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美国经济史
(第7版)

[美] 乔纳森·休斯 (Jonathan Hughes) / 著
路易斯·P. 凯恩 (Louis P. Cain)

邸晓燕 邢 露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美国经济史 (第7版)

乔纳森·休斯和路易斯·P.凯恩合著的《美国经济史》(第7版)与近年来出版的同类著作相比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本书汲取了上世纪50年代“计量革命”以来该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因而,反映了美国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势。第二,从阅读经济史来学习经济学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本书篇幅适中,通俗易懂,大凡书中出现的经济学术语,在书后均有解释,这为通过历史来学习经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认识渠道。第三,对历史理解得越深刻,就能对未来把握得越准确。从本书对美国经济史新的解释里,可以看到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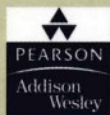
——萧国亮, 北京大学

这是一本适合所有背景的学生学习的入门教材,尤其对美国法律体系的讲解尤为全面,从对英国法律的继承直到20世纪60年代新的一系列“生活质量条例”。

——Tom Geraghty,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这本教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阅读轻松,它对美国经济史整个故事进行了精彩的解读。

——Simone Wegge, 史泰登岛学院



www.pearsonhighered.com

上架建议: 经济史

ISBN 978-7-301-18236-9



9 787301 182369 >

定价: 89.00元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美国经济史

(第7版)

[美] 乔纳森·休斯 (Jonathan Hughes)
路易斯·P. 凯恩 (Louis P. Cain) / 著
邱晓燕 邢 露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7-604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经济史:第7版:翻译版/(美)休斯(Hughes,J.), (美)凯恩(Cain,L.P.)著;邢露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ISBN 978-7-301-18236-9

I. ①美… II. ①休… ②凯… ③邢… III. ①经济史-美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F1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0124号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ntitled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7th Edition, 9780321278895 by JONATHAN HUGHES; LOUIS P. CAIN, published by Pearson Education, Inc, publishing as Addison-Wesley, Copyright © 2007 by Pearson Educatio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Pearson Education, Inc.

本书原版书名为《美国经济史》(第7版),作者乔纳森·休斯,路易斯·P.凯恩。书号9780321278895,由培生教育出版集团2007年出版。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未经培生教育出版集团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途径,生产、传播和复制本书的任何部分。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ARSON EDUCATION ASIA LTD.,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11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培生教育亚洲有限公司2011年出版发行。

书 名: 美国经济史

著作责任者: [美]乔纳森·休斯(Jonathan Hughes) 路易斯·P.凯恩(Louis P. Cain) 著
邱晓燕 邢 露 等译

责任编辑: 仙 妍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236-9/F·267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em@pup.cn

印刷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43.75印张 995千字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4000册

定 价: 8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前言

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计量历史学革命”(Cliometric Revolution)以来,对于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使得我们对于美国历史的认识不断改变和深化。写作《美国经济史》一书的主要原因便是将这些不断产生的研究贡献整合起来,形成一幅经济发展与变化的总体图景。无论是我还是英年早逝的约翰·休斯(John Hughes)都不打算“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我们对美国经济史中的大部分内容并没有进行修改。正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C. North)所写的那样,我们的理想是“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表现。”^①

写作这本书的第二个动因是现代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过去解释了我的现在。一本美国经济史的教科书应该引领我们从最初的开始走到当前。在 20 世纪 60 年代左右时,教科书中把美国在人均收入、金融与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活跃的企业家文化等各方面的经济成就描绘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繁荣的自由市场经济,一个慷慨的福利国家,一个稳定且仍在成长的经济体。在 21 世纪初的今天,情况已经与当初有所不同。过去 40 年来发生的变化根植于 1960 年以前,我们必须找到并分析那些根源,才能理解我们的现在,或者思考我们的未来。

毕竟,一个社会在实现了某种成果之后突然改变它的发展轨迹,采用同样的制度手段却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是不大可能的事。我们管理联邦政府预算的种种尝试正是过去,特别是由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看似成功的财政政策的产物。早一代的经济史学家为美国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动荡到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结束时国家世界声望达到顶峰这一胜利征途撰写了历史,而今日美国经济史的视角已与那时不同。随着 21 世纪的开始,理解经济史语境中发生了什么开始变得重要。因而,本书的讲述方式与过去的同类教科书相比,对 20 世纪投入了相对较多的空间。另外,现在对于法律和制度发展的介绍有着更为广泛的处理方法。

自从计量历史学(cliometrics)对经济史作了大量吸引人的修正之后,这本教科书就用来表述主要结论,而不注重背景经济分析。其目的是,让学生和那些并非专门研究经济学的教师也可以了解计量历史学的发现。虽然这种方法确实会忽视一些重量级的优秀著作,但很多教师会在他们的课堂上介绍计量历史学的激烈争论。与此同时,任何人都可以概括性地了解到计量历史学家们对历史修正作出的贡献。

^① Dougla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81), p. 3. 诺斯与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在 1993 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对经济史所作的贡献。

本书的组织

呈现在此的美国经济史大体按年代排序,分为五个主要部分:殖民地时期(1607—1783);国家时期(1783—1861);内战及内战后时期(1861—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1914—1945);二战后时期(1945—现在)。每一部分开始的时候,都有一篇简短的“背景综述”来介绍当时相关的政治和社会情况,以加深读者对时代的认识。

虽然本书以时代顺序组织,但根据需要会偶尔出现时间交叠的情形。例如,在关于妇女参与第三产业(tertiary sector)的讨论中(第28章)包括了对20世纪初的一些重要事件的讨论。为了保证类似这种案例的连贯性,讨论会超出直线时序之外。

本版更新内容

我们希望这个修订版能充分展示经济史学家们新近研究的活力和创新性。这项工作已经被融入本书的相关部分中。本次修订所作的最大变动是,绝大多数的统计参考资料都换成了新五卷本的《美国历史统计》(*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由于此套丛书进行了重排,很多卷的编号都不同了,这影响了本书的大部分表格和数字,但并不影响本书的基本主旨。

除了如上所述的更新之外,本书的前三部分基本没有变动。主要的变化包括:加入了劳伦斯·佩斯金(Lawrence Peskin)关于美国工业兴起的论述,相对以前的常识,佩斯金将工业在美国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大大前推。约瑟夫·戴维斯(Joseph Davis)新做的工业生产指数是对佩斯金论述的补充。本书为法利·格拉布(Farley Grubb)关于共和国早期货币供给的有争议著作补充了更多的证据。对“内战前谜题”(antebellum puzzle)也是这样,“内战前谜题”这个概念描述的是:如果身高能够合理地表征一个经济体的福利水平,那么,在19世纪中期,美国人的人均收入水平在提高的同时,平均身高却在下降,这一事实令人迷惑。第三部分的很多新材料都反映了对农业方面的关注,其中的代表是由特里·安德森(Terry Anderson)和P. J. 希尔(P. J. Hill)、加里·利贝卡普(Gary Libecap)和泽纳普·汉森(Zeynep Hanson)以及阿兰·奥姆斯特德(Alan Olmstead)和保罗·罗德(Paul Rhode)等人合著的作品。其他的重要补充包括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和安德雷·史莱弗(Andrei Shleifer)关于规则(regulation)和最优法律执行策略的研究,以及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关于关税的最新文章。

第4部分和第5部分中关于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内容都进行了重写。这两个部分中都包括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对20世纪20年代和90年代的比较研究。关于20年代的讨论,扩充了关于禁酒令的探讨,它部分是基于杰弗里·迈伦(Jeffrey Miron)的研究。关于30年代的讨论,我们纳入了艾利克斯·菲尔德(Alex Field)的观点,他认为30年代是我们最高产的十年;还有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普莱斯·菲什巴克(Price Fishback)和肖恩·坎特(Shawn Kantor)关于30年代救济体系的研究。

我们对第5部分的第27章和第30章进行了重新排序,希望使讲述更有效率。米尔

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对20世纪90年代的看法与罗伯特·戈登的观点并列于第30章新增的结论部分“兴盛的90年代”中。约翰·沃利斯对二战后年代的研究和奥姆斯特德与罗德关于战后农业的研究也是新增内容。

在这样一本教科书中,只能对新的研究发现进行简要的概括。阅读教科书永远不能与细致阅读原始文献一样。我们期望采用这本书的教师能够引导有兴趣的学生去阅读注释中和章末所附的“推荐阅读”中的材料。在先前的各个版本中,限于篇幅,一些吸引人的最新专题研究并没有被包括进来。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大学院校都提供了图书馆计算机检索服务。那些更专业的出版物大多数可以通过引用书目中的题目在计算机上检索到。

两部专业百科全书满足了经济史学家的需要。五卷本的《牛津经济史百科全书》(*Oxfor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History*)在很多图书馆的参考书收藏中都可以看到。经济史服务(Economic History Services)的网站(www.eh.net)上有一部百科全书,我们稍后还要详细讨论这个网站。

除了百科全书之外,还可以从互联网得到大量信息。在你阅读此书时,这里介绍的详细信息可能已经过时。《经济史学报》(*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和《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都收录在JSTOR(www.jstor.org)的经济学期刊中。很多学校的图书馆都向学生提供JSTOR的服务。JSTOR的原则是保持一个五年期的开放界线,即:所收录的期刊每新出一期,JSTOR上就会开放该期刊五年前同期的电子版。《经济史探索》(*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的过刊可以在IDEAL上看到,IDEAL也需要订阅。

大量历史数据也可以从政府机构的网站上获得。本次修订所利用的网站中有两个是来自商务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的。第一个是人口普查局(Bureau of the Census)网站(www.census.gov),特别是上面公布的最新一期《美国统计摘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www.census.gov/prod/www/statistical-abstract-us.html)。第二个是经济分析局网站(www.bea.gov)。联邦财政的数据可以从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网站(www.cbo.gov)上获得。最后,劳动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提供了通货膨胀、生产率以及工作时间和收入的数据。

经济史网(Economic History Net, www.eh.net)可能对很多学生来说是一个有用的网站。在它的众多栏目中,有一个“那值多少”(How Much Is That Worth?)的页面。通过这个页面,学生能找到很多有用的系列历史数据,对不同时期的数据进行比较。这个页面还能让学生对两个年份的各种经济数据进行计算,得出两年份之间的历史平均增长率。最后,通过“那值多少”页面,学生可以获得约翰斯顿-威廉姆森估算的总体和人均的名义和实际GDP、GDP平减指数(deflator)以及1789年以来的人口数量等方面的数据。这些估算定期更新,它们可替代书后列出的那些数据。

本书的网站是www.aw-bc.com/hughes_cain。那里为教授和学生提供了一些额外资料,包括章节测验、演示幻灯片;还有一个论坛,供提问和讨论。

互联网上有大量的相关网站,应该鼓励学生利用这笔丰富的资源。很多研究机构和教授都在网站上提供了大量信息。只举一个例子,芝加哥历史学会的网站(www.chicago-history.org)上有1871年芝加哥大火灾(Chicago Fire)和1886年海伊马基特广场暴动

(Haymarket Square Riot)的全面描述,还有全本的《芝加哥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Chicago*)。

对学生的益处

采用时序的方式可以让学生产生一种事件演进的感觉,令他们认识到,在美国四个世纪的发展中,经济变化和历史变化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为了直观起见,本书在书前印了一份重大历史事件年表,以提醒学生那些变化发生的顺序。

重要的经济学术语都以黑体字印出,并且给出定义,以帮助那些经济学背景有限的学生更快地掌握其内涵。所有的黑体字术语都出现在书后的术语表中。建议学生在读本书之前,先浏览这个术语表;在阅读各章节碰到它们的时候,如果需要,再去词汇表中重温。

如前所述,每一章的结论后面都有一个推荐阅读的清单,里面包括了文章和书籍。这些读物都与该章所讨论的问题有密切联系,可以用做课堂讨论中的补充阅读材料。它们为写作研究论文提供了书目文献基础。在原始材料方面,这些阅读材料也为那些被激起了好奇心的学生提供了探索专门问题的机会。前面说过,更多资料可以在本书的网站上找到。

美国经济史是理论家和决策者为改进国家经济的绩效和美国人民的福利而持续努力的“临床经验”。过去的经验是我们经济知识的重大组成部分——有助于我们了解经济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当新问题出现时如何改善经济的运转状况。正如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不知你站在哪条路上,你就无法知道将要去到何方。”

路易斯·P.凯恩, Glenview, 伊利诺伊

致 谢

当约翰·休斯邀请我在本书的第4版与他合作时,我们详尽地讨论了将要做什么。那一版,和第5版的部分内容,反映了相互间一致的目的。令人遗憾的是,执行任务留给了我。约翰是我的老师、同事和朋友。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做得更好。这个第7版是我再一次没有约翰的帮助下而做的,但我希望了解他的人仍能感知他的明显存在——恰恰是通过他的作品。本版的主要改变是加入新版《美国历史统计》信息。如果没有 Benjamin Passty 的帮助,本书不可能按时完成,他修订了日程安排以配合那卷书的延迟到来并参与了本版每一阶段的工作,非常感谢他的帮助。谢谢你, Ben。

本版有为研究者和学生准备的网站(www.awbc.com/hughes_cain)。很多使用者都能找到,但我感到奇怪的是有很多人找不到这个网址。感谢 Tawni Hunt Ferrarini(北密歇根大学)所做的工作。

这是第三次由艾迪逊·威斯利出版社出版。感谢艾迪逊·威斯利的 Denise Clinton、Roxanne Hoch、Julia Boyles 和艾尔姆大街出版服务集团职员 Ingrid Benson,感谢他们付出了时间和才干。

Stan Engerman(罗彻斯特大学)和 John Wallis(马里兰大学大学园分校)从第一版开始就是重要的顾问。在本版中,以下各位给出了详细的评论:Lee Alston(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Joseph Ferrie(西北大学)、David Flynn(北达科他大学)、Thomas Geraghty(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Ali Hekmat(东犹他大学)、Bruce Kaufman(佐治亚州立大学)、David Thornton(坎贝尔大学)、Simone Wegge(斯塔恩岛学院)和 John Wallis。从所有人那里我都获益匪浅。本版得益于他们提供的认真的评论,我希望他们在这一版中能够知晓他们的贡献。

以前版本中还应感谢其他人作出的贡献:

Hugh Aitken, 阿姆赫斯特大学

John Altazan, 新奥尔良大学

Hank Ammerphol, 皮埃蒙特中央社区学院北卡罗来纳分校

Terry Anderson, 蒙大拿州立大学

Jeremy Attack, 范德堡大学

Fred Bateman, 佐治亚大学

Jack Blicksilver, 佐治亚州立大学

Stuart Bruchey, 哥伦比亚大学

Luvonia Casperson,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什里夫波特分校

David Chaplin,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Ray Cohn, 伊利诺伊州立大学
Barry Eichengreen,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Robert Fogel, 芝加哥大学
Robert Gallman,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Robert C. Graham,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John R. Hanson, 得克萨斯农工大学
Gary Libecap, 亚利桑那大学
James Livingston, 北中央大学
Stephen McLain, 新奥尔良大学
Lee Melton,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巴屯鲁日分校
Douglass C. North,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Anthony O'Brien, 利哈伊大学
Martha Olney,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Alannah Orrison, 马鞍峰学院
Stanley B. Parsons, 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
William Phillips, 南卡罗来纳大学
Roger Ransom, 加利福尼亚大学里弗赛得分校
Hugh Rockoff, 罗格斯大学
Elyce Rotella, 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
Morton Rothstein,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
Lester Saft,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北岭市分校
Daniel Shiman, 联邦通信委员会
Richard Steckel, 俄亥俄州立大学
Dana Stevens, 南佛罗里达大学新立学院
Lea Templer, 峡谷学院
Mark Thomas, 弗吉尼亚大学
Thomas Ulen,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分校
Robert Whaples, 维克森林大学
Samuel Williamson, 迈阿密大学俄亥俄分校
Gavin Wright, 斯坦福大学

我诚邀对本版有意见和建议的每个人直接联系或通过网站对本书给予批评或评论。

我还想感谢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西北大学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们,他们对我观点的形成有所帮助。

在本版写作期间,我离开了芝加哥大学人口经济学研究中心。自从约翰·休斯建议我在研究生期间参加他的芝加哥研讨班开始,Bob Fogel 的热情极大地感染了我。Bob 是我和这本书的朋友,非常感谢有机会成为他的同事。本版的完成得益于这段经历。

西北大学经济史研究团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其贡献是无价的。Joel Mokyr 对这个项目作出的贡献,比任何人所能想到的范围还要多。Joe Ferrie 紧跟其后。Dave Had-

dock、Hilarie Lieb、Chiaki Moriguchi 正是一个作者希望到的友善同事和批评者。Dan Barbezat(艾摩斯特学院)、Joyce Burnette(沃巴什学院)、Charlie Calomiris(哥伦比亚大学)、Carmella Chiswick(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Anne Hanley(北伊利诺伊大学)、Mike Hauptert(威斯康星大学勒克劳斯分校)、Betsy Hoffman(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Eric Jones(墨尔本大学)、Brooks Kaiser(盖茨堡学院)、Laura Owen(德堡大学)、Alan Taylor(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以及一群研究生,从 Harold Williamson 开始,直到 John、Joel、Joe,全都持续在每个周四下午开会讨论。本书的大部分都产生自研讨会,我希望每个成员都能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想起我们之间的友情。对于他们的友谊和贡献,我的感谢之情难以在纸上尽述。

最后,我的妻子和女儿给了我坚定的支持。本版献给 Chelle 和 Lauren。

绪 论

美国经济史的主题是一个巨型经济体如何从一个微不足道的起点成长发展而来。以数量来衡量,这段经济史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它的结果是现在的经济为美国人提供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生活标准。

它也是一个有问题的经济体。但是,所有的经济体与理想状态相比都是存在问题的,我们的问题主要是由自己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过去的问题而产生的后果。例如,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一个工业化的经济环境,以及大规模制造业生产所带来的庞大利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建设了基本上由各种金属、化学产品和能量输送系统组成的巨型基础设施。这样的生活虽然为我们提供了不断增长的就业职位和消费品,但也带来了有害的副作用,那就是空气污染、水污染,在有些地方甚至是土地污染。

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卡车和拖拉机解决了人们的交通和其他工作对便捷可靠的动力的需求。更好的高速公路为机动车提供了便利,于是刺激了人们去郊区生活。便利的社区购物中心减少了人们开车去市中心的必要。以上这些情况进一步刺激了人们对汽车和卡车的需求。为了更好地利用农场拖拉机驱动的移动动力,人们发明了更加高效的农机设备,还出现了一些自带动力的设备。燃煤锅炉被燃气或燃油锅炉取代,进而刺激了对石油的需求,也由此产生了另外一种不同于燃煤所产生的空气污染。如今,我们在努力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经济发展的挑战带来不断产生的问题,又不断地促使我们寻找解决它们的方法,美国经济史为这个过程提供了连续的记录。经济史研究的是一个隐藏在纷杂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之下的实际过程。

有些注重经济史的完美艺术的人抱怨这种研究方式很呆板,与其他历史相比起来较为无聊。现在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史确实在某些方面缺少升华。经济史大家,比如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亨利·福特(Henry Ford)和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都缺少对戏剧性的偏好。那些在经济上作出贡献的人,很难像军事英雄艾森豪威尔或者政治人物罗斯福那样引起人们的敬仰。抛开具体人物,经济史的主题包括历史人口统计、技术改变和制度发展——与部队转移、帝国覆灭、政治争论以及浪漫的爱情相比,它们都是些枯燥的东西。况且经济史的连接逻辑是经济分析,这本身看起来就比较枯燥。

一棵孤立于高崖上的大树可能激发诗人的灵感,使他成为一个创作天才。但同样的一棵树,对于生物学家而言就触发不了那么文学性的思考。不过,如果我们想了解森林生态的话,生物学家从这棵树上获取的知识可能比诗人的灵感对我们来说重要得多。经济史对我们而言也是如此。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实透露了经济为何会繁荣,为何会停滞,又为何会衰亡。所以,如果公共政策的对象是一个繁荣的经济体,那么这个经济体的历史就对决策至关重要。经济体的未来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过去的历程。

毕竟,现在的经济是时代的典型产物,是过去的遗存。比如,我们这个时代的收入分配、工业布局、城市扩张、交通运输网络、人口的年龄和种族构成,以及私有经济利益和集体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更多的情况都是过去所作决策的后果。那些决策中的大部分都是由早已谢世的人们作出的。如果我们想要保持现在的状态,或者想更加明智地改变未来经济的运行轨迹,那么我们最好理解现在的这些关系是如何形成的。这些关系是历史这座大磨坊中的幸存者,这些成就不是轻易就可达成的;如果它们为何会以现在这种面目出现没有全面的理解,就不应该去改变它们。这种知识正是经济史的实质内容,对它的重要性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我们的经济有它的过去,这段过去还很长。

但是很奇怪,美国人不知为何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国家很年轻。这个观念部分源自现实的基础,而这个现实基础是经济和社会不断地变迁。通览我们的历史,我们是一个经历了巨大变化的国度。仅仅人口增长就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以至于每 50 年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会发生一次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的人口在 2000 年是 2.81 亿,1930 年是 1.23 亿,1880 年是 5 000 万。2000 年时,我们担心的是生态和最近记忆中的能源危机会否重演。1930 年时,这些问题才刚出现,而在 1880 年,更不会有人能想到它们。从 1776 年到两个世纪后的 1976 年,我们的人口增加了 85 倍,同期欧洲的人口只增加了 4 倍。我们也经历了工业革命,变成了一个以城市为主的国家。现在,我们只有不到 1% 的劳动力在农场工作,而这个数字在 20 世纪 20 年代高达 20%。今天,我们有近四分之三的劳动力从业于服务和专业领域;我们不再需要这些劳动力去生产粮食或者制造商品。

我们是一个喜欢新发明小玩意的国家,所以我们不断地制造和购买新东西。我们在国内到处搬家,就好像我们曾经在拓荒时期做的那样。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阶级结构可以代代相传。相反,我们的社会充满了流动的人,他们在社会上或向上或向下移动。这种持续的变化激发我们去重视每件事的崭新一面。

然而实际上,美国经济史基本是对一个位于北美大陆的欧洲式社会的研究,这里有持续了 400 年的英语区(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殖民地建立于 1607 年),持续时间同样久的法语区(魁北克城建立于 1608 年),西班牙裔在这里的时间则更长(佛罗里达的圣奥斯汀建立于 1565 年,新墨西哥的圣达菲则从 1610 年以来一直被持续占领)。不要忘记,从考古发现中还能找到更加古老的北美历史。要理解美国经济史,就必须调查这个大陆如何改造到来的移民,让他们适合它的要求。在主要国家的宪法类文献中,《美国联邦宪法》(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9)是延续使用至今的最早此类文献。美国法律中的很多内容都直接继承自其英国前身,还清晰地保留着《大宪章》(Magna Carta, 1215)的印记。

因此,美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美国拥有古老的起源、持续的制度,然而在结构和精神上又不断进行更新。研究这个复杂社会的经济进展注定是一项繁重的工作。我们将要追溯在今天非常重要的现实的远古起源——那会是一些陌生的词汇和概念,但都在 21 世纪初的今天化成了日常生活的规范。为了真正理解现代美国经济,我们需要对几乎长达四个世纪连续的社会演进进行研究。

当然,每个经济体都有一段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从研究任何单独经济体的发展而获得的知识,都对理解其他经济体的历史有所帮助。因此,学习经济史与学习经济理论一样,都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就算是经济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在一个计划经济体系中,供给和需求不能用来解释它的价格形成机制;企业竞争理论不能用来解释垄断行业的定价和产量决策。类似地,在我们理解一个社会的经济为何能以某种速度增长以及为何它的结构异于其他社会之前,我们必须通过背景信息来掌握每个社会的独有特征。

当一个人考虑美国和墨西哥——它们同在北美,彼此相邻——两个经济体之间巨大的差异时,这种背景信息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对于美国不同区域历史的分析也需要这样。17世纪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地区的土地垦殖与19世纪爱荷华州的土地垦殖就有明显的特征差异,于是我们要求助于法律史的知识以及人口和技术的变化情况。同样地,与50年前相比,今天白人女性参与劳动力的比例大有不同,于是我们必须考虑深层的经济和社会变化。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期相比,今天的政府在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重要了很多,于是我们必须就政治变化提出敏锐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完全理解这个世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美国人口比例的巨大提高,那么“高文化”问题就要被列入考虑重点。

如果要研究其他的题目(比如,地质学、地理学、气候学、农艺学、动植物遗传学),那么科学技术上的重要变化也要被纳入考量之中。在美国经济的漫长历史中,虽然一直以宪法作为基本法,但由于劳动合同变化巨大,商业组织的形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甚至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改变。因此,虽然经济史可能看起来是一个相对狭窄的主题,但其实并非如此。

最后,我们必须谨记,我们是利用历史来了解我们自己。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由于我们都是自己过去的产物,因此我们应该理性地期待对过去的研究能将我们带到当前并思考当前的实际情况,而不是带到有些人可能希望的地方去。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研究和写作历史的人都试图这样或那样地歪曲历史,以使其适应一个预先设计好的理念,产生一个“应该”的结果。比如说,我们历史上的左派作家——在19世纪、在20世纪30年代、在越南战争的激变时期——一次次地希望,在对20世纪末期的问题进行处理的时候,美国的资本主义能走向社会主义。这并没有发生。如果逻辑真的站在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那一边,那么我们何必要这么顽固?美国经济史应该能够回答这种问题。

同样,在过去70年中发展起来的混合型经济,或者说“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使自由市场理论家们失望,他们本来信奉扩大的政府职能只会是浪费而且不合逻辑。那么为什么美国人会在经济建设中坚持一种反自由企业信条而行的道路呢?我们希望能回答这种问题。如果发展混合型经济的意图是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在经过了近九十年的赋税改革和收入重新分配之后,为何财富与收入的分配还是如此不均衡?在过去的50年中,我们一直在选举无畏通货膨胀斗士入主白宫,可为什么我们还是有这么高的通货膨胀水平——跟我们第一次选这样的人时一样,甚至更高?我们的研究也会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些解答。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历史的结果,只有在历史研究中我们才能理解它们,别无他途。

我们的旅程从遥远的过去开始,那时,第一批人带着他们的法律和制度从英格兰移

民而来。1682年,威廉·潘(William Penn)——宾夕法尼亚的奠基人——写下了一些可能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有关政府的评论:

政府正如钟表,受人驱动而运行;正因政府由人制造并受人驱使,所以它们也会被人毁坏。因此,是政府依赖于人,而不是人依赖于政府。人好,政府就不会坏;如果政府出了问题,人们会治愈它。但是,如果人坏,即使政府是好的,人们也会扭曲破坏它,直到它与他们同流合污……^①

距离潘在宾夕法尼亚政府和殖民地进行他的“神圣试验”(Holy Experiment)已经三个多世纪了,我们仍旧在经济、法律、道德和司法中检验着这些命题中蕴涵的智慧。在美国经济史的过程中,我们将会看到一场辩证的戏剧,剧中人和他们的制度为了公正与公平进行着无尽的往复探索。

^① Francis Newton Thorpe, ed.,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nstitutions, Colonial Charters, and Other Organic Laws*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9), p. 3054.

目 录

第1部分 殖民地时期:1607—1783年

第1章 海外帝国	3
第2章 殖民地的发展	28
第3章 独立战争前夕的美国	49
第4章 赢得独立	70

第2部分 全国时期和宪法危机:1783—1861年

第5章 西进运动	93
第6章 人口与劳动力	112
第7章 法律与美国古典资本主义的兴起	142
第8章 交通运输、内部改进与城市化	158
第9章 农业的扩张:两种土地体系的冲突	177
第10章 关于奴隶制度的争论	198
第11章 早期工业部门	219
第12章 金融体系与国际经济	244

第3部分 工业化社会的崛起:1861—1914年

第13章 南北战争对经济的影响	273
第14章 铁路与经济发展	297
第15章 南北战争之后的农业	315
第16章 人口增长和大西洋移民	334
第17章 工业化与城市的发展	351
第18章 大企业与政府干预	378
第19章 金融发展:1863—1914年	397

第 20 章	庞大经济及其国际关系	419
第 21 章	劳动者与法律	438

第 4 部分 联邦力量的发展:1914—1945 年

第 22 章	中央管制经济的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	453
第 23 章	“常态”:1919—1929 年	468
第 24 章	大萧条	490
第 25 章	新政	515
第 26 章	战时“繁荣”	537

第 5 部分 勇敢面对新世界:1945 年至今

第 27 章	新边疆之前:战后经济	557
第 28 章	人口、劳动力和第三产业部门	570
第 29 章	战后工业和农业	601
第 30 章	新千年及未来	635
第 31 章	我们的过去还有未来吗?	667
术语表	677
译后记	684

第 1 部分

殖民地时期:1607—1783 年

北大西洋的欧洲势力发现美洲大陆并且对其进行殖民的过程,正与 15 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欧洲人口增长和民族构建的过程密切并行。那些尝试的后果大相径庭。被英格兰殖民的地区成长和发展的程度远高于其他欧洲势力殖民的地区。特别是后来成为美国的那些殖民地,在当时就取得了与当时欧洲国家相似的生活水准。在新世界的其他殖民地甚至直到今天也只能被列入“发展中”或者“转型中”国家的范畴。^① 我们研究美国经济史,必须调查研究那些对经济成长和发展作出贡献的因素。

在本部分中,我们将要把讨论集中在以下三个主要问题上:

- (1) 初始的制度特征,以及影响未来美国发展的经济行为;
- (2) 使殖民地经济能够产生内生增长、能够适应哺育了它的世界经济的地区性及行业的特殊性。
- (3) 推动殖民地经济脱离它们的最初创立者和赞助者——英格兰而独立成长的力量。

对未来的美国经济而言,从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到乔治三世(George III)这段英格兰历史最为关键。那些君主统治时期的政策决定了这个国家管理土地获取权和所有权的法律、商业惯例,以及由移民而来的人口增长方式。直到今天,美国经济的主要特征还都源自于这些遥远的起源。不论是人口还是经济都基本沿着最初建立于殖民地时期的线路成长和发展。像习惯法和保障产权这类事物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财富分配上美国相对新世界的其他部分而言较为公平。

自然禀赋必然决定了增长的模式。东海岸地区和它紧邻的腹地(最初的殖民地正位

^① 近期的大量比较研究解释了为何一些殖民地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而其他地区则没有。比如,Stephen Haber, ed., *How Latin American Fell Behi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Kenneth Sokoloff and Stanley Engerman, "Institutions, Factor Endowments, and Paths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4, no. 3, Summer 2000; and Stanley L. Engerman, Stephen Haber, and Kenneth L. Sokoloff, "Inequality, Institutions, and Differential Paths of Growth Among New World Economies," in Claude Menard, ed., *Institutions, Contracts, and Organization* (Cheltenham, England: Edward Elgar, 2000)。

于这里)拥有多种多样的土壤、矿产和气候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适应自然条件的过程中,殖民地在不同的经济活动上变得专业化起来,产生了长远的地区特色,从而使其与新英格兰、滨大西洋中部地区(Middle Atlantic)和南方地区的经济区分开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区域经济都是内部相互补充的;它们之间互有优势。但是,这最初差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区域经济成功地参与了更加广泛的国际经济。在贸易中,这些地区都更加依赖外面的世界,而不是北美大陆上的邻近地区。这些殖民地处于大西洋的边缘,一旦船只从这里出海,他们与欧洲的距离几乎同各个殖民地之间的距离一样。

历史学家约翰·麦卡斯克(John McCusker)和拉塞尔·梅纳德(Russell Menard)有说服力地指出:“殖民地经济是成功的,以18世纪的标准而言增长得很快,产生了相当广泛的繁盛局面。”反过来,这些特征使得“独立在18世纪70年代成为预想中的事情”。^② 它们也造就了社会变化。历史学家马克·埃格诺(Marc Egnal)和约瑟夫·厄恩斯特(Joseph Ernst)已经强调了社会变化中的两个基本要素:第一是由商人和富裕的地主构成的“殖民地精英”的成长;第二是“‘下层社会’(lower orders)在革命运动中的积极和自觉参与”。^③ 这个结论与进步史学家(比如,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和路易斯·哈克[Louis Hacker])完全不同,后者强调殖民地受惠于其母国。

到了18世纪中期,特别是印法战争(French and Indian War)于1763年结束之后,快速增长的殖民地人口带来的经济需求日益与母国英格兰更大的帝国目标相冲突。与西部地区(即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之间的冲突、内部经济的专业化,加上航运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这些都为那些提倡反对帝国统治的人们增加了政治动机。

到了18世纪70年代中期,13个殖民地拥有250万人口,是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的1/3,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瑞典、丹麦、瑞士和葡萄牙等国的人口数。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在这时已经开始;土地公司已经出现,并驻扎在阿利根尼山脉(Alleghenies)以西,人口也逐渐涌到山脉那边去定居。事实上,1774年的《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将西部地区作为保留地置于魁北克和英国皇室的控制之下,这本身就被认为是与该年关闭波士顿港一样的战争行动。但这些还不是全部。再次引用麦卡斯克和梅纳德的话说:

大都市区(伦敦)的商人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贪婪举动威胁到了美国人参与新兴行业,(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是传统行业的能力。议会的限制和掠夺性的英国商人引燃了美国人的恐惧,使他们以为自己陷入了失去自由的阴谋,并且会将美国的资源全部交入腐败的政治家和大都市区的海盗手中。^④

大革命继而发生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管理的失误,英国人造就了第一个独立的海外民族,这个国家在语言、法律和习俗方面永远留下了英格兰的烙印。

^② John McCusker and Russell Menard, *The Economy of British America, 1607—178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pp. 351—358.

^③ Marc M. Egnal and Joseph A. Ernst,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 29, no. 1, January 1972.

^④ McCusker and Menard (1985), p. 352.

第 1 章

海外帝国

本章为即将到来的一切布置了舞台。我们将会考察那些来到新大陆又建立了殖民地的人。美国经济史有着欧洲根源。在美国的土壤上,欧洲根源产生了相似但并不完全一致的结果。对于新世界的其他部分而言,却并非全部如此。由于这个结果已经扮演(并且一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的故事从对欧洲历史的浮光掠影式的回顾开始,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何欧洲人会对北美感兴趣。接下来,我们会审视殖民过程的普遍情况。什么人把他们的财富投资于殖民地?什么人选择了前往北美,他们又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存和工作的?在北美土地上,殖民者拥有哪些产权?最后,我们将会考察主要殖民地的历史,特别是前三个殖民地。这三个殖民地最初都是私人的冒险事业,它们的历史展现出殖民是一项具有风险的投资。接受风险、获得教训对美国经济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欧洲的扩张和发现新大陆

公元 476 年,罗马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塔斯(Romulus Augustus)被野蛮人首领奥多亚克(Odoacer)推翻,在欧洲史上,这代表了“古代”的结束。在那之后三个世纪血腥的历史中,西欧民族从西罗马帝国的文化和法律残骸中存活了下来。另一方面,依托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则创造了更加辉煌的繁荣盛景。

公元 7 世纪,古罗马帝国的大部分——不管是东罗马还是西罗马——都被不安定的伊斯兰教力量推翻了。穆罕默德死于 632 年,在其后的一个世纪中,穆斯林军队席卷了世界,清洗了过去千年的文化和王朝结构。古波斯帝国在 634 年被征服;西班牙的加的斯(Cadiz)于 711 年沦陷。下一步本是法国,但是根据历史学家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的研究,历史的趋势在这里扭转了。732 年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在图尔之役中取得了胜利,标志了穆斯林扩张的终结。

皮朗认为,正是欧洲人对伊斯兰教的反应缔造了现代西方文明。从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 742—814)时期开始了一个持续千年的欧洲人民融合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一系列“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以相似的语言、风俗、文化和王朝联系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群体。

在开始的时候,北欧的土地和劳动力组织形式变成了所谓的“封建制度”。这是一种复杂的金字塔式层级结构,从农民到国王都以共有的对土地和劳动力的义务和权利被嵌入这个结构之中。简言之,农民耕作庄园主所分配的土地,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保护和部分的供给品。而庄园主又是从国王那里获得土地。

围绕这一体系的是罗马天主教会的精神力量和超国家组织——这是历史上最庞大和最悠久的官僚机构之一。1492年,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女皇(Queen Isabella)授予哥伦布在“大洋中的一些岛屿和一块大陆上”随意所为的特许权,这援引了基督教主权国家的征服权——与此相伴的是伊莎贝拉女皇的承诺,即若她的代理人哥伦布的强力行动给任何基督教君主造成了伤害,她都要给予补偿。同年,基督教统治的西班牙从摩尔人手中夺取了格拉纳达(Granada),终结了穆斯林在西班牙持续了700多年的势力。

几个世纪中,欧洲君主们制定出了一些游戏规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所有非基督教国家都给予歧视。这在美洲得到了延续。任何基督教国家都有的征服权沉重地压在美国的早期历史之上,因为这使欧洲在美洲的殖民掠夺合法化。虽然欧洲人也不停内斗,但是他们征服和管制美洲“野蛮人”的权利从未曾被真正质疑过——在科特斯(Cortez)将墨西哥交给西班牙统治的时候没有,在19世纪美国人将幸存的印第安人驱赶到保留地的时候也没有。从对穆斯林的军事对抗开始,西方对非基督教徒的征服进行的军事反应,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长久历史传统。

通向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运动从14世纪晚期开始。15世纪,文艺复兴达到了鼎盛,欧洲在人文、政治和军事的很多领域都走在了时代的前端。历史学家通常将此作为封建主义的终结和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的开始——后者是亚当·斯密的术语,用来表述随着强大的中央集权民族国家出现的人文和制度环境。重商主义者相信国际贸易是一场零和博弈;他们相信,为了国家财富的最大化,必须存在政府的管制。这些信念一直占据了主流地位,直到美国大革命爆发;在同一时期,亚当·斯密首次提出较少的干预会使国家更加富裕。

1.1 民族国家

若以最粗略的线条来描绘,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相互争斗反映了早期现代欧洲世界的历史变革。欧洲文化进化成为一个新旧的混合体——就像罗马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的组合那样。到15世纪末,民族国家开始在欧洲出现;瑞典、英格兰、俄罗斯、法国和西班牙都出现了全国性的统治者,而德语区的人民也在他们自己的国王和贵族的统治之下聚集成群体。1519年开始的新教改革加速了这一进程。新教改革加强了英格兰、荷兰、瑞典和各主要德国公国的独立力量。城邦国家与庞大的超国家统治者的势力在消退。民族国家扩张了市场的范围。与城邦国家相比,更大的地区在财产、契约和商业上受到统一的法律管辖。

15世纪结束之前,北欧已经成为商业增长的中心。对于国内外人身和财产的更多保障,是更加稳定的政府向公认的政治结构进行法律演化的结果,这一演化过程长达几个世纪。长途贸易在海上和河流沿线不断增长,尤其是受到汉萨同盟条约规范的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这些条约包括保险业准则、协商机制,特别是个人财产权即是个人使用、出售和交换财产的权利。稳定的法律减少了事物的不确定性。这种法律的演化提高了西欧的经济发展水平。正如亚当·斯密后来所论证的那样,一个保护私有财产并且允许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法律系统,与“看不见的手”一样,能增加国家财富。

其他一些必需的制度也随着法律发展而来。早在14世纪,意大利的商业银行家们

就把分行开到了西欧各地,包括英格兰的部分地区。他们除了资助贸易以外,也资助制造业;在借贷中,他们将国王和平民一视同仁。特别地,他们使用了汇票(bill of exchange)——一种带有日期的票据,用来支付货款——减少了运输铸币和金、银条的需求,这极大地简化了对外贸易的程序。

1.2 人口模式

商业的增长意味着城市和人口的增长。尽管在形成民族国家之前,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但其也为城市增长提供了适当的供给。博洛尼亚在13世纪初的时候可能有64 000人。巴黎在14世纪初有60 000人;科隆有50 000人。此外,还有数以千计的市镇和村庄,那里进行着生产活动——食品加工、磨坊碾磨以及木制品和金属制品的制造;那里同时也是商品集散地,比如纺织品。商业活动从这些市镇和城市扩张到其腹地(城镇周边的,与其进行贸易的地区),并且沿着河流进入大海及其他更加遥远的市场。

城镇和商业的发展是不均衡的,这源自于人口的不均衡。欧洲的人口增长并不是一个持续稳定的增长过程。证据表明,从10世纪中期到14世纪早期,稳固的人口增长滋养了中世纪晚期的文明。在这段时期中,持久的投资伴随着人口增长(这不仅表现在城市不断扩张的新边界上,还表现在宏伟的哥特式教堂上),但这辉煌的一幕在14世纪由于饥荒和瘟疫的接踵而至戛然而止。最著名的一场瘟疫是1347—1348年的黑死病,它可能使欧洲人口减少了一半。据说有20万座较小的市镇和村庄变得彻底荒无人烟。复原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从那场灾难中的恢复为15世纪商业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上升的基础。正是那时,新兴的民族国家开始积极从事海外扩张。1545年,英国有320万人口,还没有完全从瘟疫中恢复过来。尽管仍有一些较小的阻滞,主要是16世纪晚期的宗教战争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但欧洲人口的增长还是为商业扩张——在那些年里人们发现了美洲并建立了殖民地——提供了力量。^①

1.3 发现新大陆

根据重商主义者的思路,物质资源是用来培植民族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为了这一目标,民族国家会进行探索、发现,并最终采取殖民行动。重商主义者们相信,价格水平与货币供给直接相关,这是货币数量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的基础知识。上涨的价格通常意味着活跃的交易、良好的买卖和税收的增加。因此,刺激欧洲人在美洲进行扩张的一个因素是国际贸易和金融,特别是为了获取贵金属。重商主义是国王和商业资本家之间的力量联盟。国王凭借商人来建立国库,商人依靠国王来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

1415年,葡萄牙人穿过北非,占领了昆塔(Cuenta),标志着欧洲人永久性海外扩张的

^① Francis Newton Thorpe, ed.,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nstitutions, Colonial Charters and Other Organic Laws*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9), p. 46.

开始。哥伦布第一次远航回到西班牙之后的1494年,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缔结了一份条约(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he Treaty of Tordezillas]),承认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league)之外发现的所有土地为西班牙所有,之后,依据这种度量方法,葡萄牙获得了巴西。德索图(De Soto)在1539年登陆佛罗里达,发现了密西西比河,后死于今天的阿肯色地区。西班牙人从陆上出发,从墨西哥向北穿过西南地区深入到了现代的堪萨斯。一位叫弗朗西斯科·科罗拉多(Francisco Coronado)的西班牙官员在1540年发现了大峡谷。这些发现确立了西班牙人对许多现属美国的地区的所有权。因此,在一个世纪间,主要因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开拓,欧洲人世界视角发生了完全的改变。

其他欧洲君主也接踵而来。首先组织到来的是英格兰。1496年,吝啬的亨利七世(Henry VII)给热那亚探险家乔瓦尼·卡伯特(Giovanni Caboto,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颁发了授权信,让他“去寻找、发现并且找出那些在此时还不为基督教徒所知的小岛、国家、地区或者异教徒的省份”。^②1497年6月24日,卡伯特到达了布列塔尼角和新斯科舍,并宣布它们属于亨利七世。他的发现(以及后来他和他的儿子的远航)确立了英格兰在新世界的最初权益,这再次改变了历史进程——但那是一个世纪之后的事情了。英格兰人一直希望能在大陆的北部水域中找到一条通往亚洲的西北捷径。在亨利的儿子和孙女伊丽莎白女王的代理人为了寻找这一捷径而进行了几次毫无成果的尝试之后,1607年,得到了詹姆斯一世(James I)特许状的一家公司在弗吉尼亚建立了第一个英格兰的永久殖民地。

英格兰并不是唯一一个对北美有所企图的欧洲国家。1608年,法国人发现了魁北克。长期在哈德逊河流域进行商业贸易的荷兰人在1624年建立了后来的纽约城。由瑞典人于1643年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后来成为宾夕法尼亚地区,这块殖民地于1655年被转让给荷兰,后来又被转让给了英格兰。

到1650年,西班牙人、英格兰人、荷兰人和法国人都在后来成为美国和加拿大的地区建立了殖民地。这四股势力都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荷兰是共和政体)。西班牙和法国代表了欧洲的军事威力,这事实上是它们的主要兴趣。荷兰和英格兰则代表了席卷北欧的商业革命(这部分是由西班牙从美洲获得的金币引起的)。英格兰将对我们的历史产生最关键的影响。

2. 海外的英格兰

2.1 投资者

当英格兰追随卡伯特的发现而开始实际建立殖民地的时候,新世界的富庶已经变成了传奇。运往西班牙的黄金和白银(其中一些被英格兰海盗中途截取)已经在整个欧洲流通。在1588年击败西班牙舰队之后,以船只和金钱的方式参与了战争的英格兰商人

^② Francis Newton Thorpe, ed.,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nstitutions, Colonial Charters and Other Organic Laws*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9), p. 46.

开始寻求有获利前景的投资项目。^③ 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和其他人绘制的地图和写作的笔记使英格兰的领导人对北美殖民地的前景有所了解。他们熟知能从北美找到的某些资源,尤其是可供应船只木材、桅杆和松脂制品的潜在资源。他们熟知西班牙的佛罗里达殖民地以北的定居点。此外,他们仍然对通向东方的西北通道抱有些许希望。英格兰人在临时的渔猎营地和东北海岸沿线的废弃定居点与印第安人交易获得皮毛;法国人在加拿大交易而来的皮毛也可在欧洲买到。很多英格兰船长都因为交易而上岸。在1605年,探险家乔治·魏茂斯(George Weymouth)爵士带回了五个印第安人,并在伦敦进行展览。尽管早期有失败的经历,很多商人和其他资本家都准备在殖民事业中进行风险投资。

谢泼德(Shepherd)和沃尔顿(Walton)为英格兰的殖民试验提供了经济上的解释。^④ 英格兰的经济虽然是多元化的,但仍然以农业为主。它的劳动力和资本都充足,但是相对而言,自然资源比较少。他们认为,生产农产品的成本是递增的,而制造业的生产成本是固定的。收入水平和人口密度都足以提供一个分散的市场,从而实现以最低的成本制造产品。

另一方面,如果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则会出现收益递减并导致成本(及价格)上涨。北美大陆的自然禀赋极佳,但是既没有劳动力也没有资本(即没有英国人计划使用的劳动力)。最初的时候,高成本(包括个人风险和不确定性)遏制了移民和殖民地农业的发展。然而,随着对英国农业产出的需求增加,英国的成本上涨了,而殖民地农业的成本相对降低了。在某个点上,殖民的冒险行动被证明是有利可图的。边做边学(包括当地人免费分享的知识)有助于解决之前的个人风险和在未知土地上进行生产与跨洋运输的不确定性问题,这导致殖民地农业的成本进一步降低。于是更多的殖民地被建立起来。

从通常意义上讲,这些殖民地都是与国内经济分离的孤岛。在很多方面,用发展经济学家使用的“飞地”这个术语来类比最初的美洲殖民地情况是合适的。^⑤ 从现代意义上讲,在非工业化的环境中一块典型的飞地就是存在的目的通常是进行天然产品的生产,可能还会对其进行部分的处理加工。建立飞地能够获利的原因是,这些产品在出口市场中具有高价值。这一价值弥补了因缺少工业和国内市场而引起的制造成本上升以及运往母国市场的运输成本上涨。企业几乎无需适应当地环境。设备、供应品和专业技术劳动力都是引进的,运输和港口设施则是企业自己建设。

然而,今天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工业飞地与北美殖民地有着明显的不同。在17世纪初期,尽管原材料采掘业也是期待中的获利途径之一,但英国殖民者对农业更加偏好。英国殖民者的态度与今天建立飞地的公司不同,也与在新大陆其他地方的欧洲殖民者不同。英格兰殖民者认为北美可以被看做是一片无主的空地,一般而言,殖民地在这块空地上的生产活动不利用本土劳动力。事实上,虽然当地土著在皮毛贸易和为他们提供必

③ 参见 Francis Dillon, *A Place for Habitation, the Pilgrim Fathers and their Quest* (1973), p. 23; David Beers Quinn, *England and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1481—1620* (1974)。

④ James Shepherd and Gary Walton, *Shipping, Maritime Trad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lonial North America* (1972)。

⑤ 参见,例如 Stephen Lewis, Jr., “Primary Exporting Countries,” in Hollis Chenery and T. N. Srinivasan,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II (New York: North-Holland, 1989)。

要的农业知识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他们几乎从未尝试过开发这种劳动力供给。除了防卫之外,殖民者们认为他们的一切决定都应该与当地土著的意志无关,这就是说,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不必寻求当地社会的帮助。

英格兰人通过几种方式来组织他们的海外冒险事业。第一批殖民地是由私人通过股份有限公司来资助的。组成一家拥有皇家特许状的股份公司(joint-stock company)的方法,是一种确立合作关系的形式,在公司中每个合伙人按照他们的投资额来分配股份。安·卡洛斯(Ann Carlos)和其他人的著作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当时有多少英格兰公司采用了这种看起来相当现代的组织形式(比如,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⑥像伦敦的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这样的股份公司,虽始于皇家特许,但促成其事者实为私人的资本和积极参与。特许状界定了公司的权利、特权、义务,以及运营地点。商人和其他私营的个人承担建立不列颠帝国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后来,弗吉尼亚等地的殖民政府都被王室接管和直接操控,使它们都成为了皇家殖民地(royal colony)。在一些情况下,因为国王的个人喜好,广泛的权力和大面积的土地被授予个人经营者,比如费迪南多·戈治斯爵士(Sir Ferdinando Gorges)、巴尔的摩勋爵(Lord Baltimore)和威廉·潘。虽然这些业主殖民地(proprietary colonies)在一些方面很像小王国,但是这里的公民享有其他英格兰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包括代议制政府机构。

建立一个殖民地需要大笔的资本开销。如果这个殖民地的建立过程失败了,那么这笔开销就不得不翻倍,因为几乎没有可以重复利用的机会。维持一个殖民地的补给则需要每年追加支出。如果没有发现可开采的矿产资源,那么殖民地就很难成为可行的商业事业,除非能够在此建立产品生产基地。为了维持贸易中心(即交易场所或者港口)而花费的日常开支也是需要投资的项目。英格兰和其殖民地之间的商业需求要求快速建立一个贸易中心。

在异乡生活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需要在新世界重建欧洲式的城镇生活环境。本就陌生的环境里居住的都是持有与英格兰人的公平竞争精神所不同的观念的本地人,这导致殖民者建立起封闭的、防御性的定居点。在新大陆上,为了保障对土地“公平而有利的分配”,为了“保留和推广”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为了抵制“傲慢和利益”的诱惑,他们聚集在几个中心地区,而不是各自分散在广阔的地域中。简言之,城镇是那时定居点的通行模式;若非如此,殖民的预期收益就会受到危害。杰克逊(Jackson)和舒尔茨(Schultz)断言:“从一开始,美国就是一次聚群而居的演习,一场社会秩序的实验。”^⑦

直接或者通过补贴形式进行的公共集资是另外一种理论上可能的投资方式,但在现实中则不大可能实现。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公共利益被忽略。^⑧奎因(Quinn)认为,即使是

^⑥ Ann Carlos and Stephen Nicholas, "Giants of an Earlier Capitalism: The Chartered Trading Companies as Modern Multinationals,"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62, no. 3, Autumn 1988; and "Theory and History: Seventeenth-Century Joint-Stock Chartered Trading Compan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6, no. 4, December 1996.

^⑦ Kenneth Jackson and Stanley Schultz, eds., *Cities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2), p. 41.

^⑧ 参见 Wesley Frank Craven, *Dissolution of the Virginia Company: The Failure of a Colonial Experiment* (1964), pp. 24ff. 几乎所有的殖民地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资助。通常有最初七年的免税优惠,而且英格兰承担了政府成本中的一大部分,特别是在防御方面。

对得到特许状的英格兰公司而言,“在大西洋沿岸建设一道壁垒来阻止西班牙殖民力量进一步扩张,并建立一个基地……来攻击西班牙现有的殖民地和从它们那里驶出的昂贵的板舰队(plate-fleets)”,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⑨第二个因素是“新的地中海型农业”的建立。如果北美能够出产酒、橄榄油、无花果、柑橘和糖这类产品,英格兰就能扩大它的贸易,同时减低它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性。这两个因素支持了在西班牙殖民地北边建立殖民地的位置选择。

我们并不清楚商人的冒险活动是由探索新大陆的冒险精神激发的,还是因为他们确实觉得这种行动符合不列颠的最佳长期利益。历史记录基本上将这些商人描画为经纪人;若是能成功估计风险,那么这种行动的回报是赢利,但是,事实上风险可能比他们预期的要高,而收益则比预期低。在很多案例中,即使是最具远见的投资者,他们所期待的能够开始赢利的时间也比他们实际需要的时间短。

1584—1587年,最初的弗吉尼亚殖民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北纬36°——是免受西班牙威胁的,它靠近英格兰能攻击到西班牙舰队的地区,并且也具有适合地中海型农业的温和气候。然而,这时的公司规划不足,资金来源也不充沛。当时选择建立殖民地的地点缺少高效率的港口设施,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主要资金似乎都来自于从西班牙人那里抢劫到的战利品。此外,存在一个在后来才显现出来的问题,即几乎没有英格兰人熟悉的与地中海型农业相关的密集组织和专业化技术。^⑩詹姆斯敦(Jamestown, 1607)定居点在开始的时候较之前的定居点有一些优势,但是它之所以成功,却完全是由于来自英格兰的持续投资。还有很多事情要学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2.2 人口

英格兰人很难找到足够多的殖民者愿意提供他们的劳动力,尤其是在殖民地建立之初。从弗吉尼亚和普利茅斯发回的早期报告都不甚乐观。那些自愿航海去美洲的人来自各个行业,动机也各不相同。一些人因为宗教原因来到美洲,希望在这里能够践行在欧洲遭到压制的信仰自由。英格兰的清教徒,法国的新教徒、天主教徒、贵格会教徒,以及来自德国的门诺派教徒,都是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人是作为独立移民来到美国的,他们拥有足够的资本购买土地,之后开始经商或者从事其他职业。可能有一半以上的白种人是作为契约劳工来到美国的,在这里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来抵充到达新世界的旅途费用。非洲人则以奴隶的身份到来。另外,还有数千皇家犯人——债务人、罪犯和战俘——在签署了用劳动换取自由的契约之后也来到了美国。我们将在下面对他们一一进行讨论。

2.2.1 自由人口

对那些自己筹资来到美洲的人来说,在大多数殖民地中,仅仅是跨过大西洋而来这一行动就会为他们带来人头权土地授予(headright land grants)(针对个人的土地授予),并且他们可以从大多数殖民地政府那里购买土地。当然,来美国的不只是农民;从最初

^⑨ Quinn (1974), p. 288.

^⑩ Ibid., pp. 289 and 294.

开始,移民中(在第一个弗吉尼亚殖民定居点之外)就有着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小商贩、水手、车夫和学者。整个成熟的英格兰商业生活序列都出现在了殖民地的场景之中,特别是在海港。虽然,根据英格兰法律和习俗,政府对价格、工资、营业执照的发放和服务质量等方面拥有控制权,但那些独立到来的人可以自由订立他们的服务合同,就像在英格兰一样(详见下一章)。

2.2.2 契约劳工

殖民地的劳动力供给永远不够。契约劳役(indentured servitude)是增加白人欧洲劳动力的制度手段。个人订立合同,在一段时间中(通常是四到七年)做某种工作,作为交换获取横跨大西洋的交通费以及其他特定报酬的手段,这些报酬主要包括食物、衣物、居住,可能还有某种手艺或技能的教育和培训。^① 契约合同中经常包括一项“自由奖励”(freedom due),即在成功完成契约之后会得到一定数量的钱财或者土地。大卫·盖伦森(David Galenson)认为,这种契约是英格兰“农场服务”观念的继承和延伸,本质上是一种农业学徒制。^② 在合同期满的时候,劳工变成了自由人口和自由劳动力的一份子。阿兰·库利科夫(Allan Kulikoff)强调“对土地的渴望”是自由人口和契约劳工出现的共同动力。^③

随着切萨皮克湾周围的殖民地中种植园系统的崛起,对契约劳工的需求飞速增长。事实上,盖伦森所分析的超过20000名劳工中的大多数都去了切萨皮克。他们主要是20岁左右的男性。他们最常从事的职业是:农夫、工匠、(非熟练)工人和家庭佣人。

盖伦森和罗伯特·希夫纳(Robert Heavener)的文章向我们详细展示了此种形式的非自由劳动力的市场存在之广泛。^④ 数以千计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来到美洲;盖伦森估计在1650—1780年间白人净移民的数量达到了600000。在白人移民中的契约劳工流向切萨皮克地区的比例估计在一半到四分之三之间。这些人可以在英格兰与海船船长或者进行劳工贸易的商人自愿签署契约合同。盖伦森找到了大量的潜在劳工与契约提供者之间的交易记录。契约持有人在英格兰支付旅途费用,在到达美国港口之后,通常在船上、劳工登陆之前,这些合同(和人)就被卖出。而购买价格等于所有成本再加约百分之五十。一般而言,考虑到殖民地的市场情况,出售价格取决于劳工的年龄、性别和技能。契约合同拥有法律地位,如果权利受到侵害,劳工可以向法庭起诉。劳工在服役期内生育的孩子是自由的。但是习惯上,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地区,这些孩子在十几岁的时候会成为学徒以学习贸易技能。埃德蒙·摩根(Edmund Morgan)在《清教徒家庭》(*The Puritan Family*)中提出,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让父母免除应付自己的青春期子女的麻烦!

法利·格拉布(Farley Grubb)和托尼·斯蒂特(Tony Stitt)认为,18世纪初,殖民地对白人劳工的依赖转变成了对黑人奴隶的依赖,这一突然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威廉三世

① 如果合同中的条款没有完成,签署合同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起诉另外一方。

② David Galenson, *White Servitude in Colonial America: An Economic Analysis* (1981), p. 9.

③ Allan Kulikoff, *From British Peasants to Colonial American Farmer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Kulikoff也讨论了印第安人在新社区发展中的作用。

④ David Galenson, "Immigration and the Colonial Labor System: An Analysis of Length of Indenture," *EEH*, October 1977; Robert Heavener, "Indentured Servitude: The Philadelphia Market, 1771—1773," *JEH*, September 1978.

(King William III)时期的战争,特别是安妮女王(Queen-Anne)时期的战争。由于战争减少了壮年男性劳动力的供给,导致了契约期限的缩短,进而致使劳工的有效价格提高。^⑮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契约劳工市场复兴起来,但再也没有达到之前的数量。

2.2.3 出卖劳力来抵偿船资之移民

从欧洲大陆来到殖民地的移民,特别是德国人,与英格兰移民的情况不同。这些人被称做出卖劳力来抵偿船资之移民(redemptioners)。海船船长将他们带来,并在到达后给他们一段时间筹集船资。他们一般把自己的一个或者几个孩子卖做契约劳工来筹钱。英格兰劳工通常是独自到来,相反,德国人却是全家移民,同时带着他们自己的给养和动产。^⑯

2.2.4 犯人

发配重罪犯到美国以获得劳动力是一个不太常见,但可能非常著名的方法(感谢好莱坞)。犯人在码头被卖做契约劳工。在这些情况中,被称做“国王陛下的七年旅客”的这些男女,是在英格兰犯了三百多项死罪之一的犯人,在愿意将自己流放到其他地方的条件下,他们被允许继续生存。

这群移民在殖民地并不受欢迎,但英格兰的监控殖民地运作的商会律师们反复试图通过针对他们的立法。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这种移民输送活动一度中断,但1783年《巴黎条约》的签署(有时候被混称为《凡尔赛条约》)之后,英国法庭仿佛没有注意到美国已经独立,重新开展了输送罪犯活动。在1788年,美国国会最终决定禁止从英格兰输入罪犯,从此英国将澳大利亚变成了新的犯人流放地。

送往美国的囚犯之中还有其他的特殊种类:叛乱者和战俘。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清教领袖约翰·科顿(John Cotton)写给他的朋友克伦威尔(Cromwell)的信中,简短描述了这类特殊的早期殖民地劳动力。与罪犯不同,这些军事犯多是壮年男子,所以特别紧俏:

这些苏格兰人,经由上帝的安排送到了你们Dunbarre,并从那送到各处。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尽我们所能地)让他们生活得更美好一些。譬如得了坏血病或其他疾病,而不缺医少药。他们并没有被作为奴隶出售,处于永久的奴役状态,而只需工作6年、7年或8年,就像我们一样;(我听说,)买下大多数劳工的那个人,为他们建造了房屋,每四个人住一所房子,并把那附近数英亩的土地赋予他们,让他们在这些土地上耕作,每周3天(轮流)为他工作,另外4天为他们自己。他还许诺,只要他们能偿还他们为付出的花费,他就赋予他们自由。^⑰

船长把劳工和犯人当做他们的货物,无疑会以他们来直接换取殖民地的产品,在返航的时候带走。这种交易对各方均有利。后来,到18世纪中叶的时候,随着母国国内情况的改善、殖民地人口的自然增长、殖民地对欧洲商品需求的上升加上充裕的黑人奴隶

^⑮ Farley Grubb and Tony Stitt, "The Liverpool Emigrant Servant Trade and the Transition to Slave Labor in the Chesapeake, 1697—1707: Market Adjustments to War," *EEH*, July 1994.

^⑯ 参见 Farley Grubb, "The Auction of Redemptioner Servants, Philadelphia, 1771—1805," *JEH*, September 1988.

^⑰ Thomas Hutchinson, *The Hutchinson Papers*, vol. I (Albany, NY: The Prince Society, 1865), p. 264.

供给,对白人契约劳工的需求较早期有所降低。平均来看,黑奴比白人劳工贵,因为对买家而言,与他们签署的“契约”优于与白人劳工所签署的那种。因此,奴隶的利润更高。

2.2.5 奴隶

非洲奴隶不像英格兰人那样受到保护;他们是没有权利决定自己命运的人。他们的服务期很快就变成了一生,并且,如果母亲是奴隶,那么她所生的孩子也终其一生都是奴隶——不管他的父亲是谁。孩子的身份随其母亲的观念源自《圣经》。因此,女性奴隶“卖身契”的购买者同时获得了那份契约所带来的自然增长。直到美国内战结束奴隶制之前,这条规则一直沿用。

非洲奴隶在法庭上毫无地位。没有任何不列颠法律管理他们,并且殖民地自己创制的法律也不允许奴隶申冤。然而,法律确实允许奴隶主对“不听话”的奴隶进行体罚,有时甚至造成他们的死亡。在古代罗马奴隶制中,领主可以处死不服从的奴隶;在美国殖民地中,这种极端的方式通常不被禁止,但是人们假设,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情来“损坏自己的财产”。

关于美国奴隶制的研究文献有很多,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详细讨论。^⑩ 在此,我们只要说明奴隶制被认为对殖民地经济的发展是绝对必要的就足够了。奴隶制始于1619年的弗吉尼亚,正如埃德蒙·摩根所说的那样,它与殖民地中美国人的自由思想的发展是同步的。在北方的农业活动通常基于较小的、适合家庭耕作的地块;劳动力通常由家庭自身提供。奴隶制存在于所有的殖民地中,但在南方,其使用范围则广得多。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奴隶制无疑是由种族歧视带来的,但是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其发展的根本动力,特别是在南方的烟草、大米和靛青种植园中。这种需求之下黑人奴隶制应运而生。

在弗吉尼亚,土地和劳动力可以在一次交易中被同时购得。进口而来的奴隶在获得人头权授予方面与进口的劳工一样好用。由于购买奴隶所获得的净收益比购买契约劳工高很多,因此奴隶的价格也相对较高。奴隶的运输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奴隶主为他们承担的衣食费用又不受法律的监控;服务期满——就是他们死亡的时候——除了一个简单的坟墓,也不需要再对他们发放自由报酬(freedom payments)。

伟大的美国法理学家詹姆斯·肯特(James Kent)在1826年写作他的《英国法注释》(Commentaries)时,因美国奴隶制的持久存在而感到尴尬。可能没有任何对美国奴隶法律地位的描述——即使是最耸人听闻的作品——能比肯特下面的短短的几行文字更具有启发性:

尽管在刑事检控中并非如此,然而奴隶一般被视做物品或者财产,而不是人,他们是可销售的个人财产。他们不能通过继承或者购买获得财产,他们所发现的和拥有的一切,都属于他们的主人。他们不能订立合法的合同,他们被剥夺了公民权利。他们是遗嘱执行人手中的资产,可用来偿还债务,无论遗嘱如何,都不能损害债权者的利益来解除他们的奴役状态。在奴隶的卑微与领主的完全支配和权力这两方面,

^⑩ Kenneth Morgan, *Slavery, Atlantic Trade and the British Economy, 166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探讨了奴隶贸易对英国经济的影响。他的 *Slavery and Servitude in North America, 1607—1800*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对这个复杂的论题进行了简短的小结。

他们的境况都更加接近古代的奴隶,而不像封建时代的农奴。^①

1776年之前的殖民地法律不能与英格兰法律发生矛盾。1772年,在伦敦审理的萨默赛特(Sommersett)案中,大法官威廉·曼斯菲尔德(William Mansfield)勋爵坚持英格兰法律不支持奴隶制。这个裁决最终导致了19世纪30年代英属加勒比群岛的有偿奴隶解放,以及在英帝国内和平地消灭了黑人奴隶制。但是,对美国来说,它来的太晚了。经过独立战争之后,奴隶制被联邦宪法承认(在国会所作的分配中,每个奴隶相当于五分之三个人);萨默赛特案过去90年后,在奴隶制和州权的混合中,美国人终于通过一场血腥的内战解决了这个问题。早在1808年,宪法就禁止了国际奴隶贸易,但是政治和法律手段都不能为这一根植于美国社会中的制度找到和平的解决途径。

2.3 土地

从最初开始,殖民者就被认为是英格兰臣民,殖民地也被视做是英格兰的土地。詹姆斯国王在1606年的宪章中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他说,从弗吉尼亚出发的殖民者们“将在任何我们的领土上拥有并且享受所有的自由、选举权和豁免权……就像是在我们这个英格兰国国内居住和出生的一样”。^②

我们在前面提过,欧洲人认为,只要是从非基督徒手中夺取土地,他们的征服活动就是合法地将土地所有权纳入基督教范围内。如果那片土地找不到非基督徒的所有者,那么仅仅是发现就足以让他们拥有土地。这对英格兰和所有其他欧洲国家都适用。比如,英格兰人以发现为由宣布对纽约的所有权,并认为荷兰在此的殖民地是侵权的。他们最终通过战争和谈判从荷兰手中得到了纽约。至于那时居住在纽约的印第安人,要么从英格兰人那里接收土地(就像易洛魁族人[Iroquois]所做的那样),要么就只能被驱逐或者杀害。

2.3.1 财产权

理论上,所有的英格兰土地都属于国王。他是唯一并且绝对的所有者。只有他——作为最高领主——的财产权才不是来自任何人的,除了上帝。他是土地“赠送人”(donor),没有他的授权,臣民是没有土地所有权的。根据英格兰的封建制度,所有的土地所有权都是由国王授予并为国王服务的。所有的英格兰男性在他们的土地上都是国王的佃户,而女性一般不拥有土地。这在殖民地的继承法和习俗中很容易被理解。当一个男性去世的时候,他通常将自己的不动产传给儿子,但是其遗孀可以使用部分或者全部的财产,直到她也去世或者再婚。寡妇拥有土地所产生的收益的所有权,但不是土地本身。^③ 英格兰人发展出了一套详尽的用于地权移交的技术,包括在1667年通过《欺诈条

^① James Kent, *Commentaries of American Law* (Boston: Little, Brown, 1884), vol. II, p. 253.

^② Thorpe (1909), p. 3788.

^③ Marylynn Salmon, *Women and the Law of Property in Early America* (1986). 一种可能的例外是,一个男性在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遗嘱。他的妻子有权得到一部分维持生活的财产,但是这种所有权只在她活着的时候有效。她可以使用这部分财产,但不能将土地出售或者转让给任何人。在她去世之后,这部分财产的所有权又回到她丈夫的继承人名下。也参见 Carole Shammas, Marylynn Salmon, and Michel Dahlin, *Inheritance in America* (1987); and Alice Hanson Jones, "The Wealth of Women, 1774", in Claudia Goldin and Hugh Rockoff, eds., *Strategic Factor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1992)。

例》(The Statute of Frauds)之后的书面土地契约。安全的土地所有权为建立普遍的安全财产权提供了一个先例。

在今天的美国,国王的职能发展成了州政府的职能。因此,如果你不纳财产税,那么你的产权就会被剥夺掉相当于税款的一部分。在其他国家,土地可以被自由地(allodially)拥有,具有绝对的权利,但在美国不是这样。这是我们从英国继承而来的未被引起重视的部分。据笔者所知,美国人民从来都没有被问过他们希望以什么样的权利来拥有土地。

2.3.2 印第安人的土地

欧洲人交易土地的技术对剥夺印第安人的土地至关重要,因为印第安人没有拥有私有财产的传统,也没有书面的所有权证明。他们可以通过授权、购买或者条约的方式从国王(或其代理人,包括殖民地政府)那里获得土地(他们自己的土地或者别人的),但是他们对自古以来自己就在其上狩猎的土地没有“自然的权利”,只有“居住权”(occupancy)。这实际上非常脆弱,因为欧洲法律不认可印第安人“居住”土地的方式。正如特里·安德森(Terry Anderson)和佛瑞德·麦克切斯尼(Fred McChesney)所说,在开始的时候,实际上直到19世纪,这种土地居住权是被尊重的,欧洲人更倾向于通过交易获取土地。^②所有的殖民地政府都试图(但未必能成功)限制个人殖民者从印第安人那里购买土地。这个政策是必要的,因为任何特定部落宣称的权利都只能从白人自己那里获得书面证明。

虽然印第安人也在他们的部分土地上从事耕作农业(毕竟,他们与第一批欧洲殖民者分享了他们的耕作技术),但是,他们自然更喜欢传统的膳食结构,其中包括了野生动物提供的肉类。欧洲人习惯于食用驯化动物所提供的肉类,这意味着采用印第安膳食则人均需要的土地会更多。据斯坦利·莱伯格特(Stanley Lebergott)的报告,欧洲人每人需要土地2英亩,而印第安人每人均的土地需求是他们的1000到2000倍。^③按照欧洲人的土地利用计划,北美土地对欧洲人的价值远远高于对印第安人。这并非为欧洲人夺取土地正名。这里只是简单指出,以印第安人觉得合理的价格从他们手中购得即使是几英亩土地,也能获得长期的资本收益。随着欧洲人口相对于印第安人口的比例提高,后者的土地密集型生存方式越来越受到威胁。^④

2.3.3 个人的土地获得

除了从印第安人那里得到土地,欧洲白人还通过以下五种主要方式在美国获得土地所有权:(1)建立殖民地公司获得的所有权股份;(2)人头权授予(headright grants);(3)从政府手中购买;(4)优先购买权(preemption)(“擅占者权利”);(5)出于特殊目的的政

^② Terry Anderson and Fred McChesney, "Raid or Trade? An Economic Model of Indian-White Relation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94.

^③ Stanley Lebergott, *The Americans: An Economic Record* (New York: W. W. Norton, 1984), p. 16.

^④ 这些年中,关于土著部落在经济中的地位的综合,最好的调查来自 Neal Salisbury, "The History of Native Americans from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Europeans and Africans Until the American Civil War," in Stanley Engerman and Robert Gallm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1996)。关于西部边境地区的财产权的演化,是 Terry Anderson and Peter Hill, *The Not So Wild, Wild West: Property Rights on the Fronti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的研究主题。

府授权。

1. 所有权股份

在弗吉尼亚和普利茅斯的例子中,一些地权是按照股份进行分配的。在弗吉尼亚,如果投资者对公司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却没有获得完全的公司成员资格,那么他们会被授予大块的土地。数千英亩的土地最初就这样被分配出去。

2. 人头权授予

人头权授予是指,每个跨过大洋的男性、女性或者儿童都能获得 50 英亩的土地。(具体数额会有相当大的波动,特别是在弗吉尼亚。)这就是说,如果人头权授予是 50 英亩,那么一名男性来到美洲,他会获得 50 英亩土地。如果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其他人,那么按照人头权,他可以得到 250 英亩土地。这一政策在弗吉尼亚、纽约、新泽西、卡罗莱纳及马里兰、宾夕法尼亚和佐治亚的部分地区实行。起初,在弗吉尼亚,对人头权授予没有什么限制,但随着这种特权被滥用而带来的负担的出现,政策进行了修改。在一个既需要垦殖土地又需要人口的国家,人头权利系统对建立殖民地的过程具有强大的刺激作用。

3. 从政府手中购买

所有的殖民地最终都发展出了一套由政府直接将土地售出的手法。第一个试图通过销售将其几乎所有的土地转让出去的是宾夕法尼亚。威廉·潘拥有 4 700 万英亩土地的授权,并希望将它们中的绝大部分出售。到 18 世纪中叶,所有的殖民地都形成了以金钱换土地的交易惯例。

4. 优先购买权

对于优先购买权,或者说土地的实际使用者得到土地所有权的方式,各方的态度并不相同。在南方和中部的殖民地中,优先购买权的方式受到鼓励,但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则相反。“擅占者权利”的问题在 18 世纪 50 年代以后备受瞩目,当时增长的人口开始关注西部广大的旷野地区。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人开始去那片空旷的土地上定居,他们或是没有钱,或是不具备法律知识,也可能根本不在乎法律。到了独立战争结束的时候,这股西进的涓涓细流变成了洪水。

居住在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的擅占者(squatters)早就存在了。事实上,在马萨诸塞地区,1630 年之前就有擅占者。康涅狄格最早的移民技术上讲都是擅占者——他们未获许可就搬到了那个地区。佛蒙特早在 1752 年就有大量的擅占者。著名的民兵武装格林山兄弟会(Green Mountain Boys)就是一批为了保卫自己开垦的土地而武装起来的擅占者。在新英格兰地区,擅占者的定居点受到政府抵制,但在中部和南部的殖民地中,擅占者被当做开拓先锋受到欢迎,拥有大量土地的政府在优先购买权方面十分慷慨。

5. 出于特殊目的的政府授权

殖民地政府也出于各种特殊目的进行土地授权,比如鼓励定居,发展工业,修筑桥梁、渡口或者其他任何原因。在马萨诸塞,在边境城镇中,土地被授权用来建立新的宗教会所。被称作圣职附属地(glebe)的土地被授予教会。士兵一般因为他们的服役而被授予土地。特殊贸易和服务也被授予土地:威廉姆大学的建立者威廉姆上校得到了一块 200 英亩的土地,用于修建贸易站和磨坊;在马萨诸塞,一个叫做霍巴默克(Hobbamock)的印

第安人因提供翻译服务而得到土地报酬。

通过以上方式,殖民地的土地上慢慢都有人居住了。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的权利成为之后美国经济发展的至为重要的背景。殖民地的土地所有权包含了未来美国资本主义的种子。

通常认为,不动产的私人所有权是“一系列权利的集合体”。土地购买者的权利与地主和小佃农(*sharecropper*)的权利不同。在诺曼征服之后数个世纪的英格兰,基于共同义务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封建关系网络,这带来了一套错综复杂的不动产所有权。那些权利——所有权的内容——被称为土地占有权(*tenure*)。幸运的是,殖民地的土地法相对简单,因为王室只允许在美洲建立一种占有权,那就是自由永佃权(*free and common socage*)。在新大陆的其他部分存在着更多种类的土地占有权;在这样的地方,相对更加不公平的土地财产分配制度一直保持到今日。自由永佃权的主要特征包括:

- (1) 它是永久的(不受任何年份期限的限制)。
- (2) 它可以被继承人直接继承(而不需要土地捐赠人进行再次授权)。
- (3) 它可以通过遗嘱传递。
- (4) 由它而产生的义务必须是“固定的和确定的”。
- (5) 存在完全的废置权。
- (6) 自由永佃的土地可以被其所有者自由转让(即可以出售)。

在英格兰,军用土地的占有权在无限继承权(即继承者有绝对权利处理地产)上也具有上述特征。那时,美国人开始把他们的占有权称作无限继承权(*fee simple*),从此“永佃”(*socage*)这个词从普通用语中消失了。

不管它的名称是什么,这种占有权所附带的义务(代价)一般包括每年向捐赠人支付的固定的保留土地租金。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所有的附带义务都被并成一笔定期缴纳的代役租(*quit rents*),这意味着支付了这笔租金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免除”所有其他义务。这种代役租最终演变成了现代美国的地方财产税。如果捐赠者(在今天,是州政府及其地方单位)没有收到代役租税,那么土地的占有权就会消失,土地所有权又回到捐赠者手中。一些殖民地居民抗拒缴纳这种税赋,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税赋是“外来的”,是不公平的。在一些殖民地,定居点的与世隔绝使得征收活动难以进行。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了解要旨即可,不必更加深入地去探讨这个复杂的土地法问题。^⑤ 购买了土地的美国人可以把土地卖出去,如果他愿意的话;买者和卖者拥有同样的权利。土地可以被分割,或者改变性质(砍树、开荒、开矿、凿井、挖湖)。与卖者相关的只有售价。卖者可以保留部分权利——比如,矿产权。由于维持土地占有权需要缴税,所以闲置土地是需要成本的,同时也刺激人们只会保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这些土地为他们带来的收益超过税金。普遍认为,正是这种力量促使家庭农场成为土地开发的主要形式,除非那块土地上有大量的其他可开采资源——比如,木材、矿石、水——或者除非那块土地可以以超过税金的价格租借出去或者租佃出去。

^⑤ 关于各个殖民地遗产传递中实际情形的差别,参见 Lee Alston and Morton Owen Shapiro, "Inheritance Laws Across the Colonie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JEH*, Vol. 44, no. 2, June 1984.

永佃权使美国的土地从最初就成为了商品,一个人可以不受任何其他权利和义务的阻碍而得到土地。活跃的土地市场成为美国经济史的特征,土地投机(speculation)一度几乎成为国家的主要产业。人们购买土地,不是因为他们计划使用它,而是因为他们预期随着对土地需求的增长,土地价格会随之升高,他们会因此得到资本收益。

土地占有权的自由也界定了它的所有者的自由,这致使美国人从一开始就将土地所有权和个人自由看做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成为美国经济史上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在20世纪,土地受到更大社会需求的阻碍,所以这一传统也随之逐渐被侵蚀。然而,从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中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土地本身就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体内的主要商品,并且是个人企业开采土地上的自然资源的基础。在殖民地时代,新发现的贵金属矿产有五分之一被留给皇室所有,但是在美国工业化的年代中,私有者在对煤炭、石油、铁和其他矿产进行开采和提炼的时候,很少为国家作这样的保留。

2.3 殖民地

建立殖民地的顺序或多或少是随机的,既受美国情况影响,也受欧洲局势影响。然而,各个殖民地的建立时间却是一个问题:到底以颁发特许状的年份还是以建立第一个永久定居点的年份来计算殖民地的建立时间?我们将按照习惯,以建立定居点的时间来计算(见图1.1)。1607年建立的弗吉尼亚被认为是一个营利的股份公司。普利茅斯殖民地(1620)和马萨诸塞湾殖民地(1630)的建立具有宗教促因,是由迫于英国教会压力而来到美洲大陆的逃亡者建立的。下面让我们逐一检视这些殖民地,以从细节层面了解它们是怎么在新世界取得成功的。

2.3.1 詹姆斯敦

1606年4月6日,伦敦的弗吉尼亚公司得到了一份执照,赋予它“在美洲大陆上被称做弗吉尼亚的地方为我们的人民建立一块殖民地”的权利。^⑤摆在公司官员面前的建议书与东印度公司或者其他商业冒险之行的建议书相似,包含了几段能揭示投资者商业意图的话。需要选择一个能建立贸易中心的地点:“……你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在某条可通航的河流入海处找到一个安全的港口,顺着这条河流应该能深入最遥远的大陆内部……”^⑥

1607年5月13日,詹姆斯敦定居点建立了,并且,两年之内又在距离詹姆斯敦要塞20英里的地方建立了第二个定居点。殖民地的经济和政治控制权都属于地方长官——公司在弗吉尼亚的人。1607—1622年可以被分为两个阶段,其间公司对其治理方法进行了修正,将他们边学边做的经验引入其中。

第一次修正在1609年,授予冒险家们全部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权。重组降低了对一夜暴富的预期,把注意力聚集在对劳动力的需求上,以生产在英格兰有市场的产品。这个模式使殖民地变得越来越趋向种植园而不再是海盗巢穴。契约劳工充当了劳动力;他们被要求从公司的公共土地和周边的森林和水系中获得粮食补给。从森林里得来的松

^⑤ 引自 Edward Neill, *History of the 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 (1968), p. 3.

^⑥ *Ibid.*, pp. 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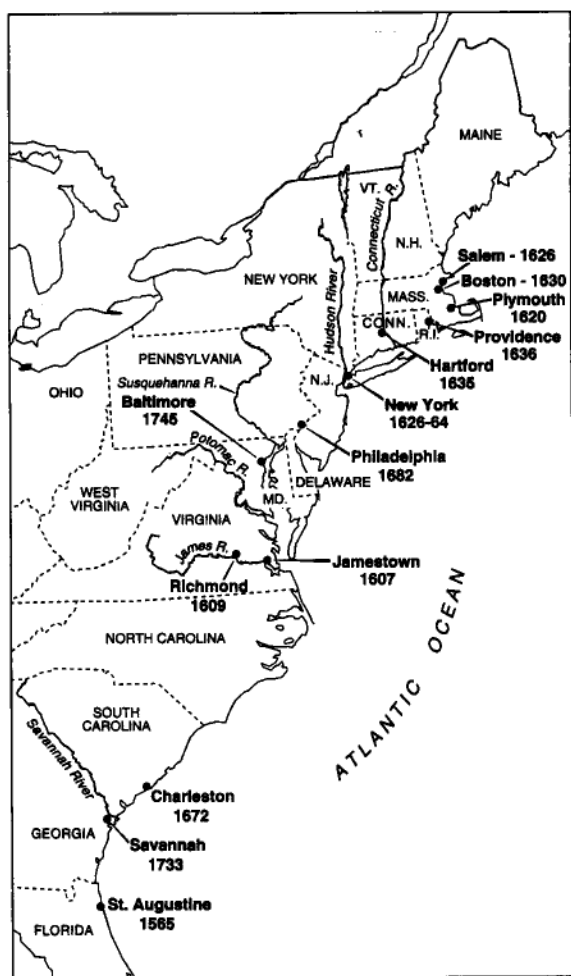


图 1.1 殖民地城市与它们的建立日期

最早的殖民地城市不是海港就是位于通向大海的水道上。圣奥古斯汀 (St. Augustine) 是西班牙定居点。英格兰最早的定居点是 1607 年建立的詹姆斯敦, 其次是里士满 (Richmond)、普利茅斯、塞伦 (Salem) 和波士顿。最后一个建立的英格兰殖民地是 1733 年建立的萨凡纳 (Savannah)。

脂制品 (沥青和柏油) 为最初的商品生产提供了支持, 成为公司的收入来源。

在缓慢的开始之后, 公司的生产停止了。很多最初的冒险者都退出了, 而很少有后来者替补他们的位置。结果, 几乎没有新的殖民者到来, 他们的数量 (1616 年 350 名, 1618 年 400 名) 不足以进行大宗产品的生产。1614 年, 第一批殖民地居民的七年契约到期,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选择在弗吉尼亚继续生活。那年年底, 在殖民地中有了 81 名“自由”居民。基于鼓励私人的事业能够比现在将整块土地作为一个大型种植园的政策更快地发展殖民地的设想, 将土地分租给这些人耕作成为一项惯例。随着更多的居民完成了他们的契约, 但几乎没有人来替补他们的位置, 租佃农场的数量急剧增加, 同时公司的种植园也消失了。一项皇家调查显示, 1618 年殖民地中仅有一个犁。如果之前还有更多, 那么它们也没能继续存在下去。到了 1619 年, 种植园彻底消失了。

同时,私人产业转向了烟草生产。1613年,弗吉尼亚人发现他们的烟草具有市场价值,一年之后,少量烟草被带往英格兰,1616年之后,数量急剧增加。烟草似乎就是殖民地所需的商品,但是投入烟草生产的劳动力越多意味着生产粮食的劳动力越少。早在1616年,戴尔长官就被迫要求每人必须种两亩小麦来降低对英格兰粮食的依赖程度。这种法令很难执行,对英格兰粮食的依赖程度还是上升了。太依赖于英格兰的粮食供给使殖民地的经济变得不平衡。不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看,这种状况都不利。殖民地的资源几乎全部被用来生产一项被当时的冒险家(和大部分英格兰人)指责为罪恶的东西。

第二次修正发生在1618年。与1609年的那次相同,这次修正的起因是殖民地的绩效不符合冒险家们对它的预期。重组要求研究殖民地失败的原因以及该怎么样做才能完成它的目标。土地用途必须转向生产烟草之外的粮食和大宗产品。充足的粮食供应对现存的殖民地居民和那些被殖民地现有条件吓阻的潜在居民很关键。公共土地不得不重新分配以产生收益。所有的这些都需要增加劳动力供给。这可能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埃德蒙·摩根指出:“英格兰人根本不会去设想仅仅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工作。”^②殖民地居民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的抱怨表明改革势在必行,即需要一项明确并且永久的土地占有政策、清晰确定的财产权、废除军事管制以及建立一个弗吉尼亚议会。

第一届议会通过了限制烟草生产的法律。他们希望殖民地在获得贸易盈余的同时还能生产铁、丝绸、酒、松脂制品、盐以及其他能使之自给自足的产品。这种预期注定会变成失望。公司向新来的居民大作宣传,特别是那些善于做生意的人。1619年,600名新的殖民地居民被送到了弗吉尼亚,未来几年还有更多的新人到达。

1622年,公司给詹姆斯敦的领导者写信询问他们何时能得到收益。公司觉得农业上投入的努力太多了,而在商业方面却不足,殖民者对其殖民地内部的考虑比国际贸易重要。虽然很需要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贸易中心,但这个问题一直被忽略。这封信“恳请”弗吉尼亚人找到一种可以赢利的大宗产品;还谈到了提升贸易中心的城市职能的必要性。

1622年3月,一场印第安人的屠杀*打乱了殖民地的日常生活,也中断了公司的重组计划。很多私人定居点都被弃置。殖民地居民不能为一个几近破产的公司提供守卫。事实上,就算没有这场屠杀,重组计划能否成功也值得怀疑。这场屠杀的重要之处在于,即使公司曾经受益于边做边学(这一假设是否成立还存疑),那么之后它将再也不能使用这种信息来源了。

国王和枢密院于1623年展开了一项对弗吉尼亚公司的皇家调查,这成了一场不同阵营间旷日持久的政治角力。詹姆斯敦的位置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它的防御不够充分。那里没有客栈或者旅馆来接纳新抵达的居民,并且住宿条件本身就非常之差。在分散的定居点中没有大宗产品的生产。公司曾经运送了6000—10000人(这个数字有争议)前往殖民地,可最多只有2500人留了下来。烟草仍然是唯一的赢利产品,但是很多人依旧

^② Edmund Morgan, "The Labor Problem at Jamestown, 1607—1618,"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6, 1971, p. 600.

* 1622年的包哈坦战争中,印地安人摧毁了弗吉尼亚88个移民定居点中的80个,首府詹姆斯敦被夷平。——译者注

对它保持厌恶。因此,国王收回了弗吉尼亚公司的特许状,在1642年,弗吉尼亚成为第一个皇家殖民地。这是北美第一次靠政府插手才解决的事件。从那以后,该殖民地被当做由分散的烟草种植园组成的联合体来发展。关于弗吉尼亚在没有政府援助的情况下能否幸存下来的问题是有争议的。

2.3.2 普利茅斯

弗吉尼亚公司的特许状是针对北方殖民地的。普利茅斯(U. K.)公司在缅因州肯纳贝克河上的萨加达霍克建立定居点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清教徒是第二批试图在新英格兰地区定居的人。为了宗教信仰,他们离开英格兰去往荷兰,但是在30年战争*开始的时候,他们又回到了英格兰,然后航海来到新世界。清教徒希望能够在弗吉尼亚公司所控制地区的北部定居,但是面临三个问题:(1)他们需要弗吉尼亚公司颁发的许可证授权他们可以在这块土地上居住;(2)他们需要国王的许可,但国王不可能接纳这个想法;(3)他们需要钱。

正如我们所见,弗吉尼亚公司急需更多的登记居民。授予清教徒的许可证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布拉德福(Bradford)所写的历史中的一些句子给出了结论:他们的定居地一定在哈德逊河口附近;弗吉尼亚公司所能授予许可证的地区不能在北纬41°以北。弗吉尼亚公司也不能在没有国王许可的情况下给予他们宗教上的宽容。清教徒被迫“接受”与他们的信仰相悖的宗教信条,特别是国王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超越他们教会的至高地位。移民的部分代价是伪装自己的信仰。

最关键的问题是,在新的殖民地能够自给自足之前,谁为他们的旅程和补给预付资金。先前的经验都说明这需要一大笔费用,然而清教徒们的资金勉强仅够他们返回英格兰。就算在1619年,弗吉尼亚公司也不可能将资金转去一个北部的殖民地。一个曾经帮助过清教徒的人出现了,他是托马斯·韦斯顿(Thomas Weston)——伦敦市民,铁器商和小商人冒险者。韦斯顿是一个有十年历史的公司的领导人,该公司正在寻找这样的投资机会。约翰·史密斯上校(Captain John Smith)在所著的《弗吉尼亚历史概说》(*Generall Historie*)中将韦斯顿组织起来的70名小赞助人描述为:“……他们不是一个企业,而是自愿组合起来的组织,其内部没有约束或者惩罚机制,目标是做善事和传播宗教。”

韦斯顿提出的条件是苛刻的,但弗吉尼亚公司的条件也差不多。^②韦斯顿的冒险者们为他们支付雇船、补给和运送的费用。作为回报,殖民地居民必须为他们工作七年,进行皮毛贸易、渔猎、伐木或者其他任何能赚钱的劳动。满足基本生存之外的全部利润都归公司所有。必须认识到这些条件是风险很高的。清教徒主要是棉布和丝绸工人,其中有些人对农业知识略知一二,但是他们对在北美做何种工作才能赚钱一无所知。

清教徒在1620年的晚些时候到达了新英格兰这块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这里比他们原来的目的地偏北很多。由于来得太晚,他们已经没法靠采摘自然生长的食物而获得温饱,经历了第一场严酷的寒冬,他们中一半的人未能存活。求生尚且自顾不暇,遑论任

* 30年战争指1618—1648年间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新教国家和旧教国家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译者注

② 对清教徒提出的条件可以参看Dillon(1973), p. 120。

何生产活动。当“五月花号”(Mayflower)在1621年4月回到英格兰的时候,韦斯顿得知在弗吉尼亚以北建立了殖民地,他和他的团队立即从枢密院获得了一份新英格兰地区的新许可证,内容是国王将北纬40°到48°之间的所有北美土地都授予了他们。^⑨然而五月花号空载而归的事实让韦斯顿不满,他写信抱怨此事,并威胁清教徒们,如果殖民地不立即运皮毛回来的话,就停止向他们运送补给。

1621年11月,“财富号”(Fortune)带着新的许可证来到了普利茅斯,还有36名新居民,但没有粮食。总督威廉·布拉德福(William Bradford)警告韦斯顿,只输送人口而不提供粮食储备会造成严重的困境。1622年春天,饥荒袭来。同时,“财富号”满载着雪松板、海狸皮和其他皮毛返航英格兰,但是法国人在路上俘获了这条船,所有的货物都被查抄了。^⑩

在最初的两年中,清教徒过着公有生活。他们都为公司工作,所有的财产都平均分配。1623年,居民们要求允许他们为自己工作并且表示愿意纳税。原因是他们觉得一些人劳动时不够尽力,因为他们看不到对个人福利的直接回报。结果,每一个家庭都被分配了一块土地,面积取决于家庭规模。分配的土地只能供现在使用而不能被传给后代。^⑪1627年以后,财产不再是公有的了。向私有产权的转变增加了殖民地的产出,但是作为商业投资,殖民地还未产生红利。

普利茅斯似乎处在一个很适合发展种植园的位置上,但是其港口没有为越洋贸易的船只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普利茅斯附近的土地很贫瘠,它可以生产满足殖民地生存的粮食,还剩余一些谷物可以和土著人进行交换,但是土地岩石太多,并不适合生产出口的大宗产品,而那才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所以,在寻找适合自己出口的大宗商品的过程中,殖民地居民转而以捕鱼和皮毛贸易为主要营生。^⑫

尽管普利茅斯的位置靠近北大西洋渔场,但它从没有从渔业中获过利。殖民地没有资金建立捕鱼船队。更关键的是,大多数清教徒不是水手,而且他们倾向于依靠土地来谋生。海狸皮毛贸易更加具有吸引力。清教徒到来之后不到一年时间里,他们就开始探索与土著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在接下来的15年中,他们建立了几个贸易点,在那里代理人用工具和衣服换取皮毛。普利茅斯逐渐控制了新英格兰地区的皮毛贸易,但是,随着更多的人来此定居,皮毛贸易逐渐萎缩了。尽管如此,皮毛贸易是成功的;布拉德福估计,1631—1636年间,价值1万英镑的海狸皮和水獭皮被运往了英格兰。^⑬

这类商业行为要依赖于英格兰的信用,但是普利茅斯缺少与英格兰商行之间的商业合同。普利茅斯商人与加勒比群岛发展了贸易往来,但规模一直都很小。1630年之后,

⑨ 如果这是一份皇家特许状,那么普利茅斯就会成为第14个州。参见 Frances Rose-Troup, *The Massachusetts Bay Company and Its Predecessors* (1930)。

⑩ 巴巴里(Barbary)海盜于1625年在英格兰海峡俘获了第二只船——小詹姆斯号(Little James)。到两年以后,才有了从普利茅斯满载出发又平安到达英格兰的第二艘船。参见 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Story of the "Old Colony" of New Plymouth*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6), p. 124; and George D. Langdon, Jr., *Pilgrim Colony: A History of New Plymouth* (1966), p. 27。

⑪ 直接继承是租佃的特征;只有在七年的契约劳工期满之后才能分配到租佃土地。参见 Jonathan Hughes, *Social Control in the Colonial Economy* (1976), pp. 59—65。

⑫ 板材和盐也被列入了殖民地可能出产的大宗产品的清单中。

⑬ 转引自 Langdon (1966), p. 26。

普利茅斯加入了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之间进行沿海贸易的行列。^⑤

韦斯顿最初的冒险家们在经历了四年的海上漂泊之后,最终于1624年12月解除了他们的合作关系。官方原因是殖民地的宗教行为,但是没有收益的事实显然也同样重要。一群有同情心的冒险家买下了那些急于离开者的份额。普利茅斯达到自给自足的时间比詹姆斯敦早,但是它们都不能被称做成功的案例。

2.3.3 马萨诸塞湾

1624年,约翰·史密斯上校将他发现的拥有丰富渔场的海岸命名为“马萨诸塞”。在之前一年,新英格兰委员会授予多尔切斯特公司(Dorchester)许可证,计划在今天格洛斯特(Gloucester)附近的安角(Cape Ann)建立一个定居点。建立这个公司的目的是为英格兰的清教徒提供一个避难所,但是它在1626年就失败了。当1628年委员会授予新英格兰公司许可证的时候,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居民留了下来。新英格兰公司由一群来自林肯郡的波士顿清教徒商人组成,他们承担了多尔切斯特公司的责任。他们全都是优秀的商人,看到了这个地区的经济潜力。他们首先确保自己拥有有效的许可证,然后作为双保险,又获得了皇家特许状,授予他们从梅里麦克(Merrimac)到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从海到海——之间的土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得到了一个新头衔,“新英格兰马萨诸塞湾地方长官和公司”。

皇家特许状承认公司由20名特许权持有人组成。18名“助理”中的7位加上总督和代总督负责商业。公司可以自由确定“自由人”的数量——他们是拥有投票权的持股人。官员由自由人在“地方议会”上选出。在英格兰的法律范围内,特许状赋予公司完全的行政权和立法权。公司对所有定居或者到访这里的英格兰臣民拥有“完全和绝对的惩戒、惩罚、赦免和统治权”。特许状也要求公司保护它的居民,让他们有保护性的措施——“为了他们的防卫和安全,在此后的任何时候,可以使用陆军和海军的武力或者任何合适的方式来打击、驱逐、反击、抵制和对抗那些试图或者计划破坏、侵占、损害和骚扰马萨诸塞湾公司成员的人。”^⑥特许状和公司一起到达了马萨诸塞;地方议会也将在这里召开。因此,只有那些亲自到达北美的股东才有权参加会议和投票。这件事的结果是对殖民地控制的实权将在新英格兰而不是英格兰产生。^⑦

马萨诸塞湾的领导者们都是富翁和名流;在1630年17艘大船带来了1200名定居者。尽管经过周密的计划并有物资准备,第一个冬天还是很艰苦。清教徒们认识到,这个殖民地跟弗吉尼亚截然不同。在1633年寄往公司在伦敦的秘书处的一封信中,一个波士顿的清教徒宣称,定居弗吉尼亚的人是纯粹为了利益,而去马萨诸塞湾的人“一些是出于平复自己的良心上的好奇,更加普遍的是另外一些人,他们是为了将福音传给那些从未聆听过的人”。^⑧事实上,他们大多会按照加尔文教义建立教堂(和团体),逃离查里

⑤ 参见 Bernard Bailyn, *The New England Mercha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955), pp. 34—35.

⑥ 特许状的全部原文收入 Edmund Morgan, *The Founding of Massachusetts: Historians and the Source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4), pp. 303ff.

⑦ 事实上,1631年5月8日,只有不到12名实际经营者出席了第一次在美国土地上召开的地方议会。会上,116人申请成为自由人。参见 Emmet Robert Wall, *Massachusetts Bay: The Crucial Decade, 1640—16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6.

⑧ Rose-Troup (1930), p. 96.

一世(Charles I)和劳德大主教(Archbishop Laud)的管辖。在17世纪30年代的十年中,数千清教徒逃亡到新英格兰。直到1640年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相继爆发了内战,移民潮才暂停下来。

马萨诸塞湾在经济上的成功是众所周知的。其建立者拥有的丰富物资,为了殖民而不是为了利益的愿望、比其他早期殖民地充沛得多的人手,还有居民们那著名的“美国式智慧”(Yankee ingenuity),都为它的成功作了铺垫。普利茅斯和詹姆斯敦都是在逐利的动机下建立起来的,跟这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地方比起来,它们简直是干瘪的老人。

第一年里建立了七个城镇,包括肖马特(Shawmut,波士顿)。^③最初的聚集地是查尔斯河正对岸的查尔斯敦(Charlestown),但是第一年总督约翰·温throp(John Winthrop)搬到波士顿去之后,后者就成为殖民地的政治中心。事实证明波士顿是个非常理想的贸易地点。这个半岛位于定居点网络的中心;它是连接各个城镇的枢纽,也是将这些城镇与世界联系起来的枢纽。当时,陆上交通阻碍重重,但水路较为便捷,在半岛和附近城镇之间的渡轮很早就开始运营。此外,波士顿湾拥有一座良港。近岸的地方,海湾很浅,易于修筑桥墩和码头。往外去,海水很深,最大的远洋货船也可以安然停靠。

1640年,波士顿已经拥有差不多2000人,整个殖民地有12000人。波士顿吸引了很多商人,其中一些来自伦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英格兰有良好的关系网。^④新到的居民通常除了钱什么都不用带。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大多都可以在到达后买到,这与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的情况正好相反。他们用现金从已经落稳脚跟的居民手中购买生活必需品,后者则用现金从新晋居民所乘的船上购买英格兰商品。波士顿成了新移民的出发点、开始定居所需物品的交易市场,以及英格兰货物和殖民地富余农产品的贸易中心。

随着马萨诸塞湾清教徒的到来,普利茅斯的清教徒得到了经济上的推动。就在他们北方40英里的波士顿市场,比位于他们东边3000英里的英格兰市场更加具有商业价值。例如,波士顿可以为普利茅斯生产的家畜提供外部市场,同时提供金钱回报。有时候,家畜和其他农产品的贸易产生的价值比普利茅斯和印第安人进行的海狸皮毛贸易还要高。

在最初的十年中,这里的市场主要针对新到的移民。需求通常超过了供给,这必然引起通货膨胀。当移民的速度开始降低,殖民地农产品的区内市场随之萎缩。针对英格兰生产的大宗农产品对马萨诸塞和普利茅斯而言都是行不通的。这在短期之内形成了困境,但是,长期而言,波士顿商人发现了其他的出路。1640年以后,出现了三个主要市场。与英格兰商人的联系为他们提供了西班牙和大西洋群岛的木制品市场的信息,也为殖民地大量富余的低档小麦和其他谷物提供了市场信息。第二个市场是船只的装备和供应。借着波士顿的港口设施,这个市场在17世纪40年代持续扩大。第三个市场在加勒比种植园主开始专营糖而不得不进口粮食的时候发展出来。到1650年,马萨诸塞湾对加勒比地区的出口超过了对欧洲的出口。

海外贸易加速了殖民地内部的变化,在建立之后的不到20年中,波士顿已经成为一

^③ 参见 Walter Muir Whitehill, *Boston: A Topographical History*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3; Darrett Rutman, *Winthrop's Boston: Portrait of a Puritan Town 1630—1649* (1965), p. 27.

^④ 参见 Bailyn (1955)。

个商业城市,有大量的零售商和手工业者,他们将农产品制成皮革制品、面粉和其他商品。造船业的发展补充了对船只的装备、补给和维修功能。并且,如多尔切斯特公司曾经希望的那样,渔业也有了坚实的基础。波士顿不仅成为殖民地联合体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而且成了新英格兰的中心。1691年,马萨诸塞湾公司和普利茅斯合并为“马萨诸塞湾省”,其行政和立法权的独立越来越依赖于英格兰的法律。^④

2.3.4 其他殖民地

1634年建立的马里兰部分是由于巴尔的摩勋爵希望为罗马天主教徒找到一处避难所,但是也蕴涵了赢利动机,利润来自出售土地、封建税收,以及其他各种收费。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1644年从清教徒的马萨诸塞(他被驱逐)迁往罗德岛(1663年获得特许状)的部分原因也是宗教分歧,而这次分歧完全发生在新大陆。

康涅狄格由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衍生而来。1639年,纽黑文的居民组织了一个他们自己的永久政府。接着,在1643年修正的宪法中规定,只有“经过认可的新英格兰教会的成员”才有权选举和担任政府职位。1662年,查理二世(Charles II)授予了康涅狄格更加自由的特许状。

1681年威廉·潘得到宾夕法尼亚的时候,宗教再次成为建立私有殖民地背后的主要力量。瑞典人和荷兰人已经在那里居住了四十余年。查理二世将宾夕法尼亚这一大块土地授予潘,是为了偿还潘的父亲——海军司令威廉·潘爵士——的一笔借款。身为贵格会的首领,潘梦想着将这里变成被迫害的教友和其他新教组织的避难所。潘还希望从出售土地和地租中获益,但是未能如愿。

特拉华于1902年建立(1701年获得特许状),它原来是宾夕法尼亚的一部分,后部分由于潘和巴尔的摩勋爵后裔之间边界纷争的影响分裂出去。佐治亚(1773)本是作为慈善事业而成立的,所以禁止了奴隶制和朗姆酒,但后来却成了皇家殖民地,人人脑子里都想着金钱之类不太高尚的东西。后来更引进了黑人奴隶制,以增加殖民地的经济收益。为了使那里的生活更加舒适,朗姆酒的进口和消费也被允许了。

纽约是由荷兰的西印度公司颁发的特许状建立的。特许状颁发于1621年;奥尔巴尼定居点建立于1624年,曼哈顿的第一个永久定居点是1626年建立的要塞。英格兰人在1664年接管了纽约殖民地。后来它一直是约克公爵詹姆斯的私人殖民地,直到詹姆斯在1685年当上了英格兰国王。

新泽西最初的居民是荷兰人和瑞典人。很短的时间之后,那里有了一些拥有产权的英格兰人。1681年,新泽西的一部分随着宾夕法尼亚被授予了潘;1702年,剩下的地区成为了皇家殖民地。

1663年的特许状将卡罗来纳授予一群经营者,后来形成了南北卡罗来纳。1670年建立了一个永久定居点。1719年,南卡罗来纳拥有了特许状,十年后,偏僻森林中的那些定居点也拥有了特许状,后者成为了北卡罗来纳。

^④ 参见 Rutman (1965), chap. 7。马萨诸塞湾州也包括楠塔基特岛、玛莎葡萄园岛、萨加达霍克和缅因州。

2.4 殖民帝国回顾

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英格兰对美国经济史具有极大影响。当其他欧洲国家把殖民地当做获取这个大陆上的财富的港口时,英格兰人在此定居了下来。马萨诸塞湾的经验显示出,一个成功的殖民地需要临界数量的人口和财富;而这两样在弗吉尼亚和普利茅斯都没有。与普利茅斯相似,马萨诸塞湾的居民拥有一个比经济更为重要的激励因素。他们的宗教信仰使他们必须在新世界取得成功,他们不愿意再回英格兰。弗吉尼亚公司是典型的重商主义的尝试,但它失败了。

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在开始的时候是皇家殖民地。所有的殖民地都是私人企业,不论以私营的形式或是合股的形式。但是到了独立战争前夕,殖民地的问题使除了罗德岛、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和马里兰之外的地区都成了皇家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殖民地与众多英格兰的附属国一样,都要接受伦敦的管理。当詹姆斯二世被赶下英格兰王位的时候,埃德蒙·安德罗斯(Edmund Andros)长官在1686—1689年间将北方殖民地联合起来的计划也失败了。更早的新英格兰联邦(1643—1684)已经化为泡影;当1754年跟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出现了新矛盾的时候,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再度提出了建立殖民地联邦的计划,但被商会推翻。

英国人不愿看到北美大陆上形成一个独立的联盟,就算是在皇家控制之下也不行。皇室一直认为加勒比群岛上殖民地的蔗糖种植园比大陆上偏僻森林中的定居点更有价值。糖和朗姆酒是需求量很大的能赚钱的商品。但是到了18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最初的时候,至为重要的东西是将分离的殖民地与英格兰联系起来的共同纽带。这为美国人提供了共有的语言、法律、风俗和商业道德与惯例——当时时机到来的时候,他们会基于这些共同的基础制定自己的宪法和法律。移植海外的英国制度将会继续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中的大部分都会因在美国所遇到的新挑战而发生变化。

推荐阅读

文章

Alston, Lee J., and Morton Owen Shapiro. "Inheritance Laws Across the Colonie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4, no. 2, June 1984.

Anderson, Terry, and Fred McChesney. "Raid or Trade? An Economic Model of Indian—White Relation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37, no. 2, April 1994.

Galenson, David. "Immigration and the Colonial Labor System: An Analysis of Length of Indentur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4, no. 4, October 1977.

———.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entured Servitude in the Americas: An Economic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4, no. 1, March 1984.

Grubb, Farley. "The Auction of Redemptioner Servants, Philadelphia, 1771—180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8, no. 3, September 1988.

Grubb, Farley, and Tony Stitt. "The Liverpool Emigrant Servant Trade and the Transition to Slave Labor in the Chesapeake, 1697—1707: Market Adjustments to War."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1, no. 3, July 1994.

Heavener, Robert: "Indentured Servitude: The Philadelphia Market, 1771—177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8, no. 3, September 1978.

Jones, Alice Hanson. "The Wealth of Women, 1774." In Claudia Goldin and Hugh Rockoff, eds., *Strategic Factor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A Volume to Honor Robert W. Foge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Morgan, Edmund. "The First American Boom: Virginia 1618 to 1630."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 28, no. 2, April 1971.

Potter, Jim.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in America, 1700—1860." In D. V. Glass and B. E. C. Ea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Essays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Chicago: Aldine, 1960.

Salisbury, Neal. "The History of Native Americans from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Europeans and Africans Until the American Civil War." In Stanley Engerman and Robert Gallm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书籍

Bailyn, Bernard. *The New England Mercha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Boorstin, Daniel. *The Americans: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8.

Craven, Wesley Frank. *Dissolution of the Virginia Company: The Failure of a Colonial Experiment*. Gloucester, MA: Peter Smith, 1964 (reprinted from 1932).

Curtin, Philip.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9.

Dillon, Francis. *A Place for Habitation, the Pilgrim Fathers and their Quest*. London: Hutchinson of London, 1973.

Ford, Amelia Clewly. *Colonial Precedents of Our National Land System as It Existed in 1800*. Philadelphia: Porcupine Press, 1976.

Galenson, David. *White Servitude in Colonial America: An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Hughes, Jonathan. *Social Control in the Colonial Economy*.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6.

Jones, Eric L. *The European Mirac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Langdon, George D., Jr. *Pilgrim Colony: A History of New Plymout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Morgan, Edmund S. *The Puritan Family: Religion and Domestic Relations in Seven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 New York:

W. W. Norton, 1975.

Morris, Richard. *Government and Labor in Early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6.

Neill, Edward D. *History of the 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68 (reprinted from 1869).

Notestein, Wallace. *The English People on the Eve of Colonization*.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4.

Pirenne, Henri. *A 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Invasions to the XVI Century*. New York: University Books, 1956.

Powell, Sumner Chilton. *Puritan Villag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England Town*.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3.

Quinn, David Beers. *England and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1481—1620*.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4.

Rose—Troup, Frances. *The Massachusetts Bay Company and Its Predecessors*. New York: The Grafton Press, 1930.

Rutman, Darrett B. *Winthrop's Boston: Portrait of a Puritan Town 1630—164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5.

Salmon, Marylynn. *Women and the Law of Property in Early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Shammas, Carole, Marylynn Salmon, and Michael Dahlin. *Inheritance i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Shepherd, James F., and Gary M. Walton. *Shipping, Maritime Trad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lonial North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Smith, Abbot Emerson. *Colonists in Bondage: White Servitude and Convict Labor in America, 1607—1776*.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7.

第 2 章

殖民地的发展

为了理解殖民地经济是如何发展的,我们需要详细探究殖民地的格局。殖民者住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住在那里,他们生产什么,以及他们所遵循的法律框架都是这个格局中的相关部分。在最初的几十年之后,大部分殖民者都不住在城镇中。第一次人口普查(1790)显示只有 24 个地方的人口达到或超过 2 500。但是这些城镇——其中很多是海港——吸引了经济活动的集中,这对持续发展的经济生活非常关键。

1. 城镇和海港

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如果资源平均分布在一个平原上,我们可以预想人口也将平均分布。然而,现实中的人口很少会在空间中平均分布。人们建立社区、村落、城镇和城市来利用商业、政府和医疗等机构和基础设施带来的便利。就算在东部人眼中内部条件完全均一的爱荷华州农业区,城镇和村庄也不是平均分布的。它们为什么会位于它们所在之处呢?

1.1 决定位置的因素

经济学家们已经发现,转运功能(break-in-transport)是城镇选址的一个基本决定因素。转运功能是指一地具有卸载和装载货物的功能,比如从远洋大船上向内河船只上转运。由于从英格兰到达美洲大陆的通道是水路,因此最早的殖民地定居点——詹姆斯敦、普利茅斯、波士顿、新阿姆斯特丹——出现在水道附近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它们并不是随机出现在海岸线上的,有两个原因:(1) 由于地形原因,只有几个地方可能形成港口。(2) 一些地方的腹地——城镇的周边地区——比其他地方更加容易获得本地农产品。那些既有转运功能又有腹地的地方可以更好地开展进出口双向贸易,所以形成了城镇。

最初,这种贸易是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的——即皮毛和欧洲商品之间的交换。很快,殖民者参与到了基本经济活动之中——农耕、伐木、捕鱼和采矿——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在转运地进行的商品交换促使这些地方建立起了物资分配和收集设施,比如码头、货仓和商店。因而,这些拥有可开发腹地的港口的周边地区集中了基本经济活动。像纽波特(Newport)和罗德岛这样的贸易中心,由于它们优良的港口条件,可以产生相当大的经济增长,与它们通过海上联系的其他贸易中心也一样。美洲大陆的东海岸地区不是一块资源均匀分布的平原。由于地形不规则,河流和山脉分布其间,因此海洋(海湾)和河流成为主要通路。向内陆地区修建道路是一项费力的工作,只有在人口增长和劳动力充

足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向城镇集中的商业活动也吸引了政府活动,比如设立军事设施(例如,一个有补给的要塞)或者常规法院可以开庭以及政府执行民事活动的地方。在海港,还有一些航海物资交易的海关机构和设施。这些使此类地方所能进行的事务比其他地方多。美洲殖民地是英帝国的分支,这又使得上述活动得到保障。

在这个地形差异很大的世界中,早期殖民地的选址范围是有限的,必须要满足具有转运功能、拥有富饶的腹地以及一定的发展能力等条件。一些位置明显优于其他地区,好比那些在水道边的位置:波士顿位于海湾,哈特福德位于河边,纽约和费城靠近河流入海口,查尔斯敦不仅拥有良港而且数条河流还延伸向它的腹地。

例外的是弗吉尼亚,尽管它拥有的人口数量是最多的(按照这个衡量方式,它的腹地是最富饶的),但那里上一定规模的城镇数量却最少。弗吉尼亚的城市化进程很慢,因为分布在河流和海湾沿线的烟草种植园承担了贸易中心的功能。这些水道成为主要的商路,甚至偏远地区的农家也临水而建。远洋船只可以便利地到达种植园主的码头并和他们交易。^① 我们的模型只需进行小小的调整,在这种有大量河流、海湾的地区用种植园来替换城镇即可。

来自腹地的产品反过来创造了市场条件,不管它们仅仅是被送往贸易站,还是被送往收集点进行进一步加工——比如农产品和木材的处理。考虑到殖民地美国的产权形式(我们在上一章回顾过),地主有商品要出售,而城镇中自然会有市场,如果将这些活动集中在城镇中进行,那将能使卖家和买家都获利。如果一项活动能增加商品的价值,或者为贸易双方提供服务,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商人会在城镇中进行此项活动。潜在客户和供货商的集中,降低了做生意时的搜寻和交易成本(例如,寻找顾客或者记录所有权变更)。这种在经济生活中能降低成本的要素被称为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它们的存在增加了城镇壮大的可能性——外部经济越强大,城镇成长的可能性越大。^②

1.2 镇区和县

在基本经济活动建立起来之后,城镇很快开始成长。它们的密度有助于确定日常生活的法律和政治组织。虽然经济因素决定了很多城镇的选址,但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非经济力量,对城镇选址产生长久的影响。几十年中,新英格兰的新教徒只在需要创立新教会的需求足够充足的时候,才建立新定居点。宗教冲突和人口增长一直推动着这一进程。当新教会向殖民地政府申请的时候,它们会被授予足够建立新城镇的土地。结果,在很长时间内,新英格兰都呈块状扩张;新城镇都是旧城镇的复制品。一座城镇不仅是新英格兰人口中所谓的“中心”,还指代周围供给它的区域。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比殖民地

① 人们传统上指责这种贸易模式使南方殖民地缺少殖民地之间和地区之间的联系,并将南方没有发展出城市经济归咎于此。参见 Joseph Ernest and H. Roy Merrens, "Camden's Turrets Pierce the Skie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 30, October 1973, p. 550.

② 历史上,美国的钻石生意在纽约成长起来;它曾经是最大的零售市场。一旦批发和切割业在纽约进行,其他的经销商和切割工人都来到纽约来利用这里的劳动力、信息、卖家和买家,最后这个行业在这里就是因为它在这里。虽然其他地方可能提供更加低廉的租金和更低的犯罪率,但它们缺少外部经济。

小但比乡村和自治镇要大的微型政府。

在其他殖民地,城镇向内地的扩张可能更为持久,但也更为零散,所以只有稀疏的人口定居。为了便于管理,也为了实施保护和方便贸易,城镇被建立起来,但是城镇之外有范围更大、性质不均的区域,这就是县。由于镇区和县级大小的单位在英格兰就有(“百里区”和县),因此这种发展并非新发明,只是制度在不同环境下的应用。这种情况的一个长远结果是,当美国人向内陆挺进的时候,受新英格兰影响最大的地方流行镇区政府管理,而其他地方流行县级政府管理。直到今天,在伊利诺伊和印第安那这样的州,行政和税收管辖区的相互交叠到了令人头晕的地步,这是因为它们的北部地区是由新英格兰人建立的,而南部地区则是从旧弗吉尼亚移植而来的。更西的地区流行县级政府管理,也同样由于它们源自弗吉尼亚:政治生活是从广大地区上稀疏的人口开始的。

按照某种边长的矩形来划分区域的方法来自殖民地时期的实践。覆盖 36 平方英里的矩形镇区开始于 18 世纪的新英格兰(佛蒙特的本宁顿是第一个),1 平方英里(640 英亩)的矩形小区似乎起源于北卡罗来纳。这些早期的划分方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 1785 年和 1787 年颁布的《土地法令》(Land Ordinances)中,美国人决定在未来划分大陆布局的时候使用殖民地时期的经验。^③ 镇区是 6 英里乘 6 英里的正方形,分为 36 个小区,每个小区为 640 英亩。1/4 个小区,即 160 英亩,成为一个典型农场的面积。

1.3 主要城镇

如前所述,1790 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只有 24 个地方的人口达到或者超过了 2500。在全部 3 929 000 人口中,只有 202 000 人(仅仅 5%)的人口可以被称为“城镇”居民。15 年之前,这一比例甚至更低。如果我们关注在 150 年殖民地时期末的 20 个最大型城镇,就会明显看到水路交通在它们的建立和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见表 2.1)。

内陆的城镇全部位于主要的可通航河流上,但是大多数城镇还是海港。我们注意到,中部和新英格兰殖民地的中心城市占了绝大多数(见图 2.1)。费城虽然拥有富饶的腹地、坚实的纺织业基础以及原始制造业,但建立的时间较晚,在 1681 年(早期的荷兰和瑞典人居住在沿河的洞穴中);不过,在独立战争之前,它超过了所有的城市。事实上,在 1776 年费城的人口仅次于伦敦,位居第二。弗吉尼亚的首府和第二大城市威廉斯堡(Williamsburg),只有 1 500 名居民,然而,詹姆斯河入海口的诺福克(Norfolk)的人口却超过了 6 000。城市生活必备的制度保障——消防队和消防管理,为了防范犯罪而进行的夜间巡逻,为穷人设立的养济院,以及供水设施——都逐步发展起来。正如卡尔·布登堡(Carl Bridenbaugh)在《荒野中的城市》(*Cities in the Wilderness*)和《暴乱都市》(*Cities in Revolt*)这两本书中所说的那样,到殖民地晚期,主要城市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城市文明。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将稍加详细地分析这一发展中的制度结构。

^③ 一部关于殖民地经验及其后果的吸引人的作品是 Amelia Clewly Ford, *Colonial Precedents of Our National Land System as It Existed in 1800* (1976)。

表 2.1 殖民地时期的城镇人口

城镇/城市	年份	人口
费城	1775	40 000
纽约	1775	25 000
波士顿	1775	16 000
查尔斯顿	1775	12 000
纽波特	1775	11 000
纽黑文	1771	8 300
诺威奇	1774	7 000
诺福克	1775	6 200
巴尔的摩	1775	6 000
新伦敦	1774	5 400
塞伦	1776	5 300
兰卡斯特	1776	5—6 000
哈特福德	1774	4 900
米德尔顿	1775	4 700
朴茨茅斯	1775	4 600
马布尔黑德	1776	4 400
普罗维登斯	1774	4 400
奥尔巴尼	1776	4 000
安纳波利斯	1775	3 700
萨凡纳	1775	3 200

资料来源: Carl Bridenbaugh, *Cities in Revol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16—217.

1.4 早期制造业

尽管城市主要为提供农业殖民地和外面世界进行交换物资的服务而存在,但城市生活的中心也在向纺织业—制造业中心发展,并主要使用当时的技术:手工艺、水力和畜力。黛安·林斯特龙(Diane Lindstrom)和约翰·夏普莱斯(John Sharpless)的著作说明,殖民地时期的传统影响了早期国家时期,在这些城市形成了一种混合型的制造业。^④由于城镇选址的转运功能,各种手工业者加入到了商人的行列之中。(外部经济的存在使我们可以预见到这种集聚。)这两个部门互相服务,一起发展;碾磨、皮毛加工和木工、蒸馏、蔗糖提纯、造船、纺纱、制帽——这些活动代表了大型殖民地城市的特色。(某种程度上)冶铁和伐木业是例外,这是由运输成本决定的,由于这些行业的最终产品比原材料轻,因此生产地点都在原料产地。

较小的村庄和农场也有制造业,特别是在中部和新英格兰的殖民地。即使按照当时欧洲的标准来看,无论是在本地需求还是出口方面,美国殖民者都很好地迈上了工业化发展之路。卡尔·布登堡估计:“在四大北方城市中(波士顿、纽约、纽波特、费城),1/3

^④ Diane Lindstrom and John Sharpless, “Urban Growth and Economic Structure in Antebellum America,” *REH*, 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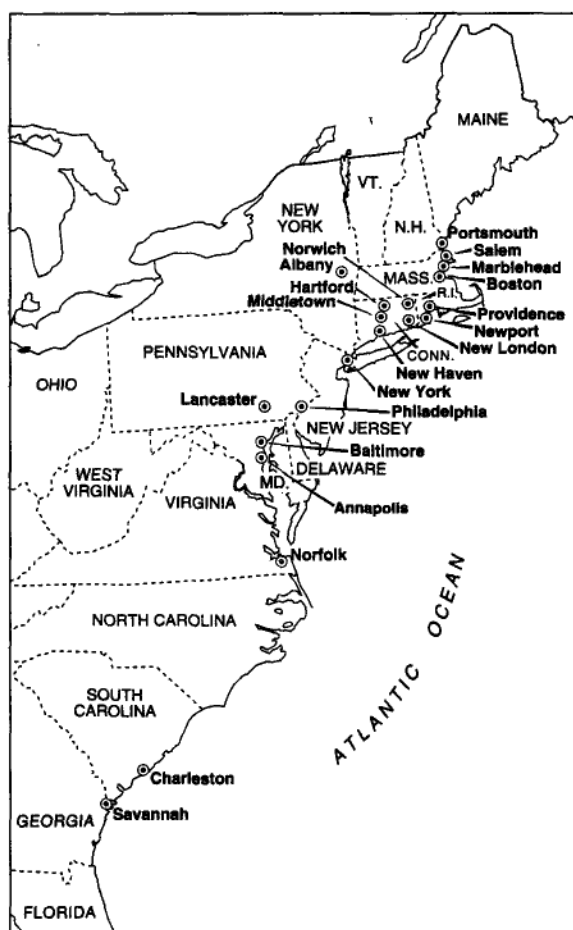


图 2.1 20 个殖民地城市

殖民地城市主要是贸易中心。注意,这 20 个最大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新英格兰地区,在那里,国内的制造业、渔业和木材加工业、造船业都占了主要地位。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是奴隶贸易的中心。松脂制品的生产和提取在新英格兰经济活动中也很重要。

到一半有收入的雇工——即数千市民——都是手工业者。”^⑤

进一步的城巿成长依赖于商业和制造业。像纽波特这样不能在腹地形成制造业中心的城巿,注定会落伍。最终,在 19 世纪晚期,工业革命来到了美国,这主要是发生在城巿中的。即使在殖民地时代,外部经济的吸引力也造成了原始制造业向商业城镇和其周边集中。英格兰在 18 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手工业者、匠人、商店和铸造工人集中地的压制和控制,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后果。这些受压迫者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有力的反击——数千名愤怒的工人加入到激进分子的行列,并掀起了一场革命。^⑥

^⑤ Carl Bridenbaugh, *Cities in Revolt: Urban Life in America, 1743—1776* (1955), p. 272.

^⑥ 参见 Lawrence Peskin, *Manufacturing Revolution: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Early American Indust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2. 地域分工

我们已经讨论过,殖民地时期美国的小城市和城镇为殖民地经济提供了市场。从事第一产业即初级产品生产的人口超过了9/10,主要的职业包括农业、渔业、矿业和伐木业(此外还有对富余产品进行加工和装运以供出口)。

2.1 比较优势

殖民地的原始边界是在英格兰划分的,而划界的那些人从来没去过美洲,甚至连合适的地图都没有。他们的决定是基于政治便利的考量,而不是经济。然而,一旦建立起殖民地,在那些边界内部的转运点就出现了城镇。问题是:“运送什么东西?”这就是由经济现实决定的了。自然禀赋——气候、土壤分布、地形、树木和矿产的种类和数量——都是给定的。使用当时的知识、技术和机械设备对它进行开发都遵循李嘉图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原则(任何人都专门生产自己效率相对较高的生产和服务)。这决定了它们的基本发展方向。

在重商主义者的世界中,比较优势原则为两个人或者殖民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提供了基础;而国家之间的贸易则受到限制。如果每个人或者地区都专门生产自己相对高效的生产和服务,即具有较低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s)(用其他被放弃的选择所衡量的成本),那么贸易将对双方都有利。

由于私人利益是大多数殖民地经济活动——开发那些由特许授予的产权——的主要目标,因此人们最希望的是收益最大化。最初的发展是在试错的基础上进行的。正如我们讨论过的,第一批英格兰殖民者面对的是一个新的环境,这里有不同的气候和各种未知数。这里适合种哪种小麦?哪种本地作物,比如玉米和马铃薯(原产于南美洲,被殖民者引入到北美)和南瓜可以作为人类的食物?烟草最适合在哪里种植?什么可以作为牲畜的饲料?以及哪种牲畜最适合殖民地使用?这些问题的唯一解决途径就是去一件件尝试,从失败中学习经验,然后再次尝试。由于英格兰人急于摆脱对他们的欧洲竞争者的依赖,因此他们对引种新作物比如桑树(为了养蚕)和姜实行了补贴和保护性措施。在南方,水稻和靛青这两种引种作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另外,殖民者仍然抱着寻找黄金和白银的希望;少量的黄金不时被找到,一起被发现的还有大量低值金属矿藏。

随着殖民者渐渐懂得了生产什么能获利,下一个问题变成了:“这些产品中哪些是最能产生利润的?”一块在弗吉尼亚或者马里兰的土地,如果既能种植小麦,又能种植烟草,那么为了取得利益最大化还需要考虑哪种作物收益更高。弗吉尼亚的大多数烟草种植者也可以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小麦,但是,考虑到相对成本与小麦和烟草的市场状况,他们选择了种植烟草,尽管这样做有挨饿的风险。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早期弗吉尼亚的地方长官不得不以命令的方式来督促小麦种植,1616年规定,种植烟草者,每人必须种植两英亩的小麦。所有殖民地都尝试过烟草种植,但是在南方以外的大多数地区,其利润都比不上种植其他作物。英格兰人一早就被“尼古丁女士”所深深吸引,也尝试在英格兰种植烟草,但由于立法原因,殖民地并没有受到竞争的威胁。

中部地区的殖民地,甚至是新英格兰,一直都进行着烟草种植,尤其是康涅狄格河流域,那里漫长而炎热的夏天堪比刚果。在弗吉尼亚,当种植小麦也可以获利的时候,人们仍然选择了种植烟草,这显示出弗吉尼亚的比较优势是烟草种植。当价格变化的时候,人们对作物的选择也同时变化。18世纪中期,烟草相对于小麦的价格有所下降,弗吉尼亚人改变了他们的种植结构,其小麦出口额一度超越了宾夕法尼亚。市场发生改变的时候,比较优势也随之变化。在一些地方,养羊代替了养牛;在另外一些地方,农民弃农经商;还有一些地区,比如杨基山农场,生产活动非常多样化,以至于每个农场都不一样。如果在某地任何方面都不具有竞争优势,但当地居民还是决定留在他们的土地上,那么对他们相对而言在竞争劣势最小的方面进行专业化生产仍是最划算的。

由于上述讨论的这些因素以及气候差异,各殖民地都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发展,形成了相当分明的地域分工。必须强调,这种地域分工也受到“与帝国之间的联系”的影响。殖民者与英格兰以及英帝国的其他地方进行贸易,还与加勒比群岛甚至欧洲大陆上的国家进行贸易,并且上述地区之间的贸易超过了殖民地之间的贸易。^⑦因此,殖民地在发展的最初就形成了专业化的地区分工(比如,在南方生产烟草、水稻和靛青;中部殖民地生产小麦和牲畜;新英格兰地区的造船业和捕鱼业),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国际市场。早期的弗吉尼亚人需要通过一些途径向在伦敦的公司偿还欠款。普利茅斯的殖民者对公司进行了内部重组,于是皮毛和其他殖民地产品可以被运往英格兰充当还款。直到美国独立几十年后,国内需求才占据了产出结构中的主要部分。在殖民地时期,殖民地是作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而成长起来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市场需求决定了殖民地的成长道路。新英格兰人出口渔业产品、小的制造业产品、船只,并提供航运服务,同时进口粮食。南方则出口大米、烟草、靛青和林产品,同时进口制造业产品。

2.2 新英格兰

最初的时候,殖民者进行定居点选址时只关心一件事:维持生存的方法。对所有的殖民者而言,这意味着通过耕作、捕鱼或者狩猎获得食物。当基本生存需求被满足之后,市场和比较优势的力量开始对定居点选址产生作用。新英格兰地区并没有太多高质量的可耕地,所以这里的经济发展侧重点很快就转向了其他自然禀赋。新英格兰缺少可耕地的情况在殖民地中是独一的。岩石和山脉使农业最多是维持生存的职业。虽然绝大多数新英格兰人都从事农业生产,但大多数新英格兰农民不得不寻找其他职业来补贴生活。比如,在冬天伐木,在早春采摘和提炼糖枫汁,或者开一间铁匠铺、酿酒厂、木工或农具的店,也可能开铸造厂或磨坊。很多农业家庭的成员——特别是女性——通过外发制进入了制造业。企业主发现让工人将原材料带回家去工作,比要求所有人都在工场工作的效率高。例如,生产服装的每一个环节——特别是纺纱和织布——基本上都是由农业富余的劳动力完成的,其中包括了冬天的男性劳动力。

新英格兰农民必须运用他们的才智才能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玉米和夏季的蔬

^⑦ 参见 John McCusker and Kenneth Morgan, eds.,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这本论文集集中的文章强调,在18世纪,欧洲国家与大西洋沿岸地区之间贸易的特征是形成了商业关系的网络。

菜是田里的主要作物。然而,新英格兰的气候严酷,春天解冻的时间太晚,秋天霜冻的时间又太早,土壤中多岩石,所以这里的农业始终是一项艰难而且边缘化的活动。当19世纪初人们可以穿过山脉到去开垦土地的时候,新英格兰的很多土地被就此撂荒,新英格兰农民放弃了在此进行的艰苦奋斗,逃向西部。今日被森林遮盖的那些孤单的石头墙垣和地基,默默见证了那段人们尝试在石头上进行耕作的失败历史。那些留下来的人仍在进行牲畜(羊)养殖、奶品生产和伐木,这才使得新英格兰的农村地区没有被彻底遗弃。

居住在海边的新英格兰殖民者很快就投入了渔业——毕竟,曾经吸引欧洲人来到荒无人烟的新英格兰海岸地区的就是渔业。早在1700年,新英格兰的捕鱼船队就创造了1千万磅鱼的出口额,超过了英格兰本土。到1775年,在新英格兰仅从事鳕鱼生产一项就有4400人和665艘船;岸上加工厂——进行腌制、干燥、熏烤和包装等工序——使用的劳动力更多。捕鲸也成为了新英格兰的主要行业,18世纪70年代,有360只船从事捕鲸。鲸油可以用来制造蜡烛和充当灯油,这注定了这个行业在整个19世纪100年中历久不衰。

这里还有大量制桶和造船所需要的木材,于是,新英格兰人很快就精熟于制造桶板、箍桶和造船。至于其他的林产品,柏油和松焦油沥青被用于船体防水层,这又强化了新英格兰的造船工业。河流沿线出现了大量锯木工场,而纽伯里波特(Newburyport)、塞伦、马波海德(Marblehead)和纽黑文这样的沿海小城和波士顿、朴茨茅斯和纽波特这样的中心城市都出现了造船厂。美国五针松成了制造桅杆的不二之选。丰富的沼铁矿储量和木炭资源支撑起了钢铁工业,而钢铁工业及其他与造船业关联的行业——比如马车制造、船舶储备品、酿造和蒸馏——使新英格兰成为了一个制造业基地。这一基地又支撑了大量的城镇和海港。农妇纺织的毛线、麻线和编织的衣服都在新英格兰的市场中出售;羊、牛、猪为市场提供了肉类;牛还同时为皮革和制鞋业提供了原料。在18世纪末初级工厂出现之前,这些城镇和农村工业也为工业、商业和好航海的美国人国度打下了基础。

威妮弗雷德·罗森堡(Winifred Rothenberg)关于新英格兰农业劳动力市场的研究表明,即使没有明显的技术变革,市场的推动和农场管理的优化仍然最终提高了生产率,解放了农业劳动力,使他们可以从事其他行业。于是,当工厂出现的时候,他们走进了工厂。由于对劳动力的使用更加有效,因此缺乏技术进步并不一定有碍于生产率的提高。^⑧

新英格兰的不幸之处在于它贫瘠的土地资源,然而,在19世纪早期,这里的殖民者顺应环境把不幸变成了幸运。^⑨这里的商人在加勒比地区为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出产的富裕粮食开创了市场;而造船工人为通向那个市场铺平了道路。

⑧ Winifred Rothenberg, *From Market-Places to a Market Economy*(1992), pp. 166—174.

⑨ 正如一些学者相信的那样,新英格兰虽然缺少可耕地,但在18世纪人口增长的时候,人均财富水平却没有降低。人们很快就适应了环境,从而避免了耕地贫瘠而可能带来的贫穷。Gloria Main,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Colonial Massachusetts," *JEH*, March 1983. 还有零星证据表明,那里还发展出了农业劳动力市场——这是衡量农业人口专业化水平的一个很好的指标。Rothenberg (1992), chap. 6.

2.3 中部殖民地

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都有肥沃的土地,并且前三个州的农业用地充裕,足以在此建立大型农业基地。而宾夕法尼亚自由的土地买卖制度吸引了大量移民。随着农业的扩张和矿业的发展,这些地方的移民不断增加。加之,这里的商业条件与新英格兰地区差不多,也有造船业。这些因素和充足的各类农业土地一起使中部殖民地的人口快速增长。纽约和费城这两个最大的海港在商贸上繁荣起来。^⑩ 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的炼铁业在 18 世纪发展得热火朝天。制鞋、制陶、玻璃制造、木工、鞣革之类的行业满足了这一蓬勃发展地区的内部需求。数以万计的德国移民在富饶的宾夕法尼亚盆地定居下来,将他们的语言、建筑(大型石头谷仓)、饮食习惯和文化带到了宾州的殖民地。

中部殖民地小麦生产上的地位尤为重要。在斯古吉尔河(Schuylkill)和布兰迪维因溪(Brandywine)这样的河流沿线分布着大量的磨坊。磨坊将小麦磨成了面粉,使这里成了殖民地的“面包篮子”。^⑪ 中部殖民地还是销往欧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牛、猪和羊等牲畜和加工肉类的主要产地。在殖民时期结束的时候,中部殖民地的人口已经超过了新英格兰。人口的增长基于这里多元化扩张的农业,而这种农业又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这为未来的商业和工业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力的内部市场。

2.4 南方殖民地

南方殖民地的比较优势在种植业——尤其是烟草种植,而种植园最终成为奴隶制的代名词。南方殖民地拥有大量肥沃的可耕地、原材料和木材。利用这些资源,殖民地不仅生产出了满足自身需求的粮食和牲畜,还生产了大量外销的烟草和大米(烟草主要产于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大米则产于南卡罗来纳)。靛青在 1743 年被伊莱莎·卢卡斯(Eliza Lucas)引种到南卡罗来纳,1748 年之后,靛青种植得到了英格兰的政府资助。南方的松林出产沥青、松脂、柏油和树脂。经济作物的最有效生产方式是使用成批的非熟练工,这是由规模经济(scale economics)决定的。规模经济是指:在一定的土地上,一大群工人通过合作进行工作的效率比将土地和工作按照人头分配给每个人进行工作的效率高。大多数使用畜力和农具进行的农田作业都服从于规模经济规律。

佐治亚是奴隶劳动力的规模经济的典型。佐治亚的种植园主本来是被禁止使用奴隶的。在连续多年各种作物均告欠收之后,英国方面终于在 1749 年同意他们使用奴隶。之后,佐治亚的殖民者很快就迎来了丰收。仅仅四年之后的 1753 年,佐治亚有了 1 066 名奴隶和 2 381 名白人。随着水稻生产的兴盛,佐治亚在 1770 年的人口达到了 23 400 人,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中,人口增长了十倍,其中 45% 是奴隶。

南方地广人稀,运用规模经济的原理来对其进行开发所需的劳动力来自于大西洋上的奴隶贸易。欧洲移民希望得到自己的土地。契约劳工的数量不足以弥补南方发展所

^⑩ Thomas Doerflinger, *A Vigorous Spirit of Enterprise: Merchan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1986). 这本书的标题稍有误导,它是对商人——特别是费城的商人——的精密研究。

^⑪ 证据表明,即使在 17 世纪,这里的农业也有不错的增长。Duane Ball and Gary Walton, "Agriculture Productivity Changes in Eighteenth Century Pennsylvania," *JEH*, March 1976.

需的劳动力缺口。

马里兰在很多方面都与中部殖民地相似,但是奴隶人口的统计数据还是标志了它是一个南方殖民地。^⑫ 1770年,宾夕法尼亚的人口为240 000人,其中奴隶有5 761人;而相邻的马里兰人口为203 000人,奴隶却有64 000人。即使在18世纪,要理解南方经济,我们还是必须掌握黑人奴隶的使用这条线索。请看表2.2中的数据。

表 2.2 1770 年黑人奴隶在各地区人口中的比例

殖民地	百分数
新罕布什尔	1.0
马萨诸塞	2.0
康涅狄格	3.1
罗德岛	6.5
纽约	11.7
新泽西	7.0
宾夕法尼亚	2.4
特拉华	5.2
马里兰	31.5
弗吉尼亚	42.0
北卡罗来纳	35.3
南卡罗来纳	60.5
佐治亚	45.5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lennial E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series Eg 1—59.

南方殖民地和其他殖民地之间黑人奴隶数量的巨大差别不仅将南方所使用的劳动力与其他地区区别开来,而且使以这种劳动力为基础的南方经济与众不同。就像本章前面讨论过的那样,从整体上看,南方的知名城市很少,其景观比其他地方更像农村。然而,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人口都很稠密。这两个殖民地在17世纪是契约佣工的主要落脚点。不过,这种情况在18世纪有所改变。那时劳工有了更多选择,而且很多劳工本身是自由人,所以,除了切萨皮克地区之外,南方并不是人们喜欢的落脚点。面临这种情况,南方的地主们通过大西洋上的奴隶贸易来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这可能也促使白人劳工不再来到南方。一旦相关的法律控制准备就绪,奴隶制的相对效率很快使南方殖民地都盛行奴隶制。

我们对欧洲移民不愿去南方殖民地的原因还不是完全清楚。宾夕法尼亚是18世纪白人移民到达的主要目的地,那里形成了相对自由的制度,土地也容易获取。但是在这些方面弗吉尼亚也没有什么不同。杰斐逊在《弗吉尼亚笔记》中写了一段著名的话,他说:“在温暖的气候里,如果能让别人为你劳动,没人愿意自己操劳。”^⑬但我们对这话可不

^⑫ 参见 Lois Green Carr, Russell Menard, and Lorena Walsh, *Robert Cole's World: Agriculture and Society in Early Maryland* (1991)。这部书通过对17世纪中期马里兰边界上的家庭生活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农业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视角。

^⑬ Thomas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London: John Stockdale, 1788), pp. 271—272.

能当真。首先,这话对寒冷的气候也同样适用。而且,从11月到5月,南方的气候比北方温暖,这对欧洲人应该具有吸引力。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来罗那和宾夕法尼亚夏天的温度和湿度都跟最南方的地区一样令人难受,更不要说纽约城和整个哈德逊河谷了。另外,如果报酬足够高,总是能够找到人工作的。

使南方殖民地对奴隶劳动力的依赖越来越大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缺少欧洲移民劳动力这么简单。第一,南方流行大规模的土地所有,开发大块的土地超出了家庭农场所能调动的劳动力的能力范围。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大块土地来自于人头权工地授予(在政府授予土地的时候奴隶被算作“仆人”,这样每个在码头上买来的奴隶都能带来50英亩的土地)。第二,南方在继承财产的时候遵循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土地属于最年长的儿子),这意味着在所有人死亡之后土地不会被自动分割给多个继承人。相反,在中部殖民地和新英格兰,遗产土地一般要被平均分配,长子只能得到其中的两份。在欧洲,女儿一般会得到嫁妆,但在货币紧缺土地却充裕的殖民地,女儿可以与幼子得到同样大的一块土地。^⑭

在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相对而言,长子继承制比平均分配后长子得到两份的方法更容易使不动产的规模增大。我们通常会预期,经过几代人之后,南方比其他地区更容易产生集中的大块土地财产。研究这个问题的著名学者爱丽丝·汉森·琼斯(Alice Hanson Jones)的发现证实了这一预期。她发现,到1774年为止,南方的每个自由财产所有人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比中部殖民地高46%,比新英格兰高63%(琼斯的数据见表3.3)。^⑮南方近1/4的财富是以奴隶的价值来估算的,还有1/4以土地的价值估算。然而,由于近一半人口是奴隶,因此这些财富的比较数字的实际意义不应该被夸张。

如果把奴隶的价值剔除,再严格按照人均来计算,南方还是比其他地区富裕。奴隶创造的财富增加了奴隶主的财富,并且长子继承制保障了财产既不会被分割也不会被其他继承者占有。

财产(*wealth*)是在全部时间中收入所带来的净储蓄的总额。它可以是继承而来的,也可以是赚取来的。任何能使财产经过几代人的传递后仍保留在一起的制度都有助于集聚财富。1774年,中部和北方殖民地的财富有一半是土地。考虑到其他可以被计入财富的因素(比如牲畜、农业工具、谷物和耐用消费品),南方殖民地白人的平均财富仍然略高。这些数据说明了种植园主们知道:奴隶制至少对他们来说是很划算的。

南方地区还发展出了奴隶管理办法,用来控制这种劳动力并将其引向那些南方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殖民时期佐治亚的奴隶管理办法规定:

工匠不许收任何黑人作学徒;除非是给种植园施肥和耕作,种植园主之间不得相互借用奴隶工作。^⑯

^⑭ 参见 Carole Shammas, Marylynn Salmon, and Michel Dahlin, *Inheritance in America* (1987), p. 34; and Marylynn Salmon, *Women and the Law of Property in Early America* (1986)。

^⑮ Alice Hanson Jones, *Wealth of a Nation to Be: The American Colonies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1980), p. 58, table 3.7. 1774年,全部13个殖民地的人均财富是46.5英镑。以区域分,新英格兰的人均财富是36.6英镑,中部殖民地是54.7英镑,而算上奴隶,南方的人均财富是54.7英镑。参见 Jones (1980), p. 54, table 3.5。

^⑯ Charles Jones, *The History of Georgi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883), p. 423。

很明显,所有工作使用奴隶都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对佐治亚最有利的事情还是农业(所以要对其在其他领域使用奴隶加以限制)。那时和现在一样,既得利益者操纵政府,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牺牲其他人的利益。

为了解释南方对奴隶的偏好,我们必须寻找能说明南方殖民地与众不同的普遍理由。人头权工地授予、继承制度、主要作物的性质,以及对上述三个因素所作的制度调适,这些结合在一起看起来足够了。种植烟草需要不断开垦新的土地,而种植水稻需要很多劳动力。使用奴隶是问题的解决之道。被杰斐逊和连续几代历史学家所认同的气候直接导致南方奴隶制的观点,现在可以被摒弃了。

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奴隶制仅仅被作为“利益”问题讨论,而不是道德问题。毕竟在1787年,每个州都有奴隶。不过这次讨论表明,一些代表相信奴隶制最终会走向消亡。弗吉尼亚几次单方面表示要结束弗吉尼亚港口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但最终被伦敦的商会律师驳回。这些律师援引了18世纪初霍尔特(Holt)大法官的意见:“在《航海法》(Navigation Acts)中,黑人是商品。”弗吉尼亚不能废除《航海条例》,除非是通过武力解决,正如后来所发生的一样。在制宪会议之后的不到十年中,一位来到佐治亚的北方人伊莱·惠特尼发明了一种机器——轧棉机——改变了一切。由于南方殖民地发展中的特性,这些州的殖民地政府已经拥有了一套劳动力系统,而这套系统在棉花生产上的效率足以震惊世界,机器生产的高效率与南方奴隶制的矛盾也是1787年制宪会议上产生分歧的原因。这一分歧只能靠一场血腥的内战来弥平。

2.5 殖民地贸易的方向

从图2.2中我们可以看出1768—1772年间殖民地商品贸易流的总体趋势。我们在第4章将会谈到,17世纪英格兰的《航海条例》禁止殖民地与英格兰港口进行贸易,但是18世纪30年代,对条例进行了修订,允许殖民地天涯角(Cape Finisterre,位于西班牙半岛西北端)以南同欧洲进行某些直接贸易。对英国的出口占了殖民地出口额的56%,对欧洲南部为18%,对西印度群岛为26%,直接出口到非洲的产品不到1%。进口方面,殖民地进口的4/5来自英国,18%来自西印度群岛,从非洲和欧洲南部的进口则少得多。经济史学家詹姆斯·谢泼德(James Shepherd)和加里·沃尔顿(Gary Walton)的工作使我们能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些贸易模式,并且理解它们的深远意义。图2.3描绘了地区贸易的细分。

海外贸易的地域差异反映了每个地区的比较优势。新英格兰最大的出口地是西印度群岛,在那里,新英格兰的木材、木工业、渔业、小制造业,以及松脂制品都大有市场。由新英格兰向英国和欧洲南部的直接出口就少了很多。但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进口额有整整2/3来自英国,近1/3来自西印度群岛。

中部殖民地的出口商品——谷物、皮革、面粉、牲畜和小商品——在英国、欧洲南部和西印度群岛之间分配得近乎平均,但是中部殖民地超过76%的进口产品都来自英格兰,21%来自西印度群岛。

更加具有外来特色的是南方出口的商品(特别是烟草,被大量地重新进口回美洲大陆),它们绝大部分被销往英国,同时,南方的进口商品有80%来自英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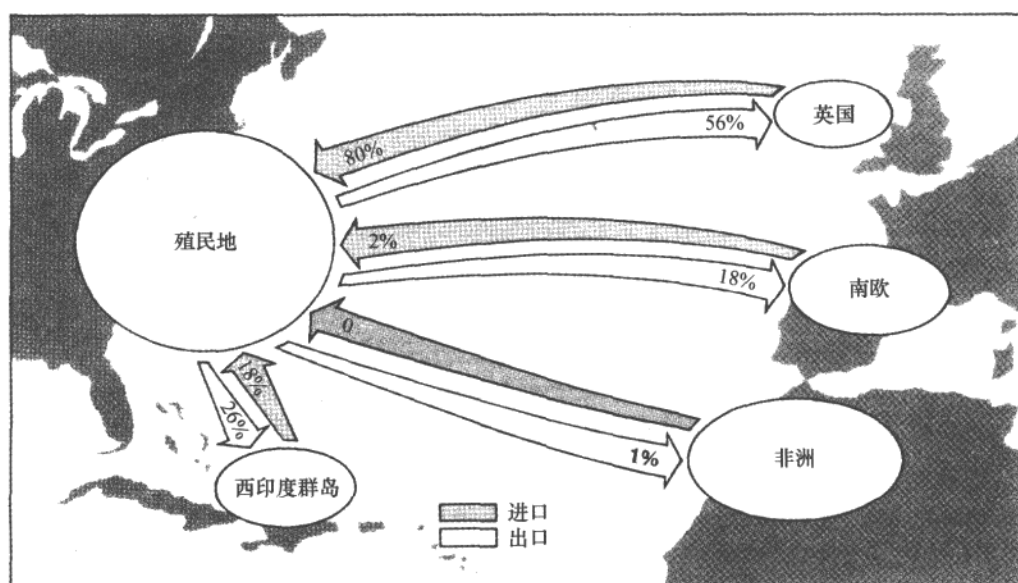


图 2.2 1768—1772 年殖民地贸易总额的比例分布

不论是出口还是进口,英国都是殖民地美国的主要贸易对象,其次是西印度群岛和欧洲南部。

资料来源: James F. Shepherd and Gary M. Walton, *Shipping, Maritime Trad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160—161. 重印获得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授权。

沃尔顿的研究表明,贸易“三角形”的旧观念太狭隘了。^① 如我们所知,确实存在这样三角形的路线(比如,新英格兰出产的朗姆酒被带到非洲,换回的奴隶被运往西印度群岛,奴隶在西印度群岛被出售以换取蔗糖和蜜糖,蔗糖和蜜糖又被运回新英格兰换取朗姆酒),但是,证据显示殖民时期的商船航行路径主要是巡回的。它们的贸易模式类似于现代的不定航线的不定期货船。根据法律和船长对走私被发觉的风险的估计,它们在机会允许的任何时间和地点入货和出货。

仅日用品方面,殖民地就有很大的贸易逆差。他们从外部进口的有形商品比出口的多,而逆差主要来自于跟英国的贸易。商品贸易将殖民地置于国际贸易中的逆差位置。图 2.4 显示了 1768—1772 年间各地区年度和总计的贸易逆差。这些年份的逆差 3/4 发生在与英国的双边贸易中,而最高额的顺差是与欧洲贸易产生的。我们有理由推测,产生顺差的原因是《航海法》禁止殖民地直接从欧洲北部直接进口商品,而与英国的逆差产生的部分原因是,商品需要经过英格兰转运,由此产生了额外的转运成本。

那时和现在一样,商品贸易并不代表全部,殖民地经济的逆差通过其他途径得到了弥补。殖民地的实际年度净负债相对较小。那么殖民地的全部贸易收支差额(balance of payments)是多少呢? 沃尔顿和谢泼德进行了计算,得出了具有启发性的结果。^② 从

^① Gary Walton, "New Evidence on Colonial Commerce," *JEH*, September 1968.

^② Gary M. Walton and James F. Shepherd, *The Economic Rise of Early America* (1979), p.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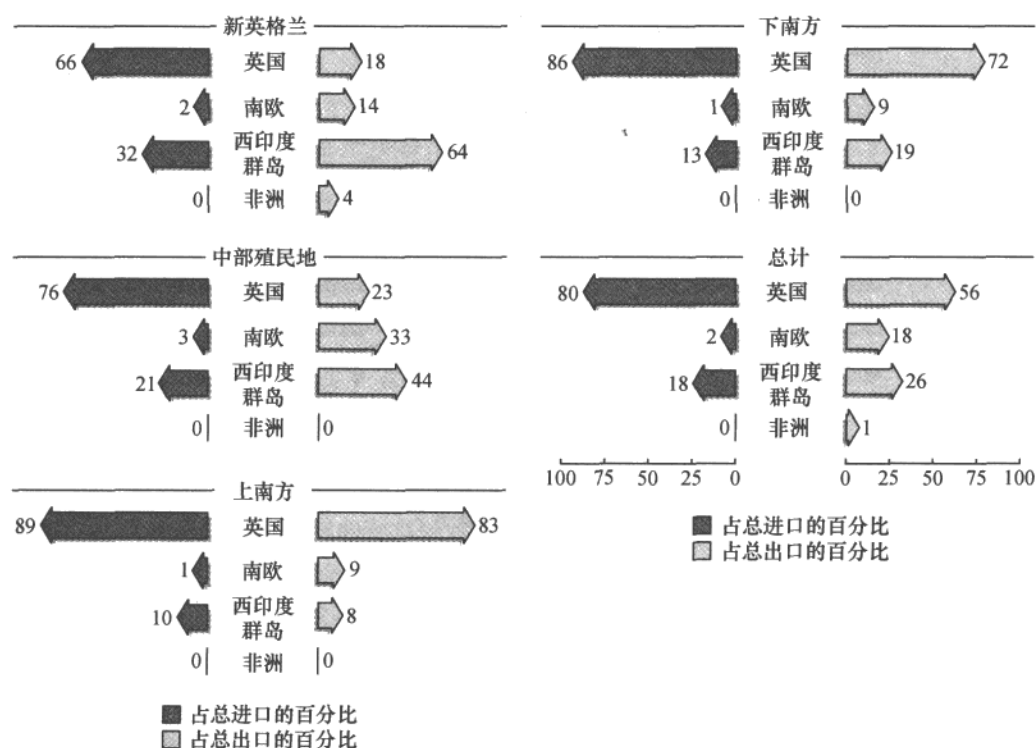


图 2.3 按照地区划分的 1768—1772 年殖民地贸易的比例分布

除了新英格兰之外,英国是所有殖民地的最主要进出口市场。西印度群岛在新英格兰的进出口市场中均占有相当份额。

资料来源:James F. Shepherd and Gary M. Walton, *Shipping, Maritime Trad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160—161. 重印获得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授权。

1768 年到 1772 年的情况来看,年均商品贸易的逆差是 1 121 000 英镑,而船只出售带来的 140 000 英镑加上净航海收入和商业佣金的 880 000 英镑几乎完全弥补了这一逆差。进口奴隶(200 000 英镑,主要是从西印度群岛进口)和契约佣工(80 000 英镑)的支出共计 280 000 英镑,基本上由英国投入殖民地的 230 000 英镑的军费抵消。另外,每年英国对殖民地投入的海军军费平均为 70 000 英镑。如果我们将这些全部计入,殖民地的年度净负债只有差不多 40 000 英镑,这一数字反映了英国向美国转移的商业信贷。

殖民地在 1768—1772 年间的净年度负债增长显然不像历史学家曾经以为的那样大。显然,在总体收支中,殖民地受惠于与母国的联系。

3. 习惯法传统

使用英格兰习惯法并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殖民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这是使英国殖民地与其他殖民地不同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理解为何英国殖民地比其他新世界殖民地发展得快,习惯法的运用是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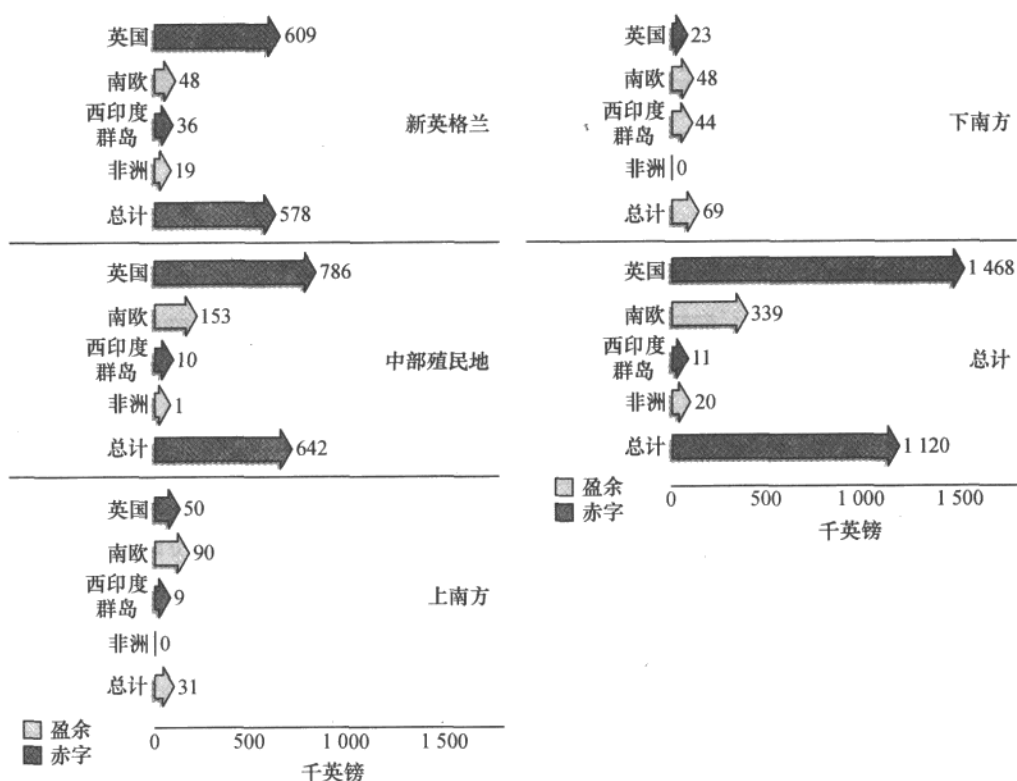


图 2.4 按地区划分的 1768—1772 年殖民地平均年度收支情况

贸易逆差主要由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贸易产生。南方殖民地在与欧洲南部地区进行的贸易中略有盈余。全部贸易逆差的 3/4 来自与英国的贸易。

资料来源: James F. Shepherd and Gary M. Walton, *Shipping, Maritime Trad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15. 重印获得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授权。

习惯法是所有英格兰殖民地所遵循的法律,用来处理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并解决私人之间的纷争。它是在重商主义时代发展出来的,是经济生活受控制于民族国家的利益的产物。当重商主义被亚当·斯密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取代之后,人们的关注点转向了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这一政策强调政府不干预私有经济。然而,政府的干预一直存在,美国宪法采用了习惯法。政府干预一直保留在地方和州政府的层面上,到了 19 世纪晚期又进入了国家层面。现代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这一传统的有力影响。比如,政府可以使用“警察权”来监控每一件事,小到给理发师颁发执照,大到环境保护组织。然而,这一传统也给我们带来了现代的消费和投资市场体系。普通法传统是美国经济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任何与美国经济史相关的书中都非常值得花一些篇幅来讨论,任何学习美国经济的学生都应该对它进行一些思考。

3.1 市场和购者自慎

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土地占有权是如何融入英格兰的土地所有权系统中的。但是动产的情况如何呢?商品和牲畜的所有权在什么时候算是从一个人手中合法转入其他人手中的呢?如果不能为买者和卖者提供动产权利的保障,就不可能出现商业的大发展。

在英格兰,解决动产产权移交问题的方法是建立公开市场(market overt)体系:一些城镇被指定为市场城镇,并选择一些固定的日期作为这些市场的开市日。在伦敦以外的地方,开市日的市场城镇是唯一可以合法进行动产交易的地方。那里发生的交易不需在三位见证人监督下进行。只有在伦敦,每天都是开市日,每家店铺都被看做公开市场。另外,出现了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的大型集市。公开市场和集市解决了两个基本问题:实现了对商业活动的管理,货物转手的时候全部产权也随之转移。按照英格兰法律,在开市日和市场城镇中进行的交易被认为经过了见证,所以经过出售或者交易的产权获得了保障。

在一个大多数人口是文盲的基本稳定的社会中,公开市场体系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由于职业商人和那些偶尔将自己生产的商品拿到市场上出售的农民都是流动的,所以要建立一套特殊的法庭来解决纠纷。这些法庭被称为商事法庭(courts of pie powder,也称为饼粉法庭或“灰脚法庭”[dusty foot])是有记录并可以进行上诉的法庭。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在1353年颁布的一项法律使这套法庭有了正式的基础:“(由于)商人为了做生意不能长时间停留在一地,我将授予他们迅速权,每时每刻。”^①这一调整是在法院使用衡平法诉讼(equity proceedings)的滥觞。

从一开始,整套英格兰的市场系统就被照搬到了美国东海岸。当殖民者第一次开始建立自己的定居点的时候,他们自然希望重建一套他们业已熟悉的系统。因此,我们发现所有的殖民地都建立了公开市场和开市日。在17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马萨诸塞,法律规定:“从今以后,应该在波士顿保留一个市场……每个星期的第五天开市,……在塞伦……第四天开市,……溪谷第三天开市……”波士顿每年还有两次集市,“每年在第三个月的第三天与第八个月的第三天连续开市两三天”。^②

殖民地经济在物质上表现出巨大的扩张。在边疆社会,交易在任何买家和卖家相遇的地方进行。按照规定,动产权利的转移只有在市场上进行才能得到法律保障,但随着美国贸易的发展,这根本不现实。农民们反对这一制度,他们表示,开市日的时候市场上充斥了商品,这给卖家带来了不利。因为为了能在开市日结束之前把商品卖完,卖家必须牺牲易腐货物的利润。

17世纪末,新英格兰的农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在自己的农场上向顾客直接出售产品。慢慢地,中间商、批发商和零售商都来到这里,从市场的不完整中谋利,并逐渐消除了市场的缺陷。城镇成为殖民地农产品的批发地和零售地。城镇中的工匠也反对公开

^① Edward Adler, "Business Jurisprudence," *Harvard Law Review*, vol. 28, 1914—1915, p. 139.

^② William Whitmore, ed., *Colonial Laws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Boston City Printers, 1889), p. 150.

市场的交易规则,他们发明了一种“定制”的交易形式,即只为特定的客户工作。这种形式也出现在零售商店中。比如,1789年,费城的制鞋匠拒绝那些在公开市场上卖鞋的人加入制鞋业协会。

那时,公开市场变成了日常商业发展的绊脚石⁵。英格兰的市场规则之一是购者自慎(caveat emptor),“商品出门概不退换”。在开放的市场上,如果买家有公平的机会验货(规则保障了这一行为),那么一旦商品的所有权通过交易进入买家手中,买家就要自己承担商品的质量问题。在不受公开市场规定保护的地方,这个原则也可以适用。因为“商品出门概不退换”的原则既保护了买家又保护了卖家,所以在殖民地时代晚期,公开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但是“商品出门概不退换”并不是欺诈的保护伞,如果在交易中受到了欺骗,买家可以在民事法庭起诉卖家。

在城镇中一直执行着质量控制条例,进行交易的时间也受到控制,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禁止在星期日进行某些商业活动的所谓的蓝色法规(blue laws)今天还存在于很多城镇和州中。政府的“警察权”对商业的控制从来没有消歇——直到近几十年,商品出门概不退换的原则大大扩展,才使我们的经济更加自由,可以在任何有机会的地方做生意。公开市场仍然存在于公开的和农场的市集上,这些市集遍布全国。各州,包括如今的联邦政府,取代了殖民地市场官员的位置,为制造商和经销商制定了行业安全和质量标准。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和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是现代市场中的担负公共市场角色的机构。“商品出门概不退换”的原则虽然依然存在,但只在那些没有其他管理措施的地方起作用。

3.2 执照的颁发和其他控制措施

在殖民地时代,执照像今天一样限制着人们利用商业机会的能力。今天,肉铺、理发店和银行都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拥有执照才能开门营业。为什么不放任自由让任何能找到顾客的人都去做生意呢?这种情况不仅现在不被允许,而且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被允许过。自古以来,似乎有四种基本动机促使人民寻求政府的保护,以期政府通过法律强制禁止放任政策下可能会出现出现的滥用市场行为。政府对自由贸易的限制表现为对以下四个方面的控制:(1)垄断权,(2)质量控制,(3)道德,以及(4)税收。

3.2.1 垄断权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在商业和服务业中,为了获得更高的售价和限制竞争者的参与,人们都希望取得垄断权。最有效的垄断权是由政府创造的。垄断权在殖民地城镇中的典型形式是阻止外来者或本地人进入受保护的行业,这种限制通常由商会组织作出。除了这种公开的禁止之外,法律规定的见习制进一步限制了人们进入商业的机会。当时,行业准入权掌控在既得利益者手中。出于质量方面的考虑,见习制的要求比较容易达到。

3.2.2 质量控制

殖民地政府很关注出口产品的质量,以期取得良好的口碑。除了见习制,政府还经常颁布法令,要求检查员对商品的质量进行检验,以确保质量——用潘的话来说,是要确

定产品赢得了“公众分”(the public mark)。一般来说,法庭通过将一部分罚款分给揭发人,使得公众也参与到执行过程中。这一方法极大地降低了强制执行的成本。^①

3.2.3 道德

那时和现在一样,一些商品、服务或者行为被认为冒犯了公众道德,并且为法律所限制。今天,我们限制烟、酒、成人杂志和电影的销售范围。在殖民地时代,禁令所及包括未经当局允许的布道、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精饮料、借钱给水手、身为穷人却衣着奢华(禁奢法)、房屋不整洁、行为放荡、观看艳舞。美国人一直相信,道德可以通过立法来维护。

3.2.4 税收

政府发放一份执照的同时,就意味着收到了一笔费用。对于该行业而言,这是一种商业税。那时和现在一样,商业税是一项稳定的政府收入来源。^②

除了上述日常的控制,殖民地政府还在很多方面进行行政干预,我们今天称之为公共事业管制(public utility regulation)。这个习俗同样起源于英格兰并且很快在殖民地付诸实践。车夫、搬运工和旅店老板都要得到营业执照,他们的价码也要受公众机构控制。同样,在受到自然条件制约而缺乏竞争的地方——码头、收税桥或者渡口——服务的收费和内容也受到古老的英格兰规则限制:必须向所有需要的人提供称职的服务,并且价钱要公道。正如杰斐逊在《弗吉尼亚笔记》中说的那样:“只有在法律规定允许的地方才能设立渡口,摆渡的船资是固定的。”在后来的日子里,出现了运河、铁路、电报、电话、飞机这些使用电力、水力和石油资源的设施,但控制的概念并没有更新了。17世纪,因为发现“波士顿和查尔斯敦的搬运工经常强取超过他们应得的费用”,所以马萨诸塞成立了委员会,并赋予委员们“监管商业滥用行为的权力”。^③今天的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和联邦电力委员会(Federal Power Commission)不过是其现代翻版。现今,我们有各种公共服务委员会来将公共服务的价格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论对与错,当年这类服务的价格并没有留给客观市场来决定——今天依旧如此。

3.3 就业、工资和收入

据说约翰·史密斯上校在早期的弗吉尼亚定居点制定了“不工作者不得食”的规矩。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至少对下等阶级——哪怕是自由的白人——而言,工作都是必需的。它的法律背景是伊丽莎白女王颁布的《技工与学徒法令》(Statute of Artificers and Apprentices, 1562),其中包含了“各种技工、劳动力、雇工和学徒的序列”。这道法令要求所有人都有一技谋生,以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安定。在列举了长长的豁免清单后(比如,贵族、富人、军人、公务员、学者、水手、矿工、渔民、商人,还有在城市、公司或者市场中的师傅、熟练工和学徒),法令规定清单之外的人都可被强制从事农业劳动,包括12—60岁的

^① 在殖民地时代,弗吉尼亚和马里兰都施行过限制烟草输出和控制商品质量的计划。Mary McKinney Schweitzer, "Economic Regulation and the Colonial Economy: The Maryland Tobacco Inspection Act of 1747," *JSH*, September 1980.

^② 关于这类殖民地管理的例子,参见 Jonathan Hughes, *Social Control in the Colonial Economy* (1976), chap. 9.

^③ Whitmore(1889), p. 185.

男性和12—40岁的单身女性。每天的工作时间、工作的流动性,都有规定。农业劳动力只有在获得迁出证明信的情况下才可以离开岗位(和前苏联的情形一样)。在收割季节,手工业者也可能被强制去农村劳动,工资由地方政府设定。凡是提供高于法定工资的雇主将被罚款,罚金将由举报人和法院分享。凡是拒绝参加这种劳动的人即被宣判为流浪者。伊丽莎白女王的法令是在亨利八世的慈善救济法(1535)的基础上修订而来的,它对流浪者的处罚是笞刑、烙刑、割耳,若犯此罪行三次则处以绞刑。古老、美好的英格兰!

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很多这类早期的英格兰法律都是有效的。杰斐逊在《弗吉尼亚笔记》中指出:“我从来没有在街道或者公路上见过乞讨的美国人。”在弗吉尼亚,他写道:“……那些没有财产也没有工作的流浪者被安排在工厂里,在那里他们可以获得衣食、住处,并成为劳动力。”^③在马萨诸塞,法律规定,游手好闲的人将被关进监狱,还要受10下鞭刑,然后给他们安置工作以赚取“必需的面包和水,或者其他简单食物”。父母懈怠职务的,其子女要被安排为学徒,“在为他们自己或者国家谋利的农业或其他商业岗位上学习”,他们受到的教育是否合适,则由城镇上的行政委员进行评判。^④这些孩子可能与父母分离,法庭将他们分配给“雇主培养几年”,直到女孩满18岁,男孩满21岁。

那些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处的人,在法律上,必须面对进行强制劳动的命运,而他们的劳动工资是由法庭、行政委员或者地方政府规定的。对于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欠发达的经济体,这种规则似乎是合理的。不工作还能获得由慈善机构或失业保险发放的失业补贴,不管是对一位富翁还是对一个富裕的社会而言,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奢侈的行为。殖民地社会供养了老弱病残,但其他人必须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游手好闲的人甚至还会被投入监狱,因为他们犯了“没有可见谋生手段”的罪。这种由里根政府复兴的劳动伦理即渊源于此。像亨利·福特(Henry Ford)一样的很多美国人坚信“工作是我们的救赎之路”。但是对于质疑者而言,这种伦理中始终存在强迫性。

这些规则,一旦实施,必然会减少社会所需的慈善款项。这很重要,因为自亨利八世之后,英格兰社区(原本的教区)的人都被强制纳税,以帮助贫穷者。殖民地亦是如此。如果认为所谓“挨饿的自由”价值不大,那么在经济学上就很难谴责在美洲殖民地推行强制劳动的行为。

在殖民地年代中,随时可见政府试图对工资和物价进行控制的情况。在法律上,劳工组织被认定是反抗社会的违法阴谋机构,所以,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很少见,一般也不成功。我们已经注意到,由契约佣工和奴隶造成的大量非自由劳动力中,包含了强制性的因素。那么现在还必须在强制性劳动的因素中加上那些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契约佣工的人。殖民地时期的美国,穷人没有不必要地挨饿;在能找到工作或者政府为他们创造了工作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虚度时光。

^③ Jefferson(1788), p. 220.

^④ Hughes(1976), pp. 96—111 and footnotes.

推荐阅读

文章

Anderson, Terry. "Wealth Estimates for the New England Colonies, 1650—1709."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2, no. 2, April 1975.

Ball, Duane, and Gary Walt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Change in Eighteenth Century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6, no. 1, March 1976.

Henretta, Jam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Colonial Bosto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 22, no. 1, January 1965.

Jones, Alice Hanson. "Wealth Estimates for the New England Colonies About 177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2, no. 1, March 1972.

Lindstrom, Diane, and John Sharpless. "Urban Growth and Economic Structure in Antebellum America."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 1978.

Main, Gloria L.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Colonial Massachuset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3, no. 1, March 1983.

Schweitzer, Mary McKinney. "Economic Regulation and the Colonial Economy: The Maryland Tobacco Inspection Act of 1747."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0, no. 3, September 1980.

Shepherd, James, and Samuel Williamson. "The Coastal Trade of the British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1768—1772."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7, no. 4, December 1972.

Walton, Gary M. "New Evidence on Colonial Commerc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8, no. 3, September 1968.

书籍

Abernathy, Thomas Perkins. *Western Land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37.

Bridenbaugh, Carl. *Cities in Revolt*.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38 (reprinted b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4).

———. *Cities in the Wildernes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5 (reprinted b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Bruchey, Stuart, ed. *The Colonial Merchant: Sources and Reading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6.

Carr, Lois Green, Russell R. Menard, and Lorena S. Walsh. *Robert Cole's World: Agriculture and Society in Early Marylan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for the Institute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1991.

Doerflinger, Thomas M. *A Vigorous Spirit of Enterprise: Merchan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Ford, Amelia Clewly. *Colonial Precedents of Our National Land System as It Existed in*

1800. Philadelphia: Porcupine Press, 1976.

Hughes, Jonathan. *Social Control in the Colonial Economy*.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6.

Jones, Alice Hanson. *American Colonial Wealth: Documents and Methods*. New York: Arno Press, 1977.

———. *Wealth of a Nation to Be: The American Colonies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Katz, Michael B. *In the Shadow of the Poorhouse: A Social History of Welfare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Kulikoff, Allan. *Tobacco and Slaves: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Cultures in the Chesapeake, 1680—180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McCusker, John J., and Russell R. Menard. *The Economy of British America, 1606—1789: Need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tud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Rothenberg, Winifred B. *From Market-Places to a Market Economy: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Massachusetts, 1750—18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Salmon, Marylynn. *Women and the Law of Property in Early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Shammas, Carole, Marylynn Salmon, and Michael Dahlin. *Inheritance i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Walton, Gary M., and James F. Shepherd. *The Economic Rise of Early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第 3 章

独立战争前夕的美国

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参与独立战争的先辈们想象成漫画书里的传奇式人物,他们穿着简陋的手织布短裤,驱逐了富有而孱弱的英格兰人。然而,现代的文献研究告诉我们,殖民地生活远非这样简单。

1. 人口来源和人口增长

那时在美国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从何而来?要回答殖民地居民的来源问题,一个办法是考察殖民地末期的人口。表 3.1 展示了在第一次人口普查的 1790 年,美国的人口构成(不包括印第安人)。

表 3.1 1790 年的美国人口

年份	非白人		白人		总计	
	人口数	百分数	人口数	百分数	人口数	百分数
1790	757 000	19.3	3 172 000	80.7	3 929 000	100.0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a 22—27.

1.1 白人

1790 年,超过 4/5 的美国人口来自欧洲,只有不到 1/5 的人口可以确认是来自非洲的。白人移民的数据其实与黑人奴隶的数据一样含糊。然而,由于白人使用姓氏,因此学者们还是可能追溯出 1790 年的人口中谁具有遥远的欧洲血统。如果我们假定姓奥哈拉(O'Hara)表示爱尔兰血统,麦克道尔(McDougall)表示苏格兰血统,冯·利本(von Schlieben)表示德国血统,范·里斯维克(van Ryswick)表示荷兰血统,韦斯特维克(Westwick)表示英格兰血统,那么当时的白人中有 60.9% 都使用了英格兰姓氏。剩下的白人,8.3% 是苏格兰人,9.7% 是爱尔兰人,8.7% 是德国人,3.4% 是荷兰人,1.7% 是法国人,0.7% 是西班牙人,还有 6.6% 的人口不能确定其来源国家。然而,因为使用休斯(Hughes)和史密斯(Smith)这样姓氏的人,既可能是英格兰人,也可能是爱尔兰人或者苏格兰人,如果我们将上述的不列颠群岛合并为一类,那么数据就可信得多了。合并后,英国血统在全部白人,中占了 78.9%。我们发现,在西北地区(即今天的中西部地区以北)57.1% 的人的姓氏来自法国,在路易斯安那 64% 的姓氏来自法国。在从覆灭的西班牙帝国手中得来的地区中,大约 96% 的姓氏都源自西班牙。在最早的殖民地中,宾夕法尼亚有 33% 的德国姓氏,35% 的英国姓氏。1790 年的纽约依然有 17% 的荷兰姓氏;而新泽西

则与纽约差不多,荷兰姓氏占了16.6%。在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最普遍的是英国姓氏——马萨诸塞占了82%,在相当于今天的佛蒙特的地区占到了76%,罗德岛占71%,弗吉尼亚则占68.5%。

如上所述,1790年人口普查时,从不列颠群岛到来的移民的后裔几乎占全部人口的3/4。因此,殖民地经济发展使用大多数人所熟悉的英国制度就毫不令人奇怪了。就目前学者的研究成果而言,其他自愿或非自愿移民到美国的欧洲人也适应了英国的法律和习惯。以奴隶为主的黑人在制度上则没有发言权。

1.2 奴隶

被运往美国的黑人主要来自西非,但是也存在一条从马达加斯加群岛(Madagascar)和桑给巴尔岛(Zanzibar)通往新大陆的奴隶贸易之路。大多数进行奴隶贸易的港口都位于非洲大陆的西海岸,但是据悉在那里被卖往新大陆的奴隶中也有一些来自遥远的非洲内陆。因此,现代美洲黑人的祖先很可能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各个地区。据估计,在1501—1865年间,运往美洲的非洲奴隶有1000万,甚至可能有1500万之多。那么他们中的多少人来到了这片最后成为美国的土地上呢?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和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认为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6%是与最初的13个殖民地之间进行的。这意味着总共输入了600000人,这一数字可能太高了。^①其他人估计,在1700年殖民地有大约28000名黑人,而1700—1790年间输入的黑人共有250000名。输入的大部分黑人是奴隶,其比例在北方为59%,南方为95%。福格尔和恩格尔曼认为在1780—1807年间,输入的奴隶更多。如果这个说法正确,我们可以保守地估计,在1807年以前至少有50万名奴隶被运到美国。这个数字可能比殖民地时代输入黑人的数字少(但是少多少呢?)。关于这些数字,已经不可能取得很精确的结果了。

1.3 人口增长

对于移民的记录断断续续,还有部分遗失,所以我们对待殖民地白人移民的总数必须要审慎,特别是早期的数字。我们知道,移民到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可能有35000人。估计1700—1775年白人移民总数在300000左右。虽然17世纪的白人移民数字比黑人移民大很多,但情况在18世纪正好相反。因此,我们不妨假设白人和黑人移民的数量一样多——可能各50万是一个保守的数字。戴维·加仑森(David Galenson)估算1650—1780年间的白人移民总数约为600000。^②如果这一数字正确,那么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对黑人移民总数为600000的估计也就很合理。因此,加上人口的自然增长,白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依然大大超过黑人的比例。^③

由于17世纪各个殖民地中移民的死亡率都很高,因此移民数量很难说明什么问题。假如一个人在为殖民地贡献力量之前就死了(或者返回欧洲),那么这个人是在经济意义上的移民吗?据埃德蒙德·摩根(Edmund Morgan)的研究,如果在1625—1640年间有

① Robert William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1974).

② David Galenson, *White Servitude in Colonial America: An Economic Analysis*(1981), p. 18.

③ 大部分白人都可以选择回到他们原来的国家,而且很多人都那么做了。

15 000 人踏上了美洲大陆,那么在 1640 年这些人中只有大约 7 000 人还活着。这些极快就消失了的移民对殖民地的人口增长和经济成长有意义吗?更早的移民同样不幸。例如,1606 年 12 月,143 人离开伦敦前往弗吉尼亚,到了 1607 年秋天,活着的人就只剩下 50 个。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普利茅斯很多殖民地居民都死于第一个严冬。我们可以接受的对殖民地人口的估算是表 3.2 中的数字。

表 3.2 1610—1780 年间美国殖民地的人口估算

殖民地	1610	1630	1650	1680	1700	1720	1750	1760	1780
新英格兰殖民地									
缅因	—	400	1 100	(____包括在马萨诸塞____)				20 000	49 133
新罕布什尔	—	500	1 305	2 047	4 958	9 375	27 505	39 093	87 802
佛蒙特	—	—	—	—	—	—	—	—	47 620
马萨诸塞	—	506	14 037	39 752	55 941	91 008	188 000	202 600	268 627
普利茅斯	—	390	1 566	6 400	(____包括在马萨诸塞____)				
罗德岛	—	—	785	3 017	5 894	11 680	33 226	45 471	52 946
康涅狄格	—	—	4 139	17 246	25 970	58 830	111 280	142 470	206 701
新英格兰殖民地总量	0	1 796	22 832	68 462	92 763	170 893	360 011	449 634	712 829
中部殖民地									
纽约	—	350	4 116	9 830	19 107	36 919	76 696	117 138	210 541
新泽西	—	—	—	3 400	14 010	29 818	71 393	93 813	139 627
宾夕法尼亚	—	—	—	680	17 950	30 962	119 666	183 703	327 305
特拉华	—	—	185	1 005	2 470	5 385	28 704	33 250	45 385
中部殖民地总量	0	350	4 301	14 915	53 537	103 084	296 459	427 904	722 858
南部殖民地									
马里兰	—	—	4 504	17 904	29 604	66 133	141 073	162 267	247 959
弗吉尼亚	350	2 500	18 731	43 596	58 560	87 757	236 681	339 726	538 004
北卡罗来纳	—	—	—	5 430	10 720	21 270	72 984	110 442	270 133
南卡罗来纳	—	—	—	1 200	6 260	18 328	74 000	94 074	180 000
佐治亚	—	—	—	—	—	—	5 200	9 578	56 071
肯塔基	—	—	—	—	—	—	—	—	45 000
田纳西	—	—	—	—	—	—	—	—	10 000
佛罗里达	—	—	—	—	—	—	—	—	15 000
南部殖民地总量	350	2 500	23 235	68 130	105 144	193 488	529 938	716 087	1 362 167
殖民地人口总量	350	4 646	50 368	151 507	251 444	467 465	1 186 408	1 593 625	2 797 584
黑人总量	—	60	1 600	6 971	28 373	68 667	252 068	325 806	587 905
黑人百分比	—	1.3	3.2	4.6	11.3	14.7	21.2	20.4	21.0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Eg 1—59.

1.4 出生率和死亡率

尽管早期的死亡率很高,但人口还是增速惊人。到殖民地时期快结束时,10 个白人中只有一个是海外出生的,而 10 个黑人中有两个是在海外出生。这说明,奴隶贸易对黑人人口增长的重要性大于移民对白人人口增长的重要性。人们普遍认为,一旦殖民地人口有了坚实的基础,快速的人口增长主要是由较低的死亡率和较高的出生率造成的,而不是由移民造成。从 1700 年到 1780 年,年度人口增长速度是 30‰。这个速度并不比现代典型的欠发达国家——比如加纳和利比亚——低多少。殖民地的人口增长速度足以使其人口每 25 年翻一倍。

当然,由于是从零开始,因此在最初的几十年中,不论死亡率的高低,殖民地人口增长的速度都更快。出生率在每年 35‰到 50‰之间浮动,40‰基本上是一个准确的平均值。这是很高的出生率,比当时欧洲的出生率高出 1/3 以上。(与此相对,据估计 1998 年美国的出生率只有 14.6‰。)

18 世纪殖民地的年度人口死亡率是 20‰—25‰,比当时欧洲低。^④ 然而,比利·史密斯(Billy Smith)和其他学者的研究表明,由于平均值的计算包括了相对隔绝的农村人口,在像费城和波士顿这样的城市中,人口死亡率很可能高于平均值一倍。^⑤

考虑到当时较为简陋的医药条件,殖民地的人口增长必然得益于较好的气候、食物和水,以及较少的流感、天花、疟疾和白喉等传染病。黑人和白人的存活率基本一样,但是如果你注定是一名奴隶,那在南方殖民地的生活比在加勒比地区要强。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发现,如果美洲大陆上黑人奴隶的死亡率像在西印度群岛那样高得恐怖,那么 1800 年活着的黑人就不是 100 万,而只是 186 000。除了较低的死亡率,美洲大陆上黑人奴隶的出生率也超过加勒比群岛。

1.5 婚姻和生育

历史学家很久以来都认为,殖民地的高出生率是因为美国夫妇的结婚年龄比欧洲早。然而,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和路易斯·斯泰特(Louis Stettler)的研究显示,在新英格兰地区,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是 21 岁,男性是 24 岁。这些平均年龄虽然比现在早了三岁,但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第一次结婚的平均年龄也还和殖民地时期的新英格兰差不多。与当时的欧洲和现在的美国相比,殖民地婚姻的生育率都高得多。妇女因分娩死亡的情况比现在严重,而男人会再娶。当时的家庭都很大。正如希格斯和斯泰特所简洁描述的那样:“一名男性在一生的婚姻中平均拥有七个孩子。”^⑥

这些重要的数据非常粗略,但是比照 1790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美国人口的总数是确定而合理的。就这样,我们看到殖民地人口的增长非常有力。这种自然的活力在美国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在那之后才开始减速。

1.6 人口地域分布

我们应该注意表 3.2 中 1780 年弗吉尼亚、马萨诸塞和纽约的相对人口规模,对它们的比较能解释这个国家早期政治史的很多问题,并能说明弗吉尼亚农村的巨大贡献,尽管当时那里超过 1/3 的人口还是奴隶。尽管宾夕法尼亚建立的时间晚于纽约、马萨诸塞、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但它从 1681 年以后人口增长得很快,到 1780 年,这里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弗吉尼亚以外的所有地区。还要注意的,到这个时期结束的时候,人口已经开始向佛蒙特以及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肯塔基和田纳西转移。西进运动已经起步了。

^④ 在 17 世纪,殖民地的人口死亡率可能上升到了 24‰。Robert Paul Thomas and Terry Anderson, "White Population, Labor Force and Extensive Growth of the New England Econom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JEH*, September 1973.

^⑤ Billy Smith, "Death and Life in a Colonial Immigrant City: A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Philadelphia," *JEH*, December 1997.

^⑥ Robert Higgs and Louis Stettler, "Colonial New England Demography: A Sampling Approach,"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April 1970, p. 291.

到殖民地末期,新英格兰的人口规模已经落在了中部殖民地之后。南方的人口增长则保持领先。在巴黎和会(1783)承认美国独立之前的20年中,弗吉尼亚加上南、北卡罗来纳,构成了全部殖民地人口增长的40%。殖民地时代结束的时候,几乎一半的人口集中在五个南方殖民地中。

2. 财富与收入

当我们审视自殖民地时代保留至今的建筑之时,可以看到普利茅斯、纽伯里波特、波士顿、费城、乔治敦和查尔斯敦过去的殷实与富裕。我们或许以为只有最好的建筑被保留了下来。然而,这些坚固的建筑多是进行日常商业活动的场所和普通人的房子——而不是王公贵族的。这种富裕是由当时的社会和经济基础造就的。仅仅按照常识来推测,殖民地末期的社会也一定是非常繁荣的。

2.1 殖民地的增长

美国经济史就是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的历史,即人均总产出增长的故事。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它只能为生活状况的改进提供契机。毕竟,法国伟大的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 1848—1903)放弃了西方文明的舒适而选择了塔希提岛(Tahiti)的俭约。在衡量经济增长的传统眼光中,即使居住在污染严重、交通拥堵的东京的雇员,也比皮肤晒成古铜色、在塔希提岛上悠闲地观看辉煌落日的艺术家富裕。

这种思维模式正反映在美国经济史中。人们一直将砍伐森林、垦殖草原、修筑水坝和扩展郊区看做进步的表征,直到最近才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这种思维方式带有典型的殖民地时期的特点。人们的富足程度不以人均拥有的森林面积来衡量,而以每个家庭砍伐的树木来衡量。美国经济史的写作传统是:砍光了树木的土地上的犁沟就是进步。

对某一年份而言,用市场价格来评估的上述活动所产生的总价值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⑦ 由于信息不完全,因此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我们只能对GDP进行粗略地估算。全部产出的价值一定等于全部参与生产的生产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所获得的收入——这些生产要素传统上指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所有的产出都是生产过程中要素组合的结果。比如我们考虑一个人手工犁耕一块田的例子。犁沟的数量便是产量,人的劳作是劳动力,犁是资本,未经犁耕的土地是自然资源。每小时犁出的犁沟数目就是这个人每小时的产出,这被定义为劳动生产率(labor productivity)。如果这个人使用了一头牛(额外的资本)来作为犁耕的动力,那么每小时犁出的犁沟数目就应该有所增加,他的收入也随之增长。这就是经济增长的本质。

获得的收入不是用于消费就是被储蓄下来。随着时间积累下来的净储蓄就构成了财富(wealth)储备。不论它被投入到建筑之中还是变成了家畜,它都是社会财富。它也

^⑦ 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政府报告中使用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多于GDP。而在二战之前的年份中,对GNP的估算比对GDP的估算要普遍得多。本书将尽可能使用GDP以合乎现在的习惯用法。

被称为资本(capital),是一种在某个时间“用于生产其他商品的商品”。人们已经对殖民地的财富通过不同方式进行了粗略估算。方法之一是使用遗嘱检验法庭保存下来的财产遗嘱记录。

现代学者中使用这些数据进行研究的领军人物是爱丽丝·汉森·琼斯,她估算出殖民地的财富是非常巨大的。^⑧ 她发现,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自由人口人均拥有的实际财富是76英镑。如果我们以此作为可获得数据中的最优估算,那么通过简单的数学计算就能获得一些有趣的信息。根据沃尔顿和谢泼德的研究,当时的76英镑,相当于2000年的11100美元。^⑨ 这一金额相当可观!如果我们使用这一数值来衡量人均资本,再把它按照各种资本/产出率去除,那么就得到了1774年的人均产出(或者收入)。历史上的资本/产出率一般都在3:1和5:1之间。^⑩ 若使用前者,1774年的人均收入是25英镑;若使用后者,则是15英镑。如果我们使用沃尔顿和谢泼德转化到“现代价值”和外推到2000年价值的方法,那么1774年殖民地美国人的收入在3875美元到7250美元之间(同样,这是2000年的价值)。以较低的数字来计,这笔收入可以使殖民地美国人的生活标准达到今天的博茨瓦纳、巴西或者波兰这样国家的水平;若以较高数字来计,他们的生活水平与今天的阿根廷或者沙特阿拉伯差不多。当然,殖民地居民只能用他们的收入来享用1774年的消费和资本产品,而不是2000年的。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计算中存在着很多错误的可能性,但它依然能说明两个世纪前美国人的富裕程度至少跟他们的近亲英格兰人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根据18世纪70年代早期殖民地较低的税收来调整这一计算结果,当时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肯定是位居世界前列的。事实上,我们粗陋的估算表明,那时美国人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今天世界上2/3的人口收入水平。

大多数对18世纪人均增长速度的估计都在每年0.3%到0.6%之间,这比当时英格兰的人均增长速度略高。^⑪ 这种速度意味着,在大约140年间,人均产出翻了一番。对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缺少技术变革的社会而言,增长主要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速度是健康的。^⑫

到1774年,南方殖民地占据了总财富中最大的份额,并且人均财富占有额也最多

^⑧ Alice Hanson Jones, *American Colonial Wealth: Documents and Methods* (1977).

^⑨ Gary M. Walton and James F. Shepherd, *The Economic Rise of Early America* (1979). 参见他们的第7章,那里有对与这个主题有关的数据的精彩调查和分析。本段只是陈述了他们的主要结论。必须注意,并不是所有学者的估算都与琼斯博士的估算一样高。但是,她对历史数据的调查是最全面和谨慎的,所以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她的结论受到高度重视。

^⑩ 资本/产出率反映了在一段时间内社会使用净储蓄——资本储备——来产生收入的情况。如果取3:1,那么在某个时期内,3美元的资本能产生1美元的产出。这是一种非常粗陋并且存在问题的分析手段,但是很多时候都是有用的。即使使用现代数据,我们也必须对它保持审慎。上面选定的取值范围非常保守。

^⑪ 参见 Peter Mancall and Thomas Weiss, “Was Economic Growth Likely in Colonial British North America?” *JEH*, March 1999. 这篇文章挑战了这一观点。作者认为,殖民地居民和奴隶的增长速度要低得多,近乎于零。Mancall, Weiss 和 Joshua Rosenbloom 在区域的基础上进行了一项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经济的研究。在南方,出口的地位比其他殖民地都要重要,实际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是至少每年0.3%。(参见“Conjectural Estimat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wer South, 1720—1800,” in Timothy Guinnane, William Sundstrom, and Warren Whatley, eds. *History Matters: Economics Growth Technology, and Demographic Chan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8世纪人口增长的平均速度高于年均3%(参见表3.2)。

^⑫ Peter C. Mancall, Joshua L. Rosenbloom, and Thomas Weiss,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in the Lower South, 1720—180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9, no. 4, October 2002.

(参见表 3.3)。即使在南方,土地也是构成财富的最主要部分。特里·安德森(Terry Anderson)发现,17 世纪晚期,新英格兰的总财富以年均 1.6% 的速度稳健增长,以这一速度计算的话,财富可以在两代人之内翻一番。^⑬

表 3.3 1774 年的人均财富

	13 个殖民地	新英格兰	中部殖民地	南部
土地	£ 25.6	£ 26.1	£ 25.9	£ 25.1
牲畜	4.3	2.8	4.8	4.8
器材	1.6	1.7	1.7	1.5
存货	2.3	1.5	3.9	1.8
消费品	3.7	4.4	4	3.1
奴隶	9.1	0.2	1.6	18.4
总计	£ 46.5	£ 36.6	£ 41.9	£ 54.7

资料来源: Alice Hanson Jones, *Wealth of a Nation to 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table 4.2, p. 96.

若以弗吉尼亚和普利茅斯的“饥谨时代”来衡量,漫长的殖民地年代是经济取得成就的新纪元。那些从早期殖民地定居点中幸存下来的极少数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还有新到的移民——不管是奴隶还是自由人——加在一起,使人口达到了 250 万。

以上数字说明,不管他们在新大陆上从事什么样的事业,这些殖民地居民使用了欧洲的技术极快地将人均产出提高到了英格兰的水平。接着,增长速度降低到了当时技术条件和技术进步所允许的程度。这一模式既解释了殖民地时期的高产出水平,又解释了一旦最初的殖民形成之后增长速度就相对放缓的现象。这并不是一种不合理的增长模式。如果一大群现代美国人被迁往一个欠发达国家,我们能够想象到,那里会发生快速而且强劲的经济进步,因为美国人会使用他们自己的技术,而不是当地的技术。

这种增长模式解释了斯图亚特·布鲁切(Stuart Bruchey)在《殖民地商人》(*The Colonial Merchant*)一书中所作的描述。在登陆刚 30 年之后的 1663 年,波士顿的牧师约翰·希金森(John Higginson)就说:“我们现在生活的富裕和舒适程度超出了之前所有的期望。”^⑭当本·富兰克林(Ben Franklin)还是宾夕法尼亚州的议会职员的时候,他就发现,在离宾州获得殖民地特许权仅仅 60 年之后的 1740 年,“建立新殖民地要做的第一件苦差事,即把注意力放在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这件事,已经完全过去了,在任何地方和条件下,都有很多人生活得自在安逸”。^⑮

^⑬ Terry Anderson, “Wealth Estimates for the New England Colonies, 1650—1709,” *EEH*, April 1975. 平均来看,随着人口增长,对农业而言相对贫瘠的土地依旧能够产生资本收益。正如已经证明过的那样,在新英格兰南部地区土地是遗产财富增长的主要来源。Gloria Main and Jackson Turner Mai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Southern New England,” *JEH*, March 1988. 遗产财富的增长是相对较快的。Lorena Walsh, “Urban Amenities and Rural Self Sufficiency: Living Standards and Consumer Behavior in the Colonial Chesapeake, 1643—1777,” *JEH*, March 1983. 财产方面的证据显示,18 世纪中期,切萨皮克地区的农村家庭使用着跟当时城市家庭一样的家具和厨房用具,这表明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城市家庭差不多。高标准的商品消费明显出现在农村家庭之中。

^⑭ Stuart Bruchey, ed., *The Colonial Merchant: Sources and Readings* (1966), p. 1.

^⑮ *Ibid.*

2.2 生活标准

斯图亚特·布鲁切在《美国经济增长的根源》(*The Roots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一书中考察了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所能获得的史料,他的结论在当时略显激进:“可能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像殖民地时期的美国那样广泛地将生活资料分配给人民群众。”^{①⑥}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他描述的并不是国内资源的平均分配,而是充足的分配。

这些资源是如何配置的呢?技术方面的证据表明,美国人并不落后于欧洲。殖民地的居民是带着当时英格兰的技术和商业制度来到新大陆的,他们利用可得资源进行的生产活动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佳实践”。一旦欧洲的农业生产方法适应了美洲的天气和土壤,殖民地农业生产能力就大幅提高起来。但是殖民地居民还生产了农业、林业、矿业和渔业产品。他们制造铁和铁器,修造船只,烧砖,在农场纺织大量的毛料和麻布,还制造武器。他们创建了磨坊和屠宰场,把原木加工成木料,出海捕鱼,大量出口海鲜、腌肉和皮革。他们还有制革厂和盐场,制造鞋子,印刷报纸,生产他们自己的玻璃制品和锡器。由于美国人带着自己的亲属、财产法,保持着他们的教育水平和道德条规,因此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迅速而且经济地复制了自己的文明。^{①⑦}

魁北克蒙卡尔姆的一位叫做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Hector Saint-John de Crevecoeur)的法国官员,1780年之前一直在纽约的农场生活。他在1782年结集发表了12篇写给欧洲人的文章,名为《一位美国农民的信札》(*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其中写道:

苏格兰某地仅能勉强为生的一百户人家,在来到这里的六年之中,每年都出口10 000蒲式耳的小麦。100蒲式耳只是一个勤劳家庭的普通出口量。如果他们能在肥沃的土地上耕作……那么(雇工就可以)从雇主那得到极好的待遇,并且他们的工钱是欧洲的四到五倍。^{①⑧}

现代的研究支持德克雷夫科尔的说法。

埃德温·珀金斯(Edwin Perkins)有力地论证了:殖民地美国不仅富裕,而且那里的人民享受着高质量的生活。^{①⑨}在那里,大量肥沃的土地意味着食物的充足,木材(主要用于供热)物美价廉,而且人口密度很低。正如我们已经论证过的,殖民地美国的出生率高,而不论是婴儿还是成人的死亡率都较低,这便是由此健康的环境所导致的。另外,我们在第6章将会谈到,身高是一项非常好的衡量社会营养状况的指标。肯尼思·索科洛夫(Kenneth Sokoloff)和佐治亚·威雷托(Georgia Villator)利用法印战争和独立战争时的征兵名录,估算出殖民地新兵的平均身高是5尺8寸,很接近现在的平均身高,比当时英国皇家海军征集新兵的平均身高超了整整2寸。^{②⑩}

^{①⑥} Stuart Bruchey, *The Roots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65), p. 65.

^{①⑦} Carl Bridenbaugh, *Cities in The Wilderness: The First Century of Urban Life in America, 1625—1742* (1971); and *Cities in Revolt: Urban Life in America 1743—1776* (1971). 这两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这一问题的证据。

^{①⑧} Henry Steele Commager, ed., *America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64), pp. 34—35.

^{①⑨} Edwin Perkins, *The Economy of Colonial America* (1988), chap. 8.

^{②⑩} Kenneth Sokoloff and Georgia Villator, “The Early Achievement of Modern Stature in America,” *Social Science History*, Fall 1982. 其他的证据可以参见 Farley Grubb, “Lilliputians and Brobdingnagians, Stature in British Colonial America: Evidence from Servants, Convicts, and Apprentices,” *REH*, 1999.

殖民地末期美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并不均衡。今天,收入分配不均衡的情况也普遍存在于大多数社会中,甚至在中国也是如此。由于偏好和社会选择的不同,加之资源、技术、个人能力以及对它们的需求都不同,因此几乎任何经济体都会向参与者提供有差异的回报。当不均衡的收入和不同的消费习惯所形成的剩余,即财富,被传承下去的时候,财富显然也会变得不均衡。詹姆斯·汉瑞塔(James Henretta)发现,1771年,波士顿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社会财富的57%。^② 爱丽丝·汉森·琼斯发现,1774年,新英格兰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社会财富的46.8%,在中部殖民地,这一比例是35.1%,南部殖民地是46.9%。^③ 在一项对现代美国财富持有人的研究中,罗伯特·兰普曼(Robert Lampman)发现,1953年最顶级的10.8%的富翁掌控着全部需纳税财产的46.4%。^④ 这种不均衡是否有助于经济发展,或者阻碍经济发展,又或者这正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是使经济学家困扰的难题。^⑤ 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再次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在这里可能有必要再花一些篇幅来更加完整地展示殖民地的不均衡情况。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在早期的弗吉尼亚,对社会产品进行平均分配的努力并不令人满意。当约翰·史密斯上校说殖民地的居民必须工作才能有饭吃的时候,他所表述的其实是当时的社会需要。在普利茅斯殖民地,一开始人们试图平均分配工作和报酬,但这导致了农业产出的不足。地方长官布拉德福德在他的笔记中记录下了这些实践带来的改变及结果。那是1623年:

为了摆脱贫困,人们开始考虑如何才能尽可能多地种植粮食,并且获得更好的收成。最后,经过很多争论,长官……作出了让步,允许人们为自己种植庄稼,在这方面他们可以自己作主,在其他事务上则要因循旧章。于是,根据家庭成员的数量,每个家庭都分到了一块土地。这些土地只能供他们现在的家庭成员使用(但不能作为财产继承),在一些家庭里,土地使用者包括了儿童和少年。这么做的收效甚为显著。因为它提高了每个人的积极性,所以人们都尽可能多地种植庄稼——比长官或者其他督促他们进行种植的时候还要多,这让长官省去了不少麻烦,而且结果非常令人满意。如今妇女也愿意下地去干活,还带着她们的孩子一起。而从前她们可能会宣称自己虚弱无力,如果强迫她们干活,会被称为是暴政和压迫。

这种情况持续了数年,对正直而清醒的人来说,这完全可以表明柏拉图及其他古人的想法是多么不切实际,而那种想法在后世还不断有人赞同:拿走人们的私产,让人们生活在一个团体中,财产全部公有会让人们幸福繁盛。好像他们比上帝还明

^② James Henrett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Colonial Bosto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January 1965.

^③ Alice Hanson Jones, *Wealth of a Nation to Be* (1980), table, 6.2, p. 164.

^④ Robert Lampman, *The Share of Top Wealth-Holders in National Wealth 1922—1956*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62), p. 109.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93年最高的1/5的人掌握了社会净财产的44.1%,而最穷的1/5的人只掌握了7.2%。

^⑤ Bruce Daniels 发现,在殖民地财富分配中处于上层的社会阶层中,财富的集中(不均衡)情况在1770—1776年间有所加速。随着经济扩张,不均衡扩大了。"Long Range Trends of Wealth Distribu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New England," *EEH*, Winter 1973—1974.

智一样！对这个团体来说，这种做法事实上只带来了混乱和不满。……那些最有力、最适合做工的年轻男子抱怨自己要花费时间精力为其他人的妻子儿女干活，自己却得不到报酬。那些强壮或有才能的人获得的衣食不比那些身体虚弱、只能完成别人 1/4 工作量的人多。人们认为这很不公平。……不准人们反对此事只能说明人们的腐败堕落，却无助于事情本身。我看到人们都这样堕落，但上帝的智慧却找到了另一条更加适合他们的道路。^⑤

布拉德福德可能注意到上帝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时的诅咒：“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从普利茅斯殖民地至今，除了在少数乌托邦实验中，如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和后来的摩门教联合制度（Mormon United Orders），柏拉图等古人的美梦从来未能实现，因为按照个人的贡献进行分配的方式对经济成长更为适合。从过去直到现在，一个永恒的问题是：“在收入分配中，公平处于什么地位？”^⑥公平是平均吗？或者是按劳分配？按所承担的风险分配？或者其他？对当时的殖民地居民来说，更加迫切的问题是：“我们要用什么作为私人之间交易的货币？”

3. 殖民地美国是否存在货币短缺

货币数量理论认为，为了维持物价稳定，成长中的经济体需要相应增加货币供给。^⑦货币数量理论的基本公式是 $MV = PQ$ ，它的含义是：如果经济增长带来了产出（ Q ）的增加，并且货币供给的速度（ V ）是固定的，那么为了维持物价（ P ）稳定，货币供给（ M ）必须与 Q 同步提高。这个公式还说明，如果 V 保持不变，那么 M 的增加要么带来 Q 的增加（经济增长），要么导致 P 的上涨（通货膨胀）。由于投资资金在传统上受到限制，因此殖民地对货币的需求一直很大，这又导致了相对较高的利率。殖民地居民和历代历史学家们都相信，殖民地缺少金银币（specie），即铸成硬币的金银。包括本·富兰克林在内的一些人认为，是英格兰人在殖民地货币问题上的无能推动了人们对独立的渴望。在殖民地货币问题中还有两个重要的事实：

（1）殖民地居民学会了使用官方印制的纸币来代替金银币。

（2）1781 年，革命国会（Revolutionary Congress）授权成立了一家股份制的发钞银行，这是美国商业银行的发轫。

这两件事注定在美国经济史上造成巨大影响。

3.1 货币

一般而言，有以下四种功能的物品都可以被称为货币：

（1）被用做交换媒介。

^⑤ William Bradford, *of Plymouth Plantation*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62), pp. 90—91.

^⑥ 近些年来，美国哲学家再次认真地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Rawls 可能不同意清教徒移民的解决方法，而 Nozick 可能赞成它。

^⑦ 关于货币数量论在殖民地经济中的适用性，参见 Lawrence Officer, “The Quantity Theory in New England, 1703—1749: New Data to Analyze an Old Ques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42, no. 1, January 2005.

- (2) 有数量单位。
- (3) 可作为价值的储存物。
- (4) 作为一种延迟付款的标准被人们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除了硬币之外,有很多物品被人们接受成为货币:动物皮毛、烟草、贝壳、贝壳串珠、穿孔的石头,以及由君主、统治者、国家和其他个人印制的纸片。以上这些和其他很多物品都充当过交换媒介。只要人们接受它们就行,甚至是非自愿接受。军队经常在占领区内用发行的纸币来榨取当地人民生产的产品,不管这些纸币是否被接受。事实上,所有的法定货币(legal tender)都是由法律规定的,就是说,只要法律规定了什么是法定货币,那它就必须接受为公私债务的付款手段。它是强制流通的,拒绝使用其进行支付是犯罪行为——甚至在现代美国也是如此。

3.2 金银币

从历史上看,某些货币得到了人们的偏爱。在这些货币中人们最喜欢的是用金银币支付,即使用一定数量的贵金属进行的支付方式。

在殖民地时期,英格兰实行的是金银复本位制(bimetallic,以金银两种贵金属作为本位货币)的货币标准(monetary standard)。造币厂、国库以及(1649年以后的)英格兰银行以固定的价格收购和卖出黄金和白银。由艾萨克·牛顿爵士制定的“正确的”英格兰标准价格是,一盎司黄金的收购价为3英镑17先令9.5便士。一种以标准重量和纯度铸造的叫做“沙弗林”(sovereign)的金币值1英镑。而1英镑等于20银先令。有一些硬币的币值等于若干先令,或者少于1先令,比如6便士、1便士、1/4便士和半便士。一种叫做“几尼”(Guinea)的金币值21先令,因为它用几内亚黄金铸造的,比普通黄金纯度高。最早的几内亚黄金是在查尔斯二世的时候通过奴隶贸易由西非输入的。^②

英格兰法律禁止本国硬币的出口,甚至是运往殖民地,但是,对外国硬币和金银条的进出口却没有限制,因为它们都可以按照重量和纯度来估值。因此,以金银币进行支付就意味着以某种形式的黄金或者白银支付。这两种金属之间的兑换比例并不总是固定的,这也是复本位制度的一个问题:如果世界范围内黄金供给的增长速度快于白银供给的增长速度,那么一定数量的白银就能换取较多的黄金,以黄金标定的银价就会上升。反之亦然。

3.3 其他的支付方式

还有其他的支付方式,其中最主要的是汇票(一种要求付款人在一定时期内支付的票据),这在殖民地时代很流行。例如,假定A是一名卡罗来纳的种植园主,B是一名英格兰商人,A向B运送大米。A写了一张账单要求B支付,假设是100英镑。(这与今天你签支票或者使用借记卡完全一样。你写账单给你的银行,要求其动用你存款的一部分来付款。)使用汇票表示售出了商品,标准做法是在汇票上写明付款日期,如三个月、四个月甚至六个月。汇票上的时间便是汇票的到期日,一张“三个月期的汇票”将在签署它的三个月之后到

^② 今天,到英国旅行的美国游客会很快发现,以几尼(这种货币早已退出流通了)标价的商品比用英镑标价的要贵5%。

期。下一步是由 B(或者更可能是 B 在查尔斯敦的代理人 C)确认汇票,表示 B 将会进行支付。B(或者 C)在汇票上签字,只要 B 是一个有良好信用的人,那汇票现在就变成了货币。

接下来会发生下面几种情况。A 一直持有汇票,在到期日来临的时候,将它交给 B 或者 B 的代理人 C 来要求兑现。A 还可以在汇票被 B 确认之后把它卖给别人,比如 D。D 可以持有汇票,直到到期日时向 B 收款。对于三个月期的汇票,A 一般会以一个折扣价卖给 D。折扣的金额可以是双方商定的任何数字,但是通常这个价格是由当时短期利率决定的。如果当时存款利率是 8%,那么 100 英镑的三个月期汇票的利息是 2 英镑:8%乘以 0.25(三个月是一年的 1/4)再乘以 100。因此,D 现在可以支付 98 英镑购买汇票,并在到期日获得 100 英镑。

查尔斯敦的一位进口商可能需要付款给在英格兰的某个人。那么不需要把黄金或者白银运往英格兰,他可以从 D 那里买来汇票(或者从 A 那里购买,取决于当时谁持有汇票),并把它交给在英格兰的供货商,作为对方运往查尔斯敦的货物的货款。供货商拿到汇票之后,可以在到期日的时候把它交给 B 或者他的银行来兑现。他也可以把汇票以折扣价卖给在英格兰的其他人来换取现金,后者将在到期日的时候把汇票交给 B。

不同时期这张汇票的拥有者在将它交易给下一个人的时候都必须进行背书(在汇票背面签字以确认)。根据英格兰法律,如果在到期日 B 不履行兑现承诺的话,那么汇票上的所有签名人都对汇票的兑付负有责任。大体而言,汇票是一种很好的“商人货币”,可以用于任何方向中的金融交易。

汇票的重要性在于,不需要进行任何金银币的运输,国际交易也可以进行。这就是大多数交易完成的方式——通过汇票来进行支付。这种票据也可以用于纯粹的国内贸易。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汇票的各种衍生形式。需要牢记的一点是,汇票符合我们对货币的定义,因此,它们在流通(而不是拖欠的时候)的时候,它们就是货币。任何时候,汇票的数量都不取决于银行或者铸币厂,而是取决于商人的信用。^②

在殖民地时代,英格兰银行(成立于 1694 年)并未发行过自己的纸币。据我们所知,其他英格兰的银行也没有发行小额纸币。英格兰银行最早发行的纸币是 1791 年出现的“纸英镑”,当时英格兰银行被迫停止了金银币的支付。据我们所知,殖民地发行的纸币是英帝国史上最早的纸币。但是之前就存在一些接近于货币的物品。英格兰和殖民地政府都发行了一些印有图案的纸质的债务凭证,作为到期日收入(和支付)的保证。它们是享有利息的,如果它们能被交换和被持有者用来进行支付,显然也能被当做货币。不过它们并未被政府强制在交易中使用(不是法定货币)。而且它们的面值通常太大,不适合普通人当做货币使用。最后,赊账这种类似今天街角杂货店的做法,可能被任何买家和卖家承认。因此,当我们提到殖民地的“货币供给”的时候,并不一定指的是金银币。但还是让我们先明确地讨论一下殖民地的金银币问题。

^② 在殖民地时期,对这种金融行为的理解可以通过以下 1647 年颁布的马萨诸塞法令来展示:“任何债务,或者以汇票和其他方式签署的债务,当它被分配之后,对受让人和出让人都是一样的债务和财产。一旦经过分配,和最初的债权人一样,汇票上的受让人有权为获得票面上的债务而进行起诉。在汇票或者其他票据上进行背书的出让人必须支付票面金额。”William Whitmore, ed., *The Colonial Laws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Boston City Printers, 1889), p. 125.

3.4 殖民地的金银币问题

讨论金银币形式的货币时面临的一个难题是要知道流通的金银币有多少。铸造出来的金银币的数量并不一定是可用的金银币的数量。黄金和白银可以用于非货币的用途。金银币被熔化后可以用于制造珠宝、剑柄和其他物品。另外,金银币很容易隐藏(比如,令收税员无法发现)或者带出国外,人们在被问及自己有多少钱、是什么形式的钱、钱放在哪里这种问题时,都有一些不诚实作答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在谈论殖民地货币的特点的时候,可能除了老生常谈的“紧缺”之外,我们就发现不了更多特点了。在这种殖民地居民的语境中的货币,指的是金银币,特别是英格兰的金银币。

殖民地货币短缺的性质可以由以下事实展示。1724年春天,在费城小住之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回到了他的家乡波士顿。他来到了他兄弟的印刷所,那里的印刷工向他询问宾夕法尼亚的情况,他写道:

……问我在哪里使用什么样的货币。我拿出了一把银币,让他们传看。这是他们很少见到的,因为波士顿用的是纸币。……我给了他们一块价值八元的银币去喝酒,然后离开了。^⑨

经济史学家通常不看重殖民地人民对货币短缺的抱怨,这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殖民地时期的利率一直保持适中,所有殖民地都有高利贷法规定利率上限(17世纪在马萨诸塞是8%,后来在宾夕法尼亚是5%)。如果货币短缺制约了贸易,那么必然会产生大量违反高利贷法的案例。^⑩但我们并没有找到这样的案例。人们总能找到办法来绕开法律或者违反法律,就像他们违反航海法向殖民地走私的时候所做的那样。如果他们那么做了,那就应该留下记录。第二,根据货币数量论,如果存在货币短缺,即使实际收入水平保持不变,也会产生物价下降的结果。然而,殖民地美国的物价趋势是上升的。长期的价格上涨和名义利率的下降说明,真实利率不可能是制约借贷者的严重问题。最后,以上升的价格表示的殖民地经济的实际增长也不是货币短缺的证据。我们已经看到,不需要将货币定义为金银币,还有很多方法来控制实际资源。

3.5 收支余额和金银币

殖民地居民认为他们遭受货币短缺,这仅仅是他们的想象吗?未必如此。想要获得长期的金银币供给,殖民地居民向世界出口的物品和服务就必须比进口的多。然而,至少在殖民地末期,他们看起来似乎略有赤字。^⑪没有理由假设在之前的任何时候殖民地

^⑨ Benjamin Franklin, *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edited by Charles Eliot, in *The Harvard Classics*, vol. 1 (New York: P. F. Collier and Son, 1937), p. 30.

^⑩ 参见 Hugh Rockoff, "Prodigals and Projector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Usury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190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9742, May 2003。这份资料显示,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后,高利贷法很快就放宽了。

^⑪ 在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南方殖民地有所盈余,并应该是金银币的净获得者,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缺少国内交通线,南方与北方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主要通过海运来进行,这部分贸易额等于海外贸易的1/3。北方的船主从这种贸易中赚取的收入可能调走了南方的很多金银币。James Shepherd and Samuel Williamson, "The Coastal Trade of the British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1768—1772," *JEH*, December 1972.

都是有盈余的。在没有金银矿的情况下,金银币的积累只能通过贸易、海上劫掠或者积累债权而进行。如果银行愿意根据你的信用借钱给你,那么你的口袋也可以放满金银币,而英国银行就这么做了——给殖民地贷款。

同时,殖民地可以通过与南欧和加勒比地区的贸易来获得金银币。这使得西班牙、法国、葡萄牙和荷兰的金银币在殖民地大量流通。(1728年西班牙铸造的一元硬币在殖民地被广为接受和使用,以至于1792年人们开始采用美元时,它成为了范本。)年复一年的金银币供给可能都是从这些渠道获得的。我们将会看到,巨大的双边贸易赤字都来自与英格兰之间的贸易,这是因为服务的出售和美国的债权长期以来都集聚在英格兰人手中。英国人为殖民地提供贷款,并且为殖民地支付了大量的管理和军事费用。正如拉里·尼尔(Larry Neal)指出的那样,这些英国货币中的大部分都进入了美国人手中。^③ 沃尔顿和谢泼德发现,在18世纪70年代,美国净债务的年度增长率最高达到了约40 000英镑,但这个净值无疑较低,因为还有一小部分赤字是净输出的金银币——这正是殖民地居民抱怨的原因。根据沃尔顿和谢泼德的研究,1776年英国商人声称美国人欠他们250万英镑未偿债务。^④ 这个数字平摊到当时殖民地全部人口头上,相当于每人欠1英镑,这显然过于夸张。

3.6 货币贬值

殖民地尝试了几种货币手段来吸引金银币的流入,其中最易于想到的办法是货币贬值(devaluation):通过法律来提升(或者试图提升)外国货币在本地的价值。17世纪晚期,纽约、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都试着提供补贴来吸收西班牙金银币(补贴通常是0.3到0.5个百分点)。1704年,英国颁布了一项公告来设定外国金银币的官方汇率(比通常汇率低)。这些被称做“安妮女王的货币”的汇率只能使已经混乱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尽管政府这样做,但殖民地系统的弹性还是能使贸易繁盛,外国金银币通过贸易进入殖民地,它们是被殖民地的实实在在的商品和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吸引来的。1652—1684年存在的马萨诸塞铸币厂铸造银币,有1先令、半先令和1/4先令的。这些银币虽然跟英格兰的银币名字一样,但据说为了防止它们被运往英格兰,所以比英格兰的银币轻了23%。然而它们还是被按照实际重量运往了英格兰。

3.7 实物货币

前面已经指出,除了金银币之外还有很多物品被当做货币使用。金银币短缺对殖民地人民的创造力是一个考验。

3.7.1 农村货币

在殖民地的农村,玉米、小麦、毛皮、牲畜或者几乎其他任何东西都曾代替金银币成为货币。由于发现用这些中间物进行交易可能会产生争议,1645年以后的马萨诸塞法律

^③ Larry Neal, "Interpreting Power and Profit in Economic History: A Case Study of the Seven Years' War," *JEH*, March 1970.

^④ Walton and Shepherd(1979), p. 109.

中包含了下面一条精彩的条例：

所有以金钱、玉米、牛或者鱼为目标的合同和约定都应该按照契约以该种物品来清付,如果未能根据契约以该种物品进行支付,可用上述物品中的一种进行支付;所有正常的损失……应由双方协商解决。^⑤

用现代的说法,这类合同是与指数化的(indexed)——也就是说,如果充当实物货币的商品和牲畜的相对价值发生了变化,那么那些按照过去比例签订的合同仍要以原先的价值来执行。

在弗吉尼亚,烟草理所当然地很快成为货币。但是,正如思迪丹斯基(Studenski)和克鲁斯(Krooss)写的那样,在烟草的种植地,烟草很难成为长久的货币:

因为任何只要稍微有点野心的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后院里种出钱来,所以烟草的种植会快速增加,不几年,以白银标定的烟草价格就下跌了80%。^⑥

不管监控多么严格,也没有任何控制手段能抑制烟草种植。在弗吉尼亚和边疆地区,烟草充当了很长时间的货币。思迪丹斯基和克鲁斯还援引了早期用牲畜来缴纳哈佛大学的学费和建设基金的例子:“a goat 30s plantations of Watertown rate which died.”^⑦因此商品作为货币是有缺陷的,而且可能使金银币“紧缺”的情况更加严重,因为根据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劣币驱逐良币法则”),如果你可以用一只生病的山羊或者一堆你自家种植的烟草叶来付账,那你就把自己的金银币藏起来。

3.7.2 贝壳串

在殖民地的记录中有一个非常好的印证格雷欣法则的例子,那就是贝壳串货币。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人与印第安人交易的时候以贝壳串——用绳子把贝壳串成一串——来作为交易的中间物,接受它也用它付款。^⑧印第安人想要得到更多的欧洲商品,所以在交易中使用了较短的贝壳串和未串的贝壳,这带来了通货“贬值”,使得高质量的贝壳串的价值也随之降低,于是后者被逐出了流通领域。为了对付这种劣币,精明的荷兰总督威尔海姆·凯夫特(Wilhelm Kieft)将欧洲商品的价格提高了50%。这样,在荷兰贸易站,高质量的贝壳串的价值不再被低估,它又回到了流通领域。^⑨

马萨诸塞的清教徒第一次接触贝壳串是在1623年,是由一个来自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人德·拉塞尔斯(De Rasieres)带来的。当发现真的可以用贝壳串从印第安人那里换取商品的时候,清教徒们就开始去直接寻找合适的贝壳并且自己把它们串成串。他们很快发现自己搞错了事情的顺序,贝壳串最终是用来支付的,而用自己的商品来交易获得贝壳串的方式比自己“制造”还要便宜。于是,比较优势产生了作用,清教徒们用商品

^⑤ Whitmore(1889), p. 183.

^⑥ Paul Studenski and Herman Krooss,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963), p. 13.

^⑦ 这段话可以作如下翻译:“按照沃特敦现行的殖民地和英格兰货币的换算比例,一只值30殖民地先令的山羊被捐赠给学院。这只羊死了。”

^⑧ 印第安人之间也使用贝壳串进行交易。

^⑨ 关于这件事的更全面的讨论,见 John Romeyn Broadhead, *History of New York*, vol. 1 (New York: Harper & , 1859), p. 304.

换取贝壳串,再用贝壳串换取皮毛,然后用皮毛从英格兰换来更多的欧洲商品。印第安女性不停地串着贝壳串,贝壳串在任何可被人们接受的时候和地方行使着货币的职责。

3.8 纸币、取款凭证和银行

殖民地人们真正的重大发现是纸币。因为中国人早在数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使用纸币,这也许可以算做重复发明的又一个例子。不管怎样,1690年,马萨诸塞政府发行了7000张一年期的票据,利率是5%,按照票面价值支付,并可以用来支付税金。早在1676年,政府就根据财政收入的预期向商人借款,这些借款票据在商人之间被当做汇票使用——和货币一样。1690年,马萨诸塞政府需要向从魁北克战败回来的军人支付薪金,但当时没有金银币可以用来支付这些士兵。士兵接受了小面值的取款凭证,这种取款凭证和货币一样流通,于是不兑现纸币(fiat money)(没有金银币储备作为后盾的纸币)的闹剧在美国开场了。能产生利息的现金——这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其他殖民地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很快就纷纷效仿,南卡罗来纳在1703年,康涅狄格、纽约、新罕布什尔和新泽西在1709年,罗德岛在1710年,北卡罗来纳在1712年,宾夕法尼亚在1723年都发行了自己的取款凭证。很显然,私人也通过非正当的手段加入了自制取款凭证的行列,因为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和平主义者居然也大开杀戒,在1767年通过了对伪造罪处以死刑的立法,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对伪造罪最严厉的惩处。

3.9 殖民地的货币和通货膨胀

在殖民地,通货膨胀意味着物价普遍上升,同时殖民地货币与金银币之间汇率降低。1751年,英国议会禁止赋予新英格兰纸币法定货币地位,1764年,这一禁令推广到了全部殖民地。但是纸币本身并未被禁止。毫无疑问,这一额外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物价的上涨。这首先使纸币相对于金银币贬值,贬值的幅度在各个殖民地的情况不同。新英格兰的纸币贬值幅度最大。在罗德岛,纸币对金银币贬值最惨的时候达到了26:1,而在马萨诸塞纸币对金银币跌到了7.5:1。但是,中部殖民地的情况好得多,那里对货币的管理比较好而且设立了偿债基金。人们甚至利用货币发行来对抗经济周期,“稳定商业扩张的速度”。^⑩

在图3.1中,我们能看到宾夕法尼亚纸币与纯银英镑的汇率的变化情况。虽然在殖民地初期英镑升值的速度很快,但是在18世纪40年代之后,汇率就稳定了下来。在开始发行纸币的55年之后,纸币贬值不再失控,宾夕法尼亚流通的纸币相对英镑——金银币——仅仅贬值了1/3多一点。^⑪在1932年的美国,你可以用20.67美元买到1盎司黄金,而今天,你要付的钱差不多是那个价格的25倍。与如今的美国货币相比,殖民地时期的宾夕法尼亚货币可算是财政保守主义和政府信用发挥到极致的结果。进一步看,殖民地的物价变化大势确实是上涨的,但是按照现代的标准,严谨的学者很难去过于强调这样微小的变动。麦克卡斯克(McCusker)提供了费城商品价格的变化序列(图3.2),在

^⑩ Richard Lester, "Currency Issues to Overcome Depressions in Pennsylvania, 1723 and 1729," *JPE*, June 1963.

^⑪ Farley Grubb, "The Circulating Medium of Exchange in Colonial Pennsylvania, 1729—1775: New Estimates of Monetary Composition, Perform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EEH*, October 2004. 这篇文章认为,在独立战争开始之前的1772—1775年间,金银币的稀缺程度相对下降。

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中,物价上涨并未翻番。^② 某些特定商品的价格确实上涨得更快一些,比如宾夕法尼亚的面包(图 3.3)。总体而言,这种混合经验似乎深深吸引了英国人(他们很快就大量使用纸币)。本·富兰克林在《对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的小调查》(*A Modest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a Paper Currency*)中对殖民地货币经验的总结,比后来两个世纪中任何央行的政策综述都清晰:

为了维持国家贸易的自由和流通,我们需要适当数量的货币。超过这一数量,对贸易没有好处,而少于这个数量,如果太少的话,则会对贸易造成极大的损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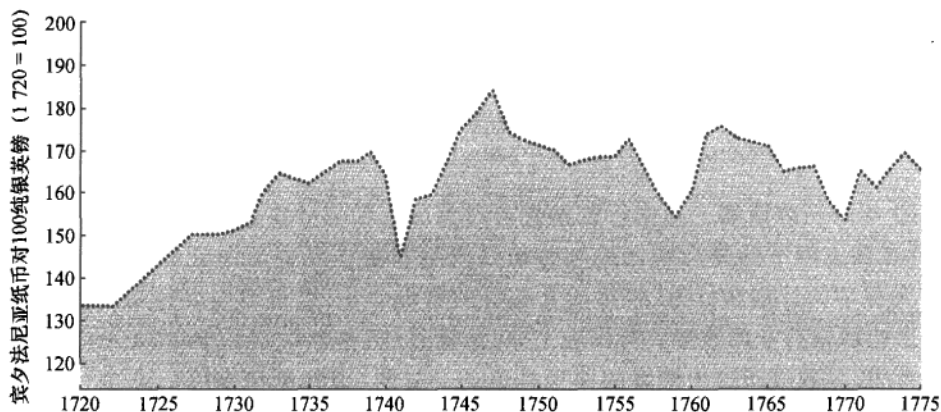


图 3.1 1720 年到 1775 年在伦敦的宾夕法尼亚纸币对英镑的汇率年度变动情况

英国银币对宾夕法尼亚纸币汇率的总体趋势是不规则上升的。总体来看,购买 1 英国纯银英镑所需的宾夕法尼亚纸币是越来越多的,但是在某些时期,银币的价格是下跌的。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Eg 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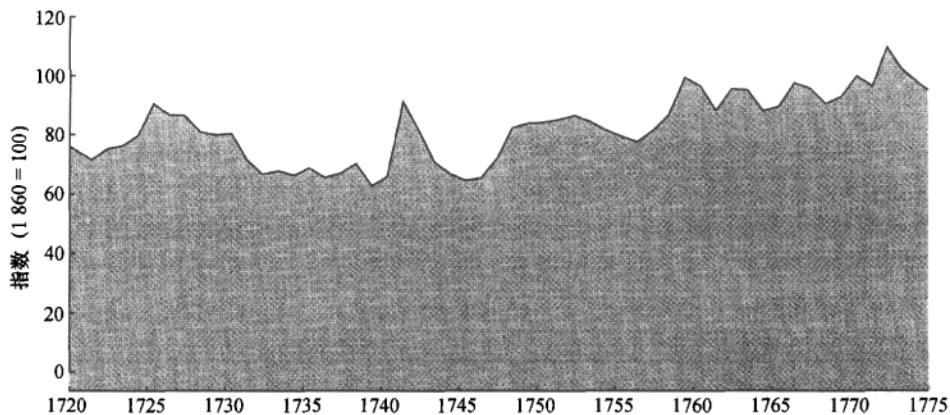


图 3.2 1720—1775 年间的商品价格

以批发价格作为指标能更清晰地展示中长期的通货膨胀情况,在独立战争前夕价格所有下降。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Eg 247.

^② 纸币发行所造成的物价上涨的程度似乎取决于货币背后的财力支持程度。偿债基金使人们更加愿意持有货币而不是持有模糊的支付承诺。Bruce Smith, "Some Colonial Evidence on Two Theories of Money: Maryland and the Carolinas," *JPE*, December 1985. 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决定货币价值中的作用,参见 Charles Calomiris, "Institutional Failure, Monetary Scarcity, and the Depreci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8, no. 1, March 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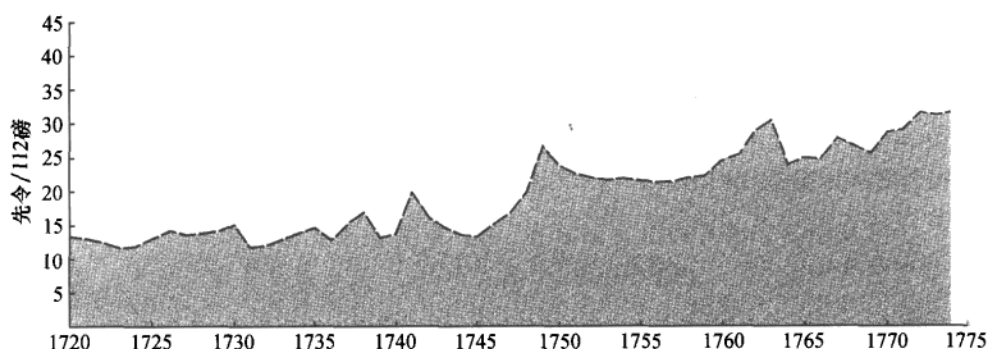


图 3.3 1720—1775 年间宾夕法尼亚的面包价格

总体而言,宾夕法尼亚的面包价格是上涨的,但很和缓,反映出温和的中长期通货膨胀。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Eg 255.

1740 年的马萨诸塞土地银行曾经警告过英国人和部分美国人,一年以后,英国议会通过了“在国王陛下的美洲殖民地和种植园限制和防止几种无保证的计划和行为的法案”。“无保证的计划和行为”包括成立私有的股份公司,以土地为质押来发行纸币——这是未来边疆银行业的雏形。英国在 1720 年就通过《泡沫法案》(Bubble Act)禁止了这种投机行为,导致颁布这项法案的原因是轰动一时的“南海泡沫事件”,一个公司对金融进行操控,带来了一时的繁荣和之后的金融恐慌。从那时起人们决定,政府必须防止人民损害其自身的利益。1741 年,泡沫法案也推广到了殖民地。然而,即使不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出现,私有银行业在每个殖民地都存在。1733 年,一群波士顿商人发行了可兑换为白银的票据(很自然地,这些票据就像它们所代表的白银一样被人们储藏起来)。他们与土地银行对抗,并且成功地使英国议会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股份制银行一直到 1781 年才出现:大陆会议授权成立了北美银行。^③

3.10 小结

在后面的一章中,我们将检视美国财政史的另外一个时期(1789—1863),它被称为“金融混乱时代”。但是,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没有证据表明那种金融的混乱对经济成长和发展带来了不利。对殖民地时期我们也必须这么说。纸币作为难以控制的金银币和粗陋的乡村货币——烟草和山羊——的替代品,被广泛应用,就像它在今天被使用的情况一样。纸币的应用取决于它的发行速度与它所购买的产品增长之间的相对关系。我们不能说发行纸币损害了经济成长。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在某些情况下,纸币的功能发挥良好。事实上,他还意识到货币量的不足可能是一个更糟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现代全世界的政治领袖都要同意他的看法。

和今天一样,殖民地时期的通货膨胀缓解了债务人的问题,对债权人不利。富人喜

^③ 在《美国商业银行的起源:1750—1800》(Origins of Commercial Banking in America, 1750—1800)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一书中,罗伯特·怀特(Robert E. Wright)指出,在法印战争之后曾有两次建立商业银行的努力,但都未成功。一家早期的南卡罗来纳银行被英国查禁,而由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等人建立的一家费城银行则受到公论的抵制。

欢财政保守主义,而不那么富有的人则希望在货币发行方面推行自由主义——这也和今天的情况一样。当独立战争到来的时候,大陆会议发行的纸币过多,导致了纸币对金银币的极度贬值,但是通过土地出售和经济成长,“大陆币”还是得到了赎回和吸收。纸币这项殖民地货币天才们的发明必然成为殖民地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之一。殖民地的货币发展带来的“通货膨胀”后果曾经使过去的研究者感到震惊,今天,我们不必再对这种看法太过当真。从1720年到1775年,平均来看,年度总物价增长速度不过是1%多一点,这还不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速度的1/10。

推荐阅读

文章

Anderson, Terry L. "Wealth Estimates for the New England Colonies 1650—1709."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2, no. 2, April 1975.

Burstein, M. L. "Colonial and Contemporary Monetary Theory."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2nd series, vol. 3, no. 3, Spring 1966.

Cole, Arthur H. "Trends in Eigh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vol. 10, no. 3 April 1958.

Daniels, Bruce D. "Long Range Trends in Wealth Distribu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New England."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no. 2, Winter 1973—1974.

Gilbert, Geoffrey. "The Role of Breadstuffs in American Trade, 1770—179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4, no. 4, October 1977.

Greene, Jack P., and Richard M. Jellison. "The Currency Act of 1764 in Imperial-Colonial Relations, 1764—1776."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2nd series, vol. 18, no. 4, October 1961.

Grubb, Farley, "Lilliputians and Brobdingnagians, Stature in British Colonial America: Evidence from Servants, Convicts, and Apprentices."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9, 1999.

———. "The Circulating Medium of Exchange in Colonial Pennsylvania 1729—1775: New Estimates of Monetary Composition, Perform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4, October 2004.

Henretta, Jam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Colonial Bosto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 22, no. 1, January 1965.

Higgs, Robert, and Louis Stettler. "Colonial New England Demography: A Sampling Approach."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 27, no. 2, April 1970.

Jones, Alice Hanson. "Wealth Estimates for the American Middle Colon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17, no. 4, July 1970.

———. "Wealth Estimates for the New England Colonies About 177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2, no. 1, March 1972.

Land, Aubrey C. "The Tobacco Staple and the Planter's Problems: Technology, Labor

and Crops."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43, no. 2, January 1969.

Lester, Richard. "Currency Issues to Overcome Depressions in Pennsylvania, 1723 and 1729."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63. Reprinted in Ralph Andreano, ed., *New Views on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Schenkman, 1965.

Main, Gloria L.,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Colonial Massachuset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3, no. 1, March 1983.

Main, Gloria L., and Jackson T. Mai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Southern New England, 1640—177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18, no. 1, March 1988.

Mancall, Peter C., and Thomas Weiss. "Was Economic Growth Likely in Colonial British North 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9, no. 1, March 1999.

Morgan, Edmund. "The First American Boom: Virginia 1618 to 1630."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 28, no. 2, April 1971.

Neal, Larry. "Interpreting Power and Profit in Economic History: A Case Study of the Seven Years' War."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7, no. 1, March 1977.

Nettels, Curtis P. "British Policy and Colonial Money Suppl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3, no. 2, October 1931.

Shepherd, James F. "Commodity Exports from the British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to Overseas Areas, 1768—1772: Magnitudes and Patterns of Trad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8, no. 1, Fall 1970.

Shepherd, James F., and Samuel Williamson. "The Coastal Trade of the British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1768—1772."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2, no. 4, December 1972.

Smith, Billy G. "Death and Life in a Colonial Immigrant City: A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Philadelphi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8, no. 4, December 1977.

Smith, Bruce D. "Some Colonial Evidence on Two Theories of Money: Maryland and the Carolina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3, no. 6, December 1985.

Sokoloff, Kenneth, and Georgia Villaflor. "The Early Achievement of Modern Stature in America."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 6, no. 4, Fall 1982.

Thomas, Robert Paul, and Terry Anderson. "White Population, Labor Force and Extensive Growth of the New England Econom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3, no. 3, September 1973.

Walsh, Lorena S., "Urban Amenities and Rural Self Sufficiency: Living Standards and Consumer Behavior in the Colonial Chesapeake, 1643—1777,"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3, no. 1, March 1983.

Walton, Gary M. "Sources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American Colonial Shipping, 1675—177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vol. 20, no. 1, April 1967.

———. "New Evidence on Colonial Commerc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7, no.

3, September 1968.

Weiss, Roger. "The Issue of Paper Money in the American Colonies, 1720—177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0, no. 4, December 1970.

———. "The Colonial Monetary Standards of Massachusett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vol. 27, no. 4, November 1974.

书籍

Bridenbaugh, Carl. *Cities in the Wilderness*.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38 (reprinted b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4).

———. *Cities in Revol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5 (reprinted b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Bruchey, Stuart. *The Roots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607—1861: An Essay in Social Causation*.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1965.

———. *The Colonial Merchant: Sources and Reading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66.

Fogel, Robert William, and Stanley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2 vol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Galenson, David. *White Servitude in Colonial America: An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Jones, Alice Hanson. *American Colonial Wealth: Documents and Methods*. New York: Arno Press, 1977.

———. *Wealth of a Nation to Be: The American Colonies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Lester, Richard A. *Monetary Experiments: Early American and Recent Scandinavi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9.

Nettels, Curtis C. *The Money Supply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 Before 172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34.

Perkins, Edwin J. *The Economy of Colonial America*.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Shepherd, James F., and Gary M. Walton. *Shipping, Maritime Trad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lonial North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Studenski, Paul, and Herman Krooss.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63.

Ver Steeg, Clarence. *The Formative Years, 1606—1763*. New York: Hill & Wang, 1964.

Walton, Gary M., and James F. Shepherd. *The Economic Rise of Early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第 4 章

赢得独立

1763 年之后,美国迈向独立的步伐开始加速。一旦我们理解了殖民地在 1763 年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就能清楚地预见到英国的政策注定要失败。至于是否是那项政策促使美国人去追寻独立,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1. 扩张和西部的土地

如果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从经济上论述美国大革命,那么最容易的切入点就是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问题。^①

1.1 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

内地的殖民地聚落是一个政治、法律问题,在必要的时候还是军事问题。乔治·华盛顿在宾夕法尼亚西部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到 18 世纪 40 年代的时候,弗吉尼亚人已经对阿巴拉契亚山脉对面的土地产生了兴趣。弗吉尼亚州议会议长托马斯·李(Thomas Lee)在 1747 年组建了一家俄亥俄公司,旨在与印第安人贸易和使弗吉尼亚获得那一地区的领土权。一年之后,这家公司获得了俄亥俄河谷 20 万英亩的皇家特许状,条件是在那片土地上定居。

法国人对此所作的应对是在各处险要地方布兵和修筑防御工事。为了获得计划中的弗吉尼亚定居点,1753 年 10 月迪恩韦迪(Dinwiddie)总督派 21 岁的乔治·华盛顿与法国人就对方在弗吉尼亚地区驻兵的问题进行谈判。华盛顿受到了法国人的热情款待并被送回了家。几个月之后,他带着一小股军队回来,开始修筑一座堡垒攻击法国人,但是为法国人所败,1754 年 7 月,堡垒、士兵和他自己全部被俘。这一次他和弗吉尼亚士兵又被遣返。他所修筑的堡垒被改名为杜奎森堡(Fort Duquesne),完全落入法国人控制中。一年之后,华盛顿再次回到了这个地区,这次他的职务是布拉道克将军(General Braddock)的副手,但再次遭遇了败绩。幸存者逃回了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的英国殖民者将战线收拢到了山上的堡垒一线,这些堡垒是由一位不讨人喜欢的军事工程师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设计的,其中有一些还是他亲自督导修筑的。1758 年,杜奎森堡被约翰·福布斯将军(General John Forbes)攻克,从此改名为匹兹堡。

蒙特利尔在 1760 年落入英国人控制,接着发生了庞蒂亚克(Pontiac)领导的印第安

^① 对殖民地美国的西部土地问题最好的研究仍然是 Thomas Abernathy, *Western Land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937)。当下讨论的主要资料来源就是这部著作。

人大起义。要到法印战争(French and Indian War)结束的1763年,才能安全地在这个地区进行大规模殖民活动。尽管,据华盛顿的报告,他在1754年还曾试图(但未成功)与德语区的殖民者在这个边远地区进行谈判,但是向西挺进的运动显然已经开始了。

在更南的地区,阻碍西进运动的难题是印第安人、阿巴拉契亚大山和对前途的一无所知。弗吉尼亚殖民者对土地的需要仍旧是推动西进的一个重要因素。1750年,托马斯·沃克(Thomas Walker)发现了坎伯兰岬口(Cumberland Gap),为穿越阿巴拉契亚山脉提供了一条通路。1752年,约翰·芬利(John Finley)来到了今天路易维尔(Louisville)的所在地,并乘坐独木舟在俄亥俄河上顺流而下。他对沿途经历的描述引起了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他曾经是布拉道克和华盛顿的车夫)的兴趣,后者在1769年进行了一次探险。1774年,哈罗兹堡(Harrodsburg)被建立起来。那时,匹兹堡已经是一座被持续经营的城市。一年以后,理查德·哈里森(Richard Harrison)和一家北卡罗来纳人的公司与切罗基族人就当时被他们称做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殖民地签订了一项协议(这个协议被弗吉尼亚政府宣布无效)。通往西部的道路被打开了,与此同时,美国大革命也开始了。这两个事件被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为西部的土地是战争的主要原因,而且在这种情况下《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才得以被战争中的殖民地居民接受。

尽管在1776年殖民地人的目光已经被西部阿利根尼高地(Alleghenies)上的土地所吸引,但是很少有欧洲人居住在大西洋台地以外。肯塔基、田纳西和佛蒙特地区本来就有常驻人口(这里为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和哈德逊盆地那些渴望得到土地的人提供了一个逃避政治、印第安人、土地紧张和地籍纠纷的逃生出口)。美国人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真正开始离开海岸地带的定居点并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阻隔向内地移居。18世纪中期,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已经在密西西比河盆地和西南部站住了脚跟。英国的毛皮商人也意识到了内地所蕴藏的财富。但是,直到大西洋海岸地区的人口增长使得宜居的土地变得稀少,才产生了足够的刺激使殖民者去内地定居。

另外,西部的土地还存在法律上的权限界定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在殖民地土地上定居并不是好莱坞电影所描绘的那种混乱无章的事情。土地占有权必须由已建政府进行授权,而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外的地区建立政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英国和法国都声称拥有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土地的所有权,双方为此不时发生冲突,这种冲突贯穿了殖民地时代的始终。而那片土地上本来就居住着印第安部落,这使问题更加复杂。直到英国人在1763年加入法印战争并取得胜利的时候,法国在这一地区的所有权才真正结束。

在弗吉尼亚公司最初的特许状中有“从大海到大海”的句子。这个由詹姆斯国王有些随意而颁发的特许状,无疑反映了他和他的资政大臣对北美大陆的巨大无知。这一无知将萦绕在所有后来者的心中。弗吉尼亚、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对土地的要求,以及最初由弗吉尼亚宪章所赋予的特许状,都仓促地被皇室颁布的《1763年界线公告》(Proclamation Line of 1763)限制了。这一公告将跨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定居的范围限定在了已经被皇室认证的土地上,殖民地居民将不能跨过流入大西洋的河流的流域以西去定居。然而,阻碍向西部移民的更主要的因素是更早的那个地区的武装冲突,而不是这道在法印

战争开始时才画出的界线。作为战利品,法国人在加拿大的权益被英国人获取,英国人在信奉天主教的魁北克建立了政府。《1774年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 of 1774*)将俄亥俄河以西的所有土地都划入了那个行政区中,这一举动刺激了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在《魁北克法案》颁布的同年,还颁布了(宣告结束《魁北克法案》的)《波士顿法案》(*Port of Boston Act*),这两个法案被殖民地居民认为是完全的和直接的战争法案。

1.2 英国人推行的土地政策

英国人在1763年突然获得了西北地区,这表示英国皇室获得了新的责任和机会,在旧的土地授权状中未曾梦想过。这是弗吉尼亚的殖民地居民顶着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压力而移居的结果。英国政府试图通过1763年的公告来达到保守的效果,限制人们获得直接由皇室承认的土地所有权,来保护(一家由英国特许的公司——哈德逊湾公司的)新获得的皮毛贸易的利益,并且维持与印第安部落之间的和平。然而,殖民地居民需要土地,他们不在乎哈德逊湾公司的利益,也不关心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和平,他们现在成为土地竞争中的弱势一方。令所有殖民地居民“不可忍受”的是1774年的《魁北克法案》,这一法案试图剥夺美国人从开始就有的土地权益。不管乔治三世(*George III*)和他的资政大臣们如何看待一个半世纪之前詹姆斯一世所作的承诺,《魁北克法案》都从弗吉尼亚人手中夺去了数百万英亩的土地。乔治·华盛顿(他本人就是西部土地的主人之一)在1774年宣布,他准备自己出资装备一只一千人的军队,亲自领导他们去波士顿与英国人开战。他后来做的比这更多。英国人在1763年的土地政策必定带来一场灾难。殖民地政府曾经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中成功地授予居民土地和安置人口,过去的制度本可以应对1763年之后的情况。但事态并未如此发展,英国人想改变过去的方式;美国人则改弦更张在交锋中改变了历史。

2. 英国的贸易政策

在土地政策上发生的变化也发生在贸易和商业领域。在经过长时期的相对成功之后,到了18世纪70年代,英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变得不再合理。但是,与土地政策问题不同,我们不能轻易地说,殖民地对18世纪70年代英国贸易政策的反对仅仅是经济问题。这些政策并没有剥夺太多美国人的权利,而是试图对他们征税。

在第1章中,我们讨论了英国殖民地的理论:殖民地居民和他们的后代在法律意义上依然是英国国王的属民,享有英国公民的权利。必须再次强调的是,这一安排在很长时间里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在贸易政策上和在地政策上一样,法国人的失败和庞蒂亚克起义的平息意味着,在1763年之后英国人可以轻松地大幅改变过去的政策。同时,殖民地居民不再受到加拿大和内地的法国人的威胁,如果他们希望,也可以自由地对抗变革。这两件事都发生了。

2.1 《航海法》

1651年,英国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便开始了营建海外帝国的

事业。那一年颁布的《航海法》(Navigation Act)划定了这个帝国的范围,并且限制它与外面世界之间的航运和贸易。克伦威尔死于1660年,英国人认定他们应该是一个君主制国家,于是派船去荷兰接回了查尔斯二世。这一年史称查尔斯二世12年(查尔斯二世的父亲死于1648年)。在这个过渡阶段,克伦威尔和国家法律都不再有效,所以国会急忙重新通过了那些他们希望保留的法律。1660年的第18项法律实际上重复了1651年的《航海法》——“是一项鼓励和增加航运的法案”。

《航海法》的直接目的是将产生于帝国内部的商品贸易保留给那些效忠于英国国王的船主、水手和商人。更明确点说,这是为了扩大和保护国王从关税、罚金、查抄和税收中得到的收入。在这一法案中,殖民地的船只和水手都被当做了英国人。由于1707年之前,苏格兰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国王是查尔斯),因此只有一个苏格兰港口——特威德河(Tweed)上的贝里克(Berwick)——被纳入到法案的条款中。法案中有关殖民地的主要禁令包括以下部分:

(1) 帝国所生产的商品不许由其他船只运送,只能由英国船长领导的英国(包括殖民地)船只来运送,而且船上至少3/4的水手必须是英王的属民。

(2) 上一条款也适用于从亚洲、非洲或者美洲的非英国殖民地部分进口的商品。

(3) 除了英国属民,任何人都不许在殖民地做商人或代理人。

(4) 除了有3/4的水手是英国人的英国船只,任何船只都不能在英国港口之间运送商品。

违反这些条款则要受到惩罚。另外,法案还规定了一些由美洲“种植园”、亚洲和非洲出口的商品只能在英国登陆。这些商品是糖、烟草、棉花、靛青、姜和黄桑木或其他用于染布的木制品。对于运输业的限制表明,只有直接从原产地出发的船只才能将商品从外国运往英帝国。此项规定会在1663年受到极大限制。法案对鱼类和鲸制品规定了特别的关税,这些水产一般由英国渔夫捕获,通过外国船只运往英国,而进入英国港口的法国船只需交纳额外的关税。第一项条款是对英国渔业的保护,第二项则是对法王路易十四反对英国政策的报复。

在1662年和1663年,法案受到修正,包括了更多的商品与更多的航运、关税条款。在1663年修正案中,从欧洲向殖民帝国的进口遭到禁止,除非是“在英国装载并启航的”英国船只。这项严厉的修正案是为了保护英国制造业并鼓励

……英国毛纺和其他制造业与商品的销路畅通,使得从同样的[殖民地]往来的航程更加安全廉价,使得王国不仅成为这些种植园的日用品的主要产地,而且也是其他国家与地区日用品的主要产地,为他们提供商品,只与种植园进行贸易已是其他国家的习惯。

随后数年的修正案继续保持了这一法案的精神。本质上说,它把这当做帝国的内部沿海贸易,把联系帝国的水道当做英国的沿海或内河水域。很显然,这样的法律必然会

导致走私。程度如何则是我们无法得知的了。^② 1733年,为保护西印度种植园主,《蜜糖法案》(Molasses Act)对进口到殖民地的外国糖、糖浆与甜酒征收高额关税。殖民地的海船船长们明目张胆地藐视这条法律,因为(1)他们必须在加勒比海进行贸易;(2)那里的英国殖民地没有足够的产出;(3)美洲人在任何可以交易的地方进行交易——这样西班牙、法国和荷兰的糖和糖浆被用来交易换取美洲的商品。英国人无视这些贸易,直到1764年出台了一项新的《食糖法案》(Sugar Act),而美洲人仍然抵制。《航海法》是对于一个扩张中的帝国的新兴贸易的“关于道路的规则”,直到1763年,它们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维系着英帝国的世界,母国及其海外殖民地。

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竭力绕过《航海法》寻找英帝国之外的市场,它们和王国的商业矛盾比南部殖民地更大。当英国的法律在1763年变得更加严苛之后,它们在北方殖民地往往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弗吉尼亚和英格兰对于西部的土地也有很大的争议。

这些法律是否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那样,它们是当时欧洲商业政策理论——重商主义的一部分。商业企业兴起,其中一些进行进出口贸易。政府进行管理和征税,以为政府活动筹集资金。有些行业受到偏爱,税收很低,有些行业甚至出于国家利益受到政府补助。也许关于这个问题已经谈论得太多了。

以现代的标准来说,《航海法》和英国重商主义并没有特别出奇之处。正如1663年的《航海法》所说:“只与种植园进行贸易已是其他国家的习惯。”利用补助、退税、关税、配额,牺牲世界的其他地方以保护并鼓励美国工业,是现代的标准做法。如果国会的每个成员和每任总统都具有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杰出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家)的经济背景和观点,我们就不会采取这样的政策。但是他们没有,所以我们确实是在采取这些政策,正如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在现在以及在17、18世纪所作的一样。欧洲人和英国人利用政府权力为自己的国民创造工业、舰队和工作机会,而如果仅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生产什么、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为谁生产,那么世界市场很可能并不会创造这些。历史学家们对于欧洲重商主义的连篇累牍的论述是试图解释为什么政府的行为并不遵循竞争市场和自由贸易理论。政府几乎从不遵循。因此,世界的产量过去是(现在也是)比本来可能或者可以生产的产量少的。重商主义时代的商业贸易愈演愈烈,因为它们受到政府政策的引导,当时的政府领导们相信,并且现在仍然相信,所以他们仍然积极地推进这种政策。

在所谓的重商主义理论中,有一点值得额外关注,即他们对于贸易顺差的强调——“以邻为壑的政策”。在美国的联邦储备体系学会以政府债券持有所为基础的纸币流通之前,美国人也认为贸易顺差是件好事。我们使用黄金作为货币,而获得黄金的方法之一就是使你卖给外国人的东西比外国人卖给你的东西多。这样,他们支付给你的黄金就比你支付给他们的多。这种做法可以增加你的黄金收入,也就是货币收入。生意人都知

^② 18世纪60年代海事法庭的一份报告中关于殖民地走私的证据表明,美国人将违禁物品“经营”到殖民地港口的努力已经非常系统、频繁和更加大胆。英国的海运和海关官员很难阻止事情的发生。一位法官在听到这些证据后,尖刻地指控美国人试图“把自己驱逐出航海法”。Jonathan Hughes, *Social Control in the Colonial Economy* (1976), pp. 155—156.

道,根据货币数量论,更多的货币意味着更高的价格和活跃的贸易,而这对他们是好事。正如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所讨论的那样,殖民者们对《航海法》不满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相信,殖民地之所以缺乏英国硬币,是因为贸易逆差使得硬币稳步减少。政府知道,活跃的贸易比萧条的贸易带来更多的税收,所以政府也更喜欢贸易顺差(并借助关税、禁运和配额来达成目标)。在重商主义理论中,《航海法》是非常合理的。贸易顺差让你的王国更加富有、强大;如果它还能让你的敌人(在17、18世纪,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是敌人)变得贫穷、弱小,那就更好了。

3. 英国是如何影响美洲经济增长的

为帮助读者理解殖民地在革命前夜的经历,让我们回过头来以一个更广阔的视角进行观察。在18世纪,英国是帮助了美洲的经济增长,还是如殖民者所控诉的那样,阻碍了其增长?这个问题充满争议,自从革命以来就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它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虽然如此,它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仔细研究。让我们从一个小小的思维实验开始。

3.1 视角

设想联合国建造了一个巨大的空间站,可包含足以支持永久星际生存的人口和资源。这个空间站和地球的轨道同步,利用太阳的能量作为能源,用其特有产品与地球交换产品。人们会赋予它什么样的自我管理与发展机制呢?我们对其未来的期望是怎样的?五代之后,这个太空殖民地和我们关系将会如何?我们会不会试图控制其社会和政治发展,防备政治极端主义的出现,如军事独裁和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我们会不会试图控制其经济发展,使其保持和我们的同质性和相互依赖性,而不是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竞争性经济体?我们是不是会坚信我们“有权”这么做,并且相信我们的指导和影响会使殖民地得到长期的好处?

我们应该看到,这与美洲殖民地的情况类似——但有一点不同。因为横跨大西洋的旅行只能借助帆船,从伦敦向费城传达一个信息需要一个月之久。无规律的内部沟通使得情况更糟。有这样的记载,18世纪时枢密院有一次向北卡罗来纳总督发出抱怨,指责他两年未曾与其进行联络。一年后,他回复了,表示惊讶和抗议,因为他一直很有规律地进行汇报。

正如我们所看见的,英国希望美洲殖民地进行生产和发展,同时一直保持忠诚。英国人提供了部分必需的补给,送去了人员,提供了管理和军事上的保护,并希望从这项投资中得到回报。殖民地从采用英国的制度开始,但被允许在不触犯英国法律的前提下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地的需要。仅仅150年之后,这两个系统之间就发生了巨大的分歧,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此后学者们一直在研究这一剧变,试图分清哪些部分来自经济生活,哪些部分来自英国和殖民地之间安排的缺陷。在这一节中,我们将研究殖民地经济增长中通常和独立相联系的一些主要问题。

3.2 殖民地的“充分就业”

殖民者毫无选择,只能干活,艰难地从荒野中求生存。殖民地为了独立生存,必须赚取至少与来自英国的人力、补给、运输成本等投资(加利息)相当的收入。正如我们所见,最终他们获得了多得多的收入,不仅吸引了英国持续的投资和移民,而且带来了内部的财富积累和不断增加的人均收入。这种外来(英国)导致的经济增长可能对经济结构有什么样的影响,而美国独立战争又可能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约95%的人口从事第一产业(农业、木材业、海港),但也有一部分,约5%的人,生活在城镇里,意味着一小部分(也许略高一点)的产出来自城镇行业(贸易、手工艺、“制造业”、服务业)。我们假定,也许这一假定不太现实,即在所有部门中“非生产性的”人口——小孩、老人、残疾者——的比例相同。早前提到的对于劳动力的严格规定,其目的就是保持就业率尽量接近充分就业(求职者和工作机会达到平衡)水平,奴隶制、劳役制以及对于流浪(无业状态)的严厉惩罚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如果允许装病开小差,产出就会减少。无业状态太昂贵,早期殖民地政府的法律全力以赴地阻止这种行为。

如果没有技术进步,那么人口增加(投入这个经济体的男女最初是来自英国的强制移民,随后是自愿移民、奴隶贸易和人口自然增长)只不过使产量提高的可能性加大。如果有任何形式的技术进步,那么长期的产出增加将比人口增加上升得更快,并导致人均收入的增加。

如果英国政策本来的目标是增加初级产出的比例,并且为了生产初级产品而不惜牺牲其他产出,那么殖民地美洲本应该会越来越农业化。根据某些学者的观点,英国重商主义从逻辑上必然导致这一结果:殖民地只允许作为适宜英国国内经济的补充物发展,生产何种产品由英国选择。通过禁止殖民地生产任何可能同英国国内产品竞争的产品,例如工业制成品,英国本来可以迫使殖民地变成越来越专业化的初级产品提供地,不是因为比较优势,而是因为法律。

一个更加合理的英国政策是随着时间流逝,允许更多城市风格的产出。很显然,这才是现实,因为我们看到,城市化正在进行,城市风格的产出也在相应增加。然而,有一些殖民地居民(和之后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种增长轨迹是由英国法律强加给他们的。针对银行、熟铁、羊毛制品出口等的禁令拉慢了殖民地城市风格工业发展的速度。因此,他们使得殖民地的发展轨迹偏离了“自然的”道路,即随着生产发展,非初级品的产量和从业率本来会增长得更快。如果后者是真的,那么独立战争的作用本来应该是加速城市化、制造业的发展,使其比初级产品的生产增长更快。对于从初级产品生产到制造业转变的步伐,不再有外来的限制。

劳伦斯·派斯金(Lawrence Peskin)在关于美国工业的产生的新书中认为,北美的城镇商人接受了他们的重商主义角色,即对英国初级产品的提供者和英国制成品的需求者。当独立战争之前,英国提高税率时,对制造业的刺激增加了。城镇商人期望回到1765年的体制之前,认为制造业是达到他们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城镇机械师则认为

制造业是发展殖民地经济、使之独立于英国的手段。^③

3.3 独立战争与工业革命

1776年之后的半个世纪之内,制造业确实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今。然而我们不能就此确认是独立战争引发了此种进步,因为技术革新与同时期的另一件大事密切联系:工业革命。英国人的创造力带来了由原动机(水力及之后的蒸汽动力)驱动机器,这些革新迅速地扩散到美洲。

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在英国于1769年申请专利。到1783年,它已经被约翰“铸铁大师”威尔金森工厂用来驱动铁锤和为高炉鼓风。英国伟大的纺织业改革者理查德·阿克赖特1790年开始用瓦特的蒸汽机驱动他的机器,其实已经有至少两位纺织业巨头,罗伯特·皮尔和彼得·德林克沃特,先于他这么做了。到1800年,已有成百上千的蒸汽机在英国的工厂中工作。这些工厂联合起来赢取外部经济,创造出了真正的第一个工业化城市。工业革命来了,而英国很快获得了和她在世界上的相对规模来说极为不相称的力量和影响。失去的美洲帝国将很快被另一片广大的地域,“第三块土地”,亚洲、非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取代。

当比较优势表明模仿有利可图时,美国人向他们的英国亲戚学习得很快。塞缪尔·斯莱特,阿克赖特工厂在英国的一位工人,记住了阿克赖特的机器设计,于1789年来到美国。到1790年,借助美国银行家的力量,斯莱特制造了机器,在罗德岛波特基特成立了阿尔米和布朗纺织厂。在这个时刻,可以说美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了。1793年,埃利·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为美国主要棉纺业创出了供给方,并且顺带加速了向南方的贩奴行为。由于南方各州从此有了棉花这样一项非常有利可图的产品,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种产品的最佳生产方式就是役使大批奴隶去做,在这种情况下,蓄黑人奴隶成为一项长期赢利的事情。棉花很快成为南方的主要产品,为英美两国的纺织业提供原料。

工业革命同时加速了大西洋两岸的城市化进程,它和带来巨大政治、军事变化的独立战争接踵而来,以至于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如果没有这样的暴力分离,殖民地美洲的自然进程——这个进程是被重商主义的英国禁止的——本来会是怎样的。证据表明这样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无论如何,即使独立战争没有发生,英国也不可能阻止在美洲发生工业革命,甚至,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根本就不想阻止。考虑到独立战争之后他们仍然在美国进行了大量投资,他们很可能会自己把工业革命传播到这里的。

4 殖民依赖时期的结束

1763年之后,英国人开始了他们希望的在北美大陆的殖民地事业的新阶段。他们相信,他们所需的是修正国王与殖民地之间旧的(部分上说是个人的)协议。他们刚打完了

^③ Lawrence A. Peskin, *Manufacturing Revolution.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Early American Industry* (2003), Part I, 描述了最初绕行英国政策的努力。正如他所证实的,独立战争并没有澄清制造业的作用。

一场昂贵的战争,想要殖民地财政体系能使殖民地政府更加自给自足,无需英国付出太多。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最终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兰斯·戴维斯(Lance Davis)和罗伯特·哈滕巴克(Robert Huttenback)表明,在17世纪70年代的欧洲世界里,美洲殖民地是税收最轻的之一。^④因此,如果我们想理解英国与北美帝国的决裂,我们就不能仅仅研究税收。

从伦敦的角度来看,美国独立战争既是政治矛盾,也是经济问题的结果。向议会执政的演变尚未完成,当时的国王是25岁的乔治三世(死于1760年的乔治二世的孙子),他十分顽固,决心亲自执政,而不是仅仅名义上统治。老威廉·皮特于1761年辞去了首相的职务。乔治三世试图通过干预议会事务达到自己的目的,最终如愿以偿。随之而来的是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拙劣、无能时期。更糟的是,欧洲当时也处于一个大混乱时期,直到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才得到缓解。这是一个战争、革命和更多战争的时代。

美国独立战争标志着这一时代的开始。美洲到底出了什么事?这部分地可以看作是英国殖民者管理的失败。英国在北美的统治技术过时了。直到18世纪60年代,英国在美洲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殖民政府。每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独立的安排和特许状。本·富兰克林1754年提出统一殖民的管理机构,这一提议被很不明智地拒绝了。英国枢密院(一个无固定形态却存在了很长时间的英国显赫人物的混杂组织)与英国商务部统治马恩岛、法国海岸边的海峡列岛、美洲殖民地、西印度群岛以及在世界各处的其他持有地。

商务部是在1696年的一次大规模重组中设立的,它对殖民地事务的保守管理产生了一些重要的长期后果:它于1719年对哈德逊湾公司南部边界的划分最终成为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线;它对殖民地法律的审查是美国司法审查的前身;它禁止各殖民地在贸易上互相歧视的行为是联邦宪法中商业条款的来源。

然而,商务部只是一个官僚机构,对政治演化毫无控制。到18世纪70年代,这个部门的管理已经十分落后于时代。那时英国的政治十分混乱,而在美洲,殖民地大会已经发展得较为完善,拥有了在1696年无法想象的力量。^⑤他们征收税款,任命官员,授予西部土地,对付印第安人。他们怎么会被一个英国官僚机构统治?18世纪60年代时,英国议会统治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海外殖民地拥有一些议会游说员(如本·富兰克林),但是根据英国宪法,直接来自殖民地的代表是不可能成为议会成员的。因此,从管理上说,英国无法应付其自身行为造成的结果——正如后来发生的事情所证明的那样。

18世纪的英国政府,正如现在大部分政府一样,一些有组织的特殊利益群体为自己谋求利益,而无组织者的利益则被牺牲。这里补助,那里征税,禁令,特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便是“英国政府”。18世纪50年代政府对殖民地铁制品发出禁令,然而殖民地的

^④ Lance Davis and Robert Huttenback, "The Cost of Empire," in Richard Sutch, Roger Ransom, and Gary Walton, eds., *Explorations in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Douglass C. North* (1982), p. 44, table 3.2. 也参见他们的 *Mammon and the Pursuit of Empi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60—191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⑤ John Brewer,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1989) 是对英国公共政策的有趣讨论。

猪肉和条铁却可以免税进入英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异化殖民地的钢铁业从业者和英国的猪肉、条铁生产者,都是为了英国制造者的利益。

从英国的角度来看,殖民地税务改革是再合理不过的事了。在1767年之前,殖民地的关税收入每年约为2000英镑,却要花费9000英镑的成本去征收。他们需要的是一系列可以征收上来的税,以及一个新的征收机构。英国刚刚为了保护这些殖民者同法国打了一场漫长的昂贵战争,现在它希望在当地驻军一万人以保护这些殖民者,想让这些殖民者也出一份钱。

1763年宣言的目的是将对印第安事务的管理由殖民政府转移到王室。殖民者正确地意识到这样就减少了他们的政府权力。1764年的《通货条例》(Currency Act)的意图是通过建立偿债基金(sinking fund)(用金属币或英国货币偿还纸币的储备)制度,使殖民地的纸币事务能够自我限制,这在金融上是一个健康的举措,对于殖民地的财政权施加了限制。1764年的《食糖法案》用意是通过向外国糖和糖浆征税以保护西印度群岛的利益,这样限制了殖民地的供给来源,并提供官员以执行这些法律。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Stamp Act)是从法律文书和报纸中获得一小部分财政收入的手段。应由殖民地官员来征收这些税款。而这被殖民地看做变本加厉的“无代议士却征税”。印花税大会在纽约召开,达成了不进口的协议(在南方并未得到执行),于是英国向殖民地的出口下跌了2/3。

印花税无法征收上来,征税官员受到袭击。英国人让步了,废除了《印花税法案》。但是,在1766年,愤怒的英国议会通过了《宣言法案》(Declaratory Act),他们相信,这项法案一劳永逸地肯定了议会对所有殖民地事务有征税和立法的权力。但是,恰恰相反,这项新法案无异于火上浇油。1767年,在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汤申德(Charles Townshend)的推动下,议会决定对茶、玻璃和纸征税,并在美洲设立一个海关署,有权进行一般搜查和扣押——给予援助令状(writ of assistance)。到1768年,这些举措在殖民地码头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并于1770年导致了波士顿惨案(Boston Massacre)。

乔治三世最喜爱的大臣诺斯勋爵,“一个脾气好而懒惰的人,才智有限,却精明而有商业头脑”,于1770年成为首相。^⑥到1782年,在乔治三世的领导下,他率领英国政府陷入了一个又一个困局。1773年的《茶叶法案》(Tea Act)降低了殖民者的茶叶价格,但是却授权东印度公司直接向殖民地出售茶叶,绕过了之前支持的一系列批发商和零售商,这使得殖民地的商人面临断绝生路的危险。结果导致了波士顿倾茶事件。

与此同时,在1774年,诺斯勋爵和英国议会又通过了如下著名的暴君法案——《波士顿港法案》(Port of Boston Act)、《马萨诸塞政府法案》(Massachusetts Government Act)(将马萨诸塞变为王室的殖民地)以及《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最终断绝了英国与殖民地之间一个半世纪的纽带关系。对英国政府来说,殖民者是犯了错误的小孩,需要惩罚。对殖民者来说,英国政府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第一届大陆会议于1774年9月在费城召开,1774年10月14日,他们用平实的语言列出了对英国政府的不满之处。

(1) 英国议会向殖民地征税。

^⑥ Charles Oman, *A History of England*(London: Edward Arnold, 1895), p. 544.

- (2) 议会宣称,有权对殖民地立法。
- (3) 向殖民地委派了征税官员。
- (4) 海事法庭的司法权延伸到了内陆。
- (5) 法官的职位由王室的好恶决定。
- (6) 向殖民地派驻了常驻军队。
- (7) 为了审讯,可以把人带离殖民地。
- (8) 波士顿港被关闭了。
- (9) 军事法被强加于波士顿。
- (10) 《魁北克法案》没收了殖民者的西部土地。

随后的决议重新阐述了殖民地的法律地位。

我们的祖先,也就是最先定居在这里的人,在他们从母国移居本大陆之时,就享有凡英国领域内的自由臣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自由和豁免。

他们移民到本大陆决不意味放弃、交出或丧失上述权利中之任何权利,相反地,他们当时是,而且他们的后代今天仍有权行使和享受上述所有权利。

一位英国艺术家对殖民地人民和礼仪的看法,表现了殖民地的女性愿意为了抗议《茶叶法案》而放弃饮茶。

殖民者并不反对航海法,“为了保护整个英帝国及其各个成员商业利益的安全”;但他们反对“任何不经过美洲臣民的同意向其征收外部或内部税目的企图”。他们进一步决定:

各个殖民地有权享受英国的普通法,尤其是根据该法,享有由同等社会地位的邻居进行审判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在更多的决议之后还列出了殖民者要求废除的八项法律——这些法律的总和实际等于 1763 年以来英国政府在美洲所作的所有改变。^⑦ 1775 年 7 月 6 日,大会发表了《使用武力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Causes and Necessity of Taking Up Arms)。一年之后,在 1776 年 7 月 4 日,殖民地宣布独立。

5. 为独立而战

宣布独立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完成独立就更加困难了。殖民地的人口分为三派:独立派、亲英派、中立派。独立派主要是由北方的中产阶级商人和南方的种植园主组成,亲英派主要是北方的地主士绅以及南北方皆有的公务员和神职人员。如果这些派别人口比例相同,而又有许多学者认为中立派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那么很显然,独立派在总人口中是少数。

进一步说,即使独立的概念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在武装斗争中获胜的可能性也

^⑦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States*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7), pp. 1—4.

是很低的。英国拥有陆军和海军,掌握战争所需的丰富资源和财力。与此相反,殖民地缺少一个中央政府,与英国之外的其他地方也很少有经济联系。在这场将要持续六年的战争于1775年4月爆发之前,没有进行任何战争准备。他们具有的优势是,那是一个运输、通信困难的年代,北美殖民地离英国本土如此遥远,给英国人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所以,当英军没能反应迅速地镇压初期的起义时,殖民者的机会来了。

殖民者如何为战争筹措足够的资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二届大陆会议(1775—1781)于1777年通过了《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但直到1781年才获得各州批准。虽然他们为前殖民地之间提供了一种对话的手段,他们之间的纽带是非常松散的。权力掌握在基本独立的各州手中,中央政府基本无权。比如说,中央政府没有独立的征税权,所有的税收都是通过独立的各州分别征用。乔治·华盛顿的联邦军队要同各州的民兵争夺公共资源。

5.1 为战争筹集资金

一般来说,政府获得进行战争所需资源的办法有五种。^⑧第一种是减少非军事支出,但是新成立的美国政府并没有这种支出。

第二种是征税,然而,我们已经说过,美国政府无权直接获得税收。《邦联条例》包含一种向各州征用财政收入的体系,然而各州学会了扣留这些按照法律他们应该支付的款项。^⑨况且,这场战争的口号之一就是“无代议士不纳税”,征税不是一个政治上可行的方案。

第三种就是借钱,但是,在最开始,这也不可行。一个刚刚宣布独立的民族的可信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它无权获得直接税收,那么它将如何筹款偿还利息和本金呢?没人知道。然而,即使这种风险可以解决,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反叛失败,这笔债英国会替殖民地还吗?也许可以从富有的爱国者那里筹集一些资金,但是政治上保守的一派是亲英的,大部分殖民者并没有可用来投资政府债券的资金——这种资本市场在许多年之后才会发展起来。最后,他们通过国内外的渠道筹到了一些资金,但是只有殖民者胜利的可能性增加,这些资金才会继续注入。

因此,第四、第五种办法就是这场战争的前几年实际使用的办法了。第四种是最重要的手段——印刷纸币。为支付产品和服务,美利坚合众国发行了“大陆币”(continentals),一种预期依靠财政税收兑换回正币(specie)的钞票。直到1780年,这种纸币几乎是支付战争所需的唯一手段。

从1775年开始,发行了2.41亿美元的大陆币,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被兑换了,流通中的数量比这个数值要小。发行高峰在1779年,这一年,新生的美国政府发行了14次货币,总发行量达到了1.4亿美元。同一年,大会投票通过了把流通量限制在2亿美元以内的决定。

^⑧ 对这一话题的一个优秀的综述参见 Ben Baack, "Forging a Nation State: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and the Financing of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EHR*, November 2001.

^⑨ Keith L. Dougherty and Michael J. G. Cain, "Marginal Cost Sharing and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Public Choice*, vol. 90, March 1997.

最初,大陆币与正币的兑换比价是1:1,然而,到了1776年,随着发行量越来越大,兑换量越来越小,大陆币开始贬值。1777年年初,比价是3:1,1778年年末,比价是10:1。一年后,在发行高峰时,大陆币与正币的比价已经达到了50:1。然而贬值还没有结束。尽管大会在1789年3月规定,大陆币与西班牙货币的“官方”比价是40:1,市场价格仍然持续下跌,并于1781年1月降到了谷底,100:1。^⑩如此,独立战争头几年的经济运转竟然主要是靠印刷纸币来维持的!

因为大陆会议没能限制纸币发行量,而且各州又发行了2.09亿他们自己的钞票,随着大陆币的贬值,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也许在战争中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对许多商品的需求都大量增加了,但是这次实在超出了过分的程度。通货膨胀是强加于最无力支付者头上的间接税。可以认为,政府在初次发行时获得了面额的足值,但是之后人们使用同样面额的一张钞票时却只能买到相对较少的商品和服务。这意味着,任何接受纸币的人都是在间接地向政府贡献资金。正如查尔斯·卡罗米里斯(Charles Calomiris)指出的那样,独立战争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带来的人们对政府的金融管理能力的置疑之声至今都能听到。^⑪

尽管政府欢迎这样的贡献,通货膨胀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大部分人对革命事业无动于衷,这意味着大多数农场主和商人更希望接受正币。许多人拒绝接受纸币,也就是说他们向英国人而不是殖民地居民出售货物。那些接受纸币的人经常把他们的货物囤积起来,因为快速上涨的价格带来了赚取更多利益的可能。

这些问题致使政府采取获得资源的第五种手段:直接没收。贫穷而饥饿的士兵抢夺食物,贫穷的政府从亲英派同情者手中没收土地。士兵们经常发不出军饷,但是,战后他们获得了土地作为欠薪的补偿。

5.2 战争对经济的影响

除了那些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人、那些“孤儿寡妇”和那些收入固定的人以外,商业也深受这场战争之害。在关闭两年之后,美国的港口在1776年4月对英国之外的船只重新开放。虽然如此,但英军还是封锁了北方的港口。私掠船很成功,但捕鱼、捕鲸、贸易的船队却受到沉重打击。在海军上将豪尔(Howe)将封锁解除之后,商业才于1778年恢复。事实上,在1778年和法国的结盟中除了关于急需的资助问题,也有关于商业的条款。^⑫

战争中制造业获得了提升,因为更好的英国商品变得难以得到。然而对这种商品的需求仍然十分强烈,所以许多商人愿意冒险提供。虽然有风险,但真实价格剧烈上涨,所以对进口货物替代品的生产得到了鼓励,至少在战争结束前是如此。所以,提供英国商品和美国产替代品在战争中是非常有利可图的。

大部分殖民地从事农业,而战争对它们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它们离军队的距离。大部

^⑩ 未偿付的一些州在1783年被拒付。

^⑪ Charles Calomiris, "Institutional Failure, Monetary Scarcity, and the Depreci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JEH*, March 1988.

^⑫ 在法国之后荷兰与西班牙与新国家签订了条约。

分农场主从战争中得到了好处,因为战争期间需求较高,导致农产品价格和地价都上涨了。在仅发生寥寥几场战斗的新英格兰,对那些有可出售的富余产品的农场主来说,直到1780年,日子都还不错。然而,大部分新英格兰农场都太小,不足以产生利润。中部殖民地的农场主,尤其是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和军队的距离要近得多。那些没有因为军队经过、战斗和没收而遭受财产损失的人从高需求中得到了好处。在南方也是这样,然而这是遭受打击最严重的地区,因为其主要农作物烟草是被封锁的对象。查尔斯敦和萨凡纳(Savannah)在1779—1780年都被英军占领了,大量财产遭到了损失。总之,如果农场主有富余产品,且距离军队较近可以出售这些产品,那么他们将赚取利润。而欧洲军队是用正币支付,不是纸币,这对农场主来说意味着双重利润。

5.3 战争的结束

这场漫长的战争并没产生什么决定性的战役,无论是海军还是陆战,直到1781年法国舰队以谋略调动了英军并将康沃利斯(Cornwallis)困在约克郡。即使如此,最终战役在1782年8月才打响。巴黎和约(The Peace of Paris)于1783年9月签署,赋予了美国完全的独立与他们根据古老权利宣称拥有的西部土地。英国将梅诺卡岛(Minorca)和佛罗里达(1763年从法国手中取得,而法国是之前从西班牙手中取得的)放弃给了西班牙,而将圣卢西亚、多巴哥、塞内加尔(西非)和其岸边岛屿戈雷(Goree)给了法国。

战后,新政府表现得效率低下,不足以和欧洲诸国打交道。当美国拒绝(按和约的要求)归还其从英国同情者手中取得的土地时,英国也就没有给予这个新国家贸易优惠待遇,并将其军队留在了西部边境。而最后这一刺激将导致30年后与英国的第二场战争。

6 属于英国的成本是多少

从经济上说,做“英帝国”的成员是好是坏?很显然,殖民者正确地看到了,独立并拥有开发西部土地的权利将是前途无量的。但是考虑到当前英国加于其上的经济负担,这场革命是否理由充分呢?实际上,他们根本无须这么做。革命是暴力、流血的动乱,一般是在两股邪恶势力之间进行的。如果一帮军事激进分子推翻了独裁压迫者,成立了残酷血腥、经济混乱或“计划的”经济停滞的邪恶政体,这是在伸张“正义”吗?衡量生活质量的改善程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独立战争中也有这种怪物的影子,不过冷静的头脑占了上风。如果革命者相信英国在经济上压迫他们,他们是正确的吗?就1774年即将革命者可以得到的信息来看,脱离英帝国会使人均收入提高吗?要得出答案并不容易。

我们之前讨论过,每个地区的生产者如何通过尝试摸索得知其比较优势所在——最适合当地的气候、土壤、地形、劳动力的性质及与之相适应的习俗的商品。终于,相当独特的地域化经济产生了。一般来说,以出口为目的,南方专门生产烟草、稻米、靛青和松节油;中部殖民地专门生产谷物、牲畜(和皮革)、与国内初级产品相关的加工制品。新英格兰因其较不适合农业,开始熟练利用其丰富的木材资源,集中于造船业、捕鱼捕鲸、船务及各种小作坊手工业。

这种经济区域分布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考虑到殖民地与海外之间的贸易机会。通过专业化和贸易,殖民地会比进行自给自足的生产获得更多的利润。比较优势和贸易就像技术进步;和从事效率相对较低的各种行业相比,每一个劳动单位可以从有效的生产和贸易中获得更多。即使弗吉尼亚可以产葡萄、造葡萄酒,但出售稻米并从葡萄牙进口葡萄酒仍然是更划算的。

6.1 列举商品

英国重商主义并不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尤为突出的就是国会数十年间通过的一系列(数以百计)控制英国和殖民地经济生活的法律。如果这些法律的目的真是限制殖民地经济生活,使之成为英国本土经济的补充,那么我们可以推想,这些法律应该对新英格兰和中部地区最为严格,因为这些地区的产品和英国本土产品最为类似。然而,从最开始,商品列表就包括南方产品——烟草、稻米、靛青和其他染料——这些物品对英国农业来说是十分新奇的。罗杰·兰塞姆(Roger Ransom)指出,对英国来说,仅仅中南方的管制成本就已经是很可观的了。^⑬然而,国会禁止在英格兰种植烟草,以保护南方种植园主!因此,认为这些法律,“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的目的是建立一种严格的殖民地—首府关系——让海外地区相对贫困,以增加英国本土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是有些误导的提法。这是一条双向车道。

无论如何,这种政策也不是自由贸易(和放任主义)。这条双向车道也有拐弯抹角之处。在数十年间,英国的既得利益者成功地(就像我们今天的既得利益者一样)通过特殊法律扭曲了市场,为自己创造了人为优势,而让整个社会相对处于劣势。当国会禁止殖民地制造型铁(这条法律在殖民地被公然违抗)或禁止出口木制品时,目的是为英国相应行业获得优势。美国作者就这些法律做了许多文章,然而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殖民者认为这些法律带来了真正的负担。而且,有些殖民地产品(猪和条铁)还受到了这些法律的优待。殖民地也享受到了补助、赏金、免受欧洲竞争的保护以及向从英国再次出口的殖民地产品的生产者支付退税的待遇。

我们在1660年的《航海法》中看到了只能从殖民地运往英国的商品列表。烟草和稻米是主要部分。之后,稻米可以从殖民地直接运往南欧,然而除了走私的损失之外,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烟草商人仍然可以独享所有的殖民地烟草,并以更高的价格在欧洲市场转卖。^⑭推测起来,美国人本可以直接卖往全世界,自己享用这个“中间人”利润。但是会多收入多少呢?这是很难衡量的。

6.2 所有成本

为了理解美国烟草生产者(及其他人)因为只能间接卖往欧洲(通过英国)而蒙受了多少损失,我们得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且永远无法知道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如果排除了

^⑬ Roger Ransom, "British Policy and Colonial Growth: Some Implications of the Burden of the Navigation Acts," *JEH*, September 1968.

^⑭ David Hancock, *Citizens of the World: London Merchant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ritish Atlantic Community, 1735—1785* (1995) 对英国商人群体的结构作了有吸引力的考察。

通过英国转运的成本,欧洲对这种价格的烟草的需求会是多大。我们不知道美国的供应价格会是怎样。我们不能知道这些价格的原因之一是,如果美国本不是英国殖民地,那么维持一个独立国家的成本(即税收)将应该加到美国的供应价格中。我们还需要知道,因支付运输和英国的管理成本,由于烟草(及其他商品),美国每年的GDP是否减少了,减少了多少。

我们没有这些殖民地的GDP数据。我们也需要知道殖民地进口的相应信息。我们还需要计算当时英帝国成员的全部成本和利益;在当前价格下的全部税收(T)、这些限制每年的成本(C)、英国在管理和防务上的支出(E)减去全部补助(包括按货币计算的对殖民地企业的保护)、奖金和退税的总和(S)及殖民地自行管理和防卫所需的支出(A)。在任何一年,以当前价格,当时英帝国成员的成本(B)的总计负担将是

$$B = [(T + C + E) - (S + A)]$$

然后 B/GDP 将是任何一年的净负担。我们甚至不知道 B 会是正数还是负数。无论如何,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勇敢的计算,他们的努力构成了数量可观的文献。

这场现代争论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35年,当时路易斯·哈克尔(Louis Hacker)恶劣地断言,美国人被英国重商主义政策挟持为“臣仆”,如果美国留在英帝国中,美国的资本家将永远不能控制自己的事务,遑论未来:

殖民地企业的利益将从属于每个在国会有影响力的英国资本家集团。^⑮

哈克尔认为,独立战争主要是为了解除英国对殖民地经济的束缚。关于自由、不可剥夺的权利等言论只是修饰性的,只是为了掩盖基础的经济现实。

哈克尔的假说在1942年受到了历史学家劳伦斯·哈珀(Lawrence Harper)的挑战。^⑯他将“英帝国管制”分为四部分:(1)跨大西洋贸易,(2)殖民地制造业,(3)对美国贸易的税收,(4)1763年之后的政策变化。哈珀的结论是:

(1) 美国只是因为航海法,在同英国和欧洲的贸易上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这些法案并没有减少在加勒比海或同非洲的贸易。

(2) 英国对于国际贸易平衡的重商主义很可能对殖民地工业起的促进作用大于阻碍作用。

(3) 对糖、糖浆和甜酒的税收一般都被逃避了,而且没有证据表明贸易被这些税收扭曲了。

(4) 1763年之后的政策和限制是灾难,因为它们导致了一场“雪崩式的骚乱”。

哈珀指出,总体而言,英国的政策很可能帮助了殖民地经济的增长,尽管对殖民地和欧洲之间贸易的限制可能导致了小小的净税务负担。总体上,他的结论是,“很难理解英国重商主义对殖民地有多少实质性的歧视”。即使要求在列表上的殖民地产品需先运到英国是对殖民者的歧视,他们却和这些规矩相安无事了一个多世纪。即使是在革命时代1776年的修辞性话语中也没有提到这些列举的商品。

可能作出更为精确的衡量吗?1965年,罗伯特·托马斯作出了开创性的努力,重新

^⑮ Louis Hacker, "The First American Revolu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Quarterly*, September 1935, p. 107.

^⑯ Lawrence Harper, "Mercantilism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March 1942.

开启了这一话题,以多方面的努力试图量化《航海法》中列举的商品条款给殖民者带来的负担以及当时英帝国成员的净成本。^⑦他发现,这负担比哈珀认为的还要小。其他参与这一争论的人则是在托马斯的基础之上工作。^⑧之后彼得·麦克利兰(Peter McClelland)严厉地批评了托马斯的假定和他对计算问题的过度简化。事实上,麦克利兰对这一问题的分析确实指出了量化过程中的可怕问题。麦克利兰还强调,殖民地对英国在1763年之前颁布的贸易法律并没有激烈反对:

例如,《独立宣言》没有提到《贸易法案》,而那些受出口限制打击最重的地区——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几乎从未将这些限制列入对母国的不满之中。

1971年,加里·沃尔顿再次研究这个问题,他估计殖民地对英国保护和管理的总成本可能是18世纪70年代年收入的1%。然而他承认,如果考虑到英国对管理、防务、补助和赏金的花费,这个数字还得减少。

6.3 1783年的独立美国

这些计算的净结果很可能是,就严格的经济意义来说,美国人留在英帝国内收益更高。决定这是不是事实的努力是由哈珀和托马斯根据美国1783年之后独立运营政府的成本作出的。从这些计算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净负担有可能是负的,留在英帝国内、让英国人来付这个巨额账单的话收益更高。美国人在战后不得不向自己征税,比英国人之前征收的更多,而俄亥俄谷以北的土地政策变成了现金销售,这比在《魁北克法案》之前的英国殖民政策要严格得多。

6.4 殖民者如是说

继续作为英国殖民地从经济方面看是否划算,这仅仅是一个假想。美国革命已经发生,而殖民者们已经在《独立宣言》中说了原因。关于英王乔治三世,他们说:

他竭力抑制我们各州增加人口;为此目的,他阻挠《外国人入籍法》的通过,拒绝批准其他鼓励外国人移居各州的法律,并提高分配新土地的条件。

他建立新官署,派遣大批官员,骚扰我们人民,并耗尽人民必要的生活物质。

他同某些人勾结起来……

切断我们同世界各地的贸易;

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

^⑦ Robert Paul Thomas,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on Colonial Welfare: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JEH*, December 1965.

^⑧ Peter McClelland, "The Cost to America of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包括如下讨论, Jonathan Hughes and Herman Krooss, *AER*, May 1969. 讨论范围更大更广的是, Gary Walton,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Burdens of the Navigation Acts," *EHR*, November 1971; Peter McClella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Burdens of the Navigation Acts: A Comment," *EHR*, November 1973; Gary Walton, "The Burdens of the Navigation Acts: A Reply," *EHR*, November 1973. 逐渐深化的领域是从纯经济学探讨转向政治学, Joseph Reid, Jr., "Economic Burdens: Spark to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JEH*, March 1978. 瑞德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揭示出,围绕航海法的问题是如何引发政治争论,以及如何刺激某些殖民者采取行动的,这降低了革命的其余部分成本。

关于土地定居、人口增长、官僚机构的成本和滥用、贸易限制、不公平的税收——无论是否有理由——都揭示了殖民者们想要独立的原因。于是他们就独立了。当1774年的法案导致波士顿港被关闭时，战斗就开始了。在现代的标准下，仅仅关闭港口这件事就足以导致开火。当和平重新到来的时候，这个新生的国家将需要自己设计政策以解决这些问题。多亏了英国的养育，这个过程是在持续上升的经济条件下完成的。

推荐阅读

文章

Baack, Ben. "Forging a Nation State: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and the Financing of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54, no. 4, November 2001.

Calomiris, Charles. "Institutional Failure, Monetary Scarcity, and the Depreci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8, no. 1, March 1988.

Davis, Lance E., and Robert A. Huttenback. "The Cost of Empire." In Richard Sutch, Roger Ransom, and Gary M. Walton, eds., *Explorations in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Douglass C. Nor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Egnal, Marc M., and Joseph A. Ernst.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January 1972.

Hacker, Louis M. "The First American Revolu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Quarterly*, vol. 27, no. 3, part 1, September 1935. Reprinted in Gerald D. Nash, *Issues 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eath, 1972.

Harper, Lawrence A. "Mercantilism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3, no. 1, March 1942. Reprinted in Gerald D. Nash, *Issues 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eath, 1972.

McClelland, Peter D. "The Cost to America of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59, no. 7, May 1969.

———.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Burdens of the Navigation Acts: A Commen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26, no. 4, November 1973.

Nettels, Curtis P. "British Mercantilism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hirteen Colon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12, no. 2, Spring 1952.

Price, Jacob. "Note on the Value of Colonial Exports of Shipping."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6, no. 3, September 1976.

Ransom, Roger. "British Policy and Colonial Growth: Some Implications of the Burdens of the Navigation Ac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7, no. 3, September 1968.

Reid, Joseph D., Jr. "On Navigating the Navigation Acts with Peter D. McClella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0, no. 5, December 1970.

———. "Economic Burdens: Spark to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8, no. 1, March 1978.

Thomas, Robert Paul.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on Colonial Welfare: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5, no. 4, December 1965.

Ver Steeg, Clarenc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Considered as an Economic Movement." *Huntington Library Journal*, vol. 20, August 1957.

Walton, Gary M.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Burdens of the Navigation Act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vol. 24, no. 4, November 1971.

———. "The Burdens of the Navigation Acts, A Repl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26, no. 4, November 1973.

书籍

Abernathy, Thomas Perkins. *Western Land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37.

Bailyn, Bernard. *The New England Mercha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Boorstin, Daniel J. *The Americans: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8.

Brewer, John.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Coleman, D. C., ed. *Revisions in Mercantilism*. London: Methuen, 1969.

Dickerson, Oliver Morton. *American Colonial Government 1695—1765*. Cleveland: Arthur H. Clark, 1912.

Egnal, Marc M. *A Mighty Empire: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Goodwin, John A. *The Pilgrim Republic*. Boston: Ticknor, 1888.

Greene, Jack P., and J. R. Pole, eds. *Colonial British America: Essays in the New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Er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Hancock, David. *Citizens of the World: London Merchant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ritish Atlantic Community, 1735—178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Harper, Lawrence A. *The English Navigation Law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9.

Hughes, Jonathan. *Social Control in the Colonial Economy*.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6.

McCusker, John J., and Russell R. Menard. *The Economy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1607—178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Miller, John C.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Morgan, Edmund 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Review of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 Washington, DC: 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 1958.

Peskin, Lawrence A. *Manufacturing Revolution: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Early American Indust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Schlesinger, A. M. *The Colonial Merchant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Frederick Unger, 1964.

Shepherd, James F. , and Gary M. Walton. *Shipping, Maritime Trad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lonial North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Ver Steeg, Clarence. *The Formative Years, 1607—1763*. New York: Hill & Wang, 1964.

第2部分

全国时期和宪法危机:1783—1861 年

1783—1861 年的主要潮流

直到 1861 年爆发南北战争之前,全国局势主要由三股力量支配:

- (1) 适当政府机构的组织和发展
- (2) 西进运动和不断增长的地方主义
- (3) 早期城市化和城市的发展

就像大部分概括一样,这个概括也有许多不足。然而这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使得我们可以详尽地考察一个新生国家的头 70 年中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基本的体制建设——包括宪法,这个于 1789 年颁布的伟大的联邦文件为国家开创了新的法律基础——将是我们关注中心。我们将重点讨论对人和机构的安全财产权的建设。独立战争切断了我们和古老的英国宪法之间的联系。如果要建设一个统一的全国政府,需要一个新的基础。即使按照《邦联条例》,各个殖民地也几乎一直是各自独立的力量。在那之前,它们在宪法上是互不相干的,只有与英国的联系是共同的。英国的宪法是(现在也是)不成文法,一个由法律和惯例组成的实体,在 1688 年之后由国会作为直接修正力量。

当我们观察美国人的创造物时,我们看到了谨慎的工作精神。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及其同事将这种谨慎称为保守主义,而这是一种误解。专业的特技演员非常谨慎。同样,试图创建宪法的代表们也是如此。他们做的是一件危险的事情。1789 年的伟大联邦宪章是由已经拥有全部主权的各州的代表所创建的。他们是胜利的叛变殖民地的领导者,现在他们处于国王的地位。在将这种权力交给另一主权之前,他们需要仔细地审视什么是不能放弃的。

联邦宪法是各州关于权力的协议:哪些权力应该集中在一个地方,哪些权力应该留给那些达成协议者。我们在之后数十年的法庭判决、新州宪法和私法中看到了对权力的

调整,有大幅调整,也有细微调整。美国人需要通过成文的协议、立法和司法解释来找到一种在经济和地理大发展的时代和平共处的方式,即使新的主权国家正在联邦框架内被创建。新的联邦权力和各州保留权力之间的冲突将是不断上演的争议和调整的主题。在某些方面,地方利益是互相不能相容的,而私法个人的传统权利和经济增长的需要并不能完全一致。在最初几十年中,必须设计一种政府和法律框架,使得未来的经济繁荣能够和平地从殖民地的农业主义中诞生。

这些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因为在北方和南方都在进行的大规模西进运动——从大西洋沿岸的殖民地一路向西直达太平洋。当 1789 年各州达成的协议在 1861 年被打破时,美国已经横跨了整个大陆。我们已经看到,试图妥协植根于殖民时期的地方差异的努力最终失败了。联邦各州之间战争的悲剧威胁着要在美洲殖民地后代中创造两个横跨大陆的国家,而当时还有另两个这样的例子:加拿大和拉丁美洲。

第三股力量是工业化,我们已经在殖民时期看到了它的雏形。到 1860 年,美国在工业产量上已经仅次于英国排名世界第二,不过和第一的差距还比较远。工业主要意味着城市的发展,即使是在原始的水平上。面粉磨坊和水力工厂可以位于人口中心之外,有时也确实这样。然而有充分的理由将磨坊和工厂建在离市场较近、交通方便的地方,在处理和生产之外也方便其他活动。

1789 年的创立者们不可能想象,在仅仅 70 年间,拥有 2 500 人以上的城镇数量从 24 增长到了 392(其中两个城市拥有超过 50 万的居民),而整个人口中有超过 1/5 的人居住在城镇中。1790 年,在定居 150 多年之后,只有 5% 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产生了殖民地时期小城镇的因素和外部经济——劳动专业化和技术,以及交通运输和贸易——现在被工业革命强化了,带领美国走上了一条工业化国家的道路。托马斯·杰斐逊的田园牧歌之梦是注定要破灭的。

第 5 章

西进运动

在本章中,我们将检视美国人独立之后为自己创建的新国家框架的理性和地理维度。首先讨论新的法律体系,联邦宪法,及随之而来的各州和普通法(common law)的权威。接着看看托马斯·杰斐逊及其同事的天才是如何在 1785 年和 1787 年的《土地法令》(Land Ordinance)中创造了有序的西进运动的方式。这几乎是和宪法本身一样伟大的成就。

1. 宪法决议(1789—1791)

1.1 《邦联条例》

为了进行独立战争,13 个殖民地由《邦联条例》和“永久联盟”(Perpetual Union)松散地联系在了一起。根据 1777 年的殖民地立法机关,这个文件在 1781 年终于被全部批准通过。位于现加拿大的北方英国殖民地也被邀请加入邦联(Confederation),但他们拒绝了。邦联过于软弱,不能有效地作为一个全国政府发挥作用。尤其是,征税以维持中央政府——“合众国大会集合”(The United States in Congress Assembled)——运营费用的权力被留给了各州,中央政府从各州征用税收。这种授权方式导致了严重的“搭便车”问题(不承担成本却享受利益的行为),使得这个新生的国家在战争结束时面临债台高筑、通货膨胀的局面。除了征税权之外,中央政府还需要掌握管理州际和国际商业、提供全国防务、建立全国司法机构的权力。

1.2 制宪会议

1786 年 1 月,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带头任命了委员,寻求建立一种更为适宜的政府形式。他们在安纳波利斯与其他州(特拉华、纽约、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的代表会面,发出了召开制宪会议的呼吁。第一次会议于 1787 年 9 月 14 日在费城召开,有来自 7 个州的 55 名代表参加。主要问题是,讨论加强了中央政府将为各州留下相当大的主权(联邦体系)还是有限的或完全没有主权(全国体系)。

詹姆斯·麦迪逊对这一讨论的描述为今天的学生提供了一幅关于这次伟大会议的清晰图画。^①在四个多月之后,1787 年 9 月 28 日,会议主席乔治·华盛顿将全部文件和一封附信送往各州供批准。特拉华于 1787 年 12 月 7 日第一个批准。罗德岛于 1790 年 5 月 29 日批准,是最初 13 个殖民地中最后一个批准的。然而在 1788 年 6 月 21 日,关键的

^① James Madison,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on of the American States*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7).

9 票多数已经因新罕布什尔的批准而达到,新的宪法生效了。大会宣布宪法于 1789 年 3 月 4 日正式实行。前十个修正案,即《权利法案》,仿《弗吉尼亚权利宣言》而定,由第一次大会通过,于 1791 年 12 月 15 日生效。

查尔斯·比尔德认为,制宪会议代表自身的经济利益在塑造这份文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② 商人、制造者、公共和私人债券持有者、资本家、金融家都倾向于支持一个全国性的政府体系。同样,蓄奴者和放债者会倾向于反对这种体系。比尔德的假说在历史学家中引起的争议弥漫整个 20 世纪,却没有带来多少实证主义的研究。经济历史学家更多关注效果而不是原因:新的宪法消除了《邦联条例》的不足,有助于创造经济增长的条件。

通过对费城会议的 16 个支持“全国体系”的关键投票、和 7 个州批准过程的实证主义分析,罗伯特·麦克奎尔(Robert McGuire)相信,他“恢复了比尔德的荣誉”。^③ 他断言:“发现表明了投票的模式,可以说总体上是支持对宪法的经济解释的,因为个人和选民的利益主要是在利益能够被结果显著地推动时影响特定议题的投票。”^④ 特别地,他指出来自较大的州和沿海各州的人、银行家及其他私人放债者、独立战争中的军官最倾向于支持新宪法。来自较小的州的和内地地区的人以及蓄奴者则更倾向于持反对态度。农场主和放债者要么反对,要么无动于衷。

1.3 保留权利

根据麦迪逊的描述,会议上的讨论是由决心成功的代表进行的、关于各州利益的仔细讨论。他们似乎完全知道他们要什么。过去的做法成功,他们便沿袭(司法审查);在有必要时,则创造新的形式。当需要妥协时,如奴隶制,他们便妥协。各州(每个都是有独立主权的)的代表谨慎地保护他们的权力,只将那些他们确信是创造一个有效的新中央政府所必需的那些权利出让给新的中央政府。为了加强他们的“保留权利”,他们加入了《第十修正案》:

本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保留给相应各州行使,或保留给人民行使。

保留给各州的权力是警察权——制定地方法规、法律和法令,如殖民时期那样,包括进行执照、视察、对地方商业活动的管理等(参见第 7 章)。在规范人们内部之间的关系方面,有普通法——祖先在美洲适用了近两个世纪的古老规则。1774 年,大陆会议曾在《宣言和决定》(Declarations and Resolves)中宣称“英格兰的普通法”是所有美国人的权利。一些州的宪法也明确声称了同样的法律实体。将此种法律的发展和解释留给各州的做法变成了政策。如果遇到意义模棱两可的情况,如在罗宾逊诉坎贝尔案(1818)中,美国最高法院要求州法院从英格兰的案例中寻求指导:

^② Charles A. Beard,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1935).

^③ Robert McGuire, *To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 (2003). This book builds on work done in conjunction with Robert Ohsfeldt. Chapter 3 is based on “An Economic Model of Voting Behavior at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of 1787,” *JEH*, March 1986, while Chapter 6, which reports similar voting behavior at the state ratifying conventions, is based on “Self Interest, Agency Theory, and Political Voting Behavior: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ER*, March 1989.

^④ McGuire (2003), p. 91.

美国法院的补救,在普通法或公正上,不是根据各州法院的实例,而是根据普通法和公正的原则,如我们得出我们的知识和那些原则的那个国家所界定和定义的那样。^⑤

宪法可以是如此地简洁且全面,因为它并不需要是所有权利、法律和声明的完全列表。许多东西本是不言而喻的。

1.4 联邦宪法略述

这个文件本身非常简单。我们在这可以列出对我们的美国经济史研究特别有用的部分。明确授予国会的权力在第一章第八节中,共有 18 条。简言之,国会应有如下权力:

- (1) 征税,但应全国统一;
- (2) 以合众国的信用借款;
- (3) 管制同外国的、各州之间的和同印第安部落的商业;
- (4) 制定合众国全国统一的归化条例和破产法;
- (5) 铸造货币,厘定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的价值,并确定度量衡的标准;
- (6) 规定有关伪造合众国证券和通用货币的罚则;
- (7) 设立邮政局和修建邮政道路;
- (8) 保障专利权和版权;
- (9) 设立低于最高法院的法院;
- (10) 界定和惩罚在公海上所犯的海盗罪和重罪;
- (11) 宣战,制定相关条例;
- (12) 招募陆军和供给军需,但此项用途的拨款期限不得超过两年;
- (13) 建立和维持一支海军;
- (14) 制定治理和管理陆海军的条例;
- (15) 规定征召民兵,以执行联邦法律、镇压叛乱和击退入侵;
- (16) 规定用来为合众国服役的那些民兵的管理,但民兵军官的任命由各州保留;
- (17) 在合众国政府所在地的地区行使主权;
- (18) 制定为行使上述各项权力所必要和适当的所有法律。

对黑人奴隶制的妥协在第一章第九节第一段。大西洋奴隶贸易可以继续 20 年,但要缴税。

现有任何一州认为得准予入境之人的迁移或入境,在一千八百零八年以前,国会不得加以禁止,但对此种人的入境,每人可征不超过十美元的税。

在第一章第九节第五段,国会被禁止对各州输出的货物征税。下一段则禁止国会根据商业权力(第一章第八节,第三项权力)制定对各州区别对待的歧视性法律,也禁止对在一州出港、另一州入港的船只征收州际关税。

^⑤ *Robinson v. Campbell*, 3 Wheaton 212 (1818).

如此全面的权力需要限制各州的主权。这列在第一章第十节中。第一段限制与外国政权的协议；禁止各州发行货币（纸币）、使用金银币以外的任何物品作为偿还债务的货币、通过任何公民权利剥夺法案、追溯既往的法律；以及著名的契约条款：任何州不得制定“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契约的概念贯穿了整个英国历史；契约的神圣植根于法治而不是人治的政府这一观念之中。通过包含这一条款，普通法成为新的共和国的法律。第二段禁止对州际商业加以限制，“但为执行本州检查法所绝对必需者除外”。后者与将警察权保留给各州的做法一致。

第二章规定了行政权，第三章规定了司法权。第四章包括“充分信任和尊重”条款，要求每个州对于他州的法律和司法程序予以承认。每个州的公民享有各州公民的一切权利。古老的英国信条“追捕犯人的喊声通缉令”（越过州界追捕重犯）列在本章第二节第二段。在第三段中，再次对殖民时期的劳役和奴隶制的延续加以承认。

根据一州法律须在该州服劳役或劳动的人，如逃往他州，不得因他州的法律或规章而免除此种劳役或劳动，而应根据有权得到此劳役或劳动之当事人的要求将他交出。

这一规定在 1857 年德莱德·斯科特（Dred Scott）案例中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美国南北战争。第四章还规定了新州的加入，并保证“实行共和政体”。第五章规定了修正案的提出。第六章第一段规定邦联时期的债务延续到联邦时期。第二段则是“最高条款”：

本宪法和依本宪法所制定的合众国法律，都是全国的最高法律。

第五修正案因如下规定而在政治史上著名：

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

而之后的一段话在经济史上同样著名：

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

1.5 随后的经济发展

宪法，这份惊人地简洁而清晰的文件，经过修正和解释，已经成为“全国的最高法律”逾两个多世纪了。借着各州保留的权利和了解普通法与自身权利的公民，联邦宪法保障了财产权和人身权。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即可靠的法律，将持续存在。在第八章中，我们将看到法律制定者和法官在随后的岁月里如何运用宪法维护一个巨大的经济体有序的发展。这种行为还将继续。随着我们研究的进程，我们将反复不断地引用关于商业、契约、保留权利和正当程序的条款。

2. 1785 年和 1787 年的《土地法令》

在各州达成关于联邦的形式和权力的协议之前，他们已就西部土地达成了协议。殖

民者 1783 年从英国人手中夺得的定居点少于弗吉尼亚授权中所说的“从大海到大海”，因为英国人 1763 年承认了法国和西班牙（以及印第安部落）对密西西比河西部的宣称权，并将旧西北保留给了魁北克（1774）。然而，最先要解决的是加拿大边境下面密西西比和阿利根尼山脉之间的地区。谁拥有它，如何解决它？赌注是国家未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片土地及其资源会带来收入、财富、城市和未来的人口。土地政策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

2.1 西部土地的割让

在和平到来之前，这个协议就已经开始了，因为在 1781 年之后英国人已经处于必败状态。七个殖民地宣称因为其最初的授权或同印第安人的交易而拥有西部土地。弗吉尼亚的宣称包括了其南部边境以北的所有土地，因此和其他殖民地有重叠。正如我们所见，甚至在独立战争之前，定居者们已经开始往西部迁移。《邦联条例》包含一个条款，声明不得为中央政府的利益而从各州手中剥夺西部土地。土地投机者喜欢相反的政策，一些动机更为纯洁的政治家则希望新政府能拥有公共土地，以便实行关于西部的全国政策。

马里兰（一个没有西部土地的州）在土地问题解决之前是不会批准《邦联条例》的。纽约州的宣称是基于与易洛魁人的条约，当 1781 年它将这些宣称权移交给中央政府时，马里兰作出回应，批准了《邦联条例》。同年，弗吉尼亚将其巨大的宣称权贡献出来，为全国政策提供了保证。弗吉尼亚的馈赠在 1784 年被接受。弗吉尼亚人明智地规定，在今伊利诺伊和印第安那州内，中央政府不得将他们的土地给予同印第安人就土地达成私人交易的人。为了执行这种针对印第安居民的劣质宣言，投机者需要联邦军队作为后盾。

2.2 集体财产权与公共领域

在查看对公共领域的处理之前，先简要概括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公共领域是共有财产（community property）的巨大延伸，没有人有动机去保全这种财产，除非共有权利能以某种方式通过分配给他人安全的私权而转移给他人。如果所有其他人都能自由地享用甚至破坏这种财产，一个人又怎么会限制自己的使用呢？除非能够分配私权，搭便车者永远不能排除，只要个人的收益大于使用成本，每个人都有动机过度使用共有财产。完全自由免费的结果就是暴力。无法想象公共领域会留在政府的所有权内；我们没有拥有一切的沙皇，没有世袭封建贵族，他们的私权高于普通人。事实上，我们害怕这种事情，所以法律禁止在公共土地上分封贵族。

需要找到一种办法分配土地。每一块向真诚的定居者开放的土地立刻变成了熟透的梅子，等待有资格或有钱的人将其分别摘走。因此，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没有办法禁止投机——乐观和悲观的心理浪潮（如同现代的股票价格、汇率和商品价格的波动一样）。这是第一个问题。这是分配权利过程的一部分。那些购买了公共土地的人以所能达到的最高价格将其重新卖出。第二个问题从殖民时期就开始了，白人定居者一直试图夺走公共的（以及印第安人的）土地。“擅占者”家庭不断深入荒野，处于最前列。英国人无法限制他们；随着白人人口的增多，印第安人也不能限制他们了。需要一个可作为总体法则的政策。公共领域注定要分成无数由私人拥有的小份。但如何做？只有当

最好的土地已经分完、占用的私人成本显著增多时,对空地的占领才会减慢或停止。

2.3 杰斐逊与 1785 年和 1787 年的《土地法令》

土地政策会是怎样的?对此国家再次需要感谢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斐逊,伟大的 1785 年和 1787 年《土地法令》背后的精神指导者。即使他知道现代产权理论,理论上他也不可能做得更加出色。没有人,更没有任何势力,能够将公共领域的事务处理得比他更加公平。在当时做这项工作要承担太多的压力。杰斐逊意识到“捐赠”(清晰的所有权的主权来源)将从全国政府开始。政府现在是这个权力的受遗赠者,通过殖民地宪章及弗吉尼亚等州的权力让与,从英格兰国王那里继承了控制权,而那些州的所有权也是来自英国国王。

杰斐逊希望这些土地(1)成为全国政府的一次性财政收入来源,(2)成为共和政府和民主制度的基础,(3)成为私人所有者的安全的财产。他害怕全国政府滥用权力的潜在可能,希望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移除政府的所有权。他对于这些土地的最重要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

(1)一旦私人从全国政府获得土地所有权,对土地的使用权不应再受到政府的控制。

(2)分配应该是有序的,在销售之前应该经过科学调查,并根据调查标记边界,而不是用殖民时期的“界石和地界”来划分^⑥。

(3)居住在公共土地上的人口有资格将这些地区建设成为新的州,并与旧州在一个公平的基础之上。

这样,西部土地将会成为美国民主边界的延伸,而不是政府、社会或经济政策与实践剧烈分离的基础。

杰斐逊 1784 年关于公共土地的备忘录中提出了他的政策的要点。他是国会一个关于土地政策的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本质上,他认为全国政府对公共土地拥有无限继承权,通过销售可将权利转移给私人购买者。之后全国政府便出局了,捐赠者成了现在或未来的州政府。土地将由州“持有”。税应上缴给州,而这些土地,用杰斐逊的话说,“在任何情况下永不会回到合众国手中”。^⑦通过这个简单的举动,新州被赋予了一个未来的税收基础,而财产所有者将会受制于他们的州和地方政府。联邦政府的权力凌驾于私人公民之上的危险性减少了许多。根据殖民时期的先例,采取了初期手段以贮备所有金银及其他矿产资源和盐井的三分之一,但是没有确定的政策将这些贮备的矿产权利交给政府。拥有完全所有权的人仍然拥有他们自己的矿产,当这个国家开始在私人拥有的矿产基础上发展重工业时,这一事实凸显出资本的重要性。

1785 年法令和 1787 年法令(《西北法令》)都是杰斐逊的委员会于 1784 年提出的一份法令的修改、扩展和再次采纳。这份法令包括一项条款,要求在 1800 年以后在所有阿

^⑥ “Metes and bounds” is a system for identifying land that makes use of more or less permanent natural objects such as creeks, trees, and rocks.

^⑦ Quoted in Marshall Harris, *Origin of the Land Tenure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0), p. 389.

利根尼山以西的土地上禁止奴隶制。它仅以一票之差未能在国会通过。之后杰斐逊曾如此讲述这次失败：

当时有十个州在场。六个州全体同意，一个州意见分裂；而要通过这项提议需要七张支持票，所以失败了。如果在这个分裂的州或那些反对的州中能有一个声音出来支持，就能阻止这项恐怖的罪恶在这个新生的国家蔓延。就这样，我们看到数百万尚未出生的人的命运悬在一个人的舌尖——而在这个可怕的时刻，天堂却保持了沉默。^⑧

就这样，杰斐逊没能成为美国历史上决定传统奴隶制的和平死亡的最重要的人。在1787年法令中，只在俄亥俄河以北的地区禁止奴隶制。^⑨

按计划，这些土地将被调查，然后拍卖。在1785年法令中，杰斐逊原计划的10平方英里镇区被新英格兰传统的6平方英里的镇区取代，每个镇区包含36个640英亩的地区（参见图5.1）。半地区是320英亩，四分之一地区是160英亩。当1862年《宅地法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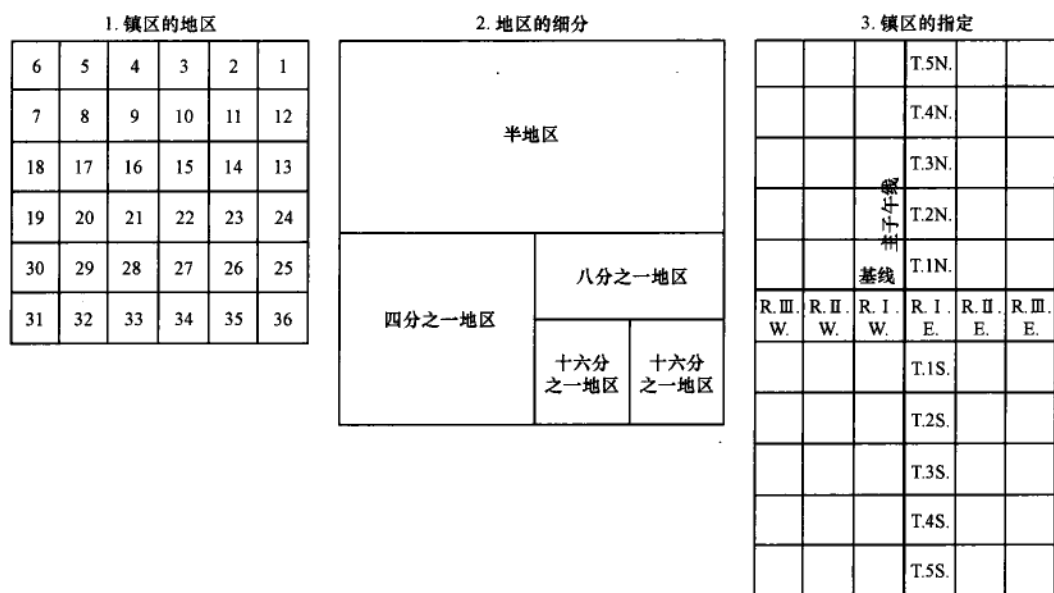


图 5.1 1796 年土地调查体系

这里列出的是1796年《土地法案》规定的公共土地基本调查方案（在1785年《西北法令》之后）。每个镇区是36平方英里。一个地区是1平方英里，640英亩。一个地区分成四个农场，每个160英亩，直到1862年的《宅地法案》中仍是基本的家庭份地。基线和子午线是用来以数字标记镇区的分割线。

资料来源：Charles O. Paullin, *Atlas of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and New York: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and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1932), plate 48.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⑧ “The Ordinance of 1784 and Jefferson’s Services for the Northwest Territory,” *Old South Leaflets*, vol. 6, no. 127 (Boston: The Directors of the Old South Work, Old South Meeting-house, 1905), p. 23.

⑨ 杰斐逊提名的10个州全部都有传统的名称和合理完整的边界。例如，现在的芝加哥市，曾经包括在艾森尼斯皮亚州，“艾森尼斯皮亚河或洛克河流经”的区域。它的正南方，拥有同样的南北边界的曾是麦特罗普塔米亚州，“这里是Muskingum河、俄亥俄的迈阿密河、沃巴什河、伊利诺伊河、迈阿密湖、桑达斯基河的发源地。”参见Louis Cain, “Carving the Northwest Territory into States,” in Joel Mokyr, ed., *The Vital One: Essays in Honor of Jonathan R. T. Hughes* (1991), p. 156.

(Homestead Act)获得通过时,160 英亩是一个标准的家庭份地。随后,在干燥的西部,政府项目中的灌溉水权的分配将是根据同样大小的“家庭农场”来进行。每个镇区的一个地区将划分出来以支持公立学校(遵循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的传统),另四个地区供政府使用。一项加入支持教堂的土地(在新英格兰殖民地非常常见的行为)的提议,也许是因为第一修正案的缘故,未能获得通过。

1787 年的《西北法令》包括了杰斐逊的计划,将西部土地划分为若干近似矩形的地区,这些地区将来可通过正当程序成为新州。1784 年,杰斐逊的委员会提议将西北地区划分为 10 个部分(参见图 5.2)。两年后,詹姆斯·门罗向当时的驻巴黎大使杰斐逊发信,表示他害怕创造 10 个新州是“失策的”。既然 1784 年法令在奴隶制问题上遭遇了失败,他认为加入 10 个新州将增加地方分离主义的可能性,减少新政府成功的可能性。^⑩一年后,门罗提交的一项动议在国会获得通过,将西北地区新州的数量限制在三到五个。



图 5.2 1784 年法令中的西北地区

在 1784 年法令草案中提议的十个州。

西北地区将被组建成一个行政区 (district); 国会将指派一个地区长官和法官。当这三到五个地区之中有一个拥有 5 000 名到达投票年龄的男性居民时,将选举产生一个地区性立法机构并向国会派遣一名无投票权的代表。行政和司法职位则仍将由联邦政府指定的人员担任。当该地区的自由居民人口达到 6 万时,该地区将成为一个新州,“在任

^⑩ 门罗还提出了减少新州数量的第二点理由:“一大部分疆土是非常贫穷的,特别是靠近密歇根湖和伊利湖,以及在上边密西西比河和伊利诺伊河构成的广阔平原,并不如表面那样富饶,长期以来是不毛之地。因此在这些地区如此多年来的衰败,甚至可以说从来没有容纳足够数量的居民,使这些地区有权加入南方联盟……”参见 Louis Cain, “Carving the Northwest Territory into States,” in Joel Mokyr, ed., *The Vital One: Essays in Honor of Jonathan R. T. Hughes* (1991), p. 156.

何方面和原来的州处于平等地位”。尽管一个地区对其内部事务拥有相当大的控制权，它在联邦层面没有投票权；而根据宪法，一个州至少要有两名参议员和一名众议员。而且，地区的行政和司法长官仍由联邦政府任命；州却不是这样。所以，成为州有很大的好处。

对老兵的土地赠予是荣耀的，土地大小根据军衔而定。^⑪ 土地，军事“储备”，因为这个目的而被单独划出。因为士兵可以将这些土地出售给私人投机者以获得现金，所以大部分老兵并没有在他们的土地上定居。这些土地是对他们的服役的报酬。尽管杰斐逊希望对转让(alienation)和继承(inheritance)西部土地的军事部分加以限制，但是最终，土地使用权变成了下列之一：(1) 永久拥有(无时间限制，完全所有权)，(2) 直接继承，(3) 自由转让，(4) 浪费权(right of waste)，(5) 无遗嘱的情况下继承，同等血亲，男性或女性，不考虑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有权根据遗嘱划分土地。长子继承和限定继承是禁止的。^⑫ 给予长子双倍份额的做法也被摒弃了；曾有这种习俗的州在 19 世纪早期放弃了这一习俗。玛丽莲·塞尔蒙(Marylynn Salmon)在对女性和财产法关系的研究中指出，长子继承和长子双份制度的废除是独立战争之后对女性最为有利的法律变化之一。^⑬

俄亥俄河以南的西部地区是分步进行组建的。1792 年，弗吉尼亚同意其肯塔基地区成为州。北卡罗来纳 1790 年将其权利转让给田纳西，而田纳西按照《西北法令》的做法组建成了一个地区，但是没有禁止奴隶制，也没有采取那种调查体系。原先同西班牙有争议的南方地区在 1798 年组建了密西西比地区，佐治亚州 1804 年转让了其宣称权。同样，其原则还是《西北法令》，只是没有禁止奴隶制。

这样，在 1783 年和平到来之后仅仅十年，阿利根尼山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所有土地都在理论上按照“美国原则”组织起来了，确保拥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政府形式，以及精心设计的使土地进入安全的私人所有权和发展的方法。未来美国资本主义的基础——私人所有权和对生产资源的控制——就此缔造出来。既然大部分人所知的大部分财产权是体现在自由和常见的农田租佃中的不动产权，很自然地，其他形式的财产权是派生自这种基本的形式。古老的英国土地使用权成为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基础。

最初，西北地区的土地只能以地区为单位出售，后来以半地区出售，到 19 世纪 30 年代，甚至缩小到以 40 英亩为单位；新的各州注定将拥有充满家庭农夫的土地。在现有的 50 个州中，31 个是根据《西北法令》的组织原则成立的，该法令真是来自我们 18 世纪政治家头脑和笔尖的令人惊叹的成就。^⑭

理论上，这是一个将整个大陆建设在一个法治而有序的基础之上、使个人拥有安全的财产权的社会机制。这是对未来的伟大礼物。在今天的世界上，自东向西，从俄罗斯的针叶林到南非的沙漠，仍然有些国家政治恶劣，不能解决土地所有制、安全的个人所有

⑪ 总数约 950 万英亩的公共土地预留给了独立战争的老兵和他们的后代。最后一块土地证是独立战争一个世纪后的 1886 年签发的。Jerry O'Callaghan, "The War Veteran and the Public Lands," in Vernon Carstensen, *The Public Lands* (1962), p. 112. The vets could, and did, sell their claims to others for cash.

⑫ “需要”限制了哪类继承人能够继承财产。

⑬ Marylynn Salmon, *Women and the Law of Property in Early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p. 190. 而这些改变对女儿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作者注意到北卡罗来纳州采取了一条无遗嘱死亡的法令，使妻子与丈夫在继承方面趋于平等。

⑭ 并不是说每个新成立的州都复制了最新的法令。每个州都与国会单独进行磋商。Paul Gates, *History of Public Land Law Development* (1968) 该文对这些差异作了有趣的讨论。

权的问题。在现实中,对美国公共领域的处理也许不完全是杰斐逊所设想的样子,但是尽管一个多世纪的进程中也有贪污腐败现象,最终解决方案里还是贯彻了他的原则。阿利根尼山以西地区的人们基本上都是在《西北法令》的框架下行事。^⑮

3. 地区利益(1790—1853)

对大陆地区的收购发生在宪法定制后的 60 年内(1790—1853 年间的收购参见图 5.3)。根据同英格兰的条约,原殖民地及直到密西西比河的地区面积近 889 000 平方英里。1803 年从拿破仑手中购买(价格仅为 1 500 万美元,美国净花费仅 1 130 万美元)的路易斯安那几乎使国土面积翻倍,增加了 827 000 平方英里的土地。1819 年,通过与西班牙的条约,又增加了 72 000 平方英里的土地——佛罗里达。



图 5.3 1853 年的美国疆域

美国疆域是从多种途径得到的。有些,如佛罗里达、俄勒冈、密西西比以西的北部地区以及哥斯登购买计划,是和平的交易;另一些,如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犹他、内华达、加利福尼亚以及得克萨斯的一部分,是军事行动的成果。当然,路易斯安那购买计划是现金交易。

得克萨斯 1836 年从墨西哥独立,九年后加入了美利坚合众国,又增加了 390 000 平方英里。1846 年,同英国关于俄勒冈边界问题的长时间争议得到解决,又增加了 286 000 平方英里。同年又打响了与墨西哥的战争。结果又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以

^⑮ Jonathan Hughes, "The Great Land Ordinances: America's Thumbprint on History," in David C. Klingaman and Richard K. Vedder, eds., *Essays on the Economy of the Old Northwest* (1987).

及怀俄明、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的一部分,共 529 000 平方英里的辽阔土地。1853 年的哥斯登购买计划(Gadsden Purchase)又从墨西哥购买了约 27 000 平方英里的土地。

到 1853 年,美国的土地面积已经达到了 19 亿英亩。直到南北战争时,仍有整整 2/3 的土地是空置的,留在公共领域内。直到 20 世纪早期,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直到今天,美国的一个重要任务仍然是在这片辽阔的空白之地上散播人口和文明。1867 年从俄罗斯购买了阿拉斯加,又增加了 586 000 平方英里的广阔土地,这里至今人迹罕至。1898 年吞并夏威夷,1899 年吞并波多黎各,这些地区拥有了州的地位(波多黎各自由邦是一个联系邦),面积共约 3 628 000 平方英里。

在我们间歇性的帝国主义时期,我们于 1898 年吞并了菲律宾。他们于 1946 年独立。除了小型的属地如维京群岛、关岛、美属萨摩亚等,这场 1607 年开始于弗吉尼亚的席卷全国的土地浪潮似乎已经平静了下来。在所有这个国家占领的土地上,杰斐逊及其同事的组织方案都占据主导地位——土地使用权、调查、对公立学校的支持、镇区的大小以及其他。1785 和 1787 年的法令确立了基本准则。

4. 对公共土地的处理

在土地处理的实际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按照计划进行。政府机器在建立起这个体系的过程中动作过于迟缓、机构过于臃肿,当终于成立了足够的土地办公室时,在记录和发放土地使用权时又过于缓慢。事情进展得太快。值得注意的是,总体而言,联邦政府花费在处理土地上的钱似乎比销售土地的收入还多。如果你将 1880 年之前的每年数目合计,总花费达到了约 3.22 亿美元,而收入约为 2.01 亿美元,损失 1.21 亿美元。这个数字不包括与授予土地有关的管理成本,如对运河和铁路公司的管理。也就是说,支持政府的纳税人补助了从政府手中购买土地的人。^⑥ 销售收入甚至不足以弥补交易成本。

4.1 投机

已经有许多文章写过对公共土地的投机,尽管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如果这个体系当时真是按照计划运行的,这种估价活动也许还会有一些价值。如果之前曾经对所有土地进行了调查,如果所有土地真是在公开拍卖中出售,真的卖给了实际定居者,那么这些有序的计划也许有可能实现。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政府的各种保留价格(reservation price)——由国会制定的最低价格,低于此价格的竞标将不被接受——不可能包括不同地区不同品质的土地。因此,不可避免地,有些土地的价格过高(因此无人购买),有些又过低(因此以代表实际市场供求的价格被转卖,经常是当场就被转卖)。马尔科姆·罗尔伯夫(Malcolm Rohrbough)在他的《土地管理局业务》(Land Office Business)一书中描述了 1836 年密歇根州卡拉马祖的销售情况,当时正是土地热的高潮时期。管理局关闭以进行记录工作,但面对门边汹涌的人潮,登记员只得重新开放竞价。他“接受了无数的申请,

^⑥ Carstensen (1962), p. xviii.

在地图上将这些土地标记为已售,无助地看着有意购买者们在被接受的申请上投机炒作”。^⑦显然,在那种情况下保留价格实在是太低了。

4.2 一块土地的大小

国会对公共土地的处理开始于1787年,以一英亩10美分的价格将100万英亩的土地卖给了俄亥俄联合公司(Ohio Company of Associates)。同年还有两起规模类似的交易,分别卖给了赛欧托公司(Scioto Company)和约翰·西姆斯(John Symmes)。就像在殖民时期一样,现在要靠这些公司找人来定居并以能接受的价格和条件将这些土地重新出售。这种安排并非杰斐逊及其同事的本意,而它将是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前兆。尽管国会有压力要求以小农场主能够承受的规模打包出售,最小出售规模开始定在了640英亩,政府保留价格为每英亩1美元。1796年开始可以赊账购买,并且将价格上调到了每英亩2美元。1800年,最小打包规模减少到了320英亩,1804年降到了160英亩,1820年80英亩,而最低价格也降到了每英亩1.25美元,赊账购买被废止了。投机——自由市场销售——是农场规模、价格和地点满足个人需求的方式。1832年,最小规模降到了40英亩,只能用现金;对通过优先购买权(preemption)以最低价格购买已经定居的土地加上了160英亩的限制。现金购买的土地没有上限。

很显然,在好的年景里吸引了大量有意购买者的公开土地拍卖,仅仅被看做将土地从公共领域转移到自由市场的初步交易手段。官员们控诉说,购买者联合起来在拍卖中只以较低的保留价格竞价,然后再自行以高得多的价格拍卖刚买到的土地,这种现象并不罕见。但是在1841年通过《优先购买权法案》之后,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消息灵通的购买者在拍卖中出价更高(除非是暴力威胁)以竞购不存在优先购买权的上好土地。

4.3 优先购买权与划分等级

如我们所见,殖民时期的定居者经常在地上“非法擅自占用公地”(squat)。除了马萨诸塞之外,州政府倾向于慷慨地对待他们,认为他们的先锋工作是有价值的。联邦政府则远没有这么慷慨——他们派出军队焚烧农场和村庄。但是擅占者们总会回来,因为他们认为联邦政府对土地宣称的权利没有合法性。从最开始,要求优先购买权的呼声就很高;时不时地,这些定居者还受到特别优先购买权法案的尊重(例如1813年关于伊利诺伊、密苏里和佛罗里达地区定居者的立法)。1815年之后,随着印第安部落缓慢而稳定地消失,擅占者们对于部落土地的要求也逐渐消解,导致擅占者如潮水般涌来,他们迫切需要一个总的优先购买权法律。^⑧政府一边继续为特定地方特定人群制定特殊的优先购买权法案,一边坚持拒绝出台一部总的优先购买权法案,即向擅占者开放所有的土地。

直到1830年,杰克逊总统仍在威胁使用军队将擅占者们从土地上驱逐走。然而,同

^⑦ Malcolm Rohrbough, *The Land Office Business* (1968), pp. 245—246.

^⑧ David Wishart, "Evidence of Surplus Production in the Cherokee Nation Prior to Removal," *JEH*, March 1995, 文章认为消解的一个原因是存在能够被白人获取的显著的经济租。威沙特是对此作出贡献的不少作者之一。Linda Barrington, ed., *The Other Side of the Frontier: Economic Explorations into Native American Histo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8).

年国会就通过了最广泛的优先购买权法案,每两年延期一次。^①其中包括一个条件,如果在—块擅占地区有两人的要求重叠了,这块地将由两人平分,且他们还可以分别在别处另寻 80 英亩土地。不用奇怪,这些 80 英亩“飘地”的市场很快蓬勃发展起来。1841 年,通过了一个总的优先购买权法案,将优先购买权限制在 160 英亩,但允许在 40 英亩的较小规模上以每英亩 1.25 美元的价格现金销售。^②

因为许多土地没能售出或发放未能完成,国会在 1854 年通过了《划分等级法案》(Graduation Act),根据该地区开放销售以来土地积压的时间将公共土地的保留价格降低:10 年未能售出的土地为每英亩 1 美元,30 年或更长时间未能售出的土地为每英亩 12.5 美分。

1862 年的《宅地法案》,在 1763 年宣言将内地关闭一个世纪之后,把剩下的满足占领和改善的公共领域开放给了定居者。到那时为止,密西西比以东大部分好地,或更确切地说,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中部的第 100 根子午线以东的土地,都在私人手中了。

但是还有些别的东西需要考虑。在 1862 年《宅地法案》中体现的对殖民手段——根据定居和劳役授予土地——的回归一直都是一个谜团,尤其是因为南北战争爆发时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将人口从战争的驾驶座上转移,从东部和中西部转移。为什么是那个时候?也许并不是那么神秘。宅地所用的土地是属于平原和山地印第安人的。尽管自从 1781 年以来美国就宣称拥有那些土地,但从未在那里建立起有效的控制。在许多方面,宅地者(homesteader)是一只占领军,而且远比之后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和菲尔·谢里登所代表的军队便宜得多。农场所有者大部分自己承担费用,而且倾向于将印第安人赶走。这样,宅地者成了开发西部的先遣队,就像殖民时期的擅占者一样。上千场这样的战役之后(约 30 年),边疆关闭了,印第安人被赶进了保留地,联邦政府掌控一切。1862 年之后的宅地行为是一个软弱的(或无暇他故的)政府在争议土地上建设产权的手段——通过支持宅地者。道格拉斯·W. 阿伦如是说,而且这种论述很合理。^③

4.4 效率和公平的问题

对土地管理局以及办事程序的研究都认为,其管理一直是效率低下的。工作人员太少,而定居者们总是在调查土地之前冲进较好的地域。购买之后完成所有权的确认需要五年之久。最初,每份土地执照都需要美国总统亲自签字。1832 年,土地管理局需要发放 42 000 份执照才能跟得上需求。从 12 月到 6 月,杰克逊总统签署了一万份执照,还有 10 590 份等待他的签字,而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之后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秘书替代总统签字。

^① Mark Kanazawa, "Possession Is Nine Points of the Law: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arly Public Land Disposal," *EEH*, April 1996, 文章讨论了在形成 1830 年优先权购买法案的公共土地政策中,擅占者发挥的作用。他还分析了国会投票对该法案的影响。

^② 一项对 1841 年法案不完美结果的研究,认为那些设法获取土地的投机者手里的边疆土地已经超过了 160 英亩,参见 Allan Bogue, "The Iowa Claim Clubs: Symbol and Substanc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1958, reprinted in Carstensen (1962)。

^③ Douglas W. Allen, "Homesteading and Property Rights: or, 'How the West Was Really W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91.

土地官员们通常都是腐化的,私自出售关于土地的信息,并亲自在土地交易中投机以增加收入。据指控,至少到1841年《总优先购买权法案》之前,这个体系是以公众的花费填满了富人的钱包(投机者有财力以现金购买大块土地,然后分成小块重新出售)。

有可能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体系吗?毫无疑问。任何不那么腐败的体系都会更好一点。但是这个问题严格意义上说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大部分公共领域都是用武力从英国人、墨西哥人或印第安人那里抢来的。例如,在路易斯安那购买计划中,印第安人得到了什么补偿?条约被撕毁,印第安人被强行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1830年的《印第安人移居法案》(Indian Removal Act)目标是将所有的印第安人转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对这样得来的土地进行公平分配将会是一个有趣的伦理问题。无论如何,国会1850年对伊利诺伊中央铁路、1862年对横跨大陆的铁路以及之后政府对铁路的授予共将大陆土地面积的10%(约1.9亿英亩)补助给了铁路建设。在这里寻求公平公正就更为复杂了。

如果我们考虑正在发生的事情——共有财产的大规模“私有化”——我们应该同意我们的体系具有一个最主要的优点:正如兰斯·戴维斯所说:“至少很快。”^②然而,当时的政策有一些奇怪的不一致之处。农场主想要越来越多的土地,因为开荒(clearing)在经济上对他们有利。据斯坦利·莱博高特(Stanley Lebergott)研究,中北地区的一个农场主每年可以开荒10至12英亩土地,收入在140至200美元之间,比一个成年男子每年作为农业劳动力的收入还要多。在另一方面,出售公共土地的政策对这一努力有损害作用,因为新的土地不断加入,降低了土地的整体价格。^③

最终,土地以1785年和1787年法令所规定的形式被占有了,而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其实际经历的过程并不比现代国会对河流和港口的拨款更加不光彩。公共土地在19世纪是国会的消费力,私人利益得到满足,因为这里的公共利益不可能得到一致,甚至不可能被明确识别。杰斐逊当时可能会感到震惊,而如果在今天他无疑会。弗农·卡斯滕森(Vernon Carstensen)赞许地引用了伊利诺伊农业学院院长尤金·达文波特(Eugene Davenport)1915年的声明:“但是我们有这些农场、这些城市、这铁路、这文明,这些可展示的成绩,他们值得这样的代价。”^④考虑到这任务的艰巨,我们可能会花上许多时间设想一个也许会做得更好的制度。

4.5 土地销售模式

西进运动是土地的事情,也是人的事情。随着国家向西进发,需要越来越多的人;而且,需要时间。直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移民并未占据显著的份额;本土人口的自然增长和迁移是国家西进的主要动力。数据参见表5.1。

^② Lance E. Davis, 因为在窃贼偷盗来的商品中实行“平等分配”纯粹是一种幻想,因此国家从快速通过这项法案中获利了。

^③ Stanley Lebergott, “The Demand for Land: The United States, 1820—1860,” *JEH*, June 1985. Jeremy Atack and Fred Bateman, *To Their Own Soil* (1987), pp. 7—10, 还说明了错误的结果,土地被政府政策持续释放到市场上;租金——从使用的土地上获得的收入,从“东部土地”获取的收入相应减少了;转移到了西部。

^④ Carstensen (1962), p. xxvi.

表 5.1 1790—1860 年的地区人口

殖民地	1790	1830	1860
老地区			
新英格兰	1.0	2.0	3.1
中大西洋	1.0	3.6	7.5
南大西洋	1.9	3.6	5.4
总计	3.9	9.2	16.0
新地区			
东北中部	0.0	1.5	6.9
西北中部	0.0	0.1	2.2
东南中部	0.1	1.8	4.0
西南中部	0.0	0.2	1.7
山区	0.0	0.0	0.2
太平洋地区	0.0	0.0	0.4
总计	0.1	3.6	15.4

注：人口数字以百万人为单位。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a 36—45.

到 1830 年，涌进中北地区的东部（俄亥俄、印第安那、伊利诺伊、密歇根、威斯康星）和中南地区的东部（肯塔基、田纳西、阿拉巴马、密西西比）的人群使得那里的人口数量超过了 350 万。^⑤ 十年后，人口达到了将近 600 万。到 1860 年，这两个地区，加上中北地区的西部（明尼苏达、爱荷华、密苏里、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堪萨斯）和中南地区的西部（阿肯色、路易斯安那、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人口增长得如此迅速，以至于整个美国将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这些地区，而在 1790 年，这些地区的人口数量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有着确定的宪法和法律体系、安全财产权、统一应用的土地定居法，对经济体系没有重大的内部冲击（战争、叛乱）并主要基于自然增长的人口增加，似乎具备相对稳定的西进运动的条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860 年之前的西进运动和土地销售有三个高潮期，主要集中在 1818 年、1836 年和 1854—1855 年前后。1800—1860 年的土地销售可参见图 5.4。

这里是本书中首次遇到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这一现象——经济活动中高峰和低谷的循环出现。在 1860 年之前，三个高峰期出现在 1818 年、1836 年和 1854—1855 年，随后便是 1819 年、1837 年和 1857 年的经济危机。独立战争之前也有一些较小的循环，没有产生大的经济危机。1836 年和 1854—1855 年的土地销售高峰是极为戏剧性的，1818 年的模式类似，但没有那么戏剧性。数据参见表 5.2。

^⑤ 对这个问题的一项有意思研究是，Susan E. Gray, *The Yankee West: Community Life on the Michigan Frontie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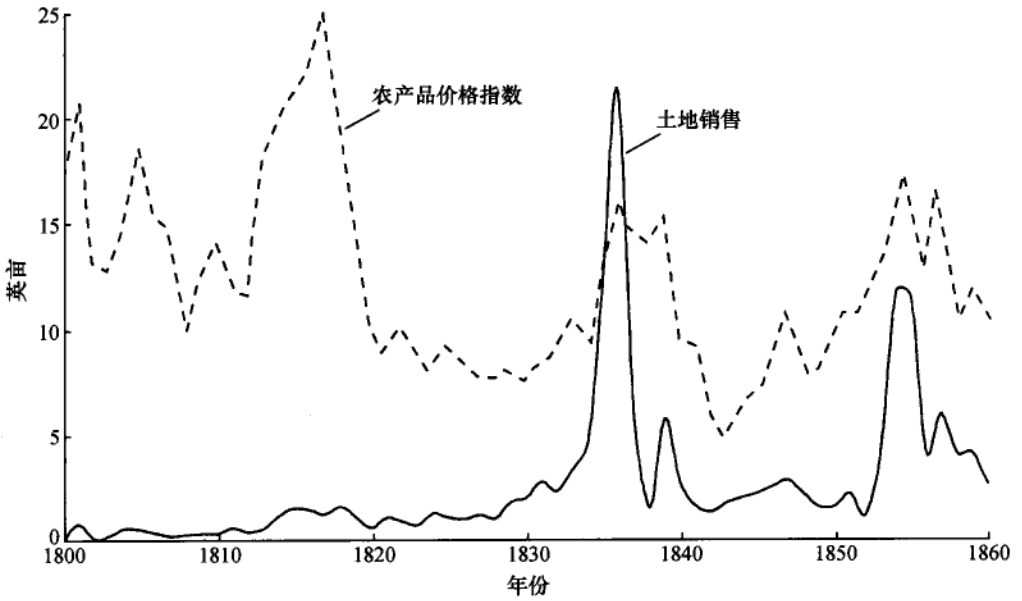


图 5.4 1800—1860 年的公共土地销售与农场产品价格

1860 年之前,西进运动的浪潮和农业产品价格上涨之间有一个粗略的对应关系。在 19 世纪 30 年代中期和 50 年代中期,这种对应尤其和公共土地的销售和食品价格指数相关。在 1815 年之前,西进运动受到对西部土地所有权的争议、政府土地销售调查和办公室的缺乏以及敌对的印第安部落的阻碍。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f 79, Cc 114.

表 5.2 三个高峰时期前后的土地销售

年份	英亩数	年份	英亩数	年份	英亩数
1815	1.4	1833	3.3	1851	2.1
1816	1.4	1834	4.6	1852	1.1
1817	1.2	1835	12.5	1853	4.0
1818	1.5	1836	21.2	1854	11.6
1819	1.0	1837	5.7	1855	11.4
1820	0.5	1838	1.4	1856	4.1
1821	1.0	1839	5.7	1857	5.9

注:土地面积以百万英亩为单位。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f 79.

对这种模式有许多明显的解释跃入脑海。既然对土地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除了“土地饥渴”之外)来自于其产品的价格,我们可能会期望在食品价格和土地销售之间会有某种联系。我们可以在图 5.4 之中看到这种联系,但却不是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土地销售的巨额增幅和食品价格变化完全不成比例,而且在 1818 年这种联系也不能成立。

人们需要土地,但是人口突然剧烈增长(就像土地销售的增长那样)的唯一可能方式是移民。移民和土地销售的关系并不显著,因为 19 世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来到美国的爱尔兰和德国移民主要居住在城市里。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到来促使其他人离开城

市去往公共土地。随着交通运输的改善——内部改善,如公路、运河和铁路——土地的可用性也增加了,但这些改善所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不能解释西部土地销售中出现的突然、巨大改变。对运河、公路和铁路的投资发生在土地销售平平的年份;因此,尽管上述条件无疑对土地销售热潮有支持作用,但它们并不是这种热潮的原因。^⑤

亚瑟·科尔(Arthur Cole)在1927年出版的著名著作中研究了所有这些现象,得出的结论是,投机才是原因。^⑥他使用每月和季度数据指出,土地销售的增长发生在商品价格和其他经济活动迹象的增长之前,而且土地销售的衰减也发生在1819年、1837年和1857年的总经济萧条之前。幸存者对这些情况的描述肯定了科尔的结论。整个的城镇地区一夜之间被抛弃在荒野,有些从未得到开发;大街上今年还人头攒动挤满了购买者,第二年就空无一人。当1836年芝加哥刚刚从芝加哥河和密歇根湖交界处的泥泞中兴起时,哈里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正在那里。

当我们到达芝加哥时,我从未见过如此繁忙的地方。……街道上挤满了土地投机者,匆匆从一个销售点出来,又急急跑到下一个销售点去。一个黑人身穿大红衣服,手里拿着一面大红的旗子,骑在一匹身披大红护具的白马上,宣布销售的时间。……当绅士们在街上行走时,店主们从店里向他们大喊,邀购各种各样的农场和土地,建议他们在地价涨得更高之前出手。^⑦

按照现在芝加哥房地产的情况,人们会希望他们当时抓住了这个机会。但是,阿利根尼、密歇根、卡拉马祖河上一块两万英亩的土地,全部划分成城镇地段,真的准备好了?这场惨败的幸存者乔治·C.贝茨(George C. Bates)之后写道:

你还太年轻,没感受过这场通货膨胀的各个阶段,1834年时是一缕微风,1835年时是一阵大风,1836年时是一场风暴,1837年时风向突变,成了可怕的龙卷风,每个人手中都只留下了残骸,之后是一片死寂,一直持续到1844年。……^⑧

土地销售的模式——借款花钱(产生债务)——是经济活动整体循环的一部分。我们将看到,在经济周期的许多共同原因中,没有一个单独的原因能够被隔离出来,受到经济学家一致的同意,也许除了货币主义者,即那种认为货币行为是宏观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的经济学家。周期性,即经济周期的时间,也从未得到满意的解释。经济周期是令人不快的,但它确实发生在,不能因为难以方便地解释这一现象就将它从经济史上抹去。观察者们都同意,在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经济活动存在扩张和收缩的循环,并呈增加的趋势。

所以,总之,事实是,尽管随着国家的增长和西进,宪法的、法律的、人口的因素为公

^⑤ Carter Goodrich, Julius Rubin, Jerome Cranmer, and Harvey Segal, *Canals an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⑥ Arthur Cole, "Cyclical and Sectional Variations in the Sale of Public Lands, 1816—1860,"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27; and Paul W. Gates, "The Role of the Land Speculator in Western Development,"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1942, both reprinted in Carstensen (1962). Gates shows the various roles, virtuous and deplorable, of the frontier professional land speculator.

^⑦ Quoted in Rohrbough (1968), p. 240.

^⑧ Quoted in *Ibid.*, p. 243.

共土地稳步进入私人手中提供了基础,尽管伴随着土地销售而出现的实际定居点缓慢但持续的增加,但是实际上土地销售的模式明显是周期性的。在不断增长的经济中,我们将一次又一次遇到经济周期的问题,每一个经济周期中几乎所有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都交织在一起。在20世纪,现代福利国家部分地是为了抵御这股力量才发展起来。这是一个有趣的历史社会事实,经济周期在我们的历史中出现得如此之早,力量如此之大,且发生在公共土地私有化如此基本的事物之上。因为我们的土地使用权使得土地成为一种商品,就像任何其他商品的销售一样,经济增长的周期力量可以而且确实影响到了它。

推荐阅读

文章

Allen, Douglas W. "Homesteading and Property Rights; or, 'How the West was Really W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34, no. 4, April 1991.

Billington, Ray A. "The Origin of the Land Speculator as a Frontier Type."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19, no. 4, October 1945.

Bogue, Allan G. "The Iowa Claim Clubs: Symbol and Substanc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vol. 45, no. 2, September 1958. Reprinted in Vernon Carstensen, *The Public Lands* (1962).

Cain, Louis P. "Carving the Northwest Territory into States." In Joel Mokyr, ed., *The Vital One: Essays in Honor of Jonathan R. T. Hughes*.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91.

Cole, Arthur H. "Cyclical and Sectional Variations in the Sale of the Public Lands, 1816—1860."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9, no. 1, January 1927. Reprinted in Vernon Carstensen, *The Public Lands* (1962).

Gates, Paul W. "The Role of the Land Speculator in Western Development."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vol. 66, 1942. Reprinted in Vernon Carstensen, *The Public Lands* (1962).

———. "Charts of Public Land Sales and E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4, no. 1, March 1964.

Hughes, Jonathan. "The Great Land Ordinances: America's Thumbprint on History." In David C. Klingaman and Richard K. Vedder, eds., *Essays on the Economy of the Old Northwest*.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7.

Kanazawa, Mark T. "Possession Is Nine Points of the Law: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arly Public Land Disposal."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3, no. 2, April 1996.

Lebergott, Stanley. "The Demand for Land: The United States, 1820—18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5, no. 2, June 1985.

McGuire, Robert A., and Robert L. Ohsfeldt. "An Economic Model of Voting Behavior at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of 1787."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6, no. 1, March

1986.

——. "Self-Interest, Agency Theory, and Political Voting Behavior: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9, no. 1, March 1989.

O'Callaghan, Jerry A. "The War Veteran and the Public Lands."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28, no. 4, October 1954. Reprinted in Vernon Carstensen, *The Public Lands* (1962).

Treat, Payson Jackson. "Origin of the National Land System Under the Confedera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report, 1905. Reprinted in Vernon Carstensen, *The Public Lands* (1962).

Wishart, David M. "Evidence of Surplus Production in the Cherokee Nation Prior to Removal."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5, no. 1, March 1995.

书籍

Atack, Jeremy, and Fred Bateman. *To Their Own Soil: Agriculture in the Antebellum North*.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Beard, Charles A.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13.

Carstensen, Vernon, ed. *The Public Land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ublic Domai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2.

Gates, Paul W. *History of Public Land Law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Public Land Law Review Commission, 1968.

McGuire, Robert A. *To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 A New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Rohrbough, Malcolm. *The Land Office Business: The Settl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American Public Lands, 1789—183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21.

第 6 章

人口与劳动力

从取得独立到南北战争,殖民时期美国人口增长的两个主要趋势和特征一直在延续:(1) 增长非常快;(2) 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增加了,尽管这一时期有大量人口在空旷的野外定居。而且,移民的来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60 年,居住在美国的人口中有 4 百万以上的人是在欧洲出生的,这个数字几乎和非白人人口数量一样。欧洲出生者的比例从 1790 年以来翻了一番,而非白人的比例则下降了 1/4。这种变化是 1808 年合法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结束和自由欧洲移民活动扩大的必然结果。人口中各个成分的出生率都开始下降,平均家庭规模也在减小。产生 20 世纪主要人口特征(例如较小的家庭)的过程已经显现出来。

1. 规模与自然增长

各人口普查年份的主要人口数据可参见表 6.1。此表列出了总人口及白人与非白人的比例,还列出了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比例。到 1860 年,美国人口超过了英国,而白人人口也超过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和。在欧洲国家中,只有法国和俄罗斯的人口超过美国(中欧的德语地区仍然是许多小国割据的状态)。1790 年之后的人口复合增长率维持在每年 3.3% 左右,约 23 年翻一番,和殖民时代后期的增长率相当。南北战争之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增长的绝对人口仍然相当多。1860 年之前,没有哪个欧洲国家保持了这样的增长率。据这方面的专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称,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够达到我们人口总增长率的一半。既然有证据表明美国的死亡率和欧洲处于同一水平,那么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只能是移民和(持续的)高出生率了。^①

19 世纪中期之前的出生率数据基本只能依靠推测。根据现有的证据,19 世纪早期的出生率可能是每年 55‰(比较 1910 年的 30.1‰和 1998 年的仅仅 14.6‰)。数据显示,之后出生率稳定缓慢地下降,到 1860 年降到了 41.4‰。早期人口具有如此高出生率的原因有许多。第一当然是因为当时人口中有半数以上正处在生育高峰年龄。1800 年人口年龄的中位数只有 16.0 岁,甚至到了 1860 年也只有 19.4 岁(比较美国历史上这一数据最高的 2000 年,35.3 岁)。1820 年,当这个国家开始致力于西进运动时,美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还不到 17 岁。^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青少年的国家。

^① Robert Fogel, "Nutrition and the Decline in Mortality Since 1700: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in Stanley Engerman and Robert Gallman, eds.,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86), p. 440. 福格尔指出,1700 年美国人的死亡率是 40‰,同年英国的这一数字是 28‰。到 1850 年,两国的这一数字分别是 23‰和 24‰。

^②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a 35, Ab 40.

表 6.1 基础人口数据(1790—1860)

	总计	白人	非白人	城镇
1790	3.9	80.7%	19.3%	5.1%
1800	5.3	81.1	18.9	6.1
1810	7.2	81.0	19.0	7.3
1820	9.6	81.6	18.4	7.2
1830	12.9	81.9	18.1	8.8
1840	17.1	83.1	16.9	10.8
1850	23.2	84.3	15.7	15.4
1860	31.4	85.6	14.4	19.8

注:总人口数据以百万人为单位。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a 2, 25, 31.

经济历史学家认为,大量的、相对廉价的土地(及拥有土地的机会)为高出生率提供了条件。^③ 一个主要由农夫和计划务农的人组成的国家,面对大量的空地,显然有充分的理由建立更大的家庭。当年轻人留在家里时,他们可以劳动,如果他们离开家,可以在附近定居,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庭。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且农业中的技术进步当时还不能显著地提高生产力),土地的可获得性无疑是对未来预期的基础。可用的土地就是未来的家庭收入。尽管难以相信 19 世纪早期的美国人对环境有如此敏感的认识,但这似乎就是事实。

城镇居民不是农夫。他们为什么也对土地的可获得性(或者,就他们的情况来说,是缺少土地)如此敏感? 表 6.2 中列出了各地的家庭规模,新英格兰和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的数字较低,意味着他们的出生率也较低,其中体现的城市和农村的出生率差别显得

表 6.2 1840 年和 1860 年每千名 20—39 岁女性拥有的 5 岁以下孩子的数量

	1840	1860	1860/1840
新英格兰	871	701	0.805
中大西洋	1069	878	0.821
东北中部	1433	1141	0.796
西北中部	1614	1249	0.774
南大西洋	1299	1099	0.846
东南中部	1589	1175	0.740
西南中部	1442	1124	0.780
山区		1156	
太平洋		1078	
总计	1217	1029	0.845

注:1840 年的数据只统计了白种人。

资料来源: Calculated from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a 2244—6550.

^③ Richard Easterlin, "Population Change and Farm Settlement in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JEH*, March 1976; and Lee Craig, *To Sow One Acre More* (1993).

十分引人注目。因此,肯定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在城里养育孩子真的比在乡下困难吗?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在这么多又便宜又好的土地唾手可得的条件下,城镇的数量和规模都增长得如此之快?一个答案是孩子可以看成是让消费者花钱的耐用品(*durable goods*)(就像我们现在的冰箱、汽车)。在城里比在乡下选择更多,有更多花钱的方式,所以,城镇家庭规模相对较小。另一个答案是孩子可以看成是可用来产生收入的投资品(*investment goods*)(就像工厂和设备)。农村的孩子可以在相对较小的年纪就开始帮助干农活,如种植他们自己的食物(对于城镇孩子来说则不太可能),农村家庭生一个孩子的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所以,农村家庭规模相对较大。

关于儿童数量的数据倾向于证实这些推测。表 6.2 中的每一个例子都表明,每一千名育龄妇女拥有的五岁以下孩子的数量(出生率和家庭规模的代表),在定居地比在边疆地区显著较小,在城镇地区比在农村地区小。尤其要注意山地和太平洋地区,那里的新土地是在 1848 年之后获得的。^④在整个 19 世纪,妇女初次结婚的年龄一直在提高,而这倾向于降低出生率。^⑤根据已知的数据,似乎黑人(包括黑奴和黑人自由民)的出生率变化趋势(但不是绝对水平)和白人基本相同。^⑥1860 年之后可以获得更好的数据,仍保留同样的趋势;平均来说,出生率和死亡率都下降了,家庭规模也在下降。

李·克雷格(Lee Craig)利用 1860 年北方家庭农场的的数据估算了各种家庭成员的家庭劳动的美元价值,结果列在表 6.3 中。19 至 54 岁之间的成年男子的价值列在表格的第一行;下面列的是其他家庭成员的价值相对成年男子的比例。克雷格的估算和已知的北方农场劳动分工一致。^⑦田野工作一般是男性的责任,而妇女和儿童从事离房屋和庭院较近的工作:

收获季节在田野里干活的劳动力每天消耗约 4 000 卡路里的热量,这些热量来自每天三次大餐和两次加餐(在午餐前后各有一次)。妇女和儿童,尤其是十几岁的女孩子,或者是雇来的助手,经常把饭食送到田地。因为饭食的准备、递送、清洗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对于家庭来说,让一些人专门进行田地劳动、另一些人专门在家劳动,是比较划算的。^⑧

这并不意味着妇女和儿童不能或没有做田地工作。他们更倾向于在开发程度较低、劳动力相对匮乏的地区进行田野劳作(或参与开荒活动)。

④ 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参见 Easterlin (1976); Richard Steckel, "Antebellum Southern White Fertility: A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Analysis," *JEH*, June 1980; and Don Leer, "The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Antebellum Ohio," *JEH*, June 1976.

⑤ 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的趋势近似相同。Michael Haines and Barbara Anderson, "New Dem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te 19th-Century United States," *EEH*, October 1988, p. 342.

⑥ Richard Steckel 在其著作的第 10 章讨论中,认为女性奴隶生育率的绝对水平肯定远高于当时的白人妇女(依他的证据也许高出两倍),比以前所想的要高很多。

⑦ "女性工作"导致产品中包含的价值在东北地区的农场中份额更高,这些农场比其他两个地区的农场利润更高。Craig (1993), p. 80.

⑧ Craig (1993), p. 36.

表 6.3 1860 年北部农业中家庭劳动的美元价值

	北方	东北部	中西部	边疆
成年男性(19—54岁)	229.09 美元	294.77 美元	186.44 美元	193.66 美元
儿童(0—6岁)	-8.6%	-7.1%	4.6%	-3.3%
儿童(7—12岁)	7.2	7.7	14.9	14.0
青少年女性	9.6	7.8	21.3	9.1
青少年男性	25.5	37.7	25.5	25.3
成年女性	66.6	52.3	37.7	76.1
成年男性(55岁及以上)	76.7	49.5	65.4	69.9

东北部: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新泽西、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佛蒙特的镇区。

中西部:伊利诺伊、印第安纳、俄亥俄、南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的镇区。

边疆:爱荷华、堪萨斯、明尼苏达、北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的镇区。

资料来源:Lee A. Craig, *To Sow One Acre Mor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table 4.2, p. 80.

克雷格的结果表明,平均来说,妇女的劳动(不包括家务劳动的价值)约是成年男子的 $2/3$;然而在中西部地区却不足 $2/5$ 。^⑨儿童和少女贡献并不太多,然而他们的贡献在中西部是最大的(几乎是他们母亲的一半)。中西部的少年少女都更经常地参与市场生产和开荒工作;而东北地区的男孩们更倾向于专门从事市场生产,女孩们则专门从事家庭生产。因此,中西部的妇女劳动价值较低,部分地是因为她们代替了其十几岁女儿的工作。另一个原因是她们的生育率更高,中西部农场妇女生育数量平均是东北地区妇女的1.5倍。^⑩

长期的生育率下降这种重要的问题需要一个可信的解释。出生率为什么应该和可耕地数量有任何关系呢?答案是,父母具有一个遗赠(bequest)动机,无论是“策略性的”还是“有目标的”遗赠。

有目标的遗赠是利他主义的;当他们的孩子离开家庭去建立自己的家庭时,父母会给孩子一笔钱,数目至少不比他们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得到的少。伊斯特林指出,这种行为在定居区会引起生育率下降,因为在这种地区,好的农场土地的相对价格较高且在不断上涨,因此遗赠的价格也上涨了,减少了对更多孩子的需求。在另一方面,较新地区的土地价格相对较低,使得父母更容易为孩子提供遗赠。^⑪

策略性的遗赠是父母提供给孩子某些激励,使他们以某种方式行事或提供一些特定产品和服务。正如克雷格所说:

当孩子还留在家中时,父母将孩子看做收入的一个来源;当孩子们长大、父母年老之时,父母将孩子看做经济安全的保障。孩子将父母看做资助或遗赠的提供者,

⑨ 特别是牛奶制品、家禽和鸡蛋,占去了妇女儿童在市场产品上花费的时间的绝大部分。

⑩ Jeremy Atack and Fred Bateman, *To Their Own Soil* (1987), pp. 49—55, 强调了这些结果。在全部人口中,新英格兰的生育率是最低的。

⑪ 伊斯特林的分析得到了支持, Morton Owen Shapiro, “A Land Availability Model of Fertility Changes in the Rural Northern United States, 1760—1870,” JEH, September 1982; and Craig (1993), p. 96. 在大陆法中女性的地位是依附的,特别是新英格兰,如果父母选择将土地遗赠给女儿,按照规定,土地将会受到女婿的控制。

而代价是小时候提供农场劳动,当父母年老时提供照顾。^⑫

策略性的遗赠导致定居区生育率下降是因为定居增加了非农场的选择,增强了孩子讨价还价的力量。

保罗·大卫和威廉·桑德斯特罗姆提出了一个强调策略性遗赠的“生命周期”解释。他们认为,大型家庭是用来为父母提供年老时的安全保障。同样,可耕地的短缺和生育率的下降也有联系。当美国独立时,可耕地的极大丰富意味着(父母)已经拥有的土地不会随着时间升值从而作为养老金,那么孩子就会或可能会被促使为他们年老的父母提供照顾。到19世纪晚期,最好的土地已经日渐稀缺,那么已经拥有和定居的土地的租金和价格会上升,其资本增值使得它可以作为养老之用。因此,人们投资土地,代替了养育更多的孩子。土地越稀缺,经济租金和资本增值就越高,年老的父母需要的孩子就越少。^⑬

2. 1860年之前的移民

人口增长的第二个来源当然是移民。独立之后,移民仍然不受限制,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之后很长时间。就这种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及其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过去25年来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新鲜有趣的问题。

2.1 数据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我们只讨论那些存在可量化证据的移民。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加拿大和墨西哥边界上那些没有记录的人员流动情况,尽管有文献证据表明其数量可观。还有一个问题,在1808年合法奴隶进口中止之后,奴隶进口是否仍然存在。毫无疑问,非法的奴隶进口仍然存在,但似乎其数量非常有限。英国人在1820年之后有力地压制了大西洋上的奴隶贸易,虽然仍有运往美国的奴隶船只,但数量已经大大减少。学者们搜集的证据表明,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进口的奴隶(几乎全是在1808年以前)及其在美国的后代,约占非白人总人口的1/3到1/2。^⑭据估算,到1860年,美国黑人中99%是在美国出生的,当然,其祖先主要是殖民时期的。实际上,到1860年,黑人中在美国出生的比例要高过白人。^⑮到1860年为止移民对人口增长的贡献列在表6.4之中。

到19世纪30年代以前,移民对人口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之后移民快速、稳定地增长。1821—1825年间,年均移民数量为8000人;1826—1830年间,数量增长到了20587人;之后的五年,1831—1835年,又增长到了50598人;在1836—1840年继续增长到了69330人。到了1841—1845年,移民已经达到了年均86067人。在历史上的这一时期,

^⑫ Craig (1993), p. 23.

^⑬ Paul David and William Sundstrom, "Bargains, Bequests, and Births: An Essay on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 Reciprocity, and the Demand for Children in Agrarian Societies," Stanford Project on the History of Fertility Control, working paper no. 12. 我们有幸得到作者的允许援引这部著作。

^⑭ Robert Gallman, "Human Capital in the First 80 Years of the Republic: How Much Did America Owe the Rest of the World?" *AER*, February 1977.

^⑮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vol. 1 (1974), pp. 23—24.

表 6.4 1800—1860 年净移民占人口增长的比例

年份	十年增长比例
1800—1810	3.3
1810—1820	2.6
1820—1830	3.8
1830—1840	11.7
1840—1850	23.3
1850—1860	31.1

资料来源: Calculated from Richard Easterlin,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in Lance 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table 6.1.

北欧的一连串荒年和土豆种植的失败扰乱了欧洲社会,引起了第一次真正的移民潮——1845—1850 年间涌进了 140 万人,而这还仅仅是开始。在随后的七年中,有 220 万之多的移民从欧洲来到了美国。这次移民潮的主要特征列在了表 6.5 中。

表 6.5 1845—1860 年移民的来源地

年份	总量	大不列颠	爱尔兰	斯堪的那维亚	其他西北欧国家	德国
1845	114.4	19.2	44.8	1.0	9.5	34.4
1846	154.4	22.2	51.8	2.0	12.3	57.6
1847	235.0	23.3	105.5	1.3	24.3	74.3
1848	226.5	35.2	112.9	1.1	9.9	58.5
1849	297.0	55.1	159.4	3.5	7.6	60.2
1850	370.0	51.1	164.0	1.6	11.5	78.9
1851	379.5	51.5	221.3	2.4	20.9	72.5
1852	371.6	40.7	159.5	4.1	11.3	145.9
1853	368.6	37.6	162.6	3.4	14.2	141.9
1854	427.8	58.6	101.6	4.2	23.1	215.0
1855	200.9	47.6	49.6	1.3	14.6	71.9
1856	200.4	44.7	54.3	1.3	12.4	71.0
1857	251.3	58.3	54.4	2.7	6.9	91.8
1858	123.1	29.0	26.9	2.7	4.6	45.3
1859	121.3	26.2	35.2	1.6	3.7	41.8
1860	153.6	29.7	48.6	0.8	5.3	54.5

注:单位是千人。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d 106—113.

最初的浪潮来自英伦列岛。英国政府对爱尔兰的饥荒完全无动于衷,据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估算,在 19 世纪 40 年代末,超过 100 万人因此丧生。^⑥ 那些成功逃离爱尔兰的人,要么去了英国的其他地方,要么去了加拿大,要么去了美国。在 1846—1855

^⑥ Joel Mokyr, "The Deadly Fungus," in Julian L. Simon, ed., *Research in Population Economics*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80), p. 248.

年这十年中,已知有近 130 万爱尔兰人移民到了美国。还未算人数以千记的从加拿大来到美国的人。同一时期,欧洲的德语地区也产生了近一百万的美国移民。1848 年的政治动荡产生了移民潮中的许多著名人物(例如卡尔·舒尔兹,后来的密苏里州参议员)。然而,这些迁移大多归因于庄稼歉收,如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及其他北欧国家的移民翻了一番,这股热潮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 50 年代末才结束。

表 6.6 列出了来自各国的移民的比例。注意,除了 1846 年和 1854 年之外,英国的比例(第 5 栏)每年都占总移民的 50% 以上。爱尔兰和德国加起来(第 6 栏)通常占总移民的 65% 至 75%。这些年中仅仅这三个国家的移民比例就占了 79.4% 至 90% 以上。其余的移民大部分来自其他北欧国家。

表 6.6 1845—1860 年移民的比例

年份	(1) 大不列颠	(2) 爱尔兰	(3) 德国	(4) 其他国家	(5) 1 列 + 2 列	(6) 2 列 + 3 列	(7) 1 列 + 2 列 + 3 列
1845	16.8	39.2	30.1	13.9	56.0	69.3	86.1
1846	14.4	33.5	37.3	14.8	47.9	70.8	85.2
1847	9.9	44.9	31.6	13.6	54.8	76.5	86.4
1848	15.5	49.8	25.8	8.9	65.3	75.6	91.1
1849	18.6	53.7	20.3	7.4	72.3	74.0	92.6
1850	13.8	44.3	21.3	20.6	58.1	65.6	79.4
1851	13.6	58.3	19.1	9.0	71.9	77.4	91.0
1852	11.0	42.9	39.3	6.8	53.9	82.2	93.2
1853	10.2	44.1	38.5	7.2	54.3	82.6	92.8
1854	13.7	23.7	50.3	12.3	37.4	74.0	87.7
1855	23.7	24.7	35.8	15.8	48.4	60.5	84.2
1856	22.3	27.1	35.4	15.2	49.4	62.5	84.8
1857	23.3	21.6	36.5	18.6	44.9	58.1	81.4
1858	23.6	21.9	36.8	17.7	45.5	58.7	82.3
1859	21.6	29.0	34.5	14.9	50.6	63.5	85.1
1860	19.3	31.6	35.5	13.6	50.9	67.1	86.4

注:占总移民的百分比,1845—1860 年。

资料来源:Calculated from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d 106—113.

我们知道,殖民时期的白人人口大部分是讲英语和德语的(参见第 3 章),所以这些移民应该能够很好地融入美国。然而本土主义却发生了,19 世纪 50 年代,一个反奴隶、反天主教、反移民的“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一个秘密党派,其主要目的是阻止“外国人”获得政治权力——要求入美国籍必须先在美国居留 21 年。雷蒙德·科恩(Raymond Cohn)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移民潮于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下降趋势,与本土主义运动的兴起确实有关系。^⑦

^⑦ Raymond Cohn, "Nativism and the End of the Mass Migration of the 1840s and 1850s," *JEH*, June 2000. 罗伯特·福格尔在下列著作中强调了不可知论者的目标和第二次大觉醒的总日程, *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 (2000)。

19世纪50年代的争议中心是宗教。随着爱尔兰和德语莱茵地区人口的涌入,美国的新教将要被淹没在罗马天主教的海洋之中。当时有言论说这个国家将要陷入罗马军团之手。之后,当移民来源变成了意大利、希腊和东欧国家时,言论就变得更加种族主义。到那时,爱尔兰和德语移民的后人已经加入了要求限制南欧、东欧移民的美国原生白人行列。

2.2 费利的“杨基人”

约瑟夫·费利(Joseph Ferries)对这些移民的研究《现在是杨基人》(*Yankeys Now*)很有启发性。^⑧他将19世纪40年代抵达纽约市的客船记录与1850年和1860年联邦人口普查的时间表手稿联系起来,把一份包括2594名欧洲移民的样本与1850年和1860年人口普查中的本土居民进行比较。尽管移民样本中的所有人都是在纽约市登岸的,约2/3的人当时就去了别处。超过一半的人去了纽约、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就比例而言,移民比本土居民更倾向于住在城镇里。

在地理上,移民比本土居民更具有流动性:移民样本中约有70%的人在1850年和1860年人口普查之间改变了所居的郡,而本土居民中只有43%的人这样做了。就职业而言,移民也更具有流动性。就样本中的爱尔兰人和德国人而言,其流动性可以立即观察到。随着他们在美国时间的延长,他们的职业并无多大改变。在费利的样本中,英国和德国移民相对更具有向上的流动性,而爱尔兰移民则相对更具有向下的流动性。

随着时间流逝,移民也积累了财富。费利估算,新移民的财富每年平均增长约15%,在移民到美国的头20年内,其财富会随着时间一直增长。移居到西部各州特定的快速增长地区的移民比大多数其他移民的经济状况更好。尤其是定居在新兴西部城市如密尔沃基(Milwaukee)和圣路易斯的移民,到1860年,他们比留在东部的移民要富裕许多倍。^⑨

2.3 大西洋移民的来源

表6.5中的数据记录了19世纪的第一次来自欧洲的移民潮。之后还有更多的移民潮。在1815—1914年间,据估计有5000万人移居出了欧洲,而其中有3500万人目标是美国。为什么?布林里·托马斯(Brinley Thomas)在其《移民与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简要的解释,这一解释主要基于欧洲的人口增长、欧洲的职业与阶级刚性(“非竞争性群体”)以及在投资、建房、自由贸易、自由移民和外商投资等活动方面的18至20年的大循环周期。^⑩第16章将详细讨论这个假说的细节,但是现在值得暂停并考虑一下,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了第一个循环的构架。他列出了1914年之前四次主要大西洋移民潮;

^⑧ Joseph Ferrie, *Yankeys Now: Immigrants in the Antebellum United States, 1840—1860* (1997).

^⑨ 最近关于流动与财富出现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除了费雷之外,参见 Timothy Conley and David Galenson, "Nativity and Wealth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C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8, no. 2, June 1998; Steven Herscovici, "Migration and Economic Mo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8, no. 4, December 1998; and Thomas R. Walker, "Economic Opportunity on the Urban Frontier: Wealth and Nativity in Early San Francisco,"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7, no. 3, July 2000.

^⑩ Brinley Thomas, *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1954).

最后一次移民潮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结束。四次周期的时间,从低潮期到低潮期,是1844—1861年,1862—1877年,1879—1897年,1898—1914年。

可以这么说,欧洲的“推动”(灾荒)和美国的“拉动”(扩张的经济——回忆一下19世纪50年代美国土地销售的情况)的结合,加上欧洲人口的不断增长,造成了1844—1861年的移民浪潮。对欧洲来说,这意味着吃饭的嘴变少了。对美国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2.4 沃克和由塞尔丁-尼尔假说

这里我们再次提前简要涉及一下第16章的内容,经济学家、统计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弗朗西斯·沃克(Francis Walker)的假说。19世纪后期,沃克提出了一个假说,即在给定的美国条件下,人口增长率有一个最大值。因此,每个欧洲移民占据了一个原本可能是原生美国人的位置。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多一个欧洲移民,就意味着少了一个原生美国人。

保罗·由塞尔丁(Paul Uselding)反对这种看法,他提出了两点:(1)最大增长率从未存在,(2)每个欧洲移民都意味着将一定的资本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其数额基本等于将该人养育到移民年龄所需的成本。^①因为移民主要都是可以直接进入劳动力队伍的年轻男子,他们是欧洲给美国经济的“礼物”。美国没有付出成本,却获得了利益。

由塞尔丁将这种思想追溯到意大利统计学家阿格斯蒂诺·德维达(Agostino De Vita),他认为到1914年美国经济的巨大资本存量(capital stock)不过是抚养、供给食物、教育、运输这数百万欧洲移民的成本总和。大西洋移民就这样“解放了”美国的资源,使其可用来建设这些移民在这里工作所需的资本设备(capital equipment),使得美国经济走在了欧洲的前头。

由塞尔丁并没有接受德维达的大胆结论,而是利用了关于1839—1859年移民的已知数据,将这一基本思想用一些复杂的计量经济模型模拟出来。他的结论是,到1859年,移民导致的额外资本形成占GNP的5%—10%。拉里·尼尔(Larry Neal)参与了他的研究,在1972年,他们发表了一篇论文,计算了1790—1912年的数据,得出结论:在这个时期结束时,移民创造的额外资本存量占GNP的10%—20%。^②他们认为,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美国经济是因为有了移民而发展得更快。

但不是每个人都从中受益。费利的工作表明,19世纪50年代时移民的到来,尤其是爱尔兰移民,对本地的手工艺人有负面影响。这似乎是因为美国历史上移民最高潮时期恰好和工业化的开始时期相同:

尽管他们(爱尔兰人)的到来似乎导致了本地熟练工人的状态有所恶化,他们或许也有助于不太熟练的工人进入工厂,因为当雇主准备改变生产过程时他们正好可用。^③

^① Paul Uselding, "Conjectural Estimates of Gross Human Capital Inflow to the American Economy," *EEH*, Fall 1971.

^② Larry Neal and Paul Uselding, "Immigration, A Neglected Source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790—1912," *Oxford Economic Papers*, March 1972.

^③ Ferrie (1997), p. 208. 也参见第8章。

威廉·拉兹奥尼克(William Lazonick)和托马斯·布鲁士(Thomas Brush)认为,这些移民比原生美国人更容易被工头“驱赶”工作,导致更高的个人生产率。^②

罗伯特·高尔曼(Robert Gallman)对由塞尔丁-尼尔的工作进行了分析性研究,指出了一些看似合理之处,包括,截至1860年,北方各州约有35%的成年男性出生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他还指出,联邦军队中一半以上的人出生在国外)。^③高尔曼还为沃克的假说添加了一条额外说明:因为大部分移民停留在城市里,原生美国人向城镇地区迁移的速度就比原本可能的情况减慢了。因此,原生美国人的出生率也比原本可能的情况高(因为城镇的出生率比农村地区低得多),如果城镇增长的人口“位置”由原生美国人填补的话。

理查德·伊斯特林对沃克的假说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原生美国人的出生率下降更可能是因为边疆的结束、土地不再那么唾手可得、城市化的加速,而不是臆想的与欧洲移民的经济竞争。

我们将在考察随后的三次欧洲移民大潮之后,在第16章重新讨论这些假说。无论如何,根据由塞尔丁和尼尔,在1860年之前,移民对美国经济的正面影响已经非常强烈了。

2.5 截至1860年之前移民的归宿

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大部分1860年以前的欧洲移民去了北方各州。在1860年,总人口为3150万,有360万外国出生的白人生活在东北部和中北地区的东部,只有39.1万生活在南方。15.5万人生活在太平洋地区,其中6.4万人为“其他人种”,主要是中国人。表6.7列出了1850年和1860年各地区不同出生地的人各占的比例。当时,黑人主要在南方,从事农业,受到奴隶制的束缚。南方黑奴制的延续和那里欧洲移民的缺乏是否有联系呢?

表 6.7 出生于1850年和1860年的美国人口

人口分段	1850年			1860年		
	本土出生	国外出生	国外出生的比率	本土出生	国外出生	国外出生的比率
新英格兰	2 421 867	306 249	11.23%	2 665 953	469 330	14.97%
中大西洋	4 879 441	1 019 294	17.28	5 904 410	1 554 575	20.84
东北中部	3 972 423	550 837	12.18	5 729 688	1 197 196	17.28
西北中部	780 797	99 538	11.31	1 823 670	346 162	15.95
南大西洋	4 574 180	104 910	2.24	5 202 203	162 500	3.03
东南中部	3 313 901	49 370	1.47	3 919 056	101 935	2.54
西南中部	852 866	87 385	9.29	1 619 670	127 997	7.32
山区	68 732	4 195	5.75	150 716	24 207	13.84
太平洋	83 067	22 824	21.55	289 258	154 795	34.86
总计	20 947 274	2 244 602	9.68	27 304 624	4 138 697	13.16

资料来源: Calculated from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a 2244—6550.

^② William Lazonick and Thomas Brush, "The 'Horndal Effect' and Early U. S. Manufacturing," *EEH*, January 1985.

^③ Gallman (1977), p. 31. 这项估计基于 Lee Soltow, *Men and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870* (1975).

3. 白人劳役制的结束和黑人奴隶制的延续

欧洲移民的另一个功绩是加速了继承自殖民时期的白人契约劳役制(*servitude*)的消亡。在殖民时期结束时(1783),白人劳役制已经在与自由工资劳动的竞争中逐渐消亡。戴维·加林森(David Galenson)指出,在自由市场上,白人熟练工人通过谈判获得的工资比契约劳役制下获得的实际收入要高。^⑤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使得非自由的白人劳动力价格与黑奴相比比较高。因此白人契约劳动力的供给比黑人受到更多限制。白人劳役制消失了,黑人奴隶制却继续发展。

3.1 劳役制与竞争

1787年,在制定宪法的时候,白人劳役制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它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形式仍持续了几十年,主要用来将流浪汉和孤儿组织成具有生产力的单位,并加强贸易中的学徒制度。法利·格鲁伯(Farley Grubb)在对德国劳力移民(*redemptionner*,出卖劳力来抵偿船资之移民)的研究中认为,劳役制消失的时间在1820年左右。^⑥1816年,这个“没有夏天的年份”摧毁了欧洲的农业,之后的几年,劳役者的供应增加了;从1816年到1819年欧洲恢复好年景之前,每年都有300多人来到费城。1820年仅有20名契约劳役者到达,之后的十年则总共只有10名。这其中大多数是儿童。成人更容易通过家庭和在美国的朋友筹集旅费。

而且,法官们开始拒绝因为债务将某人投入监狱。如果合同在违反时已经是不可弥补的,那么合同就失去了其价值。通过谈判达成工资更加有效,尤其是长期的(最多一年),如果雇员提前解约,那么雇主就不用付出工资。^⑦这样的合同是比较依靠自我约束的。当然,旧的契约劳役制中的附属条件,如食宿、衣服、医药、贸易教育及契约到期时的工钱,对雇佣制的劳动力不再适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移民稳步增加,使得白人劳役制变得不再必要,于是它就渐渐消失了。

克里斯托弗·哈尼斯(Christopher Hanes)认为,随着契约劳役制的消失,转换成本(*turnover cost*)增加了,尤其是当雇主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其家庭不能长期提供时。当寻求工人的成本和关键时刻缺乏劳动力的成本变得特别高时,雇主们,尤其是南方种植园主,便倾向于采用奴隶制来减少这种成本。^⑧

3.2 对奴隶制的忧虑

伊莱·惠特尼在1793年发明了轧棉机,使得南方种植的短绒高地棉花变成了一个新的金矿,而南方的主要农业劳动力形式——奴隶制——也随着棉花种植而演化。我们

^⑤ David Galenson, "White Servitude and the Growth of Black Slavery in Colonial America," *JEH*, March 1981.

^⑥ Farley Grubb, "The End of European Immigrant Servitud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Market Collapse, 1772—1835," *JEH*, December 1994.

^⑦ Morton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1780—186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86.

^⑧ Christopher Hanes, "Turnover Cost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lave Labor in Anglo-America," *JEH*, June 1996.

将在第9章和第10章更加详细地论述这个话题。现在,让我们注意整体人口趋势的影响。对一个在1860年主要由欧洲人占据的国家而言,美国显得很特殊,甚至是独一无二,因为其总人口中有13%的人身陷于传统奴隶制(chattel slavery)之中。然而,只要是购买欧洲或美国棉花的地方,所有人在经济上都从这个奴隶制之中受益。

非洲人在美国被奴役的历史开始于1619年的詹姆斯敦,当时一艘荷兰军舰向殖民者出售了20名非洲囚犯。奴隶习俗就此开始发展。黑人奴隶必须终身为奴,他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是奴隶。到殖民时期结束时,美国面临的这个社会、政治和人道难题让最伟大的思想家也为难。1780年约有50万以上的奴隶,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南方,而出路仍不明朗。乔治·华盛顿于1794年谈及自己的蓄奴者身份时说:“如果当时不是因为我在原则上反对像在市场上出售牲口一样出售奴隶,我就不会在这个日期之后的12个月后拥有一个奴隶。”^⑨

在惠特尼发明轧棉机之前,南方有一种反对奴隶制的情绪,并且相信这种制度不会持续很久。旧的烟草种植区的衰落潜藏着奴隶劳动力过剩的危险。比种植烟草需要的劳动力少的多种经营在扩散。但是,也存在一种对任何变化的深层恐惧。直接地解放奴隶(除非像英国在1834年做的那样,由纳税人给予赔偿)意味着奴隶主将会受到严重的经济损失。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当时未经试验,也无法回答,即未来假如前奴隶和前奴隶主散居在一起,他们之间会有和平吗?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记事》(*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中表达了他的担忧:

白人的偏见根深蒂固;黑人对所受的苦难刻骨铭心;新的刺激;自然造成的真正差别;以及许多其他情况,将把我们分成不同的党派,造成永久不会平息的内乱,直到将某个种族灭绝……

他在别处所写的对奴隶制后果的恐惧甚至更加令人毛骨悚然,而这是他最常被人引用的一句话:“当我想起上帝是公正的,而他的正义不会永远沉睡,我为我的国家感到不寒而栗。”然而这种正义沉睡的时间比预想的要长,因为惠特尼的轧棉机将棉花文化带给了南方各州。

3.3 奴隶制的蔓延

棉花并没有平息恐惧,但它确实使南方的“特殊机构”变得极为有利可图。1784年,八包美国棉花在利物浦因虚假文件而被截获——每个人都知道在美国不可能种植商业数量的棉花!1792年,美国棉花出口量为13.8万磅;1794年为160万磅。到1800年,美国出口量为1800万磅,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形成。人们大量涌入新的棉花种植地,同时把奴隶制也带了过去。阿拉巴马、密西西比、西佐治亚、路易斯安那、东得克萨斯都开始种植棉花,同时开始使用奴隶制作为劳动形式。

尽管大部分南方白人并不拥有奴隶,但是南方各州的奴隶人口分布却是惊人地平均(参见表6.8)。这种增长在较新的地区更加剧烈。1860年,奴隶占南卡罗来纳和密西西

^⑨ 引自 Harold Woodman, ed., *Slavery and the Southern Economy: Sources and Reading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6), p. 3。

比人口的一半以上,占阿拉巴马、佐治亚和路易斯安那人口的40%以上。尽管蓄奴行为分布很广,但是实际上在19世纪60年代蓄奴比例在这些州有所下降,因为奴隶价格上升了。^②

表 6.8 1790—1860 年的南部奴隶人口

年份	弗吉尼亚	南卡 罗来纳	北卡 罗来纳	佐治亚	密西西比	阿拉巴马	路易斯 安那
1790	292.6	107.1	100.8	29.3	— ^a	—	—
1800	345.8	146.2	133.3	59.4	3.5	—	—
1810	392.5	196.4	168.8	105.2	17.1	—	34.7
1820	425.1	258.5	204.9	149.7	32.8	41.9	69.1
1830	469.8	315.4	245.6	217.5	65.7	117.5	109.6
1840	449.0	227.0	245.8	280.9	195.2	253.5	168.5
1850	472.5	385.0	288.5	381.7	309.9	342.8	244.8
1860	490.9	402.4	331.1	462.2	436.6	435.1	331.7

注:1790—1860年单位是千人。

^a 无数据。

资料来源:Harold D. Woodman, ed., *Slavery and the Southern Economy: Sources and Reading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6), table 2, p. 13.

3.4 法律和政治妥协

作为一种劳动力形式,美国奴隶制从未被当做可供效仿的范例。^③ 在第1章中,我们看到詹姆斯·肯特将其看做是一个法律问题。在法律上,奴隶仅仅是“物品或财产,而不是人,可以作为个人财产出售”。^④ 黑人奴隶制是历史的理性障碍,是杰斐逊和麦迪逊时代的国家伤痛。

到1860年时,奴隶制主要只是南方的问题,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在美国的每个角落都曾存在过奴隶制和奴隶。南方只是无法找到一个离开奴隶制的办法。现代美国人有时会觉得难以想象美国不到一个半世纪以前还是蓄奴社会。在北方,奴隶制的根基并不十分牢固,奴隶大部分被不同程度地解放了,而这个体系也消失了。在中部老殖民地,解放奴隶的进程比较缓慢,但到1860年时这个过程也基本完成了。随着南方越来越多的奴隶获得自由,北方的大部分州实行了驱逐黑人的法律,禁止被解放的奴隶定居,希望以此避免种族矛盾。

法庭遵循将权力保留给各州的原则,或多或少地继续强化奴隶习俗和法律,即是支持奴隶制的。在1857年的德莱德·斯科特判决中,法庭判决斯科特不可获得自由,斯科特是密苏里州的一个奴隶,其主人在19世纪30年代将他带到了威斯康星地区。最高法院指出,黑人不能起诉,因为他们不是公民,更加不幸的是,国会没有在威斯康星禁止奴

^② Gavin Wrigh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tton South: Household, Markets, and Weal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 pp. 34, 42.

^③ 参见 Stanley Elkins, *Slavery: A Problem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and Institutional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chap. 3, 与纳粹集中营进行了心理比较。

^④ James Kent, *Commentaries on American Law* (Boston: Little, Brown, 1873), chap. 1, fn. 12.

隶制的权力。由于缺乏这种权力,1787年《西北法令》和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中的条款实际上被否定了。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被推向了南北战争。政治体系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妥协,不仅在1820年,而且1850年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时以及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等都是政治妥协的表现。最后,妥协再也没用了。只有战争能解决问题。

3.5 奴隶制和欧洲移民

我们看到,美洲殖民地时期的两种非自由劳动体系最后走向了不同的命运。一种因为不经济而消亡,另一种却因为非常经济而蓬勃发展。随着移民劳动力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地大量涌入北方城市,自由工资劳动体系在北方兴盛起来。正如我们所见,欧洲移民在1860年之前很少到南方,可能是因为那里基本没有城市。学者们经常写道,移民们避免与奴隶劳动力竞争。更可能的是,进入了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他们会去寻找最容易得到、成本最低的工作。基本上,即是他们登陆的城市,或是现成的交通线沿岸的内陆地城市。

总体而言,欧洲移民避免将农业作为他们谋求好生活的途径。1860年之前,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够买得起土地。即使到了1910年,在外国出生的劳动力存量中,只有13%是在从事农业;87%选择了其他职业。当然,也很有可能,移民对奴隶劳动有一种原生美国人所不具备的厌恶之情,因此他们避开了存在奴隶制的地方,但是严格意义上说,这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考虑到1780年奴隶的数量、制定宪法的性质、法律制度的演变和奴隶人口的增长,很难想象会有足以使得奴隶制无利可图的大量欧洲移民自愿进入南方从事农业。即使在今天,如果不是非法的,奴隶制也未必显然是无利可图的。^⑨

4. 1860年之前美国社会的劳动力

到1860年时,美国劳动力,包括所有超过10岁的人,总数仅仅为1100多万,约占总人口的35%。其中约有79%(58%为自由民,21%为奴隶)从事农业。40年后,从事农业的比例将会下降一半。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兴起带来了这种变化,而且它还将继续。今天,初级生产(primary production)只占就业总量的不到1%,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则占了近70%。就就业而言,现代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于食物、商品生产(包括其交易)的效率提高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大部分劳动力和资本被“解放”出来从事其他职业。即使在1860年,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个过程的端倪。

4.1 莱博高特-维斯劳动力数据

我们在表6.9中提供的信息要归功于斯坦利·莱博高特(Stanley Lebergott)对劳动力数据的先驱工作和托马斯·维斯(Thomas Weiss)对该数据的仔细再加工。注意,农业就业量的增长率要低于总劳动力的增长;农业劳动力占总量的份额在下降。在19世纪

^⑨ 1982年1月,三个曾经担任农场工人的老板、雇用非法移民的男性,因拥有奴隶的指控而被判长期监禁。

50年代,制造业就业量的增长率(42.5%)要高于农业的(28.8%),但只比总劳动力的增长率(37.8%)高一点点。

表 6.9 1800—1860 年劳动力的分布

年份	总计	农业	非农业 (每千名雇员)	制造业	服务业	其他
1800	1 712	1 274	438	— ^a	—	—
1810	2 337	1 690	647	—	—	—
1820	3 150	2 249	901	—	—	—
1830	4 272	2 982	1 290	—	—	—
1840	5 778	3 882	1 896	513	1 037	346
1850	8 192	4 889	3 303	1 145	1 616	543
1860	11 290	6 299	4 991	1 632	2 632	727
比例						
1800	100	74.4	25.6	—	—	—
1810	100	72.3	27.7	—	—	—
1820	100	71.4	28.6	—	—	—
1830	100	69.8	30.2	—	—	—
1840	100	67.2	32.8	8.9	17.9	6.0
1850	100	59.7	40.3	14.0	19.7	6.6
1860	100	55.8	44.2	14.5	23.3	6.4

^a无数据。

资料来源:引自 Stanley Lebergott, *Manpower in Economic Growth: The American Record Since 1800*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p. 510; Thomas Weiss, "U. S. Labor Force Estimat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 Gallman and J. Wallis, eds.,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Before the Civil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 37, 51。

与之对应的是,在 19 世纪 40 年代,制造业就业量比其他任何部分增长得都要快(123.2%),其占总劳动力的份额从 8.9% 增加到了 14.0%。制造业就业量在 19 世纪 50 年代增长率相对下降的原因很可能反映了三个因素:(1) 该年代早期再次出现土地热,之后又出现了 1857 年恐慌和大萧条;(2) 随着数百万新移民涌入城市劳动力队伍,建筑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也在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快速发展;(3) 纺织业增势放缓,而重工业尚未开始大规模兴起(在 19 世纪 70 年代才开始兴起)。

服务业部门在 19 世纪 40 年代(55.8%)和 50 年代(62.9%)增长得较为迅速。这种增长的原因之一是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和贸易。这两个行业占服务业总量的份额在 19 世纪 40 年代是四分之一强,在 60 年代是三分之一强。另一个部门是建筑业、渔业、矿业的总和。在 1840 年到 1860 年之间,建筑业的就业人数增长了 79.3%;渔业增长了 29.2%;矿业则增长了 450%。矿业巨大增长的原因是美国制造业对铁和煤的需求增长了。

莱博高特认为,这种劳动力分布情况主要反映了对生产的国内需求,因为 1860 年之前,从事原棉(美国最主要的出口品)生产的人数最多时也只占了总劳动力队伍的 5%,

而所有出口品(包括棉花)的从业人数所占比例很可能也没有超过10%。^⑤和大多数19世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不同,美国对劳动力的需求由国内经济决定。这一趋势在南北战争之前就开始了,并一直持续到那个世纪的结束。

克劳迪娅·格尔丁(Claudia Goldin)和肯尼思·索科洛夫(Kenneth Sokoloff)进一步认为,最先开始工业化的地区是那些妇女和儿童的工资及其所生产的边际产品的价格,与成年男性相比相对较低的地区。^⑥他们指出,在北方的干草、小麦和奶制品产区,妇女儿童的相对生产率较低;而在南方种植园农业区,他们的生产率要高得多。东北部的妇女在“外发”(putting out)体系中较为活跃,格尔丁和索科洛夫将她们描述为“多余的”农业劳动力。在1810年前后,东北部的年轻女性(10岁至29岁)中参加计薪工作的比例非常小。在之后的20年中,随着手工作坊转变为小型工厂,这一比例在各地分别增加了10%到30%。到1832年,妇女和儿童占了东北部工业化劳动力的40%,但他们的收入一般是和家庭成员共享的。农场和手工作坊的“家庭经济”成为了“家庭工资经济”。^⑦一份1837年的马萨诸塞人口调查表明,该州赚取工资的妇女中几乎一半在从事芭蕉叶帽子和稻草软帽的生产,而这正是主要的“外发”行业。约1/6从事已经转移到工厂里的纺织品生产,1/7生产鞋具,而这直到19世纪50年代仍然是在家庭里生产的。^⑧

美国的第一家纺织厂是艾尔米和布朗公司(Almy and Brown)的,于1790年在罗德岛波塔基特开张。尽管这个工厂很小,但它为普罗维登斯-波塔基特地区成为纺织业中心之一奠定了基础。第一个大规模的新英格兰纺织城是马萨诸塞的洛厄尔(Lowell),由成功的商业公司波士顿的洛厄尔斯(Lowell's)所有。洛厄尔的第一家工厂位于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Waltham),是最先将纺纱与织布整合起来的工厂(也是第一个使用动力纺织机的)。这种整合产生了经济上的规模效应,尤其是在劳动力的利用上。此种劳动力主要是新英格兰的单身农场女孩,洛厄尔为她们建造了干净、整洁的宿舍。这些“洛厄尔女孩”的劳动也许对洛厄尔来说较为便宜,但是它所付的工资是高于她们在家中农场所能赚到的收入的。与之相反,罗德岛的工厂一般会雇用整个家庭。

李·克雷格和伊丽莎白·菲尔德-亨得利(Elizabeth Field-Hendry)对格尔丁-索科洛夫的假说进行了一些测试,获得了支持性的结果。他们指出,女性开始被雇用的行业,尤其是纺织业,是当时资本密集和机械化程度最高的行业。^⑨因此,女性的工资不仅如预期

^⑤ Stanley Lebergott, "Labor Force," in Lanc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72), p. 191; see also Stanley Lebergott, *Manpower in Economic Growth* (1964); and Thomas Weiss, "U. S. Labor Force Estimates and Economic Growth, 1800—1860," in Robert Gallman and John Wallis, eds.,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Before the Civil War* (1992).

^⑥ Claudia Goldin and Kenneth Sokoloff, "Women, Childre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Evidence from the Manufacturing Censuses," *JEH*, December 1982; and Claudia Goldin and Kenneth Sokoloff, "The Relative Productivity Hypothesi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American Case, 1820 to 1850," *QJE*, August 1984.

^⑦ 这些术语来自 Louise Tilly and Joan Scott, *Women, Work, and Famil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8).

^⑧ See Thomas Dublin, *Transforming Women's Work: New England Live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94), p. 20. Dublin对“洛厄尔女孩”的研究是对当时的一项确定性研究, *Women at Work: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and Community in Lowell, Massachusetts, 1826—1860* (1979).

^⑨ Lee Craig and Elizabeth Field-Hendry,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Earnings Gap: Regional and Sectoral Tests of the Goldin-Sokoloff Hypothesis," *EEH*, January 1993.

的那样“水涨船高”，而且其生产力也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在南北战争前夕，当工业化延伸到中西部时，不熟练的男性移民比本土女性更容易被雇用，在中西部和东北部都是如此。^④ 到1850年，在东北部的工业化劳动力队伍中，年轻女性和儿童仅占35%。克雷格和菲尔德-亨得利还指出，因为东北部的一些女性离开了农业劳动力队伍，继续从事农业的那些人的相对价值也提高了。随着主要人口的西进，东北部的农场向奶制品和果园制品转化，而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中，女性的相对价值较高。

4.2 早期劳工组织活动

在1860年之前，那些不拥有土地或其他不动产的人主要从事出卖劳动力的工作。当然，他们的市场在不断扩张，但大规模移民的存在意味着竞争也在加剧。就像其他卖家一样，他们也试图组织起来以谋求共同利益。^⑤ 在这方面，他们面临着许多障碍。

殖民地时期的美洲，劳动者主要是为自己、为亲戚或在劳役制下劳动。（记住，在殖民地经济时期，谁为其他人工作，谁为自己工作。）普通法主要是用来保护不动产和动产（chattel），尽管技术工匠也获得了相当坚实的社会基础。他们的技能被保护他们行业的特殊法律所承认，他们享有一个分布较为广泛的行业体系。但是在这些行业中，工人、师傅（雇主）、制造者甚至商人的角色是混杂在一起的。南北战争之前劳动人群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这些角色开始出现明确区分。^⑥ 这种变化出现在早期的纺织作坊和工厂中，尤其是更多的产品变成商品，不再仅为家庭自用。城市化的中心不断增多导致了专门化的零售商的广泛分布，他们从生产者甚至是批发商那里买进货物。

有记录的最早一次罢工活动是1741年纽约面包师罢工活动，那些拥有烘焙面包的器材和面粉的人拒绝烘焙面包并以市政府规定的价格出售。雇主和雇员的角色仍然是混杂的。1805年费城皮匠罢工（持续到1806年）是同一公会的计日工人（journeyman）反对师傅，1815年匹兹堡皮匠罢工也是如此。在这两个例子中，法庭根据普通法认为，计日工人组成正式的联盟反对师傅，是违法的阴谋。直到马萨诸塞州的康芒威尔斯诉亨特案（Commonwealth v. Hunt, 1842）中，违法阴谋的说法才因美国劳动法的自动适用而被抛弃。大法官莱缪尔·肖（Lemuel Shaw）裁定：

因此，我们认为，劳动者可能倾向于加入这样一些组织，组织目标是采取措施可能倾向于使另一方更贫穷，即减少他的收益和利润的措施，因此到目前为止是违法犯罪活动，目标可能是高度有价值的、具有公众精神的。^⑦

^④ 根据 James Bessen 的研究，到1842年，当洛厄尔地区每个工人织布机的数量从2个增加到3个时，与雇用临时的、有文化的杨基农场女孩相比，雇用当地居民，包括文盲和爱尔兰人，变得更加有利可图。James Bessen, "Technology and Learning by Factory Workers: The Stretch-Out at Lowell, 1842,"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3, no. 1, March 2003.

^⑤ 参见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1), chap. 3, 探讨了劳动组织活动的这类特征。

^⑥ Lawrence Peskin, *Manufacturing Revolution* (2003) discusses how "mechanics" of the colonial period split into "manufacturers" and "laborers" in the 1820s: "As the growth of manufacturing coalesced into industrialization, a recognizable working class finally emerged" (p. 218).

^⑦ Stephen Mueller, *Labor Law and Legislation* (Cincinnati: South-Western, 1949), p. 42.

试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工人的全国行业工会(National Trade Union),在1837年大恐慌之后消失了。早期的公会组织基本上是秘密社团的哄骗、政治煽动和合营经济体的混杂。到1860年,只有约5000名工人属于今天所称的工会(labor union),而这些工会通过集体行动来改善其成员生活的能力,就目前所知,可以说是零。虽然如此,组织活动仍然时不时地活跃起来;费城和纽约都有全市范围的行业工会委员会。竞争的思潮——“竞争是商业的生命”——与劳工组织做对,当时非农业劳动力队伍是如此之小。当马萨诸塞州林恩的男性制鞋匠于1860年罢工时,该行业的单身女性也组织了一个自己的工会。^④而且,早期的美国工会注定不能在相对缺少阶级分别的美国民主体系中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获得成功。最终,一个顽强的劳工组织,关注基本民生问题的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在1886年成功建立。

然而,19世纪早期各州先后实行了技工抵押法(mechanic lien laws),表明尽管有着殖民地背景,法律和社会总体上承认劳动中的产权是可能的。在殖民时期,技工(mechanic)这个词指生产货物的人,如木匠或织工。1826年詹姆斯·肯特(James Kent)这样描述技工抵押法:“现在这是通用的规则,即每个待雇的受托人,通过其劳动和技能为货物附加了额外的价值,因其合理的劳动他对该财产具有抵押权。”^⑤这种思想符合美国第七任总统杰克逊的政策,其出现预示着劳工权利之后获得的承认。

最后,随着美国地理扩张的继续,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劳动者们(除了奴隶和契约劳工)可以自由地从低工资的地区迁移到高工资的地区,或者到不断延伸的边疆去,那里新的定居点正在不断涌现。交通运输的改善(将在第8章详述)加速了这一过程,但是同工同酬(完美市场的特征)从未实现,即使现在也是如此。劳动力市场在19世纪早期并不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现在也不是。

4.3 教育

根据阿尔伯特·费希洛(Albert Fishlow),美国花在1860年之前的劳动力队伍上的教育成本占GNP的1%(今天这个比例约为7%)。^⑥到19世纪50年代,公立的普通学校在北方分布较为广泛,然而它们在南方的大部分地方还较为罕见。据莱博高特估算,即使到了1870年,北方的学龄儿童平均一年里只有三个月呆在教室。在另一方面,尽管教育是如此稀缺,似乎在美国教育仍然比在欧洲更容易获得。到1850年,美国总人口中平均有18%的人(包括各年龄)在某种学校里就学,实际上美国当时在这方面是世界第一。(德国第二,比例为16%。英国为12%。)在新英格兰,这一比例甚至更高。

内森·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在其《技术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强调了这种初级教育对南北战争前经济增长的特殊作用。^⑦需要的是技术,而不是科学,而普通学校似乎能够满足这一目的;至少,没有比它们更好的。事实上,莱博高特和罗森伯格都认

^④ Dublin (1994), p. 13.

^⑤ Kent (1873), vol. 2, p. 914.

^⑥ Albert Fishlow, "Levels of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JEH*, December 1966.

^⑦ 下列著作中提到的数据是 Richard Easterlin 的, Nathan Rosenberg, *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71), table 1。对普通学校教育效率的讨论,参见上书的第2章, "The Economic Matrix"。

为,19世纪早期美国工人和技师容易接受技术变更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较高的读写和计算能力,没有经济活动应该如何进行的成见。缺少“读、写、算”(the three Rs)之外的全面教育或许也有其优势。

5. 人口增长和整体经济发展

人口的快速增长既有利于人均真实产量的增长,也对其有妨碍作用。一方面,有更多的劳动力可以投入商品生产和提供服务,另一方面,消耗的人也变多了。不幸的是,尽管有一些优秀的学者进行了巧妙的探索,但已知数据还是太少,不足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5.1 早期增长的来源

长期阶段(1607—1860)被认为缺少后来的这种增长的来源,例如那些整体商业经济的动态核心领域的巨大工业创新。1860年之前的大部分时期,美国经济,除了小型工业部门,使用的是已知数百年的技术,分布地域广大但内部交通运输极为不便。确实,就像道格拉斯·诺思认为的那样,事实上存在三个单独的经济体:东北部、南部和西部。⁴⁸ 在这样的世界中,经济增长是怎么发生的?毫无疑问,人均产量在整个时期是增长的。既然农业最少到19世纪50年代还是最重要的部门,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难以回答了。

答案似乎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各地小型改进的总和。如果这个过程或多或少是持续的,更好的家畜血统、更适应土壤和气候的庄稼、资本的积累(每一代都比上一代有更多的生产工具)、甚至从贫瘠土地迁移到较好的土地也会带来经济增长。即使在同一片土地上,更多的定居者(如果地力没有衰竭)在一段时期内也能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因为树木被砍伐,岩石被清理,田地被扩大,沟渠被挖掘,道路被修筑,水运也被改善(如建造桥梁、渡船等)。

改善的组织,加上有效的结构(如殖民时期船只的掉头时间的改进)也可能增加人均产量。外部经济体也有作用,尽管它们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作用甚微。甚至更好的储存设施(例如谷仓和粮仓),减少了储存庄稼的损耗,因而也可以增加人均产量。这种早期的经济历史充满了类似的整体生产力增长的来源。制造业部门也有长足的进步,但它占整体经济的比例太小,难以形成真正重要的影响。

大多数学者同意,独立之后的头十年,最少到1790年,是个艰难的时期,经济净增长微乎其微。之后情况有所改善,但其具体情况学者们至今还有争议。保罗·戴维(Paul David)认为,1790—1860年,总体年增长率为强劲的1.3%左右。⁴⁹ 戴维说,到1840年,人

⁴⁸ Douglass North,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New York: W. W. Norton, 1966), chaps. 9—12; Richard Sutch, “Douglass North a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in Roger Ransom, Richard Sutch, and Gary Walton, eds., *Explorations in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Douglass C. Nor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chap. 2; and Lloyd Mercer, “The Antebellum Regional Trade Hypothesis: A Reexamination of Theory and Evidence,” in the same volume, chap. 4.

⁴⁹ Paul David, “The Growth of Real Product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1840: New Evidence, Controlled Conjectures,” *JEH*, June 1967, p. 155, table 1.

均真实产品已经比 1790 年水平多出 60%。然而,罗伯特·高尔曼认为戴维估算的增长率过高了。^⑤ 托马斯·维斯的科研成果支持高尔曼的观点。戴维的推测是基于莱博高特的劳动力数据。如果我们使用维斯的修正数据,增长率便降低到只有 1% 左右。^⑥

除了对更好的数据的追求之外,最重要的问题是 1790—1860 年间经济增长的方式,是缓慢但不断加速的增长,还是像戴维所认为的那样^⑦,经济的突然繁荣与萧条交替。

6. 截至 1860 年的收入与财富分配

关于殖民时代末期(参见第 3 章)到南北战争之前收入与财富的分配,只有一些片断性的资料。这一时期的外国访问者在评论中提到美国社会和政治上的平均主义(egalitarianism),认为这肯定来源于一个广泛存在的同等经济条件的共同基础之上。为什么不是呢?土地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在北方也是主要的财富形式,而土地是如此唾手可得。经济和空间上的快速扩张为各种形式的新冒险提供了丰富的机会。除了在蓄奴的南方,没有多少可能让一个财富持有阶层通过继承保持其地位。但是,我们看到,即使在殖民时期,财富还是不可避免地会集中。经济条件的平均更多地表现在礼仪、衣着等方面,而不是遗产记录上。收入的增长注定是要不平均地分配的。

阿塔克和贝特曼指出,在 1860 年,北方农村地区的财富分配比城市更加平均,比南方农村更加平均,比其本身之后的情况也更平均。^⑧ 他们认为,西进的移民中有很大部分是来自中等收入的农场家庭,他们在西进之前所持有的财富就已经是相当平均的了,他们似乎可以延续杰斐逊的理想:一个没有多大财富差别的强健的自耕农社会。然而,即使在北方农村地区,也存在不平均的分配现象。较为贫穷的农村家庭一般是由妇女、新移民、青少年和老人组成。南北战争之前美国乡村的理想画面可以如此总结:“在这个具有历史传统的平均主义社会,富有就意味着是中年的、本土所生的、识字的男性白人。”^⑨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均真实收入的增长也是相当可观的。我们已经看到,托马斯·维斯估算其增长率为年均 1%。1850 年之后,似乎增幅有所提高。罗伯特·马尔戈(Robert Margo)最近对于南北战争之前工资情况的研究表明,真实工资在 1820—1850 年间以几乎相同的速度增长,但是在 19 世纪 50 年代有所下降。^⑩

增长率在各地存在显著的不同。表 6.10 列出的是理查德·伊斯特林估算的各地

^⑤ Robert Gallman, "The Statistical Approach," in George Rogers Taylor and Lucius Ellsworth, eds., *Approaches to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1971).

^⑥ Weiss (1992).

^⑦ 正如我们以前提到的, Gloria Main 并没有找到证据,证明 18 世纪早期房地产数据的增长呈下降趋势。Gloria Main,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Colonial Massachusetts," *JEH*, March 1983.

^⑧ Atack and Bateman (1987), p. 269; and Jeremy Atack and Fred Bateman, "The 'Egalitarian Ideal'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the Northern Agricultural Community: A Backward Look," *REStat*, February 1981.

^⑨ Atack and Bateman (1987), p. 129. Donghyu Yang 发现在南方“自耕农阶层的土地所有者”比“北方贫穷得多”。Donghyu Yang, "Notes on the Wealth Distribution of Farm Household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0: A New Look at Two Manuscript Census Samples," *EEH*, January 1984, p. 99.

^⑩ Robert Margo, *Wages & Labor Mark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0—1860* (2000), pp. 142—143.

区收入水平。这些估算没有根据各地区生活成本的不同而进行调整。马尔戈的研究表明,工人向西(那里人均个人收入比平均水平要低)迁移的原因之一是最初边疆地区的真实工资比东海岸要高。^⑤

表 6.10 地区人均个人收入占全国平均收入的百分比

地区	1840 年	1860 年
新英格兰	132	143
中大西洋	136	137
东北中部	67	69
西北中部	75	66
南大西洋	70	65
东南中部	73	68
西南中部	144	115
全美	100	100

资料来源:Richard Easterlin, "Regional Income Trends, 1840—1850," in Seymour Harris, ed.,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61). 由 McGraw-Hill 图书公司授权再版。

这些年来,这些数据被基于各种目的进行分析和解释。^⑥ 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新英格兰地区在 1840—1860 年间比其他地区增长得快得多,中大西洋地区和中北地区的西部各州也比其他地区略快。中南地区的西部在 1840 年和 1860 年的人均收入都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但 1860 年时高的已经不是那么显著。而且,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各州在 1860 年时,其人均收入和收入增长速度都高于中南地区的西部。旧南方和较新的高原 (high plains) 地区各州在 1840 年时是较贫穷的地区,在 1860 年时,它们相对来说更穷了。南方的有些部分,即最好的棉花种植区,是例外,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论述这一点。这里的要点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地区性差异很可能会导致整体收入分配的不平均——新英格兰的中等收入家庭会比南大西洋地区的中等家庭有更高的货币收入。现有的证据表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在 1860 年时都比殖民时代末期更加不平均了。

南北战争之前的大多数年代的收入分配数据都非常有限,但是学者们凭借其聪明才智还是从现有数据中挖掘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尤其是罗伯特·马尔戈对工资情况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财富分配中不断增多的不平等性,而对后者我们已知的数据要稍微多一些。

马尔戈指出,在 1820 年到南北战争之前的时期,“工资结构中白领工人的比例增多了,也存在真实工资的停滞时期,与这个年代(19 世纪 50 年代)相联系的是一股移民的浪潮和对贫困救济的日益依赖,而这部分地是由不熟练工人的真实工资下跌所引起。”^⑦ 他所研究的所有群体的真实工资就整个时期而言都是上升的,如表 6.11 所示。从表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整体是上升的,在 19 世纪 50 年代是下降的。表中显示了职业间的差异,职员这种白领、受过教育的群体,增长幅度最高。表中也显示了地区性的差异,尤其是,

^⑤ Margo (2000), pp. 100—102.

^⑥ 参见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e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pp. 333—338.

^⑦ Margo (2000), p. 158.

中西部和南大西洋地区的工匠的真实工资在整个时期基本没什么变化,不过在移民和国内迁徙的背景之下,这样的结果并不太令人惊奇。

表 6.11 真实工资指数:1821—1860 年

	东北部	中西部	南大西洋	南中部
一般劳动				
1821—1830	73.4	85.0	85.8	79.6
1831—1840	77.2	90.7	76.1	82.0
1841—1850	116.5	114.8	101.8	104.9
1851—1860	100.0	100.0	100.0	100.0
工匠				
1821—1830	75.0	104.2	97.8	85.9
1831—1840	80.4	99.0	98.9	91.3
1841—1850	107.1	104.0	122.1	114.8
1851—1860	100.0	100.0	100.0	100.0
职员				
1821—1830	66.4	85.3	78.5	72.7
1831—1840	70.5	76.3	83.5	80.6
1841—1850	106.6	124.7	126.8	120.3
1851—1860	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Robert Margo, *Wages & Labor Marke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0—186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p. 71—73.

工匠的真实工资不如普通劳动者增长得那么快,这和劳动者从手工作坊转移到工厂的趋势是一致的。随着国内贸易的增长——工厂体系的结果是生产的增长;交通运输网络的扩张,包括运河和铁路,其结果是分配的增长——对职员(记录员和设备管理员)的需求开始超过供给。即使其他条件是平均的,这种真实工资变化的模式也会导致财富分配更加不平均。

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Williamson)和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rt)发现,截至1860年,财富分配是趋向于更不平均的(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最为强烈)。^⑤例如,根据爱丽丝·琼斯的数据,1774年,拥有财富最多的10%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占全部财富的不到50%。^⑥威廉姆森和林德特发现,在1860年,拥有财富最多的10%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占全部财富的比例增加到了70%多。威廉姆森和林德特检查了这种财富分配的巨大转变的可能性,但是发现,这不是“幻象”。数据误差不可能造成这么大的变化。

^⑤ Jeffrey Williamson and Peter Lindert, “Three Centuries of American Inequality,” *REH*, 1976.

^⑥ Alice Hanson Jones, *Wealth of a Nation to Be: The American Colonies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59, table 8.1. 1998年国际经济史大会两篇文章证实了更早期时期的发现。参见Martin Shanahan and Margaret Corell, “How Much More Unequal? Consistent Estimat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1774 and 1860,” and John A. James and Mark Thom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Wage Inequa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Urban America,” both in *Journal of Income Distribution*, vol. 9, no. 1, Spring 2000.

而且,一个简单的原因也不能解释这种现象。他们考虑了数个卓越的财富分配解释学说,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其中的三个解释。但他们认为这些解释都不能令人信服。

第一个是相对收入移动说,这是由马尔戈的研究成果暗示的。财富是随着时间积累的净储蓄。马尔戈的数据表明,1860年以前,在其他情况一样的条件下,不熟练的(也就意味着低收入的)家庭与情况更好的家庭相比,更少(按比例来说)有机会从储蓄中积累起财富。为什么?例如,随着真实收入的提高,花费在食物上的比例就降低了。因为富有者将更高比例的收入花费在机器制造的产品上,而这些产品的相对价格又降低了,那么这个群体就更有可能积累起财富。^①

第二个解释是,美国人的平均年龄增高,因此到1860年就有更高比例的人年纪足够大到积累起财富(1820年,男性年龄中位数是16.6岁,1860年是19.8岁)。威廉姆森和林德特对这个解释和以下第三个解释都不能接受。第三个解释是,城市化导致了租金(rent)——超过竞争选择的收入——的上涨,人口集中在小量的土地上,而城市的土地的持有情况一直都不是很平均的。1860年,财富分配最不平均的地方是城市,然后是南方农村,然后是其他地方的农村。^② 平均来说,农场主是1860年最富有的美国人。在南方,从1790年到1860年,财富趋向于集中,更小比例的家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奴隶——财富的主要形式。

但是,必须承认,这些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因为财富集中的趋势在南北战争之后停止了。^③ 移民趋势也不能解释这种现象,正如李·索尔托(Lee Soltow)指出的那样。^④

毫无疑问,只要还存在足够的财富,不平均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是与经济的高速增长相联系的。^⑤ 因此,1860年之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趋势符合这个国家的主要利益:发展与增长。弗朗西斯·特洛普夫人,一位不太喜欢美国的法国女性游客,在1829年对辛辛那提的市民作出了如下的观察评论:

一些本土的政治经济学家断言,能将猛兽出没之地如此迅速地转变为一个繁荣的城市,是因为他们拥有自由的政治体制……而我认为有一个更加明显的原因:在这个国家,必需品的需求不断刺激工业发展,懒惰的人一无所有。在我居住在辛辛那提及附近的近两年中,我从未见过一个乞丐,从未见过一个有足够财产的人停止对增加财富的追求;这个蜂巢的每只蜜蜂都在积极地寻找蜂蜜……用粗俗的话说,

^① Robert Margo and Georgia Villaflor, "The Growth of Wages in Antebellum America: New Evidence," *JEH*, December 1987, pp. 883—884, 895, 认为他们的工资数据并不支持这种主张。作者们证明在独立战争前技能工资增长了约33%,而非技能工资增长了48%。

^② 近期一场讨论会检验了随着各类公共救济形式的出现,这种不公平性的一个后果。参见 Kyle Kauffman, ed., "Before the Welfare State: Learning from Early Experiments with Public Relief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37, no. 2, Summer 1997, 尤其是 Lynne Kiesling 和 Robert Margo 合作作出的贡献,以及由 Joan Hannon 对贫困家庭增长所作的案例研究。

^③ Williamson and Lindert (1976), pp. 77, 83.

^④ Soltow (1975), pp. 107, 145. 1860年之后,较之1860年以前,财富在非本土出生的人的分布稍有所公平。大规模移民本身并未加剧不平等。还可参见 Lee Soltow, "Inequalities in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1798—1875," in Robert Gallman and John Wallis (1992); Margo (2000), pp. 19—22.

^⑤ Simon Kuznets, *Six Lectures o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p. 55. 随着工业化的进行,收入分配的趋势是越来越公平。美国同样如此,后面我们将会看到。

就是钱；艺术、科学、学习甚至娱乐都不能引诱他们停止这种追逐。^{⑥⑦}

美国人想要经济增长。因为能力并不是平均分配的，运气是随机的，不平均的报酬也就并不令人惊奇，在这个国家没有什么税收和财富再分配的机制。似乎还有一些间接的证据表明，南北战争之前分配的日益不平均还有另外一个来源：生理学数据。

6.1 身高证据

显然，我们通常的总收入数据指标是和人口普查的年份相联系的。因为这些指标直到20世纪才发展出来，经济历史学家只能估算数据，如在有合适数据的时候（如来自人口普查的数据）估算人均个人收入及其分配情况。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另一种数据来源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的画卷。一系列研究表明，人体测量指标，尤其是身高，与收入和财富分配指标高度（正）相关。^⑧

例如，因缺乏营养而导致身高差异为收入不平均提供了一个指标。如果人口中的所有阶层对所有的营养及其作用的信息拥有同等的获得途径，那么，其他条件都相同的话，我们可以认为，营养不良是由于收入限制了其在营养方面的花费。也就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人们不会自愿让自己有任何程度的营养不良——我们可以假定在南北战争之前的穷人中并不存在减肥节食的风气。当然，收入并不是影响身高的唯一因素。理查德·斯特凯尔（Richard Steckel）指出了其他一些因素：

个人卫生、公共健康指标和环境会影响疾病，工作强度是技术、文化和劳工组织指标的函数。而且，食物的相对价格、文化价值如家庭内食物分配的模式、食物的烹饪手段、对食物的口味偏好等也可能和净营养相关。^⑨

我们在第一部分中看到，殖民时期的经济是缓慢而稳定地增长。而身高证据与这一情况一致。出生在1720—1740年间的人，成年人平均身高相对稳定，约为171.5厘米，但是18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要高出约1厘米。1780—1830年间出生的人相对稳定在173厘米左右。^⑩这和当代人的身高非常接近。而且，每千人死亡率在1850年时跌到了23（1700年是40）。^⑪通常这种改善被归功于这个国家占主体的农村人口的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健康的饮食、传染病风险的降低和唾手可得的土地）。

然而之后身高却降低了（参见图6.1）。约翰·卡姆罗斯（John Komlos）将之称为“战

^{⑥⑦} Frances Trollope, *Domestic Manners of Americans*, edited by Donald Smalle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9), p. 43.

^⑧ 除了身高，其他变量如体质指数（体重公斤数与身高米数的比率的平方）和骨骼的长度，仍然用于衡量生活水平。参见 Robert Fogel, *The Escape from Hunger and Premature Death, 1700—21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and Richard Steckel and Jerome Rose, eds., *The Backbone of History: Health and Nutrition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这种观点的简介表达可参见 Richard Steckel, “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Skeletons That Might Interest Economists, Historians, and Other Social Scientis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3, no. 2, May 2003。

^⑨ Richard Steckel, “Stature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JEL*, December 1995, is an excellent summary of this research; the citation can be found on p. 1911.

^⑩ Dora Costa and Richard Steckel, “Long-Term Trends in Health, Welfa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Richard Steckel and Roderick Floud, eds., *Health and Welfare During Industrialization* (1995)。

^⑪ Fogel (1986), p. 440.

前之谜”。这是一个谜,因为“1830—1860 年间,人均产量增加了 50% 左右,很难想象营养状况会下降”。^① 而且,1820—1860 年间出生的人,其平均预期寿命也下降了。^② 罗伯特·福格尔指出,虽然这些年里平均食物消耗(总营养)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平均营养摄取(净营养)很可能下跌了。福格尔认为其原因是:因为疟疾的蔓延和痢疾的增多,人们对食物的要求提高了。^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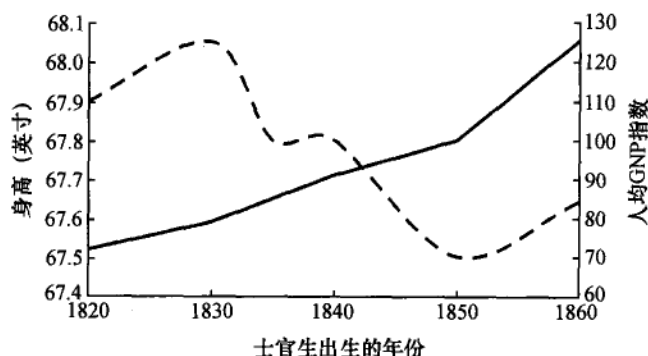


图 6.1

资料来源: Thomas Weiss, “Economic Growth Before 1860: Revised Conjectures,” in D. Schaefer and T. Weiss, ed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table 1.6; and John Komlos, “The Height and Weight of West Point Cadets: Dietary Change in Antebellum 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December 1987.

卡姆斯罗斯比较了西点军校和哈佛的学生,发现西点军校的学生中,出生于 19 世纪 50 年代的比出生于 20 年代的矮 3.5 厘米左右,只有约 5 英尺 5 英寸高。而且,50 年代的西点军校学生体重也较轻,许多人只有 100 到 120 磅。同时代的哈佛学生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特点,身高和体重都没有减少。^④ 罗伯特·高尔曼对卡姆斯罗斯的解释提出了严肃的质疑。^⑤ 他指出,在南北战争期间,西点军校中南方学生很少,而南方人平均身高比其他美国人高。卡姆斯罗斯认为南北战争之前的时期,食物价格上涨了 20% 到 40%,这是身高下降的可能原因。尤其是,普通家庭用廉价的食物代替较贵的食物,特别是动物蛋白质;而哈佛学生的家长显然没有作出这种代替。

最近,米切尔·海尼斯(Michael Haines)、李·克雷格和托马斯·维斯使用了人口普查和征兵的记录来检测战前成年人身高是否和其儿童时期各地营养品的生产呈正相关,和各地的死亡率、城市化程度、离交通工具的距离、人口流动性呈负相关。结果表明,“战前之谜”确实是一个现象。移民的增加和内部人口流动性的增加(我们已在本章中讨论过这一点)、运输成本下降带来的市场的活跃、城市化程度的增加(将在第 8 章中讨论)等

^① John Komlos, “Anomalies in Economic History: Toward a Resolution of the ‘Antebellum Puzzle,’ ” *JEH*, March 1996, p. 202.

^② Fogel (1986), p. 466.

^③ Fogel (2000), pp. 164—165.

^④ John Komlos, “The Height and Weight of West Point Cadets: Dietary Change in Antebellum America,” *JEH*, December 1987.

^⑤ Robert Gallman, “Dietary Change in Antebellum America,” *JEH*, March 1996.

因素,将疾病传播的范围扩散到全国,甚至全世界。^⑥

高尔曼和约翰·沃利斯指出,身高是唯一暗示着个人收入和财富下降的证据,这是一个谜。^⑦然而卡姆罗斯仍然相信这和日益增加的不平均有联系:“‘战前之谜’意味着……在现代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并非人类存在的各个方面都在一致地取得进步。”^⑧

推荐阅读

文章

Adams, Donald R. "Earnings and Saving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7, no. 2, April 1980.

Anderson, Terry L. "Economic Growth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Statistical Renaiss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9, no. 1, March 1979.

Atack, Jeremy, and Fred Bateman. "The 'Egalitarian Ideal'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the Northern Agricultural Community: A Backward Look."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63, no. 1, February 1981.

Ball, Duane, and Gary Walt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Change in Eighteenth-Century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6, no. 1, March 1976.

Craig, Lee, and Elizabeth Field-Hendry.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Earnings Gap: Regional and Sectoral Tests of the Goldin-Sokoloff Hypothesi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0, no. 1, January 1993.

Cohn, Raymond. "Nativism and the End of the Mass Migration of the 1840s and 1850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0, no. 2, June 2000.

Costa, Dora, and Richard Steckel. "Long-Term Trends in Health, Welfa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Richard Steckel and Roderick Floud, eds., *Health and Welfare During Industrial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Crowther, Simeon J. "Urban Growth in the Mid-Atlantic States, 1785—185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6, no. 3, September 1976.

David, Paul. "The Growth of Real Product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1840: New Evidence, Controlled Conjectur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6, no. 2, June 1967.

Easterlin, Richard A. "Influences in European Overseas Emigration Before World War I."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9, no. 3, April 1961.

———.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In Lance 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⑥ 他们的研究也表明在独立战争前的时期,营养状况恶化了。Michael Haines, Lee Craig, and Thomas Weiss, "The Short and the Dead," *JEH*, June 2003.

^⑦ Robert Gallman and John Wallis, "Introduction," in Robert Gallman and John Wallis (1992), pp. 12—16. Margo (2000), p. 152, 说明了在 1850 年代真实工资出现了短期的逆行,可能能够解释这个谜。

^⑧ Komlos (1996), p. 212.

——. "Population Change and Farm Settlement in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6, no. 1, March 1976.

Egnai, Marc.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hirteen Continental Colonies, 1720—1775."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 32, 3rd series, April 1975.

Fishlow, Albert. "The Common School Revival: Fact or Fancy?" In Henry Rosovsky, ed., *Industrialization in Two Systems*. New York: John Wiley, 1966.

——. "Levels of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6, no. 4, December 1966.

Fogel, Robert William, "Nutrition and the Decline in Mortality Since 1700: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In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eds.,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NBER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vol. 5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Galenson, David W. "White Servitude and the Growth of Black Slavery in Colonial 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1, March 1981.

Gallman, Robert. "The Statistical Approach." In George Rogers Taylor and Lucius Ellsworth, eds., *Approaches to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1.

——. "The Pace and Pattern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In Lance 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The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 "Human Capital in the First 80 Years of the Republic: How Much Did America Owe the Rest of the Worl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7, no. 1, February 1977.

——. "Dietary Change in Antebellum 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6, no. 1, March 1996.

Goldin, Claudia, and Kenneth Sokoloff. "Women, Childre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Evidence from the Manufacturing Census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2, no. 4, December 1982.

——. "The Relative Productivity Hypothesi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American Case, 1820 to 185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99, no. 3, August 1984.

Grubb, Farley. "The End of European Immigrant Servitud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Market Collapse, 1772—1835."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4, no. 4, December 1994.

Haines, Michael R., and Barbara A. Anderson. "New Dem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te 19th-Century United Stat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5, no. 4, October 1988.

Haines, Michael R., Lee Craig, and Thomas Weiss. "The Short and the Dead: Nutrition, Mortality, and the 'Antebellum Puzzle'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3, no. 2, June 2003.

Hanes, Christopher. "Turnover Cost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lave Labor in Anglo-Ameri-

c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6, no. 2, June 1996.

Komlos, John. "The Height and Weight of West Point Cadets: Dietary Change in Antebellum 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7, no. 4, December 1987.

———. "Anomalies in Economic History: Toward a Resolution of the 'Antebellum Puzzl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6, no. 1, March 1996.

Kulikoff, Ala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hesapeake Colon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9, no. 1, March 1979.

Lazonick, William, and Thomas Brush. "The 'Horndal Effect' and Early U. S. Manufacturing."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2, no. 1, January 1985.

Lebergott, Stanley. "Labor Force." In Lance 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Leet, Don R.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Antebellum Ohio."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6, no. 2, June 1976.

Lindstrom, Diane.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Before 1840: New Evidence and New Direc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9, no. 1, March 1979.

Main, Gloria L.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Colonial Massachuset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3, no. 1, March 1983.

Margo, Robert A. "Wages and Prices During the Antebellum Period: A Survey and New Evidence." In Robert Gallman and John Wallis, eds.,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Before the Civil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Margo, Robert A., and Georgia C. Villaflor. "The Growth of Wages in Antebellum America: New Evid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7, no. 4, December 1987.

Neal, Larry, and Paul Uselding. "Immigration, A Neglected Source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790 to 1912."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nd series, vol. 24, March 1972.

Potter, J.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in America, 1700—1860." In D. V. Glass and D. E. C. 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New York: Aldine, 1965.

Shapiro, Morton Owen. "A Land Availability Model of Fertility Changes in the Rural Northern United States, 1760—187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2, no. 3, September 1982.

Soltow, Lee. "Economic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eriod from 1790 to 18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1, no. 4, December 1971.

———. "Inequalities in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1798—1875." In Robert Gallman and John Wallis, eds.,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Before the Civil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Steckel, Richard H. "Antebellum Southern White Fertility: A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0, no. 2, June 1980.

———. "Stature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3, no. 4, December 1995.

Taylor, George Rogers.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Before 1840: An Exploratory Essa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4, no. 4, December 1964.

Uselding, Paul. "Conjectural Estimates of Gross Human Capital Inflow to the American Econom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9, Fall 1971.

Weiss, Thomas. "U. S. Labor Force Estimates and Economic Growth, 1800—1860." In Robert Gallman and John Wallis, eds.,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Before the Civil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Williamson, Jeffrey. "American Prices and Urban Inequality Since 182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6, no. 2, June 1976.

Williamson, Jeffrey, and Peter Lindert. "Three Centuries of American Inequality."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 1976.

Yang, Donghyu. "Notes on the Wealth Distribution of Farm Household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0: A New Look at Two Manuscript Census Sampl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1, no. 1, January 1984.

书籍

Atack, Jeremy, and Fred Bateman. *To Their Own Soil: Agriculture in the Antebellum North*.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Coale, Ansley J., and Melvin Zelnik. *New Estimates of Fertility and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Craig, Lee A. *To Sow One Acre More: Childbearing and Farm Productivity in the Antebellum Nort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Dublin, Thomas. *Women at Work: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and Community in Lowell, Massachusetts, 1826—18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 *Transforming Women's Work: New England Live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Ferrie, Joseph P. *Yankees Now: Immigrants in the Antebellum United States, 1840—18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Fogel, Robert. *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Fogel, Robert, and Stanley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vol. 1.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Gallman, Robert E., and John Joseph Wallis, eds.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Before the Civil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Handlin, Oscar. *Boston's Immigrants, 1790—188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Lebergott, Stanley. *Manpower in Economic Growth: The American Record Since 1800*.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Margo, Robert A. *Wages & Labor Mark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0—186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eskin, Lawrence A. *Manufacturing Revolution: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Early American Indust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Rosenberg, Nathan. *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Harper, 1972.

Soltow, Lee. *Men and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87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Thomas, Brinley. *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Yasuba, Yasukichi. *Birth Rates of the Whit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800—1860: An Economic Stud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第 7 章

法律与美国古典资本主义的兴起

美国拥有一部成文的宪法,很难修改,反映社会、法律和经济变化的法律可以据此得到衡量。这导致了法律制定和司法审核的过程常出现为了让法律“适合”而“缝缝补补”的情况。学习美国经济史的学生必须学会抓住美国法律史中相关的主要进步和转折,因为每一条进入美国生活的法律最终都经过了法庭的审核。美国社会的变化需要法律随之而变,而这会在法庭上得到确定。法律这个大话题在长时间的间断之后,最近被承认为理解历史和经济的一种工具。过去,经济历史很少涉及本章的内容。然而,近些年来,法律和公共选择的过程开始走入前台。这里,我们只能简要概述一下从殖民时期到 1860 年法律演变的情况。^①

19 世纪的经济奇迹之一就是美国古典资本主义及其各种形式的出现:庞大的巨型企业、集中在巨型制造中心的工业化劳动力、农业和采掘业的完全商业化、巨型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体系的兴起。^② 19 世纪之初杰斐逊和麦迪逊的小小田园世界在世纪末时变成了摩根、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美国钢铁大亨)的世界,还有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尤金·V. 德布斯(Eugene V. Debs)、州际商务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以及《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不可思议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不可思议的变化。经济历史的责任就是去解释这种变化,而法律就是这种解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尽管美国古典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晚期才全面兴起,但其基础在 1860 年已经发展得相当好。无论我们是否赞同 19 世纪的美国资本主义,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必须理解它。今天我们的生活仍然有它的影响。今天公共经济学和政策制定中的大部分语言和意识形态——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都在 1914 年以前就已起源。在独立之后的头数十年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将殖民地美国送进了古典资本主义的温床。

1. 殖民地时期的财产权利遗存

尽管美国人宣称的财产权利的定义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殖民时期建立的基本观念并没有受到独立战争的触动(除了长子继承制和永久限定继承制的废除)。正是从这些

^① 如欲进一步研究,可参见 Harry Scheiber 的文章,他是在经济史中运用法律分析的先锋,这方面的领先学者;以及 Herbert Hovenkamp 的书(1991),他是对于经济史有见解的法律学者。

^② Stuart Bruchey 强调,这些成果也得益于独立战争对社会的某些影响:在殖民时期隐藏着的、忠诚于英国王室的土地与商业财富精英,在战争结束时被推翻了,成千上万的人被放逐。Stuart Bruche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 Earlier America," *JEH* (1819), 651.

财产权利中发展出了现代美国经济。正如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在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Dartmouth College v. Woodward)中所说:“毫无疑问,非常明显,所有和财产有关的合同都不受独立战争的任何影响。”^③

美国独立战争反对的不是法律,而是一个特定的外来政权。美国人并不打算扔掉习惯法系。次优选择是大陆法(civil law),尤其是法国的法律系统,正如内奥米·拉穆鲁(Naomi Lamoreaux)和琼-劳伦特·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最近论证的那样,至少在工业革命中,大陆法系像习惯法系一样对商业的需求有积极的回应。^④

2. 不动产权利

尽管对不动产的经营最初是在具有封建结构的小型农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它却表现出卓越的灵活性,可以满足现代资本主义的变化需求。第1章中讨论过从英国转移到这里的不动产经营的基本性质。对购买者,或佃租(socage,以下称为无限继承权)的继承者来说,其所有权存在五个重要特征:

(1) 通过购买得到的所有权,其期限在理论上是永久的,只要对“捐赠者”(donor)应付的责任(税)都得到满足。

(2) 购买者和出售者的权利都是“确定以及肯定的”(fixed and certain)。

(3) 土地可以通过遗嘱或继承从上一代人传给继承人。继承是直接的:财产权利无需交回给捐赠者并重新获得授予。

(4) 所有权包括了地表和地下的资源,并享有利用(浪费)这些资源的完全权利。国王享有贵金属的1/5的保留权利在美国的实践中消失了。

(5) 权利可以完全转让——通过销售或交换——保留权利(矿产)必须是明确的、有限的。

除了无主的公共土地外,政府没有其他剩余权利,只有“政策权力”和征税权,而这些权力是由各州和地方政府(不是联邦政府)持有的。政府宣布对财产使用征用权的权力基本上是独立战争之后美国的一个创新,这不是对捐赠者权利的重申,而是对政府主权的强调,即政府有权将财产(一般是土地)强制购买(有时是没收)。

这种形式的所有权几乎就是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的理想基础。所有和财产及其产品有关的经济活动的报酬都是“商品”,意味着它们易于购买和出售,没有什么重大的限制。财产可以租赁、出租、根据小佃农合同出租、细分或和其他财产合并。水和矿产权利可以分别单独持有。所有这些自由都是任何人用购买价格可以得到的财产权利。难以想象个人还有一个上级的保有期。唯一的弱点(对所有者来说)是,如果不缴税,捐赠者有权“再次进入”(没收权)。从另一方面说,这个条件为美国地方政府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税收基础,因为发展和人口增长要求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无论如何,只要民选政府

^③ 4 Wheaton 518 (1819), 651.

^④ Naomi Lamoreaux and Jean-Laurent Rosenthal, "Legal Regime and Contractual Flexibility: A Comparison of Business's Organizational Choices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Era of Industrialization," *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 Review*, vol. 7, no. 1, Spring 2005.

征收的赋税数量是合理的,这不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障碍。

随着美国的边疆因定居和耕作范围的扩大不断扩展,美国的土地所有制愈发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完美载体。随着基于矿产采掘的重工业的来临,这个土地所有制让幸运的获得金、银、铜、煤、油、铁矿及其他资源的人得到(可能是丰厚的)回报,就像土地所有者、农场主、林业利益者长久以来都能得到回报一样。不奇怪的是,对不动产的这种开发利用所得到的收入和财富不是平均分配的,因为这些矿产在自然界就不是在土壤中均匀分布的。私人拥有土地,控制它,开发它,这种财产权利就是美国古典资本主义的基础:个人可以对其财产作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并享受其成果,这种权利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弘扬个人利益的体系,而土地所有制完美地适合这种体系。

3. 基本法律发展

宪法是法律的基本框架。对这些基本规则的日常解释和运用,对这些法律的实际内容的制定,是立法机关和法庭的事情。我们从英国习惯法体系中继承了法官造法(judge-made law)的体系。直到今天,在理论上,只有在法庭上得到解释的法律条款才是真正的“法律”。因此,尽管美国按照制定的成文法和成文宪法行事,美国还是被称为习惯法系的国家。美国政府三权分立,司法部门拥有独力的权力,这是对习惯法原则的承认和加强。经济生活中的另一个相关权力来源是警察权的传统。

3.1 警察权

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可使用武力)为国家(人民)保持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的权利,叫做警察权(police power)。历史上对这种权力的运用很广,从度量衡到性行为无所不包。自古以来,这种权力就被用来维护和控制商业活动。我们已经讨论过它在殖民地美国的许多运用情况。尽管警察权主要是各州和地方政府的管制权力,但最终它还是提升到了联邦的层面(例如,对控制污染的管制)。即使是在地方层面,这种权力也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通过许可证、区划、对商业和制造业环境的控制等手段,警察权可以且一直被政府用来控制商业并进而控制经济结构。

在联邦时代的早期,殖民地时期的警察权在定居区域保持有效。有些历史学家对这个概念有些混淆,他们错误地把这种管制同“重商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独立战争把这种管制一同推翻了。然而,独立战争反对的并不是殖民地政府,而是英国人。警察权管制是殖民地政府和习惯法传统中重要的一部分。不可能在独立战争胜利之后进行一个神奇的“突破自由”,达到真正的自由放任的地步。自由放任的思想在殖民地时期并不广为人知,也少有人拥护。管制是政府的权力,也是政府的责任。各州的地方政府在英国人被赶出去的时候并没有变化。^⑤

奥斯卡(Oscar)和玛丽·汉德林(Mary Handlin)对殖民时期末到南北战争之前的马

^⑤ William J. Novack, *The People's Welfare: Law and Regul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的中心论点就是:管制是被广泛接受的社会现象。

萨诸塞州进行了经典的研究,他们发现,殖民地政府对酒馆、旅店、公共交通、港口、码头等特许垄断体(special franchise monopoly)的控制是如此连贯一致。^⑥ 马萨诸塞州的各城镇政府甚至“保留了中世纪的权利,可以控制和组织市场、详细地管理销售情况”。^⑦ 制造业也依旧被通过稽查来控制。截至1816年,“州长任命稽查员来视察瓶罐和珍珠灰、猪肉和牛肉、铁钉、牛油和猪肉、腌鱼,每个都有副官和随从”。^⑧

在经济生活中,警察权确实有过很大的扩展。告发者仍然因其对控制的支持而被法庭使用和奖赏。当乔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发表关于民事诉讼的论文时,律师们面临失去独享知识的地位的危险。律师们通过仍是中世纪形式的公会要求为他们自己建立一个集体财产,并收到了回报,马萨诸塞最高法院开始正式检查,要求完成三年学徒期的人才能进入马萨诸塞律师界。

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对宾夕法尼亚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发现该州的警察权对经济生活的控制也保持了一贯。哈茨写道:

“这是所有政府的责任和利益,”一项宾夕法尼亚的法律断言,“防止诈骗,促进公正、有益的商业利益。”殖民地的许可证、稽查等类似管制的传统经过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一直稳定地保留着,在某些情况下还扩张了。^⑨

哈茨认为,在宾夕法尼亚,这些看法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许可证、稽查、政府偶尔对价格的调整——所有这些警察权一直被持续运用,并未消失。1835年的一项法案要求对所有出口产品进行非常广泛并详细的检查。对这种权力无人质疑。事实上,我们将看到美国最高法院(在哈默诉达根哈特案[Hammer v. Dagenhart, 1918]中)支持各州管制制造业的权力。直到1942年还是这样。

然而,也存在要求更多自由的观点。我们在殖民地经济中就能看到这种反作用力的端倪:在劳动力市场中,在公开市场废除时,以及认为“购者自慎”(商品出门概不退换)保护了贸易、在没有公开欺诈的情况下确保了权利的合法转移这一观点的日益风行。纽约州在1846年对其宪法进行了修改,直接废除了许多警察权:“所有称量、测量、衡量、挑选或稽查任何货物、产品、制造品或商品的办公室,无论任何形式的,从此废除,此后法律也不得建立此类的办公室。”^⑩

商业和制造业在南北战争之前变得更加复杂。随着制造品数量和种类的激增,而当时社会又缺乏现代的记录和通信技术,旧式警察权的详细稽查控制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一个突出的例外是对公共交通的控制(公用事业控制)。这些交通事业单位是特许垄断体,它们大部分对私人财产拥有征用权,从来无人质疑它们应该不受管制。事实上,这种形式的管制在1860年前的数十年间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在与运河和铁路有

⑥ Oscar Handlin and Mary Handlin, *Commonwealth, A Study of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Massachusetts 1774—1861* (1947).

⑦ *Ibid.*, pp. 93—94.

⑧ *Ibid.*, p. 70.

⑨ Louis Hartz, *Economic Policy and Democratic Thought: Pennsylvania, 1776—186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204.

⑩ Francis Newton Thorpe, ed.,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nstitutions*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9), p. 2662.

关的方面。然而,在其他方面,自由市场越来越被看成是比管制更加便宜的社会控制手段。哈茨认为,自由市场的观念只是随着商业企业的成长“自然地”发展,变得越来越不罕见。业主开始相信,他们自己的商业资产也应该像不动产那样自由。汉德林指出了随着经济的大发展,1860年之前在马萨诸塞州出现的困惑:

似乎不知不觉间,所有熟悉的将一个人的资产同另一个人区分开的界限都消失了,留下了一片广大的空地,熟悉的地方,但是老的界碑没了。每个人都知道,有些地方州可以直接行动,有些地方它可以作为仲裁者立法,有些地方它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在交界处,没人知道应该怎样;主图还没有画好呢……^①

关于警察权需要记住的一个要点是,它一直是、现在也是政府毋庸置疑的权利。美国资本主义从未离开过这些控制。但是确实有一段时间,这些控制不是由联邦政府来执行的。那时这些警察权是由地方政府执行的,它们给商业施加规范观念,同时也树立了道德,现在也经常是这样。就像我们大部分古老的法律背景一样,警察权也是可以发展的。先例至关重要,我们将在第18章讨论芒恩诉伊利诺斯案(Munn v. Illinois),这是关于州控制权的重大的分水岭式的案例。今天的联邦政府对产品安全的管制完全是符合警察权传统的。在自由市场经济兴起的过程中,警察权一直保持有效,尽管只是偶尔发挥作用;警察权是游戏规则的一部分。它们也有浪费的副作用。

3.2 特权与寻租

警察权可能并曾经被用来产生特权,并被获得特权的人滥用。^②设想一下,假如一个城镇里只有一个理发师被允许营业,他/她就拥有了由政府创造的垄断权。作为最低层次的特权,一个特定的人就这样受惩。我们刚讨论过马萨诸塞州律师的例子,他们通过有组织的团体向政府索取到了一种集体特权。他们可以收取更高的律师费,因为进入律师界的门槛被提高了。

考虑一下这个美国殖民地时期的例子。马萨诸塞州的记录中包括殖民地政府在1641年所作的下述规定:一个叫威廉姆·戴维斯(William Davis)的人“被拒绝给予出售饮料或啤酒或开食品店的许可,因为在波士顿镇有足够的其他同类店铺,而且他之前的行为具有侵犯性”。^③从这个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

(1) 出售饮料、啤酒或食物需要获得许可(执照)。

(2) 因为这一行业其他店铺被认为已经“足够”了,他们的利益就得到了保障,无须受到来自戴维斯的竞争——他的申请被驳回了。

(3) 通过驳回之前行为具有“侵犯性”的戴维斯,波士顿的道德水准得以保持。

已在这一行业其他人获得了租金(rent),而如果没有管制的话本不会有这种租金存在。在威廉姆·戴维斯的例子中,如果考虑到波士顿对这种服务的需求,许可戴维斯

^① Handlin and Handlin (1947), p. 260.

^② Lance Davis and 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71), pp. 74—77.

^③ Jonathan Hughes, *Social Control in the Colonial Economy*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6), p.

加入竞争的申请,这种租金就会失去。任何种类的商业执照或管制都会产生这样的租金。因此,警察权想对经济保持中立确实是非常困难的。按照定义,它就会产生和自由市场不一样的环境。否则,管制就没意义了。

显然,在1641年,波士顿的社会生产资源并没有多少被用来创造或寻求这样的租金。甚至在1644年直接行贿以获得特权所需的成本也很少,现有的“食品店”中的“饮料”、啤酒和货物的额外价格加起来也不多。波士顿的大部分资源都被用来在经济中的其他部门创造积极的新产品了。

寻租(rent-seeking)是社会利用其资源的一种很没有效率的方式。为了得到这样的租金,一些资源必然被浪费了,不能用于建设性的用途。而且,注意,寻租者获得的高于竞争水平的回报,是因为管制从社会的其他部分“转移”给他们的。理论上,对这种社会成本的补偿是提供更好的健康、安全、秩序和道德水准。

对于一个主要从事农业和采掘业的社会——一个由小型城市和(地理上的)权力有限的政府组成的社会来说,花费在寻租上的资源并不多。把获得这些租金叫做“特权”更加适合。然而,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府创造的特权不再像在殖民时期的波士顿一样,仅对很少一些人有效。随着经济社会的扩张,组织变得越来越大,更多的赌注涉及了进来。整个阶层、有组织的团体煽动政府以获得特权是非常有利可图的,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称之为集体利益(collective goods)^⑭。最开始它出现在土地销售中,在追求建造运河、铁路、桥梁的特许垄断权时再次出现。与之相随,美国发展出了一个巨大的寻租部门。

特里·安德森(Terry Anderson)和彼得·J.希尔(Peter J. Hill)认为,这种特征主要是在1870年实行联邦警察权之后变得尤为突出。^⑮为集体利益进行煽动是为控制市场而施加的政治权利的副产品,在经济上是一种浪费。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寻租部门的起源。竞争性的寻租不但会导致浪费,还会导致腐败。E. A. J. 约翰逊(E. A. J. Johnson)认为,新联邦宪法制定后的第一次国会会议上就存在竞争性的寻租者。^⑯他们的大规模胜利就是向一群投机者出售公共土地,及保护性关税。

4. 法律、收入与财富转移

当现有的各州在1789年选举第一位总统并成立一个新型政府时,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对他们的新宪法的动态解读会使得这部法典成为财富与收入再分配的工具。查尔斯·比尔德(Charls Beard)在其《对宪法的经济解读》(*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一书中指出,一个有理性的人可能会认为它是一份非常保守的试图维持现状的文件。当然,这不是事实。正是美国法学家的聪明才智使得他们可以保留宪法的总体框

^⑭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1), chap. 1.

^⑮ Terry Anderson and Peter J. Hill, "Institutional Change Through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Rise of Transfer Activity," in Roger Ransom, Richard Sutch, and Gary Walton, eds., *Explorations in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1982).

^⑯ E. A. J. Johnson, *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Economic Freedo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3).

架,同时对法律的实质内容进行修改,以释放出变化和发展的巨大能量,来支持美国的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解读法律的自由被称为“司法工具主义”(judicial instrumentalism),它在1780—1880年的这个世纪的影响最为强烈。^⑦如果没有它,美国经济就不可能像那样发展。司法工具主义给予了某些人优势,另一些人则为此付出代价,因此改变了财富和收入本来的分配。

4.1 财产权利:从惯例权到优先权

用哈里·沙伊伯(Harry Scheiber)的话来说,司法工具主义是“提高生产力、促进物质进步的实用主义态度”。既然宪法是为维护秩序和稳定以及防止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既然经济增长就意味着变化和不确定,那么只能靠法庭通过司法解释来鼓励创业活动。在这点上,司法判断用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到1820年时,正如霍维茨(Horwitz)在《美国法律的转变》(*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中所写,“美国的法律图景和40年前的景象只剩极为细微的相似之处了”。^⑧这种变化的完成,主要是依靠法官在财产权利之上放置了社会砝码,使得一些人获得胜过另一些人的好处。

假设有两个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土地紧挨着,大小一样。根据英格兰的习惯法,在所有权范围内,他们每个人都对其财产拥有“绝对支配”。根据习惯法的“古老的光明”(ancient lights)法则,邻居不可以建造会挡住另一个人已享有的阳光的建筑物。这种古老的法则,即享有阳光的权利,是一种惯例权(prescriptive rights),它必须高于邻居对生活进行改变的愿望。风景、清新的空气、安静的环境——这些都是不动产附带的、业主应享有的生活福利。它们具有真实的货币价值,不得被无偿侵犯。人们不能以会损害他人福利权(amenity rights)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财产且不负法律责任。同理,邻居不能修筑一座会淹没他人草地的磨坊水坝。对草地的使用是惯例权。伟大的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1765年在《对英格兰法律的评论》(*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中写道,一个业主对另一个业主的任何损害行为都应该被禁止,“因为作为邻居,业主有责任寻求一种不那么具有侵犯性的方式来完成此行为”。^⑨

现在,在这样的世界里你没法建成一个加里(Gary)、印第安那、匹兹堡、休斯敦或是洛杉矶。如果这个国家想要经济增长,一些财产必须进行商业化的发展,即使会损害其他人的福利权。对外界的负面影响,经济学家称为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例如烟雾、噪音、拥挤,以及其他经济增长的不良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俗语所说的:“不能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既得的财产权利不得被移除。为了经济增长,在有争议的地方,长期以来享有的惯例权不得被弱化,给其他的权利即优先权(priority rights)让路。树木必须得砍伐,河流上必须筑坝,矿产必须挖掘,工厂必须建造。

在我们现在的时代,美国拥有2.75亿人口,寻求办法来调整、减少优先权以保护环

^⑦ 对这种工具主义的权威处理请参见 Harry Scheiber, “Federalism a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Order, 1789—1910,” *Law and Society*, Fall 1975; Morton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1780—1860* (1977)。两位作者都列出了详尽的文献资料。

^⑧ Horwitz (1977), p. 30.

^⑨ *Ibid.*, p. 31.

境和生态非常重要。在1780—1860年间,美国人面临的是一个亟待发展的大陆,他们的观点和现在恰恰相反。古老的光明法则必须让路。霍维茨引用了1838年纽约州的一个案例,帕克诉富特案(Parker v. Foote),其中法官写道,古老的光明法则“不能运用在这个国家的发展中的城市和村庄,否则会造成极为严重的不良后果”。^②

司法工具主义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成本注定要由整个公众来承担。为了城市发展和工作机会,河流湖泊可能会被工业废料所污染,田园风光被破坏,空气变得污浊。企业家能够创造财富,因为他们不必赔偿其他业主的损失,除非能够在法庭上证明其过失,而这很难做到。人们有权对其财产进行商业化开发,只要他们具有合理的谨慎。马厩的隔壁是吵闹的,因为马匹是吵闹的,而这种吵闹不是过失。仍然有可能通过法律诉讼使得这种烦扰减轻,但是法官们为了经济发展,对这种事情的容忍程度越来越高。“你不能阻止进步。”

这些财产权方面的变化是由法官们在私法案例中完成的。^③法律的内容被改变了,并且改动颇大,但是宪法对财产神圣性的保证并没有改变。在法律的眼中,某些事物的神圣性比另外一些更重要。权利意义的改变与19世纪经济发展的需求相一致,尽管在理论上,18世纪的财产“绝对支配”的观念仍然保留着。在21世纪,我们仍然在改变这些观念。在关注环保的时代,“进步”经常被法庭阻止——尽管和旧的格言相悖——证明我们确实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了。

对物质进步的社会价值的态度变化的例子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即技师抵押法律的出现。另一个具体的例子是范·内斯诉帕卡德案(Van Ness v. Pacard, 1829),其中乔瑟夫·斯托里法官抛弃了习惯法的法则,判定租户对租赁财产所作的改善属于房主,房主无须赔偿租户。19世纪的美国人想要进步,类似地,他们认为边疆擅占者的劳动很有价值,即使他们侵犯了其他人的财产。擅占者得到了回报,他们获得了优先购买权;同样,租户也必须得到回报。^④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私人财产权观念是在英格兰发展出来的,而英格兰当时是一个小而稳定的农业社会,有着固定的社会阶级。美国人处在一个相对民主的社会,在一块亟待开发的大陆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改变了法律的内容,强化了他们想要发展的权利,弱化了他们认为经济上低效的权利。考虑到我们今天的情况,我们想要再次改变这些权利的社会砝码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我们今日美国的需求和我们祖先的需求并不相同。他们想要的是工厂,而不是森林。

4.2 合同性质的变化

另一个后果严重的工具性变化和合同有关。布莱克斯通这样描写英国的合同法:

^② Horwitz (1977), p. 46.

^③ 可在沙伊伯的多篇文章以及霍维茨的著作(1977)中找到例子。

^④ Karen B. Clay, “Property Rights and Institutions: Congress and the California Land Act of 1851,”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9, no. 1, March 1999, 对加利福尼亚加入美国之后的财产权执行情况进行了案例研究。Mark T. Kanazawa, “Efficiency in Western Water La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lifornia Doctrine, 1850—1911,”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7, no. 1, January 1998, 对同时期加利福尼亚的水体法律进行了研究。

……出于任何有价值的考虑的合同,如为了婚姻、钱财、完成工作或互惠合同,永不得被法律质疑;并且,如果它具有充分适当的价值,永不得在法理上废除。^②

谁可以制定有效的合同?儿童、心智受损者,在许多情况下还包括妇女,都被认为没有资格制定有效的合同。存在这种规则是因为人们认为这种情况下签订合同的双方过于不平等。因为不公平,这种合同是无效的。有效的合同应该是公平的,签订合同的双方在某种意义上应该具有平等的合同能力,这种观念是中世纪的观念,它妨碍了经济发展。工厂的工人可以和公司签订平等的劳动合同吗?直到今天,支持工会和集体谈判的一条理由就是有必要使谈判双方的力量平等,所以要将劳动者联合起来,因为资本已是联合起来的。1898年,在霍尔登诉哈迪案(Holden v. Hardy)中(支持犹他州为了健康和安全管理制矿工工作环境的权利),美国最高法院判决

……双方都已成年且具备完全能力的事实并不必然剥夺州在双方处于不平等地位时,或公共健康要求对合同的一方进行保护以免其伤害自己时,进行干预的权力。^③

法庭认为,在这种案例中,“自己的利益常常是不安全的向导,立法机关的权威可以及时介入”。^④这里涉及了健康和安全,但注意,平等的理由也作为额外的砝码被提出。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能听到这种平等观念的回响,例如在欺诈消费者的案例中。

霍维茨认为,在18世纪,平等传统盛行的基础是“自然的公正”,也因为如此多的价格是约定俗成的。三个变化迅速到来:

(1)“意见一致”(meeting of wills)总体上压倒了平等观念。如果达到法定年龄的两个自由人在非强迫的情况下签订了一项合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会被认为是有效的。工厂主可以这样和大量雇员签订关于工资、工时和工作环境的合同,只要工人知道并同意这些条款。

(2)意见一致对强化市场上“购者自慎”的规则也非常重要。如果卖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售了有缺陷的商品,而买方有机会在购买前检查,那么卖方就不是公开欺诈。

(3)根据现在的市场价格签订买卖合同。如果之后价格有了变化,原合同的价格仍然保持。这个变化使得各种期货交易成为可能。

这些变化及其他一些变化有利于让自由市场来决定工资和价格,让这种决定从旧的关于公平的“自然权利”观念中解放出来。当然,对一些人来说,这种完全的商业化显得不道德,至今仍然如此。理论上,关于合同的新观念意味着签订合同之后双方优劣情况的变化和其合约义务无关。对商业人士来说,破产法的公布给严厉的合同带来了一丝解脱。不能完成其工作的建筑商被法庭允许就他们已经完成的工作“解除合同”(recover off the contract)。工人如果违反了雇佣合同,仅仅会损失工资。^⑤

^②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765), book 2, p. 443.

^③ 169 U. S. 398 (1898).

^④ *Ibid.*

^⑤ 如欲阅读对改变合同的详细讨论,参见 Horwitz (1977), chap. 5.

4.3 雇主的责任

另两条规则的发展,让雇主不用再为工作环境和工作的危险承担责任。第一,法庭开始假定危险已经包含在工资之中;如果其他条件相同,越危险的工作工资越高。“正常风险”也被包括在工资中,雇员同意了工资合同就意味着他们接受了包含的风险。第二,雇主为雇员受伤负责的危险也被共同过失——另一个工人的过失——减轻,这也被称做“同事规则”。工厂(或其他工作)中的受伤很少没有这种因素。既然受伤的工人没有得到雇主的赔偿,而是被扔到社会上自生自灭,这种法律规则导致了公众再次为经济发展付出成本。直到今天,工人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正常风险和其本人或同事的共同过失的假定。

这些变化,就像优先权压倒惯例权一样,被沙伊伯称为法庭在私法案例中对经济增长所作的“不可见的贡献”。它们降低了工商业的风险和成本,使得工商业企业更加大胆(和有利可图)。

5. 征用权

对工商业的另一些协助直接来自政府通过征用权进行的再分配。宪法的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确保私人财产不会未经赔偿或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被联邦或州政府拿走。获得这种财产的技术手段在殖民时期就已出现,即征用权(*eminent domain*)。征用权用于成本集中而受益分散的不常见情形。运用这种权力的历史表明,它定义不清,不合常规,但是逐渐地,在被征用财产的所有者拒绝接受政府出价的案例中,陪审团的判定过程变得标准。然而政府扣押财产之后将其用于何处,却一直没有明确的限制。征用权从未只限于公共目的,现在也不是。被征用的土地可以用于运河、铁路、机械化谷仓(*grain elevator*)、收费公路、公共房屋或陋巷改造。征用一直都是突出的寻租部门;某些人得益,另一些人蒙受损失。联邦政府也许是因为尊重杰斐逊“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将已出售的公共土地重新取回的愿望,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直接运用征用权。但是州政府和市政府则从一开始就在运用这种权力。^②

6. 法人公司

法人公司的特权是州赋予集体工商企业的。经过特许,一个以法人公司形式组织的企业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分散的所有者,每个部分对公司的债务和其他义务承担有限责任。公司在法律上被当做法人对待;它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或被起诉。用大法官马歇尔的话来说,它是“一个人造产物,看不见摸不着,只存在于法律意图中”。他是在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1819)中写下这些话的,他支持公司(该学院)由英王乔治三世授予

^② Harry Scheiber, "The Road to Munn: Eminent Domain and the Concept of Public Purpose in the State Courts,"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1971. 如欲详细了解这段历史,参见 Errol Meidinger 的详尽调查报告, "The 'Public Uses' of Eminent Domain: History and Policy," *Environmental Law*, Spring 1980.

的特许状,反对新罕布什尔州推翻它的企图。从此,公司作为一个活跃的实体,出现在美国的历史中。它合法而充满灵活性地发展,是它,而不是传统的业主制度(proprietorship)成为了工商企业最重要的形态。它是具有公民权的存在物,但是由于其有限的责任和永久的生命,它具有超人的经济力量。它是由州创造的、位于州内的经济力量中心。亚瑟·塞尔温·米勒(Arthur Selwyn Miller)这样描述法人公司,他们是“政体内的封建实体”。^②

公司在欧洲和英格兰已经存在了很久。殖民政府曾七次将权利赋予私人企业。截至1790年存在40个美国公司。在1790—1800年间,近300个新的特许状被颁发。之后,这一数量继续增加。每个特许状都是州立法机关的一部特殊法案(除了纽约和康涅狄格州)。通常,特许状声明了这个工商企业的性质:其目标、其位置、它所能使用的资本数量。特许状是以特定方式经营业务的执照。这些限制在当时显得很合理,因为组建公司是州的主权延伸到一群私人手中的行为。

最初,特许被认为是垄断的授权,因此属于主权的范围。联邦政府也有组建公司的权力,如合众国第一银行(1791—1811)和合众国第二银行(1816—1836)。但是在19世纪,基本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联邦政府一直不太愿意使用其发放特许状的权力。当然,在现代,拥有联邦特许状的公司是司空见惯的了;例如,商品信贷公司(Com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在1948年获得了联邦特许状。

从1811年开始,纽约州允许公司无须立法机关特别颁发特许状即可建立。康涅狄格州在1837年通过了一项类似的法律,但是这两个州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大量出现一般化的公司(其原因将在第18章讨论)。^③就现在来说,需要注意的是,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工商业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成立公司,但是这个过程一般需要特殊的立法程序,这一程序有时十分昂贵,有时会带来腐败。

1790—1860年间各州立法机关通过了数以千计的特许公司,其中约有一半是在19世纪50年代建立的。关于它们的法律几乎完全是美国特产,尽管依据英国法律设立的公司殖民时期就存在了。英国议会对于允许有限责任极为谨慎,从1720年至1825年,金融业中不准存在合股企业,除了英格兰银行。既然美国的每个州都可以自由组建公司,自然会出现许多创新之处。伟大的法律史学家詹姆斯·威利亚德·赫斯特(James Willard Hurst)认为,美国的公司法几乎完全没有因袭英国的同类法律。^④

7. 1860年之前的最高法院与经济增长

如前所述,联邦宪法是由已具自己法律体系的主权各州共同同意的一般性的、有限的文件。无疑,宪法是“这块土地上的最高法律”,但是它留下了许多空白。没过多久,宪

^② Arthur Selwyn Miller, *The Supreme Court and American Capitalism*(1972), p. 14.

^③ John Wallis, "Constitutions, Corporations, and Corruption: American States and Constitutional Change, 1842 to 1852," *JEH*, March 2005 提出,在这一时期,11个州采用了新的宪法,包括通用的成立法人公司的条款以及发行政府债务的程序。在1837年经济危机的余波中,各州试图在不求助于地理上分散的税收的情况下,扶持地理上特殊的投资。

^④ James Willard Hurst, *The Legitimacy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970), p. 1.

法问题就产生了,如果这个新生国家想要在发展变化中仍然保持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它需要全国范围的解决。拥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和司法审核的条款,解决全国性质的争端的论坛就是美国最高法院。

由弗吉尼亚人约翰·马歇尔担任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的最高法院对自己的权力信心满满。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 1803)——“半夜法官”案(midnight judges)——中,马歇尔判决,美国最高法院的审核权力可延伸到联邦政府的另两个分支的行动上,而不仅仅是各州的法律。马歇尔在麦卡洛克诉马里兰案(McCulloch v. Maryland, 1819)的有力讼词中写下了关于“默示权力”(implied power)的经典陈述,他支持合众国第二银行的特许状:

我们永不应忘记我们正在解释宪法——……它在未来的岁月仍将存在,因此,它要能适应人类事务的不同需求。

马歇尔遵循了一条“大政策”:宪法权力将一直足以满足需要。既然有修正宪法的条款,他基本不会是错的。

7.1 商业条款

对我们现在的时代来说,很显然,联邦宪法中权力最广泛的就是商业条款:

国会有权……管制同外国的、各州之间的和同印第安部落的商业……[第一章第八节,列举权力中的第二条]。

吉本斯诉奥格登案(Gibbons v. Ogden, 1824)是对这一条款的检验,此案推翻了纽约州对哈德逊河上的蒸汽船垄断的授权,因为这条河流经纽约和新泽西两州。只有国会有权管制各州之间的商业。在库利诉监察委员会案(Codey v. Board of Wardens, 1851)中,大法官罗杰·坦尼(Roger Taney)支持费城港施加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控制的权力。但是任何含有全国意味的管制,例如海港,都是属于国会的管辖权的。在布朗诉马里兰案(Brown v. Maryland, 1827)中,关于商业权力方面法庭认为,州无权对进口商发放执照或征税。一旦商业权力被确定,它就一直存在于背景之中,直到1887年,它重新浮出水面,这次更为严重,成立了州际商务委员会。在吉本斯诉奥格登案之后的很长时间,全国或跨州的工商业企业可以免受许多州警察权带来的烦恼。哈里·沙伊伯这样评价吉本斯诉奥格登案:它确保了美国具有一个共同的国内市场。^⑧ 随着交通运输和生产技术的发展,地方企业发展到逐渐面临全国市场时,这种条件将显得极其重要。

7.2 契约条款

《宪法》第一章第十节的契约条款如下(经过仔细删节):

任何州不得制定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

^⑧ 但是,正如沙伊伯(1975)所言,之后仍然有基于商业权力判决的案例,在适用于这些案例时,吉本斯一案的判决并不是完全模棱两可的,特别是在涉及警察权的时候。

马歇尔的法庭收到的关于契约的头两个案例是弗莱彻诉佩克案 (Fletcher v. Peck, 1810) 和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 (1819)。第一个案例较为复杂, 涉及两个州及印第安人的土地。决定性的案例是达特茅斯案。这一案例涉及的问题十分严重; 因为达特茅斯宣称来自英王乔治三世的授权具有合法性, 也就意味着所有同一起来源的土地授权令具有同样的合法性。如果达特茅斯学院的授权令可以被州立法机关推翻, 那么其他的呢? 前面已经提过, 法庭认为, 达特茅斯学院的特许状是有效的契约, 受到宪法的保护。

马歇尔写道, “毫无疑问, 非常明显”, 仅仅一场战争不会推翻已有的财产权利。助理法官斯托里补充说, 这是“习惯法的既定原则, 帝国的分裂不会导致之前获得的财产权丧失”。^② 他进一步补充说, 他认为, 一场成功的革命会将推翻政府之前的安排全部推翻的观点是“荒谬可怕的”。现代的革命者一定会觉得美国革命非常奇怪, 这是一场革命, 却受到法律的限制。

7.3 商业法律

商人之间互相交易的规则大部分是从法律的其他分支中独立发展起来的。我们在第1章中讨论过, 在美国殖民时期盛行的是一些国际规则, 尤其是可谈判工具和来自汉萨同盟 (Hanseatic League) 的航运规则。因为美国经济是各州独立发展的, 这些规则日益显得不能适应情况。在斯维夫特诉泰森案 (Swift v. Tyson, 1842) 中, 斯托里法官认为, 美国必须有一个总的“商人法”。当各州的法律互相冲突时, 最高法院有义务作出判决, 使得法庭可以在“商业法律的一般原则”中找到正确的规则。全国经济再次感受到宪法的统一力量。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 法庭一直倾向于尽可能地尊重各州的权利, 但是经济问题中必须保持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的观念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

7.4 工商企业

最高法院建立不久, 它就开始倾向于建设一个竞争性的全国市场。在查尔斯河桥诉沃伦桥案 (Charles River Bridge v. Warren Bridge, 1837) 中, 法庭推翻了州特许状默示垄断许可的古老观念。法庭认为, 州可以授权成立竞争性的公司, 波士顿的查尔斯河上竖起了两座桥。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 尤其是在交通运输方面。很就出现了竞争性的交通形式, 它们都拥有公司特许状, 而它们的行为互相“损害”各自的财产权 (利润)。渡船和桥梁竞争, 铁路和运河竞争; 之后, 飞机、卡车和铁路竞争, 它们之间也互相竞争; 有线通信系统先与无线和地下电缆系统激烈竞争, 现在又与卫星通信竞争。习惯法原先所持的特许即意味着授予排他性权利的情况不复存在了。

查尔斯河桥案还牵涉到另两个重要问题: (1) 一项惯例权, 一项之前授予的财产权, 失去了, (2) 此案认为, “公共利益”必须考虑, 竞争才能最好地促进公共利益, 而在考虑既得财产权时必须考虑这一问题。之后这一问题一直隐约可见, 直到各州和联邦政府先后将其权力扩张, 开始对私人财产的开发加以管制——工商企业的费率、价格和利润。

最终, 在奥古斯塔银行诉厄尔案 (Bank of Augusta v. Earle, 1839) 中, 各州获准立法反

^② 4 Wheaton 518 (1819), 706—707.

对本州以外的公司进行州内业务的权利,但不能限制公司的代理机构在各州之间移动。每一个公司作为“法人”,在其获得特许状的州内拥有“固定住所”(domicile),可以自由地在其他州开展业务,除非被该州法律明确禁止。这一案例一直以其模糊性著称,各州直到今日仍然尽其可能地批准歧视性的法律,以此压制竞争,以公共利益为代价为其自己的公司创造州内租金。法庭必须遵守宪法的“充分信任和尊重”条款(第四章第一节),但它也必须尊重各州根据其警察权进行管制的权力。然而,大法官坦尼(Taney)并未将公司法人定义为“公民”,因此公司法人的全部权利问题一直推迟到1886年才解决。那时,其财产受到宪法第五修正案保护的“人”,根据第十四修正案就是公民(如果出生在美国或加入了美国籍)。公民的权利受到保护,不得受州法律的侵害。在圣克拉拉县诉南太平洋铁路案(Santa Clara County v. Sothern Pacific Railroad)中,公司法人被称为“公民”并获得了那种保护。因此,我们必须在与铁路管制有关的事宜中一再考虑这一问题。

这些案例代表了1860年之前和经济发展有关的司法审核的主要趋势。它们的总体趋势和各州法庭的工具主义方向一致——为工商业、经济发展和整体全国市场的形成扫清障碍。马歇尔的法庭判决的全国主义倾向尤为突出。然而,正如哈里·沙伊伯强调的那样,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谨慎。^③

在19世纪70年代左右之前,联邦政府的权力仍然受到各州保留权利的限制——除了奴隶制问题和南方各州退出联邦的决定。习惯法下的私权仍然保留给各州。这方面的重大变化开始于1877年,到时我们再详细讨论。

关于南北战争之前的时期,最概括地说,法律协助发展了美国资本主义的主要观念和机构:经济增长主要基于私人对私有生产资源利用的决策。在这些发展背后是这样的假设:大部分经济生活是私人的事情,政府协助和支持私有的经济力量,同时依赖这种力量来进行经济发展。之后我们将看到政府限制的古老观念重新出现,就像殖民时期一样,但是这次是在联邦层面上。

推荐阅读

文章

Anderson, Terry, and P. J. Hill. "Institutional Change Through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Rise of Transfer Activity." In Roger L. Ransom, Richard Sutch, and Gary M. Waltnn, eds., *Explorations in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Douglass C. Nor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Bruchey, Stuart.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 Earlier 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7, no. 2, June 1987.

Horwitz, Morton.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ncept of Property in American Law, 1780—1860."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 40, no. 2, Winter 1973.

Lively, Robert A. "The American System; A Review Articl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③ 可在沙伊伯(1975)中找到例子。

vol. 29, no. 1, March 1955.

Mann, W. Howard. "The Marshall Court: Nationalization of Private Rights and Personal Liberty from the Authority of the Commerce Clause." *Indiana Law Journal*, vol. 38, no. 2, Winter 1963.

McGuire, Robert A., and Robert L. Ohsfeldt. "Economic Interests and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A Quantitative Rehabilitation of Charles A. Bear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4, no. 2, June 1984.

Meidinger, Errol E. "The 'Public Uses' of Eminent Domain: History and Policy." *Environmental Law*, vol. 11, no. 1, Spring 1980.

Scheiber, Harry. "At the Borderlands of Law and Economic History: The Contributions of Willard Hurs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5, no. 3, February 1970.

———. "The Road to Munn: Eminent Domain and the Concept of Public Purpose in the State Courts."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5, 1971.

———. "Property Law, Expropriation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by Government, 1789—191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3, no. 1, March 1973.

———. "Federalism a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Order, 1789—1910." *Law and Society*, vol. 10, no. 1, Fall 1975.

———. "Instrumentalism and Property Rights." *Wisconsin Law Review*, vol. 1975, no. 1, 1975.

———. "Regulation, Property Rights, and Definition of the Market: Law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1, March 1981.

Umbeck, John. "The California Gold: A Study of Emerging Property Right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4, no. 3, July 1977.

Wallis, John Joseph. "Constitutions, Corporations, and Corruption: American States and Constitutional Change, 1842 to 1852."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5, no. 1, March 2005.

书籍

Coleman, Peter J. *Debtors and Creditors in America: Insolvency, Imprisonment for Debt and Bankruptcy, 1607—1900*. Madison: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 1974.

Davis, Lance E., and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Friedman, Lawrence.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3.

Handlin, Oscar, and Mary Handlin. *Commonwealth, A Study of Government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Massachusetts 1774—1861*.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47.

Horwitz, Mort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1780—186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Hovenkamp, Herbert. *Enterprise and American Law, 1836—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Hughes, Jonathan. *The Governmental Habit Redux*.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Hurst, James Willard.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ited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6.

———. *Law and Social Process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w School, 1960.

———. *The Legitimacy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in the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0—1970*.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0.

Johnson, E. A. J. *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Freedo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3.

Miller, Arthur Selwyn. *The Supreme Court and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2.

第 8 章

交通运输、内部改进与城市化

经济发展的成功不仅依靠农业和采掘业,而且依赖于交通运输业的突破和城镇的兴起。随着经济活动向西延伸,在第2章中曾经讨论的过程以同样的理由继续着。农场产品销售的收入必须大于等于生产和分销的成本。而分销成本中,运输成本是很大的一部分。生产率(productivity),即每单位投入的产出,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而上升。考虑一下,一辆货车承载的货物如果用马车来运,那得需要多少辆马车、多少车夫。火车将劳动力“解放”出来,让他们可以从事别的行业,比如农业。因此,产出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正如比较优势原则所预言的那样。美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南北战争之前的集体活动中最为突出醒目的就是对改善交通的积极追求。

这种活动组织的方式尤为耐人寻味。在英格兰,运河和铁路由私人资本所建,几乎没有政府的参与。但是在美国,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合资企业——私人 and 政府合资。经济历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这种合资是私人运营者成功地从政府获得私人特权的寻租活动,还是狡猾的需要政绩的政坛领袖通过提供特权将私人企业诱导到公共事业上来的结果。我们无法解决这种争论,我们只能概括讲述一下争论双方的主要论点。

传统上认为,运河和铁路这样的投资规模过于庞大,私人企业绝无可能独力承担。^①理论认为,因为交易风险和成本的存在,在有其他投资机会的情况下,私人部门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从事此类事业。政府单位——州政府、地方政府甚至全国政府——可以减轻这种限制,可以给予直接的财政拨款,或发行长期债券、给予贷款,以其收入部分地偿付建造成本。

法律历史学家詹姆斯·威利亚德·赫斯特提出了另一种论点,认为主动权在政府这边而不是私人部门那边:

我们感到需要促进资本自愿地流入大规模事业,当时流动资本较为稀缺,而存在许多实际限制使得政府不能通过直接征税来进行这种投资。^②

通过将交通企业组建成为公司,政治领袖可以授予其特权和征用土地、签订借款合同(contract of loan)、道路收费,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印刷货币的权利。因此,州和地方政府几乎从一开始就和这件事密不可分。加上它们提供的其他形式的政府协助,实际上它们是将征税权下放给了私人企业。赫斯特因此论证,是政府席卷了私人资本,而不是相反,这才能解释合资企业的繁盛。现在,让我们详细考虑其后果。

① Carter Goodrich, *Government Promotion of American Canals and Railroads 1800—1890* (1960), chap. 1. 最初提出这一学术观点的是,“The Early Transportation and Banking Enterprises of the States”, QJE, 1902。

② James Willard Hurst, *The Legitimacy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1969), p. 23.

1. 内部改进的时代

一旦定居者开始大量涌入西部土地,交通改善的好处立即变得显而易见。最初,人们希望新的联邦政府能够扮演主要的角色,在1806年,确实也开始建设一条全国公路,从马里兰州的坎伯兰(Cumberland)向西到伊利诺伊州(支持者们希望,能够一直向西最终连通密苏里州)。同年,要求联邦协助修筑运河的提案也摆到了国会面前。这些提案的基础是,公共土地销售的收入能够支持这些工程。

人们常说,计划经济和美国做事的风格不合。然而,当这个国家刚刚独立的时候,美国却对国内土地和东部水运有一个庞大的全盘计划:加勒廷计划(Gallatin Plan)。这个主意是参议院提出的。财政部长阿尔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在1807年收到指示,要他准备一个“在国会力量范围之内实现开路挖河的目标的计划”。^③

加勒廷在1808年4月向参议院提交了他的计划。在计划中,他强调“与人口相比地域过于辽阔”,且缺乏私人资本来利用潜在的投资机会。他相信,为了支持私人投资,必须打通各地之间的交通要道,以便稳定地产生收入。这些投资有朝一日总会带来收益,但是他认为,在最初只有联邦政府才能掌控足够的资源。为了提供一条从马萨诸塞到佐治亚的浅水航道,他提议横跨科德角(Cape Cod)、在拉里坦(Raritan)河和特拉华(Delaware)河之间、特拉华湾和切萨皮克(Chesapeake)湾之间、切萨皮克湾和阿尔伯马尔(Albemarle)湾之间开挖运河。而且,他建议建造东西部交通的要道:北部要道是从哈德逊河到尚普兰(Champlain)河、从莫霍克(Mohawk)河到安大略(Ontario)河和伊利湖;并打通下列各地之间的道路:阿勒格尼和萨斯奎汉纳(Susquehanna,或朱尼亚塔[Juniata])河、莫农加希拉(Monongahela)和波托马克(Potomac)河、卡诺瓦(Kanawha)和詹姆斯(James)河、田纳西和桑蒂(Santee,或萨凡纳)河。^④

加勒廷估算,这些运河和道路将耗资约2000万美元,如果每年支出200万美元,将需要十年。他相信,联邦政府能够承担这样的支出,而其收益将是无法衡量的。而且,一旦这些工程产生了足够的收入,它们将被出售给私人企业,其收益可以用来进一步促进内部改善。

尽管这一计划十分精巧,然而联邦政府出于一系列原因并没有采取它,其中包括对其合法性的怀疑。麦迪逊和门罗总统都倾向于让联邦政府参与内部改善的工程,但又认为干涉州内事务的行为是违宪的。美国宪法是主权实体之间的协议,联邦权力的扩张会让人深深怀疑。门罗曾经希望修改宪法以允许这种行为。然而,1830年,杰克逊总统否决了梅斯维尔(Maysville)道路法案,称其“违宪”,在这个“严格宪法主义”(constructionism)的时代,联邦干涉的计划淡出了。在1824—1828年间,约有200万美元的联邦资金用在了运河上。^⑤从马里兰到密苏里的全国公路没能如计划完成,但最终还是修建到了

^③ Goodrich (1960), p. 27.

^④ *Ibid.*, pp. 27—48.

^⑤ Jonathan Hughes, *The Governmental Habit Redux*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68—76 for this episode.

伊利诺伊州。^⑥ 总共约有 700 万美元的联邦资金花费在了这个计划上。

联邦政府未能实现加勒廷计划,但这一失败被私人企业家抵消了。卡特·古德里奇(Carter Goodrich)指出,私人企业家在州和地方政府的协助下,完成了这一计划的大部分。^⑦ 最后,铁路弥补了空白。古德里奇认为,是政治和派系斗争,而不是意识形态,使联邦政府全面参与加勒廷计划的希望化为泡影,即使在早期阶段。东北部关税表的投票换取了中西部内部改善的投票;南方几乎未从联邦政府在内部改善上的投资中获得任何好处。加勒廷计划对未来的发展历程具有间接性的影响。这个计划基本还是实现了,只是实现方式和原先预想的不同。

2. 公路、运河、汽船和铁路

城际收费公路最初似乎是许多地面交通问题的解决之道。它们的路面(石头、碎石,之后还有木板)比一般的公路更加可靠,而且在人口密集(因此利润丰厚)的地区之间提供了直接的通道。地方公路适合地方的需要。没有理由让任何地方的纳税人为其他人修筑更好的公路。然而,城际收费公路的支持者们希望其高质高速和高可靠性能吸引足够的中长途流量,好为投资者带来利润。数百家城际收费公路企业投资了超过 2 500 万美元的私人资本;1810 年时城际收费公路里程为 4 600 英里,到 1830 年时已是 27 800 英里。^⑧ 因为大部分收费公路企业较小,修筑的公路较短;一段长途线路将由多个企业经营,各自在自己的路段上收费。然而,因为费率受到公共官员的管制,这些企业的活动也受到其特许状的限制,收费公路的利润令人失望。

事实上,收费公路的利润记录是令人沮丧的。当时大部分旅程相当短,而人们也可以选择普通(免费)公路。收费公路的每吨英里成本在长途旅程时最低。然而不幸的是,大部分收费公路流量并不是这样。阿尔伯特·菲什洛估算,收费公路的利润率只有 3% 到 4%。^⑨ 到 19 世纪 30 年代,收费公路已被运河超过,随后又被铁路超过,最后被抛弃了。大部分对收费公路的投资来自私人部门,即使在州政府直接投资幅度最大的宾夕法尼亚州也是如此,据估算,那里政府投资仅占总投资的 30%。在南北战争之前的运河和铁路建设中,政府投资的比例要大得多。

2.1 运河

伟大的运河挖凿时代约为 1815 年至 1843 年,它具有许多有趣的特征,对现代学者极具吸引力。(图 8.1 为 1800—1860 年的运河系统图)正是通过收费公路和运河,合资企业——私人与(州及地方)政府的资金和力量的结合——才进入了美国历史。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运河建设确实是大规模的。据哈维·西格尔(Harvey Segal)教授统计,1815

⑥ 1925 年采用了城际公路数字命名体系,东西走向的国道(National Road)被命名为 40 路。

⑦ Goodrich (1960), pp. 34—35.

⑧ Albert Fishlow, "Internal Transportation," in Lance 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2), pp. 472—475.

⑨ *Ibid.*, p. 4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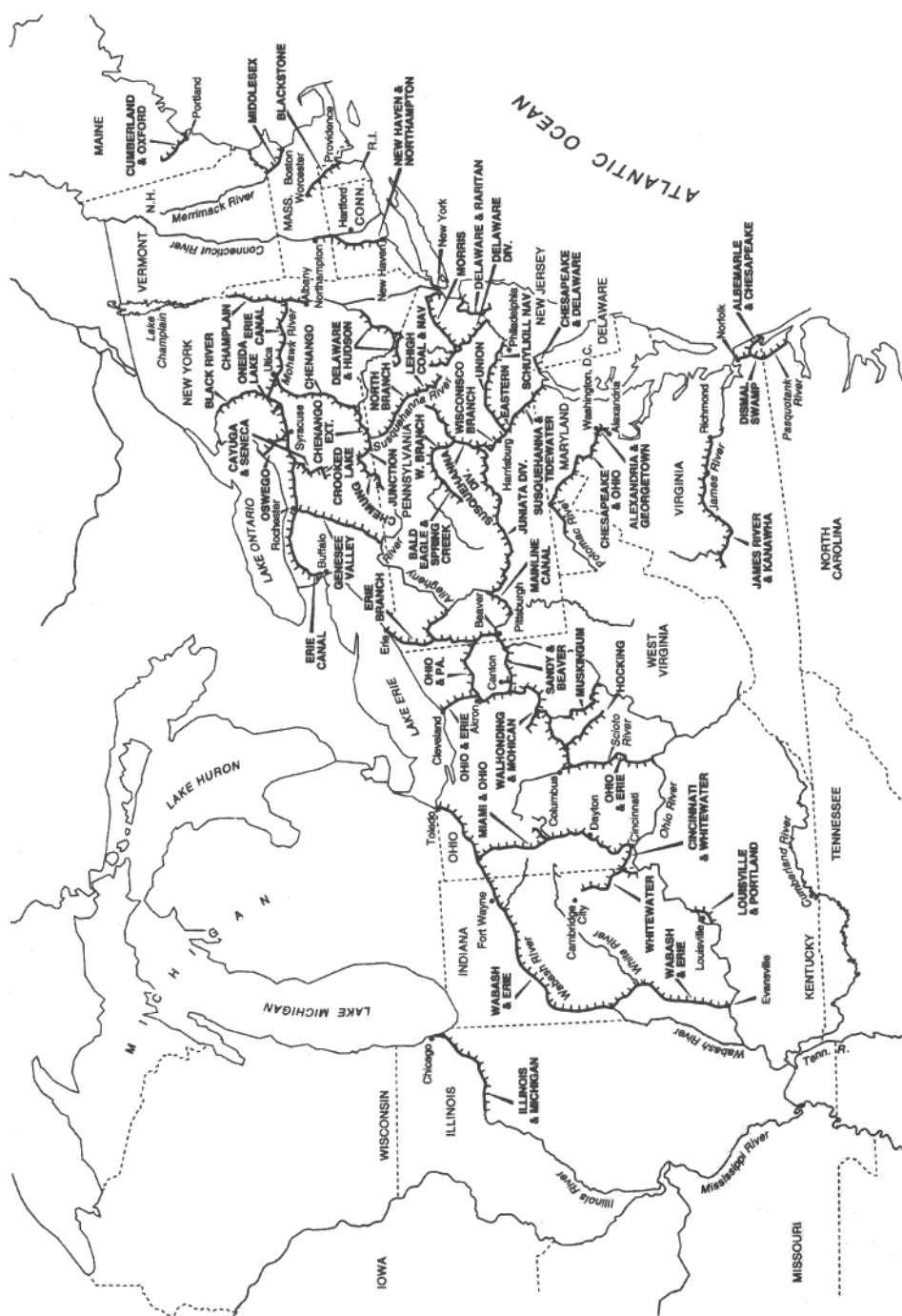


图 8.1 1800—1860 年的主要运河

在南北战争之前,为了开发利用美国的内部水运能力,美国建成了一个发达的运河系统,主要集中在密西西比河以东。最长的运河是沃巴什至伊利运河,从路易斯安那州的埃文斯维尔到俄亥俄州的托莱多。

年至1844年间,对运河的投资为3100万美元,其中73%来自政府。从1844年到1860年又投资了6600万美元,其中政府的钱占66%左右。^⑩

尽管存在一些纯私人的运河,但它们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南卡罗来纳的桑蒂运河建于1800年,波士顿到洛厄尔的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运河建于1803年,它们是私人的。但是直到1825年伊利运河的完工才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将一吨面粉从布法罗运到纽约市的成本从100美元降到了10美元,运输时间也缩短了2/3。西北地区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定居点可以向北延伸到大湖区了。

让联邦政府协助挖掘伊利运河的希望于1817年3月落空了,当时麦迪逊总统否决了提供150万美元的提案。一个月之后,纽约州的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法案,决定独自在哈德逊河和伊利湖之间修筑运河。资金将来自专项税收、州信用贷款以及运河部分航段开放之后的收费。完工时这条运河有363英里长,耗资700万美元。伊利债券最初发行时面额较小,主要被纽约州市民购买。当这条运河将要大获成功的迹象显露无遗时,大宗投资者和国外买家也闻风而至。到1829年,外国人购买的运河债券占总数的一半。那时和现在一样,外资是受欢迎的,只要它不试图控制国内产业。成功后随之而来的是扩张。又修建了几条支线,包括到尚普兰湖的水道也被打通了。^⑪

伊利运河成功之后,别处也兴起了运河挖掘热。宾夕法尼亚州的富有创业精神的居民是内部改进的早期狂热者。到1789年,他们已经受益于“公路和内陆航行促进协会”提出的“宾夕法尼亚的加勒廷计划”。向西的匹兹堡公路于1817年完工。该州投资的税收到1825年已达到180万美元,它与私人资本家合作,共投资了56家收费公路和桥梁企业。但是伊利运河是一个新的挑战。费城的卓越地位受到了威胁,1826年,立法机关投票同意用州的资金修建主线运河(Main Line Canal)。

因为在匹兹堡和沿海平原之间树立着阿巴拉契亚山脉这样高大宽广的障碍,主线运河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在数个地段通过地面交通(之后用铁路)运送货物。这些必需的转运点从一开始就将主线运河置于竞争的不利地位。主线运河横跨359英里,于1835年竣工,建筑成本约为1200万美元。截至那时,另有650万美元的资金被用来修筑其他较小的运河。

因为受1837年经济萧条的影响,宾夕法尼亚就像其他各州一样,未能偿付因内部改善工程而累积的3300万美元债卷的利息。之后它赎回了债券。主线运河总计只赚回了原投资额1200万美元的3%。1857年,它以750万美元的价格被卖给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⑫

在中西部的部分地区,自然水道似乎为运河挖掘提供了无上良机,那里的运河挖掘也是主要由政府主导的。印第安那修筑了最长的水道,从俄亥俄河上的埃文斯维尔(Evansville)向北一直到俄亥俄州的托莱多(Toledo)。这条运河名为沃巴什至伊利运河,全长450英里。沃巴什至伊利运河在19世纪50年代时完工,耗资650万美元,但是很快

^⑩ Carter Goodrich, Jerome Cranmer, Julius Rubin, and Harvey Segal, *Canals an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1961), p. 215.

^⑪ Goodrich (1960), pp. 53—56; Julius Rubin, “The Erie Canal,” in Goodrich et al. (1961).

^⑫ Rubin (1961).

就因铁路的竞争而被放弃了。^⑬ 俄亥俄州的运河挖掘也很热闹,共修建了 761 英里的运河,耗资 1 600 万美元。虽然俄亥俄州的第一轮运河热十分成功,但 19 世纪 30 年代的第二轮热潮则不是如此,原因是铁路的竞争力太强大了。^⑭

伊利诺伊州拥有联邦政府支持伊利诺伊—密歇根运河的土地授予令,这条运河将把密歇根湖和密西西比河通过芝加哥河和伊利诺伊河连接起来。如同沃巴什至伊利运河,这条运河耗资约 650 万美元,却很快被铁路超过了;现在留存的是一个“国家遗产走廊”。然而这条运河的修筑激发了先锋者的灵感,他们疏浚了芝加哥河并使其改道,借此为现代芝加哥大都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⑮ 原来的运河则是经济上的失败。

其他运河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弗吉尼亚和马里兰都以本州资金赞助波托马克运河公司,而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就是乔治·华盛顿本人。该公司在波托马克的五个瀑布附近修筑了水闸,最后以破产告终。1825 年,一家新的企业,切萨皮克和俄亥俄运河公司成立,联邦政府初期投资 100 万美元,另有 200 万美元来自州和地方的资金。私人资金很少,仅有 60 万美元。运河将延伸到马里兰的坎伯兰。这一目标终于在 25 年后的 1850 年达成,耗资 1 000 万美元,其中 60% 由马里兰州独自承担。

弗吉尼亚的内部改善过程相对更为浩大。古德里奇估算,截至 19 世纪 50 年代末,该州在运河、公路和铁路上共投资了约 5 500 万美元。在弗吉尼亚,州政府的协助一直只是吸引私人资金的诱饵。弗吉尼亚是前述赫斯特假说的一个清楚的例证。正如 1815 年的一份报告所言:“联邦应该尽力吸引个人财富流往有利于公共福利之处。”^⑯ 弗吉尼亚州政府竭尽所能将该州内部对商业开放。显然,他们并不因(按私人标准)缺乏利润而气馁,因为南北战争爆发后,弗吉尼亚又批准了大笔的新公共资金支出。

如果没有铁路,运河系统本来是很有意义的。正如阿尔伯特·尼米(Albert Niemi)所说,地方农业因为运输成本的下降而更为繁荣,而这些运河催生了为此服务的制造业部门。但是,罗杰·兰森指出,运河沿线新兴的制造业主要是对农业产品进行加工,以便通过新的运河输送到别的地方去。^⑰ 无论如何,运河降低了交通成本,带来了经济繁荣。但是因为铁路的出现,美国的大部分运河注定要失败。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在运河完工之前,就已出现了竞争性的铁路线路。铁路虽然运费较高,但更快、更可靠且常年可用,运

^⑬ 关于这一时期内部改进总体上的经济和政治困难,参见 John Joseph Walls, “The Property Tax as a Coordinating Device: Financing Indiana’s Mammoth Internal Improvement System, 1835—1842,”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40, no. 3, July 2003. Jon Joseph Willis and Barry Weingast, “Equilibrium Impotence: Why the States and Not the American National Government Fin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ntebellum Er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1397, June 2005 认为,因为宪法对收益税的禁止,美国国会不能支持那种使用从全国征收的赋税来给予一小部分地区利益的项目。

^⑭ Goodrich (1960), pp. 135—137; and Roger Ransom, “Inter-regional Canals and Economic Specialization in the Antebellum United States,” *EEH*, Fall 1967.

^⑮ Louis Cain, *Sanitation Strategy for a Lakefront Metropolis: The Case of Chicago*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8).

^⑯ 前文数据可参见 Goodrich (1960), p. 4; also pp. 87—101 for data in preceding paragraph.

^⑰ Roger Ransom, “Canals and Development: A Discussion of the Issues,” *AER*, May 1964; Albert Niemi, “A Further Look at Interregional Lands and Economic Specialization: 1820—1840,” *EEH*, Summer 1970; Roger Ransom, “A Closer Look at Canals and Western Manufacturing,” *EEH*, Summer 1971; and Albert Niemi, “Reply” to Ransom, *EEH*, September 1972.

河基本上被遗忘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⑧

2.2 汽船

如果不提到汽船的发展和它们在美国庞大的内河体系——俄亥俄河、密苏里河和密西西比河流经半个大陆——中的作用,那么对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经济发展的描述就是不完整的。罗伯特·富尔顿与他的助手希望获得密西西比河的垄断权,就像他们之前获得哈德逊河的垄断权一样,但是我们看到,吉本斯诉奥格登案(1824)表明不会有垄断了。平底船、龙骨船以及传说中的蒸汽驱动轮桨船使得广大内地的农场主能够将其庄稼便宜地运输到河的下流,一直到新奥尔良和海上。这些船也将新奥尔良的制造品运回内陆。詹姆斯·马克(James Mak)和加里·沃尔顿如此评价这个时期:“从1815年到1860年,这些地区从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转变成了农业的心脏地带,这主要归因于内河运输的改善。”^⑨

这一过程在1811年就已开始。汽船对供给方面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两点:(1)汽船可以承载的货物吨位,(2)这些吨位能够带来的生产力。它使用的效率如何?两个因素都能增加给定价格上的运输供给。因为运输的整个供给曲线右移,吨位增加,使用效率增加,降低了食品运输的成本,消费者的食品价格也因此降低。

埃里克·黑茨(Erik Haites)和詹姆斯·马克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南北战争之前西部河流上的汽船及其吨位的理解。他们通过估算每年退役的船只数量和吨位,计算出了每年吨位和汽船数量的净增额。表8.1为黑茨和马克给出的选定年份的数据。

表 8.1 西部运河上运营的汽船

年份	数量	吨位
1811	1	371
1815	7	1 516
1820	69	14 208
1825	80	12 527
1830	151	24 574
1835	324	50 123
1840	494	82 626
1845	538	96 155
1850	638	134 566
1855	696	172 695
1860	817	195 022

资料来源:Erik F. Haites and James Mak, “The Decline of Steamboating on the Ante-Bellum Western Rivers: Some New Evidence and an Alternative Hypothesi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no. 1, Fall 1973. Derived from their table A-1 with permission from Elsevier.

^⑧ 加拿大人也参与了南北战争之前运河的“交通革命”。他们的项目由政府筹资,在经济上遭受了失败。Thomas F. McIlwraith, “Freight Capacity and Utilization of the Erie and Great Lakes Canals Before 185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6, no. 4, December 1976.

^⑨ James Mak and Gary Walton, “Steamboats and the Great Productivity Surge in River Transportation,” *JEH*, September 1972, p. 620.

1860年,一条内河汽船的平均使用年限仅有5年。^②然而这些船只并不便宜。在杰里米·阿塔克(Jeremy Attack)报告的一个样本中,最便宜的汽船耗资也超过85%的现有制造厂的投资,相对于六个普通农场的价格。阿塔克的样本中,超过半数的船只是因为事故而报销。其中大部分船只触到了河中的障碍物,爆炸和起火也是常见的事故。^③

截至19世纪50年代末,美国内河上约有800条汽船服役。从1815年到1860年,向上游的实际运费下降了约90%,向下游的运费下降了近40%(因为平底船市场的激烈竞争,向下游的运费本来就较为便宜)。^④沉重的货物,如庄稼和原材料,一般向下游运送,而较轻且单位价值更高的货物一般是向上游运送,它们从汽船技术中收益尤多。运输和周转时间因为汽船及相关技术的出现而大幅缩减了。

内河汽船服务的增长并不是恒定的,无论是在建设上还是在可用吨位上。黑茨和马克发现,其活动周期和总体经济的波动基本一致,哈维·西格尔在对运河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⑤经济周期对交通的影响无所不在,稍后我们将看到它对新兴的铁路系统也有影响。在总体经济扩张期,汽船建造也兴盛蓬勃;在总体经济不景气时,它对汽船建造的影响约滞后一年才显现出来。尽管那时前景悲观,但正在建造的汽船一般会继续施工直至完成。在另一方面,因为经济不景气时可以随时解散船员、停用船只,因此使用中的吨位不会出现对经济周期的滞后现象。

汽船建造的每一次新热潮都蕴涵着新的技术进步,因此,每船生产率的提升倾向于比吨位的增幅增加得更多。^⑥19世纪50年代的使用吨位比更早时期的有效得多。马克和沃尔顿认为,从1815年到1860年,汽船的每单位生产率增长了近九倍。^⑦

马克和沃尔顿认为,设计上的进步(增加净承载能力占总吨位的比例),加上更好的引擎和码头设施(减少周转时间),是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而这大部分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完成。^⑧有证据表明,南北战争之前,铁路的竞争并未导致汽船总运量下降。^⑨但是战争期间对内河水系的破坏,加上战争中和战后铁路的大规模建设,最终给马克·吐温等人热烈赞誉的汽船辉煌时代画上了句号。

马克和沃尔顿强调,许多因素各自以其特有的方式共同造就了内河汽船的黄金时代:外部原因如“市场贸易的增长和商业组织的改进”有助于改善周转时间,而设计进步、河流改造、更优秀的船长和船员、保险费率的降低以及其他许多较小的改善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马克和沃尔顿引用了路易斯·亨特(Louis Hunter)的经典著作《西部河流上

② Erik Haites and James Mak, "The Decline of Steamboating on the Ante-Bellum Western Rivers: Some New Evidence and an Alternative Hypothesis," *EEH*, Fall 1973, p. 28.

③ Jeremy Attack,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Evidence in the Weaving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History: Western River Steamboats and the Transportation Revolution Revisited," *BEH*, Fall 1999, p. 5.

④ Mak and Walton (1972), p. 625.

⑤ Haites and Mak (1973), p. 30; Goodrich (1960), chap. 3, especially figure 1, p. 173.

⑥ Jonathan Hughes and Stanley Reiter, "The First 1945 British Steamships," *American Statistical Journal*, June 1958, vol. 3, no. 282, pp. 362—375. 随着英国汽船舰队的发展,铁制螺旋驱动的汽船逐渐取代了木制的明轮船。

⑦ Mak and Walton (1972), p. 637.

⑧ *Ibid.*, figure 1, p. 624.

⑨ Haites and Mak (1973), pp. 31—33.

的汽船》，说这事完成的“过程是艰难而缓慢的”。^② 无论如何，南北战争之后，铁路取代了汽船，迎来了传说中的美国经济“交通革命”。

2.3 铁路

铁路长期以来在美国经济历史书上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有史以来从未有别的创新比铁路更能吸引历史学家的注意力，或更能凸显 19 世纪美国人的冒险精神。除了颜色（在歌曲和故事中），铁路在美国历史中如此重要的原因有二：（1）和我们讨论过的其他交通方式相比，铁路被认为更加彻底地“开放了这个国家”，它的建设（冒着极大的风险）“超前于需求”，是对未来的赌博。（2）铁路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将这个国家的四面八方联系起来，鞭策着这个国家快速前进。铁路建设甚至以其自己的方式决定了 19 世纪经济周期的时间。^③ 然而，现代学者们对这些赞誉提出了严厉的质疑。

阿尔伯特·菲什洛对南北战争之前铁路的研究推翻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早期铁路一般是由具有远见卓识且能够预知未来发展方向的天才人物“超前于需求”建造的。^④ 菲什洛发现，早期铁路主要修筑在本就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地区，即使在伊利诺伊也是如此，而且政府资金的需求量根据线路的收益性而大幅变化：私人投资者的收益前景越差，需要的政府资金就越多。

菲什洛认为，在政府资金比例最高的地区，当地政府投资的动机主要是“防御性的”——为了确保某些地区不会被铁路绕过。铁路规划者有时完全根据当地政府的承诺来决定线路：在这种情况下，证据支持传统观点，即鼓吹者们欺骗政府投资可疑的事业。但是政府也愿意提供经济协助以吸引鼓吹者（现在仍然如此，如税收增额融资制度）。显然，这种欺骗是双向的。无论如何，这些机会显然对双方都是有吸引力的，虽然并不一定是平等的。

罗伯特·福格尔的铁路创造社会节约的观点曾在一段时期里让所有的历史学家感到迷惑。^⑤ 数十年的传统一直将铁路建设放在解释 19 世纪美国经济飞速增长的原因的核心地位。福格尔没有重复描述美国铁路建设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而是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从来就没有铁路，那么这个国家本来会发展成什么样？铁路的社会节约（social saving）——有铁路的真实 GNP 和使用次佳交通方式（在本例中是河运）将会达到的 GNP 的差额——是多少？

出人意料的是，福格尔发现，河运体系将会达到几乎同样的结果。1890 年的农业用地中只有 4% 会不被开垦。社会节约将是 1890 年估算 GNP 的约 5%。而且，在这个普遍

^② Mak and Walton (1972), p. 636. Louis Hunter's great work is *Steamboats on the Western Rivers* (1949). 如欲查看更为近期的对中西部汽船历史的总体研究，参见 Erik Haites and James Mak, "Ohio and Mississippi River Transportation, 1810—1860," *EEH*, Winter 1970; and Erik Haites and James Mak, "Steamboating on the Mississippi Before the Civil War: A Comparative Study," *BHR*, Spring 1971.

^③ Robert Fogel,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Econometric History* (1964), pp. 1—10, 有对传统观点的概述。关于经济周期，参见 *Business Cycles*, 2 vols. (New York: McGraw-Hill, 1939); Leland Jenks, "Railroads as an Economic Force in American Development," in Frederic Lane and Jelle Riemersma, *Enterprise and Secular Change* (1953).

^④ Albert Fishlow, *American Railroa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nte-Bellum Economy* (1965). Also, see Fishlow (1972). Lloyd Mercer has shown that the developmental role, "building ahead of demand," cannot be abandoned entirely in the case of railroads financed in large part by government land grants, mainly after the Civil War. Lloyd Mercer, "Building Ahead of Demand: Some Evidence for the Land Grant Railroads," *JEH*, June 1974.

^⑤ 福格尔 (1964)。对这本书的批判性反响在当时是令人敬畏的。另请参见 Peter McClelland, "Railroads, American Growth a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A Critique," *JEH*, March 1968.

认为铁路对钢铁行业的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时代,1849年美国普通钉子的总消耗量是铁路对钉子的总消耗量的两倍多。福格尔认为,铁路对钢铁行业的“后向联系”(backward linkage)并不是那样重要,甚至在1860年之前,它对伐木业、煤业甚至交通器材业的影响也不是至关重要的。^②

福格尔并不是想将铁路从美国经济史中抹去,而是想拓宽思路、寻找经济发展的更多原因。福格尔的观点是,美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大跃进”,并不是哪个单独的发明创造能够造成的。美国的经济增长确实非常巨大,铁路也发挥了作用,但房屋建造、大腹铁炉(potbellied stove)等同样也发挥了作用。实际上,截至1860年,美国的铁路钢(rail iron)中只有40%是国产的,其余则是从英国进口的。

总而言之,铁路是技术转移的重要例证。第一条运营的铁路是斯托克顿(Stockton)至达灵顿(Darlington)铁路,于1825年在英国启动。五年后,1830年,美国的巴尔的摩至俄亥俄铁路开始运营,这个国家的铁路时代开始了。美国人将英国技术改造得适合本国国情。表8.2表明了这项技术是如何在美国快速传播的。^③

表 8.2 1830—1860 年的铁路运营里程

年份	里程(英里)
1830	23
1835	1 098
1840	2 818
1845	4 633
1850	9 021
1855	18 374
1860	30 626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f 874.

1869年的铁路里程只是一个开始,在这个行业的峰值年1930年,运营中的铁路干线(main track)长达260 400英里(如果包括所有车场[yard]、转轨线路[switching track]等的话,总长为429 883英里)。截至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铁路里程已经超过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④ 表8.3为截至1860年各地铁路里程的分布。

表 8.3 1860 年的铁路里程分布

地区	里程(单位为英里)	百分比
新英格兰	3 660	12.1
中大西洋地区	6 353	21.0
中北部	9 592	31.7
南方	8 838	29.2
密西西比河以西	1 840	6.0

资料来源: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ol. 18(1958), p. 918.

^② 参见 Fogel (1964), chap. 6 的总结。

^③ 有关于较早时期的有趣观点, Franz Anton Ritter Von Gerstner, *Early American Railroads* (1997)。此书为英文翻译,原书为德语,出版于1842—1843年,对运河和铁路都进行了地理上的分析。

^④ 1860年时,英国的铁路里程为10 410英里;法国约为5 000英里;德意志诸州约为7 000—8 000英里,视所计之州而不同。

菲什洛估算,截至 1860 年,对铁路的总投资超过了 10 亿美元,比对运河的投资高出五倍多。^⑤ 政府参与度在南方最高,约占总投资的 50%。那里人口稀少,与运河的竞争激烈,导致收益前景较差。在新英格兰和中西部的主要线路中,政府资金只占总投资的 10%。截至 1860 年,约有 4 000 英里铁路汇合在芝加哥这个新兴的中西部铁路中心,而芝加哥政府本身并未在铁路上投资一分钱。

铁路对运河的侵蚀来自于总运输成本的节约。铁路全年都可提供服务,而主要的运河却要在寒冬时面临冰封期。而且,铁路提供了更多的接触点(contact point),因此减少了马车运输、货物装卸、重装的成本。所以,尽管在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整个线路上,铁路的每吨英里价格不如水运,然而铁路降低了装运成本。从一开始,铁路就侵蚀了运河潜在的收入,并共同分享着总体经济增长的成果。因为在地形平坦的地方,铁路一般是沿着河流修筑的(参见图 8.2),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铁路实际上是与现有的水运线路平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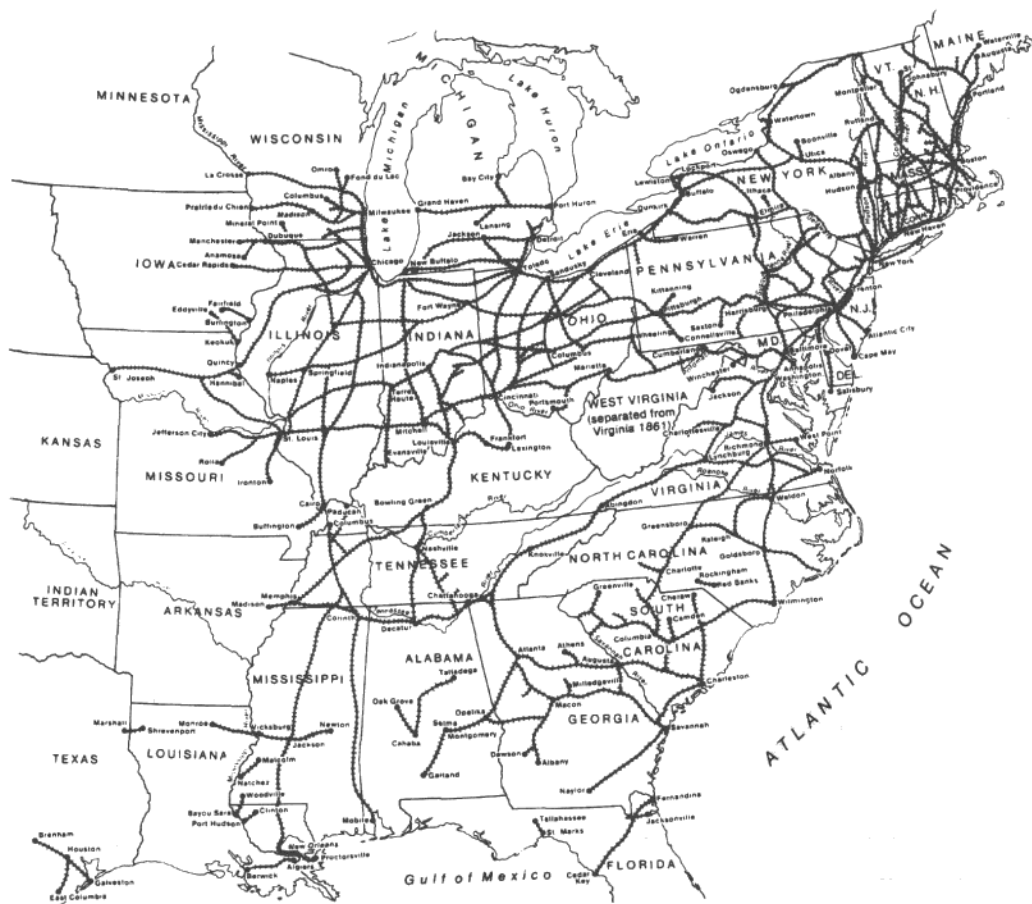


图 8.2 1860 年的美国铁路

铁路很快超过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运河系统。到 1860 年,主要的东部城市已经全部由铁路连接起来,美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之间不再是那样互相隔绝了。1860 年,北方的铁路网比南方稠密得多。

^⑤ 菲什洛的估计如下:1828—1843 年 1.371 亿美元;1844—1850 年 1.723 亿美元;1851—1860 年 7.377 亿美元。仅在 19 世纪 50 年代,总资本投资就几乎翻了一番。Fishlow(1972), p. 496.

即使如此,如果认为那些被抛弃的运河之所以经济失败完全是由铁路的竞争导致,那是误入歧途的。许多运河,如印第安那州的沃巴什至伊利运河(甚至在其北部完工之前,其南部已被抛弃了),是受到了政府支持因素的致命损害而结束运行的,而这些政府支持正是其最初得以开挖的原因。1837年和1839年的经济危机之后一直持续到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恶化了各州的财政状况,以至于九个州推迟了对其债务的偿付。^⑤其中包括伊利诺伊、印第安那、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州,它们的主要运河再也未能修成。

铁路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但那只是铁路大发展的开始阶段,在19世纪50年代的下一轮大扩张中,铁路再次吸引了政府资金和国外投资。而且,在1850年,联邦政府向伊利诺伊、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州授予了375万英亩的巨量土地以资助修建伊利诺伊中央铁路。^⑥这不是内部改善获得的第一个土地授予令,但却是截至那时最大的一个,而这还只是开始。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土地建设热潮最终导致了横跨大陆的铁路的出现。铁路增长的详细情况将在本书后面部分详述。截至南北战争之前,水路(包括海岸沿线的航运)仍然比新兴的铁路承载更多的货物,但是其黯淡前景已经隐约可见。

2.4 周期

内部改进的建设周期基本和经济周期一致,大扩张时期在19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尽管该周期和运河投资的数据有矛盾,但是铁路的数据则表现得相当一致。^⑦然而不能因此认为铁路是经济建设周期起伏的唯一原因:涉及铁路的经济数据和GNP总量相比过于渺小,而且经济周期的远期原因也有待探寻,在其他领域还存在矛盾,如银行业、外贸变化和货币供给。

保罗·库特纳(Paul Cootner)认为,美国对交通的需求,包括铁路,恰恰反映了世界对美国商品的需求。^⑧铁路建设就像经济的其他部分一样,随整体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反应。因此,表面上是铁路引起了经济的变化,实际上仅仅是两者都随着经济周期而运动。无论如何,19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的内部改善和铁路建设无疑为那些年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加速了南北战争之前经济发展的过程。

3. 城市化

随着交通网络的拓展,建设商业和工业中心的可能地址也一再增多。每个交通枢纽都是一个可能的地址,但是我们知道,其他经济因素也会发挥作用。我们不会期望每个铁路和河流交汇的地方都出现一个城市。然而,如果我们只考虑美国统计局定义的“城镇地区”——超过2500居民的定居点——似乎最多的城镇确实是在南北战争之前出现

^⑤ R. C. McGrane, *Foreign Bondholders and American State Debts* (New York: Macmillan, 1935).

^⑦ Paul Gates, *The Illinois Central Railroad and Its Colonization Work* (1934). 这是一本卓越的著作,论述了与混合型企业有关的所有困难,资料翔实丰富——联邦政府、州与地方政府、外商投资、金融危机及其政治后果。

^⑧ Jonathan Hughes and Nathan Rosenberg, "The United States Business Cycle Before 1860: Some Problems of Interpretat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vol. 15, no. 3, August 1963.

^⑧ Paul Cootner, "The Role of the Railroads in United States Economic Growth," *JEH*, December 1963.

的。从 1790 年到 1860 年,人口仅增长了 8 倍,而城镇地区的数量则增长了 16 倍以上。

3.1 城镇和城市

1790 年,美国约有 24 个城市的人口数超过 2 500。到 1830 年,甚至在内部改进的第一次真正热潮之前,城市数量已经达到了 90 个。到 1860 年,超过 2 500 人的城市达到了 392 个。城镇人口的比例在 1790 年仅为 5%,在 40 年后也只有 8.7%,但在 1860 年时为 19.7%,接近 1/5。城市化已经来临。表 8.4 为城镇地区的原始数据。

表 8.4 1790 年、1830 年及 1860 年时的城镇人口规模分布

城镇人口 规模	1790		1830		1860	
	城镇数量	总人口	城镇数量	总人口	城镇数量	总人口
2.5—5	12	44	34	126	163	595
5—10	7	48	33	231	136	976
10—25	3	48	16	240	58	884
25—50	2	62	3	105	19	670
50—100			3	222	7	452
100—250			1	203	6	993
250—500					1	267
500—1 000					2	1 379
总计	24	202	90	1 127	392	6 216
占美国总人口的 百分比		5.1		8.8		19.8

注:人口数量单位为千人。

资料来源:Derived from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a 31, 685—715.

尽管这种增长和之后的城市化比起来只是九牛一毛,然而其中已经存在一些有趣的特征。表 8.5 为 1800 年和 1860 年的十大城市。美国殖民时期的四大中心城市在 1860 年时仍然是最大的城市。纽约市和费城互换了位置,这主要是由于伊利运河。后面六个

表 8.5 1800 年和 1860 年的十大城市

名次	1800	1860	1800 年、1860 年都在 十大名单的城市	1860 年十大名单上 新增的城市
1	费城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2	纽约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3	巴尔的摩	Baltimore	Baltimore	
4	波士顿	Boston	Boston	
5	查尔斯顿	New Orleans		New Orleans
6	塞勒姆	Cincinnati		Cincinnati
7	普罗维登斯	St. Louis		St. Louis
8	纽黑文	Chicago		Chicago
9	里士满	Buffalo		Buffalo
10	朴次茅斯	Newark		Newark

资料来源:Lance 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Economy* (Homewood, IL:Irwin, 1969), p. 265.

殖民时期的城市则从名单中消失了,被新的城市取代。纽华克是新兴的制造业和港口城市。布法罗在五大湖航运的首要位置,通过运河和铁路与东海岸相连。它也是面粉业和制造业的中心。名单上的其他新兴城市在西部的水道上,芝加哥则正在逐渐成为美国铁路系统的核心。最大城市的西移反映了整体人口的西进运动——到1860年,美国人口的地理中心已经从巴尔的摩转移到了俄亥俄州的奇利科西。

3.2 城市化的经济学

如前所述,外部经济体是城市化的主要原因,虽然不是唯一原因。除了一些不可分割性,例如有效供水、排水、防火的最小规模之外,尚没有足够的内部经济体足以维持形成美国最大城市地带的庞大规模的增长速度。

是外部经济体的力量形成了美国的大部分城市。每个企业或经济机构都能因位于城市而获得一些好处:因为位置,其净回报超过了生产成本。集中在统一地点具有明显的好处,如果肉商的隔壁就是面包房,那么他们的顾客就不用跑两处买东西,从而减少了交通成本。这还有利于顾客去更远的地方买东西,从而使肉商和面包房的顾客基数都得以增加。这种力量在南北战争之前就十分明显。从表8.6可以看出,城镇人口中大部分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

表 8.6 1790 年、1830 年及 1860 年的城镇人口规模分布

城镇人口 规模	城镇人口					
	1790		1830		1860	
	城镇数量	百分比	城镇数量	百分比	城镇数量	百分比
2.5—5	12	21.7	34	11.2	163	9.6
5.0—10	7	23.8	33	20.5	136	15.7
10—25	3	23.8	16	21.3	58	14.2
25—50	2	30.7	3	9.3	19	10.8
50—100			3	19.7	7	7.3
100—250			1	18.0	6	16.0
250—500					1	4.3
500—1 000					2	22.1
总计	24	100.0	90	100.0	392	100.0

注:人口数量单位为千人。

资料来源:Derived from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a 31, 685—715.

1790年,城镇人口中有30%以上居住在费城和纽约市里。1830年,城镇人口中有37.7%居住在四个地方:纽约市、费城、巴尔的摩、波士顿。1860年有392个城镇,但46%的城镇人口居住在10个城市里,其中仅最大的两个城市的人口就占据了全部城镇人口的22%。

我们从美国殖民时期的经历中可以看出,成功发展的定居点需要有腹地提供支持。这个腹地是位于附近的原材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市场。因为分工,各自专门从事自己利润最大的方面,每个定居点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地区性特点。例如,新奥尔良会发展与棉花相关的服务业和辅助贸易;匹兹堡和铁相关;芝加哥和牲畜、小麦、玉米、铁路相关。戴安

娜·林斯特龙(Diane Lindstrom)对1815—1840年费城的研究表明,费城的发展主要是其自身制造品和服务与广大腹地的农业产品的交换。费城的对外贸易衰落了,它未能成为任何产品的主要出口地。^⑩

这一过程在较小的城镇中也在发生,每个市场区域里的定居点都会逐渐专业化。正如尤金·斯莫伦斯基(Eugene Smolensky)所写,一段时间之后,任何城镇的特点都不能孤立地理解了,因为每个城镇都是大系统的一部分,都会在市场区域内专业化,在某些方面互相依赖:

所有的城镇、村庄和城市都是大系统的一部分,每个都在城镇等级结构中占据一席之地,为一个地区服务。而且,只有将一个地区看做互相依赖的地区系统的子系统,才能理解这个地区的各个城镇。^⑪

随着经济发展,专业化的经济子系统随之发展,城市化也作为经济扩张的自然组成部分而进行。至今这一过程尚未结束;而在1860年,美国城市的大发展还刚刚开始。图8.3为1860年时美国的主要城市。它们都位于海洋、大湖、大河造就的交通要道上,当地的经济活动足够强烈。

在我们现在的时代,交通和通信的进步使得去中心化得以发展(本书后面的章节将详细讨论这一话题)。但是在规模不经济因素(diseconomy of size)——一般是过多的税收、污染、拥塞和犯罪——超过了正外在性之前,城镇区域仍然会继续发展扩大。经济上最有利的结合是交通、通信及制造业。尽管我们已经指出,即使在南北战争之前,工业化并不是城市化的唯一原因,但工业化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占据主导地位。^⑫正如兰斯·戴维斯(Lance Davis)所写:“因为纺织业可以在新英格兰发展,城市简直就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例如洛厄尔和劳伦斯)。”^⑬南北战争之前在南方的城市里,商业是主导因素。^⑭

工业化使得工厂有利可图,尤其是使用了中央原动机(central prime mover)如水力或蒸汽动力的地方。工厂因为内部的规模经济而增长。工人住在工厂附近,满足人和机器需要的相关服务也追逐利润而来,这使得住在这里的其他人的真实成本也降低了。因此,城镇出现了。我们将在第11章中道格拉斯·诺斯的围绕一个出口基地的地区增长模型中看到这一过程。正如沃伊丁斯基(Woytinsky)和沃伊丁斯基所得出的结论:“城市化的模式由历史、地理和经济条件的结合所决定。”^⑮

1860年的十大城市名单中,并没有哪个城市是纯粹的商业中心、交通中心或工业中心。即使新奥尔良基本上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商业和交通中心,但它也有自己的工业活

^⑩ Diane Lindstrom, "Demand, Markets, and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Philadelphia, 1815—1840," *JEH*, March 1975, pp. 271—273.

^⑪ Eugene Smolensky,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Urban Growth," in Davis et al. (1972), p. 536.

^⑫ Diane Lindstrom and John Sharpless, "Urban Growth and Economic Structure in Antebellum America," *REH*, 1978.

^⑬ Lance Davis, Jonathan Hughes, and Duncan McDougall,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third edition (Homewood, IL: Irwin, 1969), p. 266.

^⑭ Lindstrom and Sharpless (1978), p. 169.

^⑮ W. S. Woytinsky and E. S. Woytinsky, *World Population and Production, Trend and Outlook*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53), p. 125.



图 8.3 1860 年的主要城市

1860 年时,美国的大多数主要城市在北方;新西部由环绕大湖区的一系列城市所代表,在南北战争之后,这一地区成为新工业化的焦点地区。

动,还有造船业。美国就像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保罗·芒图(Paul Mantoux)所说的英国:工业的种子播种在土地上,“收获了一群城市”。^⑥ 这一过程在 1860 年的美国已经初见端倪,在之后的半个世纪将更加势不可挡。

托马斯·杰斐逊所希望的世外桃源,一个由数百万农夫组成的庞大国家,永不会存在了。这个国家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将围绕着交通体系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城市化的社会。1860 年,美国仍有 4/5 属于乡村,南方则比北方有更多乡村。内部改进和自然水系,甚至在重工业出现之前,就展现出了城市化的力量。

随着全国体系的发展,铁路建设在 19 世纪 50 年代达到了顶峰。离开芝加哥的第一条铁路直到 1848 年才出现,同年,伊利诺伊和密歇根运河竣工。几年后,从芝加哥坐上火车便可直达纽约市。这将两个城市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伊利运河更甚。在 19

^⑥ Paul Mantoux,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 Outline of the Beginnings of the Modern Factory System* (London: Jonathan Cape, 1928), p. 368.

世纪 50 年代,铁路比运河更为优越。在那之前,运河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它们自身的成功造成的(它们通过向较小的市场修建支线而扩张),因为它们是与铁路竞争的产物。

推荐阅读

文章

Atack, Jeremy.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Evidence in the Weaving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History: Western River Steamboats and the Transportation Revolution Revisited." *Business and Economic History*, vol. 28, no. 1, Fall 1999.

Callender, Guy Stevens. "The Early Transportation and Banking Enterprises of the St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7, no. 1, November 1902.

Cootner, Paul. "The Role of the Railroads in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3, no. 4, December 1963.

David, Paul. "Transport Innovation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Professor Fogel on and off the Rail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vol. 22, no. 3, December 1969.

Fishlow, Albert. "Internal Transportation." In Lance 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chap. 13.

Fleisig, Heywood. "The Central Pacific Railroad and the Railroad Land Grant Controvers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5, no. 3, September 1975.

Haite, Erik F., and James Mak. "Ohio and Mississippi River Transportation 1810—186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3, no. 2, Winter 1970.

———. "Steamboating on the Mississippi Before the Civil War: A Comparative Study."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45, no. 1, Spring 1971.

———. "The Decline of Steamboating on the Ante-Bellum Western Rivers: Some New Evidence and an Alternative Hypothesi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no. 1, Fall 1973.

Heath, Milton. "Public Railroad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 in the South Before 1861."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10 (supplement, "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1950.

Hidy, Ralph, and Muriel Hidy. "Anglo-American Merchant Bankers and the Railroads of the Old Northwest, 1848—1860."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34, no. 2, Summer 1960.

Jenks, Leland H. "Railroads as a Force in American Development." In Frederic C. Lane and Jelle Riemersma, eds. *Enterprise and Secular Change*. Homewood, IL: Irwin, 1953.

Lindstrom, Diane L. "Demand, Markets and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Philadelphia, 1815—184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5, no. 1, March 1975.

Lindstrom, Diane L., and John Sharpless. "Urban Growth and Economic Structure in Antebellum America."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 1978.

Mak, James, and Gary Walton. "Steamboat and the Great Productivity Surge in River Transport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2, no. 3, September 1972.

McClelland, Peter D. "Railroads, American Growth, a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a Critiqu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8, no. 1, March 1968.

Mercer, Lloyd J. "Building Ahead of Demand: Some Evidence for the Land Grant Railroad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2, June 1974.

Niemi, Albert W., Jr. "A Further Look at Regional Canals and Economic Specialization: 1820—184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7, no. 4, Summer 1970.

———. "A Closer Look at Canals and Western Manufacturing in the Canal Era: A Repl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9, no. 4, September 1972.

Ransom, Roger L. "Canals and Development, A Discussion of the Issu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4, no. 2, May 1964.

———. "Interregional Canals and Economic Specialization in the Antebellum United Stat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nd series, vol. 5, no. 1, Fall 1967.

———. "A Closer Look at Canals and Western Manufacturing in the Canal Era."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8, no. 4, Summer 1971.

Smolensky, Eugene.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Urban Growth." In Lance 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chap. 15.

Weiss, Thomas. "Demographic Aspects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1800—1840." In Peter Kilby, ed., *Quantity and Quiddity: Essays 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Williamson, Jeffrey. "Urbanization in the American Northeas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5, no. 4, December 1965.

Williamson, Jeffrey, and Joseph Swanson. "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American Northeast, 1820—1870."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2nd series, vol. 4 (supplement), 1966.

书籍

Fishlow, Albert. *American Railroad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Fogel, Robert W.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Econometric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4.

Gates, Paul W. *The Illinois Central Railroad and Its Colonization Work*.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Goodrich, Carter H. *Government Promotion of American Canals and Railroads, 1800—189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 1783—1861*.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7.

Goodrich, Carter H., Jerome Cranmer, Julius Rubin, and Harvey Segal. *Canals an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Haites, Erik F., James Mak, and Gary Walton. *Western River Transportation: The Era of Early Internal Development, 1810—186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Hunter, Louis. *Steamboats on the Western Riv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Hurst, James Willard. *The Legitimacy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69.

North, Douglass C.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1.

Taylor, George Rogers. *The Transportation Revolu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51.

Von Gerstner, Franz Anton Ritter. *Early American Railroa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第 9 章

农业的扩张：两种土地体系的冲突

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对今天来说十分遥远。现在活着的人没人能记得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这个领域现在完全属于历史学家，而这些历史学家们的意见在许多重要方面并不相同。我们已经讨论过关于这个时代的许多事情，那时经济的中心是农场和农民。

是农民在这块大陆上开垦、生产，是他们的需求创造了工业、城镇、金融、交通网，是他们的产出养活了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① 1850 年，农民仍然占劳动力总数的近 60%。他们赢得了一个帝国，但是（通过选举代表）却不能就一个基本组织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劳动契约是否包括黑人奴隶制。最终，这个问题导致了南北战争。它是唯一的原因吗？不。然而如果没有奴隶制的问题，会有南北战争吗？不。^②

如前所述，尽管殖民时期北方也存在奴隶制，但地区性农业的比较优势逐渐将奴隶人口集中到了南方。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奴隶制在农业中变得重要时，是历史鼓励了其持续和蔓延。18 世纪末契约劳工供给的枯竭使得购买奴隶在南方变得更加必需。1725 年之后，自然增长是奴隶供应的主要来源，来自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进口是次要的。从宾夕法尼亚以北，大量的早期白人移民为形成庞大而不断增长的白人人口打下了基础，因此形成了家庭农场业。随着时间的流逝，农业劳动模式的地区性差异不断增强。

截至 1850 年，南方人口中近 37% 是奴隶，而北方的奴隶人口已经可以忽略不计。1793 年伊莱·惠特尼“发明”轧棉机之后，南方种植园主扩张到阿拉巴马、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密西西比和东得克萨斯州，棉花成了奴隶制南方继糖之后另一个极为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③ 棉纺业先在英格兰发展，然后扩张到新英格兰和欧洲大陆，几十年来使得对棉花的需求不断上升，导致原棉产量大幅提高。奴隶成了必需的劳动组成部分。

与收割机和打谷机类似，轧棉机最初是一种简单的手动操作的木制机器。这些农业器具都是为了解决农业生产的瓶颈——收获能力。农夫在收获季节的劳动能力决定了这一季的收成，而轧棉机之类的器具能够增加劳动的生产率。南北方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一事实：截至 1860 年，在北方农业中没有像轧棉机这样深刻影响南方农业的器

① 在 19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密西西比河东南和东北地区，这些农民替代了美国土著部落，就像黑鹰战争时期切罗基人迁移走一样，永远涂黑了美国历史。Ray Allen Billington, *Westward Expansio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 (New York: Macmillan, 1949), chaps. 14, 15, and 32.

② 对那些宁愿看到这种观点“被估价”的人来说，参见 Gerald Gunderson,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JEH*, December 1974.

③ Angela Lakwete, in *Inventing the Cotton Gin* (2003), 解释了用来从纤维中分离棉籽的器械的悠久历史，在惠特尼之前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独立战争前时期。Lakwete 提到，惠特尼的轧棉机（1793）利用在木滚子中嵌入金属齿轮来拉出纤维，而棉籽从磨碎网眼筛中滤出来。他的装置提高了轧棉的速度，但为了数量而牺牲了纤维的质量。

具。北方,特别是边疆的劳动人口,仍然主要由自给自足、未进行劳动分工的农民组成。^④

这两种农业体系同时向西延伸,相遇时常发生冲突(地理冲突发生在边界处,精神冲突发生在法庭和国会里)。在1789年制定宪法之后的头70年里,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就是这种西进运动。最终,关于奴隶制的冲突会导致这个协议的破裂。在1787年的《东北法令》中,冲突已经有所显现;俄亥俄以北的新地区禁止奴隶制。《密苏里妥协》(1820)、《1850年妥协》、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都是试图以法律途径解决这个殖民时期就埋下隐患的问题。这个问题牵涉到经济利益、政治哲学、道德、宗教、政治。除了内战是否还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因为最终确实只有战争将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战争也使这个国家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仍感到恐惧和受伤。

彼得·特明(Peter Temin)在一篇论文中研究了两种体系之间这种看似无情的冲突。他认为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发展是对伊瓦塞·多马(Evsey Domar)著名的“不可能定理”的两种不同的解决方式。伊瓦塞·多马的“不可能定理”是:不可能同时存在(1)自由的土地,(2)自由的劳动力,(3)一个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⑤南方的选择是奴隶劳动力和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北方的选择是自由的土地、自由的劳动力、没有贵族阶级。既然这两种互不兼容的发展方式是在同一个宪法框架下进行的,“解决方式”就只有内战了。尽管多马的定理是针对欧洲而言的,但它使我们对美国1861年前的困境看得更加清楚。^⑥

1. 定居和人口

部分而言,农民的西进运动只是有机现象的结果:人口增长和新土地的吸引。在旧定居区的农场长大的年轻人希望有自己的农场。一旦向西的路途开放,东海岸的农业人口就成了前往中西部和平原区开垦农场的主要来源。来自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的定居者沿着河迁徙到俄亥俄和印第安那。弗吉尼亚人迁徙到肯塔基、田纳西和阿拉巴马。最终,这些人及其后代迁徙到伊利诺伊、爱荷华、密西西比、阿肯色和密苏里。1850年的人口调查表明,当时有145万个农场,共2.935亿英亩。十年之后,农场数为204万个,共4.072亿英亩。较老地区的土地可能开垦得更为精细,但是好地早已被占完了。在这种情况下,向西迁移最有吸引力。随着农民们向西迁移,新英格兰较落后地区的城镇逐渐被搬迁一空。宾夕法尼亚、纽约、新泽西、旧南方的情况也一样。

我们可以在表9.1中看到1850年中西部的风味,而这在今天相当明显。现在我们暂时忽略各州本地出生的人口比例。^⑦我们应该注意到,印第安那和伊利诺伊的人口中,来自南方的人相对较多。19世纪50年代印第安那和伊利诺伊具有“南方式”的政治就不足

^④ Peter McClelland, *Sowing Modernity: America's First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这是一项对农业创新的详细研究,强调了农业工具。

^⑤ 在这种意义上自由土地并不意味着价格为零,而是以市场价格自由交易,并且不受封建规则等约束的土地。

^⑥ Peter Temin, "Free Land and Federalism: A Synoptic View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JIH*, Winter 1991.

^⑦ 此表中本地出生的意思是1850年时该地的居民就出生在这个州。Richard Steckel的积极看法建立在“人力资本”的基础上,主要是农业方面,以解释内战前的这种强趋势,内部移民主要发生在从东至西,从北至南则相对较少。Richard Steckel,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East-West Migration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EEH*, January 1983.

为奇了。在威斯康星、密歇根和伊利诺伊,大量人口出生于欧洲,来自旧的中部殖民地的人也非常多。新英格兰人比例最高的是密歇根和威斯康星。显然,西进运动的影响在新英格兰日渐消失的城镇上比在中西部充满活力的新定居点上更为明显。^⑧

表 9.1 1850 年中西部人口的出生地点和住所

1850 年的 住所	出生地点						总计
	新英格兰	中部地区	南方地区	西北地区	本地出生	欧洲	
俄亥俄	3.3	15.0	7.5	—	64.2	10.0	100
印第安那	1.2	8.0	18.5	13.7	52.8	5.8	100
利林奥斯	4.4	13.2	16.2	12.9	40.4	12.9	100
密歇根	7.8	37.7	1.0	4.5	35.2	13.8	100
威斯康星	8.9	26.2	1.6	7.5	20.7	35.1	100

注:数据为百分比。

资料来源:Ray Billington and Martin Ridge, *Westward Expansion*, Fifth edi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82), p. 308. Copyright 1982 by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 世纪 30 年代,哈里亚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写过一段对话,内容是一个南方立法者抱怨年轻人都去了西部:

他告诉我,他的聪明可爱的年轻邻居们一个又一个地离开家,抛弃了文明生活,“像裹挟奴隶一样”带上他们的新娘,一头钻进了西部荒野,因为那儿的好地便宜。^⑨

而且,还有土地投机这一吸引人的要素(参见第 5 章)。获得一块土地,略加开垦,建造房屋和谷仓,然后把地卖掉,前往新的土地——很累,但对许多农业家庭来说,是极为有利可图的边疆事业。

表 9.2 为阿巴拉契亚山脉 16 州的人口数据。1810 年时,这些地区人口只占美国人口总数的 15%,到 1850 年已占 46%。直到南北战争之前的数年,这一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仍然快于其他地区。在北方,能够种植玉米、小麦和蓄养家畜的土地吸引着家庭农场经营者。在南方人口中,家庭农场经营者也被吸引到了可以种植棉花的富饶的密西西比灌溉平原。阿拉巴马、密西西比以及整个墨西哥湾平原的南部都在迎接他们。南方有好地的地方,就有种植园农业的机会,奴隶主也很快被吸引了过去。克劳迪亚·戈登估算,在 1790—1860 年间,约有 83.5 万奴隶从旧南方迁出(其中 85% 来自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约 75% 去了阿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东得克萨斯。^⑩

^⑧ 参见 Jeremy Atack and Fred Bateman, *To Their Own Soil: Agriculture in the Antebellum North* (1987), chap. 5, “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 详细研究了从东至西的移民总趋势。他们在例子中提到,尽管家庭是在区域内迁移,但是“没有家庭会从印第安纳州的西部长距离地迁移到西部。”(p. 75)

^⑨ Harriet Martineau, *Society in America*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2), p. 181.

^⑩ 参见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1974), vol. 1, p. 47, and vol. 2, p. 43. Recently, J. T. Toman, “The Gang System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42, no. 2, 认为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奴隶按照比较优势重新分配到指派地点。

表 9.2 跨阿巴拉契亚各州的人口

州	1810	1850	1860
俄亥俄	231	1 980	2 340
密歇根	5	398	749
印第安纳	25	988	1 350
伊利诺伊	12	851	1 712
明尼苏达	— [*]	6	172
威斯康辛	—	305	776
依阿华	—	192	675
堪萨斯	—	—	107
肯塔基	407	982	1 156
田纳西	262	1 003	1 110
阿拉巴马	9	772	964
密西西比	31	607	791
路易斯安那	77	518	708
阿肯色	1	210	435
密苏里	20	682	1 182
得克萨斯	—	213	604
总计	1 080	9 707	14 831
美国总人口	7 224	23 261	31 513
跨阿巴拉契亚各州占美国总人口 的百分比	15.0	41.7	71.1

注：人口数据的单位为千人；不包括远西地区和西海岸地区。

^{*} 无数据。

资料来源：Derived from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a 2, 2244—6550.

回顾一下，这种迁移似乎是非常合理而明显的。然而，人们决不会为了稳定而迁移。人们是为了机会而迁移，而这又受到农业产品价格周期性上升的强化。棉花、羊毛和小麦的价格（参见图 9.1），加上土地销售的数据，表明在南方和北方，价格上涨和公共土地销售在 1817—1819 年、1835—1837 年、1852—1854 年的大量增加都是密切相关的。这是在上升趋势中的销售激增。人们一直都在向西迁移，但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额外机会对南北方的迁移都起到了加速作用。

1.1 农场的平均规模

截至 1860 年，南方所有农场中，约有不到 1/3 拥有奴隶；这一比例比早些年要高。与此相反，在北方，据估计每两个农场就有一个雇用的男性工人。北方农场不是劳动密集型的。他们种植庄稼、饲养牲畜。农场机械和工具有了可观的改善，土地也充足——北方的家庭农场无须大量雇用劳动力也能繁荣发展。在另一方面，福格尔和恩格曼认为，棉花、糖、水稻和烟草中的奴隶劳动产生了规模经济。他们认为，这种经济的主要来源是集体劳动体系的运用。据估计，使用集体劳动体系的奴隶种植园比自由农场的生产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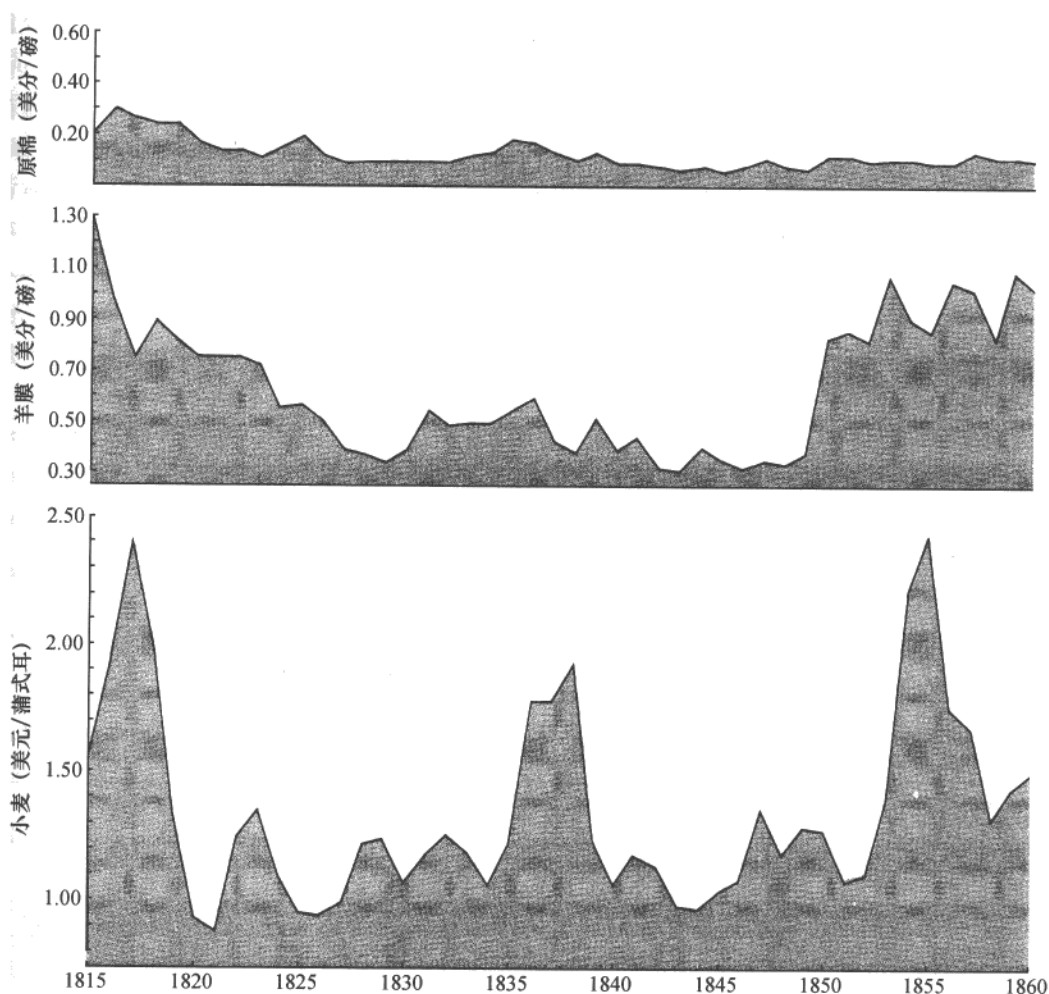


图 9.1 1815—1860 年棉花、羊毛与小麦的价格

在 1816—1820 年间,日用品的价格下降了。之后,除了 19 世纪 30 年代的短暂上涨之外,它们的价格保持平稳,直到 50 年代才又重新上涨。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c 205, 222, 226.

39%。为什么? 因为种植园主利用群体作业体系来加快生产速度。^⑩ 这一发现导致了大量的争议,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详述。无论如何,南方农场的平均规模明显比北方的大,我们不应感到惊讶。而且,南方有 1/4 的棉花种植园和农场,且其农场规模比北方的任何农场都要大得多(除了极少数最特殊的情况)。

表 9.3 中的数据只是加文·赖特(Gavin Wright)的重大工作成果的一个样本,详情可参见其著作。赖特根据土壤类型来分析南方棉花种植区。^⑪ 山麓地区(piedmont area)

^⑩ Robert Fogel,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1989), pp. 78—79; and Fogel and Engerman (1974), vol. 1, pp. 191—196, 234—237.

^⑪ See Gavin Wrigh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tton South: Households, Markets, and Weal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78), chap. 2, pp. 15—24, for all soil types.

指的是阿巴拉契亚山脚下的弗吉尼亚南部、南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和阿拉巴马。沙丘 (sand hill) 是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西部高地 (western upland) 指的是阿肯色、路易斯安那和东得克萨斯的土地。冲积平原 (alluvial lands) 是棉花种植条件最好的土地, 包括密苏里、阿肯色和路易斯安那的密西西比河和红河沿岸。1860 年, 最大的种植园和奴隶最集中的地方就在这里。

表 9.3 1860 年南方棉花种植区和其他农业州

地区	按大小划分重新分配增加的英亩数				
	0—49	50—99	100—499	500—999	≥1 000
南方地区					
皮德蒙特	4.1	8.7	36.6	14.5	36.1
桑德希尔斯	12.0	17.5	40.5	3.6	26.4
西部高地	15.5	21.7	49.3	10.2	3.2
Alluvine	4.3	4.7	33.0	24.5	33.5
南部棉花区	7.3	11.5	43.5	16.9	20.9
伊利诺伊	8.1	20.7	65.8	4.2	1.3
艾奥瓦	17.8	29.0	52.0	1.0	0.2
印第安那	17.0	28.6	51.5	2.0	0.8
明尼苏达州	52.0	24.4	23.4	0.2	0.0
俄亥俄	11.2	28.1	57.8	2.1	0.8
威斯康星	24.6	27.2	46.7	1.2	0.2

资料来源:来自于 Gavin Wright, "Economic Democracy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Agricultural Wealth in the Cotton South, 1850—1860," in William Parker, ed., *The Structure of the Cotton Economy of the Antebellum South* (Washington, DC: Agricultural History Society, 1970), table 4, p. 73.

赖特做出的更全面的数据和我们这里的样本得出的结论一致。在中西部各州, 很少有农场超过 500 英亩, 然而在南方棉花种植区这样的农场占总数的近 40%。在山麓地区, 36% 的土地属于 1000 英亩以上的农场。除了明尼苏达和威斯康星之外 (1860 年那里的农业仍然处于早期阶段), 大多数中西部农场的规模在 100—499 英亩之间。

除了较新的地区 (西部高地), 南方棉花种植区的农场在高端的分布出现了激增。显然, 在一定范围内, 使用奴隶的规模越大, 回报越多。类似的受限内部经济体在今天使用昂贵机械的现代农场上仍然存在。为了弥补高额的固定成本, 必须耕种足够多的土地, 而且, 耕种得越多, 收益越高, 直到边际成本正好和边际收入相同。

证据表明, 奴隶劳动在南方农业创造了效益——规模经济, 但这并不是无限的。即使在南方种植园, 也存在有效规模的限制。即使存在规模经济, 随着种植园规模的扩大, 成本还是会上升。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 如果没有出售股份融资组建奴隶种植园公司——即奴隶规模经济没有限制的话, 这是应该出现的。增加规模的额外成本和额外收入之比把单个种植园的有利规模限制在了某一点上。^⑬ 理想情况下, 如果有足够的土地和完全竞争的奴隶市场, 明显的规模经济将会产生巨型的种植园。

^⑬ See Gavin Wrigh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tton South: Households, Markets, and Weal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78), pp. 74—87.

就我们所知,管理、奴隶纪律和通信的问题都对棉花种植园的规模经济有着限制作用。规模经济的确存在,但有限度。雅各布·梅策(Jacob Metzger)的工作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⑭事实上,南方腹地(Deep South)有4.7%的农场大于500英亩,而东北部各州的农场中这个比例仅为0.1%,这个差别十分显著。^⑮与北方的家庭农场相比,棉花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作物,所以南方的大型种植单位需要大量的劳动者耕作,而棉花生产中集体劳动的相对高效使得较大的南方农场有利可图。

从赖特的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在南北战争之前,南方种植园的最佳规模比中西部的农场大得多。然而,超过一半的南方耕地属于家庭农场的规模范围内,即在500英亩以下,而且南方有一半农场是没有奴隶的!

1860年,南方棉花种植区的农场规模中位数是70.6英亩。在中西部各州,农场规模中位数约是这个数的70%,即49.3英亩。但是南方棉花种植区的农场规模平均数是135.9英亩,比中西部农场的平均规模64.5英亩要大一倍多。^⑯中位数和平均数之比的差异反映了南方棉花种植区在高端的激增,由奴隶集体劳动的相对大型的南方农场和种植园的超常数目。

1.2 农场财富比较

海伍德·弗莱西格(Heywood Fleisig)估计,1860年,自由州里的每个劳动力的农场器具价值为66美元,而奴隶州则仅有38美元。但是弗莱西格对北方的计算没有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南方的计算中却包括了。因为奴隶是昂贵的,南方种植园主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应该利用资本来代替奴隶。由奴隶加上土地、器具和建筑组成的一个典型的奴隶州的农场的市场价值为7101美元,而自由州仅有3311美元。在南方棉花种植区,这一数值为8786美元。^⑰赖特如此描述奴隶在持有财富的差异方面的作用:

奴隶主是目前为止这个国家最富有的阶层。奴隶主平均比北方人富有五倍,比南方未蓄奴的农场主平均富有十倍以上。^⑱

这一数据表明,尽管让现代美国人难以接受,但奴隶制作为定居的社会机制是成功的。奴隶制是不道德的,但是它确保了劳动力的供应。定居、开荒、耕地、建造的艰苦工作——那时还没有发明内燃机,大部分农活都是手工劳作——使得奴隶制具有优势。历史学家阿博特·E.史密斯(Abbot E. Smith)如此评论美国殖民时期的劳役制和奴隶制:

^⑭ Jacob Metzger, "Rational Management, Moder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Economies of Scale in the AnteBellum Southern Plantations," *EEH*, April 1975.

^⑮ Heywood Fleisig, "Slavery, the Supply of Agricultural Labor,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South," *JEH*, September 1976, p. 586.

^⑯ Wright (1978), p. 23. The mean-sized farm in 2004 was 443 acre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table 810.

^⑰ Fleisig (1976), p. 596. Terry Anderson在一次私人信件中强调了这些数据不可比性的原理。其中包括,奴隶属于“资本设备”并且有公认的市场价值。但是体现在北方农场主脑力和体力中的“人力资本”又如何呢?这一点并未考虑。如果它具有市场价值,如果市场价值(按照自由选择被雇用得到的潜在收入所衡量的机会成本)被增加到自由州的数据中,这种观点的说服力就大大降低了。

^⑱ Wright (1978), p. 35.

这是一个熟悉的故事,人类在美洲面对一片广大而人迹罕至的待开发的荒野,他们抛开了古老的等级制度的束缚,走上了自由之路(讽刺?)。这一过程中最为有效的社会机制之一就是黑人奴隶制和白人劳役制。^⑨

到了 19 世纪中期,劳役制消失了,奴隶制却没有。

奴隶制的经济学意义将在第 10 章详述。在整体上比较这两种农业体系的意义是奴隶制和棉花使得大规模机械化时代之前南方农业通过常规手段(农场和财富的规模)比北方更加成功。

2. 作为外汇赚取物的棉花

第 12 章将详细讨论 1790—1860 年间的国际收支余额问题:美国向世界其他地方出售什么,又购买什么,以及这些关系随时间变化的模式。这里,我们将农业发展放在国内经济增长的背景下进行讨论。其效果之一是直接的:农业对劳动力和资源的利用及这些活动对服务和制造品的需求。但是美国农业对国内经济的另一些影响是间接的,是通过国际收支产生的,而这些作用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称这种影响为赚取外汇(foreign-exchange earning)。

2.1 支付账单

在 19 世纪 30 年代和 50 年代,当美国快速发展时,经济使用的资源比其能够产出的要多,所以国家必须借贷。然而,借钱有利息,这对借贷者是一个负担。因此,尽管借款是及时的,加强了美国的经济的发展,但是之后的利息(加上本金的偿还)负担越轻,可供国内消费和投资使用的资源供应就越多。所以,出口是至关重要的。进口的货物需要用某些东西去偿付,这笔账单大部分是由出口支付的。表 9.4 为 19 世纪 50 年代每年商品贸易的结构。

表 9.4 1851—1860 年的商品贸易结构

商品	出口	进口
原材料	61.6	9.6
未加工的食物	6.6	11.7
加工过的食物	15.5	15.4
半成品	4.0	12.5
成品	12.3	50.7

注:数据是年平均总值占总量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Derived from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Ee 446—457.

因为制造业部门还不能提供那么大的需求,成品和半成品占据了进口量的 63%。出

^⑨ Abbot Smith, *Colonists in Bondage: White Servitude and Convict Labor in America, 1607—1776*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7), p. 226.

口品是农业和采掘业的产品；仅原材料和食物就占了出口量的 84%。

2.2 棉花的外贸收入

19 世纪 50 年代的平均出口量为 2.11 亿美元，平均进口量为 2.76 亿美元。其中 6400 万美元的差额包括“不可见”收入如货运以及外债，既有短期商业贷款，也有长期借贷（如铁路债券）。原材料出口收入中，超过半数来自棉花出口。在更早的时候，棉花的比例甚至更高。

因此，棉花显然是最重要的出口品。在整个 19 世纪都是如此，只有小麦在 19 世纪晚期勉强能与之一比。然而在南北战争之前，这个国家从海外购买所需货物的能力有一半是靠原棉直接赚取的。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之后，黄金出口也变得重要。1855 年，黄金出口额为 5400 万美元，约为棉花出口额的 61%。据道格拉斯·诺斯估计，尽管货运收入的绝对数字在增加，但其占外贸收入总量的份额实际是在下降，约相当于总出口额的 10%。^②

每年出口的棉花价值比 1815—1820 年增长了 5 倍；其数量则增长了 11 倍。棉花产量和棉花出口量的增长是南北战争之前时期的主要事件（参见表 9.5）。

表 9.5 年平均棉花出口量

时期	百万磅	百万美元
1815—1820	94	23
1821—1830	204	26
1831—1840	432	53
1841—1850	700	55
1851—1860	1 180	124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Ee 570—571.

1860 年，棉花出口的总收入达到 1920 亿美元，几乎是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 4 倍。单独一种商品能够如此主宰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这简直有些令人难以置信。英国经济不断扩张，然而其原材料有 75% 至 80% 依赖于美国南方。到 1860 年，英格兰就业劳动力数量为 1050 万，其中约有 50 万直接从事棉纺品制造业，从事棉纺业各个阶段生产的劳动力则可能有 150 万。^③ 如果南方在与各州的冲突中非常信任棉花的经济力量，这一点也不会令人感到惊奇。正如大卫·瑟丹（David Surdam）所言，在 1860 年棉花就是王者。对棉花的需求极为旺盛，而且还会继续如此。^④

^② Douglass North,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 to 1860*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1), p. 77.

^③ Jonathan Hughes, *Fluctuations in Trade, Industry, and Finance: A Study of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850—186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0), p. 72.

^④ David Surdam, “King Cotton: Monarch or Pretender? The State of the Market for Raw Cotton on the Eve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EHR*, February 1998.

3. 农业劳动：对奴隶制的依赖

农业依赖于能量。几乎所有的农活都需要举重、挖掘、拉拽、推动、剪切、砍削和运送。即使拥有现代设备，农活仍然比几乎所有其他非处罚性的工作艰苦得多。人类的身体所具备的力量有限，整个农业发明的历史就是减轻、缩短这种劳动的历史。任何能够将人类从这种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的器材、工具、动物、天然或人工的力量都是受欢迎的。更锋利的棍棒、更好的剪锄工具、役畜、滑轮、滚轮、杠杆、风力、水力——千百年来，每种手段都被尝试过了。在奴隶制中，其他人（奴隶）承受了农业劳动的劳苦。

一个奴隶可以代替一个奴隶主的劳动；许多奴隶可以代替许多自由工人的劳动。我们知道，北方农场主要种植谷物，饲养牲畜，因此其规模保持在家庭可以打理的范围内。在南方棉花种植区，关于奴隶的竞争性市场意味着，那些希望超过家庭农场规模且有钱购买奴隶的人拥有一支马上可用的劳动力队伍。问题在于如何将奴隶劳动力的获得变得有利可图。棉花、糖和烟草的种植将会诱使南方农场主购买所需的奴隶资本。南北战争之前，棉花市场是高枕无忧的，也有充足的土地销售。而且，奴隶主可以确保他们的奴隶财产会有可观的资本增殖。因此，那些懂得棉花贸易的人可以马上建立种植园。而且，白人监工和管理者的广泛使用，使得富人进入棉花种植行业更为简单。

3.1 劳动密集型的奴隶制

奴隶是自由劳动力的替代品。奴隶是否也是资本设备的替代品呢？当然不是，只要设备可以提高南方农业的生产率。没有一个理性的种植园主会不让奴隶使用铁锹、锄头和斧头。1860年前，没有可用的机械棉花采摘器，只能使用奴隶集体劳动。轧棉机的例子表明，当新的机械出现时，南方农场主会很快采用以提高生产率。

通过劳动分工和控制节奏，奴隶集体劳动变得更加高效。正如罗伯特·福格尔所言：“一旦认识到剥削奴隶劳动的基本形式是加快速度而不是延长工作时间，一些看似矛盾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②这些矛盾包括有规律的休息时间、周末放假等，甚至很可能奴隶的工作年（work year）比典型的北方农夫或南方的自由民还要短，因为那些人在田野工作完成之后还要喂养照顾牲畜和家禽。奴隶集体劳动的目标是有规律的高强度劳动。棉花市场使得南方种植园采用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形式。

3.2 棉花与奴隶人口

在1810—1830年间，棉花生产从每年17.8万包（bale）增加到了73.2万包，增幅为311%。到1860年，产量为380万包，又增加了435%。^③如果从1790年开始算的话，那就更是天文数字了（参见表9.6）。奴隶们在白人主人的指挥下向南、向西迁移，创造了美国经济史上的伟大成就之一。

^② Fogel (1989), p. 79.

^③ 1859年和1860年的收成是不同寻常的，据估计超过400万大包。表9.6中的数据是调查数据。

表 9.6 1790—1860 年的棉花产量

年份	千包
1790	3
1800	73
1810	178
1820	335
1830	732
1840	1 348
1850	2 136
1860	3 841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a 756.

1793 年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使得机械手段可以在竞争性的商业基础上识别短绒棉之后,美国棉花迅速占据了世界棉纺产品的主导地位。例如,19 世纪 20 年代之后,英国大量消费的原棉中有 3/4 来自美国。世界棉纺业的发展和美国奴隶制农业的扩张在数十年里携手并进。实际上,罗纳德·贝利(Ronald Bailey)在一篇有力的文章里指出,国际奴隶贸易带来的利润是殖民时期商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早期新英格兰工业提供了主要资本。新英格兰工商业史上的巨头如卡伯特、洛厄尔、布朗、帕金斯,甚至萨姆·斯莱特(Sam Slater)都与奴隶制脱不了关系。从一开始,新兴的美国工业体系就间接地剥削了奴隶劳动。^⑤

棉花种植区的土壤和气候赋予了南方一个经济租金——超出对资源的其他竞争性利用的经济回报。从 1820 年到 1860 年,棉花产量提高了约 11.5 倍,而奴隶人口只增加了 2.5 倍。奴隶人均棉花产量提高了 4.6 倍。

当然,有些棉花是自由的白人农民种植的,但是基本可以认为,大部分棉花是由奴隶种植的。证据表明,86% 的棉花种植在面积超过 100 英亩的农场里,90% 的奴隶属于这些农场。^⑥ 南方棉花种植区取得了惊人的农业成就:便宜的土地、奴隶劳动、雇佣管理层、对棉花不断增加的强烈需求结合在一起,使得奴隶制对奴隶主来说极为有利可图。

表 9.7 为 1790—1860 年间的南方人口数据。在这段时期里,奴隶人口比自由白人增长速度略高,因此,奴隶人口所占的比例也略微提高了。这些数据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即南方自由黑人的口增长速度比奴隶或自由白人都要高出 40%。然而,截至 1860 年,自由黑人的绝对数量或比例都仍是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

^⑤ Ronald Bailey, "The Slave(ry) Tra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New England," *Social Science History*, Fall 1990.

^⑥ Wright (1978), table 2.5, p. 28.

表 9.7 1790—1860 年的南方人口

年份	自由白人	奴隶	自由黑人	奴隶占自由白人 数量的百分比
1790	1 271	690	33	54
1800	1 704	918	61	54
1810	2 191	1 268	107	58
1820	2 776	1 644	135	60
1830	3 546	2 162	182	61
1840	4 309	2 642	214	61
1850	5 630	3 352	235	60
1860	7 034	4 097	258	58

注：人口数量以千人为单位。

资料来源：Derived from *Historical Statistics* (1960), series A 114; and *Historical Statistics* (2006), series Aa 2093, 2105.

截至 19 世纪 50 年代，蓄奴变得更加集中。赖特认为，所有南方家庭中蓄奴的比例从 1830 年的 36% 降到了 1860 年的 25%。1860 年，约 48% 的南方农场主完全不拥有奴隶。显然，奴隶主是最富有的。李·索尔托 (Lee Soltow) 发现，1850 年和 1860 年，南方所有农业财富中约 90% 至 95% 为奴隶主所有。^② 显然，随着棉花产量提高，奴隶价格上涨，越来越少的南方家庭能够用得起这种特殊资产了。这场赌博利润越来越高，但赌注也越来越大。正如赖特所言：“刺激奴隶主保持奴隶制的经济力量本身正在缓慢地削弱支持这种制度的政治基础。”^③

3.3 1860 年前南方的自给自足

北方农业的经济作物也是生存作物 (subsistence crop)：小麦、玉米、燕麦、猪和牛，它们既可以出售以换取现金，也可以留在农场供农民自己的家庭消费。北方农民的市场经济使得他们只需将他们本来就要参加的活动加以扩展就行了。

在南方棉花种植区，问题更加复杂。哈钦森 (Hutchinson) 和威廉姆森指出，尽管棉花作物非常重要，但南方除了新奥尔良外并不必依赖于其他地区的食物。^④ 棉花不是生存消费品的一部分。种植棉花的农场主会分配他的资源，用一部分来种植棉花，另一部分则像北方农民那样，用来种植玉米和其他粮食作物，饲养猪和牛。

早期，每个农场都是部分自给自足的，自产食物并对一些原材料进行加工。锯木厂、制革厂、铁匠铺、面粉磨坊、牛奶场——都位于初级产品的产地。农夫和种植园主可能从事这些专业中的一种或数种，以及其他的农业活动。问题是，经济和生存作物如何混合才是最好的？那时和现在一样，混合情况取决于相对价格和成本，但是棉花是主要的经济作物。粮食作物、草料和牲畜也可以由奴隶照顾——农忙季节由妇女儿童照顾，农闲季节则是全体负责。

^② Wright (1978), table 2.5, p. 35.

^③ *Ibid.*, p. 42.

^④ William Hutchinson and Samuel Williamson, "The Self-Sufficiency of the Antebellum South: Estimates of the Food Supply," *JEH*, September 1971.

棉花农场或种植园产生收入的能力取决于市场价格和作物的实际产量。那时和现在一样,农产品的价格每年波动很大。当时南方农场主的交通、存储和信贷条件都有限,自行生产基本食物利用了多余的劳动力,节约了购买食物的现金。玉米、谷物等粮食作物也可以种在棉花区。^⑨ 当农场面积更大时,作为额外经济作物的棉花还提供了另外一种重要作用。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粮食作物的种植使得农场主或种植园主可以在棉花价格较低的年份保留现金。因此,食物基本自给自足是棉花种植区的一个特征。基本的需求是采摘棉花的劳动力。土地这一因素则更为充裕,可以既种粮食也种棉花。玉米是棉花种植的最佳补充。

每年种植和收获的时间是劳动需求的高峰,这些作物的时间恰巧错开,使得同样一批劳动力正好可以既种棉花又种粮食作物。棉花种植开始于4月,玉米则早在2月末和3月就可以种下。在8月至12月收获棉花时,成熟的玉米可以留在田地里。其他的月份不是需求劳动的高峰时间,可以在不耽误主要种植和收获工作的情况下安排劳动力去完成农场的其他任务。^⑩

因为大型种植园可以随意愿购买奴隶,劳动力充足,可以在满足种植园所需的基本食物及其他生存需要的同时,根据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和估计的棉花价格增加棉花地的比例。因此,小农场上的自耕农种植的棉花和其他作物相比相对较少,而蓄奴的种植园则大部分生产棉花——大部分棉花都是他们生产的。

蓄奴和棉花经济的扩张之间具有互相加强的关系,生活上的自给自足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越高效的农场,占据越多的土地,越可以将更大比例的资源投入到经济作物的生产,并因此增加奴隶劳动力产生利润的能力。

截至1860年,对棉花的需求加强了扩张奴隶制的动机,尤其是在资助建立大型种植园的富人中间。棉花就是钱,而且蓄奴规模越大,用来种棉花的土地比例就越大。农场主想要农场,但奴隶主想要棉花地。

4. 北方农业向西部的扩张

在表9.2中可以看到,到1860年,阿巴拉契亚彼端的新北方各州的人口实际上超过了南方各州的人口。从俄亥俄到堪萨斯,农场家庭占据了新的土地。最早的定居者避开了广阔的大草原,定居在森林地区和河边洼地,那里有足够的林地可以提供建筑材料和燃料。

4.1 东部通道

伊利运河作为一个直接连通东西部的交通方式,与之前使用的牛车以及状况较差的

^⑨ 平均来看,南方农场显然没有东北或北方中部各州农场的粮食生产更高效。William Parker and Judith Klein, "Productivity Growth in Grain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orothy Brady, ed., *Output,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1800*, vol. 3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⑩ Wright (1978), pp. 164—176.

道路相比,大幅降低了交通成本。因此,农民出售小麦和其他农作物的价格有了提升,东部市场上的消费者购买的价格则有所下降。因为交通条件的改善,中西部的农民购买东部生产的制造品的价格也有所下降。托马斯·贝里(Thomas Berry)发现,1860年时农民因此可以用同样多的农产品换取比1820年多一倍的制造品。^② 俄亥俄和印第安那的新运河继续加强这一效果,之后很快又出现了直达铁路。到1853年(参见第8章),芝加哥成为连通密西西比和东海岸的铁路网的北方中心。农产品可以迅速、定时地运送到东部和国际市场,减少处理和储存成本,而不是只能按季度沿河而下运到新奥尔良。当然,对货物的竞争意味着农民有了选择买家的余地。19世纪50年代时,伊利诺伊中央铁路之类的铁路要么已经建成,要么正在建设,而中西部农业的丰收角也即将吹响,伟大时代即将来临。

4.2 拓荒先锋

最初,中西部的土地看起来不像是自然界或人类的奇迹。早期的拓荒者避开广大的草原,那里的冰川将石灰岩碾成厚厚的一层齏粉,其厚度难以想象。表层土壤厚达40英尺,等待犁耕。早期的定居者更喜欢靠近林地的土地,这样开荒和种植的过程就顺带出产了建筑材料和燃料。

大草原是一个谜题。自然的草原草之下的深厚草皮对于传统的铁头木犁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第一次完全的小麦收成需要两到三年时间。最初,农夫只能种“草皮作物”,将大草原的草翻转过,用斧头砍断根,播下种子。一年后,进行了更多的犁地和耕作之后,随着草茬子和干枯的根慢慢腐烂,土壤开始屈服。夏天随时有草原大火危险,必须在农场周围犁出防火的条沟。而且从俄亥俄谷以西到堪萨斯东部,每年只有30至40英寸的降水量,平坦的大草原在干燥时难以灌溉,还盛产蚊子和疟疾。

在森林地带,如密歇根和威斯康星,可能需要非常辛苦地劳作一个月才能开垦出一小块地,要建成一个普通的农场则需要五至十年。最初人们还认为大草原的土壤较为贫瘠,因为那里不能生长硬木。^③ 时间和经验会改变这些的。

4.3 成本

中西部的农夫主要依赖家庭劳动,他们面临着长期的艰苦劳动。进展很缓慢。马丁·普里马克(Martin Primack)估计,在19世纪50年代,中西部的劳动力中有整整1/6用在了清理土地这一桩工作上。^④ 这种活动需要资本,它自身也能够形成资本。确实,新建农场的家庭肯定把大部分工作时间和资源用在了我们称为“投资”的活动上:清理土地、修筑围栏和房子、饲养牲畜。如果用一个抽象的劳动单位(labor unit)来衡量这些活

^② Thomas Berry, *Western Prices Before 186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3), appendix B, table 19. Reprinted in North (1961), p. 255.

^③ Frederick Merk, *History of the Westward Movement* (1978), chap. 21.

^④ Martin Primack, "Land Clearing Under 19th Century Techniques," *JEH*, December 1962, p. 492.

动,显然,边疆经济增长的模式是投资比例会下降——与经济增长的一般情况相反。^⑤

将其劳动的85%用来保持现有消费的活动、15%用来投资先锋阶段的农场家庭很可能会失败。在建设普通边疆农场的五至十年里,投资占总活动的比例必须超乎寻常地高。将收入消费掉而不是重新投资在农场上,这是一种奢侈的行为,只能在农场建设的艰苦阶段过去之后才能享受到。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强健的农夫才能通过一系列农场“发展”获得利润,将一个已经开荒完毕或部分完毕的农场卖掉,赚一笔钱,然后继续开荒新地。之前讨论过的土地销售历史反映出19世纪美国广泛存在的这种习惯。普里马克的估算表明,19世纪50年代中西部花在清理土地上的时间是18%,与之相比,南方约为10%,东北部只有约7%。

除了这种劳作,还需投入其他投资。估计明尼苏达州在1860年,一个面积160英亩的代表性小农场(其中1/4拥有围栏)要花费795美元用来建设和供给。^⑥因为1860年西北中央地区的农场劳动力平均年收入仅有165美元(包括食宿),显然,经营农场是一件昂贵的事情。唐纳德·亚当斯(Donald Adams)认为,一名工厂工人平均需要五至十年的积蓄才能建立起“足以自立的农业生活”。^⑦阿塔克和贝特曼提供了许多关于19世纪50年代建立农场的估算。^⑧总体而言,向西迁移是划算的;1860年,一个80英亩的典型农场在俄亥俄要耗资2784美元,在明尼苏达则仅需805美元。

如果一个北方农夫卖掉农场,向西迁移到俄亥俄州,他可以买到一个比原先大1/8的农场,但如果他迁移到印第安那以西或以北,他可以买到一个两倍大的农场。^⑨

4.4 有经验的拓荒先锋

拓荒先锋大部分由“老手”组成,他们带着牲畜、工具和器材离开旧殖民地向西迁移。有着大片充满希望的土地可以建立农场,他们成为了定居点的“刀刃”,永不停止前进,令人惊叹。身无分文的移民,甚至那些来自欧洲农场的移民,因为生活所迫主要去了城市,从事赚取工资的工作。成功的农业拓荒需要大量的资本,包括能够干活的家庭成员。

让我们看看两个突出的例子。两个例子的数据都来自从中西部前往加利福尼亚的车队的遗骸。第一个是乔治·R·斯图尔特(George R. Stewart)对唐纳(Donner)一行的生动描绘。唐纳一行在1846年冬天内华达州谢拉(Sierra)的大雪中遭遇不幸。^⑩他们有20辆有篷马车,载着87个人。三个家庭拥有三辆马车,其中两辆各有七对拉车的牛(第三

^⑤ 例如,参见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7—9, 其中论述道,当投资率上升到10%以上范围时,持续增长的“起飞”就开始了。如果美国农民在边疆上有这样一个投资率,他们可能会被自然的重新造林所赶超。

^⑥ 参见Jeremy Atack and Peter Passell, *A New Economic View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4), p. 277。

^⑦ Donald Adams, Jr., “Earnings and Saving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EEH*, April 1980.

^⑧ Atack and Bateman (1987), chap. 8, “Relative Costs of Farm Making.”

^⑨ *Ibid.*, pp. 136—137.

^⑩ *Ibid.*

个“贵族”里德家庭的数据没有记录),还有奶牛、骑乘的马以及吃肉的牛。

这一行人中领头的都是伊利诺伊州的成功农场主。乔治·唐纳在肯塔基、印第安那和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长大并成功地经营农场,先后创建了三个家庭,娶了三个妻子。这个车队的工具看起来很富丽。然而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超过了一个普通拓荒队伍的平均富有水平。

莱纳德·阿林顿(Leonard Arrington)在其关于犹他摩门教徒的名著中引用了霍华德·斯坦斯伯里(Howard Stansbury)对1849年淘金热中拉勒米堡(Fort Laramie)以西的路边景象的描述:

在中午休息之前,我们经过了11辆破损的马车,车轮的辐条被拿到驮鞍上,其他部分烧掉或毁掉。路上,扔掉的东西到处都是。铁条和钢、铁匠所用的巨大铁砧和风箱、铁撬、钻头、螺旋钻、洗金机、凿子、斧头、铅箱、铲子、犁头、大型砂轮、烤箱、煮炉、小桶、大桶、马具、衣服、腌肉、豆子,基本上按照这里列举的顺序散布在道路沿途。……这一天我们看到了17辆马车的遗骸和27头死牛的尸体。^④

同样,没有理由认为这里描绘的器物来自一个特别富有的车队。拓荒是一种持续了几代人的生活方式。新的农场是由知道如何做且拥有合适器具的人建立的。循迹前往加利福尼亚的人是普通的美国人,他们离开中西部的农场,前往这个黄金之州。将拓荒农场转变成美国人的面包篮需要连续几代人的才智和努力。

4.5 技术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棉花经济通过奴隶的密集劳动而增加产出。北方农场对雇佣劳动力的需求较少,因为主要的作物是谷物(不是劳动密集型的)和牲畜(需要年年如一日的照顾)。当改进的农场机械出现时,中西部的家庭农场变成了我们今日所知的“农场上的工厂”。改变是缓慢而持续的——更大的犁、更好的播种收割机械、蒸汽机,然后是内燃机、拖拉机和卡车,其中孕育着中西部农业的未来。

现代的中西部家庭农场一般轮种大豆、小麦和玉米,拥有500英亩以上的土地,主要由一个全职的操作员使用价值不菲的机械作业:拖拉机、播种机、大型圆耙、喷洒器、带空调的联合收割机,甚至在贮藏里使用丁烷干燥剂。这种机械化的经济奇迹的起源正是19世纪时期中西部农场劳动力的长期短缺。

4.6 早期的发明

当拓荒先锋初次到达中西部时,他们的技术基本上还是中世纪的:用一个小小的带铁套的木制犁敲开土地;用手来播种种子;用镰刀收割谷物,用手摇晃,然后晾干,用手持连枷打谷,让风扬去谷壳。农具的改造一般由很小的改进组成,来源渺茫不可考,不过有一些“英雄式”的改进我们还是略知一二的。

在中西部,铁犁就是这种英雄式的改进之一。它比旧式的带铁套的木制犁轻巧坚

^④ Leonard Arrington, *Great Basin Kingdom: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Latter-Day Saints 1830—19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70.

固,拉动时能更有效地将泥土破开。铁犁由成群的骡马或牛拉动,能够更快地破开大草原的土壤,因此使家庭农场能有效耕作的面积得以扩大。在铁犁引进之后20年,即1857年,伊利诺伊莫林(Moline)的约翰·迪尔(John Deere)公司每年生产一万只铁犁。

马拉收割机是一个类似的发明。1833年,奥贝德·赫西(Obed Hussey)申请了一个专利,1834年,塞勒斯·霍尔·麦考密克(Cyrus Hall McCormick)申请了另一个专利。马拉收割机由马拉动,一个轮子上的刀刃可以不断滚动切割庄稼,使得人们不必再自己挥舞镰刀收割。然而,截至1850年,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美国谷物是由收割机收割的,这种机器也只售出了3400台。截至1860年,售出了约8万台,而在1859年,这8万台中的5.6万台还处于工作状态。为什么机械收割时代的到来推迟了那么长时间,又突然爆发呢?

经济历史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找到这个答案。知道这个很重要,因为收割机的历史无疑代表了大部分大型且较昂贵的农业资本设备。传统观点简单地认为,19世纪50年代小麦价格的上扬使得购买这种机器有利可图。然而,保罗·大卫指出,如果收割机降低了生产成本,那么即使谷物价格固定或下降,购买收割机仍然可能是划算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大卫的分析考虑了(1)农场地形,(2)工资成本,(3)利率,(4)设备的使用寿命,以及19世纪50年代不断上涨的谷物价格。地形很重要。伊利诺伊中部的农夫面临的是一马平川、少有石砾的土地,而佛蒙特的农夫面对的是布满岩石的山坡地,显然前者会更倾向于使用这种机器。正如大卫所说:

……机械收割机的有效使用需要一个平整、无石的农场地形,划分成较大而规则的形状——这种特殊的自然资源,在19世纪中期,在美国比在英伦诸岛更便宜(与谷物价格相比)。^②

因此,随着中西部农业在西进运动中崭露头角,机械收割也随之扩散开来。在劳动力成本(高)、利率、机器使用寿命一定的情况下,一个农场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规模之后,投资购买一个收割机才是划算的。只有那样预期生产力才能超过机器的成本并产生利润。大卫认为,这个规模在1849—1853年间时是46英亩左右,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时降到了35英亩,因为当这个门槛规模和很大一部分中西部农场的平均规模相符合,投资收割机便蔚然成风了。

大卫的计算受到了一些争议。阿兰·奥姆斯特德认为,收割机的使用寿命比大卫假定的要短,因此门槛要提高。而且,因为收割机一般是租用或者合用的,所以门槛规模实际上和这事基本没关系。它只对单独的购买者起作用。此外,收割机还一直受到改进,变得越来越有效,越来越便宜,也就越来越有利可图。^③刘易斯·琼斯(Lewis Jones)认为,不管是哪种情况,农场的平均规模都与此无关,只有那些使用收割机的农场才与此有

^② Paul David, *Technical Choice: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ssays on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89.

^③ Alan Olmstead, "The Mechanization of Reaping and Mowing in American Agriculture 1833—1870," *JEH*, June 1975.

关。^④ 在 19 世纪 50 年代的中西部,达到大卫或奥姆斯特德计算的门槛规模的农场比收割机销售得多得多。因此,谷物价格上升肯定也是收割机销售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小型农场的主人可以继续使用镰刀,或者他们可以租用或与其他人合买收割机。

蒸汽脱粒机在 19 世纪 50 年代变得普遍,淘汰了连枷。这些机器是合用或租用的。而且,钻孔播种机、耕耘机、除草机、马拉草耙机以及种植之前耙地的机器等都变得普遍。即使中西部的农场主不能大幅提高每亩地的产量(他们确实不能,除非用化肥)或通过投入更多的劳动来提高农场的产量,但机器使得他们可以耕作更多的土地,从而提高了每个农场的产量。他们有两个昂贵的因素:劳动力和资本,还有一个丰富的因素:土地。机器的使用保存了劳动力,丰富的土地资源增加了资本和劳动力的生产率。机器可以说是北方农场主的“奴隶”。

4.7 产出

表 9.8 为整个国家较粗略的产量数字。如果我们假定这三种作物的数量能够代表中西部的情况,那么我们看到,两种田野谷物小麦和大麦的增长率在 19 世纪 50 年代比在 40 年代高。这些作物使用了收割机,玉米则没有。然而,因为燕麦耕作也使用了收割机,也许这些数据只能勉强表明小麦和大麦对燕麦的相对价格上升了,同时收割机的使用也有一定影响。当然,其他机器的使用对作物生产率的变化也有作用。

表 9.8 1839—1859 年主要谷物的产量

年份	小麦	玉米	燕麦	大麦
年代				
1839	85	378	123	4
1849	100	592	147	5
1859	173	839	173	16
每个年代的增长率				
1839—1849	17.7	56.6	19.5	25.0
1849—1859	73.0	41.7	17.7	220.0

注:产量数字仅指谷物,单位为百万蒲式耳。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a 683, 709, 712, 731.

这些增加的产量中,有多少是在中西部生产的? 这个我们也无法断定,只有一些零散的数字。从中西部和上南方出口的面粉和玉米具有预期中的较大增幅:面粉从 1839 年的 80 万桶增加到 1850 年的 300 万桶,再到 1860 年的 500 万桶。然而,玉米出口从 1839 年的 100 万蒲式耳(计量谷物及水果的单位,等于 8 加仑或大约 36.4 升)增加到了 1860 年的 2400 万蒲式耳,玉米却没有使用收割机。^⑤

每个机械发明的准确影响是不能从这些数据中看出的。我们只能依靠常识判断。

^④ Lewis Jones, "The Mechanization of Reaping and Mowing in American Agriculture: A Com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7, no. 2, June 1977.

^⑤ Diane Lindstrom, "Southern Dependence upon Interregional Grain Supplies: A Review of the Trade Flows, 1840—1860," table 7, in William Parker, ed., *The Structure of the Cotton Economy of the Antebellum South* (1970).

农场主购买农业机械，在19世纪50年代，突然大量购买收割机。他们购买农业机械是为了使用和创造利润。因此，这些机械必定在经济上是划算的。否则，他们就会继续使用镰刀，为了“省钱”。

5. 妥协破灭

19世纪50年代，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北方小麦种植区和南方之间有一条想象中的分界线，从伊利诺伊谢尔比维尔(Shelbyville)向东西部延伸。这条分界线在威斯康星最后一次冰川漂移堆积物的南部边缘。这条线的上面是平坦的大草原，下面是山丘、冲积平原和高地的南方棉花种植区。19世纪50年代，在小麦区和棉花区之间存在一个混合农业区，那里的主要谷物是玉米，人和牲畜都吃这个。弗雷德里克·默克(Frederick Merk)对居住在这个中间地带的人作出了富有洞察力的观察：

对奴隶制问题的所有伟大妥协都来自玉米地带的政治家。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杰西·B.托马斯(Jesse B. Thomas)在1820年带来了《密苏里妥协》。肯塔基州的参议员亨利·克雷(Henry Clay)带来了《1850年妥协》。伊利诺伊州的另一个参议员斯蒂芬·A.道格拉斯(Stephen A. Douglas)是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的妥协信条的领头人物。肯塔基人约翰·J.克里滕登(John J. Crittenden)作出了1860年的克里滕登和平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了。^{④6}

随着这条线向西延伸，妥协渐渐失去了作用。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允许堪萨斯的人民主权凌驾于奴隶制问题之上，当这两种农业体系最终直接冲突时，结果就是战火。堪萨斯不会种植棉花。但是在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19世纪40年代从墨西哥得到的土地——棉花最终会成为重要的作物。奴隶制已经进入了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暂时还是净土。土地——谁拥有它，应该如何使用它，具体干活的又是谁——一直是美国历史的推动力。随着这两种体系在19世纪50年代向西延伸，对这些问题进行妥协的努力最终失败了。

詹妮弗·罗贝克(Jennifer Roback)强调，对南方来说，密苏里之上的土地是公共资源，根据1789年的协议《联邦宪法》，南方各州对其享有同样的权利。^{④7}当林肯在1860年被选为总统时，支持他的是决心把奴隶制保持在西部之外的北方集团，协议被撕毁，南方退出了联邦。奴隶制是通过火与剑废除的。

推荐阅读

文章

Adams, Donald R., Jr. "Earnings and Saving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Explorations*

^{④6} Merk (1978), p. 179.

^{④7} Jennifer Roback, "A Public Choice Perspective on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7, no. 2, April 1980.

Atack, Jeremy, and Fred Bateman. "Egalitarianism, Inequality, and Age: The Rural North in 18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1, March 1981.

Bailey, Ronald. "The Slave(ry) Tra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New England."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 14, no. 3, Fall 1990.

Bogue, Allan G. "Farming in the Prairie Peninsula 1830—189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7, no. 1, March 1947.

Danhof, Clarence. "Farm Making Costs and the Safety Valve; 1855—1860." In Vernon Carstensen, ed., *The Public Land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3.

Fleisig, Heywood. "Slavery, the Supply of Agricultural Labor,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Sou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6, no. 3, September 1976.

Gunderson, Gerald. "Southern Ante-Bellum Income Reconsidered."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0, no. 2, Winter 1973.

———.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4, December 1974.

Hutchinson, W. K., and Samuel H. Williamson. "The Self-Sufficiency of the Ante-Bellum South: Estimates of the Food Suppl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1, no. 3, September 1971.

Metzer, Jacob. "Rational Management, Modern Business Practice, and Economies of Scale in the Antebellum Plantation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2, no. 2, April 1975.

Olmstead, Alan. "The Mechanization of Reaping and Mowing in American Agriculture 1833—187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5, no. 2, June 1975.

Parker, William. "Agriculture." In Lance 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chap. 11.

Parker, William, and Judith Klein. "Productivity Growth in Grain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orothy Brady, ed., *Output,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1800*, vol. 3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Passell, Peter. "The Impact of Cotton Land Distribution on the Ante-Bellum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1, no. 4, December 1971.

Primack, Martin. "Land Clearing Under 19th Century Techniqu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2, no. 4, December 1962.

Ransom, Roger L., and Richard Sutch. "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Sou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6, no. 2, April 1979.

Schmitz, Mark D. "Economies of Scale and Farm Size in the Ante-Bellum Sugar Sector."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7, no. 4, December 1977.

Schmitz, Mark D., and Donald Schaefer. "Paradox Lost: Westward Expansion and Slave Prices Before the Civil War."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2, June 1981.

Steckel, Richar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East-West Migration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0, no. 1, January 1983.

Surdam, David. "King Cotton: Monarch or Pretender? The State of the Market for Raw Cotton on the Eve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51, no. 1, February 1998.

Temin, Peter. "Free Land and Federalism: A Synoptic View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21, no. 3, Winter 1991.

书籍

Atack, Jeremy, and Fred Bateman. *To Their Own Soil: Agriculture in the Antebellum North*.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Bidwell, Percy, and John Falconer.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1620—1860*. Washington, DC: Carnegie Institution, 1925.

Bogue, Allan G. *From Prairie to Cornbelt: Farming on the Illinois and Iowa Prair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Danhof, Clarence. *Change in Agriculture: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1820—187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Fogel, Robert W.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89.

Fogel, Robert W., and Stanley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Lakwete, Angela. *Inventing the Cotton Gin: Machine and Myth in Antebellum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Merk, Frederick. *History of the Westward Movemen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

Parker, William, ed. *The Structure of the Cotton Economy of the Antebellum South*. Washington, DC: Agricultural History Society, 1970.

Wright, Gav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tton South: Households, Markets, and Weal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

第 10 章

关于奴隶制度的争论

在前面各章中,我们讨论了战前南方的农业。本章将探讨一个许多人感兴趣的话题——奴隶制度,它构成了棉花种植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1. 为何争论?

美国历史上也许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像奴隶制度一样造成如此深层的矛盾。这个国家很大一部分的历史由奴隶制度定型,而众多现代美国人又拥有奴隶的祖先,因此这一话题必然引起持久的兴趣。同契约白奴制度以和平方式终结不同,黑人奴隶制度只有通过南北战争和宪法修正案才得到终结。

在南北战争之前的十年里,奴隶经济史无前例地繁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现象?作为一个生产系统,奴隶制度是“高效”的吗?如果不是被南北战争终结,它会拥有长期发展的前景吗?

1.1 奴隶制度是……

奴隶制度是怎样的制度?让人费解的是,我们无法为一个如此简单的问题找到答案,一部分原因是,这一问题只能由生活在奴隶制度中的人回答,而不同的人对奴隶制度的感受迥然不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历史记载本身存在问题。我们将首先考虑后一个原因,以便以某种同情的心态理解历史学家关于奴隶制度的种种矛盾、扭曲、误解和争议。

1.2 奴隶制与历史

要展开有关奴隶制的历史文献的严肃研究,我们需要解决几个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历史记载正在等待着为我们的问题提供解答。然而,由于历史学家必须选择提出哪些问题,他们自身的偏见必然影响历史书面记载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同一历史问题总有着各种彼此矛盾的解读。如果自由党、保守党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研究同一个历史现象,他们恐怕会得出彼此矛盾的三种历史叙事,然而每一种叙事又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写出的历史又可能无法被这三位历史学家接受,因为他的分析将吝于利用体制、个体经验、时间与立法变化等方面的资料。

一个严谨、力求客观的历史学家会特别关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理解这一时期的背景条件十分重要。例如,如果我们在研究美国奴隶制度的时候考虑白奴,那么我们的理解将增加一个维度,我们将在对黑奴制度的道德抵触之外理解奴隶制度的殖民地根源,因而将这一制度视为更广义的非自由劳动力供给问题中的一部分。第二,我们必须

考虑那些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过程,特别是那些一直在为奴隶体制的产生提供动力的初始条件。一个突出例子就是建立在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工业化基础之上的、在很长时期内不断扩大的原棉需求。在几十年间,工业化让美国的农业奴隶制度在国际原棉市场中获利颇丰。

最后,我们必须依靠某种理论来理解奴隶制度。所谓理论即在特定背景和初始条件之下我们认为可以“解释”这一问题的因果关系的一般集合。例如,如果一个奴隶种植园是一桩“生意”,它的目的即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对于经济学家而言,种植园主行为的理性程度应当不亚于一个现代经营者。这一看法的危险性在于它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种族主义、无知、根深蒂固的非理性风俗以及在牺牲了某些更加“理性”行为的前提下,为维持奴隶制而制定的法律等因素会占上风。理论在单独使用时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向导,必须谨慎对待。

很明显,这些因素之间有充分的争论空间,目前也确实存在众多争议。近年来一大部分历史著作均将奴隶制度经济学作为研究论题,我们对这方面的了解比35年前大大增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了解了一切,或是大家都已经接受了同一个解释。许多问题仍然存在,其中不乏一些基础的问题。

2. 奴隶家庭

在1790—1860年间,美国南方的自由白人与奴隶人口增长率仅为5.5%,事实上奴隶人口比白人增长更快一些。^①自由白人和奴隶人口增长率的相似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一般来说,由于奴隶有价值,其“繁殖”被最大化;第二,奴隶处于“不人道”的生存条件之中。这导致对任何生存条件下的奴隶家庭而言,其生育率均只略高于白人。

我们知道每个奴隶都有奴隶母亲;他们在法庭上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地位;他们的婚姻(如果有仪式的话)均是非法的(婚姻契约没有任何约束力);他们的财产不属于自己;他们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儿女。奴隶是财产;他们可以被贩卖、作为遗产继承或是在奴隶主破产时作为债务偿还的形式之一被分配。

由于1808年后这个国家取消了合法的国际奴隶贸易,奴隶人口的自然增长就成为维持这一系统的必要条件。^②奴隶主必须依靠奴隶母亲来增加奴隶供给。因此,女性奴隶和她们的孩子就构成了这一系统的基础。彼时的一部分背景是,基督教等力量的道德规范约束让美国人认为奴隶的繁育是令人厌恶的(尽管那些绘声绘色的现代小说甚至目击证人的证词都述说着它的反面)。这意味着必须存在某种形式的男、女奴配对,即使这

^① 参见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Bb 43—76*, 可找到奴隶的数据;白人数据可以在1960年版本中找到, *series A 95—122* (注意这一信息并不包括在修订版本中)。

^② Peter C. Mancall, Joshua L. Rosenbloom, and Thomas Weiss, “Slave Prices and the South Carolina Economy, 1722—1809,”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forthcoming), 发现奴隶劳动的价值除以奴隶制造的商品的价格,在整个18世纪保持相对不变。在18世纪90年代,切萨皮克的奴隶价格低于国际水平。国际奴隶贸易的禁令限制了供给,预期会提高国内奴隶的价值,因此得到了切萨皮克奴隶主的支持。在切萨皮克低价奴隶的可得性意味着尽管南卡罗莱纳的奴隶价格足够高,以至于证明持续进口是合理的,种植园主也没有反对禁令,正如人们所预计的那样。

种关系是非法的。那么,这些奴隶家庭又是怎样的呢?

面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却再一次陷入困境。你提问的对象是谁?每一个奴隶的故事都只是成千上万个可能故事中的一个。此外,这就像试图描述如今“普通的”美国家庭一样。哪个家庭是典型的呢?我们可以从人口普查中构建一个普通家庭,可是在奴隶家庭中,并没有一项官方的人口普查会列出父亲和母亲的名字或是结婚日期,因而也无法得知这对夫妇共同生活的时间长度,而且孩子的生日也常常不可考。因此,让我们考虑另一个解决方案。

在1974年的奴隶制度研究专著《十字架上的时间》(*Time on the Cross*)中,罗伯特·福格尔和斯坦利·恩格曼认为,虽然存在一些我们可能认为会阻挠甚至阻止稳定家庭产生的力量,但是奴隶之间的家庭关系一般而言仍然可以长达数年。^③ 两个研究者声称,奴隶主并不经常出售奴隶的子女。

有三个深层原因暗示着这一基本家庭系统的存在。第一,奴隶们的生活习惯让家庭成为稳定的关系;第二,奴隶主希望在他们的财产中维持某种类似普通美国人的性行为;第三,比起其他安排而言,家庭是更有效率的经济单位。^④ 根据这两位作者的意见,其他的家庭生活方式,如建立在完全的性自由基础上的群居生活、一妻多夫或是一夫多妻制均被淘汰。^⑤ 福格尔与恩格曼在结语中写道:

奴隶的生育、性剥削和乱交毁灭了黑奴家庭,这是一个迷思。家庭是奴隶制度下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因此,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种植园主会鼓励奴隶成立稳定的家庭,而且大多数种植园主也是这么做的。^⑥

2.1 三个见证者

福格尔与恩格曼的描述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为什么还会有争议呢?这是因为当时的观察者往往提供了迥然不同的描述,而废奴主义者又在他们的文献中有效地利用了性剥削与不正常的家庭生活的证据。因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存疑。不妨参考 Frederick Douglass 与 Booker T. Washington 两位生而为奴的著名证人的回忆录。道格拉斯在1845年出版的书被广泛用为废奴主义文献,他在书中是这样描述他的父母的:

我的母亲叫 Harriet Bailey。她是艾萨克和 Betsey Bailey 的女儿,他们都是黑人,而且肤色都很黑。我的母亲的肤色比我的外祖父母都要更黑。我的父亲是一个白种人。所有和我谈到我的父母的人都说我的父亲是个白种人。还有谣言说我的主

^③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1974). Although Fogel responded to critics of *Time on the Cross* in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1989), 他较晚期的观点并没有发生太多改变,因此,本章的讨论依据他较早时期的著作。

^④ Fogel and Engerman (1974), vol. 1, p. 126.

^⑤ 稍微晚些的得到很高赞誉的研究,参见 Herbert Gutman, *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 1750—1925* (1976). 另参见 Richard Steckel, “Slave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Winter 1980.

^⑥ Fogel and Engerman (1974), vol. 1, p. 5. See Gutman (1976), pp. 418—425, 考察了内战后黑人家庭的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黑人家庭努力整理各类事项并重建家庭。他的证据表明一夫一妻家庭是最渴望的目标,即使奴隶买卖打破了早期的家庭并导致了多夫或多妻的结果。

人就是我的父亲……^⑦

谈到他的家庭生活,道格拉斯是这样写的:

我在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和我的母亲分开了……在我后来逃离的马里兰州的那个地区,这样的风俗很普遍,婴儿和他们的母亲很早就分开。很多时候母亲被迫在小孩12个月大以前就与他们分离,被送往某些农场工作……而孩子则交给由于年老体衰、无法从事田间劳动的女奴照料。

我从没见过我的母亲。我只和她会过四五次面,每次见面都是在深夜,而且时间都很短……为了在深夜见我,她只有在完成了白天的工作之后深夜长途跋涉(12英里)。^⑧

华盛顿于1901年出版自传《奴隶的翻身》(*Up from Slavery*),这本书的出版比道格拉斯的书晚了半个多世纪。

我出生在一个坐落在交叉路口的叫哈尔斯福德(Hale's Ford)的邮局附近,出生年份则是1858年或1859年……我几乎完全不了解我的祖先……我无法找到任何资料,以考证我母亲之外的所有家族成员的历史。我记得我的母亲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妹……我对我父亲的了解比我母亲更少。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听说他住在附近的一个种植园,是个白人。^⑨

家庭生活怎么样?

我早年生活在一个小屋中,这一点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奴隶并没有什么不同。当然我的母亲在白天没有时间给她的孩子太多的教育。她会在清晨花一些时间照顾我们……我对幼年的记忆之一是母亲在某天深夜做了一锅鸡汤,然后把我们都叫醒并喂鸡汤给我们吃。我不知道她从哪儿搞到的鸡,也不知道她怎么搞到的……在《解放宣言》宣告我们家自由之前,我们从没睡过床。我们三个孩子——我的哥哥约翰、我的妹妹阿曼达和我在满是灰尘的地板上铺了一张床垫并睡在上面……我们睡在肮脏的抹布堆里面……^⑩

这看起来并不像正常的家庭生活。然而比起城市里的自由劳动力而言,这种生活也许也差不到哪儿去。

第三个见证者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在1860年写到了他参观的一个大型棉花种植园:

那是一个很棒的种植园。在种植园的最高处矗立着一栋宽敞漂亮的房子,但它已经多年没有住人了。上一次路人瞥见这儿的主人还要追溯到两年多以前。这家主人住在数百英里之外……整个种植园,包括它周围的同样属于这家主人的沼泽

⑦ Frederick Douglass,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1968), pp. 21—22.

⑧ *Ibid.*, p. 22.

⑨ Booker T. Washington, *Up from Slavery* (1963), p. 2.

⑩ *Ibid.*, pp. 2—3.

地,面积达到了数平方英里。这其中有1300—1400英亩的土地用于种植棉花、庄稼和其他中耕作物,有多达200条地垄穿越沼泽……种植园有135个老老小小的奴隶,其中有67人负责日常的耕作……黑奴居住的地方有一家幼儿园,目前有20个女奴每天分四次来到这里照顾她们的孩子,每次时间为半个小时……^⑪

当然,农业耕作的劳动力需求并不是整年都很旺盛的。在冬天的几个月里,奴隶们将有比道格拉斯和华盛顿描述中提到的更多的时间享受“家庭生活”。

2.2 其他证据

试图从此类证据得到一般结论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问题,即他们只能找到孤立的例子,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这些样本到底是有效的随机样本,抑或仅仅是碰巧印成了白纸黑字的一些非典型案例。虽然存在许多与道格拉斯和华盛顿描述基本一致的其他关于种植园生活的记载,但是也有大量证据显示了福格尔与恩格曼的结论的正确性。

古特曼(Herbert Gutman)对六个大型种植园的黑人家庭的研究显示,在解放宣言以后,大多数黑奴家庭都是“双家长制”,也就是说,丈夫和妻子在一夫一妻制下共同生活。^⑫他发现,在年满40岁的大多数奴隶中,大多数曾有过长期夫妻生活经历,直到其中一个家庭成员过世。这一点得到了理查德·斯特克尔与史蒂芬·克劳夫德的研究证实。斯特克尔在研究南北战争的抚恤金文件时发现,女奴并不倾向于在刚刚发育成熟的时候就生孩子,她们第一个孩子的降生很大程度上受到奴隶婚姻的影响,而在头胎之后的生育问题则受到奴隶母亲的工作模式的很大制约。没有一例被解放的奴隶母亲会为多于一个男人申请老兵抚恤金。^⑬不仅如此,黑人老兵的妻子尽管年纪轻轻就成为寡妇,却往往选择继续守寡而非再婚。克劳夫德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研究前奴隶的证言时发现,在742个13岁以下的奴隶中,大约有2/3的人生活在双亲家庭,1/4的人生活在有单亲(几乎都是母亲)的家庭。在后面这组奴隶中,有3/5的家庭被奴隶交易或类似事件拆散。克劳夫德发现种植园的规模对这一数字具有影响。在拥有15个以下奴隶的种植园里,三个孩子中只有一个生活在双亲家庭中。在拥有25个以上奴隶的种植园里,三个孩子中有两个在双亲家庭长大。^⑭

还有另一个问题。当我们从数字出发,试图理解产生这些数字的生存条件并评价当时的生活质量时,我们从定量证据过渡到了定性证据。这样的过渡缺乏自然、理性的支撑。事实上,大多数关于奴隶聚居区的生活描述都是悲惨的。然而,奴隶人口却能够而且确实在这种十分困难和悲惨的条件下增长——人类在过去的历史中做到了同样的事情。由于从定量到定性证据的过渡存在问题,我们很难断言:奴隶(或任何其他)拥有

^⑪ Frederick Law Olmsted, *The Slave States* (1959), pp. 200—201.

^⑫ Gutman (1976), chap. 1. For evidenc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Plantation Stud,” etc., see the footnote on p. 59.

^⑬ 参见 Steckel (1980)。

^⑭ Stephen Crawford, “The Slave Family: A View from the Slave Narratives,” in Claudia Goldin and Hugh Rockoff, eds., *Strategic Factor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Stephen Crawford, “Quantified Memory: A Study of the WPA and Fisk University Slave Narrative Collections”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0).

的合理的物质生活水平暗示了奴隶家庭的满意程度。^⑮我们会问：“关于‘老种植园的快乐日子’的奴隶叙事在哪儿呢？”

我们在前面考察的目击者证词暗示三个假设：第一，男性家长的地位并不重要。实际上，道格拉斯和华盛顿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第二，奴隶制度关于婴儿护理的规定让刚刚生育的母亲可以几乎整天工作；第三，道格拉斯的母亲几乎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而华盛顿的母亲完成照顾孩子的工作也十分困难。这些对农业奴隶系统的典型批评在现代黑人家庭状况的一些分析中找到了诸多对应：现代黑人家庭同样没有稳定的男性家长，而且母亲也必须靠工作获得家庭收入，因而没有足够时间照顾家庭。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古特曼、斯特克尔和克劳夫德等学者的证据，我们会得到与福格尔和恩格曼一致的结论——典型的奴隶家庭是由一对奴隶配偶组成的。

3. 如果没有南北战争，奴隶制度会灭亡吗？

近年来，学者们对奴隶制度保持着持久的浓厚兴趣，他们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一些主要问题。一些历史学家一直认为奴隶制度到1860年已经岌岌可危，即使没有1861—1865年的军事干预，它也会由于某些自然原因而消亡。这些学者认为，在19世纪的工业化带来的更好投资机会面前，奴隶制度的收益并不足以让它持续下去。历史学家查尔斯·胡班（Charles Sydnor）和乌利齐·菲利普（Ulrich B. Phillips）是这一看法的突出代表。^⑯诸多“激进派”作家认为这一观点十分正确，因为它将奴隶制度视为历史错误和工业化经济中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残留。至少马克思对奴隶制度持这一观点。从经济上看，美国南部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因而只能算是资本主义欧洲的一截殖民盲肠而已。^⑰

要相信历史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不可避免，总是非常方便。这些历史学家选择相信南北战争只是一场生命和资源的悲剧性的浪费，因为它试图废除一个本来就奄奄一息的制度。刘易斯·格雷（Lewis Gray）则在其著作《1860年前美国南部农业史》中阐述了不同的观点，他有证据证明到1861年前奴隶制度发展得都很好。^⑱直到1958年，这一问题才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争论。由于各种证据和论点莫衷一是，研究者们往往倾向于在个人喜好和直觉基础上作出选择。

3.1 康拉德与迈耶

阿尔弗雷德·康拉德（Alfred Conrad）与约翰·迈耶（John Meyer）于1958年发表的著名论文“战前南方奴隶经济学”标志着计量经济学（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应用数学统计分析）的重机枪开始瞄准战前的奴隶制。^⑲这两位研究者发现，奴隶农业的年利润值与南方

^⑮ 对于奴隶所描述生活的记录，近期的一项研究参见 John Blassingame, *The Slave Community: Plantation Life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⑯ Charles Sydnor, *Slavery in Mississippi*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33); Ulrich Phillips, "The Economic Cost of Slaveholding in the Cotton Bel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20, no. 2, June 1905.

^⑰ Karl Marx, *Capital* (London: William Glazier, 1918), vol. 1, p. 790, n. 1.

^⑱ Lewis Gray,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to 1860* (1933).

^⑲ Alfred Conrad and John Meyer, "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JPE*, April 1958.

投资者的其他投资选项相比很有竞争力,而且“整个南部”都受益于奴隶制。在一些历史更久的州里,已有种植园与南部和西部新的产棉区之间的奴隶交易创造了利润。棉花产量本身是这个系统的主要基础。在安场保吉(Yasukichi Yasuba)与理查德·萨克(Richard Sutch)随后的重要批评著述中,奴隶存量的资本收益被列入利润方程式,而奴隶制度的生存能力则得到了强化。^⑨

计量经济学著作的结论似乎一劳永逸地证明了奴隶制度的生存能力和赢利能力。它们建立在数字基础上,意味着(或看起来意味着)奴隶制的制度分析与文化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关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奴隶制度得以维持的原因是它为奴隶主赚到的钱不比任何其他资本投入的回报少。历史学家仍然在重新评价他们的研究发现,但有些史学家,如写作了《奇特的制度》(*The Peculiar Institution*)的 Kenneth Stampp,则旗帜鲜明地反对修正主义的观点。尽管奴隶制度是不道德的、让人厌恶的,有时还是无人道的,但它在其存在期间却产生了收益。

3.2 《十字架上的时间》:论点与反驳

1974年,《十字架上的时间》出版。福格尔与恩格曼提出了关于战前奴隶制度的10个主要论点,在某种程度上招致了学术界如潮的批评。他们的有些观点其实并不新颖,但是他们提出观点的方式如此大胆,以至于史学家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些观点连同其他激进的成果的研究意义。批评者攻击说,奴隶制这一“奇特的制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奇特。而《十字架上的时间》受到的批评数量之多、批驳之细、考据之严都是经济学历史上罕有先例的。

福格尔与恩格曼提出的10个主要论点概要如下:

- (1) 对于了解他们自身利益、追求利润和财富最大化的南方人而言,奴隶制是理性的、可赢利的方式;
- (2) 在1861年前,奴隶制在经济上比以往更加繁荣且发展迅速;
- (3) 在南北战争之前,奴隶主并未对奴隶制度的未来怀有悲观预计;
- (4) 不仅在南方奴隶农业比自由农业更有效率,而且与北方的家庭农场相比较,这一结论也同样成立,规模经济可以解释它们之间的差异;
- (5) 作为农场劳动力,普通奴隶要比他的“白人参照物”更加勤劳而有效率;
- (6) 城市的奴隶需求比农村增长更快,奴隶在城市就业上比自由工人更有竞争力;
- (7) 奴隶生育与性剥削是迷思。稳定的奴隶家庭才是正常情况,它也因其符合奴隶主的经济利益而受到鼓励,大多数奴隶交易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或是“在奴隶长大到可以离开家庭时进行”;
- (8) 奴隶的物质生活条件比美国北部工厂里的自由白人更好;
- (9) 奴隶收入的剥削率仅为10%;参与种植劳动的普通男奴将得到他毕生工作所得的90%;

^⑨ Yasukichi Yasuba, “The Profitability and Viability of Plantation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Studies Quarterly*, September 1961; and Richard Sutch, “The Profitability of Antebellum Slavery Revisited,” *SEJ*, April 1963.

(10) 南部经济并没有停滞不前,在1840—1860年,南部人均收入比北部增长更快,按照绝对价值计算,南部也比北部和其他国家更高。^①

一句话,《十字架上的时间》的主要论点为研究者提供了十分明确而且无法抗拒的标靶。不仅如此,对许多学者而言,还有一些辅助研究也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例如,福格尔和恩格曼认为奴隶主很少使用武力,一般而言,为调动奴隶生产积极性而采用的激励方式是积极的经济回报。^②更有甚者,他们认为奴隶对这些优厚的待遇的反应就是成为更加努力而有效率的工人。

在该书的第一批评论者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后,他们马上掀起了一阵批评的狂潮。福格尔与恩格曼被指责为暗示奴隶制度是一种仁慈的甚至是进步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系统中,工人一边享受着优厚的待遇,一边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南方企业家们理性而仁慈的注视下辛勤工作。他们的书产生了难以置信的反响。在我们针对这场论战的某些特殊问题展开详细讨论之前,让我们以论点为序,回顾这10个论点的相关研究成果。

对追求利益和财富最大化的南方人而言,奴隶制度是一个理性的方式。在1974年之前,这一点几乎毫无争议。美国南方的气候与土壤十分适宜棉花生产。正如肯尼思·斯坦普(Kenneth Stampp)强调的,只有极少数的学者会坚持认为南方的奴隶主是亏本经营,奴隶制系统仅仅由于其根深蒂固才得以维持。^③

奴隶制度在南北战争之前取得了强劲经济发展。加文·赖特(Gavin Wright)和其他学者认为这里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解。^④由于棉纺织业迅速发展,美国棉花在19世纪50年代需求十分强劲。这一形势不会持续超过十年,而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原棉供应在南北战争之后追上了需求,在随后的数年中原棉生产的利润都锐减。如果就经济而言奴隶系统在19世纪50年代发展强劲,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将来也会如此,因为它的赢利仍然源于棉花种植。

奴隶主在南北战争之前对奴隶制度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在通常的奴隶生命周期内,如果计算可能发生的交易的潜在资本收益,那么奴隶交易的净回报是可观的。19世纪50年代工业发展对奴隶的需求,特别是铁路建造对奴隶的需求,导致奴隶的价格上涨。由于某些估计中奴隶的收益比其他投资的收益小,持续的奴隶交易可以证明奴隶主对奴隶制系统的前景是持乐观态度的。^⑤

南方的奴隶农业比北方家庭农场生产效率更高。从上一章中我们知道,使用团队劳动系统的种植园据报比自由农场的产出要高上39%。正如批评者所说,除非将产出定义为“收益”,我们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将两个系统进行比较。^⑥即使定义为收益,种植园产出

^① Fogel and Engerman (1974), vol. 1, pp. 4—6.

^② Ibid., pp. 144—157.

^③ Kenneth Stampp, “Introduction,” in Paul David, Herbert Gutman, Richard Sutch, Peter Temin, and Gavin Wright, *Reckoning with Slavery: A Critical Study in the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American Slavery* (1976), pp. 12—13.

^④ Gavin Wrigh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tton South* (1978), chap. 6, pp. 118—123; David et al. (1976), pp. 308—312.

^⑤ Fogel and Engerman (1974), vol. 2, pp. 74—83.

^⑥ Paul David and Peter Temin, “Slavery: The Progressive Institution?” in David et al. (1976), pp. 218—223.

的计算也必须以 19 世纪 50 年代的巨大需求、1860 年(主要比较年份)的棉花大丰收以及居高不下的棉价为基础。根据加文·赖特和其他学者的意见,规模经济并不是十分重要的因素。^② 在另一方面,美国南部使用奴隶的种植园很明显要比雇用自由劳动力的农场更有效率,在一定范围内,大型农场和种植园的统治地位确实显示了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

奴隶劳动力比白人农业劳动力工作更努力,也更有效率。批评者认为这是因为奴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选择,他们每天工作时数和每年工作天数都比自由白人更多,因而他们的劳动可能产生更多的收益,但这一数字并不能告诉我们他们每小时的平均产出。^③ 正如我们看到的,福格尔认为团队劳动系统(gang system)导致“加速”现象,产生更高的劳动强度,因此参加团队劳动的奴隶 35 分钟的产出就相当于农民(包括自由农民和不参加集体劳作的奴隶)1 小时的产出。

城市奴隶需求比农村增长更快。克劳迪亚·戈登在她 1976 年的著述中分析了当时形势的复杂性,但她的研究支持了福格尔与恩格曼的结论。^④ 城市奴隶需求是有弹性的,由于存在许多可用的替代品,奴隶价格的上涨导致需求的大幅减少。而与之相反的是,农业奴隶的需求则是稳定的。^⑤ 更高的棉花价格让奴隶价格上涨,因此,城市奴隶人口在 1840—1860 年间减少了。

奴隶生育与性剥削是迷思。理查德·萨克、赫伯特·古特曼与其他学者认为,废奴主义者在此问题上的观点是有积极意义的。确实存在证据显示奴隶主以各种方式提高奴隶的生育率,以便将他们的孩子出售。奴隶种植园的儿童和成人比率提高了,而同期女性与男性的比率则降低了。^⑥ 但是,在更长时期内奴隶与自由白人一样都出现生育率下降的情况,这显示奴隶的生育行为并没有战胜决定人口趋势的其他因素。然而,这一证据无法支持奴隶交易很少导致奴隶家庭解体的论点。

奴隶的生活条件比自由工人的更好。必须明确的一点是,由于奴隶是一个昂贵的生产因素,拒绝为奴隶提供营养的膳食、充足的衣物和居住条件将是一个愚蠢的经济错误,因为这样做将影响他们当时或未来的劳动能力。然而,福格尔和恩格曼提出了更加大胆的观点。他们认为奴隶的膳食不仅仅是营养,而且十分均衡而具有多样性。对这个问题我们无法找到确定的答案,因为为了证明这一结论,他们必须计算奴隶剩余收入中的食物消费。萨克指出,《十字架上的时间》引用的数据是将南方最大的种植园与北方最穷困的贫民窟进

^② Wright (1978), pp. 44—55. 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奴隶农业中的规模经济,在奴隶劳动和其他投入之间缺乏可替代性。很显然,奴隶主在扩展产量上受到了严格限制,他们增加奴隶,替代增加资本设备来扩展产量——因此,是奴隶劳动密集型农业。Mark Schmitz and Donald Schaefer, “Slavery, Freedom, and th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EEH*, July 1978.

^③ David and Temin, in David et al. (1976), pp. 202—214.

^④ Claudia Goldin, *Urban Slavery in the American Sou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⑤ 最简单的形式:如果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除以价格变动的百分比大于 1,那么就是需求富有价格弹性。如果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除以价格变动的百分比小于 1,那么就是需求缺乏价格弹性。

^⑥ Herbert Gutman and Richard Sutch, “Victorians All? The Sexual Mores and Conduct of Slaves and Their Masters,” in David et al. (1976). 参见 pp. 99—133, 在那一章讨论了奴隶的买卖, pp. 134—162 的那一章是关于奴隶的繁育。此外,更进一步的分析,参见 Richard Sutch, “The Breeding of Slaves for Sale and the Westward Expansion of Slavery, 1850—1860,” in Stanley Engerman and Eugene Genovese, eds., *Race and Slavery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Quantitative Studies* (1975), chap. 8.

行比较。他还指出,食物、衣服与医疗的证据并不能支持福格尔与恩格曼的结论。^②

在奴隶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对主要农场劳动力的剥削率仅为10%。福格尔与恩格曼计算的基础是奴隶在出生时的预计终生产出总量与终生维护成本总量的当前价值之差。对9岁以下的奴隶而言,由于关于这些年份的折息贴现很少,这一差值应为负数。在奴隶满9岁以后,这一差值将变为正数,但由于前面的折息贴现,直到奴隶27岁时总的剥削率才变为零。保罗·大卫(Paul David)与彼得·特明(Peter Temin)认为10%的剥削率过低,很可能是远远低于实际数值。^③

南方的经济增长比北方更加迅速。这一论点的准确性要取决于选取哪些地区进行比较。路易斯安那州的三角洲地带与得克萨斯州东部确实发展迅速,但1800年左右就开始实施奴隶制度的老南方地区却并非如此。不仅如此,大多数的南方人口人均收入均低于美国全国的平均水平。由于1840—1860年棉花种植大扩张,西南中央区在那段时间确实势头强劲,其发展速度超过了任何其他地区。^④

上述研究成果一部分证实了《十字架上的时间》的结论,另一部分则有力地批驳了福格尔与恩格曼的观点。论战由此产生。现在让我们考虑这场论战中的一些更有趣的部分。

3.3 从量到质

经济史学家试图从经济角度对奴隶制展开单独讨论,这一做法是可以理解的。经济理论的逻辑让经济学家可以基于定量证据得出强大的,甚至是限定性的结论。然而,这一操作的前提是能够找到这样的证据,而且产生这一证据的相关社会事实对分析结果没有影响。康拉德与迈耶的研究提供的是一般的证据,他们的结论没有引起很大的争议。后续的研究也有相当的限制条件,只限于已接受的一般证据。

福格尔与恩格曼则更加大胆。他们试图阐明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相关证据一直都是模糊而不乏争议的:为了维持奴隶的工作水平,奴隶主到底使用了多少暴力?奴隶的吃穿住条件到底如何?奴隶家庭的不稳定是否造成了南北战争后黑人社区存在的众多社会问题?奴隶家庭破裂的原因是否通常是奴隶交易?奴隶主是否有目的地如同喂养牲畜般喂养奴隶,以实现租金资本的最大化?奴隶婴儿死亡率是否比普通白人高许多?美国日益发展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决定了奴隶制度的灭亡?为什么奴隶反抗行动如此罕见?^⑤如果我们试图理解这一“奇特的制度”及其对美国的深刻影响,我们必须解答以上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定性问题。

在《十字架上的时间》一书中,福格尔与恩格曼大胆地试图在定量证据基础上正面回答这些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受到了十分严厉的批评。联系我们此前关于书面历史与理论问题的讨论,我们不难看到这些巨大争议的根源。要毫无争议地阐明“过去

② Richard Sutch, "The Care and Feeding of Slaves," in David et al. (1976).

③ David and Temin, in David et al. (1976), pp. 187—202. 平均剥削率是未支付给奴隶劳动的竞争性工资的一定比例。Fogel 和 Engerman 认为这个数字也许总体是 54%。Richard Vedder, "The Slave Exploitation Rate," *EEH*, October 1975, sees it as perhaps 65 percent overall.

④ Richard Easterlin, "Regional Income Trends, 1840—1950," in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e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pp. 38—45.

⑤ 这些问题的每一个讨论可以在以下著作中找到 Fogel and Engerman (1974), vol. 1, pp. 144—157.

是怎样的”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历史研究的本质,也是这场论战留给我们的教训。

保罗·大卫和彼得·特明对《十字架上的时间》提出了重要的批评。^⑥ 他们认为,如果将研究仅仅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我们不能得到关于奴隶的相对福利,即他们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的“富裕”程度的结论。例如,大卫与特明比较了恩格尔规律与奴隶的膳食清单。恩格尔规律是一个实证结论:一般而言,随着实际收入的增长,食物的消费比例会降低。而在福格尔与恩格曼的数据中,他们所称的奴隶实际收入的增加造成了与恩格尔规律相反的结果。奴隶们吃得更多了,他们摄入的膳食含有更多的碳水化合物,产生更多的卡路里。

大卫与特明问道:“一个自由白人家庭需要有多穷,才能将他们收入的这么大部分转化成膳食?”两位研究者试图证明,奴隶制度是强制性的,如果劳动和消费都在强制下完成,根据任何实际收入水平来作出福利方面的比较判断都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我们或许还可以说,由于奴隶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收入、家庭、衣服、子女、妻子、丈夫、牲畜等都没有物权,断言奴隶对自己的生活有任何程度的满足感都是愚蠢的。有一个战前的老笑话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这一点。有个奴隶从肯塔基逃走,被带到印第安纳治安法庭受审。

法官:你在那儿待得不开心吗?

奴隶:噢,不是的,我在那儿生活很好。

法官:你受到虐待了吗?

奴隶:没有,老主人和我是很好的朋友。我们老是一块儿钓鱼、打猎。

法官:你的食宿条件怎么样?

奴隶:还不错。我吃火腿、马铃薯,还有蜜糖。我的小屋前的玫瑰长得比门还高。

法官:我不明白,那你为什么要逃走呢?

奴隶:呃,法官阁下,如果你喜欢的话,那你自己去好了。

关于奴隶的健康与膳食,即使我们接受《十字架上的时间》最乐观的推测,这些证据仍然无法支持任何关于奴隶幸福程度的结论,就像如今美国监狱人口在关于“足够”的食物、衣服、医疗和牙医服务方面的标准常常高于许多“自由”的美国公民,但我们仍然无法就此证明罪犯比自由公民更幸福的结论一样。因此,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应当考虑其他的因素。

3.4 斯特克尔的发现

理查德·斯特克尔(Richard Steckel)的著述颠覆了我们了解的美国奴隶生活质量的信息。以往证据(主要是现存的种植园记录)表明,战前黑人人口死亡率与当时的白人没有太大区别。^⑦ 这似乎解释了先前我们提到的战前白人与黑人人口增长速度的相似性。但是,斯特克尔让人信服地证明,两个人种出生前死亡率与出生后死亡率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斯特克尔发现,奴隶婴儿的出生平均重量仅为 5.5 磅,有 30% 到 35% 的婴儿夭折。

^⑥ David and Temin, in David et al. (1976), pp. 183—184, 223—235.

^⑦ Steckel, “Slave Mortality” (1979).

他认为超过一半的奴隶婴儿死于流产或早夭,而当时医疗知识的贫乏是造成黑人和白人婴孩的高夭折率的原因之一。然而,5岁以下黑人儿童的死亡率大约为白人儿童的两倍,而南方更为恶劣的生存环境却只能解释这一差距的1/4。另一个已知的原因则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奴隶主往往让怀孕的奴隶母亲在分娩之前尽可能地延长工作时间,而在分娩之后又要求她们尽快重新工作。^③ 这些措施导致奴隶胎儿和新生儿营养不良:“从怀孕开始,母亲的疲惫就影响了胎儿的健康。”^④

考虑到奴隶人口的整体自然增长,斯特克尔认为奴隶女性的生育能力比此前预计的更高。事实上黑人人口的死产、新生儿死亡人数比白种人口高2.5倍,但新增怀孕数量弥补了这一差距。奴隶母亲平均首次怀孕年龄要比白人女性早两岁。^⑤ 新的奴隶年幼儿童数据证明了斯特克尔的下述结论:

例如,只有0.2%的3岁奴隶儿童达到了现代的身高标准,这意味着奴隶人口是所有生长学研究对象中最贫困的。相对身高的数字表明,甚至尼日利亚拉各斯的贫民窟和孟加拉国城区的生长环境都要优于美国奴隶儿童。^⑥

斯特克尔关于奴隶生活周期的营养与身体发育的发现也许更值得注意。同此前提到的出生体重一样,这些发现的数据来源是1820—1860年间使用海运和内陆水运的50606份奴隶申报单(托运声明),海运与内陆水运是东西海岸之间奴隶运输的主要方式。1807年的一部联邦法规定必须申报奴隶数据,我们因而取得了这些数据。船运申报表必须在始发码头填写并交给船长。这一法令的目的是确保来自加勒比或非洲的奴隶运输不会与美国本土港口的奴隶运输混淆。申报表显示了奴隶儿童严重的营养不良情况。然而他们中的幸存者一旦长大成为劳动力,又由于得到合理的膳食(包括肉类)而恢复正常发育和体重。如果这一切是有意为之,那么可以说这一食物提供策略是建立在十分冷酷无情的算计基础上的。6岁前的奴隶未来产值折扣应当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斯特克尔的结论并不认为,奴隶主这一冷酷无情的算计是奴隶儿童忍饥挨饿的原因。6岁以下奴隶儿童的身高让观察者有充分理由将他们误认为侏儒:“奴隶儿童的身高可能引起现代儿科医生的警惕。”^⑦ 在斯特克尔考察的所有人口中,美国奴隶儿童比任何其他同龄人群(欧洲、美洲、非洲、加勒比地区)的身高都要矮。然而在16岁半时,美国男性奴隶比英格兰工厂的工人和体力劳动者、意大利的穷人、哈普斯堡军事学校的学生、斯图加特的中产阶级、德国农民和俄罗斯工厂工人都要高。美国成年男奴的身高也超过了斯图加特的贵族。^⑧ 奴隶开始工作之后,给他们提供食物将获得更高回报,

^③ Richard Steckel, "Birth Weights and Infant Mortality Among American Slaves," *EEH*, April 1986. 也参见 Richard Steckel, "Stature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JEL*, December 1995。

^④ Richard Steckel, "A Dreadful Childhood: The Excess Mortality of American Slave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Winter 1986, p. 450.

^⑤ *Ibid.*, pp. 451—452.

^⑥ *Ibid.*, p. 430.

^⑦ Richard Steckel, "A Peculiar Population: The Nutrition Health, and Mortality of American Slaves from Childhood to Maturity," *JEH*, September 1986, p. 726.

^⑧ *Ibid.*, p. 728.

因此他们得到更好的膳食条件,以弥补年幼时身高的不足。^④

斯特克尔更进一步探讨这些数据可能解释的其他问题,例如关于奴隶的温顺和倦怠的记录(参见后文“埃尔金斯的解释”)。斯特克尔认为,虽然奴隶在成年时恢复了正常身高,但幼年的营养不良可能已经造成大脑功能的损害,而这一损害的负面影响延续到了成年时期。这一因素可以部分地解释黑人在解放之后成就寥寥的事实。^⑤ 这是一个可怕的推测。但是美国奴隶制度本来就是一个可怕的制度。

4. 为什么奴隶制度会延续?

我们可以将《十字架上的时间》理解为一个场景,其设计目的在于解释一个历史现象。到1860年,黑人奴隶制度已经在美国存在了将近两个半世纪,而且在最后的十年中,它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繁荣。在福格尔和恩格曼富有开创性的定量研究中,两位研究者试图在已有证据基础上解释这一系列引人瞩目的事实。不仅如此,虽然有Nat Turner和Denmark Vesey这样著名的逃亡黑人的例子,数以百万计的奴隶仍然选择生活在枷锁中,除了假装生病和小偷小摸这些普遍记载的行为之外,他们并没有对这一制度表现出多少反抗行为。^⑥

在数以千计相对封闭的种植园里,寥寥数个白种人同比他们人数多出数倍的黑人奴隶生活在一起,然而奴隶主们却对此几乎没有任何畏惧。这怎么可能呢?当我们思考这一问题,会发现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战前南方的一个著名观点是奴隶是快乐、善良、幼稚的生物,他们会对仁慈的待遇和偶尔的惩罚作出积极的反应。^⑦ 如果这不是奴隶制度得以持续的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在《十字架上的时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世界模式,在这个世界中,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企业为奴隶提供充足的物质回报和工作灵活性,以让其接受失去自由的境遇。福格尔与恩格曼声称,以黑奴为主要劳动力来源的战前棉花经济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功,不亚于“黑人在逆境下创造的成就”。^⑧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奴隶主与奴隶的共同努力可以解释统治了这个国家三分之一国土上的庞大的奴隶经济的高度生产力与相对稳定程度。两位研究者的这一解读受到了毫不留情的谴责。肯尼思·斯坦普(Kenneth Stampp)这样评论《十字架上的时间》:

……该书不是对奴隶制的辩解,其论点也并非种族主义性质……但它对奴隶生

^④ Philip Coelho and Robert McGuire, "Diets Versus Diseases: The Anthropometrics of Slave Childre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0, no. 1, March 2000, 他们认为美国南部的畸形环境反过来对奴隶造成了影响。Steckel 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回应。

^⑤ Steckel, "A Dreadful Childhood," *SSH* Winter 1986. 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Steckel 给出了最后的结论,但他强调这是推测性的。

^⑥ Kenneth Stampp 认为这种抵抗的形式比一般想象的更重要,并尖锐地批评了 Fogel 和 Engerman 对此不重视。David et al. (1976), "Introduction," pp. 27—28.

^⑦ Stanley Elkins, *Slavery: A Problem of American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1959), pp. 2—23.

^⑧ Fogel and Engerman (1974), vol. 1, p. 264.

活的高度评价仍然根源于传统支持奴隶制的解读……⁴⁹

斯坦普评价道：

在不规则的现实世界中，有着理性和不理性观念的奴隶主和奴隶挣扎着谋求生存。然而《十字架上的时间》却用一个理性、规则，而且从未存在过的世界，取代了这一现实世界。⁵⁰

4.1 埃尔金斯的解释

对于奴隶制度在这个国家的长期存在，有没有更好的解释？也许有，但这些解释同样存在争议。斯坦利·埃尔金斯(Stanley Elkins)认为，奴隶制度粉碎了个人主义，产生了“桑巴”式人格的刻板印象：这些奴隶快乐、无忧无虑、行为滑稽可笑，敬爱他或她的“老主人”。⁵¹ 这些奴隶对主人及其家庭的利益有着自我认同，愿意为主人兢兢业业地工作，并牺牲包括自己的家庭在内的一切。简单说来，这一行为是因为奴隶对奴隶主的过度依赖阻止了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主义的发展。结果是，种植园的黑奴都十分温顺，因为顺从比任何其他选择得到的回报都多。对拥有特权和力量的人表现出“卑顺”将获得回报，而任何其他行为都因受到禁止而代价昂贵。低阶的兵士、医院中的病人，以及几乎所有文化、所有时代的女性都有类似的体验。

埃尔金斯比较了美国黑奴与纳粹集中营中的被囚者。专制的野蛮行为、完全的依赖、自我认同的完全丧失，以及持续不断的羞辱让欧洲人也表现出类似的普遍的温顺行为，让他们几乎无法反抗极端的劳动要求，甚至无法反抗剥夺生命的行为。被囚者失去了自己的名字、语言（如果他/她不是德国人的话）以及文化——他们在集中营之前的生活失去了任何用处和意义。他/她不能制订任何计划。未来一片空白，而过去毫无意义。他们的生存依赖于迅速的服从，所有的福利都来自于拥有绝对权力的党卫军警卫队。因此，这些被囚者的价值观慢慢地被警卫队同化，他们开始与警卫队产生利益认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他们。被囚者试图讨好警卫队，到了最后，他们看起来甚至并不恨党卫军。在那种情形下，作为个人决定的自杀很少见，因为自杀所需的独立思维已经消失了。⁵²

黑人与集中营的被囚者之间的对应确实十分令人震惊。黑奴父母无法保护他们的孩子，从襁褓开始，黑人儿童就必须依靠主人的仁慈得到一些小恩小惠。对成人奴隶而言，终生的经验将他们限制于如何在系统内求得生存。违抗命令就要冒肉体惩罚（主要为殴打与鞭笞）、限制口粮，甚至被卖给奴隶贩子的危险。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在《快跑，乔丹，快跑》(*Roll, Jordan, Roll*)一书中提供了黑奴在解放之后缓慢、几乎是勉强地面对自由境遇的惊人描述，这一点与得到解救的集中营被囚者的反应十分

⁴⁹ Stamp, in David et al. (1976), p. 18.

⁵⁰ *Ibid.*, p. 30.

⁵¹ Elkins (1959), chap. 3; pp. 82—89 是对“桑巴”和奴隶的幼稚表现的讨论。

⁵² *Ibid.*, pp. 103—133.

相似。^⑤

4.2 吉诺维斯的观点

在《从叛乱到革命》(*From Rebellion to Revolution*)一书中,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试图用比埃尔金斯更客观的方式,解释黑奴缺少反抗的现象。^⑥与加勒比与南美地区的奴隶相比,19世纪1860年前美国的黑奴反抗行为规模很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吉诺维斯通过对当时发生的奴隶叛乱事件的研究,归纳出以下八个重要因素:

- (1) 黑人与白人的比例
- (2) 蓄奴单位的规模
- (3) 周围物理地形的性质
- (4) 非洲出生的奴隶与美国出生的奴隶的比例
- (5) 奴隶主在工作场所的存在
- (6) “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 (7) 落后的经济条件
- (8) 催生黑人领袖的社会关系结构

与加勒比和南美地区相比,美国南部上述八个因素的重要性使得反抗行为和哪怕是有限的成功的前景显得微不足道。

在美国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小规模反抗较可能发生。由于反抗行为成功的前景惨淡,奴隶个体只有选择服从体制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它。除了南加州与密西西比,白人在数量上都占优。几乎一半的美国奴隶身处于不到20人的小集体中,因而黑人起义需要的“批判群体”基础十分罕见。当地也缺乏人迹罕至的山区或雨林可以让逃亡的黑奴藏匿。在战前,绝大部分美国黑奴均为本土出生,他们不再像他们的非洲祖先那样接受过军事训练,而且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有着白人祖先。事实上,从17世纪晚期起,大部分活着的美国黑奴就已经是本土出生的了。^⑦

在南方的种植园里,奴隶主通常与奴隶生活在一起或是住在他们附近。南方的奴隶主之间,或是奴隶主和不蓄奴的南方人之间很少因为奴隶制而发生重大纠纷。他们的经济条件很好,没有成年奴隶会死于饥饿(除了受到惩罚)。黑人领袖很少,而且大多为宣传和平主义的基督教主张的奴隶牧师。基于这些证据,我们没有理由预期南方出现重大的奴隶反抗或叛乱事件。美国南方有可能出现一个Nat Turner,但像海地革命者让·雅克·德萨林(Jean Jacques Dessalines)这样的领袖则是不可能出现的。

因此,从“奴隶心理”或是理性叛乱的角度来看,反抗行为都毫无意义。在《十字架上的时间》的世界中,反抗更是无谓之极。那么为什么奴隶制度不能持续下去呢?它是一

^⑤ Eugene Genovese, *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 (1976), “The Moment of Truth,” pp. 97—112. 可以发现与集中营的比较, Elkins (1959), p. 114。

^⑥ Eugene Genovese, *From Rebellion to Revolution: Afro-American Slave Revolt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⑦ 我们得益于 Thomas Ulen 教授对这一点的强调。

个私有财产制度,它长期存在并得到法律保护,它为奴隶主产生了丰厚的利润,等等。

5. 奴隶“经营公司”的问题

对一些批评者而言,《十字架上的时间》最让人不安之处在于它将南方的奴隶种植园当成小型企业进行分析,认为它们的经营遵循严格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而这种经营方式也许与现代的乡村锯木厂并无二致。在该书中,奴隶制度的特殊性变成了成本与收益的函数,而奴隶主则被描述为了解自己的机会成本并采取相应行动的人。许多评论者更喜欢将奴隶制度视为前资本主义的、过时的人为体制,或是令人厌恶的畸形现象。然而,即使我们接受《十字架上的时间》的新古典主义分析,福格尔与恩格曼的某些结论仍然显得十分奇怪,而且两位研究者也确实倾向于以人道主义方式解读奴隶制度。正如前面所述,两位作者在合理的经济学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基础上提出了以下三个论点:(1)武力得到“最佳”的使用^⑤;(2)奴隶交易并不常见,而且极少导致奴隶家庭破裂;(3)奴隶主鼓励奴隶生育以创造利润是迷思。在纯粹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中,武力是金钱或物质回报的免费替代品,如果它能够产生较高的边际效益,就会得到使用。福格尔与恩格曼同意这一观点,并认为武力会得到“最佳”的使用。其他研究者也同意新古典主义的观点,但他们指出,有证据证明武力的“最佳”使用并不意味着它们“很少”被使用。^⑥不管怎么样,皮鞭的威胁可以而且也确实让奴隶付出的每小时劳动强度比自由劳工更高,在技术要求不高的农场体力劳动方面则尤其如此。

5.1 奴隶交易

现代公司的经理在辞退员工时往往并不关心他们的家庭关系。《十字架上的时间》的批评者们认为,奴隶家庭往往由于孩子、妻子或丈夫的买卖而破裂。在这一点上,福格尔和恩格曼比这些批评者更不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因为他们相信奴隶主会尽力使奴隶家庭保持稳定。这一问题可以由奥姆斯特德的记录得到证明,后者的一个研究对象相信如果一个年轻奴隶女孩被交易走,那么她一定是得罪了她的主人。“她做错了什么?”他问道。

“什么?没有。”

“你要对她做什么?”

“我要带她去里士满,然后把她卖掉。”

“你是她的主人吗?”

“不,她的主人是_____。他把她养大。”

“为什么他要把她卖掉?她做错了什么?”

“做错了什么?没有。我想她没做错什么。”

^⑤ Fogel and Engerman (1974), vol. 1, p. 232. 武力也得到审慎的使用;参见第 237 页。

^⑥ Herbert Gutman and Richard Sutch, “Sambo Makes Good, or Were Slaves Imbued with the Protestant Work Ethic?” in David et al. (1976), pp. 60—67, 90—93. 也参见 Giorgio Canarella and John Tomaske, “The Optimal Utilization of Slav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5, no. 3, September 1975.

“那为什么他要把她卖掉?”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卖掉她?他每年都会卖掉一两个奴隶,我想他是需要钱吧。”^⑤

奴隶交易发生的频率到底如何?它对奴隶家庭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似乎有证据证明奴隶交易发生得较为频繁,而且这些交易常常导致奴隶家庭的破裂。既然奴隶之间的婚姻(不管得到何种权威的认可)毫无法律地位,而奴隶儿童又属于奴隶主而非他们的父母,那么至少在奴隶儿童成年之后,奴隶家庭就只有依赖于奴隶主的仁慈才得以维持稳定。福格尔与恩格曼的批评者认为,与《十字架上的时间》提出的论点相反,一般的人道主义在老南方是一种稀缺商品。

5.2 生育

奴隶的生育又是怎样的呢?废奴主义者往往声称鼓励奴隶生育是很普遍的现象。请看奥姆斯特德的另一则引言:

对于我此前在《时代日报》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谨慎评价,有位奴隶主曾给我写信,信中说道:“在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肯塔基、田纳西和密苏里这些州,奴隶主会关注黑奴的生育和成长,就如同他们关注马和骡子的繁殖一样。在更南边的地区,蓄养黑奴的目的的一部分是为了使用,而另一部分则是为了将他们出售。种植园主会命令黑人女孩和(未婚和已婚)妇女生育孩子,我知道有很多黑人女孩由于没有生育而被卖掉。有生育能力的女奴比没有生育能力的女奴平均价格要高上1/6到1/4。”^⑥

《十字架上的时间》的主要批评者之一理查德·萨克认为,奴隶主可能采取任何手段以提高女奴的生育能力。奴隶交易的利润为交易预期收益与将奴隶养育至适龄所需的费用之差。到19世纪50年代为止,奴隶婴儿的价格达到150美元以上。^⑦任何种植园的奴隶都是可以增殖的财产,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牲畜的地位毫无二致。可以假定任何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奴隶主均会将奴隶的生育作为获取利润的选择之一。

由于福格尔和恩格曼声称奴隶主对奴隶的生育控制并不存在,至少并不普遍,众多反对者提出种种反面证据和观点对他们进行了猛烈攻击。^⑧康拉德和迈耶认为,奴隶交易与生育控制是奴隶制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不以棉花为主要作物的老南方,奴隶主会向产棉区供应黑奴,因此整个美国南方均受益于奴隶交易。如前所述,道格拉斯·诺斯甚至认为整个美国都在经济上受益于奴隶交易。这也成为废奴主义者最强有力的论点之一。持有维多利亚道德观的美国人似乎对这种不道德的纯理性思维十分震惊。在这个问题上,理查德·萨克谨慎地与上述证据保持距离(我们永远无法证明这些证据具有典型性或是经常发生),与之相反,他试图通过奴隶年龄、性别与户籍的普查数

^⑤ Olmsted (1959), pp. 49—50.

^⑥ *Ibid.*; 参见49页的脚注。

^⑦ Gutman and Sutch, in David et al. (1976), pp. 159—160.

^⑧ Fogel and Engerman (1974), vol. 1, pp. 78—86.

字来说明问题。他的发现如下：

- (1) 老南方出售给新南方的奴隶净交易额数量巨大；
- (2) 在儿童与成年奴隶的比率方面，奴隶输出州普遍比奴隶输入州更高；
- (3) 在奴隶输出州中，男女奴比率更低的种植园具有更高的实际儿童与成年奴隶比率。

所有这些证据似乎都不可避免地指向同一个结论。萨克的结论十分明确：

许多美国南方的奴隶主有系统地控制奴隶生育以供交易。这些奴隶养殖者集中在边境以及大西洋沿岸诸州。他们蓄养大量育龄女奴，并鼓励奴隶的一妻多夫和滥交行为。这一繁殖经营的产品大多在刚刚成年时即被销售或输出到西南部实行奴隶制度的各州。

这样的操作几乎不可能是无意行为……^②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结论并不能证明美国南部的奴隶生育控制行为具有典型性或者普遍存在。它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奴隶生育控制的确存在，它并不是迷思。即使没有生育控制，奴隶制度仍然是一个坏制度，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奴隶生育控制至少在南方某些农场的存在。

6. 小结

在本章中，我们仅对奴隶制度的现代论战的某些重要方面进行了探讨。严格意义上说，许多类似奴隶家庭性质的争议并不仅仅是经济学问题。经济学逻辑或是忽略了这些争议点，或是以许多学者看来十分不自然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分析。希望得到更多信息的读者可以阅读本章引用的主要文献。目前我们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仍然缺乏定论，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例如，“整个南方”从东西奴隶交易中到底获得了多少实际收益？东部高质量奴隶劳动力的流失在何种程度上降低了当地的农业收益，又在何种程度上提高了西部的农业收益？交易净收益的数额是多少？Passell 和 Wright 以及他们之后的 Kotlikoff 和 Pinera 以证据证明，在棉花种植向西部扩展的过程中，老南方与新南方的奴隶交易收益可能与众多高质量奴隶流失造成的土地贬值相互抵消。^③ 斯特克尔的著作则证明，奴隶主系统地压缩奴隶营养供给以降低支出的运作，更多是出于无知而非刻意的谋杀。他指出，即使严格的以赢利为目的的成本收益分析可以为居高不下的奴隶儿童死亡率提供理论基础，这也并不能证明奴隶主是基于这些分析而制定了其供应政策。

1994 年，罗伯特·沃普斯 (Robert Whaples) 对 178 位经济历史学家进行了问卷调查，

^② Sutch, "The Breeding of Slaves," in Engerman and Genovese (1975), pp. 195 and 198.

^③ Peter Passell and Gavin Wright, "The Effects of Pre-Civil War Territorial Expansion on the Price of Slav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0, no. 6, December 1972; Laurence Kotlikoff and Sebastian Pinera, "The Old South's Stake in the Inter-Regional Movement of Slaves, 1850—18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7, no. 2, June 1977.

邀请他们阐述自己在几场主要学术争议中的立场。^④ 调查针对奴隶制度提出了四个陈述,被调查者的反应提供了美国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般看法。几乎所有被调查者都不同意前两个陈述:

(1) 种植园主维持奴隶制度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他们或者对如何实现自己的最大经济收益没有认识,或者对此毫无兴趣。

(2) 南北战争前夕,奴隶制度在经济上已经日暮途穷。

后两个陈述则反映了福格尔与恩格曼更具争议性的研究结论。虽然它们得到了多数被调查者的支持,但是支持者的比例大大减少。三分之二强的受访者对第三个陈述表达了有条件的支持:

(3) 与使用自由劳动力的农业相比,奴隶农业更有效率。规模经济、有效管理与劳动力和资本的密集使用让南方的奴隶农业比非奴隶农业更为高效。

最后,仅有一半多一点的被调查者支持了以下陈述:

(4) 在南北战争发生前的十年里,南方奴隶的物质(而非心理)生存条件比自由工人要更优越。

奴隶制度已经一去不复返,奴隶制度的见证者也已经故去。然而,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学者仍然在检查这一制度的残骸,并试图告诉我们“历史的真相”。未来的研究无疑还会产生类似《十字架上的时间》的地震效应。

奴隶制度在一个多世纪前的结束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只是让美国黑人以一种新的形式融入主流社会。不管我们如何痛恨美国的奴隶制度,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它是美国历史上十分特殊的存在。在许多方面,奴隶制度都与逻辑相悖,而且从19世纪欧洲普遍的(刚刚发现的)道德观念来看也是令人厌恶的。主要应用于南方农业经济的奴隶制度产生了十分惊人的生产力。要理解美国历史,我们就无法回避奴隶制度的讨论。正因如此,那些尖刻的评论、激烈的争议,以及由此产生的耻辱与愤怒,也会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点燃。有人可能希望美国只有英雄和纯洁的历史,然而这并不符合事实。将人当成财产持有的现象与西部大屠杀、针对少数民族的各种不公正现象、高层腐败、犯罪等一样,都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历史是关于人类的历史,即使是经济史,也无法回避人性的瑕疵与缺陷。

推荐阅读

文章

Aufhauser, R. Keith. "Slavery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1, March 1974.

Conrad, Alfred, and John Meyer. "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6, no. 2, April 1958.

^④ 参见 Robert Whaples, "Where Is There Consensus Among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ians? The Results of a Survey on Forty Proposi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5, no. 1, March 1995.

Fenoaltea, Stefano. "The Slavery Debate; A Note from the Sidelin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8, no. 3, July 1981.

Fleisig, Heywood. "Slavery, the Supply of Agricultural Labor,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Sou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6, no. 3, September 1976.

Fogel, Robert William.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Slavery: A Comparison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Agriculture in 186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8, no. 3, Spring 1971.

———. "Three Phases of Cliometric Research on Slavery and Its Afterma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no. 2, May 1975.

———. "Explaining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Slave Agriculture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A Rep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0, no. 4, September 1980.

Fogel, Robert William, and Stanley L. Engerman. "Explaining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Slave Agriculture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7, no. 3, June 1977.

Schmitz, Mark D., and Donald F. Schaefer. "Slavery, Freedom, and th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5, no. 3, July 1978.

Steckel, Richard H. "Slave Height Profiles from Coastwise Manifest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6, no. 4, October 1979.

———. "Slave Mortality."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 3, nos. 3 and 4, October 1979.

———. "Slave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vol. 5, no. 4, Winter 1980.

———. "Birth Weights and Infant Mortality Among American Slav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3, no. 2, April 1986.

———. "A Peculiar Population: The Nutrition, Health, and Mortality of American Slaves from Childhood to Maturit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6, no. 3, September 1986.

———. "A Dreadful Childhood: The Excess Mortality of American Slave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 10, no. 4, Winter 1986.

———. "Stature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3, no. 4, December 1995.

Sutch, Richard. "The Profitability of Antebellum Slavery Revisited."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31, no. 2, April 1963.

———. "The Treatment Received by American Slave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Evidence Presented in *Time on the Cros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2, no. 4, October 1975.

Thomas, Robert Paul, and Richard Nelson Bean. "The Fishers of Men: The Profits of the Slave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4, December 1974.

Vedder, Richard K. "The Slave Exploitation (Expropriation) Rat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2, no. 4, October 1975.

Wright, Gavin. "Slavery and the Cotton Boom."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2, no. 4, October 1975.

Yasuba, Yasukichi. "The Profitability and Viability of Plantation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12, no. 3, September 1961.

Zepp, Thomas M. "On Returns to Scale and Input Substitutability in Slave Agricultur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3, no. 2, April 1976.

书籍

David, Paul, Herbert Gutman, Richard Sutch, Peter Temin, and Gavin Wright. *Reckoning with Slavery: A Critical Study in the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American Slave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Douglass, Frederick.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8.

Elkins, Stanley M. *Slavery: A Problem of American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59.

Engerman, Stanley, and Eugene Genovese. *Race and Slavery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Quantitative Stud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Fogel, Robert William.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89.

Fogel, Robert William, and Stanley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2 vol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Genovese, Eugene. *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6.

Gray, Lewis.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to 1860*, 2 vols. Washington, DC: Carnegie Institution, 1933.

Gutman, Herbert. *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6.

Olmsted, Frederick Law. *The Slave States*.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59.

Stampp, Kenneth. *The Peculiar Instit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4.

Washington, Booker T. *Upfrom Slavery*.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63.

Wright, Gav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tton South*.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

第 11 章

早期工业部门

为了全面理解美国的工业产出在 1913 年达到的水平——几乎相当于欧洲所有国家的总和——我们必须回到从前,观察其萌芽时期的情况。1790 年,大部分制造业活动尚处于原始状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制造业报告》(*Report on Manufactures*, 1791)一书中估计,当时美国人所穿的衣服中有 2/3 到 3/4 是家庭自制的。显然,当时的纺织机也完全不是由水力驱动的。如前所述,当时有水力驱动的谷物磨坊,以及一些和农业相关的基本制造行业如麻袋制造、制桶等。城镇里有手工制作工具、鞋类、帽类、瓶罐、盘碟等的工匠。沿河而建的锯木厂,如梅里麦克,和小型工厂十分相似,正如(旧媒体所说的)布兰迪维因溪上的杜邦(DuPont)粉末工厂一样。

建国之初的美国制造商很难同英国人进行竞争。直到 1812 年战争之前的数年,英国陷入了欧洲战场,美国决定维护其作为中立国家的权利,立法宣布禁止对外贸易,其国内生产才大幅增长。美国的企业大部分规模甚小,如果中止贸易,可以很快复制这些企业。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国内生产也经历了短期增长。一直到 1820 年,制造业企业大部分仍然集中在东北部,使用历史悠久的生产程序,纺织业则是著名的例外。

1. 制造业的变化方向

如果美国在 19 世纪的工业进展和欧洲一样,那么到了 20 世纪早期时,美国的工业产出将只有欧洲的 28% 甚至更少。事实上,1913 年美国生产了 3 190 万吨的粗钢,欧洲所有国家的总和为 3 550 万吨;美国出产了 5.17 亿吨的煤,欧洲则是 4.93 亿吨。我们所见的是一个工业奇迹的开始。据估计,到 1914 年,美国的工业生产率是西欧的两倍。在 19 世纪,美国的工业能力让世界震惊。首先,让我们看看影响 19 世纪美国工业增长的因素。

1.1 人的因素

我们可以认为,1790 年美国展现的机械能力与西欧相同。一般都认为,当时美国人的识字能力和计数能力与欧洲人大致相当;在定居区(至少在北部与中大西洋各州)可以获得初等教育。在商业与技术运用方面,如造船业和发动战争的能力上,他们也与欧洲水平相当。美国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发展程度不高”的国家,它只是拥有的工业较少。

1.2 工业革命的传播

1790 年,工业革命已经在欧洲出现,其中心在英国,英国因此获得了(并且试图维持

其)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英国与试图秘藏新兴科学知识的现代政府并无不同,它试图维持技术上的垄断地位。在1774年和1781年,英国国会通过了禁止出口新型工业机械的法律,出口纺织机械的人将被罚款200英镑并入狱12年。1782年的一项法律对“盗用劳工”(labor pirating),即试图吸引英国熟练技工出国的行为,加以处罚。但是,政府是不可能完全阻止技术扩散的。无论是否合法,工业家们总是会前往有钱的地方,并将英国工业革命传播到那里。

1775年,著名英国工业家“铁老大”约翰·威尔金森的兄弟威廉·威尔金森准备利用英国的机械和工人在法国建设钢铁厂,并且教会法国人如何利用该机械生产加农炮的炮筒。1789年8月3日,在革命中的法国旅行的阿瑟·扬(Arthur Young)见到了几座威尔金森的工厂,并对Montcenis的设施进行了如下描述:

……一个令人不快的国家。……这是一个Mons的座位。Weelkainsong的铸造加农炮工厂。……法国人说这个活跃的英国人是Dr. Priestly的亲戚,因此他是人类的朋友:而且,为了把自由带到美洲,他教会他们如何生产加农炮。这个工厂规模相当大;除了矿工之外,还有大约500到600名雇佣工人;架设了五个蒸汽机进行熔铸和生产。……我与一位英国人进行了交谈……这里曾经有很多英国人,但现在只有两个了。……^①

在比利时,制造工业的开端是与William Cockerill的名字和企业联系在一起的,而此人也是来自英国。在Ruhr谷,德国工业在爱尔兰人W. T. Mulvany的指导下发展。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的俄国,是John Hughes及一群威尔士人在从事煤、铁工业。^②

美国也从这种转移中获益良多。约克郡的Schofield兄弟在18世纪90年代早期来到美国,建造了水力梳毛机。其追随者中比较著名的有苏格兰的工程师Henry Burden,他为马萨诸塞的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即所谓的“美国技术摇篮”,带来了最重要的技术革新。^③他说服移民机械师在那里工作。来自威尔士的移民David Thomas是第一个将无烟煤炼铁技术引进19世纪40年代的宾夕法尼亚州炼铁业的人。就在30年后,移民Scot Andrew Carnegie将利用英国发明家Henry Bessemer的转钢炉,“Bessemer的火山”,在美国发动钢铁的工业革命,其他人也曾尝试过,但是失败了。

熟练的美国观察者也引进了工业化。阿尔米和布朗(Almy and Brown)是美国最早的纺织厂,它利用了Samuel Slater从英国走私过来的技术。Francis Cabot Lowell于1811年在英国旅行时被英国的织机迷住了,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回家之后,他与一位名叫Paul Moody的熟练机械师合作,终于在1814年成功制成了水力织布机。我们在第6章中已经看到,洛厄尔的企业不仅是美国大规模纺织厂的先驱,也带来了重大的劳动力创新。

① 引自Jonathan Hughes,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History: Theses and Conjectures*(1970), p. 74。

② 关于创业型移民的更加详细的讨论及其他相关阅读材料,参见Hughes(1970), pp. 71—77。

③ Paul Uselding, “Henry Burden and the Question of Anglo-American Technological Transfe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EH*, June 1970。

1.3 美国的创新

尽管美国不遗余力地向欧洲学习,但独特的发明和创新很早就在美国开始出现。使用“独特”这个词是为了突出美国工业的两大显著特征:利用机械来节约劳动力,挥霍地使用原材料。美国缺少劳动力,原材料却极为丰富;因此,它谨慎地使用稀缺的资源,自由地利用丰富的资源。简而言之,这是良好的经济学实践。

其后果在1860年的棉纺织业中就可以看到。英国的纺织厂平均拥有1.7万个纺锤,276个纺机,而新英格兰的纺织厂平均只有7000个纺锤,163个纺机。美国棉纺织业(是美国最大的行业)拥有的纺锤数量是英国的20%,劳动者数量约为英国的25%,消耗的原棉却高达英国的40%。^④ 美国的生产率比英国高,到1860年,美国的这一优势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好奇。在工业的其他部门里,较高的生产率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尽管这些工业技术都不是在美国发明的。^⑤ 这是怎么回事?

1784—1785年,发明家奥利弗·埃文斯(Oliver Evans)在费城郊外建造了一座由重力、摩擦力和水力驱动的面粉磨坊。谷物由吊桶和皮带带动从装载仓经过磨坊各层,人除了操控之外,无须进行额外的干预。这个磨坊一小时可以处理三百蒲式耳的谷物。这是一条流水线,它出现在亨利·福特的高地公园工厂装配第一条真正的汽车生产流水线之前一百多年。

伊莱·惠特尼和西蒙·诺思(Simeon North)都获得了联邦政府的武器合同。惠特尼的是在1798年制造一万杆步枪,诺思的是在一年后制造一批手枪。两人都遵循了可互换式零件的概念——利用冲压机和切削机,按照一定的模式制造完全相同的零件。不熟练的工人只需最低程度的手工装配(锉磨)就能将这些零件组装成最终产品。

在磨坊的例子中,其部分目标是用资本设备(capital equipment)——机器——来替代不熟练工人。在武器制造的例子中,技术则用来替代熟练工人,即美国缺乏的军械修护员。惠特尼这样谈论其设计机械以取代人类技能的岁月:“我不但需要制造武器,而且需要造出大部分军械修护员。”^⑥ 财政部长奥利弗·沃尔考特(Oliver Wolcott)将合同给了惠特尼和诺思。他至少很欣赏惠特尼的作为。沃尔考特在给惠特尼的信中写道:“我认为,对制造武器的机器的显著改进是美国的巨大收获。”^⑦ 奥诺尔·布朗克(Honore Blanc)曾在法国尝试过这一概念,但据人们所知,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当时正在法国的托马斯·杰斐逊曾与他谈话,希望他能移居美国。惠特尼曾向英国和法国的官员解释他的点子,但却遭到嘲笑。惠特尼在1809年完成了一万杆步枪的合同;1812年,使用老办法的英国人有20万杆损坏的步枪,需要军械修护员一一修护每个零件。^⑧ 因为他们的步枪是一个一个单独做的,其零件都是不可以互换的。

到了19世纪30年代,标准化、可互换性、生产过程中的分工等概念已经在美国工业

^④ Hughes (1970), p. 132.

^⑤ 对这一工业的详细讨论,参见 Robert Brooke Zevin, “The Growth of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After 1815,” in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e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1971), chap. 10.

^⑥ Jonathan Hughes, *The Vital Few: American Economic Progress and Its Protagonists* (1986), p. 123.

^⑦ 引自 Hughes (1986), p. 141.

^⑧ *Ibid.*, pp. 141—142.

中广泛运用。它们在制作部门的整合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结果,而这后来成为美国经济生活的重要特征:尽管美国的熟练工人和欧洲一样,通常有比不熟练工人更高的工资,但熟练工与不熟练工的工资比例却比欧洲低。^⑨ 英美两者比例的差异反映出美国的不熟练工人具有相对较高的生产率,因为他们的工作受到机器的帮助,从而弥补了其技能的匮乏。^⑩ 到了19世纪40年代,这一体系已经在锁、钟和表中使用。1846年,缝纫机被授予专利,很快它就进入了鞋类、马具、服装制造等行业。

在1851年的伦敦世界博览会上,美国的产品虽然并不以优雅见长,但它们的实用和廉价却十分引人注目。^⑪ 从那时起,“美国制造体系”开始为人所知——设计简单、标准化、可互换性、大规模生产——它逐渐主导了轻型消费品的领地。^⑫ 随后,它还将进入重工业部门,进入机械制造(制造机械的机械),最终主导几乎整个经济体。到了19世纪末,美国工业的单位劳动平均产出与欧洲和英国形成了鲜明对比。最终,美国会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一个在服务站工作的十几岁的不熟练工人可能和熟练的木工挣钱一样多,流水线工厂里的不熟练工人可能比簿记员甚至学校老师挣钱更多。

1.4 美国制造体系

经济历史学家,尤其是内森·罗森伯格,在19世纪初期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对可互换式零件的“美国体系”的采用,19世纪中期机械工具产业的发展,以及19世纪末期自行车、航空工业和汽车工业的出现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⑬ 技术历史学家如梅里特·罗伊·史密斯(Merritt Roe Smith)和戴维·霍恩谢尔(David Hounshell),准确地记录了这一过程中的各个步骤是如何发生的。史密斯展示了陆军部军械司在促进可互换性方面的作用,而霍恩谢尔则在公共部门的兵工厂与位于康涅狄格河谷的私人部门金属加工业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⑭

另一位技术历史学家唐纳德·霍克(Donald Hoke)对这一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尽管霍克看到的史实与其他历史学家完全一样,但他认为,在美国工业发展历史中,位于康涅狄格河谷的私人部门金属加工业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才是最重要的角色。他坚信,美国体系开始于19世纪第二个十年布里斯托的木质钟表制造业以及19世纪30年

⑨ Nathan Rosenberg, "Anglo-American Wage Differences in the 1820s," *JEH*, June 1967.

⑩ 而且,1821—1859年的证据表明,在独立战争前时期,非熟练工人工资年均增长1.4%,而熟练工人工资年均增长1%。加强了这种模式。Robert Margo and Georgia Villaflor, "The Growth of Wages in Antebellum America: New Evid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7, no. 4, December 1987. Gerald Friedman的发现表明,内战后这种模式最终得以逆转,1903年,熟练工人的工资比非熟练工人的工资高83%,1890年这个数字是80%,而1880年只有61%。19世纪晚期大西洋移民中非熟练工人的涌入颠覆了工业化早期形成的历史模式。Gerald Friedman, "Strike Success and Union Ideology: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1880—191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8, no. 1, March 1988.

⑪ Nathan Rosenberg, *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72), p. 50.

⑫ 到1871年, Henry Burden的机器能够每小时生产3600只马靴。Uselding (1970), p. 331.

⑬ 例如参见 Nathan Rosenberg, ed., *The American System of Manufacturers: Th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Machine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55 and the Special Reports of George Wallis and Joseph Whitworth 1854*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⑭ Merritt Roe Smith, *Harper's Ferry Armory and the New Technology* (1977), Merritt Roe Smith, "Army Ordnance and the 'American System' of Manufacturing, 1815—1861," in Merritt Roe Smith, ed., *Military Enterpris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Perspectives o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Cambridge: MIT Press, 1985); 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1984).

代哈特福德附近的柯林斯制斧厂；“兵工厂并不是之前所认为的那种重要因素”。^⑮

霍克与其他历史学家之间的基本分歧在于各自寻求的东西不同。史密斯和霍恩谢尔试图解释罗森伯格所描述的“技术趋同”是如何发生的，解释从建国初期的小规模武器生产到一个世纪之后福特汽车公司的装配流水线的长期变化。霍克并不试图在他研究的行业与其他同为“技术趋同”传统一部分的相邻行业之间建立联系。他想知道谁是第一个调整这一技术的人。由于二者所提的问题略有不同以及对于何为“重要”的因素分配的权重不同，所以二者可以同时都“正确”。

1.5 要素比例的重要性

近些年来，学者们仔细研究了19世纪美国工业创新的单一模式，以找出其远因。劳动力和土地的丰富程度差别是美国制造业采取这种发展道路的原因吗？John Habakkuk爵士在其先锋著作《19世纪美国和英国的技术：寻找节约劳动的发明》一书中认为，美国之所以需要降低劳动成本（节约劳动）的机械，其最初原因是工人的“机会成本”——边疆存在其他的可行选择。^⑯ Habakkuk写道，廉价的土地意味着制造业的工资必须足够高，才能留住工人，让他们不“到西部去”。可以看出，当时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雇主不能以现行价格雇用到所需的全部工人。他们必须付出更高的工资。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雇主来说，让相对不熟练的工人使用机械可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率，从而弥补额外的工资支出。然而，这是一个看似悖论的结果：劳动变得更加“稀缺”——高价——提高工资带来的“节约劳动”的诱惑也就更大了。因此，由于生产率的提高，一支快速增长的工业劳动力队伍也是一支“高工资”的劳动力队伍。^⑰

随着这一体系日渐普及，美国工业家能够以比欧洲通行水平更高的工资雇用工人，购买利息更高的机器，并且仍然有利可图。在一个静止的世界里，更高的利息会限制投资。但是，因为技术进步使得资本的产出率更高，投资需求曲线向右边移动了——使得利率和投资水平同时提高。因为高效的技术，美国经济变成了一个具有高工资、高利率、高利润及快速增长率的经济体。

约翰爵士认为，在英国，有效利用机械的压力没有那么大，部分是因为英国工人没有美国那样容易前往的边疆，只得接受更高技能下的更低工资，诱使英国的雇主利用熟练工人这种丰富的资源。随着时间的流逝，英国工业变成了低工资的劳动利用型产业，而美国工业则日益变成高工资的劳动节约型产业。^⑱

^⑮ Donald Hoke, *Ingenious Yankees: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System of Manufacturers in the Private Sect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58.

^⑯ H. J. Habakkuk, *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earch for Labour-Saving Inventions* (1962). 对 Habakkuk 理论的一个大胆证明，参见 Paul Uselding, “Factor Substitution and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merican Manufacturing 1839—1899,” *JEH*, September 1972.

^⑰ Habakkuk (1962), chap. 3.

^⑱ 证明非常坦率，Habakkuk 假说本身是非常简洁的。用相对工资数据来强调它被证明是有挑战性的事业。Nathan Rosenberg, “Anglo-American Wage Differences in the 1820s,” *JEH*, June 1967; Donald Adams, Jr., “Wage Rates in the Early National Period: Philadelphia 1785—1830,” *JEH*, September 1968; Jeffrey Zabler, “Further Evidence on American Wage Differentials, 1800—1830,” *EEH*, Fall 1972; Donald Adams, Jr., “Wage Rates in the Iron Industry: A Comment,” *EEH*, Fall 1973; and Jeffrey Zabler, “More on Wage Rates in the Iron Industry: A Reply,” *EEH*, Fall 1973.

当然,技术选择(实际上是所有被采用的技术变革)的问题,必然牵涉到技术工具的采用以及知识、生产组织、劳动力、市场营销、金融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保罗·大卫对 Habakkuk 的开创性研究进行了补充,他提供了一种解释,说明为什么技术发展中的重大分歧能够实现自我维持。^① 他的研究基于英美两国 19 世纪的技术。技术变化可能开始于劳动与资本价格比率的改变,例如引起从劳动密集型向劳动节约型生产过程的转变。然而,可能的技术与可行的技术是不同的。后者比前者少,而且,如果要进行根本性的改变(例如从畜力转变到机械力),其他相关活动也必须进行调整,才能完全应用这种改变。工作方式要更改,新的常规要形成。将这种技术转变融合到整个社会之中需要一个可能会对地方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这一过程牵涉到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社会基础设施的相应发展以及边干边学。

日积月累之下,许多小的进步积累起来,使得经济与新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较老的方法和组织消失了,新的过程在市场经济中扩散。随着时间流逝,演化出了一个全新的系统;相关的经济活动以适合新技术的方式发展,使其社会生产率更高、经济效益更好。在某种程度上,最初的技术改变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如果开动这个边干边学的过程的话。即使要素价格回到过去的水平,也就是说回归旧技术会带来边际优势,很可能也不会出现再次转变了:经济不会回到老轨道上的。抛弃所有新近改变的固定成本太高了。继续在这种新的、日益普及的经济组织方式之下进行节约成本的改进工作,是更有利可图的做法。^②

威廉·拉兹奥尼克出版了一份有趣的案例研究,论述了这种机构和技术力量。^③ 他将劳动力与所有权的反作用力作为背景和初始条件。我们可能会以为,在 19 世纪的棉纺织业中,大西洋两岸的技术是整齐划一的。然而,尽管英国的棉纺织业成为使用较差原材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美国的这一产业却采用了新技术,使用更好的机器、品质更高的原材料,同时又节约劳动力。英国劳动者组织起来以保护其工作机会,用技能和较差的原材料取代新技术,并通过这种方式与管理层合作。与英国人不同,美国工人没有联合起来;他们倾向于经常更换工作,如果别处有更好的机会,他们就会离开这个行业。美国工业可以通过更新的机器、品质更高的原棉、对稳定劳动力更少的依赖性来弥补这种流动性带来的损失。

另一个关于劳动力的考虑是格尔丁-索科洛夫假说——最先工业化的领域是女性及儿童的工资比成年男子工资低的行业——在第 6 章中已对此假说进行了介绍。^④ 在

^① Paul David, *Technical Choice,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1975).

^② 在一个经济体中被放弃的技术在另一个经济体中则未必遭淘汰,即使一项技术在别处遭到放弃,它也可能在一个地区随时间流逝而得以改进。这种情况的一个有趣例子,再转换的少数案例,是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木火炉取暖的重新流行。在新英格兰,由于煤油便宜(而且更方便)这种炉子曾经长时间被弃用。当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 OPEC 限制燃料油供应价格时,新英格兰人又被驱使回到他们取之不尽(劳动应用型)的木头供给上。他们非常惊喜地从斯堪的纳维亚进口木炉,在那里木炉并未被弃用而且得到了很大改进。20 世纪 30 年代就被看做过时的技术在 40 年之后得到了令人吃惊的改进。

^③ William Lazonick, "Production Relations, Labor Productivity, and Choice of Technique: British and U. S. Cotton Spinning," *JEH*, September 1981.

^④ Claudia Goldin and Kenneth Sokoloff, "The Relative Productivity Hypothesi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American Case, 1820 to 1850," *QJE*, August 1984.

1820—1860年间,几乎所有的制造企业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纺织业比其他行业做得更好。劳工组织的改变似乎可以解释这种现象,这也与该假说一致。雇用较大比例的女性及儿童的企业一般是位于城镇地区或其附近的较大企业。尽管它们与较小的作坊企业的资本劳动率几乎相同,但它们的规模更大,所以可以采取一种更加复杂的劳动分工方式。这些较大的企业通过把生产地点从人们的家中转移到制造工厂中使得工作的步伐加快了。在城镇地区之外,女性及儿童大部分只是在非高峰期从事兼职工作,他们希望工作的时间和地点具有灵活性。因此,家庭手工业尽管生产效率较低,却仍然是一种有竞争力的组织形式。索科洛夫指出,证据“似乎表明,维持这种观点越来越难了,即东北部工业化扩张的起因主要是由于停滞而衰落的农业部门释放出了劳动力及其他资源”。^③

1.6 生产力和专利权

索科洛夫对生产力的研究成果与传统观点一致,即南北战争之前工业技术的变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南北战争之前的大部分时期,其时制造工厂从纺织业扩散到其他行业。他的估计值表明,在南北战争之前,总要素生产力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效率提高了,而资本劳动率并没有显著增加。而且,技术进步的速度在战前和战后几乎一样快。第二个阶段开始于约19世纪50年代,其时非畜力能源得到广泛采用,因此出现了更加机械化的生产技术,资本—劳动比率也相应提高了。

根据现有的量化证据,索科洛夫发现,在手工作坊扩张到前工厂式的雇用10到15名工人的专业化手工工场过程中,存在着规模经济。新英格兰的良好农田相对较少,较为“城市化”,互相竞争的工匠相对较多,受到这种规模经济的影响,发展出了一种以重组专业化手工工场为基础的“前工业化时代的”工业。^④索科洛夫不确定规模经济是来自这种重组带来的社会大分工和专业化(类似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提出的著名图钉厂事例),还是因为工作单位的劳动强度更高,因为手工工场的工作可能会受到更多的监督和管理。在欧洲工业史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发展情况。^⑤

^③ Kenneth Sokoloff, “Productivity Growth in Manufacturing During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the American Northeast, 1820—1860,” in Stanley Engerman and Robert Gallman, eds.,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86), p. 724. 也参见 Kenneth Sokoloff and David Dollar, “Agriculture Seasonalit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 Early Industrial Economies: The Contrast Betwee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7, no. 2, June 1997.

^④ David Meyer 的有趣研究 *The Roots of American Industrialization* (2003) 认为新英格兰农业和工业在内战前是共同增长的。农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源自农场主价格刺激使有能力的劳动力转向工业部门,并为逐渐增加的农村和城市人口提供食物。人均收入在增长,使得对新英格兰工厂的产品需求增加了。

^⑤ Kenneth Sokoloff, “Was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Artisanal Shop to the Nonmechanized Factory Associated with Gains in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the U. S. Manufacturing Censuses of 1820 and 1850,” *EEH*, October 1984; Herbert Kisch, *From Domestic Manufacture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Kisch 提到“原型工厂”的最初思想出现在以下著作中, Fritz Redlich and Hermann Freudenberg,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Europe: Reality, Symbols, Images,” *Kyklos*, vol. 25, 1964, p. 381. 工业化发展路线的概括在欧洲是这样被 Joel Mokyr 描述的“……工业化之路由原始现代部门的出现构成的,在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加,直至最终完全统治了经济。” Joel Mokyr, “Growing-Up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urop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3, no. 4, November 1976, p. 372. 对原始工业化思想的研究,参见 D. C. Coleman, “Proto-Industrialization: A Concept Too Man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36, no. 3, August 1983.

索科洛夫利用关于美国专利权的信息来解释日益专业化的趋势及“现代”工业技术的扩散。^⑤ 竞争性企业的扩张及交通系统的改善是技术变革初始加速度的主要来源。但是,索科洛夫指出,之后美国仍然保持了这个加速度。为什么?

自从雅可布·施莫克勒(Jacob Schmookler)在1966年出版了开创性的《发明与经济的增长》一书之后,利用专利权资料作为技术变革衡量指标的做法受到了广泛批评。^⑥ 关键在于大部分专利对技术变革鲜有助益,而许多作用很大的变革并没有申请专利,或者不具备可申请专利性。索科洛夫认为,我们应该把专利记录看做“发明活动中消耗的资源”的定性反映。

总之,专利记录表明,从19世纪一开始,加速度就一直存在;在1790—1860年间,人均量增长了14倍。这种加速度并不仅限于某种特殊行业,它也不是恒常不变的。索科洛夫认为,与早期工业化相伴的市场扩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了1812年战争之前反常的增长以外,专利活动总体上和经济周期保持同步。在地理上,它也是分散的。城镇地区和市场不发达地区的人均专利数量都在增长。尽管如此,从整个时期来看,新英格兰的南部与纽约拥有最高的数量。

索科洛夫与佐丽娜·卡恩(Zorina Khan)合作,详细解释了他们所谓的“产生发明的资本”投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⑦ 市场的最初扩张增加了参与这一过程的人员的数量和类型;例如,有些专利的持有人是家庭主妇和神职人员。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发明就像其他经济活动一样,也出现了专业化趋势。数据表明,到了19世纪中期,终身专利的数量有所增加。转向现代专利,即由专家从事发明活动的趋势,在数据中十分明显。同样,还有向城市集中的趋势,因为那里资源比较丰富。然而,所有这些因素,在南北战争之后的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们将在后面再次考察这些资料。

1.7 消费

不仅市场供给这一面发生剧烈变革,需求也在增加。历史学家认为,美国的需求变得奇特;它开始需求大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产品。爱德华·艾姆斯(Edward Ames)和内森·罗森伯格为这一论述增加了需求大批量产品的要素。^⑧ 美国人想要即刻拥有工厂制造的产品,从而把他们自己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以从事更加迫切需要的农业和采掘业。如果机器制造的工具用坏了——而且在使用过程中创造了足够的利润——可以购买新的工具来代替它们。简单的设计就足够了。他们需要的是工具的即时供应。正如艾姆斯和罗森伯格提出的问题:“在英国谁用猎枪,在美国又是谁用?”在英国,猎枪只有少数人使用,地主们用它来猎杀飞鸟,这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在美国,猎枪是一种工具,就像铲

^⑤ Kenneth Sokoloff, "Invention, Innovation, and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Antebellum Northeast," in Robert Gallman and John Wallis, eds.,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Before the Civil War* (1992). 这篇文章包含对 Sokoloff 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著作的有价值的总结。

^⑥ Jacob Schmookler, *Inven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⑦ Kenneth Sokoloff and Zorina Khan, "The Democratization of Invention During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46," *JEH*, June 1990.

^⑧ Edward Ames and Nathan Rosenberg, "Changing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nd Industrial Growth," *EJ*, March 1963.

子或斧头一样,所有的拓荒者都要用它。美国的耐用品消费者对装饰不感兴趣。另一方面,高品质的衣服要花钱,而衣服很容易替换,也许是以一种新的方式:

人们期待衣服能穿一季,就购买这种质量的衣服,不要更多。下一个季节的时候消费者又会重新购买。……据说这种频繁更换的习惯弥漫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对人们通常需求的商品品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英国的类似商品相比,美国商品更多的注重外表而不是实际的耐用度和实用性。^①

美国消费者会购买能干活的工具,不管其外表如何,正如会购买好看的、工厂制造的衣服,不管其是否耐穿。在这两个例子中,重要的都是价格和实用性。关于工具,罗森伯格引用了一段 20 世纪早期英国作家的话,这位作家注意到美国人用机器性能来决定他们的标准:

……如果机械工具不能根据这种传统产品进行调整,那么必须改变这种产品来符合机器的需要。因此,标准的美国餐刀具有一个僵硬的金属外形,刀把和刀刃是一次成型,然后进行整体电镀——这种做法完全适合工厂生产。^②

如果消费者想把东西用尽然后再买新的,也有他们如愿以偿的例子,这两种需求都极为适合工厂生产,毫无疑问,这就是今天美国著名的“抛弃型经济”的由来,这种习惯甚至延伸到了汽车和住房方面。

1.8 资源

罗森伯格在其《技术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强调的另一个要素是原材料的使用,尤其是木材。^③ 与房屋、工具、家具、交通器材的其他原材料相比,木材的供应极为丰富,19 世纪的美国人自如地使用它,以至于 1860 年之前,美国人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用木材来代替金属。事实上,在 1860 年,木材业创造的市场价值仅次于棉纺织业。罗森伯格估计,在 1860 年,美国的人均木材消费量是英国和威尔士的五倍。^④ 为了这种廉价的资源,美国人发明了复杂的木工器材(正如在英国,人们发展出了一种复杂的社会结构来利用劳动——他们的廉价资源)。欧洲人对美国人在木材加工过程中的浪费感到震惊。罗森伯格引用了一位英国观察者的话(写于 1872 年):“在美国,木材加工,即从原木到完成状态的过程,充斥着浪费现象,这种浪费简直可以称为犯罪……”^⑤ 只有你认为木材是一种稀缺资源的时候你才会这么想。

因此,美国制造业在节约劳动、利用资源的基础上发展,由愿意购买机器制造产品的消费者支持,这些产品后来变成了机器移动的流水线产品。在 20 世纪,欧洲人也发展出了同样的爱好,尤其是汽车。彼得·特明指出,典型的美国制造技术创新的前进速度永远不会增长得比利润更快。^⑥ 特明研究了钢铁行业,他发现只要木炭还是最有利可图的

^① Habakkuk (1962), p. 123.

^② Rosenberg, *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72), p. 44.

^③ *Ibid.*, pp. 18—24.

^④ *Ibid.*, p. 27.

^⑤ *Ibid.*, p. 28.

^⑥ Peter Temin, “Manufacturing,” in Lance 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燃料,炼铁业就试图继续使用木炭,只有在资源和技术使得焦煤更加划算时,它们才转而使用焦煤。^⑤ 因此,到1860年,美国的炼铁业可能表面上显得比英国技术落后,因为它仍然依赖燃烧无烟煤或木炭的小型熔炉和锻炉,而木炭又是一个木材产品。

当这一行业及其市场的很大一部分越过了阿利根尼山脉之后,当通往东海岸的铁路网络发展起来之后,当品质适合的焦煤被发现之后,美国钢铁行业将会很快追上并赶超欧洲的技术实践。但只有在划算的时候他们才会这么做。美国的经济增长是基于私人对自身利益的计算,而不是国家威望或规划。在动力的变革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尽管蒸汽机很早就被引进美国,它的用途也比较广泛,但一直到1869年,工业中使用的驱动力仍然有接近一半来自水力——美国的河流实在是太有利了。^⑥

1.9 1860年之前扩展的过程

图11.1是根据约瑟夫·戴维斯最近的研究画出的工业发展图。^⑦ 可以看到,19世纪30年代早期美国工业发展出现了一次迅猛增长。在那之后的25年里,几乎每十年数字都要翻一番,之后,1857年的经济危机导致了一次规模缩水。图11.2是根据增值(value added,收入减去原材料成本之差)计算的1860年十个制造产业的规模分布。棉产品生产是增值最多的,按雇佣人数计算的话则是第二(11.5万)。棉纺织业是美国工业的领头羊,正如在英国一样,在未来,它还将是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必经之路。这种机器的使用相对比较简易,不需要劳动者掌握多少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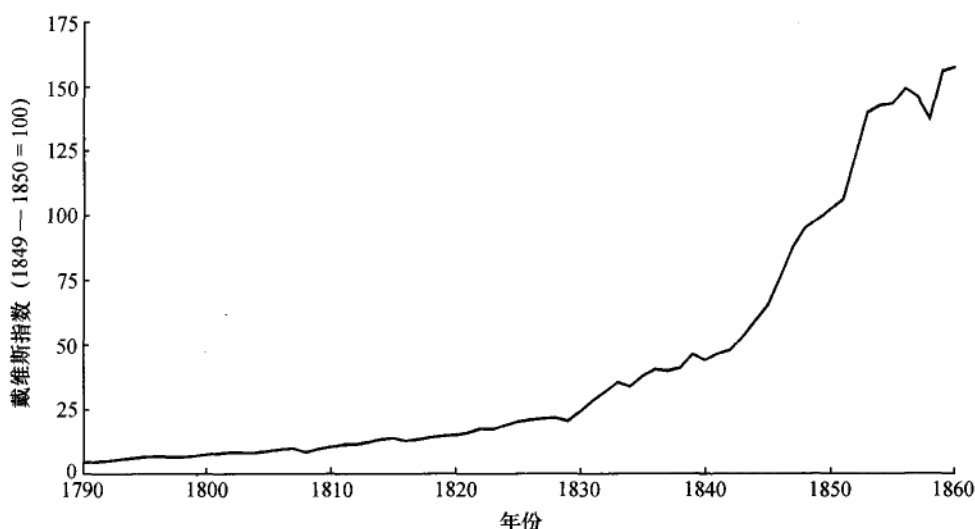


图 11.1 1790—1860 年的工业生产

资料来源: Joseph H. Davis, "An Annual Index of U. S. Industrial Production, 1790—1915,"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9, no. 4, November 2004.

⑤ Peter Temin, *Iron and Steel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1964).

⑥ Rosenberg, *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72), pp. 63—64.

⑦ Joseph H. Davis, "An Annual Index of U. S. Industrial Production, 1790—1915,"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9, no. 4, November 2004. 1864年戴维森指数达到了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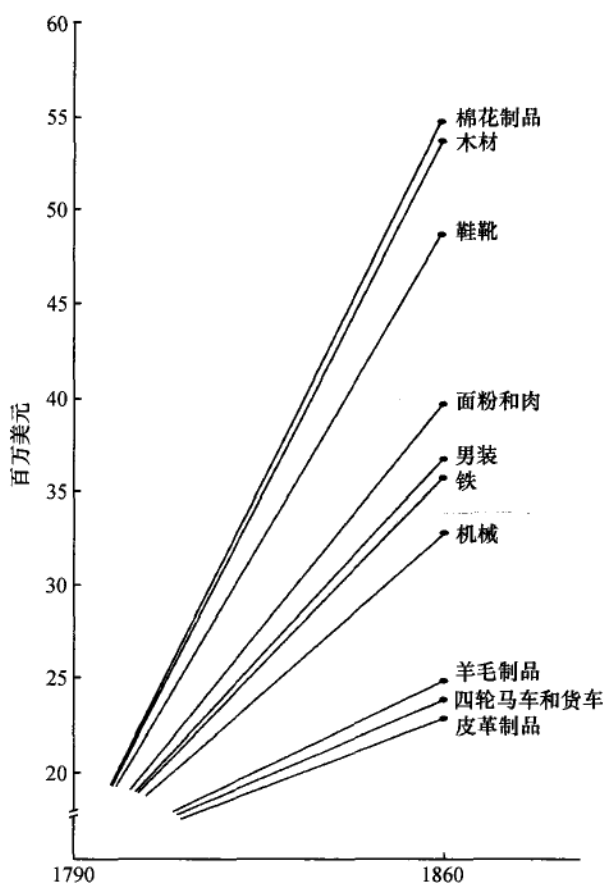


图 11.2 附加价值增长路线

资料来源: *Eigh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0, vol. 3, Manufactures.*

1860年雇用劳动力最多的行业是鞋类制造(12.3万),按增值计算的话则是第三。那时,缝纫机已经在这个行业中广泛使用,工厂生产也已经十分常见。1860年,男性成衣业也已经开始使用缝纫机,这个行业雇用了11.5万人。增值排名第二的木材业雇用了7.6万男性,这个行业利用的是美国最为丰富的资源之一,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它都是最具有生产力的行业之一。然而,在1860年,按照工人数量平均计算的话,面粉磨坊和皮革制品行业产生了最多的增值。

机器生产业的增值排名第七(雇佣人数4.1万),按工人数量平均计算的话,1860年这个行业已经排名第三。罗森伯格强调,这个行业将成为未来技术变革的“焦点”行业。^⑨它将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最终发展成机器工具业,到时候人们设计机器来制造机器。它还会有一些专业化的分支,例如机车建造和罐头制造。

在之后的50年里,机器建造将成为增值最多的行业。技术进步将通过机器建造扩散到美国工业的所有部门。美国人已经愿意购买机器加工的标准化产品,后来他们还将为机器本身的标准化以及建造机器的工具付钱。标准化越普及就效率越高。在第一次

^⑨ Nathan Rosenberg,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1840—1910," *JEH*, December 1963.

世界大战中,国防支出进一步促进了标准化的进程,因为政府是最大的购买者,从服装到子弹,它们需要所有的东西整齐划一。在这里我们再次接触了可互换性的概念。

在1860年的产业分布中仍然可以看到工业与农林业的密切联系。半个世纪之后,我们将看到工业更多地利用其他制造业的产品作为材料。

2. 能源

制造业需要能源,在早期的工厂中,主要的能量来源,即驱动力(prime mover),极大地影响了工业的布局。在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能量来源花样繁多,令人惊叹。

2.1 畜力

我们无法知道美国利用畜力的准确数字。马、骡和牛既可以用来做固定的工作,也可以用来做牵引力。可靠的数据表明,在1867年,美国有680万匹马及约100万头骡子在工作。当时的人口为3750万左右;因此,大约5.4个人就有一匹马。假如技术不变,倒回去几年,1860年应该有550万匹马,约100万头骡子,还有许多牛。在美国经济中,到底有多少工作是由这些牲畜提供动力的,已经无从知道了。它们肯定担任了大部分牵引工作,据估计,在1860年,它们提供的驱动力占总量的63%,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④

2.2 水力和蒸汽

除了马、骡、牛之外,美国人也使用风车、水车和蒸汽机作为驱动力。学者们发现,1838年固定式蒸汽机的官方数量统计是不完全的。彼得·特明在他觉得可能的地方修正了官方的报告,他的结论是,在官方报告的基础上,至少可以认定当时美国有1616个蒸汽机。^⑤ 罗森伯格认为这个数字可以提高到1800。^⑥ 阿塔克、贝特曼和韦斯则认为正确的数字应该是1420。^⑦ 在这里,精确的数字并不重要。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在1838年美国定居区域的地图上插上1420个彩色小图钉,我们就能看到当时蒸汽机的供应已经相当充足。然而,在机械的(非畜力的)能量来源中,水力仍然远远超过蒸汽机。^⑧ 现存的证据表明,1838年的蒸汽机是由约250家企业制造的。1860年,机器行业的增值(在美国各行业中排名第七,参见图11.2)有整整90%来自蒸汽机的建造。^⑨ 这些建造厂大部分是小企业,他们还从事其他工作。除此之外,也有来自外国的供应。尽管人们对于蒸

^④ 在这个国家马匹的数量在1915年达到了顶峰,难以置信的2140万匹。(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series Da 983), 仍然是4.7个人拥有一匹马,高于铁路和内燃机的时代!

^⑤ Peter Temin, "Steam and Water Power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in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e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1971), p. 231.

^⑥ Rosenberg, *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72), p. 64.

^⑦ Jeremy Atack, Fred Bateman, and Thomas Weiss, "The Regional Diffusion and Adoption of the Steam Engine in American Manufacturing," *JEH*, June 1980, p. 285.

^⑧ 如前所述,到1869年,作为原动机,蒸汽机仅仅勉强超越了水力。Atack, Bateman, and Weiss (1980), p. 282, fn. 10.

^⑨ Temin (1971), pp. 230—235.

汽机的设计和建造已经普遍比较熟悉,然而证据显示,南方的使用者特别地倾向于从英格兰进口蒸汽机。^{④⑥}

2.3 经济考虑

水力之所以能够保持驱动力的牢固地位,有若干种可能的解释。第一当然是因为水车作为动力机械对于小型谷物磨坊及类似工作来说已经完全够用了。也有地理的原因;新英格兰的工业地区及阿巴拉契亚河一带有众多水势湍急的河流,有许多适合建造水车、水坝的地点。在南方和中西部,阿巴拉契亚河的另一边,因为缺乏适合水车的地点,固定式蒸汽机的使用要早得多。如果那些地区也像阿巴拉契亚河流域一样拥有天赐的丰富水力资源,毫无疑问在那里水力也会比蒸汽更加重要,但表现形式不一定相同,因为要做的工作也不同。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有了蒸汽机之后仍然使用水力还有其他经济方面的原因。特明指出,早期蒸汽机的使用寿命可能只有五年左右;因此,尽管水力的最初投资超过蒸汽机,但其使用寿命长得多,燃料成本为零,水力设备较长的折旧周期使得在拥有良好水力资源的地方,其年均成本低于蒸汽机。^{④⑦} 尤其是,如果原材料,例如棉花,能够容易地运到工厂里(驱动力的所在地),蒸汽机就失去了它们的另一个优势——地点的灵活性。所以,棉纺织业注定将在新英格兰的水力作坊里继续存在很长时间。^{④⑧}

2.4 地点

因为地点的灵活性,蒸汽机具有许多现代电动牵引机和内燃机的优点。它可以运到需要工作的地点。如果原材料较轻、容易运输的话,这一点并不是太明显的优势。如果原材料容易腐败,如炼糖业,或者重量是个大问题,如木材业、水泥业和砖块制造业,蒸汽机的地点灵活性就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当然,蒸汽机很早就被用在船上,在美国广大的内陆河网中穿行,在大海上航行,这是将能量来源带到工作地点的极致。因此,蒸汽机对美国制造业的渗透在中西部最为迅速,那里水力资源匮乏,即使有水力资源的地方也没有新英格兰的好。^{④⑨}

到1869年,蒸汽能源已经超过了水力,正如在20世纪时,内燃机和电机将远远超过蒸汽机一样。任何驱动力的效率是与要做的工作相比产生能量的数量和成本。水力最终将消亡(直到水力能够被用来发电),因为无论怎样改进它,水力本身仍然存在限制。大型工厂难以用水车来驱动。水力作为直接动力来源的最后一次演出无疑是机器改进家亨利·伯德恩在1851年为他在纽约州特洛伊的机器工程建造的大型水车。^{⑤①} 这印证了那句关于技术的格言:较老的技术会在最后阶段趋向巨型化。

^{④⑥} Temin (1971), p. 231, table 1.

^{④⑦} *Ibid.*, p. 197, table 4.

^{④⑧} 在新英格兰纺织工业中,工业贷者的优先权也扮演了一定的作用。Lance Davis, "Sources of Industrial Finance: The American Textile Industry, A Case Study," *EEH*, April 1957; Lance Davis, "The New England Textile Mills and the Capital Markets: A Study of Industrial Borrowing, 1840—1860," *JEH*, March 1960.

^{④⑨} Temin (1971), p. 191, table 1.

^{⑤①} Uselding (1970), pp. 332—333.

最终,蒸汽机凭借其地点的灵活性,使得工业可以在其他经济因素决定的地点发展,例如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因素,还有市场或运输优势。

2.5 低压与高压蒸汽机之争

罗森伯格关于美国通过采用的技术利用丰富资源的假说也包括蒸汽机在美国的历史。有些令人迷惑的是,美国人在设计、制造低压和高压蒸汽机方面同样娴熟(有些企业两种都能做,视需求而定),然而大部分实际采用的却是高压蒸汽机;可是在英格兰,低压蒸汽机却更为普遍。^⑤ 高压蒸汽机的优势是更为便宜、重量较轻。其主要缺点是消耗的燃料较多。但是,在美国,燃料不是问题。正如罗森伯格所说:

这些特征使得这种引擎在资源丰富的美国更有吸引力,实际上,值得用大量的自然资源来“换取”固定资本投入的减少。^⑥

高压蒸汽机约于1803—1804年在英美两国几乎同时出现,在英国是由 Richard Trevithick 开发的,在美国则是由 Oliver Evans 开发的。和水力与畜力相比,蒸汽拥有巨大的优势,而 Evans 非常欣赏这一点,他指出,从长期来看,适合修筑水车的地点不够多,冬天结冰就无法使用,风力的不稳定也是个问题,而牲畜则过于“繁重”,“太容易出意外”。Evans 写道,蒸汽“是我们唾手可得的忠实仆人,在所有地点、所有季节都听我们使唤”。^⑦ 最终,他的观点占了上风,因为现在人们用煤、石油及核燃料来产生蒸汽从而发电。他所指的那种蒸汽机大部分被电机和内燃机取代了。木炭、木头、焦炭、煤——都可以通过燃烧“产生蒸汽”,在1860年已经如此。1859年在宾夕法尼亚州 Titusville 发现了达到商业开发数量的石油,这在南北战争之前对经济史演进几乎毫无影响。

2.6 许多能量来源

美国人普遍偏好高压蒸汽机胜过低压蒸汽机的事实会让 Trevithick 和 Evans 都感到高兴而水力和畜力在美国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的事实可能让两人都感到惊奇。同样,这是成本和收益的问题,而不是技术方式的问题。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工业依赖于许多动力和牵引力来源,这是由地方的需求和优势决定的。既然工业发展得极其成功,没有证据表明这种能量来源的多样化对经济不利。可以理解,现在石油价格和供应的变化使得能量来源再次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如果这样,历史表明,这种能量来源的多样性本身并不会经济不利。

^⑤ Temin (1971), pp. 232—233.

^⑥ Rosenberg, *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72), p. 65, fn. 6. 也参见 Harlan Halsey, “The Choice Between High-Pressure and Low-Pressure Steam Power in America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4, December 1981.

^⑦ 引自 Temin (1971), p. 228. 机器技术的飞速发明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技术用金钱概念来衡量是“资本密集型”的。例如,在许多用途上本田比劳斯莱斯都更有“效率”,用每一款新车型体现的技术进步衡量,可以买好几辆本田,一辆劳斯莱斯则完全是贬值的。也许这样的考虑有助于解释 Alexander Field 最近的发现,用配置的机器的金钱价值比产出或劳动力价值来衡量,19世纪英国的制造业似乎比美国制造业更“资本密集型”。Alexander Field, “On the Unimportance of Machinery,” *EEH*, October 1985.

3. 工业地点

第2章讨论了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未知土地上如何选择最初的定居点和城镇位置、交通港以及自然赠予的生产能力的不同。在那个基础上,如果我们在1790年问道:“未来美国的城市会在哪里?”我们很可能回答说城市会在河流、湖泊或大海的附近,在陆路与水陆交汇并形成交通港的地方。我们将会说,路上道路的地点将由未来经济活动的需求决定。如果查看现代美国的地图,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会为刚才的答案感到满意,除了丹佛、盐湖城、斯波坎、比尤特以及西南部的一些城市如阿玛里洛和拉伯克之外。^④我们能够提出一个更好的理论,从整体上解释城市位置和经济活动吗?在1955年和1959年,道格拉斯·诺斯发表了两篇论文,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整个美国历史上经济活动的地点情况。^⑤

3.1 地区出口基础

首先,考虑某个地区及其出口活动。诺斯观察了美国历史上各地区专业化发展的情况,注意到在一开始,刚刚解决口粮问题之后,就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一个又一个新的区域被开发,因为有可能利用那里的某种资源(例如鱼、木材、棉花、黄金、小麦、煤),出口到定居时间更长的地区去。最初,人口和投资资本的流入只是为了开发这种单一的资源(某些情况下,可能是相关联的多种资源,例如中西部的谷物和牲畜)。

据诺斯分析,任何地区在发展出出口活动之后,其未来将被三个因素决定:(1)该地区的自然条件(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2)其出口产业的“特点”,(3)之后技术和运输成本的变化。

如果该地区在某一种商品上拥有巨大的比较优势,生产将会集中在这种商品上,其他的可能性则会被忽略。西部的矿业定居点科罗拉多州的特柳赖德、内华达州的Jarbridge、爱达荷州的银城都是例子。当富矿都被挖尽时,人们会继续前行,把原来的镇子抛弃。很久之后,技术的另一次变革(汽车和房车)带来了游客。然而,在开发这种出口商品的时候,这些地区似乎在发展可能性上十分有限。

出口产业的“特点”会影响该地区之后经济发展的其他重要特征。如果这种出口产业规模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也就是说,大型企业会比小型企业更具有比较优势——那么该地区的收入分配将相对更加不平均,发展只会带来少数几个城镇中心,经济生产的主要活动集中在处理并运送这种出口商品上。如果我们详细观察美国历史,北部在这一点上与南方和中西部都不同。南方的棉花经济是劳动密集型的规模经济(奴隶制和大种植园是效率最高的技术),结果只有少数几个城市中心,主要活动就是

^④ William Dean 是刚才所描述的地点模式的主要发现者。它可以用来解释芝加哥的形成。Louis Cain, “William Dean's Theory of Urban Growth: Chicago's Commerce and Industry, 1854—1871,” *JEH*, June 1985.

^⑤ Douglass North, “Location Theory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JPE*, June 1955; and Douglass North, “Agricul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December 1959. 两种分析综合在下列著作中 Douglass North,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1), chap. 1.

处理和运送原棉。在中西部,家庭农场式的农业产生了一种更加平均的收入分配,因此,城市发展的可能性就更多。(我们在后面详细讨论这一点。)

最初确立的比较优势可能会因为技术和交通成本的变革而改变。在某些情况下,其他(次要的)出口行业可能会与最初吸引定居者和投资的那个行业一同发展。这种次要行业可能最终会发展成主要行业,乃至完全取代原先那个行业的地位。这种出口与次要行业的混合可能最终会使得该地区呈现工业“平衡”的情况,掩盖了单纯的出口活动最初的重要作用。我们已经提过旧西部的矿业城镇,现代西部的滑雪胜地则是这一论点的绝佳例子。通往滑雪地区的交通(汽车、铁路、公共汽车、飞机)以及缆车的修建使得那些几乎已经荒废的矿业城镇如凯彻姆、亚伯达和科罗拉多的阿斯彭重现生机。

3.2 土地所有权、社会基础机构及地点

诺斯认为,在19世纪农业中,除了南方之外的地方几乎没有规模经济,这导致了如下结果:(1)收入分配更加平均,(2)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农场,(3)对学校和社会服务的需求,(4)制造商和销售商的市场可能性更广。正如罗森伯格所说:“19世纪的美国社会是由农业家庭的品味决定的。……”^⑤除了在农业南方之外,这些家庭按照欧洲的标准来说是富裕的,他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增长的市场。这个事实增加了城镇形成的可能地点——决定地点的因素不再仅仅是某种单一出口商品的需求,而更多的是数百万家庭的需求及向他们提供商品的机会。城镇可能地点的增多还意味着城市类型的活动可以在许多地方进行。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最终会导致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需求增加,即需要更多的学校和大学。正是因为拥有掌握财产的市民群体,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完全、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责任,在蓄奴区以北的美国出现了众多的学校、教堂、大学及其他类似的社会基础设施。在北部,美国土地所有权体系的福音是印第安纳、俄亥俄、爱荷华等地坚实社区生活的基础。奴隶制给南方带来的真正损失就是潮水地区(tidewater areas)*以西这种社会基础设施的缺乏——自相矛盾的是,这正是由于对那些有资本蓄养大批奴隶的人来说,奴隶制的利润太高。因为未能对当地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南方在进入20世纪之后社会经济潜力的发展受到了阻碍。

现在我们把交通港的作用加入到决定城市中心地点的考虑范围之内。如果地球表面具有完全相同的形态,那么城市的实际地点将几乎完全由运输成本决定。^⑥但是美国大陆的地表特征并不完全相同,所以自然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大陆被南北向的河流和山脉分割开来,点缀着各种可利用的自然资源,除了农田,还有特殊地点。道路、运河和铁路基本是东西向的,将各地区联系起来,因为南北向的水运系统不足以满足发展的需要。在靠近出口基地的地区附近,水路和陆路交汇之处成为城市。图11.3是一个简化的例子,其中只有一个出口基础行业,一个交通港,以及若干种起支持作用的次级经济活动。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城市地点会是铁路与河流相交的地方。在各地区内

^⑤ Rosenberg, *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72), p. 48.

* (美)有潮水域地区(尤指弗吉尼亚东部)。

^⑥ 这个问题很久以前就被德国经济学家解答了。August Lösch. Stefan Valavanis, “Lösch on Lo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no. 4, September 1955.

部,交通将从城市中心向四周辐射。外部经济体将把次级活动吸引到城市中心,那里的交通成本最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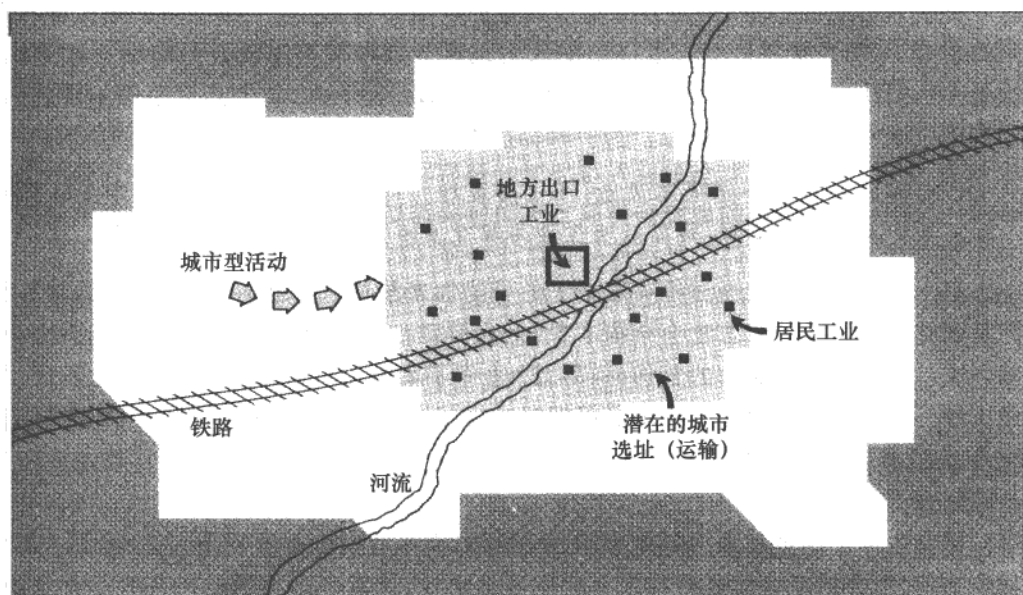


图 11.3 地区增长与城市定位的确定假说

该地区的发展基于一项出口工业的开发实践。由出口工业而得的收入支持了社会基础设施以及次级工业的发展。区内外交通运输成本以及地形因素,将会产生一个潜在的城镇地点。连接区内的交通产生外部经济,并为这个城镇点中任何有利可图的地方带来经济活动。

随着美国向西进发,这一过程产生了许多城市(我们已经提过,西部和西南部是例外):特洛伊、锡拉库扎、罗切斯特、水牛城、匹兹堡、惠林、扬斯敦、克默兰、阿克隆、底特律、芝加哥、密尔沃基、明尼阿波利斯、迪比克、奥马哈……^⑤在 19 世纪,随着美国继续向西进发,这个城市名单也在继续扩大,铁路、水流及其他自然资源得到开发。诺斯的分析是交通港理论的补充,为地区发展和城市化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描述,不仅适用于 19 世纪 60 年代,而且也适用于之后的年代。

4. 南北方之间的差异

诺斯的理论对南北战争之前南北方之间工业化的差异问题有所启示。一般认为,到 1860 年,与北方的成就相比,南方的工业化远低于其应该达到的水平。弗莱德·贝特曼(Fred Bateman)和托马斯·韦斯(Thomas Weiss)在研究中强调了这一点,但是他们认为,这些差异令人感到不解,并不像美国历史编纂的传统认定的那样,“南方就是落后”。^⑥

^⑤ 芝加哥选址及扩大对区位理论的应用,参见 Louis Cain, *Sanitation Strategy for a Lake front Metropolis: The Case of Chicago*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9); “From Mud to Metropolis: Chicago Before the Fire,” *REH*, 1986。

^⑥ Fred Bateman and Thomas Weiss, “Manufacturing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REH*, 1976。

1860年,南方主要行业中的制造活动,如棉纺织品生产、鞋类、服装、面粉和谷类加工,仅占全国总量的20%,而南方纺纱厂的规模只有新英格兰平均规模的三分之一。尽管南方也有一些较大的工业企业,但南方的制造业企业一般都比新英格兰的小,甚至比西北部新州的企业小,而且常常位于与世隔绝的农村地区。这种规模差异并没有明显的原因。贝特曼和韦斯认为,南方制造业的利润与北方和西部相差不大,如果其他条件一样的话,南方本来应该发展得比现在更好。为了解释这种现象,他们提出了几种可能的原因:

南方的投资者特别厌恶风险,不了解多样化的好处,未能改变其预期并认识到制造业的利润日益丰厚,或是认为工业多样化具有难以接受的高额社会成本。^④

杰里米·阿塔克试图通过检查理论上的可能性来解释这种地区间差异,他反对那种认为是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社会结构本身(低人口密度,黑奴和贫穷白人缺乏购买力,富人偏好进口商品和手工制作的奢侈品,等等)阻碍了南方工业发展的观点。^⑤他发现,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体的收益差异不足以解释南方工业发展的缺乏。根据阿塔克的证据,1860年的技术和其他条件完全可以为南方工业的规模和范围提供充分的合理性。南方的企业家也不是懒惰和松懈的人。

对棉花生产中租金的预期以及奴隶所有制的资本收益有助于解开这些谜团。在南北战争之前,南方的工业化进行得没有北方那么迅速,这有许多原因——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荒谬的。实际上,本章中讨论的所有美国工业化特征都既适用于北方,也适用于南方,尤其是当蒸汽机的普及消除了新英格兰水力资源更多的相对优势之后。南方在发展工业的时候,在技术选择上也表现出典型的“美国特征”。索科洛夫和Tchakerian比较了专门生产同种农产品的郡县,他们发现其人均制造品产量几乎没有差别。在那些专门产棉花的南方郡县中,人均制造品产量特别低。^⑥在1860年之前,尽管存在极佳的纯商业原因去投资于制造业,但那些拥有资本的人却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了继续维持奴隶制和棉花生产。正如贝特曼、韦斯和阿塔克所说,南方的出口基础为足够多的次级产业提供了支持。然而,正是在投资基于奴隶制的南方农业可获得更高收益的预期消失了之后,资本才开始迅速地流入南方制造业,才有足够多的资本流入地方的工业建设,形成南方工业化之后的崭新出口基础。

5. 制造业与关税问题

为了完成对美国制造业起源的初步调查,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关税问题,倒不仅仅是因为它在19世纪的经济重要性,而是因为它在政治上的利益从未消失。对于消费者来说,关税(tariff)是他们为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所支付的税款。这是将财富从国内的消费者那里转移到了受保护的国内生产者那里。那些生产与进口商品竞争的产品的厂家可以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因为那些进口商品的价格被提高了。因此,关税是一把金融

^④ Bateman and Weiss (1976), p. 161.

^⑤ Jeremy Atack, "Returns to Scale in Antebellum United States Manufacturing," *EEH*, October 1977.

^⑥ Kenneth Sokoloff and Viken Tchakerian, "Manufacturing Where Agriculture Predominates: Evidence from the South and Midwest in 186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3, July 1997.

保护伞,保护那些成本较高的国内生产者,或者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纯利润,从而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进入被保护的行业,而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这些本来很可能不会发生。

那些购买有进口商品竞争的的商品的消费者蒙受了真实收入的损失,因为关税导致价格提高了。外国人也蒙受了收入损失,因为关税使得美国人购买的外国产品比原本可能的要少,因此,美国的出口者(例如南方的棉花种植者)也损失了一些国外客户。那么谁从关税中得益呢?政府获得了税收。与进口商品竞争的的商品的生产者获得了更多的客户或更高的价格,或者两者皆有;在那些行业工作的人可能会得到更高的工资;关税导致的更高预期回报率可能会导致投资者向被保护行业投资更多的钱。

对生产者来说,关税是一种补助,就像大多数补助一样,它会让经济进程偏离市场决定的方向。约翰·詹姆斯(John James)指出,南北战争之前的关税将南方的资源引向了北方的工业,这个事实南方人早就意识到了。^③

为什么会存在关税?显然,政府想要关税作为财政收入(只要关税不是太过分,完全扼杀了进口也就没有收入了)。寻租的生产者想要关税以获得额外的收入。还有谁呢?

政客们一直喜欢关税,它能确保其获得选票。现代的关税支持者一般强调说它能保护美国的工作机会。如果美国人购买外国汽车,那么美国汽车厂的工人就会失业。这种论证本身是正确的。但正确的回应是美国的厂商应该制造更好、更便宜的汽车。在更早些时候,当人们需要关税时,他们说关税可以保护美国工人免受“外国廉价劳动力”的竞争,而这种论述基本是错误的。那时外国的劳动力之所以那么廉价,是因为他们的生产力那么低下。然而,这种说法总是能够吸引选票,因为美国人知道外国工人的生活水平低下;他们害怕竞争会导致美国的生活水平也下降。近年来,这种观点较少被提到了,因为是富裕的德国、瑞典、日本工人在生产那些美国人大量需求的产品,而那些工人能力既强,工资又高。

一个出现很早的“无法解答”的关税论点是“保护新生工业”——即随着经济发展,一个国家的新生工业为了与其他国家的成熟行业进行有效的竞争,可能需要短期的保护。如果这些行业在起步阶段就不得不面临国际竞争,它们就无法发展壮大到具有比较优势。在美国的第一项关税法案中就表述了这一点,该法案于1789年7月4日通过:

出于支持政府、偿还合众国债务及鼓励制造业的必要,于进口的产品、商品和货物之上征收关税。……

在这里完全没考虑消费者的福利、自由贸易或是经济效率。关税是为了让政府获得收入,保护美国的新生工业免受外国竞争。获得财政收入和保护新生工业的论点现在很少听到了。海关税收现在占联邦财政收入的比例连1%都不到;在1790年,关税占总财政收入的99.9%,直到1860年仍然占94%。某些年份的土地销售收入可能会改变一下比例,但总体来说,直到1860年,关税仍然是联邦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有关保护的论点是独立的,因为“完美的”保护性关税会完全消灭进口,政府就无法从关税中获得财政收入了。关于保护,弗兰克·陶西格(Frank Taussig)研究了那些强大

^③ John James,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he Antebellum Tariff: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EEH*, July 1978. 但是还可能有一些效应,增加了南方棉花生产者在当时的作用,取决于北方纺织品制造增长对原棉的需求。Clayne Pope, "The Impact of the Ante-Bellum Tariff on Income Distribution," *EEH*, Summer 1972; Bennett Baack and Edward Ray, "Tariff Polic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1830—1860," *EEH*, Winter 1973—1974.

的“新生行业”(现在仍然处于被保护状态),距离最初施行关税已经过去近一百年了,他怀疑没有哪个行业因为关税的保护而获得了成功,除了一直孱弱的美国丝绸业和1824年之前的棉花制造业之外。^④从18世纪90年代到1815年,欧洲连绵不断的战火一直保护着美国棉花制造厂商免受国外竞争。当1815年和平到来、英国的纺织品全面进入美国时,美国的厂商前往国会请愿,提出了新兴行业理论,要求提供保护。他们成功地获得了保护。彼得·特明提出,弗朗西斯·洛厄尔(Francis Lowell)在1816年关税中追求扁平税率,进口棉布每码至少要缴纳25美分的关税。这对于洛厄尔生产的那种低密度棉布来说,是很高的特殊关税。其意图就是抑制印度之类地方所产的低密度棉布,但它对更细致的布,如从英国进口的布,并没有显著影响。南方人对这种关税感到满意,这导致了社会财富向洛厄尔转移,而位于罗德岛的生产高密度布的作坊却没有得到多少保护。^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制造业报告》中认为,新生行业理论可能有一点道理。在1816年,与位于罗德岛的细致棉布厂商相比,洛厄尔似乎更属于“新生的”。

既然关税是一种制造业的收入转移,那么显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某些人不会从中得益。南方在国际市场上以国际价格出售其产品,购买产品时却只能要么从受到关税保护的、寻租的美国制造商那里买,要么购买进口产品并支付关税。因为这种情况,关税中的保护性因素从一开始就让南方的政治领袖感到怨恨,这是地区分离主义日益高涨的原因之一。

北方要求对制造品进行更多保护的情绪似乎在经济周期的萧条期附近最为高涨,因此,美国在1816年、1824年、1828年和1842年通过了最主要的保护性关税法案。这种相关关系的原因十分明显:在萧条期,价格一般会下降(至少以前如此),如果有了关税,价格下降的幅度不必太大即可应付外国竞争者。1828年的关税法案被称为“可憎的关税法”,它将关税税率提升到了61%,它促使南方的政治家在约翰·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的领导下,开始严肃地重新思考1789年达成的宪法协议,以及各州可否自行宣布国会法案无效。

也许是为了强调约翰·卡尔霍恩的智慧,尼克·哈利(Knick Harley)最近再次检视了南北战争之前的关税。尽管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关税对美国工业化的影响比较有限,哈利却提出,保护性关税是美国制造业部门整体规模扩大的原因,尤其是对棉纺织业影响巨大。

关税减少了美国的进口,这又导致了食品出口的减少。因此,关税的主要成本就落在了土地这个食品生产的主要资源上。西部和南方都是制造业保护主义的主要牺牲品。^⑥

^④ Frank Taussig, *The Tariff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88). Robert Brooke Zevin, "The Growth of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After 1815," in Fogel and Engerman (1971), 说明了在1825年主要的技术发明出现之前,由棉纺织工业的增长引起的需求、供给和技术变迁的复杂变化。尽管很难证明这些创新是关税保护的结果,但是它们并没有损害投资者。这种情况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吗?毫无疑问,但也许时间会不同。Zevin认为该产业增长的初始动力主要是由于工厂自身生产,它使产业从家庭中走出来。

^⑤ Peter Temin, "Product Quality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in the Early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JEH*, December 1988.

^⑥ C. Knick Harley, "The Antebellum American Tariff: Food Exports and Manufacturing," *EEH*, October 1992, p. 398. Douglas Irwin认为应该对棉花出口征税,而不是对棉花进口征税。他计算出最优税率大约在45%—55%之间。然而其效应非常小,约占美国GDP的0.3%,或南部GDP的1%。参见Douglas A. Irwin, "The Optimal Tax on Antebellum U.S. Cotton Expor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60, no. 2, August 2003.

哈利利用了一个可计算的总体平衡模型,他的计算结果是,如果当初废除了关税,那么棉纺织业的规模本会至少缩小一半。乔舒亚·卢森布鲁姆(Joshua Rosenbloom)认为,美国纺织业的扩张来自于和1812年战争相关的事件,尤其是1807年的《禁运法案》。在那场战争之后,是纺织业厂商游说国会以获得保护性关税。^⑦在较早的一项研究中(没有利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马克·毕尔斯(Mark Bills)的结论是保护性关税差不多是美国迟至1833年仍存在棉纺织业的唯一原因!^⑧1833年的妥协、联邦政府高得令人不安的盈余、1846年和1857年的较低关税暂时压制了南方在19世纪50年代的反关税情绪。

到了1860年,关税税率降得如此之低,以至于关税收入占可征税进口商品价值的比例只有19.7%;在1830年是否废除关税的争论白热化的时候,这一数字高达61.7%(参见图11.4)。因此,1833—1860年,制造业的增长是在关税持续下降的背景下进行的。尽管关税降低了,它仍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问题,而且,毕竟它确实毫无理由地将收入从南方和其他非工业化地区转移到制造业中。当南方被击败后,寻租的制造商们又回到关税的老路上,这不是偶然。1865年关税税率提升到了近50%,除了1873年和1874年之外,税率从未低于40%,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有所改观。正如陶西格所说,关税也许并未决定美国工业的增长,但它确实为制造商带来了额外的收入,并让其他所有人为之付出代价——为了鼓励“新生行业”而设计的关税,约翰·卡尔霍恩充分地理解这个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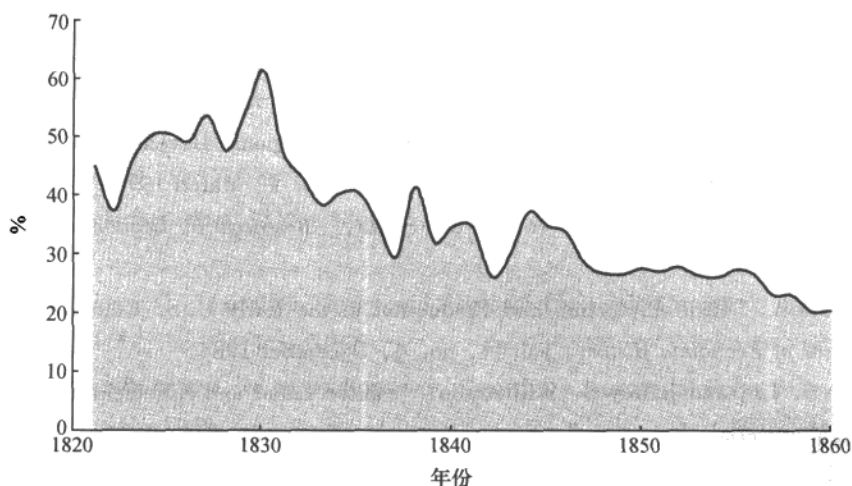


图 11.4 1820—1860 年关税收入占应税进口商品价值的比例

到1860年,关税收入占应税进口商品价值的比例是19世纪20年代的40%。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Ee 429.

⑦ Joshua Rosenbloom.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in David Jeremy and Douglas A. Farnie, eds., *The Fibr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Cotton Industry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⑧ Mark Bills, "Tariff Protection and Production in the Early U. S.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JEH*, December 1984.

推荐阅读

文章

Adams, Donald R., Jr. "Wage Rates in the Early National Period: Philadelphia, 1785—183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8, no. 3, September 1968.

———. "Wage Rates in the Iron Industry: A Comment."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no. 1, Fall 1973.

Ames, Edward, and Nathan Rosenberg. "Changing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nd Industrial Growth." *Economic Journal*, vol. 73, no. 289, March 1963.

Atack, Jeremy. "Fact or Fiction? The Relative Costs of Steam and Water Power: A Simulative Approach."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6, no. 4, October 1979.

———. "Returns to Scale in Antebellum United States Manufacturing."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4, no. 4, October 1977.

Jeremy Atack, Fred Bateman, and Thomas Weiss. "The Regional Diffusion and Adoption of the Steam Engine in American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0, no. 2, June 1980.

Baack, Bennett P., and Edward J. Ray. "Tariff Polic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1830—186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no. 2, Winter 1973—1974.

Bateman, Fred, James Faust, and Thomas Weiss. "Profitability in Southern Manufacturing: Estimates for 186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2, no. 3, July 1975.

Bateman, Fred, and Thomas Weiss. "Comparative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Antebellum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5, no. 1, March 1975.

———. "Manufacturing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 1976.

Bils, Mark. "Tariff Protection and Production in the Early U. S.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4, no. 4, December 1984.

Brito, D. L.,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Skilled Labor and Nineteenth Century Anglo-American Managerial Behavior."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0, no. 3, Spring 1973.

Cain, Louis. "William Dean's Theory of Urban Growth: Chicago's Commerce and Industry, 1854—1871."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5, no. 2, June 1985.

———. "From Mud to Metropolis: Chicago Before the Fire."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0, 1986.

David, Paul. "Learning by Doing and Tariff Protection: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Case of the Antebellum United States Textile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0, no. 3, September 1970.

———. "The Horndal Effect in Lowell, 1834—1856: A Short-Run Learning Curve for Inte-

grated Cotton Textile Mill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0, no. 2, Winter 1973.

Davis, Lance E. "Sources of Industrial Finance: The American Textile Industry, A Case Stud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st series, vol. 60, no. 4, April 1957.

———. "The New England Textile Mills and the Capital Markets: A Study of Industrial Borrowing, 1840—18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0, no. 1, March 1960.

Field, Alexander J. "Sectoral Shift in Antebellum Massachusetts: A Reconsidera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5, no. 2, April, 1978.

———. "On the Unimportance of Machiner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2, no. 4, October 1985.

Goldin, Claudia D., and Frank D. Lewis. "The Role of Export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Napoleonic Wars, 1793 to 1807."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7, no. 1, January 1980.

Goldin, Claudia, and Kenneth Sokoloff. "The Relative Productivity Hypothesi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American Case, 1820 to 185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49, no. 3, August 1984.

Harley, C. Knick. "The Antebellum American Tariff: Food Exports and Manufacturing."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9, no. 4, October 1992.

James, John.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he Antebellum Tariff: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5, no. 3, July 1978.

Lazonick, William H. "Production Relations, Labor Productivity, and Choice of Technique: British and U. S. Cotton Spinning."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3, September 1981.

Livesay, Harold, and Glenn Porter. "The Financial Role of Mercha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U. S. Manufacturing, 1815—186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9, no. 1, Fall 1971.

North, Douglass C. "Location Theory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42, no. 3, June 1955.

———. "Agricul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vol. 41, no. 5, December 1959.

Passell, Peter, and Maria Schmundt. "Pre-Civil War Land Policy and the Growth of Manufacturing."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9, no. 1, Fall 1971.

Pope, Clayne. "The Impact of the Ante-Bellum Tariff on Income Distribu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9, no. 4, Summer 1972.

Rosenberg, Natha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1840—191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3, no. 4, December 1963.

———. "Anglo-American Wage Differences in the 1820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7, no. 2, June 1967.

———.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ffusion of Technolog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0, no. 1, Fall 1972.

Sokoloff, Kenneth L. "Was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Artisanal Shop to the Nonmechanized Factory Associated with Gains in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the U. S. Manufacturing Censuses of 1820 and 185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1, no. 4, October 1984.

———. "Productivity Growth in Manufacturing During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the American Northeast, 1820—1860." In Stanley Engerman and Robert Gallman, eds.,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 "Invention, Innovation, and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Antebellum Northeast." In Robert Gallman and John Wallis, eds.,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Before the Civil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Sokoloff, Kenneth L., and Zorina Khan. "The Democratization of Invention During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46."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0, no. 2, June 1990.

Temin, Peter. "Steam and Water Power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6, no. 2, June 1966. Reprinted in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e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 "Manufacturing." In Lance 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 "Product Quality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in the Early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8, no. 4, December 1988.

Terrill, Tom E. "Eager Hands: Labor for Southern Textiles, 1850—18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6, no. 1, March 1976.

Uselding, Paul. "Henry Burden and the Question of Anglo-American Technological Transfe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0, no. 2, June 1970.

———. "Technical Progress at the Springfield Armor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9, no. 3, Spring 1972.

———. "Factor Substitution and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merican Manufacturing 1839—1899."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2, no. 3, September 1972.

———. "A Note on the Inter-Regional Trade in Manufactures in 184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5, no. 2, June 1976.

Zabler, Jeffrey F. "Further Evidence on American Wage Differentials, 1800—183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0, no. 1, Fall 1972.

———. "More on Wage Rates in the Iron Industry: A Repl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no. 1, Fall 1973.

Zevin, Robert Brooke. "The Growth of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After 1815." In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e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书籍

Clark, Victor S. *History of Manufac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607—1860*. Washington, DC: Carnegie Institution, 1929.

Cole, A. H. *The American Wool Manufac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David, Paul A. *Technical Choice,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Habakkuk, H. J. *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earch for Labour-Saving Inven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Hounshell, David A.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Hughes, Jonathan.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History: Theses and Conjecture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0.

———. *The Vital Few: American Economic Progress and Its Protagonis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Meyer, David R. *The Roots of American Industrializ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Rosenberg, Nathan. *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Smith, Merritt Roe. *Harper's Ferry Armory and the New Technolo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Taussig, Frank W. *The Tariff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88.

Temin, Peter. *Iron and Steel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An Economic Study*. Cambridge: MIT Press, 1964.

Ware, C. F. *The 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 A Study of Industrial Beginning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31.

第 12 章

金融体系与国际经济

让我们重新回头看看南北战争之前美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情况。在金融上,美国人继续维持其殖民时期的习惯,偏好使用纸币,但是 1790 年之后货币是由私人发行的。独立战争对金融的需求和影响需要用新的制度来调和,各主权州之间存在矛盾,亟须设计一种可行的全国性银行制度。

1. 货币与银行业的发展

正如威灵顿在滑铁卢所说,为独立战争筹集资金是一桩“千钧一发的事情”。美国人是侥幸成功。在战争期间,大陆会议并没有权力征税,当时也没有任何系统地从各州获取经济支持的方式。从 1776 年到 1780 年,大陆会议通过印刷纸币来支付账单。纸币印刷的数量远远超过了金属币的储备水平,也超过了可能的金属币偿还能力,它迅速地贬值了。截至 1790 年,共发行了 2.416 亿美元的纸币,使金属币完全退出了流通领域(又是格雷欣法则)。

1780 年,各州被要求征税,以 40 大陆币兑 1 银币的价格兑换大陆币。随后大陆会议又发行了一种新的货币,以 20:1 的价格向各州兑换旧的货币。那些没有兑换的旧货币最后贬值到了约 1000:1 的水平——因此才出现了俗语“还没大陆币值钱”。从 1776 年到 1782 年,大陆会议还借了约 6360 万美元的内债(按金属币衡量的话只值 770 万美元)。从 1780 年到 1783 年,外债(共 780 万美元,其中 640 万美元来自法国)以及向各州征用的财产(只有部分被偿还了)是主要的财政来源。英军在约克镇投降之后,英国对在北美殖民地作战失去了兴趣——至少在接下来的 20 年内如此,所以不必继续筹集资金打仗了。

而且,各州也自行借债并发行自己的纸币,其面额共 2.08 亿美元。为了创建金融机构,大陆会议在 1781 年授权成立了北美银行。该银行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它尽力为政府处理金融事务,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中央银行的角色。斯图丹斯基和克鲁斯认为这是美国第一个真正的中央银行,而这一称号通常是用来称呼 1791 年授权成立的合众国银行的。^① 1787 年,北美银行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州的特许状,变成了一家州银行。

1.1 汉密尔顿的政策

在 1783—1787 年间,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恶化得很厉害;它不能征税,从公共土地

^① Paul Studenski and Herman Krooss,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p. 31.

销售中获得的收入极少,它被迫向外国(荷兰)银行家借钱以维持生存。1789年的新《宪法》为联邦政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潜力极大的经济基础,赋予了联邦政府征税、举债、发行货币并“调控”其价格的权力。同时,各州放弃了发行货币的权力。罗尔尼克、史密斯、韦伯认为,各州这么做是因为它们原先是殖民地,后来变成了州,它们经历过汇率的反复无常,因此更倾向于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联盟。^② 法利·格拉布(Farley Grubb)强调其受益者:“在1787年,未来的银行家们认为发行纸币的权力是摇钱树,但只有不存在政府发行纸币的竞争,他们才能获得收益。美国的美元货币联盟似乎是由商人银行家建立的,他们的意图是篡夺各州和联邦政府关于货币事务的主权,从而增加他们个人的权力和财富。”^③

在宪法权力之外,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还设计了许多充满活力的政策。汉密尔顿的政策只有部分获得了成功(还遭受了当时许多人的强烈反对),但现在,那些政策被当做伟大的构想,只是执行时不太完美。其内容是:(1)征收关税及其他税项作为联邦财政收入,(2)发行新债券(并安排好偿还事宜)以偿还战争时期大陆会议欠下的债务,(3)由联邦政府承担各州在战争时期欠下的债务,(4)建立一个新的中央银行,(5)以新铸的金属币为基础建立一个全国货币标准。

以1789年的关税法为开端,汉密尔顿的设计得到了部分实现。正如第11章所讨论的那样,关税几乎成了联邦政府的全部财政收入来源。国内税收所带来的收入则要少得多,而且其中之一——针对威士忌的税收——还导致了1794年宾夕法尼亚西部农场主的“威士忌叛乱”。在当时的农场上,酿造威士忌是很受欢迎的“储藏”多余谷物的技术。那起叛乱被民兵兵不血刃地制服了。

汉密尔顿估计,1790年的国债约为5400万美元,而各州未偿付的战争债务总额约为2500万美元。在1790年和1795年,人们制定了新的条款,通过发行各种新债券来偿还这些债务,最后还设立了专门的偿债基金来付清债务。尽管在1835—1836年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当总统期间,美国几乎还清了这些债务,然而当时又以更高的利率借了新债,因此,这些债务从未真正还清过。那些旧债的债权人收益颇丰,因为美国不断借新债还旧债,债券价格也一路飙升。汉密尔顿受到了反对者的严厉责骂,他们中有些人认为应该补偿那些旧的债权人。杰斐逊也高度怀疑独立战争的花费到底有多少事实上被用在了一般用途上。^④ 虽然如此,汉密尔顿体系基本上仍被完全采用了。

因为各州的战争债务都被联邦政府承担了,它们的金融基础十分健壮。但是,根据新的《宪法》,各州失去了发行自己的纸币的权力。然而它们授权成立的银行却可以发行纸币,它们也确实这么做了。

② Arthur Rolnick, Bruce Smith, and Warren Weber, "In Order to Form a More Perfect Monetary Un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Fall 1993. 作者指出这样的联盟也将避免在一个固定的汇率体系中内在的货币铸造税的问题。更多的关于这些殖民地之间汇率的问题,见 John McCusker, *Money and Exchange in Europe and America, 1600—1775: A Handbook*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8)。

③ Farley Grubb, "Creating the U. S. Dollar Currency Union, 1748—1811: A Quest for Monetary Stability or a Usurpation of State Sovereignty for Personal Ga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3, no. 5, December 2003, p. 1796.

④ Richard Hofstadter, ed., *Great Issues in American History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 1765—1865*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8), part 3, document 3, p. 155.

在 1791 年,一个新的中央银行,合众国第一银行,获得了 20 年的特许状。美国财政部持有其五分之一的股票,其余的股份由私人持有。杰斐逊和许多人一样反对成立这家银行,其理由是《宪法》并未赋予这种权力,而且这家银行可能会给美国带来各种非本土方式的实践行为。^⑤

1792 年,《铸币法》规定在费城建立一座铸币厂,并规定美国从此以金银复本位制为基础:15 盎司白银等于 1 盎司黄金。这些金属币是以十进制为基础铸造的。国内将发行面额 10 美元的金币(叫做鹰币)、1 美元的银币以及更小面额的辅币。没有全国性的纸币。

应该怎么评价这个体系?如前所述,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关税是联邦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国内的税收则没有那么成功。由联邦政府承担独立战争债务的决定确实树立了联邦政府的威信,正如汉密尔顿所希望的那样。从各方面说,合众国第一银行都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但是在 1811 年它却未能获得特许状的延期(仅以一票之差失利)。1812 年,美国再次在没有中央银行的情况下同英国开战并因此狼狈不堪。政府在筹集战争资金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当他们于 1814 年暂停金属币的偿付之后,很快出现了通货膨胀。詹金斯和韦登弥尔估计,由于没有银行,政府损失了 4 600 万美元,因为他们不能以平价出售债券。在 1816 年,一家新的银行,即合众国第二银行,得到了特许状,但是它的特许状延期在 1832 年被安德鲁·杰克逊否决了。下一个中央银行,即联邦储备体系,直到 1914 年才成立。^⑥

理查德·塞拉(Richard Sylla)认为,按照当时的标准,汉密尔顿的政策让美国很早就拥有了“世界级”的金融体系。他强调,这种体系在银行系统与其他金融市场之间创造了密切协作的纽带。美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如塞拉所说的那样最终“由金融引领”仍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但这些政策很显然在很早的时候就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便利。^⑦

关于《铸币法》无须多说。金银复本位制是糟糕的本位制,因为这两种金属之间的比价经常浮动,并导致奇怪的结果(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1796 年,在欧洲黄金相对于白银的价格上升了,美国的金币一铸造出来,几乎马上就被运往欧洲。银币被装箱运往加勒比地区,在那里它们被换成不规则的、失去光泽的、更加笨重的西班牙钱币,然后运回美国换取黄金和/或新的银币。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 30 年代中期),美国人在流通中没有自己的金属币,只能回归殖民时期的做法,使用外国硬币,甚至宣布某些外国硬币为法定货币。^⑧然而这其实关系不大,因为新的各州银行为

⑤ 关于这家银行头几年的情况,见 David J. Cowen, “The 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curities Market Crash of 1792,”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0, no. 4, December 2000.

⑥ 在 Jeffery Jenkins and Marc Weidenmier, “Ideology, Economic Interests, and Congressional Roll-Call Voting: Partisan Instability a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Legislation, 1811—1816,” *Public Choice*, vol. 100, no. 3—4, September 1999, 作者检查了对第一银行特许权延期和第二银行特许权的投票。他们发现前一次投票遵照了意识形态的底线,而第二次投票没有。在两次投票之间,联邦政党解散了。

⑦ 见一个例子 Richard Sylla, “U. S. Securities Markets and the Banking System, 1790—1840,” *Review*, May/June 1998; Peter Rousseau and Richard Sylla, “Emerging Financial Markets and Early U. S. Growth,” *EEH*, January 2005; Robert E. Wright, *The Wealth of Nations Rediscovered: Integration and Expansion in American Financial Markets, 1780—1850* (2003)。

⑧ Studenski and Krooss (1952), pp. 62—63; David Martin, “The Changing Role of Foreign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 1782—1857,” *JEH*, December 1977.

人们提供了支付手段——纸币。

1.2 纸币——州银行钞票

我们知道,各州保留了特许成立法人公司的主权。这种权力很快被用来创建由州颁布特许状的私人银行,而这些银行则发行它们自己的纸币。当那些银行对外发放贷款时,它们付出自己发行的纸币,而不是像现代银行那样开设活期账户并让贷款者签发支票。尽管新的《宪法》禁止各州发行纸币,但各州授权成立的州银行却提供了人们所需的纸币供应。^⑨

除非持币要求兑换,那些纸币是按照市场价格进行流通的。商人出版了“验钞指南”之类的商业书籍来指导人们如何分辨纸币的市场价格,其分辨根据是已知的财产、业主的特征等。19世纪30年代之前,支票和存款还很少见。因此,银行贷款会立即进入流通,直到那些纸币被送去银行要求兑换成金属币;有时候,人们拿去兑换时纸币的发行者早已消失在历史中了。到1860年,美国有1562家州银行,据估计,流通中的纸币有大约一万种。

曾经有过许多关于州银行的记载,它们的故事千奇百怪,它们发行了太多古怪的纸币,有的纸币还有绰号,如“蓝猴子”或“生病的印第安人”。人们指责第二银行的中止是之后所有经济灾难的原因——1837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之前的通货膨胀以及1839—1843年的经济萧条。他们认为,没有了第二银行的约束力,银行,尤其是那些“不靠谱的银行”,利用经济形势发国难财,发行了超出担保能力的过多纸币。^⑩

尽管银行系统不理想,但美国经济仍然保持增长,这让批评家们感到迷惑不解。^⑪“不靠谱的银行”发行的纸币(不管其保证金多么不足)完全没有造成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从1816年到1860年,总体物价是下降的;只在19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略有周期性的上扬。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是银行法律过于自由以及缺乏中央银行导致了“过多的货币”。在合众国第二银行中止之后,货币供应甚至还没有人口增长得快(参见表12.1)。按照现代的标准来说,这种业绩简直令人嫉妒,二战后的联邦储备体系远不能望其项背。休·罗科夫(Hugh Rockoff)和彼得·特明等学者认为,这种对第二银行的概括是不公平的。^⑫正如理查德·塞拉(Richard Sylla)所说,对南北战争之前美国银行业的批判性视角主要来自于公共对银行欺诈和倒闭的不满。^⑬

^⑨ 各州通过使用银行特许权来应对反对发行自己的纸币的禁令,如今这个观点得到了一项研究的支撑,这项研究表明各州不仅对这些银行的资产进行征税,还在这些银行中进行投资。如今根据估计,这些州在南北战争之前可能通过银行的特许权增加了20%的财政收入。Richard Sylla, John Legler, and John Wallis, “Banks and State Public Finance in the New Republic: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JEH*, June 1987。

^⑩ 对形容词“靠不住的”的用法不太确定,但和边界有关。

^⑪ 南北战争前的银行保持的实际准备金比例似乎是广泛变化的。Roger Hinderlter and Hugh Rockoff, “The Management of Reserves by Ante-Bellum Banks in Eastern Financial Centers,” *EEH*, Fall 1974。

^⑫ Hugh Rockoff, *The Free Banking Era: A Reexamination* (1975); and Peter Temin, *The Jacksonian Economy* (1969)。

^⑬ Richard Sylla, “American Banking and Grow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Partial View of the Terrain,” *EEH*, Winter 1971—1972。还可参见 Paul Trescott, *Financing American Enterprise: The Story of Commercial Banking*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3), chap. 2。

表 12.1 1836—1860 年的人口、银行与价格数据

年份	人口 (百万)	银行存 款总量 (百万美元)	银行流 通纸币 (百万)	银行资 产总量 (百万)	批发 价格 ^a
1836	15.3	\$166	\$140	\$622	\$114
1860	31.5	310	207	1 000	93
Percentage of Change	+ 104.7	+ 86.7	+ 47.9	+ 60.8	- 18.4

^a 指数以 1910—1914 = 100 为基础。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a 9, Cc 113, Cj 252, 265, 270.

1.3 学习新技术

美国经济中的这一试验阶段和欧洲的发展有些相似。19 世纪上半叶,在整个西方世界中,人们都在试验适合工业化经济的新金融技术(根据当地的法律和习俗)。那段时期的金融史充满了试验和失败,有的想法被抛弃,也有的获得了成功和赞美。^⑭ 美国的州银行也是这个学习过程的一部分。要找出最佳的金融技术,尝试和错误是难免的。

受到州授权的银行也是早期美国经济的金融中介体系发展的一部分,这种体系是特别的,专门针对美国的需求和法律。由州授权的制度产生了单一制银行(unit banking,不设立分支行的单一制银行),即许许多多小银行。在 19 世纪 30 年代,英格兰也有几百家独立的银行。但是后来英格兰的银行合并成了几家大型的全国性银行,而在美国,因为各州拥有独立的权力,这种合并直到最近才开始发生。即使是现在,美国银行在全国各地的分支也比英格兰和加拿大的少。

1838 年之前,州银行是获得特许状的法人公司,其所有者存在明显的寻租行为,而社会又确实需要这种金融服务。但是从 1838 年到 1863 年(该年通过了《国家银行法》),互相竞争的“自由银行制”在各州的扩散更多地体现了社会对金融中介的需求,而不仅仅是各地独裁银行家的寻租行为。

这两种做法后来都让位给了州银行调控委员会和全国银行体系。银行特许状和自由银行制都是试验,正如所谓的工业银行一样——工业银行是为工业目的而成立的法人公司,在其特许状中包含开展银行业务的权力。这种做法在美国不太成功,但在欧洲,从事各种商业银行业务的银行(同时还广泛参与交通和工业活动)变得很常见。美国人就像他们的英国亲戚一样,更希望商业银行就专心从事银行业务,并把主要资金用在发放短期贷款上。罗伯特·克雷格·韦斯特强调,这种偏见最终导致了 1913 年《联邦储备法》的出台。^⑮

^⑭ 失败的体系的例子:在 1837 年经济危机之后的英国,对支配英国银行的“朝圣者规则”的放任;法国在 19 世纪 50 年代的复本位制用于稳定法国货币的失败;还是在法国,国家发展银行,在 1852 年建立的借贷流通体制在 15 年后失败了。Jonathan Hughes, *Fluctuations in Trade, Industry and Finance* (1960), chaps. 2 and 10.

^⑮ Robert Craig West, *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 1863—1923*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ap. 7. 另外,塞拉(1971—1972)包含了一个关于短期信用的起源、依据和相关文献的讨论,或者关于美国银行业的“真实法令”的条文。

1.4 对中介的需求

对金融中介的需求在殖民时期就已经十分明显：(1) 他们试图通过特许状创办银行（英国人将《泡沫法案》运用到马萨诸塞土地银行上从而阻止他们这么做）；(2) 殖民时期的商人群体以非法人公司的形式运营银行业务。中介（intermediation）——在储蓄者和借款者之间的所有中间人活动——是任何社会整体交流系统的一部分。最纯粹的中介形式就是捐客。某些人、企业乃至地区从当前业务和日常运营中获得一些盈余，而另一些人则需要多于其自身储蓄的资金（对当前的消费来说，自由资源不需要）。

考虑这样一个例子，假如有人想建一座房子。这个人很可能需要借钱。他会以谈好的条件把房子抵押给贷方，并商定在未来数年内偿还贷款的数额加上利息（借钱的成本）。这里的利息是借贷双方都同意的这笔钱的使用费——对真实资源的权利要求。如果贷方的钱是从其他人那里借来的（如接受存款的银行），那么他就是中间人。

州银行接受存款并为其支付利息。存款者从中赚取利息。银行又以更高的利息将钱借出，这样就完成了一个中介循环。通过这种方式，某些人的盈余被另一些人“利用”起来。这种功能是社会需要的，它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至少增大了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1.5 社会考虑

我们可以把刚才所说的中介功能当做资本的动员。中介——银行、保险公司、储蓄借贷联合会、股票市场——的任务之一就是这种动员。这是必要的，但是，对借款人的选择并不是一件社会中立的事情。我们在美国的金融史中会看到对银行贷款的社会后果的许多批评（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受到了影响。那些付得起的人得到了资金及其潜在利润，那些付不起的人则没有得到。

许多早期的新英格兰银行是信贷银行而不是储蓄银行；也就是说，它们的主要业务是折价出售商业票据，而不是吸收存款。内奥米·拉穆鲁认为，这些银行是家庭资本主义体系的延伸，是银行和企业的混合体。^⑥ 银行将股份出售给圈外人，通过这种方式筹集资金以借给圈内人。在19世纪早期，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在第19章中将会看到，19世纪末时公众的观点发生了改变。为什么早年圈外人会购买这种银行的股份？拉穆鲁认为这些银行是“投资俱乐部”。从事圈内人贷款的银行的股份类似于共同基金（mutual fund）的股份，其投资组合包括经营该基金的家庭的企业。

19世纪早期的银行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商业银行，相反，它们基本上是投资俱乐部，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银行股份的出售使得小储蓄者可以购买多样化的投资组合的股份，各个银行的投资组合非常不同，而大家也都知道这一点。因此，它使得小投资者可以参与他们喜欢的当地企业的活动。^⑦

通过这种方式筹集的资金数量不可小视。拉穆鲁估计，1860年银行部门的总资源与

^⑥ Naomi Lamoreaux, *Insider Lending: Banks, Personal Connec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ndustrial New England* (1994).

^⑦ *Ibid.*, p. 82.

该地区制造业部门的资本存量在一个数量级上。

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研究了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银行,他发现这里的银行比拉穆鲁研究的新英格兰银行拥有更广泛的所有人。它们的资本总额巨大,使得其贷款活动没有那么集中;它们的贷款对象范围很广,包括小企业和农场主。霍华德·博登贺恩(Howard Bodenhorn)对南北战争之前银行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城市银行主要贷款给商人,而农村的银行则主要贷款给农场主。像拉穆鲁一样,赖特和博登贺恩都相信,这些银行的贷款活动(在本例中是向圈外人贷款),有助于当地的发展。^⑧

州银行是赢利机构,很自然,它们想借给利息最高的,而利息最高的通常也是风险最高的。因为存款者想要保证存款的安全,储蓄银行贷款的安全性就成了一个问题。既然没有明显有效的办法把完全的安全性与最高的利润率结合起来,那么即使是中介都会带来困难。如果安全性(保证按计划支付)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那么农场主之类的人就会很难靠农田担保借到钱。如果安全不是必需的,那么在经济艰难时期,银行就会倒闭,因为其贷款者破产了,而存款者损失了他们的钱,整个社区都会遭殃。

我们将看看这些对银行业务互不相容的需求是怎样在美国银行史上反复制造麻烦,导致人们多次试图进行银行改革,以及某些人尤其是农场主是如何要求政府银行满足他们的特殊要求的——又是寻租活动。

1.6 部分准备金制度

作为一个群体,银行不仅仅是中介:它们还能通过部分准备金制度(fractional reserve banking)创造出数倍于存款数量的货币。^⑨早期时候,银行家们认识到,他们无须随时持有足够支付所有存款的资金。为了满足一天正常的提款需求,只要保有存款总量的一部分就够了。剩下的资金可以用来放贷或投资,其利息可以增加银行的收入。尽管单独一家银行不能借出比存款更多的钱,但作为一个群体的银行则可以。

让我们把整个银行系统设想成一家银行。如果整个国家只有一家银行,且它将存款的20%留做准备金,那么从每100美元的存款中它就可以放出500美元的贷款(或发行同样数额的纸币)。当然,如果所有的存款者同时要求提款(或所有的纸币持有人同时要求兑换),这家银行是支付不了的。使用部分准备金制度的系统都支付不了,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因此,部分准备金制度既有利润,又有潜在的风险。

1.7 准备金比例

那么,关于准备金的问题就集中在什么准备金比例(reserve ratio)才是既安全又让银行家有利可图的。没人能提供答案。有些准备金对银行日常业务来说是必要的,万一出现紧急情况,则需要一些额外的准备金。然而,现金的准备金是不会产生利息的,为了弥

^⑧ Robert Wright, "Bank Ownership and Lending Patterns in New York and Pennsylvania, 1781—1831," *BHR*, Spring 1999. 该材料扩展性的描述可以参见莱特的 *Origins of Commercial Banking in America, 1750—1800* (2001). 以及 Howard Bodenhorn, *A History of Banking in Antebellum America* (2000), particularly chaps. 2 and 3.

^⑨ Richard Timberlake, Jr., *Money, Banking, and Central Banking*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chaps. 5—7.

补这种损失,银行家必须找到利息更高的贷款者。

如果紧急情况规模很大,只有100%的准备金比例才够用,但显然这在部分准备金制度中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因为银行通常承诺兑现金属币——美国的法定货币。结果,当危机来临时,银行将停止将其纸币和存款兑现成金属币。在1819年、1837年和1857年的经济危机及1860年里,几乎所有的美国银行都停止了金属币的兑现。在之后的经济危机里,他们继续使用这种防御性的手段,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33年,那一年,美国的所有银行都关门了。

1.8 杠杆作用

通过部分准备金制度创造的银行货币可以当做经济杠杆,因为其创造的对真实资源的权利要求超过了存款者储蓄的数额。如果国家以更多的生产作为回应(以商品和服务的当前价格接受了银行的货币),这种杠杆就导致了真实增长。如果这种货币创造带来的对资源的竞标没有导致这种回应,那么货币与商品和服务的交换率就会下降,结果就出现了通货膨胀(inflation)——商品数量不变,货币却增加了。因为银行货币通常随业务需要而扩张,而较大的经济扩张一般伴随着物价上升,那么当经济危机到来时,人们往往指责州银行发行了过多的货币。但是在危机时刻,不能收回全部贷款的银行就像处于类似境地的其他企业一样,它们只能关门。19世纪的每次经济危机都有大量的银行倒闭。

1.9 州银行的发展

独立战争之后,南北战争之前,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② 人们需要中介,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经济杠杆起到了作用——人们接受州银行的钞票作为货币。因此,除了经济危机和萧条时期之外,银行业是一个如意的行业。1810年有88家由各州授权成立的银行,到1820年已有300多家,到了1860年,尽管倒闭了不少,仍有至少1500家州银行。表12.2间断性地列出了1834—1860年间州银行的钞票和存款数量。

表 12.2 州银行纸币与存款

年份	未兑现纸币	存款
1834	95	102
1835	104	122
1840	107	120
1845	90	114
1850	131	146
1855	187	236
1860	207	310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j 265, 270.

^② Howard Bodenhorn, *State Banking in Early America: A New Economic History* (2003) 包含了这一部分和下一部分中提及的很多话题。

表 12.2 的数据没有显示出州银行业绩的波动率 (volatility), 之前提到的趋势也没有。正是这方面的表现让南北战争之前的州银行饱受指责。在表 12.3 中, 我们可以看到根据银行债务与批发价格的现存资料作出的对波动率的粗略估计。

表 12.3 银行债务波动率

波动率	批发价格	银行未 兑现纸币	总储蓄量
价格膨胀			
1834—1837	+ 25	+ 54	+ 83
1843—1847	+ 15	+ 47	+ 42
1851—1857	+ 28	+ 60	+ 113
价格紧缩			
1837—1843	- 40	- 90	- 112
1847—1851	- 7	+ 49	+ 55
1857—1860	- 18	- 8	+ 22

注: 数据表示变化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c 113, Cj 265, 270.

我们现有的相应银行数据表明, 在 1834 年和 1860 年之间的三次物价高涨期 (1834—1837 年、1843—1847 年、1851—1857 年) 里, 银行的支付要求——银行货币——的增长远远超过了总体批发价格水平的增长。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 但物价的涨幅低于银行支付的增长, 这说明实际上杠杆成功地起到了作用。

在这三次扩张期之后的经济危机中, 人们指责州银行“发行了过多”的货币, 助长了过高的乐观情绪。^② 但是我们也可以辩称是商业乐观情绪导致了对信用的需求, 而银行仅仅是对这一需求作出回应。正如彼得·特明所说, 银行货币的增加建立在银行系统的金属币储备增加的坚实基础之上, 而经济体的回应则是需求更多的资源, 利用更充足的货币供应。^③ 相对于银行货币的增幅来说, 物价上涨幅度较小, 这说明要么真实生产有了大幅提高, 能够吸收那些银行货币, 要么银行货币本来就没有那么重要。

在物价下跌的时候, 记录显示有多种可能情况。在 1837 年经济危机之后的严重经济衰退中, 钞票和存款数量急剧下降 (许多银行倒闭), 其跌幅超过了物价下跌的幅度。毫无疑问, 经济的糟糕状况部分由银行业的危机引起。没有其他的合理解释了。不幸的是, 根据现有的资料, 我们无法得知更精确的情况。在另两次经济危机导致的物价下跌时期中, 银行钞票的发行量继续上升 (尽管在 1858 年下降了 15% 但在 1860 年又回升了)。只有在 1857—1860 年间, 存款同物价一样下降了。

^② Jonathan Hughes and Nathan Rosenberg, “The United States Business Cycle Before 1860: Some Problems of Interpretation,” *EHR*, August 1963.

^③ Temin (1969). 还可参见 Hugh Rockoff, “Money, Prices, and Banks in the Jacksonian Era,” in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e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chap. 33.

1.10 调控的努力

银行倒闭使太多的人遭殃(数以百万计的存款者),所以人们试图通过私人行动或者政治体系的压力让银行家更加谨慎保守。因为银行的特许状规定银行是州主权的分支,人们认为如果银行伤害了公众,州也负有部分责任。私人调控的主要例子之一是著名的波士顿银行萨福克体系(Suffolk System)。

早在1819年,基于少量准备金发行的乡村银行钞票就在波士顿流通,将波士顿萨福克银行的钞票逐出了流通领域(格雷欣法则再次发挥作用)。为了报复,萨福克银行定期将那些乡村银行的钞票拿到其发行银行那里要求兑现成金属币,从而迫使那些乡村银行提高准备金。1824年,另外六家波士顿的银行也参与了进来。随后,乡村银行同意,如果波士顿银行不要求将其钞票兑换成金属币,它们就将准备金存在波士顿银行中。结果,乡村银行的准备金比率提高了,因此,在同样数量的存款下,贷款数量减少了,自由流通的乡村银行钞票也就减少了,其汇率下跌。

这一体系是现代的联邦储备体系要求成员银行储备非营利性存款的做法的先驱。萨福克体系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50年代,那时在波士顿、纽约、费城及其他主要的银行业中心几乎同时出现了票据交易所。票据交易所对银行执行了更加严格的规定,迫使银行家采取谨慎态度。^③

州的权力也被用来调控银行界的行为——只要想想州是银行特许状的授予者,这就一点都不奇怪了。1827年,为了鼓励银行家更加谨慎,纽约的银行股票持有人被要求承担加倍责任(double liability, 银行股票面额的两倍)。这种做法迅速传播开来。^④

1829—1938年间,纽约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州调控实验。其创新内容是要求银行家购买强制性的存款保险:纽约安全基金(Safety Fund)。这是现代的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的先驱。任何持有特许状的纽约银行都必须在基金中存款,其数额相当于其资本总量的3%,作为发行钞票的准备金或州银行拒绝存款。在银行倒闭的数量及速度保持正常的情况下,这是个非常好的想法。但是在1837年的经济危机中,倒闭的银行如此之多,以至于基金会也破产了。

州存款保险计划在经济危机中也不能幸存,直到20世纪30年代联邦政府成立了FDIC,它有权向美国财政部借钱来支付存款者。州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因为其资源有限,只能在存款上做文章。而FDIC以美国财政部为后盾,能够限制它的只有政府的意

^③ Studenski and Krooss (1952), pp. 88—99; Wilfred Lake, "The End of The Suffolk System,"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7, no. 2, November 1947. Arthur Rolnick, Bruce Smith, and Warren Weber, "The Suffolk Bank and the Panic of 1837,"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vol. 24, no. 2, Spring 2000, 宣称萨福克银行作为一个地区的银行纸币的票据交易所,使得在1837年的恐慌期,其他新的英国银行可以使用准备金,并且使得偿还体系持续运作。在这一方面,它提供了现在和中央银行联系的一个服务。最近另两个研究将萨福克体系用于检验当代的议题。Charles Calomiris and Charles Khan, "The Efficiency of Self-Regulated Payments Systems: Learning from the Suffolk System,"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28, no. 4, November 1996, part 2, 将它看做是一个自主调控的交易系统,而 Bruce Smith and Warren Weber, "Private Money Creation and the Suffolk Banking System,"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31, no. 3, August 1999, part 2, 检验了私有钱币的问题(如今有了电子的替代物)。

^④ 股东的加倍责任大体持续到1933年。1933年,紧急银行业条例去除了国家银行发行的新股票的加倍责任。1935年的国家银行业法律使得国家银行在1937年之前放弃了对它们的所有股票的这种要求。州银行之后也遵循这一条例。

愿——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后盾。

提高准备金比例的尝试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其中最著名的是路易斯安那州的福斯托体系(Forstall System)。^⑤它最初成立于1842年路易斯安那州的所有银行都关门之后。福斯托体系要求将相当于钞票和存款总量三分之一面值的金属币储备起来,并限制了州银行的贷款,并要求商业票据有90天的期限。这种谨慎的做法带来了好处。在1857年的经济危机中,当美国的大部分银行关门时(例如纽约只有一家银行没有关门),路易斯安那的银行仍然能支付金属币。安全性似乎不但对钞票持有人和存款者有好处,对银行家也有好处。1863年之后,高额现金储备成为全国性银行的特点,而福斯托体系的成功居功至伟。

1838年,在纽约的引领下,出现了竞争性自由银行(free banking)运动,在这一体系下,任何一群人只要遵循一些总体规则进行登记、同意按照州的章程运营银行业务、在某些州还要同意维持一定数量的准备金,就可以获得银行特许状。其他州模仿纽约,银行的数量又翻了数倍。立法者们相信,与特许经营的旧体系相比,自由银行体系会减少腐败的倾向。他们的想法是正确的。到1838年,安全基金已经寿终,合众国第二银行也正寝了。^⑥

1.11 第一银行与第二银行

关于国会在1791年和1816年授权成立的这两个“中央”银行,人们已经写过许多文章。^⑦最明显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两个银行,美国经济史会有显著不同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因为从1836年到1914年——这是一个剧烈变革和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美国完全没有中央银行。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两个银行仍然很令人感兴趣,它们是美国学习金融过程的一部分,而且,它们都和伟大的人物有联系:第一银行与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第二银行与比德尔和杰克逊。

毫无疑问,英格兰银行是这两个银行的原型;杰斐逊认为,汉密尔顿完全是被英格兰银行的成功例子冲昏了头脑才热烈鼓吹成立合众国第一银行的。^⑧就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合众国第一银行是商业银行的直接竞争者,并且被预期要赢利。^⑨因为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都是私人银行的直接竞争者,所以整个银行界基本上都反对将其特许状延期。

从中我们得到了一些教训。两个银行的特许状中都提到公私合营的做法,这与政府和商界合作的民主思想完全相容。但是,将银行股票卖给外国人的做法给两个银行都招

^⑤ George Green, "The Louisiana Bank Act of 1842: Policy Making During Financial Crisis," *EEH*, Summer 1970; and Irene Neu, "Edmond Jean Forstall and Louisiana Banking," *EEH*, Summer 1970.

^⑥ Studenski and Krooss (1952), p. 89; A. Barton Hepburn, *History of Curre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5).

^⑦ John Holdsworth and Davis Dewey, *The First and Second Bank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0); Ralph Catterall, *The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1903); A. M. Schlesinger, Jr., *The Age of Jackson* (1945); Bray Hammond, *Banks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 (1957); Bray Hammond, "Jackson, Biddle, and the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JEH*, May 1947; and Marie Elizabeth Sushka, "The Antebellum Money Market and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Bank War," *JEH*, December 1976.

^⑧ "Jefferson," in Hofstadter (1958), Part 3, document 3, p. 158.

^⑨ Jane Knodell, "Profit and Duty in the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Exchange Operations," *Financial History Review*, April 2003, 指出通过提供地区内和国内的交换服务,银行得到了私人商业活动和公共商业活动之间的协同效率。

致了不少敌意。因此,当1914年成立联邦储备体系时,股票所有权被限制在成员银行之内,转移被限制,而政府的所有权仅限于华盛顿特区的总部。而且,成立的联邦储备体系只是一个银行的银行,它不与私人银行竞争业务。

为什么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都在20年的特许状到期之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尽管它们各自的故事完全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有一个20年期限的联邦特许状,而这是致命的。政治使得它们不可能继续存在。汉密尔顿的主张遭到杰斐逊的强烈反对,杰斐逊认为第一银行是违宪的,它侵犯了宪法规定保留给各州的权力。当第一银行在1791年获得特许状时,联邦党人正把持着政府。决定特许状是否延期的时候则是杰斐逊派人士当权,在竞争性银行家的督促下,他们拒绝延期。与私人银行相比,第一银行规模庞大,它经营的业务是私人银行一直垂涎三尺的,如果第一银行的特许状不能延期,那些银行就能分一杯羹。1811年,当第一银行特许状到期时,美国有88家私人银行,五年后这个数字变成了250家。

历史学家通常同意,在第一银行的生涯中,其中央银行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它高效地完成了联邦政府的大部分财政工作,为州银行的扩张步伐安装了一把安全闸,当州银行的扩张速度太快时,它就聪明地将州银行钞票送去要求兑现成金属币。但是,事实上,这正是其矛盾所在。第一银行并不是以调控机构的身份获得特许状的,虽然这些央行控制的举动被现代的历史学家所赞许,但在当时的人看来,那是篡权。

1816年获得特许状的第二银行也将央行的工作完成得很好,尤其是兰登·切维斯(Landon Cheves和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担任行长时。1832年,第二银行被政治斗争所害未能获得特许状延期,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否决了延期议案,因此联邦政府的资金撤出了银行的管理层。^③ 杰克逊的有力否决是对第二银行在美国的权力的致命一击,但他也强调,第二银行是拥有特权的垄断者,其股份大部分由外国人和“富人”持有。

当杰克逊在1828年当选为美国总统时,第二银行的主席是见多识广的比德尔,当时第二银行十分昌盛,人们普遍认为它所做的正是特许状中授权的事。杰克逊上任一年之后向国会传达了一条信息,他重新捡起了杰斐逊时代认为此种银行违宪的观点,并且表示,如果将来真的需要这种垄断的话,他更希望银行是由政府所有。比德尔试图赢取杰克逊的支持,但是总统丝毫不为所动。(杰克逊一直以来就不是银行界的朋友。他之前曾经用一大片土地换了一笔钞票,结果发现那堆钞票一文不值。)随后比德尔又向亨利·克雷求助,在1832年的总统竞选中,克雷将是杰克逊的对手。克雷征得比德尔的同意后,将特许状延期的问题当做竞选的武器。尽管他们成功地获得了足够的国会议员支持,在夏天通过了特许状延期议案,但杰克逊却在11月份的投票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一过程史称“银行战争”。

杰克逊把他的胜利当做对第二银行的宣判,他几乎立即开始从第二银行撤出联邦政府的资金,并将其存在受偏爱的州银行里。1836年之后,合众国第二银行得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特许状,1841年,它试图利用其资金操纵原棉市场,失败之后,特许状也中止了。

^③ George Rogers Taylor, ed., *Jackson and Biddle: The Struggle over the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Heath, 1949); 也参见 Schlesinger (1945)。

第二银行同第一银行一样,比州银行庞大得多。通过在支行之间使用汇票作为货币,它事实上创造了一种统一的通货,而这正是私人银行所害怕的。^③ 他们憎恨第二银行的支行,指责其为侵入当地经济生活的特权者。按照现代的标准,对货币的垄断是央行应该具有的。但是在 19 世纪 30 年代时,流行的观点并非如此。结果,从那时起直到 1914 年,美国一直没有中央银行。作为替代,财政部试图在银行系统之外独立运作事务。独立的财政部成为历史尘埃中的另一项试验,1914 年美国又回归到中央银行体系,成立了联邦储备体系。从第二银行的经历中得到的另一条教训是:应当尽可能地将调控权写在特许状中,这一点在 1914 年得到了实现,尽管之后又进行了很多改变。^④

国会授权成立的这两个以英格兰银行为模板的银行还留下了另一桩遗产。联邦储备体系实际上拥有永久特许状。联邦储备体系的特许状可以修订,但它不用像合众国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那样每隔 20 年就要给特许状延期一次,否则的话,毫无疑问它也会同其前辈一样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当然,国会可以终止现行体系,如果那是“人们的意愿”的话。

2. 其他中介

为了服务于社会系统的其他部分,需要其他类型的中介。州银行是商业银行,顾名思义,它主要作为商业界的中介而运营,是商业工具。为了获得长期贷款和销售股权,企业和政府都需要有组织的资本市场。新兴的运输公司与日益兴盛的制造业企业需要一个平台。资本市场的演化与短期贷款市场同步进行。短期金融是长期贷款和股权销售的润滑剂。纽约、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和新奥尔良是早期的中心。

纽约证券交易所于 1817 年正式成立,之前它已以非正式的形式存在了 20 年。^⑤ 它逐渐成为美国资本市场的中心,正如纽约市成为商业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一样。其他城市也出现了服务于当地需求的证券交易所。之后各个主要中心用电报联系起来,焦点则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普通股从一开始就有售,债券也一样。优先股(对红利有优先权)出现于 19 世纪 30 年代,之后,工业家向政府学习,也开始发行长期债券供公共资本市场认购。

只要有需求,有想象力,这种专业化的活动就会出现。互助储蓄银行——受到精心管制的针对穷人的储蓄所,很早就在美国出现了。第一家此类储蓄所于 1816 年成立于费城。其强调重点是贷款的安全性,尽管利润很低,但与经常倒闭的商业银行相比,这种机构创造了令人羡慕的可信记录。到 1860 年,美国有 278 家互助储蓄银行,其资产总和约为州银行的 15%。这方面的权威专家兰斯·戴维斯认为,到 1860 年,美国十家最大的企业中有九家是储蓄银行。^⑥ 这个主意是从英国学来,其用意是为小储蓄者提供一种安

^③ 并且,根据大卫·马丁的观点,杰克逊及他的支持者将第二银行看做是背叛者,因为它没有使国家摆脱小面额的纸币。David Martin, "Metallism, Small Notes, and Jackson's War with the B. U. S.," *EEH*, Spring 1974.

^④ 1913 年 11 月,联邦准备金条例在伍德罗·威尔逊签署之后成为第 23 条法律。普遍认为联邦准备金体系始于 1914 年,随着该法令运作的开始。

^⑤ Stuart Banner, "The Origin of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1791—1860,"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7, January 1998.

^⑥ Lance Davis, Jonathan Hughes, and Duncan McDougall,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third edition (Homewood, IL: Irwin, 1969), chap. 13.

全的节约方式。节俭的美德所带来的巨额资金被用在了最安全的投资方式上。在英格兰,它只限于投资政府债券。在美国,储蓄银行的谨慎投资将其他资金解放出来,使其可以用在风险更大的地方。

人寿保险公司和火灾保险公司出现于19世纪早期,同时出现的还有葬礼会社、建房会社与私人救火公司。这些都是将群体的资金动员起来对抗个体灾害的手段。因为火灾不仅是城镇里个体的危险,大城市为了自卫,接管了救火的工作。那些“搭便车者”,即未在私人救火公司投保的房屋主人,变成了整个社区的威胁。如果不管那些未投保的房屋,火势可能会延伸到投保的房屋。为了保护那些购买了其服务的房屋,城镇里的私人救火公司不得不扑灭未购买其服务的房屋的火灾。虽然如此,针对火灾的保险仍然停留在私人公司的层面。

和中介相关的名单还可以列出很多。关键在于,随着新需求的产生,试验是必需的,1860年之前的美国经济正是因为这些试验而充满活力。^⑤

2.1 南北战争之前的资本市场整合得怎样?

霍华德·博登贺恩和休·罗科夫断言道,新英格兰、中大西洋地区与南方的金融市场早在1850年就已与纽约市形成了相当程度的整合。^⑥在这个背景下,整合是用极小的利率差异衡量的。这很令人惊奇。大多数学者认为,资本市场一直到1900年左右才开始整合,但是博登贺恩和罗科夫的数据表明,1850年的利率差异比1900年还要小。而且,19世纪50年代是铁路和电报网络大发展的时期,一般认为这些东西有利于市场的整合。电报是由萨缪尔·F. B. 茅斯(Samuel F. B. Morse)于19世纪40年代发明的,大幅减少了两地之间传递信息所花的时间,而在利用这种新技术的信息中,大部分是商业信息。纽约市利率变化的新闻通过电报线路(一般沿着铁路线修建)传播,其速度完全取决于操作员击键的速度。19世纪50年代中西部修建了大量铁路,证据表明那里的利率比大西洋沿岸略高一点。太平洋地区直到南北战争之后才通过铁路和电报与东部联系起来,证据表明那里的利率可能会高出许多。可以预见的是,南北战争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局面,尤其是南方的情况。博登贺恩和罗科夫的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南北战争之后,重新整合花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将在第19章讨论这个问题。

3. 美国与世界经济的金融联系

现代的学生可能会对19世纪的私人银行发行自己的本票当做“货币”感到迷惑不解。为了领会那个时期的银行史,我们必须理解这种做法。而且,我们必须深入探讨金属币兑现的问题,因为州银行在发行钞票时所作的这个承诺将混杂多样的美国货币系统

^⑤ 尤其有趣的一个例子是克伦·克雷对早期加利福尼亚州的商业行为的研究。“Trade, Institutions, and Credit,”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4, October 1997.

^⑥ Howard Bodenhorn and Hugh Rockoff, “Regional Interest Rates in Antebellum America,” in Claudia Goldin and Hugh Rockoff, eds., *Strategic Factor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他们发现,如果用整合最简单的定义,费城和南加州早在1820年就和纽约市形成了整合。还可参见Bodenhorn (2000), particularly chap. 4.

与国际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例如,当佐治亚州的一位州银行家接受其自己发行的钞票、付出金币时,他是在支付国际货币。^⑧ 如果他维持了某种准备金比率,那么这笔流出的黄金就降低了他向外贷款的能力——也就是说,缩小了他的钞票发行量。

3.1 金银复本位制与金本位制

当英格兰银行在 1797 年暂停黄金支付时,英格兰是一个金银复本位制的国家,黄金和白银在银行都有固定的价格。因此,当时英格兰和美国拥有相同的货币本位制度。当英格兰银行最终于 1821 年恢复支付时,只有黄金的价格是固定的,英格兰采用了纯金本位制。^⑨ 当时,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和德意志诸侯国,还在使用金银复本位制。

只要一种贵金属的价格固定,各种通货之间就可以建立起稳定的汇率。英格兰银行的黄金价格是每金衡制盎司(troy ounce)3—17—10 $\frac{1}{2}$ 镑(3 镑、17 先令、10 $\frac{1}{2}$ 便士)。美国的铸币厂法定价格是每常衡制盎司(avoirdupois ounce)20.67 美元。根据重量单位和黄金质量换算,1 英镑价值 4.87 美元,1 先令价值 24.35 美分,而 1 便士的价值略高于 2 美分的价值。一旦黄金的价格固定,其他通货的汇率也可以用类似方式算出。

如果一位美国商人想往英格兰汇出金属币以支付某些货物,而在英格兰的自由市场上白银的价格太低,那么该商人可以用白银兑换黄金,汇出黄金,以每盎司 3—17—10 $\frac{1}{2}$ 镑的价格获得信用。因此,19 世纪的国际金融体系是建立在黄金价格固定和汇率稳定的基础之上的。

除了短暂的混乱时期(如美国暂停黄金支付的 1861—1879 年)之外,稳定而固定的汇率是 19 世纪大部分国家的常态。尽管某些国家是金银复本位制的(在 1849—1851 年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大发现导致黄金相对于白银的价格下跌之后,有些国家甚至使用了纯银本位制),但这一体系被统称为黄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

3.2 黄金点

正如殖民时期一样,19 世纪商人的大部分国际支付并不是通过运输金属币,而是通过买卖汇票完成的。美国的英国货币主要来自一种商品的出口——原棉——以及船运业。汇票本身的价格并不固定。其实际购买力取决于其面值(在到期日应支付的数额)减去利息费用(因为可以提前支付)以及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⑩ 因此,某地如费城一位商人为英国货币支付了多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自由市场的力量所决定的。使用“在某

^⑧ Thomas Willett, "International Specie Flows and American Monetary Stability," *JEH*, March 1968.

^⑨ Sir Albert Feavearyear, *The Pound Sterling: A History of English Mone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chap. 9.

^⑩ 汇票买方期望的贴现率将和他或她的“机会成本”等同,反过来这些钱将从一个可选的相同数量的投资中获得。这个流通过程基于买方的选择。如果一个卖方想让买方提出一个更低的现金价格,他或她需要一些别的选择。在 Lance Davis and Jonathan Hughes, "A Dollar-Sterling Exchange 1803—1895," *EHR*, August 1960, 因此国内的利率用于决定美国购买的汇票的价格暗含的汇率。英国的比率更好地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论点和支撑性论据,可见 Edwin Perkins, "Foreign Interest Rates in American Financial Markets: A Revised Series of Dollar-Sterling Exchange Rates, 1835—19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8, no. 2, June 1978; Lawrence Officer, "Dollar-Sterling Mint Parity and Exchange Rates, 1791—183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3, no. 3, September 1983; and Michael Collins, "Sterling Exchange Rates, 1847—18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ol. 16, no. 3, Winter 1986.

种程度上”这个限定语是因为除了用汇票之外,使用金属币也是一个选择。

购买、打包、保险、运输金属币的麻烦程度决定了汇票的可能价格。例如,如果英国货币汇票的价格上涨,以至于用金属币支付同样便宜或更加便宜,那么人们就会用金属币支付,结果要么汇票降价,要么汇票持有人只能等到到期日兑现汇票。外汇价格的上限是黄金输出点(gold export point)。类似地,如果在伦敦的美国汇票过于昂贵,黄金就会流入美国。这个门槛叫做黄金输入点(gold import point)。这两个黄金点确保了黄金本位制下外汇汇率的稳定性。黄金点是汇率的极限值,如果超出了这个极限,汇率就不成立。

由于黄金价格的固定和黄金运输的可能性,19世纪的商人在算钱的时候可以享受一种稳定性。在一个通信极为不便的时代,这种稳定性是最宝贵的东西。汇率的极限值是众人皆知的,称为黄金点的一致。然而,既然这种一致是由黄金运输的可能性带来的,那么如果黄金暂时无法运输,汇率就会变得不稳定。在19世纪60年代铺设的大西洋海底电缆使得银行间可以快速转账之前,这种情况多次发生。

在1837年和1857年这样的金融危机中,银行拒绝支付金属币,只有付出额外费用才能获得黄金。因此,黄金点会偏离正常的狭窄范围。^⑩这是自由市场在艰难时刻维持国际金融体系完整的方式,这意味着,州银行实行自己的贷款政策的自由受到国际环境的限制——只要它还想继续维持准备金比例。避免国际影响的唯一方式是完全舍弃金属币支付。

当美国通货处于黄金输出点时,一般是经济高速增长、国际收支出现大量赤字的时期(美国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比它生产的多),国内黄金的减少造成了银根紧缩、利率上升、贷款受限,并限制了当前经济的进一步扩张。经济停滞的时候情况则相反:黄金的流入会放松银根、鼓励增长。正因如此,黄金本位制被认为具有自我调整能力。

就这样,美国的货币体系和经济通过贵金属本位制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这种制度优劣参半。美国能从外国的经济扩张中受益,但也会受到外国经济萧条的牵连(除了外国的农业歉收之外,外国歉收总能提高对美国食物的需求)。黄金本位制自动地传递金融震荡,而这种震荡又通过金融市场反弹回来。英国人和美国人彼此指责对方导致了货币问题变成了常事。事实是,黄金本位制是一个整合的金融体系,它传递好事和坏事都同样地有效率。

3.3 南方的棉花金融

1860年以前,美国金融体系中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特殊成分是棉花金融,它在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英国是最大的棉纺织品生产者,正常情况下,其3/4的原棉来自美国南方。其中涉及大量的钱;它对金融的作用大概可以和现代从石油输出国组织向工业化国家运送石油的效应相比。

一种非常精细的金融系统发展出来,包括英国银行的代理人、贴现公司以及遍布南方棉花种植区和运输区的棉花进口者。因此,融资总是可能的,其来源可以是国际资本,

^⑩ Davis and Hughes (1960), table A-2.

也可以是南方的棉花种植者和运输者。棉花代理人安排立即现金付款给南方棉花种植者,代理人通常代表其英国委托人“接受”账单(背书),因此英国信用立即充满了棉花市场。

棉花被发运,而由此产生的汇票要么卖给美国各地包括南方和北方的进口者,要么卖给专业化的英国贴现公司,他们将等到期时在英国兑现。棉花汇票可以在英国贴现,因为其上有英国的签字,是与英国的贴现公司交易的票据。当然,信用是双向流通的,南方棉花种植区在1860年以前拥有的金融体系比1865年之后许多年的还要好。^④

北方经济也从中受益。总体来说,北方与英国——1860年以前最大的贸易伙伴——的贸易是入超状态,而南方则是出超状态。英国的信用在北方也可用,而且,通常来说北方对南方的贸易是出超状态。因此,南方的繁荣为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道格拉斯·诺斯在《1790—186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指出,1860年以前,南方对欧洲的贸易顺差是北方工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⑤南方赚取外汇,北方用这些外汇购买外国的机械和制造品。因为南方的贸易顺差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而这整个体系又依赖于英国的金融体系,因此这一段在美国历史上很少受到颂扬。

美国的银行家慢慢地挤入这一体系,尽管在南北战争之前它主要仍是英国的天下。棉花金融的历史影响非常深远,最终成为美国投资银行的主要来源。举一个例子就够说明这一点了。我们需要个人历史的细节,而我们的讨论也必须从宏观经济史转移到微观经济史上。

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是来自马萨诸塞州塞伦的北方金融家,他在伦敦住了很长时间,拥有非常成功的职业生涯。他的企业叫做皮博迪公司,是一家“美国公司”,其主要业务是棉花金融。1854年,他邀请一位新的美国合伙人去伦敦,尤涅斯·斯宾塞·摩根(Junius Spencer Morgan),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安泰火险公司(成立于1819年)创始人的孙子。

1857年,J. S. 摩根的儿子皮尔庞特刚结束了在格廷根大学的数学学习,正无所事事。不久,小摩根前去伦敦和他的父亲汇合,观察英格兰银行在1857年经济危机中的重大举动(包括给予皮博迪公司大额贷款以维持其生存)。在伦敦两年的学徒生涯之后,皮尔庞特摩根于1859年秋天返回新奥尔良,来到杜肯·谢尔曼的棉花运输公司学习美国这边的棉花金融。很快他又卷入了其他事情,并在南北战争期间来到了纽约市。

皮博迪公司在1865年变成了J. S. 摩根公司。该公司在伦敦和巴黎都设有办事处,变成了欧洲数一数二的商业银行公司,其突出业绩包括在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借给法国5000万美元的贷款。尤涅斯·摩根于1890年去世,彼时他的公司在欧洲金融方面已经可以与罗思柴尔德和巴林斯比肩。皮尔庞特·摩根成为现代美国投资银行的鼻祖,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金融家。

^④ Normal Buck,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nglo-American Trade, 1800—18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5); R. C. O. Matthews, *A Study in Trade-Cycle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chap. 5.

^⑤ Douglass North,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1961); also, a shorter version, Douglass North, “The United States Balance of Payments, 1790—1860,” in *Trend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 2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早些时候,皮尔庞特与其父曾经帮助过年轻的安德鲁·卡内基在伦敦销售宾夕法尼亚铁路的股票。他们的善意在1900年得到了回报,卡内基以5亿美元的价格把卡内基钢铁的业务交给了摩根。美国钢铁公司就是在摩根的协调之下通过这桩交易形成的。当J. P. 摩根于1913年去世时,他的名字已经变成了美国金融史上的传奇,直到今天仍然如此。^③

如前所述,19世纪的美国金融处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将在之后的章节中再次谈到摩根先生和卡内基先生。

4. 金融体系与经济周期

黄金点的一致与良好的电气连接非常相似,只是在外汇市场上通过的不是电流,而是经济脉冲。由于南方棉花与英格兰的联系,英美经济波动的节奏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这些早期的经济发展步调变化对真实经济生活的影响究竟有多深是很难评估的。尽管价格下跌时货币收入受到了影响,但南北方的农业活动都仍然在继续进行。事实上,农业产出对价格变化非常不敏感,这已经成了历史常态,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④ 南北战争之前,南方农业也许比北方自给自足的家庭农场更具有商业敏感性,但是奴隶制经济中的固定成本相对如此之高,以至于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价格变化才会影响生产规模。一般来说,种植园主不会因为棉花价格的暂时下跌而卖掉他们的奴隶。

4.1 批发价格的波动

图12.1是1790—1860年的年度批发价格图。在这些数据中有许多例外,我们这里只是以此进行概括的论述。在南北战争之前这种可以自由地对市场信号作出回应的经济体中,整体价格的变动可以粗略指示出经济生活步调的变化。最早的价格记录因1793年的巨变而失色,当时欧洲正在打仗而杰斐逊的禁运令正在执行——导致市场每月都变动剧烈。

以农业为主、同国际市场紧密联系的沿海地区小经济体对这种影响极其敏感。随后到来的是1812—1815年的通货膨胀,在当时处于战争中的美国市场上,来自欧洲的货物几乎绝迹,国内的制造业力量仍然十分微小(虽然因此而开始蓬勃发展),而合众国第一银行终止之后州银行开始自由地扩大其纸币发行量。1816年出现了两股促使价格一直下跌到19世纪30年代的力量:(1)欧洲制造品回归美国市场,(2)欧洲农业逐渐恢复元气。这种恢复使得欧洲的食物供应增多,并且还让1818年之后的美国市场上的农产品连续十几年供大于求。^⑤

^③ Jonathan Hughes, *The Vital Fe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p. 9.

^④ 加第纳·米恩斯在1935年对这种关系进行了讨论,见 Senate Document No. 13, 74th Congress, 1st session, "Industrial Prices and Their Relative Inflexibility," reprinted and elaborated in Gardiner Means, *The Corporate Revolu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4), chaps. 4 and 5.

^⑤ W. B. Smith and A. H. Cole, *Fluctuations in American Business 1790—186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section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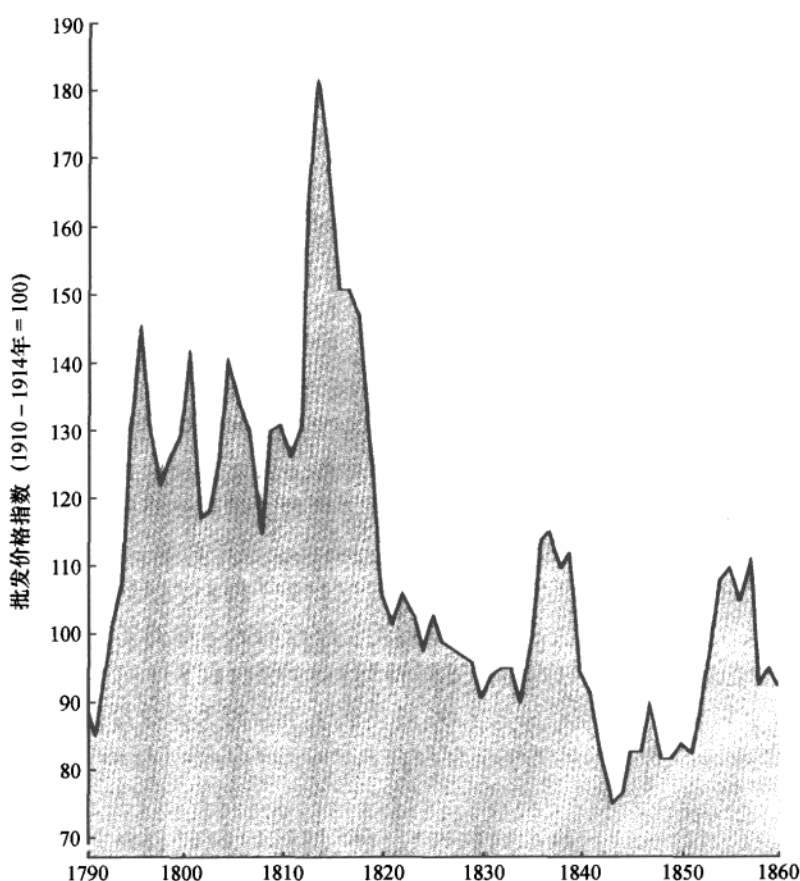


图 12.1 1790—1860 年的批发价格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c 113.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三次较大的经济扩张: (1) 结束于1837年经济危机的强劲扩张(1839年还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2) 1843—1847年间的一次相对较弱的扩张, (3) 19世纪50年代利弊参半的扩张, 在1855年和1857年价格达到了最高峰。在这一时期, 英国也经历了较大的金融危机(在1825年、1837年、1847年和1857年)。美国第一次大规模金融危机发生在1819年, 之后在1837年又发生了一次较大的经济危机, 在1847年发生了一次较小的危机。1857年的经济危机是国际性的, 对美国和欧洲的影响都非常严重。

1837年和1857年在美国和英国发生的经济危机是通过金融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 但是从经济学上说, 这两个国家的真实活动最多只有一些不确定的联系。19世纪30年代, 英国在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扩张, 而美国人正热衷于交通建设(其动力是联邦政府会将预算盈余返还给各州)和出售西部土地。无法证明这些真实活动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但是观察者们都同意, 金融纽带同时引爆了两个国家的金融危机。

1847年英国的金融危机发生时, 铁路股票的价格刚刚度过最高点, 开始一路暴跌。英格兰银行在1844年获得了新的特许状, 该特许状完全限制了其除了以金属币存款为

基础以外自己发行纸币的能力,因此英格兰银行几乎暂停了支付。^④当时的英国还面临着其他麻烦,包括农业歉收、爱尔兰饥民大量涌入以及铁路投资的急剧减少。

在美国,19世纪40年代是以一场大萧条开始的(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场大萧条可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⑤但是1846年与墨西哥的战争带来了更多的支出和更高的价格。之后,在1849年,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大发现带来了一股新的热潮和又一次的大规模西进运动。美国1847年的黄金产量是4.3万盎司,1848年上升了10倍,达到了48.4万盎司。而这还只是开始。1849年的产量是难以置信的190万金衡制盎司,并且这一数字持续上升,到1853年达到了310万金衡制盎司——12盎司为一磅。之后黄金产量有所下降,但在1860年仍然有220万盎司。^⑥

1851年在澳大利亚也发现了黄金。到1857年,世界上货币黄金的供应量提高了1/3,在十年中发生这样的增长是前所未有的。^⑦美国变成了黄金生产国和出口国,这些新的黄金,加上克里米亚战争期间(1854—1855年)政府在欧洲支出的增多,使得19世纪50年代早期的商业世界呈现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作为通货的基础,新的黄金储备让美国的通货流量从1847年的2.26亿美元提高到了1857年的4.75亿美元。在这样的货币冲击下价格只上涨了约50%,这说明19世纪50年代美国的真实产量有了大幅提高。^⑧

美国的棉花经济在19世纪50年代前所未有地繁荣。美国棉花产量在十年里翻了一番,而世界棉花消费增长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原棉价格仍然持续上涨。19世纪50年代的价格几乎是十年前普遍价格的两倍。公共土地的销售再次出现了小幅上涨,但并未达到19世纪30年代的规模。最好的土地已经卖出去了。1862年通过的《宅地法》鼓励人们在西部的免费土地上定居。一个时代结束了。

之后,在1857年,发生了许多学者认为是首次出现的世界性经济大动荡。^⑨英国人指责美国人,因为银行业危机是在美国的上一年夏季开始出现的,而且英国最先倒闭的大企业是美国公司。到了11月份,恐慌蔓延到了整个西欧。然而,研究表明,从1857年春季开始,英国明显出现了经济下滑,其原因非常复杂(部分因为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政府支出突然减少),而这些原因与英美之间的金融纽带几乎毫无关系。英国在1858年经历了一次快速恢复,以纺织品出口的恢复为基础,而美国的棉花价格并没有降低到1856年以前的水平。显然,当1861年战争打响时,美国经济仍然处于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混乱之中。

^④ 在这一时期关于英国周期的形式,见 A. D. Gayer, W. W. Rostow, and A. J. Schwartz, *Growth and Fluctuation of the British Economy 1790—18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2); W. W. Rostow, *British Econom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2); Matthews (1953); Jonathan Hughes, "The Commercial Crisis of 1857,"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2, June 1956; and Peter Temin, "The Anglo-American Business Cycle, 1820—1860," *EHR*, May 1974.

^⑤ Ira Ryner, "On the Crises of 1837, 1847 and 1857," *University of Nebraska Studies*, vol. 5, April 1905; and Temin (1969).

^⑥ Robert A. Margo, *Wages & Labor Mark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0—186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chap. 6, 提供了一种关于加利福尼亚州淘金热的有趣观点。

^⑦ Hughes (1960), chap. 1.

^⑧ 金和货币的图取自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series Cj 8, 70, Db94.

^⑨ Hughes (1956).

4.2 互相依赖

尽管很难说南北战争之前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同步的,但 19 世纪 30 年代和 50 年代的这两次最大的冲击都通过金本位制度高效地传递了出去。^⑤ 美国在 19 世纪 40 年代早期的萧条很可能也是这样。

这些经济活动的波动,即“经济周期”,之前从未被真正理解为一系列连续事件,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一百多年里,它们让经济学家感到困惑不解。尽管表面看来经济周期都是一样的,但每次经济周期的经济表现和结构变化都不同。^⑥ 在每次上升期中,货币供应量与物价的上涨就像一场热疫,但多种疾病都可能导致热疫。虽然如此,但是毫无疑问,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专业深化和贸易增长带来了一个日益互相依赖的世界。这个世界高效地使用一种单一的通货,即黄金本位制下的金属币,它必然使得这个世界更易受周期性经济搅动的传递和影响。

5. 国际收支余额与经济周期

发展中的美国经济在国际关系上和现代的“发展中”国家非常相似。在扩张期里,美国使用的商品和服务比自己生产的多,19 世纪 30 年代和 50 年代出现大量贸易逆差(参见图 12.2)。当增长缓慢时,比如在 19 世纪 40 年代早期,出现贸易顺差。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世界对美国出口的需求长期增长,尤其是原棉,加上美国经济倾向于跳跃式地发展——周期性地“激增”,使其领先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外国人愿意为这种增长融资,他们借钱给美国并向美国投资。彼得·特明指出,由于 1837 年以前的修正,美国在 19 世纪 30 年代本来有可能蒙受巨大的贵金属损失,但这被美国的金银复本位制抵消了。随着黄金的流出,墨西哥的白银流入美国“填补”了空缺,使得前述的州银行钞票发行量动态增长成为可能。^⑦

在 19 世纪 50 年代,黄金生产有所下降,这在美国面临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情况下导致了银根紧缩,因此之后被归结为 1857 年美国金融崩溃的原因之一。人们照例指责银行“发行纸币过多”。这种解释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对 1857 年美国的经济危机需要进行更细致的调查。

从现代凯恩斯主义的角度来看,南北战争之前的一个怪异之处是联邦政府金融体系的完美表现(参见图 12.3)。按照现代标准,理想的反周期政策应该是在扩张期创造政府盈余,从流通领域撤出资金,对经济热潮进行调控;在衰退期鼓励政府赤字,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控制衰退的深度和长度。在 1825—1846 年、1844—1846 年与 1850—1857 年这

^⑤ Temin (1974).

^⑥ 阿瑟·伯恩和威斯利·克莱尔·米切尔,经济周期时的美国学生,试图减少所有周期共同的那些要素的证据。他们将经济周期概括为“只能通过心灵获得一系列证据而窥察”。Arthur Burns and Wesley Mitchell, *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46), p. 12.

^⑦ Temin (1969), pp. 80—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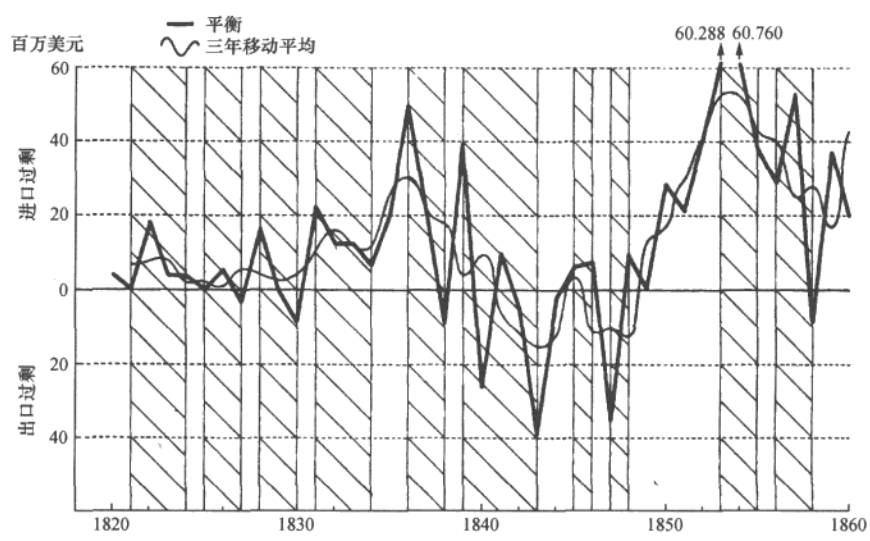


图 12.2 1820—1860 年美国商品贸易余额

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国际交易方式如同一个现代欠发达国家的实践,即使用国外产品的数量远远超出本国生产的产品,而且这一数量不断扩大。阴影部分是周期性的经济紧缩。三年移动平均数起到了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并使得经济发展特征更加明显。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Ee 3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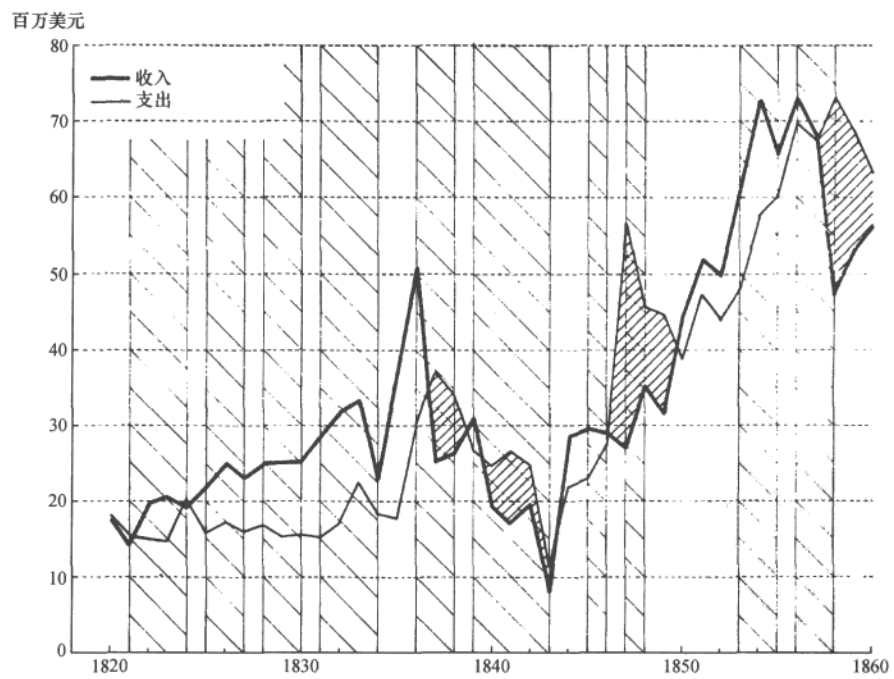


图 12.3 1820—1860 年联邦总收入与支出

从 19 世纪 30 年代到南北战争之前,联邦政府出人意料地采用了“周期性平衡预算”的方法。经济衰退时赤字较多(阴影部分),而主要的扩张时期,经济又存在盈余。这种“模范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政府进项较于支出来讲,是更加具有收入弹性的。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Ee 584—585.

三次大扩张期中,经济(在理论上)被政府盈余加以制约。在 1820—1821 年、1837—1843 年、1847—1849 年与 1858—1860 年这些大衰退期中,政府维持了赤字,应该能够刺激不景气的经济。

这种宏观经济记录十分令人羡慕,现代政府尚且无法做到,而当时能做到似乎是出于巧合。当时的联邦政府占经济总量的比例非常小。其支出大部分时候对国内收入的变化不敏感。政府的主要支出是支付国债的利息和官员、军队的工资。在杰克逊否决了关于麦斯维勒路的支出(1830 年)之后,联邦政府在国内交通上的支出也维持在低水平上。因此,支出或多或少地与美国发展的步伐保持同步,而政府则提供最低限度的必需服务作为回应。

另一方面,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海关税收。进口对收入变化非常敏感,国民收入增加,进口就会增多,因此美国经济的大规模扩张使得政府的收入飙升。图 12.4 记录了南北战争之前关税收入与商品进口量的比例。最突出的高峰时期发生在 1812 年战争期间,那时分母减小了。1807 年有一个小高峰,那年国会通过了《禁运法案》,试图让英国和法国承认美国应该拥有中立国的权利。同样,这个高峰的原因也是进口的减少。另一个相对较高的点发生在 1828 年,那年国会通过了“可憎的关税法”,将平均关税提高到了 50% 以上。尽管我们在图中也能看到 1816 年、1824 年和 1842 年的关税法,但 1828 年的比率显然是南北战争之前最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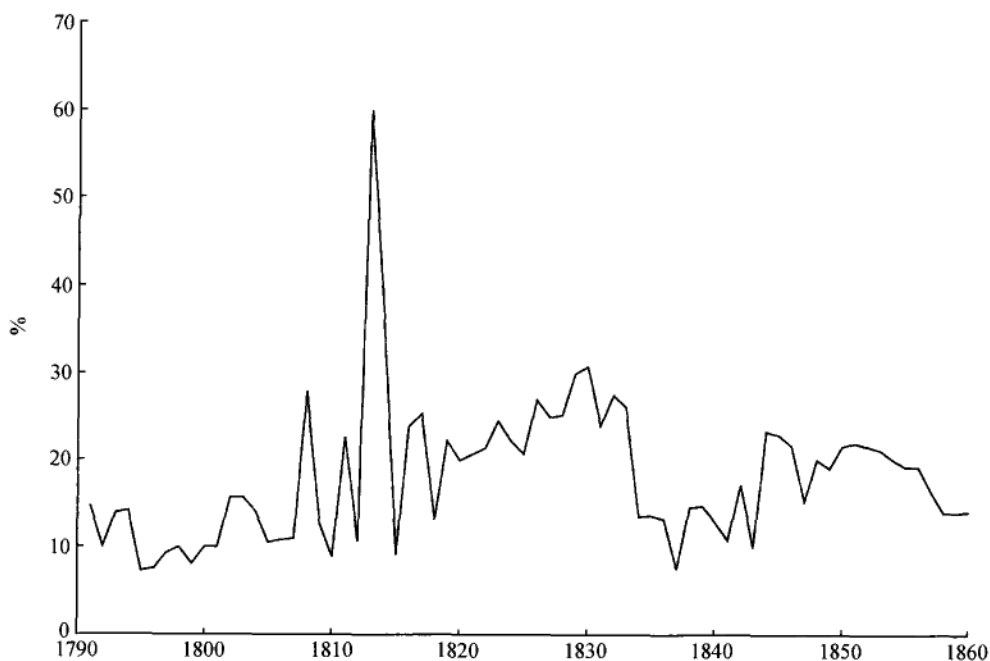


图 12.4 内战前 1790—1860 年消费者收益与商品进口的比率

用每年消费者收益除以进口商品来计算得出数据。商数小于关税平均税率,这是因为并非所有进口都征收关税。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Ea 589, Ee 368.

既然联邦政府没觉得有必要仅因为收入增加了就增加支出,因此联邦预算在好年景时就出现了盈余,正如宏观经济学教导我们的一样。^⑤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政府行为可能会抵消金本位制度的“自我矫正”机制,因为它使扩张和萧条的程度比原本能够达到的要低。凯恩斯主义与古典的金本位制度不相协调。

6. 回顾

南北战争之前的金融体系是一个变化的实验室,到1860年,情况和1790年几乎已经完全不同了。在很大程度上,那是一个混乱的时期。我们应该考虑最后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没有证据表明这种金融混乱拖慢了经济长期发展的速度。英国拥有一个精细得多、结构“正确”得多的系统——拥有中央银行、整合的支行、严格的金本位制度、财政部观念十分谨慎——然而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增长却超过了世界第一工业化国家英国。如果像现代货币主义者喜欢说的那样,“货币很重要”,那么美国1860年之前的历史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哪种货币重要吗?”

推荐阅读

文章

Bodenhorn, Howard, and Hugh Rockoff. “Regional Interest Rates in Antebellum America.” In Claudia Goldin and Hugh Rockoff, eds., *Strategic Factor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Bordo, Michael, and Anna J. Schwartz. “Money and Pric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 Old Debate Rejoine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0, no. 1, March 1980.

Davis, Lance E., and Jonathan Hughes. “A Dollar-Sterling Exchange 1803—189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13, no. 1, August 1960.

Green, George D. “The Louisiana Bank Act of 1842: Policy Making During Financial Crisi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7, no. 4, Summer 1970.

Hammond, Bray. “Jackson, Biddle, and the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 no. 2, May 1947.

Hinderliter, Roger H., and Hugh Rockoff. “The Management of Reserves by Ante-Bellum Banks in Eastern Financial Center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no. 1, Fall 1974.

Hughes, Jonathan. “The Commercial Crisis of 1847.”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8, no. 2, June 1956.

^⑤ Hughes and Rosenberg (1963).

Hughes, Jonathan, and Nathan Rosenberg. "The United States Business Cycle Before 1860: Some Problems of Interpretat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15, no. 3, August 1963.

Knodell, Jane. "Profit and Duty in the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Exchange Operations." *Financial History Review*, vol. 10, no. 1, April 2003.

Lamoreaux, Naomi R. "Banks, Kinshi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6, no. 3, September 1986.

Martin, David A. "1853: The End of Bimetal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3, no. 4, December 1973.

———. "Metallism, Small Notes, and Jackson's War with the B. U. 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no. 3, Spring 1974.

———. "The Changing Role of Foreign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 1782—1857."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7, no. 4, December 1977.

Neu, Irene D. "Edmond Jean Forstall and Louisiana Banking."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7, no. 4, Summer 1970.

North, Douglass C. "The United States Balance of Payments, 1790—1860." *Trend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Studies in Income & Weal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vol. 24.

Redlich, Fritz. "American Banking and Grow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pistemological Reflection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0, no. 3, Spring 1973.

Rockoff, Hugh. "Money, Prices and Banks in the Jacksonian Era." In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e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chap. 33.

———. "Varieties of Banking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40—18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5, no. 1, March 1975.

Roll, Richard. "Interest Rates and Price Expectations During the Civil War."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2, no. 2, June 1972.

Rolnick, Arthur, Bruce Smith, and Warren Weber. "In Order to Form a More Perfect Monetary Un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Fall 1993.

Rousseau, Peter, and Richard Sylla, "Emerging Financial Markets and Early U. S. Growth."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42, no. 1, January 2005.

Sushka, Marie Elizabeth. "The Ante-Bellum Money Market and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Bank War."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6, no. 4, December 1976.

Sylla, Richard. "American Banking and Grow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Partial View of the Terrai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9, no. 2, Winter 1971—1972.

———. "U. S. Securities Markets and the Banking System, 1790—1840." Federal Re-

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vol. 80, no. 3, May/June 1998.

Sylla, Richard, John B. Legler, and John J. Wallis. "Banks and State Public Finance in the New Republic: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7, no. 2, June 1987.

Termin, Peter. "The Anglo-American Business Cycle, 1820—186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vol. 27, no. 2, May 1974.

Willett, Thomas D. "International Specie Flows and American Monetary Sta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8, no. 1, March 1968.

Wright, Robert E. "Bank Ownership and Lending Patterns in New York and Pennsylvania, 1781—1831."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73, no. 1, Spring 1999.

书籍

Bodenhorn, Howard. *A History of Banking in Antebellum America: Financial Marke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 Era of Nation-Build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State Banking in Early America: A New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Catterall, Ralph. *The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3.

Hammond, Bray. *Banks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Hepburn, A. Barton. *History of Curre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cmillan, 1915.

Hughes, Jonathan. *Fluctuations in Trade, Industry and Fin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0.

Lamoreaux, Naomi. *Insider Lending: Banks, Personal Connec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ndustrial New Eng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North, Douglass C.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1.

Redlich, Fritz. *The Molding of American Banking: Men and Ideas*, 2 vols. New York: Hafner, 1947 and 1951.

Rockoff, Hugh. *The Free Banking Era: A Reexamination*. New York: Arno Press, 1975.

Schlesinger, A. M., Jr. *The Age of Jackson*.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45.

Studenski, Paul, and Herman Krooss.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cGraw-Hill, 1952.

Sumner, William Graham. *A History of American Currency*.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78.

Temin, Peter. *The Jacksonian Economy*. New York: W. W. Norton, 1969.

Wright, Robert E. *Origins of Commerical Banking in America, 1750—1800*.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 *The Wealth of Nations Rediscovered: Integration and Expansion in American Financial Markets, 1780—185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第3部分

工业化社会的崛起:1861—1914 年

主要潮流

尽管南北战争对于国家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然而战争的结束却是一个转折点,当然,这样说并不十分精确。旧南方已经随风而逝,在此后的数十年中,南方地区的经济和福利与美国其他地区相比将会显得颇为不如。北方的农业生产进入了繁盛期,到19世纪80年代,小麦已成为美国第二大出口原料,仅次于原棉。事实上,农业在经济和社会上的主导地位已经到达了最高峰。美国的下一代人将是首批生活在工业化社会的人,城市的发展、城市生活与文化将真正主导这个国家的生活和政治。下面这些数据将展示这种变化的本质。

1870年,只有14个城市拥有10万以上的人口,仅有26%的人居住在人口数大于2500人的城镇之中。那一年所生的人到40岁时,即1910年,美国已有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50座,46%的人,也就是将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三座城市(纽约、芝加哥和费城)拥有100万以上的居民,另有其他五座城市的人口数在50万到100万之间。

1870年,美国仅生产了7.7万美吨钢。1910年,美国钢锭和钢铸件的产量达到了2800万吨,超过了德国和英国的总和。实际上,到1913年,美国生产了全世界约36%的制成品。1860年,英国一国的煤铁产量就超过美国的4倍多。而到了1913年,美国的煤产量超过了整个欧洲,而美国产的石油也超过了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这些变化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然而也相当迅速,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就可以看到。变化的速度太快,以至于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破坏,因为这个国家原来以农业为基础的法律制度都需要改变以适应变化。

尽管农场主为达到他们的共同目标作出了最后的英勇一击,但是南北战争之后的焦点很恰如其分地落到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膨胀上。州政府不再拥有足够的控制力。一个城市化了的工业社会将是一个联邦权力膨胀、其他权力萎缩的社会。是联邦权力进行财

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并在政治层面上收取和支出租金。正如理查德·约翰(Richard John)所观察到的,在美国,“大政府先于大商业出现”^①。

罗伯特·韦伯(Robert Wiebe)在他富有洞察力的著作《寻找秩序,1877—1920》中记录了战前美国不成文的老“习俗统治”解体的过程,这种统治是基于人口统计学和土地所有权的。^② 农场主和小城镇的政治联盟注定将失去它们的影响力。铁路、城市、矿井、工厂、重工业、大型金融集团以及巨型企业将是阿波马托克斯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将涌进,主要是进入大城市和工业地区。

阿波马托克斯二十年之后,自由土地与奴隶制的矛盾,以及西进运动,都显得像清教徒祖先那样遥远了。战前的美国曾被英国人称为“乔纳森表弟的大农场”,而此时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国家之一,一个充满活力、不断产生技术进步和社会变化的地方。美国的农场主并没有成为铁路、银行和大商业的牺牲品。尽管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致相同,农业部门的增长却没有工业部门那么迅速,农场主们意识到了农业部门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从许多方面来说,从1870年到1914年这段时期,正如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庆祝的那样,是美国真正的变化期。^③ 在整个美国历史中,这种变化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杰斐逊对于拥有产权的自耕农国家的理想,基本上被遗忘了。

① Richard John, "Affairs of Office: The Executive Departments, the Election of 1828, and the Making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in Meg Jacobs, William J. Novak, and Julian E. Zelizer, eds., *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 New Directions i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6.

② Robert Wiebe, *The Search for Order* (New York: Hill & Wang, 1967).

③ Robert Higg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1865—1914: An Essay i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1971).

第 13 章

南北战争对经济的影响

南北战争对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结束了在南方盛行 250 多年的动产奴隶制。南方的主要经济形式是农业,而其组织形式是以强制劳动为核心的。奴隶的供给加上棉花的利润,决定了这个“技术性的选择”。奴隶劳动力的可用性影响不动产、个人财富以及专门工具器材的市场价值。整个社会,阶级结构、礼仪、法律、教育、对未来的预期,全都植根于这种把人当做财产的制度中。

1. 战争成本的衡量

战争的成本是什么?试图计算战争的成本并不是愚蠢的做法。战争已经是现代国家中耗费最大的经济活动之一。^① 成本非常重要。南北战争极大规模地浪费了人力物力。计算成本的过程会显得既冷血又造作,然而我们需要得出数字来回答关于战争及其对经济影响的重要问题。

1.1 屠杀的成本

双方共死亡约 60 万人,占 1860 年人口普查中 15—39 岁男性人口的 9%。北方军队的官方统计结果是,14 万军人在战斗中丧生,另有 22.4 万人因其他原因死亡——占全部兵员的 16.5%。另有 28.2 万人受伤。^②

这些生命的价值是多少?如果用 1860 年奴隶市场上壮年农场劳动力的价格来衡量,每个约值 2000 美元,这“人力资本”的总损失达到了 12 亿美元。另有 50 万人受伤。这些受伤的损失该如何衡量?从表面上看,这种智能的计算是荒谬可笑的。1860 年有多少家庭愿意为了 2000 美元出卖儿子或父亲的生命?(按 1860 年的平均水平计算,这笔钱足够一个人消费 20 年——还好这只是一个反问句。)然而,试图衡量战争的成本就必须进行这样的计算。

① Mark Wilson, “The Business of Civil War: Military Enterprise,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880,”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2), reported in *Enterprise & Society*, vol. 4, no. 4, December 2003, 这是一个关于维持内战装备和武器所作的努力的动力的调查。

② 联邦军队没有官方数字,并且这个估计范围很大(比如,所有着制服的男性被估计为 60 万人至 150 万人)。对于在联邦部队的参军人,查理·李发现死亡的可能性(致病环境往往比战斗更易致死)是受年龄、出生地、职业和家庭财富影响的。Chulhee Lee, “Selective Assignment of Military Positions in the Union Army,” *SSH*, Spring 1999。

幸好,克劳迪亚·戈登和弗兰克·刘易斯(Frank Lewis)已经计算好了。^③ 将士兵薪资超出平常(和平时期)收入的部分称做60万死者的“风险保障金”,据估计北方的伤亡者共损失约10.6亿美元的人力资本,南方约7.67亿美元,双方总计损失约18亿美元。他们估计,南北战争期间政府的直接支出在北方有23亿美元,南方有10亿美元。而对财物的物理破坏主要发生在南方,估计约有15亿美元。

1.2 总成本

将所有的数字总计,戈登和刘易斯估计北方的直接成本约为34亿美元,南方的直接成本约为33亿美元,双方共约67亿美元。以1860年的价格水平来说,这个数字的实际价值是多少?67亿美元的总数达到了美国1850—1860年这11年出口总额的两倍有余,很可能是1860年国民总收入的两倍。它是从1789年到1860年所有联邦政府支出总和的四倍多。它是1860年美国所有制造业增加价值的八倍多。它是美国1860年出口总额的近十七倍。而市里·李更指出,如果把退伍军人因健康恶化而导致的经济损失考虑进去,成本还将更高。^④

我们可能认为完全是资源浪费,现在让我们用严格的经济学术语来考虑一下。1865年后累积的成本总计——即永远失去的机会和人才、累积的利息费用、退伍军人的薪金支出——已经被省略了。阿塔克和帕塞尔指出,以1860年的价格,这场战争的开销本可以将所有的奴隶从主人手中买下,并为每个奴隶家庭分配40英亩的土地和一只骡子,还将富余35亿美元用作“维修”——回溯工资。^⑤

这就是修正美国历史以去除奴隶制的成本。美国人永远不知道这是美德的代价还是罪恶的酬金。无论如何,南北战争都是历史的长期账单,总有一天会到期的。

2. 为南北战争筹集资金

在南北战争中,正如其他所有战争一样,用于购买物品和人力而实际花出去的所有钱,最后总有一个接收者。所以,当我们说战争对于参与者来说是庞大的支出时,也就意味着它是某些人的庞大收入来源。与军队订立合同的承包商,从农夫手中购买牛肉,再以可观的利润卖给军队,只要他的利润增长大于税收的增长,很显然会从战争中获得收益。一个在私人部门工作的人,出售商品给没有战争相关收入的人,他缴纳的税收用于战争的支出,却没有得到与战争相关的回报。对生命和财产的破坏,对于那些为之付钱

^③ Claudia Goldin and Frank Lewis, "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JEH*, June 1975. Goldin and Lewis also estimated the "indirect," long-term costs: how much did the Civil War extract from future income? 彼得·特明指出这些数字被四倍地高估了;见 Peter Temin, "The Post-Bellum Recovery of the South and the Cost of the Civil War," *JEH*, December 1976. 戈登、刘易斯和特明有一个关于战争成本的更进一步的转算,见 *see JEH*, June 1978, pp. 487—493.

^④ 戈登和刘易斯估计战争时期联邦部队新兵的创伤成本为365万美元;李估计战争时期健康损伤带来的损失为734万美元。Chulhee Lee, "Wealth Accumulation and the Health of Union Army Veterans, 1860—1870," *JEH*, June 2005.

^⑤ Jeremy Atack and Peter Passell, *A New Economic View of American Histor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94), pp. 360—363.

的人来说是净损失。如果一个城镇的面粉磨坊被毁坏,磨坊主失去了这个磨坊,而他的邻居也要蒙受损失,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替代的磨坊以碾磨他们的小麦,并为此支出寻找、交易和运输的成本。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这种损失必须从任何可能会获得的收益中扣除——正如第三方损失的外部不经济性一样。

2.1 税收和通货膨胀

为战争筹集资金意味着征用资源。除了遗产税和财产税,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向死去的人收取费用。而现有的人口可以直接收税,也可以间接收税。直接税包括销售税、收入税之类,间接税包括因为通货膨胀导致的更多税收,而当防御支出远远超出赋税收入时,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政府通过新印刷钞票为额外的支出“付款”,事情就更会如此。另一种办法是政府通过增加净负债向未来的人口筹措资金,即增加国债。无论哪种情况,政府买到了想要的东西,而人们必须凑合着用剩下更少的资源。货币的购买力下降了。结果,政府需要印刷越来越多的新钞票以购买一定量的物品。这就是通货膨胀。南北双方的政府都尝试过这种收税方法——几乎所有的政府在为战争筹集资金时都这么做过。

2.2 北方的经济

当南北战争爆发时,双方对接下来事态的严重程度都估计不足。用现在的眼光去看,无论南方北方,当时所设计的税收计划都远远不足以支付战争的支出。结果就是举债和多造货币以支付更多士兵和装备的费用。通货膨胀和向未来举债是必不可少的。比较 1860 年和 1865 年的联邦预算结果,如表 13.1 所示。

表 13.1 1860—1865 年联邦政府的预算与负债

年	收入	支出	盈余(+)/ 赤字(-)	互相抵消的债务
1860	\$56.1	\$63.1	\$ - 7.0	\$64.8
1865	333.7	1 297.6	- 963.9	2 677.9
1865 1860	5.9	20.6	137.7	41.3

注:单位为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来自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Ea 584—587。

1865 年的支出是 1860 年水平的 20 多倍。尽管已经在任何能够想象到的事情上都加征了税收——包括略有累积性的收入税、加收的关税、消费税、对经商的联邦执照要求增加,甚至有威士忌税和啤酒税——1865 年的联邦政府通过税收获得的财政收入只比 1860 年增加了 5.9 倍。于是,赤字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增长,总负债在五年内增长了 41 倍。联邦政府竟然可以应付以这种强度快速增长的金融需求,简直令人惊奇。萨蒙·P. 蔡斯,林肯的财政部长,因其财政方案受到了历史学家的许多批评。他的方案包括:向金融家杰伊·库克“转让”债券销售,暂停金属币的支付,印刷联邦法定货币(美元纸币,通常称为绿背美钞)。另外,1864 年创建了国家银行系统(National Banking System),并强行把庞

大的债券发行更多地纳入国家金融系统,从而正式地对私人银行系统进行调控以适应战争。然而,一个多世纪之后(又经历了几场战争),现在我们来回顾的话,蔡斯和他的同事其实做得相当不错。

联邦政府从经济中榨取所需的资源,它采取的手段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1861年12月政府暂停金属币支付,1864年发行了4.15亿绿背美钞,1865年又发行了1.46亿国家银行纸币(以政府公债作为主要保证金),货币供给从1860年的4.42亿美元上升到了1965年的11.8亿美元。物价上涨的幅度低于这个比例。(参见表13.2)。

表 13.2 1860、1865 和 1869 年的货币与价格

年份	物价指数——联邦方面		
	货币存量	批发价格	生活成本
1860	100	100	100
1865	267	199	175
1869	198	162	147

注:单位是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Derived from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c 49, 113;

1860年,美国仍然处于1857年恐慌的余波之中,有一定的失业率,货币供应的增长有可能被真实物品与服务的可观增长抵消掉。然而,只要货币存量增长,价格就随之上升,货币存量下降,价格就随之下跌,尽管比例并不是完全相同。而且,正如斯坦利·恩格曼指出的那样(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述),政府对于其他物资与服务的需求增长率下降,抵消了对于特定军事物资与服务的需求增长。这样,在联邦这方面,通货膨胀得到了惊人的抑制,尤其是考虑到来自债务增长的货币供应的可能增长量(参见表13.1)。在自由市场上,绿背美钞的与黄金的贴现率最多达到了65%,而战争结束后又回到原来的水平。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物价以极度惊人的比例上升(如1923年的德国,物价是1914年的数十亿倍)——并没有发生。

2.3 南方

对南方来说,他们的金融情况要困难得多,最后终于还是陷入了灾难性的恶性通货膨胀之中。^⑥ 联邦政府成功地提高了税收,可以支付战争支出的20%以上,然而位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南方政府,因为其港口遭到北方的封锁,而战火又主要在南方的土地上肆虐,他们通过税收筹措的资金只能支持战争支出的12%。^⑦ 当战争结束时,南方的债务

⑥ 对于联邦金融历史的脚注:在1979年,据报道劫后余生的联邦美元以1:8的比例卖给了美联储,一些人开玩笑说这是因为1865年之后联邦财政部采取的保守的货币供应政策。

⑦ 关于封锁及其影响,见David G. Surdam, *Northern Naval Superiority and the Economics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2001)。

总额超过了20亿美元。^⑧ 物价上涨了92倍。^⑨ 南方的财政官员因为忽略而没有规定纸币是法定货币——这是一个重要的管理错误——当南方在军事上失利之后,货币也就变得一文不值。根据尤金·勒纳(Eugene Lerner)的计算,战争结束前,南方纸币与黄金的比价已经下跌到近1/1000。^⑩ 南方金融的崩溃也许比军事上的溃败还要糟糕。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为战场上的军队谈判。而南方的财务状况是不可能谈判的。^⑪ 南方金融资产的持有者,其资产全部化为乌有。胜利的联邦国会完全没有任何赎回“叛变”一方货币与债券的打算。^⑫

2.4 真实负担

经济史学家一直疑惑于谁为南北战争买单。死者、南方金融资产的持有者、那些庄稼和农场牲畜被扣押的人、那些家园被破坏的人,当然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奴隶主失去了他们的财产,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对北方来说呢? 花费的数十亿美元成为某些人的收入,但不是所有的人,更不是按照相等的比例获得了这些收入。

刚才提到的绿背美钞对黄金的贬值也可以反映出外汇价格的上升。大多数情况下,美国人要为进口商品付出额外费用。一些学者认为由此导致的购买力下降是南北战争带来的真实负担的一个重要部分。表13.3列出了可用的相关国际收支余额资料。

表 13.3 1856—1870 年的美国贸易,五年平均

时期	商品和服务		
	出口	进口	余额
1856—1860	356.0	344.6	11.4
1861—1865	269.0	282.0	-13.0
1866—1870	409.6	439.2	-29.6

注:单位是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Ee 1—3.

⑧ Marc Weidenmier, "The Market for Confederate War Bonds," *EEH*, January 2000, 表明一项和法国公司埃米尔·埃兰格的联邦债券可以用棉花偿还。

⑨ Richard Burdekin and Farrokh Langdana, "War Finance in the Southern Confederacy, 1861—1865,"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0, no. 3, July 1993, 指出联邦债务和纸币问题的决定是受国家预算驱使的,但通货膨胀率由“新闻”驱使。Marc Weidenmier, "Turning Points in the U.S. Civil War: Views from the Grayback Market,"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68, no. 4, April 2002, 指出“新闻”对南北的影响是不对称的。他关于黄金美元的联邦美元价格的新的系列报道表明增长了60倍。Richard Burdekin and Marc Weidenmier, "Suppressing Asset Price Inflation: The Confederate Experience, 1861—1865," *Economic Inquiry*, vol. 41, no. 3, July 2003, 试图解释两个数据的差异。他们讨论了在某个特定时期前批准债券的货币交换的三种货币改革。在那些日期之后,债务人只能将他们的钱交换成低产出的债券,如果他们被允许将它们全部交换。这个改革在早期的1863年和1864年导致了商品到货币价格率的剧增,因为联邦民众花费了他们的货币余额,在债券到期前购买了商品。

⑩ Eugene Lerner, "Money, Wages and Prices in the Confederac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3, no. 1, February 1955.

⑪ 关于内战财政的简明调查,见 Paul Studenski and Herman Krooss,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cGraw-Hill, 1952), pp. 137—160. 联邦货币的惨败中的例外是在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堪萨斯州的私人战争时期钱币问题上,比联邦货币贬值的更少。Gary Pecquet, "Money in the Trans-Mississippi Confederacy and the Confederate Currency Reform Act of 1864," *EEH*, April 1987.

⑫ 放任它表明,在1945年之后,德国有了一个和美国的更有利的合约,在债券上以100比1的比率,在货币上以10比1的比率交换12年“千年德意志”的财政估价和战后货币。

表 13.3 列出的是道格拉斯·诺斯所估计的对外商品与服务交易的五年平均数值。很显然,战争导致出口额大幅下降。进口额也有所下降,但幅度较小。进口商品的价格则有所上升,因为绿背美钞对黄金的价格下降了。凯塞尔和阿尔奇安估计,战争期间通货膨胀时的实际收入滞后中多达 40% 来自于这个原因。^⑬ 如果他们是正确的,那我们必须把战后数年的国际交易也作为战争负担的一部分。注意战后的首个五年中,贸易差额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从 1865 年到 1866 年,美国的价格立即下跌了,而外国的价格一般直到 1873 年才下降。随着战后美元对黄金价格的上升,部分由于外国投资在北部和西部的扩大,美国的棉花市场,即使国内价格较低,也必然受到了负面影响。^⑭ 总而言之,南方受到了不成比例的损害。

在相对价格和汇率问题上,美国人在 1866—1870 年的情况和 1861—1865 年的情况一样糟糕。赤字更大,贸易逆差更大,利率的真实负担也更大,因为国内价格下降了。1866—1870 年明显是一个恢复和经济扩张的时期。内部经济扩张而贸易逆差增大,这当然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它确实使得有关战争真实负担的国际收支余额问题比原先所想的更加复杂。

另一个老问题来自威斯利·克莱尔·米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的早期工作,又获得了斯蒂芬·迪卡尼奥(Stephen DeCanio)和乔尔·莫克里的进一步支持,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工资总是落后于通货膨胀水平,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是下降的,他们直接承担了战争成本的重要一部分。^⑮ 整整 2/3 的实际工资下降是由货币扩张导致的价格上升引起的。

此外,美国财政部战后在减少债务方面的政策颇为保守(参见表 13.1),采取递减税制(向穷人征税,付给富人),加重了工作并纳税者的真实负担。用通货膨胀时期的绿背美钞购买的公债,战后被如数偿还,而此时美元的真实价值(也就是购买力)已经提高了许多,可以购买更多国内生产的商品。在南方,这场战争被称为“富人的战争,穷人的战斗”。^⑯ 在北方,被征召入伍者实际上可以雇用穷人代替他们入伍,也确实有许多人这么做了。就像在大部分战争中一样,那些没能避开战斗的人和那些纳税者承担了全部成本。其他人在大后方则过得很好。那些收入和财产增长比通货膨胀还要快的人过得尤其好。

^⑬ Reuben Kessel and Armen Alchian, "Real Wages in the North During the Civil War: Mitchell's Data Reinterpreted,"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 October 1959.

^⑭ Mark Aldrich,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Northern Expansion, and the Market for Southern Cotton: 1866—1879,"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3, no. 2, June 1973.

^⑮ Stephen DeCanio and Joel Mokyr, "Inflation and Wage Lag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EEH*, October 1977.

^⑯ 斯坦利·莱博高特指出南方的棉花种植者在农场种植棉花,持有和“整个联邦部队”同等的人力,各自呆在农场。Stanley Lebergott, "Through the Blockade: The Profitability and Extent of Cotton Smuggling, 1861—1865," *JEH*, December 1981. 约翰·詹姆斯总结,偿还战后的债务显著提高了私有领域的资金增长率。债务偿还政策实际上通过广泛地取自税收,转付给小部分的股东,而使资金流转。詹姆斯将这个过程叫做“挤入”效应。通过提高私有领域(以前的股东如今只能投资私有领域)的投资,它使得南北战争之后的经济增长率得以提高。John James, "Public Debt Policy and Nineteenth Century Economic Growth," *EEH*, April 1984, p. 210.

3. 这场战争推动了工业化吗？

老一辈的历史学家在南北战争中就看出了在19世纪最后25年席卷美国的工业化大浪潮的源头。那个时期的许多重要企业家和金融家,比如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和皮尔庞特·摩根(Pierpont Morgan),在战争时期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入(但是和他们之后的收入完全不能相比)。这些历史学家相信,战争必然大幅度增加了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所有这些军鞋、枪炮、制服、货车以及食物。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农业美国似乎瞬息之间就奔入了工业化之路。它只用一代人的时间就完成了。马修·约瑟夫逊(Matthew Josephson)之类探听丑闻的人,认为在19世纪晚期暴发户(通过金融和工业致富者)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美德或荣耀可言,美国的工业化应该肇始于如此肮脏、悲惨的南北战争的这种说法会让他们特别有动力。^{①⑦}甚至在诗歌中,例如在斯蒂芬·文森特·班奈特(Stephen Vincent Benet)的《约翰·布朗的身体》(*John Brown's Body*)中,正是工厂和工人的世界击退了南方骑兵汹涌而来的兵刃。

3.1 传统和恩格曼

在美国史学家中,提出南北战争和工业化浪潮之间的联系,最常见的是归因于查尔斯·A. 比尔德和路易斯·哈克。^{①⑧}所谓的比尔德-哈克论文是一个极好且易受攻击的靶子。比尔德和哈克的论文写于20世纪20、30年代,刚刚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经济增长,与班奈特诗句中“工业北方”观点相同,他们认为南北战争刺激了工业发展,尽管他们缺乏可靠的资料。问题在于,这场战争是在美国土地上打的,还让数以百万计的人离开了生产岗位。例如,1865年联邦军队有一百多万武装军人,几乎占符合兵役年龄的男性总人口的20%。这场战争实际上吸干了美国。正如斯坦利·恩格曼所表明的那样,这场战争使美国经济陷于停滞。

比尔德-哈克论文中假定的战争收益,恩格曼没有发现什么迹象。罗伯特·盖尔曼的商品总产量数字表明,在1840—1860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4.6%,在1860—1870年间,增长率则降为2%,在接下来的1870—1900年间,又恢复到4.4%。^{①⑨}恩格曼就此说:“在19世纪中,60年代是唯一一个年均增长率较低的年代。”^{②⑩}通过这些指标,似乎表明这场战争使得美国的增长停滞了五年。在1850—1860年间,人均的真实增长可能是每年1.5%。战争使得这个比率大幅下跌。在人均水平上,“非南方”地区在19世纪60年代的年均增长低于1%。

^{①⑦} Matthew Josephson, *The Robber Bar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4).

^{①⑧} Charles Beard and Mary 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1930); and Louis Hacker, *The Triumph of American Capitalism* (1940). 25年之后,哈克更强调共和党的法官解释法律的方式。See Louis Hacker, *The World of Andrew Carnegie, 1865—1901*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68).

^{①⑨} Stanley Engerma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Civil War,” reprinted in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e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所引用的盖尔曼的数据在 p. 371.

^{②⑩} *Ibid.*, p. 371, no. 1.

南方的产量当然绝对下降了。实际上,按照恩格曼的观点,战后恢复的增长率在某程度上只是在“弥补损失”。至于南方,恩格曼写道:

在南方,战争的破坏效果被最深刻地体会到。人均商品产量在战争的那个十年内下跌了39%,直到1880年,仍然比1860年的水平还低21%。^②

他估计,如果南方维持了其战前的人均增长率,1870年的水平应该是其实际水平的两倍。埃德温·弗里奇(Edwin Frickey)的工业产品指数在1860—1865年间只增长了6%,但是在1865—1870年却拥有了47%的强健增长率。^③再看固定资本的数据,在19世纪50年代的年增长率为8.5%,而在19世纪60年代还不到原先的一半(4.1%)。^④

3.2 战争工业本身

如果把寻找收益的范围缩小到“战争工业”本身,我们发现,除了毛制品(数以百万计的制服)之外,19世纪60年代是一个萎靡不振的时期。从1855年到1865年,马萨诸塞州的鞋类行业中,产品产量下跌了约30%,就业率也情况类似。农场产量略有提升。当战争爆发时,这个国家的食物非常充足。在北方,尽管食物价格上升了,但产量增长甚微。例如,小麦面粉的产量在1861年是4077美吨,在1865年是4165美吨。^⑤在1864年的收获季节之后,塞勒斯·麦考密克未卖出的收割机存量是其销售额的40%。用于枪炮的铁实际上在年均铁销售额中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1%),而铁路修建,自从1857年商业危机以来已经有所下降,在战争时期更是跌幅惨重(参见图13.1)。

南方的情况更加惨重。退出全国市场的行为无疑更是雪上加霜。它对于地区性贸易的影响,可以从一个标准消费品:咖啡的进口数量变化中看出来。咖啡进口量在1860年是1.8亿英磅,年人均量约为11英磅。在1862年,这个数字很顺应时势地下降了一半,跌到了0.94亿英磅。咖啡是著名的前线交易品之一,穿蓝衣服的人(北方军人)用咖啡跟穿灰衣服的人(南方军人)交换烟草。到1870年咖啡进口量恢复到了2.72亿英磅,年人均约为6.8英磅,约为今天数量的3/4。^⑥因为南方的缺席,所有非本地的交易肯定都受到了严重的束缚——缺少了南方赚取外汇的能力,缺少了南方的市场。

3.3 真实工资与利润

恩格曼与这种观点进行了争论:真实工资下降必然意味着经济生活中的另一些部门真实收入上升——即剩余索取者假说(residual claimant hypothesis)。^⑦他指出,很明显存在无人获益的可能,即收入份额保持不变,但收入的真实增长总体上下降了。

^② Stanley Engerma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Civil War," reprinted in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e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所引用的盖尔曼的数据在 p. 373.

^③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series Da 497.

^④ Engerman (1971), p. 374.

^⑤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d 368.

^⑥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d 843.

^⑦ Engerman (1971), p. 3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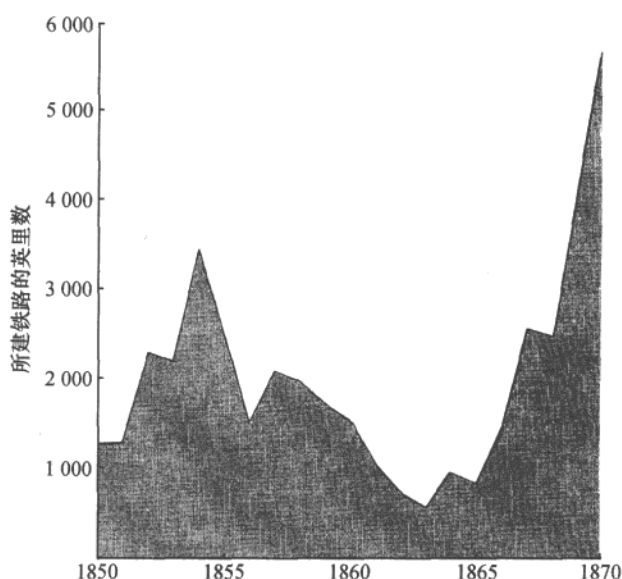


图 13.1 1850—1870 年铁路建设里程

铁路的修建自1854年之后呈下降态势（尽管在1857年暂时恢复了一些），在南北战争的初期更以更大的幅度下跌。横贯大陆的铁路时代开始于战争结束之后，统计的“新建铁路里程”进入了大发展时期，直到1873年恐慌给经济带来重创。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f 882.

这里凯塞尔和阿尔奇安的论述最为有效。战争期间美国贸易价格比率（出口价格/进口价格）的变化可能降低了工资、利润、利率、租金等所有东西的真实水平。如果美国用1蒲式耳的小麦换取8件英国的衬衫，然后其出口价格（它的货币价格）相对于英镑下降了25%，用1蒲式耳的小麦就只能换取6件衬衫了。无论收入是如何分配的，每个人都会从这1蒲式耳小麦少换的2件衬衫中受损。实际上，爱德华·巴德（Edward Budd）估计的收入分配表明，在战争期间，劳工的收入份额还略有上升。^② 因此，明显较弱的现有证据不能支持剩余索取者假说。

3.4 战时经济法规

恩格曼还检查了主要的战时经济法规，它们并不一定是暂时的——这些法规是在南方众议员和参议员缺席的情况下制定的。某些历史学家从那些法规里看出较有利于工业而不利于农业的倾向（还是比尔德-哈克论文）。这种解释听上去不错，但并不符合事实。当时通过的主要法律是《国家银行法》《宅地法》《莫里尔法案》（the Morrill Act）《莫里尔关税》和《太平洋铁路法案》。除了《莫里尔关税》之外，这些法律严格地说并没有产生促进工业的结果，反而事实上是满足了旧的农业需求。《莫里尔关税》则与其说是促进北方资本主义的增强的手段，不如说是增加联邦财政收入的一种办法。

然而，杰夫里·威廉姆森（Jeffrey Williamson）认为，联邦债务融资能力的改善，增强

^② Cited in Engerman (1971), p. 376.

了国家在战后建立真正资本结构的能力。^②从战后的财政收入中支付的利息与偿还的债务,在1866—1872年间,每年使得约1%的国民生产总值可用于私人资本的形成,在1872—1878年间,这个比例为0.8%。政府通过其财政政策,扮演了资本动员机器的角色。

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南北战争解放奴隶的事实使得其牺牲被神圣化了。我们并不质疑他们的自由。但是1860年的美国人却对这一点存有质疑,所以我们应当考虑南北战争的经济成本。这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伟大的过去,而且还带来了一系列后果。^③

4. 战后南北方恢复情况的比较

在1860—1870年间,美国人口增长了840万,近1/4。仅东北部地区和西北部地区的各州就贡献了380万,也就是新增人口数的45%。南方各州仅增加了110万人口,比其在1860年增长了10%,仅占全国新增人口的13%。然而在战前,正如我们所见,南方人口几乎和中西部地区增长得一样快。这些数据反映出打击南方的一系列影响,然而它们也体现出了一个困扰整个国家战后数十年的令人伤心的问题。

随着基于奴隶的种植业系统的消失,南方农业的活力似乎也消失了。在之后的一个世纪,南方几乎在社会经济福利的任何一个方面都落后于美国的其他地区。^④为防误解,有一个说明值得注意:杰伊·曼德尔(Jay Mandle)强调,在南方内部,那些受到奴隶制影响最少的州、那些棉花种植较少的州,在战后时期获得了最好的增长和发展。^⑤

4.1 实物增长的衡量

在南方,人均商品产量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下跌。在1860年,南方实际上领先于非南方,南方是78美元,非南方是75美元。在1870年,南方落后了,数字是48美元比82美元。甚至到了1880年,数字是62美元比106美元,南方还是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而美国其他地区的人均商品产量已经比战前提高了41%。在1871—1879年间,全国作为整体,人均GNP的增长范围在每年4.4%到5.2之间,但是同时期南方的农作物总产量每年增长率还不到2%。^⑥表13.4列出了换算成1860年指数的商品总产量。

^② Jeffrey Williamson, "Watersheds and Turning Points: Conjectures on the Long-Term Impact of Civil War Financing," *JEH*, September 1974.

^③ 关于内战的经济影响的量化的研究的调查可以参见 Patrick O'Brie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88)。

^④ James Irwin, "Explaining the Decline in Southern per Capita Output After Emancipation," *EEH*, July 1994, argues that the decrease in Southern production has more to do with loss of the plantation system than with freeing the slaves.

^⑤ Jay Mandle, "The Plantation States as a Sub-Region of the Post-Bellum South," *JEH*, September 1974. 种植棉花的州有阿拉巴马州、阿肯萨斯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以及南卡罗来纳州。曼德尔指出“机构和种植业联系的可能性也许是增长的阻滞”作为一个一般性的可能,在任意的空间或时间(pp.737—738)。

^⑥ Engerman (1971), pp. 371—372.

表 13.4 1860—1880 年按地区和产业部门划分的商品产出

年份	总量	采矿业 和农业	制造业
非南方地区			
1860	100	100	100
1870	140	146	133
1880	332	218	215
南方			
1860	100	100	100
1870	75	75	80
1880	118	115	141

注：单位是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计算来自 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The Economic Impact to the Civil War," reprinted in 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e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p. 371。

这些指标明显表现出南方未能恢复元气。即使在 1880 年,当非南方地区的工农业部门产量已经比 1860 年翻了一番,南方的农业产量仅增长了 15 个百分点,工业仅有 41 个百分点。看看这些数字,我们正在研究的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失败。

4.2 战时的破坏

最近的研究已经较为清楚地表明了与战争相关的破坏问题,有一些研究得出了非常令人惊奇的结论。按照常识寻找南方战后落后的原因,应该是战时对生命、财产、动物、建筑等实体的破坏,以及对金融、商业等功能组织网络的破坏,诸如此类。这些确实是沉重的损失。詹姆斯·塞勒斯(James Sellers)估计,因为这场战争,南方财产的总货币价值降低了 30%。南方损失了 20% 的羊,30% 的骡子,32% 的马,35% 的牛,42% 的猪。农场不动产的价值下跌了 50%。^③ 这些损失的比例都是灾难性的。除非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仅仅恢复牲口数目就得花上一些年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一个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对南方却没有类似的计划。

此外,这个地区的金融结构也被南方政府的财政灾难摧毁了。南方各州银行的平均规模在战前比北方的要大,战后消失了 9/10。^④ 旧的劳动力组织形式当然被废除了。要如何去耕种? 没有人知道。随着和平到来的是巨大的重建任务,这与德国和日本在 1945 年面临的情况一样。^⑤ 区别在于,1950 年联邦德国已经恢复了 1938 年的真实产量水平。而我们已经看到,南方直到 1880 年仍然没有真正恢复 1860 年的人均产量水平。是哪里出了问题?

^③ James Sellers, "The Economic Incidence of the Civil War in the South,"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September 1927.

^④ Roger Ransom and Richard Sutch, *One Kind of Freedom: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mancipation* (1977), pp. 108—109.

^⑤ Jonathan Hughes,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History: Theses and Conjecture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1), p. 269.

4.3 棉花

一个问题是,在南方恢复生产时,原棉价格长期下跌。棉花价格在1860年是非常高的。问题在于产量。南方的棉花产量规模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才达到50年代末期的水平。但是那时的价格却低于50年代的水平,更远远低于战时和战争刚结束时的水平。1689年,平均每磅棉花仍可以卖到16.5美分(1865年曾经达到43.2美分)。到70年代晚期,价格又下降了一半,在那个世纪余下的二十多年里,一般维持在每磅8到9美分左右。^⑤ 罗杰·兰森(Roger Ransom)和理查德·萨奇(Richard Sutch)的研究表明,在农产品价格普遍下跌的时期,棉花价格的总体下跌比其他物品下跌得更为严重。^⑥ 如果想在这样的市场中获得利益,生产者的效率必须有突飞猛进的增长。而这在战后时期并未立即到来。因此,“棉花大王”(King Cotton)不再是可靠的利益来源了。

尽管如此,棉花仍旧是南方主要的经济作物,生产者竭尽全力增加其总产量。正如加文·赖特所强调的,为了让每个农场产出更多的棉花,战前自给自足式的棉花文化被放弃了。^⑦ 随着经济作物棉花的价格下降,种植者们越来越多地需要购买食物和补给,并且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处在艰苦的条件下。南方与棉花相联系的贫穷,现在成为南方的一个固定特色。而在战前,棉花曾经意味着富裕。1866年,棉花种植面积为770万英亩,在1870年,超过了900万英亩。到1875年,这个数字超过了1100万英亩,但1875年的收成为460万包,很可能却小于1859年的收成。^⑧ 每英亩单位产量严重下降了。为什么?

4.4 没有补偿的奴隶解放

南方的奴隶制植根于对黑人劳工的压迫,经过两个半世纪的演化,已经发展为一种由原棉市场所滋润的、强大的经济扩张机器。当这个机器被军事挫败和奴隶解放打破时,也给南方开放了许多重新组织经济生活的可能。尽管在战后南方有所发展,黑人也获得了可观的利益,但当时所选的制度却限制了增长。

正如在磁铁作用下的铁屑一样,一个新的模式形成了,然而很不幸的是,那个模式意味着相对较低的生产力、贫穷、社会落后。在研究战后南方社会剧烈转型的著作《自由的一种》(*One Kind of Freedom*)中,罗杰·兰森和理查德·萨奇认为,这种磁力就是种族主义。“黑人应该安分守己”的思想,让19世纪后期的美国经济在资本主义的动态模子里保留了一个落后农业的巨大孤岛。当北部和西部的各州创造出了诸如美国钢铁公司、通用电气、标准石油公司这类企业——这是世界经济史上利用金融整合实现经济增长和变化的独特现象——的时候,农业南方却发展出了一种相对贫穷的模式。

在战前,“买光奴隶”的思想着重于补偿奴隶主失去其人力财产的损失。战争结束了

^⑤ Ransom and Sutch (1977), pp. 326—327, n. 30;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a 757.

^⑥ Ransom and Sutch (1977), p. 192.

^⑦ Gavin Wrigh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tton South* (1978). 赖特认为在消耗其他作物的同时积累棉花使得价格的下跌——保持现金收入的一种努力。兰森和萨奇有更常见的解释。

^⑧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a 755—756; 两个年份间的资源差异使得肯定这一点变得不可能。

这种办法。奴隶们获得了无条件的释放,他们的权利由宪法修正案所确立。南方的奴隶主不得不由个人来承担这种经济损失,据估计约有16亿美元(按1860年的奴隶价格计算),占南方总财产损失的四成。^④

像奴隶主一样,奴隶也没有得到补偿——他们及其祖先几百年来所受到的压迫都没有得到补偿。兰森和萨奇估计,剥削率(奴隶“工资”低于其劳动的市场价格的部分)约为54%。^⑤整个国家都曾从奴隶的劳动中受益,但这债务却无人偿还。黑人被扔在市场经济中自寻出路。没有财产、没有金钱、没有技能(在1870年,90%以上的黑人只能做劳工),没有哪怕最基本的经济生活决策经验(例如为自己的劳动讨价还价),他们对新生活毫无准备,现在只能自谋生路。^⑥1870年,20岁以上的黑人男性中有90%是文盲(与此相比,相同年龄段的南方贫穷白人中只有20%的文盲率)。^⑦

在战争末期,南方各州没有一个拥有遍及全州的公共教育体系。胜利的联邦国会腐败无能,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善这种情况。对南方白人来说,和平生活以毁灭、贫穷和失败开始。对黑人来说,和平生活以一无所有开始。他们自由了,但没有财产、技能,也没有受到教育。

4.5 南方黑人在和平时期的发展

这幅悲惨的画面有点言过其实。对南方黑人来说,拥有自由,是他们获得和美国白人平等地位的第一步,而这一过程要持续许多代人,至今仍没有完全实现。^⑧重点在于,事情是在往好的方面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南方黑人的经济状况比白人提高得迅速,当然,考虑到他们起点之低,这种状况也在意料之中。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从佐治亚州审计长报告中筛选数据,得出报告称,到1880年,南方黑人共累积了价值580万美元的财产,人均约8美元。在随后的30年中,据估算,黑人的财产价值增长了约3.3倍,而白人仅增长了1.4倍。^⑨据希格斯计算,从南北战争结束到1900年间,黑人人均收入水平翻了一番还多。^⑩

对此现象的一个解释是,黑人的识字率快速上升了。随着识字而来的是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刚获得解放时,大部分黑人缺乏成为合格农民的能力和经验。识字率的上升反映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倾向。罗伯特·马戈在对南方教育的研究中指出,1880年,超过3/4的黑人是文盲,而白人的文盲率只有1/5。20年后,超过一半的南方黑人被报告为识字,而此时白人识字率为7/8。从1880年开始,每一代黑人儿童都比上一代拥有更高的

^④ Sellers (1927).

^⑤ Ransom and Sutch (1977), p. 212. 从相反的角度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vol. 1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估计“奴隶创造的收入价值的12%被奴隶主剥夺”(p. 153)。

^⑥ Ransom and Sutch (1977), p. 31.

^⑦ *Ibid.*, p. 30.

^⑧ See Michelle Connolly,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 in the Postbellum South: A Separate but Unequal Story,” *JEH*, June 2004.

^⑨ Robert Higgs, “Accumulation of Property by Southern Blacks Before World War I,” *AER*, September 1982. Robert Margo, “Accumulation of Property by Southern Blacks Before World War I: Comment and Further Evidence,” *AER*, September 1984, 根据五个另外的州的数据证实了希格斯的发现。这篇文章附了希格斯的一个答复。

^⑩ 这是中级的估计,报告参见 Robert Higgs, *Competition and Coercion* (1977), p. 102.

入学率,因此识字率也更高。在世纪之交,南方的学校是“隔离而平等”的。这一状态在20世纪早期遭到了恶化,因为白人开始要求更多的教育资源,而黑人则被剥夺了权利。尽管如此,马戈估计,到1950年,黑人的识字率已达到了90%。^{④7}正如希格斯所评论:

也许人们之所以普遍未能认识到在获得自由的头半个世纪里的真正经济收益,是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些阻碍黑人获得更大发展的障碍之上,而没有顾及及其他。……列出阻碍更快速发展的主要障碍,就是辨识出那些本以为只是尚未完成的重要成分。^{④8}

另一个因素是移民,黑人对各州之间农业生产力的不同作出了反应。黑人向西迁移,进入了阿肯色、俄克拉荷马和得克萨斯。许多人希望得到一个自己的农场,不管是自己所有还是租赁下来。另一些人希望在西南部新兴的城市中心寻找机会。

4.6 劳动力与分成制耕种

最开始的问题是决定如何处理土地。无论南方是否战败,它总还是美国经济的一部分。因为南方经济以农业为主,耕作必然是初期的基础。正如以前一样,使用土地的权力来自于所有权或由所有权所派生出来的使用权:租赁(lease)、租借(rental)或分成制耕种。

土地仍然属于那些其所有权来自战前土地所有权的人。黑人需要为他人工作,至少最开始是这样。人们尝试了多种方案:按月工资、包食宿的工资。一个政府的代理机构,“自由民局”(Freedmen's Bureau),尝试设定最低工资为每月8至10美元。(自由民1865年在佐治亚州开出过低达每月2美元的要求。)当然,人们没有找到统一的工资支付方案。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工资部分地是由所涉及土地的生产力决定的。工资很自然地会因地点、情况的不同而不同。不可能有统一的规定。

在这个时刻,南方(以及一些之后的历史学家)本应该认识到奴隶制下强制所发挥的作用。强制意味着比“自由市场”情况下每天工作更多的时间、工作更多的天数、更多的人共同劳动。一旦获得了自由,曾经的奴隶现在也和白人一样拥有了工作/休息的选择权。妇女和儿童离开了田地,男人也倾向于更少的工作时间,用休闲换取赚钱。这里便产生了对立的种族主义谜团:自由民是懒惰的!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他们不会再像奴隶一样工作,因为他们现在可以在工作和休息之间自由地选择。额外的工作日、额外的工作时间、额外的艰苦劳动,是强制劳动才造就了原先奴隶制可观的人均生产率。^{④9}

因此,奴隶解放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力“短缺”,尽管这本是意图之中的短缺。既然劳作者不会再像奴隶制下被强制的那样做额外的工作,南方五大棉花种植州的人均产量都比战前水平下跌了,并且在19世纪的余下几十年里再也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1900年时是1859年水平的69%,在之前的年份里甚至更低。^{⑤0}正如兰森和萨奇所指出

^{④7} Robert Margo, *Race and Schooling in the South, 1880—1950: An Economic History* (1990), pp. 8 and 130.

^{④8} Higgs (1977), p. 123.

^{④9} Robert Margo, “The North-South Wage Gap, Before and After the Civil Wa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8778, February 2002, 指出相对于北方,南大西洋和南方的中心州的工资下降得很快,并且呈现出与南方农业的人力产量的下降相联系。

^{⑤0} Ransom and Sutch (1977), table F.2, pp. 258—259.

的,黑人劳动力的潜在投入撤出了约1/3,这使得战时许多牲畜、器具、建筑的损失显得不太重要了。^⑤ 因为劳动力不足,这些东西本来也不能派上用场。然而,即使自由民比以前工作更少,他们的真实生活标准不管在任何方面都比当奴隶时大为提高了。^⑥ 兰森和萨奇引用的一份1866年4月的出版物带着压抑的怒火指出:“大部分田地里的的工作现在是由男人来完成,妇女们认为她们的丈夫有责任供养无所事事的她们。”^⑦

在尝试开始雇用工作,甚至试图恢复集体劳作等多种方法大多都未收到良好效果的情况下,南方只能轮流尝试其他将人手投入工作的办法:所有权和各种形式的租用,包括分成耕种制(*sharecropping*)。^⑧ 正如希格斯所指出的:“支付工资被证明是让雇主和雇员都不满意的办法。”^⑨ 种植园主习惯了其对奴隶的要求,抱怨自由民逃避劳动。而自由民则抱怨种植园主在工资合同上捣鬼。

土地的所有权仍然是高度集中的,但是老的种植园土地如今大部分都被分成了数以千计的家庭规模的农场。^⑩ 总体而言,自由民缺乏购买设备和牲畜的资源,最初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供利用的东西。在经过多次试验后,分成耕种制多少形成了一个标准协议:庄稼收成五五分成,土地拥有者为农场、房屋提供器材、种子、设备以及当年的口粮。自由民自己提供自身和家人所需的物品。这份合约几乎都是每年重新签订。^⑪ 1860年,在所有的熟地(*improved land*)中,超过80%属于100英亩或更大的农场。到1870年,近40%的农场小于100英亩;73%的土地属于20%最富有的人。在1860年这个数字是75.1%。^⑫ 因此,无论这场战争使得个体土地拥有者的境遇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都几乎没有起到土地所有权“民主化”的作用。到1880年,在南方棉花种植区,69.5%的农场由白人经营,30.5%由黑人经营(参见图13.2)。1880年雇用佃农的土地拥有者平均雇用4.7个。一些老的种植园通过佃农和雇用劳动力保持结成一体,1880年它们仍然产出了棉花总产量的14%。^⑬

黑人占南方总人口的一半,很可能占农业劳动力的70%以上。到1880年,黑人经营的30.5%的土地中,32.1%为黑人所有。因此,他们拥有1880年南方棉花种植区被耕种土地的9.8%。如果我们考虑1865年的情况,到1880年已经有这么多土地为黑人所有,实在是令人惊叹的。不仅是因为土地昂贵,而且因为当时对黑人持有土地存在广泛的阻力,有时甚至是暴力。^⑭ 注意,在图13.2中,被出租的土地里,租借和分成制耕种的比例

^⑤ 他们的估计从28.3%到37.2%,因为黑人劳动力的数量“撤出”自由市场。Ransom and Sutch (1977), p. 45; 关于南方资产储蓄的损失的不相关性的论据, p. 47。

^⑥ Ransom and Sutch (1977), pp. 6—7.

^⑦ Cited in Ransom and Sutch (1977), p. 45.

^⑧ 杰拉德·大卫·杰尼斯提供了一个对黑人分成制耕种的出现的有趣解释。奴隶资产通过解放运动转变成了前奴隶。它不再是前奴隶主的信用附属品。黑人分成制耕种,要求黑人劳动力输出的承诺信用,如今使用这个资产作为他自己的附属品。Gerald Jaynes, *Branches Without Roots: Genesis of the Black Working Class in the American South* (1986)。

^⑨ Higgs (1977), p. 45.

^⑩ Ransom and Sutch (1977), pp. 78—87.

^⑪ *Ibid.*, pp. 89—105, 关于分成制耕种,附有合约的例子。

^⑫ *Ibid.*, pp. 71 and 79.

^⑬ Nancy Virts, “Estima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Plantation System to Southern Agriculture in 1880,” *JEH*, December 1987.

^⑭ Ransom and Sutch (1977), pp. 8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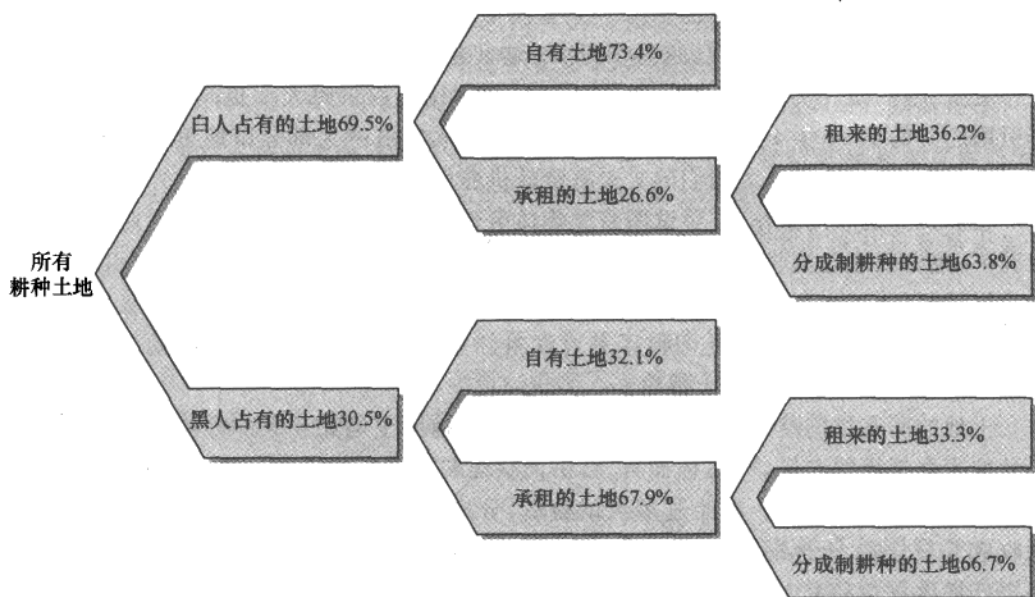


图 13.2 南方棉花:1880 年所有耕种和使用的土地

在南方出租的土地中,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经营,都有超过 60% 的比例为分成制耕种。大部分农田 (69.5%) 由白人经营。在这部分白人经营的土地中,73.4% 是由土地拥有者自行耕种。对黑人来说,拥有所有权的比例仅为 32.1% (占南方总田地不到 10% 的比例)。

资料来源:来自 Roger L. Ransom and Richard Sutch, *One Kind of Freedom: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mancip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table 5.1, p. 84, 转载经过牛津大学出版社允许。

在贫穷白人和黑人中比例大致相同。^① 正如兰森和萨奇所评论,分成制耕种很可能也为贫穷白人农夫创造了机会!^②

分成制耕种协议是组织和控制劳动力的一种形式。管理权基本上还是保留在土地拥有者手中,他可以通过给农场提供的物资来决定种植什么、种植多少。关于分成制耕种在美国的起源有很多争论。约瑟夫·雷德 (Joseph Reid) 和一些人认为,其最终形态是自由代理议价的最优结果。^③ 另一些人则认为另有起源。下述文字并不是要对这一问题作出最终定论,不过这是关于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份分成制耕种协议 (在弗吉尼亚殖民地) 的论述,值得一看:

在 1618 年之后,直到国王于 1625 年继位之前,契约劳工在公司的土地上耕种

^① 在一个基于弗吉尼亚山麓地带的黑人职业的的证据的研究中,詹姆斯·伊文认为兰森和萨奇可能因为把很多列举出来的“农民”归为“农民劳动力”而夸大了情况。James Irwin, “Farmers and Laborers: A Note on Black Occupations in the Postbellum South,” *AgHist*, Winter 1990, n. 14。

^② Ransom and Sutch (1977), p. 104。

^③ Joseph Reid, “Sharecropping as an Understandable Market Response: The Postbellum South,” *JEH*, March 1973. Robert Higgs, “Race, Tenure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Southern Agriculture,” *JEH*, March 1973; and “Patterns of Farm Rental in the Georgia Cotton Belt, 1880—1900,” *JEH*, June 1974. See Ransom and Sutch (1977), p. 339, n. 67, 有更进一步讨论。

……他们被提供一年的口粮、工具,契约工作七年,只要他们把出产的一半上交给公司。在契约期满之后,他们会获得一块土地。在那之前,他们是分成制耕种者。^④

在弗吉尼亚的例子中,分成制耕种者在七年后获得了一块土地。因此,我们实际上可以认为战后的这种协议比250年之前的协议还要落后一步!兰森和萨奇表示,这种分成制耕种一旦启动,便迅速地在整个南方棉花区传播开来。它使得刚自由的奴隶和贫穷白人获得了谋生的机会,在工作和生活中都不必再受到每日的监督。失败的风险由双方——分成制耕种者和地主,共同承担。土地拥有者能够让让自己的土地有人耕种,如果佃户的表现不令人满意的话,还获得了一个改变佃户的机会。

在分成制耕种的情况下,进行太多改进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既然佃户随时都可能被赶走,他们没有动力进行改进(他们所作改进带来的好处很可能只能通过打官司来实现,而官司未必能获胜)。地主也不太可能进行改进,因为那样就是把资本投资到很可能完全不在意长期利益的佃户手中。不管是哪种情况,南方分成制耕种者的艰苦贫困生活都使得这种推测在很大程度上是肤浅的。斯蒂芬·迪卡尼奥(Stephen DeCanio)在其对战后南方的研究中,估计仅仅是获得土地所有权就本可以将分成制耕种者的收入翻倍,如果同时拥有土地和资本的所有权,本可以获得三倍的收入。从前的奴隶未能获得数代强制劳动的财产补偿,使得黑人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陷入了贫困。^⑤四十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本来可以改变这一切。

4.7 国家金融和劳役偿债制

战前的棉花经济和其大型种植园“管理单位”在金融上受到代表国内外棉纺工业的银行及代理人国际网络的良好支持。英国银行在利物浦之类的重要进口中心享受折扣,通常持有大量的美国纸,来自南方移动原棉的纸。南方各州特许银行也向拥有棉花可供运送的人授予信贷(贴现他们的纸)。

在南方战争结束时,旧金融体系几乎一点也没有保留下来。原先的各州银行完全被南方政府的高额负债压垮。棉纺企业的代表早就从这幅荒凉的场景中消失了。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为什么旧体系没有以某种形式复兴。^⑥事实上,南方的银行业恢复得很不好。随着棉花种植园的原子化,即分割成一个个家庭规模的小农场(种植园体系的消失),一个同样原子化的金融体系出现了,并一直持续到世纪末。

《自由的一种》中很大的篇幅,事实上可说是最有争议性的部分,是对于战后南方金融情况的研究。^⑦兰森和萨奇认为,基本金融单位变成了当地的供应商——主要是乡村

^④ Jonathan Hughes, *Social Control in the Colonial Economy*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6), p. 57.

^⑤ Stephen DeCanio, "Productivi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Post-Bellum South," *JEH*, June 1974. Lee Alston and Joseph Ferrie, "Time on the Ladder: Career Mobility in Agriculture, 1869—1938,"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5, no. 4, December 2005, 表明向上的流动性在农业中大体和在黑人中相似。

^⑥ Ransom and Sutch (1977), table 6.4, p. 113.

^⑦ 在1999年修改他们的研究的会议中 Ransom and Sutch presented "One Kind of Freedom: Reconsidered (and Turbo Charged)," *EEH*, January 2001, 在会议中他们重新作了一些来自原始研究的计算,但是利用了一个大很多的数据库。由于兰森和萨奇没有改变他们的基本结论,本章中的讨论只引用原始工作。需要指明的是在他们发表的论文随后跟着有加文·赖特、哈罗德·伍德曼、彼得·科尔克拉尼斯和斯坦利·恩格曼的讨论。

商店——他们向佃户和分成制耕种者提供补给。其保证金是对未来庄稼收成的抵押权。

战后南方银行体系终于出现后,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区。全国性的银行需要5万美元的启动资本,这种限制使得这些地区较少出现银行。正如我们所知,南方的中心城市比北方少得多。没有遍及全国的分行系统(如当时英国所有的),各地只能利用现有的资源自行产生金融中介机构。在小城镇出现了小型的私人银行或州银行。然而,土地抵押不再是南方主要的债务工具。对那些有充足信用记录的人来说,借贷的基础是个人单据和其他附属担保物。而这把大量住在彼此隔绝的乡村的分成制耕种者和佃农排除了出去。

南方被剥夺了正常的银行服务,并大致在那种情形下保持了很久。在1880年,整个美国有2061家全国性银行,其中只有126家属于旧南方政府统辖下的12州,只有42家属于5个棉花种植州。和战前的情况不同,南方银行现在的平均规模比其他地方的要小。然而无论大小,数量上也显然太少,不能满足眼前的需要。

填补真空的是一种更初级的金融中介形式,高额涨幅的商品信贷。出现了近8000家乡村商店,向贫穷的分成制耕种者和佃户授予贷款,“正常”的涨幅为每年40%到70%。^⑧(目击记录与兰森和萨奇的计算都得出了这个估计数值。)贫穷的南方农民支付着如此高额的利息,然而在50或100英里外的城市中,利率只有这个的1/10。^⑨一个原子化的经济体系需要一个原子化的金融基础。决策单位的原子化会创造出分散的金融管理制度以相适应。这就是发生的事实,只不过其中的金融机构根本不是存款银行,而是真实商品的经销商。消费者和商品来源之间竞争性的中介消失了。结果就是高利贷。

这个乡村金融体系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大概是,它是为顺应当地需求的变化而诞生“蹦出来的”。各州通过法律,把庄稼抵押权确立为对分成制耕种者财产的主要收费。存款和支票战前就未在南方广泛使用。随着各州银行的纸币因为过度税收而消失,全国性银行又几乎没有在南方发行其本票(promissory notes),这种以物易物的原始高利贷体系因而大行其道。那些商人本身同时也成了棉花发货人。

旧体系中拥有大规模的单位,由旅行的“棉花部门”服务,发行针对棉花移动的纸。纸“钱”在南方、东海岸甚至国外的银行可以贴现,南方因此获得补给。但是,因为租佃和分成制耕种导致了如此大量的“管理单位”,这种部门体系不能有效地重建。必须由能够亲眼见到佃户和分成制耕种者本人,或者了解其名字和声誉的人来提供金融服务。这个人就是乡村店主。因此,这种次优的非竞争性中介形式出现了,在那个世纪的余下年代里,它在南方农村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变化,尤其是新式轧棉打包设备的出现和南方铁路系统的快速发展(1860年为12842英里,1890年为56786英里),降低了棉花打包和运输的成本,使得运输点的数量加倍增多——铁路的任何一站都可以成为运输点——并因此增进了战后棉花工业的本地化。

兰森和萨奇认为,这种体系使得乡村店主拥有了垄断力量。这种力量的基础显然是

^⑧ Ransom and Sutch (1977), pp. 129—130.

^⑨ *Ibid.*, p. 130.

交易的高成本和乡村的隔绝性,以及糟糕的交通条件。^⑩正如第8章讨论的城市位置理论所言,新出现的乡村商店大约距离半天的路程,和地形有关。如果距离再近,就有可能出现竞争——农民可以“逐店选购”,选择更好的价格,但这只能在农民在多个地点拥有同样的信用水平的情况下才可能。道路难走,直到19世纪晚期才出现一些邮购服务(之前甚至没有足够的邮局)。

分成制耕种和垄断的乡村金融的后果就是兰森和萨奇所说的“劳役偿债制”(debt peonage),其起源是“因为农民年末时没有足够的食物储备和用现金价格购买必需食物的现金,他被迫借债以供家庭次年食用。”^⑪既然棉花是经济作物,信用就抵押在棉花种植上。结果是用以种植可供自足的食物的土地和资源数量减少。^⑫与战前时期不同,现在这种小型种植单位将棉花种植面积最大化了。分成制耕种者和佃户陷入了债务缠身的境地。有效的经济力量落入了那些不会从“进步”中获益的人手中。乡村商店需要的是长期贫困的客户,只要他们能继续种植棉花。^⑬在这种新体制下,南方的经济处于颠倒的状态。棉花现在是令人贫困的作物;生产棉花是以牺牲食物种植为代价的。^⑭金融变成小规模和本地化的。

兰森和萨奇的例子对乡村店主有多大的否定作用?现金和信贷价格之间相差60%以上的年利,这足够认定对方可谴责吗?克劳迪亚·戈登指出,大部分学者认为,产生这种利息是因为风险难以确定,而不是因为垄断力量。此外,它对经济是否有严重影响,还取决于通过信贷获得物品的比例。她摆出证据表明仅有20%是通过信贷购买的,比兰森和萨奇计算的数量要低得多。^⑮罗伯特·希格斯认为对黑人有歧视性利率的观点并不符合直接证据,彼得·蒂姆(Peter Timm)则评论说,没有证据表明乡村商人通过牺牲其黑人客户而致富。此外,希格斯不同意商人的压力导致“过度生产”棉花的观点。他相信,一

^⑩ M. Christina Molinari, "Credit Merchandising in the Postbellum American South: Information and Barriers to Entry," *Rivista di Storia Economica*, vol. 19, no. 1, April 2003, 利用了不完全信息游戏的理论来表明,考虑到现有的商店老板专有的对当地借主的信用度的了解,高利率可能是一个阻止潜在竞争者信号。

^⑪ Ransom and Sutch (2001), p. 22; 还可参见 Ransom and Sutch (1977), chap. 8. 利用更大的数据库,他们估计南方棉花业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农场,包括黑人和白人的,竟有46.2%因为信用体系而不能高效运作。

^⑫ Ransom and Sutch (1977), pp. 151—159. Both William Brown and Morgan Reynolds, "Debt Peonage Reexamine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3, no. 4, December 1973; and Gavin Wright, *Old South, New South: Revolutions in the Southern Economy* (1986), 将表明农村金融的压力是不必有。根据他们的说法,南方通过种植棉花换得现金,仍然具有相对的优势。但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会有完全的周转?在战前,小农场主投入了相对小部分的土地用于种植棉花;战后则有相对大的部分。如果1860年之前能够自给自足,为什么之后不能了呢?正是棉籽象鼻虫最终结束了这个体制。

^⑬ 为什么没有合并呢?为什么没有更多商人进入?为什么当地商人没有扩大生产?答案可能是处理的高成本。在沟通方式提高之前,没有人能从接管一个需要这么详细严格的当地信息的中间状态的商业活动中获益。最终,当然,变化来临了。充足的银行业设施在农村建立了。农民可以到城镇旅游,可以从城镇的银行业的竞争中获得。从某一方面说,兰森和萨奇描述的如此生动的现象是三个因素的产物:(a) 地理,(b) 采用土地保有期使得战后南方的棉花业艰难运作,(c) 战争本身使得战前的南方银行业体制不能随着中间商业的需求的改变而改变。

^⑭ 试想我们假定在消耗食物的同时南方农民将重视转向了棉花是因为他们更情愿在战后种植业的竞争性经济中为一年作物的好收成冒险。Gavin Wright and Howard Kunreuther, "Cotton, Corn, and Risk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EH*, September 1975; Robert McGuire and Robert Higgs, "Cotton, Corn and Risk... Another View," *EEH*, April 1977; Gavin Wright and Howard Kunreuther, "... A Reply," *EEH*, April 1977; Robert McGuire, "A Portfolio Analysis of Crop Diversification and Risk in the Cotton South," *EEH*, October 1980.

^⑮ Claudia Goldin, "'N' Kinds of Freedo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ssues," *EEH*, January 1979. 整个议题致力于关于“一种自由”的会议的进展。这一收集转载为 Gary Walton and James Shepherd, ed.,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New South, 1865—190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个更加合理的假说是,黑人在最适合生产棉花的土地上被过度代表了。^⑥

很明显,南方的劳动力市场保持隔绝的状态,受到北方和移民劳动力的回避。加文·赖特在《旧南方,新南方》(*Old South, New South*)一书中认为南方的劳动力市场工资低下,而南方的企业也调整自己以利用这一点。^⑦因此,在南北战争结束后70年,直到19世纪30年代,南方经济仍然自成一体。南方工人迁移离开南方,但是南方主要以农村为主,其高出生率不断地补充劳动力市场,填满了移出居民留下的空白。甘蔗种植园和精炼厂的工资如此之低,以至于受雇的华工抛弃了这个行业,移居去了西海岸。在大量农业人口的压力下,南方的农场实际上规模不断缩小,直到小于北方的农场,而北方农场因为不断使用新型农田机械,规模稳定增长。这与战前的情况相反。棉花生产是劳动密集型的,没有机械化,这使得南方的种植业成了贫困之源。

南方的制造业也是劳动密集型的,开始非常弱小,但是以相对可观的速度增长,有时比北方的类似行业还要增长迅速。但是前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南方的制造业部门在战后的数年中还是太过弱小,不足以拯救南方的经济。南方的工业形成并保持了种族隔离的模式(白人只在纺织业,大量黑人在钢铁业),这种现象只能用社会历史学来解释。单凭经济学是无法解释的。^⑧另外,城市和小型贸易城镇的相对缺乏(奴隶制的另一个后遗症)、基础金融机构的缺乏,意味着几乎没有什么可供转型成为现代经济的商业焦点。

此外,南方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如北方各州那样显著的投资。南方公共教育系统的缺乏是奴隶制的另一个后遗症。公共学校在奴隶制时代是无意义的,南方拒绝建设它们。根据赖特的论述,在旧南方,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十年里,人们仍旧认为这种学校是奢侈品,是浪费。让穷人受教育只会鼓励受益者移居北方,谋求更高的工资。一个结果是南方和北方的工资差别日趋扩大,尽管正如经济学理论所言,在每个地区内部各州之间工资差别日趋缩小。

根据赖特的描述,北方投资者倾向于躲避南方及其贫困。兰森和萨奇认为,在另一方面,战后南方的富人却慷慨地在北方工业中投资。当19世纪30年代之后,这些模式终于反转过来时,南方独特的经济本身却从美国场景中消失了。直到19世纪30年代,战后的南方主要是小型农场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世界,是经济和社会落后的范例。^⑨

在19世纪后期,在当时的技术、文化和传统下,也许旧的南方棉花种植区真的没有更好的选择。斯蒂芬·迪卡尼奥(Stephen DeCanio)就持这种观点。他强调,对南方农民来说,种植棉花仍然是最“有价值的”活动;棉花种植者(无论白人或黑人)都比不种植棉

^⑥ Higgs (1977), p. 71; Peter Temin, "Freedom and Coercion: Notes on the Analysis of Debt Peonage in *One Kind of Freedom*," *EEH*, January 1979.

^⑦ Wright (1986).

^⑧ Gavin Wright, "Postbellum Southern Labor Markets," in Peter Kilby, ed., *Quantity and Quiddity: Essays in U. S. Economic History* (1987). 这种种族偏见的后果是在20世纪初,黑人儿童可能将和父母双方或其中一位分开生活。对经济后果的讨论见 Carolyn M. Moehling, "Family Structure, School Attendance, and Child Labor in the American South in 1900 and 191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1, January 2004.

^⑨ For further discussion on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progress in the postbellum South and to the 1930s, see Lee Alston and Joseph Ferrie, *Southern Paternalism and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1999); William Phillips, "The Labor Market of Southern Textile Mill Villages: Some Micro Evidence," *EEH*, April 1986; and Warren Whatley, "Southern Agrarian Labor Contracts as Impediments to Cotton Mechanization," *JEH*, March 1987.

花的任何种族的人要富裕。^⑧

5. 小结

对整个国家来说,一个伟大的机会在战后的南方被错过了。直到进入20世纪之前,这个地区最著名的特点就是浪费人力和自然资源,贫穷落后,充斥着野蛮的种族主义。白人种族主义者这样谈论黑人,“懒惰,没出息,无知”,而北部和西部的人也这样谈论南部的白人。

在20世纪,有了汽车、公路、工业化城市中的工作,这个魔咒被打破了。南方农业迎来了机械化,这个地区的重要港口和商业中心发展出了工业。向城市移居,尤其是向北方城市移居,自由民的后代大部分变成了城市居民。在南方,《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获得了通过,这条法律规定了黑人可以在哪里吃喝、居住、工作,甚至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该坐在哪里。^⑨正如兰森和萨奇所写:“从1910年到1930,肯定有近15%的黑人离开了南方棉花种植区。黑人的移居在人类历史上也是较大的迁徙活动。”数以千计的南方贫穷白人也离开了。

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悲剧,而它的种子在殖民时代就种下了。它是1789年宪法制定以来唯一的(到目前为止)一次崩溃。这场战争惊人的人力和经济成本又被在旧南方废墟上建立的体系所增大。直到今天,伤疤仍然没有清除,这场灾难的人力和经济代价仍然在继续。

推荐阅读

文章

Cochran, Thomas. “Did the Civil War Retard Industrialization?”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vol. 48, no. 2, September 1961.

Connolly, Michelle.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 in the Postbellum South: A Separate but Unequal 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4, no. 2, June 2004.

DeCanio, Stephen. “Cotton ‘Overproduction’ and Late Nineteenth-Century Southern Agricul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3, no. 3, September 1973.

———. “Productivi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Post-Bellum Sou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2, June 1974.

DeCanio, Stephen, and Joel Mokyr. “Inflation and Wage Lag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4, no. 4, October 1977.

Engerman, Stanley.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Civil War.” Reprinted in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e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⑧ Stephen DeCanio, *Agriculture in the Postbellum South: The Economics of Production and Supply* (1974), pp. 12—14.

^⑨ See Higgs (1977) for an analysis and survey.

Row, 1971.

Goldin, Claudia. "'N' Kinds of Freedo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ssu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6, no. 1, January 1979.

Goldin, Claudia, and Frank Lewis. "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5, no. 2, June 1975.

Higgs, Robert. "Race, Tenure,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Southern Agricul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3, no. 1, March 1973.

———. "Patterns of Farm Rental in the Georgia Cotton Belt, 1880—19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2, June 1974.

———. "Accumulation of Property by Southern Blacks Before World War I."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2, no. 4, September 1982.

Irwin, James R. "Farmers and Laborers: A Note on Black Occupations in the Postbellum South."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64, no. 1, Winter 1990.

———. "Explaining the Decline in Southern per Capita Output After Emancipa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1, no. 3, July 1994.

James, John A. "Public Debt Policy and Nineteenth Century Economic Growth."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1, no. 2, April 1984.

Lebergott, Stanley. "Through the Blockade: The Profitability and Extent of Cotton Smuggling, 1861—1865."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4, December 1981.

Lee, Chulhee. "Selective Assignment of Military Positions in the Union Army: Implications for the Impact of the Civil War."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 23, no. 1, Spring 1999.

———. "Wealth Accumulation and the Health of Union Army Veterans, 1860—187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5, no. 2, June 2005.

Mandle, Jay R. "The Plantation States as a Sub-Region of the Post-Bellum Sou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3, September 1974.

Margo, Robert. "Accumulation of Property by Southern Blacks Before World War I: Comment and Further Evi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4, no. 4, September 1984.

McGuire, Robert A., and Robert Higgs. "Cotton, Corn, and Risk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other View."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4, no. 2, April 1977.

———. "A Portfolio Analysis of Crop Diversification and Risk in the Cotton South."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7, no. 4, October 1980.

Pecquet, Gary M. "Money in the Trans-Mississippi Confederacy and the Confederate Currency Reform Act of 1864."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4, no. 2, April 1987.

Phillips, William H. "The Labor Market of Southern Textile Mill Villages: Some Micro Evidenc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3, no. 2, April 1986.

Ransom, Roger, and Richard Sutch. "The Impact of the Civil War and of Emancipation on Southern Agricultur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2, no. 1, January 1975.

——. "One Kind of Freedom: Reconsidered (and Turbo Charged)."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8, no. 1, January 2001.

Reid, Joseph. "Sharecropping as an Understandable Market Response: The Postbellum Sou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3, no. 1, March 1973.

Sellers, James L. "The Economic Incidence of the Civil War in the South."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vol. 14, no. 2, September 1927.

Temin, Peter. "The Post-Bellum Recovery of the South and the Cost of the Civil War."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6, no. 4, December 1976.

——. "Freedom and Coercion: Notes on the Analysis of Debt Peonage in *One Kind of Freedom*."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6, no. 1, January 1979.

Virts, Nancy. "Estima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Plantation System to Southern Agriculture in 188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7, no. 4, December 1987.

Weidenmier, Marc D. "The Market for Confederate War Bond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7, no. 1, January 2000.

Whatley, Warren C. "Southern Agrarian Labor Contracts as Impediments to Cotton Mechan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7, no. 1, March 1987.

Williamson, Jeffrey. "Watersheds and Turning Points: Conjectures on the Long-Term Impact of Civil War Financing."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3, September 1974.

Wright, Gavin. "Postbellum Southern Labor Markets." In Peter Kilby, ed., *Quantity and Quiddity: Essays in U. S. Economic History*.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Wright, Gavin, and Howard Kunreuther. "Cotton, Corn, and Risk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5, no. 3, September 1975.

书籍

Alston, Lee J., and Joseph P. Ferrie. *Southern Paternalism and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Economics,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South, 1865—196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dreano, Ralph, ed.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Civil War*. Cambridge, MA: Schenkman, 1964.

Beard, Charles A., and Mary R. 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DeCanio, Stephen. *Agriculture in the Postbellum South: The Economics of Production and Supply*. Cambridge: MIT Press, 1974.

Hacker, Louis. *The Triumph of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40.

Higgs, Robert. *Competition and Coercion: Black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1865—191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Jaynes, Gerald David. *Branches Without Roots: Genesis of the Black Working Class in the*

American Sou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Margo, Robert. *Race and Schooling in the South, 1880—1950: An Economic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Ransom, Roger L. *Conflict and Compromis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ry, Emancipation,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Ransom, Roger L., and Richard Sutch. *One Kind of Freedom: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mancip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Stamp, Kenneth. *The Era of Reconstruction, 1865—1877*.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6.

Surdam, David G. *Northern Naval Superiority and the Economics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1.

Walton, Gary, and James Shepherd, eds.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New South, 1865—190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Woodward, C. Vann. *The Strange Career of Jim Cr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Wright, Gav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tton South*.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

———. *Old South, New South: Revolutions in the Southern Econom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第 14 章

铁路与经济发展

正如我们在第 8 章中所见,到 1860 年,美国铁路网已延伸到了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当时有约 3 万英里的铁轨在运营中,已经是当时世界上单个国家所拥有的最大的铁路网了。到 1910 年,美国铁路总里程达到了惊人的 351 767 英里,其中 266 000 英里为干线(main track)。这个国家的铁路总里程远远超过了公路总长度:204 000 英里。

建造美国铁路是一个如此庞大的工程,以至于它的故事对美国历史具有无以伦比的影响。确实是,为什么不呢?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任何类似的事情。一整个大陆的人被蒸汽引擎和钢轨结合起来。农场和工厂的产品,本来各自产地相隔千里之外,有了这种制造和发行的新设施,现在可以很容易地共享用。通过连接内陆和港口、码头的铁路,整个经济体的产出可以有规律地、方便地运输到世界其他地方。美国的隔绝几乎完全是过去的事了。内河汽船和运河驳船(对许多作家来说)显得几乎像是金字塔的时代一样遥远了。铁路在世界历史上书写了新的篇章。

在最近的数年中,经济历史学家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重新检视了铁路和美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在铁路上赋予了过多的解释性权重,以至于损害了对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解。解开铁路神话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揭示真相。它是必需的一步,一旦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发展的离奇而不同的历史上。

当联合国试图把经济发展的知识传播给逍遥散漫的世界时,那些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的学者,大部分把这种进步当做理所当然并开始调查他们自己的经济增长记录。有些国家当时是(现在也是)赤贫;有些国家相对较富裕。在现代科技运用如此广泛的情况下,这是为什么?那些工业化国家的历史中是否有些神奇的因素可以解释他们成功的原因?西方的富裕国家都在 19 世纪有过一段和工业化同时进行的大范围“铁路化”的历史。这是答案吗?

铁路投资的收入效应——例如,提供铁路设备的行业受到了刺激,铁路运输的使用者获得了有规律、可信赖的沟通方式——提供了一个明显的线索。在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英国、法国、美国——的历史上,以及在东欧、俄国和日本,铁路修建的过程似乎是核心的解释主题,是带来其他各方面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东非的新铁路系统能够带来同样的进步效应吗?如果不能,为什么?

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使得罗伯特·福格尔和阿尔伯特·菲什洛对美国铁路的研究工

作如同一记重磅炸弹击中了历史和经济学专业。^① 当学术界的震动终于尘埃落定,他们的许多同事意识到,美国成功的经济发展并不仅仅是靠某一个部门或一小部分“重要”部门的集中发展就能轻易带来的,即使是像运输这样的基础部门也不行。最后,这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考虑更多的因素,开始担忧“人力资本”、诚实而有效的政府、农业,以及其他许多因素——这让那些从不接受铁路神话的人十分欣慰。

1. 铁路网的完成

回望美国铁路建设的时期,我们为其激昂的步伐感到震惊。那是创新“浪潮”如何席卷美国经济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在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回报在企业家手中累积增长,没有政府或其他计划机构对利润水平设定限制——一个具有高利润期望的创新部门(例如铁路)会吸引资本和企业。这个部门不断扩张,直到期望回报掉落到竞争性水平。如果政府还提供补助(如对铁路授予的土地权利),这种投资狂热就会更加强烈。

在企业家兴奋期,当高利润在招手时,创新部门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殖民地时期南方的烟草文化、奴隶制下的棉花文化、蒸汽机器在工业中的应用、北方农民的西进运动、电力在工业和家庭中的应用、20 世纪 20 年代的汽车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电视、快餐连锁店、个人电脑和互联网——这些都是曾经影响美国经济增长并带来爆炸性潮流的创新的例子。

然而无论如何,历史学家必须在该说的时候说公道话,不能被当时伟大创新部门的耀眼光芒冲昏了双眼。虽然有些部门发展了,但即使在壮观的创新浪潮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有些部门也衰落消失了。同步增长和衰落的现象是学者们早已熟知的。关于这方面最早的研究是半个多世纪以前西蒙·库兹奈斯(Simon Kuznets)和亚瑟·F. 伯恩斯特(Arthur F. Burns)所发表的。^② 增长是一定时间内扩张和收缩的代数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对长期性增长和周期模式的研究受到了这些伟大创新浪潮的重要影响。^③ 熊彼特认为,为了抵消经济中较为老旧和保守部门的停滞倾向,创新浪潮是必需的。毋庸置疑,19 世纪晚期的铁路显然是一个主要的创新部门。

1.1 建设的步伐和模式

在表 14.1 中,我们可以看到 1860 年起铁路的增长情况。干线里程一直在增长,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联邦政府出于国防原因在金融情况危急的时刻接管了铁路。^④ 一

^① Robert Fogel,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Econometric History* (1964); Albert Fishlow, *American Railroa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ntebellum Economy* (1965).

^② Simon Kuznets, "The Retardation of Industrial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August 1929; Arthur F. Burns, *Production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70*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34), chap. 4, "Retardation in the Growth of Industries."

^③ Joseph 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2 vols. (New York: McGraw-Hill, 1939). Others followed his lead. For example, Thomas Wilson, *Fluctuations in Income and Employment* (New York: Pitman, 1949).

^④ 美国和加拿大在 19 世纪 80 年代前使用六种不同的铁轨计量尺度。Douglas Puffert, "Path Dependence in Spatial Network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Railway Track Gaug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9, no. 3, July 2002, 是一个关于单一的计量尺度如何被运用的激动人心的研究。

战后,铁路的经济情况继续恶化,这个庞大的系统进入了衰落期,直到现在。被遗弃的线路成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一个严重问题;总里程——包括干线、车场(yard)、支线——在1929年达到了顶峰,为429 883英里(可以绕地球17圈),接着就开始逐渐下滑,遗弃线路超过了新建线路。那时候,汽车和卡车打断了铁路的增长前景,而空中运输刚出现在地平线上。

表 14.1 经营的主干铁路里程

年份	英里数 ^a	年份	英里数 ^a
1860	30.6	1890 ^b	166.7
1865	35.1	1895	180.7
1870	52.9	1900	193.3
1875	74.1	1905	218.1
1880	93.3	1910	240.3
1885	128.3	1915	253.8

^a 单位是千英里。

^b 1890年以后,编组站调车线和支线从数据中删除了。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f 874, 930.

1915年现存的干线总里程中有一半是在1885年和该年之间修建的。菲什洛博士对这个部门建设模式的研究表明,在19世纪晚期有三次浪潮:1868—1873年,1879—1883年,1886—1892年。因为铁路主要是靠贷款修建的,所以这些建设热潮分别被1873年、1882年和1893年的经济危机打断就一点都不奇怪了。然而,每当经济开始恢复,铁路建设热又会重新兴起。在20世纪,1903年和1907年的两次经济危机尽管十分严重,却没能打断铁路的继续扩张。1929—1932年的大萧条倒是确实打断了,但是那时铁路已经面临着新型运输方式的竞争了。

图14.1列出了菲什洛分析的南北战争之后各地区在这一浪潮中的建设模式。铁路大体上是一种连续的、线性的物理资本。既然人口和经济活动(运费收入的来源)并不是均匀分布,不同线路的经济前景和面临问题也就各不相同,令人眼花缭乱。此外,美国的地理情况也给铁路贯穿大陆的线路设置了现实的限制。

这些因素都对各个铁路系统的金融史有着各自不同的影响,试图对其进行概括是非常困难的事。例如,图14.1表明,南北战争后的铁路修建热潮主要发生在西南和西北地区。这些地区距离遥远,铁路必须足够长才能把各地连接起来。然而,铁路里程并不代表经济上的成功。菲什洛指出,在1873年,根据收入计算,东北地区占全国总有效铁路服务的60%。^⑤ 东北部地区人口集中,工业化相对较完善,获得了大量的收入。这是因为这个地区面积小而紧凑,也因为这里和其他地区如西部的内布拉斯加相比,几乎不需要修建新的铁路便能获得收入,成功与否是取决于管理水平的。

詹姆斯·J. 希尔(James J. Hill)的“大北方”(Great Northern)铁路从未破产过。联合太平洋公司(the Union Pacific)由爱德华·哈里曼(Edward Harriman)于1897年重组,从破

^⑤ Albert Fishlow, “Internal Transportation,” in Lanc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2), p. 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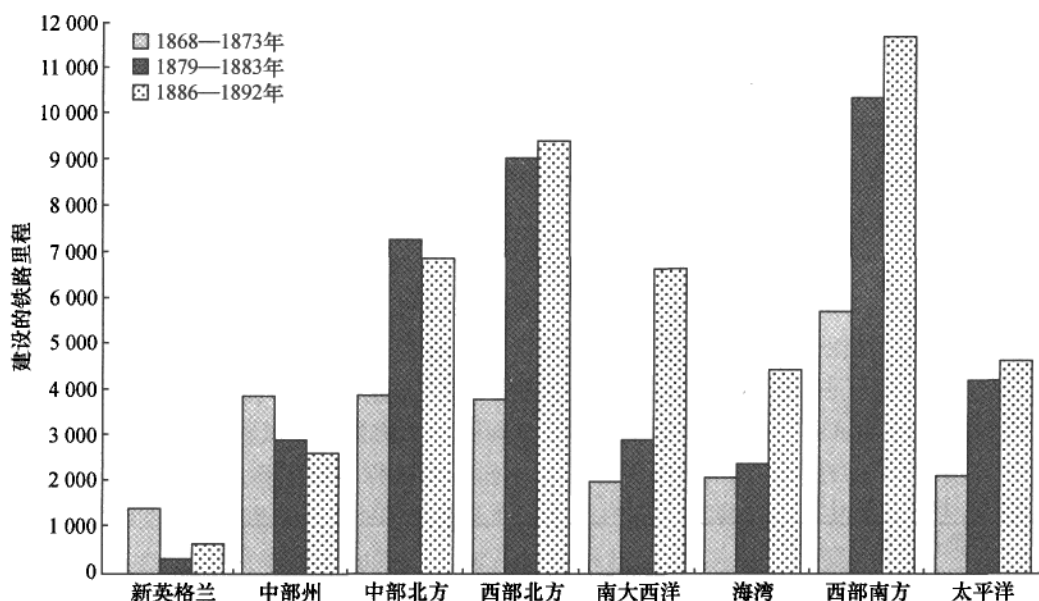


图 14.1 按地区划分的内战后三次铁路建设高潮

1868年至1892年之间各地区建设铁路里程的数据表明,美国广大的中央部分——包括南方和北方——极西部地区、西南地区、以及太平洋诸州占据主导地位。到1868年,东部铁路(除了南大西洋地区)大部分已经修建完成。

资料来源:Albert Fishlow, “Internal Transportation,” in Lance 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table 13.12.

产走向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经济成功。到1906年,它的红利为10%,哈里曼也大有所获。除了财务重组,哈里曼还执行了一个庞大的计划,把旧的“锈迹斑斑的铁轨”推倒重建。^⑥在另一方面,伊利公司则数代以来一直处于破产的境地,尽管其地段相当好。它的早期财务管理由詹姆斯·弗斯克和杰伊·古尔德负责,是美国金融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事例之一。

成功与否取决于许多因素:建设成本、财务结构的特点、管理、运输收入、铁路沿线的经济发展以及站点与其他运输系统的连接情况。在1893年恐慌后,153家美国铁路陷入了破产,各自都有各自的理由。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罗伯特·福格尔发现,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运输收入可以很轻松地超过其高额的建设成本,即使有大段线路是位于空旷的沙漠中。^⑦哈里曼已经证明,它之所以在1895年破产,完全是因为管理不善。

1.2 土地权与建设

第8章探讨了在铁路修建中私人部门的财务对抗政府建设补助的问题,以及政府是否聪明地用补助引诱了铁路修建者,或是铁路修建者因为自己的钱处于巨大的风险中,所以要求并得到了政府的补助。随着联邦政府在南北战争之后大量地授予土地,这种做

⑥ Jonathan Hughes, *The Vital Few* (1986), pp. 374—379.

⑦ Robert Fogel, *The Union Pacific Railroad* (1960).

法(不管是哪一种!)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在1851年得到了授权之后,国会为了鼓励铁路建设,仅对四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就授予了1亿英亩的土地——占公共用地的10%。联邦政府对所有铁路授予的土地总面积达1.31亿英亩,各州又添加了4900万英亩。图14.2列出了这些土地的位置。显然,目标是通过铁路把整个国家内部联系起来。^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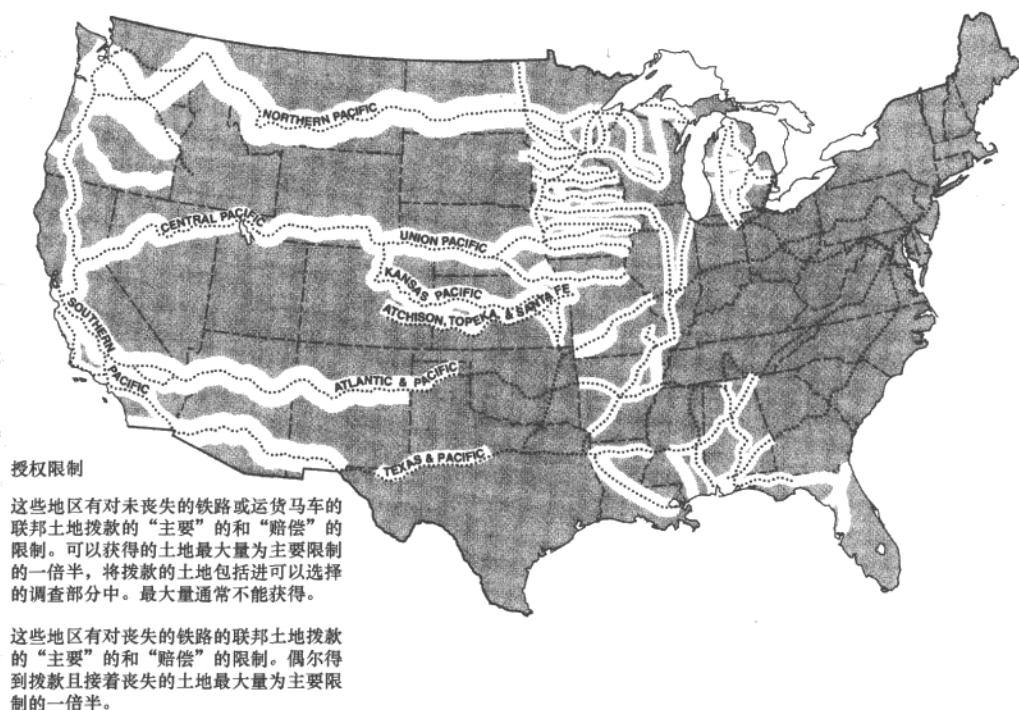


图 14.2 授予铁路建设的联邦土地

资料来源: Charles O. Paullin, *Atlas of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and New York: Carnegie Institution and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1932), plate 56D. 转载经过华盛顿卡内基机构的允许。

土地授权倾向于在总里程增加最多的地区(参见图14.1)。联邦补助至少刺激了铁路建设。跟据罗尔德·墨瑟(Lloyd Mercer)的观点,铁路授权取得了意想中的效果,但可能并不是最有效率的补助方式。^⑨然而,政府手中有的是土地,既然土地授权的目的是刺激铁路建设,那么铁路里程的快速增长标志着这一政策十分成功。1869年,首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在犹他州岬点建成,两条受到许多补助的铁路,“中央太平洋”(the Central Pacific)(由西向东修建)和“联合太平洋”(由东向西修建)在这里汇合。随后的一些年里,南北方其他横穿大陆的铁路也相继建成。人们对铁路土地授权政策的评价毁誉参半,有人

^⑧ Stanley Engerman, "Some Economic Issues Relating to Railroad Subsidies and the Evaluation of Land Grants," *JEH*, June 1972, p. 444, n. 2.

^⑨ Lloyd Mercer, "Land Grants to American Railroads: Social Cost or Social Benefit?" *BHR*, Summer 1969.

称赞其为至关重要的政府补助,有人斥之为免费白送,而如果没有这个政策,横贯大陆的铁路也许就不会修建起来。^⑩

尽管铁路的财务历史十分糟糕,大多数历史学家对其还是持正面态度。^⑪虽然横贯大陆的铁路中很大一部分是利用公共资源“领先于需求”建设的,在之后的时间里,随着居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人口、破产的铁路得到重组以及运量的增加,整个国家确实从中受益了。这种正面观点一直以来主导着美国历史学界。^⑫正如斯坦利·恩格曼所强调的,估计社会收益和成本时的问题,与铁路的建设者和使用者的收益和机会成本的总和相比,为土地授予政策的社会利益和公平问题留下了极大的讨论空间。^⑬

2. 铁路与经济增长

也许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经济史的调查中,罗伯林·福格尔对研究分析的技术起到了最重大的影响。他的书出版于1964年,概括描述了他对19世纪铁路对整个经济增长在计量上的重要性的估计。次年,阿尔伯特·菲什洛关于战前铁路的书也出版了。两个人的研究都降低了铁路作为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的地位。福格尔的主要靶子之一是沃特·罗斯托(Walter Rostow),这无疑使得冲突更加戏剧化,因为罗斯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其著作基本上主导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经济史写作。罗斯托是用经济理论解释历史的先锋人物。

2.1 罗斯托与主导部门

要想深刻体会福格尔和菲什洛对理解美国经济史的贡献,我们需要先了解罗斯托博士的著作及其所持观点的理由。故事其实是从这里开始的:早期的历史学家试图解释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中特征鲜明的周期性增长,然而他们未能找到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关于这种早期的努力有许多文献,现在多半已经无人阅读。人们用范围极其广泛的各种原因来解释商业周期的扩张与收缩,从太阳黑子和躁狂症到“真实”因素如庄稼收成的周期性改变,当然还有货币供应的情况、银行家的操作等。^⑭

^⑩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also invested in railroads. Jac Heckelman and John Wallis, "Railroads and Property Tax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1, January 1997, estimate that the increase in property values attributable to railroad construction could have generated sufficient property taxes to cover the majority, if not all, of the construction costs.

^⑪ 当活的牛群被铁路运往东部,它们在有规律的周期后被运下火车以此交换事物和水。因为牛群以重量卖,黑心的商人在它们被卖前先给它们灌满水,因此有这个短语“注水货物”。第一种被“灌水”的公司股票——其资本化的增长并未伴随工厂和设备的增长——即铁路的股票。商业巨头丹尼尔·德鲁和杰伊·古尔德名义上操纵了铁路的股票,以此试图增加他们自己的利益。在1873年的经济萧条期,好多美国铁路进入破产管理。

^⑫ J. Hayden Boyd and Gary Walton, "The Social Savings from 19th Century Rail Passenger Services," *EEH*, Spring 1972; Gerald Gunderson, "The Nature of Social Saving," *EHR*, August 1970; E. H. Hunt, "Social Savings in 19th Century America," *AER*, September 1967; Stanley Lebergott, "United States Transport Advance and Externalities," *JEH*, December 1966; and Peter McClelland, "Railroads, American Growth, a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A Critique," *JEH*, March 1968.

^⑬ Engerman (1972), p. 463.

^⑭ Gottfried von Haberler,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1960年,罗斯托提出了一种概括化的对经济发展的“解释框架”:经济增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⑮ 罗斯托框架的核心概念是“起飞点”(take-off),在这一点上每个经济体能够维持一个合适的投资与回报的比例以推动其发展(通过乘数与加速器的交互作用),并使其进入长期经济进步的阶段,每个工业化国家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创新和随之而来的主导部门继续这一过程。

罗斯托的早期著作,如他自己写的《19世纪的美国经济》(*British Econom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48)、与A. D. 盖尔(A. D. Gayer)和安娜·J. 施沃兹(Anna J. Schwartz)合著的《1790—1850年英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The Growth and Fluctuation of the British Economy 1790—1850*, 1953),强调了投资的决定因素和这些活动导致的工业变化的时间模式。^⑯ 随后,在《经济增长过程》(*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一书中,罗斯托发展了其“主导部门”假说,认为在周期性历史中,主要的增长部分是由蓬勃发展的创新部门所带来的收入效应所驱动的。^⑰

罗斯托的研究整合了几十年来人们对于周期与增长的理解。接着他又用图表标出了数个国家发展的主要历史轨迹。对美国来说,起飞点来临时正是南北战争之前的最后十年,对铁路的投资是这一过程“不可或缺”的。铁路消费了铁、劳动力和燃料,衍生了其他创新,降低了运输成本,迅速发展成了拥有广阔资源的巨型企业。铁路统治了那个时代。在1860年前开始的趋势一直持续到了那个世纪的结束。对在巨大的历史画布上作画的Joseph Schumpeter来说,这个开始于1875年的漫长的周期性上升应该归因于“世界的铁路化”。罗斯托的“阶段”框架和主导部门的思想是举出了美国经济早期的一个类似阶段。

2.2 福格尔和菲什洛

一个不可或缺的主导部门会有多大? 19世纪全国收入中到底有多少比例是由和铁路相关的活动产生的? 为这些问题提供准确的回答,是福格尔和菲什洛在他们各自独立的研究中共同的目标。

最初的结论是令人震惊的,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评估关于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的观念。开始,福格尔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展示了关于“世界的铁路化”的传统观点究竟有多少正确性。他想一劳永逸地确定这些数字。最初,福格尔对他做出的结果十分沮丧。铁路建设在钢铁行业的增长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这种论述已经被重复了无数遍,历史学家们都认为根本毋庸置疑。相反的情况也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没有铁路,当时的钢铁行业本来会变成什么样? 道格拉斯·诺斯在1961年曾经证明,1860年,铁路使用的铁给钢

^⑮ 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1960). Rostow returned to these themes in his massive work *The World Economy* (1978).

^⑯ W. W. Rostow, *British Econom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8); and A. D. Gayer, W. W. Rostow, and Anna J. Schwartz, with the assistance of Isaiah Frank, *The Growth and Fluctuation of the British Economy 1790—1850: An Historical, Statistical, and Theoretical Study of Britain's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8).

^⑰ W. W. Rostow,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铁行业带来的收入并不比用来制造铁炉子的多。^{①⑧} 在这个基础上,你能做出什么概括呢?

福格尔集中精力研究铁路使用的铁材,并考虑进了对旧铁轨的报废拆除和重新轧制。事实上,在1840—1860年间生产的生铁总量中,铁路所使用的还不到5%。^{①⑨} 显然,出产的铁材95%都用在其他地方了。经济历史学家必须考虑这个问题。福格尔发现,在房屋建设中使用的铁钉的总重量都比铁路使用的铁材总重量大。^{②①} 如果铁路在钢铁需求的中扮演的角色真的如同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们所坚信的那样重要,那么钢铁行业的处境会很不妙。

煤的情况又如何呢? 用来为铁路造铁的煤占煤总产量的不到6%。铁路所需的木材(那些枕木)在木材总产量中占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正如福格尔所说:“铁路所用木材在木材市场上的微小比例恰可反映出经济中的其他部门木材消耗的规模。”^{②②}

1859年,铁路设备产量的价值仅占有运输设备产量的市场价值的1/4。铁路仅占有机械产量的6%。福格尔得出的结论是,1859年铁路带来的产量还不到GNP的4%。

铁路的机会成本是怎样的? 也许就像进口咖啡豆:昂贵,但是如果种在堪萨斯州的温室中,只会更贵。也许铁路提供的服务比同样数量的马车和运河服务便宜得多。那么,也许铁路“真正的不可或缺的”贡献可以这样衡量:同样数量的运输量,如果使用铁路之外最便宜的运输手段,成本会是多少? 这个数字和使用铁路的实际成本之差,菲什洛和福格尔称之为铁路给经济带来的社会节约(social savings)。水运的运费率比铁路的运费率低。然而,当考虑进其他额外成本时,这种优势就消失了。这些成本可归因于额外的马车搬运、转运、运输过程中的货物损失、航海季节较短,以及因为运输较慢而导致的额外存货需要。对乘客来说,计算强调了他们因乘坐铁路而节约的时间。

菲什洛精心研究了南北战争前的铁路情况,得出的估计是,1859年铁路带来的社会节约为GNP的4%。之后就是庞大的铁路建设热潮。当拥有了1890年的庞大铁路系统时,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记住,整个经济都增长了。)福格尔发现1890年铁路带来的社会节约不到GNP的5%(实际是4.7%)。^{②③}

福格尔的调查为经济史的研究带来了方法论上的革命。他进行了详细的反事实(counterfactual,可能、但未实际发生的情况)假设,用运河、河流、马车运输等代替实际建成的铁路,研究这些情况下成本和收益的不同。1890年,农场产品中的3/4是在距离可航行(或具有航行潜力的)水体40英里范围内生产的,这种距离也可以用马车运输。这样,用“铁马”开启大草原、农场和山谷上的土地这样的传说故事可以消失了。事情本可能是另外一种面貌。福格尔得出结论说,如果没有铁路,1890年的GNP可能会直到1892年才能达到。^{②④}

^{①⑧} Douglass C. North,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New York: W. W. Norton, 1966), p. 164.

^{①⑨} 福格尔的主要发现参见 Fogel (1964)。铁的测量见 pp. 230—233.

^{②①} Fogel (1964), p. 233.

^{②②} *Ibid.*, p. 234.

^{②③} 关于福格尔对菲什洛的社会储蓄的估计和评论,见 pp. 219—224.

^{②④} 关于他假设的运河体系的地图,见 p. 92.

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用于陆地运输的蒸汽机车,只是整个经济增长的镶嵌画中的一小片。19世纪美国无以伦比的经济增长并不像我们坚信的那样是由铁路;铁路并不是“不可或缺的”,除非我们非要在1890年达到1892年的GNP。其他研究比较生产力(comparative productivity)的学者证明了铁路在那个方面也是无足轻重的。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它们基本上只是当代技术的应用而已。^④

2.3 挽救神话

任何一个学习美国或其他国家19世纪铁路情况的学生都会认为,铁路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主导部门”(leading sector)。无论菲什洛还是福格尔都不愿意把这种看法扫进历史的垃圾箱,尽管在我们的估计中,它们作为增长驱动者的地位已经被显著降低了。无论如何,对一个单一行业来说,GNP的5%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了。今天美国没有任何一个行业能在总产出中占到这种程度的比例。

正如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所强调的,铁路是我们的首批巨型企业。^⑤它们的管理问题和管理方法给所有的美国工业企业家上了一课。它们的债券在某些时候是美国发展中的资本市场上最主要的商品。它们如此长期地迅速地无情扩张,有助于形成19世纪美国无限增长、无限机会的社会风气。但是也许它们太过显眼。整个经济的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现象,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因素。

杰夫里·威廉姆森(Jeffrey Williamson)从其他人忽略的角度探求了铁路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认为在1890年之前的各种间隔中,铁路对于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可能并非福格尔计算的社会节约所能概括。威廉姆森强调说,如果没有西部的铁路建设,农业产量的增加根本不会发生。因此,根据威廉姆森的说法,铁路比福格尔所认为的更加“不可或缺”。^⑥

最后,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的最新贡献是托马斯·霍姆斯(Thomas Holmes)和詹姆斯·施密兹(James Schmitz)作出的,他们对福格尔使用的实际水运运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如果没有铁路,运费会高得多,因为历史上在水运行业有很强烈的垄断倾向,而来自铁路的竞争削弱了这种倾向。^⑦但是,他们没有提供对运费和社会节约会提高多少的估计。所以,这场辩论还会继续下去。

3. 铁路和大企业的冲击

19世纪晚期的铁路把各种戏剧性的问题摆到了公众面前。当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时,铁路真的已经不可能像普通的资本主义商业企业那样发展了。奇怪的是,在对

^④ Trevor Dick, "United States Railroad Investments' Investment Since 1870," *EEH*, Spring 1974. 正如迪克指出的,铁路对来自投资基金的钱市的资金依靠使得它们不可能成为引导产量提高的潜在者。它们跟随着循环。

^⑤ Alfred Chandler, *The Railroads The Nation's First Big Business* (1965).

^⑥ Jeffrey Williamso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Development: A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93. Rostow (1978) 在第13和14章以及第748—749页处一个很长的脚注中答复福格尔的批判。罗斯托坚持他的主导部门分析并且将铁路置于主导部门的位置。

^⑦ Thomas J. Holmes and James A. Schmitz, Jr., "Competition at Work: Railroads vs. Monopoly in the U. S. Shipping Industry," *Quarterly Review: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Spring 2001.

大企业的公共政策的演化过程中,铁路甚至都不是“不可或缺的”。很容易证明,政府对铁路的管制以及由此而来的法律和实践在之前的法律史上已经存在了。^②然而,公共政策之所以像现存情况这样发展,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美国有关铁路的经验。这里,毫无疑问,铁路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铁路进入了私人所有和政府管治结合的灰色地带。在现实中,因为如下一些原因,很难想象它们还会有其他的命运:

(1) 铁路全都是政府创建的——它们是获得公共许可的企业(publicly licensed corporation),拥有相应的特权和责任。它们是主权的延伸,甚至对其他财产拥有征用权。它们由政府资助的性质虽然是必需且能带来利润的,但也使得它们对公共政策——也就是政治——的变化或增加异常脆弱。

(2) 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依靠政府补助和土地授权建设起来的,而这些似乎是不公平的特权。

(3) 在铁路管理中,竞争性的平行线路和价格战是被厌恶的,然而合并与联合倾向于导致地区性垄断,很容易成为公众抱怨的目标。

(4) 它们很自然地具有寡头垄断的倾向——为了“稳定”收入而结成的固定价格联盟、价格歧视、回扣(歧视性垄断者的通常做法)——使得它们的管理距离通常与观念中的公平竞争相去甚远。

(5) 就像现代汽车一样,它们从创新事物变成了生活必需品,它们的行为也逐渐被视为公共事务。

铁路之所以会遇到这样的命运——政府管制——还有一个原因。铁路的建设者中包括相当大一部分臭名昭著的恶棍和强硬角色,他们的生涯、态度和暴发户式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很少获得公众的同情。在某些例子中,铁路大亨的名誉比普通罪犯好不了多少。铁路很容易成为公众愤恨的目标,而每当这种时刻来临,它们就成了公共政策的傀儡。问题是,政策并没有特定的目标。庞大的铁路系统成了一个可怜的巨人,它的未来由千奇百怪的政策和公众舆论所决定。

3.1 垄断问题

严格地说,垄断者是市场上仅有的唯一卖方。在隔绝的主干线上,确实只有一条铁路。如果你购买铁路服务,你是在购买一项垄断服务。垄断价格会是怎样的?对铁路来说,拥有多种多样的顾客,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具备做一个完美的歧视性垄断者的诱人前景,即对所有人以不同的价格提供服务。古老的拇指定律在铁路定价中的说法是“收取顾客能够承受的最高价格”。这个价格是多少呢?

图 14.3 列出了一个利润最大化的垄断者收取统一价格时的情况。这样一个垄断者在 a 点,数量为 q_1 ,此时 $MC = MR$ 。在这个数量下,价格 p_1 就是顾客能够承受的最高价格。总收入是价格乘以数量,即 op_1aq_1 区域。总成本是平均成本乘以数量,即 $ocfq_1$ 区域。因此,利润就是 c_1p_1af 区域。

^② Jonathan Hughes, *The Governmental Habit Redux* (1991), pp. 102—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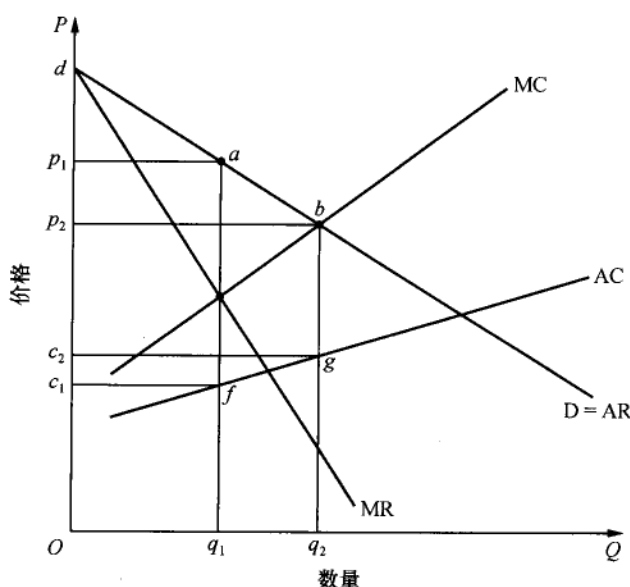


图 14.3 垄断定价的两个例子

一个利润最大化的垄断厂商会将生产安排在 a 点 ($MR = MC$ 处)。而完全价格歧视厂商会收取每个消费者的需求价格,将生产安排在 b 点 ($MC = AR$ 处)。前者利润为 c_1p_1af 区域;而后者利润为 c_2dbg 区域。

需求曲线表明了铁路顾客需要的全部价格和数量,很显然,有些顾客愿意支付比 p_1 更高的价格。现在,善于思考的垄断者肯定在为这一潜在收入的损失而感到遗憾。如果垄断者增加服务的边际成本较小(对铁路来说,它们的总成本中极大部分是固定不变的),垄断者可能会想要为所有潜在顾客以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提供服务,而不是仅仅收取一个价格 p_1 。一个相似的例子是,了解其病人财产收入的乡村医生会根据病人的支付能力而调整收费。

考虑一下“去管制化”的现代航空费用。我们看到顶级服务要收取附加费,便宜的座位则有“超低价优惠卡”,从纽约到洛杉矶的往返票比从芝加哥到蒙大拿州波兹曼市的便宜。在理想状态下,完美的歧视性垄断者会强迫每个顾客暴露其支付意愿。完美的歧视性垄断者在 b 点,数量为 q_2 ,此时 $MC = AR$ 。在这个数量下,最后一个消费者的价格为 p_2 。现在的总收入是 $odbq_2$ 区域。总成本,即平均成本乘以数量,是 oc_2gq_2 区域。因此,利润是 c_2dbg 区域;完美的歧视性垄断者的利润比单一价格的垄断者高得多。 c_2dbg 区域包含了 c_1p_1af 区域。

旧时的铁路实行过价格歧视。他们在有竞争的地区收取较低的费用,在无竞争的地区则收取较高的费用。可以去别处购买服务的大客户能够享受折扣;短途旅行的费率比长途旅行要高——一整套把戏。^② 航空公司现在这样做,铁路过去这样做。因此招来了不满的发货人和旅客的强烈抗议,最后导致政府管治。

^② 这其中最著名的是,“午夜折扣”,被铁路部门用于支付标准油,而这必须和约翰·D.洛克菲勒先生交涉。

公平地说,铁路试图通过相互协商和合作解决定价问题。而当财神玛蒙占据上风时,他们就诉诸阴谋。托马斯·尤伦(Thomas Ulen)博士已经证明,尽管卡特尔的成员有很大动力互相蒙骗,将价格降到卡特尔水平之下,某些价格卡特尔还是能够持续很长时间,并且相对稳定。^⑨ 在旧铁路中,有很多这样的价格固定联盟。

经济学家的经验法则,竞争性的(因而“公平的”)价格总是等于边际成本,在铁路这里完全不适用。设想一下两名乘客在怀俄明州狼城(Wolf City)等候火车的情形。他们购买了两张去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车票,然后站在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火车站台上。火车停下了。第一名乘客应该付多少钱?第二张车票的边际成本是多少?和第一张的有差别吗?现在将这个问题扩展到所有的车站、所有的乘客、所有种类的运载,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铁路的持有人、法官、州或州际商务委员会官员——能够算出铁路服务的公平或“合理”价格应该是怎样的。

Edward Harriman 是我们最伟大的铁路财政家,他曾经试图为他自己的定价策略辩护,他使用了一种独特的标准,即顾客所能负担的最高的(推测上的)然而在他们各自的市场上又是竞争性的费率:

对铁路来说,如果对沿线的企业收取过高的费用从而扼制它们的发展,这是一种自杀行为。即使没有平行道路的直接竞争,铁路沿线的每一个工业企业都在和其他线路周围的企业竞争,每条铁路不得不收取这样低廉而合理费用,以允许该铁路所属地区的工业能够在竞争性的市场上成功销售,从而为铁路提供作为收入来源的待运送货物。铁路公司的利益同顾客密切相关,不可能切断。^⑩

这个标准的问题很多,不但含糊且与歧视性垄断者无关(顾客的支付意愿已经反映了其竞争状态),而且顾客仍然知道他们在铁路之间的定价协议面前是非常脆弱的。这些协议允许所有费率或某种特定费率一致提高,从而集体地将收入从铁路使用者转移到铁路持有者手中。卡特尔仍然可以完美地运作。因为铁路在政治压力面前比较脆弱,从而导致了公共管治的结果。

3.2 管制的到来

到1890年为止,有大约1000家独立的铁路公司。它们合在一起形成了铁路系统,将货物和人们运送到各地。它们真的应该像1000家街角杂货店一样运营,互相之间毋须评估和合作吗?这些公司是多姿多彩、杂乱无章的过去的幸存者,当时曾经发生过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例如萨斯奎哈那战争(Susquehanna War,互相竞争的铁路投资者雇用了小股壮汉部队进行战斗以夺取铁路财产的物理控制权)。据说,它们向法官和独立政治家行贿,“腐蚀”了整个立法机关。它们故意修建与对方平行的线路以进行价格战并收购对方。尽管它们活力充沛,许多公司,包括联合太平洋公司这样拥有巨型铁路网的公司,最终在财务上一败涂地,将成千上万的投资者毁于一旦。它们的歧视性定价策略招

^⑨ Thomas Ulen, "Railroad Cartels Before 1887: The Effectiveness of Private Enforcement of Collusion,"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1983.

^⑩ Quoted in Hughes (1986), p. 391.

致了很多敌人。

3.3 农民案例

公众对这些新兴巨型企业的对立情绪很快就到来了；公众转而向政府寻求补救。^②在19世纪70年代，州立法机关纷纷通过法律，允许州政府代表机构控制铁路运营的许多方面，包括定价。铁路在法庭上与这种管制进行斗争，随后，在1876年秋，五件案子一起递交给了美国最高法官，被称为“农民案例”。这些案子被这样命名是因为其大体上是农民不满的结果，被当时的全国农庄领袖所关注。（农庄是农民的地方性组织，最初为社会和教育目的而成立，后来成为政治论坛和农民表示抗议的渠道，而铁路常常成为他们对抗的敌手。）这些案例是：（1）芒恩诉伊利诺伊州，（2）芝加哥、伯灵顿和昆西铁路诉爱荷华州，（3）沛克诉芝加哥和西北铁路，（4）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圣保罗铁路诉阿克利，以及（5）威诺娜和圣彼得铁路诉布雷克。^③

1877年3月，这五个案子被宣判。现在进行回顾，我们可以看到是它们封印了美国铁路系统的命运。法庭在对芒恩诉伊利诺伊案的判决中包括了全部五个案子，而这个案子实际是关于一个谷物升运机的。但是对于芒恩的判决随后被法庭全面应用到另四个铁路案例上。尽管十年之后芒恩对铁路失去了效力（因为沃巴什诉伊利诺伊案，将在下一节详述），铁路应毫无疑问服从永久管制的原则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第6章指出了在企业中公共控制私人财产的法律基础。农夫案例中的铁路被视为已经转变为公共财产的私人财产。大法官韦特判决，任何企业，如果其财产和行为对普通公众至关重要，“和公众利益密切相关”，那么根据古老的传统，企业应服从政府管治。在芒恩案中有关的政府是州政府，到1886年，已经有了25家州铁路委员会。

3.4 沃巴什、法人，州际商务委员会（IIC）

1886年，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有关歧视性定价（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歧视性垄断者）的决议，沃巴什、圣路易斯和太平洋铁路诉伊利诺伊案，为联邦管制提供了舞台。最高法院认为，铁路主要属于州际商务，它们的州际业务只有服从国会管制、遵守联邦宪法关于商务的条款才合适。同年，在圣克拉拉县诉南太平洋铁路案中，对于铁路财产征收特别的地方税被认为是违反第十四修正案（即保护个人财产未经合法程序不受州权力侵害）的行为。^④修正案的本意是保护原奴隶的财产，而法庭简单地把南太平洋公司当做了法人。这起判决之中的法律思想的精细微妙之处并未给铁路在那个平民主义的时代的形象带来多少好处。

这个事件的发生时机是偶然的，然而历史进程却是必然的。一年之后，即1887年，国会建立了州际商务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ICC）——首个固定而独立的联邦管制机构。因为铁路的跨州性质，公众所需的州政府管制很自然地转移到了联邦

^② Anne Mayhew, "A Reappraisal of the Causes of Farm Prot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0—1900," *JEH*, June 1972; Robert McGuire, "Economic Causes of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grarian Unrest," *JEH*, December 1981.

^③ Hughes (1991), pp. 12—15.

^④ 118 U.S. 394 (1886).

政府那里。尽管最初 ICC 没有设定铁路费率的权力,它的建立仍然标志着一种几乎可以无限扩张的联邦政府权力开始出现。

近些年来,ICC 的起源成为争论的话题。托马斯·吉利根(Thomas Gilligan)、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l)和巴里·韦恩加斯特(Barry Weingast)认为,州际商务法案(Interstate Commerce Act)是铁路和短程发货者之间妥协的产物,这二者在此事中有直接利益关系。基斯·普尔(Keith Poole)和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 Rosenthal)则认为这个法案是远为广泛的政治经济利益结合的结果,认为其他人过于强调了定义狭窄的利益集团。^⑤ 对普尔和罗森塔尔来说,让联邦权力对重要问题施加影响符合相当广泛的人群的利益。

著名的历史学家加布雷尔·科尔科(Gabriel Kolko)以及其他认为,铁路运营者把商会视为强迫联邦权力协助解决卡特尔管理问题的机会。^⑥ ICC 为铁路利益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由联邦政府资助的论坛。从这个角度看,ICC 是首个由被管制者“占领”管制委员会的例子。

1898 年,斯迈思诉艾姆斯案最初被认为是法庭对解决费率设定难题的尝试。标准设定是,费率必须足以为投资提供“公平”的回报率。^⑦ 事实上,这种解决的尝试仅仅是改变了争论的基础。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对铁路资产的评估,无论原生或重置成本,以形成费率基础。1906 年,《赫本法案》(Hepburn Act)将设定最高费率的权力赋予了 ICC。

3.5 奥尔布罗·马丁和占领理论

“被占领的”联邦控制机构如何行为?费率是否被充分提高以保证运营赢利?奥尔布罗·马丁(Albro Martin)的工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马丁在《被否定的事业》(*Enterprise Denied*)中论证道,如果 ICC 确实被人占领了,那么占领它的就是铁路的使用者——乘客和发货者。^⑧ 随着 1896 年之后的物价上涨,铁路的费率却落在了后面,这首先是因为法庭设定的费率,其次是因为 ICC。在《赫本法案》之后,ICC 拒绝批准铁路宣称需要的价格上涨。根据马丁的论证,资本器材的修理和重置不能得到维持,到了 1914 年,铁路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在实物上举步维艰。这种困境为联邦政府在 1917 年的接管铺平了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政府“出于国防的目的”运营铁路。

3.6 《谢尔曼法案》和遥远的未来

在 1904 年的北方债券案中《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被用来阻止形成一个综合了联合太平洋、北方太平洋、大北方、和伯灵顿等公司利益的庞大的控股

^⑤ Thomas Gilligan, William Marshall, and Barry Weingast, "Regulation and the Theory of Legislative Choice: The Interstate Commerce Act of 1887," *JLE*, April 1989. Keith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The Enduring Nineteenth-Century Battle for Economic Regulation: The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Act Revisited," *JLE*, April 1993; and Keith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Congress and Railroad Regulation: 1874 to 1887," in Claudia Goldin and Gary Libecap, eds., *The Regulated Economy: 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Political Economy* (1994).

^⑥ Gabriel Kolko, *Railroads and Regulation, 1877-1916* (1965).

^⑦ 169 U. S. 466 (1898). 一个著名的短句是“公司为公众便利服务的价值产生的公平回报”。

^⑧ Albro Martin, *Enterprise Denied* (1971). 关于科尔克论文中一个更早的评论,参见 Robert Harbeson, "Railroads and Regulation 1877-1916: Conspiracy or Public Interest?" *JEH*, June 1967.

公司。^③ 法庭认为,这样的联合会倾向于减少竞争。1913年,哈里曼的联合太平洋公司于1901对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收购和重组也基于类似的原因被解散——哈里曼最后的这个组织杰作减少了竞争。^④ 铁路的合并似乎在全世界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因为经济力量驱使它们在所有的主要国家里拥有更少的运营单位,并最终达到一个垄断的地步。《谢尔曼法案》的运用,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ICC 对于铁路的合并拥有了否决权,意味着美国的铁路合并不会以欧洲那样的步伐进行了。

早期运用《谢尔曼法案》来限制铁路合并的行为,反映了人们对于垄断的合理恐惧,即使是政府管制下的垄断。但是,如果考虑到共享车辆、终端分享、连续性服务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和外部性,这将铁路置于了依赖政府的境地。而事实已经表明,政府的主动性十分不足。直到我们这个时代,通过政府补助、计划和管理,铁路的合并和合理化才达到了过去的大亨们在北方证券托拉斯里所尝试的水平。美铁公司(Amtrak)及其他由政府出资或补助、用来挽救大铁路网的铁路系统,似乎在召唤哈里曼、希尔和皮尔庞特·摩根等人的灵魂进行最后的狂欢。到20世纪60年代,美铁公司正在组建的时候,美国的铁路系统已经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⑤ 今天的情况只比当时稍好一些,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本来也许会是怎样?”

有些人,如马丁,认为铁路从来就没有那样的机会。政府管制在早期就介入了,而且一直持续。从另一方面说,亨利·福特——他购买了一条铁路,用他自己的原则来经营并赢利,最后被 ICC 强令将其出售——认为,传统的铁路管理和政府控制机构都是不合格的。很有可能他才是对的。他作为铁路巨头的短暂经历是我们所有的唯一——一个现代铁路的例子:用直接的、20世纪的商业原则运营,没有管制,没有和其他铁路进行串通安排,没有工会或工作规则。福特对他的小型铁路十分满意,但 ICC 却勃然大怒。^⑥

美国从未完全满足平民主义者对于管制的所有要求,从未将铁路系统全国化。直到今天,美国的铁路仍然是私人拥有,尽管管理部分主要由政府管制机构来完成。一方面由私人拥有并发展,另一方面由政府控制,这种方式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任何一方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铁路公司的投资者、管理层、使用者、政府都不能得到满足——因为一直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政策。

推荐阅读

文章

Boyd, J. Hayden, and Gary Walton. "The Social Savings from 19th Century Rail Passenger Servic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9, no. 3, Spring 1972.

^③ 193 U.S. 197 (1904).

^④ 226 U.S. 86 (1913).

^⑤ See Paul MacAvoy,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Regulation* (1965); and Thomas McCraw, "Regulation in America," *BHR*, Summer 1975, for surveys of regulation and its long-run consequences.

^⑥ Henry Ford, *My Life and Work* (New York: Doubleday, 1922).

David, Paul. "Transport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Professor Fogel on and off the Rail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vol. 32, no. 3, December 1969.

Dick, Trevor J. O. "United States Railroad Inventions' Investment Since 187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no. 3, Spring 1974.

Engerman, Stanley L. "Some Economic Issues Relating to Railroad Subsidies and the Evaluation of Land Gran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2, no. 2, June 1972.

Fishlow, Albert. "Internal Transportation." In Lance 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Fogel, Robert W. "Notes on the Social Savings Controvers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1, March 1979.

Gilligan, Thomas W., William J. Marshall, and Barry R. Weingast. "Regulation and the Theory of Legislative Choice: The Interstate Commerce Act of 1887."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32, no. 1, April 1989.

Gunderson, Gerald. "The Nature of Social Saving."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vol. 23, no. 2, August 1970.

Harbeson, Robert. "Railroads and Regulation 1877—1916: Conspiracy or Public Interes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7, no. 2, June 1967.

Holmes, Thomas J., and James A. Schmitz, Jr. "Competition at Work: Railroads vs. Monopoly in the U. S. Shipping Industry." *Quarterly Review: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vol. 25, no. 2, Spring 2001.

Hunt, E. H. "Social Savings in 19th Century Americ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7, no. 4, September 1967.

Jenks, Leland Hamilton. "Railroads as an Economic Force in American Development." Reprinted in Thomas Cochran and Thomas Brewer, eds., *Views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vol. 2.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Lebergott, Stanley. "United States Transport Advance and External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6, no. 4, December 1966.

Mayhew, Anne. "A Reappraisal of the Causes of Farm Prot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0—19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2, no. 2, June 1972.

McClelland, Peter D. "Railroads, American Growth, a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A Critiqu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8, no. 1, March 1968.

McCraw, Thomas. "Regulation in America, a Review Articl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49, no. 2, Summer 1975.

McGuire, Robert A. "Economic Causes of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grarian Unres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4, December 1981.

Mercer, Lloyd. "Land Grants to American Railroads: Social Cost or Social Benefit?"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43, no. 2, Summer 1969.

——. “Building Ahead of Demand: Some Evidence for the Land Grant Railroad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2, June 1974.

Poole, Keith T., and Howard Rosenthal. “The Enduring Nineteenth-Century Battle for Economic Regulation: The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Act Revisited.”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36, no. 2, October 1993.

——. “Congress and Railroad Regulation: 1874 to 1887.” In Claudia Goldin and Gary Libecap, eds., *The Regulated Economy: 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Ulen, Thomas. “Railroad Cartels Before 1887: The Effectiveness of Private Enforcement of Collusion.” In Paul Uselding, ed.,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8.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83.

Weiss, Thomas. “United States Transport Advance and Externalities: A Com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8, no. 4, December 1968.

书籍

Chandler, Alfred D. *The Railroads: The Nation's First Big Busines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5.

Cochran, Thomas C. *Railroad Leaders, 1845—1890, The Business Mind in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Fishlow, Albert. *American Railroa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nte-Bellum Econom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Fogel, Robert W. *The Union Pacific Railroad: A Case of Premature Enterpri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0.

——.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4.

Grodinsky, Julius. *Transcontinental Railway Strateg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2.

Hughes, Jonathan. *The Vital Few: American Economic Progress and Its Protagonis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The Governmental Habit Redux: Economic Control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Kolko, Gabriel. *Railroads and Regulation, 1877—191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MacAvoy, Paul.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Regul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65.

Martin, Albion. *Enterprise Denied: Origins of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Railroads, 1897—191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 *James J. Hill and the Opening of the Northw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Ripley, W. Z. *Railroads: Rates and Regulations*.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12.

Rostow, Walter 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y and Prospec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8.

Stover, John. *American Railroa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第 15 章

南北战争之后的农业

本书第 10 章对美国农业的讨论侧重于两种社会农业体系——北方的家庭和南方的奴隶制种植园——同时进行的西进运动。北方雇佣劳动力的极度稀缺——每两个农场只有一个劳动力——已经产生了相对资本密集型的农业趋势。而在南方,奴隶制似乎催生了一种极为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在南北战争之前,两种体系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南北战争消灭了南方的奴隶制种植园农业。从种植园奴隶制向分成制耕种和农业雇佣劳动力体系的转变较为不成功,南方农业成了美国经济中较为萧条的部分,直到 20 世纪才得以改革。在北方,两个农业大扩张时期即将来临:第一个是种植基本谷物和饲养牲畜的旱地农业,第二个是 20 世纪中期政府协助的大规模水利灌溉体系——我们时代真正的工程奇迹。

1. 宅地和边疆时代的结束

最初,美国农业增长的模式是持续的粗放耕作,结果是农场产量的大幅提升。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出现了一个突出的现象:基本作物耕作面积的增幅和产量增幅之比近乎 2:1。数据参见表 15.1。

表 15.1 1866—1990 年玉米和小麦的英亩数和产量

年份	玉米			小麦		
	耕种 亩数 (百万)	产量 (百万 蒲式耳)	每英亩 蒲式耳	耕种 亩数(百万)	产量 (百万 蒲式耳)	每英亩 蒲式耳
1866	30	731	24.4	15	170	11.0
1890	75	1 650	22.1	37	449	12.2
1910	102	2 853	27.9	46	626	13.7
1950	2	3 075	37.5	62	1 019	16.4
1970	66	4 099	61.9	44	1 370	31.1
1990	67	7 934	118.5	69	2 736	39.5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a 693—694, 717—718

我们可以看出,从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到 1910 年,每英亩小麦产量只增加了约 12%,而每英亩玉米产量更是有所下降。这些变化发生的时候,农场主们正逐渐从东海岸的岩石山丘地形转移到中西部的平坦冰川地形。

农场主继续西进,推进到几乎灭绝的印第安人和野牛群新空出来的土地上。特里·

安德森和 P. J. 希尔记录了这些新土地上与土地、皮毛、矿产和水有关的财产权协议的演化。^① 1862 年的《宅地法案》(Homestead Act) 改变了获得土地的程序,但它并不是前代人理想中的样子。大部分新定居点并不是来自宅地。建立一个农场是一桩昂贵、高风险、费时间的事情。而且,宅地法开放的土地主要是在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中部的第 100 条子午线那边,那里的降雨量比美国中部和东部低得多。农民必须学会新的技术才能在这些较干旱而没有灌溉的地区耕种。汉森和利贝卡普认为,在北方的大平原上,《宅地法案》引导形成的农场规模过小。修改法律以允许更大农场的试图失败了,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了一个农场联合的过程。^②

西部的铁路获得了大量土地的授予。他们急于卖掉这些土地,因此产生了一个和宅地竞争的市场。铁路提供了经济支援,有助于解决定居问题。他们不仅希望从土地销售中获益,而且也想促进沿线的经济发展,从而获得更多的运量。尽管宅地无须付款即可获得,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铁路的土地提供了西部的大部分新农场。

1.1 大幅增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提高亩产的化学和生物学技术相对缺乏,这意味着美国农业中产量的增长率和耕作土地的增长率基本相同——一个突出的现象。如果两个增长率完全相同,那么这两者之比,即亩产,应该是保持不变的。在 1866—1910 年间粗略地计算(参见表 15.1),土地耕作面积的长期增长带来的实际产量的增长几乎是同一比例的,所以其亩产只有细微的增长。

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如果投入生产的新土地的质量显著提高了平均产出,那么亩产量应该提高。如果新土地的质量降低了平均水平,那么亩产量应该下降。可以发现,较好土地和较差土地互相抵消,结果是投入和产出以同样的比例增长。^③

从南北战争结束到 1910 年,总产量增长的主要来源就是投入土地的增加。更多的土地种上了玉米和小麦。然而应该注意的是,阿兰·奥姆斯特德和保罗·罗德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小麦生产率的增长有一半应该归功于“生物学方面的创新”。^④ 到 20 世纪中期(参见表 15.1),美国历史上的生化革命发生了,大幅提高了亩产量。随着产量大幅飙升,种植这些基本粮食作物的土地面积实际上降低了。但是,截至 1910 年之前,是土地投入的增加和较为稳定的亩产量带来了北方农业的大发展。在北方家庭农场的最后一次西进行动中,整体结果就是土地面积和产量增长率基本相同。

从土地的物理性质可知,在南北战争之前,从旧殖民地向中西部扩张时,最开始的总产量增长率比耕作面积的增长率快。这反映出最开始时土地质量的改善。除此之外,为

① Terry Anderson and Peter Hill, *The Not So Wild, Wild West* (2004).

② Zeynep Hansen and Gary Libecap, "The Alloc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to Land: U. S. Land Policy and Farm Failure in the Northern Great Plains," *EEH*, April 2004; and Gary Libecap and Zeynep Hansen, "'Rain Follows the Plow' and Dryfarming Doctrine: The Climate Information Problem and Homestead Failure in the Upper Great Plains, 1890—1925," *JEH*, March 2002.

③ 关于这样的假设的可能性的进一步讨论,见 William Parker, "Agriculture," in Lanc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72), pp. 376—379.

④ Alan Olmstead and Paul Rhode, "The Red Queen and the Hard Red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merican Wheat, 1800—1940," *JEH*, December 2002, 宣称在种类和文化实践上的变化抵消了昆虫、疾病和杂草增加的危害。

什么要抛弃佛蒙特、拥抱爱荷华呢？自从南北战争之后，随着农业体系在大草原和大平原之上传播，总产量稳定增长——但是增长率和耕作面积的增长率一样。

1.2 农业效率

西进运动伴随着北方农业效率的微小提升。我们看到，亩产量在这些年中基本保持稳定。因为马和骡拉的器具和机械的进步，每个农场主所能耕作的土地面积增多，每工时的产量也随之提升。^⑤ 即使土地的产出保持不变，因为其他投入的效率增加，所以平均成本也会下降。犁、蒸汽脱粒机、收割设备、播种设备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都增加了农业的总生产率，将北方农场主从劳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⑥ 因此，即使亩产量几乎保持不变，每工时的产量却上升了，农业获取利润的能力也增加了。所以，农业吸引了更多的人和更多的投资。表 15.2 为每工时产量增加的数据。

表 15.2 农业：每工人小时产量

	每工人-小时的蒲式耳量		
	小麦	玉米	棉花
1840	0.43	0.36	0.23
1880	0.66	0.56	0.33
1900	0.93	0.68	0.35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a 1144, 1148, 1156.

即使在实际田野工作层面上的机械化到来较迟的棉花种植方面，每工时出生率也提升了。在玉米和小麦方面，提升非常明显。农场主可以通过获得更多的土地以摊薄其牲畜、设备成本，从而提高效率。在经济史上的这一时期，农场的土地确实是个变量。土地自身的肥沃程度是相对固定的，但改变其他投入的比例却能够增加农业的利润。

威廉·帕克(William Parker)和朱迪思·克莱恩(Judith Klein)利用每蒲式耳平均劳动投入的地区加权指数估算，在 1840—1860 年和 1900—1910 年间，小麦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2% 多一点，玉米和燕麦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约 1.8%。^⑦ 在农业的标准中，这已经是很高的数字了，正如在经济的其他部门观察到的数字一样。杰里米·阿塔克和弗雷德·贝特曼(Fred Bateman)在其北方农业史研究进行了重新估算，他们用的是完全一样的估算公式，只是有两个地方不同：他们使用了他们对各地区产出的估算，排除了南方的数据。结果，小麦的比率没有变化，而玉米和燕麦的比率则如他们所料，有所下降。^⑧

生产率和利润率的提高使得农场和宅地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大，参见表 15.3。请注意，田地面积的增加并不仅仅是因为宅地的原因。额外的田地主要来自政府的现金销售、

⑤ 骡子在南方尤其常见，正如 Larry Sawers, "The Mule, the South, and Economic Progres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 28, no. 4, Winter 2004, 指出，南方在 20 世纪早期对骡子的偏爱南方长热的夏天的反映，并且反映了骡子能很好地适应种植在那的作物。

⑥ Wayne Rasmussen,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on American Agriculture, 1862—1962," *JEH*, December 1962.

⑦ William Parker and Judith Klein, "Productivity Growth in Grain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40—1860 and 1900—1910," i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Output,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1800*,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no. 3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⑧ Jeremy Atack and Fred Bateman, *To Their Own Soil* (1987), pp. 188—191.

铁路授予以及割让给各州然后卖给个人的土地。而且,宅地中有 3/4 是在 1890 年之后占据的,那时边疆的实际连线已经消失。宅地运动最兴盛的时期事实上是 1910—1920 年间,那时正是农产品的高价格终于获得回报的时期。占领一片土地,将之变为农场,即使土地是免费的,这也是市场决策行为,因为那需要投入成本。其他的投入并不是免费的,而且建设农场的机会成本也不是零。宅地运动从来不是解决地荒问题的理想方案。

表 15.3

年份	农场土地	每十年 增长量	每十年最终的 宅地进入量
1860	407.2	—	—
1870	407.7	0.5	1.4
1880	536.1	128.4	17.9
1890	623.2	87.1	29.0
1900	841.2	218.0	31.9
1910	881.4	40.2	38.8
1920	958.7	77.3	74.3

注:单位是百万英亩。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f 78, Da 5.

在所有的公共土地中,宅地占了 2.85 亿英亩,而现金销售占了 3 亿英亩。在 1860—1920 年间,农场土地增加了 5.482 亿英亩,其中宅地只有 1.923 亿英亩。从 1860 年到 19 世纪末,是现金销售而不是宅地运动,是新农场大量出现的主要原因。

1.3 地区农业生产的模式

大量建设农场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农场带”(farm belt)的出现,这是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农业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图 15.1 和图 15.2 中的大量黑点就是农场带,每个黑点代表 2.5 万英亩,它们正好穿过美国的中间,从俄亥俄延伸到中西部,在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的边界处变细,直通西部,另一支则向北延伸,通到明尼苏达和达科他的红河小麦区。玉米和小麦等基本谷物(西部还有高粱)种植是农场大量发展的根源。

小麦和玉米可以直接被人类食用,它们和高粱都可以做牲口的饲料。它们是中西部食品行业大发展的基础。在图 15.3 中可以看到,到 1920 年,牛的生产,在整个美国农业中(即使在西部高地的干燥地区),集中在中西部的得克萨斯东北到伊利诺伊一带。芝加哥、奥马哈和堪萨斯城成为肉类加工业的中心。

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火车和汽船上的冷藏技术逐渐进步,进一步提高了中西部谷物、牲畜行业在美国市场和国际贸易中的统治地位。铁路、谷物运输机、河流和湖泊上的汽船,将中西部和世界联系在一起,促进了以芝加哥商品市场为中心的金融服务的发展。在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初期,英国商务部组织的这些商品市场对食品的作用就像纽约证券交易所对证券的作用一样。我们可在表 15.4 中看出基本谷物产量是如何逐年增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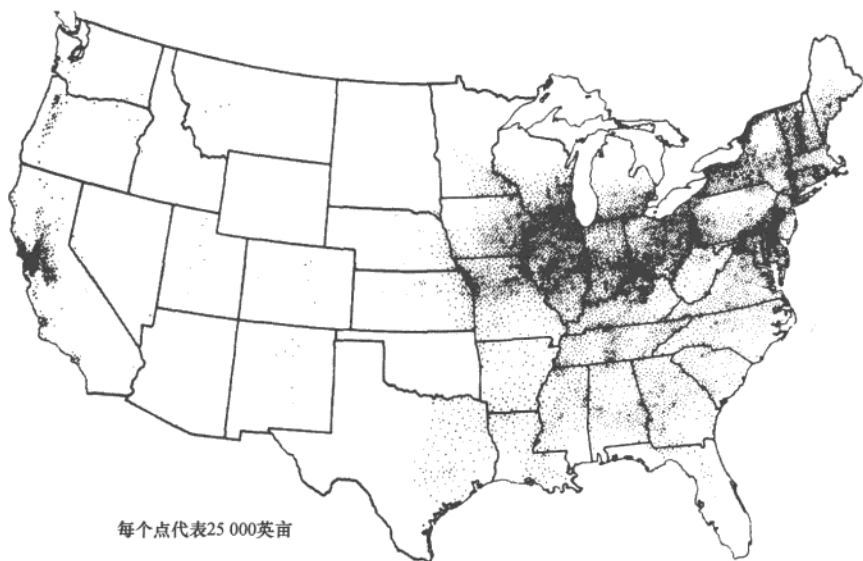


图 15.1 1870 年改进的土地

1870 年,改进的土地被很好地局限在明尼苏达、衣阿华、密苏里、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和东得克萨斯——以及俄勒冈威拉米特河谷和加利福尼亚中央河谷。

资料来源:Charles O. Paullin, *Atlas of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DC, and New York: Carnegie Institution and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1932), plate 144E. 转载经过华盛顿卡内基机构的允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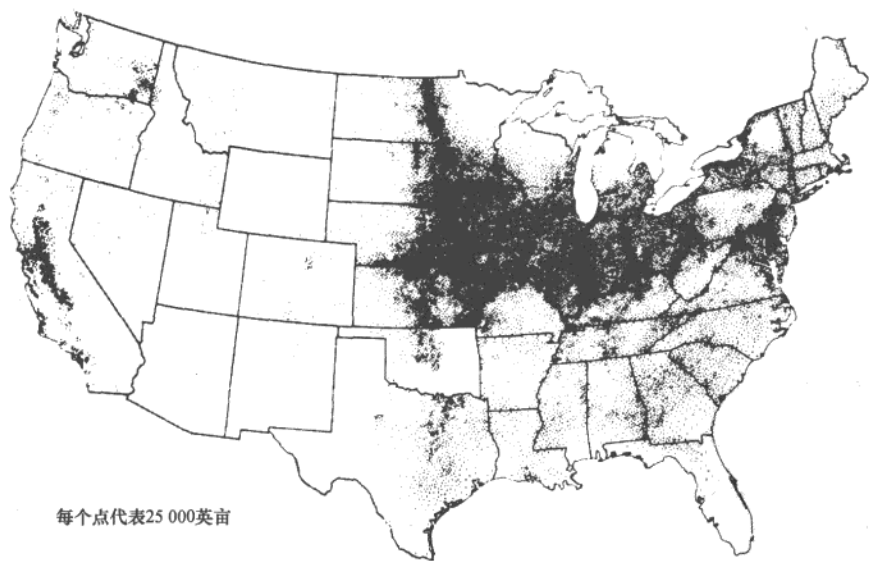


图 15.2 1900 年改进的土地

到 1900 年,尽管在高原地区和西部地区有了比 1870 年更广泛的耕种,但是从喀斯开和内华达山脉绵延至东部到中西部农业带都缺少降水,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些干旱土地的持续性特征和灌溉农业,这形成了大盆地、西南地区和高原各州的农业特征。

资料来源:Charles O. Paullin, *Atlas of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DC, and New York: Carnegie Institution and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1932), plate 144H. 转载经过华盛顿卡内基机构的允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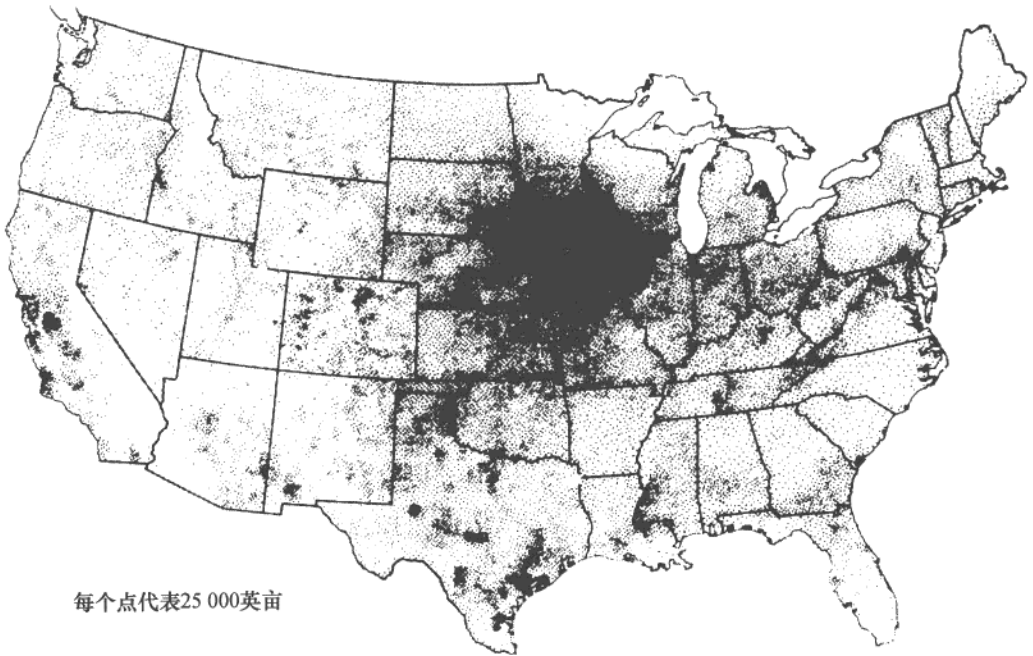


图 15.3 1920 年牛群(包括奶牛)

尽管食用牛生产已遍及各地,但在 1920 年主要还是以饲料喂养。结果,食用牛的饲养集中在得克萨斯北至东北部的狭长地带到农业生产州。屠宰和牛肉包装工业也集中在这个地区——尤其是芝加哥、奥马哈和堪萨斯城。

资料来源:Charles O. Paullin, *Atlas of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DC, and New York: Carnegie Institution and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1932), plate 143C. 转载经过华盛顿卡内基机构的允许。

表 15.4 1859—1919 年基本谷物的产量

年份	小麦	玉米	燕麦	大麦
1859	173	839	173	16
1869	288	761	282	30
1879	459	1 755	408	44
1889	468	2 122	809	78
1899	659	2 666	943	120
1909	683	2 552	1 007	173
1919	945	2 346	1 055	122

注:单位是百万蒲式耳。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a 683, 709, 712, 731.

1.4 小麦周期

美国中西部的谷物种植者在 19 世纪晚期发展出了一套极好的地区分化种植模式,直到今天人们仍然继承了这一模式:大草原上种玉米,高原种高粱,中部较温暖的地区种

冬小麦,北部种春小麦。这为发展消耗这些谷物的牲畜和家禽饲养业打下了基础。之后这一模式还加入了其他作物的循环(尤其是玉米带的大豆),但是小麦的时间表成为基础。^⑨在得克萨斯、俄克拉荷马和堪萨斯州,冬小麦在深秋种下,于次年春末成熟;而北部的小麦是在春天种下,在8月成熟。在南部,收获时节开始于6月的冬小麦收割,然后随着中西部炎热的夏季一直往北延伸。到秋天,收割完毕,下一个循环又将开始。

铁路沿线和磨粉中心的机械化谷仓使得大量运输和储存成为可能。^⑩谷物的期货交易使得农场主们可以将获得纯收入的时间延长。期货也让谷物的购买者们可以事先定好合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其购买的净成本。期货市场的赌博尽管是商品交易中总会遇到的现象,但它似乎让警觉的政治家们感到不满。因此,对这一因素的滥用和控制期货交易史的早期就出现了。^⑪无论如何,随着中西部的农业日趋市场化、商业化,期货交易成功地将一部分非农业资金吸引到谷物和牲畜的生产中来。

通过实践而学习意味着试验和改变。杂交玉米的故事经常被提起。^⑫至于小麦,在19世纪,北方谷物带引进了胶质较多、适于做面包的硬红小麦,收益良多。红小麦来自俄罗斯南部,最初由移民自那一地区的门诺会农场主引进。而且,其他在大平原上茂盛生长的抗旱、防锈的品种也是引进的。农业部和堪萨斯州大学的植物遗传学家还培育了一些重要的新品种。一个崭新的小麦种植世界诞生了,最古老的农业手段得到了改造。

高粱玉米是在19世纪70年代从非洲引进的,它们能够在较为干旱炎热的地区生长。自从引进了这种作物,高原农场在冬季就能用本地生长的作物喂养牲畜了。品种的改良增加了中西部的牛和猪的屠宰体重。中西部新谷物带的超高效率迫使东部和城市附近的农场主转而从事奶业、家禽养殖以及种植蔬果。^⑬城市人口的增长也有助于这种转变。因为这种专门化是有利可图的(也就是说,在中西部之外的地方种植谷物的机会成本提高了),美国农业整体而言变得更加商业化,不再以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为中心。其他地区也从中西部农业中得益:新英格兰的奶场主从中西部的谷物作为干草的补充来喂养他们的奶牛。^⑭

表15.5表明了中北地区是如何逐渐在基本谷物和牲畜的生产上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即使在几乎每个美国农场都可能生产的牲畜上,中西部的专门化也胜出了。随后,

⑨ 20世纪对固定氮的大豆的引进扩大了小麦,谷物(如高粱)和大豆的运转。

⑩ 关于中西部谷物贸易的一个很好的讨论可以参见 William Cronon,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 W. W. Norton, 1991), chap. 3.

⑪ Jonathan Lurie,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1859—1905* (1979);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ase, 1918," *Research in Law and Economics*, 1983.

⑫ Zvi Griliches, "Hybrid Corn and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s," *Science*, vol. 132, 29 July 1960. 格里利切的分析强调了在扩展的科学益处中市场推动力的作用。阿兰·伯格通过展现准备转向杂交玉米地玉米种植带机械化的重要性加深了对这一成就的认识。Allan Bogue, "Changes in Mechanical and Plant Technology: The Corn Belt, 1910—1940," *JEH*, March 1983.

⑬ Fred Bateman, "Improvements in American Dairy Farming, 1850—1910: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JEH*, June 1968. 正如贝特曼指出的,技术进展在奶制品行业是缓慢的,使得适应农业上的相对优势的变化很艰难。

⑭ Philip Coelho and James Shepherd,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Prices: The United States, 1851—1880," *JEH*, September 1974; John Bowman and Richard Keehn, "Agricultural Terms of Trade in Four Midwestern States, 1870—1900," *JEH*, September 1974. 科赫和谢普德发现一致的价格差别,但是他们没有系统地反对农场陈述。褒曼和吉恩没有发现反对中西部农民的贸易周期的现世转变,但发现了和农场主及平民党相联系的种植带动乱的短期增长相对应的时期的形势。

当内燃机出现,取代了马力时,主要供马和骡食用的燕麦也被石油所取代。内燃机的使用将数百万英亩用来种植燕麦的土地解放了出来,可以挪作他用了。

表 15.5 1880—1900 年地区谷物和牲畜的产量

产量	东北		中北		南方		西部	
	1880	1900	1880	1900	1880	1900	1880	1900
玉米	91.0	90.7	1 285.3	1 941.2	374.8	629.7	3.5	4.7
小麦	34.2	33.1	329.6	441.3	52.8	93.8	42.9	90.3
燕麦	84.0	87.3	270.2	764.3	43.6	62.3	10.1	29.6
牲畜	286.0	320.5	772.5	1 557.0	392.7	810.8	125.7	367.2

注:玉米、小麦、燕麦的单位是百万蒲式耳。牲畜的单位是百万美元。美国全国的玉米、小麦、燕麦产量并不等于表中的加总,因为使用的不同的政府数据。Niemi 的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美国调查局的数据。

资料来源:Albert Niemi, *U. S. Economic History*, 2nd ed. Copyright © 1980 b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使用经过允许。

2. 农业的扩张和价格困境

如果我们只考虑农业的物理维度,其数字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就像广为传颂的成功故事的基本要素一样。但是美国的真实历史——点缀着绿背美钞、农民和平民主义运动——表明,农场主们,或很大一部分农场主,他们的想法与此相反。^⑤ 1860 年有 204 万个农场。1890 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 458 万个,平民主义运动也达到了顶峰,他们要求联邦政府对收入和财富分配进行根本的改动。是什么出了问题?

问题在于,供给比需求更快地向右侧移动;国内食品的市场没有产量增长得那么快。因此,从南北战争结束一直到 19 世纪 90 年代晚期,农产品的价格整体而言下跌了(只有偶尔几年价格是上升的)。尽管其他价格也下降了,但农场主们坚信他们受到的打击最大。结果,农场主的固定成本——设备和牲畜的利息和月供——却要用日益下跌的价格来偿付。当然,这个问题不是无法解决的。如果平均成本比平均收入(价格)下跌得更快,产量增加仍然可以带来利润率的提高。但是固定成本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使得普通农场主更难以达到那种产量水平。如果价格上升、资本自动增殖、成本这边又没有压力的话,事情就会容易的多。

伟大的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达特(Richard Hoffstadter)所谓的美国政治的“偏执特质”接管了这个事情。按照平民党(Populist Party)的观点,农场主们相信他们不仅是市场状况的受害者,同时还受到许多阴谋的陷害。如果我们抛开这种阴谋论的观点,那么图 15.4 中的价格模式和表 15.4 中的产量数据表明了什么呢?

我们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到,供给随着时间上升,而价格则下降了。需求在也增加。越来越多的产品在较低的价格上卖出。我们看到,直到 1895 年,供给就是比需求增长得

^⑤ 农业的赞助商在内战之后立即增加,他们的目的是提高农民的条件。20 世纪 90 年代的平民党成了农民的愿望的政治表达者,很多愿望第一次在农业中清楚地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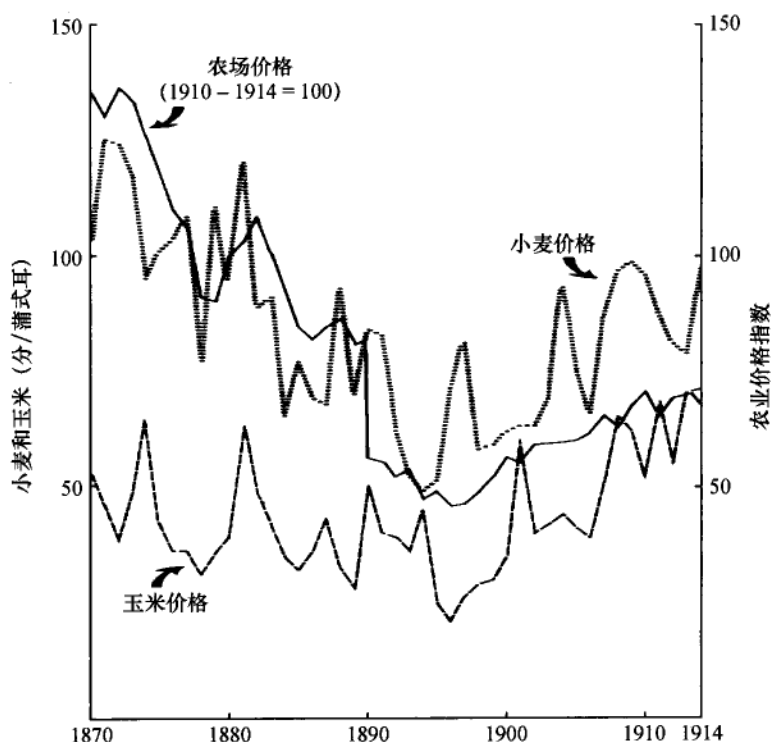


图 15.4 1870—1914 年的农业价格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c 114, Da 697, 719.

快。如果当时任何一年的供给少一点,这种需求的增加本来都会导致价格的上升。但是没有出现那种情况,价格在二十多年里一直呈下降趋势。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况,需求必须比供给增长得快,而这在 19 世纪 90 年代晚期确实发生了。

尽管美国人口在 1850—1910 年间增长了 4.8 倍,但是农业生产的增幅仍然超过了人口的增长。人们增加的收入并不是按比例花在了食品上(记住恩格尔规则)。而且,生产率的增加可能还降低了成本,因此降低了农场主的整体要价。19 世纪 90 年代晚期的价格上升是因为海外市场的需求大幅上升了。总体上,正如杰弗里·威廉姆森所言,价格恢复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发生。^⑩

南北战争之后,虽然亩产量保持不变,但农场主大量涌入中西部大平原,造成了农产品暂时的供给过剩。出口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最终,海外市场的扩张带动了价格的上升。正如威廉姆森所言:“长期而言,谷物价格主要是由中西部和美国之外的情况决定。”^⑪平民主义者寻求的主要是国内的解决方案(将在第 19 章详述)。他们希望联邦政

^⑩ Jeffrey Williamson, “Greasing the Wheels of Sputtering Export Engines: Midwestern Grains and American Export Growth,” *EEH*, July 1980, p. 200.

^⑪ *Ibid.*, p. 197.

府采取直接行动解决他们的问题,采取手段将国内生产收入的再分配向农业部门倾斜。之后,在20世纪20年代,甚至直到今日,美国农场主认识到海外市场才是销售他们过剩产品的最佳途径。美国是世界大国中唯一(想想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不能将自己生产的食品消费完的国家。

如果产量的增加给农场主们带来更高的利润(比如,如果当时的价格是上升的,或者平均成本下降得更快),可以想见,19世纪晚期的大规模农场主抗议活动就不会发生。但是,我们看到,农业收入比其他部门的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在下降,农场生活是艰苦的。而且,平民主义者的观点清楚地表明,农场主们坚信,他们蒙受了损失,未能享受经济繁荣的成果,希望政府采取行动让他们获得更多收益,将他们从这个令人怨恨的市场状况中解救出来——但这个市场状况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3. 农场主的抱怨

学者们在平民主义者的抱怨上花了许多功夫。这些抱怨对美国公众政策的长期影响十分重要,因此需要理解它们的性质。并不出人意料的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大杂烩。^⑮

3.1 铁路费率

罗伯特·希格斯发现,1896年之前,平民主义者认为铁路费用过高的论点是有据可依的。希格斯分析了南北战争之后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和铁路费率的变化,他确认农场主的处境没有得到改善。这一发现和惯常的现代观点有些抵触:

在1897年之前的30年中,农场主们没有从交通费用的下降中得益。在整个镀金时代(Gilded Age),每吨英里铁路运输可换取的棉花、玉米或小麦数量基本维持不变。这一发现使得农场主们对铁路运费“过高”的抱怨显得可以理解。^⑯

1906年之后,随着怀有政治动机的州际商务委员会获得了设定费率的权力并拒绝随着物价上升而提高铁路费率,农场主从实际运费的下降中得到了好处。随着铁路运营成本提高,铁路费率却下降了,导致对路基和设备的投资停滞了。到1917年联邦政府接管铁路时,铁路车辆只能蹒跚而行。^⑰但是以铁路运营商为代价,农场主们却享受了近十年优惠的运费。

3.2 农场主的贸易条件

杰弗里·威廉姆森的计算表明,中西部农场主的贸易条件(term of trade)——农产品

^⑮ Robert McGuire, "Economic Causes of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grarian Unrest," *JEH*, December 1981, 宣称农业收入时间上的不稳定大部分和政治运动时农业动乱的多变的形势高度相关。

^⑯ Robert Higg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1865—1914: An Essay in Interpretation* (1971), p. 89.

^⑰ Albro Martin, *Enterprise Denied: Origins of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Railroads, 1897—191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的价格变化与(他们所花费的)在制造品上的成本变化之比——并不是不利的,甚至直到1890年时还得到了改善。^②然而,希格斯强调,农场的真实收入虽然在增长,但是其增长速度低于其他部门的增长速度;农场主的相对地位在下降。^③农场主们认识到了这一点,感到怨恨。

3.3 利率和土地垄断

农场主们抱怨自己在支付高利贷般的高利率,而希格斯并不同意这一看法,1870年之后,实际上利率下降的比农产品价格还快。尽管利率下降了,但原教旨主义者以及严格的罗马天主教徒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钱财有利息就是不道德的。南北战争之后盛行短期抵押贷款,这种贷款的月供较高,但也有机会在利率下降时重新商谈抵押。^④学者们不能证明农场主对铁路和公司“土地垄断”的指控是正确的。尽管非宅地的土地确实具有正价格(而宅地具有正的机会成本),但没有证据表明土地价格整体而言有垄断的因素。^⑤美国有充足的土地,我们看到,在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些土地被迅速地转变成农场。

在另一方面,玛格丽特·阿兰·博格和罗伯特·施韦恩格在中西部土地投机的收益上的发现有着双方面的作用。^⑥尽管“东部的投资者”确实从土地投机中获得了资本增殖,但是同样地,之后将土地重新卖出的农场主也获得了收益。实际上,大部分重新销售的土地都是由首批定居者定居之后自己卖出的。罗伯特·福格尔和杰克·鲁特奈特发现,西部土地的年均资本收益——购买价格加上持有期间的成本,减去出售价格,除以持有的年份——在1869—1889年间超过了2.3%。^⑦在那个利率较低的时期,这个数字已经颇为可观了。当然,在各地具体情况中,个体农场主可能会被放债者和垄断者欺骗。

3.4 农场的反抗:为什么?

对于经济事务的不满什么时候是有充分理由的?这种问题实在是没有办法回答。如果人们投资于一项风险较低的事业(如受到联邦保险的活期存款),那么任何损失都可能招致抱怨。但是农业从来就不是一个低风险的事业。而且,任何人都可以抱怨从各种生产活动中获得的收益太少了,而要支付的各种利息太高了。农场主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并不喜欢支付利息。(而且,他们将其论点道德化,说得好像农民们无比辛劳,懒惰的肥猫却坐享其成。)平民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一致,他们都认为利息是“非劳动所得的收入”(unearned income)。而且,农场主

^② Williamson (1980), p. 200.

^③ Higgs (1971), p. 100.

^④ Douglass North, *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Past: A New Economic History*, secon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4), p. 133.

^⑤ Higgs (1971), pp. 90—102.

^⑥ Allan Bogue and Margaret Bogue, "Profits and the Frontier Speculator," *JEH*, March 1957; and Robert Swierenga, *Pioneers and Profits* (1968).

^⑦ 估计随着抵押的损失而调整。Robert Fogel and Jack Rutner, "The Efficiency Effects of Federal Land Policy, 1850—1900," in W. O. Aydelotte, A. G. Bogue, and R. W. Fogel, eds., *The Dimension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History* (1972)。

们坚信,他们被剥夺了在这一问题上的正当权利,因为全国性银行——联邦政府成立的机构——不允许接受农场抵押作为贷款抵押物(loan collateral)。这个政策是歧视性的,农场主们知道这一点。

农场主们的其他关于经济方面的抱怨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理由。^②正如罗伯特·维贝(Robert Wiebe)所说,在这一时期,旧的协议正被打破,而那些被漠视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农民。^③他们表示抗议,尽管他们的困境正是因为他们自己太高产而造成。安妮·梅休(Anne Mayhew)提出了一个雨伞理论:农场主们反对其生活的“商业化”,因为农业变得对发展中的市场结构更为敏感了。^④我们已经提过,麦圭尔认为,收入的不稳定性增加了农场主的不满,而这和梅休的看法没有不一致的地方。^⑤

这是美国经济史的最大悖论之一,即南北战争之后农业的巨大发展最终是以政治上的兄弟相残和社会上的动荡而结束的。农民、平民主义者及其同盟向镀金时代的经济宣战,到新政(New Deal)末期他们的主要需求得到满足时,美国已经经历了根本性的改变。美国人应该感谢平民主义者,因为他们才有了无记名投票、参议员直接选举、联邦土地银行、商品信贷公司、联邦储备货币、进出口银行以及一系列自从1892年以来联邦政府以改革的名义创造的其他机构和基本变化。最后,重要的不是他们的抱怨是否有正当理由,而是他们获取、操纵联邦权力的大量努力所带来的实际后果。1896年,平民主义者似乎前途渺茫;但到了1936年,他们已经是无处不在。

4. 边疆的消失:对遥远未来的一瞥

在旧的教科书中,美国历史是一幅自1607年开始的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其要素是边疆:它一直在那,又一直向西移动;善良、勇敢的人们驾驭马车穿过荒野,开垦田地,修建铁路,直到世纪之交时,随着这条连绵不断的阵线上的要塞、军营纷纷消失,平民主义者掀起反抗运动,这一画卷终于结束了。^⑥剩下的只是收场白。当然,这是对美国历史的浪漫化描述。我们知道,宅地运动大部分是在1890年之后发生的,那时野牛和印第安人早已从大平原和大草原上消失了。农业产量的大幅增长发生在农业人口下降很久之后,事实上,小麦和玉米的产量在过去30年间的增幅比其在1800—1910年间的增幅还要大。美国农业的大戏在边疆消失之后才真正开始上演。

^② 关于平民党的抱怨及结果的简短总结,见 Jonathan Hughes, *The Governmental Habit Redux*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98—117. The classic is John Hicks, *The Populist Revolt* (1961). 更多最近的,见 Anne Mayhew, "A Reappraisal of the Causes of Farm Prot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0—1900," *JEH*, June 1972.

^③ Robert Wiebe, *The Search for Order* (1967).

^④ Mayhew (1972), pp. 469—475.

^⑤ Dennis Halcoussis, "Economic Losses Due to Forecasting Error and the U. S. Populist Movement," *EI*, April 1996, 表明在平民党运动的高峰期,对预言错误有利的经济损失增加了。和梅休一样,哈库西斯关注新的市场机会。随着运输成本的减少,农业技术的提高,以及农民更紧密地在国家市场中联系,他们预期的平均收入增加了。相应地,价格不确定性的成本增加了;现金市场更多的参与意味着他们在价格上更不独立。在高峰期之后,家畜的多样化帮助减少了损失。

^⑥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1921).

4.1 耗竭地力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土地的可能使用方式。基本谷物的亩产量从南北战争之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是保持稳定不变的。因为现代的农业科学技术革命,这个潜在的长期障碍不具有可操作性。土地投入本身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这一过程实际上在19世纪早期的灌溉中就已开始,随着灌溉方案的发展和保守政策的实施,未来被剧烈地改变了。

“边疆的消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意味着传统美国农业单纯依靠面积扩张获得的回报严重地减少了。粗放的耕作手段意味着土地被剥夺了其创造性的力量。这一过程从殖民时期的弗吉尼亚就已经开始了,当地力衰竭时,人们就把烟草种到更新的土地上,他们不断向西移动,一直持续了近三百年。

在大草原和高原上,获得肥料的问题限制了谷物轮种的实行,因为必须饲养牲畜,以其粪便作为肥料。如果雨水不规律或者不充足,庄稼产量就会有很大的波动。人们需要人工肥料(以及撒播它的机器),水的供应也必须稳定。在伊利诺伊,人们必须砍断大草原上的野草,种植草地作物,然后年复一年地耙、犁土地,还得依赖大自然恩赐充足的雨水和阳光,施舍一些自然肥料来滋润这些作物。

如果想在爱达荷州的蛇河谷(Snake River Valley)或加利福尼亚州的皇家谷(Imperial Valley)耕作,必须解决供水的问题。大自然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水源,但是阳光倒很充足。到20世纪30年代,风蚀和水蚀造成的土壤流失已经让农场带半干旱地区的数百万英亩潜在土地消失。这一问题受到了政府强硬干预:用恢复水土的政策提供水源,用土壤保持措施来对付侵蚀现象。

4.2 开始实施灌溉和水土保持

在自然界本没有水的地方提供地表水的行动已经将农业从高原拓展到了太平洋区域。尽管涉及的土地面积相对来说还很少,只有总土地面积的4%(约4000万英亩),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已经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定居和发展方式。

从一开始,美国经济史的发展就是城市和农村齐头并进的。美国的土地所有权加上农业的商业化性质确保了这一点。在西部本来只有干旱沙漠的地方,一个新的灌溉农业帝国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提供了有水的土地和适合的栖息场所。这些沐浴阳光的土地现在支持着庞大的人口,用现在的标准来看,这些曾经的沙漠地带现在蕴涵着这个国家的未来,这远不是30年前所能设想的。

通过重力灌溉在干旱地区保持水份的手法在远古时期就已被人所知,如苏美尔人就曾用过。进入加利福尼亚南部沙漠的西班牙人在洛杉矶地区发展了小型的灌溉系统。当摩门教徒在1847年进入大盐湖的干旱盆地时,他们立即种植了土豆,并用城市河(City Creek)上筑坝蓄起的水灌溉它们。然后他们系统地重新组织了社会结构,重新分配了他们在灌溉系统中的财产权利(和义务)。^②从那一点起,美国西部三分之一国土上的干旱沙漠变成了挑战和机遇,不再是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了。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结合政府行

② Leonard Arrington, *Great Basin Kingdom* (1958).

动和将财产权授予私人来解决。

4.3 早期的法案

作为回应,国会于1877年通过了《沙漠土地法案》(Desert Land Act)。^③ 根据这项法案,将以每英亩1.25美元的价格把640英亩的半干旱、干旱公共土地出售给任何同意在三年内灌溉其三分之一面积的人。在这个例子中,所有权的转移部分是通过现金偿付,部分是通过“服务”(灌溉)。到1880年,美国人已灌溉了100万英亩的西部土地;到1890年这一数字达到了336万英亩。1894年的《加里法案》(The Caryl Act)加速了这一过程,它将100万英亩的土地授予任何同意灌溉它的西部州。

1902年,《新土地灌溉法案》(Newland Reclamation Act)在美国财政部成立了一项灌溉基金,接受并分配资金以资助新的灌溉计划。联邦政府创建了程序以修筑贮水的水坝。受影响的土地暂时从宅地项目中撤出(以防止投机),但是参与者可以登记领取160英亩的宅地,在基本的灌溉工程完成之后兑现。定居者们组织了灌溉的区划。他们清偿了这些工程的成本(除了由政府维护的水坝之外),一旦大多数人按比例清偿了他们应付的成本,他们便可获得这些土地。

从这些事情开始,截至1919年,约有1900英亩的土地得到了灌溉,而政府与私人合作的通过土地灌溉分配财产权的做法也已形成惯例。^④ 即必须修筑水坝,开垦土地,完成付款过程,安全分配财产权。这一整个体系符合美国人拥有和开发土地的标准做法。

4.4 未来概览

这些事情的结果将在20世纪中期和更远的将来表现出来。史上最大的工程就是从这些事情发展出来的——庞大的多用途水坝可以灌溉土地、发电、保持水土、充做游乐设施。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沙漠和大山已经被巨大的人工湖泊所点缀,产生了数百万英亩的良田。1936年建成的伯德勒水坝(现在的胡佛水坝)创造出了一个长达150英里的大湖。^⑤ 结果,亚利桑那和南加利福尼亚的许多地区成了天府之国,凤凰城、拉斯维加斯、洛杉矶及其他许多大小城市纷纷崛起。到1941年,基拉河上的皇家水坝(Imperial Dam)和全美运河(All American Canal)已为加利福尼亚的皇家谷提供了稳定的水源供应。1937年,国会拨款在科罗拉多修建了惊人的大汤普森工程。人们用水泵将科罗拉多河的水抬高了186英尺,让其从洛基山脉下的一条13英里长的隧道穿过,流入横贯大陆分水岭(大陆分水岭是指北美洛矶山脉上的一道想象线,该线把大西洋流域和太平洋流域区分开来)的大汤普森和南普拉特河沿岸的水库和农场。1956年,国会通过了《科罗拉多河储水工程法案》(Colorado River Storage Project Act),在圣胡安河上修筑了格伦峡谷和纳瓦霍水坝,在绿河上修筑了弗雷明峡谷水坝,在冈尼森河上修筑了布鲁·曼萨水坝。西南部由此也是水波荡漾了。

太平洋地区的西北部,瀑布区(Cascades)的东边,拥有大量的非灌溉耕作的可耕地。

^③ 参见 Anderson and Hill (2004), chap. 10.

^④ Frederick Merk, *History of the Westward Movement* (1978), p. 508.

^⑤ 关于灌溉、开垦和保存的整体发展的更多细节和报道,见 Merk (1978), chaps. 5—7.

哥伦比亚河上的大古力水坝于1935年获准修建,目的是向周围台地的农场提供灌溉水源。尽管财产权的分配很复杂,但直到1948年,它一直在进行。大古力和下游的博纳维尔水坝都可以发电。为了发电,哥伦比亚河及其支流上还修建了一些小型的水坝。结果和西南部一样,在原本荒凉而美丽的废土上创造了一种“人造的”灌溉农业体系。同样在1935年,国会还通过了中央河谷工程,在沙斯塔山下修筑一个庞大的水库,可以发电并将沙斯塔湖的水流导向黄金之州加利福尼亚的腹地。圣华金谷得到了更加密集的灌溉。

在东部,庞大的灌溉工程是沿着密苏里、阿肯色和田纳西河的水域进行的。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VA)创建于1933年,目的是接管阿拉巴马州马索·寿斯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水坝及其发电设施。因为TVA的庞大水坝体系(及其发电能力)是由联邦政府在已被定居的地点修建,而那里本已有自古传承的财产权(照美国的标准来说),所以围绕它产生了极大的争议,一直持续到今天。TVA让一些租金产生,另一些租金消失,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地区的人口分布、工业结构和经济前景。

另一个主要灌溉工程是密苏里河谷工程,它在密苏里河沿线建筑了一系列水坝和水库。其主要目标是控制洪水。蒙大拿州福特·派克的公共工程管理水坝完工于1937年。在之后的数十年里,在一个叫做密苏里基础机构间委员会(Missouri Basic Inter-Agency Committee)的复杂政府间机构的管理下,联邦政府修筑了更多的水坝。到1973年,这一体系基本完成,洪水基本绝迹。

迄今为止另一个即将完工的主要工程是阿肯色河工程,13个水坝和一个水闸系统使得人们可以通过这条河从密西西比河一直航行到俄克拉荷马州的中部,它还能控制洪水,为一块广大的区域提供水源。1965年的《水资源规划法案》(Water Resources Planning Act)使得行政命令可以创建更多的河流流域委员会,并在未来需要时重复这一过程。

尽管取得了如此多的进步,这一技术的利用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水资源的规划、保护和灌溉仍然存在诸多的可能性。

4.5 环境问题

所有这些了不起的工程成就都需要在自然热爱者、受影响区域的财产权所有者和利用联邦政府的力量继续从自然界的原材料中创造美国式文明的需要之间得到妥协。这一过程经常涉及公共物品的创造,有时候也要毁灭一些(如格伦峡谷的美丽景色被淹没了)。有搭便车者揩油问题,还有以纳税人的代价在政治体系中分配经济租金的问题。这些冲突导致了无尽的政治争论,让律师们发了横财,因为总有受伤的人告上法庭。在俄克拉荷马诉阿特金森案(1941)中,美国最高法院根据商业条款赋予了联邦政府干预几乎任何水利系统的权利:“国会可以对河流的不可通航河段加以控制,以保护和促进其可通航部分的商业。”^⑤

现在,社会想如何利用自然的馈赠呢?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能源危机改变了人们对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看法。庞大的水坝和灌溉系统极大地延伸了那里的人口持续发展

^⑤ 313 U. S. 508 (1941) 525.

的可能性。^⑤显然,在这些地区广泛使用太阳能是具有长期前景的。政府与私人合资办事业是美国的老传统,也非常符合美国的宪法框架。

回忆一下 19 世纪 30 年代的交通运输改善时期。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问题是任何变化的正常结果。毕竟西进运动延续了三个世纪,包含着如此多的冲突。民主程序使得美国可以和平地解决这些冲突,除了印第安战争和南北战争之外。因此,19 世纪晚期的美国农业和定居中边疆的消失其实是打开一个新时代的篇章——在科学技术的协助下,对土地和资源进行集约型利用。一个多世纪之后,美国人仍然只能隐约看到可能的建设性未来。

4.6 剩下的公共土地

最后,剩下的那些没卖出去的公共土地也是个问题。在 22.71 亿英亩的总土地面积中,约有 7.75 亿英亩留在了公共领域内,约占总土地面积的 34%。阿拉斯加拥有多达 3.59 亿英亩的公共土地。现在约有 7100 万英亩土地属于国家公园,约有 5300 万英亩属于印第安部落和土地信托。林业局(Forest Service)监管着约 1.91 亿英亩的土地,约有 3000 万英亩被分配给了五角大楼。其他土地,包括大片的牧场,主要受内务部(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管理。这些公共土地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木材、矿产、野生动植物以及无价的美景,可以用来定居、从事农业或作为牧场。利用这份广大的公共财产的政策从来都是饱受争议的,它们还面临着腐败的威胁或滥用的危险——如果没有管制,公共财产资源不可避免地会遭受这样的命运。

加里·利贝卡普的工作大大扩展了利用这种公共财产的经济知识。^⑥利贝卡普在和罗纳德·约翰逊合写的两份论文中指出,保守主义者对于大湖区和太平洋地区西北部的森林砍伐率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约翰逊和利贝卡普认为,太平洋地区西北部约有一半的土地是利用了宅地法、优先购买法、木石法等法案欺诈得来,以回避关于获取森林土地的限制。他们估计,在 1881—1907 年,这种诈骗价值约 1700 万美元,并且将清晰产权的确立延迟了长达六年之久。结果,这些珍贵的资源受到了过快的开发。^⑦

而且,还有滩涂和水下土地(及其资源,比如石油和天然气)。关于如何利用这些公共资源才是可接受的,这个日益城市化的国家在最近数十年里已经数次改变其态度。这些问题会导致无尽的争论。荒野,按照定义,就是受汽车束缚的一般公众不能去的地方。这种独占的本质是歧视性的、不民主的——那些不能或不愿步行、骑马、乘橡皮筏子、海豹皮船或滑雪进入荒野的人是不能感受荒野的。交给私人的公共财产是“免费赠品”。如果由政府开展,那是“社会主义”。杰斐逊曾希望联邦政府停止对土地拥有所有权。现

^⑤ 当然,不会没有困难。太阳带的新供水系统很贵。它们是经济商品,明确的价钱大部分由政府开支收集,它们的分布必须部分是政治性的。因为整个过程大体上没有计划,人口不一定集中在水最充足的地方。我们可以假设,从长期看,一个特定的区域可能没有足够的水供应。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人口必须缩减。

^⑥ Gary Libecap, "Property Rights in Economic History: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EEH*, July 1986 是关于这类文献的很好的综述。

^⑦ Ronald Johnson and Gary Libecap, "Efficient Markets and Great Lakes Timber: A Conservation Issue Reexamined," *EEH*, October 1980; and Gary Libecap and Ronald Johnson, "Property Rights, Nineteenth-Century Federal Timber Policy, and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 *JEH*, March 1979.

在这是不可能的了。关于公共土地,还有许多章节正等待着人们去书写。^④

推荐阅读

文章

Bateman, Fred. "Improvements in American Dairy Farming, 1850—1910: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3, no. 2, June 1968.

Bogue, Allan G. "Changes in Mechanical and Plant Technology: The Corn Belt, 1910—194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3, no. 1, March 1983.

Bogue, Allan G., and Margaret Bogue. "Profits and the Frontier Speculator."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17, no. 1, March 1957.

Bowman, John.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Midwestern Farm Land Values and Farmland Income, 1890—1900." *Yale Economic Essays*, vol. 5, no. 2, Fall 1965.

Bowman, John, and Richard H. Keehn. "Agricultural Terms of Trade in Four Midwestern States, 1870—19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3, September 1974.

Coelho, Philip, and James Shepherd.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Prices: The United States, 1851—188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3, September 1974.

DeCanio, Stephen. "Productivi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Post-Bellum Sou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2, June 1974.

Fogel, Robert W., and Jack Rutner. "The Efficiency Effects of Federal Land Policy, 1850—1900." In W. O. Aydelotte, A. G. Bogue, and R. W. Fogel, eds., *The Dimension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Halcoussis, Dennis. "Economic Losses Due to Forecasting Error and the U. S. Populist Movement." *Economic Inquiry*, vol. 33, no. 2, April 1996.

Hansen, Zeynep, and Gary Libecap. "The Alloc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to Land: U. S. Land Policy and Farm Failure in the Northern Great Plain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2, April 2004.

Hardin, Garret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3 December 1968.

Harley, C. Knick. "Western Settlement and the Price of Wheat, 1872—191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8, no. 4, December 1978.

Johnson, Ronald N., and Gary D. Libecap. "Efficient Markets and Great Lakes Timber:

^④ 关于共同的财产资源的问题有很多很好的材料。其中最好的包括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3 December 1968; and Libecap (July 1986). In addition, Libecap has several other specific papers on these issues: "Government Policies on Property Rights to Land: U. S. Implications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Mexico," *AgHist*, Winter 1986; with George Alter,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Partible Inheritance, and the Demographic Response to Rural Poverty: An Examination of the Spanish Southwest," *EEH*, April 1982; and with Ronald Johnson, "Legislating Commons: The Navajo Tribal Council and the Navajo Range," *EI*, January 1980. Also, on the exhaustion of the California fisheries, see Arthur McAvoy, "Law, Public Policy,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alifornia Fisheries, 1900—1925,"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57, no. 4, Winter 1983.

A Conservation Issue Reexamined."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7, no. 4, October 1980.

Libecap, Gary D. "Economic Variabl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 The Case of Western Mineral Righ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8, no. 2, June 1978.

———. "Bureaucratic Opposition to the Assignment of Property Rights: Overgrazing on the Western R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1, March 1981.

———. "Government Policies on Property Rights to Land: U. S. Implications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Mexico."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60, no. 1, Winter 1986.

———. "Property Rights in Economic History: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3, no. 3, July 1986.

Libecap, Gary D., and George Alter.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Partible Inheritance, and the Demographic Response to Rural Poverty: An Examination of the Spanish Southwest."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9, no. 2, April 1982.

Libecap, Gary D., and Zeynep Hansen. "'Rain Follows the Plow' and Dryfarming Doctrine: The Climate Information Problem and Homestead Failure in the Upper Great Plains, 1890—1925."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2, no. 1, March 2002.

Libecap, Gary D., and Ronald N. Johnson. "Property Rights, Nineteenth-Century Federal Timber Policy, and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9, no. 1, March 1979.

———. "Legislating Commons: The Navajo Tribal Council and the Navajo Range." *Economic Inquiry*, vol. 17, no. 1, January 1980.

McGuire, Robert A. "Economic Causes of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grarian Unres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4, December 1981.

Mayhew, Anne. "A Reappraisal of the Causes of Farm Prot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0—19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2, no. 2, June 1972.

Olmstead, Alan, and Paul Rhode. "The Red Queen and the Hard Red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merican Wheat, 1800—194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2, no. 4, December 2002.

Parker, William. "Agriculture." In Lance 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Rasmussen, Wayne D.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on American Agriculture, 1862—1962."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2, no. 2, December 1962.

Williamson, Jeffrey G. "Greasing the Wheels of Sputtering Export Engines: Midwestern Grains and American Export Growth."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7, no. 3, July 1980.

Winters, Donald L. "Tenancy as an Economic Institution: The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Tenancy in Iowa, 1850—19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7, no. 2, June 1977.

Zerbe, Richard.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ase, 1918." In Paul Uselding, ed., *Research in Law and Economics*, vol. 5.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83.

书籍

Anderson, Terry, and Peter J. Hill. *The Not So Wild, Wild West: Property Rights on the Fronti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Arrington, Leonard. *Great Basin Kingdo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Atack, Jeremy, and Fred Bateman. *To Their Own Soil: Agriculture in the Antebellum North*.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Bogue, Allan. *From Prairie to Cornbelt: Farming on the Illinois and Iowa Prair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Hicks, John D. *The Populist Revolt*.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1.

Higgs, Rober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1865—1914: An Essay i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1971.

Lurie, Jonathan.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1859—1905*.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9.

Merk, Frederick. *History of the Westward Movemen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

Shannon, Fred A. *The Farmer's Last Frontier, 1860—1897*.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Swierenga, Robert P. *Pioneers and Profits: Land Speculation on the Iowa Frontier*.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1921.

Wiebe, Robert. *The Search for Order*. New York: Hill & Wang, 1967.

第 16 章

人口增长和大西洋移民

南北战争之前形成的人口分布趋势在战后继续发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趋势仍然丝毫没有减弱。美国人口中的各个不同成分长期以不同的速度变化,最终造成了人口结构的重大改变。

1. 趋势

已经形成的人口趋势有四个主要影响:

- (1) 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持续增长。
- (2) 美国继续在地理上扩张,东海岸人口所占的比例持续下降。中西部、西部和西南部形成了一个内部帝国,当南北战争爆发时,其前景已现端倪。
- (3) 随着欧洲移民持续不断地涌入,国外出生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在上升。
- (4) 非白人人口的比例持续下降。

我们可以在表 16.1 中看到这些数据。

表 16.1 1860 年和 1910 年总人口变化

年份	总人口 ^a	百分比总量				
		城镇人口	农村人口	白人	非白人	国外出生者
1860	31 444	19.8	80.2	85.6	14.4	13.2
1910	91 972	45.7	54.3	88.9	11.1	14.7

^a 总人口数量是千人。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a 22, 25, 31, 33.

从表 16.1 中可以得出的最惊人的结论可能是,出生在国外且一直生活到 1910 年的人,其比例仅比 1860 年时略高一点。实际上,1860 年的数据已经非常高了,因为 19 世纪 40 年代后期和 50 年代时,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大量涌入美国——从 1845 年到 1860 年约有近 400 万人。这些移民因为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北欧土豆大范围歉收而来到美国(参见第 6 章),而这只是大规模欧洲移民的开始。1850 年,国外出生者的比例只有 9%。1910 年,美国白人中约有 40% 的人要么是在国外出生的,要么其父母至少有一人出生在外国。伊斯特林认为,截至 1910 年,美国人口中有一半是 1790 年之后进入美国的欧洲移民的产物。^①

^① Richard Easterlin,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in Lanc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72), pp. 124—127. 历史性的人口统计学最近的研究中一个有用的调查是 Michael Haines and Barbara Anderson, "New Dem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te 19th-Century United States," *EEH*, October 1988.

1.1 出生率和移民的活力

移民持续不断地充当总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是因为原殖民地人口,包括白人和黑人,其活力都在下降。18世纪晚期时,其每千人出生率为50以上。在整个19世纪,这个高出生率一直在稳定下降(参见表16.2)。死亡率也下降了。从1870年到1910年,因为基本的健康条件得到了改善,死亡率从每年每千人约22降到了16。^②人口增长了,但如果要维持高增长率,必须要获得稳定的海外人口的融入。

表 16.2 1800—1910 年,每千人中年安全出生婴儿人数

年份	出生数
1800	55.0
1860	41.8
1880	33.6
1900	28.5
1910	29.2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b 41, white only.

而且,原殖民地的黑人人口的增长率和白人人口的增长率如此接近,以至于这两者(其后代)之间的比例在1920年和在1790年几乎一样。^③原殖民地的黑人和白人人口都注定要被19世纪涌入的欧洲移民及其后代包围。

1800年的出生率(每千人14.6)是1910年的一半,而1910年的出生率约是1800年的一半。这些女性的孩子和移民的孩子都倾向于减小其家庭规模。这一模式在1860—1910年间趋于形成。

1.2 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

在1860—1900年间,美国人口增长了近三倍,而在快速工业化的推动下,实际产量的增长甚至比人口还要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在1.4%至1.6%之间。这种增长并不稳定,有严重的周期性问题的,但是每次经济衰退之后又会恢复快速增长。长期而言,实际产量的增长总是走在人口增长的前头。这一结果和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理论相悖,他认为人口的高速增长会吞噬所有的富余产品,直到所有人仅能维持在生存线上。事实上,美国的经历和马尔萨斯的悲观预言恰恰相反:人口

② 罗伯特·希格斯在一篇重要的论文中把农村人口的死亡率的下降归因于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而这是实际收入的增加引起的营养和住房状况的改善造成的。Robert Higgs, "Mortality in Rural America, 1870—1920: Estimates and Conjectures," *EEH*, Winter 1973. 城镇人口死亡率下降的现象更多是由于这些因素以及水供应和城市卫生设备的改善共同引起的。Edward Meeker, "The Improving Heal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850—1915," *EEH*, Summer 1972. In 1998, the death rate per 1,000 population was 8.7.

③ Easterlin (1972), p. 127. 他同样提供了关于材料里很多内容的一项有用的调查,这一章参见 "Population Issues 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in Robert Gallman, ed.,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 1 (1977)。

在增长,生产力增长得更快。^④ 其他主要的工业国家也具有相似的经历。这与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在 20 世纪几乎被人口增长拖入了泥潭。

表 16.3 中的数据简要地表明了这些变化。从 1860 年至 1910 年,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工作时间缩短了,国民收入却增长得更快。动力的使用,如蒸汽及之后的电力,增长的比表中任何其他数据都快。这为理解这些数据提供了线索。因为机械动力替代了人力,所以可以让更多的人参加工作,工作时间缩短了,还可以得到更好的报酬。

表 16.3 增长的证据:1910 年数据是 1860 年的乘数

	1910 数据
	1860 数据
人口	2.93
受雇工人	3.43
年工作时间	2.76
1950 年的国家收入	6.00
安装的动力机器的马力	8.27

资料来源: L. 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Economy* (Homewood, IL: Irwin, 1969), table 20.3, p. 388.

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候,实际产量的增幅高得惊人。事实上,在工业化国家中,只有 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初期的日本达到过美国这样高的 GDP 增长速度。从 19 世纪 60 晚期到 1900 年,美国 GDP 复合年增长率约为 4%;在 1893—1907 年间,其速率达到了 5% 以上。如果按后面这个速率增长,GDP 每 14 年就会翻一番。尽管人口的快速增长将人均水平拉低了一些,经济仍然保持着充足的动力,连续数十年经济净增长。^⑤

2. 移民与增长

图 16.1 在算术标尺上标绘了 1865—1914 年的移民原始数据。经济历史学家们对这些数字研究得如此之深入,以至于这一成就的本质似乎已经埋藏在专业书籍和论文之中。在 1840—1914 年间,2 400 万移民来到了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 15 年里,美国接受了 1290 万移民,在当时相对于一个中等规模的欧洲国家的人口,或是整个斯堪的纳维亚的总人口。在 1905 年、1906 年、1907 年、1910 年、1913 年和 1914 年,移民每年为美国人口新增 1% 以上。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浪潮。这千百万人是自愿来到美国的,他们也被自愿接受了。

^④ 阿兰·凯利指出 19 世纪的人口高增长率通过创造性的活动刺激了经济增长(每项资金的增加)。Allen Kelley, "Scale Economies, Inventive Activity, and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Population Growth," *EEH*, Fall 1972.

^⑤ Simon Kuznets, "Notes on the Pattern of U.S. Economic Growth," in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e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1971), table 1, pp. 18—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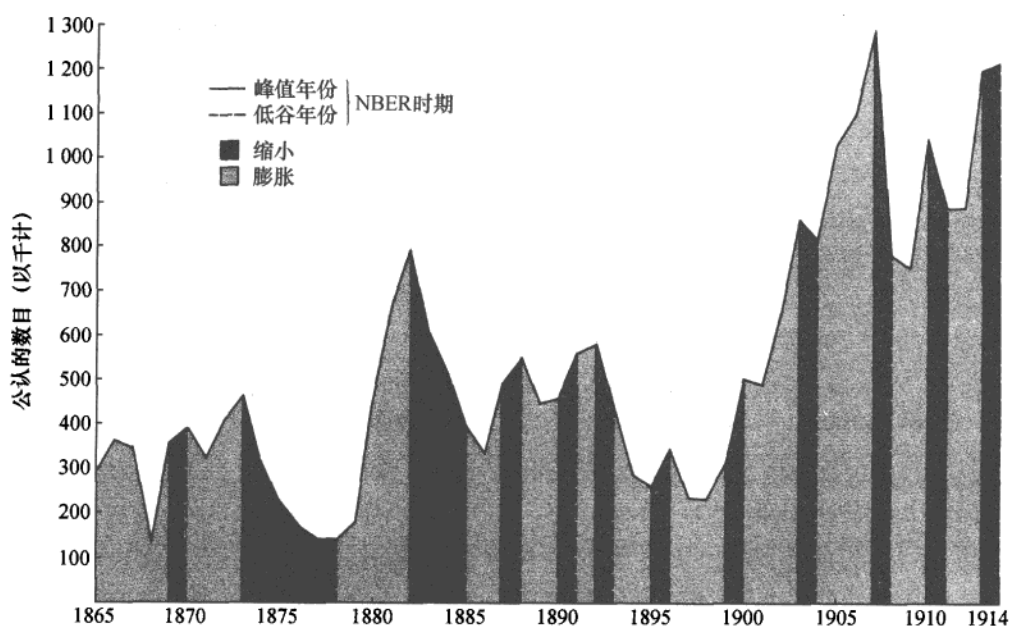


图 16.1 1865—1914 年美国移民

图表中，巨大的移民潮一目了然，即使单看原始数据也是如此。在关于移民潮的各种解释中，布利林·托马斯的理论最为主流。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d 90; business cycle dates: A. F. Burns and W. C. Mitchell, *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47), p. 78.

2.1 原始数据与周期

扩张的经济利用了这千百万移民。当然，如果没有移民，经济可能仍然会增长，但其增长情况可能会有差别，很可能增幅会没有这么巨大。^⑥ 人口迁移的模式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之前我们讨论过19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的移民热潮，当时欧洲的土豆歉收促使数百万人涌入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之后的最初几年，移民人数降到了每年10万以下，之后又大幅回升。因为这种移民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在大西洋两岸都没有政府政策的支持），我们可以推想，美国吸引力的涨落和其总体经济情况应该有些关系，也就是说，和经济周期有关。^⑦ 我们可能会认为，如果移民有的选择，他们会更愿意去经济繁荣的国家而不是经济衰退的国家。这种推想总体而言是否正确呢？

这种推想大部分是正确的。注意在图16.1中，移民高峰是在1873年、1882年、1892年、1903年、1907年和1910年。这些年份确实也是经济周期中经济活动的高峰

^⑥ Jeffrey Williamson, "Migration to the New World: Long-Term Influences and Impact," *EEH*, Summer 1974; similarly,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 Growth," chap. 11 in his book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Development: A General Equilibrium History* (1974).

^⑦ Harry Jerome, *Migration and Business Cycles* (1926).

年,而且在每个高峰之后都伴随着移民人数的低谷。在年景较差的时候,移民的家信会提醒弟弟妹妹或者父母不要再到美国来。在年景较好的时候,移民则会写信回家催促亲戚快点来美国。詹姆斯·邓拉维(James Dunlevy)和亨利·格梅里(Henry Gemery)利用《移民总警监年度报告》中的数据,主要研究了1898年,他们发现,这个“家庭—朋友效应”是移民去向的重要决定因素。西蒙·韦格(Simone Wegge)在德国移民的数据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效应。^⑧也有一些经济波动并没有与之对应的移民趋势变动。信息延迟和极强的“推动”力量(例如1898年和1910年之间发生在东欧的大饥荒和大屠杀)显然盖过了其他因素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说,在美国短期经济活动和移民潮流之间有一些相关性。

2.2 长期涨落

如果我们再看看图16.1,我们应该会对其中较长期的骤增和突降留下深刻印象,旁边点缀着一些不太重要的起伏,就像大洋上的波浪。正如第6章所讨论的那样,这些“长期涨落”约分为四个周期,从波谷到波谷算的话是:1844—1861年,1862—1877年,1879—1897年,1898—1914年。每个周期持续时间约为16—18年。

这些涨落的原因是什么呢?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这些周期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发现,美国总体经济的增长与人口增长和移民这些基本因素的变化具有相关的长期涨落趋势。他写出了其中隐含的过程:

消费者获得的人均商品流的长期涨落,有些延迟地先后引起进出移民差额和人口自然增长的长期涨落,导致了人口总增长的长期涨落。而后者又有些延迟地引发了对人口极为敏感的资本形成的长期涨落,这又导致“其他的”资本形成出现了相反的涨落情况,影响到消费者获得的人均商品流。后者的涨落又开始新一轮的影响,导致进出移民差额、人口自然增长等都随之涨落,以此类推。^⑨

库兹涅茨的研究表明,总体而言,当世界范围内实际收入提高时,移民潮也随之上扬,当经济萧条时,移民潮也随之低落。这些基本因素影响巨大,尽管国内经济活动和移民的波动可能并不是严格对应的。美国是否能吸引潜在的外国移民,主要看美国实际工资和收入的长期趋势。

2.3 托马斯模型

1954年,著名的威尔士经济学家布林利·托马斯(Brinley Thomas)出版了《移民与经

^⑧ James Dunlevy and Henry Gemery, "The Role of Migrant Stock and Lagged Migration in the Settlement Patterns of Nineteenth Century Immigrants," *REStat*, May 1977. James Dunlevy and Richard Saba, "The Role of Nationality-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n the Settlement Patterns of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mmigrants," *EEH*, April 1992, 指出“家庭—朋友效应”对于只计划一个短暂的居住的移民来说尤其重要。最近 Simone Wegge, "Chain Migration and Information Networks: Evidence from Nineteenth-Century Hesse-Cassel,"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8, no. 4, December 1998, 提供了对她定义为“网络的”和“非网络”的移民离开欧洲的决定的详细见解。

^⑨ Simon Kuznets, "Long Swings in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and in Related Economic Variable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February 1958, p. 34.

济增长》一书,这本书可以说是实证主义经济学的天才著作之一。^⑩在这本书中,托马斯把大西洋经济(包括所有离大西洋较近的国家,只要其居民可以抵达并渡过大洋)看做一个单独的经济单位,其中的人口和资本按库兹涅茨周期以一种自我滋养的节奏流动。对托马斯来说,移民现象处于中心位置,而库兹涅茨则对移民的重要性持保留意见。

托马斯注意到,移民的劳动力队伍和其携带的欧洲资本推动了美国经济的上升。廉价的劳动力和对食物、住房的需求为美国的经济扩张提供了额外的动力。^⑪欧洲的增长速度则相对放缓了。当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下降时(处于库兹涅茨周期的下降期),欧洲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则相对上升,因为欧洲对食物和住房的需求上升了——这些需求来自那些留在家中而不移居国外的人。因为商品、资本和人口的自由流动,19世纪的大西洋经济以库兹涅茨周期的规律增长,大西洋两岸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尽管通常的经济周期基本是同步的,至少按年计算的话。

2.4 国际资本流动

托马斯强调,个人投资者就像移民一样也会作出回应。他们都会对市场情况作出反应,追求最丰厚的回报。因此,当美国经济呈扩张趋势时,欧洲的资本就会大量流入美国经济,为新移民提供工作、食物、衣服、住房。这些东西并不是计划好的,只是成千上万或穷或富的个人对市场机遇作出的反应而已。移民大量涌入在美国工业化经济中蓬勃发展的城市。托马斯认为,在这些时期里,投资倾向于使用劳动力——每单位的资本会使用更多的劳动力。托马斯把这一现象称为资本的“广化”(widening)。

在相反的情况下,移民变少。他们在欧洲工作,因此食物、衣服和住房的需求也在那里。工资比另一种情况下要低,欧洲投资也就留在了欧洲。在这些时期里,美国的投资倾向于节约劳动力——用机器来代替工人工作。托马斯称之为资本的“深化”(deepening)。如此,大西洋经济的增长节奏由人口和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建立起来,而其他通常的增长属性一般被经济学家归功于19世纪相对自由的商品贸易。

事实上,托马斯认为,最初正是要求贸易更自由的动力本身开启了这种大西洋移民的模式。食物、原材料及一些制造品进入了欧洲经济,搅乱了增长中的欧洲农民人口的生活,它降低了农业的收入,而当时欧洲农民人口正好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期。欧洲农业在这种条件下是不能扩张的,新的人口必须要找到别的出路。因为在欧洲国家中,社会各阶层各职业之间的流动性是如此有限,所以欧洲人发现,与其试图在国家林立、语言错综的欧洲改变职业和位置,不如迁移到相对更为开放自由的美国更为高效。因此,被经济因素改变去向的人们发现,横渡大西洋是他们的净边际收益最大的方式。投资者的情况也类似。通信和交通的改善使得招工和找工作的人双方都更为便利了。

近半个世纪以来,托马斯的庞大假说(这里只是简要的概述了一下)已经被学者们批判地研究了许多回,却依然完好无损^⑫。托马斯认为,库兹涅茨周期中的这种此消彼长

^⑩ Brinley Thomas, *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1954).

^⑪ “廉价的劳动力”意味着仅仅是增加的设备使得工资比没有设备时更低了。

^⑫ Richard Easterlin, “Economic-Demographic Interactions and Long Swings in Economic Growth,” *AER*, December 1966.

的节奏解释了 19 世纪大西洋经济的增长模式(也解释了图 16.1 中的移民数据)。(对欧洲人来说)美国完全开放的移民政策、黄金标准(货币完全可兑换,且是永久的)、国际投资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加上美国社会是一个“大熔炉”的事实,使得欧洲可以调整其自身的人口和工业增长模式。欧洲的失业者可以自由的移民去美国。

在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移民限制、20 世纪 20 年代保护主义的兴起及国际黄金体系的崩溃等打断之前,大西洋简直就是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内湖。横渡大西洋的旅行使得大洋两岸的经济都能长期快速地发展。边际调整使得两岸的经济发展都更加容易。

现在,如果我们考虑一下第 6 章中提过的拉里·尼尔和保罗·尤赛丁的看法,即这些移民本身也是资本从欧洲向美国转移的一种主要形式——向美国提供廉价的人力资本——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美国因 19 世纪的欧洲移民而繁荣。尽管人们可以反驳说,后来还有数百万的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方的)移民来到美国,但是差别在于,这最后一批人力资本浪潮通常并没有来自拉美国家的投资力量相伴随、作支撑。而且,美国企业开始在海外投资开设使用人力的工厂,因此,这些新移民可能并没有受到那样热忱的欢迎。

2.5 移民成分的改变

在积累的数据里,周期性移民看起来似乎是来自欧洲的同质人群。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个人群的内部成分是随着时间而改变的。最初,它和殖民时期的移民情况差不多,人口主要来自英伦诸岛,少量来自北欧,来自南欧和东欧国家的人极少或没有。因为北部的国家(除了爱尔兰)主要信仰新教,其文化和殖民时期的美国人比较相合,这批移民基本没有引起排斥。实际上,美国独立之后的最初数十年就像殖民时期一样,移民一般是受到热烈欢迎的,因为他们是征服和填满这个空旷大陆的必要协助力量。

然而,自从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爱尔兰人和莱茵河德语地区的人群大量移民到了美国。当时宗教仍然是美国人关注的问题,所以出现了由宗教偏见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因为德语人群信仰新教,所以他们没有受到多少排斥;然而,在 1845—1860 年间,出现了 150 万爱尔兰天主教移民。结果,出现了第 6 章中所讨论的“一无所知”本土主义运动。

19 世纪的后半期,反移民的情绪再次出现。^⑬ 这次是针对意大利、希腊和南斯拉夫等来自巴尔干半岛和俄罗斯的人群。马萨诸塞的洛治(Senator Lodge)如此描述这些人:“说英语的人们和他们从来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们完全是美国人民的主体所不熟悉的一

^⑬ 尤其可以参见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1955)。

群人。”^⑭人们要求对这些人施加限制(中国人就受到了1882年的《排华法案》的限制)。^⑮工人害怕这数百万新鲜劳动力的竞争;雇主则希望得到他们的廉价劳动。

到19世纪90年代晚期,大部分移民都是来自南欧和东欧。1913年的移民数字是119.8万人,其中只有15%来自传统的西北欧移民来源地;约70%的人,即80多万人来自中欧、俄罗斯和意大利。

大西洋移民潮的结束,部分是因为美国人(已经成功定居)不再需要新移民了。1790年,美国白人中有77%的人可将国籍追溯到英伦诸岛;到1920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了41%;超过30%的人来自中欧和南欧。^⑯1921年,国会通过了第一个在整体上限制移民的法律《紧急情况配额法案》(Emergency Quota Act),为“来源国”施加了配额,以阻止移民的进一步涌入。^⑰

移民来源从西北欧向东南欧转变的原因是复杂的,包括整个19世纪从东到西各处人口的快速增长、工业化的扩张、贸易以及其他降低死亡率的因素。19世纪末的政治动荡加剧了来自东部的推动力量。然而,法国尽管有很多的政治动荡,却没有多少人移民到美国。法国的人口增长很慢,农业情况也比较稳定。可能对法国人来说,来自美国的“吸引力”是一定的,而“推动力”则不足,并且,推动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约翰·汤马斯克(John Tomaske)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析研究工作。^⑱他认为,从各个欧洲国家移居美国的移民与该国已在美国的移民(他们会关于把美国的信息寄回国内)成正相关,与当时该国的人均收入和美国的人均收入之比成负相关。因此,信息和机会成本是影响赴美移民的因素。

在表16.4中,我们比较了移民的“新”“旧”来源地区,以查看1898—1907年间库兹涅茨周期上升期的效应。我们从1895年上一个周期结束后的低潮期开始。可以认为,美国的吸引力在整个欧洲都是能感受到的。最初,移民来源“新地区”的数据和“旧地区”在一个数量级上。随后,从1899年起,南欧和东欧掀起了一个明显的高潮。移民数量迅速上升。显然,那里的推动力比北欧的大。在表16.5中,我们能看到移民来源的长期变化。

^⑭ 引用于 Jonathan Hughes, *The Governmental Habit Redux*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65。

^⑮ 西部州的美国劳工和高加索美国人之间的斗争异常复杂。见 Mark Kanazawa, “Immigration, Exclusion, and Taxation: Anti-Chinese Legislation in Gold Rush California,” *JEH*, September 2005。除了寻常的种族问题,高加索人不能理解汉语和中国习俗。当他们需要中国劳动力时,他们不能在他们自己的工资合约体系中使用。他们也不能返回使用旧的合约体系。克拉德和加仑森宣称由于执行的成本因此合约不能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重新引进美国经济。在西海岸中国人的例子中,在执行成本转向一个中间人时建立了一个体系,“帮会”。他们展示了对特别反常的劳动力合约体系的有吸引力的见解。最后,种族偏见胜利了,出现了《排华法案》。他们的论文是一个常识的典范,正视将使任何狭窄的理论应用于异常虚假的现实。Patricia Cloud and David Galenson, “Chinese Immigration and Contract Labor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EEH*, January 1987。

^⑯ Easterlin (1972), table 5.2, p. 125。

^⑰ 《国家来源法案》在1929年通过。

^⑱ John Tomaske,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county Differences in European Emigration, 1881—1900,” *JEH*, December 1971。

表 16.4 1895—1907 年来自欧洲的年移民组合

年份	“旧区”国家 (大不列颠、爱尔兰、 斯堪的那维亚、德国)	“新区”国家 (中欧*、俄罗斯、 意大利)
1895	134.2	105.5
1896	129.9	185.3
1897	84.8	122.4
1898	74.4	133.0
1899	84.8	200.9
1900	97.9	305.8
1901	106.4	334.6
1902	128.4	457.7
1903	186.7	572.7
1904	194.1	515.6
1905	238.3	682.1
1906	192.5	753.9
1907	201.3	883.1

注：每年的移民数据是千人单位。

* 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奥地利和波兰。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d 107—117.

表 16.5 1821—1920 年总移民出生地百分比

年份	欧洲			其他美洲国家	亚洲
	北部和西部	东部和中部	南部		
1821—1890	82	5	3	8	2
1891—1920	25	39	25	8	3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d 92—94, 106—120.

托马斯不会对这些变化感到惊奇。汤马斯克也不会，因为“新地区”人口和“新地区”GDP 之比的加大将会降低移民的机会成本。¹⁹ 而库兹涅茨认为主要是美国的扩张在吸引欧洲人，他可能并未预料到新旧地区之间会有这样大的差别。也许最初是新地区的推动力促使人们作出移民的决定，然后是美国的吸引力主导了一切。托马斯的模型可以包容所有的现象。政治动荡是纯经济因素之外的独立力量；因此，俄罗斯移民的数量增加，从 1897 年的 2.58 万人，到 1907 年日俄战争失败之后的 25.89 万人，这不是偶然的。

还有另外一点必须提及。托马斯指出，1921 年之后美国对移民的限制加剧了中欧和东欧极权主义的兴起。其著作的最后这一部分向来不受美国经济学家的喜爱。托马斯认为，1918 年之后，马尔萨斯浪潮继续在欧洲的中部、南部和东部蔓延，但是因为那时向美国的出路已经不再开放，欧洲各地的政府被迫在当地解决这些增长人口的问题。结果就是各地政府实施保护主义以及对经济生活的大规模干预，最终导致了极权主义。即使这些事实是正确的，但美国并没有义务继续开放移民，不能认为它对欧洲的政治偏差

¹⁹ Irving Howe' *World of Our Father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8), 提示了存在这样的情形，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犹太人从东欧移民。还可参见 Barry Poulson and James Holyfield, "A Note on Europe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 Cross Spectral Analysis," *EEH*, Spring 1974.

担负责任。这实在是一个太重的负担,不能让1921年的美国国会来承担。

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在那个时候结束了对移民的开放政策。如果到1914年大西洋移民对美国经济增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为什么在20年代时要停止它呢?通常的回答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种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混合物发展了起来。对欧洲“激进主义”的恐惧、保护主义情绪的复活,加上劳工有组织的大规模新移民的反对,产生了对限制政策的足够政治支持。^②

试图关闭移民之门的举措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20多年就开始了。1917年,美国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对移民进行识字测试,一般是要求移民用自己选择的语言阅读美国宪法中的一段话。正如克劳迪亚·戈登所言:

政策的最终转变不是很难解释。移民限制的立法历史中,复杂部分是其时间。^③

一项类似的议案于1892年时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尽管众议院投票推翻了戈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的否决,但参议院并未采取行动,这一议案胎死腹中。19世纪90年代其余的大部分类似议案都获得了劳工组织和资本家组织的共同支持。后者的态度是对1886年芝加哥干草市场广场骚乱这类事件的反应,在那次集会上,一群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发表演讲,最后发生了骚乱。罗伯特·维贝(Robert Wiebe)观察发现,随着经济从19世纪90年代的低潮中复苏,资本家的态度转变得非常快。^④1912年,参众两院再次通过议案,要求进行识字测试。总统(这次是威廉·霍华德)再次否决了这一议案。这次,参议院以压倒多数投票推翻了该否决,然而却在众议院以六票之差未能通过。当这项议案在1917年终于变成法律时,它也是通过推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否决而生效的。

戈登分析了对这一提议的数次投票的记录,发现东北部、中大西洋地区的很大一部分、中西部的约一半票数最初是支持这种测试的,而南方则持反对态度。经过15年,又有大量移民进入之后,东北部和中西部分裂了——农村地区支持进行测试,而城镇地区,尤其是移民大量涌入的大城市地区则反对测试。南方的态度保持不变,前一次因人数太少不能单列的山区和太平洋地区这次与南方的态度相同。这一斗争在大城市中继续进行,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的其他地区转而支持限制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移民再次恢复,但规模要小得多。表16.6突出表现了旧大西洋移民这一惊人现象。(较近期的移民,包括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将在第28章详述。)这是美国历史经历的一个非常基本的决定性因素。从1841年到1920年,总人口中的移民比例一直都是1951—1960年水平的三倍以上。

^② Jeremiah Jenks and Jeff Lauck, *The Immigration Problem* (1926); Edward Hutchinson, "Immigratio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62, March 1949.

^③ Claudia Gold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0 to 1921," in Claudia Goldin and Gary Libecap, eds., *The Regulated Economy* (1994), p. 225.

^④ Robert Wiebe, *Businessmen and Reform* (1962).

表 16.6 每千人中的移民数

1820—1830	1.2
1831—1840	3.9
1841—1850	8.4
1851—1860	9.3
1861—1870	6.4
1871—1880	6.2
1881—1890	9.2
1891—1900	5.3
1901—1910	10.4
1911—1920	5.7
1921—1930	3.5
1931—1940	0.4
1941—1950	0.7
1951—1960	0.5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a 9, Ad 90.

之后仍然能感受到移民大潮的余波。1930 年人口普查年是移民子女在世人数最多的年份,有 2 590 万。表 16.7 为这些人所报告的父母来源地。

表 16.7 1930 年本土出生的白人中父母为外国人或混血的,父母的来源国家

国家	数量	总的比例
不列颠岛	5 295 000	20.4
德国	5 264 000	20.3
意大利	2 756 000	10.6
中欧	2 555 000	9.9
斯堪的那维亚	2 247 000	8.7
苏联——1918 年后的地区	1 516 000	5.9
其余的欧洲西北部	701 000	2.7
其余欧洲	252 000	1.0
亚洲	152 000	0.6
法国、加拿大	735 000	2.8
其余加拿大	1 324 000	5.1
墨西哥	583 000	2.3
其他	2 525 000	9.7
总计	25 905 000	100.0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d 319—353.

到 1930 年,美国人中拥有德国父母的人数和父母来自英伦诸岛的人数相同。意大利、中欧和苏联加起来所占的比例比英伦诸岛和德国的任何一个都大。那时,大部分美国人,尤其是拥有白色皮肤或接近白色皮肤的人,对其血缘来源比例几乎没有什么概念。^② 表 16.7 是 19 世纪大西洋移民大潮的最后一点痕迹,那次大潮将如此多人的祖先带到了美国这块土地。

② 一个第五代的美国人将有 16 位美国的祖先;第七代的有 64 位。

3. 城市的磁铁效应

尽管欧洲移民主要来自乡下和小村庄,他们却在美国的城市定居下来。伊斯特林认为,截至1980年,美国的城镇人口中有53%出生在国外。^②在另一方面,美国本土白人中有3/4仍然居住在农村,只有8%的人居住在人口10万以上的城市里。^③

3.1 政治含义

国外出生的人在城市里占据主体,本土白人主要居住在乡村和小城镇,这一现象将会决定美国数十年内的政治走向。南北战争之后,共和党是主要政党,其力量来源是本土白人占优势的地区。寻找主顾的民主党则趋向于迎合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利益,而城市里国外出生的人占多数。20世纪30年代后期,移民及其后代在全国政策上可以给民主党巨大的多数票。植根于美国小城镇和农村的地区百年老党共和党却要苦苦挣扎才能获得多数。这一模式在20世纪持续了很久。

3.2 国外出生者在各地区的分布

因为死亡和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移民限制政策,1930年人口普查之后,国外出生者的绝对数量开始减少。所有移民中约有半数在从欧洲抵达美国后留在了东北部各州,住在靠近港口的地方。从1870年到1920年,这些州的总人口中约有1/5的人出生在国外。表16.8为地区分布的数据。

表 16.8 1860—1950 年外国出生的地区定居居民

统计年份	国外出生的总量*	地区人口中国外出生的百分比				外国出生的人口总量中地区的百分比			
		东北部	中北部	南部	西部	东北部	中北部	南部	西部
1860	4.1	19.1	17.0	3.5	27.3	48.9	37.3	9.5	4.3
1870	5.6	20.5	18.0	3.2	30.2	45.3	41.9	7.2	5.7
1880	6.7	19.4	16.8	2.7	26.7	42.1	43.7	6.7	7.5
1890	9.3	22.3	18.1	2.6	24.4	42.0	43.8	5.7	8.5
1900	10.4	22.6	15.8	2.3	22.0	45.6	39.8	5.5	9.1
1910	13.6	25.8	15.7	2.5	21.5	49.0	34.4	5.4	11.2
1920	14.0	23.1	13.5	2.6	18.4	48.8	32.9	6.2	12.1
1930	14.3	20.9	11.3	2.2	15.4	50.4	30.5	5.7	13.3
1940	11.7	17.0	8.4	1.5	10.8	52.4	28.8	5.5	13.3
1950	10.4	13.4	6.1	1.6	8.3	50.7	26.0	7.4	16.0

* 外国出生的人口总量单位是百万人。

资料来源: Calculated from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a 2244—6550.

② Easterlin (1972), p. 136.

③ Native whites, however, were increasingly migrating to cities, and the immigrant decision to locate there reflected the same attractions that were pulling in the native-born: economic opportunities. Lowell Gallaway, Richard Vedder, and Vishwa Shukla,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Immigrant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Economic Analysis," *EEH*, Spring 1974.

尽管移民最集中的地区是东北部,拥有巨大的新兴工业城市和肥沃农田的中北部地区各州也吸引了很多移民。实际上在 1880 年和 1890 年,那里的国外出生者比东北部还多。西部的人口相对较为稀少,但其国外出生者的比例从一开始就比较高。在海岸沿线——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州——国外出生者一直以来就处于主导地位;事实上,有些城市里有整片整片的外国风情区(例如旧金山的唐人街、西雅图的芭乐区(Ballard))。伐木和捕鱼的村庄城镇则吸引了大量了瑞典人、挪威人、芬兰人、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

南北战争之前,南方吸引的移民相对较少,阿波马托克斯似乎对这种位置偏好没起到什么作用。在表 16.8 列出的大部分时期里,住在南方的国外出生者只占国外出生总人口的不到 6%。当然,国外出生者占南方人口的比例也是微不足道的。1860 年之前南方对欧洲移民较没有吸引力的原因可能与工作机会和气候的关系比较大,而不是因为通常给出的解释,奴隶制。

1865 年之后,农业延伸到了中西部和太平洋地区,但它需要相当多的资本。许多移民成功地在那些地方定居,明尼苏达、威斯康星和爱荷华的发展就是明证。但是,大部分移民来到美国时并没有资本,而他们的技能(如果有的话)更便于在城市里使用。无论技能是否熟练,城市的服务业和工业部门都是工作机会最大的地方,移民也就集中在那里。^⑤对他们来说,“黄金海岸”就是一个城镇或城市,而对半数欧洲移民来说,这个城镇或城市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

移民是否遭受到了歧视,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麦哥得里克和坦能发现了一些针对东欧和南欧新移民的歧视的迹象。^⑥其他人则没有发现什么雇主歧视移民的根据。尤其是罗伯特·希格斯,他积极性地论证了当时不存在歧视。^⑦

琼·汉农(Joan Hannon)研究了 19 世纪末密歇根州农业器械和铁制品行业——在这个行业中有大量的移民——她认为,与新兴的劳动管理系统相关的歧视是她在小城市里发现的职业流动性较低的原因。在这些小城市里,移民甚至无法在某些职业内取得立锥之地,而在大城市里,移民只是难以升迁到较高职位。^⑧大卫·巴法姆(David Buffum)和

^⑤ David Brody, *Steelworkers in America* (1960), “The Immigrants.” 围绕美国制造业的移民雇佣的混乱问题的一个更近的调查,连同它们指示的技术水平的一个调查,见 Albert Niemi, *U. S. Economic History: A Survey of the Major Issues*, second edition (Chicago: Rand McNally, 1980), chap. 15. 在 1920 年,移民大致提供了制造业 25% 的劳动力,超过 30% 的矿工,以及产国 30% 的铁路劳工。

^⑥ Paul McGouldrick and Michael Tannen, “Did American Manufacturers Discriminate Against Immigrants Before 1914?” *JEH*, September 1977.

^⑦ Robert Higgs, “Landless by Law: Japanese Immigrants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 to 1941,” *JEH*, March 1978. 同样的结果报告于女性移民的例子中,参见 Martha Norby Frauendorf, “Relative Earnings of Native and Foreign-Born Women,” *EEH*, April 1978. 考虑到年龄和技术水平,皮特·希尔同样没有发现劳力市场对移民的歧视的强有力证据。Peter Hill, “Relative Skill and Income Levels of Native and Foreign-Born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EEH*, January 1975.

^⑧ Joan Hannon, “City Size and Ethnic Discrimination: Michigan Agricultural Implements and Iron Working Industries,” *JEH*, December 1982. 在一系列相关的论文中,汉农研究了整个 19 世纪纽约的贫困救济。在 19 世纪初用福利-收入比来衡量的救济,类似于一个半世纪后“为贫穷而战”的开始阶段。Joan Harmon, “The Generosity of Antebellum Poor Relief,” *JEH*, September 1984. 利率在 19 世纪中期下降了。相应地,贫民窟的重要性上升了; Joan Hannon, “Poor Relief Policy in Antebellum New York Stat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Poorhouse,” *EEH*, July 1985. 汉农将短期的、能自给自足的穷人数量的增加归因于市场产量的增加以及在城镇、农村地区工资势力的蔓延;城市化和工业化是次要的因素。Joan Hannon, “Poverty in the Antebellum Northeast: The View from New York State’s Poor Relief Rolls,” *JEH*, December 1984.

罗伯特·韦普尔斯(Robert Whaples)在一份最近的研究中发现,在密歇根州的家具行业中,如果和雇主同族者占雇员的比例下降1.0%,那么雇主就要多付0.1%的工资津贴。^③在较小的企业和城镇中,这种效应更加显著。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起工作的话会得到津贴,这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与把工人根据民族隔离起来相比,支付津贴更便宜。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雇主几乎不可能根据民族给出歧视性的工资待遇;没人会愿意在较低的工资下工作。然而,正如巴法姆和韦普尔斯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歧视不是只有这一种形式。^④当然,劳动力市场也不是完美的市场。

曾经有一种观点风行一时,认为移民去往城市是因为他们一无所长,除了去工厂当不熟练工人之外什么也干不了,但这种观点早已被抛弃了。^⑤美国正在工业化,城市正在发展,而移民表现得十分灵活,反应敏锐;他们定居在工资最高的地方。^⑥向城市的集中可能也体现了城市中民族群体文化的吸引力,但实际的经济条件也是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例如,巴斯克(巴斯克语也称欧斯科拉语(Euskara),语系归属未定。分布于西班牙北部的吉普斯夸省、比斯开省、纳瓦拉省和阿拉瓦省的部分地区,以及法国西南部与西班牙接壤的比利牛斯一大西洋省的部分地区)牧羊人去了西部辽阔的空旷土地。在那里他们的专业技能有充分发挥的机会,他们没有留在东部城市的工厂里做工。每一个移民都对美国的经济作出了贡献。

推 荐 阅 读

文章

Buffum, David, and Robert Whaples. "Fear and Lathing in the Michigan Furniture Industry: Employee-Based Discrimination a Century Ago." *Economic Inquiry*, vol. 33, no. 2, April 1995.

Cloud, Patricia, and David Galenson. "Chinese Immigration and Contract Labor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4, no. 1, January 1987.

Dunlevy, James A., and Henry A. Gemery. "The Role of Migrant Stock and Lagged Migration in the Settlement Patterns of Nineteenth Century Immigran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59, no. 2, May 1977.

———. "Economic Opportunity and the Responses of 'Old' and 'New' Migrants to the U-

^③ David Buffum and Robert Whaples, "Fear and Lathing in the Michigan Furniture Industry: Employee-Based Discrimination a Century Ago," *EI*, April 1995.

^④ 需要的动力能够消除基于种族的雇佣者工资歧视的希望,对这一事实的透彻体现,见 Yuzo Mutayama, "Contractors, Collusion, and Competition: Japanese Immigrant Railroad Laborers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1898—1911," *EEH*, July 1984.

^⑤ Lowell Gallaway and Richard Vedder, "The Increasing Urbanization Thesis: Did 'New Immigrants' Have a Particular Fondness for Urban Life?" *EEH*, Spring 1971; James Dunlevy and Henry Gemery, "Economic Opportunity and the Responses of 'Old' and 'New' 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JEH*, December 1978.

^⑥ Arcadius Kahan,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Some Pilgrims' Progress: Jewish Immigrants from Eastern Europe in the U. S., 1890—1914," *JEH*, March 1978; Gordon Kirk and Carolyn Kirk, "The Immigrant Economic Opportunity, and Type of Settlement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JEH* March 1978.

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8, no. 4, December 1978.

Dunlevy, James A., and Richard P. Saba. "The Role of Nationality-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n the Settlement Patterns of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mmigrant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9, no. 2, April 1992.

Easterlin, Richard. "Economic-Demographic Interactions and Long Swings in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6, no. 5, December 1966.

———.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In Lance 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 "Population Issues 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A Survey and Critique." In Robert Gallman, e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Herman E. Krooss.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 1.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77.

Frauendorf, Martha Norby. "Relative Earnings of Native and Foreign-Born Wome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5, no. 2, April 1978.

Gallaway, Lowell, and Richard Vedder. "The Increasing Urbanization Thesis: Did 'New Im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 Particular Fondness for Urban Lif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8, no. 3, Spring 1971.

———. "Emigration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to the United States, 1860—191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1, no. 4, December 1971.

———. "Population Transfers and the Post-Bellum Adjustments to Economic Dislocation, 1870—192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0, no. 1, March 1980.

Gallaway, Lowell, Richard Vedder, and Vishwa Shukla.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Immigrant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Economic Analysi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no. 3, Spring 1974.

Goldin, Claudi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0 to 1921," in Claudia Goldin and Gary Libecap, eds., *The Regulated Ec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Haines, Michael R., and Barbara A. Anderson. "New Dem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te 19th-Century United Stat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5, no. 4, October 1988.

Hannon, Joan U. "City Size and Ethnic Discrimination: Michigan Agricultural Implements and Iron Working Indus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2, no. 4, December 1982.

———. "The Generosity of Antebellum Poor Relief."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4, no. 3, September 1984.

———. "Poverty in the Antebellum Northeast: The View from New York State's Poor Relief Roll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4, no. 4, December 1984.

———. "Poor Relief Policy in Antebellum New York Stat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Poorhous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2, no. 3, July 1985.

Higgs, Robert. "Mortality in Rural America, 1870—1920: Estimates and Conjectur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0, no. 2, Winter 1973.

———. "Landless by Law: Japanese Immigrants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 to 1941."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8, no. 1, March 1978.

———. "Cycles and Trends of Mortality in 18 Large American Cities, 1871—190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6, no. 4, October 1979.

Hill, Peter J. "Relative Skill and Income Levels of Native and Foreign-Born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2, no. 1, January 1975.

Kahan, Arcadius.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Some Pilgrims' Progress: Jewish Immigrants from Eastern Europe in the U. S., 1890—191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8, no. 1, March 1978.

Kelley, Allen C. "Scale Economies, Inventive Activity, and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Population Growth."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0, no. 1, Fall 1972.

Kanazawa, Mark. "Immigration, Exclusion, and Taxation: Anti-Chinese Legislation in Gold Rush Californi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5, no. 3, September 2005.

Kirk, Gordon W., and Carolyn J. Kirk. "The Immigrant, Economic Opportunity, and Type of Settlement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8, no. 1, March 1978.

Kuznets, Simon. "Long Swings in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and Related Economic Variable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02, no. 1, February 1958.

———. "Notes on the Pattern of U. S. Economic Growth." In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e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McGouldrick, Paul F., and Michael B. Tannen. "Did American Manufacturers Discriminate Against Immigrants Before 191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7, no. 3, September 1977.

Meeker, Edward. "The Improving Heal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850—1915."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9, no. 4, Summer 1972.

Mutayama, Yuzo. "Contractors, Collusion, and Competition: Japanese Immigrant Railroad Laborers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1898—1911."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1, no. 3, July 1984.

Neal, Larry, and Paul Uselding. "Immigration, A Neglected Source of U. S. Economic Growth, 1790—1913."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nd series, vol. 24, no. 1, March 1972.

Niemi, Albert W. "The Role of Immigration in United States Commodity Production, 1869—1929."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52, no. 1, June 1971.

Poulson, Barry W., and James Holyfield, Jr. "A Note on Europe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 Cross Spectral Analysi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no. 3,

Spring 1974.

Tomaske, John A.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country Differences in European Emigration, 1881—19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1, no. 4, December 1971.

Williamson, Jeffrey D. "Migration to the New World: Long-Term Influences and Impact."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no. 4, Summer 1974.

书籍

Brody, David. *Steelworkers in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Easterlin, Richard. *Population, Labor Force, and Long Swings in Economic Growth: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Erickson, Charlotte. *American Industry and the European Immigrant, 1860—1885*.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7.

Higham, John.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s Nationalism, 1860—1925*.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5.

Jenks, Jeremiah, and Jeff Lauck. *The Immigration Problem*.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1926.

Jerome, Harry. *Migration and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26.

Kuznets, Simon, and Ernest Rubin. *Immigration and the Foreign Born*.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54.

Taylor, Phillip. *The Distant Magnet: European E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 1971.

Thomas, Brinley. *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Wiebe, Robert H. *Businessmen and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Williamson, Jeffrey G.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Development: A General Equilibrium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第 17 章

工业化与城市的发展

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经济史必然是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在最初的工业萌芽出现之后,在美国出现了大工业、大商业并带来相关的社会、政治影响。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从林肯的农业国家变成了西奥多·罗斯福的美国,一个城市化的工业社会。

1. 初期观察

一些简要概括的总结可以让我们先略微了解一下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总体的印象”,所以,为了了解森林,我们要先查看组成森林的树木。^① 是什么促使这片森林——这个城市化的工业社会——发展成这个样子的? 森林不是线性的,规模无限的城市也不是。城市发展存在其特有的形状、结构和限制。长期以来有观点认为,美国历史中的这一工业化时期是由两大基本经济因素主导的:(1) 内部经济体,它使在工厂中进行生产比在分散的小型设施里进行生产更加有利润;(2) 外部经济体,它使多个工厂集中在一起进行生产比各个工厂分散单独生产更加有利润。^②

最近,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提出了一些城市系统的模型,他认为企业层面的经济体规模、交通成本和要素的流动性形成了城市系统,其模型没有提到外部经济。^③ 在与之相关的研究中,萨柯·金(Sukkoo Kim)指出,美国发展出地区专业化、本地化的长期趋势,其原因是由于内部经济体和跨地区贸易。金没有找到支持外部经济体的作用的证据。^④

是什么创造了内部经济体? 一个企业选择厂址的基础是生产和运输成本的最小化。英格兰最早的工厂的出现,是因为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的水力纺纱机(1769年)和萨缪·克罗姆顿(Samuel Crompton)发明的走锭细纱机(1779年),这两项发明都是纺纱技术的革命。使用了新的机械之后,监督和质量控制变得非常重要,如果要降低生产管理的单位成本,就得把工人集中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工厂。那么把工

① 这一章涵盖的对这一时期和议题最好的、短而精炼的调查,见 Robert Higg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1865—1914* (1971)。

② 对于一个没有城市将发展的世界,见 *ibid.*, pp. 59—61。多样的物质特征和内部外部的经济足够在一个商业世界中产生城市。

③ 克鲁格曼已经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文献。最近的两篇是 Paul Krugman, “On the Number and Location of Cities,” *EER*, April 1993; and “First Nature, Second Nature, and Metropolitan Location,” *JRS*, May 1993。

④ Sukkoo Kim, “Expansion of Markets and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Trends in U. S. Regional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1860—1987,” *QJE*, November 1995。

厂放在哪儿呢?

自然界的动力资源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因为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利用了自然界的动力资源(以流水为动力),使用这种技术的工厂不得不将其有形资本(厂房、设备)设在靠近这种资源的地方。那些工作和这些厂房、设备相关的人也就不得不前往这些地方。

从同样在 1769 年申请专利的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乔尔·莫克里称这一年为充满奇迹的年份)到现代的电机,工厂地址对自然动力资源位置的依赖越来越小。因为煤和之后的电力都是可以运输的,所以工厂地址越来越依赖于运输成本。既然企业不再被束缚在某种动力资源的附近,它们可以根据成本自由选择移动到离原材料市场近的地方或是离产品市场近的地方。

蒸汽机可以看做是一种降低运输成本的技术。它可以用于水运(汽船),也可以用于陆地运输(铁路),它使整个 19 世纪的运输成本一直在下降。在现代,高速公路、可靠的长途通信网络、喷气式飞机、计算机、卫星通信等进一步解放了这些力量。然而,我们现在查看的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当时的工业选址受到水运、陆运以及之后迅速成为主要动力来源的可燃烧以产生蒸汽的烟煤的强烈影响。

南北战争之前,芝加哥之类大城市里的企业已经发现,它们可以将产品卖到更远处的市场,成本却相同(甚至更低)。在 19 世纪的进程中,这些企业采用了新的生产程序,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多的产品。在整个 19 世纪,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都在下降,且彼此促进。

是什么创造了外部经济?如前所述,工业选址倾向于集中在一起,而不是在整个大陆上随机散布。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厂倾向于把厂址设在互相靠近的地方。每个工厂都因其他工厂的存在而获益:共同使用运输设施、劳动力集中、社会开支降低了成本。在历史上,第一步是初期的选址活动,然后生产活动一般是基于地区性的出口行业的。一旦进行到了这一步,随着出口行业及其支持行业的发展、增多,就有可能形成一个成功的工业网络。虽然克鲁格曼和金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些效应相对来说不太重要,但并不是说这些效应不存在。

基本可以认为,在当时的经济中,工厂就意味着城市。美国的城市化甚至在殖民时期就已通过商业、交通和小规模的生产而开始,而工业化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对大部分 19 世纪的城市来说,可通航的水路和铁路、包括燃料在内的原材料以及产品市场,是决定城市地址的主要因素。

大部分工业城市的人口增长集中在旧东北部、港口、中大西洋各州的河流沿线、大湖区周围、墨西哥湾港口、密西西比流域的主要河流交汇点,以及几个内陆地区(达拉斯、丹佛和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和总土地面积相比,工业化所改变的实际空间是非常小的。如果忽略最大的二三十个城市,1914 年的美国看起来几乎就像 19 世纪 20 年代一样充满乡村风情、未受污染。实际上,在新英格兰的落后地区或阿巴拉契亚山脉之类的地方,随着人们离开那里前往城市寻找工作或去西部谋求更好的土地,那些地方又重新变成了森林。

2. 重工业的兴起

亨利·福特生于1863年,即盖茨堡战役的同一年。在1913—1914年的模型年(model year)中,当时已成立11年的福特汽车厂出产了248 307辆完整的汽车。平均每个工作日生产近800辆汽车,如果按每天八小时计算,每36秒就生产一辆。10年后,福特的装配线达到了其产量的顶峰:每15秒就生产一辆T型汽车。位于密歇根州高地公园的装配流水线工厂于1913年开始运营。通过这个工厂,美国长期以来实验的可互换式生产、节约劳动的分工和资本密集、利用资源的技术选择取得了胜利:随着“美国体系”在福特的装配线上达到顶峰,大批量生产完全改变了工业的形式。他出生时美国仍有奴隶,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后来他可以乘坐自己制造的飞机飞行。但是,我们要注意,在装配流水线出现之前,这一伟大变化就已经开始了。“美国体系”在1851年的伦敦水晶宫展览会上就广获关注,那次展览的产品包括麦考密克的收割机、柯特的旋转器、辛格的缝纫机等,它们全都使用了可互换的零件。

2.1 工业的发展

约瑟夫·戴维斯再次为我们提供了工业发展过程的概览。图17.1的数据从1850年开始,和第11章提供的信息有一些重叠。在这种比例尺下,1857年的大萧条几乎完全看不出来,不过1893年的大萧条以及20世纪初期的一些经济衰退则显示得非常明显。数据结束于1915年,那时美国经济已经做好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⑤如果我们以1860年为基础,比较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基本附加价值数据,其结果在表17.1中。从1860年到1914年,人口几乎增长到了3倍的数量。如果我们用1914年的人口(9240万)除以1860年的人口(3150万),结果是2.93。以“1914/1860”命名的这一列里的数据都可以用这种方式理解。“1914/1860人均”这一列里的数据等于前一列的数字除以2.93。

1860—1914年间,这些制造行业中的每一个都比人口增长得更快。印刷业(27)是增长最快的行业,即使按人均来算也增长了10倍以上。皮革业(31)是增长最慢的行业,也比人口增长的速度快一半以上(1.6)。总体而言,在这54年中,制造业部门增长到了12.5倍,人均附加价值提高到了4倍以上。1860年之前,美国人在棉纺生产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现在他们又在商品制造业上重演这一成就。在这一过程中,这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工业化的巨人。

^⑤ Joseph H. Davis, “An Annual Index of U. S. Industrial Production, 1790—1915,”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9, no. 4, November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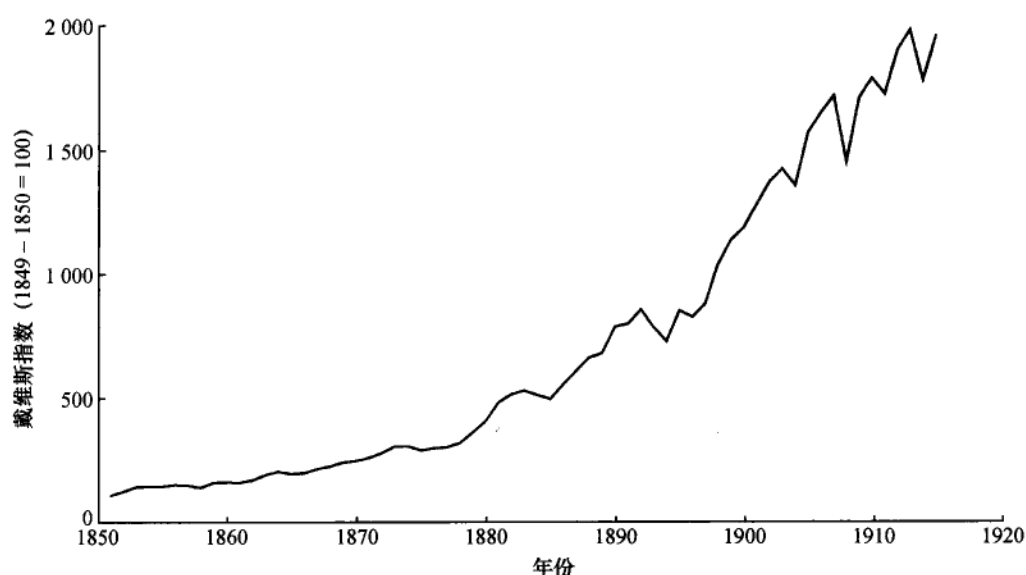


图 17.1 1851—1915 年的工业产量

资料来源: Joseph H. Davis, "An Annual Index of U. S. Industrial Production, 1790—1915,"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64, no. 4, November 2004.

表 17.1 1860—1914 年价值增加的增长过程

2 进制 SIC 码	1860 年 价值增加 (百万美元)	1914 年 价值增加 (百万美元)	1914/1860	人均 1914/1860
27 印刷业	22.6	668.0	29.6	10.1
38 工具	3.5	97.8	27.9	9.5
30 橡胶	5.7	137.9	24.2	8.3
21 烟草	14.4	283.1	19.7	6.7
35/36 机械	50.4	949.2	18.8	6.4
37 交通设备	27.7	498.6	18.0	6.1
29 石油	15.5	270.8	17.5	6.0
26 纸	12.1	203.7	16.8	5.7
39 不同种类的	25.8	411.4	15.9	5.4
20 食物	104.5	1 619.6	15.4	5.3
28 化学品	26.3	375.3	14.3	4.9
34 构造金属	35.3	486.7	13.8	4.7
所有制造业	767.2	9 607.8	12.5	4.3
33 原料金属	54.4	634.5	11.7	4.0
32 石头、粘土和玻璃	32.9	377.4	11.5	3.9
23 服装	58.3	662.9	11.4	3.9
25 家具	17.5	178.8	10.2	3.5
24 木材	76.5	659.5	8.6	2.9
22 纺织品	108.2	748.2	6.9	2.4
31 皮革	75.6	353.4	4.7	1.6

资料来源: 数据收集自 Louis Cain and Donald Paterson, "Biased Technical Change, Scale, and Factor Substitution in American Industry, 1850—1919,"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6, no. 1, March 1986.

2.2 投入要素

为了把产出提高到如此程度,必须提高投入的数量。投入提高的比例是怎样的? 罗伯特·盖尔曼把国民生产净值(net national product, NNP)中的投入分成三种。如果我们用他的数据中的1910年的价值除以1860年的价值,结果是:劳动,3.4;土地,3.7;资本,10.3;NNP,6.2。^⑥ 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与土地和劳动相比,资本的增加相对要高得多。我们用资本来代替更加稀缺的资源,也就是熟练工人,10.3倍的资本投入加上其他两项投入,产生的NNP增长了6倍多。

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就是增加使用的资本,尤其是工厂,以生产最终产品。资本从何而来? 它将产出高于现有消耗的部分用于资本投资。家庭、企业和政府必须储蓄,才能释放出资本这种资源。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较老的概念,叫做资本产出比(capital-output ratio),就是衡量这种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的。为了生产1美元的最终产品,要投资多少资本? 如果这个比例是2:1,即2美元的投资能创造1美元的产出,那么投资额需要增加2%才能让最终产量增加1%。为了衡量这个比例,我们需要一种防御性的资本观念。我们必须假定存在储蓄的动机,且投资的实际过程不会随时间降低平均产出。而且很明显,增加投资的技术效率可以降低资本产出比。

萨姆纳·斯利克特(Sumner Slichter)以实际的工厂设备、机器以及未售出的存货的重置价值(replacement value)衡量工业资本的数量。他发现,在1850—1912年间,每1美元的国民收入中的工业资本增长了41%到75%,其数值因他所使用的估计方法不同而有差别。^⑦ 如果收入是固定的,那么这种资本设备的生长将需要每1美元的收入中有更多的比例被用来生产而不是消费——即被用来投资。

然而,如果收入是增长的,那么消费和投资就可以同时增长。既然每个家庭有了更多的收入,增加储蓄(不消费的部分)的比例就不一定要减少消费。例如,假定 T_1 年的收入是100美元,其中消费了80美元,储蓄了20美元。 T_2 年的收入增加到了150美元,其中消费了112.50美元,储蓄了37.50美元。 T_1 年的储蓄收入之比是20%, T_2 年的储蓄收入之比是25,然而消费却从80美元增长到了112.50美元。国民生产净值的生长——1910年是1860年的6.2倍——使得生产者可以获得大量的资本而消费者也获得了更多的产品和服务。^⑧

杰弗里·威廉姆森认为,投资能力的增强更多的是因为资本商品的相对价格降低了,这一因素比其他任何单独因素的作用都要大。^⑨ 实物资本的生产率提高,其本身也是

⑥ Robert Gallman, "The Pace and Pattern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in Lanc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2), calculated from table 2.9, p. 34.

⑦ Sumner Slichter,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Histor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62. 他的工业资产的资产输出率在1850年是1.63,在1900年在2.3至2.9之间波动。

⑧ 罗伯特·高尔曼估计事实上储蓄率随着工业化进程显著增加了,正如文中例子所示。他估计储蓄从19世纪60年代NNP的14%增加到80年代,多于25%。Robert Gallman, "Gross National Produc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4—1909," in Dorothy Brady, ed.,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vol. 30 (1966)。

⑨ Jeffrey Williamson, "Inequality, Accum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mbalance: A Growth Equity Conflict in American Histor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27, no. 2, January 1979, p. 249.

工业发展的结果,而且它促使了收入、投资总额和储蓄率大大增长。

即使现在,如果试图精确认定导致收入增长的原因,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尽管那些较早时期的数据资料较为缺乏,罗伯特·盖尔曼仍然进行了勇敢的尝试和巨大的努力,试图解释国民生产净值的增长。^⑩ 据他计算,从1870年到1930年,产出的增长中约有43%来自劳动投入的增长,4%来自土地,27%来自资本,27%来自不可测量的因素,比如劳动力受到了更好的教育、更有效的经济组织形式、设计的改善等。

2.3 其他变化指标

尽管发生了重大的技术革命(我们将在后面详述),但工业产出的巨大增长主要还是来自劳动力的充足供应和廉价原材料的利用。让我们重复一下表17.1中的操作,但是这次采用劳动力的投入(斯坦利·莱博高特的数据)作为比较的基础。结果列在表17.2中,我们可以对这些变化得到一个大概的印象,也许比表17.1中表现得更为精确一些。

表 17.2 选定的工业增长衡量:1910 年数据是 1860 年的乘数

第一部分:劳动力		第二部分:基础产业实物产出		第三部分:制造业实物产出	
总计	3.3	铁矿	19.8	制造业产出总计	10.8
农业	1.9	原油	419.1	食物和其产物	3.7
矿业	6.7	生煤	46.1	纺织品和其产物	6.2
建筑业	3.7	宾夕法尼亚无烟煤	7.7	铁、钢及它们产物	25.2
所有制造业	5.8	铜矿	67.5	其他金属和金属产物	26.0
贸易	6.3				
铁路	24.3				

注:所有乘数都是从原始数据计算得来。

资料来源:第一部分: Calculated from Stanley Lebergott, "The American Labor Force," in Lanc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table 6.1, p. 187; and Thomas Weiss, "U. S. Labor Force Estimat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 Gallman and J. Wallis, eds.,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Before the Civil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 37 and 51. 第二部分: Calculated from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b 25, 28, 29, 73, 75. 第三部分: Calculated from Edwin Frickey,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0—191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pp. 38—43, 54.

在表17.2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美国工业化过程中资源改变的统计学证据。首先注意,在劳动力部分中,农业劳动力的增长要小于总劳动力的增长。1910年,农业劳动力为1190万,约是1860年的590万的两倍,但是其增长速度与总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仍然不成比例——总劳动力从1110万增加到了3750万。^⑪ 除去技术和生产率的变化,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尽管农业劳动力在1860年到1910年间翻了一番,但其增长率只有总劳动力增长率的59%。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分析其他的数据。

^⑩ Robert Gallman, "The Pace and Pattern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in Davis (1972), pp. 33—39. 1870—1910年的计算见 Jeremy Atack and Peter Passell, *A New Economic View of American Histor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94), table 1.5.

^⑪ 农业产生了增加的价值的61%,工业占39%,以同样的单位测量。到了1909年,这两个数字是26和74——比翻番更甚。Robert Gallman and Edward Howle, "Trend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Since 1840," in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e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1971), p. 26.

工人一般会加入增长最快、对劳动力需求最大的行业,导致了相对较快的劳动力增长速度。正如维克托·克拉克(Victor Clark)所说:“美国的工业发展是劳动力和原材料结合的结果。”^⑫因此,即使1910年1190万农业劳动力的数字绝对超过了矿业的100万,但矿业劳动力增长到了6.7倍,这表明矿业的产出(和/或利润)也有同样惊人的增长。确实有吗?观察表17.2中基础产业实物产出部分的矿业活动增长数字,将其与总劳动力的增长数据相比较。这些数字是巨大的。在这一时期,美国利用了其巨大的自然资源储备,为工业的扩张提供了基本原材料。

除了食物的生产(参见表17.2的制造业实物产出部分),制成品的实物产出远远超过了劳动力(和人口)的增长速度。即使纺织这个最古老的制造业也比总劳动力(及棉纺织业工人人数)的增长率高出一半以上。金属生产的增长总体而言比总劳动力的增长率高出7倍多。

2.4 再次节约劳动力

如前所述,内森·罗森伯格对“技术性选择”这一观点进行了润色,强调美国人通过大量利用最丰富的资源——资本和原材料,从而保存了相对稀缺的资源——劳动力。尽管他的论述主要以南北战争之前的材料为基础,我们却在19世纪晚期的工业化进程中看到了其观点的闪光之处。美国人仍然像以前那样奢侈地利用木材(1910年的木材产出是1870年的3倍),但他们现在转而利用(当时)超级丰富的煤、铁资源来进行伟大的工业化了。^⑬该隐和派特逊再次确认了美国工业一贯具有节约劳动力而利用原材料的技术。^⑭伊丽莎白·菲尔德-亨利(Elizabeth Field-Henry)证明,在完全相同的时期里(1850—1919年),节约劳动力总偏差是直到1890年的节约劳动力男性偏差、1900—1919年间的男性使用偏差及整个时期劳动力女性使用偏差的和。^⑮

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认为,创建巨型公司的动力是理由充分的,因为既可以减少运输成本,“连续过程生产技术”又产生了规模经济。在这种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少数行业里,如烟草产品、钢铁和肉类加工业,巨型公司在1870—1900年间就出现了。杰里米·阿塔克在一项独立研究中发现,在这些行业中,1900年的普通大小的企业几乎和1870年最大的重工厂一样大。在那些不受运输成本的巨大改善及这种规模经

^⑫ Victor Clark, *History of Manufac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9), p. 2.

^⑬ 见一个例子, Nathan Rosenberg and Manuel Trajtenberg, “A 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 at Work: The Corliss Steam Engine in the Late-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4, no. 1, March 2004, 他指出蒸汽机的流传可能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Sukoo Kim,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Did the Steam Engine Contribute to 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42, no. 4, October 2005, 反驳这个效果是很小的。

^⑭ Louis Cain and Donald Paterson, “Biased Technical Change, Scale, and Factor Substitution in American Industry, 1850—1919,” *JEH*, March 1986. 加文·赖特强调了美国自然资源对19世纪末的发展的重要作用。Gavin Wright,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uccess, 1879—1940,” *AER*, September 1990; and Gavin Wright and Richard Nels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The Postwar Er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EL*, December 1992.

^⑮ Elizabeth Field-Hendry, “The Role of Gender in Biased Technical Change: U. S. Manufacturing, 1850—1919,”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8, no. 4, December 1998.

济影响的行业中,单个重工厂及其管理组织则变化不大。^⑥

总体而言,上述文献认为,在19世纪晚期,实物资本和人的技能互为替代品。一方面,正如克劳迪亚·戈登和罗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所说,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两者互为补充。他们试图解释这两者之间的转变,认为技术进步的过程存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安装机器,需要熟练的机械师作为机器的补充。第二个阶段是由不熟练的工人使用机器。机器代替了原生产这些产品的熟练劳动力(如织工)。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那些更加资本集约型的行业,那些使用批量、连续过程技术的行业,那些钱德勒强调需要更多的管理者和专业工作者的行业,也是那些“需要较高教育水平”的行业。^⑦

2.5 能源

这样大量的产出增长需要的能源消耗也同样巨大。在1860—1910年间,利用矿产资源生产的能源增长到了27.4倍。^⑧利用软烟煤生产的能源增长到了46.1倍。到1910年,美国所有的非动物能源中有整整64%来自烟煤。令人惊奇的是,美国的非动物能源中仍然有11%是通过燃烧木材产生的蒸汽。硬无烟煤占了12.4%,石油占6.1%,天然气占3.3%,水电占3.3%。利用燃煤的铁路系统从1860年的30626英里里程增加到了1910年惊人的351767英里(包括铁路车场),增长到了11.5倍,其劳动力队伍增长到了24.3倍(见表17.2)。

20世纪20年代铁路使用柴油机以前,所有的铁轨上跑的都是燃烧煤的机车。煤资源十分丰富,因而价格低廉(当然,煤矿工人的伤亡则是完全另外一个问题了),在环境保护的限制出现以前,美国工业化的主要能源就来自这种资源。仅仅烟煤的消耗并不能衡量能源利用中的显著转变:主要利用全国各地的燃煤和(之后的)燃油的中央发电厂来发电。电力甚至更加便宜,再加上小马力电动机,能源实际上可以在所有制造业重工厂中随意使用。工厂设计和布局现在不必再受到中央能量来源的限制(代替生产过程)。到1909年,电力已经占制造业所有初级马力的21%,这一数字到1919年时达到了50%,到1929年时达到了75%。正如亚瑟·伍夫(Arthur Woolf)所说,电力化几乎是另一场革命,其影响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能感受到。^⑨

2.6 工业收入的变化

表17.3比较了彼得·特明根据人口普查结果所作的对1860年和1910年工业的附加价值——获得的收入减去材料成本——的编辑。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些变化的另一

^⑥ Alfred Chandler, Jr., *The Visible Hand* (1977); and Jeremy Atack,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Corporation," *EEH*, January 1985.

^⑦ Claudia Goldin and Lawrence Katz, "Technology, Skill, and the Wage Structure: Insights from the Past," *AER*, May 1996. 也参见他们的"The Origins of Technology-Skill Complementar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3, no. 3, August 1998.

^⑧ 数据来自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b 164.

^⑨ Arthur Woolf, "Electricity, Productivity, and Labor Sav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 1900—1929," *EEH*, April 1984.

个指标:制造成品过程对原材料附加了多少净收入。

表 17.3 1860 年和 1910 年按附加值计算的最多的前 10 大工业

1860		1910	
工业	附加值	工业	附加值
棉花制品	55	机械	690
木材	54	木材	650
靴子和鞋子	49	印刷出版	540
面粉和膳食	40	钢铁	330
男服	37	啤酒	280
铁	36	男服	270
机械	33	棉花制品	260
羊毛制品	25	烟草制品	240
客货车	24	有轨电车	210
皮革制品	23	靴子和鞋子	180
所有制造业	815	所有制造业	8 529

注:附加值的单位是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Peter Temin, "Manufacturing," in Lanc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pp. 433 and 447.

注意,到 1910 年,四个全新的行业进入了十大行列:印刷、啤酒、烟草产品、有轨电车。面粉和膳食、羊毛制品、客货车以及皮革制品在 1860 年时还是十大之一,现在排名则下降了。这些变化反映了社会的转变。

新的大型行业反映了一个拥有大众传播工具、公共交通运输和比 1860 年“更高的”消费标准(如可辨认来源的酒精饮料、雪茄、香烟等奢侈品)的社会。面粉和膳食的出产,除了出口之外,不会比人口增长快多少,当人均收入增加时,它肯定不会增长得和收入一样快(这里再次反映出恩格尔定律)。当收入增加时,直接羊毛制品的需求会减少,因为人们会用不同的布料做夏天和冬天的衣服(夏装用棉布和亚麻)、改善家里和办公室的取暖设施、将棉花和毛线进行混纺以获得更轻更软的衣服。而且,古德伊尔贴边缝、更好的缝纫机、高效的配送手段使得鞋类进入了十大行列。制鞋业的商品化导致了工厂生产。^②木浆造纸这一革命性手法的采用使得印刷业和出版业取得了原先用破布所制的优质纸张所不能想象的突飞猛进。

到 1910 年,机器行业本身创造的附加价值就相当于 1860 年十大行业加在一起的总价值的 85%。正如罗森伯格所言,机器工具行业在 19 世纪末出现了自动化和半自动化技术之后进入了全盛期,它对革命性的标准化机器的推广起到了核心的促进作用。^③木材继续保持了第二主要创收行业的位置。可再生的木材资源极为丰富,所以美国人继续

^② William Mulligan, Jr., "Mechanization and Work in the American Shoe Industry: Lynn, Massachusetts, 1852—188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1, March 1981.

^③ Nathan Rosenberg, *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72).

铺张浪费地使用木材。随着切割、刨削机器的改进,又开发出了许多木材的新用途。到1910年,钢成为美国制造业的基本金属。

最后,这些行业只是1910年的十大。其他行业也在19世纪晚期的技术推动下迅猛发展——石油、化工、照明和驱动用电、汽车行业(及支持它的基础设施,包括公共机构建设的高速公路)——这些行业将迅速改变1910年的工业格局,其变化之大将让人简直无法辨认。它们只是工业化的迅猛冲击的一小部分。变化不会停息。美国工业化形成了一个不断创新的世界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2.7 技术的变化

为了达到真正的可互换零件式的生产技术水平,必须取得比南北战争之前更巨大的技术进步。^②正如保罗·尤赛丁所说,“美国体系”这一词汇的用意就在于表达美国机械技术的独特之处:

这一类型的机器或产品具有如下的主要特质:(1) 标准化,生产的产品整齐划一;(2) 劳动的分工与专业化;(3) 工作方式统一;(4) 工作任务常规化、标准化、商品化。^③

美国体系与手工生产的晚期阶段或英国体系的真正不同之处在于,它使用了具有特殊目的的机器以生产可互换的零件。

具体来说,美国人发明了一种通过铣削(milling)将不需要的金属去除的程序。铣削机在1812年战争时期出现,到19世纪30年代时,已在美国比较常见。内森·罗森伯格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他对金属加工技术的进步在美国的传播作出了解释。^④罗森伯格的研究以机器工具行业为中心,这一行业用特殊的机器工具满足客户的专业化需求。这些工具、资本货物,最初是定制的。当满足了一个客户的专业化技术需求时,人们发现这一技术可以进行移植,用来满足另一行业的类似需求。这个技术就此传播开来。最终,特定机器的配置变得标准化,这些机器可以大量生产了。机器的标准化降低了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使得技术可以进一步传播,罗森伯格称这一过程为技术融合(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

尤赛丁精确地区分了“制作”(making)机器(凭指定一次做一个)和制造(manufacturing)机器(为所有买家大批量生产)。其中的经济学是我们所熟知的。美国人善于对欧洲的测量设备进行改良,以适应一个更加广阔的市场。尤赛丁指出,欧洲人制作了极好的测量设备以改进机器制作中的精确度,美国人一次又一次地进口这些设备,然后将其融合进机器中,生产出各个可互换的零件。市场决定了这些发展的性质。美国人希望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使用机器,从而节约劳动力。在机器制造中采用越来越精密的测量标

^② Paul Uselding, "Measuring Techniques an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in Otto Mayr, ed., *The American System of Manufacturing* (1981). 对于19世纪末在德国市场,美国制造金属产品的质量的提高以及它们有竞争力的价格的介绍见 Roderick Floud, "The Adolescence of American Engineering Competition, 1860—1900," *EHR*, February 1974.

^③ Paul Uselding, "Studies of Technology in Economic History," in Robert Gallman, ed.,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 1 (1977), p. 168.

^④ Nathan Rosenberg,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JEH*, December 1963.

准,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

尤赛丁怀疑,即使到了1860年,美国的产品“在商店的层面”还并不存在真正的可互换性。即使是滑膛枪这样的标准化产品,仍然需要锉磨零件才能装配起来。必须发明制造出减少误差的测量设备。车床、铣削机、螺纹环塞规、螺旋测径器甚至精确的钢制扁尺,直到19世纪晚期才被机械师和制造厂广泛使用。

在19世纪,美国社会极为欢迎改变和进步。正如之前的章节所述,“你不能阻止进步”的观念甚至渗入了关于财产权的法庭——这是优先高于规定的例子。随着经济发展,新产品和新技术层出不穷。即使只列出19世纪晚期最主要的技术进步,也会大大超出本章的篇幅。如果想了解更多的细节,请参见保罗·尤赛丁关于技术史的研究论文。^⑤

对于钢铁来说,其基本的改变是广为人所知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首先,产量的提高伴随着惊人的规模经济。特明指出,1860年,一个“好的”美国高炉每天可生产7—10吨生铁。到1910年,这一数字达到了500吨,而且有了保存和利用其释放的高温废气的技术,其生产效率也更高了(之前这些气体都浪费掉了)。^⑥在炼钢业中,两个重大的创新——酸性转钢炉(旧称贝氏转炉)和西门子平炉——相继出现。酸性转钢炉发明于1856年,在南北战争之后被成功引入美国,它使美国的炼钢业跃居世界第一位。然而,酸性转钢炉刚刚获胜,它就被平炉技术超越了,参见表17.4。

表 17.4 1870—1913 年的钢铁产量

年份	总量	酸性转钢炉	平炉	百分比	
				酸性转钢炉	平炉
1870	77	42	2	54.5	2.6
1880	1 397	1 203	113	86.1	8.1
1890	4 779	4 131	566	86.4	11.8
1900	11 227	7 481	3 638	66.6	32.4
1910	28 330	10 478	17 672	37.0	62.4
1913	34 087	10 604	23 340	31.1	68.5

注:除特殊标准,数据单位是千短吨。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d 399—401.

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是当时最大的炼钢企业,它以酸性转钢炉为基础,在整个炼钢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亨利·贝塞麦(Henry Bessemer)爵士本人说服了年轻的卡内基,让他相信“贝氏火山”可以用于美国的铁,卡内基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返回匹兹堡安装了首个贝塞麦工程。

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随着产量提高,价格会下降,收益会朝着最有效率的方向移动。1873年时,钢轨的价格是一吨120美元,1898年,价格降到了一吨17美元。在这个

^⑤ Uselding (1977).

^⑥ 可能是近代最好的研究见 Peter Temin, *Iron and Steel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An Economic Inquiry* (1964). 关于鼓风炉技术的很好的一个研究,见 Robert Allen, “The Peculiar Productivity History of American Blast Furnaces, 1840—1913,” *JEH*, September 1977.

时期里,安德鲁·卡内基以一个新人的身份进入了钢铁业,战胜了世界上所有的炼钢厂。他是通过对市场的无情利用做到这一点的,他让销售队伍接受市场价格,让经理们谋求利润。每次重修高炉时,卡内基都要求设计上有所改进。

在19世纪90年代,钢轨的价格是一吨28美元,这个行业渴望成立一个固定价格联盟,就像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一样。传统上,在匹兹堡存在这样的机构,但是,在1890年出台《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之后,加入这种组织变成了危险的事情。卡内基知道,采用平炉技术带来的成本下降和产量提高可以带来他想要的销售额。他告诉竞争者,他不再想要协议定价了:“只要我想要,市场随时是我的。我看不到任何把我的利润与你分享的理由。”^{②⑦}

卡内基毫无保留地抛弃了他的大型酸性转钢炉工厂,安装了西门子平炉,据说,他曾经召开过这样的董事会:“那么,今年我们应该扔掉什么呢?”^{②⑧}技术过时的很快,一个竞争的经济环境迫使人们不断采用创新的技术。^{②⑨}那些跟不上脚步的人只能认输。

安德鲁·卡内基是典型的19世纪美国大亨,霍瑞修·爱尔杰小说式的从乞丐到富豪的人物,这种企业家的竞争手段被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称为“创造性的破坏”。如果要向经济生活中引入创新的技术,效率较低的旧技术必须被抛弃。充满创新的经济体必然会在身后留下一系列过时的淘汰品。肯尼思·索科洛夫和佐利纳·汗(Zorina Khan)利用美国专利记录进行研究,他们认为19世纪的上半期是一个充满重大创新的时期。^{③①}一般来说,专利活动是扩大经济周期(procyclical)、充满创业精神以及与市场增长成正相关的。无论参照系是全部记录还是限于160个“伟大的”发明家,这些评价都是符合事实的。

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需求的衡量标准就是利润。它可以通过降低成本来提高,而这正是19世纪的新技术所做的事情。钢也许是最为戏剧性的例子了。其中牵涉到了巨额的金钱——数以千计的工人、煤、焦炭、铁路、河船、内陆货船航线——随着这一行业的崛起,整片整片的社区和城市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因为它,有人发了大财,有人破产,社会关系中出现了戏剧性的冲突——例如,著名而暴力的1892年宅地大罢工,最后卡内基钢铁动用了平克顿事务所和国民警卫队来保护“工贼”并破坏了罢工。

在19世纪90年代,特种合金钢的生产增多,随后还引入了电炉。长期以来存在的压力是减少生产铸块、轧制、成形加工、和拉制之间的时间(与重新加热的需求)。过程是稳定的,竞争是激烈的,这一行业继续朝着降低成本的方向扩张。

^{②⑦} Jonathan Hughes, *The Vital Few* (1986), p. 239.

^{②⑧} *Ibid.*, p. 259.

^{②⑨} 美国人对鼓风炉内层的目的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通过增加炉内的空气压力,每一装料的生铁量能够增加,但是鼓风炉的内层将更快地被磨穿。美国的钢铁专家增加了压力,称为“有力的推动”,以及增加他们的利润。英国观察者批评这项技术,但是美国人能够廉价销售钢铁,即使代价是新的高炉内层。Peter Berck, “Hard Driving and Efficiency: Iron Production in 189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8, no. 4, December 1978.

^{③①} Kenneth Sokoloff, “Inventive Activity in Early Industrial America: Evidence from Patent Records, 1790—1846,” *JEH*, December 1988; and Kenneth Sokoloff and Zorina Khan, “‘Schemes of Practical Util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mong ‘Great Inven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5,” *JEH*, June 1993. 最近的评论,可见 Zorina Khan and Kenneth Sokoloff, “Institutions and Democratic Invention in 19th-Century America: Evidence from ‘Great Inventors,’ 1790—193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4, no. 2, May 2004.

生产成本的降低传递到购买者身上之后就形成了对私人经济的补贴,但其中并不牵涉到收入的强行转移。实际上,购买者的真实收入增加了。竞争迫使生产者将收益传递到客户身上。当时任伊利诺伊钢铁公司领袖的阿尔伯特·H. 盖里(Elbert H. Gary)法官,在评论卡内基的竞争性猛攻的后果时如是说,再也不可能“在小吨位、高利润的基础上做生意了”。^①甚至在J. P. 摩根买下了卡内基,使美国钢铁公司拥有这一行业2/3的铸块产能时,这一行业仍然在扩张。^②

农业机械的进步,蒸汽脱粒和更好的收割机,使得农业机械行业随着中西部小麦和玉米经济的扩张,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自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肉类加工业中引入了冷藏技术,开启了全国市场的大门,在这一行业公司合并的大潮中,甚至出现了Swift and Armour这样的名字。^③南北战争之前的工业巨头约翰·D. 洛克菲勒,被1911年的一起成功反托拉斯诉讼拖慢了脚步,所以这一行业未形成垄断。^④西南部石油的发现又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在纺织业中,19世纪晚期出现了更为先进的自动化纺织机、更好的缝纫机和裁剪工具,降低了服装制造的成本。从为联邦军队制作制服的经验中产生了男装的标准型号,使得包括鞋类在内的服装大批量生产成为可能。

在19世纪末,标准化与可互换零件这一美国传统终于成为了美国制造的特征。为全国市场生产商品成为工业企业发展、合并的目的,也进一步促进了生产资料、耐用消费品、服装和工具的型号标准化。随着庞大的美国市场的发展,大批量生产成为可能,通过简化产品的设计过程,减轻了工业扩张的难度。^⑤

3. 市场的扩张

这些增加的产量去了哪儿?既然产出的成本就是用来生产的要素的收入,那么答案就很简单:它们在美国市场上卖掉了。存在投资和扩大产出的动力,因为产生的收入以这样一种方式分配,使得产品能有利润地卖出去。也许亚当·斯密最著名的格言就是:“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在本例中,市场是极大地拓展了。

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口增长的倍数为2.93倍。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净值增长的倍数是6倍。因此,平均每个人能在1914年买的东西比在1860

^① Hughes (1986), p. 238.

^② 公司最近的历史由企业的记录指明,见于Kenneth Warren, *Big Steel: The First Centu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teel Company, 1901—2001*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1)。

^③ Barry Goodwin, Thomas Grennes, and Lee Craig, “Mechanical Refriger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Perishable Commodity Markets,” *EEH*, April 2002, 讨论了机械的冷冻技术如何贡献于在空间上联系的商品市场,比如黄油市场,主要的包装工人在该市场中发现了肉的互补品。牛肉挂在冷冻车厢的天花板上装运,黄油则放在地板上。

^④ Joseph Pratt, “The Petroleum Industry in Transition: Antitrust and the Decline of Monopoly Control in Oil,” *JEH*, December 1980.

^⑤ 美国新的技术的发展没有普遍地被贸易伙伴采用。比如,在钟表制造业,富士模仿了美国技术,但是德国没有。见Donald Hoke, *Ingenious Yankees* (1990)。“最好的实践”技术在这些例子中的国内选择性的扩散仍然是一个谜。霍克宣称这个技术带来的储蓄是如此巨大以致能盖过由于变化的生产要素的贡献导致的任何难以想象的差别。同样的困惑还可见于其他领域比如纺织品领域。Gregory Clark, “Why Isn’t the Whole World Developed? Lessons from the Cotton Mills,” *JEH*, March 1987; Mira Wilkins, “Efficiency and Management: A Comment on Gregory Clark’s ‘Why Isn’t the World Developed?’” *JEH*, December 1987; and John Hanson II, “Why Isn’t The Whole World Developed? A Traditional View,” *JEH*, September 1988.

年多了一倍,而人数则几乎是原来的三倍。即使没有替代效应(以减少购买某种产品为代价购买另一种产品),国内市场的扩张也会给新行业、新产品和新技术带来光辉灿烂的前景。事实上,有些产品和行业逐渐衰落了,另一些却走上前台,所以说也存在产品的置换效应。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人均收入的增加对购买制成品和服务最为有利。根据恩格尔定律,收入对食品的需求弹性小于1。而在1869年,美国人已经吃得挺好了。

表17.5为罗伯特·盖尔曼估算的每十年真实国民生产总值(以1860年价格计算)。这些估算表明,从1858年到1903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约5到6倍。盖尔曼的估算包括了19世纪30年代,到1840年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英国和法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法国高25%至40%,和英国比较接近。盖尔曼得出的结论是:“在美国历史的早期,她就已经是重要的经济力量之一了。”^⑥

表 17.5 1834—1908 年的 GNP(1860 年价格)

交错的十年	十亿美元
1834—1843	1.56
1849—1858	3.30
1869—1878	6.40
1874—1883	8.40
1879—1888	10.60
1884—1893	12.70
1889—1898	14.40
1894—1903	17.30
1899—1908	21.80

资料来源:Robert E. Gallman, “Gross National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4—1909,” in Dorothy S. Brady, ed.,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vol. 30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table A1.

从1834—1843年到1894—1903年,国民生产总值每十年的增长率约为48%,从1894—1903年到1944—1953年,这一数字降到了34%。然而,因为人口的增长率也在下降,人均增长情况基本保持不变,从1834年到1953年,每十年为16%。

在这一时期,有一个真正令人惊奇的变化:资本形成的份额大大增加了。盖尔曼不确定这究竟是在什么时刻发生的,但知道是在南北战争时期前后。南北战争之前,资本形成总额约为14%—15%;战争之后增长到了24%—28%,而且这个很高的数字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直到1914年。盖尔曼指出这一现象,认为它“……从一个较高的水平增加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⑦而这几乎完全来自国内储蓄率的提高。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突出的变化是,生产者耐用品主要由国内生产了。随着美国的工业化,美国人能生产大多数自己用的机器了。

^⑥ Gallman (1966), p. 7.

^⑦ *Ibid.*, p. 14.

除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海外市场也大幅扩张了。^③从1860年到1914年,食物制成品的出口增长了6.5倍,从3900万美元增加到了2.93亿美元;食物半制成品的出口从仅仅1300万美元增加到了3.74亿美元,增长率为28.8倍。成品出口的增长率为惊人的20.1倍,从3600万美元增加到了7.25亿美元。原材料是南北战争之前国际贸易的最大宗,在这一时期仅增加了2.7倍,从2.17亿美元增加到了8亿美元。农业的成绩也很好,天然食物的出口从1200万美元增加到了1.37亿美元。因此,到1914年,制成品、半制成品和成品合计的出口额实际上比天然食物和原材料的总和还要多49%。1860年,制成的材料和食物的出口额仅占原材料和天然食物总和的12%。在那个贸易相对比较自由的时代,美国的制造者们在海外市场成绩斐然,然而他们还不断要求国内征收保护性的关税,其实完全没必要!

西蒙·库兹涅茨估算,根据市场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869—1873年间为每年平均66亿美元(他早期发表的数字),在1912—1916年间为347亿美元。^④考虑到日期(及未校正的价格),这个5.2倍的增长率和我们其他的估算基本一致。1860年的市场潜力中的每一美元在1914年都变成了五至六美元。美国的工业家面对的是其产品需求长期上升的前景。

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劳动力的稳定增加,加上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可以认为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利于分工——投资新技术以制作新产品——的市场拓展条件了。经济存在周期性的起伏,但是正如熊彼特所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周期起伏实际上对经济增长有利。临近19世纪末时,一旦这个国家的首次“伟大游戏”——公共领域以及私有化——得到很好的处理,美国的制造业似乎会进一步长足发展。对最好的公有资源的粗放型收购几乎已经结束,是时候进行集约型的经济发展了,这正是制造业崛起的特征。

4. 城市的发展

城市也是工业化地区,这几乎是一个真理,因为(用道格拉斯·诺斯的话来说)即使一个由退休老人和冬季游客组成的佛罗里达城市也会发展起来,出现第二产业。^⑤只要有规模经济,这些行业就会产生工人的聚集——形成工厂式的集体工作模式。随着产品在市场上行销,这些第二产业中的有些企业会逐渐发展成地区性甚至全国性的企业。工业化不伴随城市的发展才是真正稀奇的事情。当有了现代通信手段后,也许这是可能的,但基本从未发生过。

例如,英格兰人口在工业革命中增长了130%(1751—1831年)。伦敦在18世纪中叶时已经是一座古老而庞大的城市,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到1831年,其人口比1750年增长了170%。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工业化的兰开夏郡的人口增加了4

^③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Ee 446—457.

^④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a 184.

^⑤ 并且可能有相关的发明!伊文·菲勒发现发明活动趋向于向城市集中,而不是由于在某个特定的城市的发展影响了它的发展。Irwin Feller, "The Urban Location of United States Invention, 1860—1910," *EEH*, Spring 1971.

倍。曼彻斯特是该郡最大的城市,增长率超过 6.7 倍。在整个欧洲,随着工业化的传播,原来只有宁静的中世纪村庄的地方也出现了环绕着工厂而建的新兴城市群。^①

在美国,人口和工业的西进运动产生了相同的效应:大湖区周围和北部出现了特洛伊、布法罗,然后是伊利、克利夫兰、托利多、底特律、芝加哥、密尔沃基、德卢斯。内陆的河流沿线出现了斯克兰顿、阿伦敦、匹兹堡、阿克伦、威灵、哥伦布、韦思堡、印第安纳波利斯、明尼阿波利斯、辛辛那提。南方和墨西哥湾周围出现了伯明翰、墨比尔、新奥尔良、什里夫波特和休斯敦。就这样,随着人们聚集到工业活动的中心,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美国城市名单不断扩大。到 1960 年,160 个城市地区约包含了美国人口的 90%。^②

这一过程尚未结束。随着技术的进步,一些老的城市衰败了,一些新的城市开始扩张。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能源危机”促使一批新型制造产业出现在美国南部和西部的阳光带,而中西部和东部陈旧、肮脏的钢、煤城镇被抛弃了。有些较老的行业具备流动性,比如机器工具,其中心已经随着客户移动了许多次:将特洛伊、辛辛那提和芝加哥抛在身后,随着人口迁移到休斯敦和洛杉矶。纺织业和服装制造业也相当富有流动性。^③ 棉纺织业给南方带来了城市化,占据了南方工业生活的主导地位,正如在较早的历史时期里原棉主导了南方的乡村生活一样。^④ 表 17.6 概括了 1790—1910 年城市的发展。

表 17.6 1790—1910 年的城市增长

年份	一体化的地区 2 500 人及以上		一体化的地区 100 000 人及以上		一体化的地区 1 000 000 人及以上	
	数量	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数量	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数量	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1790	24	5.1	— [*]	—	— [*]	—
1840	131	10.8	3	3.0	— [*]	—
1860	392	19.8	9	8.4	— [*]	—
1880	939	28.2	20	12.3	1	2.4
1890	1 348	35.1	28	15.4	3	5.8
1900	1 740	39.8	38	18.7	3	8.5
1910	2 262	45.7	50	22.1	3	9.2

* 这种规模的城市尚不存在。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derived from series Aa 31, 684, 686—689, 699—704.

^① Jonathan Hughes,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History: Theses and Conjecture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0), pp. 60—62.

^② Eugene Smolensky,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Urban Growth,” in Davis (1972), p. 582. 也参见 David Meyer, “Midwestern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American Manufacturing Bel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EH*, December 1989.

^③ Leonard Carlson, “Labor Supply, the Acquisition of Skills, and the Location of Southern Textile Mills, 1880—1900,” *JEH*, March 1981.

^④ Kenneth Weiher, “The Cotton Industry and Southern Urbanization, 1880—1930,” *EEH*, April 1977.

到1910年,三个城市——纽约、费城和芝加哥——各有一百万以上的人口,它们的人口加起来占据美国总人口的近10%。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50个,其人口占总人口的22%。到1910年,五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居住在大城市中。当时甚至有人以为整个国家会发展到只剩下几个超大城市。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而且,甚至在19世纪时,小型城镇的活力在数据中已经十分明显。即使在大型城市发展最快的时候,人口在2500以上、25000以下的城镇的人口也成功地占据了总城镇人口的30%。^⑤

尚不知道美国最大的城市规模会是多少。那应该会发生在20世纪晚期,最庞大的城市可能会停止扩张,人口开始减少,而较小的城市将接过继续城市化的重任。然而,19世纪的历史已经显露出城市的一些弊端,如我们所熟知的犯罪、拥挤和污染,这是城市生活中的不经济因素(diseconomy)。城市生活的优势还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尽管它们已经开始吸干乡村地区的人口增长(在半个世纪之内,乡村将面临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大片地区将被抛弃。)

城市的规模经济突出表现在交通、教育、医疗、中央上下水系统、“文化”、通信等方面,这些便利吸引着人们。^⑥但最重要的是,对这个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口来说,城市意味着工作和多种多样的机会。城市拥有庞大的第三产业部门——服务、贸易、专业工作,为工业基础服务。莱博高特的劳动力数据表明,到1914年,非农业劳动力中有整整54%在第三产业就业,而这种工作倾向于集中在城镇地区。托马斯·韦斯对第三产业就业增长原因的研究表明,主要来说,因为城市发展、城市劳动力增多,人均收入增长,导致了这种现象。^⑦

到20世纪中期时,所有劳动力中约有2/3就业于第三产业。^⑧这种就业情况是以采掘业、制造业和第一产业的高产为基础的。基本上,第三产业包括关于食品、服装、住所的贸易和其他服务。请注意,在表17.7中,第三产业(无论是否包括交通和公共事业设施)扩张了,而制造业的比例实际上下降了。这一趋势将继续下去,事实上,这是成功城市化的典型特征。^⑨生产力的提高将本来从事食物和商品生产的劳动力解放了出来。

^⑤ 从1860年到1910年,整整90%数量的城市场所持续变成小镇,人口在2500和25000之间。当然,按比例,他们的影响减弱了:这些小镇在1860年包含了40%的城市人口,到了1910年仍然有32%的人口。*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a 684—698。城市的发展由于美国农村和小镇的正常经济活动而放慢。John Ermisch and Thomas Weiss, “The Impact of the Rural Market on the Growth of the Urban Workforce, U. S., 1870—1900,” *EEH*, Winter 1973—1974。

^⑥ Celeste Gaspari and Arthur Woolf, “Income, Public Works, and Mortality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Cities,” *JEH*, June 1985。

^⑦ Thomas Weis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Service Industry Workforce,” *Essays in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1984); 还可见于 Thomas Weiss, “Urbanization and the Growth of the Service Workforce,” *EEH*, Spring 1971; and Thomas Weiss, “The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of the Urban and Rural Workforces: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870—1910,” *JEH*, December 1972。

^⑧ Jonathan Hughes, “Industrialization. Part I: Economic Aspects,” in David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7 (1968), pp. 252—263。

^⑨ *Ibid.*

表 17.7 1900 和 1914 年非农业企业中的雇员

就业领域	1900		1914		百分比增长 (1916 与 1900 年相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矿业	637	4.2	1 027	4.4	61.2
合约建筑	1 147	7.6	1 267	5.5	10.5
制造业	5 468	36.0	8 210	35.4	50.1
交通和公共事业设施	2 282	15.0	3 445	14.9	51.0
贸易	2 502	16.5	4 128	17.8	65.0
金融	308	2.0	657	2.8	113.3
服务	1 740	11.5	2 647	11.4	52.1
平民政府总计	1 094	7.2	1 809	7.8	65.4
总计	15 178	100.0	23 190	100.0	

注：百万人口中没有百分比。

资料来源：Derived from Stanley Lebergott, "The American Labor Force," in Lanc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table 6.2, p. 192.

第三产业一般要求特殊的教育和/或培训，因此，也倾向于聚集在城市中。工业活动吸引它们，付给它们报酬。它们是外部经济的创造物，倾向于簇拥在一起——例如纽约市的广告和好莱坞的电视制作。因此，城市的发展会引发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美国的工业化注定了美国会是一个城市化的社会。他们的祖先曾经在野草中挥动锄头，辛苦耕耘，如今他们连奶酪和黄油是不是从一个东西做出来的都不知道。然而，这种知识已经不是现代社会生存所必需的了。

5. 资本主义之下的工业发展

大体而言，美国的发展模式和结构只不过是众多个体对其自身的愿望和机会的反应的长期总和。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缺乏一个有效的中央经济规划。政府（小规模地）收税、花钱，制定关税法律、给予一些补助、将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卖给私人。根据警察权，一些行业受到管制，或必须获得州和地方政府的执照。除了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交通建设热潮，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称为中央调控。经济发展来源于个人的动力。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经济讨论只专注于人类行为的经济激励。当然，现实则要复杂得多。例如，理论上宗教和经济毫无关系，却促使成千上万的人从普利茅斯殖民地继续前进。个人的动机比想象的复杂得多，人们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去从事一种经济事业。然而，在美国社会中一直存在一股强大的中心力量：私人对各种财产的权利，得到充分的理解和保护。因此，生存、欲望、贪婪、嫉妒等普遍存在的念头，以及一些更为高尚的动力，一直在推动经济发展，除非在最为困难的情况下。

5.1 财富与企业家供应

正如我们在遥远的殖民时代最早期看到的那样，因为继承、勤劳或仅仅出于运气，财

富在人群中是不均匀地分配的。实际上,在所有的人群中,总有一些人非常厌恶风险,大部分人比较谨慎,一小部分人则非常乐于赌博。在整个美国历史中,当存在知识和机会、且对利润的分配权得到确定的时候,就会出现创业活动。这一力量长期以来一直是左右美国发展情况的动力,不过其原因远远不止是财富的不平均分配。^⑤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直到最近美国的创新和创业力量似乎有所减弱时(参见第29章),才有人开始评论这种创业勇气的作用。^⑥ 它只是一直存在,在任何需要它的时候。

伟大企业家的形象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是企业文化的舵手,被高度尊崇。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人们对自由企业充满信心。霍瑞修·爱尔杰式的普通人登上企业家顶峰的传奇更像是神话而不是现实:大部分工商业领袖都具有不俗的家庭背景。^⑦ 而另一方面,大企业家们往往成为民众嫉妒和辱骂的对象。正如西奥多·罗斯福评价铁路金融家爱德华·哈里曼时所说:“[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恶棍。”之所以出现这种谬论,是因为美国人对于规模太大的东西有一种恐惧之心,自从美国第一银行时起,人们就对于这一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一个规模较小的地方机构是可以接受的,但一旦它越来越大,变成全国性的,它就变得邪恶起来。罗伯特·维贝(Robert Wiebe)在《寻找秩序》一书中发现,人们“相信大型的机构会压制新的机会,而地方企业家表达其不满的呼声是持续时间最长的”。随着全国交通通信网络将经济联系得更为紧密,“几乎每个小企业都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复杂混乱的业务关系网,这网络不但没有拓展它的自由,反而限制了它的自由”。^⑧

因为成功的企业家一般都比较出名,比较有钱,他们往往成为别人冷嘲热讽、酸言醋语的目标。今天,他们的后代是受到尊敬的。没人会嘲笑《纽约时报》社会版面上哈里曼、吉尔德和范德比尔特家的人,但是在美国历史上,赚了大钱的人往往被像罪犯一样对待。社会更倾向于认为他们是“强盗贵族”而不是“工业巨头”。只有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美国钢铁业需要一个新的卡内基,而美国汽车业需要一个新的亨利·福特——却没人站出来——我们才开始为企业家精神感到担忧,于是通过召开会议、政府拨款来研究这一问题,并用其他方式拉响警钟。

5.2 发明和创新

研究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主要学者是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参见第14章)。他在《经济发展的理论》《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三本书及其他许多著作

^⑤ 更多关于这个年代的财富分布,见 Richard Steckel and Carolyn Moehling, “Rising Inequality: Trend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Industrializing New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1, no. 1, March 2001. Steckel and Moehling test several labor-market-based hypotheses for the growth of inequality in this period, but conclude in favor of a new mechanism based on “luck, rents, and entrepreneurship.”

^⑥ 时代在变化。考虑来自一个日本工业领袖的话语:我们进展的工业比美国要好……如果美国想要卖给我们消耗产品成品,他们没有机会……美国人善于发明新机器,但是在运用那些发明的能力上,可能日本人更有能力。The *Washington Post*, 31 July 1978. So much for the legacy of Carnegie and Ford.

^⑦ 主要的统计研究有 Frances Gregory and Irene Neu,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Elite in the 1870s,” and William Miller, “The Business Elite in Business Bureaucracies.” Both are included in William Miller, ed., *Men in Business* (1962). See also Ralph Andreano, “A Note on the Horatio Alger Legend,” in Louis Cain and Paul Uselding, eds., *Business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Change* (1973).

^⑧ Robert Wiebe, *The Search for Order* (New York: Hill & Wang, 1967).

中,详细地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企业家的作用。^④ 在关于 19 世纪晚期工业化的本章即将结束之际,让我们暂停一下,简要讨论一下熊彼特的假说。

1842—1897 年这一时期是熊彼特研究的重点,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布尔乔亚文化”(他所使用的非贬义术语)。他用“布尔乔亚”来指代中产阶级——其价值观、文化、理想——自由民主、代议制政府、具有流动性的开放社会、人人可受教育、个人自由、容忍差异、财产安全等一整套东西。对历史学家熊彼特来说,这是 19 世纪资本主义的独特创造。其他任何经济体系都不曾、也不会创造一个这样的社会。

是什么推动了布尔乔亚社会的发展?熊彼特认为,其推动力是不断创新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他们敢于冒险。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对于未来的设想——关于他们自身、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伙伴——就变成了现实。他们用来在竞争市场中推动变革的武器就是创新——新产品、新观念、新服务、新技术。

发明(invention)和创新(innovation)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发明是对人类天赋的被动利用。一个“更好的捕鼠夹”如果留在工作间里,它对整个社会或经济发展并没有什么影响。要生产它,并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出售它,需要另一种天赋,即企业家的能力。如果一项发明成功地进入了经济生活并改变了其走向,改变了资源的分配,它就变成了一项创新。如果那些充满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其中有些也是发明家,如贝尔和爱迪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就“自然地”成为布尔乔亚文明的领袖。

19 世纪的工业化是由各个个体工商企业创造的,这些企业又是由各个个人,即企业家,创造的。^⑤ 是人创办了工商业,而不是“条件”。因此,布尔乔亚文明的批评者们认为的“强盗贵族”对熊彼特来说是英雄。农业机械行业的赛勒斯·麦考密克和约翰·迪尔;汽船和铁路行业的利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铁路行业的利兰·斯坦福、爱德华·哈里曼、詹姆斯丁·希尔,甚至是杰伊·古尔德和吉姆·菲斯克;钢铁行业的卡内基和亨利·菲瑞克;金融业的约翰·皮尔庞特·摩根、贝尔蒙·奥古斯特和安德鲁·梅隆;石油行业的洛克菲勒——他们都是熊彼特式的企业家。这种能量的动力纯粹来自于获取企业家利润的机会——通过企业家活动获得的超过其他任何对资源的可能利用形式的利润。^⑥

这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不是零和的,而是会把效率低下者“逼得无路可走”,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竞争中的破坏是前进的代价。企业家们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这是唯一存在的“规划”。消费者的需求用美元的形式表现出来,经济对此作出反应,从而得以发展,成功的企业家要么发现了消费者的需求,要么通过销售技巧说服消费者,让他们相信应该买这种新东西。而且,通过衍生需求(derived demand)的机制,创新会导致更多的创新。^⑦

^④ Joseph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949); *Business Cycles*, 2 vols (1939); and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943), chap. 7, “The Proces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A more recent contribution is Israel Kirzner,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1973).

^⑤ 詹姆斯·维拉德·霍斯特声明 19 世纪由合法的变革造成的最大变化是企业能量的释放,这是在法庭作出牺牲其他财产权利而利于经济发展的有作用的决定之后形成的。James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ited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4)。

^⑥ Kirzner (1973), chaps. 1—2.

^⑦ Ross Thomson, “Learning by Selling and Invention: The Case of the Sewing Machine,” *JEH*, June 1987. The phenomenon continued into modern times; Daniel Nelson, “Mass Production and the U. S. Tire Industry,” *JEH*, June 1987.

5.3 企业家的角色

美国人一直依赖并尊敬创业行为——只要它不是太成功。^⑤ 美国所有的巨大财富几乎全是来自成功的创业行为,但是,富有的企业家们享有的特殊社会地位几乎不值一提,最多是在地方上有点影响……甚至像托马斯·杰斐逊和乔治·华盛顿这样的人,除了对美国历史的其他贡献之外,也都曾扮演过企业家的角色。这样做的还有其他千百万姓名已经湮没的人。对于美国历史上的企业家角色,最重要的不是他们是谁,而是他们存在过,而且有能力完成他们所从事的事业。^⑥ 对于美国的经济史,从来就没有过规划。只有一些初始的法律和宪法框架,其中包含了财产所有者的发展权利。我们已经看到这一体系是如何演化的。

财产所有者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有时他们独自完成,有时他们借助家庭的力量。有时政府的补助(来自纳税人的钱,由政府官员征收和分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作决定的总是那些希望获利的人自己。总而言之,美国的经济史是由其人民完成的,是由他们自己的企业家精神引导的。当然,总有些人的企业家精神比其他人强烈,今天也是这样。

不是所有人都有意成为企业家。^⑦ 去大西洋城或拉斯维加斯旅行一趟,我们会很快意识到,不同的人对风险的态度差别巨大。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更希望生活里没有太多有意的风险。然而所有的创业活动都牵扯到冒险,正如赌博一样。^⑧ 厌恶风险的企业家会尽量减少纯运气的因素,如通过广告、价格战、同一价格下更高的质量等手段,也可能是通过勾结、寡头垄断、操纵价格和合并以达到垄断。美国社会通过反托拉斯的政策和管制手段以试图限制企业家反社会的降低风险活动。

5.4 创造性的破坏与熊彼特式的增长

熊彼特将企业家的角色称为“创造性的破坏”,因为在资本主义式的增长中,企业家们为争夺资源而竞争,成功者会把失败者赶出游戏。亨利·福特不但使得许多令人尊敬的马车制造商破产,还将其他数以百计的汽车制造商赶出了这个行业。电视就像黑死病一样,让周刊和月刊杂志行业十不存一。20世纪80年代早期,来自日本和欧洲的省油小

^⑤ 美国关于国内大企业家的记载的主流主要是本着20世纪早期本着刺探名人丑闻的历史学家的精神——强烈的敌意。最好的有 T. W. Lawson, *Frenzied Finance* (New York: Ridgeway Thayer, 1905); Henry Clews, *Fifty Years in Wall Street* (New York: Irving, 1908); Gustavus Myers, *History of the Great American Fortunes* (Chicago: Charles Kerr, 1910); W. Z. Ripley, *Trusts, Pools and Corporations* (New York: Ginn, 1916); John Moody, *The Masters of Capita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9); Ida M. Tarbell, *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New York: Macmillan, 1925); C. W. Baron, *They Told Baron*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30); and Matthew Josephson, *The Robber Bar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4).

^⑥ Arthur Cole, *Business Enterprise in Its Social Setting* (1959). For a sympathetic view of American entrepreneurs, see Hughes, (1986).

^⑦ 人们对待冒险行为的态度差别有很多记载。学生可能对茹文·布兰纳的工作感兴趣: *History—The Human Gamb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Betting on Ideas: Wars, Inventions, Infl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⑧ 参见 John Nye, “Lucky Fools and Cautious Businessmen: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Measurement of Failure,” in Joel Mokyr, ed.,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 6, *The Vital One: Essays in Honor of Jonathan R. T. Hughes* (1991)。

型汽车几乎让底特律成为一座空城。又有谁知道,昨天那些“.com”公司的百万富翁们,今天有多少还在找工作呢?

人们不会保留一切东西。当人们采用新主意、新产品、新技术的时候,旧的东西就会被抛弃。熊彼特式的企业家会正确地预见到机会并采取行动。这个国家的发展因他们的行动而改变。长期来看,除了政府的限制之外,美国的经济增长是企业家人进行决策的结果。市场总是提供选择,但有些被接受了,有些没有。其净结果就是所谓的“熊彼特式的增长”——一次经济周期的上升期,其中充满创新浪潮,有时这些创新在功能上是互相联系的(如钢铁、化工、电子、汽车),随后是一次下降期,这些创新中只有最有效的才能生存下来。然而,因为有一些生存了下来,下一次新浪潮的起点将比上一次更高。

因此,在熊彼特式的增长过程中,衰退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加速了创造性的破坏过程。^④ 那些被大潮席卷的人,那些企业不太健全或是业务过时的人,一般会被迫关闭公司。他们所雇用的工人和使用的资源因此被解放出来,被更有效率的公司或新进的公司使用(也许价格会打个折扣)。在衰退期里,警报操纵器(alert operator)将失败者买断——正如卡内基收购霍姆斯特德工程以及迪尤肯钢铁项目一样。卡内基的一位经理这样描述他的手段:

扩张业务的最好时机是没有其他人在干这件事的时候。当钢铁业进入繁荣期时,大部分制造商会介入,兴建新的钢铁厂。因为是繁荣期,他们要支付最高的原料价格,当他们终于建好准备开工的时候,繁荣期也过了,大部分工厂只能闲置。^⑤

而这就是卡内基出手的时候。其他成功的企业家也深知这种手段。^⑥ 其他不能理解这一点的人就失败了。这是残酷无情的,但熊彼特认为,这是极为有效的,能够创造出超乎想象的经济增长。在1842年至1896年的经济大增长时期(低谷至低谷),不仅美国,整个商业世界都出现了大范围的工业化。

5.5 古典企业家

当摩根于1913年3月去世时,伦敦《经济学家》写道:

摩根先生毫无疑问是一个天才人物,具有极强的意志力和掌控力。正如当代有人评论的那样,他将和制造商卡内基、商业组织者洛克菲勒、铁路大亨哈里曼一起,并称为现代美国最具有原创性和典型性的四大产物之一。^⑦

到1913年,世界已经认识到伟大的美国企业家是一股能够改变世界的社会力量。最伟大的企业家,或至少是赚了最多钱的人,将庞大的新美国工业化经济组织起来,从根

④ 熊彼特的庞大体系的经典批判见 Simon Kuznets, "Schumpeter's 'Business Cycles,'" reprinted in Simon Kuznets, *Economic Change: Selected Essays in Business Cycles, 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Growth*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54). 库兹涅茨指出熊彼特的分析表明企业家能力的提供将不都是唾手可得的(p. 112),但是库兹涅茨认为这种推断是循环论证的。

⑤ Hughes (1986), p. 237.

⑥ 参见上书, pp. 315—317 关于1921年大衰退中亨利·福特的描述以及 pp. 370—374 关于1893年大恐慌之后哈里曼收购太平洋集团事件的描述。

⑦ Hughes (1986), p. 454.

到枝,以统一的管理方式组建成庞大的公司,然而又具有伸展性和多样性。像卡内基钢铁公司这样的企业会涉足许多行业:桥梁建造、摩天大楼的建造、采矿、用湖船运输矿石、运营铁路。摩根这样的人是金融组织者,控制着从挖煤到银行业这样广泛的经济活动。

当存在规模经济的地方,第一个达到平均成本曲线上的下降区间的企业将有能力以低于所有竞争者的价格出售产品,把所有的竞争者从市场上逐出——只要继续存在规模经济。这种情况将导致出现一个企业控制市场的局面,在19世纪晚期的条件下,最可能的是一个主导性的企业家。^⑥

企业家能力的不平均为经济学家分析行业发展带来了难题。企业家的角色一般不会出现在微观经济理论的变量工具箱中。然而,在几乎所有行业的历史中,不平均的企业家能力都起到了一个主导性的作用,尽管它也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亨利·福特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整个汽车行业的恶魔。那时他已经60多岁,开始失去控制力,被通用电气的阿尔弗雷德·斯隆和威廉·奴森(之后被福特解雇),沃特·克莱斯勒、道奇兄弟之类的人超过。在随后的竞争中,其他汽车企业和企业家消失了,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因此,尽管一个特定行业的企业家不一定会永远占据主导作用,但一个行业的新企业很可能被不同水平的企业家经营着。随着这个行业的发展,有些企业因为更好的管理而发展得比平均水平快。较高的企业家水平使得企业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主导,(往往)形成了公司,因为公司具有永久的生命,它们会长时间作为行业主导存在下去,有些时候比其创始人的生命要长得多。通用电气(托马斯·爱迪生),费尔斯通橡胶(亨利·费尔斯通),美国钢铁(安德鲁·卡内基和皮尔庞特·摩根),标准石油(约翰·D.洛克菲勒)都是例子。伟大的企业家显然是达尔文理论中的成功生存者。下面是洛克菲勒在主日学校课堂上的说教,我们不见得接受他的理由,但我们能够理解其中的逻辑:为了生出美丽的美国玫瑰,必须在玫瑰生长的时候摘掉较小的花蕾。为了他的大玫瑰标准石油,他摘掉了许许多多小花蕾。

在两个多世纪里,美国社会和法律一直鼓励企业家行为,这个国家也因此而持续发展,繁荣昌盛。

推荐阅读

文章

Allen, Robert C. "The Peculiar Productivity History of American Blast Furnaces, 1840—191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7, no. 3, September 1977.

Andreano, Ralph C. "A Note on the Horatio Alger Legend: Statistical Stud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Business Elite." In Louis Cain and Paul Uselding, eds., *Business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Change*.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3.

Asher, Ephraim. "Industrial Efficiency and Biased Technical Change in American and

^⑥ 关于19世纪末的工业聚集的证据,见F. M. Scherer and David Ross,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ird edi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0), pp. 153—156。

British Manufacturing: The Case of Textil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2, no. 2, June, 1972.

Atack, Jeremy.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Corpora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2, no. 1, January 1985.

Cain, Louis P., and Donald G. Paterson. "Biased Technical Change, Scale, and Factor Substitution in American Industry, 1850—1919."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6, no. 1, March 1986.

Carlson, Leonard A. "Labor Supply, the Acquisition of Skills, and the Location of Southern Textile Mills, 1880—19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1, March 1981.

Clark, Gregory. "Why Isn't the Whole World Developed? Lessons from the Cotton Mill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7, no. 1, March 1987.

Ermisch, John, and Thomas Weiss. "The Impact of the Rural Market on the Growth of the Urban Workforce, U. S., 1870—190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no. 2, Winter 1973—1974.

Feller, Irwin. "The Urban Location of United States Invention, 1860—191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8, no. 3, Spring 1971.

Floud, Roderick C. "The Adolescence of American Engineering Competition, 1860—190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37, no. 1, February 1974.

Gallman, Robert 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4—1909." In Dorothy Brady, ed.,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vol. 3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 "The Pace and Pattern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In Lanc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Gallman, Robert E., and Edward S. Howle. "Trend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Since 1840." In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e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Gaspari, K. Celeste, and Arthur G. Woolf. "Income, Public Works, and Mortality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C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5, no. 2, June 1985.

Goldin, Claudia, and Lawrence F. Katz. "Technology, Skill, and the Wage Structure: Insights from the Pas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6, no. 2, May 1996.

Goodwin, Barry K., Thomas J. Grennes, and Lee A. Craig. "Mechanical Refriger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Perishable Commodity Market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9, no. 2, April 2002.

Gregory, Frances W., and Irene D. Neu.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Elite in the 1870s: Their Social Origins." In William Miller, ed., *Men in Business*. New York: Harper, 1962.

Hanson, John R., II. "Why Isn't the Whole World Developed? A Traditional 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8, no. 3, September 1988.

Hughes, Jonathan. "Industrialization: Economic Aspects." In David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7.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Kim, Sukkoo. "Expansion of Markets and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Trends in U. S. Regional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1860—1987."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0, no. 4, November 1995.

Krugman, Paul. "On the Number and Location of Citi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37, no. 2, April 1993.

———. "First Nature, Second Nature, and Metropolitan Locatio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vol. 33, no. 2, May 1993.

Meyer, David. "Midwestern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American Manufacturing Bel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9, no. 4, December 1989.

Nelson, Daniel. "Mass Production and the U. S. Tire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7, no. 2, June 1987.

Pratt, Joseph A. "The Petroleum Industry in Transition: Antitrust and the Decline of Monopoly Control in Oil."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0, no. 14, December 1980.

Rosenberg, Natha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3, no. 4, December 1963.

———. "American Technology: Imported or Indigenou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7, no. 1, February 1977.

Smolensky, Eugen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 Growth." In Lanc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Sokoloff, Kenneth. "Inventive Activity in Early Industrial America: Evidence from Patent Records, 1790—1846."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8, no. 4, December 1988.

Sokoloff, Kenneth, and Zorina Khan. "'Schemes of Practical Util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mong 'Great Inven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5."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3, no. 2, June 1993.

Temin, Peter. "Manufacturing." In Lanc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Thomson, Ross. "Learning by Selling and Invention: The Case of the Sewing Machin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7, no. 2, June 1987.

Uselding, Paul. "Studies of Technology in Economic History." In Robert Gallman, e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Herman E. Krooss*.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 1.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77.

———. "Measuring Techniques an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In Otto Mayr, ed., *The American System of Manufacturing*.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81.

Uselding, Paul, and Bruce Juba. "Biased Technical Progress in American Manufacturing."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no. 1, Fall 1973.

Weiherr, Kenneth. "The Cotton Industry and Southern Urbanization, 1880—193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4, no. 2, April 1977.

Weiss, Thomas. "Urbanization and the Growth of the Service Workforc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8, no. 3, Spring 1971.

———. "The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of the Urban and Rural Workforces: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870—191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2, no. 4, December 1972.

———.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Service Industry Workforce." *Essays in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vol. 3, 1984.

Wilkins, Mira. "Efficiency and Management: A Comment on Gregory Clark's 'Why Isn't the World Develope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7, no. 4, December 1987.

Woolf, Arthur G. "Electricity, Productivity, and Labor Savings: American Manufacturing, 1900—1929."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1, no. 2, April 1984.

Wright, Gavin.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uccess, 1879—194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0, no. 4, September 1990.

Wright, Gavin, and Richard R. Nels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The Postwar Er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0, no. 4, December 1992.

书籍

Chandler, Alfred D., 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Clark, Victor S. *History of Manufac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607—1914*, 2 vols. Washington, DC: Carnegie Institution, 1929.

Cole, Arthur. *Business Enterprise in Its Social Sett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Frickey, Edwin.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0—191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Higgs, Rober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1865—1914*. New York: John Wiley, 1971.

Hoke, Donald R. *Ingenious Yankees: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System of Manufactures in the Private Sect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Hounshell, David A.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Hughes, Jonathan. *The Vital Few: American Economic Progress and Its Protagonis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Kirzner, Israel.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Pred, A. R.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U. S. Urban-Industrial Growth, 1800—1914*. Cambridge: MIT Press, 1966.

Rosenberg, Nathan. *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Schumpeter, Joseph. *Business Cycles*, 2 vols. New York: McGraw-Hill, 1939.

———.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43.

———.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Temin, Peter. *Iron and Steel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An Economic Inqui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64.

第 18 章

大企业 with 政府干预

在一个多世纪之后回首遥望 19 世纪 90 年代私人企业和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政府的相对关系,我们惊奇地发现:联邦政府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日常运营几乎没有任何控制。现代大量存在的控制机构那时完全不存在。学者很难在当时的美国找到数个对经济有任何控制的永久性联邦机构。那时没有反托拉斯法。那时没有联邦收入税。那时企业无须获得联邦政府的执照。那时没有联邦政府特许的公司存在。用现在的标准来说,我们几乎可以认为那时联邦政府对经济完全没有干预。然而,我们不能那样说。甚至在 19 世纪 80 年代早期,联邦政府的影响已经很明显了。例如:

(1) 联邦政府控制着公共领域——其资源及其分配。

(2) 联邦政府通过补助对经济进行配置,其局面可能是自由市场不会自发产生的。

(3) 通过关税法,联邦政府决定了流入美国的商品情况,因此为国内产品创造了额外的利润,如果没有联邦政府,这种利润是不会存在的。

(4) 联邦政府重新组织了美国的银行系统,产生了一种和各州及自由市场产生的银行体系不一样的模式。整个美国的金融结构都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5) 联邦政府对货币标准的决策影响了工资、价格、利率及所有依之而定的事物。

(6) 南北战争之后,联邦政府的政策(及缺乏政策)损害了南方的恢复。美国的一大片国土因此萧条了几十年。

(7) 联邦政府的移民政策积极促进了大量欧洲移民进入美国。

因此,联邦政府对经济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事实上,如果上述事情联邦政府都没做,那么这样的决定本身也是一种政策。而且,这种影响实际上并不是中立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政策,得到现存政策优惠的阶层就不会得到优惠,而他们得到的优惠是以牺牲另一些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我们已经知道,自从最早的殖民时期开始,政府就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经济——管制、发布执照、禁止某些行业。然而,联邦政府是在 1789 年由其他政府建立起来的,那些政府中有许多已经存在了百年之久。而且,我们知道,最初,各主权州对于它们将让渡给联邦政府的权力是精心保护的。那些保留的权力中就包括管制经济细节的权力。联邦政府设定总体框架——就是刚刚提及的那些干预——但既没有先例,也没有资源,更没有意愿去干涉日常经济事务。

自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各州和地方政府的管制权力逐渐缓步上升到了联邦层面。因此,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以来联邦机构提出的“去管制化”目标表明了人们扭转美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趋势的愿望。意料之中的是,去管制化遭到了较大规模的反对,因为美国好几代企业和劳工领袖都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

1. 法律变化:企业与法律

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法律发展中的两股小溪,优先权(priority right)和企业特权(privilege of incorporation),汇合成了一条大河,改变了美国的发展情况,这是建国者们未曾料想过的。现代学者认为,在早期有实用主义创新的地方,法庭试图以保守主义的方式加以限制,但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①到1914年,钱德勒的庞大企业主导着美国的经济。^②这种企业一般是具有广泛权力的公司,甚至是通过联营、卡特尔、托拉斯及其他形式(那时在理论上是非法的)联系起来的公司集团,它们对资源的分配能够影响千百万人的生活。菲尔德认为,这是一种节约资本的创新,其公司管理是一种提高效率的手段:用较少的资本支出获得更多的收入。^③

然而,其他人却坚信,这种游戏的背后隐藏着垄断,19世纪90年代《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出台之后,掀起了一场公司合并的热潮,证实了人们的想法。^④巨型企业被米勒称为“国家中的封建实体”,它们看起来甚至会接管国家。^⑤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公司成为了美国经济的“日程安排者”。大体而言,美国公司的安排就可以决定美国经济的局面,当然,它们的决策也要对消费者的选择作出反应。在争夺“大企业”控制权的斗争中,美国慢慢地改变了,发展出了现代管制经济。实际上,按照米勒的观点,用一种糟糕的方式陈述的话,现代“大政府”只是政府与大企业互动的结果。^⑥

1.1 大企业的兴起

如前所述,阿尔弗雷德·德勒相信,大企业——巨型公司组织——至少部分地可以用“连续过程生产技术”产生的规模经济所解释。他在《规模与范围》一书中认为,成功的公司不仅投资于生产和分配,而且投资于管理:

首先是投资于生产设备,大到足以利用技术的潜在规模经济。其次是投资于全国和国际的营销和发行网络,使得销售量可以跟上生产量。最后,为了获得这两种投资的全部收益,企业家还必须投资于管理:他们必须招聘、培训管理者,不仅要管理生产和营销两方面更多的设备和人员,而且要监控和协调这两个基本方面的

① Harry Scheiber, "Federalism a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Order, 1789—1910," *Law and Society*, Fall 1975; Herbert Hovenkamp, "The Classical Corporation in American Legal Thought," *Georgetown Law Review*, June 1988; and Morton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1780—1860* (1977), chap. 8.

② Alfre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1977) and *Scale and Scope* (1990).

③ Alexander Field, "Modern Business Enterprise as a Capital-Saving Innovation," *JEH*, June 1987.

④ 证据经过了讨论,但是毫无疑问,垄断权力是大多数商人最期望得到的东西,数据表明,在19世纪90年代的合并浪潮中,有很多增加的权力的积聚。Anthony Patrick O'Brien, "Factory Size,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he Great Merger Wave of 1898—1902," *JEH*, September 1988. 但是,其他人发现,连同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以及不期望垄断权力促使着大的合并。例如,见 Jeremy Atack,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Corporation," *EEH*, January 1985.

⑤ Arthur Selwyn Miller, *The Supreme Court and American Capitalism* (1972), p. 15.

⑥ *Ibid.*, p. 175.

活动,为未来的生产和营销进行规划和分配资源。^⑦

钱德勒和熊彼特一样相信大企业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钱德勒的成功企业是对创新作出回应而不是领导创新的。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一书中认为:

当新技术和市场的扩大使得史无前例的大量物资高速通过生产和流通渠道时,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取代了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因此,现代企业是对 19 世纪下半叶美国的技术快速创新和消费者需求高速增长的机构性回应。^⑧

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试图将熊彼特和钱德勒的理论结合起来,他认为大企业来自一个充满去中心化市场的世界,用一种创新的行动在企业内部创造出了经济能力,这些能力“通过生产和流通的过程”为最终实现规模经济奠定了基础。^⑨

兰格洛斯指出,这种看法和新古典主义理论对工业组织的解释不同。它关心的是一个机构,如大企业,是如何增长的(或为何未能增长)。拉佐尼克的企业所创造的经济能力是这一分析的中心。钱德勒的分析是相对的,他密切关注企业用哪种形式最能以其内部能力为基础实现增长。然而,正如兰格洛斯指出的,另一种历史传统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那里。虽然马歇尔从未否认内部规模经济的存在,但他也关注互相竞争和合作的企业之间的互动,查看是否存在外部经济。^⑩

内奥米·拉穆鲁对“公司合并大潮”进行了研究,试图解释为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因为横向兼并出现了这么多大企业。^⑪ 在她研究的九年中(1895—1904年),超过 1 800 家制造商放弃了独立的身份,和从前的竞争对手合并了。兼并后所形成的企业中,有 1/3 占据了 70% 以上的市场份额。

三个历史“事件”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第一个事件是钱德勒所关注的,就是资本密集型大批量生产技术的出现,它提高了固定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如果经济处于萧条期,人们会认为,在该行业“严肃的定价纪律破裂”和固定成本占总成本比重之间有直接的联系^⑫。一般认为高固定成本的企业通常会很在意它们的位置,行动较有约束。然而,一旦这种约束失效,它们最可能“匆忙达成正式的合谋协议”。

第二个事件是,1887 年之后,大量资本密集型行业极其迅猛地发展,所以,这些新兴

^⑦ Chandler (1990), p. 8.

^⑧ Chandler (1977), p. 12.

^⑨ William Lazonick,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the Myth of the Market Economy* (1991). 萨库·金宣称多单元的公司的发展更多地和市场相关,而不是和规模和范围相关。见他的“The Rise of Multiunit Firms in U. S. Manufacturing,”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6, no. 4, October 1999.

^⑩ Richard Langlois, “External Economie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Case of the Microcomputer Industry,” *BHR*, Spring 1992. 还可见于 Richard Langlois and Paul Robertson, “Explaining Vertical Integration: Lessons from the American Automobile Industry,” *JEH*, June 1989; and their *Firms, Markets and Economic Change: A Dynamic Theory of Business Institutions* (1995). 兰格洛斯和罗伯森发现了在汽车和微型计算机工业的外部经济的重要例子。正如在前一章提到的,克鲁格曼和金没有发现在总数上统计显著的外部效应。2004 年 9 月那期的 *Enterprise & Society* 中包含了关于钱德勒模型与现代商业的相关性的专题讨论;钱德勒的回应载于 2005 年 3 月那期。还可参见 Richard Langlois, “The Vanishing Hand: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 12, no. 2, April 2003.

^⑪ Naomi Lamoreaux, *The Great Merger Movement in American Business, 1895—1904* (1985).

^⑫ Lamoreaux 的理论源自关于成本结构的动态含义部分,见 F. M. Scherer and David Ross,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1990).

的寡头垄断体是否能获得回报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具有高固定成本的新行业里的新企业,销售收入是必需的;因此,出现价格战的可能性极高。玛格丽特·莱温斯坦(Margaret Levenstein)通过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 Company)的记录比较了溴、漂白剂和食盐市场。她指出,已经树立声望的全国性经销商有助于小型生产者进入整合的市场。它们也有利于合谋。如陶氏这样的大型生产者会参与短期的合谋,但不会参与长期的。随着陶氏引入新的生产程序,它将生产和经销整合起来,以规避合谋协议的限制。^⑬ 莱温斯坦指出,自从1885年起,溴行业的价格战都是因讨价还价或协调不力的问题而起。当该行业的企业同意合作时,就不太可能发生价格战了。^⑭

拉穆鲁框架中的第三个事件是19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这是兼并大潮的导火线。需求的缩减使得高固定成本成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随着年景的好转,西奥多·罗斯福之后的美国政治家开始用大政府作为手段来应付这些中心化行业的经济力量。

1.2 政府的回应

我们已经研究过美国的非市场控制传统——用政府而不是市场来决定资源的分配——从这些材料中可以总结出大政府的发展轨迹。随着经济发展,工商业随着人口西进,在地区性出口行业中甚至有时走在人口的前头。“工商业社会”被美国的大部分地区所熟知。我们在第7章中研究的警察权是普通法,只要有法庭和立法机关的地方,这种控制、禁止和区别对待的权力就存在。然而,规模经济——无论是在生产中、组织中,或是竞争者之间的合谋行为中——使得工商业组织的内部事务与许多法律的管辖范围重叠,创造出了一种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力量,这称之为规模效应。^⑮

控制这种力量的唯一途径就是利用一种同样广大的政治力量——联邦权力。否则,庞大的企业将不受控制。联邦权力可以超越各州的界限,在国际上行动,对美国企业主的组织天才做出回应,这些企业主的杰作就是美国的巨型公司,是19世纪晚期的经济奇迹。规模效应的后果最先在铁路上显现出来,我们可以从沙伊伯的论述中窥见一斑:

几乎横跨半个大陆,聚集了千百万的资本,其官僚机构比任何州政府还要庞大得多,巨型铁路企业超越了州的客观能力……可以控制它们。^⑯

如果工商业企业的力量不应该超过政治体系的力量,那么联邦政府就必须扩大。而且它有能力扩大。

回忆一下大法官马歇尔对麦卡洛克诉马里兰案(1819)的态度,宪法“在未来的岁月

^⑬ Margaret Levenstein, *Accounting for Growth: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Large Corporation*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ap. 1.

^⑭ 溴制造商选择形成卡特尔,而不是和竞争者合并。Margaret Levenstein, "Do Price Wars Facilitate Collusion? A Study of the Bromine Cartel Before World War I," *EEH*, January 1996; and Margaret Levenstein, "Price Wars and the Stabilization of Collusion: A Study of the Pre-World War I Bromine Industry,"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vol. 45, no. 2, June 1997.

^⑮ Jonathan Hughes, "Transfe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Upon Economic Activity," *REH*, 1976, p. 50. 查尔斯·麦柯迪的声明是即使大小效应本身也依赖于法庭对更大规模的商业运作开放国家经济。Charles McCurdy, "American Law and the Marketing Structure of the Large Corporation," *JEH*, September 1978.

^⑯ Scheiber (1975), p. 99.

仍将存在,因此,它要能适应人类事务的不同需求”。他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将永远能满足目前的需求。

1.3 特权、权力与怀疑

各州通过颁发特殊的许可证不加鉴别地许可公司的成立,为每个公司成立一项新的法案。这样做十分繁琐,而且容易产生腐败。但是,早在1811年,纽约州就制定了一项条款,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并进行简单登记就可成立公司。无须为每个公司成立一项法案。1837年,康涅狄格州也制定了成立公司的一般性法律。

纽约州在其1846年的宪法中进一步放松了这方面的法规。它撤销了对公司经营业务种类、地点和注册资本的限制。1875年,新泽西州取消了对资本的限制,1888年,它允许该州的公司在本州外经营所有业务。之后,特拉华州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逐渐地,曾经被严格限制、精心保护的公司特权,变得能让任何企业获得了。^⑦

与之同时发生的是另一条法律演化的轨迹。联邦宪法只规定了个人和主权之间的关系。1789年,还没有私有的集体经济实体的概念。1819年,马歇尔在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中说道,公司在法律上是一个不可见的“存在物”。因此,它是一个个体,但不是宪法规定的公民。这一解释使得现实与抽象相符。一系列最高法院的案例(参见第5章)澄清了法人公司在法律上的位置。

1851年,大法官坦尼在库利诉监察委员会(board of warden)案中写道,从逻辑上说,州和城市政府的管理不能超越它们自身的管辖权限,如果需要更大的权力,应该通过国会来解决。随后,在1886年,在圣克拉拉郡诉南太平洋铁路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公司法人受到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因此,州和地方政府对公司的管制能力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

这种情况几乎已经为回归殖民时期政府的全盘管制铺平了道路,不过这次是由联邦机构扮演行政委员会的角色,根据他们自己的考虑来决定“公共利益”。我们或许可以反对采取控制的方式,但是,实际上,不施加任何控制的情形是难以想象的。

新的大企业善于以各种方式操纵市场——通过联营协议商定价格、垄断价格、通过卡特尔协议控制产出。参与托拉斯的竞争性企业拥有投票权,形成了一种更有活力的控制,基本上可以说,在原来是竞争性的企业的地方,现在形成了单一的管理层。在农业部门遭遇困难的时刻,这些手法使得公司本身遭到了憎恨和嫉妒,正如平民主义者所宣扬的那样。美国公司被当做是和美国生活的其余部分格格不入的东西。^⑧

一般公众相信,美国工业被垄断化了,产出受到限制,价格过高,而农民、工人和消费者被傲慢的财阀阶级愚弄。当时是存在工业力量的“集中化”。然而无从知道它是否是剥削性的。但是,即使在较早的时候,也存在规模经济,有大企业成功的例子。例如,在

^⑦ 一个一般性的调查,参见 James Willard Hurst, *The Legitimacy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780—1970* (1970). Also see Lawrence Fri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1973), chap. 8. 最近一个有趣的观点来自 Christopher Grandy, “New Jersey Corporate Chartermongering, 1875—1929,” *JEH*, September 1989.

^⑧ 关于刺探传播名人丑闻传统下的书目可以参见 17 章, 58 页。更现代的观点,见 Louis Galambos, *The Public Image of Big Business in America, 1880—1940* (1975)。

1880年,尽管有约1900家企业生产农业器具,但其中最大四家的产量占整个行业的65%。1890年,铜行业被少数几个巨型企业主主导,最大四家的产量占有铜产量的3/4。1879年,所有美国出产的原油中,有90%是被美孚石油公司精炼生产的,美国的输油管道有80%属于这家公司。^①洛克菲勒爵士的邪恶漫画丝毫没有提升其企业的公众形象。

这种私有的经济力量让某些人感到恐惧。似乎一种新的寡头政治会崛起,将杰斐逊的世外桃源封建化。克利夫兰总统1888年在对国会致辞时这样说公司:

在我们查看资本聚集的成就时,我们发现了托拉斯、联合经营和垄断,而公民正在遥远的后方挣扎,或者正被铁足践踏致死。公司应该是受到精心限制的法律产物和人民的仆人,但它却正在迅速变为人民的主人。^②

正如威廉·范德比尔特所言:“公众是被诅咒的。”如果认为人们不会利用联邦政府的权力来干预,未免过于天真。到1888年的时候,干预已经蓄势待发,而且会来自多个不同的方面。

2. 转折点:芒恩诉伊利诺斯案

1877年的芒恩诉伊利诺伊案最终被留在了历史的垃圾箱中,但是对经济历史学家来说,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它上面凝结了盎格鲁美国人270年的历史。它是管制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最终,试图将芒恩的教条作为政府管制的努力失败了,这方面的美国历史只得依赖随后的创新。

南北战争之后,农业的利益一直在下降,其原因是农产品价格下跌和铁路的歧视性定价,至少农场主及其支持者们是这样认为的。在农业从事者对州立法机关有影响的地方,他们就采取行动。他们通过的法律被称为农牧业保护者(patron of husbandry),也叫农庄(grange)。^③管制铁路费率的法律也随之出台。伊利诺伊州在1871年修订宪法的时候,包括了对谷物运输机发布执照和控制其价格的条款。两个芝加哥的运输机操作手,芒恩和斯考特,拒绝服从这一条款,结果就导致了第14章中所讨论的“农夫案例”。

2.1 芒恩诉伊利诺伊案及之后

对于芒恩案的判决和垄断权力的问题,主流观点涉及了许多方面,但没有深入发展。大法官韦特诉诸盎格鲁美国人的警察权传统。他认为农夫法律中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唯一区别是它们的对象是巨型企业。自从“太古时代”以来,美国的地方政府,以及之前在英格兰的政府,都会为了健康和安全而管制企业。这一权力是毋庸置疑的。这并不是某些教科书仍然坚称的“自然垄断”事务,而是公共管制的历史基础。^④酒店、旅馆、车夫、面

^① Willard Thorp and Grace Knott, “The History of Concentration in Seven Industries,” in *The Structure of Industry* (1941), part 4.

^② 引用于 Jonathan Hughes, *The Governmental Habit Redux* (1991), p. 112.

^③ John Hicks, *The Populist Revolt: A History of the Farmers' Alliance and the People's Party* (1931); also Irwin Unger, *The Greenback Era* (1964).

^④ 一个对公共事业规章的有趣的现代探索见 Werner Trotsen, *Why Regulate Utilities?* (1996)。

包店、啤酒商、理发师——都曾是管制的对象。铁路和谷物运输机和它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韦特大量引用了哈尔公爵的文章,哈尔公爵是一位 17 世纪的英国法官,他提出了一项信条,即任何私人财产,如果公共依赖于其使用的话,它就应受到政府的管制。如果那项财产“受到公众利益的影响”,它就失去了私有的特性。这种权力是毋庸置疑的。韦特写道:

从无法追忆的时候起,[这种权力]在英格兰就被使用了,在这个国家(美国),从殖民时期起,它也被用来管制渡船、普通马车、出租马车夫、面包师、磨坊主、码头管理员、客店老板……用来确定服务、食宿、物品的最高收费。直到今天,许多州仍然存在关于这些人的成文法律;我们认为,关于此种法律属于宪法禁止的干涉私人财产行为的主张一直都是缺乏根据的。^②

哈里·沙伊伯认为,大法官韦特并不像当时认为的那样具有独创性,事实上,在芒恩案之前几十年,美国的法庭就利用哈尔公爵的论证来为管制寻找理由了。^③ 同时代的人担心芒恩信条会导致政府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助理法官菲尔德表达了反对的意见:“如果这是健全的法律……州里的所有财产和所有工商业都会任由立法机关的多数票摆布。”^④的确如此。

如果你回忆一下第 1 章中所讲的原始土地使用期的特征,其中一项是免费而普遍的农役租佃,你就会记起必须满足其事件才能延长所有权。正如韦特所言,从更早的时期开始,工商业就受到政治力量的约束。征用权的程序随着时间流逝逐渐法律化,但是征用权的权力本身从未受到质疑。宪法第五修正案禁止联邦政府不经赔偿和正当程序侵犯私人财产,第十四修正案对各州施加了类似的限制。但是关于政府对私人财产权的最高权力,并没有绝对的禁止。

有趣的是,1877 年之后的十年里,出现了遵从芒恩信条的一系列法律和案例,而这不过是死胡同。^⑤ 其中之一是泰森诉班顿案(1927),纽约州立法机关通过了一条法律,认为倒卖百老汇门票涉及公共利益,因此应受到管制。助理法官小霍姆斯写道:

认为一项业务涉及公共利益的观念……只是用来搪塞受害者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真相似乎是,在应与赔偿的时候给予赔偿,只要背后有足够的公众力量,立法机关可以禁止或限制任何业务。^⑥

对霍姆斯来说,芒恩案毫无必要地使情况更加复杂化了。

七年后,内比亚诉纽约案上诉到了最高法院。^⑦ 此案涉及是否人为地保持牛奶的高

^② *Munn v. Illinois*, 94 U.S. 125 (1877).

^③ Harry Scheiber, "The Road to Munn: Eminent Domain and the Concept of Public Purpose in the State Courts,"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1971.

^④ *Munn*, p. 136.

^⑤ Maurice Finklestein, "From *Munn v. Illinois* to *Tyson v. Banton*, A Study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27, no. 7, November 1927.

^⑥ *Tyson v. Banton*, 273 U.S. 261 (1927), Holmes in dissent, p. 446.

^⑦ *Nebbia v. New York*, 291 U.S. 502 (1934).

价,显然,这样做符合大牛奶厂商的利益。然而他们告诉纽约州的奶农,这样做对奶农也有利。法庭认为这完全属于警察权的范围,其对芒恩案的看法也和霍姆斯相同:“显然,和公共利益相关的业务范围是无限的。”^②法官麦克雷诺兹清楚地看到,芒恩案事实上限制了政府的管制长达半个世纪,而内比亚案将开启这道防洪闸。他不满地写道:

芒恩诉伊利诺伊案已经被讨论了多次……每次的结论都是,此案并不持有这样的观念,即普通商品的交易负有公共利益的责任,应受到法律的控制。[现在]相反的观点却得到了明确的陈述。现在,认为[芒恩案]具有已被否认的暗示意义,就等于确认法庭曾经宣布反对的某样东西并不是出自法庭的本意。^③

在内比亚案之后,依照政府意愿,任何工商业和所有私人财产都可能受到其控制。在芒恩案中,大法官韦特再次确认,政府有权依照法律将其传统权力运用于现代工商业中,并引用哈尔公爵的话,以作出某些限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非市场控制因为这种限制而受到了约束。芒恩案是传统警察权对抗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的最后一击。内比亚移除了限制,打开了管制之门,在政府认为管制是明智的时候,它就可以展开管制。

2.2 州际商务委员会

到20世纪30年代,铁路早已不再受芒恩案影响,却陷入了另一种桎梏,即永久的联邦管制机构。第一个这种机构就是成立于1877年的州际商务委员会(ICC)。^④ 尽管最初ICC并没有定价权,但1906年的《赫本法案》赋予了它这种权力。^⑤

近年来,人们普遍认同ICC创办者的行为是理性的,而实际可能并非如此。前面的章节已经讨论过历史学家加布雷尔·科尔科及其同僚们的观点,即1887年时,国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创办了一个联邦机构去做铁路卡特尔的经理人。^⑥ 因为ICC在任何政坛流派中都很少有支持者,所以科尔科的假说一般很少受到质疑。然而,现实中却存在许多相反的证据。

第一,自从南北战争之后,国会多次试图寻找一种管制铁路的方式,它甚至在联合铁路和中太平洋铁路之上建立了一种金融组织。^⑦ 第二,科尔科的阴谋论暗示,19世纪80年代的富有乡村气息的立法者们却提出了一个欺骗农民的方案。然而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豪尔是怎么说的?

你们赋予这些人权力,让他们可以控制大城大镇的经济和大量的投资——这种权力甚至连波斯和罗马的总督都不曾享有过……

^② *Nebbia v. New York*, 291 U.S. 536 (1934).

^③ *Ibid.*, p. 555.

^④ Thomas Gilligan, William Marshall, and Barry Weingast, "Regulation and the Theory of Legislative Choice: The Interstate Commerce Act of 1887," *JLE*, April 1989.

^⑤ 对《赫本法案》的一个很好的讨论可以参见 Martin Sklar, *The Corporat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Capitalism, 1890—1916: The Market, the Law, and Politics* (1988)。

^⑥ Gabriel Kolko, *Railroads and Regulation 1877—1916* (1965)。

^⑦ Hughes (1991), pp. 107—109.

阿拉巴马州的众议员奥茨则这样说：

我自由地谈论，先生们，我对这种联邦权力的扩大化和中央化的倾向感到嫉妒。^⑤

这种批评只是修辞上的吗？也许豪尔和奥茨被排除在了阴谋之外？但是下面这个又是什么呢？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克利夫兰的总检察长，不得不向一位朋友——一名铁路董事长——解释“占领”，显然，他也被排除在了阴谋之外，而且他还希望废除 ICC。奥尔尼肯定知道他在说什么：

这个委员会的功能受到法庭的限制，它对铁路来说可能是非常有用的。它满足了公众要求政府监督铁路的呼声，然而同时，这种监督几乎完全是名义上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委员会多半会越来越用经济和铁路的眼光看待事物。因此，它会变成铁路公司和人民之间的一道屏障，变成保护铁路、抵御对铁路利益充满敌意的草率而残酷的立法机关的东西。……明智的做法不是去废除这个委员会，而是去利用它。^⑥

但是，奥尔尼的论述依赖于 1887 年之后法庭施加的限制。而且，因为 ICC 只是第一个例子，是奥尔尼本人的智慧让他相信，ICC 将会被最终“占领”。事实上，ICC 只是随后众多坏例子中的一个。今天国会在创立新的保护能源、停止通货膨胀、提升物价、保护国土的委员会、代理机构、权力、办公室，而与 1887 年一样，国会并不大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管制委员会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方式，但并不能解决问题。委员会被“占领”并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尽管无法知道公共利益究竟是什么，但是被管制者至少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他们也以许多方式让代理机构了解他们的利益所在。这些机构对其控制的企业福利负有责任。没有一个管制机构想毁掉它们所治理的行业。

ICC 甚至连这一点也未能做到。作为一个“卡特尔”，这是致命的失败。奥尔布罗·马丁（Albro Martin）在其《被否认的事业》一书中指出，到 1914 年，ICC 的管制已使铁路步履蹒跚。^⑦ 尤其是 20 世纪早期，随着物价和工资的提高，他们拒绝提高铁路的运费，这一打击是毁灭性的。马丁认为，铁路无法得到维护，而这还只是比赛的早期阶段。托马斯·尤伦（Thomas Ulen）指出，最初的法律规定试图涵盖所有人的需求，结果内容前后自相矛盾，之后的调整和修正非但没有改善这一情况，反而使得任一利益集团的利益都没能得到满足！^⑧

ICC 是所有永久性联邦管制机构的老祖宗。在其创立一百周年之后不久，它消失了，他的功能被交通部吸收。从来没人知道创立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也不可能知道。无论 ICC 的命运是多么的失败，都不应该转移我们对其起源的注意力。最初，其委员们具有高超的智力水平。ICC 是抵消规模效应、将政治对经济的直接控制提高到联邦层面的一系

^⑤ 两个演讲都引用于 Karl Brent Swisher,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4), p. 415。

^⑥ L. L. Jaffe, *Judicial Control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65), p. 12.

^⑦ Albro Martin, *Enterprise Denied: Origins of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Railroads* (1971).

^⑧ Thomas Ulen, "The Market for Regulation: The I. C. C. from 1887 to 1920," *AER*, May 1980.

列努力的一部分。最高法院在芒恩诉伊利诺伊案中作出了最后的努力,用传统警察权这把保护伞来约束大企业,在那之后,人们需要一种新的手段。

手段之一是根据商业条款创立一大批联邦管制机构。ICC 是其中的第一个。手段之二是为新企业制定组织与行为规范。^⑨

3. 反托拉斯法案

1890 年,国会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该法案的开始段落十分著名,是这样写的:

每个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或合谋的形式结合,受到多个州或与外国的贸易的限制的合同,从此被宣布为非法。……^⑩

自此之后,联邦法庭陷入了工业和经济管理的漫长工作,再也不能从中脱身。在公司经济的最高峰,决定美国工商业最大企业生死存亡的是律师和法官。事实上,大部分律师和法官对巨型企业的管理知之甚少,然而当时人们认为这并不重要,现在也是如此。在一个多世纪之后,最终形成的现有反托拉斯法体系简直是荒谬的。^⑪

《谢尔曼法案》及其修正案为企业的行为制定了广泛而复杂的限制。正如马萨诸塞的清教徒禁止某些阶层的人穿某种特定的服装一样,反托拉斯法禁止企业进行某些组织行为。而且,正如清教徒神学家们从不告诉低等级的人他们究竟能穿什么,反托拉斯法案也没有明说什么行为是合法的。例如,法庭多次根据反托拉斯法案的“减少竞争”条款来限制企业,但是国会却从未有一条法案说明竞争到底是什么。

企业不可以从事会减少《谢尔曼法案》中未提及的、在经济学教室的飘渺环境之外无人知道的某种事物的行为。根据反托拉斯法案,合法的东西只是尚未被认为非法。因为合谋行为具有无限可能,反托拉斯法案(在理论上)可以导致无限多的法庭诉讼。由连篇累牍的反托拉斯法案形成的厚厚书堆正如《谢尔曼法案》及其修正案的纪念碑。

3.1 反托拉斯法案的目的

令人惊讶的是,学者们对《谢尔曼法案》的确切起源和目标并无一致意见。我们已经注意到,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存在着针对托拉斯、企业、联营和卡特尔的反对情绪。煽动情绪(agitation)是一个政治术语,它很有效,却无须代表任何实在的东西——反活体解剖、禁酒主义、反氟化剂、银币自由铸造主义、反达尔文主义——都有情绪化的因素。政治上真正重要的东西是选票,而在美国,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来为这个目标服务。

“托拉斯粉碎者”政治家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廉,在《谢尔曼法案》出台很久之后才

^⑨ Marc Law and Sukkoo Kim, "Specialization and Regulation: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s and the Emergence of Occupational Licensing Regul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5, no. 3, September 2005, discuss how regulation extended to such occupations as lawyers doctors, dentists, and veterinarians.

^⑩ Milton Handler, *Cases and Other Materials on Trade Regulation* (1960), p. 1109.

^⑪ For a sympathetic summary: A. D. Neale, *The Antitrust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70). Also see Friedman, (1973), pp. 405—408.

入主白宫。但是平民主义者和劳工领袖在1890年之前就煽动反对新的公司和各种企业联盟了。1891年,有18个州通过了它们自己的反托拉斯法。1888年,两大主要的政治党派都在竞选纲领中提出了反托拉斯的政策,参议员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在1888年和1889年都提出了反托拉斯的议案,并在1890年成功通过。^④

因此,历史学家必须认为,尽管最后变成了政治问题,但一定有某些因素引发了这些反对情绪。是什么事情呢?答案似乎是对经济规模和私有企业力量过大的恐惧。谢勒(F. M. Scherer)在研究美国工业发展的现代学者中是较为突出的一位,他为反托拉斯法提出了一系列可能的原因:

(1) 大型企业的发展是以“冶金、化工、能源的生产和利用、可互换式零件的使用等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创新导致了工业中的规模经济。

(2) 交通成本的下降促进了最佳工厂规模变大。

(3) 资本市场金融服务的发展使得个体企业更容易达到规模经济效益。

(4) 各州成立公司法律的自由化促进了专业经济管理(再投资利润)的发展,将企业的股东和实际管理者区分开来。

(5) 国内、国际市场的双重扩张使得扩大工厂规模有利可图。(回忆一下亚当·斯密关于分工和市场规模的名言。)

(6) 1873—1879年和1883—1886年的经济萧条使得厂商之间爆发了价格战——较差的情况使得企业在前景好转时试图通过合谋和兼并控制市场。

(7) 美国的法律使得卡特尔协议无法在法庭上执行(欧洲通常情况相反),导致企业倾向于通过兼并来达到控制的目的。

(8) 与半合法的联营和卡特尔相比,通过创造“大企业”,同美国企业家的“扩张的边疆精神”更为一致。

(9) 新企业精英的奢侈生活方式对其他选民来说是一种冒犯。嫉妒让反对大企业成为候选人的有利政治姿态。

(10) 农民占许多州的主体,他们受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萧条影响最深。许多人相信,大企业的发展是与他们的利益相悖的。在农夫和平民主义运动中,这是一股有组织的政治力量。^⑤

谢勒并未试图判断这些因素各自的权重,也许这是十分明智的做法。当时的文献显示,大企业的领导人似乎并未试图为其活动辩护,而我们现在看来,其实有许多惯常的理由可以讲,比如创造工作机会、促进经济发展等。实际上,他们可能真的相信对他们的指控是对的,因为这些指控不仅来自日常媒体、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乱斗,甚至来自白宫本身。

^④ F. M. Scherer,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0), p. 424.

^⑤ *Ibid.*, pp. 422—427.

3.2 《谢尔曼法案》

威廉·莱特温及其他人已经指出了《谢尔曼法案》和普通法之间的联系。^④对国王及之后的国会来说,他们赋予个人或企业垄断特权是完全合法的。就私人来说,一个人可以拥有广义的贸易“垄断权”(例如,他/她可以决定自己商品的价格),只要这种做法不被认为“不合理”。不被允许的是,一个人未经国会许可,自己采取行动成为某个较大领域的唯一销售者(甚至通过与竞争者达成协议,成为某个地区的唯一销售者)。^⑤

当垄断力量由于自然原因出现时——例如河流上的收费桥梁或渡船——这些情况会受到管制,从古老的时候起,就一直是“自然的”垄断。我们已经看到,英国人以及之后的美国人,出于各种原因根据警察权管制了许多私人企业,他们也对自然的垄断加以管制。托马斯·杰斐逊这样描写殖民时期的弗吉尼亚:“只有在法律指定的地方才允许有渡船,其费率是固定的。”^⑥

因此,1890年美国通过一项联邦法律声明私人垄断、联营及其他贸易合谋行为从此被宣布为非法。看起来似乎很简单:这是普通法的惯例,自从人们定居在美国以来就是这样。然而,之后的发展是令人震惊的,所谓反托拉斯法一直到现在仍然在发展,其势头丝毫未有减弱。其最初的动机并非如此。1911年,威廉·霍恩布洛尔(William Hornblower)在《哥伦比亚法律回顾》中略带歉意地写道,《谢尔曼法案》是由参议院中最能干的律师起草的。

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果有一项法案是清晰明确、明白易懂、易于实施的话,那么就是这项法案;然而也可以安全地说,自从美国政府创立以来,从未有任何一项法案比这项法案引起了更多的观点分歧,给法官和律师带来了更多的困惑。^⑦

此项法案的第一章禁止限制贸易的合谋、契约与联合,并规定了惩罚(之后惩罚又被加重)。第二章禁止垄断或导致垄断的行为。在第四章中,美国的总检察长被授权(依衡平法)提起对违犯者的诉讼。第七章允许受害人对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违犯者提起诉讼并要求三倍的赔偿。^⑧

3.3 对管制的微调

实行《谢尔曼法案》之后,人们很快发现,为了让联邦反托拉斯政策有效,必须更详细地界定违法行为,采取更加勤勉的实施行动。^⑨在1914年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

^④ William Letwin, *Law and Economic Policy in America: The Evolution of 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1965). See also Handler (1970), chaps. i and 2; and Hans Thorelli, *The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Origination of an American Tradition* (1954).

^⑤ Handler (1970), pp. 105—108.

^⑥ Thomas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London: John Stockdale, 1788), p. 253.

^⑦ William Hornblower, “Anti-Trust: Legislation and Litigation,”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11, no. 8, December 1911, p. 702.

^⑧ Handler (1970), p. 114. 《克莱顿法案》的第四部分替代了《谢尔曼法案》的第七部分。

^⑨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卡洛斯·拉米雷斯和克里斯汀·艾根-族基挑战了传统的认识。见“Understanding the Clayton Act of 1914: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est Group Hypothesis,” *Public Choice*, vol. 106, no. 1, January 2001, 作者宣称参议院的投票受大小制造业兴趣的影响。

(《谢尔曼法案》的修正案)中,第二章禁止减少竞争的价格歧视行为。第三章宣布减少竞争的排他性交易和捆绑契约为非法。因为《谢尔曼法案》已经被用来反对工会组织(工会要么完全无用,要么成功地限制了贸易),《克莱顿法案》的第六章郑重(而逻辑混乱地)宣布,劳动“不是商品或交易物品”,劳工联盟组织不得在法律上被认为是“限制贸易的非法联合或合谋”。^⑤第七章禁止可能减少竞争的兼并,第八章禁止(同一行业中)本应是竞争者的企业共享董事会。^⑥

为了执行这些法律,采取稳定的监控,美国还在1914年创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其专门职责就是追查违犯者。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机构,一位法律作家称之为“多重饰演”的例子。它同时扮演“原告、陪审团、法官和律师”的角色。^⑦ FTC的委员们可以发出“停止”命令给那些他们认为行为恶劣的人,并要求法庭强制执行其命令。1914年以后,FTC分担了总检察长的执行反托拉斯法责任。

自从1914年以来,反托拉斯法经过了多次修正,但修正并未使得法律更加协调一致。在这些年中,FTC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实施美德的权力,甚至可以禁止误导性的广告。到1980年,FTC树敌如此之多,以至于国会试图钳制其羽翼,赋予了自己立法上否決的权力和推翻FTC裁決的权力,而这使得事情更加混乱。1983年,最高法院不得不在这一问题上又推翻了国会的規定。

3.4 规则的例外

这些反托拉斯法规究竟是什么,似乎并不容易弄清楚,除了知道那是国会和法庭试图处理的问题列表之外。简单地说,它反对垄断。直到1942年,美国最高法院仍然认为,制造业不是商业。^⑧因此,某些明显违犯反托拉斯法案的行为——如1895年奈特案(糖业托拉斯)所涉及的行业可以列入制造业——就无法被禁止。^⑨

从1920年的美国钢铁案到1945年的ALCOA铝业案,规模本身并不被认为是垄断的证据;还必须有所谓的“意图”。^⑩1914年,劳工组织被从反托拉斯法规中豁免。美国人对海外市场的联合固定价格也因1918年的《韦布·波默林法案》而得到豁免。1922年的《卡帕·沃尔斯特德法案》允许农业合作社在内部进行协议定价。^⑪慢慢地,政府逐渐承认受到联邦管制机构控制的行业应该也从反托拉斯程序中豁免。一个企业刚接受一个

^⑤ 1894年的普尔曼罢工以劳工领袖尤金·V.德布斯入狱以示轻蔑而告终。

^⑥ Gilbert Montague, “Anti-Trust Laws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14—1927,” *Columbia Law Review*, 1927, p. 661.

^⑦ *Ibid.*, p. 661. 关于FTC的“试验航行”的有启发意义的研究,首先学习到它的影响力的范围和限制时,见Robert Aduddell and Louis Cain, “Public Policy Toward the ‘Greatest Trust in the World,’” *BHR*, Summer 1981.

^⑧ *U. S. v. Darby*, 312 U. S. 100 (1941).

^⑨ *U. S. v. E. C. Knight Co.*, 156 U. S. 1 (1895).

^⑩ *U. S. v. U. S. Steel Corp.*, 251 U. S. 417 (1920), and *U. S. v. Aluminum Co. of America*, 148 F. 2d; 416 (1945).

^⑪ 另外,1936年国会用《鲁滨逊-帕特曼法案》修改了《克莱顿法案》,直接试图禁止消费者在连锁商店的大量购买的折扣。这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小商业必须在大商业的竞争中得到保护。谢勒评论了《鲁滨逊-帕特曼法案》:“There is virtual unanimity among students of the Act that... its motivation was desire to limit competition, not to enhance it.” 在1937年,国会通过了《米勒·泰丁斯法案》,免除了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转售价格的维持的合约(价格固定)。F. M. Scherer and David Ross,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1990), p. 509.

管制机构的督导,又陷入了另一个机构的掌控,这是不合理的,尽管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⑤

最初,律师们反对《谢尔曼法案》,认为它与普通法抵触,与“合理原则”(rule of reason)不符。在普通法中,只有“不合理的”限制才是非法的。《谢尔曼法案》则禁止“所有的”限制,无论其是否合理。因此,在合众国诉跨密苏里运输联合会案(1897)中,最高法院弃用了合理原则。^⑥但是在新泽西美孚石油诉合众国案(1911)中,又很明确地适用了合理原则,其中何为合理由法庭决定。^⑦这两种推理原则都被法庭所沿用。

所有这些混乱情况本来都是可笑的,但是企业却因此被拆分、罚款,个人因此被投入监狱。无论反托拉斯法案意味着什么,法庭都是严肃对待的。

4. 对政府干预的评价

我们知道,美国经济从未脱离过既定的法律体系运行——即使有最边远的边疆地区可能有过例外,其持续时间也很短。从最早的殖民时期起,经济的社会环境就属于各州权力的范围。财产法律,普通法对伤害、诈骗和疏忽的规定,以及美国政府喜欢直接管制的倾向,意味着美国定居地区里的企业家或多或少处于一个拥有既定法律体系的环境。他们知道法律,他们的客户和竞争者也知道法律。

正当美国的经济领袖发现大规模组织的好处,着手创立巨型制造业、交通业和金融业的联合企业时——这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特点——公共观点却变得酸溜溜的。各州权力机构本身似乎开始反对工商企业。对政客们来说,反对“大企业”变得有利可图,至少在竞选期间如此。立法机关也反映出这一偏见。我们已经讨论过,到1914年,联邦政府控制经济活动的主要法律基础已经存在。这些法律和机构,以及不久即将出现的其他类似事物,意在限制美国主要企业的力量,在其上施加政治控制。^⑧

罗伯特·维贝(Robert Wiebe)认为,在南北战争之后的整个时期,美国的基础社会结构发生了剧变。小城镇和农村试图保持其政治地位,然而经济力量显然已经向迅猛发展的新兴城市地区发生了转变。^⑨按照维贝的观点,联邦政府施加的非市场控制反映了这种回归旧势力的力量。

道格拉斯·诺斯提出了一种兼容的观点。^⑩诺斯认为,在平民主政体中,自由市场上的失败者试图通过政治渠道来补偿自己的经济损失,因为他们的选票可以左右政坛。

^⑤ 在AT&T反托拉斯案例的某点上,讨论了公司需要被分成小单元,因为它变得太大以致不能管理。

^⑥ *U. S. v. Trans-Missouri Freight Association*, 166 U. S. 290 (1897).

^⑦ *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 v. U. S.*, 221 U. S. 1 (1911).

^⑧ 《商业历史综述》的2002年冬季刊包含了关于技术改革和管理的一般主题的几篇论文。这一时期特别相关的是关于无线电(收音机)服务的出现和电报、电话服务的分离的论文。近期两篇记录州层次规制发展的文章是William Hausman and John Neufeld, "The Market for Capital and the Origins of State Regulation of Electric Uti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2, no. 4, December 2002; and Marc Law, "The Origins of State Pure Food Regul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3, no. 4, December 2003.

^⑨ Robert Wiebe, *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 (New York: Hill & Wang, 1967).

^⑩ Douglass North,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The Task of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16, no. 3, September 1978.

显然,巨型新行业的势力范围和大量涌现的工业城市,加上农业收入的相对衰落,可能就是反企业法律的原因。尽管劳工利益尚不能对政治权力起到决定性作用(我们将在第21章中看到这一点),劳工的投票在工厂区仍然举足轻重。他们的代表可能会联合起来争取利益,无论是否是少数派。

在平民民主政体中,失败者的联合可以在立法活动中体现出来,投票的少数者利益可以被放大,尽管通常来说占据优势的仍是多数者政治。^⑤同一时间可以发生不止一件事情。企业从1890年的《麦金利关税法》中获得保护,然而同时,其他利益群体推动通过了反托拉斯法。^⑥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在1865—1914年的特殊利益政治现象中存在,正如现在仍然存在一样。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一个被认为国会腐败的时代产生了对企业施加联邦管制的第一次现代行动。乔治·彼特林梅尔(George Bittlingmayer)研究了反托拉斯法案实施的前25年,他发现,针对大企业的诉讼与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同时出现,针对小企业的诉讼则与之无关,这一发现是反托拉斯对经济活动有害假说的证据之一。^⑦

政府中反企业态度的兴起可能始自克利夫兰,并于1912年威尔逊的成功竞选时达到顶峰,这显然是很好的政治——也就是说,能赢得选票的政治。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廉·塔夫托(Howard Taft)都将打倒托拉斯的修辞口号作为竞选成功之路。在美国,农民和小城镇居民的选票仍然是多数,尽管其领先优势在减少。

那些在殖民时期从政府严控逐渐削弱的趋势中得到好处的人是独立的精灵、大土地授予者掌控中的失败者、只在镇区分发新土地的新英格兰政府。他们主要是渴求土地的农民,最终通过革命(根据1785年和1787年的土地法令展开的和土地拍卖)从自由市场得到了土地。还有希望从殖民时期城镇的严密非市场控制中寻求自由的生意人,他们企图脱离殖民时期定居点的大批监视者、搜寻者、督查者和检察官的牵制而获得自由。

在南北战争之后,农民再次成为失败者,但是他们现在有了同伴,即劳工和城市贫民,后者在争夺收入分配份额的战斗中败给了工商企业家。他们要求回到对经济进行非市场控制的道路上来,要求对财富和收入进行系统性的转移。这些需求是最初要求州对铁路进行管制的原因,并随着这股力量上升到了联邦层面。他们在各种影响农业和工业的法案中发挥作用,包括《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在取得了一些间断的胜利之后,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赢得了这场战争。

在近半个世纪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福利国家的美国版本,但这是一个转移社会(transfer society),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财富从富人处转移到了穷人处。^⑧20世纪30年代新政时期之后的失败者是那些工作、赚钱却受到过多征税的人,他们既要缴直接收入税,又因为通货膨胀而蒙受损失:通货膨胀创造了租金并转移到其他地方,如政府承包

^⑤ James Buchanan, *The Limits of Liberty: 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pp. 100—103.

^⑥ 从这个观点看美国经济史的结构,参见 Stanley Reiter and Jonathan Hughes, "A Preface on Modeling the Regulated United States Economy," *Hofstra Law Review*, vol. 9, no. 5, Summer 1981, especially pp. 1403—1421.

^⑦ George Bittlingmayer, "Antitrust and Business Activity: The First Quarter Century,"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70, no. 3, Autumn 1996.

^⑧ Alan Blinder, "The Level and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Well-Being," in Martin Feldstein, e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 443—447. 这个术语取自 Terry Anderson and P. J. Hill, *The Birth of a Transfer Society* (1989)。

商、特别保护收入者、穷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包括那些在国外的人,如政府对国外势力的军事及非军事援助。还有那些工商业的利益群体,他们希望从不断扩张的管制中获得解放,我们将看到,到1980年,他们成功地取得了一些成果,通过政治行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去管制化。

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和安德雷·施雷弗尔(Andrei Shleifer)认为,法律执行策略的最佳选择取决于法律执行中有哪些易被受影响利益群体攻击的弱点。社会选择一种法律执行策略的可能选项有:出事后进行私人诉讼,采取预防性的管制措施,两者兼有,两者皆无。格莱泽和施雷弗尔指出,在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管制时代的初期,管制成为越来越高效的策略。去管制化的转变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此类问题现在可以通过私人诉讼有效地解决,因此管制相对而言就没那么高效了。^{⑥7}

联邦管制体系和反托拉斯法律中表现出来的混乱并非个别现象。这是联邦政府通过非市场控制手段干预经济的典型特征,自从1887年开始就一直如此。这一控制的目标是永久地处理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1914年已取得了众多成果——ICC、《谢尔曼法案》《食物洁净法案》(Pure Food and Drug Act, 1906)、《克莱顿法案》、FTC、联邦储备体系(1914)——它们是市场、买家和卖家之间的调停者。

我们必须记住一点,因为如果直接面对它的话,美国生活和历史、经济书籍中就会少了许多废话:非市场控制意味着拒绝接受市场的决定,通过成功地诉求政治或政治化的解决——寻租。^{⑥8}通常,其目标非常直接:市场中的一个群体希望通过政府干预获得市场本身不会带给他们的某些优势。否则,控制就没有理由了,除非是为了解决律师和官僚的就业问题。

在19世纪晚期,美国资本主义通过成立公司的一般法律产生了巨型工商企业。美国人恐惧这些企业的集体力量,然而,同时他们又想要:

(1) 只有巨型企业才能提供的大规模生产带来的好处

(2) 竞争性开放市场的好处,其中消费者的利益是通过卖家之间的相互竞争来保护的

这两个目标互相矛盾。^{⑥9}然而生活中许多令人向往的事情都是互相矛盾的(例如家庭和事业)。美国人想鱼和熊掌兼得,现在他们似乎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对自由市场的不信任显然深深植根于美国社会之中,并且可以追溯到最早的殖民地定居者那里。另一方面,对政府管制的抱怨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在所有党派的总统候选人和独立人士口中都可以听到。

这种二元对立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美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当工商企业变得规模庞大时,社会的政治臂膀控制它们的努力也会随之增长。1937年,美国最高法院直率地表达了这一观点,认为《瓦格纳法案》——对企业施加了联邦建立的工会——是符合宪法的:

当企业扩大到全国规模时,州际商务成为其主要活动,其劳动关系怎么会是国

^{⑥7} Edward Glaeser and Andrei Shleifer,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JEL*, June 2003.

^{⑥8} Anderson and Hill (1989).

^{⑥9} 对那些斗争巧妙的总结,见 Alfred Chandler and Louis Galambos,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Modern America," *JEL*, March 1970.

会不能干涉的禁地。……^⑩

经济生活中没有什么方面会是政府不能干涉的禁地。我们知道,这也不是什么新观念,甚至可以将其追溯到1607年。在1887—1914年间,这股力量上升到了联邦层面,在那里,它保持、发展、兴盛、扩大。芒恩诉伊利诺伊案是古老系统的终结,1887年的《州际商务法案》则是新时代的开端。

推荐阅读

文章

Aduddell, Robert M., and Louis P. Cain. "Public Policy Toward the 'Greatest Trust in the World.'"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55, no. 2, Summer 1981.

Atack, Jeremy.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Corpora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2, no. 1, January 1985.

Chandler, Alfred D., and Louis Galambos.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Modern 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0, no. 1, March 1970.

Field, Alexander J. "Modern Business Enterprise as a Capital-Saving Innov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7, no. 2, June 1987.

Gilligan, Thomas W., William J. Marshall, and Barry R. Weingast. "Regulation and the Theory of Legislative Choice: The Interstate Commerce Act of 1887."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32, no. 1, April 1989.

Glaeser, Edward L., and Andrei Shleifer.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1, no. 2, June 2003.

Grandy, Christopher. "New Jersey Corporate Chartermongering, 1875—1929."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9, no. 3, September 1989.

Hovenkamp, Herbert. "The Classical Corporation in American Legal Thought." *Georgetown Law Review*, vol. 76, no. 5, June 1988.

Hughes, Jonathan. "Transfe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Upon Economic Activity."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 1976.

Langlois, Richard N. "External Economie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Case of the Microcomputer Industry."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66, no. 1, Spring 1992.

Langlois, Richard N., and Paul Robertson. "Explaining Vertical Integration: Lessons from the American Automobile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9, no. 2, June 1989.

Levenstein, Margaret C. "Mass Production Conquers the Pool: Firm Organization and the

^⑩ N. L. R. B. v. *Jones and Laughlin Steel Corp.*, 301 U.S. 1 (1937), pp. 41—42.

Nature of Competi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5, no. 3, September 1995.

———. "Do Price Wars Facilitate Collusion? A Study of the Bromine Cartel Before World War I."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3, no. 1, January 1996.

McCurdy, Charles W. "American Law and the Marketing Structure of the Large Corporation, 1875—189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8, no. 3, September 1978.

Montague, Gilbert H. "Anti-Trust Laws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14—1927."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27, no. 6, June 1927.

O'Brien, Anthony Patrick. "Factory Size,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he Great Merger Wave of 1898—1902."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8, no. 3, September 1988.

Scheiber, Harry. "The Road to *Munn*: Eminent Domain and the Concept of Public Purpose in the State Court." *Perspectiw,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5, 1971.

———. "Federalism a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Order, 1789—1910." *Law and Society*, vol. 10, no. 1, Fall 1975.

Thorp, Willard L., and Grace W. Knott. "The History of Concentration in Seven Industries." In *The Structure of Industry*. Temporary National Economic Committee, monograph No. 23.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1.

Ulen, Thomas. "The Market for Regulation: The I. C. C. from 1887 to 192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0, no. 2, May 1980.

书籍

Anderson, Terry L., and Peter J. Hill. *The Birth of a Transfer Society*.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9.

Chandler, Alfred. *The Visible Han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Friedman, Lawrence M.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3.

Galambos, Louis. *The Public Image of Big Business in America, 1880—194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Handler, Milton. *Trade Regulation*. Brooklyn: Foundation Press, 1960.

Hicks, John D. *The Populist Revolt: A History of the Farmers' Alliance and the People's Par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31.

Horwitz, Mort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1780—186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Hughes, Jonathan. *The Governmental Habit Redux: Economic Control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Hurst, James Willard. *The Legitimacy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780—1970*.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0.

Josephson, Matthew. *The Robber Barons: The Great American Capitalists, 1861—1901*.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4.

Kolko, Gabriel. *Railroads and Regulations, 1887—191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Lamoreaux, Naomi R. *The Great Merger Movement in American Business, 1895—190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Langlois, Richard N., and Paul Robertson. *Firms, Markets and Economic Change: A Dynamic Theory of Business Institu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Lazonick, William.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the Myth of the Market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Letwin, William. *Law and Economic Policy in America: The Evolution of 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5.

Martin, Albrow. *Enterprise Denied: Origins of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Railroa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Miller, Arthur Selwyn. *The Supreme Court and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2.

Moody, John. *The Truth About the Trusts*. New York: Moody, 1904.

Myers, Gustavus. *History of the Great American Fortunes*. Chicago: Charles Kerr, 1960.

Neale, A. D. *The Antitrust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 Study of Competition Enforced by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Scherer, F. M., and David Ross.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ird edi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0.

Sklar, Martin J. *The Corporat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Capitalism, 1890—1916: The Market, the Law,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Sobel, Robert. *The Age of Giant Corporations: A Micro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Business 1914—1970*.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2.

Tarbell, Ida M. *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New York: Macmillan, 1925.

Thorelli, Hans B. *The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Origination of an American Tradition*. Stockholm: Akademisk Avhandling, 1954.

Troesken, Werner. *Why Regulate Utilities?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the Chicago Gas Industry, 1849—1924*.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Unger, Irwin. *The Greenback Er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第 19 章

金融发展:1863—1914 年

在 1863 年的《国家银行法案》以前,美国的银行业是多种形式的混合物:(1) 依据各州颁发特许执照而建立的银行,(2) 未获得特许状或根据各州一般法规建立的私人银行,(3) 根据纽约州体系建立的自由银行。^① 根据南北战争时期通过的一项法律,联邦政府继合众国第二银行的特许状于 1836 年因杰克逊总统的否决而失效之后,首度再次进入美国银行业。

1863 年之后创建的全国性银行,其运营范围仍然被限制在州的范围之内,甚至,即使在州内,它们仍然不得开办支行。它们是“全国性”的,只是因为它们拥有联邦政府的特许状。与之竞争的州银行系统仍然存在,保持了美国银行业的混乱传统。即使是真正全国性的联邦储备体系(Federal Reserve System,1914 年开始运营的美国中央银行,所有的全国性银行都必须与之合作),各州的界限仍然存在。《国家银行法》禁止跨越州界开办支行;为了保护来自一元式银行特许状的地方性垄断租金,大部分州禁止了它。

因为经济的发展需要金融作为中介,美国在 1863—1914 年间的金融史基本可以概括为,在一元式银行体系的限制内创造这种中介。这是一个奇怪而有趣的故事。

1. 创造金融中介

1912 年,联邦货币委员会在报告中抨击现有的美国商业银行体系,指责其根基和分支,直率地称其犯下了大量错误和罪行。此份报告详述了现存体系的 17 条重大缺陷,最后总结如下:

我们的国内、国际信用体系的运营方式现在可称为是粗鄙不堪、代价高昂的,完全与我们这个智慧的民族不相配。……我们的银行和银行家在国际贸易中起到的影响微乎其微,这对于一个进步中的国家来说简直是耻辱。……我们的厂商在国际贸易中感受到的能力匮乏,很大程度上对国内交易也适用。^②

如果这些指控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很可能会问,美国联邦和各州的立法机关怎么会创造出这样一种怪物呢?部分答案是,他们想出了这个点子,又把它搞砸了。这是(现在仍然是)美国政府的特点:试图通过立法满足每个人的要求。经过美国立法程序创造

^① Hugh Rockoff, "Varieties of Banking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40—1860," *JEH*, March 1975.

^② *Report of the 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2), pp. 28—29.

的经济机构通常不是专门设计来完成某种经济目标；它们还要满足更有效率地组织起来的利益团体，同时为起草法律的人招徕选票（有时还有经济支持）。那么，出现千奇百怪的结果就不令人奇怪了。

1.1 国家银行法

我们已在第12章中讨论过，到1860年，美国存在1500多个独立的州银行，它们都是之前各种金融危机的幸存者。它们都是发行纸币的机构，流通其自己的本票（promissory note）作为货币。1860年，可能有一万种不同的钞票在流通。

联邦政府的财政处境却很紧张。它试图通过销售长期债券筹集资金，但这一举措只取得了部分成功，而短期借债只会让联邦财政状况雪上加霜。^③ 1861年，约有1.80亿美元的利率为6%的长期债券售出。1862年，金融家杰伊·库克（Jay Cooke）承包了巨额的债券销售，通过挨家挨户地推销，成功卖出了3.62亿美元。那一年财政部还另外售出了1.50亿美元的债券。然而，同年，财政部因为急需资金，又另外借了6.82亿美元的短期债务，发行了9.15亿美元的法定纸币（最多4.47亿美元未在任何时候偿付）。^④ 当时有反对将新的长期债券“外包”给库克之类的运营商的。

因为这些都发生在具有转折意义的1863年盖茨堡战役发生之前，仗还要打好几年，急需资金，必须找到新的办法驾驭银行体系以满足联邦财政部的需要。答案很显然，要想办法迫使州银行接受联邦债券。他们选择的手段是1863年的《国家银行法案》（及其之后的修正案），在他们的设想中，这会将联邦财政部的财政需求同理清美国流通货币的需求结合起来。1844年的《英格兰银行法案》对英格兰银行纸币的处理（据此彻底消灭了私人银行钞票）可能是其灵感来源。成千上万种州银行的钞票可以通过发行一种全国统一的流通货币一下子尽数消灭。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让联邦政府对州银行重新发布特许状。^⑤

内战的爆发使得国会中暂时没了南方的立法委员，因此那些最反对“垄断性的”合众国银行重新出现的州在国会中没了代表。南方代表的缺席，使得新的银行业法律得以顺利通过。《国家银行法案》于1863年通过，但没引起多大反响；因此，1864年10月，又对法案进行了修订。同时，建立了一个新办公室，即通货审计官办公室。根据修订的法案，全国性银行根据其所在城市的规模而有不同的最低资本要求（最初的范围是从6千人口城市的5万美元到5万人口以上城市的20万美元）。通过购买相当于最低资本三分之一的合众国债券并将债券抵押（储蓄）在审计官处，每家银行将获得相当于债券面值90%的全国银行钞票（每家银行的名字被凸印在钞票上）作为回报。这一特征是对纽约州的自由银行体系的模仿；纽约州银行体系的其他特征，如安全基金、存款保险，则未被模仿。

全国银行钞票将是除了海关偿付之外所有场合的法定货币。为了让这种体系看起来比州银行体系更为健全，对全国性银行施加了法定储备要求，对全国性银行的资产施加了双重责任。这些特征应该能够吸引人们在全国性银行中存款。全国银行钞票流通

^③ 在T1年份借到的一年的100万美元，当还要求另外的借款，必须在T2年份被返还。理想的情况下，财政部将尽可能地借得久，至少将偿还的问题转移到钱是仅有的问题的时候。

^④ Paul Studenski and Herman Krooss,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table 20, p. 156.

^⑤ 在 *Veazie Bank v. Fenno* (1869) 这个方案被最高法院宣布合法。

需缴纳半年一次的 0.5% 小额税款——超过存在审计官处的政府债券的资本需缴纳 0.25%, 存款需缴纳 0.25%。此外,1864 年 6 月,开始对州银行钞票征收 2% 的税。

因为银行家们对这一方案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1865 年 3 月,对州银行钞票的税收从 2% 上升到了 10%。现在,用州特许状继续经营的过高成本使得银行家们对此方案的兴趣大涨。随着内战即将结束,参与全国体系的银行数量飙升。最初,似乎全国银行体系肯定将彻底消灭各州立法机关的银行特许业务。但是相反,实际上变成了两种体系并存的局面,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化了(参见表 19.1)。

表 19.1 1860—1914 年的国家银行与州银行

年份	总量		国家银行		州银行		国家银行资产 占总资产的 百分比
	数量	资产 ^a	数量	资产 ^a	数量	资产 ^a	
1860	1 562	1 000	—	—	—	—	—
1861	1 601	1 016	—	—	—	—	—
1862	1 492	1 012	—	—	—	—	—
1863	1 532	1 209	66	17	1 466	1 192	1.4
1864	1 556	973	467	252	1 089	721	25.9
1865	1 643	1 357	1 294	1 127	349	231	83.0
1866	1 931	1 672	1 634	1 476	297	197	88.2
1867	1 908	1 674	1 636	1 494	272	180	89.2
1868	1 887	1 736	1 640	1 572	247	164	90.6
1869	1 878	1 736	1 619	1 564	259	171	90.1
1870	1 937	1 781	1 612	1 566	325	215	87.9
1880	3 355	3 399	2 076	2 036	1 279	1 364	59.9
1890	8 201	6 358	3 484	3 062	4 717	3 296	48.2
1900	12 427	9 059	3 731	4 944	8 696	4 115	54.6
1910	24 514	19 324	7 138	9 892	17 376	9 432	51.2
1914	27 236	21 155	7 518	11 477	19 718	11 679	49.6

^a 资产单位是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Derived from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j 149—150, 158—159, 203—204, 212—213, 251—252. 州银行的数据适用于“非国家”银行及除了商业银行外的银行。

最开始,州体系迅速缩减,但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一旦州银行家学会了如何不发行纸币而仍然牟利,州体系又迅速恢复了。到 1900 年,州银行体系的总资产大大高于全国性体系。州银行的数量比全国性银行多得多,但其平均规模只有全国性银行的一半大。当时美国有 13 000 多家银行,而这一数目仍在跳跃式地上升。到底发生了什么?

1.2 存款与支票

南北战争之后,支票与存款日益成为偿付的通常方式。州银行只能流通它们自己的纸币(还要缴 10% 的联邦税),可以用活期存款(demand deposit)的方式借钱以及在这种

账户的名下签发支票。活期存款账户下的支票实际是一种金融汇票 (financial bill of exchange), 是委托人 (签发支票的人) 命其代理人 (银行) 将资金交给第三方的凭证。正如我们在第 1 章中讨论的, 这种叫做汇票的金融工具早在发现美洲之前很久就已被西欧的商人和银行家们使用了, 显然它在古代已为人所知。只要普通市民接受以支票作为付款方式, 而不是要求支付硬币或银行本票, 支票就可以被用做主要的金融工具。与支票相关的法律在殖民时期就已存在。

普通市民对支票的广泛使用是一项重大的创新, 因为这意味着日常流通中对钞票和硬币的需求可以减少。两件事情是必需的。第一, 银行家们必须尊重支票; 委托人必须拥有足够的银行信用。第二, 卖家相信委托人偿付款项的能力, 要么委托人将银行信用转移给第三方 (叫做正当持票人), 要么银行支付硬币或纸币给持票人。当然, 附属条件是卖家相信银行本身能够支付。

支票和存款的广泛使用, 意味着州银行不再需要印刷自己的本票来创造银行信用——货币。因为活期存款能够实现纸币和硬币的所有功能, 其本身也是“货币”。因此, 一旦支票和活期存款成为可以接受的支付方式, 就可以避免缴纳 1865 年实行的州银行钞票 10% 的税并且不减少州银行信用。1865 年之后的 10 年内, 州银行就成功地恢复了之前依赖自己发行货币才能运营的业务。在表 19.1 中, 我们可以看到截至 1914 年时州银行体系的增长, 及整个银行体系的增长情况。

甚至在 1914 年之前的 15 年里, 各种银行的数量和资产又翻了一番, 所以, 随着经济发展并在各方面都变得更加商业化, 银行业显然仍是一个增长中的行业。1914 年之前, 人们多次试图对这一迅猛增长的事物加以改革和控制。让我们看看这些尝试。

1.3 通货与硬币

19 世纪 70 年代末期, 所有的州银行钞票都从流通中消失了。全国银行钞票则是以存在审计官处的合众国政府债券为基础。随着利率下降——从南北战争到 19 世纪 90 年代——债券价格上升了, 而全国性银行不愿意在这种低回报的资产上投资, 甚至不愿意流通凸印着它们自己名字的钞票。^⑥ 相反, 全国性银行也开设了活期存款。因此, 流通中的全国银行钞票也减少了 (参见表 19.2)。

表 19.2 流通中的纸币与硬币, 1870—1914 年

年份	美元 纸币	国家 银行 纸币	金币	黄金券	银元	银元券	1890 年 国库 纸币	辅助 银币	合计		金属及 金属 代表	纸币 比金属
									低值 硬币	纸币		
1870	\$325.0	\$288.7	\$81.2	\$32.1	\$—	\$—	\$—	\$9.0	\$—	\$613.7	\$122.3	\$5.0
1880	327.9	337.4	225.7	8.0	20.1	5.8	—	48.5	—	702.1	308.1	2.3
1890	334.7	181.6	374.3	130.8	56.3	297.6	—	54.0	—	516.3	912.9	0.6
1900	317.7	300.1	610.8	200.7	65.9	408.5	75.3	76.2	26.1	617.9	1463.5	0.4
1910	334.8	683.7	590.9	802.8	72.4	478.6	3.7	135.6	46.3	1018.5	2130.2	0.5
1914	337.8	715.2	611.5	1026.1	70.3	478.6	2.4	160.0	57.4	1053.0	2406.2	0.4

注: 单位为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j 54—65.

⑥ Studenski and Krooss (1952), pp. 178—179.

财政部的部长们也不太愿意再增加合众国纸币,即绿背美钞。如下所述,这种南北战争期间发行的纸币最初是不能兑换成金银的,直到1879年财政部才恢复了正币的偿付。

随着金银及仓库收据——金银兑换票(certificate)——的增多,通货也增多了。直到19世纪末,绿背美钞和全国银行钞票在总支付手段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停滞不前。1900年之后,随着全国性银行数量的增多,全国银行钞票的流通数量有了大幅提升(参见表19.1)。随着利率的提高,合众国债券比上一代时价值更高,而银行大门上的“全国”标志成了威望的象征。^⑦ 全国性银行在各种货币危机中表现比州银行略好。

1900年之前,南北战争期间对美国通货问题的全国性银行“解决方案”不过是个笑话,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倾向于其他一次性解决所有货币问题方案的政治运动——赤金(solid gold)、银币自由铸造(free silver)、商品货币等事件的发生,我们将分别详细讨论这几种方案。目前,我们需要考虑的是1914年中央银行的重新出现。根据当时的议论,其原因之一是货币供应“缺乏弹性”,尤其是全国银行钞票的供应。^⑧ 在经济周期中,货币供应没能及时随着需求的涨落而伸缩。

对那些认为通货和硬币的增多能够使经济更加健全的人来说,是贵金属的开采和铸币,加上通过贸易顺差获得的钱,“解决”了1900年之前美国的经济问题(参见表19.2)。但是那一年,纯纸币与硬币及代表存储贵金属的货币之比下降了90%以上。在1870年,每存在1美元的金属币,就存在5美元的纯纸币;到1900年,与每1美元金属币对应的只有约40美分的纸币。最大的流通提升来自于货币黄金供应的增多和货币白银(比前者少)使用的增多。当美国终于在1900年正式采用金本位时,美国已经拥有很多黄金了。

1.4 银行业改革与联邦储备体系

最初,审计官们相信,必须给流通中的全国银行钞票数量设定一个上限。1875年,人们放弃了这一观点,因为纸币流通数量已经在下降了。没有明显的办法能让全国性银行(及其纸币)在全国范围内平均分布。斯图登斯基和克鲁斯报告说,1876年,马萨诸塞州新贝得福德镇流通的全国银行钞票数量比任何南方的州都要多。罗德岛的人均全国银行钞票流通量是77美元,阿肯色州的这一数值为13美分。^⑨ 为促进全国性银行的发展,1882年,小型银行(资本在15万美元以下者)所需的债券储备从1/3减到了1/4。同样,储备要求是根据城市的规模而变化的。1900年,全国性银行被允许发行和储备债券的面值相当的纸币。

然而,全国银行体系仍然是不成系统的。其支票清算(check clearing)活动非常缓慢且代价高昂,也没有一个中央协调机构。1882年和1873年的金融危机将全国性银行置于危险之中。1893年的大萧条再次使它们面临严峻处境,在1907年的大萧条中,它们几

^⑦ 从1863年到1907年,449个国家银行破产了;2000个州银行在同一时期被遗忘。对于国家银行的破产,它们80%的债务被偿还了(*Ibid.*, p. 248)。

^⑧ 最近的一个讨论可见 George Selgin and Lawrence White, “Monetary Reform and the Redemption of National Bank Notes, 1863—1913,” *BHR*, Summer 1994。

^⑨ *Ibid.*, pp. 178—181。

乎怀疑一切支付行为——拒绝为钞票支付正币。^⑩ 活期贷款 (call money) 利率 (无须事先提醒、随时可要求偿还的借款的利率) 在 1893 年大萧条中达到了 70% ; 1907 年更是达到了 125% 。理查德·格罗思曼 (Richard Grossman) 模拟了这一时期的宏观经济, 他认为小型的经济低迷, 只有少数银行倒闭, 将会导致真实 GNP 立即下降 2% 。而较大的经济衰退, 银行大范围倒闭, 将导致 20% 的下降。^⑪

当 1907 年尘埃落定之后, 人们要求改革。1907 年的大萧条再次暴露出银行储备系统的协调不力。当危机时刻, 对货币的需求增加时, 其供应却减少了。小城镇的银行家们将他们存在大城市银行里的存款当做储备。纽约市的活期贷款市场非常活跃, 所以它吸引了许多此类存款。在经济危机中, 乡村和小城镇的银行家将他们的存款取出, 大城市的银行家只得催促贷款人还钱来满足他们的要求, 整个信用体系就像纸搭的房子一样塌了。尽管美国财政部四处紧急拨款试图挽救, 尽管那些银行自身也试图发行票据交换凭证 (clearinghouse certificate) 作为临时货币, 但没有办法阻止恐慌的蔓延。^⑫ 这种恐慌在经济周期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总会出现, 很多人相信 (现在仍然相信) 那是由银行纸币 (存款) 增多引起的。^⑬

1907 年, 在年事渐高的摩根的领导下, 很多潜在的损失被纽约市巧妙、有力的行动所避免了。^⑭ 尽管这是旧时代最伟大的金融家“皮尔庞蒂弗克思·麦克恩默斯”极为杰出的成就, 他却因此没有得到人们的感激。他的行动——联合银行资金、信用配额、对股票市场空方 (short interest) 的管教——在某种程度上与英格兰银行 1857 年之后采取的手段相近, 而摩根对这些手段十分了解。1907 年, 他已经持续半个世纪每年在伦敦住一段时间, 打理他在那里的银行。他从英格兰银行那里学到了危机处理的办法。事实上, 他在 1903 年情况开始变糟时已经为类似的行动做好了准备。他的手段是在没有中央银行的情况下开展中央银行业务。

让某种形式的中央银行回归的话题已经被讨论了若干年。尼古拉斯·比德尔 (Nicholas Biddle) 和合众国第二银行所谓的违法之处在 1907 年的恐慌和 1873—1893 年的记忆中被遗忘了, 1908 年, 国会通过了《奥尔德利奇-弗里兰法案》, 为“下次”提供了一个临时紧急通货, 推荐全国性银行组织一个全国通货联合会, 要求建立一个全国货币委员会为银行体系的改革提供建议。而他们所建议的就是建立联邦储备体系。^⑮

^⑩ Kerry Odell and Marc Weidenmier, “Real Shock, Monetary Aftershock: The 1906 San Francisco Earthquake and the Panic of 1907,”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4, no. 4, December 2004, 提供了在西海岸的地震和东海岸的恐慌的联系。

^⑪ Richard Grossman, “The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Bank Failures Under the National Banking System,” *EEH*, July 1993.

^⑫ Jon Moen and Ellis Tallman, “Clearinghouse Membership and Deposit Contraction during the Panic of 1907,”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0, no. 1, March 2000, 宣称属于票据交换所成员的纽约和芝加哥银行比非成员的银行有更小的缩减, 这是对《联邦储备法案》的一般性支持的证据。

^⑬ 一些经济学家还相信金融危机仅仅是更深存在的不平衡的偶发现象。证据没有表明仅仅向货币或非货币成因发展的趋势。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Michael Bordo, “The Impact and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Financial Crises: Some Historical Evidence, 1870—1933,” *Rivista di Storia Economica*, 1985.

^⑭ Jonathan Hughes, *The Vital Few* (1986), pp. 439—453.

^⑮ 关于联邦储备银行制度的结果的背景和起源的细节, 见 Robert Craig West, *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 1863—1923* (1977)。

委员会的主席、罗德岛的参议员纳尔森·奥尔德利奇(Nelson Aldrich),于1911年提出了建立一个联邦储备联合会的计划,联合会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15个地区,由私人银行群体持有和运营,由联邦政府提供赞助。事实上,他的计划和老朋友摩根以前提出的其他大型金融重组计划很类似。

1912年,委员会的报告中又重新提出这一提议。然而,1912年是威尔逊和民主党赢得了选举。他们充满了改革思想。他们接管了国会的立法工作,将之改变以满足他们自己的标准。结果就是《联邦储备法案》于1913年12月由威尔逊签字生效。

显然,美联储的创立是美国对央行体系的一大贡献。奥尔德利奇计划中的许多成分被保留在了最终的法案中,但也有许多被改变了。而且,通过建立联邦储备委员会,新的体系被政治化了,该委员会所有被任命者都具有一定的行政权力。

《联邦储备法案》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充分反映出其起源的多样性。它是私人利益和政治创造力的混合物。1935年对美联储的结构和功能进行了改革,现在它的外表看起来像是“政府”的一部分。然而,外表可能是具有欺骗性的。

最初,除了纯技术性的结算支票和为联邦政府的金融操作服务的功能外,联邦储备体系不过是个空壳。12个银行的央行业务对于奥尔德利奇的方案来说过于简化了;美联储的设计意图并不是像当代的其他央行——如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德国国家银行或瑞典央行——那样成为一个垄断的中央银行。这12个银行的每一家都应该位于该地区的金融中心,但是,正如奥德尔和韦曼指出的那样,确认金融中心所在位置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①6}

过去的教训深深体现在《联邦储备法案》中。因为它的特许状不会过期,所以美国人不会再遇到大银行的特许状危机。美联储与其他银行做生意;它是银行的银行。它不直接与大众进行交易——也就是说,它不像早前的其他央行那样会与私人银行进行竞争。因此,不会有来自银行界的要求废止它的压力。

会员银行被要求在其本地区的银行中存入无息的现金储备,这是从萨福克体系中学到的关于信用控制的宝贵经验,在第12章讨论过。要求的储备(曾经多次改变,现在非常复杂)最初和全国银行体系的一样——也就是说,根据城市规模而不同。最初,《联邦储备法案》中本应有一个存款保险方案,但是因为银行家的反对,这一条被从法律中去掉了。^{①7}在1929—1933年间发生了更多的灾难之后,这一构想再次出现,成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其最初的雏形是纽约的安全基金,创立于1829年。

为了让各方满意,联邦储备体系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大杂烩。拥有联邦特许状的全国性银行被强制从属于这一体系。它们从地区银行购买最初的股份。每家全国性银行必须购买相当于其资本和盈余6%的联邦储备银行的股票(3%解款,另3%在未来随要求清偿)。每家地区银行将拥有九名理事,分为三类,每类三名:第一类代表银行家,第二类代表工商业和农业,第三类代表“公众”。第二类理事不能是任何银行

^{①6} Kerry Odell and David Weiman, "Metropolitan Development,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s,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Fed in the Lower Sou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8, no. 1, March 1998.

^{①7} 对这个法案的分析,见 Studenski and Krooss (1952), pp. 258—262. 标准的历史见 H. Parker Willis,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Legislation,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23)。

的员工、董事或官员。对第三类理事有同样的限制,而且,他们不能拥有任何银行的股票。州银行被邀请参与这一体系,但可保持其州特许状;或者,甚至不用参与这一体系,也可以使用美联储的支票结算功能。

将这些结合在一起的是联邦储备委员会:拥有七名成员,最初包括财政部长和通货审计官。总统在参议院的建议下任命其他五名成员,并需经过参议院同意。办公室章程试图将白宫的占有者通过任命成员控制这一系统的可能性最小化。地区银行高级官员的任命需经过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同意。而且,每家地区银行都将有一名来自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代理人”,以促进内部交流与合作。地区银行可以在定期举行的联邦咨询委员会(Federal Advisory Council)上对联邦储备委员会提出建议和意见。

银行家们想要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但不想受联邦政府的控制,他们想要私人所有权。国会中的平民主义者想要民主,想要从上层限制私人银行的利益。威尔逊和改革派想要某种形式的中央银行。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些东西。

地区银行将根据其购买的商业票据发行自己的本票,据信,这样会使通货“更有弹性”,能够随着商业的需求而增加。但是,为了满足健全货币的需求,最初还有一个要求,即发行钞票需以黄金为“背后支撑”(最初,黄金持有量被包括在“资本”数量中)。实际上,这种“钞票要求”一直持续到了1968年,不过数额降低到了25%。地区银行的利润超过6%的部分将与美国财政部平分,用来偿还国债或作为未来绿背美钞发行的基础。

最初,那些想要“轻松赚钱”的人对新联邦储备钞票的前景表示不满。他们想要和绿背美钞一样容易使用的东西。只要印刷钞票然后花出去,就行了!《联邦储备法案》被称为:

一项建立联邦储备银行、提供弹性通货、提供再贴现商业票据的手段、对银行业实行更加有效的监督及其他目的的法律。……

之后,美联储的结构和功能还发生了很多变化。最开始,为了“找到诀窍”,学会如何通过这个奇怪的机构进行央行的操作,显然需要某种特殊的天赋才能。本杰明·斯特朗,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头头,几乎是立即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20世纪20年代的开放市场委员会(Open Market Committee)及其运营实质上可说是他的发明。^⑮到20世纪70年代时,几乎完全基于政府债券购买的联邦储备钞票成为“弹性通货”,这超出了绿背美钞支持者们的想象。如果印刷更多的货币就能解决经济问题,那么美联储就可以造出乌托邦。1914年只是开始,是央行缺失80年之后的回归。^⑯

^⑮ Elmus Wicker, *Federal Reserve and Monetary Policy 1917—1933* (1966); S. V. O. Clarke, *Central Bank Cooperation, 1924—1931* (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1968). Perry Mehrling, “Economists and the Fed: Beginning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6, no. 4, Fall 2002, 是对四名经济学家, J. 罗伦斯·劳克林, 欧文·费歇尔, 保罗·华伯格, 以及本杰明·斯特朗的近距离观察, 他们都在美联储的形成和早期发展上起重要作用。

^⑯ 美联储是发展的企业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产物, 这种观点的提出见 James Livingston, *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Money, Class, and Corporate Capit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2. 投资银行与资本市场

只要存在需求,金融中介就可以有多种形式并可以创造出无数种不同的机构。美国最终发展出的体系是最为复杂的一种。19世纪晚期,发展中的经济有能力轻松创造出所需的结构。当经济增长点是土地投机和农产品贸易时,土地抵押公司和商人银行(merchant bank)迅速发展。当交通体系和工业化先后发展时,投资银行出现了。

2.1 戴维斯理论

兰斯·戴维斯(Lance Davis)发现,关于工业化和金融业发展之间的联系,英美两国的经历存在一些有趣的差别。^② 我们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工业家们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兼并运动,产生了一批“巨型企业”。然而类似的事情在银行业并没有发生,反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小银行,成千上万。1900年左右,美国拥有巨型工业企业和过多的小型商业银行。英国的情况则跟美国相反。英国的特征是,工业企业并不互相兼并形成大企业,商业银行则相互合并,形成了少数巨型银行,其分支遍及全国乃至全世界。

戴维斯研究了这两个国家的金融业,发现了其中的关键联系:投资银行。美国的投资银行擅长把股票和证券放在投资者手中,包括那成千上万的小型商业银行。在英国,二线城市如乌维汉普顿或谢菲尔德的小型企业则可以前往劳埃、巴克莱或西斯敏银行在各地的支行办理所有的金融业务。各地支行可以调动整个银行庞大体系所集合的资本。这样,英国企业家无需放弃自己独立的企业跟别人合并,就可以筹集扩张所需的资本。因此,英国的工业结构主要由小型的家族企业组成。

类似处境下的美国工业企业则没有这种当地的资本来源。为了筹集资本,美国企业不得不创造一种不可见的、可以在别处交易的资产,在一个主要的中心地点交易以换取资金。所以,像股票、证券这样不可见的资产被创造出来,出现了兼并这样的金融活动。美国的企业家有办法搞到大钱,但很难搞到小钱。为这种筹集资本的工业重组服务的专门机构是位于金融中心的投资银行,它们在J. P. 摩根、布朗兄弟、哈里曼、库恩-洛布、基德-皮博迪等人的名下运作。

Pierpont 摩根和席夫(Jacob Schiff)这样的人在投资银行做的事就是对铁路、采矿企业、制造厂等进行兼并、重组,只要其前景足够光明,其金融票据(financial paper)能卖得出去。金融中介减少了其交易成本。人们普遍认为,重组的结果会导致该行业的竞争减少。因此,根据戴维斯理论的逻辑,美国的投资银行业伴随着美国制造业和交通网发展起来。大企业是由投资银行造就的,投资银行则凭借重组大企业的收益而发展。事实上,摩根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为了维系这种纽带,他坚持在每个大型金融重组的董事会中安排一个“摩根的人”。

关于这种过程,举一个人做例子就足够,他就是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

^② Lance Davis, "Capital Immobilities and Finance Capitalism: A Study of Economic Evo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EH*, Fall 1963.

19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担任宾夕法尼亚州铁路官员的卡内基,前往英国筹集资金。在美国是筹集不到的。1900年,当卡内基决定出售铁路时,他在一张纸上写下了4亿美元多的价格,把它递给了神奇小子查尔斯·施瓦布(Charles Schwab)。施瓦布把这张纸条交给了摩根,然后回报说,摩根只是扫了这张纸一眼,然后说:“我要了。”结果就形成了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工业并购,美国钢铁公司,其产能占美国铸铁总产能的2/3,5.50亿美元普通股,5.50亿美元优先股,3.04亿美元债券。以华尔街为中心的美国资本市场,有了摩根这样的投资银行家作为舵手,才真正显示出其威力。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一个人的经济生涯中,例如卡内基和摩根。机构的变迁,在本例中是美国商业银行界的不断分裂,产生了复杂的财务和庞大的企业。戴维斯是这样论证的,历史似乎也支持他的观点。^②

2.2 货币与资本市场

中介牵涉到两个更为基本的过程:收集与投资。储蓄者必须找到将资本聚集在少数收集机构——如银行和保险公司——里的好处,这些机构才能成为放贷者。另一方面,借贷者需要金融工具,需要从放贷机构获得贷款的途径。

所有的中介机构都善于提供各种时限的经济和借贷。短期(short end)有银行、储蓄机构、摩根这样接受存款的私人银行家。然后有专精于商业票据的机构,从银行贷款,再借给商人。也有非银行的中介机构,包括提供更长期借贷的保险公司,以及专精于长期债券的机构,投资银行。^③

我们知道,商业银行在美国独立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其客户主要是富人,其数量和资产的发展都大得惊人。

美国的储蓄银行出现在1816年。它们的设计意图是用来吸收穷人的存款。最早的储蓄银行以互助企业(mutual company)的形式出现,存款者是企业所有者,投资只限于风险最低的类型。因为其保守的投资策略提供了最大程度的安全性,互助的储蓄银行拥有商业银行所没有的健全声誉。尽管数量相对较少,但它们其实已跻身美国最大企业的行业了。因此,19世纪的互助储蓄银行在调动资本上的作用比今天的同类银行重要得多。截至1910年,628家互助储蓄银行的资产总和为36亿美元,约为7000家全国性银行资产总和的1/3。^④

尽管存在储蓄贷款协会(saving and loan association),但它们在1914年尚未发挥其在20世纪的重要作用。人寿保险公司也还未能像今天一样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它们已经是大型机构了。早在18世纪50年代,费城长老会牧师基金就开始出售人寿保险。一个世纪之后,保险单的销售已经发展出其他形式。多个

^② 由于美国对银行的权力由州控制,本地的利益占优势。见 Charles Calomiris, *U. S. Bank Deregul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2000)。

^③ Margaret Myers, *The New York Money Market*, vol. 1 (1931); John James,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Money Market, 1893—1911," *JEH*, December 1976.

^④ Lance Davis, Duncan McDougall, and Jonathan Hughes,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Economy*, third edition (Homewood, IL: Irwin, 1969), p. 203; Alan Olmstead, "Investment Constraints and New York City Mutual Savings Bank Financing of Antebellum Development," *JEH*, December 1972, 结果是对储蓄银行投资的限制。

险种的出现增加了保险的吸引力。1910年,保险公司的总资产为39亿美元,比互助储蓄银行的总资产略多。^② 商业银行、互助储蓄银行、人寿保险公司是1865—1914年间主要的收集中介机构。这三者的资金都可供贷款。

聚集的资金可以凭个人担保和(除了在全国性银行之外)实物担保(抵押)贷款给个人。尽管任何银行可能都有较大比例的业务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但和使用金融市场的标准工具——商业票据、债券、股票,全部由有资格的专家进行买卖——相比,这种方式非常繁琐累赘。对稳定的债券流进行专业化地评估,大大减少了所有参与者的交易成本。

全国性银行直到1914年才可以凭抵押贷款,而且直到19世纪晚期,银行仍对工业债券十分警惕。有组织的中介市场效率高得多。协助贷方挑选借款者的专门业务发展起来。人们需要金融工具(financial instruments),如普通股、优先股、可换股(convertible)、无担保债券(debenture bonds)、普通债券,可以很容易地对它们进行分类并交给买方和贷方。投资银行为其客户提供最佳借贷方式的建议。

关于“货币”(短期贷款)和“资本”(长期贷款)的市场在所有的主要城市中发展。但是,纽约市拥有港口、银行和大量中介机构,在19世纪70年代成为美国真正的货币、资本市场中心。华尔街集中、主导了整个美国的金融业。^③

兰斯·戴维斯认为,纽约的庞大货币市场是关键所在。正常时,来自乡村和小城镇通讯员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注入纽约的银行。纽约的货币经纪人甚至在18世纪时就已经十分专业,他们之间就收取的佣金比例达成了一致标准。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管理处已在运行,它将主导美国其他的金融中心。^④ 长期债务、股票的交易者经常也需要短期资金,他们构成了纽约活期贷款市场的基础。只需提前很短的时间通知,他们就可以借到所需的资金。

最初,只有很少几个企业在纽约上市。其中由公共设施企业和铁路发行的政府债券占多数。戴维斯认为,南北战争期间联邦政府对资金的巨大需求,促使投资发展得日益成熟复杂。一旦储蓄者形成购买投资组合的爱好,经纪人和投资银行就可以利用这一点。19世纪末,工业家们在华尔街专家的指引下,或直接,或通过中介,能够轻松地利用美国储蓄者积聚的资源。美国拥有一个调动资本的机器。通过利用货币资本联合市场,这一机器愈加扩张。戴维斯总结道:

阿波马托克斯之后35年内市场造就的巨大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者日益成熟、在南北战争期间得到验证的市场技术创新、活期贷款市场的继续发展及投资银行兴起的结果。^⑤

^② Davis (1969), p. 203.

^③ Robert Sobel, *The Big Board: A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Stock Market* (1965).

^④ Kenneth Snowden, "American Stock Market Development and Performance, 1871—1929," *EEH*, October 1987; Kenneth Snowden, "Historical Returns and Security Market Development, 1872—1925," *EEH*, October 1990.

^⑤ Davis (1969), pp. 215—216. 也见 Richard Sylla, "Federal Policy, Banking Market Structure, and Capital Mob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3—1913," *JEH*, December 1969. 毫无疑问,由于缺少州内的分行而增加了对投资银行的中介的需要,这有助于维持地区的利率差异。Lance Davis, "The Investment Market, 1870—1914: The Evolution of a National Market," *JEH*, September 1965.

3. 通货问题

金融机构的成功建设取决于交换媒介的实物供应情况。我们知道,美国独立之初就采用了金银复本位制,这成了之后美国货币问题的源头。南北战争之前,存在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州银行钞票,这不但没有使问题简化,反而使其更复杂了。之后,在南北战争期间,出现了绿背美钞和全国银行钞票。从那时起,直到1933年,情况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货币”对政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总统竞选的主题多次集中在美国应该拥有哪种货币这一问题上。

3.1 哪种货币?

顺便说一下,美国不是唯一一个遭遇货币问题的国家。例如英国,它花费了几个世纪,历经无数改革家的努力,试图把他们古老伟大的货币系统改成十进制的。最终,直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人终于成功了,然而仿佛是命运的嘲弄,这个十进制的货币竟然成了英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一次通货膨胀的载体。19世纪40年代,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甚至让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发出如下的感慨:“货币问题甚至比爱情更让人发疯。”

美国一开始就享受到了十进制的优越性。当美国人将其货币(硬币和纸币)命名为美元时,他们不必再使用英国货币:基尼(英国旧时的金币,值21先令,现值1.05英镑,用于计算专业人员的收费,如律师、医生等的费用)、英镑、克朗(5先令(25便士)的英国旧币)、半克朗、弗罗林、先令、便士、四分之一便士。除了采用四分之一元,使得人们可以继续使用古老的25分、50分和75分之外,他们把1元分成100个便士。美国的主要问题是,硬币应该用哪种金属来做。应该使用哪种金属作为标准?

宪法规定,金银都是法定货币。没有提铜、铅和铁。但是金银兑换票这样的代表货币呢?是否应该储备同样数量的贵金属为其“担保”?银行本票呢?它们是否应该有“担保”?用什么担保?由谁来发行?联邦政府的纯名义纸币呢?这些应该由谁来控制?哪些应该是法定货币?哪些不是?^②

为了简化问题,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殖民时期的货币情况(暂不考虑印第安人的贝壳、鹿皮之类)。债务人阶层喜欢有更多的货币,这样工资就能上涨。买卖日用品的人(农民)也喜欢有充足的货币供应,因为这样可以提高价格,让资本收益自然增长。然而,那些拥有货币财富的人不希望货币供应恣意增长,因为这样利率可能会下降,他们放贷的收益可能会因此减少。因此,可以简要概括地认为,穷人和农民希望人均货币供应增长,而那些靠利息赚取收入的人则希望人均货币供应保持稳定或下降。^③

因为黄金是最稀缺的金属,所以富人更喜欢以黄金作为标准。因为最丰富的贵金属

^② 详细地包含这个材料的两个很好的早期的工作,见 A. B. Hepburn, *History of Curre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4); and Davis Dewey,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4)。赫本特别善于描写《谢尔曼白银采购法案》的狂妄后果。

^③ 正如我们在下文还将讨论的,平民党的一个要求是每人有固定数量的钱(50美元),这个观点仍然存在于如今货币主义者的想法中,尽管它已经转变为对货币和人口增长率的匹配。

是白银,所以白银受到那些因工资和价格上涨而获益的人的喜爱。而且,后者也喜欢纸币,无论其来源如何。金银复本位制是一种妥协;储备要求是对银行发行纸币的限制。还有其他限制是针对直接发行的名义货币:19世纪时是绿背美钞,现在是联邦储备券。

现在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些矛盾从未得到完全解决。今天,“新凯恩斯主义者”代表了老的通货膨胀主义者的利益,而现代货币主义者则代表了“健全货币”的利益。现在我们来看看1862—1914年间关于货币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

3.2 绿背美钞和正币偿付

美国于1862年开始发行“绿背美钞”,当时黄金正在流出这个国家,银行和财政部停止了正币的偿付。绿背美钞是纯粹的名义货币。因为1834年的《通货法案》低估了白银的价值,1862年实质上已经没有白银在流通。随着绿背美钞和全国银行货币的发行,价格一路飙升(参见图19.1)。南北战争期间的通货膨胀使得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只能对通货体系进行一些笨拙的修修补补。那些享受通货膨胀带来的收入增长的人可能并不希望通货膨胀继续变得更严重,但他们肯定更不喜欢战争结束之后实际发生的情况。战后的价格崩盘一直持续到了1869年左右,只有少数周期性的短期恢复。因此,在30年的时间里一直存在来自通货膨胀主义者的稳定压力,他们要求做点什么以阻止通货紧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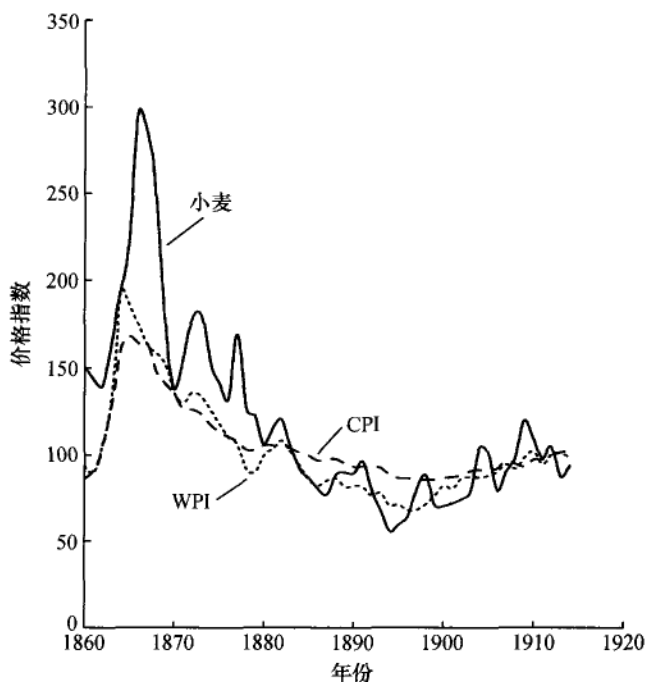


表 19.1 价格,1860—1914 年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c 1, 66, 113, 206—209.

事实上,价格下降反映了生产力提高,导致了真实工资和收入的上升,然而通货膨胀主义者看不到这一点。那些想要通货膨胀的人变成了白银和纸币的狂热支持者。“健全货币”利益群体则支持黄金,而且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反对白银和绿背美钞利益群体。

19世纪90年代末到1914年的价格复苏部分地缓解了货币贬值的压力,然而其原因更多地是由于金银供应量的增加,而不是纸币。正如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一样,贵金属供应的增加最终导致了价格的上升。

战争结束之后,连续几任财政部的目标都是恢复黄金偿付。为恢复美国出口的竞争力,价格下降是必需的。因此,纸币发行必须有所限制。在此背景下,绿背美钞的发行被冻结、减少,而我们知道,全国银行美钞的流通也没有多到能使价格上升。结果导致了第一次“货币起义”(money revolt)——绿背美钞运动,其目的是促使美钞发行量提高以刺激物价。^⑨ 1873年的经济危机让物价再一次急剧下降,扩大纸币发行量的压力更大了。然而,1874年国会对绿背美钞设定了3.82亿美元的上限,次年又命令财政部于1879年1月恢复黄金偿付。这是在15年的暂停之后重新采取的行动。1870年的《基金法案》(Funding Act)中也有关于绿背美钞的条款,其中规定,1870年之后停止发行绿背美钞,直到其总量降低至3.6亿美元。^⑩ 它们将被扩大发行量的全国银行钞票所取代(然而事实上,直到20世纪,全国银行钞票才开始扩大发行量,参见表19.2)。

3.3 1873年的罪行

19世纪四五十年代黄金供应的增多让白银退出了流通领域。^⑪ 1834年的《通货法案》将比例定为16:1。1861年,15.29盎司的白银可以购买一盎司黄金(白银价格为每盎司1.352美元)。白银退出了流通领域,因为银块比铸成的银币更值钱。19世纪70年代早期,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大发现的影响逐渐减退,1美元所含的贵金属成分为1.0312美元;所以白银仍然不被流通。1873年的《铸币法案》没有提及任何关于重新铸造银币的条款。因此,美国财政部只得印刷面额少于1美元的纸币以提供流通媒介。

西部银矿大发现之后,白银产量飙升,1874年时,1盎司黄金的价值已相当于16.7盎司白银。在市场上,白银价格降到了每盎司1.292美元。白银生产者希望重新获得补助。1873年的《铸币法案》撤销了固定的银币铸造价格,从此它被称为“1873年的罪行”,而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势力诞生了,它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做自由白银(free silver),其目标是恢复白银原先的地位。^⑫ 奇怪之处在于,他们将从市场中移除白银称为“自由”。“自由白银”者认为,铸币厂购买的白银会增加货币数量,从而提高物价。^⑬ 通货膨胀主义者有了立法的新目标,让财政部按照1834年的铸币厂面值重新购回白银。海斯总统

^⑨ Irwin Unger, *The Greenback Era* (1964).

^⑩ 这个部分的数字取自 Studenski and Krooss (1952), chap. 16.

^⑪ 事实上,我们可能提出自19世纪50年代起,美国已经不再使用复本位制的标准。David Martin, "1853: The End of Bimetal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JEH*, December 1973. 也见 Milton Friedman, "The Crime of 1873," *JPE*, December 1990. 弗里德曼指出如果保留一个严格的复本位制,标志着19世纪残余物的价格上的大部分下降可能被避免。

^⑫ 复本位制的概念存在于“第73条罪行”之下。Francois Velde, "Following the Yellow Brick Road: How the United States Adopted the Gold Standard,"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6, no. 2, second quarter, 将这一部分置于国内的复本位制的背景之内。更一般化的,见 Angela Redish, *Bimetallism: An Economic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⑬ Marshall Gramm and Phil Gramm, "The Free Silver Movement in America: A Re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4, no. 4, December 2004, 指出这个问题不是通货膨胀,而是缺少能加大流通成本的小面额硬币,特别是对于南部人和西部人。

1877年否决了恢复补助的提案,但一年后,国会推翻了他的否决,通过了这一议案。

3.4 1878年的布兰德-埃里森法案

《布兰德-埃里森法案》(Bland-Allison Act)也试图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它提出了一种斯图登斯基和克鲁斯称为“跛行本位制”(limping standard)的东西,不是完全的复本位制,但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⑤ 根据这项1878年的法案,财政部将每月以当前市场价格购买200万—400万美元的白银。一方面,这些白银将被铸成银币,每块银币重412.5格令(1金衡制盎司=480格令),其中371.25格令是0.9的纯银。这是1834年的老法案所规定的硬币重量:价值20.67美元的银币将能在美国铸币厂中购买1盎司黄金。而且,银币是完全的法定货币;然而,如果用它们换取白银兑换票(10美元以上者),这些兑换票却不是私人交易的法定货币。例如,银行显然会拒绝接受兑换票。

1878年之前有很高的呼声认为,因为财政部可以拒绝购买超出铸币所需的白银,白银被“去货币化”了。《布兰德-埃里森法案》通过之后,财政部承诺购买白银进行铸币。白银流入,黄金流出。物价依旧下降,人们指责财政部未能以足够高的价格购买足够多的白银。按照《布兰德-埃里森法案》,价格就是市场价格。到19世纪80年代,统称平民主义者的其他群体出面要求恢复16:1的旧价格。他们希望提高白银价格也能提高其他物品的价格,如玉米、猪和棉花。^⑥

3.5 1890年的《谢尔曼白银购买法》

尽管根据《布兰德-埃里森法案》购买了2.913亿盎司的白银,1890年时白银在市场上的价格仍然降到了每盎司93美分,而财政部已储备了3.80亿美元的白银。其他物品的价格也没有恢复,银币主义者、绿背美钞主义者、平民主义者以及其他通货膨胀主义者,要求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

为了回报西部投票支持麦金利关税(更高的限制性关税),参议院通过了1890年的《谢尔曼白银购买法》。该法将每月购买量翻了一番,将使用1890年的国库券购买白银,然后上缴财政部换成金条或硬币。只要白银价格持续下降,那么出售白银换取国库券,用国库券购买黄金,然后用黄金购买白银,再用白银换取国库券,这样做就一直可以赚钱。

1893年,克利夫兰总统向国会紧急呼吁:“金融不信任和恐慌情绪已经从各处显现出来”,《谢尔曼法案》被废止,而此时财政部的黄金储备已经远远低于最低要求的1亿美元,处于十分危险的水平。^⑦ 在国际收支平衡的压力下,储备继续减少。政府以出售债券

^⑤ Studenski and Krooss (1952), p. 190; 也见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3), pp. 113—119 关于白银和货币。

^⑥ 杰弗里·弗里德曼在一篇分析国会投票的文章中,指出更高的选民债务层次不是一定和对黄金的抵制联系在一起的,而矿物和农业产品的层次是和这种抵制相联系的。弗里德曼总结这场争论是关于相对价格的汇率的效果,也是关于绝对价格水平的通货膨胀。见 Jeffry Frieden, “Monetary Popu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An Open Economy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7, no. 2, June 1997.

^⑦ Studenski and Krooss (1952), p. 219.

为应对手段。最终,在1895年,克利夫兰总统向华尔街和投资银行家求助。^⑧

皮尔庞特·摩根、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 Belmont)等人组成了一个辛迪加,向欧洲出售美国债券以换取黄金。这个辛迪加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随之就爆出了大丑闻。公众观点认为,美国政府向私人投资银行家求助是一件耻辱的事情。6个月之后,黄金再次开始外流,摩根提议再来一次。但克利夫兰总统重新回到了向公众出售债券换取黄金的道路上。债券的价格十分优惠。公众用钞票换取黄金,然后用黄金购买债券。如果财政部当时拒绝接受钞票支付黄金,那么白银主义者就能成功地迫使政府摆脱黄金、转向白银了。

1896年晚期,随着来自育空(加拿大一地区)和南非新发现金矿的黄金开始流入,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出现了转机,这一危机得到了缓解。财政部已经经历了8年的混乱,黄金储备已经数次大幅低于最低限额。

白银的支持者要求将白银和黄金的比价恢复到16:1(白银价格为每盎司1.292美元,16盎司白银等于1盎司黄金,黄金价格为每盎司20.67美元)。到了1896年,白银价格降到了每盎司69美分,和黄金的比价为30:1。那年夏天,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赢得了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他的“黄金十字架”演讲使得所有的通货膨胀主义者联合起来。虽然这是一场成功、有效的演讲,但是麦金利赢得了总统大选,支持黄金的“健全货币”势力开始进行。^⑨ 根据《布兰德-奥里森法案》和《谢尔曼法案》,财政部已经购买了5亿多美元的白银。现在,国际收支是顺差状态,黄金再次流入,商业前景看好,价格逐渐回升,该轮到健全货币支持者行动了。

3.6 1900年的《金本位法案》

1900年,在失败了数次之后,国会通过了《通货法》,或称《金本位法案》,在法律上规定了美国的纯金本位制。美元被定义为25.8格令的0.9纯金。1.50亿美元的金币将被储备起来,作为绿背美钞和1890年国库券的最终偿付手段。全国性银行的最低资本要求被降低了,少于3000人口的城市只要2.5万美元,全国性银行被授权发行相当于其储备债券面额的纸币。结果,涌现了大量的全国性银行。

黄金继续流入,通货大体上保持金本位。然后,1907年经济危机爆发,全国货币委员会成立,联邦储备体系形成,发行了新的联邦储备券,另一种新货币。

3.7 后记:1933年白银再次登场

尽管经历了这么多起起伏伏,1929—1933年间,这一体系再次崩溃,情况是前所未有的糟糕。人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平民主义者的白银“狂热”的最后一搏。1933年时的白银市场价格已经降到了每盎司43美分,而政府还将黄金的价格提高了69%,达到了每盎司35美元。为了安抚平民主义者,罗斯福总统命令财政部再次购

^⑧ Matthew Simon, "The Morgan-Belmont Syndicate of 1895 and Intervention in the Foreign-Exchange Market," *BHR*, Winter 1968.

^⑨ 关于这一时期的一个有趣的讨论参见 Hugh Rockoff, "The 'Wizard of Oz' as a Monetary Allegory," *JPE*, August 1990.

买白银。1933年6月,通过了《白银购买法案》,要求财政部购买白银,直到其白银储备量达到黄金的1/4,或者其市场价格达到每盎司1.29美元。

因为欧洲和亚洲的上空布满战争的阴云,黄金大量流入美国。到了1939年,美国财政部又购买了10亿盎司的白银(几乎吸干了世界白银货币体系中的所有白银),而白银的市场价格却还是43美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摄影和电子工业(使得白银有了极大的工业用途),加上通货膨胀,最终“帮助了白银”。储存在央行里的银币逐渐消失、被熔铸。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白银价格达到了历史顶峰:当亨特兄弟操纵市场时,达到了每盎司50美元。^④从1792年到1939年,美国财政部购买了46万多吨的白银,然而基本上却没有达到任何目的。

4. 平民主义者想要什么?

在这些充满戏剧性的货币斗争中,生活依旧继续,经济周期也继续运转。在大规模经济危机中,银行倒闭,铁路破产,工厂关门,数百万人失去工作。这些事件导致了劳工激进主义的出现和对自由市场长期调控能力的深切不满。约翰·詹姆斯(John James)指出,南北战争之后,经济危机日趋严重的原因并不是其冲击越来越大,而是因为货币体系的混乱,无论是通过货币乘数、高能货币还是货币需求。^⑤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非常严重——失业待救济人员排成了长龙——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人们开始谈论联邦政府对经济福利的责任,以此为基础,人们开始组织起来。最大的组织是人民党,即平民主义者,他们要求政府干预一系列经济事务。

平民主义者对制度创新的参与(例如1887年《州际商务法案》和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已经在之前的章节中讨论过了。本章中讨论的通货和银行业的变革是联邦政府试图干预经济的公开表现,与平民主义者的施政纲领一致。尽管自总统而下都发表了坚决的否认声明,但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了士兵的抚恤金、对造船商和企业家的补助、对铁路的补助和特殊优惠,以及保护厂商免收外国竞争的关税,所有的联邦政府资金和权力都可能创造市场本不会创造的经济活动和工作机会。1894年4月,失业者“考克西大军”来到华盛顿,要求联邦政府大量拨款,导致立法机关试图直接印刷纸币来缓解危机。克利夫兰总统感到震惊,但是他们的要求很明确。如果可以利用联邦权力资助铁路巨头和制造商,当然也可以用其帮助穷人。在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时期,一个非常不同的未来正在逐步显现。

1907年经济危机之后,国会最后一次试图通过仅仅改革货币和银行业来解决经济问题——它创立了联邦储备体系。1921年的经济衰退持续时间太短,不足以测试新体系的能力,但是,在1933年,事实证明单纯的“货币改革”再也不能满足那些在周期性经济衰退中倾家荡产的人们。最终,新政将把平民主义者的施政纲领付诸法律实施。

本章对金融制度发展的讨论是为了解答一个更广大问题:平民主义者想要什么?平

^④ 到了1980年2月,在一年的飞速增长之后,白银从前一年的每盎司5美元达到了每盎司50美元。Bunker and Nelson Hunt, the Texas oil millionaires,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is boom before it collapsed.

^⑤ John James, "Changes in Economic Instability in 19th-Century America," *AER*, September 1993.

民主义者不是革命者,他们不想推翻 1789 年的协定。他们停留在联邦宪法的界限之内,因为那是一种权力来源。^⑫然而,他们希望对宪法的实质性内容进行大量修改。

例如,平民主义者希望在联邦层面实行更加直接的民主。他们要求剥夺州立法机关任命参议员的权力。按照这种逻辑,所有的政府机关(除了联邦法院)将都由直接的大众民主选举产生。将不再有经济力量和地方影响的既定保留地。一切都必须由定期选举投票产生。

他们要求进行无记名投票,进一步强化了大众民主应当拥有更加广泛影响力的观念。如果不能监视投票行为,那么新兴城市政治机器的腐败行为将受到限制。毫无疑问,如果认为在争当官员者之间进行无记名投票就能产生良好的政府,这种想法有点天真幼稚,但是,即使政府是坏的,至少选择起来更加自由了。

女性选举权是其争取内容的一部分,是其政治优势,而且消除了对一半人口的公民权的明显剥夺。同样,平民主义者的施政纲领同情劳工运动。改善公共教育的要求也可以认为基本上是政治性的。教育显然是进入公务员阶层的成功之梯,在 19 世纪末,高中毕业的人口比例是非常之小的(1900 年仅有 7%)。如果没有更广泛的教育体系,大部分穷人孩子的出路就被封死了。

这些政治要求最终都得到了满足,而且,即使不能证明美国政治生活的质量因此得到了改善,至少可以说坏的政治不再因缺少投票权而产生。类似地,这些运动的一个结果是产生了功能性文盲,即现代高中毕业生,不是由于公共教育体系不能招收穷人的孩子上大学,给他们提供教育。如果他们没上大学,那是由于别的原因。

4.1 经济需求

平民主义者在经济上的要求是直接利用联邦权力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再分配。平民主义者清楚地看到这种事情已有先例——对工业有保护性关税,对铁路有补助,对公司有法庭和立法机关帮忙。自由市场的不公平结果只是平民主义者愤怒的部分原因。

尽管平民主义者的绝大部分极端要求从未得到满足,但它们也有自己存在的理由:

(1) 废除全国性银行体系。这些拥有联邦特许状的银行是嘲弄和仇恨的对象,因为它们没有随着国家发展而扩张其业务(贷款),而且,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它们都有系统地歧视农业、拒绝接受农业不动产的抵押贷款。为了保证全国银行钞票的成功,州银行钞票被课以重税直至其不复存在。全国性银行对平民主义者几乎毫无帮助,甚至很可能有害。

(2) 对铁路和电报系统进行国有化。铁路和电报公司是政府权力的受益者:取道权、征用权、对道路的特别垄断许可、各种各样的补助。按照平民主义者的观点,这都是滥用特权的突出事例。这些企业受到了联邦的管制,但没有国有化。按照平民主义者的观点,这些企业具有的“私有”特性简直是一个笑话。

(3) 禁止对法人公司进行补助。无论过去或现在,立法机关都无法满足这一要求。法人公司是一群把资本汇集在一起的人的集合。如果政府能够补助个人,却不能补助群体,这是说不通的。美国最高法院于 1886 年判决法人公司是个体的人,这是此要求在 19

^⑫ 下文的讨论主要来自约翰·希克斯的一个附录,见 John Hicks, *The Populist Revolt* (1931)。

世纪80年代末不现实的原因之一。如果在联邦层面满足这一要求,美国之后的历史就无法继续了。商品信用公司、克莱斯勒、通讯卫星公司,更不用提整个飞机制造和国防工业,都是联邦政府补助法人公司的标志。

(4) 外国人或法人公司不得拥有土地或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这是本土主义、念旧主义和早期的环境保护主义。其要点在于,应该保留土地用于农业和储备。“土地,包括所有宝贵的自然资源,是人民的遗产。”这一问题现在仍然时有所闻,例如在加利福尼亚有诉讼要求将每个农场的用水权限制在原先的160英亩宅地之内。美国民众普遍厌恶拥有美国土地的外国人,正如在过去一样。

这些后来的生态主义者和环境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平民主义者的最初意图。从1877年的《沙漠土地法案》和1878年的《木石法案》开始,人们试图“把东西放回”自然界作为定居过程的一部分。到了1868年,加利福尼亚的人民已经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从私人手中收回,而1872年,联邦政府单独划拨出了黄石公园。我们很快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平民主义运动看做现代特殊利益政治的大型先驱。然而,平民主义者也对意义更加广泛的问题表现出深切的关注,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主张会在美国政治中得到更加广泛的支持。例如,他们认识到,基于新兴的细菌疾病理论的公共健康手段将为工人——无论贫富——提供保护。^④ 平民主义者的“笨乡巴佬”形象是精英主义者对他们的丑化。

4.2 离家更近

平民主义者的要求只关注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从中我们看到一种新型的政治模式。平民主义者的纲领表现为一系列对现行秩序的指控——大型垄断企业(而不是小型企业)、法庭和立法机关的腐败,以及由此而来的“庞大财富”积累。平民主义者认为,“从政府不公的多产子宫之中诞生了两大阶级:贫民和百万富翁。”这样的修辞是必需的,因为平民主义者的要求是以改革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为了进行改革,必须对某些东西进行改善,而平民主义者提议改善的是他们所占的国民收入的比例。

这种“改善”之一就是通货改革。实质上,有两种形式的通货要求,都属于“商品货币”。各种关于白银的提议都是这一问题的一部分。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平民主义运动是在物价下降的较长时期即将结束时出现的。平民主义者知道,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货币总量必须和实际物品产量增长得一样快,否则物价就会下降。绿背美钞被冻结了,全国性银行也没有增加纸币发行量。1878年的《白银购买法案》不能满足要求,平民主义者希望财政部用新货币购买更多的白银。除此之外,增加货币供应的唯一希望是黄金,东部的坚挺货币支持者更偏爱黄金,但平民主义者认为其前景黯淡。因此,他们提出了“亚财政部方案”,要利用农业产出来增加货币供应。

^④ 参见 Robert Higgs,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1865—1914* (1971), pp. 36—39. Barbara Rosenkrantz, *Public Health and the State* (1972) 讨论了科学和马萨诸塞州的政策在1842年和1936年之间如何改变。Lee J. Alston, Ruth Dupré, and Tomas Nonnenmacher, “Social Reformers and Regulation: The Prohibition of Cigaret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9, no. 4, October 2002, 讨论了在20世纪早期,一个积极的进展运动在产生禁止制造、进口和烟草销量的兴趣上的作用。

“亚财政部方案”要求在农业地区建立地区性的财政部办公室。在收获季节,农场主可以将庄稼卖给政府,或者以庄稼为抵押获取政府贷款。财政部将印刷新的货币用于这种交易。这样,庄稼可以产生新货币。农产品价格将不再于收获季节下跌,农场主的收入因此获得了改善。这一方案直到 1933 年才被采纳,人们创立了商品信用公司来完成这一任务,使用了更为方便“有弹性”的联邦储备券。然而它并没有解决农业的问题。

农业抵押缺乏安全的贷款来源的问题也将用同样的方式解决,即通过政府直接提供针对农业抵押的贷款。这一办法将绕过现存的银行和抵押公司,还增加了货币供应。这一方案于 1916 年被采纳,那一年通过了《农场贷款法案》,规定成立联邦土地银行以提供农业抵押贷款,这是联邦政府提供此类服务的众多努力的开端。到了 1981 年,农业组织请愿要求政府阻止土地银行没收未履行付款的抵押品。尽管土地银行体系对某些农场主帮助很大,它们也没能解决农业问题。

现代货币主义的有趣先驱之一是平民主义者的另一个要求,即他们要求财政部保持通货供应为人均 50 美元(现在是人均 2000 美元以上)。这一想法是为了应对价格下降,如果没有别的,平民主义者至少是坚定的“数量理论”支持者。他们就像之前的绿背美钞主义者和之后的许多其他人一样,知道只有整体货币需求水平跟上农业产出的水平,才能确保提高农业收入——价格乘以数量。他们认为,指定一个人均通货数量就可以应对农产品价格因为产量飙升而导致的持续下跌。

正如第 15 章中所讨论的一样,让平民主义者耿耿于怀的不仅是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还有他们所坚信的(尽管常常是错的),他们比其他人的情况更糟糕,农产品价格下降得比其他价格更快,他们的贸易条件相对于工业产品、交通成本和利率在持续恶化。因为这一状况的形成部分是由于农场主自身的勤奋和高产,而他们又不愿削减产出,那么出路只能是利用政府权力来提高需求。

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美国社会的“失败者”形成的受侵害群体将无数次试图做同样的事情。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广泛抱怨美国首都里的特殊利益政治正在压抑国会,使其不能明智地统治国家。平民主义者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但他们早生了一个世纪。

推 荐 阅 读

文章

Bordo, Michael D. “The Impact and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Financial Crises: Some Historical Evidence, 1870—1933.” *Rivista Di Storia Economica*, International issue, 2nd series, vol. 2, 1985.

Davis, Lance E. “Capital Immobilities and Finance Capitalism: A Study of Economic Evo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vol. 1, no. 1, Fall 1963.

——. “The Investment Market, 1870—1914: The Evolution of a National Marke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5, no. 3, September 1965.

Friedman, Milton. “The Crime of 1873.”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 6,

December 1990.

Grossman, Richard S. "The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Bank Failures Under the National Banking System."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0, no. 3, July 1993.

James, John A.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Money Market, 1893—1911."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3, no. 4, December 1976.

———. "Cost Functions of Post-Bellum National Bank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5, no. 2, April 1978.

———. "Public Debt Management Policy and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1, no. 2, April 1984.

———. "Changes in Economic Instability in 19th-Century Americ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3, no. 4, September 1993.

Martin, David. "1853: The End of Bimetal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3, no. 4, December 1973.

Olmstead, Alan L. "Investment Constraints and New York City Mutual Savings Bank Financing of Antebellum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2, no. 4, December 1972.

Rockoff, Hugh. "Varieties of Banking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40—18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5, no. 1, March 1975.

———. "The 'Wizard of Oz' as a Monetary Alleg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 4, August 1990.

Selgin, George, and Lawrence White. "Monetary Reform and the Redemption of National Bank Notes, 1863—1913."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68, no. 2, Summer 1994.

Simon, Matthew. "The Morgan-Belmont Syndicate of 1895 and Intervention in the Foreign-Exchange Market."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42, no. 4, Winter 1968.

Smiley, Gene. "Interest Rate Mov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8—191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5, no. 3, September 1975.

Snowden, Kenneth A. "American Stock Market Development and Performance, 1871—1929."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4, no. 4, October 1987.

———. "Historical Returns and Security Market Development, 1872—1925."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7, no. 4, October 1990.

Spencer, Austin H. "Relative Downward Industrial Price Flexibility, 1870—1921."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4, no. 1, January 1977.

Sushka, Marie Elizabeth, and W. Brian Barrett. "Banking Structure and the National Capital Market, 1869—191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4, no. 2, June 1984.

Sylla, Richard. "Federal Policy, Banking Market Structure, and Capital Mob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3—191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9, no. 2, December 1969.

———. "American Banking and Grow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Partial View of the

Terrai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9, no. 2, Winter 1971—1972.

Williamson, Jeffrey G. "Watersheds and Turning Points: Conjectures on the Long-Term Impact of Civil War Financing,"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3, September 1974.

Wimmer, Larry T. "The Gold Crisis of 1869: Stabilizing or Destabilizing Speculation Under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2, no. 2, April 1975.

书籍

Calomiris, Charles. *U. S. Bank Deregul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Davis, Lance, and Robert Gallman. *Evolving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Britain, The Americas, and Australia: 1865—191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Dewey, Davis R.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34.

Friedman, Milton, and Anna J.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Hepburn, A. Barton. *History of Curre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cmillan, 1924.

Hicks, John D. *The Populist Revol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31.

Higgs, Robert.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1865—1914*. New York: John Wiley, 1971.

Hughes, Jonathan. *The Vital Few: American Economic Progress and Its Protagonis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James, John. *Money and Capital Markets in Postbellum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Myers, Margaret. *The New York Money Marke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1.

Rosenkrantz, Barbara G. *Public Health and the State: Changing Views in Massachusetts, 1842—193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Sobel, Robert. *The Big Board: A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Stock Market*.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

Studenski, Paul, and Herman Krooss.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cGraw-Hill, 1952.

Unger, Irwin. *The Greenback Er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West, Robert Craig. *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 1863—1923*.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Wicker, Elmus. *Federal Reserve Policy 1917—1933*.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第 20 章

庞大经济及其国际关系

美国的经济增长不像其他 19 世纪晚期的工业化国家一样严重依赖海外市场。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国内产出中有 20%—30% 依赖于出口销售,同时进口类似比例的商品以供国内生产和消费。因此,比较优势在欧洲人提升生活水平、进行专业化生产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英国人必须进口纺织业的原材料,法国人必须进口燃料,他们的工厂才能开工。与此相对,美国对贸易的依赖则小得多。

从 19 世纪 20 年代到 20 世纪 20 年代这整整一百年里,美国的出口量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6%—7%。这一比例随着时间逐步下降:殖民时期的比例要高得多,在 18 世纪 20 年代晚期为 20%—30%,在 1790—1800 年间为 10%—15%。^① 因为在西进运动中,美国大陆内部的原材料资源得到了利用,美国人几乎不需要进口异国产品,除了一些赤道地区特产和非常专业化的制造品。然而,在某些行业中,进出口的比重比其他一些行业要高。例如,农产品中约有 20% 出口到了海外市场,而进口商品如钻石、咖啡、茶、香料、高级瓷器和刻花玻璃等也在国内贸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然而,我们不应该就此认为对外贸易对美国来说并不重要。因为美国人确实想要购买外国商品,外贸对他们的真实价值,和其他可出售的商品与服务一样,等于其机会成本。如果美国人坚持要喝茶和咖啡,但无法进口这些商品,那么要用美国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去生产这些物品的成本将非常高。同样,如果美国农场主未能出口 20% 的农产品,那么他们在南北战争之后的处境将糟糕得多。由于对外贸易,美国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正如所有的贸易伙伴一样。美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巨大差别是其自给自足程度的不同。

1. 贸易与支付的趋势

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比例的变化,随着时间推移,每个国家的比较优势都会缓慢而切实地改变。技术变革本身通过重新定义生产要素,改变了要素比例。即使是一个只生长香蕉的加勒比岛屿,在有了现代交通之后,也可能以旅游业的形式出口其气候与风景(尤其是在冬季)。因此,它投入给香蕉的资源会减少,投入给宾馆的资源会变多。最后,当发现让所有的劳动力都在宾馆工作并从其他没那么幸运的岛屿购买香蕉反而利润更高之时,这个岛屿会开始进口香蕉。

^① Robert Lipsey, "Foreign Trade," in Lanc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72), p. 554.

1.1 美国贸易成分的变化

在表 20.1 中,我们可以看到比较优势在 19 世纪早期到 20 世纪 20 年代之间是如何变化的——从农业逐渐过渡到制造业。在出口方面,制成品的比例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进程而提高。在进口方面,原材料的比例大幅提高,制成品的比例则下降了。食品占出口总量的比例在 19 世纪末达到了顶峰。其后食品出口有所下降,其部分原因是欧洲大陆兴起了农业保护主义。

表 20.1 1821—1930 年的美国贸易结构

年份	原材料		天然食品		加工食品		半成品		制成品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1821	60.5	4.5	4.8	11.1	19.5	19.7	9.4	7.4	5.7	56.8
1851—1860	61.7	9.6	6.6	11.7	15.4	15.4	4.0	12.5	12.3	40.5
1881—1890	35.9	21.3	18.0	15.4	25.3	17.8	5.2	14.8	15.6	30.8
1901—1910	31.0	34.0	10.6	11.9	20.1	12.1	12.8	17.2	25.6	24.8
1921—1930	26.0	37.1	8.5	11.8	11.8	11.4	13.3	18.2	40.8	21.4

注:数据表示占美国贸易总量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Lance 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Economy* (Homewood, IL: Irwin, 1969), tables 16—3A, B.

尽管食品占进口总量的比例也在缓慢下降,这种下降却不是由于美国的农业保护主义。美国人进口的主要是赤道及其他不能在本土种植的异国食物。^② 进口赤道异国食物的需求,根据恩格尔定律,其增长速度很快就会低于需求其他进口商品的增长速度。

1.2 扩张

表 20.1 中的数据反映了一个快速扩张的贸易总量中的比例。我们可以在表 20.2 中看到用价值衡量的数字。这种增长是惊人的——在一个世纪中,出口增长到了 86 倍,进口增长到了 68 倍。但是,我们注意到,这种增长实际上比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略低。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怪异之处,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其长期进口弹性降低了;因此,其平均进口倾向,即其进口变化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降低了。其原因在于,在较长的时期内,美国的大部分原材料能够做到自给自足,而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经济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这一模式一直持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改变,那时石油进口飙升,而制成品的进口也上升了,回到了 19 世纪的比例。(这些急剧改变将在第 30 章中详述。)对于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前半段来说,随着国内收入的扩张,随着人口的飙升,随着竞争性经济导致的美国工业革命的发生,对外国商品的需求相对下降了。

^② Stanley Lebergott, "The Returns to U. S. Imperialism, 1890—1929," *JEH*, June 1980.

表 20.2 1820—1930 年美国贸易的增长

年份	总计		原材料		天然食品		加工食品		半成品		制成品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1820	52	55	31	3	2	6	10	11	5	4	3	31
1851—1860	232	274	143	27	15	33	36	44	9	36	29	156
1891—1900	1 006	763	296	202	183	129	256	130	82	106	190	107
1921—1930	4 499	3 742	1 165	1 387	360	445	528	423	600	686	1 916	801

注:数据是百万美元年平均率。

资料来源:Lance 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Economy* (Homewood, IL:Irwin, 1969), tables 16-3A, B.

1.3 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

尽管美国的平均进口倾向降低了,但是自 19 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与美国人口相比大得不成比例。在一个富有、持续增长、贸易的大门始终敞开的经济体中,这种模式是可以预见的。表 20.3 中列出了一些相关数据。

表 20.3 1876—1925 年美国占世界贸易的份额

年份	制成品		原料产品		美国人口 占世界人口 的百分比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1876—1880	7.4	3.7	15.4	7.1	(1850)2.0
1881—1885	9.6	3.8	16.0	8.5	
1886—1890	9.1	3.8	14.4	9.5	
1891—1895	8.6	4.4	16.1	10.0	
1886—1900	7.0	6.7	16.7	8.0	(1900)4.7
1901—1905	7.0	7.7	16.0	8.9	
1906—1910	7.2	7.8	14.7	9.6	(1910)5.1
1913	6.4	9.3	14.2	10.0	
1921—1925	7.9	13.2(1926—1929)	18.9	15.1	(1920)5.7

注:数据是总量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Trade data:Folke Hilgerdt, *Industrialization and Foreign Trade* (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1945), derived from tables 7—9, 13. Population: John V. Grauman, "Population Growth,"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vol. 12, p. 379; and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a 2.

美国在世界贸易中份额的增长速度显著高于美国占世界人口份额增长速度的唯一例子是制造品的进口。乍看之下,这一结果似乎显得有些矛盾。毕竟制造品的出口才是美国外贸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但是,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也迅猛增加了。

制造品不受恩格尔定律的影响,而且,因为它们种类繁多,它们实际上也不受边际效用递减(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每增加一单位物品所增加的满足程度逐渐减少)倾向的影响。在经典例子中,如果增加消费者已经拥有的物品,就会出现边际效用递减。然而在一个制造品种类层出不穷的经济体中,消费者很难产生厌烦情绪——今天的经济已经很明显地展示了这一点。但是,道格拉斯·欧文指出,美国在 1910 年左右成为制造品的净出口国,这一过程开始于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铁和煤出口的飙升。欧文的研究成果

和加文·赖特的发现相一致,后者强调,美国的自然资源在19世纪晚期的经济增长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③;符合逻辑地,制造品进口的增多在人均收入增加的经济体中是一个特征性的现象。最富有的工业化发达国家是最有活力的制造品市场。尽管制造品进口在美国总进口量中的比例下降了,但它们的绝对数量随时间而增长,它们占世界总制造品贸易量的比重在上升。

1.4 美国贸易的方向

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与欧洲的贸易在其进出口中占主导地位,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也在稳步上升。到了20世纪20年代,与美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量(参见表20.4)约占美国总进口量的2/5,出口量的1/3。与亚洲的贸易也大幅增多,尤其是和日本,但与其他亚洲国家(当时它们基本都是欧洲国家的附庸)的贸易也在增加。亚洲的经济发展,正如加拿大、墨西哥和拉丁美洲一样,为美国的进口提供资源,为美国的出口提供市场。

表 20.4 1860—1925 年美国贸易的方向

年份	北美北部		北美南部		南美洲		欧洲		亚洲		大洋洲		非洲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1860	6.9	6.7	8.8	12.5	4.7	9.9	74.8	61.3	2.4	8.3	1.5	0.3	1.0	1.0
1901—1905	8.6	5.4	6.7	13.3	3.2	12.5	72.3	51.3	5.3	15.4	2.0	0.9	1.9	1.1
1921—1925	14.3	11.5	10.1	14.9	6.8	12.2	52.7	30.4	11.3	27.3	3.2	1.6	1.6	2.1

注:数据是美国贸易总量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Lance 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Economy* (Homewood, IL: Irwin, 1969), tables 16-4A, B.

伟大的瑞典外贸统计学家福柯·希尔格特(Folke Hilgerdt)强调,是经济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地理与气候的差异,导致了贸易。^④到了20世纪20年代,世界贸易中约有90%来自发达国家。发展程度较差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量中只占零头。^⑤参与外贸的世界各地的制造商逐渐学会对其产品进行特化以适应外国客户的需要。随着世界各地收入的提高,市场扩张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分工——成为可能。通过外贸活动,美国的经济从这些改变中获益。

1.5 国际收支账户

如前所述,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和其他正在发展的国家一样。在经济扩张期,美国所使用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比他们生产的要多,导致了贸易逆差和外债增多。在经济停滞期情况则相反。

南北战争之后,随着工业化的扩张,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食物和材料出口大幅

^③ Douglas Irwin, "Explaining America's Surge in Manufactured Exports, 1880—1913," *REStat*, May 2003; Gavin Wright,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uccess, 1879—1940," *AER*, September 1990.

^④ Folke Hilgerdt, *Industrialization and Foreign Trade* (1945), pp. 23—25. 以及,“制造业的发展远远没有促使这些国家独立关注国外产生的关于制造的文章,促进了这类文章的引入(p. 118)。

^⑤ Folke Hilgerdt, *The Network of World Trade* (1942), p. 7.

增多,小麦、乳制品和肉类成为大宗外汇赚取者,进一步刺激了食物出口。尽管棉花不再是南方农场主的摇钱树,但棉花出口仍然数量巨大,保持了第一外汇赚取者的地位。此外,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进展,制造品和半制成品的出口显著增多。结果,到了19世纪70年代(参见表20.2),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美国的国际收支账户趋势发生了逆转。1875年之后,美国的商品贸易长期保持顺差状态(参见表20.5)。到了19世纪90年代后期,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总额也出现了盈余。^⑥

表 20.5 1866—1914 年美国平均商品贸易余额和经常账户收支余额

年份	贸易余额	经常账户余额
1866—1870	-34.8	-29.6
1871—1875	-12.8	-11.6
1876—1880	+182.0	+244.4
1881—1885	+114.6	+143.4
1886—1890	+37.8	+27.2
1891—1900	+419.2	+496.8
1901—1905	+505.6	+548.6
1906—1910	+433.0	+516.0
1911—1914	+575.0	+626.0

注:单位是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Ee 1, 2, 364.

19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经常项目上的大额亏空反映出贸易顺差的暂时不足,但它也表明美国外债的重要性。美国人向外国(主要是英国)进行了大量的借贷,而利息与红利的支出——加上外国货运、保险、银行业的支出净额——已经足够形成最后一笔亏空。正如第19章所述,这些支出几乎榨干了美国财政部的黄金。1895年之后,经常项目上的收支账户长期保持在盈余状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将大部分长期外债“遣送回国”(联盟国用股票和债券交换军事物资),在其历史上首次成为长期债权国。^⑦

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凭借其少见的食物与原材料上的自给自足,年复一年地吸收外汇信用与黄金。回想一下第19章中讨论的金融体系的最初后果:通货和银行体系“填满”了黄金,1900年正式采用了金本位。对美国的贸易伙伴来说,美国的经常项目盈余成为长达半个世纪的残酷现实。美国经济的进口倾向如此之小,以至于几乎从未有过要求收支“平衡”(出口减去进口等于零)的运动,让要求通过保护性关税限制进口的政治煽动显得有点无的放矢。

^⑥ See Jeffrey Williamson, *American Growth 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1820—1913* (1964), appendix B, for yearly data.

^⑦ 关于整个19世纪的细节的调查的一项经典工作是 Charles Bullock, John Williams, and Rufus Tucker, “The Balance of Trad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Stat* 1919. 更近的分析,参见 Williamson (1964). 还可参见 Matthew Simon, “The United States Balance of Payments, 1861—1900,” in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vol. 24 (1960).

2. 再次考虑关税问题

回忆一下第 13 章中的 1861 年《莫里尔关税法》。因为南北战争，国会中的南方立法委员暂时缺席，所以反对保护主义煽动的力量减弱了。而且，联邦政府既想减少不必要的进口，又想通过关税获得财政收入，非常不现实。《莫里尔关税法》将关税提高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的水平。在 1860 年，应付关税的进口货物的平均税率为 20%；1830 年，税率为 62%。1861 年的关税法把税率水平提高到了 47%，之后税率一直维持在 40% 以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见图 20.1）。巴克和雷研究了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关税历史，认为这完全是由保护主义引起的：

关税削减与工业快速增长有系统联系的事实……支持我们的观点，即各行业的关税税率及关税随时间的变化被巧妙地组织，符合特殊利益群体的经济保护主义的狭窄需求。^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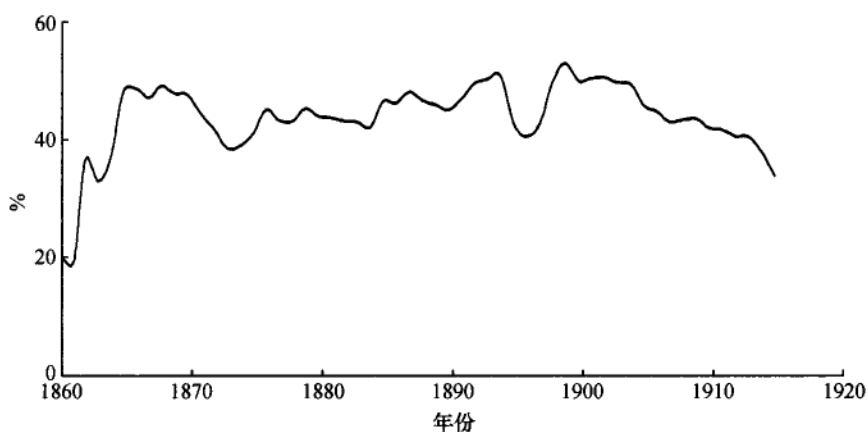


图 20.1 1860—1915 年关税收入与可征税进口商品价值之比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Ee 429.

正如常常发生的那样，一个临时的战争手段变成了永久特性，结果，美国成为世界上贸易限制政策最严格的国家。

2.1 关税收入

关税税率保持在高水平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财政收入，二是为了满足保护主义的情绪。关于第一点，毫无疑问。联邦政府的支出（财政需求）规模在南北战争中急剧扩大。就像所有的战争一样，战后的支出再也不能回到战前的水平。额外的财政需求继续存在。1856—1860 年的五年里，平均支出为 6 900 万美元。战争结束后，军队被解散了。战时支出减少了，但它在下降时却卡在了某个地方。在 1866—1870 年间，年均支出达到

^⑧ Bennett Baack and John Edward Ra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riff Policy: A Cas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EEH*, January 1983, p. 86.

了3.78亿美元;战前的数字再也看不到了。^⑨

1862年出台《宅地法案》之后,出售公共土地的收入只占财政支出的零头(尽管在某些年份该项收入有所提高),而联邦政府的支出已经永久地增加了。内战收入税在1872年降低,直到1913年起草美国宪法第十六修正案时,征收一种新收入税的企图才得以实现。从1872年到1913年,联邦政府几乎完全是依靠物品和服务的消费税支撑起来的。关税是针对外国商品的消费税,是这种递减税中的主要支柱。从1866年到1913年,联邦政府的财政总收入约为210亿美元;其中100亿美元(近一半)来自进口货物的关税。在出台收入税修正案之前,在当时的财政技术下,关税是政府财政所必需的。要么收取关税,要么,只能关闭联邦政府。

2.2 保护主义

高关税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国的保护主义情绪。在欧洲,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影响颇广,而美国在1857年大幅削减了关税法案中的保护主义因素。之后,在1860年,英国和法国签订了《科伯登-谢瓦里埃条约》,承诺在两国及其贸易伙伴之间进行广泛的双边减税谈判。1862年,德国关税同盟与法国签订了一项双边减税协议。美国在1861年陷入了内战,因此未能响应欧洲的贸易自由化运动。战争结束之后,保护主义的压力大大加强了。^⑩ 那些要求贸易更加自由的人通常都不成功。(1870年关税略有下调,但很快被1875年的关税上涨抵消了。)

1882年,切斯特·亚瑟总统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关税事宜——当时的政府预算出现了盈余。尽管委员会建议削减关税,但1890年的麦金利关税却规定了更高的税率。1894年,国会通过了《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案》(Wilson-Gorman Act),将税率降低到了40%左右。为了弥补财政收入减少的损失,该法案要求征收收入税,但此项条款被宣布为违宪。1897年的《丁利关税法案》(Dingley Act)又恢复了高税率(注意图20.1中19世纪90年代的曲线走势)。^⑪ 德国在1879年通过了保护性的关税法案,法国在1881年和1892年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到了1914年,英国和荷兰成了欧洲硕果仅存的自由贸易国家。^⑫ 1913年,威尔逊总统奋力争取推行更加自由的政策,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乱了他的计划。20世纪20年代,税率降低到了20%以下,但是1930年又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这是一个强硬的保护主义举措,将税率提高到了近45%,使其又回到了19世纪末的水平。

保护主义情绪现在仍在国会中发挥作用,它的基础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关税创造了一种租金,为被保护者及其供应商提供了比竞争性市场本应有的更高的利润,为其雇员

^⑨ Jonathan Hughes, *The Governmental Habit Redux*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89.

^⑩ Gary Hawke,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 and Industrial Protec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EHR*, February 1975.

^⑪ Douglas Irwin, "Higher Tariffs, Lower Revenues? Analyzing the Fiscal Aspects of 'The Great Tariff Debate of 1888,'" *JEH*, March 1998, 宣称在1888年,实际的关税水平在最高的收入关税水平之下。因此,任何对关税的缩减将减少海关收入。

^⑫ S. B. Saul, *Studies in British Overseas Trade 1870—1914*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60), chap. 6. For American tariffs, see Frank Taussig, *The Tariff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2).

提供了更高的工资。其他所有消费者都为此付出代价。在遥远的过去,支持关税的论据有幼稚产业(*infant industry*)理论:只有在初期保护幼稚产业免受外国竞争,它们才能成功发展、带动国内经济增长。^⑬这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国初期充满希望的论证相一致。

富兰克·陶西格(Frank Taussig)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表明,除了1842年之前的丝绸和棉纺织业,美国几乎没有哪个行业是由于受到政府的贸易保护才从萌芽期发展到成熟阶段的。^⑭毫无疑问可以这样做。如果香蕉的关税足够高,也许缅因州或明尼苏达州的温室香蕉产业可以成功。但是美国的政治家显然将税率保持在这种水平之下了,因为过高的税率将会完全扼杀贸易,而政府还需要从贸易中获得财政收入。立法委员们并不想没工资可拿。

支持保护主义的主要论据从南北战争时期一直用到现在,那就是“装满午餐桶”:关税创造了拥有美国高工资的工作机会和繁荣经济。既然现在仍然用这种观点来为美国钢铁、化工、纺织、鞋类等辩护,那么它就值得考虑一下。其论证过程是这样的:如果允许廉价外国劳力制造的产品进入美国经济,那么美国的工作机会和繁荣经济就被毁了。为了那些驱使悲惨劳工在血汗工厂里干活的外国老板的利益,美国人牺牲了自己的福利。每进口一辆沃尔沃,就意味着一辆别克汽车未能售出,导致高工资的美国工会成员面临失业的危险。这种论述如果发挥到极致,将完全消灭国际贸易。但是它一直是吸引选票的有利武器。

比较优势无法如此容易地转化为政治。而且,比较优势会随着时间改变。美国钢铁、汽车这样的行业,曾经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是所有外国竞争者的噩梦,但后来没能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变得较没有竞争力了。如果那时它们失败了,人们会失业,工厂会关门,城市会衰落,投资会落空。即使有学者指出,资源用在别处而不是锁在不能按现代标准进行高效生产的工厂里,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但对这些受损的人来说,他们没有得到补偿。按照这种论点,完全保护,完全禁止汽车进口,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保护主义继续存在。它带来的好处很集中,它的代价则被广泛分担。

2.3 再次考虑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意味着你在效率最高的地方使用你的资源。如果不这样使用资源,那么本来可以产生的额外利润就损失了。考虑两种极端情况:

(1) 如果你生产所有产品的效率都是世界上最高的,那么对你来说最有利的仍是将

^⑬ 美国铁产业的世纪转折点的发展深受关税政策变化的影响。Bennett Baack and Edward John Ray, "Tariff Policy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EEH*, Fall 1973. 更近的, Douglas Irwin, "Could the United States Iron Industry Have Survived Free Trade After the Civil War?" *EEH*, July 2000, 宣称如果在1869年完全排除了关税,该工业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将能保留。

^⑭ William Hutchinson, "Import Substitu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Northeast, 1870—1910," *JEH*, June 1985. 他大体上同意塔斯格,尽管哈亲森认为羊毛产业也必须被认为仅仅是关税的产物。

资源用在你自己生产效率最高的产品上,用它与世界各地交换其他所需产品。

(2) 如果你所有生产都很糟糕,那么对你来说最有利的仍是将资源集中在最不糟糕的领域,用它交换其他所需产品。

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弥尔(1806—1873)在1848年用优雅的语言写道:

我们与外国人进行交易时,经常可能以很小的劳动和资本代价获得他们的产品,我们付出的代价比那些外国人自己所花的成本还要低。然而这种交易对那些外国人也是有利的,因为他们交易获得的产品,尽管对我们来说成本很少,对他们来说成本却高得多。^⑤

考虑美国的关税问题时,我们应该仔细思索弥尔的话。关税使那些受保护者收入提高,同时使人们的总收入降低了,除非关税能使生产突然出现一种比其他任何情况下都更有效率的形式。

今天,所有的国家都有关税,它们就此互相讨价还价,这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每个国家都有出口。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向美国的出口被美国的关税限制,作为回应,它也对美国的出口征收限制性关税,那么,两国政府必须进行商谈以减少对双方的损害。^⑥ 如果它们不商谈,对两国经济的损害就最大化了,尽管每国的被保护者相对于该国的其他人仍然收益更多。因为美国1866年之后是作为世界两大贸易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沙皇俄国)进行工业化的,我们可能会感到吃惊:如果没有关税限制,美国会发展得更好。

2.4 关税的影响范围

实际上,那些以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被保护者不会做得像他们那样好。尽管在1866—1914年间很难找到任何依靠保护才能生存的美国产业,然而很明显,关税创造的租金将本来会在别处创造利润的资源吸引到了被保护的行业中。

兰斯·戴维斯(Lance Davis)所作的计算粗略衡量了这种长期收入转移的程度(参见表20.6)。农业几乎未从关税保护中受益;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受益最多。例如,1890年,制成品占总进口量的29.2%,而制成品的税收则占总进口税的41.8%。半制成品占总进口量的14.8%,其税收则占总量的18.6%。农业进口量占总量的16.3%,其税收却仅占4.2%。戴维斯总结道:“因此,尽管所有的行业似乎都受到了某种补助(由消费者买单),制造业却得到了远超出其应有份额的收益。”^⑦

^⑤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sixth edition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11), p. 348.

^⑥ Gottfried von Haberler,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Its Applications to Commercial Policy* (1959), pp. 374—390.

^⑦ Lance Davis, Jonathan Hughes, and Duncan McDougall,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Economy*, third edition (Homewood, IL: Irwin, 1969), p. 304.

表 20.6 1860—1920 年关税保护的相对效应

年份	(1) 制成品 进口占 总进口的 百分比	(2) 制成品 关税占 总进口 关税的 百分比	(3) 半成品 进口占 进口的 百分比	(4) 半成品 关税占 总进口 关税的 百分比	(5) 总计 第 1 栏 + 第 3 栏	(6) 总计 第 2 栏 + 第 4 栏	(7) 农产品 进口占 总进口 的百分比	(8) 农产品 关税占 总进口 关税的 百分比
1860	48.7	60.3	9.9	10.2	58.6	70.5	12.9	1.3
1870	39.8	40.8	12.8	12.8	52.6	53.6	12.4	13.0
1880	29.4	40.5	16.6	20.8	46.0	61.3	15.0	3.2
1890	29.2	41.8	14.8	18.6	44.0	60.4	16.3	4.2
1900	23.9	38.6	15.8	18.4	39.7	57.0	11.5	6.1
1910	23.6	37.8	18.3	20.2	41.9	58.0	9.3	3.9
1920	16.6	23.0	15.2	11.8	31.8	34.8	10.9	3.0

资料来源: Lance 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Economy* (Homewood, IL: Irwin, 1969), table 16—22.

也就是说,消费者以关税的形式为补助买单,其中制造业得到的好处远远超过农业。农场主意识到了这种歧视,要求政府提供其他形式的补助以弥补这种不平衡。然而在 1914 年之前,他们大部分要求没有得到实现。鉴于全国制造业联合会具有保护主义的传统,这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3. 1900 年的金本位

这里我们可以将之前关于货币变革的讨论和国际收支账户联系起来。任何简化都对国际贸易有益。我们已经注意到,用商业票据进行支付能促进商品交易,因为它使种植者、货运者和制造者更容易获得信用。这些票据到期时,要么用货币兑现,要么用其他形式的汇票支付。例如,一个持有可在英国兑现的成熟美国票据的利物浦商人可能会发现,接受可在美国兑现的票据并把货物发到美国,比接受现金支付要更加有利可图。因此,国际银行业就这样随着贸易的扩张而发展。

最终,这种信用体系必须依赖于对一种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的预期支付,在 1914 年之后,正币扮演了这个角色。一个国家的基本货币单位是用一种(单本位制)或两种(复本位制)正币的重量来定义的。就此而论,几乎整个商业世界都是依照固定汇率(fixed exchange rate)进行支付。19 世纪 70 年代之后白银市场价值的下跌(参见第 19 章)使得黄金成为更受欢迎的金属。尽管美国事实上是金本位的国家,在 1879 年财政部恢复黄金偿付之后,白银仍然扮演了捣乱的角色,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了。在 19 世纪,大部分欧洲国家抛弃了白银和复本位制,采用了纯粹的金本位(俄罗斯迟至 1893 年才采用)。^⑩

^⑩ Michael Bordo and Hugh Rockoff, "The Gold Standard as a 'Good Housekeeping Seal of Approval,'" *JEH*, June 1996, 讨论了不太好地遵循“游戏规则”的周边国家如何在核心国家的资本市场支付额外费用。

美国把白银这一选项至少保留到了1900年,之后终于采用了纯粹的金本位。任何人可以自由地在商业世界里的任何地方购买任何形式或数量的黄金,并可以在任何时候将其运到任何地方,最终使得黄金点数保持在一个狭窄的范围之内,确保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和一致。^①按照19世纪的标准,这是金融界的最高成就,它几乎消除了国际交易中单纯货币的不确定性。你会知道你能以固定的汇率换到钱。金本位凭借广泛储备的金币和金条进行运作。^②位于核心的英格兰银行保证黄金的支付,在这一金融系统边缘有坚船利炮从第三世界国家征集关税以确保它们符合主要发达国家的意愿。

金本位具有许多优点,也有一些重大缺陷。优点主要集中在汇率固定、可以约束所有国家的银行系统、让他们控制其钞票以维持黄金的可兑换性。例如,政府不能(像现在这样)随意印刷钞票,利用通货膨胀恣意掠夺世界经济的实际资源。为了偿还债务,政府有两个选择,要么以市场价格向公众借贷(为了偿还普法战争的赔款,法国在1871—1873年间就是这么做的),要么向自己的人民征税。^③

金本位的缺陷是,在国际收支中失去黄金的国家会鼓励通货紧缩,一般是通过减少信用、提高央行的贴现率、增加失业率和经济的整体萧条。这是金本位给那些经济扩张得相对过于迅速的国家开出的无情“处方”。基于无限预算赤字的现代金融技术在这种体系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政府必须保持“诚实”。

围绕这一体系的“游戏规则”发展出了一种强大的神秘技术,央行利用其来加强国际贸易与支付的同情运动。为了让金本位运作,央行应该通过其自身的贷款政策,将黄金的进出流动放大。^④如果黄金储备增加,那么按照“游戏规则”,央行应该降低贴现率、增加贷款与投资。如果黄金储备减少,那么央行应该减少贷款、出售债券、提高贴现率。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金融正统论者狂热地坚信,金本位及与之相随的负责政策(包括自由贸易)将创造这样一种情况,即国际收支会自然地趋向平衡,真正的金属币无须在各个国家之间大规模流动。美国贸易和支付的不平衡状态本不应该出现。这一体系还会带来竞争性的国内市场和国际自由贸易。商品交易本身就会使商品交易中获得的生产要素收入倾向于变得同样国际化,而无须对生产要素本身,即劳动和资本,进行交易。理论上,这就是乌托邦。

当然,乌托邦并不存在。这个乌托邦不存在的原因有许多。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进行国际迁移,大量的资本四处流动。而这些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恰恰是因为国际收支并不自然地趋向平衡,要素价格并不相等,哪怕拥有世上最自由的国际贸易体系。而且,金本位的货币调整机制远不是理论中那种润滑良好的机器,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金融危机中经常磕磕碰碰、抛锚断链。最后,事实表明,中央银行只在金融秩序对自己有利时才遵守“游戏规则”。它们不愿意为了某种理论上的国际调整而扰乱国内的金融。

这里我们又遇到了搭便车的问题。为什么某个中央银行应该为了贸易伙伴的利益

^① Oskar Morgenster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nsactions and Business Cycles* (1959), chap. 5.

^② Arthur Bloomfield, *Short-Term Capital Movements Under the Pre-1914 Gold Standard* (1963), pp. 14—19.

^③ Haberler (1959), pp. 92—96.

^④ Ragnar Nurks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Experience: Lessons of the Interwar Period* (1944), chap. 4.

打乱自身的经济运行呢？它不会这么做的。亚瑟·布鲁姆菲尔德 (Arthur Bloomfield) 指出了 19 世纪晚期的这一点，拉格纳·纳克斯 (Ragnar Nurkse)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重建的黄金交换标准中也发现了这一点。^{②③} 在相关案例中，约有 2/3 的中央银行在应对国际收支变动时对储备采取的行动违背了游戏规则。1914 年之前美国没有中央银行，但自从 1895 年之后，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每年都处于盈余状态，美国在稳定地积累储备。

问题并不是金本位机制不能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按照理论描述良好运行：

通常来说，信用政策只需进行微小的调整，黄金所有权只需进行少量的转移，就足以补偿国际收支账户的临时变动，维持国际汇率和价格水平，使其保持紧密一致。^{②④}

问题在于，它事实上没有。在 19 世纪的真实生活条件下，交易各国的经济以不同的速度增长，为了让经济继续发展，人口和资本必须在国家间大规模流动。随着经济繁荣、危机、萧条、失业这些旧式金融系统特征的循环，经济确实存在净增长。^{②⑤} 最终，这个循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撕得粉碎。

英格兰银行在 1914 年最后一次“搁置”了 1844 年法案（银行对付金本位崩溃的方式），从此，纯粹金本位随风而逝。^{②⑥} 自从 1918 年起就有人试图恢复旧体系的一些特征，因为它会让政府保持一种财政整体性，会带来永久通货膨胀之外的东西。但是，正如现在，所有此类尝试都失败了。中央银行继续对国内经济（和政治）压力，而不是国际的稳定，作出更多的回应。同样，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在 19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金融灾难之后，美国以完全金本位国家的身份参与到了旧体系之中，但是 1903 年和 1907 年的危机打断了这一经历。尽管有了新的中央银行，但是 1921 年和 1929 年还是发生了更大的灾难，美国最终于 1933 年永远放弃了金本位的游戏。部分黄金储备制度一直维持到了 1968 年，但是当其面临变得具有切实操作性的危险时，它马上被放弃了。^{②⑦}

金本位的神话威力强大。现实就是 19 世纪的经济史：随着经济发展，贸易会扩张，通货有可能是纯纸币、纯金、纯银或金银混合。美国经济是带着金银复本位制来到这个世界的，它慢慢地抛弃了白银，在 1861—1879 年间使用了不可兑换的货币，然后在 1900 年采用了直接金本位制度，但仍然将白银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 1914 年，因为国际收支，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美国一直在积累黄金。^{②⑧}

②③ Bloomfield (1963), p. 19; and Nurkse (1944), pp. 68—88.

②④ William Ashwort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50—1950* (1952), p. 168.

②⑤ Morgenstern (1959), chap. 2.

②⑥ Victor Morgan, *Studies in British Financial Policy, 1914—1925* (London: Macmillan, 1952), chap. 1.

②⑦ 即，在 1968 年，法定的“黄金准备”，美联储平衡表上的黄金证券与活期负债（联储纸币和活期存款）之比是 25%。由于联邦储备委员会购买了政府证券来帮助财政部资助越南战争，货币供应增加了。由于黄金账户只有在货币“贬值”（黄金价格上升）的情况下才可能增加，黄金准备被放弃了。

②⑧ R. G. Hawtrey, *The Gold Standard in Theory and Practice* (1939), chap. 3.

4. 国际资本流动

1895年之后的经常项目盈余意味着美国在国际交易中应该是净贷方。净借贷就像是国民核算(national account)等式中正的净投资。例如:

$$\text{GNP} = C_p + I_p + G + (X - Z)$$

国民生产总值等于私人消费支出(C_p)加上私人投资(I_p)加上政府支出(G)加上出口减去进口之差($X - Z$)的总和。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进口越多,无论是商品、服务还是资本,最终GNP——美国利用总支出做出的总产值——就会越少。当出口超过进口时,GNP大于国内消费,为了吸收这个额外的部分,该国将信用延伸到外国消费者身上。因此,在19世纪90年代,净出口——出口减去进口之差——变成了正数,并且一直保持如此。

所有进行贸易的国家都付出并接受信用。当美国处于经常项目赤字阶段时,它所使用的商品和服务比它生产的多。当其经常项目出现盈余时,它使用的比它生产的少,多余的产品被出口了。那么,为了让信用达到长期的平衡,要么将净正币运往该国——这在1895年之后经常发生——要么利用各种长期债务工具以及普通股票来处理这些借贷。^⑨因此,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过去的外债一起被清偿,经常项目的盈余逐渐改变了美国传统的国际债务国地位。由于长期国际收支账户的变化,美国变成了债权国。1895年之前,通过美国的金融赤字,外国的储蓄协助了美国经济增长。^⑩之后,美国的净储蓄开始协助外国经济增长。

为了解释经常项目上国际收支与预期相反的净资本流动数据,我们必须考虑一个限制性条款。我们讨论资本流动时仿佛把它当做完全被动的平衡项目。然而,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不是这样。在美国的外国投资者对投资项目感兴趣,他们不会考虑美国当前的国际收支账户情况。因此,当美国的经常项目出现盈余,也就是在向外贷款时,美国也接受了来自外国的借贷和投资。杰弗里·威廉姆森研究了19世纪可用的数据,他的发现反映出这些问题。他提出的估计值在某些情况下与表20.7中所用的数据类似(某些情况下则不类似);他对19世纪晚期的分析和这里提出的类似。^⑪

^⑨ Jeffrey Williamson, "Real Growth, Monetary Disturbances, and the Transfer Process, 1879—1914," *SEJ*, January 1963, pp. 256—257, 显示了在1889年至1896年间持续地净出口之后,在1897年、1898年、1899年、1901年、1902年、1903年、1904年、1905年、1906年以及1907年的净硬币的进口量。

^⑩ Williamson (1963), pp. 256—257; 在1850年至1895年的45年间,只有1857年、1859年、1861年、1877年至1879年、1881年及1893年这八年有净资产外流。

^⑪ Williamson (1963), chap. 4, pp. 124—188, 以及附录B。威廉姆森宣称(pp. 175—183)美国的黄金流动并不决定国内货币存量的长期变动,严格与支付平衡的变化一致。对威廉姆森和其他学者的争论的分析见 Bijan Aghevli,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the Money Supply Under the Gold Standard Regime: U. S. 1879—1914,"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5, no. 1, March 1975。

表 20.7 每十年间美国资本流动情况

年代	净流出	净流入
1820—1830	14	
1831—1840		186
1841—1850	20	
1851—1860		160
1861—1870		875
1871—1880		332
1881—1890		1 310
1891—1900	393	
1901—1914	41	

注:单位是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Ee 17.

这些无形的东西很难衡量。即使在今天,拥有计算机和大量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在联邦储备体系、财政部和商业部这样的地方工作,衡量这种资本交易的价值仍然基本只能依靠猜测。由于制定了详细的规则,商品贸易与许多资本、金融交易现在是可计量的,但是个体的交易数以亿计,不可能把每件事都记录下来。1914 年之前,正式的计量程序非常少,试图重建与收支平衡相关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可信统计是对学者的挑战。^②

表 20.7 列出的是广为人知的估计值,这是由贸易数据、关于投资的片断性估计等数据估算出的美国资本交易情况,以十年为单位累加起来。没人保证这些数字的准确性。^③但它们能体现出一些关键之处。注意,19 世纪 90 年代之前,以十年为单位计算,美国消费少于生产的时期只有坎坷的 19 世纪 20 年代和(主要)处于萧条期的 19 世纪 40 年代。19 世纪 90 年代之前,在 19 世纪的其他所有年代里,美国经济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都超过了它生产的,因此,出现了资本净流入。然后,从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资本输出国。

4.1 外资流动

表 20.7 中的数据是对信用流动净值的估计。任何时刻的外资存量是流动值、未付债务和还款的总和。兰斯·戴维斯和罗伯特·卡尔(Robert Cull)估计,在 1790—1914 年间,约有 31 亿美元的外资进入美国。他们指出:

显然,按总数来说,外资并未扮演最主要的角色;事实上,金融资本的流动几乎肯定不如跨大西洋人力资本的流动重要。……总体来说,在 1790—1900 年间,外资占国民资本形成的比例约为 5%,而本世纪过去的 30 年里的数字约为该数值的 4/5。

尽管其占总量的比例相对较小……但在某些时间、某些地点,这些资本转移非常重要。^④

② 早期的估计见 Williamson (1963), appendix B.

③ 其他估计见 Williamson (1963), appendix B; 以及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Ee 7—21。

④ Lance Davis and Robert Cull,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820—1914* (1994), p. 111.

他们强调了三个时间和地点。第一,在1816—1840年间,外资占新资本的22%,主要集中在交通部门——收费公路、运河、铁路。他们估计,在1838年,外商长期投资中约有40%,即约4500万美元,是投资于交通部门。第二,在19世纪60年代,外资占总资本的比例仅略低于16%;这些资金用在了南北战争的债务、重建及首条横跨大陆的铁路路上。第三,在19世纪80年代,当美国西部逐渐融合进联邦之中时,外资占了近9%。大部分外资继续流入铁路部门,但土地及与土地相关的行业(尤其在西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投资。在1914年,外资中有60%在交通部门,但土地相关活动也吸引了超过14%的外资。

英国是大部分外资的来源,法国和荷兰则因为美国独立战争、路易斯安那购买计划和1812年战争持有大量的债权。1818年被海外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中,有48%由英国投资者持有,43%由荷兰人持有。十年后,比例分别变成了74%和11%。尽管来自欧洲大陆的资金数量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有所增加,但英国的份额继续增长,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据估计,英国占对美外商投资的份额在1861年达到了90%;1900年时这一数值仍然高达74.5%。^⑤

许多美国发行的债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主要是因为20世纪之前纽约证券交易所专营铁路股票。1880年,在纽约交易的美国股票有103支,其中有73支是铁路股票。十年后,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增加了15支,但铁路股票的数量增加了17支。同年,伦敦证券交易所允许交易的美国股票有47支,其中有19支是铁路股票。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美国股票的数量增加了61支,而铁路股票的数量只增加了18支。^⑥ 外资保持高水平的原因之一是,在19世纪末,尽管美国的储蓄水平异常之高,但其机构没有资本需求增长得那么快。

戴维斯和达尔也讨论了19世纪末美国对外的投资情况。^⑦ 从1790年到1896年,美国在国际上是净债务国。从1897年到1914年是他们研究领域的最后18年,这段时期里美国变成了资本净输出国,国际上的主要债权国。在这些年里,美国的对外投资达到了原来的五倍多,直接投资是原来的四倍,证券组合投资是原来的17倍。这种巨大增长背后的地理模式基本保持稳定。对外长期投资中约有75%是针对美洲国家,其中近80%投资到了加拿大和墨西哥。对墨西哥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铁路和矿业;对加拿大的投资则种类丰富得多。对欧洲的小额投资主要是出于美国企业对产品的特殊需求。

美国对外资最常见的反应是要求外国投资者被平等对待,但这种反应并不是普遍一致的。平民主义者、西部农场主、工人,尤其在农业萧条时期(1885—1895年),表露出其仇外情绪。“面对他们不能种植的土地、他们不能偿付的抵押,农业群体忽视了造成他们困境的地理和气候原因,把矛头指向了……外国投资者。”^⑧ 两大政党都将限制外国人持有土地纳入竞选纲领之中,45个州之中有30个通过了此类限制法律,无视西部极度缺乏投资这一事实。

^⑤ *Ibid.*, p. 17.

^⑥ 在双方的交易中只有一支共同的股票,即纽约中心铁路股票。

^⑦ Davis and Cull (1994), chap. 5.

^⑧ Davis and Cull (1994), p. 51.

4.2 趋同化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长期以来如此依赖于外国借贷的美国经济,至少从资本流动的角度看,经历了一场从资本缺乏国到资本富裕国的转变。这种资本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杰弗里·威廉姆森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这种全球化导致了生活水准的趋同化,富国和穷国的差距缩小了。^③ 威廉姆森研究的国家是19世纪末对劳力和资本流动贡献很大的西方工业化国家。趋同化的道路既不顺利也不连续。它在1870—1890年间达到了顶峰,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其趋向又逐渐分道扬镳。

北美,即美国和加拿大的经历,有点与众不同。我们知道,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的萧条年份之后,美国成为一个资本富裕的工业产品净出口国。^④ 威廉姆森指出,1870年,美国的真实工资比英国高72%,1890年降到了63%,1913年又回到了72%。

趋同化是赫克歇尔-俄林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的预期结果。各个国家会出口集中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使用其缺乏要素的产品。随着交通成本的降低,商品价格渐趋相同,贸易增多。对丰富要素的需求增多(向右转变),对较缺乏要素的需求减少。因此,随着商品价格的趋同,要素价格也逐渐趋同。

威廉姆森和加文·奥罗克(Kevin O'Rourke)指出,1870—1895年间英美两国真实工资差距缩小的原因约有30%可以用商品价格的趋同来解释。^⑤ 威廉姆森、奥罗克和蒂莫西·哈顿(Timothy Hatton)的计算表明,如果没有1870年之后的净移民,1890年的美国劳动力队伍将会缩小13%(到1910年则会缩小27%)。^⑥ 作为回报,1890年的真实工资将高出4%(在1910年将高9%以上)。总之,移民也会导致趋同,但程度如何呢?威廉姆森和阿伦·泰勒(Alan Taylor)通过提出另一个虚拟的问题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移民,趋同程度会如何?假定全球资本市场会对此作出回应,他们估计,移民能够解释真实工资差距缩小原因的40%。剩下部分则由“残余”力量解释,如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总要素生产率。^⑦

4.3 寂寞高手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经济的灾难性影响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1914

^③ 威廉姆森测量出实际工资的比例差别的缩小。参见他对经济史联合会的成员的会议陈词:Jeffrey Williamson, "Globalization, Convergence, and History," *JEH*, June 1996. 他的实际工资列数可以参见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Labor Markets Since 1830: Background Evidence and Hypotheses," *EEH*, April 1995.

^④ 参见 Moses Abramovitz and Paul David, "Convergence and Deferred Catch-Up: Productivity Leadership and the Waning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R. Landau, T. Taylor, and G. Wrigh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s of the 21st Century* (1995).

^⑤ Kevin O'Rourke and Jeffrey Williamso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nglo-American Factor Price Convergence: Were Heckscher and Ohlin Right?" *JEH*, December 1994. 加文·奥罗克、杰弗里·威廉姆森以及阿伦·泰勒发现商品价格的趋同可以在四分之一程度上解释新旧世界之间的工资-租金率趋同。"Factor Price Convergenc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August 1996.

^⑥ Kevin O'Rourke, Jeffrey Williamson, and Timothy Hatton, "Mass Migration, Commodity Market Integration and Real Wage Convergence," in Timothy Hatton and Jeffrey Williamson, eds., *Mig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Market, 1850—1939* (1994).

^⑦ Alan M. Taylor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Convergence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April 1997.

年之前,美国在对外投资上的花费尚未达到美国经济的潜力。1913年美国的对外投资量占其总财富量的约2%。英国的这一数值则是其国民总财富的1/4,德国约为7%,法国约为17%。^④美国人在国内已经有足够的投资机会了。他们做国际主要资本提供者的日子在未来。

推荐阅读

文章

Abramovitz, Moses, and Paul David. "Convergence and Deferred Catch-Up; Productivity Leadership and the Waning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R. Landau, T. Taylor, and G. Wrigh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s of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Baack, Bennett D., and Edward John Ray. "Tariff Policy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1870—1929."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no. 1, Fall 1973.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riff Policy: A Cas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0, no. 1, January 1983.

Bordo, Michael D., and Hugh Rockoff. "The Gold Standard as a 'Good Housekeeping Seal of Approval.'"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6, no. 2, June 1996.

Bullock, Charles J., John H. Williams, and Rufus S. Tucker. "The Balance of Trad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 vol. 1, 1919.

Hawke, Gary R.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 and Industrial Protec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28, no. 1, February 1975.

Hutchinson, William K. "Import Substitu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Northeast, 1870—191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5, no. 2, June 1985.

Irwin, Douglas A. "Higher Tariffs, Lower Revenues? Analyzing the Fiscal Aspects of 'The Great Tariff Debate of 1888.'"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8, no. 1, March 1998.

———. "Could the United States Iron Industry Have Survived Free Trade After the Civil War?"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7, no. 3, July 2000.

———. "Explaining America's Surge in Manufactured Exports, 1880—1913."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5, no. 2, May 2003.

Lebergott, Stanley. "The Returns to U. S. Imperialism, 1890—1929."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0, no. 2, June 1980.

^④ 数据根据1914年前的汇率转换,见Herbert Feis, *Europe, the World's Banker 1870—1914* (1965). 总结性的讨论,见Jonathan Hughes,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70), pp. 150—152.

Lipsey, Robert. "Foreign Trade." In Lance 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O'Rourke, Kevin,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nglo-American Factor Price Convergence: Were Heckscher and Ohlin Righ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4, no. 4, December 1994.

O'Rourke, Kevin, Jeffrey G. Williamson, and Timothy J. Hatton. "Mass Migration, Commodity Market Integration and Real Wage Convergence." In Timothy Hatton and Jeffrey Williamson, eds., *Mig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Market, 1850—1939*. London: Routledge, 1994.

O'Rourke, Kevin, Jeffrey G. Williamson, and Alan Taylor. "Factor Price Convergenc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 37, no. 3, August 1996.

Simon, Matthew. "The United States Balance of Payments, 1861—1900." In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vol. 2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Tanner, J. E., and V. Bonomo. "Gold, Capital Flows, and Long Swings in American Business Activ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6, no. 1, January/February 1968.

Taylor, Alan M.,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Convergence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1, part 1, April 1997.

Williamson, Jeffrey G. "Real Growth, Monetary Disturbances, and the Transfer Process, 1879—1914."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29, no. 3, January 1963.

———.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Labor Markets Since 1830: Background Evidence and Hypothes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2, no. 2, April 1995.

———. "Globalization, Convergence, and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6, no. 2, June 1996.

Wright, Gavin.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uccess, 1879—194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0, no. 4, September 1990.

书籍

Ashworth, William. *A Short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50—1950*.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52.

Bloomfield, Arthur I. *Short-Term Capital Movements Under the Pre-1914 Gold Standard*. Princeton: 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3.

Davis, Lance E., and Robert J. Cull.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820—191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Feis, Herbert. *Europe, the World's Banker 1870—1914*. New York: W. W. Norton, 1965.

Haberler, Gottfried v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Its Applications to Commercial Policy*. London: William Hodge, 1959.

Hawtrey, R. G. *The Gold Standard i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39.

Hilgerdt, Folke. *The Network of World Trade*. 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1942.

———. *Industrialization and Foreign Trade*. 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1945.

Morgenstern, Oska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nsactions and Business Cycl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Nurkse, Ragnar. *International Currency Experience: Lessons of the Interwar Period*. 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1944.

Taussig, Frank W. *The Tariff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32.

Williamson, Jeffrey G. *American Growth 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4.

第 21 章

劳动者与法律

美国每年都在全国性节日劳动节纪念其劳动人民。自从 1894 年以来,劳动节就是美国的全国性节日。自从 1913 年以来,劳动部长就作为内阁官员而存在。

表 21.1 中列出的基本事实已经十分明显了。非机构人口的总数量在 1870—1920 年间增长到了近 3 倍,总劳动力队伍扩大到了原来的 3.2 倍。农业劳动力数量也增多了,但只有原来的 1.6 倍。在同一时期里,非农业劳动力队伍扩大到了原来的 5.0 倍。因此,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从 50% 降到了略高于 25% 的水平。我们在第 16 章中已经讨论过移民在提供劳动力方面的作用。^①

表 21.1 1870—1920 年的劳动力特征

年份	总的 非机构人口	总劳动 人口	农业 劳动力	在总劳动力 中的百分比	非农业 劳动力	在总劳动力 中的百分比
1870	28 228	12 930	6 790	52.5	6 140	47.5
1880	36 761	17 390	8 920	51.3	8 470	48.7
1890	47 413	23 320	9 960	42.7	13 360	57.3
1900	57 949	29 070	11 680	40.2	17 390	59.8
1910	71 580	37 480	11 770	31.4	25 710	68.6
1920	82 739	41 610	10 790	25.9	30 820	74.1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a 185—187, Ba 814, 817.

存在一些形成一个整合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趋势,但各地区之间的年均收入差别仍然很大,所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们仍然不能说美国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乔舒亚·卢森布鲁姆 (Joshua Rosenbloom) 比较了《制造业普查》中的平均收入数据,他认为,在 19 世纪末,美国存在两个整合的大型劳动力市场。第一个市场包括东北部和中北地区,早在 1870 年就出现了。第二个市场包括南太平洋地区和中南地区。在另一个独立研究中,卢森布鲁姆和威廉·森德斯特龙 (William Sundstrom) 认为西部存在第三个地区性市场。^②

^① 这一时期的失业率的估计反映了宏观经济学的波动。见 Stanley Lebergott, *Manpower in Economic Growth: The American Record since 1800* (1954); 也参见 J. R. Vernon, "Unemployment Rates in Postbellum America: 1869—1899,"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col. 16, no. 4, Fall 1994. Christopher Hanes, "The Development of Nominal Wage Rigidit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3, no. 4, September 1993, 宣称在 19 世纪 80 年代经历了一系列罢工运动的工业公司更不可能在 1893 年的价格下降中减少工资。

^② Joshua Rosenbloom, "Was There a National Labor Market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Evidence on Earnings in Manufacturing," *JEH*, September 1996; 以及 William Sundstrom, "Occup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Dispersion of Wages and Working Hours: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0—1903," *EEH*, October 1993. 罗森布鲁姆的《寻找工作,搜寻工人》(2002)阐明了工人的迁移(以及移民)的作用。

1. 劳动者的社会地位

考虑一下劳动人民的历史,他们中的大部分在1790年是个体经营的农业劳动者、契约劳役者、动产奴隶或上述人群的后代,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工作,就其本身而言,受到美国人的高度尊崇。这是个人的成就。“他辛勤工作”或“她辛勤工作”在美国是表示尊敬的词汇。美国从未——尚未——拥有一个真正的有闲阶级,也没有世袭贵族。正如瑟斯塔恩·韦伯伦(Thorstein Veblen)所强调的那样,美国只是喜欢假装拥有这样的阶级。^③

19世纪最富有的家族财富是由白手起家的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赚钱并积攒起来的。即使是臭名昭著的恶棍,如果他们的钱是靠自己的努力赚来的,他们也会受到尊敬。从小木屋到白宫,人们相信这是19世纪每个充满活力的美国男孩的梦想。美国人从不赞成懒惰,即使是对那些不用靠工作赚钱谋生的人来说也是这样。直到今天,即使某人独立且富有,但不从事任何生产性职业的话仍然被认为是丢脸的。^④

1.1 工会和劳工运动

考虑到其先锋和边疆的传统,很容易理解美国人的这种羡慕勤劳致富者、厌恶懒惰富人的态度。同样地,企业对劳工组织广泛存在的敌意也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工会意味着对企业财产权的威胁,而这也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当工会谋求“公共利益”,如改变工作条件,增加安全性和健康性,总是有雇主反对。他们反对是因为这些将减少他们的利润,除非能将其转嫁给消费者承担。因此,劳动既受到尊敬,又受到畏惧。这两种态度看上去互相矛盾,然而又互相联系。尽管现代的工会领导比其前辈保守得多,他们仍然逃脱不了激进的名声:他们的观点试图颠覆头脑正常的美国主义。现代的美国工会过于官僚主义,头重脚轻,它们很少通过选举更换领导人,人们广泛认为它们毫不顾及普通成员的感受。^⑤ 工会必须努力奋斗以获取社会的尊敬,而其成员的职业则不存在这种不利情况。尽管水管工是一个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他/她所在的工会却受到深深地怀疑。这些态度可能看上去很混乱,但只要考虑一下工会和劳工运动的历史,它们就很容易理解了。

劳工组织和劳动者权利的现状都是政治变动的结果。自从1935年以来,工会受到联邦法律的保护,即《国家劳动关系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NLRA),其中有条款规定,由工人选举决定代表他们进行劳资谈判的代理人。为了工会代表和劳资谈判,这些代理人必须在州际商务中受到雇主的承认。此外,NLRA还包括仲裁的条款和机制。1938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进一步规定了劳工的工资和工作条件。1936年的

^③ 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49), chap. 3, “Conspicuous Leisure.”

^④ 因此我们的洛克菲勒家族、肯尼迪家族以及哈里曼家族在家族财富的创立者之后的时代中因为公共服务而需要注意。

^⑤ Seymour Lipset, “Trade Unionism and the American Social Order,” in David Brody, e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1971).

《社会安全法案》、1964年的《公民权利法案》、1967年的《年龄歧视法案》、1970年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中包含了更多的工作条件保护条款。事实上,雇员现在是被一个名副其实的“保护茧”所包围,由政府保护其健康、收入与工作条件。(第25章将详细讨论这方面的法律发展。)

这种对劳动者的关心代表了美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利益逆转。一个世纪之前,很难说美国社会对劳动人民或他们组织工会进行谈判的尝试,表现出了任何特殊的关心。事实上,在立法机关和法庭上可以看出,可以认为社会实质上对这种行为怀有敌意。一般来说,对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的态度转变和工会成功代表工人进行谈判有关。争取工会立法的斗争史被称为劳工运动。(这一段历史既包括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广泛斗争,也包括狭义上工会组织的发展。)

1.2 政治维度

为了理解劳工运动,我们必须记住这主要是一个政治现象。现在,总统候选人及其他想获得公职的人为得到工会的支持而互相竞争。一个世纪以前,这种支持几乎必然会导致政治失败,至少是在全国层面上。1880年,劳动力总数约为1740万人,其中只有不到1%的人从属于工会。1880年,独立企业家甚至比工业工人还多。制造业中的雇员有330万人。总人口中有整整72%的人还在从事农业。在5030万总人口中,有近300万个独立农场,75万家小型企业。

在1880年的总统大选中,共有920万张有效选票。因此,其中可能有40%来自独立企业家,他们肯定达到了投票年龄。来自劳工的投票较少——那时妇女和21岁以下的人不能投票,因此票数就更少了——而劳工组织的政治力量仍然微不足道。如果企业家和农场主认为他们的利益和劳工组织相冲突,政客们显然会远离劳工。

到了2003年,美国基本上是一个充满雇员的国家。大部分企业仍然较小(85.7%的企业雇员少于20名),但它们的雇员仅占国家雇员总数的24.1%。单单制造业的雇员数量已经超过了1450万,而人口普查称为“管理和专业特长”的就业人员几乎达到了4500万。在约1.47亿人的总劳动力队伍中,10.77%是工会成员。^⑥ 聪明的政客修改自己的主张以迎合雇员的需求。因此,对雇员权利的尊重包括立法、承诺和支持这些权利的政客就不足为奇了。在民主政治中,少数派也可能被保护,如果组织得当,他们可能会成功地进行国会游说,但他们不能选举。独立企业家现在是非常小的少数派,作为一个群体,如果他们的目标和劳工冲突,他们不太可能会受到照顾。

史称“劳工运动”的现象和狭义的工会组织是否是一回事,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工会的目标是垄断工作,如果工会要通过强迫达成目的,这是必需的第一步。^⑦ 广义劳工运动的历史目标是非正统的,包括增加工作机会、减少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各种着重点不一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等。这些目标造就了奇怪的联盟。在美国由个体经营为主向雇佣劳动为主转变的历史大背景下,尽管这种政治联盟并不协调,事实却证明它非常有效。

⑥ 数据来自《美国的统计学摘要,2004—2005》,表格569、600、611、638和730。

⑦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1971), pp. 36—43.

1.3 工人的平等权利

美国社会的劳动状况改善是一系列复杂的法律演化的结果。其主要基准点有：

- (1) 稳定而可发展的政治存在
- (2) 经济生活中的独立认同
- (3) 承认工作组织中存在一种宝贵的财产权利
- (4) 消除古老法律的障碍

让我们简要讨论这些问题。

1.3.1 政治存在

在盎格鲁美国传统中,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是并行的。在17世纪的英国,只有财产达到一定资格的人才拥有投票权。在美国,对自由成年白人男性的财产资格要求直到1860年才完全取消。之后又过了60年,在1920年的第十九修正案中,成年女性才拥有了投票权。成人的古老定义是21岁以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降低到了18岁。克劳迪娅·戈登在其重要著作《理解性别鸿沟》中指出,与女性政治权利滞后并行的是工作女性的工资与技能获取的滞后,白人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劳动力队伍中来。将政治权利与财产权利联系起来的过程与女性可出售的财产权利和投票权的取得平行发展。^⑧

因为那些不符合财产资格的人很可能是劳工,他们缺乏选举权的事实阻碍了他们完整地参与美国生活。这一状况改善的进程很缓慢,一个州一个州地,从19世纪20年代的马萨诸塞和纽约州开始。有些州要求纳税,有些州允许不拥有财产但支付超过一定数额租金的人投票,有些州要求参加民兵组织或者缴纳罚金。所有这些要求的目的都是将投票权限制在那些在本地有永久利益的人之中,排除劳工。西部较新的各州比东部较老的各州更倾向于自由地赋予投票权。

最初,只有不动产才能作数。因为劳工的宝贵财产是技能和努力,必须要让“公共哲学”极大地自由化,才能让人们认为劳工和拥有不动产的人是平等的。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把劳动当作财产权利的观念难以与法律框架相洽。在1914年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中,国会不合逻辑地宣称,(当时已被承认为财产的)劳动,不是商品。(它当然是,或者有是的可能。)

1.3.2 经济认同

谁拥有这种财产?劳动权利的承认需要明确认清谁是劳动者。在制造过程的早期,各种财产权利是混杂在一起的。在商店以古老的公会形式(学徒、雇工和师傅)组织起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单独分辨出劳动权利。师傅出售整个企业合作的产品。

在早期的罢工和罢市(通常是因为反对市政府规定的商品价格)中无法单独定义受雇者的利益。实际上,一些早期的工会既包括工人,也包括师傅。劳动历史学家之所以如此强调1805年费城鞋匠雇工罢工(详见第6章)的原因正是因为那次事件中利益的分离开始变得明显。雇工是针对他们的师傅举行罢工,要求更高的工资。从那时起,师傅

^⑧ Claudia Goldin,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1990).

与雇工之间的争端开始反映出典型的雇主—雇员之间的两极分化：资方和劳方。

到了19世纪初期,已经出现了许多师傅协会(现代雇主贸易协会的前身),它们的主要目标一般是固定市场价格。为了争取分得蛋糕的一小块,雇工们也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协会,试图控制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到了19世纪20年代,从证据来看,劳动者反对其雇主的罢工日益成为拥有生产工具的一方与唯一财产就是劳动的一方之间的较量。随着这一情形的加剧,劳动者利益的分离指日可待。

1.3.3 劳动中的财产权利

劳动本身财产权利的现实和可计算价值通过机械扣押(*mechanic lien*)法律的出现而在法律中固定了。如果师傅破产了,他的雇工有权向师傅的客户索要工资。

机械扣押法在时间和概念上与擅占者在公共土地上获得的优先购买权有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联邦政府在1841年通过了一个广泛的优先购买权法案;各个地区的特殊法案通过得更早。扣押法与允许被房东驱逐的房客取回他们修缮房屋费用的法律也有相似之处。

无论如何,机械扣押是对劳动者本身财产权利的明确承认。实际上,它们不知不觉地在一种双方商业交易中创造了一种第三方责任。承认房客有权取回修缮费用在历史上也与我们在第7章中讨论过的转变相似:当两种私人财产权利冲突的时候,各州法庭从约定俗成的权利(*prescriptive*)向优先权利(*priority right*)的转变。所有这些转变都是为了服务于经济发展。劳动者,就像擅占者、修缮房屋的房客和企业家一样,受到了法庭的鼓励。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从闲置的财产中创造了GNP。

一个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是承认劳动者在自己所在组织中的“企业”或集体财产权利。在某种程度上,这与要求法律承认“信誉”是企业的宝贵财产权利相似。如果成功的工会能提高其成员的工资,使其超过无组织的劳工(证据表明工会确实可以),那么他们就创造了一种租金。^⑨ 租金是一种组织的外部性,只有工会成员才能将其内部化。租金是通过组建工会创造的“集体利益”。^⑩ 它是组织性活动超过其他活动的机会成本的回报。在这个意义上,组建工会对劳动者有利。如果雇主不能将这种成本增加转嫁给客户,那么他们只能减少自己的收益。这可能就是雇主与有组织工人之间根本性矛盾的源头。

矛盾的关键是出售产品和服务的收益如何分配,而产品和服务是由雇主拥有的资源和雇用的劳动者共同创造的。一个行业的竞争越激烈,这种矛盾就越尖锐,因为缺乏垄断力的雇主只能自己吸收工会工资提高带来的成本增加。这一矛盾从未得到解决,而且也永远无法解决,因为组织改变了企业内部的财政分配,而这种分配是与产权相悖的。1935年的《国家劳动关系法案》强制要求进行州际商务的雇主接受这种额外的成本。雇主对工会组织之所以强烈反对,几乎完全是因为这种根本性的利益冲突。

1.3.4 合谋法律

和劳动相关的古老障碍包括普通法中与合谋(*conspiracy*)相关的观念:甲和乙串通起来

^⑨ 例如,参见 Roy J. Ruffin and Paul R. Gregory,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sixth edi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97), p. 297. 工资—雇佣交易的信念表明增加名义上的工资的能力意味着更少的人将被雇用。

^⑩ Olson (1971), especially chaps. 1 and 3.

使丙遭受经济损失。商人合谋以提高价格的做法一直是普通法所不能接受的,而工会完全就是合谋获取集体利益的组织。然而,到了19世纪20年代,师傅组成的协会在美国已经很常见。如果工会想获得合法权利,那么就得改变合谋法律。有些合谋必须变成合法的。

第6章讨论了1806年的鞋匠案例,其中工人被指控并被宣判犯有两项合谋行为:(1)他们串通起来提高工资,(2)他们的串通以损害他人为目的。工会为提高工资和工会商店举行的罢工继续受到合谋的指控。1829年,纽约州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法律,宣布“合谋进行任何有损公共道德或贸易或商业的行为”是违法行为。^①这对工会来说似乎是又一个强大的新障碍。但是,在1842年,马萨诸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莱缪尔·肖终结了有关合谋犯罪的教条的法律效力,他的话永久改变了工会组织在法律中的地位。这一案例是州政府诉亨特案,情况是一个工会试图通过罢工排除非工会成员的工人。肖写道:

假如该协会[工会]的目标是值得称赞的、合法的,或至少不是非法的,那么其手段是犯罪的吗?本案认为,这些人未受合同的约束,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为谁工作,或不为谁工作,只要他们愿意。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不能认为人们同意一起以最能促进其自身利益的方式运用其公认权利的做法是犯罪的。^②

接着,肖就这种罢工使他人财产蒙受损失的问题发表了意见:

因此,我们认为,可能参加这种协会,其目标是采取可能会使他人蒙受财产损失,即减少其收益和利润的措施,然而却远不是犯罪或非法,其目标可能是值得高度赞扬且具备公益精神的。因此,这种协会的合法性依赖于其采取的手段。……如果使用的是公平或光荣合法的手段,那么它至少是无罪的;如果是通过欺骗或武力,那么或许可以判定其为合谋。……^③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工会采取的什么手段是非法的呢?次级抵制可能是:甲和乙阻断了同丁的生意往来,目的是强迫丁的供应商丙达成一项工作协议。建筑业最喜欢这种抵制,原因很明显。三级抵制一直都被认为是非法的。

法庭上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47年,直到NLRA的《塔夫托-哈特利修正案》的第8b章宣布次级抵制非法。该法案在法庭上的适用却因言论自由和利益一致的信条而出现了例外情况。罢工本身在过去若干年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并一般按照这样的规则处理:和平的罢工纠察(罢工时守在工作地点门口劝阻他人上班)属于言论自由。^④

尽管劳工与雇主的斗争还将继续,至少到了19世纪40年代,劳工通过选举权获得了政治权力,而工会本身在法律上不被认为是合谋,也就不是非法的了。

2. 全国性工会的出现

因为早年劳工地位的变化涉及政治合法性(选举权)和对为达到狭窄目的而组织行动的接受,工会组织的目标在数十年中一直游移不定就毫不令人惊奇了。他们必须在达

^① Selig Perlman, *A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2), pp. 146—150.

^② Stephen Mueller, *Labor Law and Legislation* (1949), pp. 43—44.

^③ *Ibid.*, p. 44.

^④ *Ibid.*, chap. 6.

成广大的社会目标和集中追求狭窄的经济利益——“完全的”工会主义——之间进行选择。最终,是完全的工会主义胜出了,这体现在保守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上,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然而,直到19世纪80年代晚期,几乎每种劳动哲学都能在某种工会组织中找到。

2.1 早期的工会

关于工会组织的最早书面记载可以在罢工行动的证据中找到。19世纪初期的文件已经所剩无几。塞里格·普尔曼(Selig Perlman)指出,罢工记录可能并不能证明存在形成永久工会组织的企图。^⑤组织一次罢工比创建并维持一个永久组织容易得多。就目前所知,1794年创建的费城雇工鞋匠联盟是美国第一家长期性质的工会,尽管在它之前已有数次罢工——有些是反对固定价格的,有些是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的。

2.2 目标的问题

早期的地方性工会一般比较关注生计问题,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式的因素也在一定时间内影响了他们的行动,正如我们在第6章中看到的那样。不久之后,工会就超越了乌托邦式的公社如布鲁克农场和奥奈达殖民地、社会问题如废除监禁债务人和提供公共教育,转而提出了一个组建全国性组织的梦想——一个拥有政治影响力的巨大工会。到了南北战争的时候,劳工运动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已经取得了成功,劳工领袖大步迈向全国政权也就不令人惊奇了。

2.3 全国劳工联盟

1866年,全国劳工联盟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这是在全国层面上联合劳工组织的一次尝试,以便在政治上应对战后的萧条问题。全国劳工联盟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政府部门采用8小时工作制且不减少工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密苏里的参议员格拉茨·布朗(Gratz Brown)在1866年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议案。两年后,全国劳工联盟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国会游说行动,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签署了一份联邦文件,使政府雇员8小时工作制写入法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其政治手段肯定是很有效的。^⑥8小时制法案在数个州获得通过,工会领袖也许会很现实地希望私有部门对此会有一个同情的回应。^⑦

然而之后全国劳工联盟却在政治上走了弯路,他们在1867年的会议上倡导“绿背主义”。^⑧他们的希望是,投资资本将因此变得更加便宜,劳动合作社可以借此扩大其企业。绿背运动在全国政治中无疾而终。但是,在1872年,全国劳工联盟全身心地投入了政治,他们组建了一个全国劳工与改革党,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结果被共和党以压倒多数击败。

^⑤ Perlman (1922), chap. 1.

^⑥ Lloyd Ulman, *The Rise of the National Trade Un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⑦ Jeremy Atack and Fred Bateman, "How Long Was the Workday in 1880," *JEH*, March 1992, 发现每天平均的工作时间是10小时。Jeremy Atack, Fred Bateman, and Robert Margo, "Productivity in Manufacturing and the Length of the Working Day: Evidence from the 1880 Census of Manufactures," *EEH*, April 2003, 报告每天平均工作时间的缩短加上每年平均工作天数的增加将会增加产量,且那些类型的变化在那个时期发生。

^⑧ Perlman (1922), pp. 51—52; Irwin Unger, *The Greenback Er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2.4 劳工骑士

1873年,总统格兰特的第二任任期开始时,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接下来几乎必然会出现一个长期而严重的萧条期。那时,新出现了一个更加混乱的工会组织,叫做劳工骑士的崇高秩序。该组织于1869年由尤赖亚·斯蒂芬斯(Uriah Stephens)创立,最初是一个秘密会社。南北战争之后出现大量此类团体。1878年,骑士团变成了公开团体,一个强大的、中央化的、全国性的组织,拥有美国社会组织史上最为雄心勃勃的施政纲领。骑士团要求对社会结构进行重建,废除资本主义制度。^①

几乎所有人(包括女性和黑人,但不包括银行家、律师和酒精贩卖者)都可以加入骑士团。^②他们强调,较幸运的成员应该帮助较不熟练的劳动者。杰拉尔德·格罗布(Gerald Grob)这样写道:

崇高秩序并不是一个行业工会。它更像是一个多种成分混杂的团体,它将工会组织的经济功能置于改革社会的首要目标之下。^③

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骑士团蓬勃发展。他们的新领袖,泰伦斯·V.鲍德利(Terence V. Powderly),工人骑士团大团长,积极进行组织工作,四处传播骑士团的“福音”:完全废除“工资制度”,根据合作社原则重新制定社会的秩序。^④到了1886年,骑士团在一些重要罢工及与新工业结构最重要领袖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其中包括轰动一时的对“华尔街魔鬼”杰伊·古尔德的胜利。

1885年,古尔德在铁路工人罢工中向骑士团屈服。结果骑士团获得了大量的媒体报道,但接下来“彼得法则”发挥了作用。^⑤1886年,美国劳工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年,鲍德利作为领导的无能在暴力的劳工运动中显露无遗。美国陷入罢工,暴力的混乱之中。这一年发生了干草市场暴动、芝加哥肉类加工商大罢工、以及遍布全国的铁路煤炭处理员罢工运动。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参选纽约市长,他的施政纲领是单一税收,而8小时工作制(鲍德利试图把这一概念同骑士团分开)是罢工潮中的核心问题。在乌托邦小说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所著的《回顾》一书中主角选择1886年作为其遁逸至2000年的出发年份。在数周的艰苦斗争之后,鲍德利放弃了针对芝加哥肉类加工商的罢工,因为一个牧师告诉他罢工者的妻子儿女正因他们的行为而受苦。在此之后他很快就失去了对劳工的领导。

2.5 美国劳工联合会

1886年之后,骑士团迅速衰退并消失了。在组织劳工方面,他们主要的对手是熟练

^① H. A. Millis and Royal Montgomery, *Organized Labor* (New York: McGraw-Hill, 1945), pp. 59—75.

^② 奈特家族对纳入女性感到矛盾,但是他们试图组织她们。他们宣称种族不是一个经济的议题,但是黑人大体上在不同的单位中被隔开了。

^③ Gerald Grob, “Knights of Labor Versus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in David Brody, e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1971), p. 41.

^④ 对奈特家族的支持的观点可以参见 Robert E. Weir, *Beyond Labor's Veil: The Culture of the Knights of Labor*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这使帕德里的论文有更广泛的作用。

^⑤ 每一个人都试图在大组织中增加他或她自己的竞争力水平。

工匠及其行业工会。一方面,骑士团对成员来者不拒,其成员来自多个行业,而它的组织则是高度中央化的,以虚无缥缈的道德净化和政治改革为目标。另一方面,工匠工会植根于各地方,主要关心的是其自身状况的改善——以其他人的牺牲为代价,如果必需的话。他们满足于通过组织和谈判创建地方分会。

纽约雪茄制造者协会的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是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的创建者之一,他认为工会应该控制雇佣场所,在谈判中坚持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模仿资本”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并在罢工中取胜。^④ 他的策略是将成员限制在工匠范围中,通过高额会费积累大量的罢工资金,并且在政治上“奖赏我们的朋友,惩罚我们的敌人”。这就是完全的工会主义的精髓,它和骑士团那些不现实的目标截然不同。

1886年是决定性的一年,那一年里,这两种传统发生了公开的冲突。骑士团想吸收工匠工会的成员,组成一个大联盟。骑士团和工匠工会进行了谈判,草拟了一份条约,但最终谈判失败了。1886年12月,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其目标是仍将成员限制在工匠范围中。骑士团逐渐消亡了,随之而去的是美国劳工运动中的乌托邦改革主义传统。在1930年和1931年的会议中,美国劳工联合会甚至拒绝了强制工人的赔偿保险。^⑤ 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除了“世界产业工人”这样的异端团体、“国际女性服饰工人联盟”这样的改革主义工会,或保持这种传统的一些西部工会如“西部矿工联合会”和“国际港口工人与仓库工人联盟”之外,工匠工会主义成为主流。^⑥

以熟练工匠和地方问题为基础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占据了劳工运动的中心地位,直到约翰·L. 刘易斯(John L. Lewis)和煤矿工人领导的工业工会主义运动出现。1935年,该运动终于获得结果,成立了工业组织委员会,后来改名为工业组织代表大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CIO),并受到《国家劳动关系法案》的保护。最初,CIO显得非常政治化、社会化。但是,到了1955年,它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合并,从此遵循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政治中立传统。里奥·特洛伊(Leo Troy)所谓的“老式工会主义”的消亡将在第5部分详细讨论。

3. 反托拉斯法与工会

当劳工组织进行斗争以改善自己的处境时,美国的雇主们却找到了反对罢工的新武器,首先是法院的强制令(injunction),然后是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因为后者

^④ 对AFL的仔细、经典的分析,参见 Selig Perlman, *A The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New York: Augustus Kelley, 1949), chap. 5. See also Perlman (1922), chap. 5.

^⑤ Harold Laski, *The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Viking, 1949), p. 215. 参见 John Fabian Witt, *Accidental Republic: Crippled Workingmen, Destitute Widows, and the Remaking of American Law*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关于工人补偿的发展的一个有趣的案例研究。

^⑥ Melvyn Dubofsky, "The Origins of Western Working Class Radicalism," in David Brody, e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1971), pp. 83—100.

的出现,劳工面对的障碍除了州法庭(以及破坏罢工的州民兵)之外,又多了个联邦政府。^②

3.1 强制令

我们看到,在1842年的州政府诉亨特案之后,雇主不再能指望法庭在劳工争端中偏向他们。工会本身不是非法合谋,但它们的行为有可能被认为是非法的。如果工会的行为是非法的,那么雇主就有可能将劳工争端搬上法庭,申请制止侵权、违约行为的强制令(injunctive relief)。

强制令是根据衡平法程序发布的命令。它被用来保护财产,制止损害或侵权行为的继续。它可能禁止某种行动,也可能强制执行某种行动。如果某人不遵循强制令,那么他/她就犯了藐视法庭的罪行。州政府诉亨特案使劳工案不必再在犯罪法庭(criminal court)受审,这对雇主极为不利。强制令的使用则将犯罪的因素重新带回劳工争端之中,使雇主再次占据优势。

强制令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大量出现,被用来停止铁路罢工。1886年,爱荷华州发出了停止铁路罢工的强制令。之后,在1888年,联邦法院根据1887年《州际商务法案》发出了停止芝加哥、柏林顿和昆西铁路罢工的强制令。^③两年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3.2 《谢尔曼法案》与劳工

令人惊奇的是,《反托拉斯法案》的起草者似乎没有预见到其第一章可能会被用来反对劳工运动:“所有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构成的合同,或限制贸易或商业的合谋……从此被宣布为非法。”当工会发起一场罢工时,在字面意义上,它的目标就是限制贸易。但是,在法律意义上,是这样吗?

《谢尔曼法律》的首次主要运用是1894年的普尔曼罢工,但那次并不是一次对其真正的检验。联邦军队被派往芝加哥以move the mail。在最初的行动中,总检察长奥尔尼援引了《谢尔曼法案》作为根据。然而,在法庭上,政府改变了其立论,改以限制商业为根据,而法庭遵循了这一立论。工会领导之一尤金·V.戴布斯(Eugene V. Debs)拒绝遵从法庭的禁令,他以藐视法庭罪被判入狱。他提起上诉,但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藐视法庭的原判。^④

14年之后,《谢尔曼法案》被公开地用来反对劳工运动。康涅狄格州丹布里的勒韦公司利用强制令来制止对其产品帽子的抵制。结果造成的勒韦诉劳勒案(1908)带来了一个言语不吉的最高法院判决:

^② 关于破坏罢工的行为,见 Joshua Rosenbloom, “Strikebreaking and the Labor Marke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1—1894,” *JEH*, March 1998; 关于州法律中的改革,见 Janet Currie and Joseph Ferrie, “The Law and Labor Str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1—1894,” *JEH*, March 2000。

^③ Perlman (1922), pp. 155—156。

^④ Quoted in Mueller (1949), pp. 172—178. 也参见 Susan E. Hirsch, *After the Strike: A Century of Labor Struggle at Pullma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 关于普尔曼公司的整个发展进程中劳工管理关系的详细见解。

宣言中描述的联合[工会]是“限制各州之间贸易或商务”的联合,该词汇的意义与[谢尔曼]法案中的用法相同。^③

劳工领袖和同情者在国会展开游说,试图让工会获得豁免,不受《谢尔曼法案》管辖,正如我们之前提过的那样,他们在1914年通过《谢尔曼法案》的克莱顿修正案达到了这一目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被誉为“劳工的大宪章”。

赫伯特·霍文坎普(Herbert Hovenkamp)认为,劳工受到了《谢尔曼法案》的损害,并且现在仍然受到《克莱顿法案》的损害,因为最高法院相信劳工和资本的联合应该被平等地当做对贸易的限制。工会不是法人公司,尤其受到强制令的损害,因为强制令适用于每个单独的成员;而针对法人公司的强制令只把公司的官员和雇员当做主犯的代理人。官员们可以在自己内部制订一个固定价格的方案,完全安全,不会被当做合谋,因为公司本身在市场中是以一个单独的“人”的身份行动的。工会拒绝成立法人公司,从而给予了州政府干预其内部事务的法律权力。

在1842年的州政府诉亨特案之后,劳工联合本身在普通法中不再是非法的,而企业间的垄断协议在普通法中也不是可执行的。《谢尔曼法案》把这一切都搅乱了。根据《谢尔曼法案》,所有限制贸易的联合都是非法的。企业可以利用各种方式回避《谢尔曼法案》的影响:价格领导*、合并、成立法人公司。而且,它们往往受到高进入门槛的保护从而免受竞争。但是,劳动没有规模经济,进出该市场完全自由,在无组织的情况下对市场竞争毫无抵抗之力。如果有组织,那么显然就有联合,也就显然存在对贸易的限制。因为工会的目标恰恰就是减弱其市场中的价格接收者地位,其本质就是反竞争的。工会与法律的问题似乎是无法在法庭上解决的。因此,只有1935年《瓦格纳法案》中体现出的对执政哲学和法律的改变才能使得工会及其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合法化。旧时法庭对工会的限制清楚地证明了霍文坎普的假说,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情况仍然存在。^④所以,尽管在19世纪有所收获,尽管有了《克莱顿法案》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进步,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工会在法律中的位置仍然疑云重重。

4. 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序曲

本章中讨论的最高法院判决只是一些例子,它表明了法庭对劳工的雄心和行动的态度。尽管它们是20世纪初期的判决,但却带有浓重的19世纪味道。它们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国会巨大转变的序曲,主要是1932年的《诺里思-拉瓜迪亚反强制令法》、1935年的《国家劳动关系法案》和1938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

我们完全有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里,劳工运动的领袖为什么没有被法庭的不利判决击倒?部分原因是,恰好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这时工会实际上获得了联邦政府的完全支持。显然,劳工的主要理想有可能通

^③ 引自 Millis and Montgomery (1945), p. 569.

* 暗中默契的主要方式,即由产业中最大的一个厂商制定和变动价格,其他厂商多多少少自动跟着定价和变价。

^④ Herbert Hovenkamp, "Labor Conspiracies in American Law, 1880—1930," *Texas Law Review*, April 1988.

过友好的政治手段实现。这一时刻在20世纪30年代到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展现出保守的冈珀斯政治手段的明智之处——尽管独立的劳工党让共和党 and 民主党都感到恐惧,但工会对两党的友好候选人的支持却可能产生适宜的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最高法院的正义不依赖于选票,但选举出的政客却依赖。

推荐阅读

文章

Atack, Jeremy, and Fred Bateman. "How Long Was the Workday in 188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2, no. 1, March 1992.

Atack, Jeremy, Fred Bateman, and Robert Margo. "Productivity in Manufacturing and the Length of the Working Day: Evidence from the 1880 Census of Manufactur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40, no. 2, April 2003.

Carrie, Janet, and Joseph Ferrie. "The Law and Labor Str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1—189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0, no. 1, March 2000.

Dubofsky, Melvyn. "The Origins of Western Working Class Radicalism." In David Brody, e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Grob, Gerald N. "Knights of Labor Versus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In David Brody, e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Gutman, Herbert G.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 1815—191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8, no. 3, June 1973.

Hovenkamp, Herbert. "Labor Conspiracies in American Law, 1880—1930." *Texas Law Review*, vol. 66, no. 5, April 1988.

Lebergott, Stanley. "The American Labor Force." In Lance 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Lipset, Seymour Martin. "Trade Unionism and the American Social Order." In David Brody e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Pessen, Edward. "The Workingmen's Movement in the Jacksonian Era."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vol. 43, no. 3, December 1956.

Rosenbloom, Joshua L. "Was There a National Labor Market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Evidence on Earnings in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6, no. 3, September 1996.

———. "Strikebreaking and the Labor Marke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1—189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8, no. 1, March 1998.

Rosenbloom, Joshua L., and William A. Sundstrom. "Occup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Dispersion of Wages and Working Hours: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0—1903."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0, no. 4, October 1993.

书籍

Brody, Davi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Commons, John R., et al. *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4 vols. New York: Augustus Kelley, 1921—1935.

Goldin, Claudia.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Lebergott, Stanley. *Manpower in Economic Growth: The American Record Since 1800*. New York: McGraw-Hill, 1954.

Mueller, Stephen J. *Labor Law and Legislation*. New York: South-Western, 1949.

Olson, Mancu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1.

Perlman, Selig. *A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Rosenbloom, Joshua. *Looking for Work, Searching for Workers: American Labor Markets During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Taft, Phillip. *Organized Labo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第4部分

联邦力量的发展:1914—1945年

背景综述

在20世纪的上半叶,出现了两个对美国经济的未来具有深远影响的巨大变化:

(1) 领袖的独立权力影响力持续壮大并支配了这个经济体,直到它被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彻底地削弱。

(2) 联邦政府的中央集权和社会控制力得到扩张,尤其是在大萧条之后。

直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极大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这些变化才成为美国经济前景的显著特征。然而,当我们研究1914—1945年这段时期的经济史时,这些变化的发展模式就变得非常清楚了。

尽管这两个变化有点彼此相反,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二者的互补才是最重要的。商人非常抵制政府的扩张,但是他们也通过贡献建议和专业知识,以重要的方式帮助了政府的扩张。他们希望联邦权力的利益得到组织和稳定,但是他们厌恶必需的成本——私人部门主动权的丧失。现代战争,从1914年到1918年,以及从1939年到1945年,把这些变化推到了前沿,但是大萧条也可能和任何一次战争一样具有决定性——其影响带来了政治、社会和经济永久性的改变。在两次战争中,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被呼吁干预私人经济生活,而且在干预的设计和形成中商业领袖的建议是很重要的。

在第3部分中我们了解了发生在美国独立战争至一战之间的工业和金融变革过程中,作为缔造者和企业家的伟大商业领袖的兴起。这些人用他们伟大的经济成就,用他们在工厂和会计室的地位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他们作为天赋的(而非政治的)领导者登上历史舞台,这似乎是注定的。然而,大多数的伟大商业领袖,那些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甚至受大众欢迎的人物,从J. P. 摩根到约翰·D. 洛克菲勒,都避开政治的注意。但正是在政治、战争以及经济危机中,完全新的力量——联邦政府手中的伟大的经济影响力——才会出现。

回顾一下,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正在到来的变化的早期征兆。1875—1914年间,正是

最大的产业公司诞生之际(如通用电气、标准石油、美国钢铁、福特汽车等公司),而且正是在这个时候这些企业家的名字遍布这个国家报纸的头版头条,社会控制力从地方政府向华盛顿的转移造成了联邦调控力量的最初的、关键的集中:ICC 和其他早期调控机构,谢尔曼和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以及联邦收入税修正案。

后来在 1917—1919 年间,现代战争的需要产生了全盛的、政府指导的“中央管制经济”。商业领袖涌入战时政府的高层“使之发挥作用”,制造 1917 年和 1918 年进入法国的军队和武器。被伍德罗·威尔逊的第二届政府所利用的经济力量,在 20 世纪 20 年代哈丁和柯立芝总统时期和平的间隙似乎消失了。但是在 1929 年,巨大的长期经济危机开始,将中央管制经济带回到华盛顿,创造了新的结构,实现经济调控和(它所希望的)更大的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复兴总动员,用付工资时扣缴所得税的制度和非常累进税率支持了这段时期。到 1945 年,经济力量的平衡已经永久改变,经济生活从私人决策为首转变成政府和政治的舞台。美国“福利国家”已经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战争和经济危机的产物。

第 22 章

中央管制经济的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 20 世纪出现在美国经济中的一系列危机中的第一个危机。战争引起的作用和带来的教训为即将出现的事物描绘了一个粗略的蓝图。大多数的战争的制度装备被用来应付 1918 年以来的危机，这是美国经济史上的新奇事物。^①

到 20 世纪 20 年代，战时中央管制经济大部分已经消失了，常态经济（哈丁总统语）占支配地位。但在 30 年代新政的非常时期，战时动员方法以各种各样的姿态重新出现了，而且，从那时起到现在，这些方法一直是联邦遇到紧急事件时的主要选择。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制度发展的重要性在大多数美国经济史教科书上都被忽略了，尽管这在专家们中间尽人皆知。第二届威尔逊政府（1916—1920）的无情批评家之一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这样描述“战争集体主义”：

是一个完全的计划经济，主要由大的利益集团用中央政府的工具来运转，它是在 20 世纪其余时间国家公司资本主义的原型、先例和灵感。^②

罗斯巴德悲观的评价是正确的吗？

1. 1913 年的收入税修正案

联邦力量，像 ICC 或联邦贸易委员会那样的超“管制力量”的规则，需要对资源实行更大的控制，比用从土地买卖和关税及消费税中获得的税收能够达到的控制更大，那种税收是由国家的创立者所提供的筹资方式。这些税主要地、递减地向消费者征收。为了赋予联邦政府确定的经济力量，对普遍的经济活动征税是必需的。永久的联邦收入税就是一种选择。^③

1.1 背景

税收最原始的形式就是统治者为了个人用途强制夺取财产。统治者怎样处置这些

① Hugh Rockoff, *Drastic Measures: A History of Wage and Price Contr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4), chap. 3; Robert Higgs, "Crisis, Bigger Government, and Ideological Change: Two Hypotheses on the Ratchet Phenomenon," *EEH*, January 1985; and Robert Higgs, *Crisis and Leviathan: Critical Episodes in the Growth of American Government* (1987), chap. 7.

② Ronald Radosh and Murray Rothbard, *A New History of the Leviathan* (1972), p. 99. 对于战争动员和新政的详尽说明，参见 William Leuchtenberg, "The New Deal and the Analogue of War," in John Braeman et 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1967)。

③ 参见 Elliot Brownlee, *Federal Taxation in America: A Short History* (1996)。

财产是统治者的事,与其之前的所有者无关。这个简单的解释是理解税收的最有用的方式。除非统治者的国民具有相同的收入和同一的要求,除非他们失去同等数量的财产,否则税收绝不是“平等的”或“公平的”。

在现实世界中任何一种税收在主观上都是不平等的。因为税收不可避免地影响相对价格,而我们都会对相对价格作出反应,所以任何税收政策都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方式。^④ 自利的民众将很自然地努力改变自身的活动,到税收最低或者不存在税收的地方进行消费。同样地,没有统治者花费税收的中立方法。这样,对更多的人来说,税收往往是一个负担,而花费是一种福利。如君主邀请你参加他或她的生日宴会,那么你比那些未列入邀请名单的人会从皇家赏赐中获得更多。1787年盛夏在费城起草美国宪章的人们对税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严格限制了新政府的征税能力。联邦宪章的第一章第八节第一款称“关税、进口税和消费税将在全美国范围内统一”。

为了应对内战的出现,危难中的联邦政府开征了累进所得税。它需要即刻的收入,并且担心后来的诉讼。在1872年,国会取消了这项税收。随后最高法院在1881年进行的一项裁决,斯普林格诉美国案,实际上支持了收入税不是一项直接税;因此,它本来是符合宪法的。^⑤ 1894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收入税,同时关税税率降低,但是,美国最高法院根据宪法将其否决了。在波尔洛克诉农场主贷款和托拉斯公司案(1895)中,法院又推翻了斯普林格决定,认为收入税是一项对土地及土地上的产品征收的直接税,而且必须平等分配。^⑥ 对那些希望根据收入征税的人来说,唯一的办法是修订宪法来允许征收不等的税收。

本·伯艾克(Ben Baack)和爱德华·雷(Edward Ray)分析了怎样达到那样的目标。政府的不断扩大,军队建设计划,外事干预,军队抚恤金体系的建设,以及政府正在膨胀的管制功能,都需要一个新的和可持续的收入来源。修宪的需要意味着必须事先消除对收入税的抵制,手段是通过高收入的、工业化的东部各州的建设支出设定灵活的支出目标。大体上,他们反对另一种收入税,因为他们已经支付了内战期间收入税的2/3。预期较新的西部各州会心怀平民主义的情感,支持税赋和收入再分配。有数据显示,大约抚恤金开支的2/3和新的军事支出的2/3被转移到了那些曾有过反对收入税记录的州。图表说明了这点。^⑦

1.2 第16次修订

1913年,收入税得以批准。再一次,诱因是关税税率的大幅度削减。^⑧ 收入税修订

^④ 例如, Elliot Brownlee, "Income Taxation and Capital Formation in Wisconsin, 1911—1929," *EEH*, Fall 1970。他认为,威斯康星州的收入税悄悄地将支出从制造业的资本形成中转移走了。产业资本家“用脚投票”,威斯康星州的发展落在了相邻各州之后。

^⑤ *Springer v. U. S.*, 102 U. S. 586 (1881)。

^⑥ *Pollock v. Farmers' Loan and Trust Company*, 157 U. S. 429, 158 U. S. 601 (1895)。

^⑦ Bennett Baack and Edward John Ray, "Special Interests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Income Tax in the U. S.," *JEH*, September 1985。

^⑧ 对于高关税将会重演的关注,是威尔逊政府设立关税委员会的原因之一。参见 Karen Schnietz, "Democrats' 1916 Tariff Commission: Responding to Dumping Fears and Illustrating the Consumer Costs of Protectionism,"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72, no. 1, Spring 1998。

到联邦宪法是对原文件第一章缺陷的总体删减：

国会将有权力设置和收取收入税。无论收入来自何种资源，不在几个州之间分摊，不考虑任何统计或列举。

直接的结果：1915—1919年间——战争期间的财政年度——征收的总税收114亿美元中的60亿美元，或者说53%来自于对个人和公司征收的收入税。^⑨起初，最高档的边际税率只有7%，但为了帮助一战筹资将其提高到了77%。战后税率降低了，但最高档的边际税率只降低到25%。第16次修订是财政改革的小开端，而财政改革将改变美国经济，对那些拥护财政改革并将其看做一项必需的社会改革的人来说，财政改革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2. 第一次世界大战：数字

在20世纪早期，欧洲工业化进程持续进行；同时，民族主义抬头，演变为军备竞赛。特别是德国，试图寻求与其工业实力相称的政治地位。1914年6月28日，斐迪南公爵遇刺事件揭开了战争的序幕。德国入侵了比利时，从侧翼包围了法国，从而把英国卷入了冲突中。一个月之内，双方挖好了可供几年使用的战争工事。1914年8月4日，威尔逊总统正式宣布美国保持中立。英国封锁的效力使得德国在1917年1月31日宣布 unlimited 潜艇战争。几天后德国潜艇攻击了美国舰船，导致美国与德国断交，并在1917年4月6日宣战。美国将1百万军队加入到协约国方，打破了双方的平衡，一年后，1918年11月11日，德国正式宣布投降。总计，这场战争卷入了470万美国人，花费了327亿美元。1000万美国军人中有将近11.67万死于这场战争。

战争除了能导致人为的破坏，也能影响实际产品和转移资源的数量。为了能成立和装备数量庞大的作战部队，政府需要大量的物资，这些物资与和平时期的产品完全不同。而在战争时期国家需要大量的、随时供应的物资。因此，政府不能用常规税收来发动一场大的战争。另外，原料和劳动力必须从原来的正常状态转换为为战争服务，人民也要求在军事服务处登记征召。

从美国内战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第一次征召普通民众入伍服役；1917年5月的义务兵役制法案要求所有年龄在21至30岁（后来是18至45岁）的男性都必须服兵役。美国的武装部队在1914—1916年间平均每年是17.3万人。1917年，有64.4万男女武装军人；1918年，这个数字是290万。到1922年，征募的人数降低到27万人。^⑩薪酬、给养、装备和运输军队所需的军事资金支出在增长，如表22.1所示。

^⑨ 一项精彩简短的关于一战融资的研究，参见 Paul Studenski and Herman Krooss,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table 42, chap. 23.

^⑩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Ed 26.

表 22.1 1914—1922 年的军事支出

年份*	陆军(美元)	海军(美元)	总计(美元)
1914	208	140	348
1915	202	142	344
1916	183	154	337
1917	378	240	618
1918	4 870	1 279	6 149
1919	9 009	2 002	11 011
1920	1 622	736	2 358
1921	1 118	650	1 768
1922	458	477	935

注:单位是百万美元。

* 这些财年截止到 6 月 30 日(即,1914 年包括 1913 年的一半和 1914 年的一半)。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Ea 638, 639.

2.1 综合财政

在 1919 年的财政年度整个战争的支出大约是 GNP 的 25%。^① 增长的大部分都直接用于战争了,但是还包括政府相关费用的总体扩张。为了帮助给战争筹资,联邦政府提高了新的收入税,并提高了一些特许权税,对军需品制造商的利润征收进口税,并且对收入征收附加税(国会通过的一个在正常收入税税率之上的税率)。^② 然而,这些收入还赶不上迅速增长的支出。结果,国家债务提高了 21%,增加了 240 亿美元。由于金融系统占用了纯货币创造带来的部分负债,因此货币供给激增。此外,黄金也从欧洲流入美国。到 1916 年,黄金本位制的银行系统占用了大约 20 亿美元,这是单一国家曾经拥有过的最大数量的一笔黄金。^③ 从美国购买军火的外国政府,清偿了美国公民的国债。几乎在一夜之间,美国就变成了一个“到期的债权国”,仅仅在三年以前它还是一个长期的净债务国。在表 22.2 中可以看到这个数据。

表 22.2 1914—1922 年的联邦财政与货币供给

年份	支出 (美元)	收入 (美元)	赤字(-) 盈余(+) (美元)	联邦 总债务 (美元)	M_2 (美元)
1914	726	725	-1	1 188	16.39
1915	746	683	-63	1 191	17.59
1916	713	761	+48	1 225	20.85
1917	1 954	1 101	-853	2 976	24.37
1918	12 677	3 645	-9 032	12 455	26.73
1919	18 493	5 130	-13 363	25 485	31.01
1920	6 357	6 649	+292	24 299	34.80
1921	5 062	5 571	+509	23 977	32.85
1922	3 289	4 026	+737	22 963	33.72

注:单位是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Ea 584, 585, 587, Cj 45.

① Paul Studenski and Herman Krooss (1952), p. 301.

② Rockoff (1984).

③ *Ibid.*, p. 284.

从1916到1919年,240亿美元的债务增长是由构成合理的借贷实现的。财政部长威廉·麦克阿杜从内战时期的财政中吸取了教训。与1861年比较,银行体系已经复杂得多,他能够很协调地转移组合资源,而不是简单地印钞票。不需要更多的美钞。现在有联邦储备债券。^⑭

如果公众直接购买债券,那么资源占有权就会从公众转移(暂时转移)到政府手中。如果美联储要回笼债券,货币供给就会直接增加。这种增加的原因是美联储的净购买,以及商业银行购买大量的政府有价债券。政府对黄金储备比例作了一些调整——将支持联储债券的黄金储备改为40%——以满足1914年联邦储备法案中黄金储备须能够支持2倍以上的银行货币的要求,而且在1917年,不再要求美联储成员银行必须有黄金储备。^⑮当然,结果是,巨额比例的货币供应直线增长;到1920年,流通中的纸币和活期存款数量比1914年增加了100%。

政府能够征税(而且确实已经这么做了),能够借贷(而且确实已经这么做了),而且能够运用通货膨胀的形式来隐形征税。在后面这种情况下,政府只不过是以任何价格购买产品和服务,把产品和服务从其他用途转移到政府手里,这是必要的。消费者不会惊讶地发现他们被强制储蓄了。如果这种转移还不够用,政府还会求助于各种各样的物质分配机制(而且确实这么做了)。在一战中,政府实际上从来不必求助于票证的限额配给——通货膨胀、税收和借贷,辅之以一套精巧的分配机制(这点下一节将会讨论),就能够起作用了。

尽管在1914年经济不错,大部分时间都近乎完全就业,但是,当欧洲战争蔓延的时候美国经济也开始陷入了衰退。到1916年晚期,产量和就业得以恢复。随着政府补贴、政府采购的进行,以及优惠的税收政策,投资得以大幅度增长。在固定厂房设备和工业制造装备上的费用,1915年是6亿美元,到1920年就增长到4倍,24亿美元,5年时间是惊人的增长。然后大危机来临,在一个年头之内投资就下降了几乎50%(降至14亿美元)。^⑯

为生产战时物资而进行的生产能力的投资,意味着增长到1918年的水平,需要牺牲更少的和平时期物资生产。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莫里斯·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估计,一战中战时物资的约60%来自于消费者的节约,而只有40%来自于产量增长。^⑰克拉克的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如果我们考虑上面的实际投资数据的话。

2.2 战争时期的通货膨胀

由于新投资导致的生产能力的转移,我们可以更加感受到战时财政所产生的货币刺激的力量。从1914年到1918年,真实GNP增长了大约22%,但是一般商品价格上升了近2倍,同时消费者价格指数也翻番了。^⑱这些数据在表22.3中,从表上我们可以看到,商品批发价格增加的比率比消费者指数要快,但是下降得也快。

^⑭ Clemens Kool, "War Finance and Interest Rate Targeting: Regime Changes in 1914—1918," EEH, July 1995,标明了美国参加一战以后,目标利率从开始到1917年年末的情况。

^⑮ Studenski and Krooss (1952), p. 294.

^⑯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d 684. 下面的研究讨论了美国投资中的国外构成, Mira Wilkins, *The History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4—1945* (2004)。

^⑰ Studenski and Krooss (1952), p. 301, n. 16.

^⑱ *Ibid.*, p. 301.

表 22.3 批发价格和消费价格

年份	批发价格	消费价格
1914	68.1	56.5
1915	69.5	57.1
1916	85.5	61.6
1917	117.5	72.3
1918	131.3	85.3
1919	138.6	97.7
1920	154.4	113.0
1921	97.6	101.1
1922	96.7	94.9

注:1926年=100。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c 1, 113.

一旦支出计划付诸实施,并且开始从居民消费转移,只有实际产出与已经提高的支出比例增长时,才能阻止价格继续上涨。当然,这种产量的提高来自于现存的过剩生产能力。但是过剩的生产能力在1916年消失了,因为当时美国正忙于为同盟国生产商品。利用现有的劳动力和资本提高生产率,或者是出现新生产能力,仍然能够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根据给定的投资数据来看,当时美国的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在一些产业领域生产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有些领域并没有变化。在生产能力没有提高的产业领域,通货膨胀是完全的,只能靠战时强制的实物分配机制来抵消。这种分配发生的地方,当被压抑的需求冲击市场时,1919年控制的减弱引发了价格的汹涌上涨。这样,在1918—1920年间,在很多商品上都出现了巨大的战后通货膨胀。联邦支出在战后快速下降,以及大量预算盈余的出现,造成1921年价格暴跌。

看一下表22.4所示的谷物和钢铁的产量和价格。在谷物方面,产量没有充分增长,而价格剧增。食品不仅对美国军队来说是必需的,而且对于美国给予盟国丰富的此类援助来说也是必需的。在战后时期,作为对遭受战争蹂躏的欧洲数百万饥饿民众的援助,赫伯特·胡佛实施了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计划。1921年价格的下跌引发了农民新的需求,这引起了联邦的注意——要解决突然重新出现的农民收入问题。

表 22.4 1914—1922年选定的产量与价格

年份	玉米		钢铁		
	产量 (十亿蒲式耳)	价格 (美元/蒲式耳)	产量		到岸价格 (美元/毛吨)
			钢铁 (百万短吨)	轧制钢	
1914	2.5	0.71	25.6	20.6	30.00
1915	2.8	0.68	35.2	27.3	30.00
1916	2.4	1.14	46.8	36.3	33.33
1917	2.9	1.46	49.8	37.0	40.00
1918	2.4	1.52	49.0	34.9	56.00
1919	2.7	1.51	38.1	28.1	49.26
1920	3.1	0.64	46.2	36.2	53.83
1921	2.9	0.52	21.6	16.5	45.65
1922	2.7	0.73	38.9	29.6	40.69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c 245, Da 697, 709, Dd 399, 405.

而且,如表 22.4 所示,工业纯铁和钢材的生产量也在战时及战后几年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同时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也增加了。结果,即使产量增长了,价格也提高了。

2.3 小时制和工资

在制造业部门每周的平均工作小时量减少了,在一战以前很久开始的这种趋势在战后继续发展。所有的政府就业岗位都实施了每天 8 小时工作制。^⑨ 在战争之前产业工人主要由市场配置(而且也大量地从为军事用途而征收的、以较低比例没收的市场中转移出来),战时通货膨胀为工资收入者创造了一个短暂富足的时期。然而小时工资在名义和实际方面都有巨大增长。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工人带来了财富;一战起到的这种作用是可以论证的。^⑩ 农业工人的境遇比产业工人略差,但似乎没什么疑问的是,平均而言,即使是农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也在战争中切实提高了。其他证据表明,在一战中及战后收入分配实际上向劳动倾斜。典型的工资和工时数据列在表 22.5 中。从表 22.3 中来看,用来计算真实平均小时工资的指数是 CPI。

表 22.5 1914—1922 年选定的小时和收入

年份	周平均小时	制造产业	
		名义平均 小时收入	真实
1914	55.2	0.287	0.508
1915	55.0	0.287	0.503
1916	54.9	0.320	0.520
1917	54.6	0.364	0.503
1918	53.6	0.448	0.525
1919	52.3	0.529	0.541
1920	51.0	0.663	0.587
1921	50.7	0.607	0.600
1922	51.2	0.574	0.605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Ba 4314, 4365.

战后价格的飞速上涨伴随着工资的同步上涨。即使随着军人复员和联邦当期支出的减少(见表 22.2),由实物短缺导致的长期被压抑的需求,和巨大的货币供给扩张一起,为即将到来的扩展繁荣的和平时期奠定了令人持续乐观的基础。然后到来的是 1921 年

^⑨ 对工时和工资进行联邦控制的前兆出现在 1916 年的《亚当森法案》中,该法案包括,联邦一级政府要求铁路部门在商业条款约束下实行 8 小时工作日(超过则为一个半工时)。Jonathan Hughes, *The Governmental Habit Redux* (1991), pp. 115, 130—135. 所有工人对 8 小时工作日的长期要求在战后年份中得以实现了。参见 Robert Whaples, “Winning the Eight-Hour Day, 1909—1919,”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0, no. 2, June 1990. 以下研究讨论了战前时期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出现, Joshua Rosenbloom, “One Market or Many: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9, no. 1, March 1990.

^⑩ Sanford Jacoby 指出在战争期间,那些不能从“外部”劳动力市场招募足够工人的制造商,发展了他们自己的劳动力,由“内部”劳动力市场提供充足的劳动投入。这可以解释制造业劳动力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大部分改善。Sanford Jacoby,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Labor Markets in American Manufacturing Firms,” in Paul Osterman ed., *Employment Practices in Large Firms* (Cambridge: MIT Press, 1984). 还参见 Laura Owen, “Gender Differences in Labor Turnov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Labor Mark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1920s,” *Enterprise and Society*, vol. 2, no. 1, March 2001.

的急剧后退。与价格相比工资下降相对较少,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及战后,工人在真实收入方面获得了显著的净收益。实际上,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的“正常状态”在巨大繁荣的气氛中得以加强了,许多经济学家相信,这是由 1921 年相对价格的快速、急剧调整引起的,它使产业工人实际购买力提高了。

2.4 战时金融和收入分配

由大量的货币创造所主导的战时金融,通货膨胀以及很高的战时收入和利润税,带来了一些其他的意想不到的结果。新的联邦收入税降低了那些适用这些税的群体居民的有效需求。那些工资增长快于价格的工人获得了收入的份额,而那些靠投资获得利息的阶层则没有。

在 1914—1920 年间,价格以高于每年 14% 的复合比率上涨。股票和债券价格上涨的比例少于一半,部分原因是公司利润税实际上缴给了国库。缴税的那些“资本家”和那些从资本市场工具的投资中获得利润的资本家,与另一些人相比境况变坏了。一般利率远低于通货膨胀率。那是一个借贷和投机的好时代——而不是纳税——但却不是慢慢处理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以及美国钢铁公司股票的时候。由“死亡批发商”创造的投机和暴利的战争神话,可能很好地包含着真理要素,但显然我们的统计数据表明,这基本没有溢出到金融市场上。

看一下表 22.6 所示的数据。通胀率由表 22.3 所示的 CPI 数据简单转换而来。只看收入,并没有与通胀同步增长。一般股票价格从 1914 年到 1916 年上升了 32%,而当战后通胀发生后的 1918—1919 年一年间就上升了 14%。然而,战争时的金融,正如已经证明的那样,对那些依靠市场谋生的被动的资本家而言是不利的。实际情况中,“寡妇和孤儿”以及懒惰的富人们,这些依靠市场利息生存的人们,如果有产业工作的话,可能会更好过些。

表 22.6 1914—1922 年的金融市场

年份	最低利率	公司债券 收益	普通股票 收益	普通股票价格 (1914—1916 = 100)	通货膨胀率
1914	5.47	4.44	4.96	8.35	1.0
1915	4.01	4.62	5.66	11.03	1.0
1916	3.84	4.49	6.29	11.01	7.9
1917	5.07	4.79	7.63	8.19	17.4
1918	6.02	5.23	8.16	9.07	18.0
1919	5.37	5.29	6.35	10.34	14.6
1920	7.50	5.81	5.45	7.98	15.6
1921	6.62	5.57	6.36	8.35	-10.5
1922	4.52	4.85	6.69	10.30	-6.1

注:最低利率、公司债券收益和普通股票收益是年平均率。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j 800, 811, 1195, 1224.

铁路和公用事业的一般股票价格慢慢下跌,因为它们的收益没有与通胀保持同步。

斯坦利·莱博高特在他对财富和收入分配的研究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②事实上,20世纪的战争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收入,这是一个普遍现象。^③如果像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人声称的那样,资本家发动战争是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那么他们似乎选错了车。

在一战中,借助货币创造、通胀和累进收入税来寻求流动性的政策是一张收入再分配的蓝图,它对工资收入人群有利。由于这项政策能够使新的国库债券以相对较高的价格(低利率费用)卖出,因此它是从债券管理的角度精心挑选的政策。事实上它是非常高明的财政政策,它以另一种低费用的大量债券创造成功地运用于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项政策如此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一战的统制经济中构建了一套精巧的非市场调控体制。

3. 统制经济

联邦政府并没有简单依赖市场的反应。实践证明它在一战期间是非市场调控机制的多产的创新者;其间设立了将近5000个新的联邦机构。政府希望快速组织资源,不管这些新的配置让那些生活因此而改变的群体是否满意。强制是必需的,因此集中的决策也是必需的。为了实现目的,不得不设立了调控管理局来指挥经济的集中流动。当然极端的例子是将劳动力抽调到军队中。

符合条件的男性被强制召集到部队,工资低于机会成本。爱国热情得到了鼓舞,而且对那些符合军事服务条件,但不愿意过军事生活的人实行监禁。实际上政府用强制方式廉价地得到了这些人,在统制经济中设立战时事务局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3.1 委员会、事务部和行政局

在1914年德国入侵比利时和法国及俄国入侵日耳曼失败之后,欧洲人发现他们自己陷入了一场不得不持续四年之久的可怕的消耗战。大量军队在成千上万公里的战壕和工事中相互对峙。

起初美国宣布中立并扮演了参战者的银行家的角色。慢慢地,帮助就转向了支持同盟国,到1916年开始准备参战。为了参战,需要战舰、军队、武器和给养。需要人员来就训练、生产及运输的地点、数量作出计划。因为联邦政府不能提供这些专业技能,所以私人企业的领袖被召集到华盛顿计划和组织动员这些资源。^④

在1916年,海军顾问委员会组成,以估算国家战备需求。^⑤它包括资深学界和业界人士,成员甚至包括了已经70多岁的托马斯·A.爱迪生。当时还组成了一个派生组织,由私人部门资助的产业筹备委员会,积极为战争作准备。当年晚些时候,它转变成了国防委员会——一个包括内阁秘书长在内的完全由政府提供资金的战事组织。

^② Stanley Lebergott, *The American Economy: Income, Wealth and Wa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05—208.

^③ Arthur Stein, *The Nation at Wa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82—86.

^④ 参见 Rockoff (1984) 和 Higgs (1987)。

^⑤ 接下来的讨论中大部分信息,参见 Hughes (1991), pp. 126—135; Radosh and Rothbard (1972), pp. 66—110.

国防委员会受顾问委员会指导,后者也是由私人部门的高层领袖组成。根据格罗斯温纳·克拉克森(Grosvenor Clarkson)的研究,顾问委员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⑤它为食品控制、产业配置甚至出版物检查等制订计划。在战争前防御努力不得不以半官方的方式,主要依赖私人部门的专业能力。后来,产业部门将其最有前途的经营管理部门搬到了华盛顿,以官方的身份服务于它们的国家,以应对持久战。

即使在1916年(伍德罗·威尔逊赢得了总统竞选,口号是“他使我们摆脱战争”),口号还留在墙上。1916年的《国家防御法案》为军队力量的扩充提供了方案。1916年的《船舰法案》组建了一支常规商船,由美国船舰委员会控制。^⑥当金融领域即将到来的战争变得明显的时候,更多的拨款开始了。

企业家知道能够做什么。保罗·考斯汀尼(Paul Koistinen)援引了如下一段话,出自哈德森汽车公司的总裁霍华德·科芬于1916年12月写给都彭的一封信: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为严密的社会结构、工业、公共事业和军事奠定基础,这是每一个有思想的美国人都认识到的,它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命运至关重要,在和平和商业时代,而不仅仅是在可能的战争时代。^⑦

正是这种“军事—工业联合”的远见使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961年离开白宫之时深感忧虑。^⑧

3.2 胡萝卜和大棒:利弗食品控制法案

1917年8月的《利弗食品控制法案》,被证明是一条主要的控制法案。它赋予联邦权力发放商业许可、征用商品甚至直接接管工厂(它在最初时期还曾资助FBI)以及确定最低小麦和其他作物价格的权力。按照利弗法成立了粮食管理局,赫伯特·胡佛被任命为美国粮食管理局主席。为了获得这项立法的合法性,芒恩诉伊利诺伊案甚至被援引:写在利弗法中的是,粮食生产是“覆盖公众利益的”。^⑨即使在战争出现时,政府也用一只眼关注宪政和法制。

在利弗法下,燃料供给也受到了管制,产量的确定和价格也是管制的,而且建立了美国燃料管理局来控制 and 稳定煤炭的价格。在1917年夏天,成立了战时工业委员会(WIB),以确定制造工业的生产优先权,稳定价格,以及协调政府采购。这个委员会由著名银行家伯纳德·巴鲁克领导。

WIB根据它自己的标准管理战争生产的合约;没有竞争性的投标。它还通过它的保护部门发动了一场运动,将美国工业各个部门的规模,从钻头到服装生产,都进行了标准化。^⑩新的军队为重估美国男性的体格标准(自内战以来)提供了优良机会!在20世纪

^⑤ Grosvenor Clarkson, *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23).

^⑥ 参见 Richard Sicotte,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tical Respons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hipping Act of 1916,”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9, no. 4, December 1999.

^⑦ Paul Koistinen, “The Industrial-Military Complex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orld War I,” *BHR*, Winter 1967, p. 385.

^⑧ Hughes (1991), p. 211.

^⑨ *Ibid.*, p. 131.

^⑩ Radosh and Rothbard (1972), pp. 75—76.

20年代,商务部在赫伯特·胡佛的领导下继续制订新标准计划。

在大多数情况下,战争给养的所有权问题都由组建半公共企业来完成。美国谷物公司,按照特拉华州法律组建,购买粮食和其他商品以稳定价格,并且储存盈余商品。美国房屋公司,依照纽约州法律组建,用政府的资金供应防御工事用房。紧急船队公司,在哥伦比亚区组建,面对的巨大问题是建设造船厂,组织原料和招募工人来组成大规模海洋运输舰队。最后,战时金融公司用联邦资金给私人工业签发银行贷款。

因为联邦政府没有生产的传统,或者说生产性资源的所有权不是联邦军械库,这些半公共企业转而用另一种传统方式寻求解决方案:他们因循美国第一、第二银行的制度,实行公私合营。尽管在巴拿马海峡地区的铁路完全是政府所属的企业,但主要经营方法还是设立州授权的公司,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私有的。统制经济谨慎前行,正是纸上描述的那副样子。

通过发放许可,没有竞争投标的采购,紧急管制,必要领域的直接夺取,政府能够在短期获得合意的产量,而这是市场很可能不能自主提供的。军用的劳动力被征入伍,私人部门的劳动力大多被贿赂了。通过满足其合理的需求,或者通过战时劳工委员会在管理和劳工仲裁下强制安置,劳动力得到了安抚。^① 联邦政府接管了电话和铁路系统,而且为适应持久战实施了它自己的管理规则。

战时劳工委员会通过政府的领域维护工会的代表性。还建立了战时劳工政策委员会来协调联邦政府在劳工领域的行动。到1918年,联邦政府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单个劳工雇主。^② 当州通过法律来抵制工会对工人的诱惑时,律师总会要求美国律师为受指控的工会组织者辩护。正如所引用的那样,在政府部门就职的工人是8小时工作制,工会则认为这是想当然的事情。政府想要产量;它不希望劳工抵制。

通常,政府权力确定价格的目标是为了保证交付,所以价格倾向于是最低价格。由于基本谷物的产量在战争期间几乎根本没有增长,因此没有任何针对这个结果的政策配合,食品价格出现通胀是完全有可能的。在其他领域,比如钢铁产量,产出确实激增了,在维持和提高价格方面联邦的固定价格和最低价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③

一个有趣的例外是蔗糖。蔗糖有两个市场——国外市场(主要是古巴)和国内市场。在同盟国中组织了一个国际糖类委员会,作为在国外市场上的垄断买者,迫使海外卖方以较低价格发货。如果古巴人不这么做,他们从美国的食物进口就会被中断。他们屈服了,继续以低价格销售蔗糖。

另一方面,美国的甜菜糖种植者想要较高的价格。为了迎合他们的需要,糖类平衡委员会成立了,它将便宜的古巴蔗糖以足够高的价格销售给美国炼糖商,以保持国内种植者的最低限价。^④ 在1916—1918年间,在这种体制之下,糖类零售价格只上升了大约

① Edwin Witte, "Strikes in Wartime: Experience with Control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24, November 1942.

② Karl Brent Swisher,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4), pp. 596—598.

③ Robert Cuff and Melvin Urofsky, "The Steel Industry and Price-Fixing During World War I," *BHR*, Autumn 1970. 以下研究对这一时期的宏观经济学进行了总结: Hugh Rockoff, "Until It's Over, Over There: The U. S. Economy in World War I,"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0580, June 2004.

④ Radosh and Rothbard (1972), pp. 85—88.

21% (小麦价格上升了60%)。但是在1918—1920年两年间,控制终止之后,糖类价格大幅上升了。然后糖类交易量下降了(见表22.7)。

表 22.7 美国糖类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以及进口糖的平均价格

年份	零售价格	批发价格	进口价格
1914	0.06	0.05	0.02
1915	0.07	0.06	0.03
1916	0.08	0.07	0.04
$\frac{1916 \text{ 价格}}{1914 \text{ 价格}} \times 100$	135.6	146.8	205.0
1917	0.09	0.08	0.04
1918	0.10	0.08	0.05
$\frac{1918 \text{ 价格}}{1916 \text{ 价格}} \times 100$	121.3	113.0	114.6
1919	0.11	0.09	0.06
1920	0.19	0.13	0.14
$\frac{1920 \text{ 价格}}{1918 \text{ 价格}} \times 100$	200.0	162.8	293.6
1921	0.08	0.06	0.04
1922	0.07	0.06	0.03
$\frac{1922 \text{ 价格}}{1920 \text{ 价格}} \times 100$	37.6	46.5	18.8

注:所有价格都是每磅的美元价格,近似到分。比例的计算都将价格凑整。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e 221, Ee 595, 596; U. 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ulletin 396, *Reatil Prices, 1890 to 1924*, pp. 8—10.

古巴人的糖类贸易显然被1916—1918年间进行的战争终止了。在控制结束后的1918—1920年,古巴获得了利益,但是随后的两年糖类价格下跌了80%。政策的目标是给外国人的价格低于国内价格条件下保证供给;这样,糖类平衡委员会是个辉煌的成功。幸运的是,当时美国并不需要古巴的善意。

4. 战时控制的合法性

伍德罗·威尔逊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是一个竞争性市场的热情拥护者。他拥护那种能够限制他所认为的大企业的潜力的政策。在战争期间,美国大公司的信誉和合作是必需的。德国人不是被夫妻杂货店击败的,也不是被在竞争性投标中获胜的小公司生产的枪炮、轮船、坦克、飞机和军火击败的。它是一场现代战争,统制经济把军事—工业联合在一起,为战争作出了贡献。但当战争结束时,威尔逊希望立刻回到战前的状态。他命令新的统制经济解体,于是,这一体系开始迅速消失。政府对有组织的劳工的战时支持也同样是短暂的。在1919—1920年的劳工动乱中,政府重新充当了调停者的角色,

劳工联合会被击败了。他们的会员大幅减少。^⑤

4.1 废除官僚机构

政府内外的许多人,都认为在企业和工业部门实施的合作,以及政府指导(和资助)制度优于战前竞争经济的旧的残酷竞争趋势。但威尔逊很快转向废除统制制度。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停战条约在1918年11月11日签署,不到两周之后的11月23日,威尔逊命令 WIB 清理并结束其事务。^⑥

1919年早期,为了维护战时的“秩序”,商务部设立了一个联合政府和私人部门的产业委员会。产业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稳定价格,当这个问题变得清晰起来的时候,威尔逊命令其解散了。巴鲁克和其他人希望战时体制再继续一段时间,但暂时在华盛顿的实业家迅速打包回家了,特别是在这一点已经十分清晰之时:作为这个体制基础的战时总统权力已不存在。^⑦从任何一方面来看,1918—1920年的繁荣都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并不是经济繁荣所必需的。

通过在哈默诉达根哈特案(1918)中废除1916年的《童工法案》,以及在阿德金斯诉儿童医院案(1923)中废除工资和小时立法,美国最高法院帮助将战时制度推向被暂时忘却的地步。它还在沃尔夫包装公司诉工业关系法院案(1921)中结束了各州层面上对价格的战时控制。似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历史书来说太苛刻了。

4.2 合法性

尽管得到了教训,但在一战期间发生的事情不会被忘记。WIB在1933年以全国恢复管理局(NRA)的面目重新出现。^⑧美国谷物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商品信贷公司重新露面。食品管理局的计划重新出现两部农业修正法案。紧急船舰公司又作为国家海事管理局回来了。20世纪30年代的联邦房屋管理局,最初成立时叫战时美国房屋公司。利弗法下的燃料管理局在20世纪30年代重现时是内务部煤烟局。参议员约瑟夫·古非(D-PA),在创建新政法律管理煤炭和石油产量及价格方面的关键性人物,曾是 WIB 石油部门的领导人。

一战时的机构在20世纪30年代和(或)后来的二战中重新出现,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而战时制度下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其中任职。赫伯特·胡佛本人是一个最著名的例子。还有许多其他例子。杰拉德·斯沃普(Gerard Swope),通用电气的执行主席,他的思想后来在 NRA 和社会保障立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基础作用,他曾在 WIB 的巴鲁克手下工作。巴鲁克本人是在30年代的危机中主张重建战时制度的永不知疲倦的计划者和热情拥护者。莫林犁(Moline Plow)的两任执行主席,乔治·匹克和休·S. 约翰逊将军,都曾在 WIB 的巴鲁克领导下任职,而后又在新政内阁服务。匹克是农业修正管理局的首任领导人,约翰逊是 NRA 的领袖。新政主义者里昂·亨德森,在二战时任价格管

^⑤ Edward Berkowitz and Kim McQuaid, *Creating the Welfare State* (1988), p. 59.

^⑥ Robert Himmelberg, "The War Industries Board and the Antitrust Question in 1918," *JAH*, June 1965.

^⑦ Berkowitz and McQuaid (1988), p. 58.

^⑧ 关于这些和其他的例子,参见 Leuchtenberg (1967)。

理局办公室主任,曾于1918年在WIB的军需品部门服务。还有很多的例子。^⑨

经济动员的经验教训没有被丢弃,当新危机来临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紧急机构及了解这些机构的人们被重新召回历史舞台。

但是1918年之后的十多年,美国似乎创造了一个新的高水平的持久繁荣,而这与战时经验没有什么关系。

推荐阅读

文章

Baack, Bennett D., and Edward John Ray. "Special Interests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Income Tax in the U. 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5, no. 3, September 1985.

Brownlee, W. Elliot. "Income Taxation and Capital Formation in Wisconsin, 1911—1929."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8, no. 11, Fall 1970.

Cuff, Robert D., and Melvin I. Urofsky. "The Steel Industry and Price-Fixing During World War I."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44, no. 3, Autumn 1970.

Higgs, Robert. "Crisis, Bigger Government, and Ideological Change: Two Hypotheses on the Ratchet Phenomen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2, no. 1, January 1985.

Himmelberg, Robert F. "The War Industries Board and the Antitrust Question in 1918."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52, no. 1, June 1965.

Koistinen, Paul A. C. "The Industrial-Military Complex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orld War I."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41, no. 4, Winter 1967.

Kool, Clemens J. M. "War Finance and Interest Rate Targeting: Regime Changes in 1914—1918."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2, no. 3, July 1995.

Leuchtenberg, William E. "The New Deal and the Analogue of War." In John Braeman et 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Rockoff, Hugh. "Price and Wage Controls in Four Wartime Period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2, June 1981.

书籍

Berkowitz, Edward, and Kim McQuaid. *Creating the Welfare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wentieth-Century Reform*.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Praeger, 1988.

Brownlee, W. Elliot. *Federal Taxation in America: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Hardach, Gerd. *The First World War, 1914—191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Higgs, Robert. *Crisis and Leviathan: Critical Episodes in the Growth of American Govern-*

^⑨ Radosh and Rothbard (1972), pp. 95—97.

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Hughes, Jonathan. *The Governmental Habit Redux: Economic Control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Nelson, L. Keith. *The Impact of War on American Life: The Twentieth-Century Experienc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1.

Radosh, Ronald, and Murray N. Rothbard, eds. *A New History of the Leviathan: Essays on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e State*. New York: Dutton, 1972.

Rockoff, Hugh. *Drastic Measures: A History of Wage and Price Contr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Studenski, Paul, and Herman Krooss.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cGraw-Hill, 1952.

Wilkins, Mira. *The History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4—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第 23 章

“常态”:1919—1929 年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经济经历了一次过山车似的变化,首先是 10 年的似乎是无限制的经济增长,随后是 10 年的令人困惑和失望的经济萧条。然后再次爆发的战争为总的经济变化提供了必要条件。

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期包含了许多不确定的事件,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学家可以更加成功地描述这一时期,而不是解释其原因。这种不足是令人吃惊的。大量的文字已经描述这时期的很多事件,但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即是什么导致了 1929 年的证券市场崩盘并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有许多——或者是非常多——的解释,但是并没有得到一致意见。

1919—1930 年的这段时期是战后普遍繁荣的一个时期。从许多方面来讲,即使是 1929 年也是经济非常繁荣的阶段,1930 年大部分时间的经济状况也很难令人预想到接下来会发生经济萧条。到 1931 年,经济突然陷入萧条,直到 1941 年末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经济也没有完全恢复。当时的政治人士找不到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次萧条,它具有神秘的组合特征:高失业率和低水平投资。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这次灾难可能就是建立在 20 年代的经济繁荣发展的基础上。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次经济危机就从来没有被认识清楚。

下一章将会讨论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经济中的几个缺陷。但是这些问题,就其本身来说,并不能回答接下来发生的经济低迷。1929 年发生的股市大崩盘则被认为是能解释接下来发生的经济危机的主要事件。但是并没有形成一种能够完全来说明经济危机成因的解释,可能需要很多事件来解开经济危机的神秘面纱。这一章将会叙述一些导致经济危机的事件以及经济危机本身。

1. 收入分配

从某种程度上讲,个人所得税和其他战时金融措施必须平衡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要准确了解战争前的数据是很困难的,因为几乎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任何统计数据。根据杰弗里·威廉姆森和彼得·林德特的描述,收入和财富的不平衡的增长路径基本上未受到损害。^① 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在殖民地时期就出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第 3 章看到;尽管其发展在整个历史时期并不是一直固定不变,但是它是这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持久特点。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这种似乎一直会发展下去的不

^① Jeffrey Williamson and Peter Lindert, *American Inequality: A Macroeconomic History* (1981), chap. 12.

平等的趋势被打破了。战争时期的动员增加了劳动力的收入分配,但是当和平再次到来时,这种旧的模式又恢复了。一旦战争对劳工的过多需求已经过去,其他分配方面的优先权就要考虑了。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对收入分配的估计表明,在1922年大约总人口前1%的富人取得了13.4%的全国税前货币收入。这一比率在1929年上升到了14.5%。相似地,家庭财富的分配也是如此,占有财富总量为前1%的人口获得的财富分配比率从1922年的40.1%上升到了1929年的48.3%。^②但是1929年后,开始了长期的经济下滑。由于财富是一段时间内净储蓄的和,因此发现财富的不平等部分反应了收入和储蓄的不平等就不足为奇了。正如从多的收入中节约金钱比从少的收入中节约更容易,其他事情也是一样的。

获得的收入的证据显示,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不平等在扩大,但是这种不平等性扩大的程度仍存在争议。^③在20年代的收入增加的不平等意味着消费支出的减少,即使个人的收入在继续增加。在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和1929年到1932年的经济不景气时期,大家对于未来的消费支出的判断都是肯定地下降。这次巨大的经济危机带来了根本的变化,包括对利息收入征收高比率的税收,以及提高低收入工人的收入能力等,这些将会逐一讨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收入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发展的趋势才得到逆转,并向着更平等的方向发展。西蒙·库兹涅茨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收入不平等开始时是扩大的,但是这种不平等在后期开始下降,这一观点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④

2. 20世纪20年代的扩张

可以用“沸腾的20年代”这个词语来形容这10年:爵士乐、贩卖私酒、黑帮、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亨利·路易斯·门肯(H. L. Mencken)、贝比·鲁斯(Babe Ruth)、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这些仍然是我们经济和社会历史中的一个传奇。^⑤是什么造就了这个传奇?

2.1 禁令

我们首先谈一下20世纪20年代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如果确实有什么影响的话,它对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那就是国家禁令。当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②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Be 19, 40.

^③ Charles Holt, "Who Benefited from the Prosperity of the Twenties?" *EEH*, July 1977, p. 283. Gene Smiley, "Did Incomes for Most of the Population Fall from 1923 Through 1929?" *JEH*, March 1983. Gene Smiley and Richard Keehn, "Federal Personal Income Tax Policy in the 1920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5, no. 2, June 1995, 认为20世纪20年代税率的削减成功地将财富避税最小化,他们证明了一战时期的这个现象。对这个争论作出的最近的贡献,参见 Smiley's "A Note on New Estimat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the 1920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0, no. 4, December 2000.

^④ Simon Kuznet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ER*, March 1955.

^⑤ George Soule, *Prosperity Decade* (1947).

国会起草了战争时期禁令,以确保有足够的粮食供应。^⑥ 同年,该禁令以 2/3 的投票通过,这正是提交给各州的国家禁令获得通过所必需的。1919 年的 1 月,3/4 的州批准了国会的第 18 号修正案。同年 10 月,国会通过了国家禁令法案,或者叫更著名的《沃尔斯特法案》(Volstead Act),这为实施该修正案提供了依据。因此,从 1920 年 1 月开始,国家禁令成为一项法律。但这并不是一种新思想。例如,芝加哥节制会早在并入美利坚联邦之前的 1833 年已经成立。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WCTU)在 19 世纪后期拥有 15 万多名成员。到 1920 年 1 月,32 个州都通过了相同的法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禁令的热情改变了,到 1933 年 12 月这项禁令被废除了。

这一社会措施是否降低了酒精饮料的消费呢?从地下酒吧、不受传统约束的年轻女子以及爵士乐的情形可见上述答案是否定的。杰弗里·米龙(Jeffery Miron)和他的同事们认为“禁令对人均的酒精消费几乎没有影响”。^⑦ 当然,并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准确统计数据。利用各种数据,包括民众没有成为酗酒者和动脉硬化者的统计数据,米龙和他的合作者们发现禁令产生明显的短期作用,但长期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或者说这种长期作用几乎为零。动脉硬化在禁令实施后下降了 10% 到 20%。他们认为,在某些合理情景中,酒精的消耗量可能增加了。

佩里·杜伊斯(Perry Duis)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的研究比较了在禁令出台前波士顿和芝加哥 40 年间的公众饮酒情况。^⑧ 从 1900 年开始,杜伊斯注意到地方出台严格规定后,酒吧的受欢迎程度已经下降。售酒执照的价格上升以及新的事物,特别是电影替代了饮酒作为公众消遣的去处。20 世纪初期掀起了住到市郊的浪潮,住在市郊并每日往返于市区上班者禁止销售酒精,这也降低了酒吧的流行程度。酒精消费,至少是公众场合的酒精消费开始有下降的趋势。杜伊斯的工作表明,显然在 1971 年以前禁令所说的整体的喜好饮酒的情况并不存在,但对那种某个特定区域人群的喜好的影响(如小范围区域的人群的选择,可能是一个行政区域,是否允许酒精销售)是有作用的。

显然一开始酒精禁令并没有抑制酒精的消费。联邦政府随后又制定了更严厉的措施,为了达到目的,从 1921 年到 1930 年分派了超过原来 2 倍的人员。禁令取消了酒类税收这一在各级政府都是重要税收来源的税种。但禁酒令支持者们预期的结果并没有实现,生产率并没有立即上升,旷工人数也没有立即下降。联邦政府也没有观察到违法交通事故的减少。尽管艾略特·内斯(Eliot Ness)和其他财政官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艾尔·卡普诺(Al Capone)最后还是因为逃税而不是酗酒被判有罪。所有这些,加上这项禁

⑥ 下列文献对禁令的政治影响做了简要概括:John Gerring, "Culture Versus Economics: An American Dilemma,"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 23, no. 2, Summer 1999.

⑦ Jeffrey Miron, "The Effect of Alcohol Prohibition on Alcohol Consumpti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7130, May 1999, p. 21. Jeffrey Miron and Angela Dills, "Alcohol Prohibition and Cirrhosis," *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 Review*, vol. 6, no. 2, Fall 2004; Jeffrey Miron, Angela Dills and Mireille Jacobson, "The Effect of Alcohol Prohibition on Alcohol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Drunkenness Arrests," *Economic Letters*, vol. 86, no. 2, February 2005. 少数研究禁令期间酒类消费问题的学者,其中之一是 Clark Warburton, *The Economic Results of Prohib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1)。还参见 Mark Thornton, *The Economics of Prohibition*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91)。

⑧ Perry Duis, *The Saloon: Public Drinking in Chicago and Boston, 1880—192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883)。

令对整个社会的负外部性作用,导致许多市民相信社会从禁令中得到的收益远远小于其社会成本。禁令实施后产生很多没有预期到的负面结果,如饮用酒精更具有危险性(私烧锦酒)、犯罪率在上升、有组织的犯罪变得越来越突出、公共官员的腐败程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对罪犯公平审判的制度无限制地扩展。而且之前酒类产业大量就业的领域,如密尔沃基的啤酒厂、纳帕谷的饮料厂和路易斯维尔市制酒厂,受到了相反的影响。在1932年的选举中,民主党人支持废除第18号修正案。1933年2月在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的选举中,美国众议员和参议院都投票通过将该修正案提交各个州来废除禁令。到12月,3/4的州批准了第21号修正案,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取消的修正案。

少数几个州在禁令废除后仍执行禁酒令,直到1966年,所有州都废除了禁酒令。酒精的控制权由当地政府掌握,比如,某一个选区可以投票是否禁止酒类销售,或者某个城市可以将售酒所需的许可证的颁布与食品购买联系在一起。似乎没有一个州急着要恢复当初的国家禁酒令,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出售其他药品的全国禁令已经或正在尝试。如果禁酒令对经济没有任何影响,那么当时社会的一些积极情形,以及经济向与20世纪20年代相联系的“常态”的回归,该用什么来解释?

2.2 消费品信贷和耐用消费品

玛莎·奥尼(Martha Olney)的著作为人们了解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这个时期,消费者的家庭需求发生了剧烈转变,转而从信贷方式购买耐用消费品。^⑨在20世纪的前10年,利用可靠的电力、内燃机(和微型马力机)制造的产品涌入市场。电力和内燃机当时成为一种通用技术(general-purpose technologies),是大规模生产和加工所不可或缺的。^⑩汽车、收音机、洗衣机、电冰箱以及其他许多新的家庭用小电器的出现,为普通家庭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明亮世界。美国人精神饱满地用分期付款计划来购买这些耐用的消费品。代替了通过已赚取的收入购买这些物品的方法,消费者通过签署合同并且支付分期付款中的首笔付款后就可以拥有物品(通过抵押)。消费者使用这些物品的同时每个月需要支付一定的现金,这就降低了他们在其他商品上的消费数额。事实上这是一种新的储蓄:对未来消费的购买,是对资产的投资,替代了其他形式的储蓄。

结果,消费者的耐用消费品购买每年上升了8.3%,几乎是1922年到1929年GDP和消费增长的2倍。到了1925年,75%的汽车、70%的家具、75%的收音机、90%的钢琴、80%的留声机、80%的家用电器都是通过分期付款购得。通过国家财政机构的改革后的财政支持和消费者可以先享受后付款的激励,一种持久的新的“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出现

^⑨ Martha Olney, *Buy Now, Pay Later: Advertising, Credit, and Consumer Durables in the 1920s* (1991). 对电器和自动器具普及率的一项有趣研究,参见 Sue Bowden and Avner Offer, “Household Appliances and the Use of Time: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Since the 1920s,” *HER*, November 1994.

^⑩ Timothy Bresnahan and Manuel Trajtenberg,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Engines of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 65, no. 1, January 1995, 他们定义的通用技术(GPT)具有内在潜力实现技术进步的特征,在“创新互补”中其使用者发现,GPT的改变为那些在自有技术方面寻求改变的人们创造利润机会,而且如正文所讨论的,是普遍的。

了。消费者耐用品消费的革命为美国 20 世纪 20 年代的经济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甚至亨利·福特也规定他的汽车可以通过分期付款计划购买。^①

这些新的耐用品为二手消费品的发展提供了新市场,其中有部分二手品是由于不能完成分期付款而被收回的物品。当经济下滑时,人们很简单地选择了停止分期付款。而随着市场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二手商品,新商品的生产就不得不减少。但是,这更应该说是经济危机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危机的起因。就像下一章将会探讨的一样,时间调配的错误是引起经济危机的关键。

2.3 产量和价格

和其他大部分商品一样,20 世纪 20 年代的汽车制造量急剧增加。在 1921 年的经济衰退到 1929 年的股市崩盘期间,制造业产量将近增加了一倍。价格却异常稳定,但根据现代的标准可以确认 20 世纪 20 年代的货币扩张程度是温和的。

看一下表 23.1 的数据。在价格和经济活力的两次急剧逆转之间,经济扩张减缓了。1920—1921 年的经济衰退是短暂而剧烈的。事实上,将 1920—1921 年与 1929—1930 年价格下降程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前者下降得更多一些。货币供应量也是相同的情况。在 1921 年的衰退中,政府很少公开实施的补救很少。但艾尔姆斯·威克尔(Elmus Wicker)认为美联储碰巧在高利率水平下维持了银行的高流动性而缓冲了经济下滑。^② 大部分一战时期产生的通货膨胀在 1921 年的衰退中消散了,当复苏来临时,价格又急剧上升了。

表 23.1 1919—1930 年货币、价格与制造业生产

年份	M_2^a	批发价格	消费价格	制造业生产指数
		(1967 = 100)		
1919	\$31.01	71.6	51.8	15
1920	34.80	79.6	59.9	15
1921	32.85	50.3	53.6	12
1922	33.72	50.0	50.3	15
1923	36.60	52.1	51.2	18
1924	38.58	50.6	51.2	17
1925	42.05	53.6	52.4	19
1926	43.68	51.8	53.0	20
1927	44.73	49.1	52.1	20
1928	46.42	50.0	51.2	21
1929	46.60	49.1	51.2	23
1930	45.73	44.6	50.0	19

^a 单位是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c 1, 66, Cj 45, Dd 498.

^① Lendol Calder, *Financing the American Dream: A Cultural History of Consumer Cred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是从消费者文化角度对这个主题做的一项近期补充研究。

^② Elmus Wicker, "A Reconsideration of Federal Reserve Monetary Policy During the 1920—1921 Depression," *JEH*, June 1966.

从1921年到1929年,制造业的产量增加只经过一次小的减速(1924年的轻微衰退),然后是1926年到1927年的回升。由于面临着实际产量的强劲扩张和从1921年开始的相对较慢的(但仍然是显著的)货币供应的增加,总销量和消费价格特别平稳。从战争年代开始的直接投资和剩余产能的迅速增长,使得无通货膨胀的真实增长成为可能。尽管货币的供应量从1920年的低水平增加了大约20%左右,但价格实际上却下降了。工资上涨的同时消费品价格却比较稳定,从1922年到1929年平均产业工资增加了17%。^⑬ 即使在经过股市崩盘的1930年,从该年度的实际货币供应量和价格趋势也无法预知将要发生的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

2.4 GDP和失业率

表23.2显示了从1919年到1930年的GDP和失业率情况。除了经济衰退的两个年份(1921年和1924年),平均失业率小于5%。在20世纪,经济繁荣发展和一些技术和冲突导致的工作中中断及季节性的失业,使得失业率维持在一个低的水平。在1919年、1923年、1926年和1929年,从字面定义上可以认为实现了充分就业。

表 23.2 1919 年—1930 年失业率, GDP 和联邦财政情况

年份	失业劳动力 百分比	国内生产总值			联邦政府	联邦政府	盈余(+)
		以当前 价格计算 (10 亿美元)	1996 年的 价格计算 (10 亿美元)	1996 年 人均价格 (10 亿美元)	收益 (10 亿 美元)	支出 (10 亿 美元)	赤字(-) (10 亿 美元)
1919	2.3	76.6	583.8	5 556	5.1	18.5	-13.4
1920	5.2	87.1	575.0	5 401	6.6	6.4	+0.2
1921	11.3	73.9	560.9	5 168	5.6	5.1	+0.5
1922	8.6	72.9	594.4	5 401	4.0	3.3	+0.7
1923	4.3	84.9	673.5	6 016	3.9	3.1	+0.8
1924	5.3	87.0	690.1	6 048	3.9	2.9	+1.0
1925	4.7	91.3	711.8	6 145	3.6	2.9	+0.7
1926	2.9	97.5	755.3	6 433	3.8	2.9	+0.9
1927	3.9	96.8	763.4	6 415	4.0	2.9	+1.1
1928	4.7	96.8	769.9	6 389	3.9	3.0	+0.9
1929	2.9	103.7	822.2	6 752	3.9	3.1	+0.8
1930	8.9	91.3	751.5	6 106	4.1	3.3	+0.8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Ba 475, Ca 9—11, Ea 584, 585.

1921年、1922年、1924年和1930年的高失业率情况反映了经济特点的一种自然的调节,因为这时期的联邦政府并没有进行缓冲经济的行为。资源以及工人们马上进入了失业状态,价格下降,工资降低——更加有效的就业措施必须考虑这些因素,以确保经济发展。这一观点为大部分经济学家所信服并成为熊彼特伟大周期分析体系的基础,这部分已经在第17章论及。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状况完全符合他的分析。^⑭

^⑬ David Brody, *Workers in Industrial America* (1980), p. 62.

^⑭ 参见 Tom Nicholas, "Why Schumpeter Was Right: Innovation, Market Power,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in 1920s America," *JEH*, December, 2003.

在1921年的经济萧条和1929年之间,真实GDP(1921年价格)增长了59.3%,相当于年平均增长6%。从实际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经济发展,保持价格稳定的同时工资收入在提高,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充分就业。即使这样,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也越来越不平衡。

1920—1921年的经济快速下滑导致一年中的失业率达到6.5%和总体价格下降37%,但GDP却只是下降了8.7%。^⑮1920—1930年真实GDP下降了9.9%,几乎是14%甚至更多,尽管价格下降很少(见表23.1)。1930年失业率开始上升,该数字大概是1929年失业率的3倍,但仍远低于1920年和1921年经历过的状况。1929—1930年间,货币的供应量下降了3%,相比1920—1921年下降了惊人的9.3%。^⑯

在这一阶段的末期,通过分析可以判断近期将会发生经济衰退,但程度会比1920—1921年的轻微。而且可以合理推断和确信经济将会恢复。^⑰如果我们不知道20世纪20年代个人可支配收入是非常不均衡地增加,那人均GDP增加的数值代表的是非常全面的发展。如果单独以人均GDP增加作为经济健康的指标(而且通常大家这样判断),1921—1929年GDP增加了42%,显示一种非常健康的经济状况。事实上,一场风暴马上就要来临了。

本章开始讨论的收入分配情况表明这种考虑是个幻觉。小岛哈里(Harry Oshima)指出,20世纪20年代由分马力和内燃机相结合带来的机械化发展,使得当时对无技能的工人、甚至是有技能工人的需求急剧下降。在20年代的后期“技术失业”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这些因素必然对20年代的收入分配变化产生了影响。^⑱

2.5 财政结果

1919年后,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导致了通货紧缩。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可以在表23.2的最后一列中看到,接近1亿美元。1919年还有战争留下的134亿的财政赤字,但随后每一年的财政预算都是盈余。净结果是温和的通货紧缩。1919年的财政赤字相当于当年GDP的16%。当美联储购买政府发行的国债时,就是对通货膨胀的强有力刺激。但随后发生的1921年的经济衰退驱散了这些问题。只有1924年和1927年的政府财政预算产生了盈余,为GDP的1%。

从南北战争到1919年,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从来没有在一年中达到10亿美元。但是,随着1913年新收入税的实施,联邦政府的财政资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根据帕金森第三定律,“提高支出以和收入一致”,联邦政府的支出就再也没有低于10亿美元。就像那个世纪的所有美国战争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上了

^⑮ John Pilgrim, "The Upper Turning Point in 1920: A Reappraisal," *EEH*, Spring 1974, 他将1920—1921年的下滑主要归结为货币紧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战后扩张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供给瓶颈,参见K. D. Roose, "The Production Ceiling and the Turning Point of 192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8, no. 3, June 1958.

^⑯ 对于这段时期的插曲和当时的联储政策的说明,参见威克尔(Wicker, 1966)。

^⑰ Joseph Swanson and Samuel Williamson, "Estimates of National Product and Income for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1919—1941," *EEH*, Fall 1972, 揭示了1922年全年的GNP数据,但没有国民收入、个人收入或者失业数据;参见表3, p. 59。

^⑱ Harry Oshima, "The Growth of U. S.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Significance of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Early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JEH*, March 1984.

一个大台阶。

2.6 农业部门

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通常判断是农业部门是导致前所未有的30年代经济大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知道,甚至在19世纪后期农民已经相信他们自己落伍了。平民起义以及后来的革新标志着农业的不满情绪。在20世纪20年代,农业部门对联邦政府的特殊对待方式再次表现不满。1922年,通过《卡帕-沃尔斯特法案》,农业集团的游说议员们成功地消除了农业合作社反托拉斯指控的威胁。这一议案为这些组织进行产量限制和固定价格铺平了道路。^①

联邦政府一直在为进口货物尽量提供财政补贴。柯立芝总统和胡佛总统都否定了豪根-麦克纳里条例草案来寻求这种支持;1933年罗斯福总统签署了成立进出口银行的议案。

农民希望联邦购买全部粮食,在市场上制造人为的短缺。后者的计划是平民主义所喜欢的,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利弗法下获得了部分的成功。1929年,胡佛总统迫于压力,在农业市场法和联邦农业委员会的要求下,出台规定,贷款5亿美元进行农场合作计划以稳定这些人群。到1930年,农业委员会拥有国家1/3的小麦供应,以所得的利益支持农业收入。^②农民明显地感到受委屈,为什么呢?

20世纪20年代农业问题的经济历史可以从表23.3快速浏览。大部分的数据根据1920年(战后经济周期的顶峰)的数值换算成倍数关系。在第1栏中,我们注意到1921年农业产量下降得非常厉害,但那是价格下降的结果,第2栏中的农业产量就下降得比较少。在整个时期产量的增加是比较适中的,1929年的产量只比1920年高16%。但是,由于农业产品价格的快速下降,农民纯收入远远落后于1920年并且一直没有恢复。^③农业价格与非农业价格比较,1919年到1921年下降的幅度非常大(第8栏,农场的净实物贸易条件),但是其后在缓慢地恢复直到1930年。缺乏产量扩张意味着即使农业收入从1921年的低点开始增加,但它从没有达到1919年的收入水平,甚至连1920年的收入情况也达不到。所以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农业在整个国家收入中占的比率正逐渐地下滑。

在1920—1922年间,衡量农业收入的固定支出增长得非常迅速(第10栏和第11栏)。即使在1920—1921年的经济衰退后,严格的贸易条件的实施使农民收入大大改善。但利息收取和对房地产的税收降低了农民的收入(就像房地产的债务),使得美国农业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一系列南部的银行在这次的困难时期相继倒闭,但是正如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货币主义者认为一系列银行的倒闭并不是导致经济大萧条的主要原因。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概述,参见 Bruce L. Gardner, *American Agricul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002)。关于农民对联邦政府的诉求的有趣讨论,参见 Elizabeth Hoffman and Gary Libecap, "Institutional Choi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 S. Agricultural Policies in the 1920s," *JEH*, June 1991。

^② Martin Fausold, "President Hoover's Farm Policies 1929—1933," *AgHist*, April 1977。

^③ Alston, "Farm Foreclos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Interwar Period," *JEH*, December 1983。

表 23.3 农场经济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农场名义产量	农场真实产量 第1列/ 第7列	农场净收入	每英亩利息	每英亩税收	农场主得到的价格	农场主支付的价格	农场主净交换的贸易条件 第6列/ 第7列	农场产出占GDP的百分比	利息占农场收入的百分比 第4列/ 第3列	税收占农场收入的百分比 第5列/ 第3列
1919	105.0	102.1	116.5	83.3	80.0	102.8	92.1	111.1	21.7	2.0	1.8
192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8.1	2.8	2.6
1921	58.5	99.5	43.2	114.8	122.0	58.8	72.4	80.8	12.5	7.4	7.2
1922	64.5	103.9	55.7	120.4	129.5	62.1	70.6	87.9	14.0	6.0	6.0
1923	71.4	106.0	65.0	120.8	130.5	67.3	74.3	89.9	13.3	5.1	5.1
1924	72.5	106.9	62.3	115.7	133.0	67.8	74.8	89.9	13.2	5.1	5.9
1925	83.6	113.1	86.4	109.3	132.5	73.9	76.2	97.0	14.5	3.5	3.9
1926	78.7	114.6	76.2	105.6	135.0	68.7	75.2	90.9	12.8	3.8	4.5
1927	77.8	116.4	73.1	103.2	135.5	66.8	74.3	89.9	12.7	3.9	4.8
1928	81.4	115.2	76.8	101.4	138.5	70.6	75.7	92.9	13.3	3.7	4.6
1929	81.7	116.4	78.9	98.6	139.5	70.1	75.2	92.9	12.4	3.5	4.5
1930	65.4	110.5	54.6	95.4	140.5	59.2	71.5	82.8	11.3	4.8	6.6

注:第1—8列以1920年为基数。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a 10, Da 1063, 1295, 1337, 1340, 1343, 1344, 1346.

因此,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农业灾难确实深深植根于20年代的经济发展的之中。^②1899年和1919年之间出现的农产品高价格为之前出现的许多问题提供了一次暂时平息的时机。但是20世纪20年代农业遇到了许多困难,特别是长期的债务和税收负担,使得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排斥农业的潮流。

2.7 建筑、人口和移民

使得每个作者几乎都能注意到一场巨大灾难的不祥信号是20世纪20年代的建筑业繁荣发展,并且在1925—1927年达到了巅峰,提早出现于股市大崩盘。这一情况可以从表23.4中看到。

表 23.4 1919—1930 年建筑业生产的价值

年份	总的新建筑	许可证 (1930年=100)	成本指数 (1967年=100)
1919	6.3	81.9	30
1920	6.7	87.6	37
1921	6.0	107.6	30
1922	7.6	167.6	27
1923	9.3	212.7	30
1924	10.4	213.3	30
1925	11.4	252.3	30

^② 关于20世纪20年代农业问题的更详细分析,参见 Thomas Johnson, "Postwar Optimism and the Rural Financial Crisis of the 1920s," *EEH*, Winter 1973—1974.

(续表)

年份	总的新建筑	许可证 (1930年=100)	成本指数 (1967年=100)
1926	12.1	239.6	30
1927	12.0	214.4	30
1928	11.6	199.1	30
1929	10.8	187.3	30
1930	8.7	100.0	29

注：建筑价值的单位是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c 1, 110, 207.

到处可见建筑施工情况,建筑业命运的改变立即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在美国经济中建筑业有比较长的持续周期(18—22年)。事实上,阿瑟·伯恩斯(Arthur F. Burns)和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C. Mitchell)在《衡量商业周期》一书中总结到,建筑业周期在美国经济中是最有规律和明确界定的。^② 20世纪20年代的建筑业大繁荣使建筑业创造的总收入增加了80%。从1919年到1926年,新的建筑许可证的价值惊人地上升了192%。

然后建筑业的繁荣开始衰退。但这并不是因为建筑成本的上升,事实上,综合成本指数显示建筑成本保持比较稳定。需求实际上在减少,尽管很缓慢但很残酷。^③ 在第16章已经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立法上规定减少入境的移民数量。从表16.6可以看出,迁入移民率在20世纪的第一个20年是每千人口10.4人。这个比率只有20年代的1/3,30年代的1/25。这样就减慢了人口增长率。从1890年到1915年,每年的总居住人口增长率少于2%,但是1919—1929年这10年的人口增长率在1.5%左右。美国年轻人在战争中死亡的人口(1918年的人口出生率是负值)和迁入人口的减少,导致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家庭组成比率在下降。^④ 但建筑业并没有观察到这一减少现象。到了20年代的中期,建造的房屋数量超过了需求量,而且人们经历了经济衰退后收入也在减少。我们在下一章中将会论及,这种需求的下降是固定投资减少的因素之一,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可能是导致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之一,但其影响尚不足以产生经济大萧条。

3. 金融部门

20世纪20年代的事件归结为农场和建造业的衰退是一种老掉牙的解释。^⑤ 尽管上述行业衰退在经济方面意味着有一些深层次的、潜在的不健全因素,但学者们从来也不愿意将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经济萧条单独归咎于这些行业。令经济学家们沮丧的是世俗的观点:那就是经济基本是好的,但普遍存在的公众过分投机行为给当时的美国资本主义带来了灾难。这一观点特别令理性预期学派的学者感到困扰,他们认为如果人们控制他们自己的资源那他们就不会犯系统性错误。因此,近年来学者们将1929年及随后发生的很多事情主要归咎于金融系统。

^② Arthur Burns and Wesley. Mitchell, *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1947).

^③ Lloyd Mercer and Douglas Morgan, "Housing Surplus in the 1920s? Another Evaluation," *EEH*, Spring 1973.

^④ 家庭信息可以在如下资料中发现: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e 82;人口增长率则根据 series Aa 7。

^⑤ Soule (1947)。

3.1 传统的解释

从表 23.5 可以看出传统观点的主要原因。四种统计分析和一些原始数据都根据 1920 年的数据转化成相对指数关系。在 1929 年,根据当时的价格计算的 GNP 比 1920 年低 7.5%,但是价格几乎比 1920 年低了 40%;活期存款和流通货币的总和 M_1 ,仅仅比 1920 年高 12.3%。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组合证券,加上其未偿还的贷款及贴现——衡量美国联邦储备货币的创造活动——只有 1920 年的 47.9%。即使美联储愿意,商业银行系统的保守主义也不可能成为主要的通货膨胀来源;1929 年的活期存款数额仅仅比 1920 年高了 18.1%。

表 23.5 金融指数,以 1920 年 = 100

年份	GNP	批发 价格	M_1	联邦储备 贷款和债券	活期 存款	定期 存款	M_2	普通 股票
1919	91.8	89.8	91.8	95.5	92.3	83.3	89.1	143.2
192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21	76.1	63.2	90.6	47.1	90.8	102.4	94.4	86.0
1922	81.0	62.8	91.3	41.0	93.4	108.9	96.9	105.4
1923	93.0	65.4	96.6	37.4	98.5	123.5	105.2	107.4
1924	92.6	63.5	99.7	38.4	102.4	134.7	110.9	113.4
1925	101.7	67.3	108.1	43.1	112.7	148.1	120.8	139.7
1926	106.0	65.0	110.3	41.3	115.2	158.1	125.5	157.8
1927	103.7	61.7	110.0	49.2	114.9	168.3	128.5	192.2
1928	106.0	62.8	111.2	55.1	116.8	181.0	133.4	250.0
1929	112.7	61.7	112.3	47.9	118.1	180.3	133.9	326.1
1930	98.8	56.0	108.6	41.8	114.4	180.4	131.4	263.5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a 10, Cc 66, Cj 42, 45, 268, 269, 800—802.

另外一方面,定期存款上升了 80.3%,这是引起潜在的货币膨胀的单一最主要的原因。即使这样,使定期存款成为较大规模的货币供应总量 M_2 ,仅仅比 1920 年多了 33.9%。因为 1929 年的股票指数比 1920 年上涨了 226%,这其中就可以解释某些事情。无论股票市场的繁荣源自哪儿,将它归咎于银行系统发行过多的货币是不明智的。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上升的股票价格仍在继续,正如传统观点所认为的,这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重大特殊现象。

什么能够解释股票市场的价格?总的来说,有两个答案。

- (1) 直到 1929 年,即使价格在上涨,股票市场显然还是有钱人购买进行投资的场所。^②
- (2) 在 1929 年,一个繁荣的泡沫最终将股票市场推向了灾难的边缘。^③

^② 仅仅在大崩盘之前,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认为股票市场是被低估的。Ellen McGrattan and Edward Prescott, "The 1929 Stock Market: Irving Fisher Was Righ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 45, no. 4, November 2004, 他们提出的证据表明,相对于预测来说,股市被低估了。

^③ Peter Rappoport and Eugene White, "Was There a Bubble in the 1929 Stock Market?" *JEH*, September 1993, 他们认为,尽管许多经济学家对于证明泡沫的存在性有质疑,但他们对股票抵押担保贷款需求行为的检验暗示,但并未证明在 1929 年存在泡沫。Tung Liu, Gary Santoni, and Courtenay Stone, "In Search of Stock Market Bubbl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5, no. 3, September 1995, 他们批评了 Rappoport 和 White 的观点。同一期也刊登了 White 的回应 "Stock Market Bubbles?"。

由于20世纪20年代收入增长的绝大部分是获得最高收入的社会阶层人士拥有,因此有很多股票保留起来寻求收益。因为上升的股票价格可以衡量财富的增长,人们鼓励进入股票市场,并且从事股票交易。这种现象在赌场赌博中、现代房地产以及普通商品市场很常见。银行家对股票经纪人轻率的贷款以及以保证金形式的赌博行为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20年代的股市大涨的主要原因,不过这些确实对股市大涨起到推动作用。但是,通过传统的观点判断,股票市场的投资必须有充足的理由,但直到最后才是这样。

为什么买普通股票?如果一个人有一笔钱用来投资,他或她就想要回报并且希望有一定的安全性。总的来说,投资的风险越大,获得的回报也越多。在正常环境下,如20世纪20年代(除了出现经济危机的时期),债券一般来说比股票的收益低。尽管债券的价格在变化(与银行存款利率成反比),但如果公司不破产的话就有固定的利息收入。甚至,债券所有者对资产有优先要求权。

股票的分红通常根据企业管理层赚取的利润进行分配。与有偿付能力的公司的债券价格相比,股票价格上涨或者下跌要多得多。因此,在正常情况下,风险厌恶的投资者宁愿选择公司债券而不是股票。总体上,经济的景气程度也影响投资者的决定。事实上,在好的时期,投资者宁愿在股票上“孤注一掷”。在糟糕的时期,他或她就会转向政府债券这一最可靠的发行货币的机构。

3.2 大崩盘之前的经济环境

1929年股市大崩盘之前的经济环境是怎么样的呢?这其中有关于周期的问题,普通投资者应该已经注意到了。他们认识到经济在增长,价格保持稳定以及就业率很高。

我们可以从表23.6中看到,直到1929年商业公司的数量都在上升。即使旧的公司失败了,人们也保持乐观心态并重新创建新的公司。1921年的经济萧条中,公司的破产率急剧上升(一直延续到1922年)。但是那一年后公司破产率就比较低,尽管仍达到1919—1920年破产率的两倍左右。而且,普通规模的公司破产率在1921年后也没有上升。1920—1921年的关键利率水平下降,从1923年到1929年,银行优惠利率平均大约下降了5%。与疯狂的20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20世纪20年代的真实利率是正的,高于实际或是预期的价格上涨:对于借款人来说,1926年4.3%的利率比1980年10%的利率代价更高,因为当时的价格上涨得非常快。

1921年当利率下降后,在股票市场上获得的收益往往要高于债券市场的收益。即使1928年当利率回到原位时,在普通股票市场的收益仍高于债券市场。在1928年,投资于公用事业的债券收益高于政府债券的收益。与投资债券比较,一位风险厌恶投资者在1928年仍然会将股票作为一种获得收益的好的投资方法。另外,获取资本收益的热情也高涨起来了。股票价格就像一座新的埃尔多拉多城(南部非洲著名的财富城),这增加了股票市场的吸引力,诱使一些风险厌恶程度较低的投资者转向了股票市场。收获是很不错的,而且资本所得利润也很是喜人。

表 23.6 1919—1930 年选定的企业指标

年份	企业数	每 1 000 家 企业中 破产的 企业数	破产企业 的平均 负债 (千美元)	年平均数(百分比)					
				最低利率	债券收益		股票收益		
					美国 政府	AA 级 公司	工业	铁路	民用 事业
1919	1 711	38	17.5	5.37	4.73	5.49	6.20	6.09	7.49
1920	1 821	49	33.2	7.50	5.32	6.12	4.54	6.78	7.87
1921	1 927	102	31.9	6.62	5.09	5.97	5.88	7.11	9.23
1922	1 983	119	26.4	4.52	4.30	5.10	6.23	6.86	8.62
1923	1 996	94	28.8	5.07	4.36	5.12	5.08	6.07	7.54
1924	2 047	101	26.3	3.98	4.06	5.00	5.36	7.09	7.88
1925	2 113	100	20.9	4.02	3.86	4.88	5.13	5.78	6.69
1926	2 158	101	18.8	4.34	3.68	4.73	5.09	5.51	5.56
1927	2 184	106	22.5	4.11	3.34	4.57	5.28	5.45	5.51
1928	2 187	109	20.6	4.85	3.33	4.55	4.27	4.82	4.88
1929	2 203	104	21.1	5.85	3.60	4.73	3.72	4.56	3.08
1930	2 160	122	25.3	3.59	3.29	4.55	4.22	4.88	3.26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h 408, 411—413, Cj 812—814, 1192, 1196, 1224.

考虑一下表 23.7 的数据。普通股票市场的价格从 1921 年的低迷中很快就恢复过来。价格开始上升,总体来说呈现上升的趋势。到了 1928 年,投资者的资金平均比 1920 年水平增加了 2 倍多。通过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看出经济运行是非常好的。悲观主义者可能会说住房和农业问题,或者根据收入分配情况警告进一步的公众消费增长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信号都被忽略了。

表 23.7 1920 年普通股票市场指数的年平均价格

年份	总计	工业	铁路	民用事业
1919	129.6	153.0	104.9	104.3
1920	100.0	100.0	100.0	100.0
1921	104.6	107.5	101.9	118.1
1922	129.1	134.3	120.2	140.1
1923	125.2	133.3	113.2	140.9
1924	150.0	156.7	141.0	163.9
1925	182.8	198.6	162.6	192.0
1926	188.3	203.3	172.9	197.1
1927	240.0	264.8	203.9	243.2
1928	320.9	362.7	225.0	348.3
1929	276.3	284.4	217.9	397.6
1930	191.9	191.9	148.8	300.0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j 800—803.

由于亨利·福特从 T 型变换为 A 型,1927 年汽车销售量出现下降——从 1926 年的 3 692 000 辆到 1927 年的 2 936 000 辆——但是 1928 年很快又上升到了 377 500 辆。^②

^② 他从 1927 年 5 月到 1928 年 1 月关闭了工厂,使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工作。自一战之前,福特一直生产单一车型,T 型车。Jonathan Hughes, *The Vital Fe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35—336.

1928年钢铁产量是6700万吨,超过1925年历史最高点100万吨。煤炭产量出现下降(1928年的产量是50100万吨,1926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产量是57300万吨),但是煤炭产量的下降部分反映了竞争性燃料——石油市场的繁荣。1920年的原油产量是44300万桶,1925年上升到76400万桶,1928年达到90100万桶。^②

廉价的汽油对家庭和工厂来说是可得的,当时汽车挤满了马路。股市达到了异常水平,一位普通股票购买者希望1929年对经济来说是极好的一年,而且通过我们所预见的任何一个角度来分析确实是这样的,直到突然的股市大崩盘。

4. 股市大崩盘

如果你的汽车轮胎在州际公路上爆裂了,然后整辆汽车都散架了,你会认为除了轮胎之外,汽车的其他部位也有缺陷。相似地,许多经济学家相信1929年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有问题,尽管大量的事实证明经济运行良好。在美国经济历史上,1929年的股票市场恐慌是最有趣和令人费解的事件之一,这次恐慌有相当长的时间和非常深远的影响力。这值得我们讨论好几页。轮胎爆掉了,这没什么奇怪的。但是然后汽车分开了,这就不寻常了。1987年10月,股票市场再次崩盘,也是在没有先兆的情况下出现了。但是1987年之后的经济很快就复苏了。不可能仅仅是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自身导致了大萧条。

股票市场的崩盘是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从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中能得到什么呢?为将来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警示呢?

4.1 他们预见到它的到来了吗?

公平地讲,如果不知道1929年的状况,你不可能从1928年的总体迹象预测到。一位理智的分析家可以预测在某时间会出现衰退。美国经济史的每一个扩张都告一段落了,就像每一次衰退告一段落一样。这次大危机侵吞了人们的财富、积蓄和工作甚至断送生命。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这次危机是不同寻常的一次。尽管非常庞大数量的人群相信类似的危机不会再次发生。^③

这一信念是每一次的繁荣激起的。很不幸,繁荣就像垃圾在一个焚化炉中燃烧一样。当火焰最高时,正是加速耗尽的时刻。因此,这次危机突然来临。一些成功的投机商在危机来临之前离开了股市,或者看到危机来临时很快地卖掉了股票。

当时发生了两个这类情形的例子。在1980年12月末,正处于当年贵金属的繁荣景象中——白银接近每盎司50美元,黄金达到每盎司850美元——冷静的专业人士看高黄金和白银的价格,预计将在几周之内白银达到75美元每盎司,黄金达到1000美元每盎司。然而,1980年的1月21日,价格突然直线下降。几天之内,黄金价格下降了20%,白银价格则下降了25%。然后是一周接一周的价格缓慢下降,直到白银的价格是每盎司10

^② 所有的产量数据来源于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b 25, 29, Dd 653, Df 343。

^③ Adam Klug, John Landon-Lane, and Eugene White, “How Could Everyone Have Been So Wrong?” *EEH*, January 2005,他们用一系列铁路托运人的预测说明,这个群体的人将开始于1929年夏天的衰退看做跟过去经验相同的一次衰退。

美元及黄金价格降到每盎司 500 美元以下。最老练的专业人士失去了巨大的财富,但其他进行短线交易的则已清仓。1987 年 10 月,股票市场的大崩盘导致几天之内损失了 1/3 的股票市值。罗纳德·里根,像之前的赫伯特·胡佛一样,立即指出经济的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尽管股市发生了大崩盘,但 1987 年的经济很快就恢复了,1929 年的这次则没有很快恢复。

你怎么能意识到一次经济繁荣即将结束呢?你怎么能知道将会出现恐慌性股价下跌,昨天还是拼命进股市的人,明天就成了惊恐的兔子?你怎么从 1929 年早期的状况知道一次大的灾难就在面前,而不是根据 1928 年极好的状况认为 1929 年会有很好的发展?这种预知是否有可能呢?^②

让我们跨越大西洋,回顾另外一个 80 年的历史。1857 年 11 月 5 日的晚上,英格兰银行的副行长博纳米·多布里(Bonamy Dobrée)写下了他的一位同事董事发现的日记内容:“霍奇森报道了九曲花街(Lombard Street)到处流传的一种最令人不愉快的感觉,一种濒临破产边缘的担忧广为流传。”^③在当天,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上升到了历史的最高点 9%,1857 年的大恐慌弥漫伦敦。一周后银行的贴现率是 10%,英格兰银行的营业部付完了它所有的货币,不得不违反 1844 年的银行宪章法,利用政府债务发行更多的英格兰银行货币进行补救。

1857 年的危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事件之一,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均遭到破坏。但是即使是那时伦敦最令人尊重的财经杂志《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在危机发生的几个月之前,即 1857 年 4 月写了如下内容:

我们既没有过剩的贸易,也没有过多的新公司,在公众中没有任何特别的或是不寻常的行为会预示将来的骚乱。我们多余的精力看来是……发泄在了俄国战争中。^④

夏季的后期,美国银行的破产及与中美进行贸易的公司的破产使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会变得担心起来。

这次的很多迹象都和 1929 年发生的事情很像。普通民众认为当时的经济发展会是一次无止境的好时光。柯立芝总统 1928 年在他的告别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说道:“平静和满意……有记录记载的最繁荣的时期,”并且对聚结的政治家确信“他们可以非常乐观地预期未来。”^⑤但是,学者们描述的 1929 年的状况与霍奇森发现的九曲花街的异常现象相似。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引用罗杰·巴布森(Roger Babson)1929 年 9 月 5 日在每年的全国商业会议的著名演讲内容:

一场危机迟早会来临,而且可能会非常可怕……工厂会关闭……人们会失去工作……这种恶性循环将会达到顶峰……^⑥

^② Peter Rappoport and Eugene White, “Was the Crash of 1929 Expected?” *AER*, March 1994, 他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们采用期权定价模型,认为崩盘应该在一年前预见到,因为扩散模型中包含的波动是上升的。

^③ Jonathan Hughes, *Fluctuations in Trade, Industry and Fin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0), p. 273.

^④ *Ibid.*, p. 20. “俄国战争”就是现在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

^⑤ 引自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Great Crash* (1979), p. 1.

^⑥ *Ibid.*, pp. 73—74.

加尔布雷斯注意到巴布森的预见被许多人们所嘲笑。

事实上,加尔布雷斯的《大崩溃》一书可以最好地解释表 23.5 的一个疑惑,相对于其他金融活动普通股票价格奇怪地上涨了。

如果有其他可替代的方法将资金从别的用处转移到股票市场,缺少常规的货币扩张并不一定减少资金流向股票市场。其他价格将会下降,股票价格将会上升。大约 1924 年后加尔布雷斯描述了这类方法的发展。^⑤ 有两类主要可供转移的投资方向:(1) 直接的,非银行的借款给经纪人;(2) 投资信托基金。

4.2 经纪人贷款

股市大崩盘后,在寻求股市泡沫解释中经纪人贷款成了恶棍。商业公司过去经常以他们多余的现金进行内部筹资,提供短期的、自行清偿贷款;或者通过经纪人贷款购买证券直接投资于股票市场。由于经纪人利用这些基金为他们的客户提供财政支持,贷款成了信用的主要来源——股票市场的杠杆。由于短期贷款到期后,它们可以立即通过非银行的借款者还清,至少在理论上的收入是很高的。

这种贷款对公司的拥有者来说是一笔意外之财,通过利用短期的剩余现金流动赚取利润。根据加尔布雷斯的调查,在 1929 年的早期,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平均一天转向短期贷款 6 900 万美元;电气债券股份有限公司为 1 亿美元。这种非银行机构比银行系统将更多的资金注入了股票市场。

20 世纪 20 年代的经纪人贷款数据见表 23.8。根据这些数据,这段时间(1923—1925 年)非银行机构现金用于这种经纪人贷款的正常比率小于总数的 30%。但是,到了 1926 年这种状况明显发生了变化。即使到了 1929 年的末期,恐慌中的非银行机构的这种贷款占到了总数的 60% 左右。1929 年 10 月的早期,当经纪人贷款达到了 85 亿美元的数字时,66 亿美元或者说大概总数的 78% 是来自非银行机构的贷款。^⑥

表 23.8 1923—1932 年经纪人贷款、银行与非银行贷款

年份	总计	纽约 城市银行	外部银行	非银行 资源	非银行 所占百分比
1923	1 580	720	410	450	28.5
1924	2 230	1 150	530	550	24.7
1925	3 550	1 450	1 550	1 050	29.6
1926	3 290	1 160	830	1 300	39.5
1927	4 430	1 550	1 050	1 830	41.3
1928	6 440	1 640	915	3 885	60.3
1929	4 110	1 200	460	2 450	59.6
1930	2 105	1 280	215	610	29.0
1931	715	540	35	140	19.6
1932	430	335	20	75	17.4

注:除特别说明,单位以千元美元计。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j 866—869.

显然,这些非银行的金融世界想要分享华尔街的投机行为,而且到 1929 年为止它确

^⑤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Great Crash* (1979), chaps. 2 and 3.

^⑥ 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1973), p. 113.

实参与了大部分的投机行为。即使在 1926 年,当银行给经纪人的贷款数量已经下降,非银行系统进行的短期货币贷款数量仍在继续增加。到了 1932 年,当黑暗降临到华尔街的时候,非银行机构提供的贷款比经济萧条时给经纪人贷款的 6% 还要少。如果从 1926 年到 1928 年股票的上涨是由于不适当的投机行为导致,而且这种不适当的投机行为是由贷款给经纪人所引起的,那么主要责任应归咎于非银行系统。

4.3 投资信托基金

投资信托基金是另一种较为流行的解释引起股票市场泡沫的原因,它是一种类似于现代共同基金的金融工具。一种托管基金可以向公众出售自己的有价证券、股票或债券,用获得的收益购买其他股票。由于那时的股票(包括现在的)以保证金(margin)的形式购买(购买者花费他或她的一部分自有现金,其余的则由经纪人出),由于市场上行,投资信托基金在短时期内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赚钱方式。

在加尔布雷斯有趣的但经过仔细研究的书中描述了几种投资信托基金的情况。美国基金集团 1922 年成立时仅有 500 美元,到 1929 年发展成为 13 个公司、超过 10 亿美元的资产。“这可能是早期花费 500 美元而能控制的最大数额的财产。”^③到了 1928 年,市场上有 186 个投资信托基金;而 1929 年当年就有 265 个新的投资信托基金成立。这种快速增长是繁荣的泡沫的表现。在 1927 年,投资信托基金向公众出售了 4 亿美元的有价证券以维持他们的运营;到了 1929 年,这一数字达到了 30 亿。^④投资信托基金成立可能不仅仅靠欺骗等方法,但是他们是将资金转移到股票市场的渠道,并且极大地刺激了这一市场的发展。

这两种特别的货币转移来源——非银行机构现金的经纪人贷款和投资信托基金——增加了个人投资者、银行和投机者直接投资股市的资金数量;他们促使本已强劲高涨的股票市场股票价格变成了极度的繁荣。到了 1929 年 10 月,经纪人贷款的总数额已经达到了 85 亿美元,其中只有 18 亿来自于银行系统。

尽管股票市场的繁荣景象持续到了 1928 年,但是 1929 年前 9 个月市场泡沫开始凸显,从 9 月开始市场开始下滑和崩溃。

4.4 繁荣和崩溃

如果把 1926 年 7 月作为一个基数月份,将每月的股票市场价格指数设定为 100,一年以后的数字是 112,到了 1928 年 7 月则达到了 148。^⑤两年之内一名投资者可以实现 48% 的资本收益,而且还可以获得分红。但更多的还在后面。从 1928 年的 7 月,指数又上升了 45 点,达到了 193。一位投资者可以从 1926 年夏天开始的三年之内使他自己的资产翻倍,而且一个夏天实现 30% 的收益。

除了掩盖了对股市必然下跌的警告,股票市场看上去确实比较好。毕竟如我们看的一样,经济状况听起来非常不错。股票市场停留于 1929 年 1 月的水平一段时间后又开始

^③ Galbraith, (1979), p. 52.

^④ 关于 20 世纪 20 年代投资基金的更多历史,请参考加尔布雷斯在其书中第三章的阐释(Galbraith, 1979)。

^⑤ 全国的月度联合数据,参见 Kindleberger(1973), p. 111.

上升。到了1929年9月,指数站上了216,比数个月前又上涨了12%。如果一位投资者在1926年夏天购买了价值1000美元的股票,那到了1929年9月股票市值就达到了216美元。在稍多于3年的时间里,投资者的单靠资本所得是116%,而且还有股票分红。

为了投资安全而不通过交易所直接售给顾客的证券,1926年到1929年的这一时间内的投资者领域看上去是很难重复的。9月份的实体经济有一些下滑的迹象,这是事实,但这些混合出现的迹象和征兆只维持了几个月时间(汽车销量下降、工业产量下降),而且也在其他年份出现过。^④ 最高层官方,从新上任的总统(和即将离职的旧总统)下到哈佛的经济社团都在鼓吹经济面是稳定的。^⑤

在美联储公开警告不支持银行贷款给股票投机者(担心经纪人贷款的规模)并且在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上升了22%(从4.5%直接上升到5.5%)后不阻止英国金价的下滑之后有一个短暂的退步。^⑥

在3月26日这天,当进行820万美元股票交易时股票价格突然直线下降,股市出现了短期瘫痪的时刻。短期贷款的利率甚至达到了年利率20%(平均月利率1.7%),但是这并没有威胁到严重的投机行为,因为根据近期经验他们可以预期到会赚取更多利润。但是,随着时间流逝,股市重新稳定了。黄金在不断地流入纽约银行;出口也非常汹涌。到了8月,美联储提高自己的贴现率到6%,但是市场上对这次贴现率的增加并没有太强的反应。

如果我们把该利息与商品价格或者生活消费指数比较,我们会发现货币是紧缩的。但是在股票市场,从当年1月开始股票价格上升了9%,而6%仍然是一个负利息率。如果你从联邦银行借款,仍然需借款来偿还。对于经纪人来说,尽管在繁荣发展的最高点的高利息率无疑会造成一些恐慌。加尔布雷斯书中报道,早在8月美联储内部相信股市崩盘将会来临,但是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阻止其发展。他们也相信在这段时间内可以采取其他方法来阻止股市崩盘;在一个膨胀的股票市场中进行一些矫正被认为是有益于股市发展的事情。

9月3日,股市达到创纪录的最高点。两天后,巴布森发表了著名的股市大崩盘预言。在9月5日当天,股市出现一次跌停,然后股市开始了令人不安的动荡的周期——回顾过去,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就是股市繁荣已经结束了。在10月19日星期五这天,只有半天交易时间,但股市还是很快又再次跌停。10月21日星期一这天,股市损失更加惨重。大家可是对股市产生恐惧。

10月24日星期四这天,股票交易额是1290万美元;股市短时期内弥漫着恐慌,但是一项显眼的计划显示来自纽约的金融家在进行有组织的援助以阻止股市进一步恶化。两个更加不一般的股票交易日使美国的金融历史来到了1929年10月28日星期一,在那一天的股票交易额超过900万美元,但那天股票价格的下降幅度超过了整个过去几周的糟糕时刻。星期一是大灾难的边缘,这也导致了第二天的股票停止交易。

^④ Lloyd Mercer and Douglas Morgan, "The American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1921—1940," *JPE*, November/December 1972. 1929年下半年汽车销量的下降并非由于市场饱和。

^⑤ Galbraith (1979), pp. 127—128.

^⑥ 此处描述的日常事件摘自注43的参考文献。

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这天股市又面临着极端的惊恐状况。超过1600万美元的股票卖盘一下子涌出。《纽约时报》的股票价格指数下降了43点,一天之内侵吞了投资者过去几年之内积累的财富。在当天股市交易结束后,许多股票的价格都比9月份的价格水平下降了50%。

股市也失去了每一处的支持。补充保证金通知(margin calls,要求经纪人从他们的客户处缴纳更多的现金)出台;在可供出售股票时没有人竞价,像这种情况有许多实例。一些背负沉重负担的公司和投资信托公司被压垮了。高盛贸易公司曾经是最辉煌的投资信托公司,股票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42%。当补充保证金通知不能履行时,成千上万的股票账户被关闭。在美国的金融历史上,1929年的10月29日就像是1941年的12月7日(珍珠港受到袭击),一件非常罕见的事,一天的经历而开辟了新的时代。

在发生了令人厌恶的股市下滑后,接下来的几周股市开始部分地恢复。到了12月,股票指数下降到了147(1926年为100),比9月份下降了32%。一年以后的指数是102,比1929年9月低了53%。这一每月一次的指数在1932年7月到了低点34,比1929年的月度最高点整整下降了超过85%。一位投资者如果在1929年拥有2116美元(从1926年9月的1000美元赚得),那在1932年的7月就只剩下了360美元。到那时候,国家开始面临经济萧条,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新政出现在美国历史的舞台上。

5. 解释

是否有令人可信的理由解释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加尔布雷斯列举了5个主要的根本性的缺点:(1)收入分配不平衡,(2)在公司水平的商业组织不稳定,(3)脆弱的银行结构,(4)国际化的金融困境和(5)国家领导人忽略了财政和经济的现实。^⑤但是这些因素并不必然会在1929年或者其他时候引起股市大崩盘。对于这个问题,罗伯特·凯勒(Robert Keller)设想了一个引起股市崩盘的目录,他也调查了20世纪20年代的技术改变和投资资本市场收益的上升。^⑥

对于研究经济周期的历史和解释早期金融危机和恐慌的研究者来说,1929年的股市崩盘的解释并不新鲜、独一无二和令人信服。^⑦它在20世纪20年代的环境下产生,但是历史上有很多次金融恐慌:1825年、1836年、1847年、1857年、1873年、1882年、1893年、1901年、1903年、1907年、1920—1921年。它们发生在不同的美国和欧洲环境中,但是同样引人注目。经济学家随后把这些灾难归咎于某些可能的原因上。^⑧

令人沮丧的是,找到导致1929年(或则任何时候的)股市大崩盘某一单一原因是徒

^⑤ 此处描述的日常工作事件摘自上注中的著作, pp. 157—165.

^⑥ Robert Keller,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1920s: A Reexamination of Fact and Theory," *JEH*, March 1973.

^⑦ 例如,参见 Lance Davis, Jonathan Hughes, and Duncan McDougall,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second edition (Homewood, IL: Irwin, 1965), chap. 23, 一系列的解釋。也参见 R. C. O. Matthews, *The Business Cyc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and Gottfried Haberler,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 (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1937)。

^⑧ 历史学家 Maury Klein 最近发表了关于大萧条的文献的综述。"The Stock Market Crash of 1929: A Review Article," *BHR*, Summer 2001。

劳的。根据这些,因此值得认真思考 1837 年塞缪尔·琼斯·劳埃德(Samuel Jones Loyd)的观点(后来是奥弗斯通勋爵),然后问到底学到了什么。

1836 年伦敦曾经出现一次金融恐慌,人们将其归咎于和美国进行的贸易的问题。英格兰银行的行为是不恰当的(它付完了所有的货币),行长霍斯利·帕尔默(J. Horsley Palmer)写下并发表了关于这次事件的一篇文章:货币市场上压力的原因和后果及近期的商业困境。塞缪尔·琼斯·劳埃德,这位英国银行家用他自己的观点回答了帕尔默的小册子,《精读霍斯利·帕尔默先生关于货币市场上压力的原因及后果的小册子之反思》。在这个小册子中,劳埃德说到了之前从来没有人提及的经济周期的观点,总体如下:

我们所在的习惯被称为“贸易状况”的历史给我们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一课。我们发现它所面对的各种情形周期性地出现,它显然是围绕一个固定的周期前进。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平静状态——然后是上升——增加的信心——繁荣——兴奋——过度贸易——骚乱——压力——停滞、危机——结束并且再次平静。^⑨

1929 年的大崩盘无疑使投资者感到非常糟糕。他们失去的(有时被称为仅仅是纸上的数字)足够支付这些从他们那里得到所需的人们。即使起初美欧工厂由于股票价格的下降而倒闭,但是在原来已经有许多证券财产积累的基础上,买了这些股票的人们在股票崩盘之后立即会发现他们不再是有钱人。未来,他们进行投资的热情将会削弱。

1929 年 10 月一个月,整个国家的股票市场的资产总额损失了共 150 亿美元,而当年的 GDP 总量是 1046 亿美元。1929 年 10 月的股票市值损失相当于超过当年 GDP 总量的 14%。1929 年的股票市场下降导致的纸上财富的损失占 1929 年 GDP 总量的比率甚至要超过 1929 年。尽管 1930 年是一个适度的、令人满意的一年,GDP 比 1929 年有了小幅的上升。但是历史并没有重复出现。到了 1933 年,股票市场的市值损失比 1929 年的最高点减少了约 850 亿美元,大约相当于 1929 年 GDP 的 85%。到了 1933 年出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大灾难,许多比泡沫破裂更坏的事情发生了。

如我们在下一章中要讲到的,现在对于导致大萧条的原因仍有很多争论。到目前,1929 年股市大崩盘造成了非常深的心理后果。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时期”变成了一个糟糕的笑话,股市一直朝着 1932 年最坏的方向发展。“新时期”这一词被换成了“新交易”,暗示着重新洗牌和再一次分配,美国经济生活的游戏将会重新开始。

文化历史工作者注意到从《了不起的盖茨比》到《愤怒的葡萄》的环境变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国家的经济、人民以及政府都被这次大萧条带来的灾难进一步改变,经济繁荣景象才得以再现。政府策略首先改变尝试纠正一些加尔布雷斯注意到的有危机的地方,但是很快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理:如何使美国的经济增长。1930—1940 年间,经济发展不能容纳这个国家所有的劳动力,还是在美国历史上存在了很长时期但并不为人所知的事情。

^⑨ Hughes (1960), p. 229.

推荐阅读

文章

Alston, Lee J. "Farm Foreclos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Interwar Perio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3, no. 4, December 1983.

Bowden, Sue, and Avner Offer. "Household Appliances and the Use of Time: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Since the 1920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7, no. 4, November 1994.

Fausold, Martin L. "President Hoover's Farm Policies 1929—1933."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51, no. 2, April 1977.

Hoffman, Elizabeth, and Gary Libecap. "Institutional Choi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 S. Agricultural Policies in the 1920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1, no. 2, June 1991.

Holt, Charles. "Who Benefited from the Prosperity of the Twenti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4, no. 3, July 1977.

Johnson, Thomas. "Postwar Optimism and the Rural Financial Crisis of the 1920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no. 2, Winter 1973—1974.

Keller, Robert.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1920s: A Reexamination of Fact and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3, no. 1, March 1973.

Klein, Maury. "The Stock Market Crash of 1929: A Review Articl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75, no. 2, Summer 2001.

Klug, Adam, John Landon-Lane, and Eugene White. "How Could Everyone Have Been So Wrong? Forecast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with the Railroad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42, no. 1, January 2005.

Kuznets, Sim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no. 1, March 1955.

Mercer, Lloyd, and Douglas Morgan. "The American Automobile Industry: Investment Demand, Capacity,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0,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72.

———. "Housing Surplus in the 1920s? Another Evalua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0, no. 3, Spring 1973.

Nicholas, Tom. "Why Schumpeter Was Right: Innovation, Market Power,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in 1920s 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3, no. 4, December 2003.

Oshima, Harry T. "The Growth of U. S.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Significance of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Early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4, no. 1, March 1984.

Pilgrim, John D. “The Upper Turning Point of 1920: A Reappraisal.”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no. 3, Spring 1974.

Rappoport, Peter, and Eugene White. “Was There a Bubble in the 1929 Stock Marke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3, no. 3, September 1993.

———. “Was the Crash of 1929 Expecte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no. 1, March 1994.

Smiley, Gene. “Did Incomes for Most of the Population Fall from 1923 Through 1929?”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2, no. 1, March 1983.

Swanson, Joseph, and Samuel Williamson. “Estimates of National Product and Income for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1919—1941.”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0, no. 1, Fall 1972.

Wicker, Elmus. “A Reconsideration of Federal Reserve Monetary Policy During the 1920—1921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6, no. 2, June 1966.

书籍

Barber, William J. *From the New Era to the New Deal: Herbert Hoover, the Economists, and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1921—193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Brody, David. *Workers in Industrial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Burns, Arthur F., and Wesley C. Mitchell. *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47.

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Great Crash, 1929*. New York: Discus Books, 1979.

Gardner, Bruce L. *American Agricul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w It Flourished and What It Co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Kindleberger, Charles.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Lampman, Robert. *The Share of Top Wealth-Holders in National Wealth, 1922—195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Mathews, R. C. O. *The Business Cyc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Olney, Martha L. *Buy Now, Pay Later: Advertising, Credit, and Consumer Durables in the 1920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Soule, George. *Prosperity Decad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1947.

Williamson, Jeffrey, and Peter Lindert. *American Inequality: A Macro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第 24 章

大 萧 条

1929 年大危机之后,经济开始了长期衰退,悲凉年复一年,直到 1932—1933 年的那个阴冷的冬天。9 000 家银行倒闭了。失业上升到了劳动力的 1/4;成千上万的人找不到工作。面包条、破旧的衣服,在中央公园里破旧肮脏的硬板小屋里的穷困生活,路上遍地都是流浪汉——这就是我们历史上那个时期的景象。

1. 远景

哪一个数字,或哪组数字,能够最恰当地描述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的影响? 什么故事能够最清楚地唤起人们对它的记忆? 在 1929—1932 年间,制造业产量下降了一半。铁路客运车辆的产量从 1929 年的 2 202 单位下降到了 1932 年的 7 个单位;汽车产量下降了 75% (从 450 万辆下降到 110 万辆)。大萧条是这样—一个时期:汉堡 5 分钱两个,人们买不起;人们愿意为一小时挣 1 角钱而工作,而雇主从他们的劳动中赚不到利润;(生存下来的)银行充斥着闲置的资金,尽管年利率低于 1%,仍然没有借款发生;农作物烂在地里而人们在挨饿。

看一下图 24.1。结婚率、出生率甚至离婚率都骤然下降。结婚率和离婚率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恢复了;然而,因为出生率长期下降,所以出生率的恢复很不明显。即使如此,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重新达到 1933 年和 1936 年的低出生率以及每年千分之 18.4 的人口增长率(20 世纪 60 年代时长期下降趋势得到恢复,在流产合法化的帮助下)。大萧条最初的震撼在要害核心方面削弱了这个国家。它是一场灾难。^①

可能没有哪一个历史事件能够像大萧条那样激发起经济学家们如此高的热情,即使到今天也是这样。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近期一项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名为《决定性时刻》(*The Defining Moment*)。^② 它的每一部分仍然是冲突的主题。什么引起了最初的下滑? 为什么经济紧缩达如此之久(1929—1932 年)? 为什么紧缩程度如此之深? 政府政策是有助于还是妨碍了恢复? 新政对于重建国家经济制度的努力是一项优异的、必要的改革方案,还是使正常调整过程偏离轨道的误导性举措? 长期的高失业是由于私人部门的失败,还是对政府行为造成持续干扰的正常反应? 新政是“挽救”了美国资本主义还

① Studs Terkel' *Hard Time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特别提到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许多鲜活的记忆。

② Michael Bordo, Claudia Goldin, and Eugene White, *The Defining Mo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关于这个问题不一致意见的范围在以下文章中说得很清楚, Karl Brunner, ed., *The Great Depression Revisited* (1981), 其中“货币主义者”和“真实值”情况得到了再次检验和重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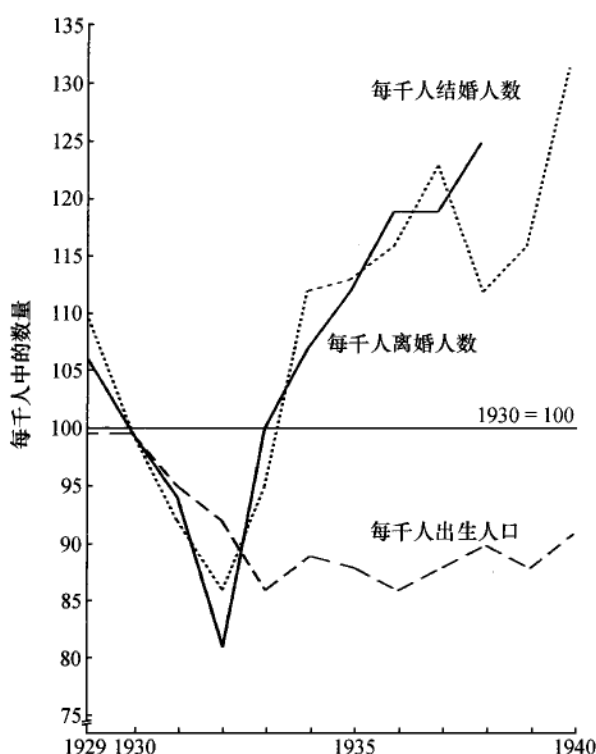


图 24.1 1929—1940 年的重要信号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a 9, Ab 29, 30, 40.

是将其演变成了永久的、永远依赖政治的异想天开的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即既有资本主义也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一种经济,政府部门起着重要作用)?^③这一章分析大萧条,接下来一章研究新政。

1929 年的第三季度达到了经济周期的高峰,此时正是华尔街泡沫破裂之前。从表 24.1 的数据可以算出,在 1929—1930 年间名义 GDP 下降了 12%;实际 GDP 下降了 8.6%。因此,按 GDP 平减指数衡量的价格,下降了 3.4%。这些数字符合严重下滑特征,但还没有到“大萧条”的程度。从远的角度看,回顾一下表 23.2。在 1920—1921 年间,名义 GDP 下降了 23.9%,但实际 GDP 只下降了 8.7%。在 1921 年的衰退中出现了一次价格急剧调整,下降了 15.2%。正如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和詹姆斯·威尔考克斯(James Wilcox)所主张的那样,从 1921 年第三季度到 1929 年第三季度整个时期,整整 8 年时间,GDP 平减指数仅仅在 4.4% 的范围内变化,而 1929 年的报告就在这个范围的中线。^④用 M_2 衡量的货币供给,在下滑的四个季度的第一个季度中就下降了 2.5%。我们可以从表 23.1 看到,货币供给在 1920—1921 年间下降了 5.6%。下滑的第一年是否有

^③ 即使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如埃爾文·漢森也能够明白 20 世纪 30 年代的可能性,此时凯恩斯的财政政策观点得到了发展。参见 Alan Sweezy, “The Keynesians and Government Policy, 1933—1939,”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2, no. 2, May 1972, especially p. 122.

^④ Robert Gordon and James Wilcox, “Monetaris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n Evaluation and Critique,” in Brunner (1981), p. 58.

些事情使人们预期它不仅仅是 1920—1922 年的重现？当时经济在 1921 年急剧下滑而在 1922 年得到恢复。

表 24.1 1929—1941 年失业、GDP 和联邦金融

年份	劳动人口中 失业人口所 占百分比	国内生产总值			联邦收入 (十亿美元)	联邦支出 (十亿美元)	联邦 盈余(+) 赤字(-) (十亿美元)
		当前价格 (十亿美元)	2000 年 价格	2000 年 价格人均			
1929	2.9	\$103.6	\$865.2	\$7 105.4	\$3.7	\$2.6	\$ +1.1
1930	8.9	91.2	790.7	6 424.4	2.9	2.7	+0.2
1931	15.7	76.5	739.9	5 965.0	1.9	4.0	-2.1
1932	22.9	58.7	643.7	5 156.2	1.6	3.0	-1.3
1933	20.9	56.4	635.5	5 060.6	2.6	3.4	-0.9
1934	16.2	66.0	704.2	5 572.3	3.4	5.5	-2.2
1935	14.4	73.3	766.9	6 026.7	3.7	5.6	-1.9
1936	10.0	83.8	866.6	6 767.5	4.6	7.8	-3.2
1937	9.2	91.9	911.1	7 072.4	6.6	6.3	+0.2
1938	12.5	86.1	879.7	6 776.0	6.0	7.3	-1.3
1939	11.3	92.2	950.7	7 263.9	6.3	8.3	-2.1
1940	9.5	101.4	1 034.1	7 799.0	8.2	8.5	-0.3
1941	6.0	126.7	1 211.1	9 045.2	14.9	12.7	+2.2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Economics Analysi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Tables 1.1.5, 1.1.6, and 3.2; *Historical Statics*, series Ba 475.

1930 年时,经验丰富的观察家们毫无疑问已经注意到经济运行在价格行为方面与以往的区别,但是他们可能无法得到这样的结论,1929—1930 年的实际下降超过 1920—1921 年的程度,因为价格下跌得比较少。这是关于什么引起了大萧条的“奥地利学派”的观点。^⑤ 观察家当然没有预料到的是货币收入重新恢复到 1930 年的水平也花了 6 年时间。在这个国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 1930 年的那种情况。以前永远不了解。

与 1920—1921 年经历的暂时的衰退不同,在 1930 年发生的衰退使美国经济在大萧条的边缘摇摇欲坠。二者的差别就像是灌渠和大峡谷一样。即将到来的经历接近美国经济所经历过的“崩溃”的地步。1933 年的可怕的下滑和世界大战重现之前一直未能寻找到恢复的办法,这常常困扰着美国人和他们选择的代议制。过去每次短暂的衰退过后似乎都会回弹的扩张的力量,但这些在 20 世纪 30 年代都失效了。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经济似乎永久跛足了,有缺陷了。

2. 1929—1941 年:统计梗概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发生的事情是不同寻常的。在 1930 年的夏天,GDP 平减指数下

^⑤ 单纯的新古典主义,或“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是多年前由哈耶克提出的,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 (1966), and Lionel Robbins, *The Great Depression* (1934). Murray Rothbard,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1975) 得到了强有力地重申。在这种情况下,到 1929 年股票价格的上升主要来源于大崩盘之前过分宽松的财政规则,而且由于美联储的过分努力造成它始终保持在正常的自我修正机制上。关于奥地利学派观点的扩展讨论,参见 Gene Smiley,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94), pp. 148—151. 这种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已经过时。

降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最低点。一年之后,它比两年前经济周期的顶点低13.6%,比20年代的最低值低11%。在1929—1933年间,用GDP衡量的名义收入下降了45.6%;真实收入下降了26.5%(见表24.1)。到1930年秋天,很清楚的是,经济走入了令人绝望的困境。

2.1 失业

在一份很详细的研究中,斯坦利·莱博高特估计在1929年失业人口占劳动力的3.2%,而到193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24.9%——包括那些工作救济的计划。^⑥当时认为,如果人们愿意在私人部门接受较低的工资而工作,那么联邦政府的工作救济计划就不是必需的。在这样一个时间阶段,这一观点具有有趣的理论吸引力。但是到1933年,当第一批联邦工作救济计划实施时,男人女人们都是绝望的。他们已经得到许诺,繁荣就在拐角处,用不了几年时间了。即使最后产量恢复了,但失业率仍居高不下。用真实量来衡量,1929年的GDP水平在1936年才得以恢复。实际人均收入到1937年才接近1929年的水平。但失业仍然处于非正常的水平上。1938年又来了一轮新的衰退,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政府的无能造成的。在1939年,当实际人均GDP终于超过了1929年的水平时,失业率仍然是1929年的5倍多。

如果我们把那些在政府制造就业的计划中找到工作的所有人都计算在内的话,有多少人还是失业的?我们感谢迈克尔·达比(Michael Darby)作了这样一项估计。^⑦表24.2中的数据揭示了政府计划对失业率的影响,这里给出了莱博高特和达比估计的结果对比。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在减少无业劳动力的百分比方面,政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果的。第二,即使政府有直接的就业努力(例如就业促进局),30年代也产生了具有灾难性水平的高失业时期。第三,考虑那些未充分就业的人——那些受困于农业季节性工作,或者那些为了避免长期失业而放弃了更高报酬工作的人——甚至达比的失业数字也无疑被低估了。

表 24.2 失业率估计(劳动力百分比)

年份	Lebergott	Darby	还原
1933	24.9	20.9	4.0
1934	21.7	16.2	5.5
1935	20.1	14.4	6.0
1936	16.9	10.0	6.9
1937	14.3	9.2	5.1
1938	19.0	12.5	6.5
1939	17.2	11.3	5.9

资料来源:Stanley Lebergott, "Annual Estimates of Un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54," in *The Measurement and Behavior of Unemploy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Michael Darby, "Three and a Half Million U. S. Employees Have Been Misle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1976, p. 8.

^⑥ Stanley Lebergott, "Annual Estimates of Un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54," in *The Measurement and Behavior of Unemploy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David Weir 修正了 Lebergott 的研究,表 24.1 中是相应的数字。

^⑦ Michael Darby, "Three and a Half Million U. S. Employees Have Been Misled," *JPE*, February 1976.

2.2 工资

以前提到的真正讲究实际的观点——如果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所有的工人都能够被雇用,这种观点怎样?在理论上,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但条件很少不变),情况应该如此,必须如此。^⑧ 我们只能推测这一点。事实上,那些有工作的人的货币和实际工资在1933年以后确实都提高了。这种情况意味着,在那些没有工作的人之间,对工作的竞争是很清晰的,尽管那个时期历史课本质疑这个纯粹的理论命题。

我们还要感谢斯坦利·莱博高特提供了表24.3中的数字。失业前和失业后的真实工资、货币收入,以及平均小时收入都在1933年跌到了波谷。就业人员的真实工资到1937年完全恢复到了1929年的水平,小时收入实际上还超过了1929年的水平。失业和货币工资乘以小时工作量一起,使得所有其他指标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都保持在1929年的水平以下。随着货币工资和真实工资从1934年开始上升,令人信服的是,更多人在低工资水平上宁愿保持失业状态。这是令人信服的。正如菲利普·卡甘(Phillip Cagan)指出的:“我们面对的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必须解释一个令人困惑的、大规模失业与工资大幅度提高并存的现象。”^⑨

表 24.3 1929—1941 年非农业雇员的年收入:就业人口和失业扣除调整后数据

年份	年货币收入		年实际收入(1914 年美元)		制造业平均 每小时收入 (每小时美元)
	失业 扣除后	就业时	失业 扣除后	就业时	
1929	1 462	1 534	855	898	0.56
1930	1 294	1 494	778	898	0.55
1931	1 068	1 406	705	928	0.51
1932	807	1 244	593	914	0.44
1933	722	1 136	561	882	0.44
1934	789	1 146	592	860	0.53
1935	851	1 195	623	874	0.54
1936	932	1 226	675	888	0.55
1937	1 072	1 341	749	937	0.62
1938	956	1 303	680	927	0.62
1939	1 029	1 346	743	973	0.63
1940	1 113	1 392	798	998	0.66
1941	1 332	1 561	909	1 066	0.73

资料来源:Stanley Lebergott, "The American Labor Force," in L. 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p. 213; 小时工资来自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Ba 4361.

这一点将一直被讨论到。企业主不喜欢进一步的劳动麻烦。工资降低可能导致了

⑧ Joseph Schumpeter, "The Present World Depression: A Tentative Diagno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21, no. 1, supplement (1931).

⑨ Phillip Cagan, "Comments," in Brunner (1981).

劳动麻烦。罗斯福的政策中根深蒂固的观点是货币工资提高对经济有利,即“高工资信条”。^⑩ 在什么情况下,如果1933年的恢复一旦开始后劳动力变得更便宜,更多劳动力能够被雇用?有证据表明当时实行了令人惊骇的商业保护主义。从1929年到1933年商业存货得到了清算。此后,在反对金融商业界的政府管理面前,这一行业的从业者保持了谨慎小心的态度。

2.3 商业条件

再回到表24.1,看一下真实GDP到1936年已经恢复到1929年的顶峰,但真实人均GDP在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名义GDP直到1941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萧条在徘徊持续,新政强有力的社会重建也无法撼动它。很难度量诸如经济预期这类事情,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他们在经济计划中起着根本性的重要作用。一组数据显示了20世纪30年代关于经济预期的不同寻常的“下滑”。看一下表24.4中的五项。

表 24.4 1929—1941 年的投资、兼并、专利、公司设立和股票价格

年份	私人部门 总投资 (十亿美元)	有记录的 兼并	申请的 专利 (千件)	新企业发起 资本量* (百万美元)	股票平均 价格 (1941—1943 = 100)
1929	16.5	1 245	89.8	8 002	220.5
1930	10.8	799	89.6	4 483	153.1
1931	5.9	464	71.7	1 551	78.9
1932	1.3	203	67.0	325	68.0
1933	1.7	120	56.6	161	101.9
1934	3.7	101	56.6	152 (178)	101.0
1935	6.7	130	58.1	(401)	139.1
1936	8.6	126	62.6	(1 062)	176.0
1937	12.2	124	65.3	(1 138)	111.4
1938	7.1	110	66.9	(904)	136.0
1939	9.3	87	64.1	(420)	131.9
1940	13.6	140	60.9	(761)	115.1
1941	18.1	111	52.3	(1 041)	95.9

* 1929—1934 年 Cj832 系列数据与之后的 Cj820 系列数据不一致。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a 76, Cg 27, Ch 422, Cj 800, 820, 832; 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table 1.1.5.

在1929—1933年间,总的私人投资几乎消失了,而且,实际上,对净投资(扣除当期折旧)的大多数估计表明,从1932年到1934年这个国家的资本存量是净缩减的。在30年代最严重的一年,1937年,又来了另一场崩溃。任何经济增长的发生都是在一定程度

^⑩ 这一学说在20世纪20年代流行起来,它是胡佛工资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政的基础。可参见其他人的作品: Anthony Patrick O'Brien, "A Behavioral Explanation for Nominal Wage Rigidity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4, no. 4, November 1989; Richard Vedder and Lowell Gallaway, *Out of Work: Unemployment and Govern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93); Jason Taylor and George Selgin, "By Our Bootstraps: Origins and Effects of the High-Wage Doctrine and the Minimum Wage,"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vol. 20, no. 4, Fall 1999.

上由净投资引起的。30年代的自发投资水平还不足以使经济重新获得20年代的增长。年复一年,越来越多的基础理论都失效了。在表24.4中所有的指标至1933年的下跌都是灾难。甚至基础的活动如发明(或至少专利申请)也被1933年的下滑给拖拽下来了。尽管同样令人吃惊的是由这些指标衡量的商业信心衰退了,恢复到1929年的相近水平,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回到了1930年。

在胡佛当政期间,商业信心倒塌了,即使倾向于共和党人,但这些企业主往往是和胡佛站在一起的。30年代的英雄人物,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和他新政的社会和经济激进主义,可能已经损害了商业希望。罗斯福尖锐地将他在商业界的对手描述为“经济保皇主义者”,这很难建立起市场信心。

股票市场也是个人预期的晴雨表。在表24.4中显示的指标从1929年到1933年下降了73%,而在这十年中剩余的时间里,一直徘徊在1929年价格的一半以下水平。商业合并通常和经济扩张时期——大的计划和希望时期——联系在一起。^⑩从1929年至1933年它们下跌了90%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未恢复。旨在增加资本的新的股票发行量,从1929年的太平日子减少了98%,十年中的其他时间下降为零;1937年的顶峰大约是1929年水平的15%。

少数比较客观的企业主发现了1923—1933年的很多乐观的理由,此时个人消费支出下降了40%(见表24.5)。在这些条件下没有新定货需求,而且因此出现了多年的企业存货净清算。外国部门不能提供帮助;1929—1933年间出口值下降了67%,此后几年都徘徊在1929年水平的50%至60%。^⑪

表 24.5 1929—1941 年个人消费、现金—存款比率和利息率

年份	个人消费 支出 (十亿美元)	全国银行 现金与存款 比率	最低利率	90 日 商业票据 利率
1929	77.4	19.8	5.85	5.03
1930	70.1	23.3	3.59	2.48
1931	60.7	22.5	2.64	1.57
1932	48.7	20.0	2.73	1.28
1933	45.9	24.5	1.73	0.63
1934	51.5	28.6	1.02	0.25
1935	55.9	30.5	0.75	0.13
1936	62.2	32.0	0.75	0.15
1937	66.8	31.3	0.94	0.43
1938	64.3	35.3	0.81	0.44
1939	67.2	37.6	0.59	0.44
1940	71.3	42.0	0.56	0.44
1941	81.1	38.9	0.53	0.44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a 75, Cj 220, 225, 1224, 1230; 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table 1.1.5.

^⑩ F. M. Scherer and David Ross,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ird edi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0), pp. 153—156.

^⑪ 1929年,商品和服务的出口达到了70亿美元。1933年下降到了24亿美元。

经历过1929年、1930年和1933年打击而生存下来的银行体系,当利率降低到最低水平以后发展了对现金贷款的非凡觉察力。储蓄者用他们艰难获得的资金冲击了联邦政府的邮政储蓄体系。^⑬ 他们不信任银行的进一步冒险,而银行似乎也不信任公众。正如我们在表24.5看到的,按照存款百分比形成的准备金在1936年上升到了1929年水平的60%,远远高于法定要求,在大萧条其余年份都保持着这个水平。自从股票价格(与过去和未来水平比较)1932年后总体上涨(见表24.4),借款的利息成本变得几乎微不足道。然而,银行还是充斥着闲置现金。^⑭ 大萧条对私人部门似乎具有几乎牢不可破的控制力。只有在1939年9月欧洲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出现了冰冻条件可能解冻的明确信号。然而,即使在1940年,失业(不算为就业而制造的就业)仍然保持在占劳动力15%的水平。萧条持续了10年之久。

2.4 联邦金融

私人预期的变平也可归因于真实力量。联邦流通票据在1932年降到16亿美元的低点。当年全体人员的收入税税率都大幅度提高了。^⑮ 在深度萧条中这种通货紧缩趋势的原因是,胡佛的绝望愿望是在一定程度上平衡预算,降低因收入下降而支出上升造成的赤字——在1932年的选举中遭到他竞争对手抨击的赤字。看一下表24.6的数据,它是规定年度中截止于6月30日的财政年数据。最严重的赤字发生在周期底部,此时收入很低,因而税收也很低。支出大部分是即将离职的胡佛政府所作出的。

表 24.6 1929—1941 年赤字、货币、价格和工业生产的增长

	盈余(+) 或赤字(-) ^a	M_1 (十亿美元)	WPI	CPI (1967=100)	IMP ^b
1929	+38.5	26.6	49.1	51.2	21.6
1930	+7.4	25.8	44.6	50.0	18.0
1931	-52.5	24.1	37.4	45.5	14.9
1932	-43.3	21.1	33.5	41.0	11.6
1933	-26.5	19.9	34.1	38.9	13.8
1934	-40.0	21.9	38.6	40.1	14.9
1935	-33.9	25.9	41.3	41.0	17.3
1936	-41.0	29.6	41.6	41.6	20.4
1937	+3.1	30.9	44.6	43.1	22.4
1938	-17.8	30.5	40.7	42.2	17.6
1939	-25.0	34.2	39.8	41.6	21.6
1940	-3.5	39.7	40.4	41.9	25.1
1941	+17.3	46.5	44.9	44.0	31.6

^a 赤字或盈余是占联邦支出的百分比。

^b IMP 是制造业生产指数。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c 1, 66, Cj 42, Dd 498; 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table 3.2.

⑬ 在邮政储蓄机构,人们可以将货币以固定利息存入邮政局。在大萧条期间,由邮局提供的较低的固定利率对储蓄者来说是最高的。Maureen O'Hara and David Easley, "The Postal Savings System in the Depression," *JEH*, September 1979.

⑭ 到1944年,这些非凡水平的现金储备消失了;比率回到了24.4。

⑮ Stein, *The Fiscal Revolution in America* (1969), pp.33—38.

在1933年到1937年之间,货币收入增长了63%,而实际收入的增长超过43%。价格恢复了一些,对通货膨胀的惧怕也许不是完全可笑的,除了罗斯福总统试图从1933年到1935年提高价格这一荒谬的(而且基本上是违反宪法的)行为。就像没有人注意到地球上最高的山脉是横亘于大洋(菲律宾)的底部一样,GDP在1933—1937年的显著扩张是淹没在大萧条之下。

随着收入的增长,政府收入慢慢恢复至1937年,然后平复下来。在1936年的整个财政年度,支出都在增长,然后在剩余年份下降了19%。曾许诺如果当选就实现预算平衡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6年选举之后提高了赋税,此时已出现即将到来的全面复兴的迹象。结果,1937年和1938年的赤字急剧减少。此外,货币当局由于惧怕通货膨胀爆发,也在减少赤字中起到了辅助作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说:“他们对不敢希望的事情表示了恐惧。”

财政的因果关系后来得到了讨论;注意到如下这一点就足够了:联邦政府的政治惯用手段是反商业的花言巧语,而商业界在与政府打交道过程中存在的心理问题,当时被反对税收的政治氛围加重了。

在1929—1932年间批发价格降低了32%,消费者价格下降了24%。二者在1938年的低迷时期都轻微下降,直到二战前还未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制造业生产在那个时期也大幅下降了48%,但到1937年就恢复了。在1937年和1938年,新的社会债券税开始上缴国库,很大程度提高了联邦收入,但减少了消费者支出——增加了紧缩的压力。1938年急剧后退之后,1940年生产又恢复了,超过了所有前期水平。

我们后面还要更详细地讨论货币政策问题。这里我们只需注意货币供给数据的几个重要方面。活期存款和流通中的货币之和 M_1 ,在1929—1932年间减少了20%多。这次下降大多数发生在1930年的春天。 M_1 的减少小于批发价格的降低,稍稍大于消费者价格的下降。正如彼得·特明所说,单看货币政策问题,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货币供给在1933年和1929年一样多!^{①6}

2.5 菲尔德假设和其他难题

即使这样粗略的介绍,有一点应该清楚的是,理解大萧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最重要的难题之一是有关1929—1941年这段时期的艾利克斯·菲尔德(Alex Field)假设:“总体来看,1929—1941年是美国经济史上任何可比时期以来技术进步最多的年份。”^{①7}这个论断基于以下两个事实。第一,新技术被私人和公共部门广泛采用,这导致了整个20世纪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高速度(在和平时期最高点的基础上进行衡量)。第二,这些年的技术进步既不是看利用了多少,也不仅仅是部分利用,而是为这些年,特别是二战之后生产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对菲尔德来说,战后增长是20世纪30年代确立的趋势的

^{①6} Peter Temin, *Did Monetary Forces Cause the Great Depression?* (1976).

^{①7} Alexander Field, "The Most Technologically Progressive Decade of the Century," *AER*, September 2003, p. 1399.

继续。在萧条期间的发明和创新仍保持活跃和高水平。^⑩ 他认为,这些年的技术进步是非常普遍的。菲尔德指出,由政府 and 大学资助的研究,以及私人研究与开发实验室的成熟,都同样重要。在化学工程中,这十年见证了透明合成树脂(树脂玻璃)、聚四氟乙烯和尼龙的发展。汽车工业实现了在“内燃机为动力的车辆方面的真正的革命性进步”,在航空工业上1936年DC-3型新型客机面世。^⑪ 电话和电力工业快速扩张,电视还在萌芽期。应用钢筋混凝土的新技术体现在这些工程中,如胡佛大坝、金门大桥、林肯隧道、宾夕法尼亚收费公路,并且奠定了战后房地产繁荣的基础。^⑫ 国家高速公路系统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了,使得这个国家的货物运输中橡胶轮的卡车运载次数增多了。与美国经济在大萧条中的表现一样遗憾的是,潜伏在表面之下的是幸运的生产率增长,它对长的时期具有影响。

在短期内,价格在1933年之后并没有像制造业生产那样恢复到原来水平。我们可以在表24.6中看到, M_1 在1933—1937年间增加了46%,批发价格上升了33%,而制造业增长了64%。而且,现价的GDP增长了63%,而实际GDP在相同的短时期内增长了43%。因此,与凯恩斯所说的相反,到1937年经济表现出非凡的强盛。失业已经从顶峰时的1933年下降了42%。但是,经济又在1938年的衰退中失去很多。

似乎很清楚的是,1933—1937年的扩张几乎不能被限定为回归1929年的经济繁荣,对联邦政策的露骨批评暗示着,本来是可以矫正至少是部分矫正的大萧条被毫无必要地延长了。这个问题下一章将会讨论。当下,我们需要关注两个引起重要悖论的问题:是什么引起了最初的下滑?为什么它会持续这么长时间?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几个不同的、极富争论的答案。

3. 对大萧条的解释

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大萧条的争论在两方展开,一方主张基于经济的货币层面(货币主义者)的解释,另一方主张基于真实层面(凯恩斯主义者)的解释。这类研究大多数的核心观点是认为最初下滑的原因是1929年股票市场崩盘和1930年的银行危机,

^⑩ 生产率增长专业的学生们发现1905至1966年的增长率比之前或之后的增长率高得多。Moses Abramovitz and Paul David, "American Macroeconomic Growth in the Era of Knowledge-Based Progress: The Long Run Perspective," in Stanley Engerman and Robert Gallm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Robert Gordon, "U. S. Economic Growth Since 1870: One Big Wav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no. 2, May 1999; and Robert Gordon, "Does the New Economy Measure Up to the Great Inventions of the Pas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4, no. 4, Fall 2000. 在1905年之前和1966年之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较大部分可以归功于资本深化。

^⑪ Field (2003), *op. cit.*, p. 1407.

^⑫ 萧条时代公共基金对其他基础设施也是有用的,如供水和废水处理也是突然增加的基础设施。

紧跟着的是持续两年的大跳水,以 1933 年早期大量银行破产和倒闭宣告结束。^② 还有许多关于大萧条的其他解释。^③ 我们将考察的另一种观点是强调金本位制的国际观点。无论采信哪种观点,联邦政府及其机构都扮演了一个关键的、通常是负面的角色。

3.1 货币主义者的观点

货币主义者的观点自然从货币描述开始,如果正确的话,有助于解释萧条会如此深,持续如此之久。在不朽著作《美国货币史》中,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将注意力集中于为什么比较严重的衰退变成了大萧条。^④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证明,在 1930 年年末存款与储蓄之比占存款与现金之比的比例下降了。随着公众将他们金钱的更大份额作为现金形式持有,银行体系中的存款,进而储蓄都收缩了。货币供给的减少导致总需求萎缩。此外,总支出下降了,这导致了产出、收入、就业和价格的降低。这反过来又引起了货币供给的进一步减少,同样变化的还有产出和收入。当银行试图通过减少贷款来补充储蓄缺口时,又会出现接下来的降低。货币主义者相信在 1930 年 11 月的首次银行恐慌时,这个链条就开始运转了。尽管联邦确实试图向系统中注入额外的储蓄,但这还是一个太少、太迟的经典案例。

联邦政府只有两个工具来对付银行危机,其中只有一个包含在 1913 年的《联邦储备法案》中。正式来看,它只能降低贴现率,即成员银行从美联储借款的利率。必需的抵押担保也是短期的、自动清偿的商业票据,当经济处于低迷时,这也会越来越少。非正式来看,在本杰明·斯特朗领导下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已经实施了反周期的公开市场业务,但是,斯特朗死后,这个机构的权力已经转移到了位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即使斯特朗还活着,银行危机的区域既定,1930 年年末的扩张性政策是否成功还是个问题。

艾尔姆斯·威克尔(Elmus Wicker)发现 1930 年 11 月和 12 月倒闭的 120 家银行全部位于东南部,而且和位于纳什维尔的考德威尔及其公司的倒闭有关。^⑤ 考德威尔和其他很多企业家控制了南部银行的主要环节。当他们遭遇 1929 年的金融困难时,他们试图寻找合作者,并在 1930 年与邦可·肯塔基合并,后者是一个银行控股集团。邦可·肯塔基也处于金融窘境中。考德威尔及其公司的倒闭在一至两周之内扩散到两个集团的所有银行。似乎有问题的是,联邦本来可以将政策集中于这个区域而阻止这次恐慌。

^② Brunner (1981) 全身心致力于大萧条早期的研究。布伦纳的“导论”是对这个问题的总结。关于美联储在 1929—1932 年间的政策存在突出的问题,关于它自身作为“最终借款人”的保证。从证据中,令人怀疑的是联储的管理者认为拯救数千家破产银行是联储的责任。而且,他们通过在 1931 和 1932 年购买政府债券而进行的“景气恢复”的努力,似乎被商业银行借贷政策的谨慎而挫败,尽管联储是有意图地“强制”恢复,或者通过这样的方式努力去做。Jonathan Hughes, “Stagnation Without 'Flation': The 1930s Again,” in Barry Siegel, ed., *Money in Crisis: The Federal Reserve, The Economy, and Monetary Reform* (Cambridge, MA: Ballinger, 1984); Gerald Epstein and Thomas Ferguson, “Monetary Policy, Loan Liquidation, and Industrial Conflict: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Open Market Operations of 1932,”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4, no. 4, December 1984.

^③ 一个没有被直接讨论的是熊彼特主义的观点,认为技术进步率放慢是大萧条的一个原因。Richard Szostak,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95), 是熊彼特主义传统的著作。

^④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3). 他们关于大萧条的一个较长章节是后来单独出版的, *The Great Contra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还参见 Anna Schwartz's defense of it in Brunner (1981), chap. 1. 这一卷包括阿兰·梅特泽尔、托马斯·迈耶和其他捍卫货币主义方法的学者的文章。梅特泽尔的文章讨论了 1931 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紧缩后果。

^⑤ Elmus Wicker, *The Banking Panic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1996).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重点研究了1930年12月美国私人银行的倒闭。部分地,这是名字的结果,在19世纪早期又叫做公共—私人冒险事业。部分地,它是银行良好信誉的结果。然而,管理上的改变已经发生了,从父亲到儿子,而儿子采取了很多有问题的操作,导致了银行在倒闭时期失去了偿债能力。而且,就这种状况联邦能够做得非常少;据说银行“应该”倒闭。再者,正如威克尔所说,既然银行在布鲁克林,如果这场倒闭本来是故事的主要部分,那么在纽约市应该能够感知到这个效应。相反,破产在南部继续,在那里发生了11月的破产。^⑤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斯特朗本不会放任事件恶化到这种程度。他们相信在斯特朗死后不久,货币政策制度发生了改变。联邦在1928年提高了利率,而后没有在1929年泡沫破裂之前阻止其产生。^⑥ 联邦允许名义货币供给下降,实际上在1930年一度提高了其再贴现率,然后当成千上万银行破产时它又坐视不管,直到它的借款人毁灭,周围经济形势陷入凄凉之中。

亚历山大·菲尔德在他对20世纪20年代股票市场的研究中,认为强调股票价格的上涨(在1921年8月和顶峰时期的1929年9月之间上涨了334%)掩盖了更显著的数量上的扩张(同一时期增加了1478%)。^⑦ 数量的扩大反映出市场上公众参与程度提高了(以及未来参与的预期),而且产生了货币交易需求的一个巨大增长。因为批发价格自1922年开始每年平均降低1%,实际利率在1928—1929年达到了惊人的高水平,该水平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才又重现,高水平的实际利率抑制了那些靠利率融资的经济部门的需求,如新的建筑行业和汽车行业。菲尔德认为这开启了低迷;股市的崩盘加强了低迷。

在1930年银行破产的第一波过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药方并不足以扭转趋势,菲尔德认为如果在1928—1929年接着采用更简单的货币政策,可能经济能够实现更温和的着陆。更近些时候,劳伦斯·克里斯蒂安诺(Lawrence Christiano)、罗伯托·莫托(Roberto Motto)、马西默·罗斯泰格诺(Massimo Rostagno)认为开始于1929年第四季度的反周期的政策,货币增长率的暂时提高,本应造成30年代轻微衰退而不是大萧条。^⑧ 相反,美联储集中精力控制泡沫,它没有认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提高了交易需求。正如事实那样,危机的发展是在第一轮银行破产中清醒之后,紧缩货币和流动性的时期开始了衰退。

第二波银行破产始于1931年3月,而且到当年秋天,美联储的政策变得更为苛刻——这是为什么萧条会如此之深、如此之长的一个原因。接着,美联储在帮助经济复

^⑤ Charles Calomiris and Joseph Mason, "Consequences of Bank Distres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3, no. 3, June 2003, 讨论了银行信贷供给中的变量是怎样解释国民收入增长的大量变化的。

^⑥ 某种程度上不同的解释能够在以下文章中发现;David Wheelock, "The Strategy, Effectiveness, and Consistency of Federal Reserve Monetary Policy, 1924—1933," *EEH*, October 1989; 而且特别是, Allan Meltzer, *A History of the Federal Reserve* (2003)。

^⑦ Alexander Field,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Onse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JEH*, June 1984. 也参见 James Hamilton, "Monetary Factors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JME*, January 1987.

^⑧ Lawrence Christiano, Roberto Motto, and Massimo Rostagno,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Friedman-Schwartz Hypothesi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35, no. 6, December 2003, part 2. 这篇文章随后有来自 Michael Bordo 和 Lee Ohanian 的评论。

苏方面做的很少。^②但是它在1936—1937年继续实施的政策却被认为助长了1938年的衰退。

那些不赞同货币主义者的解释的人,很快会注意到,在1930年晚期货币供给下降之后利息率并没有相应迅速提高,就像在1931年晚期股票市场崩盘之前那样。这一事实表明需要更多地关注货币需求。这在货币主义者看来可能是保持稳定的,但它出于某些事实效应的原因,有可能是下降的。

3.2 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在那些不赞同货币主义独有的解释的人中间,凯恩斯主义者尤其会急忙保护他们领袖的价值,毕竟他们的领袖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是古典经济学预测经济发展可能趋势失败之后的直接结果。也许最重要的工作是由一位经济历史学家做出的。彼得·特明的《货币的力量引起了大萧条?》详细地从另一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③1929年之后利率呈下降趋势,没有证据表明经济遭受了用于交易目的货币实际短缺,这使得特明对纯货币主义的解释产生了质疑。首先,正如先前所提到的,实际货币供给到1932年就大约和1929年的水平相当。特明发现,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并独立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是个人消费支出的下降(见表24.5),它在1929—1930年下降了9%多(现价),然后在1930—1931年又下降了13.5%,1931—1932年又下降了19.8%。^④在1929—1933年总共无情地下降了41%。在兴旺的20年代巨大的消费和股票市场繁荣之后,千百万美国人合上了他们的钱包,在当期收入条件下冻结了他们的支出。

在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之间接下来的大部分争论中,一个缺陷就是双方关注的是不同的维度。特明和凯恩斯主义者对于紧缩的第一个两年和私人支出的最初下降更感兴趣,他们称,他们已经警觉会发生银行破产和货币崩溃。这样,他们从根本上忽视了第一年,而把注意力集中在1930年10月份银行破产第一波之后的时期,因而不能有效地批评弗里德曼—施瓦茨分析的主要信条。货币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萧条的独一无二的深度和严重程度;这样,他们很自然地将注意力集中于1931—1933年这个时期,此时紧缩呈现出空前的加速度。

特明的结论让很多经济学家都不高兴。他们没有一般的看法,把消费看做一个独立

^② 如果在1933年至战争即将到来的1939年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利率是1%或者更低,利率在最低程度——即它们不能再由货币政策促使地更低——那么就会出现凯恩斯主义的“流动性陷阱”。如果这样,货币政策实际上没有或很少有空间使经济恢复。Richard Sutch相信流动性陷阱确实是存在的,参见, Richard Sutch, “Notes on the In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During a Keynesian Depression; The Crises of Liquid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Certain Dates in 1932,” forthcoming. 即将出版,授权引用。

^③ Temin (1976)。

^④ Temin (1976), p. 64. 还参见他在Brunner(1981)中的反驳,题目是“Notes on the Cause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关于这个问题他的思想还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找到: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1989)。关于对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反驳和对特明的批评,见 Thomas Mayer, “Money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A Critique of Professor Temin's Thesi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5, no. 2, April 1978. Martha Olney对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信贷的分析支持了特明的观点。消费者为了分期付款会减少新商品的购买。对未来的担心还会导致消费者在旧的分期付款合同偿还完毕后减少新的分期购买合同。Martha Olney, “Consumer Durables in the Interwar Years: New Estimates, New Patterns,”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2 (1990)。克里斯蒂娜·罗默也基于与Olney相似的理由支持特明的观点。Christina Romer, “The Great Crash and the Onse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QJE*, August 1990。

因素。在解释经济周期方面他们习惯的分析目标是私人投资的不稳定性。^②而且,如果特明是正确的,那么大萧条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上帝的行为。这没有简单的目标,不能责备任何人。然而罗伯特·戈登和詹姆斯·威尔考克斯却独立自主地,也许是不情愿地同意特明的观点:

股票市场崩溃造成消费支出的巨幅的突如其来的下降,随后的住宅建设的下降进一步恶化,后两者相互作用。^③

这些因素一起给予大萧条以独特的“非货币”的开端。在任何情况下,为什么不能阻止消费进入那些条件中?非消费是多么好的投资!正如乔尔·默克尔(Joel Mokyr)所认为的那样,假定在1929年股票市场垮台之后,风险厌恶的财富持有者决定只是持有现金——假定他们不把钱放在银行里。在实际条件中,按照1933年的消费者价格下降程度来衡量,他们的闲散资金只能将获得25%的收益。如果按照1929—1932年间的批发价格来衡量,他们守候着失去光泽的银山,每年就将获得约10%的收益。

证明真实效应肯定在紧缩的最初两年就发挥了作用,比决定那些因素是什么要容易得多,而对每一种因素指派具体的数量贡献,则更难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从1928年冬天开始,美联储就实施了从紧的货币政策,货币供给增长率放慢了。然而,类似的减少在20年代就早已发生了,没有引起名义收入的大幅减少。这样,反过来考虑实际支出的每一个构成部分就有些有趣了。在凯恩斯主义的模型中,他们其中任何一个的下降都将导致收入和产出的加倍下降。

3.2.1 投资

大多数学者都将他们的研究集中在经济的两个部门:建筑业和汽车业。博尔特·希克曼(Bert Hickman)证明了对建筑业投资下降有影响的两种不同效应:20世纪20年代中期建筑过多和人口增长的下降。^④据称在1923—1928年间,实际住宅建筑数量是一战之前十年间(平均)的两倍多。1924—1927年间实际住宅建筑与实际GNP的比率与20世纪的一样高。及至1940年年末,住宅一产出比率仍然比20年代中期的一半还少。在最近的研究中,戈登认为这个发现是“简单的错误”,他相信,“如果20世纪20年代有什么事是过剩的,那么它是……非住宅投资。”^⑤

不管谁是正确的,都值得提问的是,为什么这些建好的房屋没有购买者?希克曼将在20年代早期和30年代中期之间可观察到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分解为两个原因:(1)是由于“标准家庭”人数的下降(主要是一战后采用的移民限制的结果);(2)是由于1929年以后收入水平的下降。投资的下降对大萧条时期收入的下降具有多大作用?希克曼估计,假定在1925—1930年间收入水平不变,标准家庭实际人数的减少导致了合意

^② Robert Aaron Gordon, *Economic Instability and Growth: The American Recor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③ Gordon and Wilcox (1981), p. 80.

^④ Bert Hickman, “What Became of the Building Cycle?” in Paul David and Melvin Rede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 (1973).

^⑤ Robert J. Gordon, “The 1920s and the 1990s in Mutual Reflecti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1778, November 2005, 错误计算了“基期年相对价格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居民结构有偏,使70或1980年代的相对价格较高。”(p. 19).

的住宅起始支出减少了49%，大约是1925年GNP的4%。^⑤而这可能是比较少的，戈登认为它更小，4%要远远大于联邦政府支出的百分比。

汽车产量在1921—1929年间增加了三倍，这个增长需要生产者大量的额外投资。投资率到20世纪20年代末明显下降了。工业扩张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恰恰在汽车市场变得“饱和”（即新车购买率已经达到顶峰）之时产生了过剩的产能。在20年代伊始，那些想获得一辆汽车的人不得不购买新车，但是，到这个十年之末，二手车市场已经繁荣发展起来了。据称，亨利·福特突然不得不自己和自己竞争。

劳埃德·默瑟（Lloyd Mercer）和道格拉斯·摩根（Douglas Morgan）将产能定义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⑥他们将汽车工业的资本实际利用率和理论基准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在20年代晚期存在过剩产能的话，也是相对较小的。事实上，直到1929年春天也有额外投资的理由。类似地，他们发现，当市场在20年代倾向于饱和的时候，最早的饱和直到1930年才达到。

根据这个思路，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提出了“长期停滞”的思想。^⑦疆域拓展的结束，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以及投资机会的枯竭作为最深处的根本力量——这一点与熊彼特主义的观点一致——永久地弱化私人投资激励，而且因此弱化美国经济增长。大萧条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一个相似的、长期的分析，虽然是一个不太悲观的分析，是由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在他的《收入与就业理论》中提出的。^⑧威尔逊提出了一个理论和实证观点，20世纪20年代前期的投资繁荣产生了大量工业过剩产能，在新的进展能够发生之前不得利用（或放弃）它。30年代的萧条是它的结果，新的投资在产能过剩的基础工业中是不必要的。而且，和汉森的信仰一致，威尔逊认为，当萧条延滞时，没有足够的新发明，以产生在主要的生产部门投资的全新的需求。在表24.4中显示的一组专利数据支持威尔逊的这个论点。

当然，在30年代的萧条中，并非经济的所有部分都遭受同样方式、同等程度的境遇。化工、石油、食品生产和机器制造等工业在投资、产量和就业方面都扩大了。迈克尔·伯恩斯坦（Michael Bernstein）揭示出大多数针对工业的新政政策，事实上瞄准的是支持老牌的基础工业（例如，纺织，伐木，初级金属），这是至二战期间得以保留的创新，而且又直到朝鲜战争期间，在后面的几十年中最终挣扎，需要保护其免于竞争。他们是30年代最停滞的工业，而且事实上是威尔逊所说的遭受过剩产能困扰的那些产业。^⑨

总之，投资支出下降的影响被延迟，但是当用于消费和存货投资的支出在1930年开

^⑤ Alexander Field, “Uncontrolled Land Development and the Duration of the Depr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EH*, December 1992, 说明20世纪20年代无计划的发展模式延长了30年代的萧条。

^⑥ Lloyd Mercer and Douglas Morgan, “The American Automobile Industry, Investment Demand, Capacity,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1921—1940,” *JPE*, November/December 1972; and Lloyd Mercer and Douglas Morg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Market Saturation: Evaluation for the Automobile Market in the Late Twenties,” *EEH*, Spring 1972.

^⑦ 阿尔文·汉森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了说明，包括一本书，*Full Recovery or Stagn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39)。最短的声明是他的文章“Economic Progress and Declining Population Growth,” *AER*, May 1938。

^⑧ Thomas Wilson, *Essays in Income and Employment* (New York: Pitman, 1949)。

^⑨ Michael Bernstein, *The Great Depression* (1987)。

始下降时,投资的先行崩溃使紧缩更为严重了。缺乏创新的、长期的停滞使得美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长时间的萧条。

3.2.2 消费

消费减少了,部分地是因为支出的其他组成部分减少了。而且,正如特明所认为的那样,有些减少可以归因于股票市场崩盘造成消费者财富的损失。里克·米什金(Rick Mishkin)认为不存在恰当的数据来估计同期的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他采用了一个战后模型来估算在1930—1941年间的一个代表性家庭的收支平衡账单。^①破产造成的消费者财富的减少可以解释45%的在衰退的第一年的消费和投资的减少。它还解释了为什么投资衰竭并没有在初期引起经济下滑;它被股票市场泡沫导致的消费支出所遮蔽了。股票市场的崩溃使消费支出剧烈下降,与接下来更为严重的投资下降交互作用在一起。

经济学家假定,消费和储蓄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未来信心的基础上,或者是需要它。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认为危机产生了未来收入和就业的不确定性,这导致了耐用昂贵消费品支出的减少。^②最引人注目的影响是可观察到的汽车登记和百货公司销售的剧烈下降。同时,杂货店销量在增长。罗默认为消费模式是消费者回避“不可复原”的商品的结果,尽管他们没有改变未来收入的估计。潜在的消费者从现期收入中节约,导致对产品和服务产量的当期需求的降低。储蓄增加,卖不出的商品存货堆积,新订单减少,工厂倒闭,男男女女们失去工作。

斯坦利·莱博高特在对个人消费支出的研究中,比较了1920—1921年及1929—1930年下滑期间的部门之间支出。^③在这两个时期,经历了严重的下降的部门数量一样多,但是与大萧条不同的是几乎没有部门是重复经历的。而且,直到1930年和1931年消费还没有恢复到以前时期的水平。像罗默那样提到“不可还原”的耐用消费品购买,莱博高特注意到“适合于新的高收入水平的习惯并不会严格地在合适的位置上。”事实上,在大萧条期间,正是劳动力中就业的那部分人,而不是失业的那部分,停止了消费。莱博高特经过计算得出,1930年那些失业的人节制一切消费,那些就业的人继续以1929年同样的比率消费,1930年的总消费仅仅比1929年的消费少了6%。^④

3.2.3 政府支出

在这章的前面我们考察过联邦财政政策。在1929年,联邦政府的支出仅仅占GDP的2.5%,各州和地方支出总和也只比联邦政府多一点点,注意到这一点就足够了。为了一切意图和目的,联邦政府不得不在支出规模上几乎扩大了2倍,只是为了抵消建筑业投资下降的效应。这样,20年代的联邦政府预算盈余不可能引起萧条,但是减税方案被通过,以消除在经济下降之后出现的赤字,有可能使萧条更深,持续时间更长。联邦税收在1932年、1935年和1937年增加了,而后于1937年制定了新的社会保障税。^⑤在萧条的大部分时期,各层政府征收的税尽可能多。对凯恩斯来说,在下滑期间增加税收和应

^① Frederic Mishkin, "The Household Balance Sheet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JEH*, December 1978.

^② Romer (1990).

^③ Stanley Lebergott,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New Measures & Old Motives* (1996).

^④ *Ibid.*, p. 12.

^⑤ *Ibid.*, pp. 81—90.

该做的正好相反。用最原始的凯恩斯术语来说,1937年为减少赤字的增税政策把经济投入了1938年的衰退之中。

补偿性财政政策(compensating fiscal policy)的思想,通过补偿性的税收和支出计划平滑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主要是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萧条的结果。^④如果下降趋势中出现政府赤字,而在扩张时期积累财政盈余,那么政府在整个周期过程中的预算可以保持“平衡”,即使在特定的年份不是这样。补偿性财政政策应该使人人满意。政策不仅可以产生一个更大更长时间的增长模式,而且顺便能够使债务管理问题变得容易。在利率下降时,债务会积累,而当利息率在经济扩张时期上升时,债务会得到清偿。

最重要的是弥补私人投资的不稳定性。凯恩斯将1929—1933年的投资崩溃和之后的投资低迷视为不得不去控制的情形:“因此,我认为,带有综合社会化的投资将会改善仅有的那些方法,获得接近充分就业水平的结果。”^⑤凯恩斯认为,经济系统不存在自动维持稳态充分就业的机制。这就是《通论》及其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的核心信条。

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新政(相对)巨大的支出计划是这一信条的第一次成果,使得萧条与之本来状况比较,稍微不严重些,而与此同时从荒唐结果中改革和挽救了美国资本主义。

E. 凯利·布朗(E. Cary Brown)一项1956年的研究突然令人震惊地动摇了这个乐观的观点。布朗发现,联邦赤字支出的增加几乎不能弥补其他支出的下降,同时还有各州及地方政府层次的不正当的税收政策。布朗还研究了罗斯福针对私人支出的反周期政治立场对萧条的可能影响。布朗写道,结果是,30年代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没有多少扩张性效应。复苏,和它表现的那样,主要来自于受困扰的私人部门:

作用于充分就业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其直接效应的趋势在整个30年代无疑是下降的。对于这个时期已经实现的复苏,在一定的私人可支配收入中私人需求本来应该比1929年的水平要高些。而后财政政策似乎是30年代不成功的复苏策略——不是因为它没有发挥作用,而是因为它没有经过试验。^⑥

其他经济学家,特别是阿尔文·汉森,更早质疑同样的这点。新政并不是凯恩斯主义的福地。而且,作为一种“计划经济”(像拉克斯福德·塔格威尔(Rexford Tugwell)那些人所希望的),新政是一个半身像。^⑦确实发生的计划是政治推动的,是偶然的,而且没有足够的力量持续推进。新政并没有做到像战时动员那样:结束萧条。

如果不考虑其他政策,很清楚联邦支出(1)不是持续扩张的;(2)从来没有将失业减少到1929年,哪怕是1930年的水平。整个萧条时期都维持了特别高的失业。正如赫伯特·斯特恩(Herbert Stein)强调的那样,财政政策的回转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对政策的彻底无知和混乱。^⑧

当大萧条期间的财政政策逃脱了建立在大量货币政策上的大部分责难之时,税率的

^④ Stein (1969), pp. 151—168.

^⑤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6), p. 378.

^⑥ E. Cary Brown, “Fiscal Policy in the Thirties: A Reappraisal,” *AER*, December 1956, p. 863.

^⑦ Otis Graham, Jr., *Toward a Planned Society: From Roosevelt to Nixon* (1976), p. 67.

^⑧ *Ibid.*, chaps. 5—7.

提高是荒谬的。在一定程度上这被支出增长抵消了,但是当前的研究得出结论,最多“财政政策是无用的”。

3.2.4 净出口

在1932年的选举运动中,一种长期以来的权威观点认为,1936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使衰退恶化了。有效关税税率在1929—1933年间提高了大约50%(见图24.2)。假设外国并没有实施报复,关税提高了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而且结束了国内商品的替代,以至于产量下降得比原来更多,而价格则下降得较少。假如受到报复,美国出口需求将下降;这样,产量将会按照标准的凯恩斯机制下降。特别是,报复使美国食品出口在1929—1932年下降了66%,而美国农产品价格严重下跌。这个下降,反过来又引起1930年一系列农业银行的破产。正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那些银行的破产在加深衰退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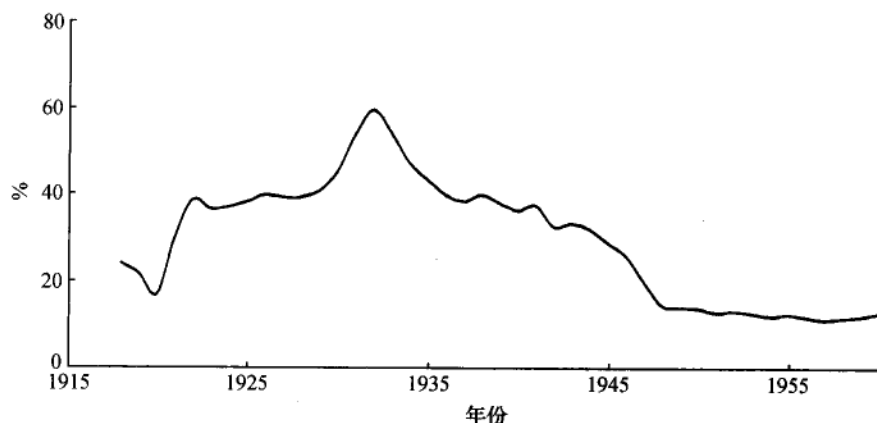


图 24.2 1918—1960 年关税收入比应税进口商品价值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Ee 429.

近期关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研究不那么困难了。据称贸易的缩减更多的是萧条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道格拉斯·埃尔文(Douglas Irwin)最近给出了一个数量估计。在1930年第二季度和1932年第三季度之间美国进口下降了40%多一点。埃尔文估计大约这个下降的1/4可以归因于有效关税税率的提高(《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加上通货紧缩)。进口份额是既定的小规模(1930年是GDP的4.9%),这意味着《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效应占住宅建设下降的1/10。^⑤ 马里奥·克鲁西尼(Mario Crucini)和詹姆斯·卡恩(James Kahn)给出了另一种观点。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包括报复和引致的资本市场扭曲在内,《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使GDP减少了2%,大概是埃尔文估计的5倍。因为单独这个原因就足以引起衰退,所以应该注意到这仅仅是住宅建设的一半。^⑥

总之,凯恩斯主义者赞同美联储恶化了萧条,但是他们不认为关于萧条的开始还有很

^⑤ Douglas Irwin, "The Smoot-Hawley Tariff: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REStat*, May 1998.

^⑥ Mario J. Crucini and James Kahn, "Tariffs and Aggregate Economic Activity: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38, no. 3, December 1996.

多工作可做。源头可以追溯到1928年建筑投资的低迷和1929年股市崩盘以后消费的减少。

3.3 国际观点

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都强调美国经济的内部因素。国际观点则强调经济外部因素,特别是金本位制。正是金本位制政策使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低迷演变成了大萧条。这个观点起源于一个非常古老的文献,其错综复杂的踪迹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货币破坏。^⑤

在国际观点中,美国事件只是更大的因素中的一部分(尽管是关键的部分)。^⑥ 这个因素在历史上运行很久了,就像由于战争和流感使人类在1914—1918年失去欧洲一样,长期贸易条件对世界初级产品生产者不利;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也这么认为。^⑦ 和那个联系在一起的是战后欧洲工业现代化的失败。后面的争论是由英格瓦·斯文尼尔森(Ingvar Svennilson)提出的,这是个令人着迷的关于大萧条的观点,就其广度和深度给出了不同于已有观点的解释。^⑧

有个一般的共同看法是,用总需求曲线左移和向上倾斜的总供给曲线可以最充分地解释萧条。使总需求曲线左移的因素是已经讨论过的那些扰动。关于什么时候总供给曲线变得向上倾斜,在宏观经济学家之间还保留着相当多的争论。是在进入20世纪之交还是接近大萧条时期?在一定程度上,这个争论与以下问题相联系,即什么时候人事部门(在公司内将工头替换为雇佣的核心)成为有效率的工资制定者。

一个正在出现的一致观点认为,美联储在1928年的紧缩政策使美国1929年的工业生产放缓了。^⑨ 美联储试图减少股票市场的投机,并且在法国低估金价之后阻止黄金流入法国,但是这两个目标都没有实现。在黄金本位制下,美国最适当的政策就是通货紧缩。较低的价格能够减少进口和增加出口,可以改善贸易平衡并吸引黄金流入。正如我们所见,这项紧缩货币政策,加上货币交易需求的增加,造成了名义利率和真实利率的显著提高。正如彼得·特明在《大萧条的教训》一书中所坚持认为的那样,这是在通货紧缩和汇率贬值之间进行的选择。对特明来说,通货紧缩政策是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倾向的选择,它是决定大萧条深度的最重要因素。^⑩ 然而,在一战的后果中,紧缩工资和价格并不容易。工人期望在政策中反映他们在战时牺牲的声音,企业接受胡佛的要求维持工资率

^⑤ 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1973); Folke Hilgerdt, *The Network of World Trade* (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1942); and Ragnar Nurks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Experience: Lessons of the Interwar Period* (Princeton: League of Nations, 1944). 还参见, Gertrude Fremling, "Did the United States Transmit the Great Depression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no. 5, December 1985. Fremling 赞同金德伯格的观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世界范围内的起源。最近, Gene Smiley, *Rethink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Chicago: Ivan Dee, 2002), 在一本书中采纳了这个方法,目的是面向大众。

^⑥ Christina Romer, "The Nation in Depression," *JEP*, Spring 1993, 她认为美国1930年全年的事件能够由国内因素单独解释。

^⑦ W. Arthur Lewis, *Economic Survey, 1919—1939*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49).

^⑧ Ingvar Svennilson, *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the European Economy* (Geneva: United Nations, 1954).

^⑨ Hamilton (1987) documents the contractionary open market sale of securities beginning in 1928.

^⑩ Temin (1989).

不变,当经济下滑时有助于减少工资弹性。^⑤ 相对稳定的工资导致产量和就业下降;这样,正在降低的价格和工资无法吸收掉需求下降造成的全部冲击。附带说明一下,萧条最严重的那些国家,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真实工资最高的那些国家。

更高利率的结果是黄金开始流入美国,此后美国保持了限制性政策。坚持黄金本位制本来不能是唯一的政策目标。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提到,美国限制性的货币政策诱使其他国家采取了类似的政策。^⑥ 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这样形容它:

……20世纪30年代早期世界范围内的货币紧缩,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对降低产量的被动反应,相反主要是缺乏设计的制度、短视的政策制定、不适宜的政治和经济先决条件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无意识的结果。^⑦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欧洲国家的黄金存量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处于低水平。这样,当美国利率上升时,其他国家不得不提高贴现率,并限制国内信贷,以保持黄金平价。正如艾肯格林在《黄金镣铐》中所认为的那样,萧条被证实是如此严重,因为传递机制通过金本位制的镣铐而发挥作用。抵御不利冲击捍卫金本位制的必要措施将严重的下滑转变成了世界性风暴。事实上,衰退倾向在美国显现之前,在大多数依赖引进资本的国家,衰退趋势是可观察到的:

……然而对于美国经济异常迅速的紧缩,并没有显示出令人满意的唯一解释因素,一个更折中的方法具有相当的解释力。这个时期成了美国衰退演变为货币紧缩政策的时机……联邦储备委员会政策的转向引起了外国更加紧缩的政策转变。因此美国出口减少了。接下来华尔街的破产使得消费者推迟了昂贵商品的消费……在1930年的下半年,货币政策再一次转向紧缩加强了通货紧缩的趋势。^⑧

1930年银行恐慌的第一波浪潮之后,美国经济经历了三次更大的浪潮。第一次发生在1931年春季。第二次出现于1931年9月,当时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第三次出现在1933年的晚冬,富兰克林·罗斯福发表了就职演说。是否不太严格的货币政策可能引发了1931年之前的萧条浪潮,对这个争论进行了讨论。在争论中一个关键假设是金本位制并不是应当遵守的约束。1931年中期以后,这个假设变得很难维持。当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后,美国也经历了黄金外流;美国的投机贬值了。此时,美联储急剧提高了贴现率,尽管美国经济正在快速紧缩,而且拥有大量的黄金储备。艾肯格林注意到金本位制需要美联储采取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以期防止更多的黄金流出。^⑨ 迈克尔·博多

^⑤ 关于总供给方的国际观点的含义的讨论,参见 Ben Bernanke, "The Macroeconomic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JMCB*, February 1995, pp. 16—25.

^⑥ Barry Eichengreen, "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the Great Slump Revisited," *EHR*, May 1992, 这是一篇关于近期学者看待大萧条的出色的综述,还参见他的, Barry Eichengreen and Jeffrey Sachs, "Exchange Rates and Economic Recovery in the 1930s," *JEH*, December 1985. 近期利用其他方法综合研究的尝试参见, Barry Eichengreen, "Viewpoint: Understand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7, no. 1, February 2004.

^⑦ Bernanke (1995), pp. 3—4.

^⑧ Eichengreen, "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the Great Slump Revisited" (1992), p. 224.

^⑨ Eichengreen *Golden Fetters* (1992), pp. 293—298.

(Michael Bordo)、伊萨·乔瑞(Ehsan Choudhri)和安娜·施瓦茨认为,扩张性的公开市场操作本来可以防止前两次恐慌的蔓延。^{⑥4}

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恢复了按照一战前比价的黄金支付,为了维持这个比价不得不严格限制国内经济。^{⑥5} 英国由于不能再从外国投资那里获得像战前那样多的财富,所以当收入很好的时候,它就缺乏资源支付进口。如果它不希望黄金流失,英格兰银行就要被迫提高贴现率以吸引短期资本。与金本位制(忽略国内经济)这样的联系,使英国经济在世界其他地方衰退之前就陷入萧条。^{⑥6}

在1931年5月,奥地利最大的银行,信用银行(Kreditanstalt)破产。它的破产将世界金融推向了一系列银行恐慌和汇率危机中。彼得·特明说过奥地利银行可以生存过整个20年代,假设是欧洲国家的疆界在一战后并没有发生剧烈变动,“就像哈布斯堡王朝并没有衰落一样”。^{⑥7} 一份审计报告评论说这个轻率的假设导致了银行的挤兑——然后是先令挤兑。奥地利政府支持金本位制的规则,迅速挥霍掉了储备之后,就实行了外汇控制。这个符咒产生的不确定性首先传导到了德国,德国在1931年的7、8月份放弃了金本位制,然后是英国,英国在9月份放弃了金本位制。正如提到的那样,从英国迅速传导到美国,在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后美国经历了一波银行破产浪潮。^{⑥8} 到了这个时刻,大萧条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现象,一个国家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虽然可能是有帮助的,但并不能制止萧条的趋势。^{⑥9}

作为国会做某事的借口,美联储在1932年春天将政策转变为扩张性的。当议会在7月份推迟的时候,美联储恢复了从紧货币政策的姿态。直到1933年早期,第四波银行恐慌开始,美联储在放弃了金本位制后,才开始了一贯的扩张政策。而且一直持续到开始复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复苏是很迅速的,但是并没有将经济带回到1929年的水平。正如罗默所示,复苏是1933年美元贬值和黄金从国外流入带来的结果。伯南克和其他一些人分析表明,那些挣脱金本位制锁链的国家从萧条中复苏的速度,比那些没有逃离金本位制枷锁的国家快得多;这些国家更能够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正如罗默所强调的,美国扩张的一个原因是欧洲人在美国经济的投资使他们的资产避免了希特勒统治而得以保全。为了这么做,他们不得不用他们的黄金来兑换美元——而且随美元贬值他们用黄金获得了更多的美元。^{⑦0}

查尔斯·卡罗米里斯(Charles Calomiris)从国际观点得出的隐含含义之一是给定一

^{⑥4} Michael D. Bordo, Ehsan U. Choudhri, and Anna J. Schwartz, “Was Expansionary Monetary Policy Feasible During the Great Contracti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Gold Standard Constraint,” *EEH*, January 2002.

^{⑥5} Peter Temin, “Transmiss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JEP*, Spring 1993.

^{⑥6} 对这一时期一个特别机智的分析可以参见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Churchill,” reprinted in Keynes,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63)。

^{⑥7} Temin (1993), p. 94.

^{⑥8} Harold James, “Financial Flows Across Frontiers During the Interwar Depression,” *EHR*, August 1992, pp. 603—606, 讨论了在英国退出金本位制后,特别是1933年7月3日宣布美国没有稳定美元的打算之后,美国人的决定是如何影响了欧洲国家的衰退的。

^{⑥9} Harold James,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考察了货币、银行和国际贸易,以及劳动力是如何分别致使战争期间全球化减弱的。

^{⑦0} Christina Romer, “What Ended the Great Depression?” *JEH*, December 1992.

个货币供应冲击,它的效应会更大,取决于经济如何负债和经济拥有哪种银行体系。^① 在1929年,新的耐用消费品的获得依靠信用购买率上升,以及股票盈余购买力上升,结果是美国经济高度杠杆化。而且,美国拥有“多样化极差,地理位置分散的银行系统”。许多小的、无分支机构的银行制造银行恐慌的可能性更高。^② 而且,当金融市场的特征定义为包括非货币渠道时,货币主义者认为,扩张性的公开市场操作本可以逆转螺旋式下滑的力量。公开市场操作不能置换的财富是借款人和银行的损失。

国际观点赞同货币主义者的看法,在萧条开始之时,货币的紧缩引起实际支出减少,而货币扩张极大地有助于恢复。这与罗默所称的美国国内经济的冲击是美国和世界萧条的原因并不矛盾。它提醒我们,即使进出口只占美国GDP一个非常小的比例,美国也是与世界经济密切联系在一起。

4. 事情处于何种状态

我们的世界从没有回到传统的美国资本主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20世纪30年危机的采取的行动。无论你选择哪种观点,本章所讨论的事件产生的结果是:世界范围内对以完全竞争模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信心的丧失。凯恩斯的《通论》就是这一变化的反映。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的垄断和不完全竞争模型,在微观经济层面反映了这一变化——规模经济是存在的,产品是差异化的,产业进入并不是完全开放的。因为完全竞争假设经济能够自我调节,第一推动力就是要看看发生了什么。关于大萧条的起因,不管你持有哪种看法,公共政策都扮演着主要角色、负面角色。货币主义者集中关注有限制的货币政策;凯恩斯主义者则集中关注有限制的财政政策(以及提高关税税率);国际观点则集中关注要严格坚持金本位制。当经济继续衰退时,对经济“解药”的寻找也加速了。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在1932年当选时决心要“有所作为”。这个作为就是下一章的主题。

推荐阅读

文章

Bernanke, Ben S. “Nonmonetary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3, no. 3, June 1983.

——. “The Macroeconomic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27, no. 1, February 1995.

^① Charles Calomiris, “Financial Factors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JEP*, Spring 1993.

^② See Richard Grossman, “The Shoe That Didn’t Drop: Explaining Banking Stability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JEH*, September 1994, 是对英国和加拿大等国稳定性的解释。关于加拿大案例的更多细节,参见 Joseph Haubrich, “Nonmonetary Effects of Financial Crises: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Canada,”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25, no. 1, March 1990. Daniel Giedeman, “Branch Banking Restrictions and Finance Constraints in Early-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5, no. 1, March 2005, 注意对分支银行的限制导致了对大公司融资的制约。

Bordo, Michael D., Ehsan U. Choudhri, and Anna J. Schwartz. "Was Expansionary Monetary Policy Feasible During the Great Contracti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Gold Standard Constraint."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9, no. 1, January 2002.

Brown, E. Cary. "Fiscal Policy in the Thirties: A Reapprais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6, no. 5, December 1956.

Calomiris, Charles W. "Financial Factors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7, no. 2, Spring 1993.

Darby, Michael. "Three and a Half Million U. S. Employees Have Been Misle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4, no. 1, February 1976.

Eichengreen, Barry. "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the Great Slump Revisite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5, no. 2, May 1992.

Eichengreen, Barry, and Jeffrey Sachs. "Exchange Rates and Economic Recovery in the 1930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5, no. 4, December 1985.

Field, Alexander J.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Onse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4, no. 2, June 1984.

———. "Uncontrolled Land Development and the Duration of the Depr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2, no. 4, December 1992.

———. "The Most Technologically Progressive Decade of the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3, no. 4, September 2003.

Gordon, Robert J., and James A. Wilcox. "Monetaris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n Evaluation and Critique." In Karl Brunner, ed., *The Great Depression Revisited*.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1981.

Grossman, Richard S. "The Shoe That Didn't Drop: Explaining Banking Stability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4, no. 3, September 1994.

Hamilton, James D. "Monetary Factors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13, no. 1, March 1987.

Hansen, Alvin. "Economic Progress and Declining Population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29, no. 1, May 1938.

Hickman, Bert G. "What Became of the Building Cycle?" In Paul David and Melvin Reide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3.

Irwin, Douglas A. "The Smoot-Hawley Tariff: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0, no. 2, May 1998.

James, Harold. "Financial Flows Across Frontiers During the Interwar Depress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5, no. 3, August 1992.

Mercer, Lloyd J., and W. Douglas Morg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Market Saturation: Evaluation for the Automobile Market in the Late Twenti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9, no. 3, Spring 1972.

——. “The American Automobile Industry, Investment Demand, Capacity,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1921—1940.”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0,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72.

Mishkin, Frederic S. “The Household Balance Sheet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8, no. 4, December 1978.

O'Hara, Maureen, and David Easley. “The Postal Savings System in the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9, no. 3, September 1979.

Romer, Christina D. “The Great Crash and the Onse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5, no. 3, August 1990.

——. “What Ended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2, no. 4, December 1992.

——. “The Nation in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7, no. 2, Spring 1993.

Temin, Peter. “Notes on the Cause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Karl Brunner, ed., *The Great Depression Revisited*.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1981.

——. “Transmiss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7, no. 2, Spring 1993.

Wheelock, David. “The Strategy, Effectiveness, and Consistency of Federal Reserve Monetary Policy, 1924—1933.”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6, no. 4, October 1989.

书籍

Bernstein, Michael A. *The Great Depression: Delayed Recovery and Economic Change in America, 1929—193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Brunner, Karl, ed. *The Great Depression Revisited*.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1981.

Chandler, Lester. *America's Greatest Depression: 1929—1941*.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Eichengreen, Barry. *Golden Fetter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9—193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Globalizing Capital.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Friedman, Milton, and Anna J.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Garraty, John A. *The Great Depression: An Inquiry into the Case, Course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Worldwide Depression of the Nineteen-Thirties, As Seen by Contemporaries and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tch, 1986.

Graham, Otis L., Jr. *Toward a Planned Society: From Roosevelt to Nix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Hayek, F. A.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 New York: Augustus Kelley, 1966.

Hughes, Jonathan. *The Governmental Habit Redux: Economic Control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Kindleberger, Charles P.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Lebergott, Stanley.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New Measures & Old Motiv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Meltzer, Allan H. *A History of the Federal Reserve: Volume 1, 1913—195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Robbins, Lionel. *The Great Depression*. London: Macmillan, 1934.

Rothbard, Murray.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Kansas City: Sheed & Ward, 1975.

Schumpeter, Joseph. *Business Cycles*, 2 vols. New York: McGraw-Hill, 1939.

Smiley, Gene.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incinnati, OH: South-Western, 1994.

Stein, Herbert. *The Fiscal Revolution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Szostak, Rick.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5.

Temin, Peter. *Did Monetary Forces Cause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76.

———.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89.

Wicker, Elmus. *The Banking Panic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第 25 章

新 政

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在 1933 年上台,对他的预期是他的新政府在使这个国家摆脱萧条方面将会更加积极进取。回顾起来,很显然他的政府至少做了一些事情,政府比以往大幅度地运用政策工具(所谓的“试验”)——至少从外在改变来看。新政竞选成功(一般归功于邮政局长詹姆斯·法利将军)的处方,“税收,税收,税收。支出,支出,支出。竞选,竞选,竞选”,几乎没有设计用来鼓励私人企业家或者公司主管人员,以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未来方面“孤注一掷”。

在第 22 章,我们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时经济中,防御的需要与社会改革者获得确定的长期的野心结合在一起——例如,引进 8 小时工作日,确认统一交易权,禁止童工,实行最低工资立法。同样的情况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也发生了。复苏的想法与美国资本主义广泛改革的野心联系在一起,与恰当的联邦责任概念中的基础变化联系在一起,因此那个 1929 年将不会再次发生——那就是,新政。^①

1. 紧急措施

要把握罗斯福政府最初 100 天的风格,在今天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最为紧迫的事是银行危机。^②

正如我们在以前章节所见的那样,银行是主要的增长部门。1900—1914 年间商业银行数量从大约 13 000 个增加到 28 000 个。到 1921 年,大约有 31 076 个独立的商业银行。而在 1921—1934 年间,这个数量减少到 16 305 个,有 14 820 个彻底失败了。在 1929 年就有 659 家银行关门。1930 年关门的银行增加到 1 352 家。在 1930 年银行危机之后,更多倒闭了,1931 年倒闭的数量上升到 2 294 家。

在 1932 年,倒闭数量有所下降,为 1 456 家,但是,在 1933 年伊始,新一波破产风潮可能来临,一些州政府开始宣布银行全体休假。^③ 人们涌进银行要求兑付存款单。由于只

^① 参见 Jonathan Hughes, *The Governmental Habit Redux* (1991), pp. 159—181; Jonathan Hughes, “The Roots of Regulation,” in Gary Walton, ed., *Regulatory Change in an Atmosphere of Crisis* (1979); and William Leuchtenburg,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932—1940* (1963). 最好的说明仍然是 Robert Higgs, *Crisis and Leviathan* (1987), chap. 8.

^② 最好的说明仍然是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Age of Roosevel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7, 1959, and 1960), 特别是第二卷。近期一个较好的解释是 William J. Barber, *Designs Within Disorder: Franklin D. Roosevelt, the Economists,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1933—194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③ 对州际银行之间暂停支付率的变化考察,参见 Kris James Mitchener, “Bank Supervision, Regulation, and Instability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JEH*, March 2005。

有部分银行准备金,像现在那样,存款的数量远远超过银行用来应付日常流动的现金。到1933年3月4日,38个州的所有银行都暂停了业务。两天以后,利用一战立法的余权,罗斯福宣告全国银行放假。^④当银行在联邦监管之下重新开业时,发现大约4000多个银行被破产和清算。本·伯南克总结道,20世纪30年代早期(特别是1931年)的银行危机影响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在30年代其余时间里,银行系统不能恢复为有能力的资金调节机制。^⑤

罗斯福政府在金融领域进行了重大变革。1933年3月9日,政府通过《紧急银行法案》,禁止黄金出口。同时授权通货管理审计长任命监督官员负责审查、重开或清算被关闭的银行,动用联邦临时存款保险。停止银行挤兑。由于普遍相信正是华尔街的“滥用”制造了1929年股市的恐慌和接下来的股灾,因此1933年通过了紧急证券法,把华尔街的操纵者掌控在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管理之下。这些改变在未来的立法中将起到更加永久性的影响。

这样的临时措施成了美元贬值的预备步骤。如大家所知,自1900年美国就是法定的严格执行金本位制的国家。现在人们相信,如果国库的金价提高,那么许多利益——增加出口,提高商品价格,恢复充分就业——都会相继发生。^⑥事实上,这个国家“实干的人们”,以及理论经济学家,长久以来都相信操纵货币能够解决广泛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我们看到,巴里·艾肯格林认为,战时金本位制的运用是造成1929—1933年世界范围内的严重大萧条的主要因素。防止金本位制受到负面冲击的“游戏规则”,将本来可能只是一场严重的衰退转变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大萧条。^⑦

罗斯福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坚定地站在了美国传统的主流之中。1933年4月5日,他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储藏黄金。制定了多项安排“号召”所有的美国货币黄金投入流通中,从联邦储备银行开始,然后是财政部。1933年4月20日,另一项法令停止国库为出口兑换黄金。美国脱离了金本位制。然后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以一个不规则不断上涨的价格购买黄金。不重要的事实是在这个建议上罗斯福接受了一些并不专业的意见。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农业经济学家乔治·沃伦(George Warren)就持有这种思想,通过提高黄金的价格,你能够提高所有商品价格。^⑧不幸的是,罗斯福接受了教授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也被国会大多数成员接受了。

除了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金融措施,主要的紧急事件是庞大的失业率。地方失业救济资金大部分都枯竭了。人们向联邦政府寻求帮助,这种信赖使未来前景驶离未知的海洋。胡佛没有考虑过这种责任会滑到联邦政府这个层面。几乎所有类型的救济都很少,按照老传统,这一责任是归各州和地方政权的。胡佛规定联邦可以贷款给州政府用于失

^④ 当危机深化时,美元的趋势,国外黄金需求的增加,是罗斯福当政后贬值预期的结果。Barrie Wigmore, "Was the Bank Holiday of 1933 Caused by a Run on the Dollar?" *JEH*, September 1987.

^⑤ Ben Bernanke, "Nonmonetary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ER*, June 1983.

^⑥ 对1933年事件的一个有趣解释,参见 John Kenneth Galbraith's *Money, Whence It Came, Where It Went* (1975), chap. 14.

^⑦ Barry Eichengreen, *Golden Fetter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9—193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⑧ Galbraith (1975), pp. 210—212.

业救济,但是他反对这样的提案,联邦政府永久的角色源于私人企业的领导者,特别是杰拉德·斯沃普(通用电气总裁)。斯沃普1931年的联邦干预计划,将失业问题社会化,带有胡佛“法西斯主义和垄断”的特征。“斯沃普计划”注定会在1935年的《社会安全法案》中改头换面重新出现。^⑨

罗斯福冲进了胡佛不敢涉足的区域。在1933年的5月20日,他要求国会批准5亿美元拨给各州政府,用于紧急救济。结果,由哈里·霍普金斯领导的联邦紧急救济委员会(FERA)成立了,它成为更多永久性机构的前驱。霍普金斯立刻通过“创造就业”工程将数百万美元发放到人们手里。他在新政年份中因虚构的、创造就业的开销项目而出名。

但是这些是权益之计。不久之后一个联邦参与和经济干预的结构就形成了。一战统制经济的经验现在成了提供策略的手边书。

2. 第一次新政

新政的经济社会计划和制度往往被区分为两部分,第一次新政和第二次新政,概略地以1936年为分界线——或者是在一些学者所认为的1935年。大部分创新行动出现在1936年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大部分是违背宪法的。1936年的选举被认为是新政历史上的分界线。但是,正如约翰·瓦里斯(John Wallis)认为的那样,《瓦格纳法案》、《社会安全法案》和1935年的《拨款紧急救济法案》是重新实施新政的所有活力所在。从以经济为基础的意义来讲,认为第二次新政实际开始于1935年较为合乎逻辑。^⑩

2.1 《国家工业复兴法案》

《国家工业复兴法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NIRA)是第一次新政中最雄心勃勃的部分。它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的启发,是对于胡佛及其他人在20世纪20年代所寻求的经济问题合作解决方法改进研究的结果。这些人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能够在和平时期转化为“工业自治”,只需要联邦选举力量的少量改变。许多经济学家、企业所有者、劳动者领袖,以及政府官员和政治家,都逐渐相信在商业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有害的,它提高不必要的风险水平,造成企业破产和失业,这种可能性比他们必需的要大(更坏)。到1932年,一些美国领导人甚至羡慕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现在似乎是奇怪的事情。

《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是为了减少国内竞争。^⑪ 部分地,这是对商业企业的反应,企业

^⑨ Edward Berkowitz and Kim McQuaid, *Creating the Welfare State* (1988), pp. 92—95.

^⑩ John Wallis, “Why 1933? The Origins and Timing of National Government Growth 1933 to 1940.” *REH*, Supplement 4, 1985.

^⑪ Michael Weinstein, “Some Macroeconomic Impacts of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1933—1935,” in Karl Brunner, ed., *The Great Depression Revisited* (1981). Pamela Pennock, “The National Recovery Association and the Rubber Tire Industry, 1933—1935,”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71, no. 4, Winter 1997,这是个有趣的案例研究。Pennock认为轮胎代码化导致了爆裂的增加和更低的价格,而不是预期的卡特尔和更高价格。最近,关于卡特尔的文献提出了卡特尔能扩张产量的可能性。Jason Taylor, “Output Effects of Government-Sponsored Cartels During the New De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vol. 50, no. 1, March 2002,他得出的结论是NIRA导致了制造业产量的减少,与人们由传统卡特尔理论所预期的一样。

将它们的灾难归因于“不公平的竞争”，特别是那些相信以“成本价之下销售”的竞争者来说。工业自治需要提升反托拉斯诉讼的威胁，以至于企业能够在生产、定价和就业方面公开串谋。这一思想是企业所有者自身能够规划的能盈利的产量和价格，这个产量和价格是一个稳定的、充分就业的经济必然的结果。《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提供的一套机制，正如我们前面所见到的，正是威尔逊总统在一战结束之际放弃采用的。但是在《国家工业复兴法案》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在禁止企业妨碍竞争的串谋行为的同时禁止企业利用削价进行竞争的行为。

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资助的一战战时工业委员会代表之一，休·约翰逊(Hugh Johnson)将军被任命为国家复兴委员会(NRA)主席。企业自我组织起来进入可以确认的行业，每个企业都自动互相在“公平行动规范”上达成一致。国家复兴委员会像以前的战时工业委员会一样，包括三个咨询理事会，代表管理、劳工(又称战时劳工理事会)和“公共部”。^⑫在法案的7A条款中，在国家复兴委员会中的企业就职的工人，被赋予通过他们自己选择的代理人——工会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力。国家复兴委员会一旦批准一个规范，行业中的企业就必须出具签字的接受意见。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有权展示“蓝鹰”勋章。

这个试验，尽管是全新的，但还是短命的。1933年6月16日签署法令，在一年之内共签署了450项规范。到1935年5月，当最高法院否决了《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时(国会过分授权)，已经采纳了550项产业规范。^⑬到那时，罗斯福已经准备让它结束了。政治家意识到它是一个扩张性的非直接管制的沼泽。安德森证明，在使《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成功运用方面，更密集的工业获得“更大的既得利益”。^⑭只有在国家复兴委员会废除之后，工业生产才获得了巨大成功。约80%非农业产业参加了规范，而且超过1000个“不公平”贸易惯例行为(即竞争性技术)在规范中得到了确认或者禁止。前骑兵司令约翰逊将军这样描述国家复兴委员会精神：

新政的核心是在工业和农业方面一致行动原则，在政府监管之下寻求一种平衡经济——反对原始野蛮的竞争和粗鲁的个人主义的残忍教条……自相残杀和罪恶放在最后。^⑮

国家复兴委员会的两部分是注定要存在下来的，国家劳工理事会和公共工程委员会(PWA)。当1935年《国家劳工关系法案》(《瓦格纳法案》)、《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7A条款被重写时，劳工理事会已经变成了国家劳工关系理事会(NLRB)，它保留了联邦在美国劳工关系中的核心力量。在哈罗德·艾克斯(Harold Ickes)领导下的PWA一直持续到

^⑫ 在一战时强制经济与第一次新政之间有很多相似性。除了那些注入NRA中的之外，食品管理局的计划行动再次出现在两个农业管理方案中。美国谷物公司变成了商品信贷公司。紧急舰队公司重新回到了国家海事管理局。而美国住房公司变成了联邦住宅管理局，事实上，大多数罗斯福对这些机构的支持意图都是战争的词藻。

^⑬ *Schechter Poultry Corp v. U. S.*, 295 U.S. 495 (1935).

^⑭ William Anderson, "Risk and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Public Choice*, vol. 103, no. 2, April 2000. 他赞同以下观点，Ellis Hawley, *The New Deal and The Problem of Monopo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结论是这些准则“反映了大多数组织程度较高的商人的利益”。

^⑮ George Gree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Revolution in American Financial Policies," in Brunner (1981), p. 224.

了二战。

2.2 1933 年和 1938 年的 AAA

另一个解决长期问题的新政计划是 1933 年的《农业调整法案》(AAA)。它也被最高法院否决了(在 1936 年),但在 1938 年起草包括食品加工免税规定在内的第二部 AAA 时,1933 年 AAA 中的某些部分被保留了下来。^{①6} 19 世纪晚期走中间道路的民粹主义者的需求是联邦政府应该提供低利率贷款给予间接储备粮食的农场主。^{①7}

人们由于缺钱买食物而挨饿,尽管农产品价格在 1929—1933 年之间实际下降了 50% 以上。正如罗格·兰瑟姆(Roger Ransom)指出的,因为在短期间隔中农业家庭的数量并没有减少,所以人均农业收入减少了。^{①8} 种粮者对微薄的收入感到绝望。由于缺少能够显著提高需求的途径,国会采取允许供给大量减少的办法,以通过预期价格上升来提高农产品收入。到 1933 年,已经有一年的棉花供给,小麦库存也是正常数量的三倍。采取的计划是为了恢复农业价格到“平价”水平——农产品与非农产品价格比率恢复到 1909—1914 年间这个价格的平均水平,这个时期在历史上是美国农场主最繁荣的时期之一。在一个著名的农场,1933 年约 600 万头仔猪被宰杀,以减少猪肉的供应。

在新成立的商品信贷公司(1933 年),农民终于可以从一个类似于政府的代理机构——人民党“副国库”计划中获得储备粮食贷款。而且,政府直接购买粮食以减少市场上的食物供应。同时,政府付钱给农民不要种粮食,让土地休耕。即使从农场的利益出发,限制产量也是一致认同的做法。^{①9}

此外,其他的政府组织也尽力帮助农民家庭,无论是从全社会还是经济方面。1934 年根据《农业信贷法案》成立了农业信贷管理局(FCA),设立这个机构是为了给农民提供贷款,可以用不动产间接抵押,比联邦土地银行达到的条款要自由得多。FCA 一直存在到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贷款机构之一。另一项工程则不那么成功。埃琳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最欣赏的想法之一就是将城市失业者重新安置到农场中以实现部分自给自足。他曾尝试过成立农业证券管理局进行这项工作,但运转得不好。^{②0}

农业政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保护和开垦,因为 20 世纪 30 年代干旱和市场贫乏共同造成了农业的悲惨状况。高高的平原变成了“尘土碗”。在最高法院裁定否决第一部 AAA 之后,国会通过了《土壤保护和家庭分配法案》,这项措施允许农业部在保护的

^{①6} *Butler v. U. S.*, 297, U. S. 1 (1936). Barbara Alexander 和 Gary Libecap 认为 AAA 能够迅速重获成功的原因在于这一事实,美国农业局联合会代表的农民有效为 AAA 进行了游说。另一方面,在工业领域没有相似的游说。参见 Barbara Alexander and Gary Libecap, "The Effect of Cost Heterogeneity in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the New Deal's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Program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7, no. 4, October 2000.

^{①7} 联邦土地银行应农民的需求建立于 1916 年,在 20 世纪 20 和 30 年代银行做贷出机构的止赎权更少。Lee Alston, "Farm Foreclosure Moratorium Legislation: The Lesson of the Past," *AER*, June 1984.

^{①8} Roger Ransom, *Coping with Capitalism* (1981), pp. 106—108.

^{①9} Frederick Merk, *History of the Westward Movement* (1978), pp. 559—560.

^{②0} 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莱克斯福特·屠格威尔,罗斯福最早的智囊团成员之一。屠格威尔在他的 *The Brains Trust* (1968) 一书中表达了他的新政起源的观点。新政的农业安全网在南部受到了抵制,在任何时候它对最贫困人口提高工资和改善条件构成了威胁。Lee Alston and Joseph Ferric, "Labor Costs, Paternalism, and Loyalty in Southern Agriculture: A Constraint on the Growth of the Welfare State," *JEH*, March 1985.

名义下给农民报酬以限制种粮。^②同时,在1916年田纳西流域的马萨爾一首尔斯堤坝建设中组织起来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成为全国范围保护和开垦努力的一个样板。^③

第二部《农业调整法案》在1938年获得通过。其中包括种粮控制和收入支持规定,甚至比1933年的法案更加强硬,这次最高法院并没有反对。^④在一个判例案件韦克特诉费尔本案(1942)中的决议,表示它同意这样的主张,参加种植面积限制的农民,不应该从他们闲置的土地上收获一点额外的产品以喂养他们自己的家畜。^⑤经过几年的修改,1938年的AAA,“常平仓”法案,保留了现代农业政策的根本。

2.3 金融改革

在最初的100天和紧急立法之后,罗斯福政府才刚刚开始。旧机构的改革还摆在日程上,但也有一些新的基础性进展。

改革的核心是金融体系。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使商业银行从大多数证券业务中分离出来。^⑥1935年,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代替了1933年法案的一些临时安排。^⑦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 S. Eccles),一个犹他州百万富翁银行家,是1935年《银行法案》的设计者,这个法案重构了联邦储备体系。^⑧(重新命名的)美联储理事会被给予对银行储备和证券贷款额外要求的任意的控制权力。由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在20世纪20年代发起的理事会的委员会,被转移至华盛顿;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被重新命名,并拥有12个成员,其中有7个是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财政部长和通货管理审计长不再管理美联储。现在货币权在总部在华盛顿的联邦储备体系中得到了强化。

将美联储的公开市场委员会迁移到华盛顿,并且政治任命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为自动大多数,可能在经济上并不明智,但是它的目的是将联邦储备体系政治化,削弱货币政策决定中的私人部门的力量。同样的目标还有委员会拥有新的权力可以任意改变成员

^② Randal Rucker 和 Lee Alston 估计,所有的新政措施综合起来,使30年代存在的14.6万到27.7万个农场节约了大约680万美元。他们疑惑是否这种努力值这个价格,对那些农场主来说其农场因政策而没有取消赎回权。参见 Randal Rucker and Lee Alston, "Farm Failures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1930s," *AER*, September 1987. Zeynep Hansen and Gary Libecap, "Small Farms, Externalities, and the Dust Bowl of the 1930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2, no. 3, June 2004, 土壤保护地区有助于调整损害控制和防止50和70年代干旱条件重来时“沙尘暴”重现。

^③ Merk (1978), chaps. 53—56.

^④ Price Fishback, William Horrace, and Shawn Kantor, "Did New Deal Grant Programs Stimulate Local Economies? A Study of Federal Grants and Retail Sale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JEH*, March 2005, 研究了AAA支出如何影响县域水平的消费并发现它们对零售有负面效应。

^⑤ *Wickard v. Filburn*, 317 U. S. 111 (1942).

^⑥ 欺诈和现在所谓的“内部交易”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离的动机。现代研究没能揭示这样的证据,1929年大崩盘和继之而来的大萧条是由《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与国家制度结构的关系而加重的。Eugene White, "Before the Glass-Steagall Act: An Analysis of the Investment Banking Activities of the National Banks," *EEH*, January 1986. 近期有学者继续得出结论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不必要的。参见 Randall Kroszner and R. G. Rajan, "Is the Glass-Steagall Act Justified?" *AER*, September 1994; and Charles Calomiris, "The Costs of Rejecting Universal Banking," in Naomi Lamoreaux and Daniel Raff, eds., *Coordination and Information* (1995)。

^⑦ 关于这个解决方案的有趣角度的研究,参见 Charles Calomiris, "Is Deposit Insurance Necessary?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EH*, June 1990. 另参见 also Charles Calomiris and Eugene White, "The Origins of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in Claudia Goldin and Gary Libecap, eds., *The Regulated Economy* (1994)。

^⑧ Jonathan Hughes, *The Vital Few* (1986), pp. 533—539.

银行的准备金率。埃克尔斯相信,在我们的民主国家,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应该被政治化,而且应该解除纽约银行家的控制权。他认为他们先前的控制是非民主和非合法的。

像商业银行一样,证券业也因1929年的崩盘和其对大萧条蔓延的贡献而饱受诟病。无论这个产业是否经过改革,在为改善它而作出努力之后(参见表24.4),它都对经济复苏贡献很少。罗斯福堂皇地谈论“用其他人的钱进行投机的活动到头了”。货币改革者已经“从我们文明的庙堂上的高位子逃离了”。1933年5月《证券法案》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案》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证券行业消除风险和鼓励美德。在1934年,《证券交易法案》被通过了。后者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来控制资本市场。他们并没有带来资本市场的复苏。一年后,《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案》是联邦第一次对公用事业财务结构和实践进行限制,将他们置于SEC的管制之下。

2.4 政府作为雇主

FERA授权相关机构进行了直接的工作救济。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开始,因为它被联邦政府公然接受,是政府对于失业的责任,它意味着政府完全接受其对失业者负有的责任。那些不能在私人部门找到工作的男男女女被安排到政府工程中工作。

民间资源保护队(CCC)和工程进度管理局(WPA)通过修建新下水道和水务系统、人行道和公路等城市维护工作为经济发展带来利益。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人们,本来社会也可以给他们提供救济支持,被安排到那些浩大的工程中去工作。他们被雇去做有用的工作,而社会从中获得了有益的产出。

从1933年至1940年CCC雇用了250万人。在1933年的萧条情况下,哈里·霍普金斯两个月中安排了400万人去土木工程局(CWA)的工程中工作。在内政部长哈罗德·艾克斯领导下的公共工程局(PWA),是在NIRA的第Ⅱ章之下设计的,将重要的公共部门投入到建筑业中去。

PWA最终花费了数十亿,但就业的效果仍然是不足。这样,在1935年,国会建立了著名的WPA,在哈里·霍普金斯领导下根据紧急救济拨款法为就业问题进行支出。开始时霍普金斯分散了大约49亿美元。到1941年,他在WPA工程中雇用了800万人,大约16%的劳动力,支出了114亿美元。

这些“让人们去工作”的措施不能被否认。但是在时间跨度上,质疑其净效果并不是悖理的。联邦就业工程以最低廉的工资雇用人们——假定是工程所在地区的“流行工资”。然而,WPA的“保障”工资,是以现金的形式常规实际支付的,对那些非熟练工人来说是一种改善,即使他们在其他地方已经就业了,这并不是秘密。

在1936年,作为《沃尔什—希利法案》的结果,政府就业变得更加有吸引力,该法案确定了所有政府就业中的工时、工资和工作条件标准。在当时(从那时起)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失业在整个30年代保持了异常高的比率,是因为真实工资持续下降。在私人部门,企业在减少名义工资之前要减少工时和削减岗位;名义工资是“粘性”的。在公共部门,联邦就业中,通过坚持通行的工资,使工资总体保持在均衡水平或者充分就业水平上。根据主张通货紧缩者的观点,如果让工资随价格而自由下降,必然能够实现充分就业。

而且,真实工资甚至还可能提高,对于那些能够保持就业的人来说确实如此。如果我们遵循这个论点的逻辑,联邦政府的英勇努力事实上是反生产性的;公共企业以超出私人部门能够达到的价格消耗劳动力和资源。因此,私人部门仍保持着萧条的状态,尽管公共企业大范围扩张。这种观点是不是完全的空想,我们无从断定。

表 25.1 列出了新政主要的直接就业政策工具。这些支出是基本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且直至今日仍然是可替代失业的模式。新政支出的 20% 是针对就业的。尽管有数百万人在这些工程中就业,但它们从未雇用足够多的人,以缓解萧条中的失业水平。新政的制造就业计划,尽管竭尽其所能和创新,但永不可能真正代替私人部门的就业。1938 年,批准的支出是雇用 400 万人,这也仅仅是城镇劳动力的 10%。当年的失业率是 19%。

表 25.1 主要的新政机构:对州补贴及就业救济收入, 1933—1939 年

机构	国家对州的补贴	就业救济收入
FERA	3 017	1 238
CCC	2 622	1 734
CWA	807	818
WPA	6 804	6 586
FSA	273	100
PWA	1 791	—
总计	15 314	10 376

注:单位是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U. S. Office of Government Reports, vol. 10 (Washington, 1941); *Final Statistical Report of the Federal Emergency Relief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1942), table 10, p. 38; 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 *Security, Relief, and Relief Policies* (Washington, 1943), appendix 10, pp. 560—561. 此表感谢约翰·沃里斯。

FERA 是曾经为各类需要的人提供一揽子救济的第一个联邦机构。表 25.1 中的联邦工程几乎与各州补贴计划完全匹配,参与其中的各州层次都控制支出——控制哪些人,控制多少。就像约翰·沃里斯指出的,国会授权的实际数量、给予各州的补贴和总的支出还是要确定的。表 25.1 中的数字是最适当的估计。^② 国家青年局(NYA)包括在表中,是 WPA 补贴和收入的一部分;PWA 的建设项目并没有雇用那些需要救济的人。1937—1939 年联邦给予州的补贴是 153 亿美元,只有 104 亿美元(约 2/3)直接用于工作救济。

2.5 劳工法

《瓦格纳法案》和《社会保障法案》是第一次新政的永久社会发明。1935 年的《瓦格纳法案》(《国家劳动关系法》)是联邦的一项努力,它轻松克服了第 21 章讨论过的大量相互矛盾的法律和实践。1931 年的《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案》限制法庭使用停止罢工的禁令。NIRA 的 7A 条款要求在参加规范的产业中进行集体谈判。《瓦格纳法案》是 NIRA

^② 对总体功能,如教育、高速路、和救济的拨款的估计,参见 John Wallis, “The Birth of the Old Federalism: Financing the New Deal, 1932—1940,” *JEH*, March 1984; and Wallis (1985)。

的7A条款的重写和扩展。它产生了一波批量生产工业联合的浪潮,并且建立了产业组织联合会(CIO),而这奠定了接下来半个世纪有组织的劳工权利及其基本结构。^② 在它的条款中,劳工有权组织起来,选举(无记名投票)他们自己的谈判代理人,并进行集体谈判。雇主被禁止参与这个过程——即解雇或者因工会行动而惩罚雇员。法案建立了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并授权它决定和仲裁结果。它甚至和《主仆法》管的一样多。《瓦格纳法案》是全面返回到最早期殖民地法律的历史的结果,早期殖民地法律根源于伊丽莎白时代的技师与学徒法令。这个规定常常卷入到劳工关系中,在某种形式中常常有强制性的。

在美国大部分历史上,在工资谈判中法律和规定总是站在有产者一方。向1935年的慢慢转变代表了民主。^③ 当它给政治家支付工资,把最高政治工具转向劳工的一方,他们确实这么做了。投票间接制定了法律。从1935年开始有组织的劳工就在《瓦格纳法案》(被修改的)的保护下获得了安全。在70年代出现了对工会权力的不满,工会过多提高工会工资并增加了通胀的压力,这些不满可以从对《瓦格纳法案》的不满中找到根源。在通货膨胀较低的最后十年,以及私人部门的工会力量消失时,这种不满就很少听到了。《瓦格纳法案》保护了有组织的劳工的权利,而不是他们曾经任职的工作。

2.6 社会保障

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案》是联邦对其权力和责任的进一步确认和承担。正如我们知道的,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社会长期以来为其穷困居民提供了一个微薄的“保障网”。手法是传统的地方事务——地方所有、国家支持的济贫院,穷人农场,等等。^④ 旧体制永远不会非常慷慨;斯坦利·莱博高特估计,由州政府做出的传统意义上的这类转移支付是一般劳工收入所得的20%—30%。^⑤ 在工作中受伤的工人们不得不控告他们雇主的疏忽。正如约翰·沃里斯、普莱斯·费希科克(Price Fishback)和肖恩·康特尔(Shawn Kantor)指出的,人们认识到了地方实施的救济系统的腐败了。^⑥ 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案》是纠正这些缺陷的一种努力。它提供:(1)老年人的一份收入;(2)由劳工雇主提前预付一份失业补偿金的计划;(3)为老人、盲人和受抚养的孩子提供无条件的救济帮助。这些思想部分是遵循了1931年的斯沃普计划。

社会保障体系从来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保险”;它不是一项合约。^⑦ 那些向其捐款的

^② Robert H. Zieger, *The CIO: 1930—195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5), 提供了一个说明,这个组织优先于与AFL的合并。

^③ Elizabeth Cohen, *Making a New Deal* (1990), 这是从多个角度进行的有趣的说明,关于芝加哥产业工人在战争期间的生活方式的改变。特别是,对比了20世纪20年代来自国家政治和工会主义时期,和他们在30年代民主党以及CIO出现时期的节支。

^④ Joan Hannon, “Poor Relief Policy in Antebellum New York Stat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Poorhouse,” *EEH*, July 1985.

^⑤ Stanley Lebergott, *The American Economy: Income, Wealth, and Wa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57.

^⑥ John J. Wallis, Price Fishback, and Shawn Kantor, “Politics, Relief, and Reform: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s Social Welfare System during the New Deal,” Glaeser, Edward L. and Claudia Goldin, eds., *Corruption and Reform: Lessons from America’s Economic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⑦ Domenico Gagliardo, *American Social Insurance* (New York: Harper, 1949).

人没有要求任何权益的法定权力。而且,在它的保险范围方面永不可能是全面的。事实上,美国是采取某种形式的全面社会保险的最后一个主要的工业国家。1935年的法律仅仅是从不情愿的国会获得一些最低限度的社会保护的一个途径。当罗斯福质疑用完全的累退工资税实行这个制度时,他说:“那些税从来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们始终是政治问题。”^⑤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社会保障体系是美国通往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人类福利的集体责任——并不需要美国政治家的公共承认,这个国家已经从动态、曲折的个人主义旧理想中有力地启程了。千百万的美国人已经从社会保障支付中获益了,从现在的工资获得者支付的社会保障税转移到以前的工资获得者那里。

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案》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必要的社会进步,但它从一开始就是有缺陷的。政府作出了多种努力来处理当前体系的不足:税基和税率都被提高了;开始受益的年龄也提高了;而且,对有些人来说,一部分社会保障收益已经变得和普通收入一样可征税了。所有这些都还没有解决问题——它只是推迟了问题出现的日期。此外,医疗保险制度也加了进来。社会保障仍然是政治演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每个人都同意需要做一些事,但是关于做什么却没有一致意见。

3. 第二次新政

由联邦政府行动带来的工作空间的改革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除非是在战时或者联邦就业自身。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最高法院在海默诉达根哈特案(1918)中废除了1916年的《童工法》。^⑥ 限制工时的努力在阿德金斯诉儿童医院案(1923)中被推翻了。^⑦ 在第一个例子中,制造业并不是州际商务的信条被给予了最强烈的支持。在第二个例子中,拥有为工资和工作条件自由谈判的权力,受到了哥伦比亚地区法律对雇用妇女和儿童设置限制条件的损害。(在那个年代国会为那个地区制定法律)。

在传统的管辖权范围内,最高法院允许各州自己有更大的回旋余地。^⑧ 对这些权力从州到联邦层面扩张的抵制被内比亚诉纽约州案(1934)所削弱,但不经意的是,那件案子涉及了一个州的定价法。^⑨ 它永久损害了芒恩诉伊利诺伊州案的条款,尽管是好的方面,只留下了商业条款成为联邦管制的障碍。任何贸易都能够被管制,但是只有州际商务才能被联邦管制。1936年选举之后,商务条款变成了联邦管制的开阔大道。

最伟大的声明是在NLRB诉琼斯和劳格林案(1937),它维持了《瓦格纳法案》:

当产业部门以国家的规模组织起来,使它们与州际商务的关系成为它们活动中

^⑤ 引自 Hughes (1979), p. 52.

^⑥ *Hammer v. Dagenhart*, 247 U. S. 251 (1918).

^⑦ *Adkins v. Children's Hospital*, 261 U. S. 252 (1923).

^⑧ 例如, *West Coast Hotel v. Parrish*, 300 U. S. 379 (1937)。

^⑨ *Nebbia v. New York*, 291 U. S. 502 (1934)。

的主导因素,怎样维持他们的产业劳工关系就构成了国会不能进入的禁区……^{④0}

3.1 《公平劳动标准法案》

事实怎样?在1938年,国会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案》(FLSA),它把联邦政府的权力设定在殖民地镇区行政委员的那个地方。联邦规定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的权力都建立起来了。^{④1}其中包括对农业劳动者的豁免(他们仍然可以“豁免”),对商业管理人员、水手和不在州际商务中的企业,或者那些劳动关系被其他的联邦规制管理(如铁路工人)的人的豁免。同时,设置了最低工资条款来提高这些豁免以及最高工资来降低这些豁免。加班工资设定为常规小时工资的1.5倍,放弃了对“压迫童工”的惩罚。在劳工部建立了工资与工时部门来实施这些规定。自从海默诉达根哈特案以来在制造业和州际商务之间一直保持的神圣界限在哪里?法院规定在美国诉达比案(1941)中,FLSA判例案,海默诉达根哈特案“现在应该是被否决的”。^{④2}它就是那么简单。

在《瓦格纳法案》与FLSA之间,新政完全颠覆了这个国家各州在工资谈判中的传统地位。在州际商务中的雇主必须和工会劳工进行谈判;限制最高工时,最低工资。旧时的资本家如亨利·福特都被这些改变惊呆了。^{④3}

3.2 农村电气化和公共权力

尽管在1935年就被授权,但是农村电气化管理局(REA)在1936年选举之后才将大多数成果实现了。通过组建大量农村电气合作社,千百万美国农场(大部分农场)都由中心电力资源实现了首次通电,而随着第二轮美国农业现代化的开始,从农场厨房的家电到谷仓和牧场,都需要用电。私人部门不能承担美国农业电气化的挑战。REA受到了私人公用事业支持者的批评,但不会有人建议“私人企业”能把这件工作做得更好。它不能。

在提高国民生产和电力应用方面新政做得很漂亮。通过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系统,新政促进了能源利用的大幅度提高,雄伟的西北多用途大坝,平原各州(第15章讨论)创建的灌溉和电力系统,REA合作者的组建,把电力带到了这个国家的农村。电力,除了REA体系之外,大部分分散掌握在私人电力公司。然而,1935年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把他们置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控制之下,他们自身寻求重组和禁止(获利)多样化的努力都受到了限制。

事实上,在严格的私人基础上,私人拥有的公用事业不能保证为大多数农村地区提供充足的电力。结果是政府推进这个项目,允许这些公用事业部门以下级合作者的身份参与。1933年时只有10%的美国农场享有常规的电力服务,当时在发达的西欧国家比

^{④0} *NLRB v. Jones and Laughlin*, 301 U.S. 1 (1937), pp. 41—42.

^{④1} Andrew Seltzer, i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 1911—1947,” *JEH*, June 1995, 在他1994年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同名博士学位论文中,考察了1938年之前通过的州立法以及FLSA。Robert Fleck, “Democratic Opposition to the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of 1938,”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2, no. 1, March 2002, 是对FLSA投票的分析。Fleck解释了这个问题在国会中削弱了民主党多数席位的原因。

^{④2} *U. S. v. Darby*, 312 U.S. 100 (1941).

^{④3} Hughes (1986), pp. 334—351.

这个数字还少是常见情况。在这个公共的、政府发起的电力工业中，国家建立了大量的新企业。它有目的地限制私人电力部门的增长能力，而与此同时推动公共电力部门的增长。

结果是不明确的。设计政策是为了鼓励电力工业的总体增长，还是仅仅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公共部门产业？更大增长的发生是不是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内部改善的完全公私合作的结果？如果没有所有那些反周期的华丽辞藻？我们永远也不知道。

联邦政府所做的那些努力是显然的混合动机的产物，不是对政策的指责。没有理由假定在政府责任的概念上如此巨大的变化，以及作为结果的政策和计划的实施，若没有被直接影响的那些经济组成部分的实质改变，将会或者能够实现。从经济学上讲，这种改变是私人部门技术改变的等价物。它不仅仅是同等投入组合的额外应用。相反，生产函数移动，所有的成本、收入以及利益都相应发生了改变。当建设佩克堡大坝或大古利大坝时，对周围环境的经济溢出效应是巨大的，而且事先无法测算。

3.3 改革回顾

我们仅仅触及了改革和变化的主要的新政措施。不能否认，新政的行动产生了重大的改变，有些改变是永久的。三代美国投票人都认可和重新认可了新政在美国社会的永久创新作用。如我们所知，大多数新政改革是美国历史上以前发展起来的政府权力限度的增加。但是也有全新的启程。查尔斯·考克斯指出：

（在和平时期）从未有过联邦规制促进工会的利益，或者规定农业价格和产量，或者制定公用事业的法定分权。^④

当然还有更多。毕竟，富兰克林·罗斯福承诺要对减少失业和重新繁荣经济有所作为。还有比这个“作为”更重要的逻辑吗？

4. 他们在做什么？

从新政一开始对经济领导阶层的攻击就是一个主要的政治传播——确实，从新政之前就如此；在1914年之前几次选举运动中就出现了。在罗斯福入主白宫以前，皮科拉委员会（Pecora Committee）就已经进行了引起轰动的反对金融界的听证会，揭露了银行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到1936年，罗斯福猛烈抨击国家“经济保皇主义者”的金融领导，并且赢得了巨大的压倒性的选举胜利。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同盟者本来相信这个国家的金融领导可以从有力的整肃中获益。但是，他们是怎样设想的却并不清楚，一个彻底的磨难对执行者自身精神上是有利的，将有助于复苏的过程。

4.1 政策和含混处

NIRA在目标上是含混的。在NIRA中，国会给予金融自由，免受反托拉斯指控——

^④ Charles Cox, "Monopoly Explanation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Public Policies Toward Business," in Brunner (1981), p. 189.

“工业自治”——希望通过 NRA 的规范卡特尔能够实现有利可图的价格和更大的产出,可以使失业者重新获得工作。同时,鼓励那些 NRA 产业规范支持的行业中有组织的劳工的发展,也是一条途径。

农业政策也是由同类的混合动机形成的。^⑤ 在最初的《农业调整法案》中,对加工过程征税,也是这样一个尝试:强迫中间人为粮食储备贷款支付成本,为土地休耕提供补贴,购买全部农业剩余产品。法定的基调是反对金融。AAA 的部分目标是通过提高农业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但是其他的动机也出现了。通过补贴减少供给的努力被其他的努力抵消了:通过机械化,金融支持,改进的耕作种植技术,更好的化肥,农作物基因改良——甚至通过农业扩展服务增加农场生活的幸福程度,来提高农场的产出效率。农业更多了? 还是更少了? 产出更多了? 还是更少了? 价格更高了? 还是更低了? 上面这些结果全部都在各式各样的政策中得到了应用。

联邦政府的政策也是不连续的。NIRA 在制造业中提升了反托拉斯法的地位,但是在 1938 年,仅仅四年之后,联邦政府就在瑟尔蒙·阿诺德(Thurmon Arnold)的领导下发动了一场补充反托拉斯法的运动,组建了临时国家经济委员会(TNEC)来研究在美国经济中“经济力量的集中”,如果有可能的话,政府的目的在于削弱经济中托拉斯的垄断地位。^⑥ 如果认为商业信心对复兴是重要的,那么像这类的政策巡视就没有什么用处。

4.2 乘数失效?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新政在广阔的视野中,在给定美国经济制度本质的情况下,实际上是造成了持久的萧条。大部分就业和产出依赖于私人部门,而私人部门被各类政府政策抑制了(例如,1935 年的收入附加税,1937 年平衡预算运动;还有商业银行准备金拆借,流入国内的黄金废止流通,以及提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这在 1938 年被认为对大萧条产生了明确的收益。反生产性政策的名单或许很长。仅一个《瓦格纳法案》,在制造业中突然设置了一整套全新的劳工关系体制,就吓坏了潜在的制造商。

根据基本的宏观经济理论,公共部门的乘数效应应该通过消费支出溢出到私人部门,而且应该为复苏提供途径。然而,根据加里·布朗(E. Cary Brown)的观点(前面章节讨论过),新政支出不足以通过乘数作用创造期待的收入效应。^⑦ 正如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新政不比什么更坏,从宏观经济来讲。

在 1937 年,拉里·派珀斯(Larry Peppers)重新估算了布朗的研究,并发现 20 世纪 30 年代的财政政策甚至是更不完善的。^⑧ 根据派珀斯计算的假设的充分就业支出政策,30 年代很小的联邦赤字事实上是充分就业收入水平上剩余的等价物。布朗认为的“财政阻

^⑤ 结合 NIRA 和 AAA 分析的有趣文章,参见 Elizabeth Hoffman and Gary Libecap, "Political Bargaining and Cartelization in the New Deal: Orange Marketing Orders," in Claudia Goldin and Gary Libecap, eds., *The Regulated Economy* (1994)。

^⑥ Wyatt Wells, *Antitrust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是对一战后开始的托拉斯的很棒的介绍,并且包括对阿诺德领导反托拉斯部门的五年的较详细的讨论。

^⑦ E. Cary Brown, "Fiscal Policy in the Thirties: A Reapprais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6, no. 5, December 1956.

^⑧ Larry Peppers, "Full Employment Surplus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Changes: The 1930s," *EEH*, Winter 1973.

碍”甚至比想象中的还要更坏。

丹·瑞丁(Don Reading)得出的结论是,联邦政府的支出也许根本不可能作为目标获得复苏。从他的研究中似乎很清楚看到,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参议院投票获得支持,与产业促进相比可能是联邦支出更重要的目标。⁴⁹

回头来看,新政非常像一辆轮子飞转的汽车,残酷地沉入泥沼之中。通过管制进行的美国资本主义的“改革”,如《公共事业控股公司法案》,和新的公私分离如 TVA 和 REA,仅仅是常规私人部门活动的替代品,现在并没有发生的私人部门活动,至少部分是因为它们自身的改革。价格水平既定,PWA、CWA 和 WPA 的伟大的制造就业工程,使“主导工资”对雇主和未来的雇主来说太高了,以至于他们无法雇用工人。提高价格和农业收入的农业政策也会提高产量,部分会抵消其他的作用。

5. 新政:社会改革?

无论新政被看做拯救者还是破坏者,它都必须被看做那个时代绝对的创新。从那以后社会政策方式的完全创新就很少达到了。政府的范围已经被大大扩展了,但一直遵循着 1940 年以来发展的线路。甚至在 1946 年《就业法案》中联邦关于价格、收入、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责任的假定,都是在萧条结束之前华盛顿特区提出的行动和雄心的形式化。事实上,公众觉察到联邦权力应该被用来寻求这样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看到的在 19 世纪末期发展起来的,例如,关于平民主义者的需求的政策。

5.1 什么是新的?

在和平时期,联邦政府的政策追求是支持既定的收入、就业和价格水平,这是新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嘉士顿·里姆林格(Gaston Rimlinger)观察到个人主义的美国理想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障碍”,影响了这些思想,甚至是社会保障。⁵⁰ 利用联邦的权力来鼓励某些产业发展,而以其他产业为代价,这并不是新的。正如我们所知,政府权力设租可以追溯到联邦美国的第一个关税;在殖民地时期,对第一批定居者征收的。然而,私人部门就业、收入、工资和价格的传统是,控制力量除外,这些事情都留给私人参与者的自由契约来解决。胡佛总统抵制这样的观点:直接的政府责任可以扩展到这类事情上,因此,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一次这样做。

运用联邦权力为非政府部门的雇员建立社会保障计划是新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思想大多数都发源于私人部门(例如,斯沃普计划)。⁵¹ 然而 1935 年的《社会保障法案》,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开始。雇员参加保障是强制性的。它抹掉了所有的慈善污点。社保成员都用特定的名字替代了身份证明。这个体制最初是最小限度的:对特定阶层的雇员

⁴⁹ Don Reading, "New Deal Activity and the States, 1933 to 1939," *JEH*, December 1973; Leonard Arrington, "The New Deal in the West: A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Inquiry," *PHR*, August 1969. 对这个问题的润色和分析,参见 Gavin Wrigh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w Deal Spending: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REStat*, February 1974.

⁵⁰ Gaston Rimlinger,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of National Welfare Systems," in Roger Ransom et al., *Explorations in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Douglass C. Nor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p. 163.

⁵¹ Berkowitz and McQuaid (1988).

是有益的做出贡献的老人和退休制度,将工人的补偿自由化和标准化的国家的诱导因素,雇主支付州失业补偿基金的规定。

社会保障后来的扩展利益并没有被事先预料到。当时在医疗保障制度和公共医疗补助制度的作用之下,医疗救助是一项巨大的利益开支。社会保障现在是一个附加和修正计划,它从未作为一个深思熟虑的整体存在过。结果是“资助危机”。当前在利益上的承诺既定,税收多少既定,这个体制总有一天将会缺乏资源以现有水平来支付利益。

正如博克维茨(Berkowitz)和伍尔夫(Wolff)证明的,完整的计划从来不是从它浅薄的制度起源那里获得的。^⑤ 瓦格纳参议员于1938年发起了一项国家健康保险计划,在国会没有通过。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在他的公平政策中尝试了,也失败了。从那之后每次尝试都继续失败了,因为国会是特殊利益的创造物,有着巨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反对国家健康保险。^⑥ 社会保障在国会的通过可能是由于它覆盖范围很小。为其支付的税收在我们最累退的一档,正如我们所见,富兰克林·罗斯福允许这个税是纯粹“始终完全政治的”。1935年这一年是新政立法重要的一年。罗斯福可能是在他对国会权力最鼎盛的时期。三四年之后社会保障议案根本不可能获得通过。^⑦

在《瓦格纳法案》中联邦发起组织劳工只是部分创新,因为在1926年的《铁路工人法案》中联邦就发起过了。1932年的《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案》(《反禁令法案》)是联邦支持有组织的劳工的进一步行动。《瓦格纳法案》事实上是工人要求政府支持的顶点,已经看到了两个虚假的黎明,一个是在战时统制经济,另一个是在NIRA。一个原始的国家劳工政策也是开始由市民保护公司、国家青年管理局和WPA演化出来的。战争和征兵照顾好了这一切,什么也没有再次发生。

在和平时期NRA的名义下联邦完全以及公然地发起产业卡特尔,是全新的,但却失败了。这个思想是旧的。在一战中,政府为了最大限度保护生产利益,帮助反竞争的产业活动。当战争结束时,威尔逊总统颁布命令废止相关的政府机构。在NRA没有通过最高法院之后,除了反托拉斯部门的复兴之外,针对制造业确实没有持续的联邦创新性政策。有关自然资源和人力的政策的实施都只是刚刚起步,但没有了后续工作。正是国家规划协会鼓励了类似的地区和州规划组织。^⑧ 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发表,似乎已经有了真实经济计划的开始,但一切都在二战时消失了,再也没有看到过类似规划协会的组织出现。这种计划是以如下假设为基础的:萧条经济是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征兆,在这片土地上要重现繁荣,政府作用的极度扩展是迫切需要的。二战扫清

^⑤ Edward Berkowitz and Wendy Wolff, "Disability Insurance and the Limits of American History," *The Public Historian*, Spring 1986.

^⑥ Colin Gordon, *Dead on Arrival: The Politics of Health Care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他强调反对者比倡导者拥有更多的资源。至于确实出现的事情,参见 Melissa A. Thomasson, "From Sickness to Health: The Twentieth-Century Development of U. S. Health Insuranc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9, no. 3, July 2002.

^⑦ 当然这个观点得到了卡洛琳·威夫尔的支持,她的结论是私人部门的一般性进步,老年和生存者保险的提供被1929—1933年突如其来的衰退打破了,然后新政介入了,基于各式各样的理由,填补了空白。Carolyn Weaver, "On the Lack of a Political Market for Compulsory Old-Age Insurance Prior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Insights from Economic Theories of Government," *EEH*, July 1983.

^⑧ Otis Graham, Jr., *Toward a Planned Society: From Roosevelt to Nixon* (1976).

了所有这些恐惧。

5.2 什么是旧的？

在新政期间联邦政府的监管控制极大地扩张，这是政府行为一般性增长的一部分。但是，在一般意义上，在联邦水平上它不是新的，自 1887 年以来不是新的。管制机构的数量以乘数比例增加，以至于似乎不可能是“革命性的发展”。常规航空服务相对来讲是新的；管制它则不是新的。两个新的联邦机构，联邦航空宇宙局和民用航空委员会，是经过时间检验的产业机构管制的应用。州际商务委员会是所有这些的开始。

各类政府公司和代理机构的建立，扩展了联邦在住房、交通和农业领域的金融参与度，这是在一战统制经济时就已经臻于完美的技术。这种联邦影响和控制的机构的繁盛，令新政期间的一些观察家感到惊愕，大量的这类机构、办公室、委员会和管理局持续到了现在。但是它们并不是新政的新机构发明。

休·洛克考夫(Hugh Rockoff)研究了 20 世纪 20 年代及更早时期的经济学家的作品，发现他们都支持几乎所有的新政计划。随着罗斯福政权的上台，此时需要经济的治疗家，微观经济学家拥有他们自己认为成功的处方，在其他地方曾经成功应用过。^⑤

5.3 它是社会革命吗？

如果革命这个词的意思是社会阶层的重新排列或者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根本改变，那么新政不是革命。而且，人们很容易争论的主张是，新政“拯救”了美国资本主义，因为它从 30 年代以后若没有政府的帮助和管理，似乎几乎不可能独立生存下去了。

没有剧烈的变革。当新政结束时，所有的机构都得以保留。财产所有权也许比实际情况更加从属于联邦管制，但是财产没有在根本上发生改变。本·富兰克林在 1940 年就认识到了我们的土地占有和使用，普利茅斯的市长布拉福德也认识到了。除了更高的赋税之外，私人资本生产仍然被设计用来生产利润，作为回报分配给私人所有。^⑥ 产业仍然是由私人管理者进行管理。食物、衣服、庇护所、药品——所有这些在 1940 年几乎完全是私人的事情，就像 1929 年那样。经济活动，除了直接的政府购买和监管规制之外，还依然几乎全部是由消费者的“美元投票”来引导的。

令人感到鼓舞的地方是什么？为什么新政仍然这么容易引起文雅的——以及不文雅的讨论？较之赫伯特·胡佛和新时代，甚至林登·约翰逊和伟大社会，为什么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新政会更多地成为现代意识的一部分？

答案实际上似乎是很普通的。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特别是，对个人灾难最低保障网的“社会”责任的思想，从殖民地时期一直是地方层次，首次提高到联邦层次并且一直保留至今。不仅联邦发起的社会保险，而且联邦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总量繁荣的责任，都给新政戴上了历史上大胆创新的光环。

^⑤ Hugh Rockoff, “By Way of Analogy: The Expansion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the 1930s,” in Michael Bordo, Claudia Goldin, and Eugene White, eds., *The Defining Moment* (2008).

^⑥ Thomas Renaghan 的研究使人接受了甚至饱受议论的“向富人课重税”的做法，构成大剂量的新政税收。Thomas Renaghan,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Federal Tax Policy, 1929—1939,” *EEH*, January 1984.

其次,政府行为自身在新政时期获得了有力的脱离,通过多样化的机构,它们的形成是为了确认、定义和作用于“社会问题”。即使新政中各委员会、管理局、办公室和行政部门的大部分消失了,其他的生存下来了,具有主动精神的管理机构的思想流行开来了。在30年代之前,社会和经济的根本变化主动权很少来自于不变的联邦机构内部。在新政中和自新政后,这种主动变得很普遍了。联邦官僚机构传统上是公务员主体,他们的行为受到当选政府的定义和引导。将为国家政策设定议程的权力,从国会和行政人员及私人部门,转移到永久的政府手中,这是新政的一个主要成就。约翰·沃里斯和华莱士·欧茨(Wallace Oates)指出,联邦支出份额的这种上升大体上是在损害地方政府支出,但是作为GNP份额的地方支出在大萧条中并没有降低。事实上,它在1992年与1927年大约有相同的百分比。^⑤州政府保持它们的支出,因为新政支出的巨大比例是由津贴,或者补助给予地方政府的。在很大程度上,州政府分配和管理联邦支出要远远不够谨慎,较之它们经历过的福利管理被认为是腐败的那些年份。^⑥

除了这些新进展之外,来自于新政的政府参与和干预经济的完全扩张,产生了“革命”的感觉,在日常生活的质量方面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到1940年,联邦政府进入了大多数人的生活中,这就是不同。联邦政府补贴住房建设不是新的。使政府财政变成这个国家房地产行业的永久特征,用巨大的联邦抵押机构网络予以支持,这才是新的。最后,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这是事实。监管力量控制、规范和管制机构在新政中激增,这种激增持续了几十年,尽管成功的总统候选人许诺“取消限制人民的政府机构”。

至于收入和财富分配——传统“阶级”关系的改变——过去50年中不平等的范围有些狭隘(正如我们将在第30章看到的那样),但是新政的实际分配对长期发展有何意义,至今仍不清楚。

最后,自新政以来在社会和经济政策上的真正的新进展数量是如此之小,以至于新政回头看时看起来非常大胆。数百万工人从他们缴税支持的社会保险计划中获得了相对较少的利益。对工人的补偿或失业补偿从没有国家的标准化。我们从未发展一项基于价值的高等教育的国家补助体系。尽管经过多年讨论,美国仍然没有普遍的国家健康保险。换句话说,它的福利状况,和它的花费一样,与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非常不广泛。^⑦除了一些特殊计划的巨大扩展(例如,从1965年之后救助有受抚养子女的家庭的支出爆炸式增长),30年代保持了总体创新的伟大时代。^⑧事实上,新政向私人经济干

^⑤ John Wallis and Wallace Oates, “The Impact of the New Deal on American Federalism,” in Bordo, Goldin, and White, eds., *The Defining Moment* (1998).

^⑥ Wallis (1984). Wallis, Fishback, and Kantor (2006) 认为这是改革的一部分;新政引入的社会保障体系今天更加常见,相对于腐败,更加官僚化。也可参见 Hughes (1979).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w Deal Spending Revisited, Again: With and Without Nevada,”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5, no. 2, April 1998, 沃里斯认为,对于决定这些拨款如何在各州之间分配,政治和经济影响都是重要的,在 Wallis, Fishback, and Kantor (2006) 中,政治被看作关键问题。

^⑦ Chiaki Moriguchi, “Implicit Contracts,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S. and Japanese Employment Relations, 1920—1940,” *JEH*, September 2003, 着眼于私人福利资本主义并考察了美国大萧条的严重性导致了明确合同和法律实施的增加。Peter Lindert, “What Limits Social Spending?” *EEH*, January 1996, 这是对1960—1992年间19个国家的这类支出的比较研究。

^⑧ AFDC 变成了 TANF(对有需要家庭的临时救助)是1996年福利改革法的结果。

预的渗透是令人惊异的。

我们提起新政时,将其作为美国的一项伟大现代社会革命,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与60年代和70年代的人权运动相比,新政作为一个机遇出现,此时自然力量似乎得到了释放。这在部分意义上是个幻觉。现代改革运动关注的是相当小部分的人口——那些官方定义为少数人群或者穷人的人。在这些术语中,新政在它进入美国社会方面是比较宽泛的。新政似乎收买了大多数美国人,这也是一个成就。在美国历史全景中,新政(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和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的作用似乎都在随时间上升。

6. 萧条的遗产

1933年之后,美国经济再也不一样了。那个时代的忧虑已经深印于公众的记忆中,其结果,作为社会保险和联邦对穷人及失业者的责任,被铭记到了法典上。国家转向联邦政府寻求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集体解决方案,这在以前是无法衡量的,也许一战统制经济时期除外。对纯粹美国资本主义的忠诚被破坏了,这显然是永远的。甚至在美国工业和金融业的顶尖层次上,也失去了希望。赫尔曼·克鲁斯(Herman Krooss)在他的《管理者观点》一书中,记录了破碎的资本主义的士气和努力,充满着言过其实的夸张修辞,保持着忠诚。^②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30年代其余时间及二战期间都待在白宫,主要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从萧条中“拯救国家”的人所赢得的声望。^③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拯救的程度是模棱两可的。然而,清楚的是1789年的那次紧缩;没有发生革命。经济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但是凭借的还是150年前就有的政治智慧。

这个由殖民者先驱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并没有被30年代的经济灾难毁灭。这也许是最基本的颂词。它意味着,尽管由新政带来了改变,但以确定的私人财产权为基础的社会合约精神和从一览表中进行的自由选举,保留在美国共和制度中。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它将被一次又一次的验证,但是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没有哪一个十年能够跟20世纪30年代相比。

这一章和上一章介绍了一段令人迷惑的插曲,它改变了一战之前的那种经济增长方式。尽管新政改革并没有结束萧条,但是它们受到了广泛认可,并被编织进了美国社会的结构之中。战争时期的知识和制度行装被携带到了未来。当条件发生改变,繁荣又回来时,选择的国家并没有回到之前公私混合的状态。经济决策制定得以加强和扩展的政治技术,在30年代得到了扩张,在后来的年份被改变和修正,并将成为新的经济生活方式。

^② Herman Krooss, *Executive Opinion: What Business Leaders Said and Thought on Economic Issues 1920s—1960s* (New York: Doubleday, 1970), chaps. 5 and 6. 在对20世纪30年代IBM领袖的一项近期研究中, David Stebenne, "Thomas J. Watson and the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hip, 1933—1956," *Enterprise & Society*, vol. 6, no. 1, March 2005, 作者得出结论是沃森和其他新政支持者对社会条件的改变和公共政策做出了完全妥协,而不是力图引导这些改变。

^③ Price Fishback, Shawn Kantor, and John J. Wallis, "Can the New Deal's Three Rs Be Rehabilitated? A Program-by-Program, County-by-County Analysis," *EEH*, July 2003, 考察了3000个县“救济、恢复和改革”的动机。富兰克林·罗斯福成功再次当选的部分基础是这些为了政治目的的计划的支出。

推荐阅读

文章

Alston, Lee J. "Farm Foreclosure Moratorium Legislation: The Lesson of the Pas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4, no. 3, June 1984.

Alston, Lee J., and Joseph P. Ferrie. "Labor Costs, Paternalism, and Loyalty in Southern Agriculture: A Constraint on the Growth of the Welfare Stat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5, no. 1, March 1985.

Arrington, Leonard J. "The New Deal in the West: A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Inqui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38, no. 3, August 1969.

Berkowitz, Edward, and Wendy Wolff. "Disability Insurance and the Limits of American History."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8, no. 2, Spring 1986.

Bernanke, Ben S. "Nonmonetary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3, no. 3, June 1983.

Calomiris, Charles W. "Is Deposit Insurance Necessary?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0, no. 2, June 1990.

———. "The Costs of Rejecting Universal Banking: American Finance in the German Mirror, 1870—1914." In Naomi Lamoreaux and Daniel Raff, eds., *Coordination and In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Calomiris, Charles W., and Eugene Nelson White. "The Origins of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In Claudia Goldin and Gary D. Libecap, eds., *The Regulated Ec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Cox, Charles C. "Monopoly Explanation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Public Policies Toward Business." In Karl Brunner, ed., *The Great Depression Revisited*.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1981.

Fishback, Price, William Horrace, and Shawn Kantor. "Did New Deal Grant Programs Stimulate Local Economies? A Study of Federal Grants and Retail Sale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5, no. 1, March 2005.

Fishback, Price, Shawn Kantor, and John J. Wallis. "Can the New Deal's Three Rs Be Rehabilitated? A Program-by-Program, County-by-County Analysi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40, no. 3, July 2003.

Green, George 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Revolution in American Financial Policies." In Karl Brunner, ed., *The Great Depression Revisited*.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1981.

Hannon, Joan Underhill. "Poor Relief Policy in Antebellum New York Stat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Poorhous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2, no. 3, July 1985.

Hoffman, Elizabeth, and Gary D. Libecap. "Political Bargaining and Cartelization in the New Deal: Orange Marketing Orders." In Claudia Goldin and Gary D. Libecap, eds., *The Regulated Ec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Hughes, Jonathan. "The Roots of Regulation." In Gary M. Walton, ed., *Regulatory Change in an Atmosphere of Crisis Current Implications of the Roosevelt Year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Kroszner, Randall, and R. G. Rajan. "Is the Glass-Steagall Act Justifie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no. 4, September 1994.

Lebergott, Stanley. "The American Labor Force." In Lance Dav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Lindert, Peter. "What Limits Social Spending?"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3, no. 1, January 1996.

Mitchener, Kris James. "Bank Supervision, Regulation, and Instability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5, no. 1, March 2005.

Moriguchi, Chiaki. "Implicit Contracts,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 S. and Japanese Employment Relations, 1920—194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3, no. 3, September 2003.

Peppers, Larry C. "Full Employment Surplus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Changes: The 1930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0, no. 2, Winter 1973.

Reading, Don C. "New Deal Activity and the States, 1933 to 1939."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3, no. 4, December 1973.

Renaghan, Thomas M.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Federal Tax Policy, 1929—1939."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1, no. 1, January 1984.

Rockoff, Hugh. "By Way of Analogy: The Expansion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the 1930s." In Michael Bordo, Claudia Goldin, and Eugene White, eds., *The Defining Moment: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Rucker, Randal, and Lee J. Alston. "Farm Failures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1930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7, no. 4, September 1987.

Seltzer, Andrew.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 1911—1947."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5, no. 2, June 1995.

Wallis, John J. "The Birth of the Old Federalism: Financing the New Deal, 1932—194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4, no. 1, March 1984.

———. "Why 1933? The Origins and Timing of National Government Growth 1933 to 1940."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 4, 1985.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Deal Fiscal Federalism." *Economic Inquiry*, vol. 29, no. 3, July 1991.

Wallis, John J., and Daniel K. Benjamin. "Public Relief and Private Employment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1, March 1981.

Wallis, John J., and Wallace E. Oates. "The Impact of the New Deal on American Federalism." In Michael Bordo, Claudia Goldin, and Eugene White, eds., *The Defining Moment: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Weaver, Carolyn L. "On the Lack of a Political Market for Compulsory Old Age Insurance Prior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Insights from Economic Theories of Government."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0, no. 3, July 1983.

Weinstein, Michael M. "Some Macroeconomic Impacts of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1933—1935." In Karl Brunner, ed., *The Great Depression Revisited*.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1981.

White, Eugene Nelson. "Before the Glass-Steagall Act: An Analysis of the Investment Banking Activities of the National Bank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3, no. 1, January 1986.

Wigmore, Barrie A. "Was the Bank Holiday of 1933 Caused by a Run in the Dollar?"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7, no. 3, September 1987.

Wright, Gav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w Deal Spending: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56, no. 1, February 1974.

书籍

Achenbaum, W. Andrew. *Social Security: Visions and Revision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86.

Alston, Lee J., and Joseph P. Ferrie. *Southern Paternalism and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Berkowitz, Edward, and Kim McQuaid. *Creating the Welfare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wentieth Century Reform*.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Praeger, 1988.

Bordo, Michael D., Claudia Goldin, and Eugene N. White. *The Defining Moment: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Brunner, Karl, ed., *The Great Depression Revisited*.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1981.

Chandler, Lester V. *America's Greatest Depress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Cohen, Elizabeth. *Making a New Deal: Industrial Workers in Chicago 1919—193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Galbraith, John Kenneth. *Money, Whence It Came, Where It W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5.

Goldin, Claudia, and Gary D. Libecap, eds., *The Regulated Economy: 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Graham, Otis L., Jr. *Toward a Planned Society: From Roosevelt to Nix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Higgs, Robert. *Crisis and Leviathan: Critical Episodes in the Growth of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Hughes, Jonathan. *The Vital Few: The Entrepreneur and American Economic Progress*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The Governmental Habit Redux: Economic Control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

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Leuchtenburg, William E.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932—1940*.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3.

Merk, Frederick. *History of the Westward Movemen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

Moley, Raymond. *After Seven Years*. New York: Harper, 1939.

Ransom, Roger L. *Coping with Capitalis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1.

Shannon, David A. *The Great Depress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0.

Sherwood, Robert E. *Roosevelt and Hopkins*, 2 vols. New York: Harper, 1948.

Tugwell, Rexford G. *The Brains Trust*. New York: Viking, 1968.

Walton, Gary M., ed. *Regulatory Change in an Atmosphere of Crisis: Current Implications of the Roosevelt Year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第 26 章

战时“繁荣”

早在 1940 年,二战就产生了对美国工业产品的需求。在那个悲伤的夏天结束之前,法国向纳粹要求停战之后,很明显美国将被卷入冲突中,至少是作为一个向被包围的英国提供战争物资的非战斗供应者。征兵又在美国复兴,战争物资的订单极大地加快了工业生产的步伐。失业开始减少,因为工人进入到了提供战争产品的工业部门工作。实际上失业率在 1941 年 11 月底降低到大约 6%。亚历克斯·菲尔德(Alex Field)证明,在萧条的年份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右移动了。尽管这个右移的大部分是未实现的——而且是未被承认的——但是它有助于解释 1942 年的潜在产量为何远高于预期。^① 政府内部的经济学家研究表明,战争生产将经济推动到充分就业水平上——终将如此。^②

1941 年 1 月,富兰克林·罗斯福提请国会要求装备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物资。3 月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授权政府可以为“总统认为其防御重要程度相当于保护美国的任何国家”提供供给,从设置债务中进行融资。1941 年 1 月美国的出口已经高达 3.25 亿美元,到当年的 8 月则达到 4.6 亿美元,而 1939 年 8 月是 2.5 亿美元。到 1945 年 8 月,根据《租借法案》,美国向同盟国提供了 500 亿美元的战争物资(扣除提供的实物,净资金是 420 亿)。租借交付远远大于 1933—1939 年的所有联邦支出总和。

但是与美国主要的战时支出比较起来,租借几乎是一个副业。在 1941 年 12 月,随着纳粹军队深入到苏联疆域内,日本攻击了美国的太平洋军事基地,德国也对美国宣战。在另一个战时总动员过程中,美国的失业问题最终消失了。如凯恩斯所建议的,其他条件不变,政府充足的支出能够刺激经济。

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称这种观点为“舆论观点”,并认为它是令人误解的。^③ 毕竟,美国在战争期间是统制经济。希格斯认为西蒙·库兹涅茨的“和平时期概念”GDP 更适宜于衡量一般居民的福利;包括战争成果的宏观经济总量最多是一种误导。根据库兹涅茨的衡量,二战期间的经济并没有提高消费或投资;它只是增加了政府支出。

很难理解,更艰苦、更长期、更不方便和更危险的工作,作为逐渐减少的消费者

① Alexander Field, “The Most Technologically Progressive Decade of the Century,” *AER*, September 2003.

② Byrd Jones, “The Role of Keynesians in Wartime Policy and Postwar Planning, 1940—1946,”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2, no. 2, May 1972. 休·洛考夫认为未使用资源的利用,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比之后的时期重要得多。Hugh Rockoff, “From Plowshares to Swords: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World War II,”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Historical Factors in Long Run Growth, Historical Paper 77, December 1995.

③ Robert Higgs, “Wartime Prosperity? A Reassessment of the U. S. Economy in the 1940s,” *JEH*, March 1992; and Robert Higgs, “From Central Planning to the Market: The American Transition, 1945—1947,” *JEH*, September 1999.

商品流的报偿,怎样与这样的描述相吻合:“经济上讲,美国从来没有如此好过。”^④

希格斯计算出净私人投资在1942—1945年间是负的62亿美元,而他称为净政府投资的数额是正的994亿美元,一致的观点都认为它改善了经济,而希格斯认为除了战争它没有什么价值。^⑤对希格斯来说,摆脱大萧条的真正复苏并没有随着战争而到来,但却随着战争而结束了。它不是由政府支出导致的,而是由战争期间金融财富的增长及更好时代就在眼前的预期所导致的。

很清楚的是,无论一个人采纳哪种观点,美国人在战争期间获得的薪水增加了,虽然在他们希望从事的工作中并不是必然这样。他们很少能够随心所欲地花掉这些薪水。当战争结束和这些约束提升时,一个新生的经济开始了战后的经济生活,在水平和增长率上都使得寓言般的20年代看起来很渺小。萧条不再回来,但是关于它的记忆却挥之不去。

1. 战时动员的领域

战争再一次要求产量从和平时期的用途释放,以及扩张产量。管制工具再次出现了,但是关于初始动员,休·洛克考夫至少注意到市场调和了统制。^⑥

1.1 工具

因为存在统制经济,必然有些人必须作出命令。一战期间和新政期间的经验已经使人理解了这一教训。当战争到来时,政府能够暂时忘掉严格符合宪法的问题,这曾经中断了NRA和AAA时期的行动。

总统的“战时权力”是非同寻常的。遵循着伍德罗·威尔逊在1916年的先例,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计划者们一起参与了战争,确定了这个国家可能的动员方式。^⑦作为新政期间煽动和调查的结果,1939年9月,为了经济计划的利益重组联邦政府,通过8248号总统令,建立了现代的总统执行办公室。^⑧如果一旦我们进入战时状态的话,总统能够将执行部门扩展到旧体系部门之外,并实现战争需要的各类决策行动。在1940年5月,富兰克林·罗斯福任命了国防咨询委员会(NDAC)的成员。它是一个伞形的组织,在它之下绝大部分的战时管理工具都创立了。例如,1940年6月,国家防御研究委员会在NDAC的保护之下成立了,其目的是动员国家的科研人员为战争出力。在这点上战

^④ Higgs (1992), p. 53. Higgs 引用了 Seymour Melman, *The Permanent War Econom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5), p. 15.

^⑤ Robert Higgs, "Wartime Socialization of Investment: A Reassessment of U. S.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1940s," *JEH*, June 2004.

^⑥ Hugh Rockoff, "The Paradox of Planning in World War II,"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Historical Factors in Long Run Growth, Historical Paper 83, May 1996. 洛考夫关注的焦点是1943年在WPB之内产生的原料控制计划。尽管CMP经常被给以信贷而成功进行战时动员,洛考夫仍然指出,CMP是个更现实的,太晚的例子。

^⑦ Paul Koistinen, *Arsenal of World War II* (2004), 是关于战时动员的历史。

^⑧ Otis Graham, Jr., *Towards Planned Society: From Roosevelt to Nixon* (1976).

时的努力类似于新政,所有这些都应归功于伍德罗·威尔逊政府 1917—1918 年的启示。^⑨

也是在 NDAC 的保护之下,民间经济的制度框架得以建立。1942 年一宣战,战时生产委员会(WPB)就命令采取行动,确定优先权和配给程序。同一年,价格管理办公室(OPA)在 1942 年《动员法案》规定的控制权力之下成立了。^⑩ 总统职位变得如此有权力,以至于在 1942 年 2 月,富兰克林·罗斯福仅仅通过总统命令就将居住在西海岸的大约 115 000 名具有日本血统的人强制拘留到集中营,而后这一行动才获得了美国国会和最高法院的支持。^⑪ (直到 1988 年美国才向这些被拘留的人道歉,国会同意赔偿幸存者。)

1943 年,一个新机构——战争动员办公室(OWM)的建立强化了战争的努力,它的建立是为了协调和加快其他机构的工作。复杂的战时工作包括定量配给、实物控制,以及由政府直接建立大量工厂和设施。新政中出现的领袖人物(他们自身曾接受过一战的公务锻炼,而在第一次新政中得到再次实践)已经适应于战时努力的管理服务了。^⑫ 1943 年,无论如何,国会改变了新政就业创造部门的绝大部分机构;这些委员会、办公室、理事会和管理局都载入了史册。^⑬ 就像一战和新政时期,管理天才来自于私人部门一样,这些“年薪一美元”的管理者(他们的薪水是象征意义的政府工资),从全国各地的公司总部、董事会会议室和大学涌回到华盛顿。眼前的工作是巨大的,不能交给朝九晚五的政府雇员。

1.2 劳动力和物资

就像其他战争一样,直接的需求是劳动力和物资。在很多方面二战动员的规模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令人惊讶的,无论朋友还是敌人。从表 26.1 中可以看到,武装部队到 1945 年达到了 1 212.3 万人。为了训练、装备、给养和运送这些部队人员,在 1941—1945 年间,大约直接花费了 2 500 亿美元,仅 1945 年一年时间就超过了 800 亿美元。仅仅一年军事支出的总和就远远超过了 1931—1935 年任何一年的全部 GDP。

为了响应 1940 年至战争努力顶峰的要求,民间非农业劳动力增加了 30% (见表 26.1),其中一部分补充了武装部队的巨大增长。这样一个“工人缺口”出现了。失业队

^⑨ Jonathan Hughes, *The Governmental Habit Redux* (1991), pp. 197—199; Hugh Rockoff, *Drastic Measures* (1984), chap. 4; Robert Higgs, *Crisis and Leviathan* (1987), chap. 9.

^⑩ Hugh Rockoff, “The Response of the Giant Corporations to Wage and Price Controls in World War II,” *JEH*, March 1981. 也参见 Hugh Rockoff and Geoffrey Mills, “Compliance with Price Contr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During World War II,” *JEH*, March 1987.

^⑪ Executive Order 9066, 19 February 1942. *Personal Justice Denied: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Wartime Relocation and Internment of Civilians*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2); Peter Irons, *Justice at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⑫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1), 包含他对二战统制经济的回忆。他的另一本书,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讨论了战时价格统制和工资控制的后果。在战后不久的两篇文章中,他表现出了关于价格控制的信仰,它们作为技术配置的一般优势,并且他发现在垄断市场上价格控制是最容易的,这是他发现在美国经济中存在的一般现象, American business: “Reflections on Price Contro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60, no. 4, August 1946; “The Disequilibrium Syste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7, no. 3, June 1947. Also see Rockoff (1984), chaps. 4 and 5.

^⑬ 正如贝特曼和泰勒在下文中所阐释的那样, “The New Deal at War: Alphabet Agencies’ Expenditure Patterns, 1940—1945,” *EEH*, July 2003, 许多机构在战时变成了联邦公共工程委员会的一部分,它们在 40 年代早期的支出模式与 30 年代非常相似。

伍变小了,而后下降到几乎毫无意义的水平,在 1944 年仅为 1.2%。30 年代的失业水平再也没有回来。在那些年,太年轻而不能参军的十几岁的少年,他们的收入,从兼职工作到暑假工作,一般比他们父母(有工作的话)在以前缺乏工作的年份中还要高很多。如果产量得以扩张的话,女人、十几岁的少年、残疾人和成年人——所有人都需要去替代千百万去了外国战场的人。^⑭

表 26.1 战时支出和人力动员,1940—1947 年

年份	GDP (10 亿美元)	总军事 支出 (10 亿美元)	武装部队 人数 (千人)	非农业 劳动力 (百万人)	失业 百分比	制造业 产出指数
1940	104.4	1.8	458	38.0	9.5	25
1941	126.7	6.3	1 801	41.3	6.0	32
1942	161.9	22.9	3 859	44.5	3.1	36
1943	198.6	63.4	9 045	45.4	1.8	44
1944	219.8	76.0	11 452	45.0	1.2	47
1945	223.1	80.5	12 123	44.2	1.9	41
1946	222.3	43.2	3 030	46.9	4.0	35
1947	244.2	14.8	1 583	49.6	4.4	39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Ba 475, 483, Ca 10, Dd 498, Ea 638, 639; 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table 1.1.5.

这样不为人知的经济潜力甚至令那些最渊博和最恼怒的人感到震惊,他们经历过 30 年代的悲惨,当时争论为了减轻失业的巨大的支出努力将会威胁公众并引起政府破产。实际情况是,1944 年的充分就业 GDP 是 1940 年的 3/4,而 1940 年是新政最好的年份。用现行价格计算,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在战争支出的刺激下 GDP 翻了一番。

1.3 复员

战争支出,向国家经济部门中提供如此巨大的注入,似乎最终使经济获得了新生。到复员时,新的活力保存下来了。当 1946 年和 1947 年退伍军人返回并重新进入劳动力大军时(武装部队和军事支出相应缩减),劳动力的扩张再次加快了(表 26.1)。真实 GDP 在 1945—1946 年间略有下降,但是价格控制有所提高,价格提高了,以现价计算的 GDP 在 1946 年略有下降,而现在重新上升了。失业率恢复到 30 年代和平时时期略低于 4% 的水平。1943—1944 年的工业生产大约是 1940 年的两倍。自此之后工业生产下降恢复到原状,进入诸如房地产和服务业领域。在长时间的落后之后,房地产业最终(1949 年)重新恢复到了 1926 年的水平。事实上,直到 1953 年朝鲜战争的最后一年,工业生产才再一次呈现出不同寻常的 1943 年的水平,这时新一波和平增长的浪潮开始了。复员,因为为经济制造战时货币和被压抑的消费需求,造成了一些经济学家所担心的问题。最悲观的悲观主义者设想 30 年代会重现,“长期停滞”就在眼前,这个国家将再也无法经历增长。

^⑭ 例如,参见 William J. Collins, “Race, Roosevelt, and Wartime Production: Fair Employment in World War II Labor Mark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1, no. 1, March 2001.

2. 为战争提供资金

有一战和新政的赤字作为直接背景,二战并没有给政府当局带来特别的财政问题,除了绝对数量之外。和通常一样,为了战争的目的,政府需要支配的资源远远超过任何可能的征税能力。这个需求必然产生大量的联邦赤字。除了税收,战时财政对价格的影响也被减少到能够从整个公众那里借到资金的程度。但是,这必然要将债券卖给美联储,而这个过程会增加货币供给,带来通货膨胀隐患。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幅图画中的主要财政特征(见表 26.2)。^⑤ 支出增长到了被认为是必要的水平。轮到国会和货币当局寻找办法了。问题在于支出提高了 8 倍多,仅仅在 5 年之内就从 85 亿美元增加到了 706 亿美元。1945 年总的联邦支出大约相当于传奇年份 1929 年 GDP 的 80%。政府不得不提高税收来支付这个增长,而且特别是针对收入税税率。此外,为了将税赋收入尽快送至政府手中还实行了代扣制度。但是 1945 年最大的财政收入仅仅是支出的一半。随着赤字的增长,债务也在增加,上升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2710 亿美元。^⑥

表 26.2 战时财政,1940—1945 年

年份	美国政府					货币供给		商业银行持有的 联邦债券
	收入	支出	赤字(+) / 盈余(-)	联邦债券总量	来自个人收入税的收入	M_1	M_2	
1940	8.2	8.5	-0.3	50.7	0.9	39.7	55.2	16.6
1941	14.9	12.7	2.2	57.5	1.3	46.5	62.5	20.1
1942	22.3	31.0	-8.7	79.2	3.3	55.4	71.2	26.4
1943	35.5	52.6	-14.1	142.6	6.5	72.2	89.9	52.5
1944	40.1	67.0	-27.0	204.1	19.7	85.3	106.8	68.5
1945	41.5	70.6	-29.1	260.1	18.4	99.2	126.6	84.1
1946	39.5	44.6	-5.1	271.0	16.1	106.5	138.7	84.5
1947	42.8	37.6	5.2	257.1	17.9	111.8	146.0	70.5

注:单位是 10 亿美元。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j 42,45,257, Dd 498, Ea 679—682; 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table 3.2.

^⑤ 对战时融资的讨论大部分来自于 Paul Studenski and Herman Krooss,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第 30 章。对于二战统制经济组织过程的新的和批评性评论,参见 Higgs(1987), 第 9 章。

^⑥ Lee E. Ohanian,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War Fin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ld War II and the Korean Wa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7, no. 1, March 1997, 作者认为这种财政导致了更大的产出和更多的经济福利,与朝鲜冲突融资时的平衡赤字办法相比。

2.1 债券销售和利率政策

和一战时一样,在二战时社会名流加入到了爱国运动之中,“债券集会”在全国各地举行(名流作为引诱公众的拉拉队队长而发挥作用),影响那些爱国的收入获得者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为山姆大叔提供贷款,以渡过这段日子。各类金融机构中都销售债券,总共有600万代理人参与销售活动。这种努力是前所未有的。结果,1570亿美元的债券被直接销售给了公众,高于销售到金融机构的数量。1946年,美国居民拥有23%的全国债券;银行占40%;非银行机构占37%。这些比例并没有显著区别于战前,保持稳定的财产分配表明是一个进步的信号。^{①7}

当利率空前降低时财政部进入了战争中,这种情况允许政府控制战争的自身成本(规定借款利率)到一定程度,这在一战中是没有享有过的。直到与联邦储备体系终止合作,1945年财政部要应付其巨大债务的比例仅仅为平均1.94%,一战结束时这个比例是4.2%。

美联储当局在1942年4月宣布它将按照到期面值0.38%的折现率,以无限制的数量购买和销售国库券。这一步使短期利率“钉住”了财政部用来借款的难以置信的低利率。如图26.1所示,长期债券也同样钉住了2.5%的利率。事实上,政府利率的稳定是财政部和美联储协作努力为新政和二战融资的结果。商业银行被允许用“战争贷款”账户购买国债,这个账户既没有准备金要求,也没有存款保证金要求。这是以利息为关系的资金。银行,像一般大众一样购买债券。组合投资(见表26.2)从1940年的219亿美元增长到1946年的1190亿美元。银行被债券填满了。^{①8}

2.2 货币供给

廉价战争的政策当然意味着货币供给是巨大的、快速的和通货膨胀型的。^{①9}由于这个国家是以大量失业资源和资本装备参战的,故其对作为货币第一幻觉结果的通货膨胀并不是非常担心。毕竟,新政没有比对通胀更热切的了。因为工厂转而生产战争物资,即使汽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一起停止,非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也是上升的。当收入增加时,这些十几年都急需消费品的民众都会涌入市场去购买可得的物品。零售商的旧货库存消失了。价格控制——以及凭票配给的商品如汽油、肉和糖——随着战争的进行要保证“公平分配”的复制。为了节约布料,男人的裤子不再翻边,羊毛变得稀缺,女士尼龙长袜消失了。天然绉绸鞋底的男鞋看不到了。需要购买的公众习惯了用织物和奇异的肉类和谷物组合来代替。物品还是丰富的,但不同的构成是必要的。^{②0}

如表26.2所示,货币供给总量大大扩张了。开始时多余的产能允许产量和就业扩

^{①7} 1940年,个人拥有全部政府债券的20%;商业银行占39%;而非银行投资者占44%。当商业机构将资源用于新的投资用途时,非银行投资者的持有份额下降了。Studenski and Krooss (1952), pp.454—455。

^{①8} 对美联储和财政部之间战时合作的研究,参见Lester V. Chandler, “Federal Reserve Policy and Federal Deb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9, no. 2, March 1949。

^{①9} Rockoff (1995)指出,货币创造在1942年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②0} 战时质量下滑的加重问题与工资控制有关。Hugh Rockoff, “Indirect Price Increases and Real Wages During World War II,” *EEH*, October 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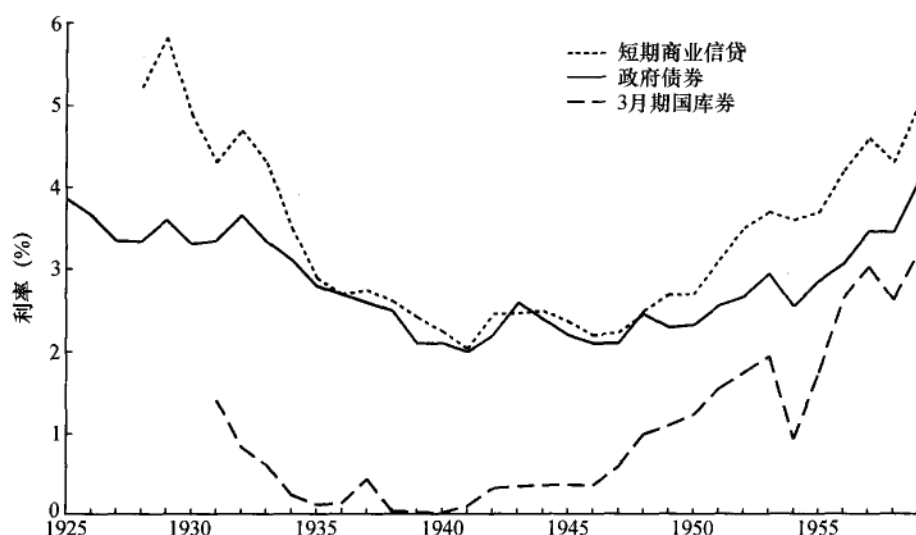


图 26.1 利息率, 1925—1959 年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j 1192, 1198, 1231。

张,而完全没有通货膨胀的后果。然而,这个国家充满了潜在通货膨胀流动性的威胁。但是当战争结束时,表现着由战争引起的被压抑的消费品需求(特别是耐用品,如新汽车和冰箱),以及在此之前的长期的萧条的流动性,遇到了实物产量的大爆发。这个国家的制造业设施投入了运转,制造商品以获得利润,因为公众因战争通货膨胀有支出购买力,但结果没有人能预料到。一些经济学家担心回到30年代;另一些人担心通货膨胀失去控制。而我们只有在回头看的时候才看得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战争结束时, M_1 已经增长了150%,但批发价格只比1940年上升了35%。仅仅用价格通货膨胀的标准来衡量,战时管理是一场胜利;批发价格在一战期间是翻番的(见表23.1)。

当价格管制在1946年解除的时候,价格强烈上升了,1950年比1945年的水平上升了50%。因为部分战时债券兑换成现金或者卖给美联储,货币供给也增加了。这些资金有助于战后的财政扩张。但是货币供给在1945—1950年间仅仅增加了额外的15%。与1940年比较,到战后时期结束时,货币供给的增加仍远远大于价格的提高。现在,货币供给在公众手里就是购买力;价格是支出的成本。毫不奇怪,美国人仍然会天真地回顾战争和战后岁月的第一个五年:紧随30年代痛苦之后的巨大繁荣。^②

2.3 税收

联邦政府试着对大多数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收入征税。税收转移将资源控制到政府手中。但是美国仍然是一个民主国家,立法者受到再次当选所必需的爱国热情的约束。这样,税收保持在政治上可行的水平上,而不是为战争融资的技术上的最大化

^② 价格控制确实放慢了通货膨胀,还是仅仅推迟了通胀? 参见 Rockoff(1984),第4章。洛考夫认为二战时的价格控制实际上减缓了1940—1950年通货膨胀的程度。Rockoff(1984), chap. 4。

水平。从表 26.2 中可以看到,事实上,联邦收入从 1940 年到 1945 年增长了大约 5 倍,相对应的是支出增长了 8 倍。既定选举制度约束条件下,不公平的税收表现是不存在的。^②

消费税提高了,奢侈品被征收特别战争税(这种税在战争结束后有代表性地保持了几十年)。重要的一项成功是扣缴——1943 年针对个人的收入税,付工资时扣缴所得税的制度。政府的征税雄心往往受到征收成本的限制。例如,对从农民那里偷取粮食的士兵进行劫掠是无效率的;成本很高,而且农民在下一季可能就不种植这么多粮食了。既然国家的大部分收入不是由富人获得的,那么抓住普通工作人口的收入这个问题就会受到维持纳税人大军的成本的约束。然而在 1942 年,联邦政府更加容易地从显著的来源那里征募了可利用的收入。^③处于新扣缴制度之下的雇员,从他们自己的雇主那里获得收入所得的同时,也从雇主那里集齐了收入税。然后这项资金将被移交给美国国内税局。用这种制度管辖纳税人更加容易。

1937 年的社会保障税是这种方式的一个示范。自此之后付工资时扣缴所得税成为联邦税制的核心。为了爱国主义的目的税率被严格地划分了等级。为什么居民应该待在家里享受富有而“我们的儿子”却在海外作战?自然地,战时税率再也没有下降到和平时期的水平。

个人所得税在 1940 年占联邦政府税收所得的 12%,到 1945 年则增加到了 45%(见表 26.2)。^④付工资时扣缴所得税给了联邦政府一项自动“撇取”全国的个人收入的机制。生活在 1943 年税收法之前的新政拥护者,永远想象不出这样的财政力量。

简言之,巨额战争费用的 46.5% 是由这种税收支付的。一战时这个数字还仅是 33%。^⑤虽然绝不能说完美,未来充满危险,但是二战的税收体制无论怎样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事实证明,事后衡量它,比怀着战时爱国主义的激情建立它,是一个重要得多的问题。

3. 战争、劳工和家庭收入

战争支出决定性地提高了家庭收入,从战争的工作中获得的收入用于消费,提高了大部分其他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根据凯恩斯主义信条,如果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由新的货币创造资助的巨大的政府支出将会奠定广泛增进的基础。1941 年家庭平均收入是 2 209 美元,而仅仅在三年之后就几乎提高了 64%;用现价表示 1944 年是 3 614 美元。那

^② J. R. Vernon, "World War II Fiscal Policies and the End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JEH*, December 1994, 作者认为在战争的早期政府的财政政策对于恢复 1942 年的充分就业环境起到了作用。就这一点来说,他否定了德隆和萨默斯的估计, Bradford DeLong and Lawrence Summers, "How Does Macroeconomic Policy Affect Output?"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 2, 1988.

^③ 在这一节中不能从讨论中解释我们的现代国会成员失去了 1943 年时的深邃,并且考虑理解了那时的税收规则。税收手段,和现在一样,是内部很少协调的预审和辩论的结果。E. D. Allen, "Treasury Tax Policies in 1943,"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4, no. 4, December 1944; also Mabel Newcomer, "Congressional Tax Policies in 1943,"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4, no. 4, December 1944.

^④ Studenski and Krooss (1952), p. 445.

^⑤ *Ibid.*, pp. 295—299.

些年真实人均 GDP 上升了 44%，从 30 年代的无成就到现在它是一个突出的变化。

3.1 劳动力参与

表 26.1 有助于表明，大萧条时代的失业率随着战争行动获得同步的剧烈下降。随着千万人参军，劳动力队伍需要从那些没有得到正常雇用的人中间扩充。1944 年劳动力比 1940 年几乎多了 1 000 万人。由于这种增加，大部分未利用的资源都得到了选择。

这种发展的部分显著特点在表 26.3 中表示。支出的上升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就业机会，并把劳动力成员罕见地扩展到了 14—19 岁的人群。劳动力参与的增加中，十几岁的女性约有 80%，男性约 57%。整个国家中 65 岁以上的男性中有一半得到有偿雇用，女性同样也有很大比例。65 岁退休立刻过时了。甚至女性在组建家庭的主要年龄段——20—24 岁，参加工作的比例增加了 10%。总的女性工作参与率提高了 30%。

表 26.3 劳动力及其参与，1940—1947 年

年份	总劳动力 (百万)	参与率百分比								
		男性				女性				
		总数	16—19 岁	20—24 岁	65 岁 以上	总数	16—19 岁	20—24 岁		
1940	56.1	82.5	—	66.4	—	66.9 ^a	27.9	—	34.7	—
1944	66.3	88.2	72.2		96.4	49.4	36.3	41.1		55.6
1947	60.9	86.8	67.0		84.9	47.8	31.8	41.1		44.9

^a 这是 1940 年 55 岁以上的比例。

资料来源：1940 和 1944，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50 and P-25；1947，U. S. Department of Labor, *Manpower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March 1972, pp. 158—159.

当战争结束时，所有参与率都下降了，劳动力自身数字也下降了。战时参与率表明，我们的“完全就业”概念主要取决于正常参与率是多大。显然，与 1944 年的参与率相比，30 年代的失业率严重得多，当时所用的参与率是更为正常的数字。70 年代，在女权运动的旗帜下，以及通货膨胀效应对家庭生活水平的压力之下，女性参与率上升了 50% 以上。二战期间，在“铆钉工人罗西”的电影中，女人做着“男人的工作”，这预示着下一代将要发生的事情。

正如克劳迪亚·戈尔丁所说，战争被证明给较年长的已婚妇女带来了福利，她们由于“婚姻门槛”（参见第 28 章）已经多年被排除在劳动力门外。继续对已婚女性工人实行限制的公司，才能对她们所获得的劳动施加了严格的约束。在战前并不是这样。但战争并没有以同样方式给其他群体的女性带来好处。战争期间最年老和最年轻（14—19 岁）的女性群体就业呈现大幅度增加。然而，1950 年的一次人口普查表明，对于最年轻的群体来说，1950 年和平时期的就业与 1940 年并没有什么不同，尽管战时的就业是 1940 年报道的数字的 200%。另一方面，对于较年长的群体，差距得以维持——甚至是扩大了。对于那些年龄在 20—24 岁的群体来说，1950 年的就业少于 1940 年。

“铆钉工人罗西”，进入劳动市场找到战时工作的女人，据说当男性回来时便失去了工作。如果她年轻，确实就有机会。戈尔丁报告中说，关于年轻的罗西是否希望继续在战后从事铆钉工作，仍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显然，对于之前的或者可替代的位置都没有。

可得的选择权。对于更老的罗西来说,选择性就业成为可得的,她们接受了这种结局。^⑥

3.2 工资

战争对制造业产品的超常需求意味着对工厂人手的需求。从开始建设的1940年,到国防就业达到顶峰的1944年,非农劳动力就业增长了约1/3。制造业中的雇员总数在1940年是1080万人,到1944年超过了1700万,增加了大约60%。制造业的平均周工资从1940年的25.2美元提高到1944年的46.08美元,提高了80%多。^⑦ 甚至最后这个国家的农民(现在数字缩小了)也分享到了这种幸运。他们的价格急剧上涨,对他们的产品的需求是空前的,配给制给了他们燃料需求的优先权。在30年代末期机械化的程度有助于他们提高产量,即使在他们的工业中实际就业是下降的。表26.4表示雇员的收入情况。

表 26.4 每个全职雇员的平均年收入, 1940—1947 年

年份	全体工业	农林渔	采矿业	承包 建筑业	制造业	服务业
1940	1 377	487	1 388	1 330	1 432	953
1944	2 207	1 220	2 499	2 602	2 517	1 538
1947	2 740	1 518	3 113	2 829	2 793	1 996

注:单位是美元。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Ba 4419, 4397—4400, 4409.

由于战争激励的进步,所有情况都持续到了战后的扩张时期。农业上的收入尽管在绝对量和相对量上仍然很低,但是也经历了战时最大的比例增长。像在一战时那样,美国长期的食品剩余,现在变成了核心必需品,农民发现他们自己再次变成了英雄。其他一切都要依赖食品生产。记住价格在战争年代仅仅上升了1/3;这样,几乎所有工业部门的工资收入者,真实收入都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增加。

3.3 收入分配

与一战一样,在动员经济中通过战争支出收入分配变得更加平等了。随着劳动力参与的大幅提高,和物质生产部门劳动力被赋予的优先权,最贫穷的家庭也在好时代中分享到了好处。朝着更公平方向的改变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令人瞩目,但它是真实的,是这个国家收入分配走向更公平的现代趋势的一部分。

如表26.5所示,最上部的20%的家庭经过萧条和战争收入分配下降了,战后几年略有上升。最高的5%家庭和基尼系数也呈现了同样的变化。战争使一些人比其他人变得更好了。至少到1946年,下面的全体80%比最高的20%得到的稍微多些。但战争之前并不是这样。

^⑥ Claudia Goldin,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1990), pp. 152—154, 175—176.

^⑦ 由于延长时间,收入的增长要快于小时工资率的增长,后者是受到控制的。D. M. Keezer, "The National War Labor Boar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6, no. 3, June 1946; Harry Henig and S. H. Unterberger, "Wage Control in War-time and Trans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5, no. 3, June 1945.

表 26.5 消费者个体中的收入分配,1929—1947 年

货币收入的百分比	最高的 20%	最高的 5%	基尼系数
1929	54.4	30.0	0.49
1935	51.7	26.5	0.47
1941	48.8	24.0	0.44
1944	45.8	20.7	0.39
1947	46.0	20.9	0.40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Ba 21—23.

4. 消费和投资

个人消费受到曾经实施的配给制的制约。这个时期的消费支出行为包含一个小的值得注意的新奇情况:用于食物支出的比例上升了。而且,战争对消费者收入的影响也为战后投资的繁荣铺好了道路。

4.1 食物消费的增长

根据恩格尔法则,随着真实收入的提高,用于食物支出的比例下降。到 1947 年美国已经吃得很好了。然而,恩格尔法则假定,一些普通的分配存在消费替代。当二战迎来家庭收入的提高时,昂贵的新型消费品,如汽车、家用电器和小机械,还没有进行生产。因为已经存在充足的储蓄率,消费者可以购买更多的食品和饮料(无论在餐馆还是在家庭消费)。这是一个奇怪的反转形式,除了强制储蓄和缺乏替代选择,可能并不能归因于更基本的东西。注意表 26.6 中的改变。

表 26.6 私人消费方式,1940—1947 年

年份	总的个人消费支出 ^a	食品和酒类 ^a	食品和酒类所占的百分比	家庭商品 ^a	家庭总商品的百分比
1940	71.3	22.0	30.9	4.1	5.8
1944	108.7	39.3	36.2	5.0	4.6
1945	120.0	43.5	36.3	5.6	4.7
1947	162.0	56.1	34.6	11.2	6.9

^a 单位是 10 亿美元。家庭商品是家具、家用电器、餐具和其他家具设备。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d 154, 179—183; 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table 1.1.5.

配给,特别是食物配给在战争中提高了,这是政府努力帮助实施价格控制的结果,而价格控制将会导致短缺。在生产迅速转移到为战争生产的情况下,政府尽力保证每一种配给商品给予消费者一个很小的数量,而不是让消费者在黑市上与短缺商品供应相斗争。^② 有两种基本的配给形式。除了加工食品、肉类、脂肪之外,对于大多数产品,消费者得到一张配给票,允许购买规定数量的特殊单位商品。对于加工食品和肉类及脂肪则实

^② 正如 Rockoff(1996)所说,价格控制和配给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快速动员效应。

行“点”制度,加工食品是蓝点,肉类及脂肪是红点。消费者利用收到的一定数量的点数来购买商品,这些商品用点数来标价。我们可以假定,既然配给点数的功能是一种纸币形式,那么它们就有和纸币相关的一切问题。^② 然而,休·洛克考夫认为,毕竟配给确实有助于控制通货膨胀,特别是战后时期可观察到的价格提高既定的情况下。^③

当战争结束时,消费品再次变得容易获得,随着食品购买的增加食品的消费支出下降了。战后对商品的巨大需求反过来又促进了 40 年代后期投资的繁荣。

4.2 投资

传统观点认为,战时经济中史无前例的商品狂潮仅仅表明了 30 年代的极大浪费——人才和资源闲置,产出和工作生活永远失去了——而且美国经济在 1941 年的减弱使得这样的情况成为可能:在保持(相对)较小的通货膨胀压力条件下,为战争需求而产生了产量扩张。

表 26.7 表示的是私人投资的数据,事实上,在战争年代出现了急剧下降。与个人储蓄相比较尤其有意思。注意,战争中个人储蓄出现了急剧上升——从 1940 年的 44 亿美元到 1944 年的 387 亿美元,大约上升到原来的 9 倍。然后当 1946 年和 1947 年可供购买的物品进入市场时,储蓄又猛然下降。如果不是没有选择,美国人显然更愿意购买商品,而不是储蓄。

表 26.7 个人储蓄和私人投资, 1940—1947 年

年份	个人储蓄	总的私人国内投资
1940	4.4	13.6
1941	11.5	18.1
1942	28.6	10.4
1943	34.6	6.1
1944	38.7	7.8
1945	31.1	10.8
1946	15.5	31.1
1947	7.4	35.0

注:单位是 10 亿美元。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table 1.1.5 and 2.1.

另一方面,当战争开始时,总的私人国内投资数据在 1942 年几乎下降了一半。到 1943 年,私人投资只有 61 亿美元,只有 1941 年的 33%。在战争结束时,随着投资优先权的结束,私人投资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战后的巨大繁荣开始了。但是,在私人投资出现这样剧烈的下降的条件下,二战期间的产量提高是怎样实现的?

正如罗伯特·戈登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指出的,联邦战时支出的记录中隐藏着更有

^② 特别是,还有大量假冒的配给点券和时不时地滥发货币,这两者都导致了通货膨胀。

^③ Rockoff(1984), pp. 174—176.

意思的非传统的智慧。^② 金融公司(它是一战战争金融公司的后身)的重建,通过它的补贴很大程度上建立并装备了工业厂房,国防工厂公司。这些建筑以有利的条件成为私人战争合约者可利用的资产。^③ 战后,一些更壮观的装置,如位于犹他州普罗沃的庞大的日内瓦钢铁公司,被卖给了私人经营者。其他的建筑和设备也简单地移交给了战时使用者。

一些用于原子弹项目的工厂仍保留着政府所有权。其他的——例如位于西部沙漠的空军基地——像海军和空军的后备部队,没有立刻的用途,被慢慢拆除、废弃,或被赋予和平时期的用途(例如,加利福尼亚的坎普石工,现在是一个工业园)。海军补给船变成了移动的鱼罐头加工厂;多余的吉普和卡车常年留在了农场里。军队营地变成了私人的属地。甚至极差的木板房建筑和匡西特活动房屋都在和平时期的地方找到了进一步的用途,例如大学校园,为学生家属提供住宿。

在任何情况下,认为不充分就业的、萧条的经济突然像凤凰一样腾飞,并且开始使得飞机和坦克为战时美国所需要,这种传统观点是言过其实的。就像劳动力队伍是由于参与率的提高而得到扩大的一样,国家工业工厂的扩张是由于政府的直接建设。可以肯定的是,1941年有了过剩产能,但它并不是战争年代巨大的产量扩张的唯一来源。

5. 凯恩斯主义的教训

战争给各地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上了一次难忘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形式的实物教学课。^④ 凯恩斯在1941年出版的小册子《怎样为战争付费》中概括了主要思想。这是他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进行的分析的一个有力的运用。政府的直接支出将创造产出,是为战争以及为居民消费和投资创造物质产品而必要的产出。经济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覆盖了可能出现的情况。既然战争产品的货币支出变成了整个经济可花费的收入,既然战争的产出并没有进入经济体系吸收那些支出,那么税收、债券和战后信贷(工人为获得利息收入而发生的存款以及冻结起来购买耐用消费品储蓄)就不得不吸收这些多余的收入,或者产生通货膨胀。《怎样为战争付费》也是“国家预算”的蓝图,并且是计划方法的蓝图,战后计划方法在西欧得以流行,但在美国没有。^⑤

这样在一定意义上,战争完全阐释了凯恩斯主义的信条。政府支出、赤字支出的运用,能够并且确实消除了与萧条相联系的失业。但是政府政策的充分运用需要命令性质的货币手段,和实物配给制以及其他的控制措施,以抑制通货膨胀趋势。^⑥

美国政治家,即使是最没有缺点的保守主义者,也不能否认他们感受到的证据——战争破解了长期滞涨之谜和挫败所有新政努力的失业问题。从1941年夏天开始,美国和他的英国同盟开始规划战后世界。他们着手制定了世界经济恢复和扩张的伟大计划,

^② Robert Gordon, “\$45 Billion of U. S. Private Investment Has Been Misplaced,” *AER*, June 1969.

^③ Louis Cain and George Neumann, “Planning for Peace: The Surplus Property Act of 1944,” *JEH*, March 1981.

^④ 现代总结,参见 Herbert Stein, *The Fiscal Revolution in America* (1969), chap. 8.

^⑤ Jacob Mosak, “National Budgets and National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6, no. 1, March 1946.

^⑥ 战争期间“伪装”的通货膨胀是希格斯(1992)质疑凯恩斯主义的战时繁荣观点的进一步原因。

最终体现在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中(见第27章)。新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必要的直接前提是在美国经济内部,联邦政府控制总需求和促进充分就业政策的能力。正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如果30年代再次重现,新的国际秩序将是无意义的。战争证明,据称灾难不会再发生。最后出现的立法(1946年的《就业法案》)似乎被战时经验所证明——当然新政本身在联邦创造充分就业经济能力的有效性方面并不能产生巨大的信心。^⑤

无论战争的教训是什么,1946年的《就业法案》是美国经济史上的一次真正革命。除了1787年夏天各州之间的折中行动,联邦政府从来没有在法律中宣布其权力,并承担“管理”经济的职责。

推荐阅读

文章

Bateman, Fred, and Jason E. Taylor. "The New Deal at War: Alphabet Agencies' Expenditure Patterns, 1940—1945."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40, no. 3, July 2003.

Cain, Louis, and George Neumann. "Planning for Peace: The Surplus Property Act of 194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1, March 1981.

Field, Alexander J. "The Most Technologically Progressive Decade of the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3, no. 4, September 2003.

Gordon, Robert J. "\$45 Billion of U. S. Private Investment Has Been Misplace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9, no. 3, June 1969.

Higgs, Robert. "Wartime Prosperity? A Reassessment of the U. S. Economy in the 1940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2, no. 1, March 1992.

———. "From Central Planning to the Market: The American Transition, 1945—1947."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9, no. 3, September 1999.

———. "Wartime Socialization of Investment: A Reassessment of U. S.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1940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4, no. 2, June 2004.

Rockoff, Hugh. "Indirect Price Increases and Real Wages During World War II."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5, no. 4, October 1978.

———. "The Response of the Giant Corporations to Wage and Price Controls in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1, March 1981.

Rockoff, Hugh, and Geoffrey Mills. "Compliance with Price Contr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During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7, no. 1, March 1987.

^⑤ 对这个法律的意外事故,从早期版本作为“充分就业”法的研究,参见 S. K. Bailey, *Congress Makes a La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0)。

Vernon, J. R. “World War II Fiscal Policies and the End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4, no. 4, December 1994.

书籍

Goldin, Claudia D.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Graham, Otis L., Jr. *Toward a Planned Society: From Roosevelt to Nix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Higgs, Robert. *Crisis and Leviathan: Critical Issues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Mixed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Hughes, Jonathan. *The Governmental Habit Redux: Economic Control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Koistinen, Paul A. C. *Arsenal of World War I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Warfare, 1940—1945*.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4.

Rockoff, Hugh. *Drastic Measures: A History of Wage and Price Contr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Stein, Herbert. *The Fiscal Revolution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Studenski, Paul, and Herman Krooss.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cGraw-Hill, 1952.

Vatter, Harold G. *The U. S. Economy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第5部分

勇敢面对新世界：1945 年至今

主要趋势：1945—2002 年

有美国参加的二战在 1945 年 8 月结束。日本投降结束了一个国家的集体努力，自 1865 年美国内战结束以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努力了。在那个绝妙暮夏的寂静空气中，可能性似乎是无限的。萧条和战争——不间断地共同持续了 16 年——最终化为历史的尘埃。美国人得到了重生。他们似乎是他们自身命运的主人。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巨人，从漫长的痛苦折磨中摆脱出来，而且当时世界上并不存在紧跟其后的第二个国家。它的工业、科学、农业、富裕给了它的人民令人兴奋的优越感。宪法支持，法规流行，选举在他们的任职间隔中发生。人们谈论美国时仍形容为“年轻和自由的”。美国人在时间的乐章中，是“美国人的世纪”的起点。

就事实而言，对美国人来说，从解除柏林封锁只有 3 年，从朝鲜战争和冷战开始只有 5 年——对已经知名的“国家安全”来说，那是从未结束的战争、从未结束的危机、从未结束的危险。那些光明的、脆弱的历史，那段开始于 1945 年 8 月的“短暂和平”，持续了不到 5 年时间，并毫无痕迹地消失了。事实上，1948 年发生的无情的政治运动，本来可以是一个幻象。也许根本没有真正的和平，它仅仅是一个战争中间的插曲。或许和平并没有真正开始，直到 1989 年苏联宣布解体，柏林墙倒塌，漫画《杜恩斯比利》（*Doonesbury*）宣布冷战结束。开始于 2001 年 9 月的“反恐战争”是否又使美国返回到长时期的“冷战”状态还是未知。

在 1950 年之后，美国经济史锁定在一些重大事件的混合之中，源自新政的新“福利国家”，混合在一起的是持续的、巨大的、用于国内外的军事和国家安全支出。在大部分时间里，战时的税率仍然保持着，而且不久，联邦赤字恢复——起初很小，然后越来越大。1945—1950 年间的经济学家认真地讨论“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认为是合理的——而且可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目标。到 70 年代末期，两位数的通货膨胀，6%—7% 的

失业率,整个美国历史上最高利率的巨额赤字,使经济学家清醒了,讨论政府支出是“失控”的,并预测在这些家庭抵押贷款的比例低于18%的情况下,一般美国家庭的房屋所有权结束了。经济增长已经放慢;真实人均GDP直到1984年才超过了1979年的水平。发生了什么?1945年的一首流行歌曲是“让好日子回来”。^⑤它们去哪里了?当21世纪到来时,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水平接近20世纪60年代的中晚期水平,我们相信它们回来了。

二战之后的美国经济史也许有五个主题占主导地位:

(1) 美国经济被证明在全球化时代是有弹性的。GDP的时间路径表明,高涨已经持续了更长时间,而下降趋势更短、更温和。“旧经济”工厂和设备的荒废以及产量减少,在传统美国强势领域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下降,对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生产率危机”和出现在80年代中期的国际收支账户问题起了一定作用。经过一段时期的重建之后,围绕计算机和互联网建立起来的90年代“新经济”,帮助经济恢复到高增长率,并且使美国经济保持在国际主导地位。

(2) 因为持续的医疗进步降低了死亡率,同时持续的经济增长吸引了移民,人口得以增加。新的移民更多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而不是欧洲。在第三产业(服务)部门劳动力增加了,与食品和商品生产部门的直接就业相比,比例也增加了。此外,在种族间和代际的补偿也向平等迈进了。

(3) 伴随经济的强劲增长一起出现的,还有政府支出占GDP份额的提高。冷战需要巨大的费用支出,用于军队、准军火设备、劳动力、外国援助和外国军事行动。^⑥此外,尽管有些管制放松开始于70年代晚期,管制制度的扩展开始包围了几乎所有合法的、与商业联系的私人经济活动。在21世纪开始之时,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作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4) 政府支出的增长伴随着长期的联邦赤字,无论是经济繁荣和萧条时期,这一点都为政客们的花言巧语提供了理由。尽管很少有证据表明,这些赤字损害了经济,但是它们已经变成了反对联邦政府扩大的象征。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晚期,这些赤字被认为已经导致了货币供给的稳步增加以及通货膨胀。在80年代和90年代,通货膨胀大大降低,赤字减少,特别是里根时代的赤字之后,保持了良好的政治环境。1990年和1993年为了减少赤字而增加了税收,到90年代末期出现了盈余。2001年3月开始出现衰退,税收削减,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袭击之后政府支出又回到了赤字预算。

(5) 增长已经使这个国家忙于从事影响“生活质量”的大量外部事务,特别是与环境相关的事务。具有历史意义的高生活标准提供了资金,有助于清洁我们的空气和水,并几乎消除了美国内部绝对贫困的核心部分。

在新千年开始的时候,某些战后经济的问题并没有像媒体曾经渲染的那样,被证明

^⑤ 对事件、政策和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清晰、概括性总结,参见 Robert Gordon, “Postwar Macroeconomics: The Evolution of Events and Idea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edited by Martin Feldste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chap. 2. 还可参见阿瑟·奥肯和赫伯特·斯泰因紧随戈登文章之后的评论。

^⑥ John Wallis, “American Government Finance in the Long Run: 1790 to 1990,”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4, no. 1, Winter 2000. Robert Higgs, “The Cold War Economy: Opportunity Costs, Ide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Crisi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1, no. 3, July 1994, 重点考察了1948—1989年这段时期的宏观经济效应。

成为灾难。在 70 年代,当其他国家的工业在努力赶超的时候,那些国家的工业似乎在发展更好的生产和分配技术,这些技术是美国工业不能或者没有采用的。结果是经济增长到 70 年代晚期放慢了。这个放慢是短暂的;1984 年之后人均收入的增长远远快于之前 20 年的增长。

在 1980 年的总统选举中,罗纳德·里根获胜,他承诺取消近半个世纪的“福利国家”,但授权支出仍然持续。1996 年,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项由共和党国会通过的福利法案,在改革进程上迈出了实质的一步。怎么样的实质还有待观察。由于资金问题而陷入困境的社会保障和医疗计划改革,不断超出政治家的掌控范围。持续的经济增长,正如美国在新千年所经历的,确实贯彻经济史的始终,将会有助于改革。

第 27 章

新边疆之前：战后经济

从二战后到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经济的进步令全世界嫉妒。到 1960 年,美国经济已经转变。战后向和平时期生产的转换较快地完成了,并且远远不像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困难。^① 那些惧怕回到萧条经济的人感到惊奇。那些惧怕价格管制一旦解除通货膨胀就会失控的人也感到惊奇。1949 年经济有轻微滑坡,但是整体景象是积极的。到 1950 年,消费者价格只比 1945 年的水平高 1/3 左右,真实 GDP 几乎恢复到了 1945 年的水平——真实人均 GDP 也没有落后很多。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朝鲜半岛被俄罗斯和美国分成了共产主义的朝鲜和非共产主义的韩国。双方实质性的对抗之后,朝鲜的坦克兵在 1950 年 6 月横扫了边界线;夺取了南部的首都汉城;并深入南部,有获取整个半岛之势。美国陆军由总统哈里·杜鲁门负责,他呼吁并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仁川实现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后一次辉煌的两栖登陆,联合国部队将朝鲜逼到中国边境。中国派出部队作战,战争继续。三年时间战事纷仍,最后在接近朝韩原始分界线的位置停止了战争。50 年代美国经济重新经历了一轮扩张浪潮,这个浪潮一直持续,直到 1960 年才出现了小的周期中断。到那时,整个美国的工业产出是 1945 年战时水平的一半。

1. 最终的就业法和经济稳定

美国消费者和美国生产者都欣然于 1945 年的和平,并满怀对经济繁荣的期望而行动起来。“美国人的世纪”是从“短暂的和平”开始的——1945—1950 年的转变和复苏。当朝鲜战争开始时,哈里·杜鲁门处于他白宫第二个任期(但当选的是第一个)的一半。朝鲜战争是有些不同的,一场有限的战争只动员了一部分资源。不像两次世界大战那样,朝鲜战争并没有出现严重的物资和人力短缺。这场糟糕的小规模战争也没有造成决定性的后果。战争动员只占用了一小部分合格的人员。联邦赤字在一个小规模水平上,只造成了轻微的货币供给增加,价格几乎保持不变。税收覆盖了 100% 的支出。^② 失业下降,企业充满活力。国内是大炮和黄油并存。经济增长继续高速前进,完全以一种和平时期的基础,而战争还在持续。

在二战结束时,许多人和经济学家都预期经济会回到大萧条情形。新政的政策(如

^① Robert Higgs, “From Central Planning to the Market: The American Transition, 1945—1947,” *JEH*, September 1999, 作者认为快速回到市场经济恢复了投资制度,这是之后快速膨胀的必要条件。

^② 参见 Lee E. Ohanian,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War Fin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ld War II and the Korean Wa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7, no. 1, March 1997。

失业补偿和社会保障)倾向于提供一张安全网,这张网被证明是不重要的或者仅仅在战争期间被忽视了,但当经济恢复到和平情形时他们就在合适位置了。美国经济在二战期间的表现与历史上其他任何战争期间表现一样好,大部分归因于那些在华盛顿学习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课程的年轻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凯恩斯主义的信条可以为阻止萧条时期的复归提供进一步的保险。

1.1 1946 年的《就业法案》

美国 1946 年的《就业法案》常常被看成一个“新政”的策略。它并不是。有比国会的纯粹智慧更根本的源由。如理查德·加德纳(Richard Gardner)所解释的,1946 年法案的真正由来是在二战期间美国对英国货币流通方面的需求的反应。^③如果美元会变成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法定储备货币,美国就不得不放弃它的自由放任传统,即为了调控收支平衡不控制总量经济活动。

正如所讨论的,美国 GDP 中进口所占比例从 19 世纪晚期开始稳步下降。历史上,美国经济的周期减速中,都有一种附加的趋势,美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变得更加正向(高于正常的盈余),这样就消耗了美元资产代表的世界财富。为了弥补正常项目赤字,美国人从国外借贷,并导致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破产。英国需要联邦行动提供某种类型的担保,如果必要的话,美国经济将会继续保持下去,避免从下滑转向萧条。

如果美元变成国际新秩序中主要的官方“储备货币”,那就必须有适量的稳定供给——美国不得不维持稳定的进口以便其他国家可以获得美元。如果那个警告没有发生,美国将通过限制外国获取美元的能力而“出口萧条”给其他国家,并从而维持它自己美元支持的货币。1946 年的《就业法案》是良好信念的表示,是对那些合理需求的反应。似乎还有疑问的是,这样一种行为在其他环境下已经被国会确定为是符合法律的。联邦承担控制失业的责任是令人头疼的,即使对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这样。一件事是发放联邦救助,另一件事是永远利用政府力量承担干预一定就业水平的义务。正是如此,国会淡化了行动,而令人不理解。如果你去掉所有的如果、和、但是,它就是这样的:

国会因此而宣布这是联邦政府的持续的政策和责任……促进就业、生产和购买力的最大化。

当然美国经济自 1946 年以来的记录足以阐明国会犹豫的原因。假定《就业法案》会得到允诺是一个借口。这个法案将美国置于未知的困境中。在 30 年代以前,受到古典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建议政府“少插手”经济(而且因此,在华盛顿只有少数经济学家)。《就业法案》,一项凯恩斯主义的措施,要求政府“插手”经济,而且授权经济的存在。这个法案要求总统的年度经济报告,一份“经济形势”报告来补充“国情咨文”。该法案设立了经济顾问委员会,帮助起草总统经济报告,并提交给国会的联合经济委员会。

1.2 伴随着价格稳定的增长

在 1945—1950 年间价格水平上升了大约 1/3,这样,名义 GDP 提高了,但真实 GDP

^③ Richard Gardner, *Sterling-Dollar Diplomacy* (1956).

却没有提高(见表 27.1)。然而,军事生产数量的大幅减少意味着真实 GDP 的下降和民用商品生产的增加是同时发生的。1946 年和 1947 年真实 GDP 分别减少 11% 和 0.9%,随之发生的是个人消费支出分别提高 12.2% 和 1.8%,这对消费者是一种幸运。^④ 在这个时代,自从 20 年代以来是第一次,美国人的购买兴致能够得到满足。不像战争年代,消费者现在发现能够拥有许多需要的东西:新汽车、冰箱、非耐用品。对生产者也是这样。

表 27.1 1945—1962 年选定的战后经济指标

年份	当前价格				转换为 2000 年美元				制造业 生产指数 通货 (1992 膨胀率 = 100)	
	GDP 总量	人均 GDP	个人 消费	GPDI	GDP 总量	人均 GDP	个人 消费	GPDI		
1945	223.1	1 672.0	120.0	10.8	1 786.3	13 387.1	902.7	67.0	22.3	2.3
1946	222.3	1 580.1	144.3	31.1	1 589.4	11 297.6	1 012.9	172.1	19.3	8.3
1947	244.2	1 694.9	162.0	35.0	1 574.5	10 927.7	1 031.6	165.3	21.7	14.4
1948	269.2	1 834.7	175.0	48.1	1 643.2	11 198.8	1 054.4	211.2	22.6	8.1
1949	267.3	1 790.3	178.5	36.9	1 634.6	10 948.1	1 083.5	161.2	21.4	-1.2
1950	293.8	1 929.5	192.2	54.1	1 777.3	11 672.0	1 152.8	227.7	24.7	1.3
1951	339.3	2 190.8	208.5	60.2	1 915.0	12 364.6	1 171.2	228.3	26.8	7.9
1952	358.3	2 274.2	219.5	54.0	1 988.3	12 619.9	1 208.2	206.5	27.9	1.9
1953	379.4	2 368.5	233.1	56.4	2 079.5	12 981.9	1 265.7	216.2	30.2	0.8
1954	380.4	2 333.4	240.0	53.8	2 065.4	12 669.1	1 291.4	206.1	28.5	0.7
1955	414.8	2 499.8	258.8	69.0	2 212.8	13 335.7	1 385.5	256.2	32.1	-0.4
1956	437.5	2 590.2	271.7	72.0	2 255.8	13 355.6	1 425.4	252.7	33.5	1.5
1957	461.1	2 681.1	286.9	70.5	2 301.1	13 379.7	1 460.7	241.7	34.0	3.3
1958	467.2	2 671.5	296.2	64.5	2 279.2	13 032.8	1 472.3	221.7	31.8	2.8
1959	506.6	2 848.8	317.6	78.5	2 441.3	13 728.3	1 554.6	266.7	35.6	0.7
1960	526.4	2 913.6	331.7	78.9	2 501.8	13 847.3	1 597.4	266.6	36.4	1.7
1961	544.7	2 965.3	342.1	78.2	2 560.0	13 936.4	1 630.3	264.9	36.7	1.0
1962	585.6	3 139.3	363.3	88.1	2 715.2	14 555.7	1 711.1	298.4	39.7	1.0

注:GPDI 是指国内私人部门投资总量。单位为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c 1, Dd 498; 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NIPA)*, table 1.1.5 and 1.1.6.

这个国家就在较高收入基础上的无节制消费中运转着。如表 27.1 的数据所示,1950 年的消费支出在名义量上高于 1945 年的 60%,在真实量上高出 28%。^⑤ 私人投资,和消费支出一样受同样的力量影响,提高到了前所未闻的水平;在 1950 年实际上等于 GDP 的 18.4%。这样高水平的私人投资是非同寻常的,它产生了健康的、可行水平的经济增长。在 1950 年,私人投资高于联邦政府的支出。与 20 世纪最后 30 年比较,那时私人投资支出平均只有联邦政府支出的 80%。^⑥

④ 美国经济分析局报道 1946 年耐用消费品支出增长了 90.1%,而 1947 年增长了 19%。

⑤ Lizabeth Cohen, *A Consumers' Republic: The Politics of Mass Consumption in Postwar Americ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3),研究了市郊化和卖场的发展等这类问题。

⑥ 对于 2000 年和 2001 年,这两个数字大约是相同的。

表 27.2 表明战后的增长提高了私人部门的所有重要组成部分的水平,但国民收入账户中的政府部门所占比例实际却降低了。房屋建筑导致了增长的速度。非住宅建筑(厂房和办公用房)到 1950 年达到了 1945 年水平的 303%,而住宅投资则达到了 1206%。市郊化开始的时期,远离中心城市的地方建立了商业中心,为市郊提供了扩展的机会。向市郊化开始转变有一段过程,并将持续几十年。制造业产量到 1950 年只有 1945 年的一半,并且到那时,事实上全部都是民用商品。

表 27.2 按产业部门划分的国民收入:1945 和 1950 年

	1945	1950	1950/1945
农业和林业	15.7	18.3	1.166
制造业	52.2	76.4	1.464
批发零售业	28.1	41.4	1.473
承包建筑	4.3	12.4	2.884
服务业	14.1	22.0	1.560
政府	36.9	23.9	0.648
总计	183.7	245.8	1.338

注:单位为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a 35—52.

在 1950—1962 年间,从朝鲜战争到约翰·F.肯尼迪执政的最后一年,美国经济继续保持没有严重通货膨胀的增长。增长的源泉将会在后面章节讨论。回想一下,那些年真正的历史剧就是缺乏经济戏剧。当然,一贯的政治嘈杂声还在继续;根据政治家和媒体的说法,共和国处于不断的危险当中。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末期发生了麦卡锡主义、两次总统的心脏病,和 U-2 侦察机事件。经济环境是如此平静,约翰·肯尼迪·加尔布雷斯教授能够在 1958 年通过提醒昏昏欲睡的国会委员会 1929 年的事件而将股票市场变成了货币恐慌。加尔布雷斯刚刚完成他的著作《1929 年大崩盘》,受邀去作见证。一位哈佛大学教授的对经济史片段的发现是大新闻。没有人比加尔布雷斯自己更震惊的了。^⑦

再看一下表 27.1,注意时间上显著的稳定性。二战后的复苏一直继续,只有一些小的挫折。伴随很小的通货膨胀的 GDP 和工业生产,显著地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可以肯定的是价格趋势只有温和的上升,而几乎没有经济学家预料或者倡导全面的通货紧缩作为一种矫正。1929—1933 年的经验已经治愈了他们绝大多数对看到由价格和工资向下调整造成的“平衡”状态的要求。

然而,年复一年的实际经济情况比表中数据具有更大的戏剧性。例如在 1954 年和 1958 年,共和党政府对突然出现的周期性回调表现了一些小的惊骇。失业率在 1953 年只有 2.9%,而朝鲜战争支出还在以赤字资金流出,到 1954 年失业率几乎增加了一倍,达到 5.6%,此时赤字有所下降。在 1958 年,一场严重的周期衰退显著发生了,按照杰弗里·摩尔(Geoffrey Moore)所说,由累进所得税和失业补偿构成的“自动稳定器”成为经济

^⑦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1981), pp. 309—310.

的组成部分。^⑧ 当收入下降时,交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税收收入也相应下降,令他懊恼的是 55 亿美元的意外赤字,这是自二战结束后最大的赤字。

1.3 财政和货币政策关系

战后的复苏是健康并充满活力的,而且它根本上并没有得到政府支出的支持,除了按照(新的)社会保障法提供的转移支付,以及正常的政府服务的支出。杜鲁门政府的很多“公平交易”社会计划都被国会否决了,而且新政的激进主义在联邦服务中还没有重新确立起来。

1945 年美国几乎立刻将它的军事力量精简到框架比例的水平。当精简完成时战争支出就下降了,但仍然有大规模的复员剩余支出,并且购买食品和给养提供对国外的救助。在 1947 年夏天,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宣布了一项欧洲复兴合作计划,即著名的“马歇尔计划”,美国参与到欧洲的重建中来。

尽管实施了马歇尔计划,联邦支出在 1945—1950 年间仍然下降了 2/5,并保持在低水平(见表 27.3)。联邦税收收入围绕 1945 年的水平波动,到 1950 年超过 1945 年水平的 1/6 多,但更低的支出水平实际上造成了政府盈余,很大程度上是无意之中造成的。因为这些盈余降低了联邦政府的资金需求, M_1 (现金加活期存款)实际上在 1949 年降低了,这是个罕见的事件。

表 27.3 1945—1962 年政府财政、货币和通货膨胀

年份	联邦政府		净值	M_1
	收入	支出		
1945	41.5	70.5	-29.0	99.2
1946	39.5	44.5	-5.0	106.5
1947	42.8	37.6	5.3	108.5
1948	42.4	38.8	3.6	109.0
1949	37.9	43.5	-5.7	107.8
1950	48.8	43.3	5.5	110.8
1951	62.9	53.3	9.6	115.9
1952	65.8	62.1	3.7	121.9
1953	68.6	66.8	1.8	125.0
1954	62.5	64.2	-1.6	127.0
1955	71.1	65.3	5.7	131.0
1956	75.8	68.3	7.6	132.8
1957	79.3	76.0	3.3	133.4
1958	76.0	81.4	-5.4	135.0
1959	87.0	83.6	3.3	140.4
1960	93.9	86.7	7.2	140.3
1961	95.5	92.8	2.6	143.1
1962	103.6	101.1	2.5	146.5

注:单位为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j 42, 49, 84; 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NIPA)*, table 3.2.

在战争期间由政府债券填充的经济,没有遭受到货币短缺。通过在市场中和向联邦

^⑧ Geoffrey Moore, "The 1957—1958 Business Contraction: New Model or Ol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9, no. 2, May 1959, p. 305.

储备系统卖出政府债券,银行系统开始重新向私人借款者发放贷款。利率的提高(回想图 26.1)对债券价格起到了轻微的抑压效应,但那并没有阻碍整个进程。私人借款的潜在利润远超过政府债券的资本损失。因为是美联储和财政部的政策压制利率以停止债务管理的问题(在 1950 年基本的商业票据利率只高出 1%),美联储购买银行持有的债券并且造成了货币供给较小的净增加。^⑨ 生产方的反应是将经济中巨大的流动性的通货膨胀效应最小化,以使价格的上升最小(见表 27.1)。

这样,在“短暂的和平”期间,通过传统的方式,经济从战时动员转变到平时期的生产,其稳定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经济学家满怀信心地预测的战后萧条并没有发生,被认为放开价格管制之后通货膨胀的爆发也没有发生。令人愉快的 1942—1945 年之后,同时代的人还能记得 1918—1921 年,并会疑惑经济如何完成了一个顺利的转变。1948 年,对失业复归的担心激励了总统从事的活动,包括哈里·杜鲁门和第三方总统候选人亨利·A. 华莱士。然而,在 1950 年,随着(1)产量和投资的大幅扩张,(2)从 1948 年开始价格保持稳定,(3)低利率和 5.3% 的失业率,稳定的联邦支出和税收水平,乐观主义者很难因对有前途的未来抱有希望而遭到批评。这种幻想被朝鲜战争的爆发打破了。

从 1950 年到 1962 年,货币供给的增加少于 1/3,大约每年平均增加 2.5%,远低于由真实 GDP 或工业产值衡量的真实产量的增加(见表 27.1)。联邦储备系统和美国财政部之间达成所谓的“协定”,作为 1951 年协定的结果,它不能自动支持联邦债券市场,现在它管理货币市场,对这个市场中的经济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在克里斯蒂娜·罗默和戴维·罗默看来,“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联储与 90 年代的美联储非常相似”,尤其是它“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这种关注是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分享的。^⑩ “供给方”的反应是将真实收入提高 50% 以上;工业产量提高了 58%,而人均(人口增加了 23%)真实收入在 1962 年达到了 13820 美元,与 1950 年的 11118 美元相比(按照 1996 年价格计算),提高了不到 25%。

1.4 学会在赤字中生存

与早些时候相比,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早期,美国卷入到一个新的财政状况中,似乎是暂时的非正常状况,但现在看来可以被看做更永久的情况。即使保守地管理,政府支出大多数年份还是超过了收入。正如约翰·沃里斯认为,在战后年份中的公共财政“是有重要意义的,如果我们把二战看成所谓冷战的漫长的冲击时期的开始,这个过程持续了 40 年”。^⑪ 冷战意味着军事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在和平时期保持了比战前高得多的比例。对那些新政中的计划,例如社会保障,它是美国福利制度的开始,是增加的支出。

^⑨ 参见 Mark Toma, “Interest Rate Controls: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40s,” *JEH*, September 1992.

^⑩ Christina Romer and David Romer, “A Rehabilit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in the 1950’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2, no. 2, May 2002, p. 121.

^⑪ John Wallis, “American Government Finance in the Long Run: 1790 to 1990,”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4, no. 1, Winter 2000, p. 77.

沃里斯提到作为集中化收入和非集中化支出的“国家制度”表现出来的支出,是用于教育、卫生、交通和福利方面的扩张性的政府支出。20世纪20年代的坚定的预算盈余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了。

看一下表27.3中艾森豪威尔的时代。“财政政策”问题,正如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是补偿性政策——盈余在扩大,赤字在缩小。^②在1953年,共和党人面对的是衰退问题,正像首次入主白宫的那代人一样。到1953年8月,衰退的恶兆出现了。共和党人在大萧条中被责难,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被刺痛,他们的焦虑不安是可以理解的。现在轮到他们来责怪民主党的无休无止的赤字支出了。对共和党人来说不幸的是,面对衰退,艾森豪威尔的大运动、预算平衡命令都毫无疑问是有效的。

1954年税收收入下降了,尽管支出也下降了。收入下降的原因之一是1954年1月收入税的预先削减计划,这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不能停止的。而且,战争货物税也削减了。然而,因为用一项税收削减来抵消衰退被开明的政府看做补偿性政策,经济学家赞同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想要的结果。从1955年到1957年,随着经济的扩张,收入和支出都增加了。但是总的保守主义——不能有新的开始——阻止了支出的增长,并导致了三个小的盈余。共和党人是胜利者。他们渡过了衰退,并没有回到1932年,而且他们实现了预算盈余。

1958年的衰退再次产生了赤字。艾森豪威尔在经济周期的任何时段都厌恶赤字,但经济学家们赞同并希望削减税收。支出上升了。在1959年和1960年,税收的增长和支出上的略微提高产生了盈余。然而,到1960年,经济减速,失业率上升了。结果盈余减少了。

这样,如果我们除了表27.3中的数字之外对艾森豪威尔政府一无所知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认为他们是受过良好训练的、“现代的”财政理论家。事实上在阐释动机的结果中什么也没有,或者说几乎什么也没有。艾森豪威尔的团队是财政保守主义者;他们想要的是预算平衡,没有通货膨胀。他们只得到足够少的通货膨胀。然而与即将到来的政府相比,艾森豪威尔的团队更像“财政诚实”的摇摆者。

现在看来,艾森豪威尔政府当时对通货膨胀的惧怕似乎很奇怪。对那些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的特殊的通货膨胀的人来说,整个1945—1962年的时期根本不算什么。但是为了理解历史上政策制定者的动机,我们必须试着从他们的眼中看世界;否则,所有一切都无法理解。必须要参照那个时代之前的通货膨胀率和政府赤字,而不是之后的此类数字来看待艾森豪威尔关于通货膨胀或国家债务不断增加的弊端的演讲。5%的利率对50年代的政策制定者来说似乎是决定性地高了。

当1953年共和党执政时,他们已经是长时间在国会缺席了。民主党人一直成功地将他们和对大萧条的指责联系在一起,而他们则通过指责民主党人对战争和通胀的责任而给予了报复。共和党人承诺和平和价格稳定,以及经济增长,但他们也害怕再来一次萧条。民主党人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他们成就了赫伯特·胡佛,尽管他在国家沉入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时做得并不好。为了与之斗争,共和党人在1954年和1958年后退

^② Herbert Stein, *The Fiscal Revolution in America* (1969), chaps. 9—14, 关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时期。

到反对通货膨胀的立场上,这时问题变成了萧条的威胁。此外,支出比税收收入更难减少。在萧条时期没有赤字是很困难的。毕竟,在 1930—1933 财政年度,胡佛是完全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主要采用了赤字政府的方式,但胡佛在白宫的任期结束之后,一些经济学家曾提出争议:也许无论何时,只要真实 GDP 低于自然就业率水平就应该有赤字。^⑬

1.5 增长的失业率

尽管劳动力的参与率在战争之后比战前保持了更高的水平(见表 26.3),失业率也仅仅恢复到了正常的和平时期的水平。1950 年的失业率是 5.2%,高于 1945 年“过度就业”时 1.9% 的失业率。而 5.2% 不是 30 年代那样,它显然是高于最近可比年份的 20 年代水平的约 1/4。为什么? 5% 的失业率几乎是经济学家概念中那个时期“充分就业”水平的失业率的 2 倍,邻国的某些地方还是 2.5%。5% 的水平引起了对“结构性”失业的讨论:需要联邦行动处理的新事物,例如将长期失业的人送回到就业岗位上的新计划。事实上,2.5% 的水平,所谓 1929 年之后的水平,在 1953 年之后,只在极不寻常的年份(缺少战争行动的时候绝对没有发生)很少再次出现。

现在经济学家提出“自然”失业率至少在 5%。^⑭ 变化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完全的机械化。在 50 年代个人遭受失业,比在没有失业补偿时的之前那些年代,灾难性程度要低,因此自然失业率变得更高并不奇怪。而且,城市人口和失业补偿实用性的稳步增长,使得失业比之前更加明显。“自然”失业率水平的翻倍很可能是统计上的幻象。^⑮

1.6 小结

1945—1962 年这个时期,除了朝鲜战争,对类似正常的经济过程来说是 1929 年以来的第一次机会,在美国经济增长中是确定性的。国际经济再次向前发展,在诸如马歇尔计划等计划的帮助下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增长。美国没有必须面对其出口市场的停滞,而且,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国际平衡,但现在说商品出口就足够了,1946 年(第一个和平年份)是 118 亿美元,1962 年是 217 亿美元,这个增长相当于国内 GDP 的扩张。

在国内,国内私人投资在长时期的不景气之后有力地提高了,从 1945 年的 108 亿美元增加到了 1959 年的 785 亿美元,到 1962 年达到了 881 亿美元。从二战结束到新边疆,没有更强劲的增长源泉了。数百万的新房屋和厂房——以及支撑性的基础设施,如高速路、公路、水利和下水处理设施、购物中心、学校和公共建筑——使美国国内的面貌大为改观。所有这些都是用最温和的一般价格上涨实现的,而且真实人均收入则快速上涨了。这并不是说没有社会或经济问题,但它们似乎是有可控的,在所有方面的经济活动

^⑬ 参见 Herbert Stein, *The Fiscal Revolution in America* (1969), pp. 443—444, 是关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这个观点的发展。另一方面,罗伯特·戈登发现,战后时期的政府在 1947—1957 年具有最不稳定的影响。Robert Gordon, “Postwar Macroeconomics: The Evolution of Events and Ideas,” in Martin Feldstein, e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1980), pp. 121—123。

^⑭ 仍然是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联系在一起的令人担忧的现象。Richard Freeman,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Labor Market, 1948—1980,” in Feldstein (1980), pp. 385—390, and figure 24. c, p. 153。

^⑮ 也就是说,当 20 世纪 30 年代那些在农村经济中失业的人找不到工作时,就业幻觉就在那些缺少就业的地方出现了。

都很活跃的情况下。可以肯定的是在 50 年代结束时有自我满足的乐观存在的根据。当然它是一种沉重缓慢的繁荣。这个国家会利用最狭隘的胜利余地作出反应，约翰·肯尼迪所谓的“让这个国家再次向前移动”——因为简单的原因，第一次存在于大多数成年人的记忆中，在半和平时期的条件下它已经向前运行了。

2. 战后国际重组

1950 年，国际金融秩序仍处于从 30 年代早期的崩溃中恢复的阶段。这一恢复应归于国际政治的一个特殊插曲。二战给予英国和美国一个机会，尝试重建战争年代造成的巨大浪费和破坏之后的国际金融秩序。

2.1 固定汇率

传统上认为 1914 年之前的金本位制，通过在贸易国家间固定黄金的铸币价格，并因此固定货币之间的汇率，对旧的金融体系的稳定作出了贡献。无论贸易的正常风险和威胁是什么，它们都不会被波动的汇率搞得更加复杂。一般认为国际资本的移动，特别因不存在汇率风险而更加方便。在战争时期，金汇兑本位制维持了固定的黄金价格，但改变了中央银行适用法，允许黄金支持的外国交易资产作为储备，与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相抵。1929—1933 年间这个体制的崩溃已经造成了一个混乱的、货币贬值的、贸易无序的时期，在美国、英国和法国达成的 1936 年的三方协定仅部分实现了稳定。

二战打破了这种混乱局面，并以美国拥有全世界 2/3 的货币黄金储备而结束。问题是设计一个固定汇率的新的国际货币协定，在黄金持有极不平衡的既定条件下——考虑到时代，最根本的是储备。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至少首先是，使用黄金为基础的美元资产作为储备货币，对抗战后中央银行的负债——纸币的扩张。

2.2 布雷顿森林体系

甚至在美国参加二战之前，由英国和美国推动的世界秩序重建就开始了。在 1941 年 8 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在纽芬兰的普拉森舍湾的轮船甲板上会晤，并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这是一个范围广泛的原则和目标的声明，包括对扩张主义者基础上的贸易和支付的国际制度的修补章节——世界原材料的使用权，更自由的（多边的而不是完全自由的）贸易，消除贸易壁垒。1942 年的《互助协定》（租借法）重申了这些原则。所有“同类型”国家都要求参与这类政策：

……适当的国际和国内措施的延伸，关于生产、就业、商品的交换和消费……消除所有形式的国际贸易的歧视条款，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

1944 年 7 月，当联合国正在筹划中，金融专家，包括英国的凯恩斯（他是蓝图的最初设计者）和美国的哈里·迪克西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会晤。这些事件的细节在理查德·加德纳的《英镑—美元外交》和罗伊·哈罗德

爵士《凯恩斯的一生》中均有描述。^⑥ 问题是找到解决政策三个目标的方法:

- (1) 设定固定汇率,方便短缺资本流动
- (2) 提供一种方法,释放和扩大 1931—1945 年的时代被限制的长期资本的流动
- (3) 设定降低关税和消除直接贸易壁垒的框架

解决的方法是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它建立了如下框架: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它为国际汇率设定了新的目录,并管理目录,根据黄金保证金,或者 IMF 成员国的捐助金,发放短期贷款。捐助金的支付是按比例分配的,美国是最大的捐助者。因为信贷额度以捐助金为基础,IMF 常常被称为“富人俱乐部”。

(2) 国际重建和发展银行(世界银行),提供长期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资本移动援助,由非政府资源提供长期借贷担保。世界银行投资是不足的,不得不设计实现其目的的方法,其本身并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资源。^⑦

(3) 国际贸易组织(ITO),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机构,利用权力规范世界关税。为了这么做,每一个国家都不得不与联合国谈判达成协议,服从联合国的权力。

战后,美国和盟国使布雷顿森林体系生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下,新的国际货币协定生效了。在 40 年代晚期,在就业和经济扩张方面没有困难,但政府的政策,除了缺乏政策之外,几乎对此没什么可做。急需美元的世界不得不直接从美国国库输入美元以维持自身的运转。马歇尔计划是这个过程的开始。几十年之后,这个协定变坏了。当预算拨款继续投向越南战争时,美国也不能保持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了。取而代之的是它开始“出口通货膨胀”——与英国最初的担心相反。

当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 ITO 的章程时,ITO 结束了。但是,1947 年美国加入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1995 年,GATT 的功能转到一个新的机构世界贸易组织(WTO)中。从开始,GATT(然后是 WTO)就是 ITO 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替代品。

2.3 马歇尔计划和欧洲共同市场的起源

到 1947 年,很显然战争摧残后的欧洲(和日本)面临着超越普通经济进程的复苏问题。马歇尔计划提供了直接的资源转让,这是欧洲人自己——包括战败的德国和意大利——创造的一个同等化计划的回报——为了有效地利用资源。附带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还提议在协定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但苏联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谢绝了。

欧洲人创建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CEEC)(先是 CEEC,然后当委员会转变为组织之后是 OEEC;现在是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包括美国在内),它是一个极好的连贯故事。仅仅靠着 120 亿美元的直接援助,西欧就迅速实现了复兴。到 1951 年,所有的 OEEC 国家的工业产量都超过了战争期间的最高值。^⑧ 紧接着,被证明是在一代人之内极好的经济增长,将会使西欧国家最有效率,至少相当于美国人均 GDP,这个时代开始了。马歇尔计划留下了一个显著的成就,即通过明智的国际经济合作所取得的成就。它还直接启发

^⑥ Gardner (1956); Roy Harrod, *Life of Keynes* (London: Macmillan, 1951).

^⑦ Louis Galambos and David Milobsky, "Organizing and Reorganizing the World Bank, 1946—1972: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HR*, Summer 1995,这是一项对这个机构演变情况的有趣研究。

^⑧ Jonathan Hughes,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70), pp. 268—270.

了紧跟着出现的外国援助的惯例,在签订的每一年中由美国和它的联合国伙伴所提供。

部分马歇尔计划包括欧洲人之间的协定,相互提供央行信贷以方便自动供给国内货币的支付,以便于在每个参与国家的出口企业和个人能够立刻获得支付。这些额度高低变化的贷款更像是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内部美国国际清算基金组织的合作,它使美国经济内部的转移问题更容易。1950年,这些规定随欧洲清算同盟(EPU)的建立而正式化。美国使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一战赔偿支付的剩余机构之一)可利用黄金,资助EPU的信贷转移。随着这些新规定的实行,EPU成员之间的贸易繁荣起来。

与此同时,欧洲人希望抓住机会,而欧洲内部国家间的障碍暂时减少了,产生了他们自己形式的欧洲一体化。领导人像法国的罗伯特·舒曼(一个阿尔萨斯人,在一战中是德国士兵,而在二战中属于法国军队)和比利时人保罗·亨瑞·斯帕克都深深体会到了欧洲国家主义的可怕的成本。但是他们也不忘其他的欧洲传统,各种各样的关税联盟,1834年德国内部的关税同盟,巨大的低地国家关税同盟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经济联盟(BENELUX),以及包括在旧的欧洲钢铁卡特尔之中大量的国家间合作。1953年,他们开始了欧洲煤炭—钢铁共同体(ECSC),直接重组这些超国家基础之上的基础工业,并建立必要的政治和社会机构调整那些因而给效率低的国家企业带来的破坏。

为了使欧洲各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进程发展得更迅速一些,在1958年,ECSC的伙伴国签署了罗马协定,欧洲经济共同体(EEC)——著名的欧洲共同市场——开始出现。到70年代早期,像英国这样不属于EEC的国家也成为其成员,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得以巩固。

所有这些结盟都是美国在二战中和二战后开明的经济政策的结果,并且最后,它们将使所有参与的国家受益。在世界经济中,在欧洲和日本,美国制造了它自己的“竞争者”,但与过去相比是多么大的提高啊!现在它有在某种意义上以前根本不可能有的贸易伙伴,通过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使用这些国家的产品,美国人的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美国企业,若没有竞争,就会消失。

3. 一般因素

从二战结束到约翰·F.肯尼迪在白宫的最后一整年,GDP增长超过了一倍,真实GDP比1945年的水平提高了 $2/5$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8年之后,肯尼迪于1960年当选,联邦政府开始实施更积极的社会再分配政策。结合税收和支出计划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目的是鼓励稳定的经济增长——新边疆,这样一个“微调”的时代因约翰·F.肯尼迪1963年遇刺而中断了。他的继任者莱登·约翰逊开始时决心继续推进新边疆。他和他的顾问转而认为美国军队要全体支持越南南部政府,美国经济再次转入战争中,这次不幸的结果仍然是重复以往。当艾森豪威尔将军离开总统职位时,他仍然在担心通货膨胀和国家债务,但那些是严格的惯例的担心。事实上,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大大减少了,从表27.4中可以看出。^⑨艾森豪威尔还担心军事—工业联合企业(military-industri-

^⑨ 到1990年,债务和GDP都接近1960年的十倍,但债务与GDP的比率从1981年的32.5%较低水平重新上升到1960年的水平。

al complex), 武器生产商影响政策和支出的倾向, 将这个国家关键地区的整体繁荣过多地与持续的冷战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从未结束——尽管在 20 世纪结束时战斗员已经改变了, 特别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后。在 60 年代似乎是无法相信的, 任何人回首 50 年代都带着怀旧的情绪, 认为那是“美好的时代”。

表 27.4 1945 年和 1960 年总的联邦债务占 GNP 的百分比

年份	GDP (美元)	总的联邦债务 (美元)	百分比 (GFD/GDP)
1945	223.0	260.1	116.6
1960	527.4	290.5	55.1

注: 单位是 10 亿美元。

资料来源: Budget of the U. S. Government, *Historical Tables, Fiscal Year 2007*, tables 1.2 and 7.

推荐阅读

文章

Bonomo, Vittorio.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s and Economic Activity: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 1870—1968.”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8, no. 3, Spring 1971.

Cain, Louis, and George Neumann. “Planning for Peace: The Surplus Property Act of 194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1, March 1981.

Darby, Michael R. “Postwar U. S. Consumption, Consumer Expenditures, and Saving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5, no. 2, May 1975.

Freeman, Richard B.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Labor Market, 1948—1980.” In Martin Feldstein, e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Galambos, Louis, and David Milobsky. “Organizing and Reorganizing the World Bank, 1946—1972: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69, no. 2, Summer 1995.

Gordon, Robert J. “Postwar Macroeconomics: The Evolution of Events and Ideas.” In Martin Feldstein, e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Higgs, Robert. “From Central Planning to the Market: The American Transition, 1945—1947.”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9, no. 3, September 1999.

Jacobs, R. L., and R. A. Jones. “Price Expect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7—197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0, no. 3, June 1980.

Toma, Mark. “Interest Rate Controls: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40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2, no. 3, September 1992.

书籍

Brownlee, W. Eliot. *Federal Taxation in America; A Short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ed. *Funding the Modern American State, 1941—1995: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ra of Easy Fin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Feldstein, Martin, e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Freeman, Ralph E., ed. *Postwar Economic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 1960.

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8.

——. *A Life in Our Tim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1.

Gardner, Richard. *Sterling-Dollar Diplom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Hickman, Bert G. *Growth and Stability of the Postwar Economy*.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60.

Stein, Herbert. *The Fiscal Revolution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Vatter, Harold G. *The U. S. Economy in the 1950s*. New York: W. W. Norton, 1963.

第 28 章

人口、劳动力和第三产业部门

美国经济史,和其他发达经济的历史一样,展示了经济发展——工业化——其强大的生产力能够带动整个社会的繁荣。伟大的 18 和 19 世纪的经济思想家留下了两个主要的遗产,一个主要是反生产的。这两个伟大的遗产是(1) 市场行为理论和(2) 资本长期收益递减的信念。第一个遗产,来自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并经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发展,牢固地建立在经济学逻辑继承发展之上。第二个遗产预期广大产业中的无产阶级将扩大,很大部分是失业者和只得到生存收入的人,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人口和劳动力大军在扩大。卡尔·马克思是通常与第二个遗产联系在一起的作家,但植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其他“古典思想”。^① 产业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非常不同的。

1. 人口

19 世纪的经济学家并不能清楚地预见人口数量与构成以及劳动力的变化是 20 世纪的标志。在那个世纪之交,大量的城市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地区;60% 的人口生活在东北和中西部。在 21 世纪的最初几年,超过 75% 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接近 60% 的人口生活在南部和西部。人口调查局的报告显示,2000 年的总人口是 28 140 万,是一个世纪之前的 3.7 倍多。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提高了 63%,从 1900 年的 47.3 岁提高到 2000 年的 77 岁。^② 中值年龄提高了近 50%,从 1900 年的 22.9 岁提高到 2000 年的 35.3 岁(见表 28.1)。1900 年,美国本土出生的男性,一般身高是 5 英尺 7.5 英寸,到 2000 年,身高是 5 英尺 10 英寸。^③ 要理解 20 世纪人口显著的增长,我们必须研究出生、死亡和移民。

① William Baumol, *Economic Dynamics*(1951), chaps. 3 and 4.

②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b 644;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3, table 107.

③ 1900 年的数据来自于 Dora L. Costa and Richard H. Steckel, "Long-Term Trends in Health, Welfa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Richard H. Steckel and Roderick Floud, eds., *Health and Welfare During Industrial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2000 年的数据是 Richard Steckel 提供的,基于国家卫生统计中心作出的国民健康与营养检测调查。

表 28.1 1900—2000 年的人口

年份	总人口 (百万)	国外出生 的人口百分比	年龄 中位数
1900	76.0	13.6	22.9
1910	92.0	14.7	24.1
1920	105.7	13.2	25.3
1930	122.8	11.6	26.5
1940	131.7	8.8	29.0
1950	151.3	6.9	30.2
1960	179.3	5.4	29.5
1970	203.3	4.8	28.1
1980	226.5	6.2	30.0
1990	248.7	7.9	32.8
2000	281.4	10.4	35.3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a 22, 33, 34.

1.1 出生、出生率和“婴儿潮”

在第6章和第16章我们讨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周期的四个长波。依赖于移民周期,他们持续16至18年。二战后,库兹涅茨周期背后的推动力量是多样化的,不只是移民。因而,长波持续大约40年,如图28.1所示,描述了20世纪的总出生情况。向上的趋势是很显然的,如二战结束后不久开始的非同寻常的增长——婴儿潮。图28.2显示了同一时期的出生率。再一次,趋势是显然的,但现在是向下——婴儿潮时期除外。今天更大数量的出生人口是年轻成年人数量增加而出生率下降的结果,这些年轻人的父母是婴儿潮的先驱。^④

理查德·埃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对婴儿潮——和半身塑像——模式的解释建立在他“相对收入”概念的基础上。^⑤ 要一个小孩的决定取决于一个家庭相对于获取收入能力的实际渴望。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说,在大萧条中长大并在二战中奋战的一代,当战后重返家园并组建家庭后,对孩子的渴望相对较低。许多人担心将回到大萧条。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所见,战后经济的潜在收入比人们预期的要高很多。此外,我们在本章稍后将会讨论,这是个仍然歧视想要工作的年轻已婚妇女的年代。战后出生的这代人不能承担萧条和战争的包袱。他们在加尔布雷斯所称的“丰裕社会”中长大。他们的物质渴望比他们的前辈要高得多,但他们的潜在收入却鲜有差别。事实上,随着婴儿潮中第一代男性进入劳动大军,劳动力供给曲线比预期中大大地右移了。妇女运动以及最终公共政策,有助于形成一个不仅吸纳男性劳动力,而且也可以吸纳他们的

^④ 美国黑人的生育率高于美国白人,但两个趋势逐渐趋近,差异随时间在缩小。

^⑤ Richard Easterlin, *Population, Labor Force, and Long Swings in Economic Growth* (1968), 还可参见他的另一本著作: *Birth and Fortune* (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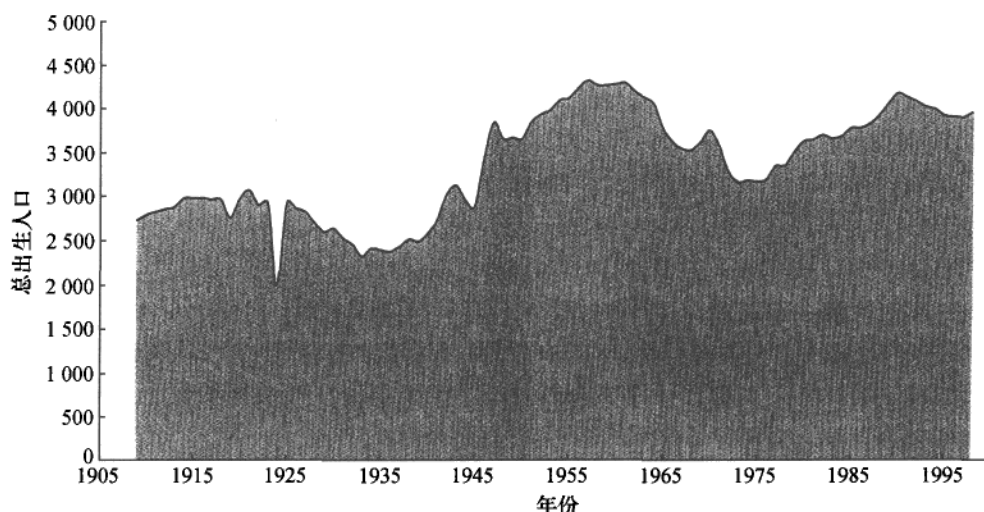


图 28.1 1909—1998 年的出生人口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b 11; U. S.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Vit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0, table 1-1;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6, table 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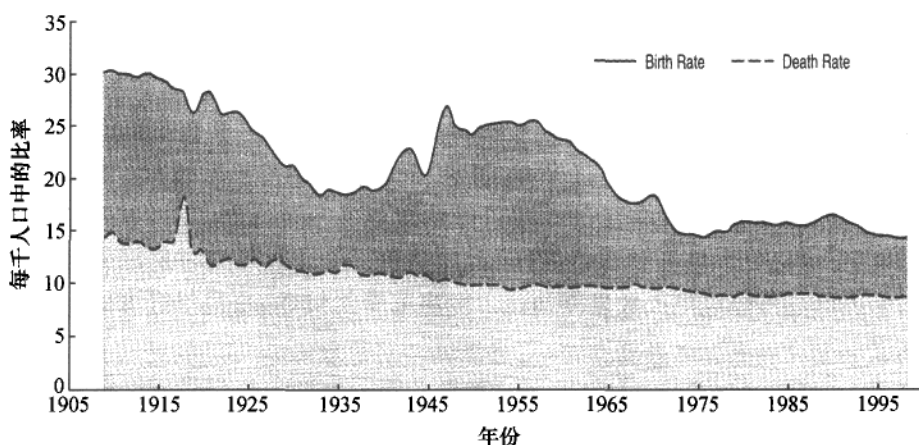


图 28.2 1909—1998 年的出生率与死亡率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b 40, 952; U. S.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Vit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0, table 1-3; U. S.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1900—1998*;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6, table 72.

姐妹和母亲的市场。

像所有的简略图一样,这张图也删除了大量的细节,有些是相互矛盾的。在埃斯特林的解释中最重要的是,在 20 世纪的后半部分随着孩子的相对价格上升,一般家庭需要的孩子越来越少。出生率是一个经济变量,但死亡率则不是。

1.2 死亡率

图 28.2 也显示了各种原因引起的死亡率。总的趋势是向下的,但没有像出生率数据那样的循环和波浪。一个造成死亡率明显偏离平均趋势的事件是 1918 年的流感流行。向下趋势的解释在于大量的技术和科学发现,极大地推进了现代医学发展。^⑥ 各个年龄的人们都从技术进步中获益,有用的早期发现和从科学发现中改进的治疗方法有助于治愈多种疾病。产前护理和新生儿护理对婴儿死亡率具有巨大的影响。在 20 世纪 50 年代,婴儿死亡率超过总人口死亡率的三倍多。在 1970 年仍然是两倍,但到 1993 年,婴儿死亡率已经降到了总人口死亡率以下,并继续下降至前所未有的程度。为美国老年人提供的健康护理也提高了,与之结合的结果是,前面所提到的预期寿命提高了 63%。

1.3 移民

在 20 世纪之初,移民是很活跃的,13.6% 的人口是在国外出生。尽管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年代这个比例都在下降,特别是由于一战后限制的结果,但在世纪中间又开始提高了。^⑦ 然而,它并没有回到 19 世纪时的水平(见表 28.1 和表 28.2)。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移民构成了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对人口增长率仍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 50 年代,合法的移民几乎构成了人口增长的 1/10,但今天的这个数字则是 1/3。^⑧

1965 年的移民法将政策从地理配额转向了一套标准,强调劳动力的市场技能,家庭的再统一,政治避难,以及其他的人道主义援助。乔治·博雅思(George Borjas)认为,平均起来,移民人口的技术水平有所下降,因为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比例提高了。^⑨ 还有一个事实是,在 20 世纪的头十年合法移民中只有 1% 有专门职业,现在这个数字接近 25%。^⑩ 在 20 世纪的头十年 70% 的移民公布他们的职业是家庭服务员或劳动者,今天这个数字是 20%。^⑪ 新移民的来源国也有所改变。在 30 和 40 年代,欧洲移民占 60% 以上,其余主要来自于其他北美国家,主要是加拿大。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只有 12% 来自于欧洲,而亚洲占到了 35%,美洲占到了 49%。墨西哥一个国家就占了移民的 24%。

⑥ 例如,Dora Costa, "Understanding Mid-Life and Older Age Mortality Declines: Evidence from Union Army Veteran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 112, no. 1, January 2003, 作者发现在 20 世纪中,童年至青年时期感染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 50—64 岁成年男性存活率的 21% 增长中占了 1/4 以上。

⑦ Ferrie 说明了下降的一个潜在原因,Joseph P. Ferrie, "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50,"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9, no. 3, Summer 2005, 在文章中他确定,在 20 世纪的上半叶美国代际职业流动和地理流动都下降了。

⑧ Timothy J. Hatton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Causes and Economic Impac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6.

⑨ George Borjas, "National Origin and the Skills of Immigrants in the Postwar Period," in *Immigration and the Work Force: Economic Consequenc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rce Are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关于目前移民政策的有趣讨论可参见博雅思的另一本著作: *Heaven's Door* (1999)。

⑩ 被雇用的本地人的相应数据大约是 16%。参见 Julian L. Sim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Immigration*, second edi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⑪ 非法移民更有可能是非熟练工人。据估计非法移民的数量大概是合法移民数量的 30%。

表 28.2 1931—2000 年的移民

年份	移民数	比率	欧洲	亚洲	北美洲	墨西哥	南美洲	非洲
1931—1940	528	0.4	0.658	0.031	0.301	0.042	0.015	0.003
1941—1950	1 035	0.7	0.600	0.036	0.353	0.059	0.021	0.007
1951—1960	2 515	1.5	0.527	0.061	0.344	0.119	0.036	0.006
1961—1970	3 322	1.7	0.338	0.129	0.552	0.137	0.078	0.009
1971—1980	4 493	2.1	0.178	0.353	0.494	0.143	0.066	0.018
1981—1990	7 338	3.1	0.104	0.373	0.450	0.226	0.063	0.024
1991—2000	9 095	3.4	0.149	0.307	0.412	0.247	0.059	0.039

注：移民数以千人计。比率为每千人移民比率。地区栏是来自每一地区的移民构成情况。北美洲数据包括墨西哥。

资料来源：U. S.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Yearbook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2004, table 2;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6, table 5.

大多数研究移民问题的经济史学家发现，尽管移民最开始比土著美国人收入少，但这个差距随着移民在美国生活时间变长而缩小。^⑫ 在 1890 年之前的时期，蒂莫西·海顿 (Timothy Hatton) 发现，来到美国的成年移民的工资，比本土美国人工资增长快 0.7%。^⑬ 博雅思发现，那些 1965 年以后到来的移民，最开始比之前到来的移民赚得少——最初的差距在扩大。减少的原因之一是美国高中学校运动，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美国用于教育的投资增加了，下面简要讨论这个问题。最近的一项研究试图解释墨西哥移民相对于美国本土人经济能力下降了，很大一部分差异可以由墨西哥人平均接受的学校教育少于美国人这一事实来解释。^⑭

此外，本土出生的人口也在国内移动。表 28.3 给出了整个 20 世纪生活在四大人口普查地区的美国人口比例数据。直到大萧条东北部一直保持同样的人口份额，但现在的份额只剩下一个世纪以前的 2/3 了。整个世纪中中西部的份额一直在下降，而南部和西部的份额在上升。美国黑人移出南部是显著的；“大迁移”稍后将会被讨论。人口的城市化，特别是南部，也是显著的。这些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劳动力市场改变的结果。

^⑫ 参见 George Borjas, "Assimilation, Changes in Cohort Quality and the Earnings of Immigrant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October 1985; George Borjas, "Assimilation and Cohort Quality Revisited: What Happened to Immigrant Earnings in the 1980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vol. 13, no. 2, April 1995; Barry Chiswick, "The Effects of Americanization on the Earnings of Foreign-Born Men," *JPE*, October 1987. Chiswick 通过观察 20 世纪 70 年代跨部门工人的情况发现，在美国居住 10—15 年之后，移民的工资最终会超过那些本土出生的工人。这一结果遭到了激烈的争论。例如，参见 George Borjas, "The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 *JEL*, December 1994.

^⑬ Timothy J. Hatton, "The Immigration Assimilation Puzzle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7, no. 1, March 1997.

^⑭ 参见 Zadia M. Feliciano, "The Skill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Mexican Immigrants from 1910 to 199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8, no. 3, July 2001.

表 28.3 各地人口,1900—2000 年

地区/年份	总人口	白人	黑人	城市人口
东北部				
1900	27.6	98.1	1.8	66.1
1910	28.0	98.0	1.9	71.8
1920	28.0	97.6	2.3	75.5
1930	27.9	96.6	3.3	77.6
1940	27.2	96.1	3.8	76.6
1950	26.1	94.7	5.1	79.5
1960	24.9	92.9	6.8	80.2
1970	24.1	90.4	8.9	80.6
1980	21.7	86.1	9.9	79.2
1990	20.4	82.8	11.0	78.9
2000	19.0	na	na	na
中西部				
1900	34.6	97.9	1.9	38.6
1910	32.4	98.0	1.8	45.1
1920	32.1	97.5	2.3	52.3
1930	31.3	96.5	3.3	57.9
1940	30.4	96.3	3.5	58.4
1950	29.4	94.7	5.0	64.1
1960	28.8	93.0	6.7	68.7
1970	27.8	91.3	8.1	71.6
1980	26.0	88.7	9.1	70.5
1990	24.0	87.2	9.6	71.7
2000	22.9	na	na	na
南部				
1900	32.2	67.4	32.3	18.0
1910	31.9	69.9	29.8	22.5
1920	31.2	72.9	26.9	28.1
1930	30.7	74.9	24.7	34.1
1940	31.5	76.0	23.8	36.7
1950	31.2	78.1	21.7	48.6
1960	30.7	79.1	20.6	58.5
1970	30.9	80.3	19.1	64.8
1980	33.3	78.2	18.6	66.9
1990	34.4	76.8	18.5	68.6
2000	35.6	na	na	na
西部				
1900	5.7	91.2	0.7	39.8
1910	7.7	93.5	0.7	47.9
1920	8.7	93.9	0.8	51.8
1930	10.0	93.6	1.0	58.4
1940	10.9	93.8	1.2	58.5
1950	13.3	93.0	2.8	69.5
1960	15.6	92.1	3.9	77.7
1970	17.1	90.2	4.9	83.1
1980	19.1	80.8	5.2	83.9
1990	21.2	75.8	5.4	86.3
2000	22.5	na	na	na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Calculated from series Aa 2244—6550;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6, table 17.

2. 劳动力

现在更多的美国人参与到劳动大军中来,在绝对数量和百分比上,都比历史上要高(约为人口的 2/3),但今天的失业率也和一个世纪以前一样在同样范围浮动(见表 28.4)。劳动参与的提高在部分程度上是健康和营养改善的结果。它是怎样提供的? 19 世纪的经济学家所不能预见的,它是技术变迁和第三产业部门(tertiary sector)相应提升的结果。第三产业或者服务业部门包括教师、文职人员、旅店员工和那些休闲产业的从业人员、护士和其他保健员、演员、艺术家、运动员、记者。直接相关的是通过专门服务提高现代生活质量——通信、生产分配、教育以及作为发达经济行为特点的生活质量提高行动——间接相关的是食品和商品的生产。它由第一产业部门(primary sector,农业、矿业、渔业、林业)和第二产业部门(secondary sector,制造业、原材料处理)予以支持并由后者生产力的巨大提高而得到滋养。

表 28.4 1900—2004 年劳动人口特征

年份	总人口	劳动人口 所占百分比	失业人口 百分比	劳动生产率 (1992 = 100)
1900	76.0	57.7	5.0	10.7
1910	91.0	60.2	5.9	12.4
1920	105.7	57.8	5.2	15.0
1930	122.8	54.7	8.9	18.7
1940	131.7	55.6	9.5	23.8
1950	150.7	56.0	5.1	33.7
1960	179.3	57.6	5.5	41.4
1970	203.2	56.7	4.2	54.2
1980	226.5	60.9	6.8	70.1
1990	248.7	64.2	5.5	92.9
2000	281.4	67.1	4.0	138.5
2004	293.7	66.0	5.5	na

注:生产率指数反映非农产业每小时的产出。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a 2, Ba 343, 475, Cg 265, 273, 281;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6, tables 1 and 576;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series PRS85006093.

前面章节讨论过,发达国家间产业发展的典型模式具有这样的特征:生产率提高,导致在第一产业部门中就业人数减少,第二产业部门劳动力就业比例逐渐减少。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工作岗位可以由第三产业部门的巨大扩张来替代。对现代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的第三产业部门,来源于各种类型的教育的发展。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将 20 世纪称为“人力资本的世纪”。^⑤ 在 1940 年,白种人(包括男性和女性)已经平均完

^⑤ Claudia Goldin, “The Human-Capital Century and American Leadership: Virtues of the Past,” *JEH*, June 2001.

成了8年有余的学校教育;到1970年,已经提高到了12年。获得更多教育的趋势还在继续。2003年,几乎一半左右的白人高中毕业生是18至21岁,多于黑人毕业生1/3,西班牙毕业生中1/4以上进入高等教育。^⑩

戈尔丁对其所说的美国教育中的“大变革”进行了阐释:1910—1940年间,相比于大多数其他国家来说,美国的高中教育、中学教育运动使得青少年更容易得到受教育的机会。^⑪高中运动起源于19世纪晚期,但是到1910年,只有约10%的美国年轻人从中学毕业。30年以后,拥有中学文凭的18岁人口的比例超过了50%。这为发生于二战后大学教育的巨大提高创造了条件。在开始的时候回归教育是很高的,戈尔丁估计它超过10%。这个时期制造业对年轻人的需求是下降的,而对白领劳动力的需求是增加的。到20年代,蓝领工人对更多教育的需求增加了。并不同时发生的事是,这一时期美国开始在收入方面抢在其他国家前头,它也在教育方面抢在了其他国家前头。

关于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约翰·希克斯爵士在他的《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提到,现代经济中的产业工人构成了那些制度的坚定支持。今天世界上真正的革命性力量是非常贫穷的数百万的工业落后世界中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完全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之外。^⑫关于这一点在美国经济中有一个小例子。真正构成威胁的并不是手工业者和装配线上的工人,而是那些在经济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就业的人。

2.1 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因素

各类劳动力市场都是衍生需求(derived demand)。对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工资率,而工资率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对劳动创造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如果生产率提高,或者产出价格提高,或者二者同时提高,那么需求将会增加(向右移)。而且,使用劳动力的环境的改善也会提高需求。因此,这个国家城市集聚的稳步增长和发展,和伴随而来的基础设施——学校、医院、公共服务、通信系统、政府机构——将会增加第三产业劳动力的需求。

类似地,需要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的特殊资本品的发展(例如,信息系统),提高了相关级别劳动力的需求。生产率也因这类城市因素而提高了,如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交通体系以及公共卫生。卡梅尔·齐斯维克(Carmel Chiswick)发现,在需求一方,对19世纪资本对高价格劳动力替代模式的一个延续:现代技术涉及与资本设备相联系的“高水平”劳动力就业的扩张,资本设备可以取代相对较高价格的生产劳动力。想象一下自动化的制造程序替代人工制造程序的规划。正如在19世纪,这种“熟练”(高水平)与“非熟练”(生产)劳动力的工资比率在这一过程中缩小了。齐斯维克写道:

^⑩ 相应的数据在1940年黑人男性5.4年,女性6.1年;1970年分别是9.8年和10.3年。*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Bc 737—792。当前数据来自于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6, table 260。2003年黑人和白人的百分比比1975年有很大程度的提高;西班牙人所占百分比有所下降。

^⑪ 参见 Claudia Goldin, “Egalitarianism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During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 *JPE*, December 1999; Claudia Goldin, “America’s Graduation from High School: The Evolution and Spread of Secondary School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EH*, June 1998; and Claudia Goldin and Lawrence Katz, “The Legacy of U. S. Educational Leadership: Notes on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20th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1, no. 2, May 2001。

^⑫ Sir John Hicks,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1969), pp. 156—159。

美国经济在 20 世纪具有如下特征:在高水平的人力职业中劳动力的比例急剧提高,同时他们的相对工资却下降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过程产生了:

……产量支持的产业混合物,相对密集地使用高水平的人力。^①

在这些条件下,劳动力需求的向右移动明显是因为第三产业的就业。

2.2 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

由于第三产业劳动力的供给需要全范围的专业知识,从家庭劳动者到核物理学家,以及其他的技术人员,因此教育影响供给方。在经济的高技术领域,常规教育的方式在创造供给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003 年,美国共授予了 46 000 个博士头衔。1900 年,这个数字是 382;1940 年是 3 290;1957 年是 8 752。^② 因这些大学机构的扩张带来的供给需要这样的教育。大多数这类扩张是靠税收支持的。甚至政府既是影响需求方也是影响供给方的因素。政府雇用博士(这样提高了需求);政府还资助他们的发展(这样帮助增加供给)。结果,经过一段时间,供给和需求都向右移动了。因为个人收入稳步提高,所以需求提高的程度更大一些。^③

2.3 交易成本

另一种考虑第三产业部门就业的方法是**交易成本**(*transactions cost*)概念。在完全竞争无摩擦的经济世界中,具有完全知识,不存在规模经济,没有任何类型的外部性,没有政府(没有税收或管制),所有资源的配置都依据消费者需求和生产成本。每个愿意工作的人都能得到雇用,其工资等于他或她的边际产品乘以产品价格。超出生产成本以上的企业利润正好补偿资本成本和管理费用。在这个世界里经济资源的使用没有进入和退出的壁垒。显然,也不存在如企业控制的“市场力量”这类事情;它们是相互竞争的。任何人及团体之间的工资和价格谈判都是完全信任的、零成本的。世界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不是呢?

在不完美的世界中完成企业的交易需要正的成本,有外部性存在,有律师和会计、税收和政府、广告、限制或垄断知识的努力(信息可以是非常昂贵的)。这类成本,被冠以交易成本之名,在初级经济学课堂上是不介绍的。然而,在这个世界上许多第三产业就业都适用于交易成本经济学,这类成本被约翰·沃里斯和道格拉斯·诺斯描述为“……从劳动分工和专门化中获取收益的成本”。^④ 沃里斯和诺斯认为,这些成本占 GDP 的比例

^① Carmel Chiswick, "Th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Revisited: The Effects of Secular Changes in Labor Force Structure,"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Fall 1985, p. 492.

^② 稍低于 50% 的学位获得者是女性,而在 1971 年只有 14%。

^③ 这些影响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有所放慢。Richard Freeman,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Labor Market," in Martin Feldstein, e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1980), pp. 382—383; and *New York Times*, 17 June 1984, p. F25.

^④ John Wallis and Douglass North, "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1870—1970," in Stanley Engerman and Robert Gallman, eds.,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86).

已经急剧提高;在1870年估计为22.5%,1970年为40.8%。它们不应该被视为GDP增长的拖累,反而应看做必要的成本,没有它们增长不可能发生。毕竟,1美元的60%要比10美分的80%更有利可图。

2.4 工作选择

职业的选择取决于两个因素:社会机动性和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机会成本是从选择的职业中获取的收入与从其他工作中可能获取的收入(潜在更高)之差。最终个人从选择的特定职业中获得适当的工资和福利,而今天,工作的选择可能变得非常复杂。例如,一个年轻的已婚妇女,从银行贷款部门职员离职,成为全职妈妈和家庭主妇,要面对一个主要的选择,一旦孩子长到比如说4岁,她和她丈夫必须衡量很多因素,以决定什么时候,或者是否她要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面临的一个不小的问题是确定她离开家庭重回工作岗位的机会成本。他们必须衡量她的净薪水的几个新成本:托儿所日托的费用,兼职女管家替代妻子家庭劳务工作的费用;由于孩子生病或者管家其他原因造成的工作日收入的可能损失;由双薪家庭造成的联邦收入税的增加和更高的上下班交通费。当然,这些因素还不包括社会学意义上的,拥有一个工作母亲的家庭,还必须被看做双亲家庭。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表明,重归劳动大军的母亲与其他没有组建家庭的工人相比将会面临更低的收入,这仅仅是因为她们在工作上花费的时间和经验相对较少。^②

许多家庭都决定父母双方都工作。他们作这样的决定是基于可以提高收入,然而收入的净增长可能是很小的。1960年,与丈夫共同生活的已婚妇女中,只有30%的人选择进入常规劳动市场。到2000年,已婚妇女的参与率几乎是1960年的两倍。在21世纪之初,男女劳动市场行为已经没有什么差异了。

图28.3揭示了这类关系。有些领域,如卡车驾驶或零售店店员,用相对较小的初始教育费用获得了快速增长的收入等级。经商、手工业、销售和文书工作,以及非熟练的工作,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在图28.3中用职业1来表示。^③其他职业,如那些需要更广泛的高等教育的工作(神经外科、生物物理工程师),用放弃的收入和当期的支出来衡量,随着成本上升多年收入很低。然而,这类领域在长期的收益将非常可观。他们也要求“复习进修”类型的不间断的教育以保持高收入。他们的收入曲线在图28.3中用职业2来表示。

给定机会、天赋、父母的希望,或者其他条件,劳动力要接受训练以便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完全理性的情况下,是否进入市场必须衡量潜在收入与预备支出(训练和教育)。在不太需要精细的背景要求的领域,接受训练的年份一部分要由放弃的收入的成本来衡量;另外还有接受训练的直接成本。达到更高收入水平的期望必须由这类考虑来平衡。机会很重要。金钱的约束使得人们远离医学、法律,远离研究生院。团体的限制(例如以

^② Claudia Goldin,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1990). 特别参见第4章, *The Emergence of Wage Discrimination*。

^③ Walter Friedman, *Birth of a Salesm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lling in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这是关于这个职业各类形式的一项有趣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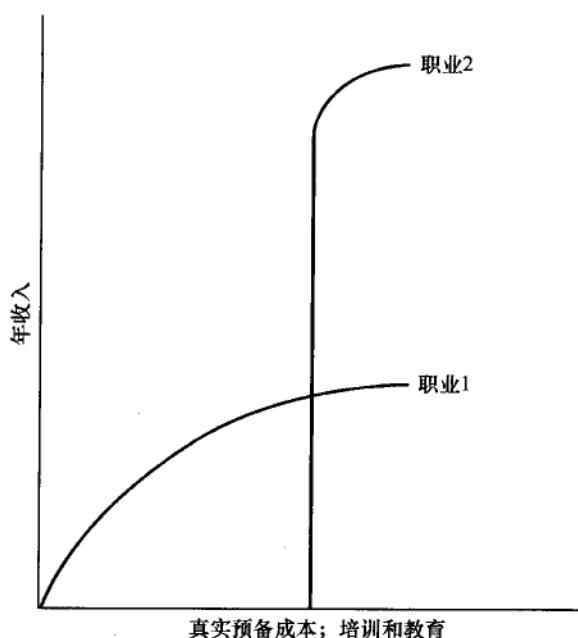


图 28.3 收入和预备成本：工作选择

有些职业，如医学、科学、技术和自由职业（职业 2）要求长时期的准备，在准备期间他们收入很少或者没有收入。当教育或训练结束时收入就来了。在那一点上，收入的增加快于那些只需要在岗工作经历的职业（职业 1）。哪种类型的职业提供最高的一生收入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环境。

种族和性别为基础）历史上限制了人们进入某些职业和行业。一旦作出决定投身一个特定领域，个人仍将面对一系列的机会（例如一个化学家可以在工业、大学或者私人咨询机构工作）。

个人对位置因素特定的偏好——气候、安逸、文化和家庭——可以将正的机会成本以及缺少这些的反应通过金钱来衡量。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的一位经理人，可能会找到很多非金钱的理由拒绝一份位于蒙大拿州阿弗尔的更高薪水的工作。对她来说，拉荷亚的无形的特征，具有多高的美元价值，可能是令人吃惊的。

除了对就业非金钱方面的这种暗含的估价，个人的均衡还由机会成本来决定。既然第三产业的就业为售货员劳动者提供了一系列的前景，那么，与个人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寻找工作相比，这里可能更多地计算机会成本。这个因素可以解释美国人不寻常的流动，他们大多数在第三产业中就业。

3. 劳动力

表 28.5 说明的是 1900—2004 年民用劳动力的部门分布。根据职业统计分布，显然描绘出了第三产业的增长。在表 28.5 中支持数据的第三产业的定义中，只包括民用劳动力（不包括所有的非熟练劳动力、所有的运输工人、所有的建筑工人、军队人员）。传统定义第三产业是根据产出，但根据就业来衡量越来越有疑问，因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的垂直一体化也雇用这类职业的劳动力。然而,遵循传统,与利用数据在其他地方作类似计算相比,表 28.5 中的数据表现出来的第三产业数据偏小。^⑤

表 28.5 1900—2004 年国内劳动力的产业分布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00	33.7	38.1	28.2
1910	30.7	38.2	31.1
1920	24.9	41.5	33.7
1940	17.4	39.0	43.5
1950	11.7	40.5	47.8
1960	6.3	38.8	54.9
1970	3.1	35.8	61.1
1980	2.2	31.1	66.7
1990	1.6	26.4	72.0
2000	2.5	24.6	72.9
2004	0.8	22.5	76.6

注:与 1900 年或更早的数据相比,2000—2004 年的数据不太严格。1930 年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Ba 1159—1395;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1, table 593; 2006, table 604.

统计数据表明,在这个世纪中根据定义第三产业部门的就业占民用劳动力的比例从不到 1/3 增长到超过 3/4。在 20 世纪中,真实人均收入增加了 5 倍,工农业产量快速增长,直接属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工人占民用劳动力的比例从 71.8% 下降到 23.4%。如果将运输和建筑工人排除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直接生产之外,而算到第三产业部门的话,第三产业部门雇用了 3/4 以上的劳动力。这种情况更像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在《回顾》中所描写的景象,而不是卡尔·马克思或者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各自著作中预示的那样。

表 28.6 表示的是表 28.5 中的绝对数量。涉及第一产业部门生产的就业下降是很显著的。还要注意到非熟练部门并没有像其他部门那样增加。随着经济的增长,工业和运输业中的熟练工艺工人和技工的数量增加了。然而,还要注意管理者、专业人员、技师和销售员的数量的增加。正是这些领域构成了第三产业部门。

在每一列的下方是 2000 年与 1900 年就业的比例。2000 年的职业结构,与 1900 年相比,在农民、林业从业者和渔民数量方面,包含了一个超过 800 万人数的下降。1900 年有 33.7% 的劳动力就业,而 2004 年不到 1%。1900 年,MPs 和 TSAs 两列合起来,通常被认为是白领职业,总和是 470 万,占民用劳动力的 17.3%。到 2004 年,他们的数量接近 8400 万,占总就业的 60.3%。

^⑤ 参见 Jonathan Hughes, "Industrialization: Economic Impact,"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7 (1968), 以及文中引用的资料。

表 28.6 1900—2004 年的劳动力分布(千人)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总计
	FFF	PPCR	OFL	MPS	TSAS	SO	TCLF ^a
1900	9 290	3 176	7 330	2 721	2 055	2 982	27 554
1910	11 108	4 247	9 601	4 144	3 623	3 513	36 236
1920	9 969	5 682	10 960	4 969	5 265	3 269	40 113
1940	8 220	5 477	12 961	7 177	7 895	5 491	47 221
1950	6 649	7 954	15 030	10 149	11 119	5 847	56 748
1960	3 843	8 708	14 864	12 587	13 766	7 047	60 814
1970	2 349	10 351	16 949	17 872	19 210	9 538	76 270
1980	2 174	11 717	18 527	27 106	25 287	12 567	97 379
1990	1 811	12 062	18 305	38 227	29 431	15 246	115 083
2000	3 399	14 882	18 319	40 887	39 442	18 278	135 207
2004	1 151	13 431	17 954	48 532	35 464	22 720	139 252

2004 年群体分布百分比

女性	22.5	4.5	23.0	50.3	63.9	56.8	46.5
黑人	6.2	6.9	13.9	8.1	11.0	15.6	10.7
亚裔	2.1	1.8	3.8	5.6	3.9	4.3	4.3
西班牙裔	37.0	22.1	19.2	6.4	10.8	19.1	12.9

FFF 农业、林业、渔业

PPCR 精密、制造、手工艺、修理

OFL 操作员、制作者、体力劳动者

MPS 管理、专业、技术人员

TSAS 技术、销售、行政支持

SO 服务行业

TCLF 总的民用劳动力

^a 总人数中不包括那些报告为未知职业的人(1940 年 2 289 人;1950 年 1 538 人;1960 年 19 007 人)。

注:2000 年和 2004 年的数据不能严格地与 1990 年以及更早年的数据相比较。1930 年的数据不包括在内。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Ba 1159—1359;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1, table 593; 2006, table 604.

在表 28.6 中白领职业的相对增加既反映了第三产业部门的增长,也反映了这些职业在制造业部门增长的事实。现在,更大数量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在大学和制造企业的研发部门就业。越来越多的律师在他们的事务所外以及在企业中执业。在 20 世纪的进程中,这些职业的增加完成了就业结构的逆转,这个事实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学家和其他的教育专家认为这个国家的优先权发生了转移。这些职业中的就业并没有包括很多不动产所有权或者学徒性质的训练。它确实需要宽泛的继续教育,而且事实上,与第一和第二产业不同,第三产业是随教育发展 to 一定程度而出现的部门。^⑤

表 28.6 还显示了 2004 年女性和少数人群的就业。女性在“技术、销售、行政支持”

^⑤ 20 世纪 70 年代第三产业部门就业的膨胀降低了教育的收益(见 Freeman[1986], table 5.7)。这并不奇怪,工作市场不景气而毕业生人数创纪录。

和“服务行业”就业的百分比大于平均数,而在“精密、制造、手工艺和修理”部门就业的百分比远远小于平均数。少数人群(黑人、亚裔、西班牙裔)就业百分比大于平均数的是服务、劳作、农业行业。少数人群在管理和专业职业中就业的百分比小于平均数。

国家的支出模式是否反映了这种改变?与给予农业、运输和制造业的补贴相比较,联邦支出用于教育的比重和结构是怎样的?是否我们真的要勇敢面对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无须技能的工厂工作、普通体力劳动、农业工作,将会和1900年在第三产业部门找工作一样难以找到?有人真的会相信美国的“再工业化”将会逆转这一趋势吗?美国将会回到劳动密集型工厂制度,有这种可能性吗?再工业化无疑将使用劳动节约型生产方法,如机器人,而且,随着劳动力持续增加,新来者肯定希望在第三产业找到工作,或者掌握那些第三产业劳动者的技能(比如程序设计)。

总之,进入第三产业的人没有太多机会找到第一、第二产业中的合适的工作。他们选择工作时与其他类似的人相比较。因为对于所有的第三产业部门就业来讲可得收入数量根本上是由其他两个部门的生产率提高来决定(当然通过对外贸易),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是第三产业工人相对过剩和需求增长落后的时期。结果是高失业率。到80年代晚期,部分由于美元汇率下跌和进而造成的出口繁荣,经济的全面扩张使失业率达到1990年下降到约5.6%。90年代的十年以衰退开始,不久之后到来的是长期的扩张,包括互联网的繁荣和破灭;但失业率达到2000—2001年经济低迷之前,下降到了4%。

3.1 在第三产业部门就业的女性

第三产业部门就业增长的重要性增加了,是基于如下考虑,20世纪劳动力构成的最伟大的一项变化是女性参与的程度。二战后经济更值得注意的一项特征是已婚已育成年女性参与率的提高。过去两个世纪中已婚女性参与率的计算显示出一个U型关系;随着获取工资的工作变得更加平常,在19世纪晚期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率有所下降。^⑦

1900年,只有18%的就业(即获得工资收入)劳动力是女性。到世纪之末,女性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倍。因为在第一和第二产业中女性数量较少,因此第三产业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按照惯例的想法,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退出劳动力市场组建家庭,然后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克劳迪亚·戈尔丁在对女性劳动力的研究《理解性别差异》中,发现这并不是准确的描述。第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是结婚之时,而不是怀孕期间。第二,很少发生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情况;那些退出的人不可能回来。^⑧更重要的是,尽管很少有女性会一直待在劳动大军中,终身工作,但戈尔丁发现,在已婚仍然工作的妇女中,工作持续率很高。已婚的职员在1940年平均年龄是33岁,受过11.3年的教育,一直工作了13.7年,其中10.5年在现在的岗位上。^⑨ 在所有的已婚工作妇女

^⑦ Goldin (1990). 还参见 Jane Humphries, “‘... The Most Free from Objection...’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Women’s Work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JEH, December 1987. 本节的大部分都以 Goldin 的书为基础。

^⑧ *Ibid.*, p. 13

^⑨ *Ibid.*, p. 30.

中这个高程度的坚持是明显的,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和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都是如此。

官方数据显示,在1890年只有5%的已婚女性在劳动大军中,而今天是60%,但这个比较有一定程度的误导。戈尔丁研究表明,1890年已婚女性的参与率与1940年的参与率相近,如果农民的妻子、寄宿公寓的管家以及其他类型的体力劳动者都从公开统计数据中排除出去的话。如果你更进一步探究背后,这个故事的模式点很多。清楚的是,在前工业化时代,在农场或是在她们丈夫的工匠店铺里,已婚女性都是积极的参与者。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业家庭的相对数量下降,家庭和车间发生分离,已婚女性的参与率缩小了,而那些年轻单身女性的参与增加了。U型的底部可以与这样的时点联系起来,在这两种类型的就业之间差距最大的时候,戈尔丁指出这正是在一战之后。

2004年在全部第三产业中,57%的被雇用者是女性,而且在所有受雇用的女性劳动力中,几乎90%是在第三产业。唯一一个雇用大量女性劳动力的非第三产业部门是工厂,雇用人数超过400万。正如戈尔丁所指出的,甚至早在1850年,在马萨诸塞州,女性工厂雇员就占全部受雇用白人女性的1/3。历史告诉我们,传统上在制造业中女性提供了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戈尔丁还说明,文书工作为女性劳动力随时间而提高的能力提供了最大的弹性,使她们在养育孩子期间或之后从家务杂事中走出来。^③

3.1.1 性别差距

1890年之后,白人女性在文书和专业部门的就业份额开始扩大,尽管几十年以来个人服务一直是白人和黑人女性唯一最重要的工作。白人女性向文书工作的转移在1930年之前的几年异常迅速。男性和女性白领职业的增加预计会减少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随着资本品对畜力的替代,随着教育对在岗培训的替代,随着市场的扩张,我们预期“性别差距”——男性和女性获得的工资的差距正在缩小。在某种有限的程度上,似乎就是这样。表28.7表明,女性与男性收入的比例从1815年的0.3以下(戈尔丁—索科洛夫对农业中这一数值的估计)上升到1850年的0.5,到1914年上升为0.6。从南北战争前到1885年发生的明显的缩小要归功于工业化。1885年之后,这一比例随经济周期而上下波动,在低迷时期上升,在好转时期下降。然而,这个收入的提高只影响单身的未婚女性;戈尔丁的报告认为已婚和年长女性的工资并没有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④ 戈尔丁解释,1885年以后制造业计时工资比例的相对稳定是这样的结果,随着女性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多样性随之提高。制造业“吸引了那些具有低水平人力资本的人,希望或者不得不工作少于全职时间”。^⑤

尽管向白领工作的转移扩大了女性就业的时间,但大多数人并没有待到足够长的时间获得提升。男性和女性都以同等的工资开始,男性从“邮递员”或送信员开始;然而,男性在同一工作待的时间更长并更容易享受到职位提升。职业的隔离阻碍了人们从事某些行业,对男性和女性情况都如此。^⑥ 女性的工作或者没有升职,像那些秘书工作,或者提升的阶梯

^③ Jane Humphries, “‘... The Most Free from Objection...’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Women’s Work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JEH, December 1987, chap. 2. 要了解更多的女性在制造业中的就业,参见 Alice Kessler-Harris, *Out to Work: A History of Wage-Earnin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2)。

^④ *Ibid.*, p. 67.

^⑤ *Ibid.*, p. 68.

^⑥ 职业的种族隔离曾经是很严重的,可能在19世纪比20世纪更加严重。

比男性短的多。长期前景中的这种差距造成了“工资歧视”,尽管性别差距缩小了。

表 28.7 女性与男性收入之比

年份	比例
1815	0.228
1820	0.371
1832	0.441
1850	0.460
1885	0.552
1890	0.539
1900	0.554
1905	0.556
1914	0.568
1920	0.559

资料来源: Claudia Goldin,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1990), table 3.1, pp. 60—61.

戈尔丁发现,在 20 世纪早些年份中,当制造业部门中的劳动力市场场所逐渐被更正规的工资框架安排取代的时候,歧视增加了,而这种工资安排是现代企业实行的,工人并不必然获得与他们当期生产率相当的工资数量。因为女性被预期将会离开工作岗位,早晚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企业选择不为她们的培训投资,也不将她们安排到有机会晋升的职位上。戈尔丁谈到:

办公室工作和制造业企业发现,将女性视为一个群体而不是个人,是有利的。作为一个群体,她们不可能渴望职责岗位;作为一个群体,她们不可能停留在劳动大军中。^④

因为这个团体被定义为年轻女性,只是在劳动力市场工作短暂的时间,改革者发现有必要通过保护法案。

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后,最高工时法和其他形式的保护法案在一个又一个州获得通过。在著名的马勒诉俄勒冈州案(1908)中,最高法院支持了一项法律请求,女性(男性不适用)的工作日中最高工时是 10 小时,依据是工作对女性和她们的(未来的)子女造成了破坏性影响。然而,作为一个群体,女性只在工作场所得到了保护,在家庭中却没有。

3.1.2 婚姻障碍

许多企业的政策反对雇用已婚女性,并要求他们的女性雇员在结婚时必须离职。“婚姻障碍”是在 20 世纪之交出现在那些工资水平与任期而不是生产率挂钩的企业中(以及学校区域)的。在 20 世纪早期,这种障碍被认为是“保护”女性免受工作场所的严酷环境之苦。即使性别歧视已经不再是激发的因素,但戈尔丁认为,它变成了一个支撑因素,一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歧视变得太昂贵了。^⑤ 早期成本较低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是这样的事实,1900 年年龄稍大的女性没有技术,特别是办公室的技术,大多数只有工作需求。第二是社会将婚姻看成一种社会安排,女性的工作就是管理家庭和家务,而

^④ Goldin (1990), p. 118.

^⑤ Goldin (1990), p. 173. 这并不是说所有对女性的歧视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结束了,只是明显的形式如结婚障碍变得太昂贵而难以继续罢了。

男性的工作是供养妻子和家庭。

3.1.3 部门参与

在西方国家,农业、一般体力劳动和手工艺部门的就业是由文化和历史决定的。在这些部门中女性的参与往往是很少的;特别是西方社会中熟练手工业往往排除女性。美国女性能够并且确实从事农业,但世界其他地方的女性参与农业劳动要广泛得多。其他非技术劳动也是如此。在那些领域女性的参与很低是由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且因此不能预期那些部门在正常情况下吸收更多的女性。二战中的“铆钉工人罗西”是个特例;那些年长的已婚妇女中,在战后继续工作的没有做铆钉工作的。在劳动力短缺的年份帮助收割的家庭主妇也是例外。在迁徙的农业劳动这种非技术性领域,女性(以及小孩)的参与一直很高。

在管理和行政部门女性的参与也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表现出显著的提高;女性在管理和专业岗位就业的百分比大约与女性在民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相同(事实上稍微高一点)。据称这里较低的女性参与也是文化因素——“男性不喜欢从女性那里得到命令”等——但很少有证据支持这种论断。然而,一些自从1900年以来增长最快的部门,除了管理和专业工人——技术工人,销售工人,服务工人——也是那些女工比例最大的行业,并且是第三产业部门。

有色人种已婚女性的参与率一直比白人女性高得多。有色人种的参与率在1890年是白色人种参与率的10倍,在1930年是3倍,而差距在近些年缩小了。差距的结束大部分是由于白人女性参与率的提高,但黑人女性的参与率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时期却有些下降。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黑人女性的从业范围中几乎都排除了农业和服务业,特别是家庭服务。潜在的原因是,由较低的教育水平造成的黑人家庭收入较低,男性失业率较高,以及种族主义。还有奴隶制的直接影响。戈尔丁相信,奴隶制也可以有间接影响:较之白人女性,付酬劳动在已婚黑人女性中很少是一个社会污点。^⑤

尽管有一个民间智慧谚语说“供给创造它自己的需求”,但女性工人的供给长时期地缺少需求,以至于这个智慧谚语无效了。爱丽丝·罗特拉(Elyce Rotella)的研究表明,女性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增加,从1870年总办公室工作人员数量的2.5%增加到1930年的52.5%,是办公自动化革命的结果。^⑥罗特拉也强调办公室工作的“机械化”最初是用于将文书技能从管理功能中分离出来。还要注意家庭工作人员,传统的女性在家庭之外的就业,在1900—1970年是下降的。而且到1970年,只有2600万男性,大约占男性劳动力的52%,在第三产业部门就业。因此,女性和男性一样,也因为第三产业部门需求的扩张而被吸收到这个部门中就业。

第三产业部门不仅仅是工作,而且是特定场所的工作。第三产业部门主要在城市中;它随着这个国家的城市化而增长。1970年在第三产业部门就业的4430万劳动力中,3780万,大约85%,在中心城市区域就业。因此,一半的男性和4/5的女性现在在第三

^⑤ Goldin (1990), p. 27.

^⑥ Elyce Rotella,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Office: Changes in Employment and Technology," *JEH*, March 1981, p. 52. 还参见 Charles Wootton and Barbara Kemmerer, "The Changing Genderization of Bookkeep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0—1930,"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70, no. 4, Winter 1996, 讨论了会计是如何变成男性职业,而簿记变成了女性的职业。

产业部门,85%的就业岗位在城市中。^③

3.1.4 统计小结

对所有的工人来说,尤其是白人女性,第三产业部门的扩张自1900年以来提供了大部分的净就业机会。在20世纪中超过1亿个岗位的净增长中,只有1490万个来自于第三产业部门之外。这样,第三产业部门占到了全部就业增加的惊人的85.7%。在过去几十年中女性劳动力参与的巨大提高,毫无疑问部分解释了女性工资率未能与男性工资率持平或相近的原因。^④但真正对女性的歧视仍然可以解释部分差距。^⑤此外,兼职就业主要和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有关。

戈尔丁就女性劳动力对间接增长的贡献所作的总体研究得出了一些有用的事实,与我们第三产业的讨论联系在一起。戈尔丁证明,年龄在15至64岁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1890年的19.6%增加到1980年的59.9%。劳动力构成中女性所占比例在同一时期从17%上升到43%。女性与男性全职收入的比例在同一时期从46%增加到60%。^⑥戈尔丁估计,女性劳动力的净贡献是14%——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女性劳动力的增加,1980年GDP就会比实际低14%。她相信城市化增加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比例,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的城市是可以找到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工作的地方。^⑦

正如表28.8所示,性别差距仍然存在,但变得更小了。这一比例大于近期记忆中的0.6。在更年轻的工人中间,“同等能力和经验则同酬”似乎更是一个规则,而不是例外;因此这个差距的进一步缩小似乎是可能的。^⑧

表 28.8 2004 年全职雇员周工资收入中位数

	总量	男性	女性	女性/男性
全部工人	638	713	573	0.80
白人	657	732	584	0.80
黑人	525	569	505	0.89
亚裔	708	802	613	0.76
西班牙裔	456	480	419	0.87
第一产业	356			
第二产业	571			
第三产业	705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Abstract, 2006, Table 632.

^③ 今天,大约60%的男性和90%的女性在第三部门就业。

^④ 在美国社会中女性越来越独立的另一个结果是贫困的增长。参见 Linda Barrington and Cecilia Conrad, "At What Cost a Room of Her Own?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Among Prime-Age Women, 1939—1959," *JEH*, June 1994.

^⑤ 参见 Francine D. Blau, "Trends in the Well-Being of American Women, 1970—1995," *JEL*, March 1998. Blau 经过25年的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她注意到有些歧视是仍然存在的。还参见 Freeman (1980), pp. 356—363.

^⑥ Goldin 发现解释男性和女性之间工资仍存在的差异时有模糊之处,通常把差异简单解释为“歧视”,似乎没有别的解释。她推测女性在“工作相关技能”方面持续投资不足,继来者参与的思想以及工作经验也主要以母亲教育为基础。然而,还有其他因素,包括持续的工作经验,有助于解释工资差异。Claudia Goldin, "The Gender Gap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Peter Kilby, ed., *Quantity and Quiddity: Essays in U. S. Economic History*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还参见 Goldin (1990), table 2.1 and 3.1.

^⑦ Claudia Goldin, "The Female Labor Forc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890—1980," in Engerman and Gallman (1986). 还参见 Goldin (1990), pp. 186—189.

^⑧ 参见 Goldin (1990), chap. 8.

3.2 黑人美国人

二战之后美国经济中的显著变化是棉花佃农制的废除。这为大量的南部农村黑人选择迁移到北方中心城市作出了贡献,这个迁移在一战之前就已经开始了。^④ 威廉·柯林斯(William Collins)证明,在“大迁移”中,工作的可得性和预期工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既然内战在很多年以前就结束了,那么就有理由产生疑问,为什么这个迁移在很久之后才到来。科林斯认为,一战之前的迁移浪潮,以及北方的雇主相对于黑人劳动力更愿意要移民,这有助于解释这种延迟。^⑤ 托马斯·马洛尼(Thomas Maloney)说明,当迁移发生时,与文盲黑人相比,有文化的黑人迁移的可能性最小,而且已婚黑人比单身黑人更可能迁移。^⑥

在 1790 年的第一次普查中,90%的黑人是南方人。这个比例在 1910 年近似,但此后开始下降。在 1940 年仍然是 75%,但到了 1970 年,只有 52%的黑人居住在南方。在 20 世纪 70 年代,许多黑人拥有的工业部门工作在南方开始消失,是受不断增加的国际竞争所害。结果,整个 70 年代居住在南方的黑人的比例实际上有所增加,并且今天仍保持在 53% 左右。然而,正如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和菲尼思·韦尔奇(Finis Welch)所称,在结束与白人收入差距方面黑人(尤其是黑人男性)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⑦ 表 28.8 表明,黑人全职工作的周工资收入在 2004 年是白人的 80% 左右。黑人男性赚取 78%,黑人女性是 86%。^⑧ 在 1940 年,黑人男性的收入只有白人的 43%。消除这种种族差距的两个主要原因是教育的提高和迁移到北方。两者都和种族歧视的减少有关,正如法律所要求的那样。第一,在每一个教育水平上黑人的工资都有增加,在 1940—1980 年间,黑人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增长了 45%,快于白人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增长。史密斯和韦尔奇断言,“有助于消除种族工资差距的两个方面是,种族之间教育差距的缩小和从黑人教育中获得的经济福利改进。”^⑨ 第二,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在南方白人和黑人的工资都低于北方,白人低于 10%,黑人低于 30%。随着大迁移,这种差距消除了。1970 年之后,南方的状况有所改善。

北方工业职位的减少导致受教育较少的黑人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结果,种族工资差距消除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许多较低收入的男性在 20 世纪 70 年代

^④ 参见 Craig Heinicke, “African-American Migration and Mechanized Cotton Harvesting, 1950—1960,” *EEH*, October 1994.

^⑤ William Collins, “When the Tide Turned: Immigration and the Delay of the Great Black Migration,” *JEH*, September 1997. Collins 说明黑人曾经转移到移民相对较少的地方,意味着一战后采取的那些移民限制对于解释大迁移出现的时期是很重要的。Thomas Maloney, “Higher Places in the Industrial Machinery?” *SSH*, Fall 2002, 他认为,对黑人工人来说,在一战之前职业分布发生了变化,职业隔离消失了,但南方的黑人并没有完全分享到这种改变。

^⑥ Thomas Maloney, “African American Migration to the North: New Evidence for the 1910s,” *Economic Inquiry*, vol. 40, no. 1, January 2002.

^⑦ James Smith and Finis Welch, “Black Economic Progress After Myrdal,” *JEL*, June 1989. 还参见 Thomas Maloney, “Wage Compression and Wage Inequality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Ma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60,” *JEH*, June 1995. Maloney 指出几乎所有的进展都发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

^⑧ 西班牙人的数量甚至更低,占 10%。总体来说周收入的中位数是 324 美元(男性 343 美元,女性 305 美元)。

^⑨ Smith and Welch(1989), p. 538. 这种增进的开端在以下文献中得到了讨论:Robert Margo, *Race and Schooling in the South, 1880—1950: An Economic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离开了劳动力市场。一项关于家庭货币收入的比较显示,工资差距在1980年是57.6%,在1990年是59.8%,在2000年是67.6%。^⑤许多家庭是由工作的女性掌管的,而第三产业部门是黑人女性的主要就业领域。其他的原因还包括,黑人在最艰难到达的领域所占比例过高,黑人居住地常常是保留蓝领工作的地区,由于移民的增加工作竞争也更加激烈。^⑥罗伯特·费尔列(Robert Fairlie)和威廉·桑德斯特罗姆(William Sundstrom)证明,种族失业差距的出现与大迁移一致。这种差距的出现似乎也可以由黑人居住地的改变来解释,但它的持续是工资差距缩小的硬币另一面。^⑦

在2004年,76.5%的黑人劳动力受雇于第三产业部门,其中超过85%在中心城市。由于第三产业的扩张比第一、第二产业更快,为了发展它还更主要地取决于一些非行业引导,最常见的是正规教育,但不是必然如此(例如,洗衣店工人,维修工人)。它还是这样一个部门,在这个部门美国社会的种族隔离特征已经造成了引人注目的结果。图28.4分别列出了白人和少数人群劳动力的分布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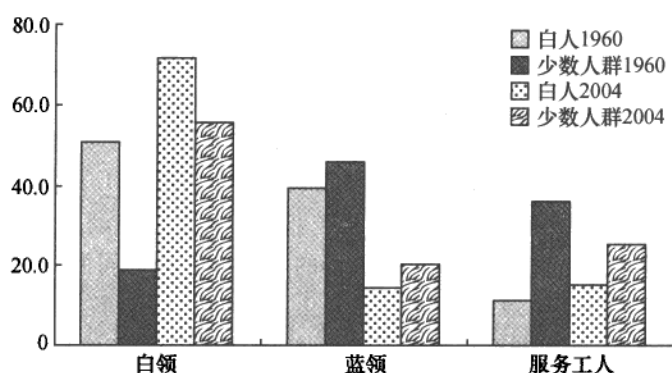


图 28.4 1960—2004 年行业和种族就业人数

在1960—2004年间,少数人群的就业总工人中超过1/3的比例在白领岗位就业,但在其他两个领域的比例下降了。在白人中,矛盾的是,服务业岗位的比例略有上升,但还存在向白领岗位的转移。蓝领岗位的绝对数量下降了,两种人群中所占的比例也下降了。农业劳动者的数量没有分开来报告。

资料来源: *Statistical Abstract*, 1980, table 698; 2006, table 607.

按照图28.4,自从1960年,第三产业部门提供工作的能力已经变得非常明显。白领职业对所有种族来说都增加了,而少数人群在白领职位的就业比例增长了一倍多。在两种领域中,蓝领就业和农业就业的比例下降了。农业的机械化紧跟着巨大的变化发生。正如所见的,白领服务工人的比例略有上升(从10.7%上升到14.0%),而少数人群在这个领域中的就业急剧下降了,用总少数人群就业中的比例来衡量,要强调的是少数人群

^⑤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6, table 673.

^⑥ 参见 Marcus Alexis, "Assessing 50 Years of African-American Economic Status, 1940—1990," *AER*, May 1998. Alexis 也证明了存在持续的种族歧视,并且政府减少了反歧视法规的实施力度。对20世纪上半叶的研究,参见 Price V. Fishback, "Operations of 'Unfettered' Labor Markets: Exit and Voice in American Labor Market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JEL*, June 1998, 特别是第五部分,他的文章是对20世纪第一产业劳动力市场的精彩概述。

^⑦ Robert W. Fairlie and William A. Sundstrom, "The Racial Unemployment Gap in Long-Run Perspectiv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7, no. 2, May 1997.

的工人在过去 30 年中向白领岗位有力地转移。

回想一下表 28.6,黑人工人在 2004 年占全部就业工人的 10.7%。但在白领工作领域他们所占比例仍然较低。在两种蓝领工作领域内部,在“精密生产、手工业、修理”行业所占比例略低,而在“操作员、制造者、体力工人”领域所占比例较高。黑人在手工艺工人中占比较低的原因是相当直接的。直到最近几年,手工业者行会还在学徒身份和会员身份方面臭名昭著地歧视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③ 在这个行业中的占比还需要时间来实现,尽管种族歧视的粗野形式已经结束了——它们,现在毕竟是违反法律的。

今天想要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农民,需要对土地、建筑和设备进行巨大的资本投资。根据这个事实,考虑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历史,黑人在农业方面所占比例较低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在“服务行业”所占比例较高也是如此。这是传统的缺乏教育和种族歧视给予少数民族的工作。尽管在这个领域黑人劳动力数量在 1960—2004 年间是下降的(见图 28.4),他们仍然支配着所有领域的总就业,从护工到私人保镖。

3.3 有组织的劳工

第三产业部门增长的一个结果是,私人部门有组织的劳工相对下降,莱奥·特洛伊(Leo Troy)称之为“老的工会主义”。^④ 现在实际在工厂工作的劳动力比例大约只有 1/5。加上手工业者、监管人员,和非农业工人的增加,总量至多达到 1/3。如表 28.5 所示,在 20 世纪开始的时候,这个比例是相反的;第三产业部门最多占劳动力的 1/4。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企业领导人宣称,更多的工人被劳动合同的工作规定锁定在非工会的工厂就业中,而不是受到最新引进的自动化技术的支持。事实上,仍然存在一些淘汰工作岗位的技术等待着引进到美国工业中。需要明智地看待这个问题。从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开始之时,重点就是“劳动节约型”技术。在美国工业中劳动力相对昂贵,而且正如前面章节反复讨论过的,有价值不朽的著作证明了美国经济发展的这一独特特征。^⑤

历史地看,用更丰富的要素替代保护稀缺要素,有助于生产函数向上方移动,并降低产出的真实成本。由于劳动者机会成本的存在,劳动力传统上一直被认为是制造业的稀缺要素。首先,正是美国农业真实收入的拉动,促使发明者从伊里·惠特尼(Eli Whitney, 1765—1825)时代以来,就寻找发现新的劳动节约型技术。20 世纪在这个国家中,第三产业部门增加了,以其最小的阶级结构和相对容易获得教育的姿态。工会试图维持会员,它经常受到对立的技术进步的冲击,技术进步将减少它的成员。额外雇工(要求比必要的人数更多的工人)、“伪造”工作,游手好闲都是其结果。一些企业,如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南部的美国钢铁公司,印第安纳州本德南部生产汽车的斯塔迪贝克公司,由于没有能力用其他方式弥补如此高昂的劳动力成本而倒闭了。这些行业将会在下面的章节详细讨论。

^③ Robert Higgs, "Accumulation of Property by Southern Blacks Before World War I,"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2, no. 4, September 1982.

^④ Leo Troy, "The End of Unionism: A Reappraisal," *Society*, March/April 1995.

^⑤ 例如, H. J. Habakkuk, *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in the 19th Century* (1962); Nathan Rosenberg, *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72), and Nathan Rosenberg and David Mowery, *Technology and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Growth* (1989)。

在手工艺和非工会的制造业部门这种情况有多广泛无法全面估计。这是要看每一个工作,每一个工厂的问题。有些人说工会合约加上了工作规定的外壳,强迫过剩的劳动力在生产部门就业。《瓦格纳法案》(1935)通过已经有70多年了,它最后被《塔夫特—哈特利法案》(1947)作了重要修订。正如戴维·西斯利亚(David Sicilia)所说,《塔夫特—哈特利法案》并没有削弱《瓦格纳法案》帮助创建的东西;而是“在企业事务中给了劳动力一个永久但屈从的声音”。^⑤ 对于嵌入到工会合约中的劳动浪费型实践,管理者作出的控告继续被工会领导人例行否决了。

工会领导者恳求更高的关税和配额,以保护他们免受“廉价外国劳动力”的竞争,或者也许还有避免新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自由贸易的协约,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受到了质疑,特别是行业工会领导人的质疑。管理者本身就来自外国进口竞争性产品(钢铁,汽车)或者在外国工厂投资,因此“出口了美国人的工作”,如流传的那样。最有可能被出口的工作主要在工业部门,而那些将获得的工作主要在第三产业部门。管理者认为,出口工作的刺激因素不是美国的报酬率太高,而是受合同保护的手工业数量太多,而使得美国的劳动力太昂贵。劳动者领袖通过指出管理者的失误来保护他们自己。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市场被外国制造商大量占领,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工业机构状况不好了。那些厂商,许多在二战期间毁灭了,既然有必要变成竞争性企业,因此开始利用美国企业延迟采纳的新技术。这些问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工业的重构已经对工会成员的减少造成了影响。

工会的限制性做法被欧洲经济学家称为“英国病”。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之前,人们普遍相信,由于这种做法要面对技术变革,英国工业容纳着两倍的被锁定劳动力,这是被共同市场国家现在的实践所批准的。^⑥ 既然疾病仍在,其进展将会慢慢侵蚀一个经济体的力量,而且这个经济体将会在产生的人均收入方面逐渐落后于其他工业国家。撒切尔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努力将英国的这种进展压低,造成了工业领域的大面积失业。从70年代开始,由于类似的原因,美国人要面对中西部和东北部老工业城镇的工厂倒闭。

莱奥·特洛伊写道,这种倒闭的结果是“旧的工会主义将会以与世纪伊始时相同的市场份额结束20世纪——7%的非农业劳动力市场”。^⑦ 最大的百分比是在1953年达到的(26%),最多的会员数是在1970年(170万)。1999年,私人部门中9.4%的工人(940万人)是工会成员,是14年前这个百分比的2/3。^⑧

“新工会主义”是公共部门的工会主义;大多数职位都在第三产业。在1999年,公共部门工会的成员超过700万,大约37%的工人在公共部门。^⑨ 在1956年,91.5万政府雇

^⑤ David B. Sicilia, “Distant Proximity: Writ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Business since 1945,” *Business and Economic History*, vol. 26, no. 1, Fall 1997, p. 269.

^⑥ 20世纪60和70年代英国也加入了美国在生产率增长排名上的下游地位,这并非偶然。1967—1977年间,比利时、丹麦、法国、联邦德国、日本和荷兰在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上都超过美国100%(参见Freeman[1980], p. 355, table 5.3)。

^⑦ Troy(1995), p. 27.

^⑧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6, table 647.

^⑨ *Ibid.* 80%组成工会的职业是在公共部门。

员中只有 12.5% 参加工会。

美国劳工联合会—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 (AFL-CIO) 在 1983 年所作的一项研究中指出了问题。^① 制造业和建筑业岗位占据了工会成员的 50%，但只占民用劳动力的 22%。女性占工会成员的 28%，但女性工会成员只占女性工人的 15%。12 年以后，40% 的工会成员是女性，大部分在第三产业。1983 年，第三产业部门，提供 75% 的工作岗位，而只有不到 10% 的岗位有组织，并只占 AFL-CIO 成员的 20%。AFL-CIO 成员在 1993 年比 1955 年多了 5%，这一年 AFL 和 CIO 合并，但在同一时期劳动力已经增长了 107%。^② 尽管旧的工会努力保持这些位置，但它的相对下降被证明是市场的力量。

3.4 退休人员

随着现代美国福利制度在 20 世纪 30 年代晚期的出现，特别是社会保障，年老工人的状况已经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已知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关于女性的因素，我们应该不会感到奇怪，可得的退休证据几乎全部是关于男性的。苏珊·卡特 (Susan Carter) 和理查德·萨奇 (Richard Sutch) 的研究表明，到 20 世纪之初，大约有 1/5 到 55 岁的男性最终以现代退休概念的方式退休；他们积累了资产以便能够从劳动力中退出并且依靠资产的本金和利息所带来的收入而生活。在 1900—1910 年间，平均来看，男性在 66.7 岁时退休，此时他们生命中还剩余 10.6 年。^③

这种观点是与赞美《社会保障法案》的观点相抵触的，后者坚持认为，在《社会保障法案》通过之前，只有富有的个人才能像卡特和萨奇描述的那样负担得起储蓄行为。而且，据说对一个老年个体来说，工作的道德标准太过强大以至于他不能从工作中退出来。那些不工作的人要么是病人要么是残疾人。按照这种观点，“退休”人员数量的增加是工业化的结果；对工作速度的要求导致老年人劳动力供给的显著下滑。

我们应该可以回想起来一般储蓄的百分比在 19 世纪 60 年代永久提高了。按照传统观点，它提高是因为父亲希望供养家庭，但证据表明随着父亲的变老，用这种方式积累起来的财富减少了——这就是被称为生命周期储蓄的例子。布瑞恩·格拉顿 (Brian Gratton) 发现，1890 年之后年长工人的真实工资的实质增加，导致了生命周期中正的工龄收入的一面。^④ 这加上这个时期以家庭为基础的经济决策，对年长工人的金融保障的增加作出了贡献。代际转移是那些策略的一部分，这个事实是《社会保障法案》在几十年后受到公众欢迎的一个原因。个人和集体中，美国人都寻求能够在法律中发现的有利的东西。

多拉·科斯塔 (Dora Costa) 对退休的研究，将现在的普查数据与内战期间的养老金联

^① 这项研究参见 Walter Galeson,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1955—1995* (1996), p. 59f. Galeson 注意到 AFL-CIO 成员大约占了工会总成员数的 80%；其余 20% 成员的绝大部分是国家教育协会的成员，是劳工运动的最大单一组织。

^② Galeson (1996) 注意到国际趋势与这里描述的美国情况是一致的；这些趋势在美国最显著。

^③ Susan Carter and Richard Sutch, "Myth of the Industrial Scrap Heap: A Revisionist View of Turn-of-the-Century American Retirement," *JEH*, March 1996, p. 19.

^④ Brian Gratton, "The Poverty of Impoverishment Theory: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1890—1950," *JEH*, March 1996. 还参见 Carole Haber and Brian Gratton, *Old Age and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An American Social History* (1994)。

系在一起,后者是对盟军退休老兵适用的。^⑤ 她发现,到1990年老年劳动力参与下降中的70%是到1960年就完成了。^⑥ 事实上现在,只有少数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男性还在工作。她证明,整个1950年退休人数的大部分增加可以归结于收入的增长,而公共养老金的增加也是这个增长的重要部分。除了内战时的养老金,许多州还在社会保障覆盖到大多数美国人老年救助之前的几年中,设置了对老年贫困人口的救助。退休抉择中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健康。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医疗进步意味着平均65岁的老年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变得更加健康。不健康往往是决定从工作中退休的主要因素。正如科斯塔所说,技术进步和休闲活动公共供给的增加,降低了老年人休闲的相对价格,因此收入的降低不再像过去那样造成劳动参与的提高。乔恩·摩恩(Jon Moen)的研究表明,农场主(和手工艺者)并没有以和其他工人同样的比例退休——和传统观点正好相反。^⑦ 他们继续生活在农场里这一事实让早期的研究者感到迷惑,他们假定那些生活在农场中的人一定一直在农场工作。

4. 收入分配

经济增长是一个有效的收入再分配器,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公理。^⑧ 在1950—1977年间,美国经历了近30年的持续良好的增长,无论是货币层面还是实际概念。应该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增长的公理成立,那么收入分配的证据将表现出更为平等的趋势。在战争期间是这样,当时是短期爆发的强劲增长。1950—1977年构成了一个较长的时期,但仍然是一个由实际战争和庞大的军事支出支撑的经济增长。确实,在冷战环境中,将这些时期看做“和平”可能并不合理。

即使如此,在1974—1975年有一次衰退,然后1977年重获增长。在1978—1980年增长放慢了,而且在1982年有一次急剧的衰退。总的来看,1978—1983年是停滞的年份,在1980年和1982年真实GDP实际上是下降的。因为位于分配较低的那一端的人,与分配顶端的那些人相比,更没有能力保护他们的收入,因此可以预期的是1978—1983年的收入分配将变得更加不平等。在世纪末的那次衰退中也是同样的情况。

表28.9中的官方贫困数据暗含着这个结果。不同规模家庭的“贫困”标准是由社会保障局于1964年制定的,并且自那时之后进行了修订。数据尽管不完善,但表示出了从

^⑤ Dora Costa, *The Evolution of Retirement: A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1880—1990* (1998). 还参见 Chulhee Lee, “Sectoral Shift and the Labor-Force Participation of Older Ma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4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2, no. 2, June 2002.

^⑥ 关于1940年以前的退休趋势存在一些争议,导致了对社会保障的引入所起作用的不同解释。Roger Ransom and Richard Sutch, “The Labor of Older Americans: Retirement of Men On and Off the Job, 1870—1937,”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6, mp. 1, March 1986, 他认为在社保推行之前较年长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并未下降。其结果依赖这样的假设,失业6个月以上的较年长人口是实际退休,但他们被误划入劳动力范围中。Robert Margo, “Th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Older Americans in 1900: Further Result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0, no. 4, October 1993, 统计意义上表明1900年退休的较年长美国人与那些6个月以上失业的人是不同的。

^⑦ Jon Moen, “Rural Nonfarm Households: Leaving the Farm and the Retirement of Older Men, 1860—1980,”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 18, no. 1, Spring 1994. 这与 Costa 的发现一致。

^⑧ 伟大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威尔弗莱多·帕累托相信经济增长、GDP增长快于人口增长,才是收入分配变得更加公平的唯一途径。Stanley Lebergott, *The American Economy: Income, Wealth, and Want* (1976), p. 144.

1959 年到 70 年代中期可以预料到的贫困比例的显著减少;这时经济增长相当强劲。数据还显示出,当经济增长放慢时贫困比例预料之中的翻转。从 1980 年到 1983 年当经济疲软时贫困家庭增加了,但从 1984 年到 1989 年,当经济从 1982 年的衰退中恢复时,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家庭的比例减少了。90 年代早期的另一场衰退导致了贫困比例增加了两个点(从 1989 年的 12.8 增加到 1993 年的 15.1),但是到 1999 年,这个比例又回到了 1979 年的水平。

表 28.9 贫困线以下的家庭

年份	全部	白人	黑人	西班牙裔
1959	18.5	15.2	48.1	n. a.
1960	18.1	14.9	n. a.	n. a.
1965	13.9	11.1	n. a.	n. a.
1970	10.1	8.0	29.5	n. a.
1975	9.7	7.7	27.1	25.1
1980	10.4	8.1	28.9	23.2
1985	11.4	9.1	28.7	25.5
1990	10.7	8.1	29.3	25.0
1995	10.8	8.5	26.4	27.0
2000	8.7	7.1	19.3	19.2
2003	10.0	8.1	22.3	20.8

注:数据的单位是百分比。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Be 272—277;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6, table 698. 四口之家贫困的界定是,1970 年,3 960 美元;到 1990 年改变为 13 359 美元。

数据还显示出,西班牙家庭和黑人家庭贫困水平非常之高。其他数据表明黑人家庭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显著变差了。在 1950 年,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是白人家庭收入的 54.3%。到 1975 年,这个数字上升到 61.5,但到 1981 年又下降到 56.4%。从 1950 年之后,超过 96% 的收益就在几年非常高的通货膨胀中消散了。然后开始再次回升,在 1999 年达到了 65.8。斯坦利·莱博高特关于收入和财富的研究揭示出,为什么美国不可能利用传统的政策消除贫困的硬核。莱博高特认为,按照美国的社会程序,美国经济制造了与经济增长一起的贫困。孤独生活的老年人,离婚的人,单亲家庭,无效率的公共教育——这些和其他原因,随着平均收入的增长,增加了贫困的数量。^⑩

产业集团的真实工资模式也暗含着一个人在哪里工作也会产生差异。在总量上,真实工资在 1980—1995 年下降了 5%,而后反弹,因此到 2005 年它们比 1980 年高 2.2%。然而,自然资源和矿产工业的真实工资在 2004 年低于 1990;建筑业的真实工资大体上保持不变。其他所有产业真实工资都更高了。^⑪ 然而,真实工资只是故事的一个部分。雇员的福利在整个时期也提高了。在 1980—2004 年间,真实的每小时补偿(工资、薪水、雇

^⑩ Lebergott(1976), part I. 在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6, table 698 中可以发现 1960—1993 年这段时期的基本贫困数据。

^⑪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6, table 628.

主缴纳的社会保险和私人福利计划的总和)在非农业产业部门提高了 32.8%。^①

表 28.10 表示在 1947—2003 年间分成五份的家庭收入。所有家庭收入的分配在 1980 年与 1947 年相近,但之后顶端的 1/5 的家庭的收入份额,特别是前 5% 的家庭,收入份额开始提高。1998 年,最高的 1/5 的家庭享有超过 47.6% 的全部家庭收入,而最低的 1/5 家庭只占 4.1%。最后一列是基尼系数,是对实际收入分配和完全公平分配的差异的衡量,完全公平分配中每 1/5 家庭都应该获得 1/5 的收入。如果完全平等,则基尼系数等于零。基尼系数的增加意味着不平等增加,在 1990—1998 年互联网繁荣时期就是如此。

表 28.10 1947—2003 年家庭货币收入

年份	在总人口中总收入分布百分比						基尼系数
	最低的 20% 家庭	下一组	中间 20% 家庭	下一组	最高 20% 家庭	最高 5% 家庭	
1947	3.5	10.6	16.7	23.6	45.6	18.7	0.403
1950	3.1	10.5	17.3	24.1	45.0	18.2	0.404
1960	3.2	10.6	17.6	24.7	44.0	17.0	0.394
1970	4.1	10.8	17.4	24.5	43.3	16.6	0.394
1980	4.3	10.3	16.9	24.9	43.7	15.8	0.403
1990	3.9	9.6	15.9	24.0	46.6	18.6	0.428
2000	4.3	9.8	15.5	22.8	47.4	20.8	
2003	4.1	9.6	15.5	23.2	47.6	20.5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Be 1—8;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6, table 680.

财富的分配通常比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自二战以来,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 0.7。在美国解放之时还是 0.7 以下。最顶端 1% 的家庭拥有的份额,在 1976 年下降到 21.8%,但在 1998 年上升到了 38.1%。^②

表 28.11 表示的是 1980 年、1990 年、2000 年和 2003 年按照收入归类的家庭收入百分比。最低收入的家庭比例在 1980—2000 年有所下降,然后上升了。平均真实收入也发生了这样的逆转。最高收入家庭的比例,白人、亚裔和太平洋岛屿居民家庭上升了,而黑人和西班牙家庭下降了。大体上,西班牙家庭过得比黑人家庭更好一些,但是两类家庭都比白人家庭在分配较低的部分占有更大的比例。亚裔和太平洋岛屿居民平均收入最高,尽管他们在低收入层次占较高的比例。2003 年,46.1% 的白人家庭获得了 5 万美元或更多的收入,比较而言,54.3% 的亚裔和太平洋岛屿居民家庭、31.1% 的西班牙人家庭,仅有 28.3% 的黑人家庭获得了同等水平的收入。在最低收入层次,14.2% 的白人家庭获得的收入少于 15 000 美元,亚裔和太平洋岛屿居民家庭的这个比例是 15.2%,西班牙家庭是 18.9%,黑人家庭是灾难性的 27.4%。对除了亚洲人和太平洋岛屿居民家庭之

^①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6, table 623. 还应该注意的是 CPI 委员会公布消费价格指数存在 1.1% 以上的误差。参见 Michael J. Boskin, Ellen R. Dulberger, Robert J. Gordon, Zvi Griliches, and Dale W. Jorgenson, "Consumer Prices,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and the Cost of Liv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2, no. 1, Winter 1998. 应该牢记的是利用 CPI 计算的真实变量会导致低估(例如,表 28.11 中中值收入和总体的经济增长)。

^②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Be 40, 42.

外的所有家庭,2003 年的比例低于 1990 年的比例。收入分配在黑人和西班牙家庭比在白人家家庭更加不平等了。事实上,种族歧视和教育弱势对少数人群的影响更强烈,而有经济成就的报酬趋向于与白人家家庭获得的报酬相等。(例如在上端,脑外科医生和 NBA 球星能够预期获得平等的报酬,不管他们是哪个种族。)

表 28.11 不变美元(2003 年)表示的家庭货币收入

年份	家庭数	15 000 美元 及以下	15 000— 24 999 美元	25 000— 34 999 美元	35 000— 49 999 美元	50 000— 74 999 美元	75 000— 99 999 美元	100 000 美元 及以上	中值收入 美元
所有家庭									
1980	82 368	18.8	14.3	14.0	17.9	20.0	8.6	6.3	37 447
1990	94 312	17.0	13.6	12.9	17.0	19.2	10.0	10.3	40 865
2000	108 209	15.0	12.5	12.3	15.2	18.6	11.3	15.0	44 853
2003	112 000	15.9	13.1	11.9	15.0	18.0	11.0	15.1	43 318
白人									
1980	71 782	16.8	13.9	14.0	18.4	21.0	9.1	6.9	39 506
1990	80 968	14.8	13.4	12.9	17.4	19.9	10.6	11.0	42 622
2000	90 030	13.5	12.1	21.2	15.2	19.1	11.8	16.1	46 910
2003	91 962	14.2	12.8	11.8	15.0	18.5	11.5	16.1	45 631
黑人									
1980	8 847	35.8	18.0	14.0	14.6	11.9	4.1	1.7	22 760
1990	10 671	33.7	15.8	13.4	14.4	13.5	5.1	4.1	25 488
2000	13 174	24.7	16.1	13.7	15.8	15.4	7.2	7.0	31 690
2003	13 629	27.4	16.0	13.3	15.0	14.6	7.0	6.7	29 645
亚裔和太平洋岛屿居民									
1980	—	—	—	—	—	—	—	—	—
1990	1 958	13.1	10.6	8.7	14.8	22.1	13.1	17.7	52 475
2000	3 963	11.0	8.5	10.0	13.6	18.4	14.2	24.3	59 559
2003	4 040	15.2	9.5	7.1	13.8	18.4	12.5	23.4	55 699
西班牙裔									
1980	3 906	24.1	19.4	16.3	17.0	15.7	4.8	2.8	28 864
1990	6 220	24.3	18.0	14.7	17.3	15.1	5.9	4.7	30 475
2000	10 034	17.9	16.7	14.9	17.6	17.4	8.3	7.2	35 429
2003	11 693	18.9	17.6	15.8	16.7	15.9	7.7	7.5	32 997

注:所有家庭的数据包括其他没有单独显示的种族。西班牙裔可以是任何一个种族。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Abstract, 2006, table 673.

对于那些希望在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上看到更大的平等的人来说,这些数字并不令人振奋。持久的时期以来,分配似乎是相当刚性的,尽管顶端的收入(50 000 美元及以上)在整个时期四组家庭都获得了显著增长。一部分,这个增长是里根时期税收政策的结果。一部分,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受教育最好的、收入最高的工人已经提高了他们工作的时间,而受教育最差的、收入较低的工人全面减少了他们工作的时间(例如,10 小

时工作日变成了8小时工作日)。^③ 随着边际税率的显著降低,富人的收入留下了更大的比例,这使得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看起来变得更大了。实际上,正如阿兰·布兰德(Alan Blinder)指出的“收入不平等的集中模式化的事实具有它的持久不变性”^④。

布兰德发现美国现金转移支付的体制对平等产生了重要影响。非常富有的人被剥夺了一些资金,那些钱给予了穷人。在他的数据中(1978),全部家庭收入流向分配的最底端1/5的比例,由于各种类型的转移支付——现金或实物,而提高了1.8%。最高1/5的收入比例则同等下降了。各种转移之后,1978年最低的1/5家庭获得了全部家庭收入的7.21%;最高的1/5获得了39.35%。^⑤ 即使在转移之后,最富有的1/5占有的家庭收入是最贫穷的1/5家庭的5倍。如果我们从表28.10中的数据判断,今天转移后的收入分配仍然和20年之前一样不平等。劳动力的变化似乎对收入分配没什么影响。

5. 第三产业就业的悖论

既然第三产业部门从数量上讲,在一个世纪之前并不重要,那么毫不奇怪,当社会理论家如卡尔·马克思预测在未充分就业的产业无产阶级将推翻资本主义时,他们完全脱离了目标。“工人”将会奋起。如果没有第三产业部门的成长,谁知道怎么样呢?

因为第三产业部门消耗了大多数原料,使用了机器及第一、第二产业部门的产品,因而,正是第一和第二产业部门的生产率使得第三产业部门的成长成为可能,至少使得那些在第三产业部门就业的人获得的相对收入增加了。另一方面,正是第三产业部门的效率——它的科学、计划和组织——使得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率提高成为可能。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三产业部门是一个悖论。它是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创造物,也是第一和第二产业的救助者,随着人口的增长,生产食品和商品的能力也增加了。

劳动节约型的机器创造的岗位比它毁灭的岗位更多,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公理。而且,一般来说这当然是正确的。在美国经济中,工作数量的巨大增加,长期中提高了真实工资,掩盖了自动化将会产生净失业的担心。生产创造市场,并因此创造就业。但是毫无疑问有些特定的工作消失了。这就是目的!假定20世纪中产业就业的历史,最可能出现的是,通过21世纪的合理化生产布局,第三产业部门将会创造净增加的岗位数量,并吸收那些在工业中失去工作的工人。

这些改变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产生的场景是,追忆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一书中的世界,在那里劳动和体力苦工被分开了。^⑥ 机器做那些令人讨厌的工作。机械辅助生产食品和商品,在发展的几个世纪中,会以减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热爱的工业无产阶级而结束,共占雇佣劳动力的比例将变得微不足道。因此,第三产业的工作选择,其中很多都

^③ 例如,参见Dora L. Costa, “The Unequal Work Day: A Long-Term Vie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8, no. 2, May 1998.

^④ Alan Blinder, “The Level and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Well-Being,” in Feldstein (1980), p. 433. Blinder的数据表明,在1952—1977年间,家庭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收入所占的份额下降了,但是最低的20%的家庭收入只提高了一点。

^⑤ *Ibid.*, p. 446, and table 6.18, p. 445.

^⑥ Edward Bellamy,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 (Boston: Ticknor, 1888).

是教育密集型的,在将来变得更加重要。因此那些认为在这个国家劳动力“接受了过多教育”的人也放弃了他们愚蠢的想法。显然对教育的需求并没有往回走,像有些人的前景那样不愉快。在竞争的世界中,一个使用无效率的劳动密集型技术的产业,是那种必须被补贴的产业,直接由被许可的垄断协定资助,或者被保护免受外国竞争,美国经济中已经有许多这样的产业了。毕竟,一个国家不能补贴每一个产业。补贴将财富从 A 转移到 B。如果没有第三方,既补贴 A 又补贴 B 就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美国工业技术退步了,它将会出口那些最没有竞争力的产品——体现着低生产率、“廉价”美国劳动力的产品。在我们历史上的这一点,我们的比较优势在于那些体现高生产率、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劳动力的产品。

推荐阅读

文章

Alexis, Marcus. “Assessing 50 Years of African-American Economic Status, 1940—199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8, no. 2, May 1998.

Barrington, Linda, and Cecilia A. Conrad. “At What Cost a Room of Her Own?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Among Prime-Age Women, 1939—1959.”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4, no. 2, June 1994.

Blau, Francine D. “Trends in the Well Being of American Women, 1970—1995.”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6, no. 1, March 1998.

Borjas, George J. “Assimilation, Changes in Cohort Quality and the Earnings of Immigrant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vol. 3, no. 4, October 1985.

———. “The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2, no. 4, December 1994.

Carter, Susan B., and Richard Sutch. “Myth of the Industrial Scrap Heap: A Revisionist View of Turn-of-the-Century American Retire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6, no. 1, March 1996.

Chiswick, Barry R. “The Effects of Americanization on the Earnings of Foreign-Born M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6, no. 5, October 1978.

Chiswick, Carmel U. “Th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Revisited: The Effects of Secular Changes in Labor Force Structure.”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vol. 3, no. 4, October 1985.

Collins, William. “When the Tide Turned: Immigration and the Delay of the Great Black Mig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7, no. 3, September 1997.

Fishback, Price V. “Operations of ‘Unfettered’ Labor Markets: Exit and Voice in American Labor Market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6, no. 2, June 1998.

Freeman, Richard B.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Labor Market, 1948—1980.” In Martin Feldstein, e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Goldin, Claudia. "The Female Labor Forc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890—1980." In Stanley Engerman and Robert Gallman, eds.,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 "America's Graduation from High School: The Evolution and Spread of Secondary School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8, no. 2, June 1998.

———. "Egalitarianism and the Returns to Education During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7, no. 6, part 2, December 1999.

———. "The Human-Capital Century and American Leadership: Virtues of the Pas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1, no. 2, June 2001.

Goldin, Claudia, and Donald Parsons. "Parental Altruism and Self-Interest: Child Labor Among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Families." *Economic Inquiry*, vol. 27, no. 4, October 1989.

Gratton, Brian. "The Poverty of Impoverishment Theory: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1890—195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6, no. 1, March 1996.

Gwartney, James. "Changes in the Nonwhite/White Income Ratio—1939—196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0, no. 5, December 1970.

Heinicke, Craig. "African-American Migration and Mechanized Cotton Harvesting, 1950—196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1, no. 4, October 1994.

Hughes, Jonathan. "Industrialization: Economic Impact."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7.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Humphries, Jane. "'... The Most Free from Objection...'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Women's Work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7, no. 4, December 1987.

Maloney, Thomas. "Wage Compression and Wage Inequality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Ma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4, no. 2, June 1994.

———. "Higher Places in the Industrial Machinery? Tight Labor and Occupational Advancement by Black Males in the 1910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 26, no. 3, Fall 2002.

Rotella, Elyce J.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Family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7, no. 2, April 1980.

———.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Office: Changes in Employment and Techn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1, March 1981.

Sexton, Brendon. "The Working Class Experi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2, no. 2, May 1972.

Smith, James P., and Finis B. Welch. "Black Economic Progress After Myrdal."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27, no. 2, June 1989.

Troy, Leo. "The End of Unionism: A Reappraisal." *Society*, vol. 32, no. 3, March/April 1995.

Wallis, John J., and Douglass C. North. "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1870—1970." In Stanley Engerman and Robert Gallman, eds.,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Weiss, Thomas. "Urbanization and the Growth of the Service Workforc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8, no. 3, Spring 1971.

书籍

Baumol, William. *Economic Dynam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51.

Benson, Susan Porter. *Counter Cultures: Saleswomen, Managers, and Customers in American Department Stores, 1890—1940*.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6.

Borjas, George J. *Heaven's Door: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Costa, Dora L. *The Evolution of Retirement: A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1880—199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Easterlin, Richard. *Population, Labor Force, and Long Swings in Economic Growth: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 *Birth and Fortune: The Impact of Numbers on Personal Welfare*,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Galenson, Walter.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1955—1995*.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6.

Goldin, Claudia.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Habakkuk, H. J. *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in the 19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Haber, Carole, and Brian Gratton. *Old Age and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An American Social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Hicks, Sir John.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Hughes, Jonathan. *The Vital Fe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Kessler-Harris, Alice. *Out to Work: A History of Wage-Earnin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Lebergott, Stanley. *The American Economy: Income, Wealth, and Wa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Owen, John D. *Working Lives: The American Work Force Since 1920*. Lexington, MA: D. C. Heath, 1986.

Rosenberg, Nathan. *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72.

Rosenberg, Nathan, and David C. Mowery. *Technology and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第 29 章

战后工业和农业

美国的制造业很容易被说成是“狼来了”。在第 28 章已阐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律师、教师、医生等行业和服务业,就业机会出现了扩张。农业的就业机会绝对地下降,制造业的就业在绝对数量上的增长已经停滞,而在比例上已经开始下降。

一些相关的数据如表 29.1 所示。生产工人在 1990 年(1 270 万)比 1947 年(1 190 万)要多一点。生产工人的人数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增加到 1 400 万,并且在 70 年代保持在 1 350 万左右。美国经济平衡地增长。结果,在 1947 年生产工人的人数超过了劳动力的 20%,而在 1990 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 10% 以下。劳动生产率的大量增加也伴随着总产量的增加,即每个工人的生产量增加。

表 29.1 1947—2004 年制造业就业和劳动力

年份	工人数量 (百万人)			占总劳动力 人数的比例(%)	
	总的城市 劳动力	制造业 工人	生产 工人	制造业 工人	生产 工人
1947	59.4	14.5	12.5	24.4	21.0
1950	62.2	14.5	12.0	23.3	19.3
1960	69.6	16.2	12.1	23.3	17.4
1970	82.8	18.0	13.5	21.7	16.3
1980	106.9	20.6	13.7	19.3	12.8
1990	125.8	17.7	12.7	14.1	10.1
2000	142.6	17.3	12.4	12.1	8.7
2004	147.4	14.3	10.1	9.7	6.9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Ba 470, Dd 3—5.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6, tables 576, 620;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urrent Employment Statistics*, series CEU3000000003.

当然,这种趋势并不新奇。美国制造业已经在努力节约历史形成的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劳动力节约的偏好在早期的美国工业史上已经成为选择技术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这一点的记录确实非同寻常。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工业生产指数(1992 = 100)在 1955 年是 30.2,2003 年达到 141.8,增加了 370%,而总的制造业就业率在同一时期下降了 11.9%,产业工人数减少了 24.4%。在整个时期,制造业的实物产量增加完全覆盖了雇佣工人数改变带来的影响。但是这种增加不是均匀的,在某些时期内的增长明显要高于其他时期。

1. 就业和增值的分布

美国制造业中哪种工业的工人数最多,以及哪种工业对国民收入贡献最大?当我们为“工业衰退带”的命运,即钢铁和汽车业的命运争吵不休时,表 29.2 可能给了我们一个惊喜。表格显示了 1980 年和 1999 年美国就业和增值的组成。根据表 29.2,1999 年的制造业工人数比 1980 年几乎多 400 万;在这些年这部分的就业下降了 19.6%。快速浏览表格可以发现只有一小部分的工业就业有所增加,大部分工业的就业都减少。总的来说,表 29.2 显示雇主的规模越大,增值也就越大。机械工业的增值在 1910 年位居首位,在 1980 年仍是如此。1999 年它在就业中位居第四,而增值位居第五。最例外的要属化工、石油和烟草,这些产业增值的贡献远远超过就业。情况正好相反,这些制造工业的工人工资较低。

表 29.2 就业的部门分布和制造业中的价值增加

	1999 年 数量	总的制造业 就业的 百分比	制造业 价值增加 的百分比	1980 年 数量	总的制造业 就业的 百分比	制造业 价值增加 的百分比
>5% ME						
37 交通	1 876	12.1	15.3	1 772	9.2	9.9
34 金属制品	1 799	11.6	8.1	1 617	8.4	7.5
20 食品	1 488	9.6	10.1	1 538	8.0	9.7
35 机械,特别是电子	1 401	9.0	7.9	2 411	12.5	12.9
30 橡胶	1 069	6.9	5.2	703	3.6	2.9
28 化学	881	5.7	13.1	910	4.7	9.6
27 印刷出版	838	5.4	3.6	1 263	6.5	5.7
38 仪器*	821	5.3	5.6	616	3.2	3.6
<5% ME						
39 其他	732	4.7	3.8	428	2.2	1.6
25 家具	628	4.0	2.3	473	2.4	1.5
36 电子器械	598	3.9	3.5	1 963	10.2	9.5
24 木材	589	3.8	2.2	698	3.6	2.3
33 原料金属	586	3.8	3.8	1 096	5.7	6.2
23 服装	576	3.7	1.7	1 307	6.8	3.0
26 纸	560	3.6	4.3	646	3.3	3.8
32 土石玻璃	526	3.4	3.2	613	3.2	3.1
22 纺织	357	2.3	1.3	816	4.2	2.5
29 汽油	104	0.7	2.4	149	0.8	3.2
31 皮革	74	0.5	0.3	233	1.2	0.6
21 烟草	28	0.2	2.2	58	0.3	0.8

* 1999 年数据缺失,用 1996 年数据替代。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d 13—231.

2. 新近工业增长的结构

直到1982年工业增长开始下调,在很长时间内工业的结构没有急剧的变化。图29.1和图29.2显示了最近耐用品和非耐用品产量增长率,1976年的每一种产品的产量作为基点,衡量2001年达到的产量。在合计中根据它们对增值的贡献将指数加权(所有制造业、所有耐用品、所有非耐用品)。图29.1所示的耐用品具备如下几个特征。首先,增长速度慢于平均的部分主要是初级金属制品和交通工具,这两个领域被保护的呼声最强烈,如钢铁和汽车被授予受重点保护(在本章后面内容将展开讨论)。美国的矿业也明显在减少。机械和电力是就业和增值最大的两部分,而且也发展迅速。整体上这两种产业的发展已经超过耐用品的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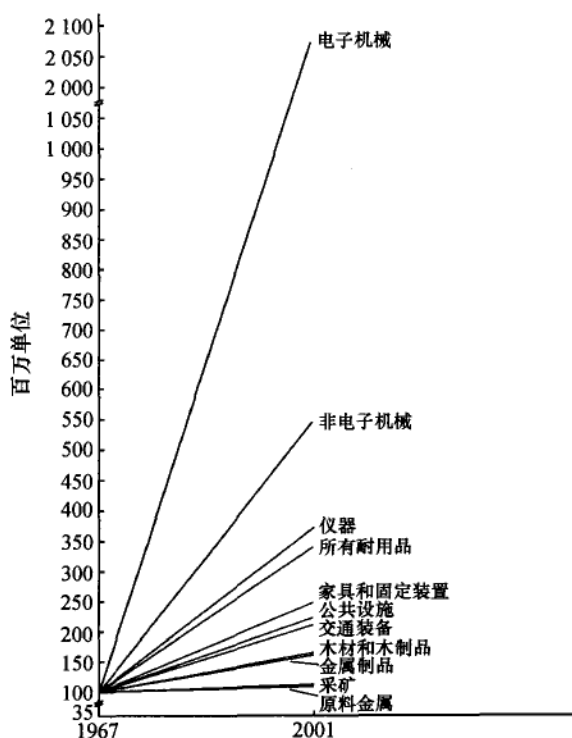


图 29.1 1967—2001 年美国工业生产指数 (耐用品)

注:1967 = 100。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d 565—582, 595, 600.

在非耐用品中,橡胶和塑料(化学品)的现代扩张与其他部门相比已经远远超过了标准。所有主要的非耐用品在1967—1999年间产量明显增加。只有皮制品的产量下降了,但烟草的产量基本维持不变。纺织作坊的产品是发展相对缓慢的产业。类似于汽车和钢铁,它也遭遇了来自国外产品的明显竞争,同钢铁和汽车行业一样,资本和劳动力的领导者都到华盛顿寻求到了政府的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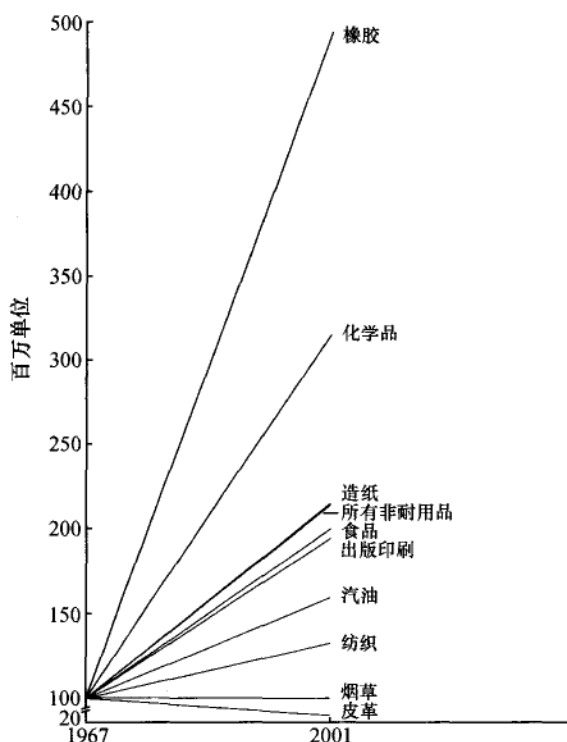


图 29.2 1967—2001 年美国工业生产指数 (非耐用品)

注: 1967 = 100。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d 584—594.

3. 生产率问题

市场是由生产力、经济增长组成。人均收入的增加是通过每小时工作的产量增加实现的(简单的乘法运算)。如果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也减慢。就如在第 3 章所列举的简单模型,改变每小时犁的亩数而不改变犁本身,这样的生产率计算是够简单,但是如果考虑整个工业或经济,生产率的测量成了一项不可思议的工作。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现在,用每小时产量变化衡量的美国生产率增长率呈 U 形轨迹(见图 29.3)。与其他国家相比,增长率在 60 年代后期以及 70 年代开始下降。商务部估计美国工业生产率在 1948—1965 年间每年增长 3.2%, 1965—1973 年间每年增长 2.4% (增长的部分下降了 1/3), 在 1973—1978 年增长了 1.1% (比 1965—1973 年下降了 55%), 最后在 1978—1980 年增长了 -0.8%, 但绝对意义上说是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了。^① 这种生产率状况有助于解释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滞胀交织的经济景象——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增加。而且,税收减少,国际收支账户出现赤字。劳动生产率也出现类似

^① Ira Magaziner and Robert Reich, *Minding America's Business: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1982), p. 31.

的下降轨迹;迈克尔·达比(Michael Darby)估计生产率的每年增长率在1948—1965年为2.6%,在1965—1973年为1.9%,在1973—1979年只有0.5%。^②

表29.3给出的劳动统计局的数据支持了这一结果;图29.3给出了每年的商业数据。在1975—1980年间,每年的生产增长率只有1.7%,只占整个商业部分的1.2%。这样的增长率低于战后的大部分时期,当然也低于同期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贸易伙伴的生产率增长。^③到20世纪90年代商业部门的年增长率才出现上升趋势,恢复到60年代的水平。

表 29.3 1950—2005 年生产率指标

年份	每小时产量(1992 = 100)		
	商业	非农商业	制造业 ^a
1950	37.3	41.9	34.0
1955	43.6	47.5	38.8
1960	48.9	51.9	41.8
1965	58.8	61.4	48.5
1970	66.3	68.0	54.2
1975	74.8	76.2	64.3
1980	79.1	80.6	70.1
1985	87.1	87.4	82.3
1990	94.5	94.5	92.9
1995	101.6	102.1	110.0
2000	116.1	115.6	134.4
2005	136.5	135.9	170.6

^a 制造业数据从1990年以后可能与1985年及更早的数据不一致。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g 281, 284, 285;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series PRS84006093, PRS85006093, PRS30006093.

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的生产率相对于60年代仍较低,但在80年代,生产率增长率开始提高。在80年代,贸易部门的每小时产量平均以每年1.7%的速率增长。这稍微高于在1975—1980年间的增长率,但低于1973—1978年的增长率,后者正好是“生产率危机”的前一段时间。农业生产率增长在1978年达到了高峰,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开始出现下降,直至现在才开始恢复。20世纪80年代的制造业生产率水平明显高于70年代;从1982年的低谷回升到现在已经处于很高的水平。

这些数据显示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经历“生产率危机”,现在大部分已经恢复。所谓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职业道德的丢失到过多的政府管制;从过低的储蓄利率到太不重视学校的科学和数学教育。有很多文献认为制造企业的投资减少与公共基

^② M. R. Darby, “The U. S. Productivity Slowdown: A Case of Statistical Myopia,” *AER*, June 1984, p. 301.

^③ Magaziner and Reich(1982), p.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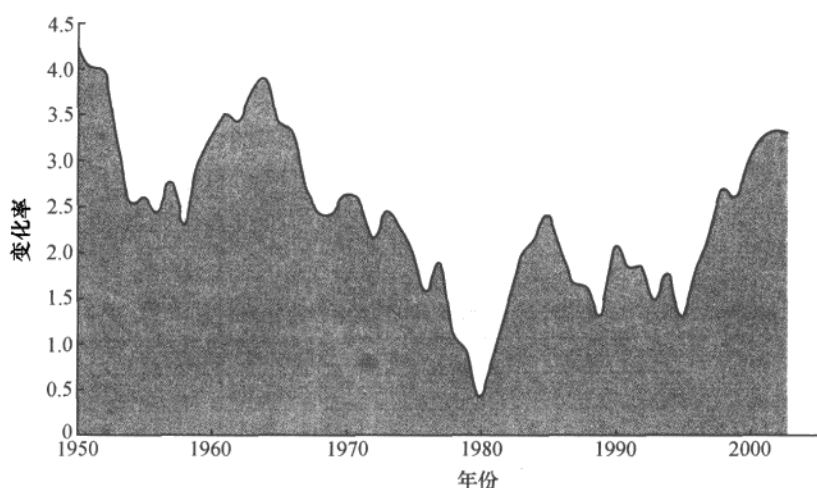


图 29.3 生产率, 1951—2003 年

资料来源: U. 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usiness productivity, series PRS84006093.

基础设施的投资减少密切相关。^④ 尽管经济大部分已恢复成为事实,但一些原因(如低储蓄率)仍值得关注。

当出现这些惊人的变化时,经济学家、政治家、牧师和其他一些人很自然地会去尝试解释这种改变。但需要回顾一下,这些总量数据所包含的一系列不同的生产经验。图 29.1 和图 29.2 显示,产量的实际增长随着工业的类型不同而有差异。电器和非电器的增加意味着在 1967—1999 年间所有耐用产品的产品指数比非耐用产品高出 3 倍。可以看到,初级金属制品(如钢材)在 1999 年(2.9%)只比 1967 年略高;现在和 1994 年都比 1967 年的产量要低。拿非耐用产品来说,1999 年的烟草和皮革的生产水平比 1967 年要低。关于生产——或生产率——要非常谨慎地看待意在解释所有工业的陈述。但是,关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美国工业生产率数据还有广泛的争议。

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 Jr.)指出生产率的下降与消费者的需求水平、进入市场的新产品数量减少以及全球竞争的“松懈”相一致。^⑤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竞争常伴随着合并和收购活动的重复爆发,这提高了投资的回报并减少了竞争。^⑥ 为了更好地理解“生产率危机”,钱德勒把制造业划分为三类:高技术、稳定技术和低技

^④ 一个例子就是 Catherine J. Morrison and Amy Ellen Schwartz, “State Infrastructure and Productive Performa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6, no. 5, December 1996.

^⑤ Alfred Chandler, Jr., “The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of U. S. Industrial Enterprises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BHR*, Spring 1994, p. 6.

^⑥ 关于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并购活动,以及在两个十年中有何不同,一个有趣的讨论可以参见 Bengt Holmstrom and Steven N. Kapla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Merger A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Making Sense of the 1980s and 1990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5, no. 2, Spring 2001。这篇文章是“公司结构变革”研讨会的一部分。

术。高技术工业是那些研究和开发支出最多的一类。^⑦ 这些工业的公司通过提供新的改进产品来提高竞争力。稳定技术工业继续提供或多或少是同样的产品。它们通过产品的设计和产品的改进来与其他产品竞争。而低技术工业在研究和开发方面投入最少,大部分是通过市场和销售来竞争。

表 29.4 列出的是这样划分的每一种产业。高技术工业中只有电子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比较困难,在接下来的陈述中我们会看到。这一类工业的合并绝大部分都是长久策略的一部分。低技术工业的合并绝大部分是一些合并后的公司把不符合公司核心业务的部分剥离,另外增加那些与公司核心业务相一致的部分。由于这些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压力较少,这些合并与收购也可以看做是为了长久的策略目的。布隆文·霍尔 (Bronwyn Hall) 发现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后期,和那些短期的稳定技术种类一样,低技术公司比其他公司更容易出现杠杆收购。^⑧

表 29.4 制造业分类

高技术	稳定技术	低技术
医药	长期	食品
电子设备	化学药品	纺织品
电子产品(包括电脑)	石油	木材
飞机—航空产品设备	基本金属	
	汽车及其他运输工具	
	短期	
	橡胶和塑料	
	石料、黏土、玻璃	
	金属制品	

资料来源: Bronwyn Hall,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Investment Horiz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6—1987,"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Spring 1994, p. 123.

长期的稳定技术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压力最大,尤其是与德国和日本的工业之间的竞争。霍尔发现这个类型的公司杠杆的增长平均是其他的两倍。而为了维持在研究与开发中的投资,以及关于产品的设计和生(如计算机)的竞争所需要的资金,这些公司也承受很大的市场竞争压力。对于其他一些种类的公司来说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并不是如此重要。事实上,霍尔发现这些公司在车间和设备以及研究与开发方面都减少了投资。她把这归结为这些年美国经济的两大特征:事实上公司税收体系偏向于债务融资和极高的利率。^⑨ 公司尽它们所需去借款,但是利率达到双位数时,它们就不再借款。

另外,可以考虑不把这些情况归为寻常的原因。迈克尔·达比对仍存疑的劳动投入

^⑦ 参见 Leonard S. Reich, *The Making of American Industrial Research: Science and Business at GE and Bell, 1876—192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and David A. Hounshell and John Kenly Smith, Jr., *Science and Corporate Strategy: Dupont R&D, 1902—19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ALCOA 是 R&D 的另一个早期投资者。

^⑧ Bronwyn Hall,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Investment Horiz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6—1987," *BHR*, Spring 1994, p. 124. 霍尔利用这些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钱德勒用其作了案例研究。

^⑨ *Ibid.*, p. 140. Carliss Baldwin and Kim Clark, "Capital-Budgeting Systems and Capabilities Investments in U. S. Companie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BHR*, Spring 1994, 文章考虑了财务会计没有披露的一系列可能性。问题不是缺少资本,而是投资的方式(p. 76)。

的一般解释提出了合理的调整方案。达比认为最近劳动力组成变化的调整应当归咎于以下三个因素：(1) 年龄(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婴儿潮”的来临，劳动力已经年轻化)，(2) 性别(重返劳动力的女性大幅度增加)，(3) 移民(劳动力中新近移民比往常更多)和(4) 教育(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女性和更多的外国工人已经获得了适当的知识以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力)。因此达比把生产率的下降说成是“统计上的近视”。

达比把他的解释看做适当的调整，工人的生产率在 1900—1979 年整个期间以每年平均 1.52% 的速率增长，在 1900—1929 年间每年的增长率为 1.54%，1929—1965 年间为 1.51%，1965—1979 年间为 1.53%。^⑩ 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结果，但关键是在这个世纪劳动力投入的“标准化”抵消了生产率的大幅度下降。正如达比指出的：

这样，似乎在 20 世纪私人劳动生产率的趋势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而我们一直用管制增长的变化、石油价格、美国管理的失效、劳动力或者其他流行的替罪羊来解释。^⑪

观察到的传统的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实际上是由于单个投入质量的暂时改变。到目前为止仍有常规测量到的每个工人每小时的物质产出的下降。但是不必担心，这必将过去。

在长久以来的美国工业核心，钢铁和汽车行业方面，最近的经济史结果可能更容易解释。我们可以注意 U 形美国生产率路径左侧的两个工业代表。我们将半导体和电脑作为右侧工业的代表。

3. 旧经济：钢铁和汽车在美国的优势地位的下降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美国受到制造业可能持续衰退的一系列危机警告。在 1992 年的竞选中，克林顿承诺要通过美国政府的政策促进“再工业化”。其他一些赞同这个目标的政客极力主张要通过一些法律来阻止现有的工厂关闭，或者建议将厂址迁至有益于健康的气候环境中，控制美国的外国投资以阻止就业“出口”，以及施加更严厉的关税和配额以维持外国产品不进入国内。伟大而著名的工业计划如俄亥俄州的火石(Firestone)公司的代顿(Dayton)轮胎计划以及美国钢铁的大芝加哥南部工厂计划被其所有者抛弃，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工人(男性和女性)失业。^⑫

这如同噩梦一般。美国钢铁收购了一家石油公司(Marathon)后改商标为 USX(试图隐姓埋名?)；通用汽车公司与日本丰田达成一个贸易协议，在加利福尼亚生产日本设计的汽车。^⑬ 只有较早的一代有学识的经济学家曾经描述到美国无敌的、任何外国竞争都无法渗透的工业优势带来的持久的“美元短缺”。现在美国面临不可避免的工业衰退，人们将其归咎于强大的外国公司。美国经济的核心工业即钢铁和汽车行业深陷困境。

^⑩ Darby(1984), p. 306, table 4.

^⑪ Ibid.

^⑫ Barry Bluestone and Bennett Harrison,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America* (1982); Robert Reich, *The Next American Frontier* (1983); Richard McKenzie, *Fugitive Industry* (1984).

^⑬ 此外，通用还在 1985 年进口了大约 20 万辆日本汽车进行贴牌销售。

由于租借和收购专利权(即在专利人的授权下生产)的制度安排,再加上国际贸易机构吸纳新的技术,整个技术思想基本上是统一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世界可以采用同样的技术。单独一个国家没有必要去完全控制任何生产技术和机器。实际所采用的技术之间的差异必须归咎于这种现象的相对要素比例、管理的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政府的政策、相关金融基础制度的适用性以及市场准入。^⑭ 任何一个经验丰富的观察者在看到像匈牙利、以色列、中国台湾、韩国、密西西比州、爱达荷州这些地区制造业的增长后,都会认定在任何适宜的经济体制环境下都能出现制造业的蓬勃发展,譬如在中国大陆。^⑮ 可以肯定,优秀的制造业仍集中在有该行业领袖的国家,比如说在1940年,但是期待成功的新企业出现也是很合理的,而且它们已经出现。关于美国 and 全世界钢铁的产量情况如表29.5所示。

表 29.5 1950—2005 年的世界和美国的钢铁产量

年份	粗钢产量		美国占世界的百分比
	世界	美国	
	(百万短吨)		
1950	207.9	96.8	46.6
1960	379.7	99.3	26.0
1970	654.2	131.5	20.1
1980	790.4	111.0	14.2
1985	792.9	88.3	11.1
1990	849.4	98.9	11.6
1995	829.4	104.9	12.6
2000	931.5	112.4	12.1
2005	1 135.4	106.0	9.3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d 399; *Statistical Abstract*, 1992, table 1266; U. S. Geological Survey, *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January 2005, p. 86.

钢铁是20世纪工业化的一种金属,是适用于建筑、机械制造、筑路、建桥的廉价金属,被认为是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伟大成功,“第二次工业革命”起于1856年的酸性转炉炼钢止于90年代匹兹堡和北美五大湖畔的平炉。廉价的铁矿、优质廉价的焦炭、聚集的劳动力以及由铁路和水道连接的巨大市场已经使钢成为美国工业发展的“自然”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增加的另一种需求爆发,在战后进一步扩展。到1950年,将近47%的世界出口在美国。之后钢的出口也迎来了另一个巨变,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工业还没有扩张。到80年代,美国大约占世界出口总量的1/10,美国工业受来自日本、欧洲、加拿大甚至巴西的一些国家的进口竞争。到2005年,已经降到了10%以下。

类似的历史反映在表29.6中,关于汽车生产的记录。在1960—1980年间,世界汽车

^⑭ Richard Easterlin, “Why Isn’t Everyone Developed?” *JEH*, March 1981.

^⑮ 读者可能会参考 Gregory Clark 的观点,Clark 认为劳动力有效部署的差异,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解释尖端科技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平均利用。Gregory Clark, “Why Isn’t the Whole World Developed? Lessons from the Cotton Mill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7, no. 1, March 1987.

的产量是 60 年代到 70 年代总体经济发展的两倍多。但是在 1960 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美国工业没有参与这种增长。美国汽车出口增长,但是进口也增长。

表 29.6 1960—2004 年世界与美国的汽车产量

年份	产量		美国占世界的百分比
	世界	美国	
	(百万辆)		
1960	16.5	8.0	48.5
1970	29.3	7.9	27.0
1980	38.9	8.0	20.6
1985	43.9	11.7	26.7
1990	48.1	9.7	20.2
1995	50.0	12.0	24.0
2000	57.5	12.8	22.2
2004	64.0	12.0	18.7

资料来源: *Statistical Abstract*, 1973, table 1320; 1982—1983, table 1058; 1988, tables 990, 1373; 1992, tables 1000, 1357;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tatistics* 2005, table 1-22.

机动车辆的进口在 1960 年是国内销售的 5%, 在 1980 年达 26.7%, 1990 年为 25.8%, 到 1995 年回降到 19.3%。钢铁的进口量在 1960 年低于美国消费量的 7%, 尽管在这后来一段时期美国政府采取一些保护措施来限制进口, 但在 1990 年进口已占消费量的 14.8%, 1994 年达到 19.1%。20 世纪 70 年代的末期, 在华盛顿采取保护政策限制外来竞争后, 钢和汽车行业(伴随相应的就业)陷入了“困境”。由于这两大工业受大公司支配如美国钢铁公司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在媒体看来这是美国工业力量的主要标志, 故在这两类工业陷入困境后, 美国媒体也一度陷入恐慌。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些由企业家如安德鲁·卡内基、威廉·杜兰特、亨利·福特和阿尔弗雷德·斯隆发展起来的工业是不是将从美国经济中消失? 还是在保护下苟延残喘当跛脚鸭?

3.1 钢铁制造

在 20 世纪 50 年代, 炼钢出现了两个革新。美国生产者在采用基础氧熔炉(BOF)和较大规模的小扁坯连铸机车间两方面都落后于其他国家。^⑥ 后者取代了在分开的平板、小坯初轧车间的铸模生产。美国生产者深受平炉技术影响, 并独自进行轧钢操作。他们的车间、劳动生产率(以及工作章程合约)都是旧技术的产物。

同时我们的竞争对手日本废弃了平炉技术并改成持续作业的车间。到 1978 年, 日本以优于美国 30%—35% 的成本在连续铸钢中达 51% 的原钢产量, 而美国只有 15%。^⑦ 马格齐纳(Magaziner)和瑞奇(Reich)把最初美国经济倒退很大部分单独归咎于美国国际贸易的管理理念缺陷。他们认为“……国外进口是以廉价劳动力、倾销和不公平交易

^⑥ Baldwin and Clark (1994), pp. 98—104.

^⑦ *Ibid.*, pp. 156—157.

为基础的,因此需要政府的保护”,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么做的。^⑩

日本本国没有铁矿和炼焦煤矿,但与美国相比,钢的出口量达40%(与美国生产者的3%相比),依靠最适用的技术他们以低成本生产的灵活性占领了国际市场。

根据保罗·蒂芙尼(Paul Tiffany)的见解,美国钢产业的其他深刻问题与大政府、大工会相关,这些不仅导致车间规模的保守政策,而且还会在一开始拒绝采纳新型的美国可以采用的BOF技术。蒂芙尼认为钢铁工业的领导者(大钢铁公司)一直期望得到比现有更优惠的税收减免和联邦补贴计划。他们依赖在国家防御策略中的轴心地位提出这样的期望,而且他们的轴心地位在冷战中进一步加深。在朝鲜战争期间,钢的产量急剧增加,钢生产者得到了快速的折旧提成(5年一个新车间),结果得到的额外税后利润可以用于扩大原来的工厂规模或者建立新的工厂。战争结束后,大钢铁公司的领导者“持续请愿”要求这些补贴仍然有效;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拒绝继续这种优惠政策,认为这样“……将会干涉自由市场经济的运作”。^⑪自大钢铁公司的发言人罗奇·布劳(Roger Blough)和本杰明·费尔利斯(Benjamin Fairless)的公众关系说教后,“作茧自缚”已经成为了一种典型。同时,蒂芙尼认为钢铁工业的劳动关系同以前一样糟糕,美国国会中的民主党代表支持美国钢铁业工人的工资需求,但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以及后来的肯尼迪政权皆反对工业部门为提高工资将成本直接转嫁于消费者的做法。

同时,整个20世纪50年代的联邦政府政策是除了自身的改革,还向其欧洲同盟国及日本寻求救助,并利用它们的新技术重建钢铁工业。由于国外生产者在价格、质量、运输进度上的优势从而能够比国内工业廉价销售,美国也因此从1959年出现了20世纪的第一次钢铁的进口大于出口。^⑫

美国大钢铁公司在过时的技术上有过大的投资。罗伯特·安克力(Robert Ankli)和爱娃·索莫(Eva Sommer)指的是在这些公司中的“管理不当、拖泥带水的工作,甚至是浪费”。^⑬这几乎令人难以相信。在50年代,数十亿美元投入到几乎崭新的荒废中。如两位杰出的工业学者沃尔特·亚当斯(Walter Adams)和汉斯·缪勒(Hans Mueller)所述:

大部分金属工厂在设置的那一刻就已经荒废。^⑭

以及

当这种膨胀在50年代后期结束时,美国工业已经发现其竞争地位比开始的十年差了很多。^⑮

^⑩ Baldwin and Clark(1994), p. 162.

^⑪ Paul Tiffany, "The Roots of Decline: Business Government Relations in the American Steel Industry, 1945—1960," *JEH*, June 1984, p. 417.

^⑫ *Ibid.*, p. 419.

^⑬ Robert Ankli and Eva Sommer, "The Role of Management in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Steel Industry," *Business and Economic History*, vol. 25, no. 1, Fall 1996, p. 230.

^⑭ Walter Adams and Hans Mueller, "The Steel Industry," in Walter Adams, ed.,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Industry*, 6th ed. (1982), p. 76.

^⑮ *Ibid.*, p. 118.

另一个同样严重的问题是在很长时间内不能采用基础氧熔炉。在1964年,12%的美国产品来自氧熔炉,而日本已经达到了44%,接近最高水平。氧转炉技术已经成了瑞士教授罗伯特·杜瑞尔(Robert Durrer)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一大成就。它在商业方面的运作开始于1950年的澳大利亚。四年后这个过程在美国才建立,而且是由一个小型的生产商(McLouth)开始运用。又过了数十年大钢铁公司才采用这种技术。类似地,美国的一些小公司开始用电气设备在远离大钢铁公司的小钢铁厂内进行废料熔炼。在50年代,钢铁大公司投资到陈旧的平炉技术的策略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考虑到表29.7中的数据,尽管从1960年到1980年净产量扩增了三倍(后来下降了),但生产过程经历了一系列变革。BOF和电气设备生产在1992年已经取代了平炉生产并改变了成千上万的钢铁工人的工作。^② 有空闲的工厂以及经济生活衰败的匹兹堡地区,艾伦镇和伯利恒、宾夕法尼亚州、扬斯敦、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和北美五大湖下游地区在这次革命中没什么动静。在来自BOF使用的压力下平炉钢的产量几乎降到零,电气炉的产生甚至比80年前或更早的时候通过新型的平炉车间撤换酸性转炉钢生产更为显著(表17.3)。尽管存在这种变革,但通过可测量的标准,美国钢产品在国际竞争中的价格要高很多;在这里要生产一吨的钢,所需要的成本、劳动力和原材料要比在日本或者西欧国家的高。^③ 但是现有的大部分是大钢铁公司的记录,并不是美国所有的钢铁生产商。毕竟,BOF和电气小钢铁技术都是早期由一些独立的相对较小的公司或工厂所创立。到1963年,控制美国钢生产总量50%的6家最大的钢铁生产商已经不再使用氧平炉技术。一些小公司加起来只控制美国钢铁产量的7%,制造所有美国BOF产量一半的产品。^④ 虽然钢铁技术革命在进行,但达不到顶峰,这是为什么呢?

表 29.7 1950—2004 年按工艺划分的原钢产量

年份	总量	平炉	BOF (百万短吨)	电气	总量的百分比		
					平炉	BOF	电气
1950	96.8	90.8	—	6.0	93.8	—	6.2
1960	99.3	87.6	3.3	8.4	88.2	3.3	8.5
1970	131.5	48.0	63.3	20.2	36.5	48.1	15.4
1980	118.8	13.0	67.6	31.2	11.7	60.4	27.9
1985	88.3	6.4	51.9	29.9	7.2	58.8	33.9
1990	98.9	5.5	58.5	39.9	3.5	59.2	37.3
1995	104.9	—	62.5	52.4	—	58.6	40.4
2000	112.4	—	59.6	52.8	—	53.0	47.0
2004	106.0	—	49.8	56.2	—	47.0	53.0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d 399—404; *Statistical Abstract*, 1992, table 1266; U. S. Geological Survey, *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January 2005, p. 86.

一些人责备政府蹩脚的企业调控政策,另一些人责备联邦政府削弱生产产量的劳动

^② *Statistical Abstract*, 1995, table 1266, 称该国的平炉产量从1992年起就是零。

^③ Magaziner and Reich(1982), p. 167; Adams and Mueller(1982), tables 11, 14A, 14B. 在1981年由工资、炼焦用煤和铁构成的每吨钢净成本美国是303美元,西欧是240美元,日本是187美元。由于日本具有更多有效率的工厂,甚至日本每吨钢材的炼焦煤和铁矿成本也低于美国(表14B)。日本也没有存货。亚当斯和缪勒的表12表明,几乎在每一个可衡量标准上,美国的工业在技术上都劣于日本和西欧。

^④ Adams and Mueller(1982), p. 111.

政策以及工资要求远超过生产率的提高;还有一些人把原因归咎于企业领导目光短浅的、短期的、缺乏头脑的管理精神。亚当斯和缪勒认为这是大钢铁公司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价值。回顾过去的发展,大钢铁公司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作为一家动态发展的企业,一旦经过最早的阶段,钢铁业的伟大人物们开创了企业之后,他们公司的继承人就变得官僚主义,精通于合并企业、控制价格和其他一些垄断行为。

在几十年的垄断中,这些大型的公司依靠贸易保护政策、周期性的大钢铁联盟和国会的支持,不论在美国还是全世界范围,对竞争性变化反应很迟钝。正如亚当斯和缪勒指出的:

由于天生的多元合并,大钢铁公司设法形成了一个协同定价和长久增长的体制。没有不可宽恕的对手强迫他们保持在组织效率和技术效率的前沿。^②

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美国市场内的外来竞争(在1960年,进口的产品占美国消费量的4.7%,1968年占16.7%)使大钢铁公司的领导者不得不需要华盛顿授权的联邦贸易保护政策的援助。从1969年到1975年,来美国的欧洲和日本的出口商都在自愿限制协定(VRA)下获得美国市场的配额。在1975年当一项反垄断的个人诉讼反对这项制度时,这个VRA才被终止。但是在1974年,又出现了一项新的贸易条例,不仅允许对特种钢进口实施配额限制,而且产生了“启动价格制”(TPM)保护美国公司免受“倾销”——就是外国公司的钢产品在美国的市场要比其本国的便宜。依据TPM,外国公司可根据高成本的美国钢铁来向消费者自由地确定价格,而不是根据国际市场价格。消费者被迫支付这个账单。对钢铁业来说这是一个好的结果,钢铁的价格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上涨。^③不得不承认,在这种环境下,BOF在受保护的美国市场内的压力主要来自国内的竞争,而不是在海外兴起的巨大国际钢铁工业的压力。^④ TPM是在美国政府证明和公布工业价格表的情况下,防止来自钢铁进口方面的不公平竞争而设置的一种制度。里根政府恢复了VRA。

考虑到主要来自工会的压力,政府采取这种配额来保护钢铁工厂的就业。这些就业的成本对每个人来说都值得考虑。亚瑟·丹佐(Arthur Denzau)估计通过这种配额抬高价格保护了钢铁2800个工作岗位,但是每个工作岗位要花费75万美元,在使用钢铁的行业又减少了5200个工作岗位。^⑤ 在1988年,美国的钢铁公司报告有利润可赚,但是它们仍然受到进口配额的保护并仍呼吁扩大配额。

从1980年到1985年美国基础钢铁的产量减少(表29.7),表明生存之道掌握在美国企业的手中。平炉技术的产量随着技术被废弃而继续下降,而BOF和电气产量在逐渐增加。到1999年,工业产能是1980年的80%,只剩11万钢铁工人,而在1980年有39.9万工人。保存下来的美国钢铁产业是有利润的,尤其是一些小的公司,尽管利润在世纪末

^② Adams and Mueller(1982), p. 128.

^③ *Ibid.*, pp. 128—33.

^④ *Ibid.*, pp. 112, n. 84.

^⑤ James Powell, "Steel Import Restraints: Flood the Markets with Choice," *New York Times*, 7 August 1988.

还在下降。^④

为保持在基础钢铁生产中的竞争力,美国钢铁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面临采取世界性技术革新的迫切需求,这种需求在过去几十年一直被忽视。在1985年,芝加哥国内钢铁公司雇用了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商,日本钢铁公司,作为建立持续生产设备和其他技术改进的顾问。仅仅在印第安纳港口工厂,在扁钢生产中日本专家提供了超过700条技术改进的建议,每年就节省了1亿美元的成本。^⑤外国公司还带给美国国际所有权路线,也似乎是现在正采用的。这是世界范围的经济,美国的钢铁公司正成为世界性的公司。

3.2 汽车

尽管在大钢铁控制下呈现僵硬的寡头垄断特征,但钢铁工业事实上在20世纪中已经渐渐变得不那么集中化了。另一方面,汽车工业除了进口带来的选择范围扩大,并没有显示这种减少趋势。尽管外国公司在美国境内开始生产汽车,但美国的三大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事实上销售所有国内生产的汽车。美国第四大公司,美国汽车公司在不能占领微不足道市场的几年内已经成为克莱斯勒公司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有其他非特异性产品几乎都从市场消失。^⑥事实上,新进入的产品非常昂贵,在几十年内美国公司几乎没有新的产品进入。三个现有的美国汽车公司代表了1100多个汽车公司中的存活者,这些公司曾一次或多次存在过,其中181家实际上只生产过一些示范模型。^⑦福特汽车公司曾经成为行业龙头,但在20世纪20年代末被通用汽车公司取代。

尽管美国汽车公司之间存在臭名昭著的非价格竞争,但汽车模型和选择的激增,以及个体购买者与售车者之间的自由交易,促使竞争活力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出现。而且,由于二手车与新车之间的竞争,消费者有了许多选择余地。巨大广告投入试图调整消费者对新车型的口味,但当福特汽车公司在1958年试图介绍一款新型汽车Edsel失败后,发现消费者的口味是不容易掌握的。

计量经济学研究显示汽车市场相当不稳定。需求价格弹性范围从-0.5到-1.5波动,收入弹性从1.0到4.0波动;因此,市场需求随着收入的改变而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对价格竞争很敏感。^⑧但是由于该行业具有价格领袖特征,以及密切的寡头行为特点,直接的一款对一款的价格竞争,大多已经消失了。在如此紧密结构化的市场内,如果新款车之间没有很多差异,任何试图进行直接价格竞争的做法会很快受到其他生产商的反击。

^④ Rick Wartzman and Carol Hymowitz, "Uneasy Revival: Big Steel Is Back, But Upturn Is Costly and May Not Last," *Wall Street Journal*, 4 November 1988.

^⑤ *Chicago Tribune*, 10 February 1986, sec. 4, p. 5.

^⑥ Robert Thomas, "Style Change and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During the Roaring Twenties," in Louis Cain and Paul Uselding, eds., *Business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Change* (1973). 更近期的两项研究是:Richard Langlois and Paul Robertson, "Explaining Vertical Integration: Lessons from the American Automobile Industry," *JEH*, June 1989; Timothy Bresnahan and Daniel Raff, "Intra-Industry Heterogeneity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American Motor Vehicles Industry 1929—1935," *JEH*, June 1991.

^⑦ Lawrence White,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in Adams (1982), p. 138.

^⑧ *Ibid.*, p. 146.

因此,生产商趋向于通过改变车型以及广告来竞争。价格元素渗入了购买方和销售者之间的个体交易,极其类似于不动产的交易市场,“讨价还价”仍是预期的行为。由于美国公司长期占据这个市场(除了创新者如豪华车或运动车),美国汽车工业似乎没有成为外来竞争的目标。表 29.8 列出了从 1937 年到 2004 年的市场份额情况。

表 29.8 1937—2004 年美国汽车市场份额

年份	通用汽车	福特	戴姆勒—克莱斯勒	其他国内品牌	国外品牌
1937	41.8	21.4	25.4	11.4	—
1946—1950	41.8	21.4	21.6	15.1	0.2
1961—1965	49.7	26.2	12.2	6.0	6.1
1966—1970	46.2	24.3	15.8	2.8	10.6
1971—1975	44.1	24.0	13.4	3.3	15.2
1976—1980	46.8	21.1	10.1	1.8	20.1
1981—1985	43.8	17.8	10.4	2.0	25.9
1986—1990	37.1	20.6	10.7	3.2	28.4
1990—1995	34.6	21.1	9.0	5.9	29.3
1996—2000	30.7	20.3	8.7	6.8	33.4
2001—2004	25.8	15.8	6.4	8.9	43.1

资料来源:Lawrence J. White,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in Walter Adams, ed.,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Industry*, 6th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82), table 3, p. 147; *Ward's Automotive Yearbook*, 2005, p. 242.

从二战开始,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控制了国内的汽车生产,而进口量在 1955 年末还不到国内汽车的 1%,之后进口车的市场份额大幅增加,几乎取代了美国汽车公司,并将经营不善的克莱斯勒公司市场份额几乎削减了一半。在 1979 年,克莱斯勒损失惨重,濒临破产,不得不要求国库给予债务担保——“克莱斯勒救援”。1981 年,里根政府同意了汽车工业的请求,设法获得了日本汽车生产商的自愿冻结配额,限制日本汽车的进口。^⑤而后国内销量上升,克莱斯勒慢慢归还贷款。当然,汽车的价格显著上涨。1984 年,汽车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汽车公司在没有外来进口增加的情况下创造了利润的新记录。

从表 29.9 中可以看到,进口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出口的增长,而美国对国际市场的出口扩张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实上,美国汽车的出口产值从 1965 年到 1995 年增长了 36.3 倍,但进口增长了 100.8 倍(从 6.4 亿美元到 645 亿美元),使美国在乘用车的国际贸易中出现了近 500 亿美元的赤字。当里根政府在 1981 年限制进口时,外国生产商在美国乘用车市场还拥有超过 1/3 的份额,美国汽车工业一度处于恐慌状态。贸易的限制使外国生产商失去了近 1/4 的市场份额。后来,外国生产商在美国市场上开始投放廉价高效的小型汽车,发现它们在质量上仍保持竞争的實力。它们通过向美国出口昂贵车型来应对数量的限制,这样它们仍然保持了利润收益。表 29.9 下半部分显示,从 1985 年到 2004 年,美国汽车出口的数量增长超过了一倍,而进口只增加了 1/3 多一点。

^⑤ Baldwin and Clark (1994), p. 60, 讨论了在将消费者的偏好整合进产品设计的方面,美国和日本汽车行业能力的差异。

表 29.9 1950—2004 年美国汽车的对外贸易

年份	出口	进口
	(计价单位:百万美元)	
1950	\$179	\$21
1960	235	513
1965	393	640
1970	822	3 719
1975	2 852	7 483
1980	3 932	16 675
1985	6 027	36 474
1990	9 708	45 716
1995	14 251	64 526
	出口	进口
	(千辆汽车)	
1985	701	4 398
1990	794	3 945
1995	989	4 114
2000	1 130	6 006
2004	1 422	6 073

资料来源: *Statistical Abstract*, 1992, table 1000; 2005 *Ward's Motor Vehicle Facts & Figures*, pp. 61—66.

首先,大部分进口的是超小型汽车,这种车型最初不受美国生产商和消费者的欢迎。在 60 年代末期,进口量出现井喷。请看表 29.10 的数据。1970 年,总进口量占美国乘用车国内销量加进口量的 20%。而且进口持续不规则增长直至 1981 年日本采取自愿冻结(那年日本汽车占全部进口的 61%)。由于所有汽车销量还包括了卡车和大型旅行车,这些汽车不包括在普通配额中,但配额适用于轿车贸易市场。几年后,美国国内的制造商比表 29.10 的情况有所改善(比如在 1977 年年底销量达到 920 万辆)。但是表中反映的情况仍然是正确的;从 60 年代后期开始,自国内汽车工业建立以来,外国汽车第一次成为美国汽车市场的主要部分。它们占据的市场份额比福特汽车要大,为什么会这样呢?

表 29.10 1950—2000 年工厂销售和进口总量(乘用车)

年份	工厂销售	进口	总量	进口占总量的百分比
1950	6 666	21	6 687	0.3
1955	7 920	57	7 977	0.7
1960	6 675	499	7 174	7.0
1965	9 306	569	9 875	5.8
1970	8 547	1 280	7 827	16.4
1975	6 713	1 571	8 284	19.0
1980	6 400	2 398	7 898	27.3
1985	8 002	2 838	10 840	26.2
1990	6 050	2 404	8 454	28.4
1995	6 310	1 506	7 816	19.3
2000	5 504	2 016	7 520	26.8

注:单位是千辆。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f 343;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tatistics 2005*, table 1—15.

大部分观察者注意到了价格与规模的结合。回想一下,新车的需求收入弹性是相当高的。当60年代末通货膨胀达到顶峰时,实际收入靠后的人宁愿把注意力投向别的东西,而不是更昂贵的新型美国汽车上。最初涌入美国市场的外国汽车,大众的 bug 和早期的丰田汽车,价格都较低端,为美国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实惠的交通。在大学的停车场上,当总体物价上升时收入立刻落在后面的地方,外国汽车非常常见。

而且,外国汽车是小型车,远远小于美国的标准轿车。这就提出了第二个问题,美国生产商用机器设备只能大批量生产六人座的轿车。那是它们能最有效率生产的、有利可图的产品。四人座的小汽车是新事物,而且每辆无利可图。美国生产商嘲笑对这种汽车的需求大幅上升的观点,认为这种车如此之小,只两个成年人和几个小孩乘坐才舒适。而且,由于新车市场已经充斥了标准产品,国内生产商提供任何新的小汽车,对它们自己的标准汽车市场来说都只是一个威胁。在1959年有一股小型车的风潮,但到了60年代,美国产品就变得更大了。

进口的小型车继续销售,到1969年和1970年,福特和通用也提供国产微型汽车。与国外竞争相比,这些美国的汽车质量较差。1969年利比亚的不流血政变和1973年持续不断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再次爆发,这造成了1974年汽油价格的急剧上涨,一个新的因素进入到了需求范围——每单位燃料行驶的英里数。

在对汽油征收高额消费税国家制造的小型外国汽车,已经比较节约燃料了。美国汽车却不是这样。在短时间内,美国主要的汽车公司进口日本汽车,并以不同款式名字进行销售。1983年之后,在保护主义的帮助下,随着经济的复苏,国际原油过剩情况的减少,汽油价格稳定下来,对美国汽车工业传统产品的需求保持了强劲势头。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对美国购买者来说进口不再是“外国”的了;在80年代,外国生产商在美国国内装配汽车并生产汽车零件。通用和丰田在美国的生产中联合了,克莱斯勒和三菱也是。对日本进口增长的限制贯穿了里根政府至布什政府,产生的结果如教科书所预计的那样——消费者的钱转移到了受保护的公司手里。新车的价格暴涨。

可想象得出,将来更多的汽车生产商将是国际联合的,汽车企业严格属于“国家”的时代几乎结束了。1998年,克莱斯勒与戴姆勒—奔驰合并,组成了现在的戴姆勒—克莱斯勒。通用和福特都与其他国家的公司有合作协议,但没有确定的合并日期。国际性联合是绕过关税壁垒的一种方式。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保护主义的力量有所增强,不仅是美国,其他国家也是如此。然而,保护主义注定要让路。尽管如此,自从1914年福特的高地公园工厂引入移动集中生产线之后,美国市场上外国产品的占领给美国的汽车产业带来了最深刻的变化。

3.3 产业不景气和全球化的一个记录

很久以来,经济学家一直意识到,不景气的产业倾向于衰退和消失。当要素比例改变时,当喜好改变,对已有产品的需求消失时,资源就会转向获得更高边际收益的用途中去。很长一段时间,正像美国经济史所表现的那样,经济结构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这样描述这一过程:

当我们在给定的一个国民经济中观察各种产业时,我们会看到先导部门从一个

部门向另一个部门转移。快速发展中的产业不会永远保持活力增长,而是会减缓发展,并被其他产业取代,这时其他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开始了。在一个国家内部我们可以观察到该国经济发展的不同的先导产业的连续活动,在每一个产业内部,我们可以看到增长率的显著放缓。^⑦

库兹涅茨发现一个产业存在的早期倾向于表现出最大程度的技术潜力,在该产业的竞争会推动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前沿上去。随后,特别是如果在最终产品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发生,技术的推进和这个产业的自然增长就会放缓。缺乏充分的市场潜力造成衰退的力量。缺乏新的更廉价的原材料,或缺乏替代投入品的显著增加,都会加剧不景气的趋势。一般而言,显著的外国竞争的加剧也是促使不景气的一个额外因素。

现在,历史不一定必然自我重复。但如果我们认真地回顾美国经济史,我们肯定能注意到库兹涅茨的发现,美国基础钢材和汽车产业的现代历史有力地证明了最终的衰退。就这一点而言,特别不祥的是,没有一个产业在二战后的时代中表现或领导过主要的技术进步。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一个类似的研究中,阿瑟·伯恩斯(Arthur F. Burns)追踪了美国 104 个经济活动领域的不景气历史,并得出结论:不景气几乎总是会导致绝对的衰退。^⑧伯恩斯还认为,在特定的行业中这样的不景气对整体发展机制来说是健康的、全面的,因为从这些衰退部门释放出的资源会流入经济中那些正处于扩张时期的更健康的部门。对库兹涅茨和伯恩斯来说,实证的法则是,工业的不景气,在特定产业,是经济演进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也许美国经济中过去的两大巨头,汽车和大钢铁的非同寻常的记录,是库兹涅茨—伯恩斯产业不景气法则的证明。有活力的、小的美国钢铁企业可能是大钢铁公司衰退的受益者。

然而,还有一个例外需要考虑,这是个重要的例外。在两个产业的所有权国际化中最实际的可能,是一个主要的新的投入发现的等价物——在此处,是管理。不景气可能可以克服。

这些年来,外国在美国产业的投资一直在创造头条新闻:德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中国,甚至加拿大。没什么新奇的;过去,外国投资(所有权)曾经是庞大的。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外国人在美国拥有的权益(股票)在或多或少地稳步增长,除了债券、在美国银行的存款,还有在美国银行国外分支机构的存款;外国的银行甚至进入了美国的主要金融中心。同样地,众所周知,美国人也扩大了国外资产的股份(还有数额巨大的贷款,有时候对借款者来说具有灾难性的后果)。许多美国的大银行曾经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因在东欧、拉美及其他地方的贷款而接近联邦救助的边缘。

毕竟这是“同一个世界”。在一个没有严重的政治和军事冲突的世界中,没有什么比投资资本的国际流动更自然的了。国家边界不是由经济造成的,而是由政治造成的。在完美世界中,风险水平和交易成本一定的情况下,寻求最高收益的投资资本将会流向最有效的用途。即使在今天的冒险世界中,这样的流动也在巨大的范围内发生。仍然怀有

^⑦ Simon Kuznets, *Economic Change* (1954), p. 254.

^⑧ Arthur Burns, *Production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70* (1934), p. 279.

“民族主义”情感的人对这种事自然是反对的,但当美国企业甚至在中国内地都能购买所有权交易时,这样的反对似乎是不合逻辑、老古董的。

至少从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国际贸易就包含着国际投资,并一直与国际直接投资联系在一起。过去这种投资是不稳定的、长周期的,正如布伦利·托马斯(Brinley Thomas)强调的那样(回顾第16章)。我们似乎在另一个这样的浪潮中。在这个程度,它能使世界范围内的管理技巧和技术应用平等化,根据经济绩效来考虑一定是受欢迎的。它可能有助于对抗美国钢铁和汽车的不景气;它对美国电子工业的增长作出了贡献。

4. 新经济:美国在电子工业上的杰出成就

正如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和詹姆斯·克奥塔达(James Cortada)指出,从一开始,信息就一直是美国经济的驱动力,包括从邮政、电报和电话,以及无线电和电视公司发展而来的网络。^③ 在二战后的年代里,随着半导体工业的出现,及此后的计算机和软件工业,信息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④ 与钢铁和汽车一样,美国的企业面临着全球市场的竞争,但美国企业最终在全部三个行业取得了杰出成就。在半导体行业,它们不得不重新争取失去的市场份额。

4.1 半导体

1947年贝尔实验室的约翰·巴迪恩(John Bardeen)、沃尔特·布雷顿(Walter Brattain)和威廉·肖克莱(William Shockley)发明了晶体管,这一事件推动了现代电子工业的产生。^⑤ 此后不久,为了应对一项反垄断诉讼,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制定了一项披露和相互特约经销政策,便于将技术转让给所有有助于做出发明活动的人。^⑥ 事实上,大量企业接受寻找技术商业化方法的挑战,他们中许多人做出了新的小的发明,包括肖克莱,给贝尔实验室在商业市场的意外成功留下了希望。

军事和空间项目为晶体管提供了最初的主要市场,而且它们的需求可能是行业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在私人部门内部的绝大多数主要发展都是想象军事市场而作出的。美国政府资助了产业初始研究与开发的绝大部分资金。^⑦ 因为军事需求是专门化的、可

^③ Alfred Chandler, Jr., and James Cortada, eds., *A Nation Transformed by Information: How Information Shape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④ 这三个行业,加上化学、诊断设备、机械工具和制药工业,Mowery和Nelson作了详细探讨,David Mowery and Richard Nelson, *Sources of Industrial Leadership* (1999)。还参见 David Mowery and Nathan Rosenberg, “Twentieth Century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Stanley Engerman and Robert Gallm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III: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⑤ 参见 Ernest Braun and Stuart Macdonald, *Revolution in Mini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⑥ 司法部在1949年提起了诉讼。这件事通过1956年签署的同意法令而得到解决,在其他方面,要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推出广泛适用的半导体技术,这项政策本来已经在AT&T实施了。公司希望有些突破性成果能够使电话营业受益。

^⑦ 应该注意的是,联邦政府,尤其是通过军事,是二战后年代产业R&D资金的主要来源。产业也从风险资本市场的出现中获益。参见 Paul Gompers and Josh Lerner, “The Venture Capit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5, no. 2, Spring 2001。

靠的产品,美国企业在制造晶体管时集中采用硅来代替锗。硅是更昂贵的原材料,但合成晶体管在大范围的温度内更为稳定。得克萨斯仪器公司推出了第一款成功的商业硅晶体管,被应用于雷达和导弹系统。在欧洲和日本,市场是由消费者电子产品引导的,企业集中采用锗。

当科学家们在两种类型的晶体管上都获得了经验时,供给的增加远远快于需求的增加,于是价格下降了。一个锗晶体管的平均价格在1957年是1.85美元,而一个硅晶体管是17.81美元。8年以后,锗晶体管的平均价格是0.5美元,而硅晶体管的平均价格是0.86美元。硅晶体管价格的大幅下降体现了硅平面工艺的发展,这个过程中,锗是不适合的。相对价格的改变,结合其首选特质,使硅成为标准。

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在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的领导下,开发了一款以平面处理为基础的应用集成线路。这个发明最初在贝尔实验室开发,在仙童公司完成,使得即时成批生产半导体成为可能。诺伊斯认识到这个处理使得将一个完整的电子线路放到集成块上成为可能。^④与得州仪器公司的杰克·奇尔百(Jack Kilby)的一场专利争夺由一项交叉许可协议解决,尽管AT&T对晶体管贡献很大,但许可被大量地授予了其他人。产品开发是迅速的。在第一个30年,每个集成线路上的晶体管数量从1000万(仅仅1000万)个增加到了1亿个。而每个线路处理的平均成本几乎没有改变。结果,消费类电子产品的价格急剧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学生们为可编程的、可作图的计算机支付的价格,比他们的父母在60年代为只有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功能的计算机支付的价格,多不了多少。与机械相比电子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系统快速增长,美国公司对增长的集中关注超过对利润的关注。

1968年诺伊斯从仙童公司辞职,一个月后,他和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创立了英特尔公司。他们与同类公司如摩托罗拉和得州仪器公司竞争,后两者集中于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同类竞争者还有老牌的、垂直一体化的企业如GE、RCA、喜万年和西屋公司。也许因为老牌企业有一系列的市场,它们不太关注新技术。到1975年,老牌企业中只有RCA保持在前十名半导体生产商之中。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企业占有世界范围内半导体销售份额的59%,集成电路销售份额的74%。十年后,这两个份额分别是43%和45%,在这两个市场中日本企业都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份额。这种变化的解释是,以军事和空间计划为目的的逻辑线路和特性集成芯片市场的相对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军事和空间计划的工业需求只有1/6。与此同时消费者市场正在迅速增长。在这个市场上重点是标准化的、大量生产的线路,适合更大的、集中化程度更高的日本企业,它们大批量生产计算机和其他消费产品。一般来说,它们比美国对手规模大得多,而且能够用未分配利润进行新投资。像钢铁和汽车业一样,日本企业决定进入国际市场,并在提高生产能力和改进产品质量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特别是,快速增长的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市场完美适合日本企业。

第一个1K的DRAM是英特尔1003,成为了行业标准,直到被4K的芯片取代。美国

^④ 参见 Leslie R. Berlin, "Robert Noyce and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1957—1968," *BHR*, Spring 2001。

企业,特别是英特尔,在70年代中期控制着世界市场。70年代末期美国经济的减速推迟了16K的DRAM的问世,日本公司抓住了这个好机会。它们获得了16K市场中41%的份额,并且没有停滞不前。到1990年,在4M的DRAM市场上日本的份额是98%。

到1985年,美国的电子产业掉头向下,但没有出局。正如兰格洛斯(Langlois)和斯泰因缪勒(Steinmueller)观察到的:“1985年实际上不是终结的开始,而是一个转折的开始。”^⑤日本企业在DRAM市场上保持了它们的竞争优势,当更大的市场再次发生了转变。这次转变不是存储器而是转向微处理,转向个人电脑(PC)。PC市场在1989年占据了集成电路销量的40%;5年以后已经增长到52%。一个英特尔公司就占领了绝大部分市场。到1994年,它占据世界微零部件生产的31%。^⑥

PC需求的增长导致了密集设计的芯片的需求上升,美国在这些芯片生产上是强项。发明才能和对需求的响应再次发挥了作用。这个产业的增长使得小的、高度集中化的美国企业都专门化了。这样造成了设计和生产的分离。设计在美国完成,而芯片通常在专门生产的外国公司制造。这种全球化的战略在美国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得以实现,政府政策使得企业能够再进口其他地方生产的半成品。这意味着美国企业在国内或国际都不必在产能上大量投资。此外,美国企业开始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诸如制造效率和产品质量方面,可以说到90年代中期他们显著缩小了与日本企业的差距。

美国工业的光辉再现与钢铁和汽车业的经历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不同于那些寡头垄断行业的巨型公司,半导体行业的中间商企业掌握着市场并随时代而变。集成电路元器件的成功清楚地列在表29.11中,和计算机行业的惊人增长一样。

表 29.11 1971—2004 年出口价值

	计算机总量	晶体管	集成电路	印制电路板
1971	1 675.1	—	—	—
1975	2 123.2	—	—	—
1980	8 076.8	599.7	6 605.7	—
1985	19 292.6	655.3	10 910.2	3 490.3
1990	25 630.0	682.3	16 623.3	7 174.5
1995	49 038.1	942.3	48 437.9	8 367.3
2000	62 856.9	1 569.3	11 891.8	73 663.7
2004	39 540.3	656.0	4 964.9	65 950.0

注:单位是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Current Industrial Reports, MA334Q—Semiconductors and Electric Components, (04)-1; MA334R—Computers and Office and Accounting Machines, (04)-1.

4.2 计算机

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发端开始,美国就统治了计算机行业。其间有不断的技术

^⑤ Richard Langlois and W. Edward Steinmueller, “The Evolution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Worldwid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1947—1996,” in Mowery and Nelson (1999), p. 48.

^⑥ 其他因素也发挥了帮助美国企业的作用。这个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日元对美元的强势地位也造成了日本生产的下降。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和韩国,也通过重视消费类电子产品而使这个行业得到了发展。最后,自从90年代早期VCR之后就没有“轰动的”、快速增长的电子设备了。

变迁和持续的产品创新。计算机硬件的发展与半导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计算机已经变得更加功效强大、更能负担得起、更小巧。布里斯南(Bresnahan)和迈勒巴(Malerba)将计算机的需求区分为三个显著类型:用于科学、工程和技术研究,用于商业数据处理,用于“个人生产应用”。^{④7} 第一种用途的市场已经增长到了其他两种用途的两倍。总之,这些不同需求需要不同规模的公司提供不同型号的计算机。IBM 从一开始就占有大型计算机的统治地位。至于微型计算机、PC 和 workstation,新的进入者扮演着重要角色。

与半导体行业一样,公共部门有助于为计算机的研究承担资金。还有一些私人支持,美国军方和人口调查局是两个最常参与的机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普里斯帕·埃克特(J. Presper Eckert)和约翰·墨赫(John W. Mauch)开发了美国第一代数字电子机械计算机,ENIAC。第二代机器 EDVAC 的顾问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建议计算机应存储程序而不是固定线路,他将这个观念增加到自己的计算机 IAS 之中。^{④8} 埃克特和墨赫最终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但经营不善,被 UNIVAC 的发明者莱明顿·兰德(Remington Rand)取得了。

既能运算又能进行程序处理的大型机是第一代商业产品。在特定的需求下,最初集中关注科学应用的生产者很快转向了兼顾商业应用,尤其是会计功能的计算机生产。IBM 成了市场领导者,但它也面临着来自于美国和欧洲其他办公设备(市场导向)企业、电子(技术为基础)企业、新建企业的竞争。直到 50 年代末期,日本的电子产业才得以发展,此时,IBM 日本已经占据了强势地位。在所有主要生产领域市场导向的企业和技术为基础的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给早期的电子产业带来了压力。

IBM 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地位来自于它的钱德勒式的三方投资:技术、市场和管理(见第 18 章)。^{④9} 整个 50 年代,IBM 推出了功效更强大的家庭计算机。当公司更加转向商业应用导向(远离政府应用)时,它并非没有一点疑虑,它在必要的管理结构方面作了投资,以满足顾客的需要。研究与开发方面的努力使它转向了新产品开发。由于对计算机有着过剩的需求,IBM 不断提高其生产能力。

在 60 年代早期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事实,不同型号的计算机(如 701、650 和 11401)是不相容的;它们被设计出来或者用于科学,或者用于商业目的,而不能同时满足两种要求。1964 年 System 360——真正的模块化计算机问世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正是这台计算机奠定了 IBM 的领导地位。这个公司通过标准化零部件的生产实现了规模经济,有助于计算机企业的向上一体化。例如,IBM 创立了自己的零件公司来生产半导体。这样依次能使它在零件和计算机设计上实现范围经济。未来几代计算机,如十年后的 System 370,使公司拥有市场支配地位。20 世纪 70 年代反垄断的压力导致了硬件和系统软件的分门计价。这使得竞争者在 System 370 的推出后更容易追随“IBM 兼容”的策

^{④7} Timothy Bresnahan and Franco Malerba,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the Evolution of Firm’s and Nation’s Competitive Capabilities in the World Computer Industry,” in Mowery and Nelson (1999), p. 80.

^{④8} 这是以他曾经所在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而命名的。磁核处理器是作为 MIT 的旋风项目的一部分开发出来的。

^{④9} 阿尔弗雷德·钱德勒亲自从事这个问题的研究,参见 *Inventing the Electronic Century: The Epic Story of the Consumer 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Industries* (New York: Free Press, 2001)。

略,这样会减少 IBM 的利润。竞争者追随着占支配地位企业的领导。

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国际贸易与工业部(MITI)调整了为发展日本国内技术能力而设计的超高性能计算机计划。到结束时,它得到了一些企业如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的帮助。计划所包含的六家公司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就像 IBM 专利的适用性一样,在日本也有适合 IBM 出现的条件。在 System 370 问世前,日本企业占有日本国内市场的近 60% 份额。^④ 向模块化系统的转移对日本人有裨益,他们可以在标准化、批量生产的产品上建立优势。到 1980 年,日本企业是 IBM 的最重要追随者。然而,他们在硬件方面的优势要远远大于软件方面。他们继续努力追赶 IBM 生产主机,但大型计算机本身被小型机器的发展超过了。

第一台小型计算机是数码设备公司(DEC)的 PDP-1,于 1960 年问世。DEC 是具有麻省理工学院背景的一家创业公司。在这一市场细分领域大量的公司都是企业家新创立的。IBM 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出现例子。小型计算机及同类产品——微型计算机的发展,得益于整体电子线路的发展。小型计算机尤其适合制造企业和研究型实验室应用。小型计算机的用户是计算机学者,因此供应商在上市其产品时并没有遇到 IBM 在大型机市场上的那样的问题。进入这个市场的第二层次新企业是提供生产者与用户的中间服务的公司。大多数小型计算机公司集中于生产;它们并不提供有效的软件支持。

英特尔在 1971 年成功推出了第一代商业微型处理器。直到那时,每个新的应用都要求设计一组定制的芯片。微型处理器,一个为许多应用提供通用解决方案的芯片,节省了工程设计时间,并消除了技术进步的瓶颈。最显著的结果是微型计算机(PC)的发展。它们比小型计算机更小、更少耗能、更便宜。最初,市场是由爱好者引导的,他们是极端的计算机人士。因此,企业销售 PC 的营销策略与销售小型计算机的策略是类似的。

关于 PC 有两个主要标准——CP/M 和苹果 II。苹果 II 系统在 1977 年问世,并确立了 PC 的消费产品地位,包括专有架构和一个操作系统。CP/M 系统是一项数码研究的专利产品,但它适用于各对手公司提供的一系列计算机,大部分对手公司是企业家新创立的。两种系统都是开放的,软件也是,并且被大量企业作了改进。而且,大部分都是企业家新创立的企业。一些程序如 VisiCalc 电子制图软件(1979)和 WordStar 文字处理器(1980)将 PC 带入了办公室。

此时,在 1981 年 8 月,IBM 作出了它延迟的决定,进入 PC 市场。既然其他公司起步在前,IBM 选择通过外部联合来做,特别是英特尔微处理器和微软的操作系统软件。正如理查德·兰格洛斯(Richard Langlois)所说,IBM 的 PC 很快确立了 16 比特标准;短期中它唯一强有力的对手是苹果的麦金托什机(Macintosh)。^⑤ 然而 IBM 作出开放其 PC 架构的决定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权衡。当它制定了标准并且让自己的产品很快出现在市场上,它为其他企业生产“IBM 兼容型”PC 打开了一扇门。这些企业几乎全部源自美国。在与 IBM 合作的过程中,英特尔和微软引导了未来 PC 市场的发展。

^④ 随着 System 370 的问世,它们的市场份额减少到约 50%。

^⑤ Richard Langlois, "Creating External Capabilities: Innovation and Vertical Disintegration in the Microcomputer Industry," *Business and Economic History*, vol. 19, 1990. 还参见他的 "External Economie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Case of the Microcomputer Industry,"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67, no. 1, Spring 1992。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曾经只能由大型机完成的特定功能,小型和微型计算机也能通过网络完成,这两个分割的市场合二为一了。计算机硬件成了一种商品,专门化的生产者加快了纵向分解的过程,而软件比硬件相对利润更高些。美国保持了它的国际统治地位,因为作出有利润的创新所需的知识是极端复杂的,强大的补充仍存在于不同的计算机市场上。

4.3 软件

软件工业的存在反映了计算机工业专门化的增长,特别是在 PC 问世后的年代。美国在计算机行业的比较优势在软件业刚一诞生就得以延续。^② 软件可以分为三个类别——控制计算机内部操作的操作系统、支持应用发展的应用工具、能够使用户完成特定任务例如文字处理或图表计算的应用软件。^③ 所有这三个都可以被写成对许多用户的同一个问题,或对特定用户的独特问题。生产所有三种产品是可能的,用不通过市场的方法;事实上,在 PC 之前,无论计算机生产商还是用户,它们都不供应软件。而且,相当数量的标准化软件嵌入诸如控制系统等产品中,而且并不适合被作为单独产品。而原理是同样的,我们的讨论将集中于可以作为单独产品的被交易的软件。

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标准化的软件包占有而且持续占有美国市场的份额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这给了美国在软件业的“第一行动者”优势,特别是在操作系统和应用工具方面,与计算机行业类似。应用软件要求更大程度的“用户友好”,特别是用户母语操作的功能。在这方面恰恰是美国比较优势最薄弱之处。

如前所述,在 PC 出现之前,很少有商业软件适合购买。ENIAC 是硬接线的,不包括软件。随着计算机的结构愈益标准化,特别是在 IBM 的 System 360 问世之后,标准的操作系统和应用市场得到了发展。在写明许多早期软件的政府合约下,企业开发极端机,但在标准化语言如 COBOL 和 FORTRAN 的过程中用户自己的收获是适当的。这样,有些独立的软件企业在美国计算机生产商开始将硬件和软件分类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分类只是有助于扩大市场的一个原因。System 360 的操作系统对家庭的所有机器都是共同的,它提高了计算机的需求。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小型计算机的出现,产品没有捆绑软件,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后,美国的贸易政策允许外国生产零部件,最后允许生产部分计算机,有助于降低计算机的价格并且因此提高了软件的引致需求。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 PC 的问世真正叩开了软件工业爆炸式增长的大门。尤其重要的是两款标准 PC 的出现——IBM 和 Mac。IBM 开发了一个自主的、有紧迫感的 PC 商业单元。它既没有人员也没有时间去开发特有的操作系统,因此它决定从外部购买,与其他客户具有相同基础的微软 MS-DOS 系统。尽管重要性相同,但它没有试图限制微软卖给其他用户的能力。^④ IBM 关心的是它的 PC 能够为微软 BASIC 操作系统开发的程序运行得和 MS-DS 一样好,因此这个领域对大量的进入者而言都是开放的,这些企业也

^② Martin Campbell-Kelly, *From Airline Reservations to Sonic the Hedgehog* (2003).

^③ 围绕软件概念有几个定义问题。David Mowery, "The Computer Software Industry," in Mowery and Nelson (1999), p. 134, 讨论了这些定义问题。

^④ IBM 在购买微处理器时与英特尔的关系也是一样的。

确实进入了。^⑤ 大部分是新企业,没有给大型机甚至小型计算机开发过软件。^⑥ 这种市场分割仍在美国保留着。

在其他国家并不是同样的情况,其他国家大部分是追随者。大型计算机生产商比企业家型企业更可能成为主要的供应来源。在软件的生产中,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显然比物质资本重要得多。在美国,人力资本开发已经在大学层次上制度化了,在美国大学里,计算机科学已经成为课程表的重要部分,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私人部门(数据控制公司和 IBM)和政府(国家科学基金)为这个方向的第一步行动提供了资金。^⑦ 知识资本包括政府政策,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加关注软件业的知识产权问题。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该产业受到了网络增长的挑战,在 PC 与(特别是)互联网创造之间。这仍然是一个正在上演的故事,并且它与产权问题联系在一起。开始之时,互联网是由政府出资建立的。最开始称为 ARPANET;ARPA 代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这个机构在 1995 年由私人部门接管之前,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国家科学基金掌控。^⑧ 显然,政府对微软的反垄断诉讼的解决,取决于软件工业未来将如何发展,而且正如所讨论的那样,这仍然是一个宽泛的尚未解决的问题。^⑨

4.4 小结

在我们研究的全部三个电子领域中,美国都是国际的领导者。在所有三个领域美国公司都是最早的进入者,而且在早些时期,政府资金大部分通过国防部来资助研究与开发,更重要的是,国防部购买研究的成果产品。政府也资助大学的培训和研究,这有助于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最后会变成一个比其他地方更大的劳动力补充队伍。巨大的美国市场,特别是大型计算机市场,激发了半导体和硬件的研发;风险投资使企业家创业企业能够追求梦想。巨大的 PC 市场的出现激发了软件的研发,而反垄断和发展中的知识产权体系提供的保护,使得其他企业追逐梦想也成为可能。正是私人部门计算机需求的增长和对半导体及软件的引致需求,构成了美国优势的核心。^⑩

半导体和计算机技术都受益于内森·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所谓的“技术融合”,这个过程是对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增加对经济的多个部门都有用的一般知识。也许这些一般目的的技术中最重要的就是平面处理,但集成电路、标准化的存储器、

^⑤ Martin Campbell-Kelly, "Not Only Microsoft: The Maturing of the Personal Computer Software Industry, 1982—1995," BHR, Spring 2001, 对该产业进行了详细综述。尽管这个综述完成于 1995 年,但作者在附录中包括了一个支持被告的微软案例。

^⑥ *Ibid.*, pp. 122—128, 讨论了 OS/2 和 Windows 操作系统之间的竞争。作者提到曾经流行的软件,特别是 Lotus 1-2-3 和 WordPerfect,投注在 OS/2 标准上,而在 Windows 占据统治地位时,它们失去了市场份额。

^⑦ Mowery(1999), p. 145, 研究表明和电子工业的其他部分一样,软件业得益于联邦的资金,特别是那些资助大学为基础的研究中心的资金。

^⑧ Janet Abbate, *Inventing the Internet* (1999); Janet Abbate,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the Making of the Internet,"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75, no. 1, Spring 2001.

^⑨ 一个关于微软案例的专题讨论文集已经出版: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5, no. 2, Spring 2001。尽管微软避免了美国法院最初规定的惩罚——被拆分成两个公司,但仍然有一些针对公司的诉讼行动,特别是在欧洲。在 IBM 应对反垄断指控的过程中有以下三位经济学家的著作包含其中: Franklin Fisher, James McKie, and Richard Mancke, *IBM and the U. S. Data Processing Industry: An Economic History* (1983)。

^⑩ James Cortada, *The Digital Hand: How Computers Changed the Work of American Manufacturing, Transportation, and Retail Indust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这是关于市场需求方研究的三卷本的第一卷。

微处理器、存储程序以及模块化的计算机也对这些行业经历的高回报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许这三个行业将会随着时间流逝,变成寡头垄断,只关心自己利益,并丧失当前拥有的优势地位。半导体工业已经对国际市场的挑战作出了反应,汲取了教训。从钢铁和汽车的历史还可以获得其他的教训。人们希望它们会这样。

5. 工业布局的国内变化

过去30年中美国制造业广为人知的“转移到阳光地带”大体上是虚构的,那只是当时几次工业进行的引人注目的迁移的结果,那时候中西部和东北部老工业城市遭受了大量的麻烦。事实上,数据表明了,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人口迁移和工业发展的“阳光地带”效应。理查德·麦克肯兹(Richard McKenzie)对地区工业发展的研究表明,当工业增长和布局发生改变,阳光地带的制造业就业上升而严寒地带下降,这并不主要是由于工厂的布局、功能和人口从严寒地带转移的结果。^⑥ 布法罗或芝加哥的一家老企业倒闭并完全迁移到南部、西南部或西部,这样的事件是很少有的。老的严寒地带的企业分布在罗切斯特、纽约、加里、印第安纳之类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对那些工业来说在那个时代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用。尽管一些老工业与人口一起迁移到南部和西部,但就业的增长是新产业发展的结果——不同的需求、技术、交通成本和市场——它们坐落在南部和西部。

老的冶金和工程工业在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成熟起来并成为中西部经济力量的核心,如果有替代产业,它们现在的衰落并没有多大影响。詹姆斯·索尔托(James Soltow)在1984年的著作中,引用了1939年格林·麦克劳林(Glenn McLaughlin)和拉尔夫·沃特金斯(Ralph Watkins)对老钢铁工业资本的研究:

在过去40年发展的重要工业中,并没有新产业在匹兹堡扎根。^⑦

最近几年,有些地区比如匹兹堡,有所恢复,而其他地区如加里,继续衰落下去。在许多案例中,那些成功吸引了新工业的地区都利用了当地的科学工程人才。然而,它们并没有创造出足够的岗位,以曾经的工资水平雇用所有在工厂卖过力的工人。

根据索尔托的研究,在中西部观察到的经济高地被以下因素掩盖了,二战的巨大需求和战后汽车、拖拉机、农用设备、卡车、钢材、机器、推土设备——中西部的面包和黄油工业。然而高地是存在的。当全国的就业总量从1948年至1968年提高了52%,全国制造业就业提高了26%多,而在五大湖区这两个数字仅仅是37%和15%。甚至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比全国平均水平更慢。^⑧ 从1968年到1978年,大湖区制造业的就业实际上下降了1%,而全国则上升了5%。陈旧的技术在老的地区无法创造出新的就业扩张。它们的时代过去了。如索尔托指出的:

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地区经济被一体化为国民经济和国际经济,主要

^⑥ McKenzie (1984), chap. 2.

^⑦ James Soltow, "Management,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Economic Readjustment of the Middle West," *BEH*, 1984, p. 94.

^⑧ *Ibid.*, p. 95.

是通过创建世界最有效率的冶金工程联合企业。

在20世纪60年代,外国竞争加剧,而国内需求只出现了温和增长。以石化和高科技电子为基础的新产业找到了市场——在休斯敦、凤凰城和硅谷等地——不是水路运输、铁矿和煤矿交织的地方。在新英格兰正在衰落的纺织工业被高科技公司取代。

二战期间少数人口涌入,随后其就业增长的结束(至少是暂时的)以及当时郊区化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些对旧的工业城市和城镇来讲,无异于社会灾难。正如索尔托所说,在老的工业烟囱林立的城市相对较高的失业率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技术、教育,以及城市杂乱的生政策未能触及实质问题——工业的就业岗位是产业的其他地方创造的,那里没有在烟囱林立的老地区的优势等着它们。^④

最后,现代法规设计出来固定了工业布局,如20世纪80年代全国就业优先行动在国会上提出,这似乎是个严重的误导。它们仅仅是劝阻企业不要设置在这类法律适用的地方。^⑤这条规定是重商主义的,让人联想到让·巴普蒂斯特·柯尔培尔(Jean 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法国的“经济计划者”,将法国分成不同的工业带,并“稳定”经济的发展。

正如美国经济史的这项研究所强调的,资本流动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试图阻止流动的政策也将会阻止经济增长。从本章对钢铁和汽车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很显然很多禁止工厂倒闭的法律是必要的,使那些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如果它们被冻结在某些地方,并禁止一切进口,那么旧有的岗位可以保住,但要牺牲全体美国民众总体生活水平,这是什么样的代价呢?正如金素洙(Sukko Kim)和其他人指出,长期来看,尤其是在20世纪的后半期,随着要素流动性更强,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消失了。这导致了地区工业结构和人均收入水平的趋同。^⑥国内和国际的流动,是健康经济增长的根本。然而,在这个国家的各州和各城市都有长期的历史,通过暂停税收、补贴和其他贿赂形式转移产业布局。尽管实践是有问题的,但它并不是新的。^⑦

6. 现代农业

尽管(或许是因为)联邦对农业实行了几乎75年的干预和管制,并创立了许多机构来“解决农业问题”,但农业部门似乎被冰封在众多困难中而没有希望了。农业产量和生产率继续提高,大多数农民的家庭收入落在了其他部门生产者的后面,在政府的储存库堆满了剩余产品,正在运行的农场的数量继续减少。图29.4表示了1820—1990年农业人口的数量(总人口的百分比),以及相应的农业产量指数。

在20世纪之初,4580万美国人生活在农村;然而,到了199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

^④ James Soltow, "Management,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Economic Readjustment of the Middle West," *BEH*, 1984, p. 97.

^⑤ McKenzie (1984), chap. 4.

^⑥ Sukko Kim,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Convergence: U. S. Region, 1840—1987,"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8, no. 3, September 1998. 还参见 Kris James Mitchener and Ian McLean, "U. S. Regional Growth and Convergence, 1880—198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9, no. 4, December 1999.

^⑦ Harry Scheiber, "State Law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American Development, 1790—1987," *California Law Review*, January 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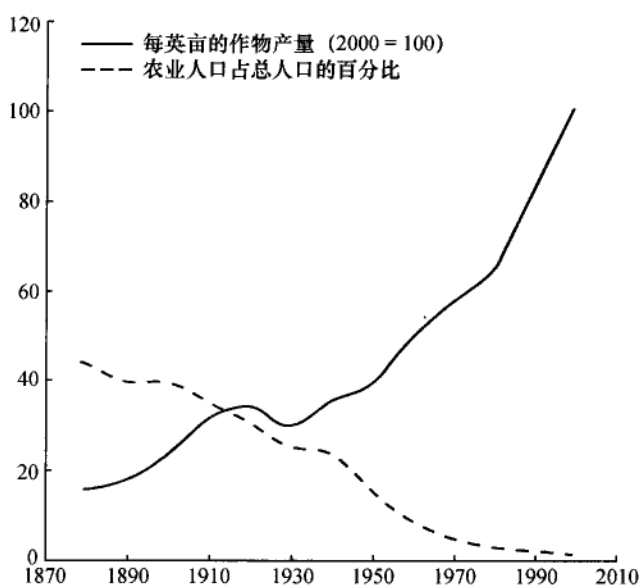


图 29.4 农业人口和农业产出

当上个世纪农业产量飞升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急剧下降。

资料来源:1870—1900, U. 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Statistical Reporting Service, *Gross Farm Income and Indices of Farm Production and Pr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9—1937*, Technical Bulletin No. 703, December 1940;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a 2, 666;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05, table B-99; U. S. Census Bureau, *Census 2000*, table P5.

1/10(460 万),仅仅为美国总人口的 1.8%。^⑧ 随着农业人口和个体农场数量的减少,农业产量无情地提高了。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每小时农业产量是 1950 年的 4 倍。同一时期每个农业工人供养的人口数从 15 人增加到 52 人。在 1920 年,650 万农场供养着 10 570 万美国人,每个农场供养 16.3 人。在 2002 年,每个农场能供养约 135 个美国人,美国人平均要将可支配收入的不到 10% 用于农产品消费——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这个数字还是 25%。而且,美国农民是世界主要农作物最大的出口商:2004 年超过 60% 的世界玉米(黄玉米)出口、超过 40% 的大豆和棉花、26% 的世界小麦出口来自美国。棉花出口,在 1995 年约占世界出口的 1/3,在 1999 年几乎下降了一半。

棉花生产的机械化导致南部农业工人的外迁。正如李·奥斯顿(Lee Alston)和约瑟夫·费瑞(Joseph Ferrie)所认为的,大约同一时期科学进步提高和稳定了产量,并减少了对拥有特定场所农耕知识的劳动力的需求。机械化减少了监督劳动力的成本以及劳动力转换的成本,置换出几百万的工人,到北部和西部寻找工作。失业的威胁维持了那些留下的人的劳动强度。^⑨ 这些技术变迁也改变了工资劳动者,并且使佃农耕作制度衰落下去。第一步是拖拉机的出现(下面讨论)。用拖拉机耕地的能力意味着大量劳动力只需要来播种和收割。第二步是棉花采摘工具的采用,到 20 世纪 60 年代几乎用它收割全

^⑧ 从那以后,联邦政府选举就不再计算仍然生活在农村的美国人的总数。

^⑨ Lee Alston and Joseph Ferrie, *Southern Paternalism and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部丘陵的棉花。^⑩

租佃方面最大的下降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克莱格·海因尼克 (Craig Heinicke) 关于黑人迁徙的研究表明,在这一时期需求的下降至少和供给的下降一样大。他的研究表明种植棉花的亩数在 50 年代有少许增加,然后在 60 年代大约下降了 50%。^⑪

因为农业家庭留在了乡村,南部和北部都这样,所以农业的融合保持了在高耕作率下的面积。到 1997 年,美国农场的平均面积是 434 英亩,在 1920 年则是 147 英亩。500 英亩的和更大的农场(只占全部农场的 18.4%)实际上占全部农地的 79.2%。对当时农业发展来讲,160 英亩的土地太小了,不能满足现代农业的需求。

这个生产奇迹是近几十年来美国农业“工业化”的一个现代成就。新式肥料、除草剂、杀虫剂和更高效机器的应用,带来了劳动小时生产率的非同寻常的增长。这些创新形成的改变见图 2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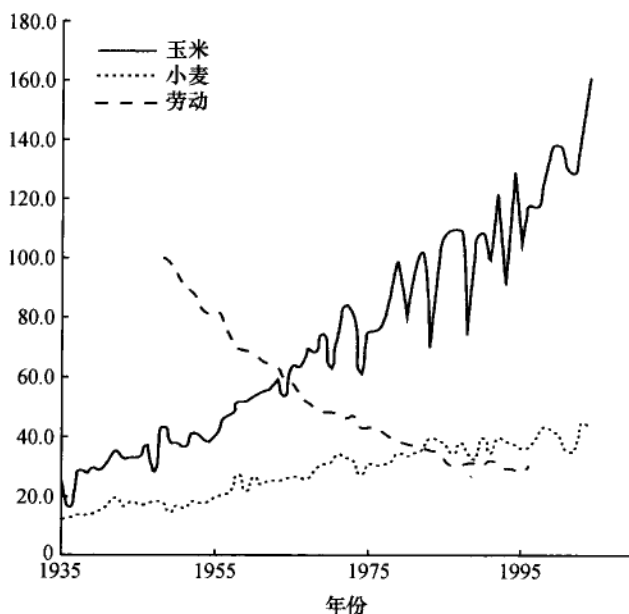


图 29.5 小麦和玉米产量,每英亩劳动时间

现代农业技术已经极大地提高了每英亩小麦和玉米的数量,同时极大地减少了每英亩的劳动投入。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693, 694, 696, 717, 718, 1224;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3, tables 835, 837; 2006, table 826, 828.

本书前面的大量讨论已经强调了机械化在提高农业生产率方面的作用,但生物学的

^⑩ 参见 Alan Olmstead and Paul Rhode, "Hog-Round Marketing, Seed Quality, and Government Policy: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U. S. Cotton Production, 1920—19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3, no. 2, June 2003.

^⑪ Craig Heinicke, "African-American Migration and Mechanized Cotton Harvesting, 1950—196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1, no. 4, October 1994. 还可参见 Wayne Grove and Craig Heinicke, "Better Opportunities or Worse? The Demise of Cotton Harvest Labor, 1949—196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3, no. 3, September 2003.

发明对农业发展也同样重要。^② 对更高产、抗病动植物的寻求是从詹姆斯敦开始的。在20世纪,遗传学和化学的应用加速了这一进程,并开创了二战后的“绿色革命”。最著名的例子是杂交玉米。1908年,卡内基学院的乔治·沙尔(George Shull)应用遗传理论培育出植株自交玉米。十年后,康涅狄格实验基地的爱德华·伊斯特(Edward East)和唐纳德·琼斯(Donald Jones)培育出不同于沙尔单交换杂交的双重交换杂交玉米。最初杂交玉米将自由授粉玉米的产量提高了5%至10%。兹维·格瑞里克斯(Zvi Griliches)对杂交玉米的散播进行了研究,表明散播的依据是其经济优势。^③ 在主要的粮食产区如爱荷华,杂交玉米散播很迅速,大部分农民直到二战时期都种植杂交玉米。其他地区则传播不那么快,但到1959年,农作物中将近95%都是杂交玉米。一个同样重要的例子是消灭牛结核病。1900年,在美国结核病导致了每九人中有一人死亡,而其中10%是由牛类引起的。阿兰·奥姆斯特德(Alan Olmstead)和保罗·罗德(Paul Rhode)估算出到1940年这项成功每年挽救了25 600个人的生命。^④

随着化学肥料的应用产量进一步提高了。到20世纪早期,北部农场的土地肥力开始耗尽。在1910—1940年间,据估计肥料的购买翻番了。在接下来的30年,随着化肥的实际价格下降,化肥的购买量增长了8倍。

基因理论在动物上的应用,20世纪30年代人工授精的发展,和对食品化学的进一步了解,促使家畜产量得到提高。

机械改良仍在继续——没有什么比拖拉机更重要了。早期的汽油拖拉机很大并且主要用于犁耕和耙掘。“公牛”(1913)是第一台小型拖拉机。Fordson(1917),福特汽车公司的产品,是第一个批量生产的小型拖拉机。但这些都远不如McCormick-Deering Farmall(1924)重要,这是第一台多用途拖拉机,能够耕耘正在生长的作物,也能牵引其他设备。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估计拖拉机是人力生产率的3倍并替代了2 400万的役使家畜。^⑤ 与玉米不同,拖拉机传播得相对较慢,但怀特通过研究根据质量调整的价格,得出的结论认为这是合理的,拖拉机的价格在1918—1940年降低了几近一半,然后在技术成熟后稳定下来。^⑥ 在罗伯特·福格尔研究的基础上,怀特估计拖拉机直接带来的社会节约占1954年GDP的8%,如果包括间接效应,特别是普及化肥的能力,实质上要高得多。这个数字比福格尔或费希洛估算的铁路效应要大得多,他们证明内燃机是改变美国农村

^② 参见 Alan L. Olmstead and Paul W. Rhode, “Bi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merica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Governmental Affairs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 April 2000。还参见他们的“The Transformation of Northern Agriculture, 1910—1990,” in Engerman and Gallman (2000)。

^③ Zvi Griliches, “Hybrid Corn: An Exploration of the Economic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Econometrica*, vol. 25, no. 4, October 1957. Griliches 还写了一篇关于拖拉机的类似文章,“The Demand for a Durable Input: Farm Trac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1—1957,” in Arnold Harberger, ed., *The Demand for a Durable Goo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④ Alan Olmstead and Paul Rhode, “An Impossible Undertaking: The Eradication of Bovine Tuberculo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JEH*, September 2004; Alan Olmstead and Paul Rhode, “Tuberculous Cattle Trust: Disease Contagion in an Era of Regulatory Uncertainty,” *JEH*, December 2004。

^⑤ William J. White III, “An Unsung Hero: The Farm Tractor’s Contribution to Twentieth-Century United States Economic Growth,” Ph. D.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00。

^⑥ 奥姆斯特德和罗德认为这个过程是资本替代的一种,拖拉机取代役使动物,并一致认为这是合理的。Alan Olmstead and Paul Rhode, “Reshaping the Landscape: The Impact and Diffusion of the Tractor in American Agriculture, 1910—19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1, no. 3, September 2001。

的一个主要方式。联合收割机(收割加脱粒)是另一个例子,它提醒人们在现代美国发展农业需要的资本数量越来越高。汽车和卡车将农民和市场前所未有地联系得更加紧密。农民最后构成了美国社会的其他部分。在仲夏和晚秋的周六早晨,郊区的“农民市场”开设通勤火车,这样大约150英里外的农民都可以直接将产品卖给消费者。

因为美国农场是私人商业投资,“工业化”已经成为企业组织中常见的美国现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规模经济。美国农业是“有效率”的,它总体上并没有受到外国竞争的威胁,在最基础的水平上,如小麦、玉米、大豆、花生和皮棉的生产。但在国内外农业的融资、产品的加工和处理,以及销售,长期以来都是灵活的联邦政策影响的结果,这就使得人们在其历史,甚至是近期的历史基础上大胆预测它的未来。美国农业成为技术的奇迹,而且现在继续和以前一样,生产的农产品超出了国内消费,在当前或任何可能的收入分配水平下。人民党的万灵药——土地银行、联邦农业抵押贷款、联邦出口补贴、国内免费食品计划以及储备粮贷款,已经无法“解决农业问题”。里根政府再次惶恐地试图将农民及麻烦扔给“自由市场”,但并没有这么做。事实上,1986年开始实施了另一个农业议案,都是价格支持和其他形式的联邦补贴。到1988年,整个联邦农业信用体系面临破产,国会面临着救援的必要,有些人估计将近1000亿美元。

1996年的农业提案表明农业政策方向的一个改变,即农业经营应转向更市场化的办法。它消除了收入支付支持和农业价格之间的联系,并代之以“弹性生产合约”和针对特殊农民群体的一系列年度固定的“转移支付”。^⑦ 这些支付独立于农产品价格和特定的作物生产,这两个变量在1996年之前决定支付的数量。合约要求,在其他事项中,农民必须遵守现存的保护计划和湿地条款,而且土地要保持农业用途。政府不再要求农民必须闲置一些土地或者必须生产一些历史上为了获得支付而种植的作物。并不是所有的都抛弃了。在1998年10月和2000年10月之间,农业产品的低价格导致通过了四项“补充能源辅助计划”,争议继续关于是否应该通过某种形式的收入支持来增加支付。

解决基本农业问题的期望——大量的农产品数量是和低价格乘以数量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问题能够在《旧约全书》中体现——今天也并不比那时候乐观。

推荐阅读

文章

Adams, Walter, and Hans Mueller. "The Steel Industry." In Walter Adams, ed.,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Industry*, 6th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82.

Ault, D. "The Continued Deterioration of the Competitive Ability of the U. S. Steel Industry: The Development of Continuous Casting."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11, March 1973.

Baldwin, Carliss Y., and Kim B. Clark. "Capital-Budgeting Systems and Capabilities Investments in U. S. Companie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⑦ 在之前的5年间的任何时间内,加入小麦、饲料谷物、棉花或水稻计划的农民,都能够加入一个七年合约。

68, no. 1, Spring 1994.

Berlin, Leslie R. "Robert Noyce and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1957—1968."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75, no. 1, Spring 2001.

Bresnahan, Timothy F., and Franco Malerba.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the Evolution of Firms' and Nations' Competitive Capabilities in the World Computer Industry." In David Mowery and Richard Nelson, eds., *Sources of Industrial Leade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Bresnahan, Timothy F., and Daniel Raff. "Intra-Industry Heterogeneity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American Motor Vehicles Industry 1929—1935."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1, no. 2, June 1991.

Campbell-Kelly, Martin. "Not Only Microsoft: The Maturing of the Personal Computer Software Industry, 1982—1995."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75, no. 1, Spring 2001.

Chandler, Alfred D., Jr. "The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of U. S. Industrial Enterprises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68, no. 1, Spring 1994.

Darby, M. R. "The U. S. Productivity Slowdown: A Case of Statistical Myop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4, no. 3, June 1984.

DeVries, Jan. "Is There an Economics Declin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8, no. 1, March 1978.

Easterlin, Richard. "Why Isn't Everyone Develope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1, no. 1, March 1981.

Hall, Bronwyn H.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Investment Horiz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6—1987."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68, no. 1, Spring 1994.

Langlois, Richard, and Paul Robertson. "Explaining Vertical Integration: Lessons from the American Automobile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9, no. 2, June 1989.

Langlois, Richard, and W. Edward Steinmueller. "The Evolution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Worldwid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1947—1996." In David Mowery and Richard Nelson, eds., *Sources of Industrial Leade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Mowery, David C. "The Computer Software Industry." In David Mowery and Richard Nelson, eds., *Sources of Industrial Leade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Olmstead, Alan, and Paul Rhode. "An Impossible Undertaking: The Eradication of Bovine Tuberculo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4, no. 3, September 2004.

———. "Tuberculous Cattle Trust: Disease Contagion in an Era of Regulatory Uncertaint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4, no. 4, December 2004.

Scheiber, Harry N. "State Law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American Development, 1790—1987."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75, no. 1, January 1987.

Soltow, James H. "Management,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Economic Readjustment of the Middle West." In Jeremy Atack, ed., *Business and Economic History*, second series, vol. 12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4).

Thomas, Robert. "Style Change and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During the Roaring Twenties." In Louis Cain and Paul Uselding, eds., *Business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Change*.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3.

Tiffany, Paul A. "The Roots of Decline: Business Government Relations in the American Steel Industry, 1945—19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4, no. 2, June 1984.

Vatter, Harold. "The Closure of Entry in the American Automobile Industry."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o. 4, October 1972.

White, Lawrence.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In Walter Adams, ed.,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Industry*, 6th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82.

书籍

Abbate, Janet. *Inventing the Internet*. Cambridge: MIT Press, 1999.

Adams, Walter, ed.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Industry*, 6th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82.

Alston, Lee, and Joseph Ferrie. *Southern Paternalism and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Economics,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South, 1865—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Bluestone, Barry, and Bennett Harrison.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America: Plant Closings, Community Abandonment, and the Dismantling of Basic Indust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Burns, Arthur F. *Production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70*.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34.

Campbell-Kelly, Martin. *From Airline Reservations to Sonic the Hedgehog: A History of the Software Industry*. Cambridge: MIT Press, 2003.

Crandall, Robert W. *The U. S. Steel Industry in Recurrent Crisi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1.

Fisher, Franklin, James McKie, and Richard Mancke. *IBM and the U. S. Data Processing Industry: 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Praeger, 1983.

Fuchs, Victor. *Changes in the Loc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Kuznets, Simon. *Economic Change*.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54.

Magaziner, Ira C., and Robert B. Reich. *Minding America's Business: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Maxcy, George. *The Multinational Automobile, Indust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McKenzie, Richard B. *Fugitive Industry: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Deindustrializa-*

tion. San Francisco: Pacific Institute, 1984.

Mowery, David C. , and Richard R. Nelson, eds. *Sources of Industrial Leade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hillips, Richard, et al. *Auto Industries of Europe, U. S. and Japan*. Cambridge, MA: Abt Books, 1982.

Rae, John B. *The American Automobile Industry*. Boston: Twayne, 1984.

Reich, Robert. *The Next American Frontier*. New York: Time/Life Books, 1983.

第 30 章

新千年及未来

20 世纪的后 40 年来,即约翰·F. 肯尼迪至乔治·W. 布什当政期间,我们目睹了社会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1961—2001 年间对很多问题的探讨都是在宏观经济普遍发生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并且这一变化所产生的结果在当时还不完全清楚。

1963 年 11 月肯尼迪的遇刺之后,美国共和党制定了能够显著改变经济的政策。在 1961 年沉寂之后又在 2001 年醒来的现代的时代落伍者充满质疑地观察着经济。管理政策似乎并不是草草制定的,不像是过渡时期的偶然。

在 21 世纪之初,艾森豪威尔总统稳定增长的传统只是一个模糊的记忆。令人印象深刻的实际经济增长实现了,进入 90 年代,前些年经济发展中的混乱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积极乐观的态度。预算支出曾被描述为“失控”;在减少预算增加额中提到了“预算削减”。年度联邦财政赤字巨大(在 1967—1997 年间只有 1969 年一年有盈余)。

从各个方面来看,1980 年都代表了近代历史的最低点。通货膨胀达到两位数,接近 14%,而短期利率则超过了 20%,达到战时及和平时期的最高点。货币供给达到 1960 年的 3 倍,国债也一样,达到了 8 500 亿,已接近 10 000 亿的纪录。正如我们看到的,工人的实际收入从 1980 年开始是逐渐下降的。劳动生产率也开始下降。^① 个人储蓄与国民收入之比是发达经济国家中最低的。个人投资停滞不前;事实上,还不到联邦预算的一半。而联邦的支出是 1929 年的 5 倍,并且比 1951 年年末还要多,但 1951 年后开始下滑。城市劳动力的失业率超过 7%。在世纪之交,前景开始变得乐观起来。1980 年后经济水平开始提高。到了 2000 年,通货膨胀率、利息率和失业率都已下降。1998 年盈余有所提高,但由于 2001 年“9·11”事件的影响,还需要若干年才可能再次出现盈余。

1961—1980 年间,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有争议的措施。在 1980 年,这些受到指责的措施显著地降低了工业产品的增长率。^② 指责现在很少听到了,但是这些措施仍然有争议。

1961—1980 年间,东南亚发生了灾难性的战争,一名总统遇刺,其他人员被驱逐出办公室,驻中东的美国使馆遭到袭击,工作人员被扣为人质。在纽约、底特律、芝加哥、洛杉矶以及其他地方爆发了种族冲突、暴乱、纵火和抢劫,举国震惊。犯罪猖獗,很多大城市中心区域的大片地区被焚毁。

在 1980—2001 年间,事情变得平静了许多。美国在长期的扩张之后,经济在 2001 年

^① Richard Freeman,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Labor Market, 1984—1980,” in Martin Feldstein, e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1980), pp. 351—560. 关于近期生产率国际比较的综述文章,参见 Edwin Mansfield, “Technology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同一卷中。

^② 一个例子是 David Packard (惠普公司的董事局主席), “Productivity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Feldstein (1980), pp. 604—616. 还参见 Jonathan Hughes, *The Governmental Habit Redux* (1991), pp. 182—201。

3月开始进入了衰退期,随后出现了9月11日的国际恐怖主义袭击。不祥的预感取代了乐观的心态。之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悲观和乐观景象都是由美国人自身一手驱动的,但是现在我们影响未来的能力却不确定了。

众所周知,美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已经从传统的重工业发生了转移,重工业从1870年到二战期间曾盛行一时。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在被一系列的新兴工业技术如电子、有色金属、新合成剂和合成材料以及大量女性劳动力的注入所改变。给公众带来的好处是更加安全的工作,比以往更加清洁的空气和水,而环境的保护并没有改变经济增长的实质。在80年代早期内政部长遭到强烈的抵制,原因是他的举动看似强调了新美国对生活质量提高的作用,而很多人则认为那使生态系统发生了退化。经过了80年代,各种迹象表明环境退化进一步加剧。1988年炎热的“温室夏天”使美国国内头痛的环境问题更加突出,人们对改变现状的要求比以往越发地强烈,这些基本问题有农作物的枯萎和东海岸海滩上漂浮的危险垃圾。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产生于90年代一系列国际会议,它提出了有步骤地减少环境问题,但是当小布什提出协议“有本质缺陷”的时候,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签署该协议。^③

从肯尼迪政府开始我们试图努力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卡米洛特的财政遗产

使市场从50年代的相对平静转变成相对长的增长模式原因之一是肯尼迪1964年的减税政策。这个戏剧性的方案是在肯尼迪在世时确定的,但却在他的下任林登·约翰逊总统时期才被国会通过。赫伯特·斯泰因(Herbert Stein)是一名现代经济史学者,根据他的想法,他认为减税明显并不是肯尼迪政策制定者的第一选择。^④他们想增加开支。艾森豪威尔当政时期的经济周期低谷一直延续到1961年。肯尼迪政府开始的几个月经济仍然停滞不前,这就是所说的“卡米洛特”,失业率保持在6%—7%,反周期经济政策这一处方是对财政的刺激。有人担心增加开支造成的赤字会引起通货膨胀,这就违背了肯尼迪竞选时的许诺。

肯尼迪本人是财政保守派。正如斯泰因所说,著名的减税措施来源于财政拖延的想法:

……从1957年秋开始的经济滞后主要是个人投资的滞后,[归因于]投资收益的高额税率……^⑤

由于缺乏私人投资,经济可能事实上在充分就业水平上已经产生了过剩。随着经济高涨到完全产能产出水平,消减税收赤字就会消失,或者这一想法那个时候就消失了。如果长期预期是容易引导的,减税就具有一般性意义。它也必须看起来是永久性

^③ 一个次要的环境问题,由含氯氟烃(CFC)排放导致的臭氧层空洞,被证明更加容易处理。在1990年达成的《蒙特利尔条约》规定,世界大部分CFC的排放国要到2000年逐渐停止采用排放CFC气体的生产。

^④ Herbert Stein, *The Fisc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1969), chap. 16.

^⑤ *Ibid.*, p. 398.

的,但这还只是一门我们没有掌握的课程。政府内的反对者希望建立一个积极的支出政策,他们害怕减税会削弱联邦政府的长期税收能力。然而,财政拖延理论者有自己的想法。

期望的回应来自于我们现在所指的供给方——更多的产品和就业刺激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假定消费需求的增加将会引起私人投资的增加。尽管降低了税率,增加国民收入会增加国家税收总量。失业从1960年的5.5%下降到1965年的4.5%。1965年价格上涨率为1.6%,所以经济运行在一个低失业和低通胀的水平上,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政策制定者们认为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有一个平衡,即菲利普斯曲线,但这个平衡点在多数讨论中是不确定的。在未来数十年它将继续影响政策。越南战争的升级成为不祥之兆。卡米洛特和新边疆消失了。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不得和战争一决高低,却失败了。马丁·路德·金曾说:“我们在越南丢下的炸弹最终会在美国城市爆炸!”在约翰逊从华盛顿逃往田纳西之前,美国的城市就被烧毁了。

到1968年年底,支出达到了1700亿美元,比1964年增加了一半。一共花了192年才达到1180亿的预算,4年后就增加了50%,仅10年就又翻了一番。战争又一次“解决”了高失业的问题(见表28.4),至少目前是这样。1967年财政赤字83亿美元,比1958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多了一半,而1960年肯尼迪竞选时这一水平与1958年接近。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林登·约翰逊政府把一大堆问题留给了下届尼克松政府。后者经历了1969年的过剩,之后跌到了财政学家所指的谷底。“美国世纪”看上去即将结束。^⑥

肯尼迪政府的宏观经济遗产——1964年的减税措施,以及在未充分就业时为了充分就业提出的预算政策已被逐渐忘却,除了1980年保守党竞选时为了刺激财政而提出的永久减税观点。当“供给经济”在1981年里根政府实现时,肯尼迪记忆模糊的遗产是有价值的。

2. 调控新潮

60年代注定会被记住,因为联邦对经济的调控从此有了新的开始。随着60年代民权运动的开展,美国在联邦层面的社会政策在30年代之后第一次又被重新提及。^⑦ 杜鲁门为了“公平交易”而努力,但还是输给了国会。加尔布雷思的《丰裕社会》(1958)受到了约翰·肯尼迪的影响,肯尼迪这个活动家带给华盛顿的是,公共支出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提高的需要。这个运动一直持续到尼克松时期。河流和港口开支也不够了。

2.1 新的培育

联邦非市场化调控的本质发生了微妙变化。随着人们对自身生活环境和非生物物理环境的关注,关于生活质量的新观点也出现了。传统的非市场控制,除反托拉斯法案

^⑥ Donald W. White,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World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用当代的视点研究了美国20世纪在世界的地位。

^⑦ Gavin Wright 的经济史协会主席报告, “The Civil Rights Revolution as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9, no. 2, June 1999. 这是一本个人的研究报告,认为这场运动是经济革命也是政治革命。

外,均是由给定的机构制定一个具体工业规范或经济活动领域。州际商务委员会负责交通运输;联邦储备系统负责银行;证监会负责证券业;联邦航空管理局负责航空工业;联邦通信委员会负责通信工业。^⑧ 最大的例外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及其修订案,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有权处理所有违规行为,无论它发生在哪一行业。

从1962年开始出台了《食品和药品修订案》(该修订案极大地增加了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权力)及《空气污染控制法案》(制定了国家空气污染标准),新产生的措施看起来覆盖范围类似《谢尔曼法案》。涉及的监管机构有权力处理任何经济领域发生的所有违法问题。这些新的措施被称为“干涉”,因为它涉及每一个行业,而不仅仅是特定的受管制行业。事实上,所有的工业都被这些法律所规范,包括那些受其他形式的联邦法规管制的行业。默里·韦登鲍姆(Murray Weidenbaum)在他的著作《全球市场下的商业与政府》中提出了不同观点。在新的管制模式下,联邦规制人对他制定的规则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并不负有特别的责任。^⑨ 如果有一个公司由于规制而导致破产,联邦机构对于这个结果不负有法律责任。在具体行业规制中,像州际商务委员会和联邦储备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对企业的生存负责。新的措施打破了旧制度的专制。

1962—1972年间,大多数的干涉性规范都建立了起来。1964年《民权法案》获得通过而成为法律——禁止工作中的种族歧视——由平等就业委员会监督执行。在1965年,《水质法案》要求国家制定标准提高水质。一年后,《公平包装和标签法案》要求生产商在罐头和包装袋上增加产品信息。同年即1966年,通过《儿童保护法案》,以保护儿童免受危险玩具的侵害。还是在1966年,根据《交通安全法案》建立了国家高速公路安全委员会,将底特律对其产品的必备安全工具和健康特性的观念进一步提升和现代化。

1967年《农业公平交易法案》为农产品贸易制定了一系列的强制标准。在那年,《危险品法案》为防火材料制定了新的标准,生产商为了被国内市场接受不得不面对这一法案。根据1968年的《信贷法案》,各种放贷者要处于大量借贷人仔细监督之下,并且放贷人要详细明确地说明借贷条件。

尼克松1968年竞选时并不是联邦非市场调控膨胀开始扭转的时期,尽管他竞选时的花言巧语是自由、平等和反对个人主义,等等。环境问题也得到了特别关注。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案》的基本目标是:保护并提高国家空气质量,以此促进公共健康和福利,提高人口素质。《水污染控制法案》在1972年进行了修订,总目标是:保护并维持国家水资源物理、化学性质及生态的完整性。1973年制定了《濒危物种法案》,目的是“制裁危及物种安全的违法行为,并允许对即将消失的物种采取保护措施”。^⑩ 事实上,1969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案》,也许证明是在过去通过的经济法案中最具有影响的,该法案曾要求新的联邦财政计划提交环境影响报告。

联邦政府在1970年获得国会同意,根据《经济稳定法案》建立一般性的价格和工资管制。《证券投资保护法案》要求证券经纪人保证他们的账户不亏损。与此同时,《国家

⑧ 民用航空委员会,和ICC一样,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它们留下的功能转移到了交通部。它们是现代时期被废止的几个主要联邦机构中的两个。

⑨ Murray Weidenbaum,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1995).

⑩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2月的环境咨文中提出。

《空气质量法案》给环境保护部门权力制定空气污染标准。或许1970年最具影响力的法案是《职业健康和安全法案》，国家同时创建专门负责职业健康和安全的机构并赋予它完全的权力强制执行工作安全标准。^⑩1972年出台《噪音污染控制法案》和《消费产品安全法案》，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负责数以万计产品的安全特性。

2.2 为什么都是管制？

这次管制活动的爆发引入了大量新规范细节上的变化，这可能不完全等同于“新政”。^⑪无论这些变化对经济的实际影响是什么（目前还没有人用任何看起来精确的方法估算过），但其促进作用是足够明确的。由于有自由市场，有市场自身的机制，因此不会也不可能达到立法者满意的生活质量，政府权力被置于广泛的改革服务中。很少有人没被影响，除了那些生活受到不利影响的人，其他人的生活都提高了。这类基本立法，促使了快速的改革和提高，将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国内立法赋予特色并间接影响了尼克松时代。

事实上，刚才提到的法律只是冰山之一角。公共广播和公共电视、联邦表演艺术和人文基金，以及转向更广泛、综合利用联邦土地和公园，是快速转向提高“生活质量”的所有方法。不管怎样这都是美国理想主义的一个例证。用一句艺术术语表示，美国画家玛丽·巴克利称之为“通向杰作的捷径”。

这些变化随着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生活方式解放而突然出现。时间和政治将会证明生活质量运动是否将会在这个国家继续。跟随由瑞典开创，并且已被其他西欧国家采用的道路，美国也开始尝试通过政府权力达到社会完美。传统的美国观点认为国家福利仅仅是通过国家活动提供基本经济安全；但是如果“美好生活”被看做包含美好、舒适、方便和超过个人购买所提供数量的文化，利益集团将会努力实现它们的需求，使这类商品能作为公共物品提供。所有需求都是基于人们愿意被征税，不管是直接还是由于通货膨胀。它可能不利于经济效率，但有利于政客选举。90年代早期，欧洲开始质疑它们的承诺，现在的计划比它们想象的还要昂贵。同样，从90年代开始，美国政客开始注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面临的财政问题。^⑫1990年税率上调，第二年，社会保险部分的税率和上限与医疗保险的分开了。十年之后，最终通过一部法律，将受益年龄从65岁调整到67岁。而两个党派的政客们都意识到了计划的普及性，保守党认为应减少一些看似很受欢迎的计划的补助，比如公共电视和国家艺术基金等。至此，他们都没有足够的选票来逆转这些产品的公共供给。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丰裕社会》中说到，美国的经济淹没在私人商品中，积极、改善性的公共物品极度缺乏。^⑬米夏(E. J. Mishan)的《技术与增长：我们付出的代价》讲到“自然的舒适”比如安静、清新空气和纯净水等是全人类的法定产权，市

^⑩ OSHA的1982年章程包含了大约28000项规则。参见Packard, in Feldstein (1980), p. 610, 是一个实业家对政策结果的估计，在他看来，“政府管制事实上，在美国生产率的下降中，可能是最大和最重要的因素”。

^⑪ 参见Hughes(1991)。

^⑫ 在一项基于OECD成员国的研究中，Lindert认为这类支出“主要根据以下因素来管理——老年人口的相对规模、收入分配、选举条件和收入水平”。Peter Lindert, “What Limits Social Spending?” *EEH*, January 1996.

^⑬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 (1958)。

场经济将其破坏了,对个人的权益没有任何补偿。^⑤ 根据米夏的观点,这种情况即将改善。对于加尔布雷思和米夏的追随者来说,“新的管制”仅仅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对于反对政府增加规制的人来说,新的管制是对个人生活的无端干涉,包括对个人的经济生活。

政治决定产出。在里根总统第一次许诺大规模解除管制后,问题被推到了幕后。事实上,里根就任前已经完成了大部分解除管制的工作。^⑥ 虽然解除管制是他执政纲领中的要点,目的是“使政府不再是人民的负担”,但是这一要点在他的第一届任期内执行的很少,第二期则更少。^⑦ 当时的政府对具体行业规范中基本经济原则的关注远高于对新的侵犯性社会立法的关注。回顾 19 世纪 80 年代的健康与安全规范,吉帕·维斯库斯(Kip Viscusi)列举了里根时期的规则,它们没能通过最简单的成本—收益检验。维斯库斯评价道,改革不仅“从没有实现”,并且它们“从未被尝试过”。^⑧ 里根的信徒成功抵制了银行业、交通运输业特别是航空业“再管制”的要求。

2.3 交通运输部门

1939 年国会第一次收到一份支持建设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的报告,两年后,富兰克林·罗斯福任命一个委员会负责完善这个概念。1944 年国会批准了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包含了“国家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的观点,但由于当时正处于战时,因此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资金。一些州没有必要地封闭公路,只能依靠 18 世纪前人修建的收费公路。1940 年开通的宾夕法尼亚高架桥是这些道路中的第一条,它得到了联邦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帮助及复兴银行的资助。^⑨ 战后的振兴,特别是以机动车为基础的城市化,导致了对新道路的需求。

1956 年州际高速公路法案以国家防御作为前言,授权了 42 500 英里的封闭式高速公路。^⑩ 同时建立了高速公路信托基金作为融资系统。这项工作将由国家完成,它历时 12 年,耗资 250 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负责 90% 的费用。^⑪ 加勒廷的最终梦想是建立一个综合的连接所有州的联邦公路系统。

交通运输部成立于 1968 年,两年后随着《城市轨道交通法案》的通过,美国进入了布鲁斯·西利所说的“基础设施发展的黄金时期”。^⑫ 我们现在关注的“破碎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崎岖的街道和一眼望到头的小桥,这使我们想起在“大萧条”时期对首都的大量原始投入,但现在首都正接近圣经里讲的“一辈子”的极限。

^⑤ E. J. Mishan, *Technology and Growth: The Price We Pay* (New York: Praeger, 1973).

^⑥ Clifford Winston, “Economic Deregulation: Days of Reckoning for Microeconomists,” *JEL*, September 1993.

^⑦ 参见 Paul Joskow 和 Roger Noll 关于“经济管制”的文章,和 William Niskanen 和 Elizabeth Bailey 的评论,见 Martin Feldstein, ed.,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80s* (1994).

^⑧ Kip Viscusi,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 in Feldstein (1994), p. 457.

^⑨ 公路利用了路基并且部分从 William Vanderbilt 铁路凿通了隧道,并且安德鲁·卡内基钢铁公司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成了宾夕法尼亚铁路的潜在竞争者。

^⑩ Mark Rose, *Interstate: Express Highway Politics, 1941—1956* (Lawrence: Regents Press of Kansas, 1979).

^⑪ 1973 年的《联邦资助高速公路法案》允许城区可以对州际公路在城市区域公共交通标记为有争议的地段进行资金交易。

^⑫ Bruce Seely, “A Republic Bound Together,” *Wilson Quarterly*, Winter 1993, p. 35.

整个20世纪60年代,铁路工业遭遇了日益激烈的竞争,进入了衰退期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州际高速公路和喷气式飞机同铁路交通在客运和货运两方面都展开了竞争。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东海岸六家铁路公司倒闭。当它们的货运收入减少,这些铁路公司开始减少维护,因此服务水平下降,更多的业务转向了城际卡车。为了救助东部铁路公路货运,联邦政府于1976年创建了由这六条铁路公司组建的联合铁路公司。^②当1970年政府建立了全美铁路客运公司以后,政府就承担起了城际客运服务的责任。^③州际高速公路体系也被证明是许多中等距离客运的可见竞争对手,而这一类型的客运在几年前都是只选择铁路的,同时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全美铁路客运公司的财政仍然困难。

民用航空于1938年建立起第一套全面系统的航空运输规则。两年以后,民用航空委员会(CAB)从民航管理局(CAA)中分离出去,后者于1958年在航空业的快速发展中更名为联邦航空管理局(FAA)。FAA和CAB在民航业中推行联邦相关的促进和规制措施。

FAA是交通部最早的组成机构之一。它的主要工作是控制领空的使用,制定规则评价机组人员的能力、飞机的适航性和飞机的控制能力(1926年首次建立);以及航空常规运输控制中心、飞机交通控制塔和飞行服务站的运行。^④

CAB参与制定州际线路以及管制商业航班的费用。随着1978年航空业解除管制(企业可以自由地设定费用,发展辐射状交通系统,以及使专属地电脑化,生成管理系统),CAB的作用大幅减少;在1984年,交通部承担了其余的功能。以前调查军用飞机事故的任务是由CAB承担的,现在由交通部的国家交通委员会承担。

截止到20世纪50年代,航空人把航空事业转化为与“宇宙”有关的事业。当对轨道卫星的需求增加后,商业性质的航空发射变得频繁了。这是一个涉及全球的工业,它的运行是由国家政府的力量推动的。20世纪60年代在航空史上是最富戏剧性的时期之一。技术更新率空前地高,但是它减速也相对很快。在越南战争结束和商业性航空业成熟的时候,飞机的产量减少了。它在20世纪80年代的某个时候复苏,但是并未恢复到冷战初期的水平。对于航空运输的需求一直是在增加的,然而,在“9·11”恐怖袭击后,以前很少引起关注的安全问题得到重视。

我们第一个管制具体产业的机构,州际商务委员会,1978年开始被逐渐并入交通部。委员会于1996年1月1日废止了ICC曾保留的部分。

3. 和平时期长时间的通货膨胀

在一个税收削减和新管制实行的时期,也许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和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就是通货膨胀了。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价格的飞速增长正在深深侵蚀各种各样的固

^② Richard Saunders, Jr., *Main Lines: Rebirth of North American Railroads, 1970—2002*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3). 六家铁路是新泽西中心铁路、艾瑞儿·拉克万纳、利哈伊和哈德森河、利哈伊谷、宾州中心和雷丁。联合铁路公司1981年首次披露了利润。1987年,通过首次公开发行联邦政府卖出了在联合铁路的股份。十年后公司被卖给了CSX公司和南诺福克公司。

^③ 联合铁路公司不得不将城际铁路服务提供到80年代早期。

^④ 此外,它还包括对航空、交通管制和航线通信设备的设计、建设、维护、和检查,以及提升航空安全。

定价值——包括不景气的收入、古老的投资业,以及一些长期性的合同。收入和财富都在重新进行分配,改变着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对拿破仑一世发动对英国的战争时发生的通货膨胀的评价也同样适用于现在——那是一段“债务人无情追赶债权人,并且没有任何怜悯地偿还”的时期。

这是一个建立新的债务的时候,可以赌一赌价格是否还会上涨;这并不是一个提倡努力工作和节约等旧式美德的时代。借贷可以轻松获得,这钱可以用来还以前价格和工资都很低的时候的债,但是,那个时候钱的真正价值更大些。

3.1 消费价格和货币供应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之间的这段时间,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普遍上涨,不像 20 世纪 20 年代,那个时期产量一直增加,价格也很稳定,也不像在 20 世纪 50 年代那样。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真实 GDP 是增加的,但价格并没有上涨同样多。当然,消费价格并没有同等程度地增加,但它们确实增加了。

从 1960 年到 1965 年,消费者价格指数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一直以每年 1.3% 的中等速度上升;医疗消费以 2 倍于它的速度上升 (见图 30.1)。在接下来的 5 年中 (1965—1970 年),价格增长幅度超过上个 5 年中通货膨胀率的 2 倍。从 1970 年到 1975 年,价格水平又上涨了 50%,超过 1960—1965 年的 4 倍以上。从 1975 年到 1980 年,增加率以每年平均 8.8% 的速度又一次增长。从 1970 年到 1980 年的十年中,价格水平从 38.8 到 82.4 (1982—1984 = 100) 上涨了不止 2 倍。更加令人吃惊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发生的加速。^⑤ 历史上的恶性通货膨胀——1923 年发生在德国和 1945 年发生在匈牙利——再一次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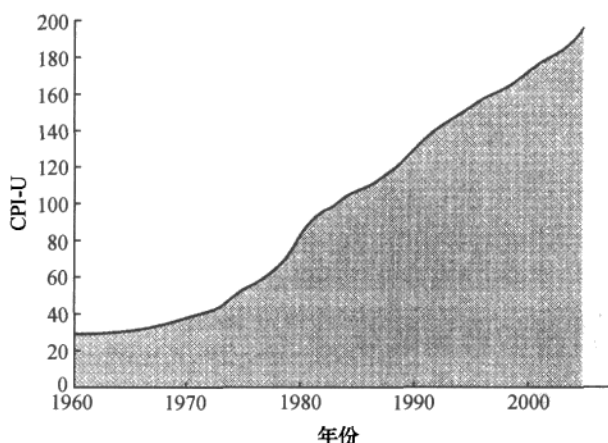


图 30.1 消费者价格 (1982—1984 = 100)

1960 年代后期消费价格加速上升,然后在 1970 年代急速上升,不管哪个政党入主白宫。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c 1;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6, table 706.

^⑤ 斯泰因对 20 年前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家观点,作出了很好的评价:“在我们天真的想法中,无休止的通货膨胀意味着无休止的价格上涨,而不是价格水平提高的比率无休止的上涨。”参见 Feldstein (1980), p. 174。

服务、医疗支出、房屋、食品和燃料等,都在变得越来越贵,虽然服装价格增长得比较缓慢(服装和鞋大量从欧洲南部和亚洲进口)。截止到1973年,OPEC的垄断导致原油价格上涨了至少3倍。原油价格持续上涨,到1980年已经接近40美元一桶(在1973年,一桶还不到4美元)。^② 截止到1980年,除服装以外,所有物价都在1967年以来的2倍以上,燃油和煤炭的价格则不止3倍。1981年CPI指数增加了10.3%,到1982年也在持续增加,虽然看上去有点放慢。在1986年,CPI是109.6(见表30.1,图30.1),尽管比起1982年有所降低,也超过1980年的33%。^③ 截止到1992年,通货膨胀已经降至2.5%到3%之间,并在余下的10年中保持在该水平上。值得庆幸的是,当通货膨胀压力解除时,在事实上回到了1966—1967年的水平,这个时候国家第一次开始为加速的通货膨胀担忧了。这些通货膨胀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表 30.1 1960—2004 年消费价格年变化率

年份	全部	食品	总住房	燃料 油和煤	天然气 和电	服装	医疗	所有 商品
1960—1965	1.3	1.4	1.3	1.2	0.2	0.9	2.6	0.9
1965—1970	4.2	4.0	6.3	3.1	1.5	4.8	7.0	1.5
1970—1975	6.8	8.8	5.7	16.4	9.6	4.5	8.0	7.9
1975—1980	8.8	7.7	13.1	18.8	12.2	5.1	11.5	16.9
1980—1985	5.5	4.0	6.6	2.3	8.4	2.3	10.3	4.5
1985—1990	4.0	4.6	3.6	0.7	0.4	3.4	7.5	3.1
1990—1995	3.1	2.3	2.9	-2.3	1.8	1.3	6.3	2.1
1995—2000	2.5	2.5	2.7	9.4	1.5	-0.4	3.4	1.8
2000—2004	2.4	2.7	2.8	6.2	4.7	-1.8	4.4	0.9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c 1, 8, 21, 26, 28, 32, 41; *Statistical Abstract*, 1992, tables 738, 740; 2006, tables 706, 708.

从长远看来,其他条件不变,通货膨胀是指与产品和服务产量相应的货币供应的增加——过多的钱追逐过少的商品。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把通货膨胀的责任归到OPEC身上是比较流行的做法,它大幅提高原油价格以至于其他商品价格都相应上涨。但是,如果货币的供应量是固定的,消费者就不能花更高的价钱购买所有的商品。OPEC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抬高原油的价格导致所有价格都上涨。^④

1960—1980年间,联邦的财政赤字总量超过3千亿美元。这一数字中,联邦储备体系所持有的联邦债券的增加量超过1千亿美元。联邦政府用自己的需求负债来为债券买单,商业银行通过借贷可使货币翻倍增加,增幅超过5千亿美元,即产生“高能”货币。^⑤

^② 这样高价格的结果是市场上原油过剩,到1981年夏,OPEC公布的价格下降到32美元一桶。1982年,石油过剩继续,到1988年秋石油价格慢慢下跌到14美元一桶。OPEC依然尽力限制原油产量,以期获得更高的价格。

^③ 读者应该会想起,CPI委员会相信官方的CPI数字有将近1.1%的偏离。见第28章的脚注67。

^④ 关于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调整为“供给冲击”、石油价格和农业短缺的分析,参见Robert Gordon, “Alternative Responses to External Supply Shock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 6, no. 1, 1975.

^⑤ 一般认为现金储备需要20%或者更少。

从1960年到1980年, M_1 事实上增加了2820亿美元(见表30.2), 增加了3.2倍, 当时的一般价格上涨水平是2.8。因此, 用“货币主义”解释, 联邦赤字财政引起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足以解释通货膨胀的发生。货币供应的增加率一直被认为是通货膨胀趋势的指示器。比如, 截止到1986年, CPI比1980年上涨33%, 而 M_1 上涨了76%。截止到1994年, CPI比1989年高出20%, 同时 M_1 上涨了45%。经济扩张真实产出的能力——吸收了一部分增加的货币供应——使价格一直跟货币供给量一样快速上升。正如威廉·普勒(William Poole)所说, 以菲利普斯曲线为基础的政策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虽然对经济的忽略可能是一张失败的处方, 但是遵循主流经济学的建议也很难保证成功。美联储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遵循了主流建议, 但也被明确认为正是这些建议制造了大通胀。”^⑩

表 30.2 1960—2004 年的股票价格 (由月平均数而来的年平均数)

年份	道·琼斯 30种工业 股票	债券收入			AAA	M_1 (十亿美元)
		标准普尔 500种 普通股票	标准普尔			
			美国政府 长期债券 (10年)	高评级 市政		
1960	615.9	58.1	4.0	3.3	4.4	140.3
1965	969.3	92.4	4.2	3.2	4.5	163.5
1970	838.9	92.2	6.6	6.1	8.0	209.1
1975	852.4	90.2	7.0	6.4	8.8	281.4
1980	964.0	135.8	10.8	7.9	11.9	395.7
1985	1546.7	211.3	10.8	8.6	11.4	587.0
1990	2633.7	330.2	8.7	7.0	9.3	811.1
1995	5177.1	615.9	6.9	5.8	7.6	1143.1
2000	10786.9	1320.3	6.0	5.8	7.6	1087.0
2004	10783.1	1211.9	4.3	4.7	5.6	1367.0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Cj 84, 800, 804, 1192, 1193, 1196;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6, tables 1182, 1184, 1193.

3.2 价格通货膨胀过程

图30.1显示了通货膨胀的过程。越南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加速; 第二次加速开始于1972年, 理查德·尼克松那注定倒霉的实施价格控制的尝试之后。到那时为止, 美国民众就学会了与通货膨胀预期共存, 并且他们越成功, 通货膨胀就越严重。人们的想法是用掉纸币换来实物资产, 任何具有市场价值的实物都可能比通胀上涨更快——实物资产和商品投资获得了特殊青睐。

越南战争开始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战争”。直到1968年夏天, 政府只能通过提高税收来弥补战争支出。我们深信, 我们能够在越南打仗, 那同时是一场“对贫困的战争”。但是联邦储备机构一系列货币紧缩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的手段都太弱太迟了。

^⑩ William Poole, “A Monetary History from a Policymaker’s Perspective,” *Cato Journal*, vol. 23, no. 3, Winter 2004, p. 362.

美国仍然有义务以一个较低的官方价格(20世纪60年代是35美元/盎司)向外国中央银行出售黄金。1968年,国家取消了美联储的“黄金准备金”责任,国内货币供给完全可以自由决定,就像经济学家们习惯称呼的那样。国内使用黄金作为货币的时代过去了,但外国的中央银行还能够并仍在用它们手中的美元向美联储兑换黄金。由于它们的通胀率远远低于美国,所以它们美元相对黄金的实际价值降低了。结果,美国持有的外国交易资产令人担忧地下降了;在1968—1971年间它们减少了将近30%。^②

法国人看出了不祥之兆,退出了布雷顿森林协定并开始在1965年将持有的美元转换成了法郎——正如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做的那样,损害了金汇兑本位制。到那时候美国国际收支账户出现了严重的赤字,美元失控地涌入了世界支出大潮中。因此,在1971年的8月15日,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单边终止了美国在国家金融领域的义务。现在美国黄金的官方价格是高昂的市场价格,而不是固定的“官方”价格(在中央银行的汇划结算款项总额中已经从35美元/盎司上涨到42美元/盎司)。

在那一点,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不再挂钩。这一体系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很好的服务,持续了近26年——这是这样一个机构的巨大成功。然而,甚至它都没有抵挡住当时的“发现金矿”喷发——即美联储需求债务“高能货币”的巨额扩张;到1980年,金价达到了850美元/盎司。这个价格是世界大量公认的对美元的不信任。当针对美元的投机结束后,金价崩溃了。在里根执政时期,作为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再次)稳定汇率的条件,利率再次被提高,但它并未到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新的机构做法是它们的产物,继续调节贸易和支付中仍存在的问题,为世界经济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③ 它们是基础块体,在其基础上二战后几十年中其他所有的机构仍然存在。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这两个机构方面找到议会和国会都能通过的折中方案上,有一段艰难的时光。在大西洋两岸有太多的既得利益都是根据凯恩斯的思想而采纳的。最终的形式是(现在仍然是),如凯恩斯当时的名言:“(世界)银行是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家(世界)银行。”^④

与此同时,尼克松政府也决定对通胀“做点什么”,任何除了明显的事——停止赤字支出和持续借贷。针对总统在1970年的《经济稳定法案》,一项反对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用收更多税的办法给战争融资将很不流行了,而支出在飞涨,怎么办呢?新的法律是:“总统可以得到授权,当他认为适当应该稳定价格、租金和工资的时候,他可以发布这样的规定和制度。”什么是他真正认为应该的呢?工资和价格管制,试图向世界表明美国正在对通货膨胀“做”了些什么,以便他们停止用美元兑换黄金,也在1971年8月15日提出来了。这是老调重弹,政府部门、委员会、权力部门和办公室回到了一战的统制经济。它没有用;它实际上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发挥作用——仅仅是赢得了一点时间。当管制撤销时,通货膨胀率恶化了。1972年,经济顾问委员会声称通胀已近结束。^⑤ 1976年,他们又这么说。通货膨胀继续发展着,就好像这些预言并不是专业机构作出的。

^② *Statistical Abstract*, 1979, p. 847.

^③ Anne O. Krueger, “Whither the World Bank and IMF?” *JEL*, December 1998.

^④ 世行和IMF的当今作用的一个选择性述评,可参见 Krueger (1998)。

^⑤ Carl Christ, “The 1972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AER*, September 1973.

3.3 通货膨胀和股票市场

一个有趣的附带情况是大部分流行的金融工具都未能分享收益。传统的智慧是,而且一直是,在通货膨胀预期中普通股票价格将会上升,提前“贴现”。经济学教授们哄骗了一代代学生相信这个道理。在20世纪70年代以此信条为生的任何人都失去了一切。普通股票剧烈波动,间或将道·琼斯30种工业平均指数推上不可思议的1000点以上,然后又回落下来。然而,这个指数在过去大部分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81年早期,始终保持在850~1000点的范围内。到1982年早期道·琼斯工业指数下降到了800点。然后在1982年秋,道·琼斯工业指数再次超过了1000点,在1979年开始的货币供给增长率下降之后,最终引起了1982年的衰退,到1987年达到了2700多点的峰值。

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时候,普通股票价格分享了新的价格膨胀,但越南战争的成本,和国内“与贫困的战争”,增加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论据;毫无希望。令人担心的是工会会无情地推动工资增加到生产率上涨之上,企业将会尽力将增加的成本转移给消费者。这样的想法使得投资者转向实际资产而远离传统的金融投资。随着通货膨胀的继续,利率上升,平均债券价格下降。尽管1960年以后股票价格和房地产投资一样受欢迎,但到1982年道·琼斯工业指数一直被推上了2000点。相反,到1982年6月又无可挽回了,降到了1965年的水平。注意表30.2中, M_1 在1965—1980年间出现了巨大的增长,而股票价格毫无进展。然后重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情况。

事实表明由预言家预测诸如股票市场的平均价格这类事情是无用的。在20世纪20年代,似乎美国人对美国经济的未来抱有绝对的信心;30年代的萧条却接踵而至。在60和70年代,至于金融市场,其未来似乎更令人沮丧。然而,经济继续总体增长,尽管有通货膨胀。1982年的衰退之后,大量的联邦政府赤字和货币供给增长,以及空前的外国在美国投资,事实上支撑着一个衰弱的私人经济。股票市场急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增长中段,一个不和谐的插曲发生了——股票市场于1987年10月19日彻底垮了。在70和80年代早期基本上无路可走之后,股票市场在1983年之后“明显好转”,此时通货膨胀率和利率下降了。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价格指数在1982年的约880点开始上升,到1986年达到了2000点。然后开始高涨,到1987年8月27日,达到了2746点的高位。然后慢慢下降直到10月19日——毫无预警地——在一个交易日下跌了令人震惊的508点。接下来有所反弹,指数在下一年一直在1900点~2100点之间波动。据估计大约有1万亿的财富被蒸发,超过了1987年GDP的1/5。

经济学家惊叹是否1988年会和1930年一样。如果1929年之后负的“财富效应”对随后的大萧条具有很大影响,历史会重演吗?1988年,至少还不会。指数于1991年超越了3000点大关,并继续高涨进入了新的世纪。^⑤

^⑤ 在第5版写作期间,1997年早期,道·琼斯平均指数已经接近7000点。当2002年早期第6版写作的时候,道·琼斯平均指数刚好站上了10000点,尽管连续两年道·琼斯平均指数都在下跌。当本版在2006年早期写作的时候,道·琼斯指数已经站上了11000点。

3.4 通货膨胀和储贷危机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储蓄机构例如信用储蓄社(S&L)开始与商业银行进行激烈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两项美联储规定为银行设置了困难——禁止对支票账户支付利息以及Q条例,这限制了存折储蓄账户的利息支付。前者使得商业银行的客户将资金转移到了商业票据市场,并且反过来这意味着商业银行更加积极地寻求消费账户。在这个市场上,它们受到Q条例的约束,并且到1966年一项国会法案允许S&L和其他储蓄机构支付比商业银行高半个百分点的利率。^⑤在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早期,当通货膨胀引起利率上升时,新的替代办法又开始出现了。设立于1972年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给消费者支付了更高的利息,并且对支票账户也具有相似的特征。S&L和其他储蓄机构设立了类似于支票的账户(“可转让提款指令”账户),对其支付利息。商业银行推出了自动转账服务,因此储户能够在有息账户中存钱,当需要的时候再转到支票账户。当通货膨胀将利率推高时,非传统的资源变得更加流行了。存款移出了银行和S&L,这个过程被称为脱媒。

这对S&L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它们的历史资本金是长期的、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在这些资本金上获得的收益比为了吸引现金存款必须支付的利率要低一些。规定利率上限是希望缩小不平衡,但只是导致了更大的脱媒化。进一步,由于商业银行受到限制对储蓄和支票账户都支付较低的利率,银行开始抱怨管制者与S&L的不公平竞争。甚至在《联邦储备法案》中规定,美联储的会员银行资金存在美联储也有6%的利率限制,这被证明对许多银行是限制性的约束。州银行开始从这个制度中退出;一些国家级银行又转变回了州注册的银行,然后也退出了。美联储开始担心实施货币政策的能力,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当临近80年代的时候,即将采取完全不同的货币政策。

到1980年,金融市场的无序结合“能源危机”将几家主要的商业银行陷入了危险之中。在几个最声名狼藉的事件中,佩恩广场国家银行(俄克拉荷马州)倒闭了,伊利诺伊大陆国家银行垮掉了。^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国会通过了两条法规,1980年的《存款机构解除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1982年的《甘恩—圣哲曼储蓄机构法案》。前者规定所有的储蓄机构都将面向同等的准备金要求,并且由美联储设定。^⑦准许商业银行提供其他储蓄机构那样有息的类似支票账户,但是后来,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的禁令被废除了。到1984年Q条例平等适用于所有机构,到1986年3月末废除了。简言之,在商业银行和S&L之间几乎没什么不同。后一个法案赋予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委员会(FHLBB)资格,将倒闭的和有麻烦的S&L合并到更健康的机构之中,不顾及机构的类型,进一步模糊了它们之间的差别。所有机构都允许发展货币市场存款账户,以便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进行竞争,并且做得很成功。

在1982年通货膨胀率和利率仍然很高,但货币政策的新方法使经济陷入衰退之中。

^⑤ 1975年减少到0.25个百分点。参见Gene Smiley,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incinnati, OH: South-Western, 1994)。

^⑥ 参见Benjamin Klebaner, *American Commercial Banking: A History* (Boston: Twayne, 1990), chap. 20。

^⑦ 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委员会负责S&L。

与1974—1975年的衰退相同的是,这次提高了失败和受到威胁的机构的数量。甚至当经济恢复时,由于净值比前一个十年缩水,许多S&L仍处于悲惨境地。1987年,审计总署宣布FHLBB的一个部门联邦储蓄和贷款保险公司(FSLIC)破产。^④1989年的《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执行法案》废除了FHLBB和FSLIC,并且赋予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最初的管理清债信托公司的责任,由这个机构负责拯救储蓄机构。紧急救助实际最终的现行估值接近1600亿美元,这个数字比刚开始估计的略低。一个国家调查团估计在1983年花费了250亿美元关闭破产的机构,这个数字大致相当于FSLIC在1982年年末时资产的4倍。^⑤现在回顾一下,250亿美元还是很便宜的。^⑥

在国家层面上,保持一个健康的商业银行部门的压力导致弱化了银行分行的历史性反对意见。联邦政府还放松了对州之间银行分行的管制。结果是戏剧性的。传统的独立的(单一制)银行让位给了银行控股公司,而後者的出现最初是为了应对20世纪50年代S&L与其他储蓄机构的竞争。到1971年的时候,当1/3的州仍然对银行分行设置限制,而另外1/3(特别是在中西部)仍然一股脑禁止设分行的时候,美国有12063家单一制银行,153多家银行控股公司,和1450家单银行控股公司。这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单一制银行数量的减少和两类控股公司数量的增加。接下来的20年中这种趋势加速了。1991年,当每个州都允许某种形式的银行分行的时候,单一制银行的数量下降到了3068个,而控股公司数量急剧上升(2025家多银行控股公司和5463家单银行控股公司)。^⑦这种多元—单一形式最有可能被那些仍然保持分行限制的州所采用,因为它的本质,是银行分行的另一种选择。商业银行业渡过了70和80年代的混乱,很大部分原因是控股公司能够吸收更弱小的储蓄机构。结果,商业银行业今天看起来与长期通货膨胀初始之时已经大不相同了。结果是持续到现在的公司合并,特别是1994年以来几部联邦法允许州之间设立分支机构;银行控股公司被允许在任何州购并银行。^⑧1999年随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终止,这些跨州的金融机构再一次合并了银行和证券业务。^⑨

3.5 GDP、真实收入和真实工资

随着20世纪70年代更高的通货膨胀率的开始,“国家的数字”开始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量变。1979年5万美元一年的“真实”工资水平比1960年的2万美元一年更高吗?美国人更穷了还是更富了?在某种意义上的秩序上保持各种关系是有帮助的。

^④ 关于这次灾难有大量文献,例如,Edward J. Kane, *The S&L Insurance Mess: How Did It Happen?*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Press, 1989)。

^⑤ 国家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执行委员会: *Origins and Causes of the S&L Debacle: A Blueprint for Reform: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⑥ 参见美国审计总署, *Financial Audit: 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s 1995 and 1994 Financial Statements* (1996)。

^⑦ James Eliot Mas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5—1991* (New York: Garland, 1997)。

^⑧ Eugene N. White, “Banking and Fina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Stanley Engerman and Robert Gallm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III: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这是对金融机构整体全景的一项有用研究。

^⑨ 正式地,1999年的《格雷姆—里奇—比利雷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消除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施加的限制。银行用了66年的时间才解除了随着大萧条到来而被施加的束缚。

1970年,美国GDP超过了1万亿美元。达到这个水平花费了363年(从詹姆斯敦定居点开始)。2万亿美元在7年之后的1977年达到。这没什么好庆祝的,因为几乎1/3的增长是单纯的价格通胀。

美国的许多工资收入者都想办法跑赢通货膨胀;这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注意表30.3,总体来看,真实GDP的总量(以2000年价格计算)持续增加到198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是如此。^④然而,就平均工资收入而言(农业除外),真实经济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尽管工人的货币收入从1970年到1980年提高了几乎一半,但他们没有再次赢得购买力。

表 30.3 1960—2005 年 GDP、收入和工资

年份	GDP 总量		人均个人 可支配收入		非农业的 平均周工资	
	当前 美元	2000 年 美元	当前 美元	2000 年 美元	当前 美元	1982 年 美元
1960	526.4	2 501.8	2 022.0	9 735.0		
1965	719.1	3 191.1	2 563.0	11 594.0	101.5	310.5
1970	1 038.5	3 771.9	3 587.0	13 563.0	125.8	312.9
1975	1 638.3	4 311.2	5 498.0	15 291.0	170.3	305.2
1980	2 789.5	5 161.7	8 822.0	16 940.0	240.8	281.3
1985	4 220.3	6 053.7	13 037.0	19 476.0	304.7	276.2
1990	5 803.1	7 112.5	17 131.0	21 281.0	349.3	262.4
1995	7 397.7	8 031.7	20 287.0	22 153.0	399.5	258.4
2000	9 817.0	9 817.0	25 472.0	25 472.0	480.4	275.6
2005	12 479.4	11 131.1	30 429.0	27 340.0	543.6	275.8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Aa 9, Ca 9, 10, 68;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IPA Tables, tables 1.1.5, 1.1.6, 2.1;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urrent Employment Statistics*, series CEU0500000004 and CEU0500000051.

真实GDP一直增长到1982年,那年才开始缓慢下降。人均个人可支配收入实际值(2000年为100)持续增加,但增长率放缓了。在1960—1973年间每年增长率约为3.4%,但从1974年到1979年每年增长率只有1.7%。到1980年,增长几乎停滞了。在1970—1980年间,人均真实可支配收入总体增长了25%(在1960—1970年,增长率是39%)。那些仍然生活在1980年以前的规则中的人们看到他们的收益被通货膨胀停止了,而且当然,许多人的收入不再领先于通胀了。真实周工资(用1982年价格衡量)在1973年后下降了。到1980年,平均周工资只有1970年水平的90%。1983—1984年开始了缓慢的复苏,但复苏几乎不能消除由通货膨胀一夜之间造成的十年的损失。无论如何,真实工资的复苏在1984年之后蹒跚而来了——当然,名义周工资每年都是上升的。有一些真正的收益,但令人担心的是随着一个又一个行业因国外竞争和失业增加而相继陷入麻烦(见表28.4),收益将会停止。

^④ 整个70年代,真实GDP的年增长率维持在2.5%的水平。作为作者之一的内森·罗森伯格观察到,因为生产率几乎没有提高,因此增长主要应归功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

参见图 30.2 到图 30.4。图 30.2 表示的是 1940 年以来以 10 亿美元为单位的联邦负债。图表明了二战后债务的增加,在 60 和 70 年代早期名义量上相对平稳的债务水平,70 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迅速增长。人们可能会预期到 70 年代大部分的增长都是由于通货膨胀。图 30.3 表明了由消费者价格指数表示的较少的债务。从 50 年代到 80 年代债务水平相对稳定,而 1980 年以后也开始快速增长。这两个图都是以绝对数字为基础的。图 30.4 说明的是总的联邦债务与 GDP 的比率。它也表明这个比率一直下降到 80 年代。也是从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增加,世纪之交有所下降,但又回到了 90 年代中期的水平,一直保持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水平。这样,70 年代恶性通货膨胀的肆虐并没有“使国家破产”。事实上,从 60 年代自始至终债务的巨大增长,通货膨胀推高了工资和物价,因此联邦债务占 GDP 的比率还有所下降。正是私人债务出现了急剧增长,从 1960 年的占 GDP 的 82.9% 上升到 1978 年的 102.6%。^⑦ 企业和个人都学着“与通胀共存”,更加依赖信用,借入现款,他们知道他们将用“更便宜”的美元偿还。每年,货币都比前一年“更不值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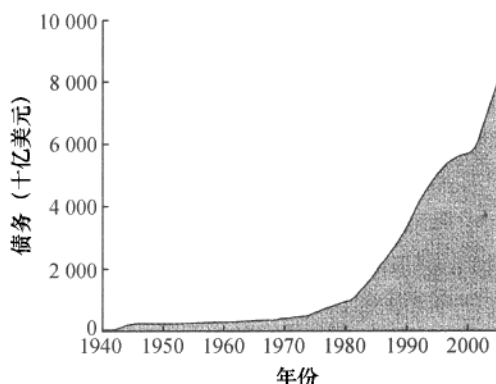


图 30.2 1940—2005 年联邦负债总量

资料来源: Budget of the U. S. Government, Historical Tables, Fiscal Year 2007, table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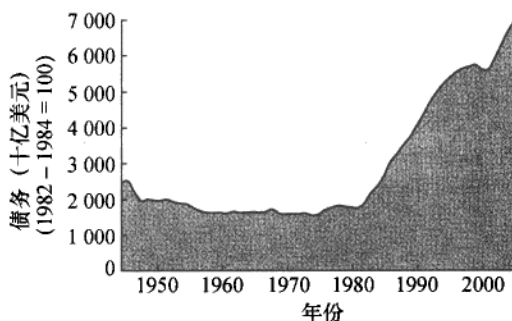


图 30.3 1945—2005 年联邦真实负债总量

资料来源: Budget of the U. S. Government, Historical Tables, Fiscal Year 2007, table 7.1.

^⑦ Benjamin Friedman, “Postwar Changes in the American Financial Markets,” in Feldstein (1980), pp. 16—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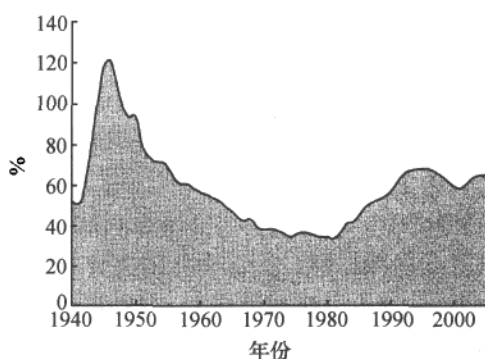


图 30.4 联邦总负债占 GDP 的比率, 1940—2005 年

资料来源: Budget of the U. S. Government, Historical Tables, Fiscal Year 2007, table 7.1.

在越南战争的准备过程中,失业率下降到了充分就业水平上。正如林登·约翰逊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大会所讲的:“你从未像现在这样好。”在70年代,当增长放缓时,失业率上升了。在衰退的1975年,失业率达到8%以上,之后下降,然后在1980年再次上升到了7%以上。放慢的增长、攀升的失业率、产业困境、加速的通货膨胀、高利息率——这些以及更多的问题轮番成为民主党在1980年选举中的选举灾难。到1982年,货币增长放慢的两年以后,通货膨胀率更低了,但利率仍然很高。年失业率几乎达到了10%,经济遭遇了严重的衰退。随着经济的复苏,失业率下降,到1988年接近5%,与其历史高点比较已经非常低了。90年代以轰动的衰退开始,衰退是由于当年两党支持通过了增税政策。1991年增税停止了,但继而出现的增长还是极其缓慢的——如此之慢以至于虽然这一低谷出现于1991年7月,1992年选举运动中公众仍然关注着经济运行的不良状况。

70年代末和80年代早期相对较高的失业率掩盖了整个美国劳工状况的一些显著变化。在1970—1985年间,人口大约增长了16%,但劳动力增长了2倍以上(39.5%),失业率也是如此(约36%)。到1985年劳动力的参与率是令人惊奇的64.8%,实际高于二战时期,一直增加到2000年,达到了67.1%。在过去的几年中只下降了约1个百分点。尽管还有其他的麻烦,但美国经济在15年中创造了2850万个新工作岗位。⁴⁸ 随着1982年以来复苏的持续,创造新工作的数量在持续增加。整个漫长和平时期存在通货膨胀,但经济在持续增长,尽管处处有短暂的反复。

在1990—2004年间,人口增长率再次达到了18%左右。劳动力和就业都以相同的比率增长,但这次大大小于前15年时期的增长。结果,失业率在1990年为5.6%,在2004年仍旧为5.5%。⁴⁹

当真实收入与名义收入的关系越来越小,利率在媒体上开始按照真实和名义量来计算。与价格增长相对应的利息率是多少?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10%已经是可怕的高利率了,但到1979—1980年,10%的名义利率实际上是负的真实利率。人们以前所未有的

⁴⁸ 2850万几乎等于加拿大的全部人口;比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加起来的人口还要多。

⁴⁹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6, table 576.

规模购买资产,以在未来得到支付。1979 年房地产市场就像 1929 年的股市一样繁荣。

3.6 双份收入的家庭

关于双份收入家庭的美国人生活的复杂结果有很多描述,这种家庭的大量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抗通胀的斗争造成的。女性平等权的需求,家庭生活的改变,日托中心需求的增长,僵化和“快餐”式的工业的变革——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女性外出工作的比例更高了,正如我们在第 28 章所讨论的那样。

当生产率在 70 年代不能维持历史增长的时候,额外的投入,特别是女性额外劳动力投入,推动了总产出的增长。总的民用劳动力从 1960 年的 7200 万人增加到了 1980 年的 10500 万人,20 年中增加了约 46%。更特别的是,在劳动力大军中 1960 年有 2300 万女性而 1980 年有 4500 万女性,增长率超过 90%。1960—1980 年在增加的 3300 万工人中,大约有 2200 万,总增长量的 2/3 是女性。到 1999 年,劳动力人口是 13940 万,约 13350 万人就业,其中有 6490 万人,总量的 46.6% 是女性。

总的消费数据也反映了这些改变。1990 年消费支出中用于食物支出的比例比 1960 年更小,1993 年是 15%,1960 年是 27%,下降了 2/5 多。单纯的恩格尔法则不能解释这么大的下降。令一些经济学家惊奇的是,在 1960—1993 年间用于衣着支出的比例的下降,从 9.9% 下降到 5.4%。这部分反映了衣着价格未能与通货膨胀并驾齐驱增长。它完整反映了这样一个世界,为了应对通胀的袭击,双份收入的家庭变得越来越常见。然而,最后,经济增长的力量抵消了停滞的力量,但并不是个容易的旅程。

4. 滞涨和“供给”经济学

到 1976 年,已经很清楚的是,持续通胀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持续增长的赤字;其他方面,滞涨(stagflation),也是原因。滞涨这个词是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结合,经济停滞来自于开始困扰经济的攀升的失业率,通货膨胀是持续不减弱的。1975 年失业率上升到 8.5%,然后在选举年下降到 7.7%。1979 年低至 5.9%,然后在下一年又上升到 7.2%。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持续提高,从 1976 年的 5.8% 上升到 1980 年的 13.5%。

1976 年的总统选举强调了用总需求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抗通胀的努力。石油价格上涨与俄罗斯的歉收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次“供给冲击”,打击了美国经济。不断增长的失业和通货膨胀是由总供给曲线的左移引起的。应对这种移动的任何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会带来一个变量的改善,但会恶化另一个变量。在 1976 年的选举中,选举人被迫选择了许多人认为的两个灾祸中的更坏者。共和党人认为通货膨胀是个更严重的问题。他们建议能“现在就赶走通货膨胀”的限制性政策,就像福特总统获胜真谛所体现的那样。他们承认这将会提高失业率,但他们认为受损者将会得到补偿。民主党则持相反主张。对他们来说,失业率是更严重的问题,他们建议的财政政策会提高通货膨胀率,但他们认为受损者会得到补偿。

4.1 能源行业

对经济的供给冲击是由于石油行业的巨变引起的。国内原油产量在 1950 年大约是

20 亿桶,1960 年是 25 亿桶。1970 年上升到了 35 亿桶,然后在 70 年代停滞了,直到废除 70 年代早期遗留的价格管制。国内产量在 1972 年下降到 32 亿桶,16 年以后仍然为 33 亿桶。但是这有区别。石油生产者国际卡特尔 OPEC 在 60 年代晚期发现自己位于一个独特的关键位置上,于是将原油价格提高了 3 倍以上。通过削减产量,分三步将石油价格螺旋推升;价格保持在每一步之间。^⑤ 结果是 70 年代石油价格达到了 40 美元一桶以及美国的“能源危机”。到 80 年代早期当出现北海石油新竞争的时候 OPEC 失去了它的内聚力。到 1988 年,石油价格下降到不到 14 美元一桶,跌回到了可以想象的 OPEC 没有施展力量的时候的水平。其间,发生了应对能源保护的剧烈调整。耗油一加仑行驶里程更多的汽车盛行。一些电力工厂改回使用煤,但是对烧煤工厂诸如硫排放等的环境约束限制了这种选择。尽管煤的成本更低,但美国还是选择烧油,为能源支出更多,并享受着更清洁的空气。它还更多地依赖天然气。对消费者有利的,事实上对国内的汽油生产商是有害的;在美国的石油行业 80 年代是艰难的岁月。

表 30.4 显示的是美国能源生产所发生的情况。从 1970 年开始,由原油生产的能源的百分比与由天然气生产的能源百分比相比,下降程度为后者的两倍。煤炭、核能和可再生能源(水力发电、地热和生物燃料)都在增长。核动力增长 28 倍发生在 1990 年以前,当时关于技术的安全问题展开了积极的政治讨论。由于能源的三种主要来源占了 2003 年能源生产的 3/4 多,而且它们都是不可再生能源,因此显然核电厂将继续作为能源生产的重要部分,直到可替代技术被证明可行的那一天。

表 30.4 1960—2003 年能源产量

	总产量	百分比					
		原油	天然气	煤	核能	可再生能源	其他
1960	42.8	34.9	29.6	25.3	—	6.8	3.4
1970	63.5	32.1	34.1	23.0	0.4	6.4	3.9
1980	67.2	27.1	29.6	27.7	4.1	8.2	3.3
1990	70.7	22.0	25.9	31.8	8.6	8.7	3.0
2000	71.2	17.4	27.6	31.8	11.0	8.6	3.6
2003	70.5	17.2	27.9	31.7	11.3	8.7	3.2

注:总产量单位是千万亿英国热量单位;其他数据是总产量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Db 157—163;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6, table 888.

20 世纪 70 年代的“能源危机”部分原因是持续的经济扩张,而国内能源供应基础相当不景气。在 1960—2003 年间,能源使用提高了 124%,从 43.8 千兆上升到 98.2 千兆个英国热能单位。正如生产数据表明的,这个增长部分是由石油和天然气燃料的进口才能达到的。从 1960 年到 1979 年,这类进口能源的净比例从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9% 增加到 24%。美国在很多领域在单位劳动的能源节约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到 1985 年,进口能源占能源总消费的净比例下降到 16%。但从那以后又开始上升。在整个 90 年代都处于 1979 年的水平及以上。

尽管能源短缺,但装机功率比以前利用得更多了。主要发动机的装机马力(1 单位约

⑤ 三个事件是 1969 年的利比亚政变、1973 年的阿以战争和 1979 年的伊朗政变。

等于 746 瓦特)在 1950 年是 49 亿单位,到 1990 年达到了 349 亿单位。增长率比较缓慢,但总体来看,总增长要远远超过其他领域经济活动的扩张。当时,计算机正在大量进入美国企业和家庭,而这需要许多的动力作为驱动。由于主要是自由市场决定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因此有理由相信电子产业将会遵循较早的创新之路——如蒸汽动力、电力、化学和轻金属——创造更高的生活水平。电子革命的小发明并不只是用于娱乐的。这些东西是值得的。到 80 年代中期,底特律已经采用了日本汽车工业的做法,用机器人代替了人力工人。回顾一下经济史上最大的一个经验很重要:资源由技术决定。能源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源泉。

4.2 财政记录和国际收入账户

当卡特政府在 1977 年承担经济责任的时候,每年的赤字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无论经济处于什么状态(见表 30.5)。杰拉尔德·福特执政的最后一年,1976 年,制造了一个庞大的 530 亿美元的联邦赤字(比前一年的 693 亿美元有所下降)。平衡预算被看做乌托邦理想,不再真实可及——是理想的,但不是可实现的目标。无可否认地,它是不再可识别的固定财政目标的世界中的一项政策。

表 30.5 1960—2004 年的联邦政府财务

	现价 收入	现价 支出	盈余(+) 或赤字(-)
1960	93.9	86.7	+7.2
1965	120.9	117.6	+3.3
1970	186.0	201.1	-15.2
1975	277.2	346.2	-69.0
1980	532.1	585.7	-53.6
1985	773.3	948.2	-175.0
1990	1081.5	1253.5	-172.0
1995	1406.5	1603.5	-197.0
1996	1524.0	1665.8	-141.8
1997	1653.1	1708.9	-55.8
1998	1773.8	1734.9	+38.8
1999	1891.2	1787.6	+103.6
2000	2053.8	1864.4	+189.5
2001	2016.2	1969.5	+46.7
2002	1853.2	2101.1	-247.9
2003	1868.6	2251.4	-382.7
2004	1974.8	2381.3	-406.5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IPA Tables, table 3.2.

正是在卡特任总统的四年时间里,联邦财政的崩溃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有这样一种思想,认为没有人能够控制。在 1975—1980 年间,联邦债务增加了 67.7%,货币供给(M_1)猛增了 38.6%,而失业率仍保持高位。与 1970 年比较联邦赤字似乎是巨大的,但它们将变得更大。卡特在执政期间的 1976 年承诺平衡联邦预算,但他的政坛生涯一

直被处理这一问题持续的失败萦绕着。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几十年中第一次在对外收支平衡上变得很脆弱。随着美元在对外汇率中贬值——特别是1971年以后,那一年尼克松放弃了更低的“官方”价格并将美国黄金定在更高的“市场”价格上——每单位出口赚的更少,而进口支出更多。^⑤因通胀而扩大的国内经济需要更多的进口。到1970年,商业贸易余额中开始出现赤字,这是19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直到1982年,因为在无形贸易上有正的净盈余,其中包括外国投资,贸易赤字得到了抑制,甚至完全被经常账户平衡抵消了。之后经常账户大幅度转为负数,到1988年,经常账户赤字总额已经改变了美国,仅仅几年时间,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然而,还有一个令美国人震惊的事实,他们发现,不仅联邦政府不能在美国经济内部控制自己的财政事务,而且在直面其他国家的竞争时美国经济也不再享有毫无疑问的竞争优势。价廉物美的外国制造品,从鞋子到汽车,都涌入了国内市场。美国的制造商和工会中的劳动力,不能削减工资和其他成本,而是加强了免受外国竞争的保护的要求。这似乎是战后年代“美国世纪”观点的一个可怜的衰落。

实际上,这些看法过于悲观了。在整个70年代外国投资涌入美国经济中,实质上平衡了寻求国外生产性机会的美国资金流出。例如,从1971年到1975年,美国人持有的外国资产上升了1240亿美元,而外国人持有美国的资产上升了1130亿美元。仅仅在1978年,美国人就在海外投资610亿美元,而外国人在美国投资640亿美元。^⑥有人对美国抱有信心,尽管美国人自己似乎失去了信心。^⑦外国投资持续进入,为赤字提供了资金,尽管到1988年,在外国投资者或撤资带来的潜在的“信心缺失”前景中,美国金融系统还存在问题。当外国人一直购买美国资产时,那个灾难只是一种担心。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只是作为一个贸易伙伴重新加入了世界经济中。它不再是世界经济事务的统治者。美国人警惕地看待这种发展,但事实上,它正是在布雷顿森林起草的战后国际重组计划的目标。^⑧这些政策付诸实施并取得预期成果用了整整30年时间。对20世纪的美国人来说,发现他们自己想从世界市场上购买的要多于世界市场想从他们那里购买的,这是个全新的经历,但世界范围的经济比起50年代一些国家如英国、德国和日本依赖美国,远远更为健康、更为可行。它们现在能够以平等的条件与美国竞争,而美国人必须习惯与它们竞争。甚至美国人不得不承认现在是外国人给他们提供资金。咸鱼翻身了。

到1980年,金融世界中即将到来的混乱感增加了政府的灾难,其中包括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在伊朗被绑架。在15%—20%间的市场利率,带来了房屋建筑活动和房地产市场的缓慢上升——抵押贷款利率达到了14%。正如我们所见,以其抵押贷款货币供给而

^⑤ 从每盎司35美元贬值到42美元之后,还没有获得希望的结果,尼克松放弃了金价体系的双层定价,黄金的市场价格达到了每盎司500美元附近。结果是从固定汇率制转变为浮动汇率制。

^⑥ *Statistical Abstract*, 1979, p. 847.

^⑦ 详细的分析,参见William Branson, "Trends in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Since World War II," in Feldstein (1980)。

^⑧ 当尼克松政府放弃黄金的“官方”价格时,“布雷顿森林”组织中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迫采纳了新的状况。在Krueger (1988)中,作者探讨了这些组织是如何看待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要求的。

长期稳定保护着房地产市场的储蓄和贷款行业,面临着崩溃。到1980年,在东部和中西部传统产业中心的重工业工厂,国际竞争迫使当地出现了毁灭性关闭。阳光地带的企业还处于成长过程中,增加了产业失业上升的困难。传统的政策处方似乎提供不了从灾难中逃脱的方法。用更大的赤字来减少失业的主张再也听不到了。赤字已经很巨大了,而且失业和价格都在上升。卡特的经济政策,通过增长减少失业的办法,似乎需要用赤字来推动增长。詹姆斯·布坎南和理查德·瓦格纳在《赤字中的民主》中强调了传统的凯恩斯财政政策中不言而喻的问题。^⑤ 在一种基本的判断中,它实际上是萧条经济学。它假定在货币政策的刺激诱导下,经济会上升,真实产出和就业会扩张。然而,赤字财政的货币需求的巨大上升,提高价格甚于提高产出,即使有未利用的产能和未就业的工人。

1946年《就业法案》的政策现在似乎是完全行不通的问题。布坎南和瓦格纳认为它一开始就完全是个伪问题:

这个法案就是承诺政府做一些根本不可能做的事,至少只要我们的基本财政和货币制度是自身不稳定的根源,就是如此。^⑥

而且,布坎南和瓦格纳认为,如果这些制度是稳定的,那么就不需要《就业法案》。

参议员乔治·麦克高文(George McGovern)在1978年在对美国人发表的关于民主党行动的演讲中,雄辩地陈述了长期扎根于美国历史的昔日的自由民主党的观念。他认为,根据《纽约时报》,在美国社会中政府只是“仁慈”机构:

让我们坚持认为政府能够而且必须解决问题,它能够而且必须消除贫困和降低通胀,它能够而且必须为这个国家设定目标和制定愿景。^⑦

在1980年,正当他领导自由民主党时被选民选下了台。

吉米·卡特得到了一位专业人士提供的经济建议,这个建议并没有充分理解他的问题。^⑧ 他基本上经历了赫伯特·胡佛在1930—1932年遭受的同样的挫折。在胡佛那里,价格反复多变而且失业上升;在卡特这里,价格激增而且失业上升。正统的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将30年代早期及70年代晚期的经济状况理解透彻。

随着1981年保守主义的罗纳德·里根上台,共和党人回到了强权。他们再一次承诺停止通货膨胀,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并采取将会活跃美国经济的政策。他们宣扬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里根甚至在就职演讲中使用了企业家一词。

4.3 结束通货膨胀

最终结束长期通货膨胀的是非正统的政策。卡特提名了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任美联储主席,两个月后,1979年8月,美联储宣布了一项重大的政策变化。政策不再以联邦基准利率——银行间拆借利率——为目标。现在美联储将尝试以货币供应的增长率为目标。迈克尔·穆沙(Michael Mussa)在对80年代货币政策的综述中指出,动

^⑤ James Buchanan and Richard Wagner, *Democracy in Deficit* (1977).

^⑥ *Ibid.*, p. 171.

^⑦ *New York Times*, 18 June 1978.

^⑧ 参见 Robert Gordon, in Feldstein (1980), p. 157. 有经济学家对总统的建议的跟踪记录。

机是“相机的、心理的和政治性的”；它不是“一个深奥的虔诚的经验，突然将大多数 FOMC(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转变成‘货币主义者’”。^⑤ 沃克尔评论说有必要“摇醒”根深蒂固的通货膨胀心理。他相信这项新的政策有两个优点。第一，它似乎是一个将联邦意图跟公众沟通的好途径；第二，他认为它是个好规则，很难为退却找借口。^⑥ 然而，卡特政府的政策却迫使美联储退却了。

在 1980 年 3 月，卡特宣布对抗通胀的新政策，包括授权美联储实施消费信贷控制。表面上，这有三个理由：(1) 将预算赤字加于利率上的压力最小化；(2) 限制消费信贷的增长，信奉卡特主义者认为消费者信贷加剧了通胀；(3) 消除通胀预期。当时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舒瓦茨(Charles Schultze)认为基本原理是荒谬的。^⑦ 沃克尔没有成功说服卡特不进行管制，当他们合起来而宣布放缓货币供给的时候，经济进入了衰退。仅仅实施几个月之后管制措施就被取消了。货币政策停止了，经济恢复了；但通货膨胀仍在蔓延。习惯上将新政策的实施认定为 1979 年 10 月，但是被迫退出政策的沃克尔认为 1980 年是抗击通货膨胀的斗争中“荒废的一年”。

紧接着里根当选之后，美联储满怀热情地恢复宣布慢货币供给增长的政策。直到 1982 年 8 月份政策都是有效的，几乎一年以后，经济即将进入衰退的迹象明显，这场衰退中真实 GDP 下降了超过 3 个百分点，失业率上升到战后的 10.8 个百分点的高位。从失业角度来看这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坏的一场衰退，但从其他角度来衡量它却比较温和。一旦衰退开始，美联储就在边际上放松了货币政策，但仍感觉它不得不“持续到底”，基于以下两个原因：(1) 建立一个通货膨胀对抗者的信誉；(2) 说服家庭和企业显著降低他们的通胀预期。沃克尔表示美联储相信扩张将在 1982 年春开始，但直到 11 月仍未到达低谷。^⑧ 事实上，官方的数据表明美联储持续低估了衰退的深度和持久性。

当美联储最终在 1982 年夏转向更简易的政策的时候，年通货膨胀率已经从 1980 年的 13.5% 下降到 1983 年的 3.2%——并保持在这个水平上。取代以货币供给增长率为目标的政策，美联储采用了更折中的办法——与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早期相似——由美联储决定银行准备金的“压力程度”。詹姆斯·托宾评论道：“我希望历史将会给予保罗和他的同事们赞扬，他们值得肯定的不仅是为抗击通货膨胀而战，而且还知道什么时候停止，什么时候宣布胜利。”^⑨ 他的继任者阿兰·格林斯潘，在 1987 年被里根总统任命，继续了美联储的折中方案。^⑩ 格林斯潘被布什和克林顿总统任命为美联储主席，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的成功很大程度应该归功于他。当经济在 2000 年放慢，在 2001 年衰落时，美联储采取了一系列似乎已经成功的利率削减政策。

^⑤ Michael Mussa, "Monetary Policy," in Feldstein (1994), p. 96.

^⑥ Paul Volcker, commentary on "Monetary Policy," in Feldstein (1994), p. 146.

^⑦ 讨论总结，参见 "Monetary Policy," in Feldstein (1994), p. 158。Mussa(p. 98) 和 Volcker(p. 147) 也讨论了这个问题，Feldstein 在序言中也讨论了："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80s: A Personal View," p. 6.

^⑧ Volcker in Feldstein (1994), p. 149.

^⑨ James Tobin, commentary on "Monetary Policy," in Feldstein (1994), p. 152.

^⑩ 对过去 15 年的一个近期综述，参见 Alan Greenspan, "Risk and Uncertainty in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4, no. 2, May 2004.

4.4 里根经济学和双赤字

里根从总统选举中就一直宣传他所信奉的供给学派经济学 (supply-side economics)。思想很简单。里根认为,通过总供给曲线右移,通货膨胀和失业能够同时消除;选举人并不必然在两者中择其一。这个理论是,大规模的一般赋税的削减会引致企业家阶层减少对赋税的反感,并使他们真实收入的更大比例进入征收范围,因而提高税收收入。同时,当工人知道从相同的税前工资中带回家的每小时收入更多时,他们将会被诱使增加努力程度和自信水平。政府希望这项附加行动,通过凯恩斯主义的乘数过程,将失业人员重新送回工作岗位,将长期的福利情况正常运转。支持这个理论的一个证据是1964年的减税,像赫伯特·斯泰因指出的那样,它部分得到了这些相同观点的支持。1981年是一次冒险,就像1964年一样。^⑤ 税收削减也是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并不是某种程度的花言巧语。在对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的分析中,阿兰·奥尔巴赫(Alan Auerbach)和乔尔·斯莱姆罗德(Joel Slemrod)的结论是劳动力市场对税率变化并不敏感,但设备投资对利率变化敏感。^⑥ 很大一部分供给学派的观点在现实中并不成立。

财政政策的主要变化可以在图30.5的“充分就业预算”曲线的显著变化中看出来。1964年肯尼迪的减税计划是曲线向右下倾斜的开始,而60年代晚期开征附加税使曲线变成向上倾斜。这项赋税的撤销导致长达十年之久的赤字增加,但这些随着里根税收削减的通过而急剧加速。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的效果是在80年代的晚期使曲线呈倒U形态。

1981年通过的减税并不是供给学派提倡的(全面性一次性减税33%),延续了3年,降低了它们的影响。第一年税率削减了5%,接下来的两年每年减少了10%。供给学派的故事对那些按照个人收入税归为一类的、支付最高边际税率的个人来说是讲得通的。1947年,最高边际税率是91%,税负占个人收入的9.5%,占联邦政府收入的46.5%。当1971年最高边际税率降低到71%的时候,1982年又降低到50%,其他百分比基本保持不变。^⑦ 为什么是恒定的?在较低的税率上,因为富人相对不很关心隐藏他们在房地产等财产上的收入,因此更多的收入是按照较低的税率征收的。税收收入会增加可能是正确的,如果只有最高税率被削减。但所有的税率在1982年都削减了,因为政策制定者关心平等和通胀。这种关心的成本之一是提高了赤字。

20世纪70年代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联邦政府发现,通货膨胀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它的税收收入增加就超过1个百分点。税赋承担者将他们真实收入的更大比例用于缴税,这个现象被称为税级攀升。整个70年代,通过新的减免国会又将额外的收入返还到纳税人手里。里根的税收建议与这个方法是一致的。然而,国会返还的议案包括一项条款,税率将会在1985年年初调整。自此以后,个人收入税将按照真实收入而非名义收入缴纳。随着赤字的提高,税级攀升将无助于提高收入。国会不得不停止减税和免税;不

^⑤ Stein (1969), pp. 410—411.

^⑥ Alan J. Auerbach and Joel Slemrod,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Tax Reform Act of 1986,”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5, no. 2, June 1997.

^⑦ Don Fullerton, “Tax Policy,” in Feldstein (1994), p. 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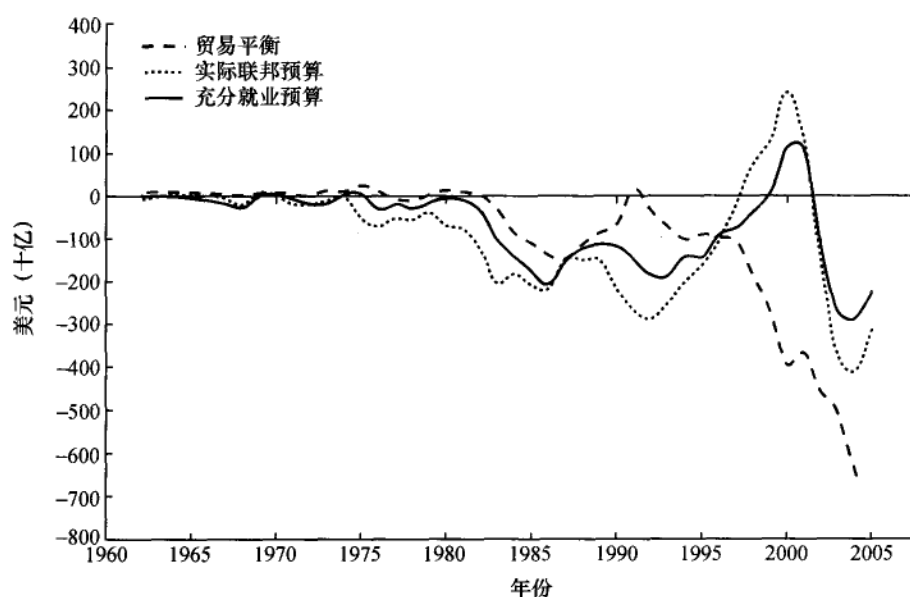


图 30.5 1960—2005 年的双赤字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IPA Tables, table 4. 1;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Historical Budget Data (1-26-2006), table 12.

得不考虑提高税收。

1982年,一次新的财政危机袭击了华盛顿。税收削减减少了政府在每一个收入水平上预期的收入数量。1981—1982年的衰退进一步减少了税收收入。这次减少,伴随着更高的国防支出,对里根政府的财政稳健构成了威胁,1982—1983年度的赤字超过了1000亿美元。经济学家将赤字与预算规则、税收和支出政策联系起来,称之为结构性赤字。由衰退引致的额外的收入亏空和支出的增加被称为周期性赤字。1983年总赤字,即这两类赤字的和是1739亿美元,赤字持续增加,直到1986年达到顶峰1921亿美元。这些赤字与货币供给的过多增加结合在一起,重新复兴了凯恩斯的繁荣感,在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吝啬”统治时期是从没有体验过的。

什么导致了这些赤字?一个简单的答案是痴心妄想。政府认为美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布满鲜花的前景”,里根的第一任预算官戴维·斯道克曼(David Stockman)将其描述为“人类历史上最难以置信的预言错误”:

……在作出这些广泛变化的相关时期,1982—1986财年,我们过高估计了GNP为精确的数字21450亿美元。现在是渐增的,但在最后一年的基础上,1986年,预测的GNP值比实际值高出6600亿美元。^⑥

另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在1980—1983年间,收入下降了GDP的1.1%而支出上升了1.9%。这样,税收削减可以说为支出上升负3/8的责任。^⑦而三类支出构成了支出的绝

^⑥ David Stockman, commentary on “Budget Policy,” in Feldstein (1994), p. 274.

^⑦ 在1983—1989年间当赤字减少时,收入增加就为这个减少贡献了1/3。

大部分。第一类斯道克曼称之为“老年人和穷人的预算,”从1961年占GDP的4%增加到1981年的10%——在两党的支持之下。第二类是公共债券的利息。从紧的货币驱动利率急剧上涨,而赤字增加了需要借的数量。里根的预算削减在减少非国防预算上的成功被这种利息支付的增加抵消了。最后一类是国防。与大多数保守主义者一样,里根相信我们已经让国防支出下降到了危险的低水平上。他认为增加的国防支出会对苏联造成财政压力,但是这究竟起到多大作用还是未知的。假定这些支出是用于遏制共产主义,那么它们从历史角度来看可能比现在更受欢迎。至少,为了购买更多的军事硬件而减少建学校的补贴,是一种很差的公共关系。

随着美好前景的崩塌,税收改革被提了出来。变革在1982年获得通过,1984年确实提高了收入,但是逐渐发生的。因1981年减税引起的赤字增加中有少一半被抵消了。1983年,总统和国会着手处理社会保障问题。真实社会福利收益在70年代提高了25%。税率在1977年提高,但高企的通货膨胀和脆弱的经济增长结合在一起,造成了无力偿债的幽灵。1983年的修正法案再次提高了税收,降低了福利水平。^⑦

税收政策的其他方面重大改变在1982年开始进行。丹·富勒顿(Don Fullerton)讨论了导致改革发生的四个原因。^⑧ 第一,尽管有赤字,供给学派仍然有影响,他们支持“统一税”,包括较少的纳税等级。第二,现行的税收体系被认为是极度复杂的;在一次电视直播中,国税局的局长承认没有人能完全了解美国的税收规则。第三,税率仍然高到足以激励许多企业和个人隐藏收入。对现存体制的支持在一个报告中被颠覆了,这篇报告暗示的意思是许多纳税人能够完全避税。最后,一些人担心现存的体制不再是平等的,拥有同等收入的人不再支付同等数量的赋税。

正是民主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Bill Bradley)在1982年第一次提出了“公平竞争环境”的呼吁。布拉德利和民主党众议员迪克·格普哈特(Dick Gephardt)联合提出了立法要求。里根的政客担心民主党会将税收问题从里根这里夺走,因此劝说他命令财政部研究这个问题。结果出台了1986年的收入中性的《税收改革法案》,边际税率被再次削减,赋税等级数量显著减少,扣减的数额也大大缩减了。结果是更平等的税收结构,但不是一个减少结构赤字的税收结构。

结果,1983—1988年的复苏和扩张在大规模赤字的状态下发生——严格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的处方——对1982年和1984年税收改革的反应是私人投资的有力增长。毫不奇怪地,私人储蓄率并没有显著提高,而国家也没有遭受到预期中的“挤出效应”,外国投资者追求既安全又高利率的联邦债务,造成联邦债务激增而造成的挤出效应。随着美国的财政政策转向扩张而其他地区的财政政策转向紧缩,千亿美元的外国投资涌入美国。这导致了美元的升值和美国经常账户的恶化。“双赤字”——空前的联邦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都由外国投资者“融资”了(见图30.5)。^⑨ 因为贸易赤字小于上升的联邦预算赤字,所以经济扩张了。失业率在1984年下降到7.5%左右,在总就业上经济继续产生了净增长,真实工资开始随真实可支配收入一起再次提高。到1988年年末,随着扩张的

⑦ 一些社保福利的接受者必须支付收入税;退休年龄提高;生活成本调整延迟6个月。

⑧ Fullerton, in Feldstein (1994), p. 190f.

⑨ J. David Richardson, “Trade Policy,” in Feldstein (1994).

继续失业率下降到5%。

扩张并没有对经济中的所有部门造成同等影响。进口商品价格的下跌严重冲击了制造业部门。当就业率总体攀升时,在制造业部门是下降的,常常可以听到对美国“竞争力”的担忧。还能听到的是保护主义的再度呼吁,这反过来让政客们更担心联邦预算赤字。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双赤字的一个不寻常后果是美元在完全浮动汇率制下的升值。当外国投资者将其千亿元的储蓄投入到美国的时候,美元在1984—1985年表现出惊人的坚挺,而不是因自身供给过度而崩溃,致使美元在外汇市场上对所有货币都升值了。曾经1美元价值是英镑的20.5%,到1985年春天,美元已经上升到1英镑的95%(1英镑=1.05美元)。然后美元下滑,到1988年降低到1.8美元兑换1英镑——1997年是1.6美元兑换1英镑。为了平衡美国账户赤字而产生的大量美元过剩供给最终在外汇市场上体现出了其影响。当进口价格上升的时候美国国内美元贬值是通货膨胀引起的,但是出口现在相应更便宜,也激增了。

“里根经济学”的支持者自然地将这种在旋风中他们赞许的经济特性归功于“总统政策的成功”。反对派警告说其中蕴涵着危险的经济风险。如果会有什么不同,在下次衰退中,美国的利率是否应该降到足以导致千百亿美元的这些外国投资大规模撤离?一场衰退可以转变成悲惨的经济萧条,但并没有出现。

里根的部下乔治·布什赢得了1988年的选举,罗纳德·里根下台,仿佛他已经平衡了预算,减少了国家债务,并解除了经济管制,就像他曾说他将会在1980年回来那样。里根时代带着希望的注脚结束了。就业是充分的,出口增长,双赤字在1988年都低于1987年。加拿大人同意了自由贸易协定。大量华尔街经纪人因不当利用内幕消息而遭到监禁之后,美国公司通过“垃圾债券”融资进行杠杆收购的浪潮再次开始了。1987年股票市场的崩盘并没有产生衰退。布什政府承担了联邦财政混乱的重担,它已经被竞选承诺给束缚了,承诺不提高赋税而平衡预算。即使溃败的民主党也希望布什能够获得这份幸运。但他没有。

在1988年的总统竞选运动中,乔治·布什劝诫选民“读懂他的话”,他不会提高赋税。当赤字继续时,他有所动摇。1990年一个两党的一揽子计划得到了落实,目的是减少结构赤字,这个一揽子计划不久就将经济推向了衰退,因此而扩大了周期性赤字。正如我们在图30.5中看到的,到90年代初期结构性赤字减少了,扭转了之前十年的总体趋势。在1991—1994年的每一年中,联邦预算赤字都超过了2000亿美元。用真实值来看,这些值比二战最后一年的1945年的赤字大得多。

5. 兴盛的90年代

在比尔·克林顿当选之后,他转向增税,作为减少赤字计划的一部分,但其政治修辞是为了恢复税制结构的“适当的”累进程度,或者像罗斯福时代呼吁的那样“对富人征收重税”。增加税收与罗斯福引起1937年的衰退一样是冒险计划。财政政策的改变看起来是图30.5中充分就业预算线增加比率加速的部分。克林顿比罗斯福幸运些;开始于1991年6月的长时间的反转足够强劲,以至于增税只是抑制了赤字比例的提高,而减少

结构性赤字还有待考证。到1998年,联邦预算从60年代算起首次出现了盈余。当联邦预算赤字转为盈余时,国际收支赤字从80年代中期以来有所改善,此时突然变成了历史上最大的赤字。部分刺激政策是所谓的“和平红利”。这个红利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冷战国防支出上的下降。然而,如果“和平红利”被定义为社会支出的增长,就像休·洛克考夫解释的那样,在冷战结束时这个红利还是没有的。战争之后,和其他大多数战争一样,社会支出占GDP的比例恢复到了“常态”,回到了战前的趋势。^③在这个十年结束之后,当经济接近周期的顶峰时,股票市场达到了纪录高位,主要是由对“科技股票”的贪得无厌的需求刺激起来的。

图30.6显示的是投资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生产力危机年代,百分比实际是上升的。80年代开始,它下降的年份多过上升的年份,直到在1991年达到低点。从那个时候起,这个比例上升,从13.4%上升到2005年的16.8%。在90年代有很多增长的理由,互联网的数据是两个理由中的较强数据。第一,企业投资于通信设备以便使用互联网,既为了供给信息也为了需求信息。第二,互联网企业(.com)成为产业。一个人会预期投资增长的比例应归因于这两个来源,随着时间流逝将会放缓。公司最初对通信设备的投资比它们将来为了维护它们而不得不做的投资要大得多,而且正如我们所见,互联网公司经历了一个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在新千年伊始,股市和经济达到了顶峰。^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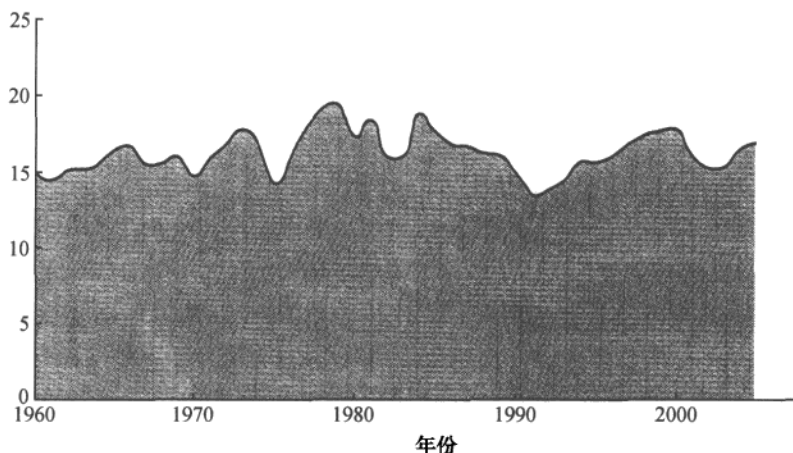


图 30.6 投资占 GDP 的百分比, 1960—2005 年

资料来源: 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IPA Tables, table 1.1.5.

罗伯特·戈登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已经指出了20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之间的强烈相似性。1990—2000年间宏观经济的许多关键变量变化的方式与1919—1929年间非常相似。特别地,戈登指出真实GDP、人均真实GDP、就业和生产率的增长几乎是

^③ Hugh Rockoff, “The Peace Dividen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ER*, May 1998.

^④ 投资百分比增长的第三个原因是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从新千年之始预期总体来说是保持乐观的,尽管以前的网络公司百万富翁不是这样。一项对1997—2002年华尔街的有趣讨论,参见 Roger Lowenstein, *Origins of the Crash: The Great Bubble and Its Undoing* (New York: Penguin, 2004)。

一致的。^⑦ 弗里德曼指出了名义 GDP、货币供给和股票市场的相似性。^⑧ 戈登评论道在我们近期历史上与 90 年代末期股票市场的扩张相近的唯一的时代是繁荣的 20 年代末期。按传统衡量的失业率在两个时期都是较低的,而在股市崩盘的那年(1928 年和 1999 年)是相同的。如我们所看到的,20 年代通胀几乎是不存在的,在 90 年代是相对较低的。最后,托马斯·皮克特(Thomas Piketty)和埃曼纽尔·塞兹(Emmanuel Saez)近期所作的一项研究证明,始于 70 年代早期的收入不平等,在 90 年代中期所达到的水平,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增长程度快于 20 年代晚期。^⑨

戈登和弗里德曼都指出技术变迁是这两个时代的推动力。在两个时期中,生产率恢复,是由通用技术——20 年代是电力和内燃机,90 年代是计算机和网络通信——的延迟应用推动的。^⑩ 戈登写道:

虽然内燃发动机和发电是 19 世纪 70 和 80 年代发明的,但 20 世纪 20 年代才出现了实质的突破。汽车登记数量在 1919—1929 年间增长了三倍,发电量超过了两倍。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家或工作中使用个人电脑的美国人数量增长了两倍,几乎和 20 年代发电增长率是一样的。^⑪

然后为什么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并没有重复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历? 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另一个“大萧条”?

戈登将 2000 年以后的发展归结为几个因素。第一,也是弗里德曼强调的因素,是格林斯潘掌管的美联储实施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供给从 1929 年到 1933 年减少了 1/3 的情况下,2000 年顶峰之后货币供给继续以平稳的比率增长。这要归功于住宅建筑和耐用品销售的繁荣,它们大到足以抵消设备和软件投资的下降。第二,财政政策在 2001—2003 年放松,这是联邦收入税一系列降低的结果,特别是资本所得税和红利税的税率降低的结果。应该与 1932 年形成对比,那年为了平衡预算而提高了税收。21 世纪早期在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下,事实是 2001 年的衰退从二战后形成了真实 GDP 最轻微的下降,人们想知道如果在 1930—1931 年之后采取了适当的政策可能会发生什么呢。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间的经济中值得评论的还有其他的不

^⑦ Robert Gordon, “The 1920s and the 1990s in Mutual Reflecti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1778, November 2005.

^⑧ Milton Friedman,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Monetary Policy Covering Three Episodes of Growth and Decline in the Economy and the Stock Marke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9, no. 4, Fall 2005. 弗里德曼的第三时代是日本的 20 世纪 80 年代。克林顿政府的几位成员写作了关于 90 年代的专题论文,包括阿兰·布兰德、罗伯特·鲁宾、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詹妮特·耶伦。

^⑨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Income Inequality in three United States, 1913—199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8, no. 1, February 2003. 1998 年收入最高的 5% 的人群收入份额占 23.68%, 1929 年占 19.76%; 1998 年收入最高的 0.1% 的人群收入份额占 4.13%, 1929 年占 2.56%。

^⑩ 20 世纪 20 年代生产率的年增长率是 5.4%, 之前的三个十年(1889—1919 年)是 1.3%。关于 20 年代的延迟的讨论,参见 Paul David, “The Dynamo and the Computer: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Modern Productivity Paradox,”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0, no. 2, May 1990, and Paul David and Gavin Wright,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and Surges in Productivity: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the Future of the ICT Revolution,” in Paul David and Mark Thomas, *The Economic Futur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⑪ Gordon (2005), p. 7.

同。其中有财政结构的变化。尤其是,30年代在一个州之内设立分支银行的禁令在2000年后让位给了全国性的分支银行。最早出现于30年代的存款保险,在2000年后是一项很好理解的实践。在两个时期,股票都可以用定金购买,但20年代允许买者以90%的定金购买,而战后时期的大多数年代这个比例被限定在50%。显然,这样的政策变化必定会提高经济潜在的稳定性,但它们不足以解释演变中的差异。正如戈登所说,我们近期的历史“证明好的公共政策很重要”,这意味着我们持续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货币和财政政策。^⑧它还取决于银行管制、存款保险和保证金规则等政策,还取决于关税削减和移民限制政策的放松,这些都有助于美国经济变得比过去更加稳定,更少脆弱。

20世纪90年代还见证了福利政策的改变,而公众福利从30年代以来一直在改善。临近克林顿第一任结束时,类似的提案就已经被否决过两次了,克林顿签署了一项法律,1996年的《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以“改变我们所知的福利”。这是较早时期开始的一个过程的高潮,当时国家从里根政府得到了弃权,在更老的AFDC法案下更有力地管理工作法规。在几年之后,福利案件数量迅速下降,更多的单身母亲得到了工作,贫困率下降了(特别是黑人和拉美裔单亲家庭,但是在贫困线50%以下还有一些增长),婚生子女速率似乎放缓了。即使如此,仍然存在预先授权法案的相当多的争论。事实上,几个条款已经过期,并且通过“临时性”的财政支持得以继续。^⑨

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每年进出口只占GDP的5%左右。到80年代,这个百分比比60年代翻了一番,而到了2000年,进口约占GDP的15%。关于工作“外流”存在着不断增长的担心,但是没有人对多少岗位是“自己生产”的付出更多关心。在克林顿的第一个任期内,他签署通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将墨西哥也带入了美加协定中来。北约扩展了,甚至俄罗斯正在释放信号它将考虑加入的邀请。美国现在是开放经济,尽管还持续呼吁保护。当所谓的“美国世纪”宣告在20世纪70年代结束时,在第二个千年结束时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保存下来。显然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我们新千年的经济前景,部分取决于我们怎样学习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存。那个恐怖的一天每一个美国人都领悟了这样的信息,我们的经济未来是跟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

布什政府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决定,加上大西洋飓风活动周期上升,使得联邦预算平衡更加不可能了。尽管经济(和股市)已经从互联网泡沫破灭中反弹,但大众情绪最好还是描述为谨慎乐观。乐观的一个理由是经济从冲击中恢复的持续的能力。

推荐阅读

文章

Andersen, Terry L., and Peter J. Hill. “The Race for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3, no. 1, April 1990.

^⑧ Gordon (2005), p. 41.

^⑨ 对这个法案的最好的评价之一参见 Rebecca Blank and Ron Haskins, eds., *The New World of Welfare* (2001)。也参见 Rebecca Blank, “Evaluating Welfare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JEL*, December 2002.

Blank, Rebecca. "Evaluating Welfare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0, no. 4, December 2002.

Branson, William H. "Trends in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Since World War II." In Martin Feldstein, e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Christ, Carl F. "The 1972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3, no. 4, September 1973.

Freeman, Richard B.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Labor Market, 1948—1980." In Martin Feldstein, e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Friedman, Benjamin. "Postwar Changes in the American Financial Markets." In Martin Feldstein, e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Fullerton, Don. "Tax Policy." In Martin Feldstein, ed.,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80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Joskow, Paul L., and Roger G. Noll. "Economic Regulation." In Martin Feldstein, ed.,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80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Krueger, Anne O. "Whither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MF?"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6, no. 4, December 1998.

Lindert, Peter. "What Limits Social Spending?"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3, no. 1, January 1996.

Mussa, Michael. "Monetary Policy." In Martin Feldstein, ed.,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80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Okun, Arthur. "Postwar Macroeconomics Performance." In Martin Feldstein, e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oterba, James M. "Budget Policy." In Martin Feldstein, ed.,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80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Richardson, J. David. "Trade Policy." In Martin Feldstein, ed.,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80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Rockoff, Hugh. "The Peace Dividen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8, no. 2, May 1998.

Viscusi, W. Kip.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 In Martin Feldstein, ed.,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80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Winston, Clifford. "Economic Deregulation: Days of Reckoning for Micro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1, no. 3, September 1993.

书籍

Anderson, Terry, and Peter J. Hill. *The Birth of a Transfer Society*.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0.

Blank, Rebecca, and Ron Haskins, eds. *The New World of Welfar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1.

Buchanan, James, and Richard Wagner. *Democracy in Defici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Feldstein, Mart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ed.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80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8.

Gilder, George. *Wealth and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Hughes, Jonathan. *The Governmental Habit Redux*.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Stein, Herbert. *The Fiscal Revolution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Weidenbaum, Murray.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5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5.

第 31 章

我们的过去还有未来吗？

不涉及过去的影响，一个社会的未来是难以想象的。本书开始就讨论了英国对殖民地美国的影响，以及殖民地法律和制度对现代美国的影响。关于这种连贯性美国没有什么特殊的。

在 2004 年的春天，芝加哥市参议会投票通过分区制改革，使这个城市的第一家沃尔玛得以建立。很快之后它又投票否决建立第二家沃尔玛。两次投票之前各集团都进行了密集的游说。支持沃尔玛的人指出它能够创造就业；反对的人则指向他们认为的公司提供了不符合标准的工资及福利，以及它反对工会的立场，并且担心沃尔玛会损害已建立企业的利益。一位市议员指出，“我们正在对付的是一个拥有长期掠夺经验历史的巨大公司。”这个言论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也听到过，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在那里市议会也反对这家公司，使人联想起殖民地美国时期的情况。2005 年一个以《沃尔玛：低成本的高成本》为标题的文件，其主题是避免成为人民党最喜欢的公司。美国人对大公司掌握的力量担心，和他们对规模利益的渴望，现在与我们生活过的一个多世纪形成了矛盾。我们不相信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结果，因此我们尽力管制它，以便我们能够享受它的利益而最小化付出的成本。在 21 世纪早期的经济中，沃尔玛扮演的作用，就像铁路在 19 世纪晚期经济中所扮演的作用。毫无疑问这种作用还会继续重新发挥。

复杂的人类制度经历了时代，制度确实是任何社会中代代相传的遗产。在美国它是如此，毫无疑问将来也是如此。一个国家刚刚过去的历史不能被抛之一边。“谁将创造未来？”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是：“在某种程度上，是那些创造历史的人。”

1. 资产

本书横跨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全程可以追溯至弗吉尼亚殖民地及前期。总结一下维持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及其资产，是很有用的。类似地，检验一下这段历史上的负债，那部分提出问题的历史也是有用的，这部分有问题的历史使它的人民过得不如没有问题时好。

1.1 增长的传统

最初，大量自然资源和土地被利用，人力资本快速增长，这些因素组合起来，赋予美国人一段前所未有的全面经济增长的历史。那段全国经历的历史，产生了一种内在的对未来的乐观主义，使政府在进一步的增长预期中作出决策。当我们是殖民地前哨的时候就是如此，当我们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的重要一员时也仍然是如此。J. P. 摩根曾经提

出,任何看跌美国未来的人都必定会破产。乐观主义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见。美国经济的成功,部分原因就是它已经成功了。美国人期望通过增长实现经济的进步,他们倾向于在选举期间突然对付那些无法拯救的政治制度,通过委任的或疏忽的错误——“那是经济,傻瓜!”

1.2 社会流动性

许多人口多、范围大的美国家庭,包括非常不同的个人收入、教育成就、生活方式和各类经济努力的样本——姐姐是医师,叔叔在工厂上班,婶祖母仍然生活在家族农场里,远房堂兄弟生活在北加利福尼亚的社区。这些不同的生活方式使得个人经验多样化而且令人兴奋,也反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这个国家不存在容易确认的或者有效制度的阶级界限。钱——你有多少,不管来自于哪里或者你拿它做什么——是社会进步的主要衡量尺度。虽然不可否认这一观点粗糙,但它是一种经济进步的态度。

国家创始人禁止“贵族的专利”并因此释放了全体公民的能量。这一思想表明任何人都是重要的。移民依然因机会而涌入美国境内——据说你在美国能够实现的就意味着全世界都能达到。如果现在的“底线”是无金融能力,那么一长串拥有土地的祖先并没有什么优势。通过法律而到达每个家庭的公共教育制度,用一种方式或其他方式保证了每个美国小孩都能在社会中获得个人进步,这个社会的障碍是可以穿透的。种族和性别歧视,遥远的过去的遗产,是社会流动的主要形式的障碍。改革者常年与这些时代错误作斗争。

更大的社会流动是在国家内部,更重要的是机遇,使天才不会被不知不觉地浪费。使用的天才越多,社会就会越接近它在其人民中拥有的潜能。当美国人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流动性时,他们就已经在这个游戏中是“世界冠军”了。如果你出生在富裕家庭或者是白人,那么一生中实现流动是更容易的事情,但是美国社会,比任何其他社会,通过社会流动更好地对个人进步敞开大门。正如斯坦利·莱博高特表明的,美国仍然是一个新晋富人的国家。^① 无论怎样粗鲁,它仍然是经济改良的积极力量。今天的顶尖的财富持有者已经和20年前的富豪名单完全不同了。

1.3 技术进步的采用

美国历史充满矛盾,是由已有的接受新思想、新产品、新实践——一般称为创新,所造成的矛盾,甚至是热切的接受所造成的矛盾。整个城镇和聚居区域被全部或部分地放弃了,人们加入迁移队伍,紧跟着这股潮流。新的地区繁荣了,旧的死亡了。新的公司扩张了,旧的失败了。美国南部阳光地带的成长就是这种现象的表现。

这种对新事物的热爱深深进入了美国人的生活,从厨房到工厂。它既是一种生产性力量也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当企业的产品失去人们的喜爱时,企业就会破产,家庭就会失去经济来源。熊彼特将创新的开始与经济增长中的企业家作用联系起来,认为是“创

^① Stanley Lebergott, *The American Economy: Income, Wealth, and Wa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61.

造性毁灭”的结果: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包含着失败和成功,它们产生经济增长。波顿·克莱因(Burton Klein)指出,宏观经济的稳定性(macroeconomic stability)——通过技术进步以相当于充分就业水平的增长——依赖于微观经济的不稳定性(microeconomic instability)——为争夺市场而竞争并控制资源。^②动力是鼓励和采用创新型的技术进步。这个过程保持了一个稳定的要素,私人经济努力的风险。

无论是把它看做“计算机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是“新经济”,计算机的应用拥有扩展工作和家庭的时间和空间的界限的潜力。它将为每个人创造出新的选择,通过衡量生产率进步所不能反映的那些选择。

1.4 保护财产权

尽管有这样的进展,如现代税收、征用法、分区制、土地利用限制以及其他缩小个人对私人财产控制范围的管制,但初始的产权天赋仍然如此坚固,这种天赋是美国人为了个人利益而努力工作获得的各种私人财产权。这种诱惑力仍然存在。历史上讲,产权保护的天赋使人口活跃,与任何社会中私人利益所起的作用一样大。人们愿意作出最大的牺牲来获得产权,从事具有远期利润的企业——从清扫农地到设计个人计算机——个人或家庭怀着从财产所有权中获得利益的希望。在一个小政府的社会中,关于经济未来的成长除了宪法一致意见之外没有特殊的集中命令计划,保护财产权基本上将未来留给了人们自己。

1.5 私人合约的保护传统

建立在信用使用的基础上的各种活动,由私人间产品和服务交易所支配的任何经济中都是必要的,它要求对未来承诺的保证有一个确定性的预期。这个所谓的英式遗产没有什么地方比合同法和社会组织来实施合约更强大。美国人现在可能迎合这种传统的力量,而在更早时期则是惧怕的(例如,对人类生活买卖行为或者他们自身劳动力的法庭强制,实行了多年)。但是这种原则上对合约的坚持,支撑着所有的私人交易,并将个人所有权和对生产性资源的控制更有力地作为经济进步的手段。在联邦宪法的合约条款中,私人合约的力量得到了加强,被提高到了自治州自身的立法力量之上:例如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

1.6 可推断法

美国人被他们牢固的法律制度挫败过多次——例如,“九个老人”(最高法院)曾经扼杀过第一次新政。基本法律的变革是不容易实现的。立法机构可以通过法律,但是大陆法传统和成文宪法衡量所有的立法,使得立法制定到成为法律过程中,司法审查是必需的。通过立法来实现根本变革非常困难,但是,立法给私人对未来价值的估计增加实质的可靠性,并为所有的被设计用来获得远期利润的合同契约增加动力。因为不动产投资和长期金融资产未来是要贴现的,因此合法框架的稳定性极大地减轻和降低了私人承

^② Burton Klein, *Dynamic Econom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担的计划的成本。

1.7 大众民主

美国人作为一个民族集体创造了他们自己的胜利(和灾难),从学校董事会到白宫,这个事实给美国的经济生活增加了长期的稳定性。为了发动社会变革,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挑起暴力和冲突是毫无意义的;美国已经有了稳定的对暴力和冲突以及根本的社会变革的节制,而且这一切都是美国自产的。选举按照日历进行。任何成年公民都可以为他(她)想投票的人投票,不论候选人的建议是什么,来自于什么政党,只要把握了他(她)的执政重点就行。温斯顿·丘吉尔曾谈到过民主,尽管它是政府的令人吃惊的形式,但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美国可能面临着草率、腐败、权力滥用以及冷漠,但是不能把这些仅仅归咎于美国。

然而,无论在任何时候对所有这些危险有任何惊慌,在长期中它们确保了美国政府形式的持久性。大众民主增加了长期的政治稳定性,即使它在时代的某个特定时点是混乱无秩序的。制度总是能改进,总是能变革;但使人痛苦的是,它从来都不是不可救药的。结果,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得以继续,走过成功与失败、战争与和平、宁静与暴乱的时代。

对政府形式的不规则改革较少,这增加了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动力。政府不仅仅是办事机构和官员;它是一种集体作决策的形式。美国政府在规则支配下运行,到了一种令人惊异的程度。对议会的程序即刻反映。从学生会到美国参议院,像全世界讲英语的人们一样,美国人依靠已被接受的一系列规则生活。这不是法律的问题,没有人需要《罗伯特议事规则》。就像语言规则一样,这些规则只是作为正统的形式被简单接受。这是最不同寻常的事。民主决策制定的这些规则防止了暴徒规则和独裁规则。它们也将最训练有素的煽动政治家留在不断被挫败的危险之中。

大众民主因其固定的规则和程序而有效率。最终人们能够统治他们自己,因为存在一个被大体接受的机器,用它可以达到目的。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女人或者政党能够在违反这架机器的情况下统治美国。在美国社会中,议会程序是合法权力的唯一渠道。储蓄者和投资者能够知道,政治权力形式上的根本创新不可能由政变带来。美国曾经变成过“香蕉共和国”,它需要通过这些程序。

2. 负债

在平衡表中我们资产的对应一方就是负债。存在潜在的失败的这种认识,促使产生了一种考虑,它是历史所表现出来的美国人惯常采用的方法,这可能会减少增长的潜能,使经济未来暗淡。

2.1 产权稀释

标准的财产权利包括使用、损害,和财产报酬。这些权利的运用使所有权成为令人想要的,值得为获得它而战。这些权利——以及同类的生产性动机——能够以各种方法

予以弱化。随着产权的弱化,运用它们的动机也减弱了。

从19世纪晚期开始,产权就被各种理由减弱了。产权的稀释具有累积性的力度,特别是对其“成果”——由产权带来的收入——征税方面。在极端情况中,如有些城中贫民窟,特别致命的产权税和管制组合已经导致其所有人在实际上放弃了产权。结果就是社会性的破坏和无益的荒废。税收、工作、生存空间,都失去了。“城市复兴”反对产权,扫清所有权,并且把产权转移到新的所有者手中——这是个代价高昂的过程。

而且,普遍的财产所有权在传统上将美国社会各阶层“结合”在一起,无论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有着怎样的经济和政治差异。正如塞利格·珀尔曼(Selig Perlman)在其《劳工运动理论》一书中所强调的,美国劳工对于和平秩序和社会稳定的承诺,一直植根于财产所有权的易获得性之中,产权给予了工人在已建立的规则中的确定的利益。^③ 在改革精神中,分区制度、土地使用规则、建筑规范——以及完全税收——稀释了所有权。在城中贫民窟中尤其如此,在那里获取和控制产权的欲望消失了,因为社会的稳定性是和财产所有权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结果就是产生了“下层阶级”,这个群体从经济增长中只得到很少的利益。

随着各级政府都需要税收收入,并且随着社会改革造成不断扩大的网络,以限制获得和使用产权,产权的稀释逐渐增强。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失去了一些内生于财产所有权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处理这些事务需要更多的智慧,因为今天我们的社会财富要部分归因于对私人拥有产权的激励。只要美国社会的结构植根于财产所有权,削弱它,把它仅仅作为其他目标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愚蠢的。

2.2 集团物品和特殊利益

纵观整个美国历史,各个阶层为了获得在自由市场中单独不能实现的经济利益,他们要联合在一起。商人集团、贸易组织、工农业的游说议员者,以及工会,全都通过集体行动努力尝试并成功获得滞后的增长收益。关税和补贴(起初给予商人阶层),通过法律禁止竞争(自《瓦格纳法案》之后给予工会),发放许可证的特殊优先权利(给予了垄断阶层,从公共事业部门到医生、律师和教师),保护农业合作社——所有这些,甚至更多的例子,都是美国经济史上通过集体行动获得的特殊利益。

从这些组织中获得的收益,被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其具有深刻见解的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和集团理论》中称为**集体物品**(collective goods),它远远大于竞争利润。^④ 它是典型的集体物品,其中的利益只能被相关特殊利益集团获得。消费者为此买单。资源被吸引到这类非竞争性用途中来,并导致了次优配置。

这种经济力量的非竞争性归类具有更进一步的危险——抵制改变。正如奥尔森所指出的,受到法律保护的特殊利益使得抵制改变和松懈工作努力成为可能,结果将是技术的退步,降低工人的生产率,并减缓经济增长。

由于美国政府是大众民主,寻求投票的政治家面临着寻租和特殊利益的压力,国家

③ Selig Perlman, *A The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New York: Augustus Kelley, 1949).

④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的经济未来可以很容易受到不良影响,表面上是对经济改变的完全“自然的”反应模式。那些获得集体物品的人们,单个利益集团,不断地寻求来自于特殊权利的租金,社会其他阶层必须提高警惕,否则就得忍受为此付账。公之于众和公开辩论是最好的防卫措施。

2.3 大企业和大政府

经济生活中的创新是增长的主要原因。创新并不是像某些奇异的突变物种那样,在黑夜悄悄爬上岸边。技术变迁必然由那些从创新中获得利润的人发起。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在其著作《新工业国》中,对企业家型企业和现在的巨型公司的官僚方式作出了有用的区分。^⑤当然,后者中的某些公司曾经引领了进步的技术创新,而且确实因为这个原因而成为了大公司。在1901年的合并浪潮中产生了美国钢铁公司,其主要的推动者是卡内基钢铁公司,据说与之相比,从来没有过更具颠覆性的有竞争力的创新者;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今天的企业都由专家委员会掌管,正如加尔布雷斯所称的技术构造,这些企业往往平庸和保守。

税收对所有企业是平等的,仅仅根据上报的利润而有所差别,增加了复杂性。沉重的收入税对企业家型的企业尤其困难,他们要在免税投资的组合背后隐藏赋税并不容易。为了增长,他们必须从主要行动中实现收益,那些收益是可见的,应征税的。^⑥这样,资源从生产性活动转移到政府部门的需求就对国家的企业家资源施加了限制。里根政府的税率削减就是直接承认税收太高了。

这是个困难的问题。政府需要税收,企业家型的企业需要资源用于增长。从过去的成就判断,这个国家在财政计划领域的标准能够承受提高。这不是直接面临的问题。它首次较严重地出现在二战时期,并且自此之后政府的支出就占到了和平时期的GDP的40%。它是个最终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大政府和大企业的时代对这个问题的漠视已经导致在竞争性国际经济中丧失灵活性,并且可能降低了美国经济本来能够实现的增长率。对此表示悲观并不困难。谴责政治右派支持大企业的政策,已经几乎成为政治左派的自动反应,而且大体上大企业是支持政治右派的。虽然某些这类政策可能代表国家的经济利益,但它们通常并不代表某一政党的利益。

乔纳森·休斯的著作阐述了这个国家是多么容易、多么自然地希望(并且能够)诉诸于政府来弥补不受欢迎的市场结果。罗伯特·希格斯强调,过去的世纪中利用政府来克服危机是如何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棘轮效应”,无论是智力形式还是制度形式。^⑦

在《转移社会的诞生》一书中,特里·安德森(Terry Anderson)和彼得·希尔(Peter J. Hill)认为,联邦权力被特殊利益者利用,将财富和收入从生产性活动转移到非生产性活动。^⑧随着时间流逝,转移权力开始控制了美国的经济。一个完全依赖于转移权力的完整的经济部门成长起来了,依靠税收和支出——或者通货膨胀。安德森和希尔认为,结

⑤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7).

⑥ 考察了过去几年中首次公开发行(IPO)的破纪录数量。在SEC规则下,要求这些企业披露当前财务状况。

⑦ Jonathan Hughes, *The Governmental Habit Redux: Economic Control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Robert Higgs, "Crises, Bigger Government and Ideological Change: Two Hypotheses on the Ratchet Phenomen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2, no. 1, January 1985.

⑧ Terry Anderson and Peter J. Hill, *The Birth of a Transfer Society*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0).

果就是转移的作用支配了政府;要求更多的喧嚣只能通过加速的转移来满足。在华盛顿,游说家和单一问题政治家的盛行反映了最终的事实。美国国库已经变成了涌满现代“淘金热”的人们的地点,这群人是由政府赏赐的寻租受益者。^⑨

莫里斯·詹纳维茨(Morris Janowitz)在《福利国家的社会控制》一书中认为,20世纪70年代由赤字提供资金支持的、由供给方引起的通货膨胀就是选举竞争的结果。^⑩詹纳维茨认为其结果是,弱政府只能将通货膨胀永久化。既然所有的政党都完全支持福利国家的扩展,但不愿意用税收支付全部费用,那么支出就会超过收入,而松散联合的政府就会取代西方民主以前时代的意识形态上不同但更强有力的政府。政府变成了他们过去的无用木偶。决定、拒绝和改变进程的力量消失了。

2.4 种族主义、性别主义:障碍物

尽管美国被称为“机会之国”,但是它的大门更容易对白人男性敞开,而对女性和少数种族则不同。种族和性别偏见历史悠久,且具有广泛的文化渊源。只有在近几年,联邦和州层次建立在新法律基础上的一致的、持续的政策才得以实施,努力禁止并最终消除它们对美国生活的影响。

那些身为女性和(或)少数种族成员的杰出的学者、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法学家、政治和企业领袖,现在活跃于美国生活的所有领域,这足以证明,歧视在过去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知识进步造成了令人沮丧的损失。历史上这个国家分布的天才中,超过一半(女性加上少数种族)被歧视所抑制了。结果是美国更加贫穷,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消除系统性的歧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进展已经取得,但问题仍然存在。

自二战以来,美国在消除种族歧视的斗争中迈开了很大的步伐。杜鲁门废除了军事设施中的种族隔离。艾森豪威尔时代最高法院决定停止种族隔离学校的开办。1964年的《公民权利法案》最终导致70年代积极的行动配额。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许多美国黑人融入到经济主流中去。

然而,内战之后奴隶制的遗产和100年以来的歧视“自由”,把庞大的黑人人口甩在了后面——在美国城市和南部农村——他们中的许多人无法适应竞争性的自由市场。他们的祖先在大迁移时期移居到城市中,特别是北方城市,以寻找(主要是)制造业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仅有的资格就是结实的后背。现在,从工业经济转移到服务经济的社会中这些工作大多已经消失了。正如在第28章所讨论的,现在大部分工作都有最低学历要求。在我们最严峻的衰退时期,任何一个周日报纸工作专栏都存在千万个空白岗位工作名单,因为最低学历要求得不到满足。在二战后的美国经济中,寻找工作的人的数量只在少数场合才超过工作岗位数。

年复一年,我们人口中受教育较少的部分人在经济上落后于其他人,并有变成永久薄弱部分的危险。它是一颗潜在的时间炸弹,在城市暴乱中定期爆炸。如果这个国家没有用一些经济刺激或者工作计划对这些人给予帮助,美国经济在国际舞台上竞争的能力

^⑨ 特里·安德森和彼得·希尔在他们的文章中使用了大量的购金热的比喻,“The Race for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3, no. 1, April 1990.

^⑩ Morris Janowitz, *Social Control of the Welfare Sta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就将被削弱,因为帮助失业者的福利成本将对预算赤字产生永久的压力。

2.5 福利国家的持续

一定存在某种税收和转移支付的组合,对于纳税人的家庭期望是无害的,然而却能满足老弱病残的合理需求。迄今,美国寻找那种可行的组合的记录是令人沮丧的。社会保险制度,其核心是社会保障,是建立在1935年立法基础上的产品,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它逐渐地发展,对于它的发展模式,没有全面的计划。没有正确计算成本而满足了需求。

美国福利国家的全部装置已经变成了美国经济中最根本的重要部分。美国将回到大萧条之前存在的生活方式,这没有现实的可能性。那个世界大部分已经消失了。数百万的工人虔诚地纳税数十年,支撑着社会保障体制。这个国家的经济未来现在不可能脱离社会保障制度的网络。社会的其余部分在继续前进,并且经过数十年已经适合了社会保障。家庭生活也顺应社会保障而有所改变;医疗保险、失业保护和年老退休的个人规定都因社会保障而完全发生了变化。

尽管福利制度很重要,但它本身对人口的影响是好坏参半的。人所共知,制度的某些部分具有荒谬的影响(例如,破坏家庭,产生越来越多的依赖和其他形式的社会无能)。美国仅仅是经济上的发达国家,没有综合的国家健康制度。尽管据报道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处理这个问题,但他们对克林顿政府的作为并不满意。^① 美国的福利制度是具有通货膨胀倾向并有缺陷的。正如在前面章节提到过,克林顿总统签署过一个法案,目的是“改变我们所了解的福利”,而最初的证据似乎多半是积极的,还有待观察这些改变是否纠正了主要问题。^②

2.6 被管制的生活

政府管制现在几乎触及了每一件物品,从黄油到钢铁。本书已经讨论过政府管制是如何受到宗教、道德、政治、经济、安全和公共卫生的激发的。当前的制度,也许更适合被称为“无制度”,从理发店到核电站,完全符合美国的法律和制度。它正是美国人所想要的。尽管因管制而造成的技术退步有时是有目的地强加的,那通常并不是管制的目的,而仅仅是广泛存在的副产品。^③ 管制的结果很少是有意为之的。正如布鲁斯·欧文(Bruce Owen)和朗·佩里加姆(Ron Braeutigam)所指出的,管制的过程倾向于产生它自

^① 克林顿政府出台的计划被证明是如此麻烦和昂贵,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个问题被晾到了一边。1996年的《卡斯鲍姆-肯尼迪法案》作出了努力,试图在现有的医疗保险体制内修正一些最严重的问题,就像乔治·布什政府努力去争取接纳“患者法案权利”一样。然而,千百万美国人或者被迫或者选择对健康进行自我保险。

^② 参见 Rebecca M. Blank, *It Takes a Nation: A New Agenda for Fighting Pover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David E. Card and Rebecca M. Blank, eds., *Finding Jobs: Work and Welfare Refor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0); Rebecca M. Blank, “Evaluating Welfare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0, no. 4, December 2002.

^③ 一个例子是阿拉斯加的鲑鱼产业。Douglass C. North and Roger LeRoy Miller, *Economics of Public Issues* (New York: W. W. Norton, 1971), pp. 104—108.

身的结果。^⑭

在这个大陆上,政府对私人经济活动的管制和政府本身一样古老。能够做的就是为解除管制提供一套一致的标准,具有某种合理的基础。在美国经济的历史上发展起来的是管制的垃圾堆,根本没有一般性意义。不合理的管制挫伤了企业和经济的进步。

然而,对于由政府来控制经济活动,美国人有着绝对的热情,通过强制经济生活进入管制模式来创造社会存在。这个深深扎根的热情不可能通过大众民主过程消除。现在既然这种热情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尝试寻求改革的合理标准就是有道理的。一个人可能从简单的问题开始:经济的哪些部分,如果有的话,完全排除政府管制,可能更好地服务于全体国民?答案是没有?在那种情况下,“地下经济”将会继续出现并盛行。即使事实上没有好处,但合法的经济未来仍将是更辉煌的,如果能够达成一致的管制的一般标准,因为美国人将继续管制。

管制对经济增长一定是有害的吗?如果是,热衷于管制的人将通过解释为什么来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服务。日落法(sunset laws),是在固定的年代之后自我毁灭的管制体制,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比方说,如果没有管制制度能够持续更长时间,那么十年不用更新保证,可能就是一个伟大的变化。改进政府管制的方法是可能的。^⑮暂时的清算最终必须要考虑我们进一步发展的能力。

3. 资本净值

资本净值是资产与负债的差额。在研究差额本身之前,应该注意的是出现在平衡表的资产和负债两方的项目。这些之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在我们概括的统计中,政府在直接确定和保护财产权的作用中,似乎是一项资产,但是当通过税收产生其他作用的收入而使那些产权被间接削弱时,它似乎又是一种负债了。当它营造了一种技术进步盛行的环境时,它是一项资产;但当它使得技术进步只在那些不再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大企业中产生时,它就成了负债。在这些例子和其他例子中,很显然的是资产是潜在的负债;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有很多美国政府做得很好的情况;它使我们的净资产无论是更大还是更小都只是个人的判断。

在任何平衡表中,净资产是资产和盈余的表现,是任何即将发生的利害关系的最终所有权。资本存量和盈余被投资为企业的资产。打个比方,让我们应用到美国,并应用到它的人力资本部分。几代美国人所创造的是一代人口,能够自愿、和平和有生产性的生活,在它自身稳定的制度框架之中。这一成就已经超越了整个历史上许多人所掌握的资本,并且还不能为今天的很多人所掌握。

正如布拉德福·德龙(Bradford DeLong)所说,20世纪证明了世界物质财富增长超过

^⑭ Bruce Owen and Ron Braeutigam, *The Regulation Game: Strategic Use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Cambridge, MA: Ballinger, 1978).

^⑮ 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研究参见 *The Fall of the Bell System: A Study in Prices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这个案例是介绍反垄断与规制问题;AT&T已经变得“太大而难以规制”了。政府的首席律师 William F. Baxter 讨论了他在这个案件中的作用,他对“反垄断政策”的评价,参见“Antitrust Policy,” in Martin Feldstein, ed.,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80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了在世纪之初所能设想到的水平。全球经济像过去那样健康。20 世纪还见证了财富在世界人口之间的分配更加不平等。^⑥ 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我们的集体生产不再强调衣食住的必要需求。生产的大部分由仅在几十年前还被视作奢侈品的商品构成。欠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也有所增长,但增长率较慢。既然互联网得以广泛使用,既然复杂的技术信息那样近在咫尺,只要几个按键就能获得,那么这种差异有些令人吃惊。

人力资本也是不可能衡量的,除了目前的特殊任务。人力资本是散布在世界的的能力,用于创造物质和文化必需品,对于维持可延续的人类社会和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这些必需品是必需的。一个游荡的沙漠部落有充足的人力资本来管理生活方式,但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本来培养医生、建设城市,或者发起太空计划。维持复杂的、生产性的现代美国文化,并鼓励其经济增长,需要制度和技术能力,以适应社会不断改变的需求。在人类社会迄今所创造的巨大的经济发达的组成部分的生产力中,美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美国人从 1607 年就一直在建设他们的社会,有时不经意地,有时又带着极大的目的性。衡量这个国家继续这一进程的能力,在于它现存的几代人的智慧。用这个标准衡量,美国经济确实拥有非常庞大的资本。凭借正确的管理和那么一点幸运,它在未来将会一如既往地继续增长。

^⑥ J. Bradford DeLong, "The Shape of Twentie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7569, February 2000. 这是他即将出版的著作的简介,部分可以在他个人网站上找到(www.j-bradford-delong.net)。

术 语 表

总生产函数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表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转化成国民收入的一种数学关系。

国际收支账户 (Balance of Payments):国际收支的账户体系,其中,一国的出口总值(包括外汇储备)等于其进口值。

汇票 (Bill of Exchange):注明日期的票据(例如签发后 90 天内支付),通常由卖方给买方,在货物或商品发出后签发。普通银行以活期存款为根据核实的票据为银行汇票,在指定日期内银行“见票即付”的一种票据。

复本位制货币标准 (Bimetallic Monetary Standard):造币厂或中央银行的现金以对两种贵金属的固定比价为基础,例如,金银双本位制。

转运 (Break-in-Transport):一个运输模式结束而另一个运输模式开始的地方,装运和卸货的地方(例如,货物从铁路运输卸下,从此地再装船运走)。

布雷顿森林体系 (Bretton Woods System):二战后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解达成的固定汇率制度。

经济周期 (Business Cycle):总体经济活动随时间而波动。在几种研究的周期中,最常见的非季节循环的周期是从波谷(生产和就业的低点)到波谷 36—40 个月。

短期同业拆借 (Call Loan):金融机构之间的一种贷款,具有潜在最短的到期日——请求即偿还。是纽约和伦敦等货币市场上最常见的一种贷款。

同业拆借利率 (Call-Money Rate):放款机构要求的短期同业拆借的利息率。

资本 (Capital):生产的物质手段;传统上以当期生产必需的工厂、机器或工具的替代成本来衡量。资本还经常被用做金融概念,包括除了劳动力和原材料之外的所有生产成本。

固定设备 (Capital Equipment):生产活动所必需的工具、机器和厂房等。例如,电烤箱就是面包房固定设备的一部分。

资本收益 (Capital Gain):“资本资产”(例如债券)的市场价值的净增长,假定超过购买成本的部分。

资本产出比率 (Capital-Output Ratio):用比率来表示,在一定时期内用于生产产出的“资本”数量。资本的数量除以国民收入等于资本产出比率。

计量历史学 (Cliometrics):斯坦利·雷特在 1960 年创造的新词,用来描述 20 世纪 50 年代普度大学利用计算机、经济理论和数理统计学研究经济史。现在也被用来描述数量经济学的历史。

集体物品 (Collective Good):曼瑟尔·奥尔森提出的一个名词,用来描述政府的特权;参见公共物品。

普通法 (Common Law):发源于英国的法律体系,以习惯或法庭判决为基础。

比较优势 (Comparative Advantage):即这样一种思想,一个人、企业或经济体应该专门生产相对更加有效率的商品或服务,因为其机会成本较低;这就是比较优势。

补偿性财政政策 (Compensating Fiscal Policy):应归功于凯恩斯的一种思想,财政政策应该是反周期的;当经济紧缩时,财政政策应该扩张,而当经济扩张时,财政政策应该紧缩。

保守主义 (Conservatism): 美国人查尔斯·比尔德对谨慎思想的命名。

消费者价格指数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由消费者支付的代表性的“市场篮子”中的商品和服务的平均加权价格。权重是表示消费者花费在每种指数商品的部分的系数。CPI 不同于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后者衡量的是商品的批发价格。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Cost-Push Inflation): 产生通货膨胀的力量归因于企业的能力, 能够通过操纵价格上涨将自身成本的上涨转嫁给消费者。

反事实的 (Counterfactual): 貌似真实, 但并不是真实的。

~~~~~

**通货紧缩 (Deflation)**: 物价水平的总体下降——与通货膨胀相反。

**活期存款 (Demand Deposits)**: 按活期支付的银行存款; 现金支票。

**萧条经济学 (Depression Economics)**: 在萧条时期足以解释经济事件的理论, 但在充分就业时期或通货膨胀时期不能解释经济事件。这个词语通常指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发展起来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解除管制 (Deregulation)**: 减少或消除按照政府管制机构——如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规则进行的资源分配。

**引致需求 (Derived Demand)**: 间接需求。汽车轮胎的需求主要取决于 (来自于) 对汽车的需求。如果汽车销售 (或使用) 下降, 则轮胎的需求也下降。引致需求是体现在消费者需要的产品或服务中的间接产品或要素的需求。

**贬值 (Devaluation)**: 一国基本货币单位中所体现的法定特殊金属币值的减少。

**边际效用递减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从额外一单位商品或服务的消费中获得的增加的满足程度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而减少。

**相机抉择的政策 (Discretionary Policy)**: 与自动或强制政策相反的政策。相机抉择政策是按照政府的意愿或念头而选择性地开始、停止或改变。

**双重负债 (Double Liability)**: 1827 年纽约实行的强加于银行股票持有者两倍的票面价值的负债, 目的是鼓励谨慎投资。

**倾销 (Dumping)**: 商品或产品以低于国内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到国外。

**耐用商品 (Durable Goods)**: 通常能够重复使用多年的消费品。与食品或服装在使用中较快消失的商品相反, 汽车和冰箱一般被看做耐用消费品。

~~~~~

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 真实人均收入的提高。

征用权 (Eminent Domain): 国家对一切财产具有支配权, 通过它可以将私人财产征收为公共使用, 但必须对所有主支付适当的补偿。

货物集散地 (Entrepôt): 商品储藏分发的中心。

均衡价格 (Equilibrium Price): 市场价格。需求和供给相互作用形成的价格, 需求或供给都是零剩余 (多余)。均衡价格将会保持不变, 除非需求或供给移动。

外部经济 (External Economies): 在既定的生产过程之外产生的成本降低, 因此对它是“外部的”。靠近铁路对工厂来说就是外部经济, 因为靠近的位置降低了原材料和制成品的运输成本, 而且这不是生产过程本身的一部分。

~~~~~

**生产要素 (Factors of Production)**: 用于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有三种基本的要素: 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 (包括土地)。在一些语境中, 企业家也被看做一种生产要素。



**联邦储备体系 (Federal Reserve System)**: 美国的中央银行, 由 12 个区域银行组成的体系, 1914 年开始运行。

**完全所有权 (Fee Simple)**: 土地具有直接继承权的地产, 美国人称之为土地占有制。

**不兑换纸币 (Fiat Money)**: 没有金属货币支持的、由政府发行的完全法定货币。

**金融工具 (Financial Instruments)**: 债券、股票、抵押贷款以及所有的金融交易与债务的可买卖凭证。

**固定汇率 (Fixed Exchange Rates)**: 不随市场条件而波动的汇率, 金本位制的汇率。

**福斯特制度 (Forstall System)**: 一种路易斯安那制度, 要求票据和存款要有 1/3 的金属货币准备金。它还限制州银行将存款资金贷放为商业票据时, 要有 90 天的到期日。

**部分储备金体系 (Fractional Reserve Banking)**: 一种银行保留存款的一部分作为银行准备金的制度。

**自由和普遍的租佃 (Free and Common Socage)**: 美国的基本土地占有制度。其特征如下: 土地永久占有; 可以直接继承; 之上的所有义务是固定的; 所有者有权闲置浪费; 可以自由转让。

**自由银行制度 (Free Banking)**: 起源于纽约的一种制度, 任何群体的个人都能获得银行特许执照, 只要所在群体遵照通用规则进行注册, 同意根据各州的规则开展银行业务, 在有些州, 还要同意保留特定的准备金。

**搭便车者 (Free Rider)**: 一个人或经济代理人, 从一项并未作贡献的支出 (通常是公共支出) 中获得利益。一个经济活动类似于驾驶一辆不必付费的公共汽车。任何公共提供的服务肯定会出现一些搭便车, 因为所有人都可以使用服务, 不管是否缴税。

**银币自由铸造 (Free Silver)**: 一场寻求银币自由铸造的运动。

**自由贸易 (Free Trade)**: 不存在壁垒 (例如关税、配额、限制贸易) 的国际贸易; 壁垒用来干涉购买或销售, 以保护国内生产者免于国际竞争。

**充分就业 (Full Employment)**: 找工作的人数和工作岗位空缺数保持平衡的劳动力市场均衡。

**通用技术 (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 对全线产品的操作和生产系统非常重要的、具有通用功能的技术。

**金本位制 (Gold Standard)**: 一种国际金融制度, 一国的基本货币单位由给定的黄金重量来定义。

**绿背主义 (Greenbackism)**: 绿背党 (1875—1876) 的政策纲领, 政策目标是用国库流出的纸币, “绿背美钞”来回购国债。政策的目标是降低税负并提高农产品价格。

**格雷欣法则 (Gresham's Law)**: 格雷欣法则是劣币驱逐良币法则的简称。在格雷欣最初的论述中, 是指在造币厂价值过高的钱币总是会将价值较低的货币驱逐出流通领域。他所指的价值是与官方铸币价格比较的价值, 即金和银的市场价格。

**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一年内一国的生产要素新生产的、不重复销售的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 无论谁拥有生产要素。

**国民生产总值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 一年内一国的本国居民拥有的生产要素新生产的、不重复销售的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 无论生产要素在何地。

**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为了维持或增加商品或服务的产量而进行的必要的技能、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投资 (以成本计)。

**恶性通货膨胀 (Hyperinflation)**: 通货膨胀率异乎寻常地高。

**规模收益递增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随着投入水平的提高而成本降低的现象。例如, 某些商品生产中流水线的使用有助于产生规模收益递增。

**契约用工 (Indentured Servitude)**: 凭借契约个人同意在一定年限内做某种工作, 以特定的支付方式作为收益, 主要是食物、衣服、住宿, 或许还有一些教育或技能、手艺训练。

**按指数调整的 (Indexed)**: 用指数除过的数据, 因而能反映不同时期相对关系的变化。

**幼稚产业 (Infant Industry)**: 有必要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的新兴工业, 直到它们成熟并能进行国际竞争。

**通货膨胀 (Inflation)**: 商品或服务的总体平均价格的上涨趋势。在通胀中, 许多个别商品的价格上升而其他商品的价格下降, 而其他商品的价格可能保持不变。通货膨胀通常用一般价格指数来衡量, 如消费品价格指数。

**禁令 (Injunction)**: 一般而言, 司法命令要求所指示的人采取或避免某些行为。特别地, 它常常被用做针对有组织的劳工的合法工具。

**投入 (Inputs)**: 企业转换为产出的要素, 通常用土地、劳动和资本三要素来衡量。例如, 面粉和酵母是制作面包的投入。

**中介 (Intermediation)**: 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金融机构。

**投资品 (Investment Goods)**: 见资本设备。

**股份公司 (Joint-Stock Company)**: 一种合伙关系, 每个合伙人都得到与他投资数量相当的可转让股票份额。与一般公司不同的是, 其责任是无限的。针对股份公司 (或由其发起) 的诉讼通常由公司的管理人员提出。

**司法工具主义 (Judicial Instrumentalism)**: 美国法官在立宪总体边界之内, 并且能修改法律实质内容的能力; 解释法律的自由。

**工人运动 (Labor Movement)**: 有组织的劳工力争获得工会的合法承认和其他有利于工会的地位的努力。

**劳动生产率 (Labor Productivity)**: 每单位劳动的产量。

**劳动节约、劳动利用型机器 (Labor-Saving, Labor-Using Machinery)**: 用来替代劳动 (在劳动力稀缺的情况下) 的机器, 或开发劳动 (在劳动力富裕的情况下) 的机器。

**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 这个术语描述的是政府不干预经济运行的一种状态。

**法定货币 (Legal Tender)**: 在法律授权下, 可以用于债务支付、不会被债权人拒绝的货币。

**长期供给 (Long-Run Supply)**: 一段时期内各种价格水平上有效产出 (供给) 能力的变动。

**宏观经济稳定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整体经济活动由充分的投资和技术变迁来保持充分就业和足够的经济增长。

**马尔萨斯压力 (Malthusian Pressure)**: 人口增长造成的经济困难, 例如饥荒。

**保证金 (Margin)**: 客户存放在经纪人那里、保证不失去交易的一笔款项。通常用总数的百分比来表示, 它表示的是客户这样数量的股票。

**追加保证金 (Margin Call)**: 经纪人要求客户提供更多的现金; 也参见保证金。

**边际进口倾向 (Marginal Propensity to Import)**: 在给定一段时期内进口变化相对于 GNP 的变化。

**市场决定 (Market Decision)**: 由市场交易 (例如市场出清均衡价格的建立) 决定的价格引导的资源配置。

**市场失灵 (Market Failure)**: 价格体系不能产生社会最优量的一种状态。

**公开市场 (Market Overt)**: 已建市场的日期和地点的体系。

**重商主义 (Mercantilism)**: 通常指 17—18 世纪欧洲政府的政策, 利用倾斜的国际贸易政策来保证稳定的经常账户盈余, 这样来积累贵金属。

**微观经济不稳定 (Microeconomic Instability)**: 暗指市场上企业之间的竞争性斗争。这些斗争能够产生局部的经济变动, 甚至是破产和失业, 但在这么做的同时, 能够保证劳动力和资源有效配置到生产收益最高的地方去。破产和失业“释放”劳动力和资源到生产性更好的用途上。局部是不稳定的, 但这种不稳定在总体上有助于资源的最有效配置。

**军工复合体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在军事和供应商品和服务的企业之间的密切关系。

**混合经济 (Mixed Economy)**: 一种既有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元素, 又有联邦政府的规制和管理的经济体。

**货币主义 (Monetarism)**: 将 GNP 的增长归因为货币存量增长的经济思想流派。货币主义者将通货膨胀看做货币增长超过 GNP 增长的现象。

**货币幻觉 (Money Illusion)**: 货币或名义收入增长混同为真实收入的增长。

**负外部性 (Negative Externalities)**: 经济活动施加于相邻经济主体的未补偿的损害。一个例子是空气污染。

**名义价值 (Nominal Values)**: 名义价值是一个时期中当期价格概念。

**非市场社会调控 (Nonmarket Social Control)**: 由政府、宗教团体、暴民行动或其他非市场力量配置资源的方式。与之相反的是市场决定。专业许可就是非市场社会调控。

**机会成本 (Opportunity Cost)**: 一项选择所放弃的最大收入 (收益)。例如, 一个成功的广告公司的业务代表有两个选择——待在麦迪逊大街或抛掉一切在纽约州的边远地区 (他毕生的梦想) 养英格兰长毛猎犬。如果他决定养狗, 那么他放弃的较高的收入就是他的机会成本。

**完全竞争 (Perfect Competition)**: 一种市场结构, 其中有大量的买者和卖者, 买者和卖者进入市场都很容易, 没有哪个买者或卖者能够影响价格, 价格无限制地自由波动。

**警察权 (Police Power)**: 政府维持稳定与和平环境的权力, 必要时有权使用暴力。

**强制收购 (Preemption)**: 仅仅由占有权而获得的财产权——“擅占”。1860 年以前强制收购通常指通过在公地上定居而获得先购买土地的权力。强制收购也被称为擅占者的权力。

**惯例权 (Prescriptive Right)**: 个人不能用这种方式使用他的财产而破坏其他人便利的权力, 而不对此破坏负责。

**价格差异 (Price Differentials)**: 同一件商品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价格销售。

**第一产业 (Primary Sector)**: 农业、矿业、渔业和林业。食品、原材料和能源的最根本来源部门。

**长子继承权 (Primogeniture)**: 一种继承制度, 由长子继承家庭财产。

**优先权 (Priority Rights)**: 超越或在强制收购之上的权利。

**生产率 (Productivity)**: 在一定的时间内每种投入要素 (或所有要素放在一起) 生产的产出数量。

**特许殖民地 (Proprietary Colony)**: 由君王赐予特定个人的大片土地。这类殖民地上的居民保有所有英国的权利, 包括代议制政府的权利。

**公共物品 (Public Goods)**: 通常由政府提供、单个消费者使用不会减少总供给的服务 (例如, 国防)。

**免役租 (Quit Rents)**: 与周期性支付的单一税捆绑在一起的一组固定附带条件。这些租金最终成为

现代美国的地方财产税。

**不动产 (Real Assets)**: 房屋、汽车、机器和建筑, 与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 (有时称为无形资产) 相对应的资产。

**真实价值 (Real Values)**: 用不变价格计算的真正值。名义收入、工资或 GNP 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上涨, 但如果上涨是完全由通货膨胀引起的, 那么真实收入、工资或 GNP 并未上涨。

**衰退 (Recession)**: 在经济周期扩张阶段的顶峰之后经济活动在总量上的下降; 官方将其定义为真实 GNP 两个连续季度的下降。通常伴随着人口失业和资源闲置的上升。

**出卖劳力来抵偿船资之移民 (Redemptioners)**: 商定在到达美国后再支付船票费用的大规模非英国移民。通常商定的是契约约定的学徒。

**租金 (Rent)**: 超过投资或生产性费用竞争选择的收益。一个钢琴家能够获得的超过次优选择的收入之上的收入就是他的租金。

**寻租 (Rent Seeking)**: 寻求租金的资源配置。

**保留价格 (Reservation Price)**: 卖者同意出售的最低价格。

**准备金率 (Reserve Ratio)**: 银行存款中作为准备金的百分比。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工具之一。

**剩余索取者假设 (Residual Claimant Hypothesis)**: 如果真实工资下降, 劳动成本降低, 其他保持不变, 对那些净收益增加的企业, 剩余索取者要求的真实收入将会增加。

**皇家殖民地 (Royal Colony)**: 由王室直接控制的殖民地。

**安全基金 (Safety Fund)**: 纽约州的强制性存款保险, 是现代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的前身。

**规模经济 (Scale Economies)**: 见规模收益递增。

**第二产业 (Secondary Sector)**: 制造和建筑业; 食品和商品生产是第一产业。

**规模效应 (Size Effect)**: 单个企业通过扩张生产, 超过很多法定管辖范围, 以逃避当地非市场化管制的能力。

**社会节约 (Social Savings)**: 一项特定活动的实际成本与完成同样目的的次优选择的机会成本之间的差。经常用 GNP 的百分比来表示。

**社会主义 (Socialism)**: 国有生产要素集中决策和规划的一种经济体制。

**硬币 (Specie)**: 用金、银或其他贵金属制成的货币。

**投机 (Speculation)**: 预期价格改变而对商品、土地或证券进行购买或期货售出, 而不是使用或仅仅为了年度收益。

**滞胀 (Stagflation)**: 由于资源未利用导致的真实产出停滞与价格通胀并存的现象。

**成文法 (Statute Law)**: 以颁布的法令为基础的法律。

**萨福克体系 (Suffolk System)**: 萨福克银行和其他波士顿银行一致同意接受并支付乡村银行的账单, 保持乡村银行在波士顿银行的准备金存款。

**“日落”法 (Sunset Law)**: 定期实施法规的法律。要法规继续实施, 必须重新颁布法律。

**供给经济学 (Supply-Side Economics)**: 一种分析经济活动的理论, 集中关注的是 GNP 决定中的生产成本要素和技术变迁。相反的是“需求”经济学, 集中关注消费、企业和政府支出的决定作用。

**支持价格 (Support Price)**: 对某种商品给予的高于市场价格的政府收购价格。例如, 许多农产品都有支持价格。

**摆动信贷 (Swing Credits)**: 与马歇尔计划一致的, 1947—1950 年欧洲经济复苏时期欧洲国家之间的自动借贷权利。

**关税 (Tariff):**对进口商品 (和服务) 征收的税, 以提高收入和 (或) 阻止或减少这些商品的进口。

**专家阶层 (Technostructure):**约翰·加尔布雷斯发明的术语, 用来描述大的现代企业的技术人员、工程师、科学家、生产专家、销售策划者等第二层次人员。这个层次的人员处于最高管理层之下, 然而任何企业的专家阶层都有其生产性和创新性能力。在加尔布雷斯看来, 正是专家阶层而不是最高管理层决定企业的未来。

**占有期 (Tenure):**保有财富的时期或阶段, 尤指土地。

**贸易条件 (Terms of Trade):**个人或国家生产的产品所得到的价格与他们购买的产品的价格之比。

**第三产业 (Tertiary Sector):**服务业、专门职业——计入国民收入的当期经济活动, 并不直接参与衣食住生产。教育、餐饮、旅馆住宿、医疗保健等都是服务业。

**交易成本 (Transactions Costs):**将买卖双方联系在一起完成交易的成本。

**转移型社会 (Transfer Society):**通过政府将财富从富人转移到穷人的社会。

**单一制银行 (Unit Banking):**每一家银行都是独立的企业实体, 与任何其他银行没有附属关系。

**增加值 (Value Added):**企业获得的收入减去其原材料的成本。

**财富 (Wealth):**一段时间内净储蓄的和。财富用存量变化来衡量, 而储蓄是从当期收入中形成的流量。

**零和 (Zero Sum):**诸如博弈中的一种状态, 总的所得和所失是固定的, 所得和所失加起来等于零。这样, 无论谁赢, 总有人必定输。

## 译 后 记

本书的两位作者是西北大学的乔纳森·休斯和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西北大学的路易斯·P.凯恩,他们以丰富的数量技巧和深厚的经济理论,用雅致朴素的语言,呈现了美国从殖民地前期到现在的经济发展历程,使人们仿佛漫步在4个世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画卷之中。大体按年代排序,分为五个阶段:殖民地时期(1607—1783);国家时期(1783—1861);内战及内战后时期(1861—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1914—1945);二战后时期(1945年至今)。本书聚焦于经济史的法律和制度问题,并紧扣当期经济学主题,反映了最新的学术进展。此外,还提供了大量数据资源,包括网址、引文资料等。

这本书是美国大学广泛使用的经济史教材,自出版以来受到广泛欢迎,本书是第七版的中译本。正如作者之一的凯恩所说:“美国经济史是理论家和决策者为改进国家经济的绩效和美国人民的福利而持续努力的‘临床经验’。”总结美国保持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检验历史的资产与负债,是经济史研究的目的所在。复杂的人类制度经历了时代的变迁,是人类社会代代相传的遗产,在美国如此,在我国亦不例外。因此,美国的经济史对我国的经济实践而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除了经济学、经济史的学生可以作为教材或者参考书外,经济学、经济史领域的学者也可以将本书作为研究资料,它仿佛是一个丰富的矿藏,提供给你翔实的史料、独特的视角以及具有启发性的思想。

我们虽不是专业全职译者,但都具有经济学研究背景,凭着对经济学、经济史的理解,力求用直译方式完整地将本书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然而能力所限,难免有所纰漏,其中的不顺畅、不达意之处,敬请读者包涵。

本书是合作翻译的结果,原由樊铎翻译,不幸的是,樊铎翻译至第4章时英年早逝,后由邢露、邸晓燕继续翻译,其中邢露翻译至21章,邸晓燕翻译第22—31章,最后由邸晓燕统稿并翻译、校对全书的脚注和图表。为了保证前后一致,对术语部分统一进行翻译。对北京大学出版社负责本书的仙妍编辑和郝小楠编辑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她们耐心、细致、辛苦的工作。

邸晓燕

2010年12月10日

[ General Information ]